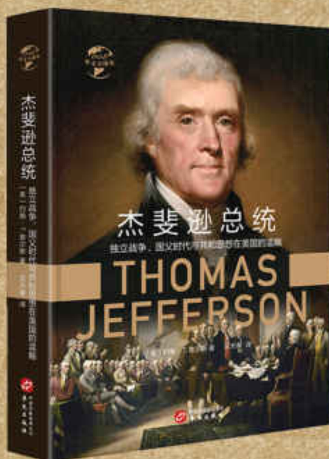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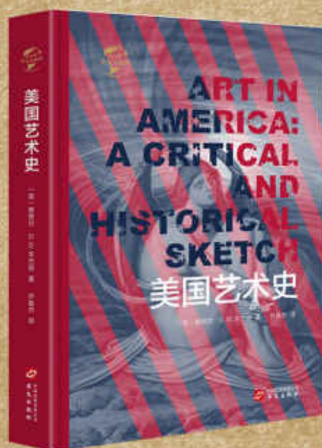
华文全球史 | 全景插图版

有图有真相 史学流派 史学大家 史学名著

全面了解美国

套装4册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总目录

美国艺术史
新美国：从门罗主义、泛美主义到西奥多·罗斯福新国家主义的蜕变
杰斐逊总统：独立战争、国父时代与共和思想在美国的滥觞
美国内战史：1861—1865



AM

A C

美国艺术史

ART IN AMERICA: A CRITICAL AND HISTORICA SKETCH

［美］塞缪尔·G.W.本杰明 著　乔春杰 译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華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艺术史/（美）塞缪尔·G.W.本杰明著；乔春杰译.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1

（华文全球史）

ISBN 978-7-5075-5013-9

I. ①美… II. ①塞…②乔… III. ①艺术史—美国 IV. ①J17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7625号

美国艺术史

作　　者：[美]塞缪尔·G.W.本杰明

译　　者：乔春杰

选题策划：

插图供应：029-85504182

责任编辑：贺金娥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总编室010—58336239

发行部010—5833621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x1000　1/16

印　　张：20

字　　数：270千字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5013-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前言
第1章 迷茫与探索：在绘画世界闯荡的天才
第2章 舶来品与原创性：肖像画与风景画领域的吸纳与进取
第3章 风景画、动物画与历史画：艺术流派的多元化与艺术家个性的深化
第4章 从西部题材到静物画：理论创新与实践转型
第5章 雕塑艺术：从海勒姆·鲍尔斯到W.R.奥多诺凡
第6章 趋势与流变：现实主义、实用技术与本土化理想
专有名词中英对照
返回总目录

前言

本书旨在梳理美国艺术发展史的脉络。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在选材过程中进行了必要的评论，因为只有通过介绍最能代表美国不同历史阶段的艺术家的代表作品的差异及特色，才能追根溯源，还原美国艺术的发展轨迹。

由于本书既定篇幅的限制，旅居国外的艺术家们的作品中只有雕塑家的作品列入了这本书的讨论范围内。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旅居国外的艺术家们，如弗雷德里克·A.布里奇曼、F.杜韦内克、摩西·怀特、大卫·尼尔、亨利·培根、尤金·本森、欧内斯特·帕顿、弗朗西斯·D.米利特、J.A.惠斯勒、W.P.W.达纳、埃德温·H.布拉什菲尔德、加德纳女士、科妮莉亚·W.科南特以及很多其他艺术家都是非常杰出的艺术大师，他们为美国审美文化增光添彩。本书筛选作品的标准是篇幅的大小限制，不是艺术家的才华高低。雕塑家的情况比较特殊，他们都曾在欧洲工作或生活过，而且至今还有很多雕塑家旅居在外。如果这本书只讨论国内的诸多艺术家，雕塑艺术作为艺术分支的讨论内容就会受到限制。因此，这本书谈论的范围包括国内外的美国雕塑家。借此机会，我想真诚感谢各位艺术家和业余艺术爱好者的慷慨相助，同意自己的作品副本引入本书。

第1章　迷茫与探索：在绘画世界闯荡的天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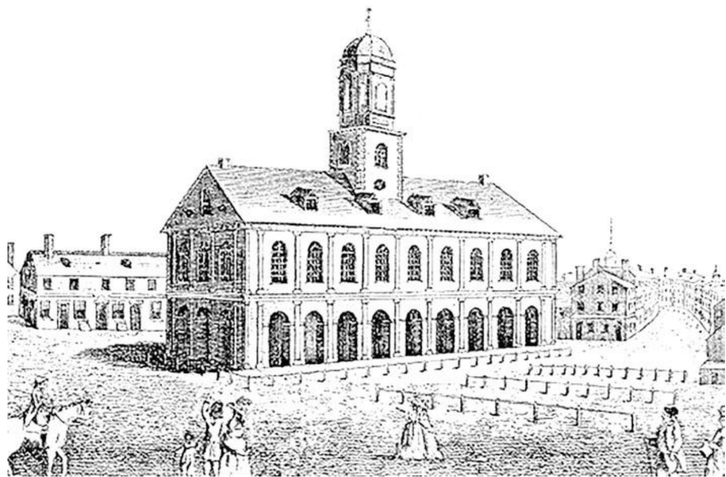


肖像画家约翰·范德林（1776-1852）

一个民族的艺术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才能结出硕果。有了成熟的思想和闲适的生活，艺术才会有机会发展到鼎盛。虽然美国现在还很难找到一个伟大的艺术流派，但或许可以介绍一下美国艺术发展初期的一些流派。我们有理由希冀，不久的将来，我们国家一定会诞生一个伟大的艺术流派。

作为时代的继承者，我们有理由认为智力活动需要通过艺术来表达。毫无疑问，最初的艺术表达是模仿而不是创造。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只有年轻的一代朝气蓬勃、刚毅成熟、富有主见，并意识到上帝赋予自己的天赋和资源，才能通过探索真理充分张扬个性。我们国家的艺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兴起的。目前为止，我们依然在模仿我们祖先们创造的母国的艺术成果，而缺乏独创性。我们的艺术成果更多的是源于模仿国外的艺术成就，而非独立观察自然。虽然艺术家队伍庞大，但很少有人独树一帜，创造一种新方法、新思想。少数几个走在时代前沿的人往往曲高和寡，他们的影响面窄，影响力小，在艺术界得不到认同。除了一两个成就较高的艺术家，很少有人能建立一个艺术流派。但其中也有很多艺术家，尤其是我们艺术发展初期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中都不乏时代的烙印。这些艺术家性格刚毅、积极活跃，就像独立战争中的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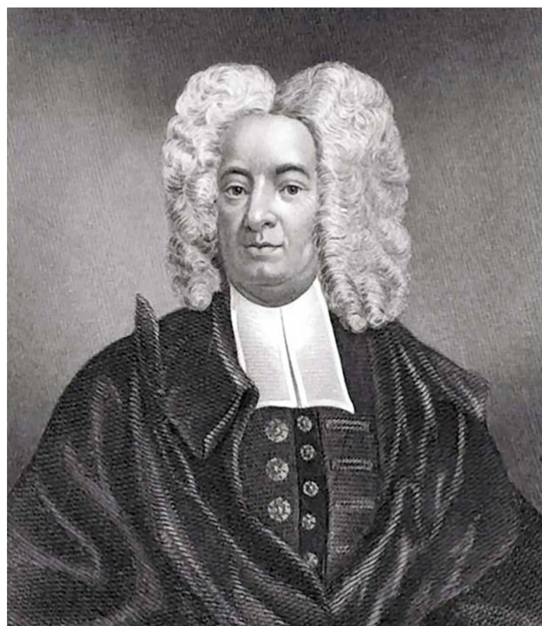
雄一样，具有鲜明的个性。他们生活的社会尚未发展到高度文明，因此人们还不能品鉴他们艺术的美质，但他们的名字却可以永存史册。过去几年，国人对艺术越来越感兴趣，不仅成立了众多艺术院校，建立了很多画廊，还增设专刊出版艺术作品，还有其他许多证据可以说明人们对艺术越来越重视。美国艺术的初期发展阶段在很多方面都很杰出，我们似乎可以说这一阶段已近尾声。现在虽然距第一批英国殖民者登陆美洲海岸还不到三百年，但我们已经开始开启第二个艺术征程。殖民时期记载的第一个专业艺术家的头衔并不属于艺术家一类，这位艺术家是一位执事。事实证明，正如旧志记载的那样，波士顿市的执事闪·德朗恩不仅是一位能工巧匠，擅长金属雕刻和木刻，还没有任何与传统艺术行业有关的不良嗜好。当时的人们生活简朴，清心寡欲，循规蹈矩，非常尊敬执事，因此执事往往被视为品德高尚的人。



《法尼尔厅》，闪·德朗恩绘

美国殖民时期的第一个百年，本土画家（几乎不能称为画家）通过给当时的名人贤士画一些黑白或彩色的肖像谋生，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如果看了这些保存下来的肖像画，你就会明白当时的画家们的生活境况。他们的画作古朴、粗糙、笨拙，画中没有任何有关画家的信息。但偶尔也会有一些出自有天赋的艺术家的油画，这些油画中的清教徒戴着硬褶边的领饰，凝视着众人。科顿·马瑟 [1] 提到过一个他称为画匠的艺术家。那个时代的人最不崇尚的就是艺术。除了安东尼·范戴克爵士、伦勃朗·哈尔曼松·冯·莱因、彼得·莱利爵士以及戈弗雷·内勒爵士创作的一

些家庭肖像画外，当时几乎没有什么艺术品。神学家们不欣赏这些珍贵的家庭遗物，但在推动西部荒野走向文明的进程中，这些遗物并不是没有价值的。这些流传下来的作品使人们想起其他国家、其他时代的伟大艺术，不知不觉中，这些作品影响并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任何人的努力都不会是徒劳的，人们付出的努力会很快转化成其他形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根发芽，就像十月播下种子，来年四月结出新的种子一样。



科顿·马瑟

美国的第一位画家是约翰·沃森。约翰·沃森是一位苏格兰人，1715年在费城画肖像画。他的确有些艺术天赋，人们至今还经常提到他。我们认为第一位有明显艺术冲动的美国艺术家是另一位苏格兰人。他在殖民地结婚，坚信殖民地将会越来越繁荣昌盛。提到这位苏格兰艺术家时，我们首先要感谢伯克利主教[2]，因为他睿智的双眼能穿透未来的迷雾，看到国家即将到来的辉煌。

伯克利主教与美国的文学艺术的发展息息相关。他拨给耶鲁学院许多书籍，在新港成立了后来被称为红木图书馆的核心机构，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红木图书馆的大楼建于1750年，建造资金来自伯克利主教的捐赠。对一个缺少宏伟建筑的民族来说，红木图书馆暗示了建筑带给人的视觉享受。红木图书馆由约翰·范布勒设计。约翰·范布勒是现代最伟大的

建筑师之一。虽然红木图书馆仅由木材和砂浆建成，但其平面图雅致和谐，令人赏心悦目，一直是殖民地最优雅的建筑结构。时至今日，从建筑艺术角度欣赏红木图书馆，会发现内陆地区许多造价不菲、规模宏大的沿袭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形式设计出来的大楼仍然不能与之匹敌。最后，我们认为在伯克利主教的推动下，美国出现了艺术的曙光。1725年，伯克利主教劝说苏格兰人约翰·斯米伯特离开伦敦，定居波士顿。约翰·斯米伯特在波士顿非常幸运地娶了一位有钱的寡妇，因此他富裕、美满地过完了一生，1751年去世。约翰·斯米伯特并不是一个伟大的画家，他如果留在欧洲，即使在艺术衰落的年代，也只能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普通画家，地位不会更高了。但我们应该感激约翰·斯米伯特，因为他的画作让那一时期的很多先贤的容貌得以留存后世，他无疑也为后来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艺术家们树立了典范。受约翰·斯米伯特的影响，这些艺术家们认为新大陆有权利用资源鼓励艺术的发展。下面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事件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约翰·斯米伯特对美国早期艺术的影响。约翰·斯米伯特前往美国时带了一幅自己创作的名为《范戴克》的肖像画副本。这幅画非常出色，华盛顿·奥尔斯顿等艺术家都说第一眼看到这幅复制品时深受触动，于是产生了灵感。约翰·斯米伯特在美国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一幅伯克利主教的家庭群体肖像画。这幅画现在保存在纽黑文美术馆。一群外国肖像画家效仿约翰·斯米伯特来到美国，创作了很多佳作，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名人淑媛们的容貌。当时除了布莱克本和科斯莫·亚力山大，他们中并没有特别出名的画家，但他们辛勤的劳动依然结出了硕果，为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的成功铺平了道路。第一个有天赋的美国本土画家是罗伯特·费克。关于罗伯特·费克有一些清楚的记录：他出生在一个贵格会 [3] 教派家庭，后来定居在新港。现在新港还可以看到罗伯特·费克的肖像画作品，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万顿州长的漂亮妻子的画像。这幅画保存在红木图书馆里。罗伯特·费克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艺术教育，因为他一直被囚禁在海上，后来被带到了西班牙。他非常有才能，并在西班牙学会了如何使用颜料。费城的马修·普拉特也很有才华，他生于1734年，比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和本杰明·韦斯特年龄稍长，但成名较晚，因为他多年来一直沉迷在标牌绘制和房屋装饰中。


彼得·莱利爵士


詹金斯和妻子玛格丽特，彼得·莱利爵士绘



戈弗雷·内勒爵士



钱多斯公爵与家人，戈弗雷·内勒爵士绘



新泽西总督路易·莫里斯，约翰·沃森绘



纽约州州长威廉·伯内特，约翰·沃森绘



伯克利主教与家人，约翰·斯米伯特绘



万顿州长的妻子，罗伯特·费克绘

殖民地突然表现出了潜在的审美能力，那时的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年仅十七岁，只学习了一些艺术基础知识就开始以作画为生了。虽然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的职业是艺术，成名也非常早，但宾夕法尼亚的一名贵格会年轻人比他更早从艺。这个年轻人比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小一岁，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对艺术的热爱。



战神维纳斯和伏尔甘，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绘

一个民族的艺术作品中，很少有比本杰明·韦斯特的第一部作品更令人印象深刻、不同凡响的。1738年，本杰明·韦斯特出生在宾夕法尼亚的斯普林菲尔德，比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年长一岁。未来的学者可能会告诉我们，美国艺术发展初期六位艺术大师成对出现并不是一个巧合：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和本杰明·韦斯特分别于1737年和1738年出生；吉尔伯特·斯图尔特和约翰·特朗布尔上校出生在1756年；1776年，约翰·范德林出生，三年后，华盛顿·奥尔斯顿出生。



本杰明·韦斯特自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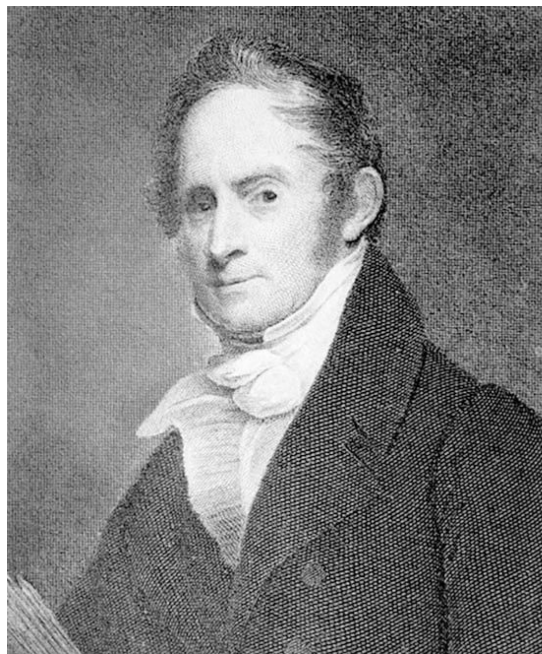
反对崇拜圣像的人捣毁了很多雕塑作品，焚烧了艺术杰作，并剪短了自己的头发，通过颁布禁奢法履行教规。为了不受他人阻挠，维护刻板的教条，这些人远渡重洋来到蛮荒之地。他们的后代现在要证明父辈们的纯正品格，证明爱美是普遍的、不可抑制的。每个人、每张嘴都会发出心声，通过艺术形式和艺术方法追求至善至美。清教徒的严苛是有针对性的，他们并不反对合法地追求艺术和美，但他们反对劣质的艺术对纯洁心灵、高尚情感的玷污。

有必要强调一下这些观察的真实性以及著名的伯克利主教预言的准确性。多年来，美国艺术兴起的最大激励因素应该是本杰明·韦斯特。本杰明·韦斯特是一名贵格派教徒。那时的艺术条件很差，本杰明·韦斯特最初从事艺术创作时和乔托·迪·邦多纳一样，没有多少资源可以利用。九岁时，本杰明·韦斯特用猫尾巴上的毛给自己做了一支画笔，将木炭和粉笔研磨后，并从黑莓中挤出红色汁液做颜料。他母亲的洗衣店给他提供了靛蓝，他父亲的印第安朋友给了他印第安人用来涂脸的红色和黄色的土。小本杰明·韦斯特用这些简单粗糙的材料画了一幅睡在摇篮里的孩子的画。很久以后，在他艺术生涯的巅峰时期，这位早熟的天才甚至声称

自己的作品永远也无法超越他第一次努力创作的那幅画。

后来，本杰明·韦斯特逐渐在当地出名，随后去了意大利，并在意大利获得了职位。后来他在英国生活了四十年，得到了英国国王的垂青和提携，成了英国皇家学院的院长。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本杰明·韦斯特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非常热爱祖国，去世后不仅受到了艺术家们的缅怀，还受到了同胞们的敬仰。美国艺术界应该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怀念本杰明·韦斯特，因为没有一个画家比他对努力奋斗的美国艺术家更友善、更慷慨。我们早期的画家一到达伦敦，就会去寻求本杰明·韦斯特的援助和指导。本杰明·韦斯特是一位很好的朋友，他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慷慨帮助这些画家，甚至让这些画家在自己的画室里支起画架，不遗余力地认真指导他们。约翰·特朗布尔、吉尔伯特·斯图尔特、威廉·邓拉普等许多艺术家都应该忘记本杰明·韦斯特的缺点，记住这位艺术家曾给予远渡重洋而来的有远大抱负的美国艺术家的巨大帮助。

本杰明·韦斯特去世后，我们必须承认他是我们国家诞生的伟人之一。然而，贬低本杰明·韦斯特的艺术、谴责他的性格已经成为时尚，这似乎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使诽谤者名誉扫地。我们不应该主观地去评判一个人，更不应该将这些艺术家和古代的圣人做比较，而应该将他们和他们同时代的人做比较，还要考虑他们遇到的机会。评价古人时，我们也需要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而不是按照我们生活的时代的标准评判他们。艺术评价是最容易出现观点过激、片面，而且不够宽容，误判他人的一个领域。本杰明·韦斯特很有艺术天赋，而且成名很早，很快就达到了他的艺术创作巅峰，这和他的刻苦勤奋以及对艺术的至诚是相称的。



威廉·邓拉普

总体来看，本杰明·韦斯特的艺术特点是所有作品的质量比较均等，没有出类拔萃的作品，色彩中总有某种不相宜的砖红色色调。譬如他创作的《雷古鲁斯出发》《死在灰马上》和《沃尔夫之死》。但必须授予他天才之称，因为他勇敢面对时代的质疑，摒弃了历史类作品中的古典服装，暗示出大胆和知觉的力量，赢得了约书亚·雷诺兹爵士的赞赏，并在特定历史时期掀起了艺术革命。本杰明·韦斯特显然是那个时代的杰出艺术家，但应该说是那个时代造就了他，而不是他塑造了那个时代。本杰明·韦斯特倾向“因袭主义”[4]。当进入艺术领域时，他求学的意大利与英国的艺术界一片萧条，但约书亚·雷诺兹爵士和庚斯博罗的作品给了艺术新的推动力。本杰明·韦斯特由于艺术潜能发掘过早，很早就已经无法继续前进了。

本杰明·韦斯特十五岁时已经成为一名肖像画家。1755年，年仅十七岁的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也进入肖像画领域。本杰明·韦斯特终年七十九岁，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七十八岁离世。和本杰明·韦斯特相比，必须承认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的艺术生涯更具本土性，完全属于美国风格。虽然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早期得到了他继父佩勒姆的一些指导，并拥有本杰明·韦斯特没有的师从外国艺术家的机会，但他的优势还是太

少。三十九岁定居英国时，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的一切艺术成就完全来自他自己的独特风格和创意。我们可以自豪地将他的作品列入本土最有价值的艺术瑰宝行列。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富有才华，是当时最受尊崇的艺术家之一。还没有穿越大西洋前往英国前，他已经在英国出名，因此他后来在伦敦得到了很多人的资助。据说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工作努力，勤奋刻苦，做事认真仔细。他会花很多时间精心设计一件衣服的每一个细节。但如果公众的评论是正确的，那么现在许多被认为出自他手的画作很可能是赝品。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对一个新英格兰家庭来说，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的姓氏相当于一个贵族头衔。因为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声名远扬，所以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潜心模仿他的风格，创作的肖像画惟妙惟肖，很多人误以为是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的作品。但仍有一些经过严格鉴定的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真迹保存得非常好，艺术学生非常喜欢研究这些作品。对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的评价大多是公正的：他自学成才，优缺点都很独特，作品风格过于生硬，人物轮廓有时比较僵硬死板，不够优雅。在那个服饰讲究，形象庄重的年代，人物僵硬的缺点不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现在看来这一缺点显得比较突出。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最好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出这些缺点。在运用色彩方面他远胜于本杰明·韦斯特，尤其善于巧妙地捕捉眼神，并且重现了那个时期的优雅礼服。他在感知和表现人物个性以及描绘手部的特点方面也非常出色，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能够超越他。瑞莉芙·吉尔夫人八十岁时，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为她画了一幅肖像画。这幅画很好地体现了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对人物手部的特点的感知和表现力。吉尔伯特·斯图尔特这样评价《埃普斯·萨金特上校》中的手：“只要扎一下手，血就会喷出来。”这幅画的确是一幅杰作。没有画家比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更能和时代产生共鸣，当我们看到他那令人钦佩的肖像画时，仿佛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将我们拉回过去。他在画中用一些神来之笔纪念那些殖民时期的领军人物。这些人物身穿色彩亮丽且厚重的制服，衣服上配有织锦和刺绣的天鹅绒以及精致的花边和领带。同时，我们也对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的艺术天赋感到震惊，他几乎没有接受过艺术培训，但他的画作却可以让同时代的人流芳百世，他的点睛之笔也备受后人敬仰。



《沃尔夫之死》，本杰明·韦斯特绘



《生意人的道路》，约书亚·雷诺兹爵士绘



《乔治·克莱夫与家人及印度女仆》，庚斯博罗绘



《埃普斯·萨金特上校》，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绘

最终决定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盛名的是他传之后世的优秀的肖像画。同时人们也不会忘记他是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历史画画家。他在波士顿画的一些画，譬如《皮尔森少校之死》《查塔姆之死》和《男孩和松鼠》等，将会使这位18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艺术家声名远播，永存史

册。

殖民地另一位很有名的艺术家是查尔斯·威尔逊·皮尔。查尔斯·威尔逊·皮尔认为自己的成名纯属偶然，但他确实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也许当幸运之风转向自己时，他知道如何努力使其化成自己的优势。然而，一般情况下，就像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和本杰明·韦斯特那样，人们好像需要通过努力才能将命运扭向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但有时幸运女神好像只青睐查尔斯·威尔逊·皮尔。无论如何，查尔斯·威尔逊·皮尔获得的美誉与他的作品分不开，他的艺术作品和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有关，而且他的儿子伦勃朗·皮尔也从事艺术，因此他的家族艺术声名远播。查尔斯·威尔逊·皮尔并没有专攻一个方面，他像许多美国本土艺术家一样多才多艺，在各个方面都小有成就，但都未能达到极致。他在科学和力学之间徘徊，最终进入了艺术界，前往英国跟着本杰明·韦斯特学习，然后又返回美国参加了战争，并成为上校。查尔斯·威尔逊·皮尔聪明睿智，多才多艺。曾经有人这样描述他：“他用象牙为自己做了一幅袖珍画像，还做了眼睛和鲨皮盒。”



《皮尔森少校之死》，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绘



《查塔姆之死》，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绘



《男孩和松鼠》，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绘

查尔斯·威尔逊·皮尔的运气很好，他在独立战争前和战争期间为华盛顿画了几幅出色的肖像画。虽然这些画缺乏许多优秀的艺术特质，但却如实描绘了华盛顿总统的特征，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因此具有很大价值。

约翰·特朗布尔上校是另一位天赋异禀且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艺术家，他完成了艺术的民族转向。约翰·特朗布尔上校是康涅狄格州殖民地的总督乔纳森·特朗布尔的儿子。约翰·特朗布尔在哈佛大学接受古典教育，其间，他看到了由约翰·斯米伯特模仿安东尼·范戴克爵士的作品创作的一幅副本，该副本前文已经提到过。安东尼·范戴克是一位伟大的画家，曾在英国宴会厅受到了查理一世和亨丽埃塔·玛丽亚 [5] 的欢迎。一个人无意间的一个行为也许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现在这幅副本又结出了硕果，启发了有天赋的约翰·特朗布尔，燃起了青年时代的约翰·特朗布尔对色彩的热情，并最终使他成了一名伟大的历史画家。

但约翰·特朗布尔首先必须经历战争的考验。战争经历赋予了他经验和知识，后来他充分利用这些知识进行创作。约翰·特朗布尔服役时就表现得与众不同，他积极热情，自信豪迈，但脾气暴躁。起初他只是华盛顿的一名助手，随后在萨拉托加攻打约翰·伯戈因 [6] 时成了一名陆军少校，据此创作了在萨拉托加攻打约翰·伯戈因的作品。后来当他可以升任上校时，他放弃任职去了英国，跟随本杰明·韦斯特学习艺术。在约翰·特朗布尔年轻时候的许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本杰明·韦斯特的风格。

如果创新是天才的特点，那么约翰·特朗布尔身上的这个特点尤其显著。他最优秀的作品主要是在英国创作的，明显比他晚年在美国创作的作品好。导致这一差别的原因也许与缺少激发艺术家灵感的可预见的艺术影响力或缺少资助有关。约翰·特朗布尔在肖像画和历史画方面非常有天分，他创作的华盛顿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肖像画极具感染力，恰好证明了他的天赋。虽然这两幅画构图并不精确，细节特征也不太相似，但整个人物神情逼真，栩栩如生，而且看上去精神抖擞，热情豪迈，仿佛画中那些通过斗争成功为殖民地赢得军事独立和政治自由的英雄们就站在我们面前。约翰·特朗布尔创作了很多关于独立战争中重要人物的微型油画，画中的人物精神饱满，个性鲜明，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约翰·特朗布尔并不擅长表现女性美，他的天赋只游弋在一个有限范围内，但

在这一狭小范围里表现出的登峰造极在当时的盎格鲁-撒克逊艺术界非常罕见。他能准确感知色彩，敏锐洞察人物特点，具有超强的表现力。但在他不擅长的领域，譬如呈现女性特点方面，他的画作的着色就会显得不自然，缺乏生气。



约翰·特朗布尔的自画像

约翰·特朗布尔的一些画作非常杰出，因此我们必须称他是伟大的画家。他的艺术作品在一些历史画作中堪称经典，譬如《独立宣言的签署》《围攻直布罗陀》以及不朽的代表作《蒙哥马利之死》和《邦克山战役》。18世纪，《蒙哥马利之死》和《邦克山战役》没有被任何类似题材的作品超越，在美国历史画作中独领风骚。

约翰·特朗布尔的这两幅作品与柜体差不多大小，宏大和细微完美融合。画中的人物脸部一般很小，大多数情况下脸部肖像都来自生活，将画中人物的脸部裁剪下来放入画框中也可以做成一副肖像画。此外，他的每一幅画上都带有那一可怕时刻的个人强烈的情感印记，如憎恨、欢欣、痛苦、勇气、悲伤、绝望等，准确的细节描绘记录了当时人物的精神风貌和一系列活动。我们在画中看到了前进、猛攻、战争爆发等作战场景，和谐的线条加上明暗的对比以及真实绚烂的色彩使他的作品独具一格。第一眼看这两幅画时我们可能会对艺术家的高超技艺表示惊讶，

但看到最后我们会感到内心的震颤，甚至感觉到自己的情感随着森林的树叶在十月的风中缓缓飘落，对人物的同情也会被战争的庄严和恐怖取代。当约翰·特朗布尔创作这两幅画时，天才之火点燃了他的灵感，他后来的历史画作在各方面都比较逊色，甚至几乎不像出自一人之手。



《约翰·伯戈因在萨拉托加投降》，约翰·特朗布尔绘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特朗布尔绘



《独立宣言签署》，约翰·特朗布尔绘



《围攻直布罗陀》，约翰·特朗布尔绘



《蒙哥马利之死》，约翰·特朗布尔绘



《邦克山战役》，约翰·特朗布尔绘

约翰·特朗布尔在有生之年看到了美国人对他的艺术作品的兴趣逐渐增加，并开始尝试在本土培养未来的艺术家。他是纽约艺术学院的校长，也是这所院校的创建人之一。

大西洋西岸，和约翰·特朗布尔同年出生的一位伟大的五彩画家也是一位肖像画家，他就是吉尔伯特·斯图尔特。吉尔伯特·斯图尔特出生在罗德岛州的纳拉干西特镇，是苏格兰和威尔士混血儿，带有两种血统的个性特点在他的生活和性格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的自画像

命运对我们的艺术家似乎比较仁慈。带着天才曙光的吉尔伯特·斯图尔特在新港得到了科斯莫·亚力山大的指导。科斯莫·亚力山大是一位善良的苏格兰肖像画家。他带着吉尔伯特·斯图尔特去了苏格兰，交由乔治·钱伯斯爵士看护吉尔伯特·斯图尔特。正如许多早期画家那样，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经历了很多坎坷，后来成为本杰明·韦斯特艺术工作室的一名学徒。这位年轻的美国艺术家在国外短暂居留期间赢得了很好的声誉，受到了很多人的尊敬。人们认为他的作品可以与约书亚·雷诺兹爵士的作品媲美。许多英国人求吉尔伯特·斯图尔特作画，他也曾为不幸的路易十六画过肖像。1793年，吉尔伯特·斯图尔特回到美国，为我们主要城市的一些领导画肖像，最后在波士顿定居。他最具代表性的画作是为华盛顿画的肖像，其中包括著名的全身肖像画。查尔斯·威尔逊·皮尔和约翰·特朗布尔画的是盛年时期活跃的华盛顿，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画的是晚年时期荣誉等身、庄严安详的华盛顿。



科斯莫·亚力山大的自画像

吉尔伯特·斯图尔特非常有个性，他给予我们的兴趣点是别的艺术家无法超越的。他的身上既有苏格兰人的精明和敏锐洞察力，又有威尔士人的热情和温顺。令人钦佩的是，他还擅长讲故事。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的迥异性格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生动的奇闻轶事。威廉·邓拉普讲述这些轶事时如数家珍。威廉·邓拉普是一位不出名但值得铭记的画家，因为他写了一本关于美国早期绘画的书。这本书虽然风格散漫但很有价值。

可以确定地说，美国没有任何一个画家能像吉尔伯特·斯图尔特那样明显被归到天才一类，他与那些有才能的画家差别很大。我们认为天才画家和有才能的画家之间的差别不是艺术等级的差别，而是类型的不同。在人类进化史中，天才是引领者，有才能的画家是跟随者。一个拥有伟大才能的人不一定有丰富世界的创新点，他只愿意接受世界，并用自己的力量支持人类的发展。但天才却不满足于事物本身，他会给我们新的真理或以新的形式阐释旧的真理。杰出的恺撒、莎士比亚、歌德、富兰克林等人体现了天才和才能恰到好处的结合，他们既善于创造新事物又长于组织旧事物。每个人的天赋有多有少，但只要能以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他就是有别于才能的天才。

这就是我们说吉尔伯特·斯图尔特有天赋的原因。他不因循守旧，不追随任何流派，也不拥赞任何派别的艺术作品。他不受任何规则的束缚，他的鹰眼刺破了大自然的秘密，而且他的作品不满足于仅呈现人物的外表和配饰，我们在他的画中看到了人物的性格。吉尔伯特·斯图尔特也没有在刻画人物性格和艺术的技术层面停留，他一直追求原创和独特。他那看似强硬、务实的苏格兰风格和色彩的旋律很合拍，就像优美的和弦。在感知音乐和色彩间的微妙关系方面，没有人能比得上吉尔伯特·斯图尔特，因为他同时也是一位音乐家。在颜料处理方面，他再次在同时代的艺术家中脱颖而出。我们现在看他的作品时，会觉得画中颜色就像一个世纪前刚放到画布上时一样，非常纯洁、有力、和谐。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通过仔细研究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的画作找到。吉尔伯特·斯图尔特对自己驾驭色彩的能力非常自信，对自己高超的技艺也很自信。他从不用任何欺骗手段，譬如在调色板上调色，他一般将蓝色、红色和黄色直接放在画布上，然后轻轻地将它们拖到一起；因此呈现出的点和斑驳色彩就像真的出现在皮肤上一样，同时显现出一种物体的棱镜效果。他将不同的颜色分开，保证了色彩的持久性。他通常会在粗纹画布上涂上薄薄一层颜料，使画面氛围显得更柔和。有时他也会在画布上涂一层很厚的色彩，就像诺克斯将军的画像那样。但即使是在这幅作品中，他也没有背离自己一贯的做法，依然呈现了肉色。



《路易十六》，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绘



《乔治·华盛顿》，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绘

有人说吉尔伯特·斯图尔特无法准确地表现女人的美丽，尤其是美国女性独特的优雅美。虽然与其他方面的创作成果相比，吉尔伯特·斯图尔特在女性肖像创作方面经常不尽如人意，但他也创作了一些非常可爱的女性肖像画，譬如他画的塞勒姆的斯托里法官的妹妹福里斯特夫人。这幅可爱的肖像画使那些对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的指责显得苍白无力，而且为斯托里法官的妹妹作画对吉尔伯特·斯图尔特来说确实无关紧要，他深入了解个体的禀赋，捕捉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不管是一名水手还是一位政治家，抑或是一位胜利的将军或一名绝色美女，吉尔伯特·斯图尔特

的敏锐洞察力和无双画笔都能完美地呈现这些人的特点。

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牛顿是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的侄子，他也是英国著名的画家，很早以前就在英国出名了。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牛顿出生在哈利法克斯，一直是英国公民，因此应该属于外国艺术家，但他在叔叔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的波士顿工作室学习艺术，他的画作中明显带有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的风格。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牛顿远离故土前画了一些出色的肖像画，其中包括他给马萨诸塞历史协会的约翰·亚当斯画的一幅肖像。他是国外知名的半文学风俗画画家。



《约里克和女店员》，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牛顿绘

詹姆斯·弗罗辛厄姆也是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的学生。他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的风格，肖像画创作方面能力出众，但这种能力仅限于创作头部肖像。詹姆斯·弗罗辛厄姆早期没有接触过艺术，甚至没见过调色板，但他的出众之处是他通过自学创作出了不错的肖像画。由于天赋和才能的限制，詹姆斯·弗罗辛厄姆的才华似乎只表现在模特的脖子和脸部。他的作品中的人物的面部表现出一种力量、色彩之美以及真实的性格，带有吉尔伯特·斯图尔特艺术的风格，但人物的手或肩膀往往不协调或不成比例，看起来有些滑稽。



《露西娅·皮克林》，詹姆斯·弗罗辛厄姆绘

除了詹姆斯·弗罗辛厄姆，与吉尔伯特·斯图尔特同时代的还有其他一些知名的美国画家，他们都有不同的优点。亨利·萨金特上校在当时很有名，但他更像一个业余爱好者，而不是一位专业艺术家，对此我们很难理解。亨利·萨金特上校最优秀的作品是《朝圣者登陆》，其中的一个副本保存在普利茅斯。另外，凭借一幅栩栩如生的乔治·华盛顿的肖像画，伦勃朗·皮尔获得了永久的声誉，他认为这是自己年轻时的最大成就。这幅画为他赢得了人们的盛赞，美国国会以两千美金的价格买下了这幅画。对一幅画来说，两千美金是一笔巨款，因为当时货币的购买力比现在大很多。伦勃朗·皮尔的《死亡法庭》是一幅巨作，这幅画的成功之处在于它的宏大壮观。在诸如《树林中的宝贝》这类作品中，伦勃朗·皮尔似乎告诉我们风俗画艺术正在向我们走来。约翰·卫斯理·贾维斯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也是一名深受欢迎的肖像画家，而且多才多艺，性格怪异。他还是一位擅长讲故事的美食家。令人遗憾的是，他几经沧桑，最后在穷困潦倒中去世。



《约克镇战役前的乔治·华盛顿》，伦勃朗·皮尔绘



《贝琪·伯蒂斯》，约翰·卫斯理·贾维斯绘

托马斯·萨利童年时来到美国，他是一位高寿的画家，因此我们很难想到他其实和约翰·特朗布尔与吉尔伯特·斯图尔特是同时代的人。托马斯

·萨利优雅的审美有时会让我们想起托马斯·劳伦斯爵士，他创作的非常出色的少女头部肖像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他的很多作品中都出现过类似的少女头部肖像，非常容易辨认。另外，他的肖像画也非常赏心悦目，但在处理男性形像时，他的艺术手法明显较弱，缺少独创性和力量感。费城的约翰·内格尔是托马斯·萨利的学生，他的艺术生涯始于马车漆匠学徒。与当时的许多艺术家一样，约翰·内格尔曾尝试画一幅华盛顿的肖像画，但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幅生动且独特的帕特·里昂的肖像画，画中是一个在锻造厂里的铁匠。这幅画现在挂在费城美术学院雅致的画廊里。在这间画廊里，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早期的几位画家的作品，其中有本杰明·韦斯特的《被拒绝的基督》、约翰·范德林的《阿里阿德涅》以及华盛顿·奥尔斯顿的《死人复活》。

签署《独立宣言》的那一年，约翰·范德林出生。他像书中描述的大多数著名艺术家一样，比较长寿，经历了很多艰辛和沧桑。他也像很多人一样，一直质疑自己一生的辛勤工作没有得到回报。他可能从未想过自己去世后会在艺术界享有如此高的声望。

约翰·范德林是哈德孙河畔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件奇怪的事让我们感觉到命运之神的行为并不是盲目的。亚伦·伯尔经过约翰·范德林父亲的房子时，他敏锐地看到了一位乡村青年简单的素描画。亚伦·伯尔在这些画中看到了约翰·范德林的艺术潜质，因此邀请他到纽约来。约翰·范德林抵达纽约后，亚伦·伯尔对他非常友善。后来，约翰·范德林画了一幅西奥多西娅·伯尔·阿尔斯通的肖像画。西奥多西娅·伯尔·阿尔斯通是亚伦·伯尔美丽但命运多舛的女儿。亚伦·伯尔遭到质疑在欧洲一贫如洗时，约翰·范德林为他提供了庇护所。

约翰·范德林的大部分艺术生涯是在罗马和巴黎度过的。坎坷的命运和接连不断的打击使他举步维艰，于是他被迫采取了许多让人心生怜悯的方式维持生活。因此，约翰·范德林很少有机会充分展示自己卓然不群的才能。



《玛丽小姐与埃米莉·麦克尤恩》，托马斯·萨利绘



《母亲与女儿》，托马斯·萨利绘



《帕特·里昂在铁匠铺》，约翰·内格尔绘



《亚伦·伯尔》，约翰·范德林绘



《西奥多西娅·伯尔·阿尔斯通》，约翰·范德林绘

但约翰·范德林有两幅重要作品明显体现了独特的艺术感和美感，这两幅作品将使他有资格在美国画家中名列前茅。我只听说过《迦太基废墟中的马略》这幅作品，但从来没见过。这幅画在当时应该是艺术中的精品。约翰·范德林因为这幅画在罗马赢得了一片赞誉并获得了巴黎沙龙[7] 金牌。然而，命运往往具有讽刺性，约翰·范德林被迫两次将这枚奖章典当，第二次典当后他再也没有能力赎回这枚奖章了。



《迦太基废墟中的马略》，约翰·范德林绘

遗憾的是，约翰·范德林的另一幅作品《阿里阿德涅》已经开始老化，画中人物的棕色皮肤开始褪色，变成了柔和的灰色。如果一幅油画涂色的方法得当，应该可以长期保持其本色，但不幸的是，很多优秀艺术家的作品都因为涂色方法不当渐渐褪色。然而，《阿里阿德涅》是一幅独特的作品，颇具古典风格，虽然原创性不是很强，但也是约翰·范德林早期艺术中最值得称赞的一幅作品。

新港是罗得岛一座风景优美的海边小城，曾是繁华的商业中心，现在是人们最喜爱的度假胜地。新港有丰富的文化、欢乐的氛围以及诱人的财富，还有很多殖民地革命协会。与新港相关的艺术记忆和它拥有的艺术瑰宝使这座小城极具吸引力。新岛是爱德华·G.莫尔博恩的出生地。爱德华·G.莫尔博恩在家乡和查尔斯顿度过了自己的艺术生涯，1807年去世，年仅三十二岁。微型画是早期艺术家的最爱。我们最好的肖像画中有一些就是微型肖像画。所有创作微型肖像画的画家中，爱德华·G.莫尔博恩是最出色的。虽然有些画家也很擅长创作微型肖像画，如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弗雷泽，但他们都不及爱德华·G.莫尔博恩。爱德华·G.莫尔博恩善于刻画人物的脸部特征，非常与众不同。同时，爱德华·G.莫尔博恩的肖像画的色彩看上去非常细腻、纯净、逼真，他最好的作品是雷·格林的肖像画和题为《时时刻刻》的精美群体画。《时时刻刻》现在完整保存在普罗维登斯图书馆里。



《阿里阿德涅》，约翰·范德林绘

没有哪一个美国艺术家的名字像华盛顿·奥尔斯顿那样家喻户晓。毫

无疑问，华盛顿·奥尔斯顿将自己的成就部分地归因于一个事实，即作为一名作家，他在美国著名的马萨诸塞州东部的文学界很有名。1779年，华盛顿·奥尔斯顿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沃卡莫。为了健康和教育，华盛顿·奥尔斯顿七岁时被家人送到新港，在那里生活了十年。他很可能与爱德华·G.莫尔博恩有联系，也许在新港还遇到了吉尔伯特·斯图尔特。

随后，华盛顿·奥尔斯顿访问了意大利，然后定居在伦敦。他的才能在伦敦得到了充分认可，并获得了院士职位。或许在华盛顿·奥尔斯顿的艺术生涯中，他不应该在事业巅峰时期选择回到美国，即使这样做有利于提升他在国内的声誉。艺术发展当时在美国缺少鼓励和影响，没有人愿意支持和资助艺术，但这一切对像华盛顿·奥尔斯顿这样具有天赋的艺术家来说非常重要，因此他的能力日渐衰退。他在波士顿多年来空怀抱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华盛顿·奥尔斯顿遭受痛苦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当时，华盛顿·奥尔斯顿作为一位艺术家一开始就被人们抬得很高，后来他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他的名声也大不如前，他得到的奖励比他应得的少。第二，华盛顿·奥尔斯顿有自己的艺术原则，他倾向抑制而不是提升自我艺术能力。他渴望给予画作智力和道德价值，以及永恒的尊严，厌恶哗众取宠的艺术，有意将作品主题处理得非常严肃，但却使主题失去了自然和率性。自然行为对充满想像力的作品来说非常重要，它可以令人感到愉悦。如果华盛顿·奥尔斯顿的艺术天分像一些人声称的那样高，也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了。情感元素有时会自然地体现出来，使作品具有温度和吸引力，缺少情感表达的作品虽然从学术角度来看比较有趣，并且值得尊敬，但却无法鼓舞人心，也会削弱本可以推进美国艺术发展的影响力。



华盛顿·奥尔斯顿的自画像

研究华盛顿·奥尔斯顿的许多蜡笔素描和绘画作品时，可以明显看出他其实可以创作出更具影响力的作品。他的作品充满热情、活力、美感、微妙的想象以及创造力。看到这些作品后，我们就能真正明白华盛顿·奥尔斯顿的艺术才能了。令人遗憾的是，他创作一些希望借其成名的作品时，没有给予画笔充分的自由，但当他心无杂念地进行创作时，我们看见了他头脑中充满激情、宏大壮阔的几乎无法言说的想象力。我们必须承认华盛顿·奥尔斯顿的作品具有创新性，但需要反复欣赏琢磨才能看出这些作品揭示的内涵。《阳光下的乌列》《耶利米》和《死人复活》可能是他最棒的作品。华盛顿·奥尔斯顿通过这些作品表现出的庄严、神秘、令人印象深刻的想象力得到了众人的一致好评。他对色彩的奥秘并没有新的发现。他是威尼斯画派的模仿者而非创始人。华盛顿·奥尔斯顿作品的色彩令人愉悦，他是美国最出色的调色师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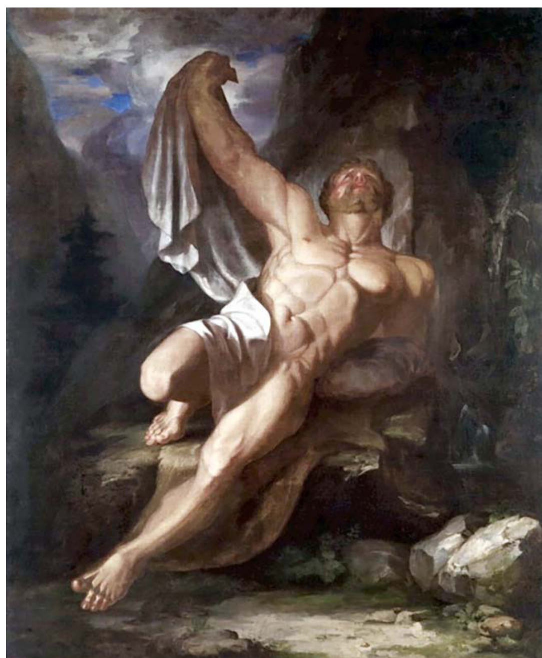
《阳光下的乌列》，华盛顿·奥尔斯顿绘

人们都知道已故的塞缪尔·F.B.莫尔斯是我国电报系统的发明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早期是一位艺术家，并有证据表明他在雕塑和绘画方面小有成就。虽然塞缪尔·F.B.莫尔斯偏爱画画，但我们都认为他非常擅长雕塑。他在伦敦时是华盛顿·奥尔斯顿的学生，创作了一尊称为《垂死的大力士》的雕塑，获得了阿德尔菲艺术协会的最佳个人金奖。他后来根据这尊雕塑创作了一幅主题相同的画，这幅画现在保存在纽黑文。毫无疑问，这是一幅充满力量的作品，表现出塞缪尔·F.B.莫尔斯丰富的人体解剖知识和创造性的想象力。虽然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位年轻的美国人将会拥有一段有趣的艺术生涯，但变化莫测的命运使他偏离了年轻时的选择，最终在科学界赢得了声誉和财富。关于塞缪尔·F.B.莫尔斯的一些描述很有趣。他曾在遭遇打击后给一个向他寻求建议的人回信，这个人问他自己是否应该做一名画家，他在信中回复说：“我年轻的朋友，如果你决定尝试一个艺术家的生活，我祝你成功。但如果你想让我诚实地说出我的观点，我必须说如果你能在其他任何行业找到工作，我建议你不要画画。我知道有很多年轻人的确有才能，但他们经过反复尝试和屡次失败后都泄气了，放弃继续努力，因而前程尽毁。”虽然这是塞缪尔·F.B.莫

尔斯放弃艺术时的想法，但当他在人生的巅峰时期回望自己早期的艺术生涯时，不知道是否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继续从事艺术事业的过程中，由于极具才华，国家设计院认为他应该是设计院的创始人。美国艺术的第一阶段到塞缪尔·F.B.莫尔斯就结束了。



塞缪尔·F.B.莫尔斯的自画像



《垂死的大力士》，塞缪尔·F.B.莫尔斯绘

我们发现除了费城小有名气的海景画家托马斯·伯奇和其他几位不太出名的海景画家，在美国艺术的第一阶段，艺术家们都致力于人物画创作。这一时期的艺术创作受崇高动机的影响，有时作品缺乏生气。历史画和肖像画创作方面，即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原创作品，也往往可以与欧洲同时代的艺术作品保持相同的水平。由于缺少在国内接受专业教育的机会，我们著名的艺术家们几乎都被迫在外国画室度过了大部分艺术生涯。

我们还发现这一阶段几乎不存在单色画或雕塑中的形式美。除了闪·德朗恩和佩兴丝·赖特巧妙地用蜡做模型，美国人对造型艺术的意识完全处在休眠状态。甚至最近几年，人们对建筑方面的任何进步依然视而不见。思想活跃、富有智慧的托马斯·杰斐逊试图赋予我们的民族第六种柱式——哥伦比亚式，并怀着爱国热情模仿印第安人种植的玉米秸秆设计处理这种样式。华盛顿议会大厦地下室的一个门廊里有按照这种样式设计的小柱子。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人会来参观这些柱子，欣赏自己的祖国曾经尝试过的唯一的建筑样式。

我国的早期画家经历了许多苦难，但他们依然心怀诚挚的信仰，对艺术充满热情。他们为国家未来的艺术发展铺平了道路。虽然当时国内很少有人欣赏他们的艺术作品，但我们还是非常感激他们。我们现在偏爱的艺术形式注定会在将来被其他形式取代，因此我们不应该忘记美国艺术先驱带给美国的荣誉。一个孩子说出的第一句话或一个土著部落的方言是一个国家语言的基础，最终会发展到较高的文化级别；一个年轻人第一次创作的粗糙艺术品或谱写的简单诗歌往往具有新颖的笔法、精致的造词或强大的感染力，这种特征常被后来的典雅文明磨去，导致我们无法想起这些艺术品本来的样子。



《特拉华河入海口的打鱼舟》，托马斯·伯奇绘



《美国海岸风光》，托马斯·伯奇绘

[1] 科顿·马瑟（1663—1728），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牧师。他进行植物杂交试验，推广接种疫苗预防疾病，为世人留下了科学遗产。他参与了塞勒姆女巫审判。——译者注

[2] 伯克利主教即乔治·伯克利（1685—1753），爱尔兰哲学家，开创了非物质论——后来被称为“主观唯心主义”。他的代表作有《视觉新论》《人类知识原理》《海拉斯和斐洛诺斯的对话三篇》。——译者注

[3] 贵格会是历史上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教派，又称“教友派”或“公谊

会”，成立于17世纪，创始人是乔治·福克斯。贵格会教徒通常都因一个信念紧密团结：相信每个人都能体验到“内心之光”，相信“人人皆能感知到上帝”。——译者注

[4]　因袭主义是一种哲学理念，认为某种基本原则是基于社会里的（显性的或隐性的）协议，而不是外部现实。——译者注

[5] 亨丽埃塔·玛丽亚（1609—1669），法王亨利四世与美第奇王后之女，英王查理一世之妻，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之母。——译者注

[6] 约翰·伯戈因（1722—1792），英国陆军军官，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约翰·伯戈因于1777年10月17日在萨拉托加缴械投降。——译者注

[7]　巴黎沙龙始于1667年巴黎艺术博览会的官方艺术展。1748到1890年，巴黎沙龙是西方世界一年一度或两年一度的艺术盛会。作品能在巴黎沙龙展览，对任何艺术家在法国取得成功都是至关重要的。1748年，巴黎沙龙引入一个为艺术家颁奖的评判委员会。——译者注

第2章　舶来品与原创性：肖像画与风景画领域的吸纳与进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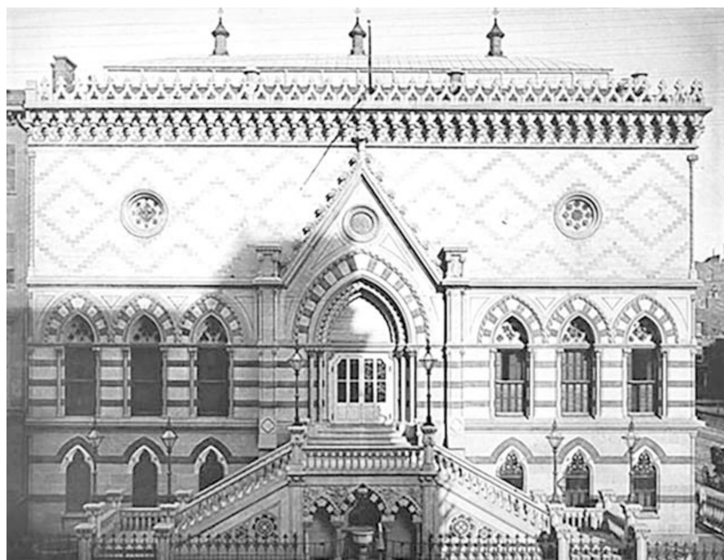
肖像、人物和风景画家亚瑟·布朗·杜兰德（1796-1886）

独立战争胜利后，建立新共和国的那一代人立即开始努力调整国内外的商业和政治关系。19世纪初，出现了很多积极的文学和艺术活动。1815年，《北美评论》[1]成立。这虽然是一个文学杂志社，但表明当时出现的具有民族特点和民族趋势的各种智力影响已经开始形成一股凝聚力，有了一定的形式，尽管这种影响和趋势还不太明显。同时，我们的艺术也受到类似的影响，开始表现出更鲜明的个性特征以及对民族表达方式多样化的需求。

吉尔伯特·斯图尔特是现代最杰出的调色师，于1828年去世。同年，国家设计院成立。这两起事件同时发生，似乎标志着我国艺术史第一个阶段的结束和第二个阶段的开始。虽然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的艺术作品很优秀，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人的艺术作品也很有生命力，但他们的创作一直断断续续，很不均衡，而且大多数作品都是在国外完成的，受外国的影响比较深。国内没有可以凝聚这些艺术家的力量的赞助机构或艺术机构，艺术家们没有机会为一个可以实现的共同目标努力。现在，这样的机构出现了。这个新机构的首任主席是塞缪尔·F.B.莫尔斯。

国家设计院取代了一个具有类似功能但组建不太合理的协会，1801年以来，这个协会一直处在不稳定状态。国家设计院成立后，开始以组建美术陈列室为核心搜集作品、组织画家。国家设计院一开始就为艺术发展提供了很多机会，并充分利用资源，大力发展美国的艺术教育。

虽然看似偶然，但国家设计院的成立标志着美国艺术史上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国家设计院经过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完备，能够比较公正地行使职权。我们可以找到成立设计院以及促进它发展的原因，但使它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倡导用新方法表达艺术的先行者的原因却并不显著。接下来的岁月里，艺术家们通过这种新方法表达了他们对艺术的渴望。国家设计院表现了美国艺术的显著进步，虽然它也有不足之处和模仿外国的陈规旧俗的缺点，但已经完全具备鲜明的民族特质。国家设计院也因拥有众多具有独创个性和才华的艺术家而驰名，它没有达到这些艺术家追求的目标是因为条件限制，而不是缺乏真正的力量。在另一个时代，国家设计院也许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国家设计院

有趣的是，在这一关键时期，我们发现影响美国艺术发展的原因和同时期的文学受到影响的原因完全一致。像我们的民族文化一样，我们的艺术明显表现出对原创性的追求，而且艺术方面的一些改变其实是受到了外国思想和方法潜移默化的影响。

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早期艺术的发展规律与支配其他国家艺术发展的规律完全相悖。其他国家艺术感觉的表达顺序一般为陶器或造型艺术，然后是建筑和雕塑，最后是绘画。我们完全颠倒了这一顺序。主要原因是美国的人口流动量大，尤其当时的西迁运动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许多人从一个州迁往另一个州，加上那时木材丰富，人们搭建了很多简陋的速成房屋，因此对建筑和装饰的审美需求很晚才出现。显而易见的是，由于同样的原因，直到绘画艺术建立了自己的协会和社团，并且拥有许多让人崇敬的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代表时，社会才有了对雕塑艺术的需求。

殖民时期的艺术表达是模糊且失败的。美国宣布独立后，艺术家们开始追求更自由、更充分的艺术表达方式。令人吃惊的是，在政府几乎完全没有提供任何资助的条件下，艺术表达呈现出一定的水准，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平。

回顾过去其他民族的艺术发展历程，除了与西班牙交战后获得独立的荷兰，没有哪个国家的艺术发展过程和发展条件与我们一样。很多不同类型的影响既是美国艺术发展的机遇也是挑战。这些影响控制艺术行为，直到现在还在阻止艺术的集中发展，艺术的集中发展可能会催生许多优秀的艺术流派和辉煌的成就。很多不同的影响也是艺术发展的机遇，因为一个人可以通过艺术抒发情感，阻止自由行为、遏制自由成长的风格主义尚未成为一张束缚美国艺术的传统之网。美国曾经的两代艺术像一个躁动不安的多才多艺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不断寻找合适的媒介，试图找到毕生事业的方向。总体来说，如果艺术发展在某方面表现出民族偏向，那应该是风景画。

我们智力状态的多面性颇类似于中世纪的德国，从黑暗时代的混乱中醒来，分裂成不同的邦国，各自代表不同的宗教和种族。我们国家的种族和宗教具有多样性，社会非常躁动不安，广大知识分子对现状十分不满。虽然人们具有民族自豪感，但我们对外国的影响高度敏感，就像摄影一样，随时备好胶卷准备接受影像信息。直到最近，我们还只是学习吸收外国的艺术而不是模仿，但我们在国内一直试图协调种族和区域之间存在的差异，只是还未达到同质化。

影响美国艺术发展的因素中存在一种普遍性因素，这种因素影响了美国所有艺术家。无论这些艺术家是什么种族或来自什么地方，他们都相继受到了这一因素的影响。其他国家的人民经过长期准备愿意中途接受艺术家，无论是受到艺术家的作品表现出来的宗教情感的激励，还是受到主导性的普遍审美的驱使，人们都会欣赏艺术家的作品，帮助他们完成使命。然而，我们国家的情形恰好与此相反，在公众的审美产生之前，艺术家已经产生了。不幸的艺术家被迫等待公众审美意识的觉醒。起初，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反对艺术，而且当时我们国家社会动荡，移民蜂拥而至，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人们不仅要面对基本的生存问题，还要创建新的政府形式，融汇各种异质文化从而形成一个新民族。总之，美国人必须与命运抗争获得生存的权利，这一切使我们忽视了理想。当然，各地也有一些特殊案例，我们可以透过表面看到诗意准备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准备承认这一伟大真理，即艺术是我们民族本能的渴望，渴望自己与主宰宇宙的和谐一致。

在美国历史发展的这一阶段，为了生存，很多艺术家不得不忍受远超传统艺术行业的艰辛。他们被迫牺牲了一生最美好的岁月去从事贸易，直到后来才开始投身艺术。经常有人指责美国艺术家是一群唯利是图的人，这是一种讽刺，大多数艺术家通过经商一定会积累更多财富。我们早期的艺术家具有英雄主义精神，他们在美国的偏远地区挣扎，寻找机会表达自己对理想的渴望。没有人指导他们，也没有促进艺术发展的环境，甚至没有人同情或鼓励他们。虽然有很多障碍，但这些艺术家还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非常让人钦佩。在美国艺术史中，早期艺术家的英雄主义精神非常有趣，而且很有教育意义，令人赞叹。

认真、精微、细致是美国景观艺术的风格，这种风格随处可见，我们有充分证据表明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之一是早期艺术家择业时的犹豫不决。实际上，许多早期杰出的画家一开始是在木材和钢材上进行雕刻，这类工作使他们掌握了细致、正规、精确处理艺术的技能。他们往往关注的是细节，而不是宏观的效果。

回顾这一时期激励美国艺术发展的外国影响因素时，我们发现来自外国的影响虽然促进了美国人审美能力的提升，但传统方法和原则的灌输却延缓了艺术向更远的方向发展。遗憾的是，虽然美国和法国之间关

系友好，但美国艺术第一次向欧洲寻求发展方向时，并没有接触法国艺术。当时引领法国艺术潮流的是齐利科、卢梭、康斯坦·特罗荣、德拉克鲁瓦以及其他后起之秀，法国艺术成了文艺复兴以来最伟大的绘画流派。当时，意大利的艺术逐渐沉沦到因袭主义的深渊。代表英国优秀艺术的是少数几个天才而不是具体的一个流派，这些艺术天才包括威廉·特纳、威尔基和约翰·康斯特布尔。他们有非常强烈的原创意识，因此无法吸引已经接受意大利艺术理念的学生。

意大利对我国早期艺术的影响表现在当时艺术家们主要受华盛顿·奥尔斯顿和约翰·范德林的影响，倾向于去意大利学习，就像现在的艺术家们去德国和法国学习一样。约翰·范德林在罗马时住在萨尔瓦多·罗萨的房子里，这表面上看是一件小事，但如果追溯这件事对美国年轻的艺术家的想象力和艺术审美可能产生的所有影响，我们也许会发现这件事并非小事，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早期跟随约翰·范德林去意大利的那些景观艺术家的风格形成。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当时从意大利半岛进口的许多绘画作品。这些作品中有一些是艺术家的真迹，动乱时期在意大利廉价出售，后来这些画作震惊了整个欧洲。也有一部分是一些画作的副本，这些作品逐渐流入美国，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随着美国急剧变化的命运被放在了人们看不到的地方，直至被遗忘。因此，在偏远的村庄或人们认为不会藏有珍贵艺术品的农房发现某一件艺术品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



《英勇的渔夫》，齐利科绘



《河边钓鱼人》，特鲁瓦永绘



《风暴中的运输船》，威廉·特纳绘



《干草车》，约翰·康斯特布尔绘

这些外国作品大部分先被运到了波士顿，藏在波士顿附近的某个地方，就像鲍登学院的创始人馈赠给学院的那些收藏品一样。收藏品中最好的作品最终被不知道其价值的员工廉价出售，这些作品因此散落在四处。不识货的员工卖掉了珍贵的裸体画，将它们移出学生的视野，认为自己援助了道德，也为机构的资金增加了诚实的一便士。华盛顿·奥尔斯顿和吉尔伯特·斯图尔特都是优秀的调色师，他们居住在波士顿，后留学多年，这两个因素促成了波士顿流派从一开始就注重色彩的特点，但这一事实在纽约早期艺术中很少提到。



波士顿

我们应该将美国艺术中的英国元素归因于当时在美国公众中具有影响力的本杰明·韦斯特、华盛顿·奥尔斯顿和约翰·特朗布尔。他们的思想观点、榜样作用对美国艺术家来说非常重要，并且促成了美国艺术最典型特征的形成。美国艺术倾向于将艺术作为讲故事的一种手段，这一特点曾是英国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我们的画家无意识地将注意力转向了风景，这种倾向其实可以追溯到英国文学。正是英国文学促成了美国绘画艺术中独特的风景画流派的形成。威廉·柯珀、拜伦和华兹华斯将风景引入诗歌，推动了英国艺术向景观艺术的发展。当时，正值我国诗人威廉·卡伦·布莱恩特风格的转折点，他受到华兹华斯发自内心的崇拜自然的影响，成为美国描述诗的先驱。华盛顿·欧文将如画风景引入美国文学。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像华盛顿·欧文一样，用生动的语言描述森林，创造了一个完整类别的主题，当时的美国艺术家曾为他的作品插图。



威廉·柯珀

19世纪早期为我国艺术发展指明方向且具有影响力的画家中，重点介绍五位肖像、人物和风景画家，他们可以被视为这一时期的艺术先驱。这五位画家分别是切斯特·哈丁、罗伯特·沃尔特·韦尔、托马斯·科尔、托马斯·道蒂和亚瑟·布朗·杜兰德。

切斯特·哈丁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曾一心务农，二十一岁开始从事椅子制作行业。当时，那位年轻的巴黎艺术家 [2] 已经赢得了罗马大奖。随后，切斯特·哈丁尝试了很多其他工作，包括沿街叫卖、经营酒馆等。后来，他带着妻儿乘坐一艘平底船从阿勒格尼来到匹兹堡，试图寻找一处安身之地和一条新的谋生途径。切斯特·哈丁一开始在匹兹堡从事标识绘制的工作，直到二十六岁时，他才忽然有了成为一名职业艺术家的想法。一个四处流浪的肖像画家的到来使切斯特·哈丁有了当一名职业画家的想法。他让这名画家为他的妻子画了一幅画像，他紧盯这位画家，上了人生第一节美术课。切斯特·哈丁尝试创作的第一幅画很粗糙，但他从此迷上了作画。他将绘画作为一种职业，六个月内画了一百幅肖像画，每幅画以二十五美元的价格卖出。他后来在波士顿定居，积极投身创作。到达英国后，虽然他的优势不多，但他比英国肖像画家更受欢迎，并得到了英国一位贵族的资助。切斯特·哈丁虽然属于当时的晚期画家，比我们现在谈论的时期早一点儿，但就整体而言，他在美国艺术史

上的重要作用却可以追溯到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创建时期。他是同时代的美国肖像画家群中最杰出的一位画家。这一画家群中有弗朗西斯·亚力山大、塞缪尔·瓦尔多、约翰·卫斯理·贾维斯和C.C.英厄姆。切斯特·哈丁非常有个性。他身材魁梧强健、为人坦率、心地善良，待人热情诚挚，而且意志坚强。这些特点使他在当时成了砍伐森林、开垦荒原、为共和国卖力的群体中的一员，正是因为这些人的辛勤努力，我们国家经过短短一个世纪的努力就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面。



《约书亚·布莱克夫人》，切斯特·哈丁绘



《尼古拉斯·布朗》，切斯特·哈丁绘



《孩子们》，塞缪尔·瓦尔多绘

虽然切斯特·哈丁没有学习艺术的机会，但他却是当时波士顿肖像画的代表画家。在纽约，亨利·英曼与切斯特·哈丁的地位相当。作为纽约居民和约翰·卫斯理·贾维斯的学生，亨利·英曼拥有当时大多数画家没有的优势。他接受过早期艺术培训，多才多艺，非常擅长微型肖像画，风俗

画和风景画也画得很好。当时，他创作的最令人钦佩的伟人油画肖像使他在未来声名远播。亨利·英曼很有勇气，而且品德高尚，在任何领域都能赢得荣誉。他的英年早逝对国家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



《安杰莉卡·辛格尔顿·范布伦》，亨利·英曼绘

亨利·英曼成名后，纽约很快成了很多具有独特风格的优秀肖像画家的活动中心。这些画家包括查尔斯·罗林·埃利奥特、乔治·A.贝克、托马斯·希克斯、托马斯·勒·克利尔、丹尼尔·亨廷顿和威廉·佩奇。他们和G.P.A.希利、约瑟夫·埃姆斯、威廉·M.亨特，以及波士顿的理查德·M.施泰格和费城的托马斯·萨利都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和特点。事实上，托马斯·萨利年事已高，应该属于前期艺术家。

这一时期，我们发现美国艺术最重要的肖像画家是查尔斯·罗林·埃利奥特。由于艺术才能的独特性，查尔斯·罗林·埃利奥特一开始也只能慢慢领会一幅简单的肖像画，使得天才在尝试一些新事物时总会踌躇不前。查尔斯·罗林·埃利奥特是我们国家诞生的少数几个天才艺术家之一，他可以名副其实地跻身天才之列。天才画家和有才华的画家之间存在显著区别。虽然在色彩纯度、鲜度和颜料的把握方面，吉尔伯特·斯图尔特胜过所有肖像画家，但查尔斯·罗林·埃利奥特在把握人物特点方面更有能力。

他有自身的优势，能读懂他所描绘的那个人的内心世界，并将其呈现在作品中。他的作品不仅如实体现了人物的外貌特征，还是人物精神生活和性格特点的缩影，甚至揭示了人物最隐秘的思想。在研究查尔斯·罗林·埃利奥特的画像时，我们需要学会分析和辨别摄影与最高级的绘画之间不可调和的本质差异。太阳是一个伟大的魔术师，但它再现在表面上的依然是假象，它不能使我们看到灵魂深处的东西，就像一个忠实但不情愿的证人一样只给出真相的一部分，而不是真相中最核心的部分。然而，伟大的天才艺术家的介入补全了太阳的证词，并向我们提出永生的建议。凡人和证明这些画作的太阳都逝去时，这些不朽的生命将幸存下来。



《安东尼·范·科利》，查尔斯·罗林·埃利奥特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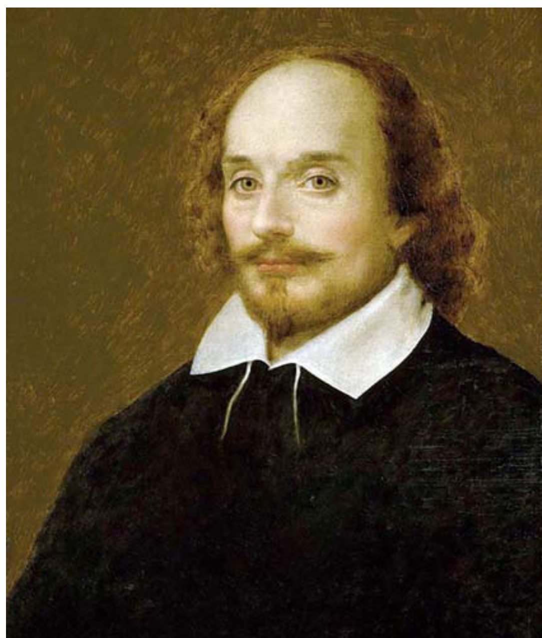
《塞内卡酋长“红夹克”》，托马斯·希克斯绘



《画室内部》，托马斯·勒·克利尔绘



《罗西娜小姐》，丹尼尔·亨廷顿绘



《威廉·莎士比亚》，威廉·佩奇绘



《伊丽莎白·克拉夫林》，威廉·M.亨特绘

乔治·A.贝克擅长表现微妙的色彩、可爱的童年以及美丽的美国女性。理查德·M.施泰格的微型肖像画也是美术艺术中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这一时期优秀的微型肖像画家还有萨拉·古德里奇小姐，她的个人经历比其他任何美国艺术家都更鲜为人知。

这一时期的绘画艺术中，威廉·佩奇的作品非常耀眼。他不像我们大多数画家那样，仅满足于运用已经发现的绘画方法和绘画材料。他是一位实验主义者和理论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归为美国艺术史的早期阶段。威廉·佩奇画了一些非常成功的肖像画和历史画，同时也做了很多其他事，深受人们尊敬。

亨利·彼得斯·格雷潜心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他在渲染女性美时没有威廉·佩奇目的清晰、处理巧妙。亨利·彼得斯·格雷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虽然他的作品比他研究的那些大师的作品逊色不少，但却领先于大多数创作此类作品的美国画家。《巴黎审判》构思巧妙，但并不完全是一幅原创作品。此外，亨利·彼得斯·格雷创作的《维纳斯》和《普赖德村民》也是构图和色彩都很优秀的作品。



萨拉·古德里奇小姐的自画像

丹尼尔·亨廷顿是国家设计院的第三任院长，他是纽约人，拥有我们早期艺术家没有的优势和成就。他是塞缪尔·F.B.莫尔斯和亨利·英曼的学生，在当时作为一名肖像画家广为人知，很受人们的喜爱。最重要的是，丹尼尔·亨廷顿早期努力创作的都是半文学风格类型、历史和寓言或宗教类的作品，由于这些作品，他的名字被载入了史册。著名的作品有《默西的梦想》《女预言家》和《玛丽女王签署了简·格雷的死刑令》。



《普赖德村民》，亨利·彼得斯·格雷绘

当时，我们主要的人物画家逐渐转向了肖像画创作，其中也有几个很有能力的风俗画的代表画家，如果他们可以得到一些艺术赞助和支持，也许会取得比现在更大的成就。亨利·英曼是美国艺术家中第一个尝试风俗画创作并取得一定成就的画家。如果情况允许，他也许会全身心投入到自己追求的三个艺术分支中的任何一个分支，可能会取得比现在更大的成就。这段时期，最重要的风俗画家是威廉·西德尼·芒特。他是长岛一个农民的儿子。起初，他和哥哥一起画广告牌。1828年，他开始从事风俗画创作。他曾坦白自己缺乏野心，非常容易因公众的认可停止改进风格，并很早就回到了长岛的农场。作为一位五彩画家，虽然威廉·西德尼·芒特有成功的潜在优势，但不太出名。然而，他在其他方面是个天才，甚至有些方面从未被后人超越，而且他的创作经历也向后来的画家展示了美国国内的生活为风俗画家所提供的创作资源。这位美国的威尔基对我们质朴生活的幽默感有敏锐的洞察力，他在表达这种幽默感时会让人想起荷兰伟大的艺术家。《漫长的故事》和《谈马价》充满无与伦比的幽默画法，体现了独特的触及人性的敏锐观察力。F.W.埃德蒙兹是当代的威廉·西德尼·芒特，虽然他只是一个银行出纳员，但他利用休息时间创作了很多构思巧妙的风俗画，表现出对色彩的敏锐感知能力。他在构图和布局方面比威廉·西德尼·芒特更慎重。



威廉·西德尼·芒特的自画像

这一时期的人物画的其他分支中，罗波特·W.韦尔是独特的历史画先驱之一，在这一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罗波特·W.韦尔出身在一个胡格诺派[3]教徒家庭，经历了国内的艰苦奋斗后，他前往意大利学习绘画艺术。在他的绘画艺术生涯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对美国绘画艺术的影响。他没有完全模仿国外的经典绘画艺术，却在实际创作和主题选择方面表现出独立思想。他的风格不是充满活力和原创性的，而是愉悦的，表现出对人物的关心和充满爱的耐心，就像欣赏自己职业尊严的人一样，但他没有突出的想象力，也没有提出或暗示任何新的真理。像《朝圣者的远航》这类题材宏大的作品，虽然难以激起人们的热情，但却是美国早期艺术创作中一幅非常认真、睿智的作品。他精心创作的《格林尼治船艇俱乐部》和《揭开面纱》也是极具价值的作品。这位德高望重的画家度过了一个安详的晚年。他在耄耋之年仍然手持画笔，并每年在学院里展出一些值得称赞的作品。



《谈马价》，威廉·西德尼·芒特绘



《格林尼治船艇俱乐部》，罗波特·W.韦尔绘

在前面提到的人物画家的艺术作品中，能够看到艺术家对艺术的孜孜以求以及一些令人尊敬的作品。然而，除了几个真正有天赋的肖像画家的作品，很多人物画家的作品除了暗示国家需要表达真正的审美，并没有体现太多对艺术史有价值的东西。但当谈到景观主题时，我们进入了一个风格明显、一致努力的领域。一些非常有潜力的伟大艺术家被强大和诚挚的信念感动，经常在作品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些作品在本质上往往具有彻底的、几近狂热的民族性，虽然其中也有不少外来

影响的痕迹，但通过从民族土壤中汲取绘画题材，艺术家们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类型，形成了一个艺术流派，无论这个流派在未来被置于怎样的位置。英国人、法国人、爱尔兰人、非洲人和西班牙人都争相描绘美国的美丽风景，譬如屹立的山峦、古老的溪流和草甸、原始森林，以及拍打花岗岩海岸的浪花。他们认为这一切都和他们的生活和名誉有关。

美国风景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三位非常有天赋的艺术家——托马斯·科尔、托马斯·道蒂和亚瑟·布朗·杜兰德。托马斯·科尔是三人中最年轻的艺术家，但他比托马斯·道蒂早几个月从事风景画创作。亚瑟·布朗·杜兰德比托马斯·科尔年长几岁，但比托马斯·科尔晚几年从事风景画创作。

托马斯·科尔盛年离世，年仅四十七岁。美国历史上的画家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多才多艺，富有想象力，而且品格纯洁高尚，朝气蓬勃。他最伟大的作品以及其中所有的瑕疵和他试图表达自我时的犹豫，让我们感受到这位拥有博大胸怀的艺术家想要表达的伟大思想。他无疑已经学会在另一个世界更真实地表达自己。在托马斯·科尔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智者的共同特点，即一个人比他的作品更伟大。研究托马斯·科尔的作品，使我们印象深刻的不是他敏捷的头脑、娴熟的技法和专业的知识，而是他的性格。在他的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曾经踏上这片大陆的一位伟人的足迹。

除了18世纪微型肖像画家约翰·弗雷泽的几幅尝试性的风景画外，可以说托马斯·科尔是美国第一位专业的风景画艺术家。托马斯·科尔出生在英国，但具有美国血统，童年时跟随父母回到美国。艺术生涯初期，他克服重重困难，度过了一段对他影响颇深、印象深刻的艰难岁月。婴儿期的托马斯·科尔十分喜欢铅笔，在他父亲俄亥俄的斯托本维尔[4]工厂里，他一直为壁纸上色。这段经历使他在色彩的和谐方面有了一点经验。同时，他开始尝试雕刻。一位德国肖像画家使他改变了这一追求，这位德国画家给他上了几节如何运用油彩的课。于是，托马斯·科尔开始进行肖像画创作，立志要当一名艺术家。但当时他父亲生意失败，养家糊口的重担因此落在了他身上。他走过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奋斗历程，苦难的经历并没有改变他对艺术的偏爱，二十二岁时，他开始画莫农格希拉沿岸的自然风景。威廉·邓拉普说：“我认为一个有美德的善良的人努力和命运独战，浸泡在贫穷中却不绝望或停止自己的努力，这种斗争

是最崇高的。”

经过几年的艰苦生活，托马斯·科尔终于漂泊到了纽约，并最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828年，国家设计院在成立时，托马斯·科尔和托马斯·道蒂同时取得了成就，并给艺术界留下了永久的记忆。半个世纪以来，这份记忆一直是设计院墙上最杰出的作品。

在托马斯·科尔的作品中可以发现国外技法对他的影响。追根溯源，托马斯·科尔其实是受了克劳德和萨尔瓦多·罗萨的影响。托马斯·科尔重访英国时，约瑟夫·马洛德·威廉·特纳和约翰·康斯特布尔已经很有名气，对法国的风景画艺术流派产生了很大影响，法国风景画艺术流派至此一直很成功。如果托马斯·科尔受到这些画家宽广且充满活力的风格的影响，不知道我们的风景画将又会具有怎样的特点。想到这个问题就觉得很有趣，但现代风景画大胆创新、更加真实的方法似乎并不适合托马斯·科尔，他坦率地说约瑟夫·马洛德·威廉·特纳失诸过火。



《北安普敦附近的康涅狄格河》，托马斯·科尔绘



《树林里的家》，托马斯·科尔绘

然而，托马斯·科尔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文学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发现班扬和司各特对他的影响。思想的重大转变使他的作品表现出庄严、充满宗教狂热的特点，即使我们对他的艺术成就存在质疑，他的作品也值得我们深思。因此，除了艺术，托马斯·科尔对一个民族的影响比大多数艺术家更大。这个民族曾历经动荡浩劫，却依然维护了艺术和宗教一脉相承的传统。托马斯·科尔具有多方面的天赋，涉猎较广，能理解很多不同领域的事物，即使我们仅从艺术角度看他的作品，也会对其中的变化印象深刻。他的作品很少受早期艺术的影响，有时尝试戏剧的力量，有时又会陷入单纯追求轰动效应的旋涡。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对自然的热爱以及一颗充满活力、渴望表达远大理想的心。他是美国艺术家中罕见的一位理想主义者。他的《帝国兴衰》将被世人永远铭记。这部作品是一部非常恢弘的系列画作，由五幅画组成，代表一个国家的兴起、发展、衰落和灭亡，以及随之而来的荒芜境地。本系列的最后一幅画题为《荒芜》，画中描绘了灰色死寂的荒野上空盘旋着麻鸭，废弃的海港倒映着倒塌断裂的柱子。当年，闪亮的船队正是从这个海港驶过。在大理石河堤旁的露台上，人们观看过帝国盛大的活动。这部作品是美国艺术史上最卓越的成果之一。虽然托马斯·科尔激起了同时代艺术家们的热情，但他的影响似乎只是给了景观艺术尊严，并没有给其他艺术家留下深刻印象和创新方法。毫无疑问，他的确抓住了风景画的特点，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仔细的研究，还需要热爱自己描绘的高山和湖泊。他使我们的第一批风景画家开始观察祖国多种

多样的美景。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托马斯·科尔的艺术技法有一定难度，在引领美国艺术方面他可能不能像托马斯·道蒂和亚瑟·布朗·杜兰德那么有影响力。托马斯·道蒂总体能力不如托马斯·科尔，因此托马斯·科尔显然是天生的艺术家。



《托马斯·科尔》，亚瑟·B.杜兰德绘



《蛮荒时代》，托马斯·科尔绘



《田园牧歌》，托马斯·科尔绘



《繁荣》，托马斯·科尔绘



《破坏》，托马斯·科尔绘



《荒芜》，托马斯·科尔绘

二十八岁前，托马斯·道蒂一直从事皮革生意。在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情况下，他放弃了皮革生意，开始创作风景画。我们早期的画家选择进入艺术生涯时都非常大胆、自信，他们在投身艺术前既没有艺术方面的实践，也没有接受过相关理论的指导。这样天真的选择显得很可爱。但如果没有一定的成果证明他们当初的大胆决定是正确的，这些艺术家的努力就会遭到蔑视，因为他们中有些具有非凡的能力。比托马斯·道蒂伟大的风景画家有很多，但没有机会接受艺术指导却能画得这么出色的画家很少。虽然当时的英国风景画艺术正处在巅峰，但托马斯·道蒂似乎在英国和美国都成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力，受到很多人的称赞。他的作品风格完全属于原创，具有柔和诗性的特质。他的作品中温和的银色色调对后来的风景画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费尔芒特水厂》，托马斯·道蒂绘



《哈德孙河》，托马斯·道蒂绘

亚瑟·布朗·杜兰德出生于一个胡格诺教徒家庭，他很高寿，是三位美国风景画艺术先驱中唯一活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家。他老年时依然精神矍铄，像托马斯·科尔一样极具天赋。亚瑟·布朗·杜兰德和托马斯·科尔的总体艺术才能相当，他们的画作反映出两人的相似之处，即都具有崇高的精神追求和对造物主深深的崇敬之情，但我们在亚瑟·布朗·杜兰德身

上发现了一种特别的精神品质。托马斯·科尔更富想象力和灵感，仿佛受到天才之火的指引；亚瑟·布朗·杜兰德的性情更温和，经验更丰富。从艺术角度看，亚瑟·布朗·杜兰德的作品更令人满意。

没有几位艺术家能像亚瑟·布朗·杜兰德那样能力超群，可以在完全不同的艺术分支领域取得成功。作为一名钢雕家，亚瑟·布朗·杜兰德在19世纪创作的杰出的版画比自己雕刻的约翰·范德林作品的《阿里阿德涅》更优秀。在我们的艺术家中，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既会设计又会雕刻，创作出《慕茜陀拉》这样的作品。亚瑟·布朗·杜兰德的刻刀功力让人钦羡。他后来开始作画。他创作的布莱恩特的头像使他跻身我国著名肖像画家之列。目前为止，他对自己取得的成就仍不满足。三十八岁时，他致力于风景画创作，很快成为这一领域的先驱和大师。他在雕刻作品时非常小心，因此他在处理画作的线条时也非常认真细致。他创作肖像画时对人物特点拿捏准确，赋予了作品人性，就像古希腊人那样，让他们的森林成为树妖出没的地方。在华盛顿科克伦画廊里的《森林的边缘》这样庄严宏大的风景画中，亚瑟·布朗·杜兰德用泼墨的方法描绘出树木的茂盛和生机，体现了他对自然的人性化的巧妙处理。他的艺术完全是民族的，很少有美国画家像他那样几乎从未受到外国艺术的启发。亚瑟·布朗·杜兰德在美国学到了使他获得三重声望的各种艺术，找到了作品的主题。只要美国艺术一直存在，他的名字就注定会永存史册。



《黄昏》，亚瑟·布朗·杜兰德绘



《慕茜陀拉》，亚瑟·布朗·杜兰德绘

风景画创始人的继承者们像他们的先驱那样，在虔诚的信仰和崇高的诗意冲动中寻找灵感。这些继承者中最著名的是约翰·F.肯西特。像亚瑟·布朗·杜兰德一样，约翰·F.肯西特一开始从事的也是雕刻。他在美国印钞公司工作，后投身绘画。和他的很多同辈相比，他似乎更幸运。他早年去英国和欧洲大陆游玩，在国外呆了七年。虽然和国外艺术流派特别是意大利的艺术流派有长久的联系，但在他的作品风格中很难找到外国艺术风格的蛛丝马迹。他的作品像亚瑟·布朗·杜兰德一样具有原创性，理解自然并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然。他画的风景画温和、谐调，完全没有煽情的意味，尤其是和谐的特征在现代价值观问题中逐渐引起了巴黎艺术家的关注。约翰·F.肯西特已经领悟艺术实践理论，这种认知的重要性在外国艺术中也逐渐凸显。他并不是在所有作品中都试图解释自然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而是在平静的、梦幻般的海岸场景中突出表现这种关系。在描绘海岸风景的作品中，他试图渲染或暗示的感情并不多，但明显表现出一种努力追求广泛的效果。这是成功把握他的艺术精髓的标志。约翰·F.肯西特的艺术作品有一种独特迷人的温和色调，充满淡淡的诗意。一般来说，他的小幅作品比大幅作品更令人满意，他的大幅作品中技法过细。几年前，约翰·F.肯西特去世，他的艺术生涯在美国的艺术史中记载得非常完整、对称。



《约翰·F.肯西特》，大卫·约翰逊绘



《钓鳟鱼》，约翰·F.肯西特绘

波士顿的乔治·L.布朗和约翰·F.肯西特同代，但他比约翰·F.肯西特长寿。他早年历尽艰辛，通过努力奋斗获得了成功。他陶醉在意大利迷人的风景中，致力于用自己的艺术才能呈现这种美。他的创作为他赢得了荣誉和地位。他追求透光率和色彩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意大利风景画的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的用色方法。他的用色明亮鲜艳，富有诗意，但这种用色使我们想起的是工作室，而不是他描绘的自由、纯粹、迷人的奢华氛围和阳光灿烂的风景。乔治·L.布朗从来不是盲目模仿外国艺术，在认可外国艺术强大影响力的同时，他还用大量证据表明自己的个性。他的作品《纽约湾》被威尔士亲王收藏。画中描绘了威尼斯水街两旁的破旧宫殿。水中到处都有像燕子一样划过水面的贡多拉小船。通过这些画作，乔治·L.布朗证明自己是一位真正的诗人，更是一位令人钦佩的画家。

[1]　《北美评论》是美国第一本文学杂志，由记者内森·黑尔等人于1815年在波士顿创立。《北美评论》的第一位编辑威廉·都铎和其他创始人发行《北美评论》，旨在培育一种真正的美国文化。最初为双月刊，刊载诗歌、小说和杂文，1820年变为季刊，致力于改善社会和提升文化。《北美评论》促进了公立教育制度的完善，健全了医生和律师的专业培训体系等。——译者注

[2] 指约翰·范德林。——原注

[3]　胡格诺派起源于16世纪初的法兰西王国。胡格诺派赞同基督教新教的改革，曾于1562到1598年与天主教派大战，史称法兰西宗教战争，以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而告终。亨利四世赋予胡格诺派大量宗教、政治和军事权力。——译者注

[4] 斯托本维尔，美国俄亥俄州东部城市。——译者注

第3章　风景画、动物画与历史画：艺术流派的多元化与艺术家个性的深化



丹尼尔·恒停顿（1816-1906）

没有任何一个艺术流派的诞生速度能比得上风景画流派的诞生速度。风景画流派的诞生归功于托马斯·科尔、托马斯·道蒂和亚瑟·布朗·杜兰德。迄今为止，美国画家取得最显著成就的领域一直是肖像画领域。现在，大多数美国艺术家都将目光转向了风景画。四十年来，很多画家使世人熟悉了他们的故土，同时也激发了大众对艺术的兴趣。

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赢得了地方或国家声誉的风景画家，只能在认识风景艺术的重要价值和不容置疑的优点时，不夸大其相对价值和地位。同时，大多数情况下，风景画作品都源自那些追求艺术的画家的真正艺术情感和他们对自然最真挚情感的热情流露。风景艺术令人愉悦，不仅提升了我们的审美，还让我们感觉到了诗意。这类作品中也有一些杰作，但总体来看，我们的风景画艺术流派还未达到最高境界。令人诧异的是，风景画艺术一直处在均上水平，主要原因是周围环境不利其发展。促进风景画流派发展的那些作品过于平淡，没有启发作用。这一流派虽然多产，但在追求数量的过程中忽视了质量。艺术中的理想和情感因素还没有完全占据支配地位，但关于景观艺术末梢的地形学和机械观念已经开始盛行。

近几年，风景画流派还在描绘自然的表面轮廓，丝毫没有触及灵魂的微妙暗示。有时也因缺乏扎实的训练或未能领会奠定艺术实践基础的公认原则，使作品明显缺乏想象力和大自然孕育的活力，以及真情实感与吸引力。虽然这些作品也体现了一定的原创性，但其风格缺少多样化或个性。另外，风景画流派的艺术家的天赋才能相对比较均等。年度展览中的作品质量差别也不大，但除了一些罕见作品，很少有作品能以独特的技法和大胆的想象力吸引人们的眼球，一些佳作也很少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风景画流派没有形成朝一个方向共同努力的影响力，也无法产生具有卓越才能且可以跳进艺术竞技场努力赢得世界赞赏的典型艺术家代表。其间，有时偶尔也会出现有天赋且已经赢得声望的艺术家，但他们与托马斯·科尔一样，缺少训练和指导。民族艺术的传承对取得卓越成就来说不可或缺。譬如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由于平淡的风格和缺乏具有推动力的环境，他在达到领先水平前就停下来了。这类艺术家的想象力受到了限制，他们追求的只是表象描绘而不是理想表达。

关于绘画技艺方面，我认为风景画流派总体上技法不精，风格摇摆不定，没有明确的目标。艺术家们往往过于重视细节描绘，缺乏宏观把握，他们关注的是部分，而不是总体效果。因此，虽然他们极其认真地渲染了细节，但画作的灵魂却溜走了。第一眼看上去令人目眩的作品并不能抓住观察者的想象力，再仔细看就会觉得平淡无奇，索然无味。顶尖的艺术作品恰好与之相反。

我们发现风景画艺术流派并不重视艺术线条的重要性，至少在欣赏能力方面存在不足。美国绘画作品的色彩大多表现得很好，但这一优势几乎被艺术家们表现出来的对绘画元素的无知所破坏。艺术家们不能有效地进行创作，或无法感知真正主导艺术思想的和谐，这也是风景画流派经常表现出的一个缺点。如果在颜色应用方面不够大胆，很多作品的涂色会看起来比较稀薄，几年后会渐渐褪色，这一点令人感到痛心。在美国艺术发展的这一时期，风景画的这些缺陷在肖像画作品中也很常见。通过调查研究，总体上缺少热烈感情和认真态度是这个流派留给公正的观察者的印象。



《橄榄山上看耶路撒冷》，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绘



《北极光》，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绘



《热带地区的雨季》，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绘

坦率地说，如果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也许就不会感到惊讶或失望了。伟大的艺术是一个酣睡的孩子。国家的动荡不安对某些职业具有鼓励促进作用，但对艺术发展来说即使不是致命的，也与艺术最高形式的发展相悖。广而多的目标阻止了艺术家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努力，而热忱的艺术天才们愿意为一个共同的艺术目标奋斗；因此我们没有因已经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的质量气馁，而是接受现在的作品质量，将其视为表现美国人民本能地转向艺术的强有力的证据。美国艺术需要等待更好的社会环境，然后才能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平。

美国的艺术作品普遍缺乏想象力，但这不能证明我们天生是一个平庸的民族。事实上，很多年前，我们曾拥有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家，譬如詹姆斯·汉密尔顿、约翰·拉法基、伊莱休·维德等。我们认为美国人在科学和机械发明方面表现出了伟大的特质，这证明我们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赫伯特·斯宾塞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必须有想象力才能解决科学发明中遇到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家需求激发了科学领域的想象力，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几乎没有理由怀疑科学领域的想象力会对创建一个独特而强大的艺术流派有帮助。



《跳舞的女孩》，伊莱休·维德绘



《向狮身人面像发问的人》，伊莱休·维德绘

然而，承认美国风景画艺术的不足之处以及我们的艺术家还没有达到风景画的最高境界的同时，我们还应该谨慎小心，给予这些艺术家应有的荣誉。他们理应得到这样的荣誉，因为他们从未停止努力，而且他们往往具有天生的才能。我们应该公正、慷慨、有鉴别地去赞扬艺术家中很多有资格得到赞扬的人。如果提到这些艺术家时是按个体而不是按流派将他们分类，那是因为我们的艺术家中几乎没有人创建流派，我们已经解释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然而，我们也许可以将创作同类主题但风格完全不同的艺术家视为一个流派。我们提到的风景画艺术流派就是按照这一标准划分出来的。

一些特殊情况将在另一章中提及。总之，这一时期的美国风景画艺术主要关注客观方面，其他形式的艺术也是如此。在这一时期，任何其他形式的艺术都触动不了人们，也不能促进审美教育的产生。审美教育是一个民族艺术的主要责任。

美国的风景画艺术流派不仅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还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关注。此外，由于风景画艺术流派几乎没有受到外国艺术的影响，完全属于本土艺术，因此它的产生显得十分自然，如同冬天过后五月盛开的花。

就像漫长的冬天过后，温暖的春天刚刚到来，果园里开满了鲜艳的花，此时美国的许多地方也涌现出了很多艺术家，特别是风景画艺术领域的艺术家。很难相信在这个几年前还有印第安人、水牛和狼自由徜徉的地方居然出现了艺术家。这些艺术家有鉴赏故乡的美的能力，能引导思想平庸的拓荒者看到四周的美景，并使自己的名字永存史册。俄亥俄在1800年才成为一个州，本时期早期的艺术家们虽然没有机会接受艺术教育或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但随着通信手段的增多，他们至少可以去纽约和波士顿，或去有很多画室和艺术资源的欧洲。其他国家的各个时代都是通过抒情诗和田园诗表达诗意，但美国最好的诗歌是那些用基督教的文明之犁拓开这块土地的人的儿子们创作的。这一时期，我们发现突然出现了一项极具影响力的发明，它对促进国家新兴艺术事业的快速发展很有帮助，这项发明就是蒸汽技术。蒸汽技术作为驱动机车和轮船的强大魔术师在保守派中的名声并不好，保守派不支持时代的进步运动。但蒸汽机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多影响，我们必须承认蒸汽技术对艺术发展的促进作用。毫无疑问，当时突然涌现的众多艺术家的迅速成功应该部分地归功于蒸汽技术。正是由于蒸汽技术的问世，才出现了方便艺术家们往返各地的大型交通设备。



《科尔特斯率军进攻特奥卡利》，伊曼纽尔·戈特利布·洛伊策绘



《斯凯勒夫人焚烧麦田》，伊曼纽尔·戈特利布·洛伊策绘



《夏季牧场》，沃辛顿·惠特里奇绘

1841年，伊曼纽尔·戈特利布·洛伊策前往杜塞尔多夫 [1] 学习，为美国艺术引入了一股新的动力。现在，美国艺术受到的国外艺术的影响其实就是意大利和英国艺术流派的影响，这一影响很明显。几年后，沃辛顿·惠特里奇去了杜塞尔多夫，在阿亨巴赫的指导下学习。沃辛顿·惠特里奇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俄亥俄人。曾有一段时期，他的风格明显受到外国艺术风格的影响，但像当时大多数美国艺术家一样，他的作品中依然有本土的独立性，他对外国艺术是吸收而不是模仿。沃辛顿·惠特里奇后来

的风景画完全具有个人特点和美国特色，然而国外的训练无疑提高了他的绘画能力。作为美国各个阶段的森林内景的忠实描绘者，沃辛顿·惠特里奇非常受大众青睐，在人们心中获得了永久的位置。他在一些风景画中描绘了辽阔的西部风景。这些作品气势恢宏，构图独特，但对天空的描绘有时缺乏生气，不够完美。

J.W.卡西尔一开始是一名雕刻师。他雕刻了丹尼尔·亨廷顿的《西比尔》，这件艺术品展现了他的才能，证明了他在这一艺术分支取得的成功。转向风景画创作后，J.W.卡西尔用高超的手法创作了许多优美、充满诗意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精致优雅，但没有独创性。詹姆斯·A.萨伊达姆温柔的风景画也有类似的特点。由于一些梦幻般的、悦目的但不是非常有活力的画，譬如《佩米格瓦塞特山谷》，塞缪尔·L.格里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受到了人们的称赞。

毫无疑问，R.W.哈伯德在画布上呈现的是一位真正的诗人的作品。R.W.哈伯德的画作描绘的是我们更熟悉的风景，虽然他的作品不会令人激情澎湃，但也质朴迷人。他的作品特点是对静谧和沉思的和谐处理，这样的作品就是一首着色的田园诗。圣路易斯的J.R.米克运用R.W.哈伯德新英格兰风景画的画法，尝试进行创作。“阿查法拉亚湖，掩映在馥郁的玫瑰花丛中”；生机勃勃的橡树展开巨大的手臂，仿佛哥特式大教堂的穹形拱门；交叠蔓生的神秘西班牙苔藓；西南的淡水湖幽静的海岸上空盘旋着的鹈鹕和快乐的彩鹤；树林中传来的知更鸟热情的朗诵，知更鸟是树林的即兴诗人。有时，J.R.米克的作品虽然在色调方面并不成功，但已经很接近虔诚和诗性精神的主题。他在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场景也很有感情，蕴含着哲理。

费城的W.T.理查兹忠实再现了美国风景画的另一个方面，即长长的银色海岸和沙丘，那是大西洋海岸许多地方的特点。W.T.理查兹经常用极大的耐心描绘林地场景。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的作品细节描绘过多。常常有人指责他的画作中的绿色过于粗糙，色彩过于强烈。但W.T.理查兹在海滩画领域有一定影响力，并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这类作品虽然稍微有些矫揉造作，但形成了一种主题风格及画作处理方式，有效呈现了美国海岸的一些特点。W.T.理查兹的一些水彩画几乎无人超越，譬如描绘荒凉、雪松丛生的泽西海岸的雪状沙丘的卓越作品。



《黄昏的纽约》，J.W.卡西尔绘



《河口景观》，J.R.米克绘

美国风景画与众不同的多样性特点还在表现秋天绚丽的树叶上。有人认为秋天的树叶过于生动，违背了艺术目的，但我认为这是个人品味问题。试图描绘落日的效果或印第安梦幻般的夏天森林的朱红和金黄色彩，并不比在一群东方人中描绘华丽的织物荒谬；但对能正确感知色彩的艺术家来说，在一群东方人中描绘织物的华丽是合情合理的主题。真正的困难不是主题，而是艺术家。一些画家通过敏锐的洞察力和出色的判断力抓住了秋季美景的特点，譬如约翰·F.肯西特和J.F.克罗普西。J.F.克罗普西起初是一位建筑师，最终成了一名深受大家喜爱的秋景描绘者，曾创作了很多作品，这些作品因真实感和艺术美感出名。他后来的

作品和他早期作品相比差距很大。J.F.克罗普西的代表作风格明快，色彩鲜明。有时，他在创作中显得非常大胆。克里斯托弗·P.克兰奇先生在意大利时和J.F.克罗普西有联系，他是一位很有名的作家，他的威尼斯风景画中表现出他对色彩的正确认知，但构图没有力度。和同时期在国外学习的艺术家相比，克里斯托弗·P.克兰奇受到外国艺术的影响较多。R.H.富勒是马萨诸塞州切尔西警察局的夜间守卫员，1871年去世。他是一名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艺术家，但他很擅长处理色彩和空气效果。他的一些风景画有时是一气呵成的，风格柔和而美丽。F.D.威廉姆斯离开波士顿前往巴黎前，制定了一套既美观又新颖的艺术处理和着色方案。F.H.沙普利对自然界的静谧极有感觉，他描绘的海岸场景很有吸引力，但往往缺乏力量。



《泽西海滩的树》，W.T.理查兹绘

如果认真观察美国风景画艺术领域，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一领域佐证了一个民族的艺术流派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彻底的原创性和个性鲜明。

虽然这一时期重要的美国风景画家多多少少都曾在欧洲学习过，但他们描绘自然时都具有这个特点。风景画流派追求精致优美而非强大有力。无论它的普遍缺点是什么，我们必须承认它的代表艺术家都很坚定、独立，他们的优缺点都极具个性。大卫·约翰逊认真创作的作品中有大量多彩多姿的树叶，让人想起了英国风景画大师的风格。约翰·B.布里斯托尔精心描绘的格林山脉中有梦幻般优美的田园草地和树木繁茂的山坡，还有被薄雾笼罩的泛起涟漪的湖泊。大自然沉浸在静谧中。这个流派的风景画家中没人能描绘出比约翰·B.布里斯托尔描绘的格林山脉更怡人的画面。



《秋天的哈德孙河》，J.F.克罗普西绘



《秋天的格林伍德湖》，J.F.克罗普西绘



《天然桥》，大卫·约翰逊绘



《尤纳迪拉河日暮》，大卫·约翰逊绘

W.L.桑塔格和A.F.贝洛斯的风景画差异很大。W.L.桑塔格采用的色调和色彩一般不以自然为焦点。他通过色彩描绘理想，因此他的画作充满诗意，甚至可以将他并入著名的诗人行列。对W.L.桑塔格来说，风景画并不是对现实场景的忠实描绘，而是对幻想的理想景色的描绘。我们应该心怀感激地接受他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不仅可以带给我们快乐，还说明了艺术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很多方面。另外，无论油画还是透明水彩画，A.F.贝洛斯都试图认真复制自然。有时我们觉得他付出了很多努力却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但他忠实阐释了美国乡村生活的魅力以及田园诗般的风景。如果A.F.贝洛斯不是一位有诗意的画家，我们可能会期待他创作出与威廉·库珀或汤普森类似的田园诗。A.F.贝洛斯先生早

期在安特卫普学校的艺术学习经历和数年来他对风俗画的孜孜以求，使他有能力巧妙地运用多样性的手法呈现迷人的乡村美景，以及高贵的新英格兰榆树和成群结对的行人。毫无疑问，A.F.贝洛斯完全有资格被称为美国的勃克特·福斯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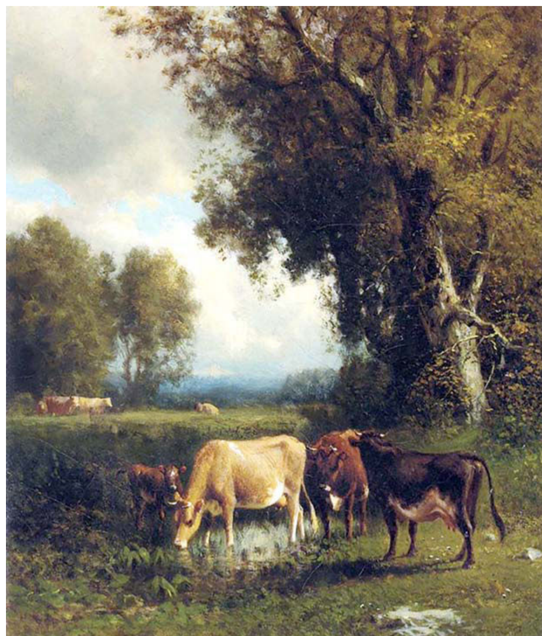
《秋晨的波托马克河》，W.L.桑塔格绘

乔治·英尼斯的早期风景画很有启发意义。从创作风格来看，他早期的风景画应该属于美国早期比较独特的风景画流派，但他最近的创作方法表明他后来在巴黎画室学习过。塞缪尔·科尔曼是另一位风景画家。他的艺术风格既和这个时期风景画流派的风格有联系，又与我们正在进入的时代的风格有联系。塞缪尔·科尔曼在美国接受教育，他对颜色很敏感。通过国外旅行，他对艺术有了更广泛的认识，并改进了自己的技法，人们很赞同他后期的创作方法。



《河畔婚礼》，A.F.贝洛斯绘

威廉·哈特和詹姆斯·哈特的风景画代表了美国艺术的另一个阶段。他们一开始都是马车漆匠的学徒，他们逐渐发现自己与不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都是大自然的信徒。他们很擅长描绘美国的山坡、山谷和树林的外在美以及绚丽的色彩。他们的作品构思巧妙，但有时太生硬，缺乏温情，这一缺点使他们的作品逊色不少。换句话说，他们的作品太客观，没有用心灵进行创作。近年来，詹姆斯·哈特在他的风景画中加入了牛，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一时期少数几位值得尊敬的描绘动物生活的画家中，詹姆斯·哈特占有重要地位。



《吃草的牛》，威廉·哈特绘

贺拉斯·罗宾斯成功抓住了高山风景的特点，对灰色的大气的处理很细腻。亚瑟·帕顿笔下的树令人赏心悦目，他描绘的十一月的朦胧风光让人感觉清爽素净。亚瑟·帕顿是这一时期的美国年轻画家的一员。小詹姆斯·斯迈利和乔治·斯迈利也属于这一时期，他们都喜欢水彩画和油画。小詹姆斯·斯迈利是许多以钢材雕刻开启艺术生涯的风景画家之一。乔治·斯迈利和小詹姆斯·斯迈利兄弟很有艺术才能，他们的一生虽然都在美国度过，但他们的后期风格却明显受到外国技法的影响并进行了改进。他们现在的风景画作品显示出一种充满吸引力的活力和新鲜感，并对主题也进行了一些原创性选择。

我们提到的每一位艺术家的风格都很有个性。个性的表达是铭刻在所有油画布上的，但这些艺术家中没有一个比桑福德·R.吉福德更具原创性。桑福德·R.吉福德如果生活在两千年前的波斯或秘鲁，很可能是一位热情的拜火教徒，或每天虔诚地迎接东升的太阳。他的风景画无论描绘的是美国远西地区还是著名的哈德孙河或美丽的东部，都表现出一种彤红霞光的效果。他在画布上的诗意表达重现了灿烂的落日天空。但那些认为桑福德·R.吉福德的诗意一直局限在沉思静谧的曙光范围内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也曾成功描绘过慵懒的薄雾和清晨静谧的湖边的昏暗林地的

雾霭。他的风格综合起来非常有个性，而且蕴含哲理，具有启发性，是艺术领域分析情感元素的杰作。

美国风景画的客观流派似乎在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的艺术创作中达到了鼎峰。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的艺术生涯代表了美国19世纪上半叶产生的主要艺术流派的典型倾向和目标，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客观流派的技法缺陷，但同时他的作品也表现了对自然的崇敬以及对宏大壮丽的客观世界的热爱。客观流派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美国艺术才子永不停息、永不满足的追求。他们在创作中释放自我、超越自我，渴望像威尼斯一样征服世界，获得财富和赞美。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先生的作品在美国艺术中所具有的价值就像地理诗章《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在英国诗歌中的价值，或圣彼埃尔和夏多布里昂 [2] 充满炙热情感的文字在法国文学中的价值。如果文学作品中允许出现这样一个主题，那么在绘画作品中也可以出现这样的主题。无论作品主题是史诗般的崇高，还是历史绘画或主观风景画的伟大，我们在这里都不需要分析这个问题，因为每个主题都很重要，任何一个主题获胜都是伟大天才的成果。毫无疑问，《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描绘了旧大陆的风景，就像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的艺术是描绘新大陆的作品一样。这片大陆的浩瀚和壮丽还未展现在人类面前。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不仅有罗利和巴尔博亚的热情，还有探险家和艺术家的特点。他不断探索陆地和海洋。作为托马斯·科尔的学生，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实现了他的老师的愿望。他沿着哈德孙河的神奇海岸和卡茨吉尔的理想山脉去寻找并获得了灵感。这一时期的文明恰好需要通过这种艺术形式表达。那些教会人们审美和发现第一批拓荒者用斧头开凿的地方的美的艺术家出现了。



《故园》，詹姆斯·哈特绘



《沿河风光》，贺拉斯·罗宾斯绘



《盖伊角》，小詹姆斯·斯迈利绘



《温莎城堡》，桑福德·R.吉福德绘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很少表现自然鲜为人知的、显著的震撼效果，但他的画作中丝毫没有煽情或做作的成分。此外，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细致地描绘并没有减弱画作宏伟的集中效果和惊心动魄的美与雄伟壮丽。《科多帕希火山》《安第斯山脉的心脏地带》或《尼亚加拉》可能违背了很多艺术流派制定的规则，但这些作品体现了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超群的能力，使他的批评者哑口无言。



《科多帕希火山》，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绘



《安第斯山脉的心脏地带》，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绘

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的第一幅画《尼亚加拉》占据了这一历史时期客观流派的制高点。这幅画由一个迄今为止从来没有越过大西洋的艺术家创作完成，且具有艺术家本人的鲜明个性。

许多人很熟悉用彩色平版印刷术复制的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的《尼亚加拉》的副本，但那些没有看过原作的人对伟大作品的壮观却没有完整的感受。如果看过原作，你会觉得这幅画上的瀑布像真的一样，似乎能听到人类还未踏上这块陆地前汹涌的河水冲过陡峭悬崖的咆哮声。这幅画象征着永无停歇的、不可抗拒的时间的所向披靡。绿色的洪水涌入可怕的深渊，汹涌的漩涡升起薄雾笼罩在洪水上方，燃烧的十月抹红了遥远海岸两旁的树叶，玫瑰色的苍穹中一道轻飘飘的彩虹用难以捉摸的色带将天堂和大地连接起来，卓绝的艺术描绘了一切。



《尼亚加拉》，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绘

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最近的一些作品主题取自著名的地中海海岸。他采用了具有广度的处理方式，较少描绘细节，因此作品中没有出现力量缺失的现象。在描绘经典的壮丽景色时，他的创作力量更成熟、更具崇高理想。《废墟中的帕特农神殿》忧郁而高贵，庄严和沉默的色调与主体特征一致；被称为《爱琴海》的伟大作品具有特殊价值，可以与一些精湛的意大利油画媲美。



《废墟中的帕特农神殿》，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绘

路易·R.米尼奥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风景画家，他选择的一系列主题和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的创作主题类似，他曾与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一同前往南美旅行。路易·R.米尼奥于1870年在伦敦去世。他满怀热情，迷恋大自然的温柔和壮丽。我们认为他是美国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公正地说，路易·R.米尼奥可以与那些最先唤醒美国的审美意识、使人们关注这片大陆的美丽壮观以及美不胜收的风景的先驱者们齐名，他们将这片大陆视为一份从未被其他人染指的遗产。路易·R.米尼奥是一位出色的调色师，在材料处理方面他在美国画家中独领风骚。他也是一位具有广泛认同感的艺术家，非常喜欢描绘自然的各个方面，譬如南美里约班巴的热带旖旎风光、尼亚加拉瀑布的漩涡急流，以及如仙境般优美、雅致、缥缈的雪景等。遗憾的是，他在内战爆发时去了英国，因此他最重要的作品属于英国。《海德公园的雪》是他去世前在美国创作的，是美国风景画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雪中猎人》，路易·R.米尼奥绘

很多有才能的海洋艺术家展现了我们民族的海洋特点。这一时期美国海洋艺术家虽然不少，但也远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多、那么有才能。威廉·布拉德福德是一位贵格会教徒。他曾多次到拉布拉多研究冰山，并创作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品，为自己赢得了声誉。他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他的一些海岸风景画颇富生机，但因方法错误受到了很多批评和指责。查尔斯·坦普尔·迪克斯不幸早逝。他的作品富有活力和想象力，充满

希望。波特兰的哈里·布朗成功描绘了海岸风景。这一时期美国最有能力的海洋画家是费城的詹姆斯·汉密尔顿。他是一位艺术天才。他的作品的用色有时显得粗糙扎眼，但他很精通颜料，也富有男性的独特想象力，可以进行即兴创作。毫无疑问，詹姆斯·汉密尔顿在描绘船或波涛的形状方面有很多缺陷，但他真的很热爱海洋。在这种热情的激励下，他描绘了古老海洋的狂野和宏大，而且画面开阔、雄伟、充满力量。美国还没有哪位画家笔下的大海比詹姆斯·汉密尔顿创作的大海更活泼、更有特色。

当我们转向动物画领域时，发现这是迄今为止美国艺术最薄弱的领域——从事这一行业的艺术家非常少，而且能力都比较弱。T.H.欣克利曾经许诺画斗牛比赛，但他的作品中很少有超越《登纳》的画作。《登纳》描绘了一只瞪着一双像玻璃一样眼睛的饥饿的狐狸，狐狸的头发颜色很漂亮，看上去有点儿狡猾，但没有生命力和特点。威廉·海因斯擅长描绘野牛、草原狗和其他一些狗，虽然他在颜色处理上能力较弱，但他成功赋予了画作群体精神和个性。他在我们动物画家中的地位相当于威廉·西德尼·芒特在风俗画家中的地位。沃尔特·M.布拉克特曾经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在一个夏天的早晨在新罕布什尔州清澈的小溪里捕到一条鱼，并感受到了捕鱼、画鱼、吃鱼三方面的乐趣。他最近赢得了“艺术界沃尔顿”的美名。如果他能像描绘溪流中的黑脉金斑蝶那样巧妙地画出岩石和树，那他的作品会显得更完美无缺。亨利·C.比斯法姆创作了一些活泼但略显拙劣的有关牛和马的作品。T.B.索普上校是一位有艺术品味的业余爱好者。他在《边境调查》这幅具有半幽默讽刺意味的作品中描绘了一只坐在野牛尸骸上的狼。这幅画体现了美国人特有的幽默。威廉·H.比尔德使这类半幽默讽刺作品达到了极致。他的哥哥詹姆士·比尔德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受人尊敬且很有造诣的动物画家。威廉·H.比尔德多才多艺。他的一个专长是借助动物风俗画暴露生来有罪的人类的弱点和缺点。他创作的猴子、熊、山羊、猫头鹰和兔子让我们忍俊不禁。这些动物模仿我们的言行举止，复述了一个故事：斯巴达的一个奴隶被他的主人灌醉，以此作为对他儿子的警告。威廉·H.比尔德的作品表现出一种新奇的绘画技巧，如《西勒诺斯的舞蹈》被称作无聊且固执己见、反复无常而又务实的猿；《酗酒的熊》的细节描绘技艺高超。他的作品中也有大量的戏剧性讽刺，譬如在《财神是凶猛动物中的公牛和

熊》中有许多奋力拼搏的人物。这幅作品揭露了证券交易所的荒谬行为。可以将威廉·H.比尔德称为美国的伊索，但许多人断言他的作品不是艺术。事实上，明确划定艺术的界限，并规定艺术家应选择什么主题进行创作是非常困难的。艺术家的创作成果只能证明他的创作手法是否正确。动物风俗画就像贺加斯生动的讽刺画报或欧斯金·尼科尔温和的戏剧风俗画一样，都是艺术家笔下的一个合理主题。



《眺望海港》，威廉·布拉德福德绘



《拉布拉多海岸附近的捕鲸船》，威廉·布拉德福德绘



《等待解冻》，威廉·布拉德福德绘



《鳟鱼》，沃尔特·M.布拉克绘



《我创造了什么？》，威廉·H.比尔德绘



《酗酒的熊》，威廉·H.比尔德绘

前一章我们提到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人物画家、历史画家以及风俗画家。威廉·西德尼·芒特是许多有才能的风俗画家的前辈。在这些风俗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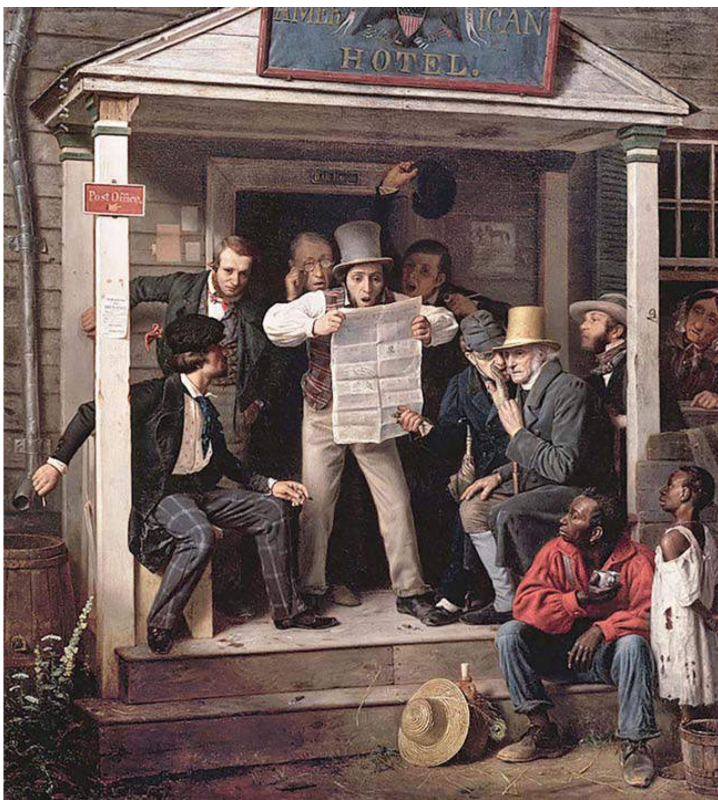
中可能会提到托马斯·希克斯，他是托马斯·库图尔的学生。在美国画家中，托马斯·希克斯是第一个到巴黎学习的画家。在巴黎一所令人羡慕的学校，托马斯·希克斯成了一名优秀的调色师，但他的后期作品失去了前期作品具有的一些特质。他创作了一些风景画和风俗画。他的风俗画比较成功，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但他主要关注的是肖像画。他的肖像画《米德将军》引人注目，是一幅佳作。理查德·凯顿·伍德维尔跟着沃辛顿·惠特里奇去了杜塞尔多夫，他在风俗画方面很有潜力。理查德·凯顿·伍德维尔的作品明显受到德国艺术的影响，但作品中表现出的强烈个性注定他要通过绘画表达自我，并使自己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画家之一。虽然理查德·凯顿·伍德维尔英年早逝，但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高兴，因为当时的人们还不懂得欣赏艺术，很少有艺术家能够赢得大家的赞美，得到人们的欣赏。乔治·B.弗拉格前期表现出创作风俗画的良好潜力，但他的能力太过早熟。他很幸运地成了华盛顿·奥尔斯顿的学生，而且长期居住在伦敦，但这些有利条件似乎并没有激发或永葆他的艺术才能。



《御寒》，欧斯金·尼科尔温绘

与此同时，美国的边疆生活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文明与野蛮之间那条如画的边界线正成为作家笔下重要的主题。华盛顿·欧文、詹姆斯·费

尼莫尔·库珀、肯尼迪、斯特里特、惠蒂尔和亨利·华兹渥斯·朗费罗等人用他们的灵感在散文和诗歌中赞美印第安人的生活，描写边境战争。威廉·卡伦·布莱恩特的《大草原》似乎是一个预言的前奏曲，为人类大军向日落之地行进奏响了乐曲。《伊凡吉林》是美国诗歌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作。诗中对西部壮观美景的概述一点儿也不比对女主角不屈不挠的性格描写逊色，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艺术心灵回应了这块未知地域的神秘和浪漫，并生动描绘了蒙昧的人类对这块尚未开发的人迹罕至的地方的兴趣和情感。遗憾的是，这些西方风俗画先驱者的作品的艺术价值并不高。从历史角度看，乔治·凯特林、查尔斯·迪斯与威廉·S.兰尼富有冒险精神和非凡的事业心及勇气。他们认同印地安人和边疆生活，凭借艺术热情使印第安人和边疆生活避免了埋没在历史红尘中的命运。如果能得到一些有效指导，他们的艺术成就可能会更高。他们为铅笔画主题做出的贡献相当于布雷特·哈特曾经的成就。布雷特·哈特用铅笔使狂野、风景如画但转瞬即逝的太平洋斜坡的情景成为不朽之作。一个值得记录的事实是，威廉·S.兰尼去世后，社会艺术家资助协会的重要互助人寿保险协会成立，并对威廉·S.兰尼的家族进行了资助。



《来自墨西哥的战争新闻》，理查德·凯顿·伍德维尔绘



《水手的婚礼》，理查德·凯顿·伍德维尔绘



《蒂皮斯》，乔治·凯特林绘



《苏族人》，查尔斯·迪斯绘

这一时期的历史画家很少创作出值得注意或纪念的作品，但也有几幅像丹尼尔·亨廷顿的《共和宫廷》这样的作品问世。这些画优美雅致，是美国艺术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费城的肖像画家彼得·F.罗瑟梅尔也创作了大量历史画。他创作的最后一幅画可能是所有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他的《葛底斯堡战役》描绘了世界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的场景，画风大胆，极具特色，但在某些方面受到了人们的严厉批评。J.G.查普曼曾经是一位技艺纯熟的木工雕刻师和风俗画家。他也曾在难度很高的历史画领域创作。1860年前，除了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和本杰明·韦斯特的一些作品，约翰·特朗布尔也创作了两三幅描绘战场的作品。最杰出的美国历史画家应该是德国血统的艺术家伊曼纽尔·戈特利布·洛伊策。虽然伊曼

纽尔·戈特利布·洛伊策出生在外国，但完全可以称他为美国画家。他童年时被带到费城，一直生活在美国，并非常热爱美国，热爱美国的土地、历史以及制度精神。伊曼纽尔·戈特利布·洛伊策二十七岁时到了杜塞尔多夫，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美国度过的，最后在美国去世。他的艺术主题几乎完全是在美国文化的启发下产生的，并与美国文明的成长融合在一起。他非常大气，充满热情，志存高远，虽然他在艺术创作中常常犯错，但观察他的作品时，我们会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颗伟大的心灵。如果得到更多有利的机会，他将取得自己一直渴望的成功。伊曼纽尔·戈特利布·洛伊策的灵感源泉似乎汲取不尽。他有拜伦式的天赋和才能，而且风格粗犷不羁，不仅有波澜壮阔的激情，还有许多奇思妙想。他的作品如史诗般壮观，创作大胆，充满活力。显然，伊曼纽尔·戈特利布·洛伊策深受德国因袭主义的影响，描绘出了别人无法想象的事物，在用色和画法方面也很严格，他为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的艺术资源。



《共和宫廷》，丹尼尔·亨廷顿绘



《葛底斯堡战役》，彼得·F.罗瑟梅尔绘



《华盛顿渡过特拉华河》，伊曼纽尔·戈特利布·洛伊策绘

然而，伊曼纽尔·戈特利布·洛伊策的所有作品并不都具有非凡价值，我们说的是这些作品总的特点。伊曼纽尔·戈特利布·洛伊策是一位多产的艺术家，作为莱辛和弗里德里希·威海尔姆·冯·沙多的学生，他明显带有杜塞尔多夫的印记。他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考尔巴赫的浮夸风格和半装饰特点。《古斯堪的纳维亚人着陆》表现的是两个没有经验、强壮的斯堪的纳维亚流浪者或海盗从一艘不可能存在的船上走出来，他们带着一位高贵的公主，并在登陆时抢夺当地人的葡萄。虽然这幅画充满生机，但从现实角度看很荒谬，我们需要从设计方面的装饰角度去欣赏它。《戈黛娃》是伊曼纽尔·戈特利布·洛伊策的一幅略显粗鄙但很有特点

的作品。《叛逆者》是他最有趣的艺术作品之一。伊曼纽尔·戈特利布·洛伊策在美国因宏大壮丽的作品被世人铭记，譬如《华盛顿在普林斯顿》《西迁》 [3] 以及《华盛顿渡过特拉华河》。《华盛顿渡过特拉华河》是他在杜塞尔多夫创作的，画中的冰临摹的是冬末从莱茵河漂过来的一块十分巨大的冰块。然而，命运经常嘲弄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伊曼纽尔·戈特利布·洛伊策去世前刚满五十一岁，他收到来自德国的一则官方消息，称他刚刚当选接替莱辛的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院长。这则消息没能让他在去世时阖上双眼。

我们在伊曼纽尔·戈特利布·洛伊策身上发现了一些特征，对此我们已经描述过。他并没有发现一些新的表达方式或更深刻、更微妙的人性特征，他愿意按所学流派的方式进行创作。如果我们想实现追求更高形式艺术的愿望，我们应该向另一位画家求助。这位画家前面已经提及过，他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作品完全属于美国风格，而且他对现有的艺术形式并不满足。威廉·佩奇是奥尔巴尼人。他研究法学，也曾在安多佛学院研究神学。他从一开始就钟爱艺术。他的思想体现了善思和务实的统一，正是这一特质促进但也阻碍了他通过努力获得成功的尝试。他常通过深思熟虑而不是一时的灵感进行创作。他对颜色的感觉细致入微，对事物形状的把握也很精准，但常受到逻辑和过度分析能力的限制。如果威廉·佩奇的思想更单纯一些，他的作品也许会因美感而非纯熟的技法打动我们，但一切都是天性使然。然而，正是因为艺术家们的不断探索，艺术才得以进步，才能够解释自然的奥秘。作为一名肖像画家，威廉·佩奇是这个时代最卓越的艺术家之一。我们在他的画作中看到了他对人物尊严和庄重的理解，丰富和谐的色彩使人印象深刻。威廉·佩奇试图描绘女性身材的美感，充分展现人物的优雅柔美。他的著作《维纳斯从海上升起》引起了人们对他的理论优点的讨论。



《哥伦布觐见斐迪南二世与伊莎贝拉一世》，伊曼纽尔·戈特利布·洛伊策绘

威廉·佩奇处在人生鼎盛期时，美国文学因一些作家的创作流露出自己的特点，这些作家的作品完全是原创的，具有神秘的创造性想象。作家们从民族土壤和民族事物中汲取灵感。这些作家包括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贾德、纳撒尼尔·霍桑以及爱伦·坡。在构思怪异、富有想象力的场景方面，他们极具原创性，19世纪没有人能超越他们。他们从本质上分析人类的心灵活动，论述人类命运中的难题。他们的天赋被世界各地所有时代的人们认可。美国文学比绘画艺术更具原创性，但绘画艺术很快会被与文学类似的发展趋势推动。

一些艺术家在彷徨中的努力终于结出了硕果，他们创作的作品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和志向。在这些艺术家中，最杰出的是伊莱休·维德和约翰·拉法基。这两位艺术家还没有实现他们一直追求的目标，但他们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因此他们的作品非常有趣且充满希望和启发性。

伊莱休·维德的早期风俗画和景观作品充满微妙的色彩心理学尝试。自然景物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更有效地传达人类印象的手段，他的作品中的人物表情茫然且神秘，表现了他对未知世界无止境的探索和对事物存在的质疑。伊莱休·维德在意大利定居后，改进了自己的创作技法，作品中的色彩更加柔和热情。《跳舞的威尼斯女孩》和《雷吉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他并未创作出像《海蛇的巢穴》那样具有奇妙想象

力的作品，也没有创作出像《阿贝尔之死》那样悲壮荒凉的作品。目前为止，他创作的《失落的心灵》《阿贝尔之死》和《海蛇的巢穴》等作品至少在表达形式方面具有独创性。伊莱休·维德作品中的但丁的神情忧郁而高贵，作品呈现了一个广袤、庄严、萧条的原始世界，也表现了一个悲剧的悲壮崇高。作为一幅富有想象力的艺术作品，伊莱休·维德在画中呈现了无边无际的大海的沉寂荒凉，一个身躯庞大的银灰色怪物蜷缩在荒无人烟的海岸边的干草上。这幅作品非常古朴，但具有一股神秘力量，是一幅纯粹的天才之作。

约翰·拉法基先生是天生的调色师，作为艺术情感元素的色彩像和谐的音乐一样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他对形状不太敏感，因此他的作品常有很多缺陷，而且线条显得犹豫不决，缺乏力量。没有人比吉尔伯特·斯图尔特在对色彩的深浅和色彩效果的调制方面更具天赋。约翰·拉法基的素描常受到人们的批评，但他有时也会因受到启发领悟形状的意义，他创作的素描作品往往怪异惊人。

无论在形式还是色彩方面，约翰·拉法基更多的是将艺术的各种元素理解为它们传达出来的信息而不太在意它们的本来面目，他关心的不是作品的外在形式，而是作品的精髓对灵魂的触动。正是由于他理解世界美的独特方式，我们才有机会欣赏《新港乐园》这样极富思想性的作品。画中的花朵鲜艳美丽，色彩温柔和谐。这样的作品就像济慈或坦尼森的抒情诗那样使我们欣喜若狂。这种严肃、深思的特点使约翰•拉法基的艺术呈现出一种宗教色彩。这一特点也使他实现了自己的远大志向，他成功完成了装饰画——美国波士顿三一教堂湿壁画的绘制。需要补充的是，约翰·拉法基得到了莱思罗普先生的慷慨帮助。在他的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敬畏自然和具有崇高理想的艺术家。他得到了这个时代最丰富的艺术机会的滋养。这些作品中也不乏容易受到攻击的瑕疵，但它们展示的愿景让我们对艺术充满希望。这些作品在新时期的美国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因此它们的瑕疵何以任由他人评论。



《被束缚的灵魂》，伊莱休·维德绘



《农妇纺纱》，伊莱休·维德绘

[1] 杜塞尔多夫是德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首府，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杜塞尔多夫以美术学院闻名，市内有13世纪到18世纪古迹、艺术学院、著名陶器博物馆等。——译者注

[2] 即弗朗西斯-瑞纳·德·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政治家、外交家。在知识分子反对教会的时代，他为捍卫天主教信仰而撰写了《基督教会》。他的代表作是自传《墓畔回忆录》。——译者注

[3] 《西迁》是镶嵌在华盛顿国会大厦的楼梯里的一幅装饰画。——原注

第4章　从西部题材到静物画：理论创新与实践转型



马丁·约翰逊·海德（1819-1904）

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预示着有进取心和冒险精神的人将取得巨大成就，这些人不仅包括商业界和数百万流离失所、生活拮据的移民，还包括美国文学和景观艺术领域的艺术家。“到西风之国去”的浪潮加快了艺术家和作家走向西部的步伐。加利福尼亚的殖民地、雄伟的落基山脉、壮丽的哥伦比亚河以及神秘的黄石公园如史诗般展现在艺术家的画布上。泰勒和斯科特征服了太平洋斜坡，弗里蒙特 [1] 指出了穿越内华达山脉的路径。画家们描绘的壮丽景色将引起更多人对自然的虔诚敬畏以及内心的狂喜。我们应该感谢这些风景画家，因为他们敢于探索，发现并勾勒出了这些迄今为止依然人迹罕至的自然景观。这些风景画家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批评。他们不仅引导人们关注绘画作品，还让人们了解了自己拥有的无与伦比的风景。如果西方风景画艺术在各个方面都与主题相符，那么我们国家的确拥有瑰丽的风景、丰富的资源。我们最感激的艺术探险家中比较著名的有艾伯特·比尔施塔特、托马斯·希尔和托马斯·莫兰。艾伯特·比尔施塔特的《落基山脉》非常受人们喜爱，他也因这幅作品跻身名人之列。

艾伯特·比尔施塔特出生在杜塞尔多夫，幼年时随家人来到美国。后

来，他前往杜塞尔多夫和罗马学习，1858年返回美国后，跟随兰德将军[2] 的探索考察队穿越了北美大平原。著名文学家菲茨·休·勒德洛随后与他一起旅行。后来菲茨·休·勒德洛写了几篇文章，生动描述了他们在旅途中看到的景象。这些文章引起了大家对艾伯特·比尔施塔特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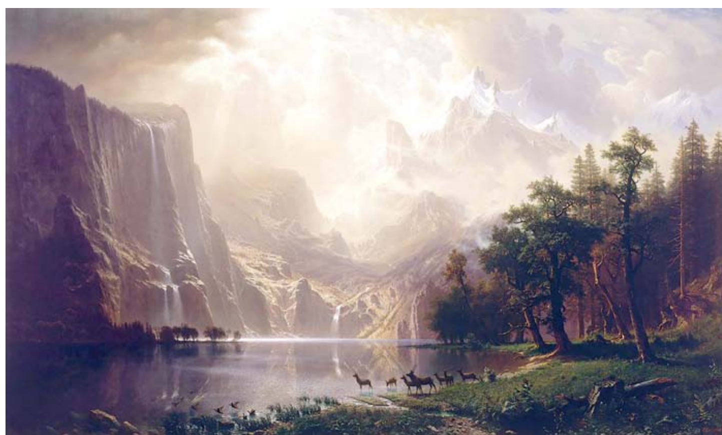
《落基山脉》是一幅具有典型意义的画作，虽然画的不是实景，看起来也有些戏剧化，一些细节处理几乎失真，但依然是一幅很有趣的作品。地形艺术应该真实反映地势地貌，但对更重视完美度的作品来说，真实性并不重要。从那时起，艾伯特·比尔施塔特完成了一些类似的描绘西方风景的雄图大作，包括宏大的《约塞米蒂谷》。他的创作特点是处理方式大胆，但色质粗杂，色调不和谐。他的作品中，我们比较喜欢的是描绘罗莎莉山上的暴风雨的一幅作品。这幅作品是他的画作中最自然流畅，也最能体现艺术本质的一幅作品。从艺术性角度来看，艾伯特·比尔施塔特描绘加利福尼亚风景的小幅作品通常比他的大幅作品更有价值。我们在他的画架上看到的最好的作品是一幅描绘战争的素描画，画中是一个躲在树丛后面的山顶上的神枪手。这幅素描画新颖别致，完全属于原创作品，丝毫没有杜塞尔多夫艺术学派的缺陷。这幅画也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即艾伯特·比尔施塔特是一个极具天赋的艺术家。他本来可以通过追求纯粹的艺术成功保持良好的声誉，但他将追求声誉与金钱的欲望嫁接在了杜塞尔多夫学派煽情主义艺术思想的枝干上。

学习研究艺术作品时，我们发现托马斯·希尔的绘画作品强调了艾伯特·比尔施塔特的画布上没有的特质。托马斯·希尔是另一位描绘落基山脉风景的画家。他一开始是马萨诸塞州陶顿的一名马车漆匠，决定从事艺术后，他前往欧洲游览，受到了外国尤其是法国画的影响，但他本质上依然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有时，他在上色方面被指责太过干硬，缺少水润度，干巴巴的，让人一看就觉得是颜料而不是美丽的风景。据说，虽然托马斯·希尔第二次给画上色时很少或几乎不用油，但他却是一位出色的五彩画家。他的作品色块醒目。可以看出，他在认真观察自然，聆听大自然的教诲。托马斯·希尔喜欢画森林内景，尤其喜欢描绘枫丹白露森林中的一些景色。他最著名的新英格兰风景画描绘的是怀特山峡谷的雪崩给山谷中的居民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景象，但他的前程却和加利福尼亚紧密相连——他后来成为一名加利福尼亚居民，并致力于描绘这个奇

妙的地区的一些壮丽风景。加利福尼亚怒号的旋风以及回荡在天空中的隆隆雷声就像无数向西前进的脚步声。时代的先行者托马斯·希尔坐在悬崖边缘描绘令人惊叹的约塞米蒂深谷时，是否意识到了他的每一笔都在加快文明先遣队的到来？这支先遣队将驱散使地球非凡的风景显得格外壮观的荒凉。托马斯·希尔深受虔诚信仰的鼓舞，他在作品中很少自由发挥，常用令人钦佩的艺术才能努力描绘脑海中真实的印象。可以非常公平地将《约塞米蒂山谷》作为美国风景画派最好的作品之一。



《落基山脉》，艾伯特·比尔施塔特绘



《内华达山脉》，艾伯特·比尔施塔特绘



《落基山脉的风暴》，艾伯特·比尔施塔特绘



《约塞米蒂谷》，艾伯特·比尔施塔特绘



《罗莎莉山上的暴风雨》，艾伯特·比尔施塔特绘



《科科兰山》，艾伯特·比尔施塔特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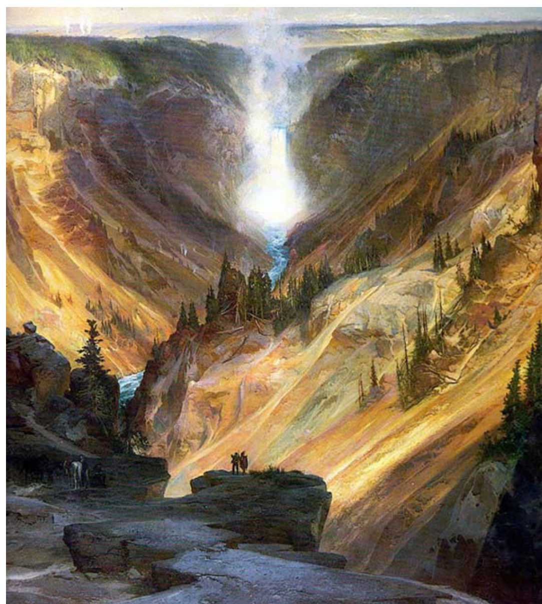
《加利福尼亚湖畔印第安人》，托马斯·希尔绘

加利福尼亚的淘金浪潮渐趋平静，不安于平淡的探险家描述了惊心动魄的黄石河。黄石河的地狱峡谷中炫目骇人的硫磺悬崖和水雾缭绕的间歇泉再次激起了具有冒险精神的艺术家们的热情。美国的风景画家深受触动，他们再次踏上旅途，试图让那些不为人知的奇景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托马斯·莫兰冒着生命危险渴望从灵感的泉涌中闻到花香，看到第一束花开。他的辉煌巨著《黄石峡》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里广为人知。就艺术主题合理性而言，可以坦率地说，《黄石峡》是迄今为止的同类绘画作品中最好的一幅。生动的岩石色彩使作品极具感染力，让人已经无暇顾及画家是否真实还原了实物。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托马斯·莫兰一直是一位孜孜不倦地认真描绘大自然的学生。



《埃尔卡皮坦》，托马斯·希尔绘

托马斯·莫兰创作的众多西部题材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一幅似乎是《黄石峡》，但完全用这些描绘热带风景或西部风景的优秀作品来评价他是错误的。他还创作了一些极富想象力的作品，显示了他非凡的才能，也表现出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我们承认托马斯·莫兰的确很有才华。他出身于艺术之家，他的两个兄弟都是有名的艺术家，其中一位擅长画海洋，另一位擅长画牛，但我们不能说他有很强的原创力。托马斯·莫兰非常认真地学习职业技能，经常关注一些著名艺术家的作画方法。在观看他的作品时，我们常发现他的作品风格是以他喜欢的几位画家的风格为基础的。他的风景画非常精妙，但缺乏创造力，因为他的模仿能力太强了。



《黄石峡》，托马斯·莫兰绘

我们发现，有迹象表明，与伟大的自然画派（如果可以这样命名）同时代诞生了另一个具有不同特点的画派。该画派有具有本土艺术思想、在本土接受教育的艺术家代表。自然画派描绘的是事物的外部特征，关注客观，不关注引起艺术想象的内心思想。与自然画派不同的另一个画派的艺术家们致力于探索自然的奥秘、分析自然中的人文因素。这些艺术家试图在画布上描绘苍穹、高山、枯林、寒水以及亘古不变的荒地的象征意义，触及生命的灵魂。这是我们前文提到过的主观艺术，这一流派的代表画家是杰维斯·麦肯蒂。对杰维斯·麦肯蒂来说，自然的声音就像一首挽歌，十月的落叶使人联想到成千上万的人排着看不到尽头的队走向坟墓。每当他在画中表现人的力量时，我们仿佛感觉到他正在和看不见的无情命运斗争。杰维斯·麦肯蒂笔下的秋景精致细腻，富含诗意美感。黄褐色的树林延绵不绝，无边无际的乌云阴郁而狂野。杰维斯·麦肯蒂的艺术唱出了那些遭受苦难的人内心的悲凉。对遭受苦难的人来说，生活就是战场，失去的永远比得到的多。这些人注视着神秘的未来，就像一个人站在注定会跌入的深渊的边缘，不知道自己跌入深渊后会得到怎样可怖的结果。

1873年，一位年仅二十五岁的波士顿艺术家在叙利亚去世，他生前在当地很有名，很有希望站在美国风景画家的前列。这个人就是A.P.克

洛斯。迄今为止，美国艺术家中还没有像A.P.克洛斯那样年纪轻轻就表现出如此丰富多样的艺术才能的画家。A.P.克洛斯没有专攻风景画，他的另一个艺术目标是人物画。他擅长将风景和人物结合起来，对色彩有敏锐的洞察力，这一点在美国艺术家中很少见。虽然A.P.克洛斯没有受过教育，他的想象力和表达自我的方式也尚未成熟，但也已经表现出大师水平。目前为止，A.P.克洛斯的绘画水平超过了美国大多数艺术家，他有取之不尽的怪诞想象力。他作为一名年轻艺术家竟然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严肃的、几乎病态的人生观。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他在二十岁前一直生活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里，承担了养家糊口的重任，并耗费了很多精力去做与他志趣不投的木头画工作。



《星期六下午》，杰维斯·麦肯蒂绘



《风景》，杰维斯·麦肯蒂绘

与A.P.克洛斯的艺术思想相比，A.H.怀恩特的作品少了一些主观和

忧郁的气息，但他同样感受到了自然的启示。A.H.怀恩特的作品显示出他对风景的感受能力和高超的表达微妙情感的技能，因此当时他被视为一流艺术家。他对空间和色彩的渲染一眼看上去似乎非常简单、普通，但却蕴含着无穷美感，譬如他对不同阶段的一块荒地、高山幽谷或莎草丛生的溪边的描绘都有联想意义。他在进行创作时好像得到了自然界的大祭司的神奇力量的帮助，风格明显，细致认真，描绘出了景物的大量细节，但真正突出的依然是一个主题思想。A.H.怀恩特的作品偶尔也会有外来影响的痕迹，但他是一位拥有强大原创力的艺术家。必要时，这种原创力会阻止他模仿任何艺术家的风格，不管是多伟大的艺术家。

霍默·马丁通过观察和探究自然表现出来的情感表明他对光和色很敏感，但对形状似乎没有什么感觉。他是一个用画笔写诗的艺术家，对大自然某些方面的崇拜类似于偶像崇拜。霍默·马丁笔触强劲有力，寥寥数笔就可以将壮丽的日落或宁静的黄昏、早晨雾霭笼罩的丛林展现出来，其中还包括被浪花日夜拍打的孤独悲怆的沙滩以及空中盘旋的野鸟。没有哪位画家的艺术创作能像霍默·马丁那样不均衡，他所有的作品中都显露出绝对的自由、新鲜和创意，具有自己的色彩调配风格，体现出充分的透光率和纯度。但他在技法上比较欠缺，因此他的有些作品富有寓意美感，光辉灿烂，使我们为之惊诧，有些作品明显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从他取得的成就看，他的作品风格没有什么规律性，说明他一直受灵感的支配，这是天才具有的特点。如果霍默·马丁有足够的天赋，那他在尝试创作时成功率会更高。



《俄亥俄河风景》，A.H.怀恩特绘



《德比郡风景》，A.H.怀恩特绘



《围栏》，A.H.怀恩特绘



《阿迪朗达克湖》，A.H.怀恩特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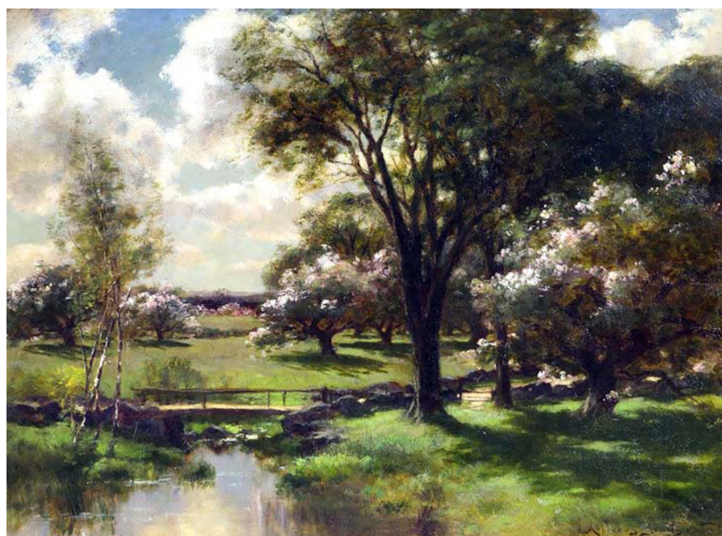
《亨利港附近的铁矿》，霍默·马丁绘



《塞纳河》，霍默·马丁绘

看了这些画家的作品，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美国风景艺术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些迹象表明美国风景艺术不会沿着常规方向发展。只要优秀的艺术家们继续坚持自己的个性并能敏锐感知大自然的基本真理，艺术就会一直处在健康发展的状态。譬如J.阿普尔顿·布朗的风景画。但遗憾的是，J.阿普尔顿·布朗以前受柯罗 [3] 影响较大，没有自由思想。后来他开始关注自然，不再模仿他人的风格和思想，终于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储备力量。另一位代表画家是欧内斯特·朗费罗，他像一位诗人的儿子，个性坚强。这种个性在我们的风景画艺术中

随处可见。欧内斯特·朗费罗虽然谈不上伟大，但他的作品表现出真实的精神和吸引人的纯洁色彩。



《晚春的桥》，J.阿普尔顿·布朗绘

D.W.C.鲍特长期居住在宾夕法尼亚的伯利恒，晚年很少在公共场合展出自己的作品。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鳟鱼溪阵雨》和一些版画。作为一位原创艺术家，他似乎在自己的风格中融入了美国风景画派最具吸引力的特点。

普罗维登斯的E.M.班尼斯特也是一位有天赋的艺术家。他不擅长素描，从未去过国外，但从他对作品的处理手法和对光与色的呈现方法中，我们看到了美国风景艺术逐步脱胎于外国艺术的过程，尽管风景画派常常抵制外国艺术的影响。



《塞纳河》，欧内斯特·朗费罗绘

过去十五年，我国海洋艺术已经证明无边无际的大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且正在召唤全国最好的艺术人才加入这个领域。其中部分原因是M.F.H.德哈斯的到来。从荷兰来到美国前，他已经是一位有成就的艺术家，而且他在本土艺术领域画技出色，被任命为宫廷画师。M.F.H.德哈斯才华横溢，虽然他的一些作品并不完美，但不乏精彩的作品，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纽约创作期间，波士顿的海洋画家约翰·E.C.彼得森和威廉·E.诺顿也创作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优秀作品。约翰·E.C.彼得森出生在丹麦，高大英俊，长得像斯堪的纳维亚人。他有一头黄褐色的头发，清澈锐利的蓝色眼睛使人想起护卫舰甲板上的舰队司令，指挥护卫舰俯冲下来向敌人的船头扫射，空中飞起团团火焰。见过他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他高大的身躯，他就像大海的儿子。可惜这位艺术家英年早逝，1876年就去世了。约翰·E.C.彼得森在波士顿开始作画时，他的画色彩很弱，构图也很粗糙，但他以惊人的速度改进了自己的技法。他去世时几乎是海洋绘画艺术领域最杰出的艺术家。他可以在画布上的每英寸画一个水手，对他来说，轮船不是很多画家笔下搁置在水面上的一块巨大笨重的物体，而是有生命力的，不仅有自己的个性，还可以像女王一样优雅，像天鹅一样冲浪。在《暴风雨后起航》中，他画的是风暴后，帆船在灰色的阴霾中快速抖开顶帆，跃上翻滚的浪头，几乎挨着天空在海中航行的景象，这是一幅充满力量的作品。他的《碰撞后》和《船在暴风前航行》也是类似的佳作。不知我们是否有机会再次

看到这样优秀的作品。

威廉·E.诺顿先生一开始是一位房屋油漆匠，与一个船舶建造家庭有亲戚关系。他曾作为普通水手出海航行过几次，因此有机会用精良的装备观察海上风貌。他创作了许多作品，有时画得很快，但从艺术角度看并不成功。威廉·E.诺顿的风格偶尔显得生硬不自然，有点儿呆板。然而他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当有了快乐的灵感时，他能完成一幅使自己在当时的海洋画家中名列前茅的作品。他喜欢安静的环境和有雾的场景。他创作了一幅题为《雾笛》的作品，画中平底渔船上的两个男人吹着号角警告从雾中悄悄驶来的汽船不要靠近他们，这是一幅十分有趣的作品。《穿越大沙洲》是威廉·E.诺顿的另一幅画：中午透着光的雾气中，一艘大型船舶穿过一支渔船队。画中真实的色彩和庄严的形式使这幅作品在美国当代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月光下的哈德孙河》，M.F.H.德哈斯绘

无论在绘画方面还是在对船舶知识的了解方面，亚瑟·夸特利都不如上述艺术家，但他因擅长描绘海岸景色和平静水面上闪烁的微光迅速赢得了声誉。有时，可以明显看出他的作品很漂亮但并不是至美之作，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他的作品具有原创性，可以看到真正的激情想要追求的效果。他笔下的天空常常令人印象深刻。《沙洲上的风暴》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波士顿的沃尔特·F.兰锡尔似乎对构图和透视法的首要原则一无所知，但他对色彩和光线很敏感，目前很少有画家可以在这一方面与他匹敌，像他那样描绘出静谧的海港景色，在玻璃一样光滑平静的水

面上倒映出大理石纹般的倒影。比较有才能的海岸画家中，A.T.布里奇画了一些熟悉的大西洋海岸的风景，写实性很强，但缺少理想的抒发。与A.T.布里奇相比，J.C.尼科尔更能寓情于景，他的色感很好，技法纯熟，作品也很有趣。他通过画笔向没有见过大海的内陆人生动描绘了大海的模样。A.T.布里奇和J.C.尼科尔都画了很多透明的水彩画，他们凭借这些水彩画取得了巨大成功。就海洋画作品而言，F.A.席尔瓦的作品也具有代表性。J.C.尼科尔是一位优秀的水彩画家，创作海岸场景的画家几乎没有能超过他的。他的一些透明水彩风景画能与他的海洋画媲美。然而，我们发现大多数海洋画家缺乏创造性。一般认为，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比海洋更能激发人类的想象力和开放性思维，但除了个别几个特殊案例，大海对美国的海洋艺术创作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



《荷兰海岸》，亚瑟·夸特利绘



《长岛》，A.T.布里奇绘

水彩艺术快速取得的成功证明了美国艺术的活跃和繁荣。1865年，一批英国水彩画在纽约展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虽然一些艺术家已经将水彩画视为一种业余爱好开始进行创作，如查尔斯·帕森斯和约翰·M.法尔科内，但这次展览似乎第一次激起了美国艺术家对水彩画的兴趣。一年内，美国成立了一个以塞缪尔·科尔曼、吉尔伯特·伯林、约翰·M.法尔科内和R.斯温·吉福德为首的水彩画协会。吉尔伯特·伯林去世很早，但很有名，是一位猎禽画家。塞缪尔·科尔曼是水彩画协会的第一任会长。1867年，该协会的第一届展览在国家设计院大厅举行，目前已经举办过十二届展览。后来，詹姆斯·斯迈利和T.W.伍德接替了塞缪尔·科尔曼轮流任会长。当时，众多画派兴起，艺术家们在水彩画领域寻找表达情感的方式，譬如苏珊·海尔女士和亨利·法勒，他们都是非常有才的风景画家。短时间内，许多著名的风景画家和风俗画家在水彩画和油画创作方面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人们将美国的水彩画协会的展品与伦敦古老协会的展品进行了友好比较，发现美国的水彩画更加突出个性和力量。



《储藏室》，约翰·M.法尔科内绘

这一时期最后一个阶段的另一个有趣特点是，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对人物素描感兴趣。风俗画艺术家人数明显增加，整体而言，他们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更高水平。战争推动了这个艺术分支的发展，战争中许多悲伤或滑稽的情景、越来越多的欧洲农业移民、民族类型和街景的日趋多样化等，都有助于吸引人们的审美，激发艺术家的想象力。美国艺术家尤其是已故的艺术家在风俗画创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由于人名太多不再一一细说。我们只能简要提到一些最值得注意同时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家。

不久前去世的J.B.欧文创作了一些非常出色的小幅画作。这些作品构图精致，着色优美，带一点儿现代法国风格。他画的一般是内部装饰，画中人物穿着古代服装。J.B.欧文最杰出的代表作是《比赛结束了》。安纳波利斯的B.F.迈耶也致力于类似主题的创作，并取得了成功。B.F.迈耶多才多艺，能随心所欲创作多种题材的作品，譬如身穿路易十四的华丽服装的绅士、艏楼上瞭望的警惕的水手、在高空缆绳上作业的工人、西北棚屋里的宗教仪式等。普罗维登斯的马库斯·沃特曼非常巧妙地融合了风俗画和风景画的特点，他的作品风格清新，充满活力。他认真创作的《格列佛在小人国》为美国艺术带来了荣誉。J.W.钱普尼曾师从皮埃尔·爱德华·弗里尔，后来去安特卫普学习过，是一位胸襟豁达的艺术家。这位没有偏见的年轻艺术家令人耳目一新。国外的学习经历使他的视野更开阔，对事物的理解更深刻。他的小幅风俗画常带有风景

描绘，尤其是最近潜心描绘的关于儿童生活的风俗画，其中表现出他对社会价值观的尊重。约翰·F.韦尔教授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是纽黑文艺术学院的院长。他在著名的《锻造轴》中表现出非凡的能力和勇气，用有力的笔触描绘了铸造业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辛辛那提的A.W.威拉德以同样的主题自成一格。他在《扬基歌》和《吉姆·布鲁杜》中体现了突出干劲与活力的风格特点，以及努力寻求夸张效果和运用漫画手法的特点。这些作品让我们联想到阿蒂莫斯·沃德与沃尔特·惠特曼的文学作品。同时，一些凸显个性的作品表明美国某些时期的风俗画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最著名的风俗画家T.W.伍德和J.G.布朗在处理这些特点时不太有勇气，但他们取得了很多艺术成就。T.W.伍德是水彩画协会的会长，从事油画和水彩画创作，他在职业生涯的前几年一直居住在南方，发现了黑人公民在美国艺术中的重要性。南方如画的风景、黑人悲惨的生活以及带有浓重口音和亲切感的幽默引起了人们对黑人坎坷多舛的悲惨命运的关注。这位艺术家的第一幅成功的风俗画描绘的是巴尔的摩的一位古怪的老年黑人，随后他受更多奴隶的启发，创作了很多有特点的作品。他并没有只关注这一类主题，街上的报童和农村质朴的生活场景也是他的灵感来源。T.W.伍德的风格以明暗对比闻名，他构图谨慎、准确、有力，作品看起来很和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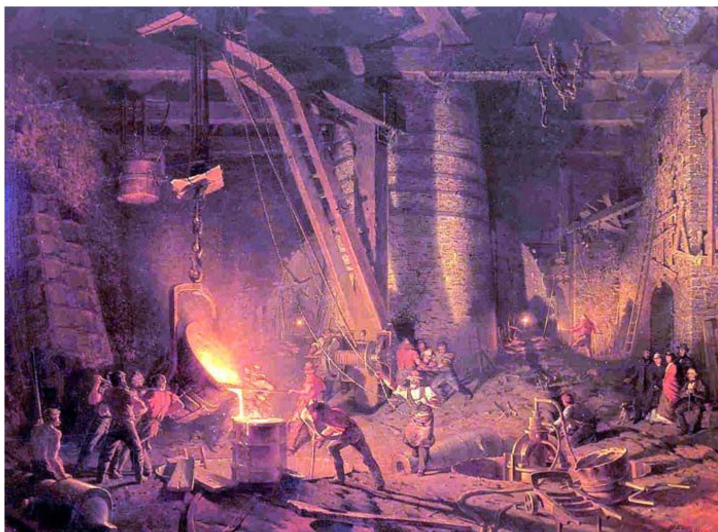
《扫地的女孩》，J.W.钱普尼绘

J.G.布朗首先发现不用去国外寻找主题，在国内创作风俗画也可以取得成功、获得名誉。他认为美国的城市儿童与巴黎的儿童一样具有艺术魅力，一个在海岸边漫步的女孩仿佛是在尼斯或斯海弗宁恩的沙滩上漫步，非常迷人；在一幅描绘大米南的一位老渔夫的画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与埃特尔塔的悬崖一样的景色。然而，J.G.布朗画中的街上青年总是先洗了脸再摆姿势，除非我们接受罗斯金先生的名言——“视艺术价值为污垢”，否则这是圣保罗的教令，不是艺术创作的规则。撇开这些微不足道的争论，我们必须承认，J.G.布朗创作了很多成功的极具特色的风俗画。我们应该赞扬J.G.布朗的学生吉尔伯特·高卢和J.伯恩斯，由于他们

的创作才能，我们才有机会在画架上看到一些令人满意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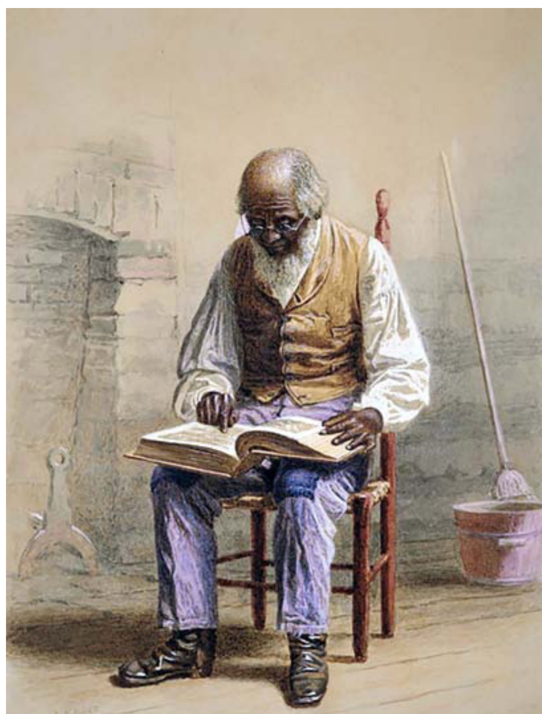
《锻造轴》，约翰·F.韦尔绘



《铸造厂》，约翰·F.韦尔绘



《扬基歌》，A.W.威拉德绘



《读经人》，T.W.伍德绘

童年时期的S.J.盖伊对朋友很热情，擅长画画，能用温和的方式处理生活中的不愉快，而且很幽默，因此结交了很多朋友。他是一位令人钦佩的画家，创作非常细致，但这一特点有时似乎削弱了作品的清新感和风格。毫无疑问，S.J.盖伊的作品经常能引起大众的共鸣，他的成功合情合理，因为不仅他选择的主题合适，而且他在艺术方面孜孜以求。另外几位艺术家有时将家庭生活的场景描绘得很有趣，譬如B.F.莱因哈特、约翰·W.埃宁格、C.F.布劳维尔特、沃尔特·萨特利、A.C.豪兰、莱缪尔·E.威尔马斯和维吉尔·威廉姆斯。奥利弗J.莱是一位反应迟钝、认真细致的艺术家，他创作了一些精致的关于家庭生活的室内场景作品，富有思想内涵，充分说明艺术是真正的艺术家应该追求的唯一目标。E.L.亨利的作品不太精致，粗糙的颜色和生硬的轮廓常常受到批评，但他偶尔也会创作一些无可挑剔的作品，如海滩场景作品《等待沐浴者》，图中最显眼的位置有马匹和主人公的随身物品。



《离家》，吉尔伯特·高卢绘

但在伊斯特曼·约翰逊和温斯洛·霍默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当代美国最成功的风俗画与明显受外国影响的风俗画之间的显著区别。伊斯特曼·约翰逊曾在杜塞尔多夫和欧洲其他艺术中心学习，人们认为他的艺术创作可能会受到国外艺术风格的影响，但事实上在美国画家中，没有哪位画家能像他那样更具个性。他的作品构图具有不确定性，但色彩和布局一般都很好，选择的题材也是大众喜爱的，极具艺术性。自从威廉·西德

尼·芒特以来，风俗画家中没有人比伊斯特曼·约翰逊更努力突出美国风俗画的特征。伊斯特曼·约翰逊擅长画人物肖像，他的创作努力表现乡村黑人朴实的生活场景，或表达童年的纯真美好。他创作了一幅叫《老马车》的作品，画的是一群兴高采烈的男孩和女孩在一架废弃生锈的邮政车上玩耍的情景，看了这幅画的人不会再质疑美国风俗画创作的无限可能性，但人们更喜欢他的一些构图简单的作品。他的画风安静、不做作，但并没有让人感到震撼或新颖。



《约翰·汉考克的住宅》，E.L.亨利绘

温斯洛·霍默古怪而新颖的创作风格受到人们的青睐，他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传统艺术方式的厌恶，以及冥冥中对一种新颖艺术语言的向往。他的本土化艺术的典型特征是新颖原创，体现了美国文化中的价值观。没有哪位艺术家在题材选择上能表现得比他更多才多艺、更具创造性，他对传统方法几乎没有耐心。温斯洛·霍默急躁、易怒的性格体现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他显然是在追求未知的事物。他的艺术主旨是体现现实主义的特点，似乎试图努力使人与自然、风景画和风俗画和谐并存，因此他的作品中从来不会只出现一个主题，风景画和风俗画是他的作品的主题，二者相辅相成。画中的人物往往身体僵硬或姿态笨拙，但总能吸引大家的目光，因为创作这些人物的灵感来自一个活跃的、焦躁不安的大

脑，这些人物是天才一时冲动的产物。他还追求作品意义的表达或客观事物真实自然关系的体现，但他力求引人注目的主题或构图往往有些做作。他的一些技法高超的水彩速写几乎用的都是印象派的处理方法。《摘棉花的人》是一幅很精湛的作品，描绘的是南方种植园生活的一个场景。他断言自己应该被视为新的风俗画的创始人。他的作品缺乏闲适平静的特点后来成了他画作的一种风格，或被他的后继者视为他风格的一部分。



《老马车》，伊斯特曼·约翰逊绘



《摘棉花的人》，温斯洛·霍默绘

在波士顿的乔治·富勒的作品中，我们找到了艺术创作越来越重视人物画创作的证据。乔治·富勒的画表明美国艺术中出现了充满活力、追求创新的个性特征，像一位追求表达自我的天才。这些作品并不完整，很

少令人满意。《吉普赛姑娘》蕴涵微妙的暗示，有一种神秘感。吉普赛姑娘的神秘一瞥富含深意，似乎编制了一个咒语，让我们浮想联翩。在这样一幅作品面前，我们觉得一个类似于霍桑 [4] 的心灵在努力传达自己的心声。这种风格在不知不觉中为美国风俗画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女孩与牛犊》，乔治·富勒绘

威廉·玛格拉斯也对美国风俗画有一定影响，我们需要格外关注他的作品。几年前，威廉·玛格拉斯在纽约绘制告示牌，现在他是大西洋西岸最杰出的风俗画家之一。他一般描绘单人画像，画中的人物一般是与农村生活有关的挤奶女工或农民，但作品效果不均等，有些作品并不成功。我们注意到他的艺术作品质量在不断进步，绘画中出现了自从威廉·西德尼·芒特以来风俗画中少有的想象的迹象。我们指的是艺术家认为自我和创作主题有联系，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整体，这种想象使主题戏剧化、人性化。在这一方面，威廉·西德尼·芒特偶尔让我们联想到吉恩·弗朗索瓦·米勒卓越的作品中折射出的独特人性。

我们要着重说一下最近的一些民族风俗画家的作品，这些作品让我

们感到欣慰。通过这些作品，我们渐渐意识到美国有很多事物可以成为艺术大师笔下的主题。我们经常听到从巴黎和慕尼黑的画室学习归来的年轻艺术家抱怨找不到灵感源泉和可以进行创作的主题。如果真的缺少主题，确实是一个极大的障碍，会阻碍伟大的美国艺术流派的持续发展。但审视这个问题时，我们似乎觉得困难并不是缺少主题，而是艺术家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他们囿于国外学习的经历，没有在本土发现激发艺术灵感的事物。

肩负时代重任的民族艺术家从来不会觉得日常生活和周围事物中缺少激发灵感的素材。歌德说最真实的诗源自因简单事物引发的联想。从未有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或风景能触动艺术家的情感，缺乏激发他们灵感、想象力、创造力的某种诗意、某种色彩、某个形状或某些光和影。美的特质是存在的，就像隐藏在岩石中的水，魔术师的魔杖能唤醒被囚禁的天才因子，其他人则看到他第一眼看到的美。

譬如，我们在纽约街道和大都会广场漫步，经过熙熙攘攘的码头或置身年久失修的贸易大街时，如果只在一旁观看喧闹的人群以及不同类型的人建造的各式各样的建筑物，却没有写作和画画的灵感，那确实让人感到震惊。如果我们的港口没有三桅小帆船或彩帆，那么我们必须坐渡船过河。码头上挤满了船舶，日出或日落时，人们在帆船或双桅帆船里看到如画的风景，一切都披上了玫瑰色的光辉，或笼罩在被风暴驱赶来的黑压压的乌云下。看到这些场景时，会没有灵感吗？

再如，我们在街道上漫步时，凝视着百老汇渐入黄昏的长长的远景，慵懒的雾渐渐弥漫在屋顶，逐渐进入暮色的鳞次栉比的房屋呈现出雅致柔和的色调。这样迷人且富有诗意的场景，如同在十月的一个晚上，那些喜欢看太阳的人在巴黎林荫大道尽头的灰色烟雾中看见了像红色圆盘的太阳。

在街道的角落，意大利水果商贩的摊位也表现出一种生动的艺术性。尤其在黑暗中，商贩们点燃了明亮的火把，摇曳的红光照在橘子和苹果堆上。

我们还经常见到清晨时，一些人赶着成群的马穿过街道前往马市的情景，但那时大多数艺术家还沉浸在梦乡中。有时，三四十匹不修边幅

的彪悍的马，四五匹为一列向前奔跑，这样的画面充满力量，让人心情澎湃。博纳尔 [5] 或施莱尔 [6] 看见这一场景激动不已。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艺术家试图描绘这类场景呢？我们难道没有知识和力量赋予这一主题应有的活力吗？



《阿拉伯骑士》，施莱尔绘



《讷韦尔的田间劳动》，博纳尔绘



《马市》，博纳尔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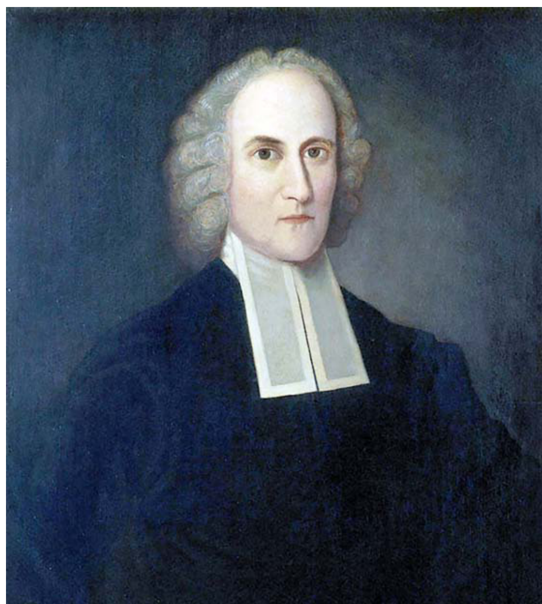
当然，对那些懂得观察生活的人来说，我们的国家从来不缺少创作主题。毫无疑问，一个民族的艺术只能由那些认同本土影响的艺术家建立和维持，这些艺术家也正在帮助确立民族艺术。那些熟悉美国艺术的人会让你熟悉我们的一些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在国内外都学习过艺术，他们可以在本土毫不费力地找到艺术素材。同时，就艺术力量的表现而言，这些艺术家也是遥遥领先的。

美国到处都有很多创作主题，艺术家没有必要去国外寻求激发灵感的事物，但并不是说一个艺术家为了成为民族艺术大师或民族艺术的引领者应该局限在一类主题范围内。文学艺术中有一条引人注目且无可争辩的规则，即认同民族文化与人性的艺术家和文学家是最具有国际视野和胸怀的人，民族艺术的个性更多地体现在主题的处理方式上，而不是主题本身。只有当艺术家完全深谙民族文化的风俗习惯和政治制度的精髓，无论作品的艺术主题是什么，都具有民族性。我们听过很多关于法国艺术流派和英国艺术流派的介绍。不是每个艺术流派的创作主题只有在国内发现，作品才具有民族性，而是我们发现作品的诞生源于艺术家受到潜移默化的民族艺术的影响。因此，如果一个英国画家和一个法国画家描绘同一个外国场景，譬如描绘一群东方人，虽然是国外主题，并且每一张画布上都是相同的事物，但你依然可以立即辨别出哪一幅是英国画家画的，哪一幅是法国画家画的。每一位艺术家都在作品中留下了属于自己民族的独特印记。

爱国主义是一种有益于国家健康发展的情感，以一种神秘方式充当了民族艺术的基础，有民族文化做基石的民族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受爱国热情激励的艺术家通常会发现很多创作素材，这些素材能唤起他们

的审美渴望，激发他们在国内的创新能力。

从风俗画到后来的肖像画，我们没有发现像其他艺术分支那样的活动和智力进步，但还是有一些值得称赞的画家。波士顿的哈维·A.扬对色彩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并以令人满意的艺术方式捕捉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但他没有像抓住事物的外部特征那样抓住人物的性格特点。波士顿的E.L.卡斯特先生形象地呈现了孩童的稚气美，他描绘了孩子们快乐的蓝眼睛、玫瑰花色的笑靥，以及如波浪一样垂在肩头的亚麻色卷发。然而他的作品主题单一，太过风格主义。亨利·彼得斯·格雷女士创作的肖像画令人愉悦。她创作的一些用花饰陶器做的肖像纪念匾牌，成为美国陶瓷艺术发展的重要证据。亨利·A.禄普女士是美国最成功的肖像画家之一。她的作品虽然不够新颖，但色调和色彩和谐、富有诗意。她也创作了一些令人愉快的肖像画和理想的作品，在她理想化的作品中，《回声》也许是她尝试过的最成功的描绘女性美的作品。乔治·H.斯托利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肖像画家之一。他的作品风格鲜明，色彩悦目，以准确的技法捕捉事物的相似之处。《回声》高雅的品味和对艺术原则的正确感知启发了他，因此他画了一些风俗画和出色的头像画。1867年，费城的威廉·亨利·弗内斯去世，他当时正处在人生的巅峰期，与美国早期肖像画大师具有同样的天赋才能。



《乔纳森·爱德华兹》，亨利·A.禄普绘

威廉·亨利·弗内斯的艺术发展很缓慢，虽然他很努力，但看不出他有多大前景，然而他具有不可估量的才能。在研究和描绘性格特点方面，美国很少有画家能比得上威廉·亨利·弗内斯。他画肖像画时，会花几天时间对模特的精神和道德特征进行彻底的研究。



《查尔斯·萨姆纳》，威廉·亨利·弗内斯绘

波士顿的大流士·科布明显有热忱的艺术追求，对审美文化的崇高目的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尝试雕塑、纪念性艺术、肖像画以及宗教作品的创作。我们认为，这样一位富有活力的艺术家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艺术，很有发展潜力。然而他的作品的技法显得不是很成熟，缺少系统的训练过程，但像《鲁弗斯·乔艾特》这种具有强烈个性特征的肖像画展示了他的艺术才能。

这一时期的历史艺术既不多产也不吸引人。战争后期产生了一些重要作品，如温斯洛·霍默著名的《囚犯到前线》。朱利安·斯科特也因《在安蒂特姆玉米地》等作品获得了显著成功，这幅画描绘的是一次难忘的战斗冲锋。我们希望将来有更多诸如此类的作品出现。朱利安·斯科特的作品方向正确，追求创意。C.A.法塞特女士也创作了一些优秀的肖像画，最近又创作了一幅名为《选举委员会》的油画，关于这幅画的优点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我们发现华兹华斯·汤普森似乎意识到了创作美国历史艺术画的可能性。虽然华兹华斯·汤普森是查尔斯·格莱尔的学生且旅居国外数年，但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任何属于外国流派或技法的地方。他是一位优秀的画家。不同流派的作品有的色彩强烈，有的色彩暗弱，但华兹华斯·汤普森的作品颜色属于中间类别：清新、冷静、明快。他的作品的每个细节都处理得很好，而且具有整体性。虽然不喜欢骑马，但他描绘的马在美国几乎无人能超越。他的缺点是主题的处理缺少活力、温度和热情，作品并没有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

华兹华斯·汤普森在地中海沿岸漫游时，搜集了很多关于美丽海岸的素材。他在描绘大气、人物、三桅小帆船和波浪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证明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华兹华斯·汤普森因描绘南方风景，以及后来根据战争创作的历史画和描绘独立战争的重大事件的作品被广为人知，他应该得到这样的殊荣。他在描绘战争方面仅次于约翰·特朗布尔。约翰·特朗布尔创作的《蒙哥马利之死》和《邦克山战役》现在在纽黑文，这两幅画是美国艺术家创作的最卓越的军事画。华兹华斯·汤普森的作品中没有太多动作、火焰和绚烂的色彩，但具有令人钦佩的特质，让人心生敬意。他最著名的一幅作品描绘的是费城的陆军在华盛顿和他的参谋面前纵队行军的场景，画中最显眼的位置是一组军官和战马。这幅画是近期的美国艺术家创作的最好的作品之一。



《囚犯到前线》，温斯洛·霍默绘



《纸上谈兵》，朱利安·斯科特绘



《选举委员会》，C.A.法塞特绘

认真观察这一时期美国审美文化在动物画创作方面的情况，我们发现动物画是美国艺术中最缺少优秀成果的一个分支。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动物画的发展前景没有风景画和风俗画那样广阔，从事动物画创作的艺术家很少，而且作品质量也不高，缺少其他题材作品中显而易见的原创性。

费城的彼得·莫兰创作的关于牛群的田园风光画非常新颖，很有力

量。波士顿的托马斯·罗宾森描绘的牛的肌理呈现出非凡的活力，但不太有新意。过去的十二年，詹姆斯·哈特的专长是将牛群引入质朴宜人的风景画中。这类作品构图巧妙，着色细致，总体效果值得称赞。但詹姆斯·哈特似乎和大多数动物画家一样，不像佛兰·斯奈德斯、莫兰德或埃德温·亨利·兰西尔爵士那样能抓住动物的性格特点。J.H.多尔夫先生创作了一些值得称赞的关于室内的猫和哈巴狗的作品。年轻的艺术家小乔治·英尼斯和J.奥格登·布朗创作了一些还不错的牛群画。

菲蒂利亚·布里奇斯女士推动了一个吸引人的原创艺术分支的发展。目前为止，她似乎是这一艺术分支中唯一的艺术家。她的作品充满微妙的幻想，也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技巧。她用水彩描绘谷物、野花和田间的小鸟、百灵鸟、红雀、食米鸟、麻雀、矶鹞等，小鸟站立在摇摆的植物茎尖，或飞过麦田，或飞过被海水拍打的沙滩。



《九月》，菲蒂利亚·布里奇斯绘

弗兰克·罗杰斯很年轻，非常喜欢画狗，但他并不打算局限在动物生活这一范围内。在试图表现犬科动物的特征方面，他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他训练了几条狗，这些狗听到他的指令会立刻摆出姿势，而且能坚持十到十五分钟。弗兰克·罗杰斯的才能和取得的成功表明，美国艺术家

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国外学习。他们可以利用有效的影响以及对自然和理想的热爱进行原创，从而将我们的民族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现在，人们对民族艺术有很多不合情理的要求，根本没有意识到新的艺术流派不是在一天内诞生的。美国民族艺术的发展与外国民族艺术的发展一样，需要具备必要的条件。艺术发展没有坦途。

现在的美国大陆不像旧大陆那样有大量野兽和猎物，但依然有美洲豹和野牛。在拓荒者的枪口下，野生动物数量锐减，大量美洲豹和野牛惨遭猎杀。R.M.舒特莱夫喜欢描绘大野猫和鹿，曾认真研究过大野猫和鹿的习性，研究成果出现在他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森林风景画中，画中常常有丛林野生动物。他的《生命的赛跑》是一幅怪诞、野蛮、力量强大的作品，描绘的是一群贪婪的狼在冰冷的雪场追赶猎物，红日即将落山的场景。A.F.泰特一生致力于描绘那些即将濒危的物种，以免这些物种被世人遗忘。除非美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比现在实施得更好，否则一些物种即将灭绝。A.F.泰特的作品太过精美，削弱了作品本来应有的力量。另外，他真实描绘了野生动物和家养的牲畜，主题中加入了创造性的幻想，使作品具有多样性，显得非常有趣。动物画方面，我们要介绍一下亚历山大·蒲柏的精致雕刻。亚历山大·蒲柏是一位年轻艺术家，他不仅能用一大块木头雕刻成群的猎物，还能用娴熟的刀工在松木上雕刻松鸡、水鸭，并给这些动物上色。

后来，一个新的艺术分支——静物画在美国备受关注。乔治·H.霍尔是一位著名的风俗画家。他在几年前画的水果和鲜花令人印象深刻，因此赢得了声誉。迄今为止，这个艺术领域很少有艺术家能达到乔治·H.霍尔那样的水平。马丁·约翰逊·海德致力于描绘热带植被的绚丽，并取得了成功。我们已经提到过约翰·拉法基非常出色的花卉画。目前，波士顿的埃伦·罗宾斯小姐是静物画领域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她的创作很有特点，而且上色效果非常突出。她的一些画让我们联想到范·惠萨姆斯丰富厚重的涂色效果。波士顿的G.W.西维、巴尔的摩的A.J.H.韦和费城的乔治·C.兰丁也创作了一些有趣的静物画。朱莉娅·狄龙女士和亨肖女士创作了一些美丽的花卉作品，非常值得称赞。在现实的花卉画创作方面，获得明显成就的女士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这表明了美国装饰艺术快速发展的趋势。不久的将来，装饰艺术一定会成为美国审美文化中民族艺

术的一个分支。



《猎人的生活》，A.F.泰特绘



《狩猎野牛》，A.F.泰特绘



《洋兰与蜂鸟》，马丁·约翰逊·海德绘



《洋兰与蜂鸟》，马丁·约翰逊·海德绘



《野花》，埃伦·罗宾斯绘



《前线》，乔治·C.兰丁绘

美国绘画的第二个阶段结束了，其间有很多有意义的艺术活动让我们深受鼓舞。美国艺术的一些阶段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后，正在经历一个转型期，新的理论和方法正在更新老的思想和方法，显示出艺术家对理想至上思想更深的理解。加上艺术伦理中人的重要性意识的迅速传播，以及倾向合作的健康发展趋势，美国艺术正在积聚力量向反对追求理想文化的唯物主义堡垒进攻。同时，新的影响正在进入民族审美文化，迄今为止很少受到关注的艺术分支正在迅速崛起。美国艺术发展的

第三个阶段即将来临。

[1] 即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1813—1890），美国著名探险家、政治家。1856年，他成为共和党总统竞选候选人。19世纪40年代，他五次率队进入美国西部探险。历史学家称他是“开路人”。——译者注

[2] 即弗雷德里克·威廉·兰德（1821—1862），横跨美国大陆的探险家，美国内战时任联邦军将军，多产的诗人。受雇于美国政府，曾横跨美国大陆为太平洋铁路勘察路线。——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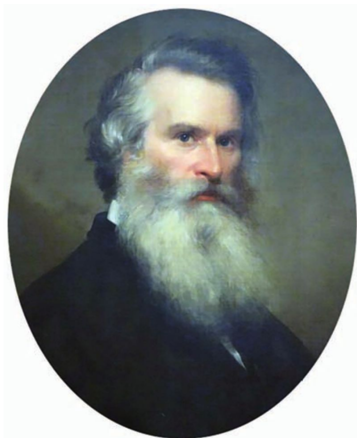
[3] 即让-巴蒂斯特-卡米尔·柯罗（1796—1875），法国风景画家、肖像画家、蚀刻版画家。柯罗堪称法国19世纪中期风景画大师，创作了很多作品，其作品既体现了新古典主义的特点，又预示着印象主义外光画法的革新。作品有《纳尔尼河上的桥》《戴珍珠的少女》等。——译者注

[4] 即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黑暗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许多作品含有道德隐喻，反对清教信仰。小说常以原罪为主题，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红字》等。——译者注

[5] 即罗莎·博纳尔（1822—1899），法国艺术家、动物画家和雕塑家，以现实主义艺术而闻名。罗莎·博纳尔被认为是19世纪最著名的女性画家，名作有《讷韦尔的田间劳动》《马市》等。——译者注

[6] 即阿道夫·施莱尔（1828—1899），德国画家，与杜塞尔多夫画派有联系。因长于画马、农民生活和战争事件而闻名。名作有《阿拉伯骑士》《帝国卫队的炮兵》等。——译者注

第5章　雕塑艺术：从海勒姆·鲍尔斯到W.R.奥多诺凡



伊拉斯塔斯·D.帕尔默（1817-1904）

人们普遍认为，米开朗基罗去世后，雕塑艺术很少出现理想之作。近年，雕塑艺术领域缺少恒定的目标以及创意和理性的把握，因此过去三个世纪的雕塑艺术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的雕塑艺术相比等级明显较低。显然，我们的民族很务实，由于生存环境不理想，人们努力在新世界的荒野中为自己赢得生存权。但让人吃惊的是，已经存在的大量证据表明，人们对雕塑有审美倾向。我们确实还没有创作出任何能与古代文物媲美的杰作，但我们的一些雕塑作品与现代最好的艺术作品相比，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

这一结果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雕塑艺术家们很少有自己的创意，对我们最好的雕塑家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国家缺少艺术教育的条件，所以艺术家们只能前往欧洲学习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风格，掌握雕塑艺术的技术要素。起初，艺术家们去国外寻求艺术指导并受其影响完全是意料中的事。一直以来，他们受到的都是因循守旧、基于对艺术原理的错误认识的影响，但这不是他们的错。

美国最成功的雕塑家从未去过国外，或至少没有系统地跟着国外的艺术大师学习，他们中有很多人非常认同现代雕塑的后期发展方向。现

代雕塑后期向寓言、肖像和风俗类方向发展，艺术家们受到国内生活的启发进行创作。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给维纳斯、朱庇特做大理石雕塑时，他们相信维纳斯和朱庇特真的存在。对神明深深的敬意启发了大师们的创作。中世纪的雕塑家雕刻救世主或圣人的事迹以及末日审判时，虔诚敬畏救世主和圣人，并对自己纪念的事件的真实性深信不疑。但当本世纪的雕塑家试图复兴雕塑的古典主题和思维方式时，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因而阻止了雕塑艺术的进步，雕塑家的艺术作品不被欣赏，社会上甚至没有出现对雕塑家有利的质疑。因为思维的固性和局限性，模仿其他艺术的艺术不可能成为杰出的艺术。一个艺术流派只有在本民族文化的启示下，直接描摹自然，才有可能获得永生的机会。自米开朗基罗以来，最伟大的雕塑家托尔瓦德森也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除了弗拉克斯曼，其他现代雕塑家从未探讨过古典艺术。我们被弗拉克斯曼对古典艺术的认识打动，但我们发现他的古典主题的作品比不上他的寓言主题的作品。在这些寓言主题的作品中，弗拉克斯曼表达了自己对所处时代的一些想法。人们逐渐意识到，艺术不能凭借任何毅力或自由的意志逃脱成长的限制，这一点在最近的雕塑艺术中，尤其在法国表现强烈情感、令人感动的雕塑中变得越来越明显。虽然一个新的、具有原创性的流派没有处在利于其发展的环境中，但只要这一流派坚持自我，就一定能达到较高水平。



《托尔瓦德森》，克里斯托弗·威廉·埃克斯贝尔绘

当白人第一次踏上美国的海岸时，这里的雕塑艺术绝不是未知的。西部的管子采石场是土著人尝试雕塑艺术的证据。在这片大陆上，备受一些热心慈善家质疑的烟草竟成了促使艺术家最早尝试雕塑创作的一个诱因。一个用燧石雕刻成的印第安烟管是美国最早的雕塑作品，造型是一个坐着的男人，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虽然烟管很简单，但体现了艺术家良好的雕刻技巧，以及对人的特征和身体结构的仔细观察。在现在已经消失的美国南部和西部原始印第安人的遗物中，我们发现了一些证明雕塑艺术的高超技法的证据，尽管当时的人们对美的认知还不太成熟。

然而，独立战争前，除了人物头像雕刻，造型艺术在美国似乎不太常见。1816年底，约翰·特朗布尔对约翰·弗雷齐说，美国近一个世纪内不会需要雕塑。但细心的观察者已经注意到，新共和国中有迹象表明一个雕刻艺术天才正在苏醒。上世纪初，执事闪·德朗恩为法尼尔大楼和波士顿的议会大厦分别制作了风向标，他因此在新英格兰名声大噪。波士顿议会大厦的风向标是一个真人大小的印第安酋长手持弓箭做瞄准动作的雕像，在一个铁轴上随风转动。雕像是铜制的，内部中空，它给人的印象表明这是一件有价值的作品。随后，新泽西博登敦的佩兴斯·赖特在

微型蜡制浮雕头像方面表现出天赋，她用同样的方法成功制作了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的肖像，这两个人都是当时的名人。大约在威廉·拉什出生二十年后，独立战争爆发。在船雕方面，雕塑家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上世纪的马修·普拉特已经证明，即使在绘制标志牌方面，天才也可以找到灵感。威廉·拉什无疑是一个天才，虽然他所有的艺术教育都源于为一个轮船雕刻师做学徒，但他雕刻的印第安人和海军英雄人物的头像为插着美国国旗远洋的商船增添了与众不同的美感，也为在众多激烈的战斗中获胜的战舰添加了独特的美感。威廉·拉什只用木头或泥土做雕塑。他的一些半身肖像雕塑，如费尔芒特的仙女雕塑，表明他很有才能和创造性，在更有利的环境中他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成绩。他用一块松木为自己做了一尊半身雕塑像，这尊雕塑表现了现实主义的力量和特征，在美国雕塑史中具有永久的重要地位。



《威兹德姆》，威廉·拉什雕



《贾斯蒂丝》，威廉·拉什雕

然而，雕塑艺术与其他艺术相比，在美国出现的时间更晚。1824年，切石匠约翰·弗雷齐制作了约翰·威尔斯的大理石塑像，这是美国本土人制作的第一尊雕塑。约翰·弗雷齐接受的唯一的艺术教育是在一个场院当学徒，这个场院为一所公墓制作了一座粗糙的纪念碑。当时，格林伍德和芒特奥本还不是奢华的长眠之地。约翰·弗雷齐作为独立的艺术家有一种追求理想的天性。他影响了年轻的艺术家，但他却缺少发掘自己潜力的机会。

1789年初，威廉·拉什开始用黏土制作雕塑，当时能促进美国的雕塑艺术向前发展的艺术家还没有看到希望之光。约翰·弗雷齐出生于1790

年，纽黑文的赫齐卡亚·奥格尔出生于1791年。赫齐卡亚·奥格尔起初从事食品杂货生意，失败后开始从事模型制造和木雕。他完全依靠自己的天赋进行创作，从未接受过任何指导。像许多第一批雕塑家一样，赫齐卡亚·奥格尔尽心雕刻的作品很有趣，证明了完全未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能够取得的成就，但并不能说明他的作品有内在价值。后来的许多艺术家一开始从事的行业或职业与自己最后献身的艺术完全不同。

1805年，有天赋的艺术家出现了，我们似乎有了拥有自己的雕塑艺术的希望。当时，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本杰明·韦斯特、爱德华·G.莫尔博恩、华盛顿·奥尔斯顿和吉尔伯特·斯图尔特早已展现出绘画艺术方面的才能。1805年，海勒姆·鲍尔斯出生，他是本世纪最著名的雕塑家之一。同年，霍雷肖·格里诺出生。1810年，乔尔·T.哈特出生在经常受到印第安人袭击的肯塔基偏远地区。肖巴尔·维尔·克莱文杰、托马斯·克劳福德和克拉克·米尔斯分别在1812年、1813年和1815年出生。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雕塑家，优点各异。这几位艺术家是重要的艺术先驱而非伟大的雕塑艺术流派的创造者。因此我们看到，在没有任何前期准备的情况下，美国涌现出了对雕刻艺术的创作冲动，同时涌现了很多给予雕刻艺术指导和力量的艺术家。想到这些艺术家简陋的创作环境，以及他们并不具备雕塑艺术方面的遗传天赋，我们看到他们的作品时就不会吹毛求疵了，而是会感到惊讶。其中，海勒姆·鲍尔斯和托马斯·克劳福德成功在欧洲赢得了声誉，与当时一流的外国雕塑家齐名。那些著名的外国雕塑家出生在拥有古典艺术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光环的地方。



《本杰明·富兰克林》，海勒姆·鲍尔斯雕

我国西部的雕塑艺术中，海勒姆·鲍尔斯一直处在领先地位，即使对那些对他的作品不感兴趣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海勒姆·鲍尔斯是青山山脉地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很早就从佛蒙特州搬到了辛辛那提繁华的街道上。有雄心壮志的美国雕塑创始人在辛辛那提繁华的街道上开阔了视野。他与许多雕塑家一样，喜欢机械学，这体现了他具有创造性思维和艺术才能。海勒姆·鲍尔斯首先研究了当时的发明创造，从中学到了很多

知识，后来开始用有价值的发明创造表达艺术。伊拉斯塔斯·D.帕尔默和其他几位美国雕塑家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艺术表达。伊拉斯塔斯·D.帕尔默起初用蜡进行创作，在当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后，他将石膏作为创作材料，跟着辛辛那提的一个德国艺术家学习，后来得到了尼古拉·朗沃思先生的慷慨赞助。我们应该感激尼古拉·朗沃思先生对美国艺术家的帮助。伊拉斯塔斯·D.帕尔默很快开始为美国一些著名的公众人物做半身雕塑像，譬如诺亚·韦伯斯特、杰克逊 [1] 、马歇尔和约翰·C.卡尔霍恩。虽然缺乏训练和艺术联想，但他创作的一些雕塑充满主题应有的活力，他后来创作的作品很少能比得上这些前期雕塑作品。



《伊拉斯塔斯·D.帕尔默的工作室》，汤普金斯·H.马特森绘



《希腊奴隶》，海勒姆·鲍尔斯雕

1837年，伊拉斯塔斯·D.帕尔默决定去意大利，霍雷肖·格里诺已经在他之前到达意大利。同以前很多艺术家一样，霍雷肖·格里诺去意大利也是因为意大利艺术上的优势以及经济上的原因。曾经某一时期，一些雕塑家还在犹豫是否去意大利，当时就民族艺术而言，待在国内是最明智的。我们的几位雕塑家已经承认，美国已经到了需要在本国影响下发展艺术的时代，将来的艺术发展将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但经济问题迫使艺术家们生活在佛罗伦萨和罗马。

海勒姆·鲍尔斯一直居住在佛罗伦萨，直到去世。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创作了许多近乎完美的作品，有时他的作品具有的优点可以和传统造型艺术时代的作品相提并论。很多人见过《希腊奴隶》，这是一幅受希腊与土耳其战争的启发创作出来的作品。《沉思》《渔家少年》和《普洛塞尔皮娜》也是他最受欢迎的一些作品。《加利福尼亚》是一幅描绘女性身材的裸体像，构思不太精致，人体比例方面受到了人们的批评。海勒姆·鲍尔斯通过这些作品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他熟练掌握艺术要求的各种技法，心怀崇高理想，具有温柔的情感而非强悍的力量。他的作品有时表现出含蓄的风格，继承了不轻易表露感情的英格兰民族的冷静和沉默。海勒姆·鲍尔斯在创作时，身边好像站了一位像导师一样严厉的清教天才。这位天才嫉妒艺术的唯美，仿佛在说："你瞧，这样做就对了。当心不要因为爱美忘记你是一个美国公民。对一位美国人来说，责任、原则、成为模范才是生活的目标。"但有时海勒姆·鲍尔斯的天赋胜过了对传统的遵循，他创作了两尊伟大的雕塑作品——堕落前和堕落后的夏娃。创作这类崇高的作品需要特殊的灵感，需要一种不受羁绊的艺术感觉。我们认为这是他最成功的作品，这两尊作品使他几乎与约翰·吉普森和安东尼奥·卡诺瓦齐名。他的艺术作品永远值得铭记。



《普洛塞尔皮娜》，海勒姆·鲍尔斯雕

充分表现海勒姆·鲍尔斯艺术才能的作品是他创作的半身雕塑。他的想象力并不丰富或活跃，从他的表达中可以看出这样一种创作思想："我永远不会急于求成。人有无限的形体类型，人的形象来自上帝。我会努力发现，尽力去做。本质上来说，创作永远可以更好。一旦知道了这一点，我就会犹豫，就会追求更好的作品，这是成名的途径之一。不管我多么认真努力，都有可能遭遇失败，但这是成功唯一的途径。最终处于最重要位置的人不是创造很多作品的人，而是创作出最杰出作品的人。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能力做一百尊雕像，我在几尊雕塑上竭尽自己的才智就行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有必要在《失乐园》雕塑模型上花费一年时间的原因。"

霍雷肖·格里诺早期获得了比海勒姆·鲍尔斯更好的教育资源，他因坚持用大理石制作雕塑出名，但这一殊荣超出了他作为艺术家应得的的荣誉。他有智慧、有修养，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因创作了美国最长的雕塑作品《邦克山纪念碑》而闻名，这尊作品非常雄伟庄严。他还创作了很多充满活力、引人注目的半身像，譬如拉斐特和费尼莫尔·库珀的半

身像，这些作品都值得称赞。但他在追求理想表达方面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他精心创作的组像《拯救》摆放在华盛顿国会大厦的门廊里，规模宏大。令人遗憾的是，这组雕像虽然被放置在最显眼的位置，但却装饰得不够得体。

国会大厦里，霍雷肖·格里诺创作的华盛顿的雕塑引起的争议比任何雕塑都多。这尊雕塑体型庞大，上身赤裸着坐在一座巨大的宝座上，左手举着一柄罗马剑。有人打趣地说，共和国这位令人敬畏的英雄似乎在说："这是我的剑，我的衣服在那边的专利局里。"当时，将华盛顿塑造成接近古罗马风格、身着公众几乎没有见过的装束的人物，似乎并不合适，甚至有些荒谬。18世纪，本杰明·韦斯特表现出更多独创性和勇气。他不顾约书亚·雷诺兹爵士等人的反对，敢于打破常规，描绘了战场上身穿军装去世的沃尔夫，因而引发了一场历史艺术的革命。秉公而论，霍雷肖·格里诺的雕像在某些方面是值得称赞的，而且影响深远，精美宝座上的浅浮雕尤其令人赞赏。他设计的这座雕像不应该放在现在的地方，而应放在圆形大厅的穹顶下面，那样会更令人印象深刻。因为穹顶挡住了冬天的雪，所以看起来就不会那么不协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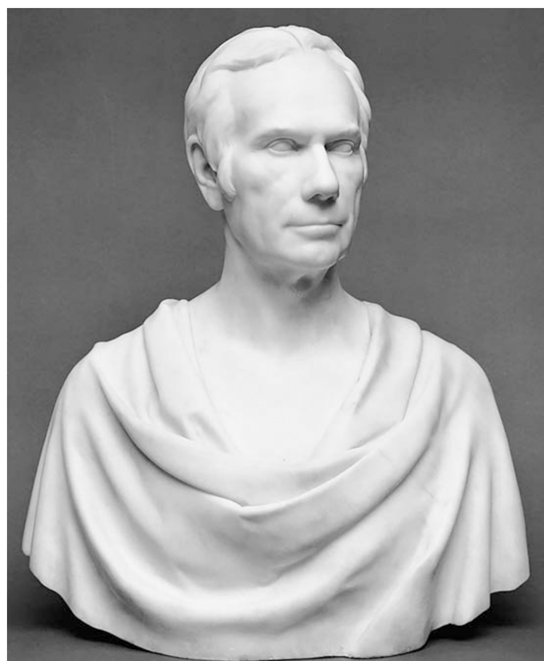
《拯救》，霍雷肖·格里诺雕

1877年，一位雕塑家在佛罗伦萨去世。大约七十年前，他在肯塔基出生。他在当地一所学校仅接受了三个月的教育，第一份职业是造烟囱。这位雕塑家就是乔尔·坦纳·哈特。他创作的肖像画非常成功。他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意大利定居后，创作了很多令人快乐的作品，譬如《安吉丽娜》和《胜利的女人》。他的艺术中有一种精致的、吸引人的美感和微妙的情感倾向，虽然令人愉悦，但无法征服我们，因为他的作品中蕴含的是简单的幻想而不是崇高的理想。

肖巴尔·维尔·克莱文杰是俄亥俄州的一位切石匠，是另一位突然对造型艺术产生兴趣的艺术家。19世纪早期，美国不同地区的艺术家在造型艺术方面寻求表达方式。像很多其他艺术家一样，肖巴尔·维尔·克莱文杰

去意大利求取当时在国内不可能获得的知识。美国应该感激他，就像我们应该感激早期的几位雕塑家一样，他们为我们重要的政治家和诗人创作了许多非常逼真的雕像。

从时间和能力上看，我们发现纽约州的托马斯·克劳福德也是首批雕塑家中的一员。如果说海勒姆·鲍尔斯的作品因精致闻名，那么在托马斯·克劳福德的雕塑中，我们发现了美国艺术中罕见的宏大、和谐风格，避免了夸张的窠臼。托马斯·克劳福德在美国雕塑家中的地位与华盛顿·奥尔斯顿在美国早期画家中的地位一样。他的作品有一种经典的庄严，一种被怜悯天性温暖的经久壮丽，表达了动荡社会中的痛苦和希望。他拥有我们大多数雕塑家缺少的天赋，如果他现在还活着，那么当一种新的雕塑秩序获得自由时，美国将几乎没有可以与他匹敌的艺术家。他最重要的作品是里士满令人印象深刻的华盛顿骑马雕像和波士顿音乐厅巨大的贝多芬雕像。这两尊雕像都由慕尼黑铸造厂浇铸。在欧洲一家著名的艺术品鉴赏机构，所有艺术家都情不自禁地为这两尊雕像喝彩欢呼。他们的热情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这两尊雕像的价值。



《亨利·克莱》，肖巴尔·维尔·克莱文杰雕

华盛顿国会大厦青铜门的镶板上雕刻着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场景，一

些人认为这是托马斯·克劳福德的杰作。直到最近，美国艺术家中也鲜有这样不同寻常的想象力和技能。俄耳甫斯 [2] 来到塔尔塔罗斯地狱寻找妻子欧律狄刻的雕像整体看上去是最对称的，这尊雕像是这位伟大雕塑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他庄严且优雅的《自由女神》雕像屹立在国会大厦的穹顶上。这尊雕像令人愤慨，因为没有其他设计能比它更荒谬。一尊如此有想象力的作品竟然放置在离地面三百英尺的高空中，看上去就像挨着天空的一个没有形状的点。人类在视域范围内无法看清这尊雕塑的美，它犹如深埋在地下的珍宝。



《乔治·华盛顿》，托马斯·克劳福德雕

华盛顿国会大厦里的艺术作品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卓越、乖张和无知。圆形大厅里的一些浮雕作品非常庸俗，令人震惊。允许将这些浮雕放在大厅里的人有的还在世。这些庸俗的浮雕很容易被当作原始的阿兹特克文物。毗邻的雕塑馆表现出同样惊人的不协调，它的存在似乎在向建筑工人暗示，我们将来需要一个国家雕塑美术馆。已经放置在大厅里的雕塑的价值并不均等，这表明这些雕塑是成批挑选来的，而不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在目前的国会审美条件下，只有委任一个像法国那样永久的国家艺术委员会，我们才有希望在首都拥有完全由国家搜集来的艺术珍品。由于人性的弱点，这个委员会有时也许会偏爱某一个艺术流

派，但得到艺术委员会认可的艺术作品在质量方面至少会比一般作品好，年轻艺术家也不能仅凭游说功夫将自己的作品带入国家宝库。

克拉克·米尔斯创作的骑马雕塑源自当时的人们对艺术的无知。克拉克·米尔斯和托马斯·克劳福德是同时代的人。他最著名的骑马雕像可能是白宫对面的杰克逊将军的雕像和华盛顿的雕塑，因此他获得了五万美元。杰克逊将军的雕像最大的特点是平衡重量的高超技巧，腾起的骏马的笨重身躯可以不依赖任何东西站立。克拉克·米尔斯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据说他还未见过任何雕塑前，就创作了一尊卡尔霍恩的半身塑像，而且与真人非常像。但他拥有的主要是机敏和才能而不是天赋。他的作品缺乏艺术感。艺术爱好者非常后悔曾给予这些作品太多厚爱。

在贫瘠的艺术土壤中，偶尔会发现有些作品能与托马斯·克劳福德、J.Q.A.沃德、亨利·K.布朗、伦道夫·罗杰斯和托马斯·鲍尔的作品媲美，表现了艺术家对崇高艺术理想的热切追求，令人高兴。亨利·K.布朗是美国最早的雕塑家之一，因两尊骑马雕塑闻名，其中一尊是纽约联合广场的华盛顿雕塑，另一尊是首都的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雕塑。令人满意的骑马雕塑非常罕见的原因错综复杂。有的雕塑从解剖学角度看，马的形态是正确的，但不够优雅；有的虽然赏心悦目，但如果一个爱马的人看到这尊雕塑会认为细节处理有误，不值得欣赏。处在这两种对立意见之间时会让人感到迷茫，无法给出恰当的建议。实际上，韦罗基奥 [3] 著名的《巴托洛梅奥·科莱奥尼骑马像》创作于中世纪，目前为止，这尊雕像似乎是古典时期以来唯一完全得到认可的骑马像，它结实、雄壮而又充满活力的轮廓充分体现了《约伯记》中对战马的描述：披甲的骑手勇敢地跨坐在战马上。骑马雕像难以创作的原因似乎与海洋绘画相同。描绘船的艺术家应该十分喜欢船，因为热爱才能理解船的一些动作。想要设计一匹动态的马的艺术家应该喜爱马，在这种情况下，对马的研究应该从童年开始，因真心喜欢马而研究马。但大多数雕塑家并不是天生偏爱马，而是接受雕刻马的任务后，他们为了得到关于马的信息开始研究马，并不是真正喜欢和热爱马。



《乔治·华盛顿》，克拉克·米尔斯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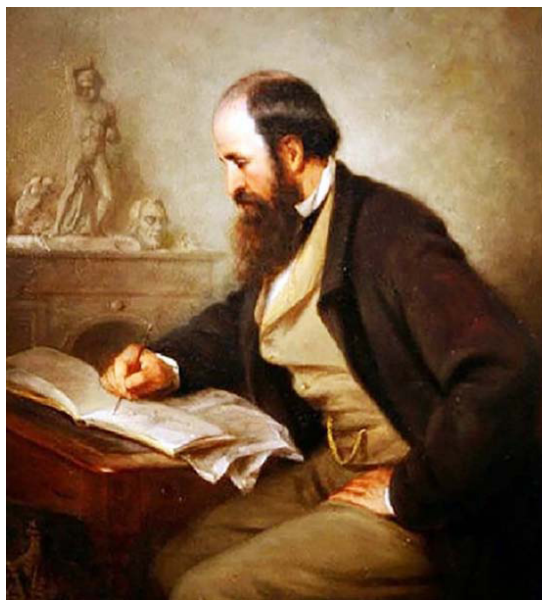


《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亨利·K.布朗雕



《巴托洛梅奥·科莱奥尼》，韦罗基奥雕

亨利·K.布朗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的两尊骑马雕像都无法令人完全满意，但这两尊雕像无疑是美国展出的最好的两尊马雕像。斯科特将军雕像中的马最俊美、优雅，从比例上看应该是阿拉伯战马，不是美国战马。华盛顿的马最有活力和吸引力，整体感觉很英勇，令人印象深刻。亨利·K.布朗现在居住在纽堡，他的职业生涯很成功，晚年依然精神矍铄，完成的作品也非常理想，譬如《路得记》，这尊雕像令人愉悦，其构思体现了作者细腻的艺术感觉。然而，亨利·K.布朗几乎没有资格在这一艺术分支中占首要地位。



《亨利·K.布朗》，路易·兰格绘

托马斯·鲍尔最初是一位肖像画家，后来用优秀的雕塑作品装饰了公共广场，他是另一位我们应该感激的艺术家。在美国，托马斯·鲍尔创作的波士顿公共花园里的华盛顿雕像看上去非常有活力，符合大众的审美标准。从艺术角度看，这尊雕塑令人精神愉悦，栩栩如生的马深受骑兵的喜爱。华盛顿林肯公园里一组名为《解放》的雕像也是由托马斯·鲍尔创作的。



《解放》，托马斯·鲍尔雕

J.Q.A.沃德创作的托马斯将军 [4] 骑马雕像注定要在美国的民族艺术中占据重要地位。这尊雕像体积庞大，在费城用青铜铸成，托马斯将军的动作有力，姿势独特，马和骑手的比例都很和谐，看起来非常出色。J.Q.A.沃德被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活力、最具个性的雕塑家之一。他对美国艺术的影响很大。我们认为艺术家可以从经典艺术的典型范例研究中获得益处，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收获。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J.Q.A.沃德通过研究模型理解了真正艺术的所有基本原则，他明白了创新源自内心，文化只能对艺术进行补充，不能给予艺术家和一个民族需要的天赋。因此，他不但对国外和古代艺术了如指掌，而且在创作时从国内事物中找到了灵感源泉。他的内心有丰富的资源，从来没有停止想象。如果可以将“黏土素描”作为一个艺术术语的话，我们可以说J.Q.A.沃德曾经很喜欢黏土素描。人们对中央公园里高贵的《莎士比亚》雕像和《印第安猎人》雕像很熟悉，从解剖学原理看，虽然《印第安猎人》雕像并不是各方面都符合规范，但在精神面貌和设计上却是美国造型艺术最杰出的作品之一。然而，近日在纽伯里波特竖起的华盛顿青铜雕像也许最能体现J.Q.A.沃德的才能。事实上，华盛顿并不是一个新主题，

华盛顿的形象已经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出现过很多次，艺术家需要特殊的独创性才能使这一主题的雕塑重获新鲜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J.Q.A.沃德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他创作的华盛顿雕像体积庞大、庄重威严、沉静肃穆。现代雕塑艺术中很少有这么和谐的雕塑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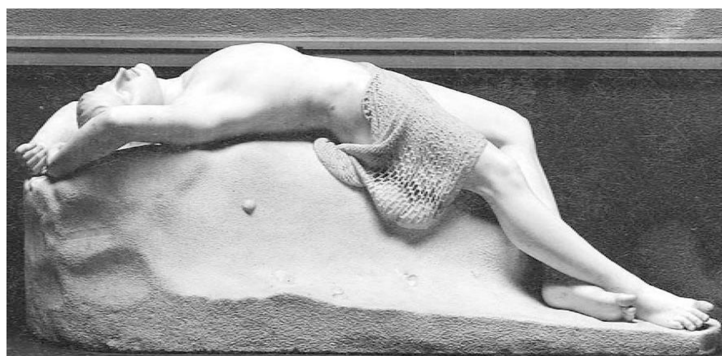
《乔治·亨利·托马斯将军》，J.Q.A.沃德雕



《印第安猎人》，J.Q.A.沃德雕

就天赋能力而言，波特兰的本杰明·保罗·埃克斯是美国最优秀的雕塑家之一。他确实很有天分，而且思维缜密，但他在自己的能力还未成熟前就去世了，空有可以流芳百世的天赋，却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潜水采珠人》是一尊精致的雕像，构思新颖，有一种温柔的美感，主题是岩石上被浪潮不断冲洗的一个年轻人的尸体。这个年轻人身上布满海苔，在死亡的静谧中安息。从这部作品的结构和构思看，显然是艺术家缜密思维的产物，体现了一定的艺术原理，灵感来自强烈的同情心和创造性的想象力。本杰明·保罗·埃克斯的《圣伊丽莎白》也是一尊可爱的雕塑。纳撒尼尔·霍桑在《玉石雕像》中详细描述过弥尔顿 [5] 高贵美好的半身雕塑像和《潜水采珠人》雕像。在爱情小说《玉石雕塑》中，英俊的凯尼恩 [6] 是一位年轻的雕塑家，和本杰明·保罗·埃克斯很像。

康涅狄格州的爱德华·S.巴塞罗缪去世时年仅三十六岁，他是美国最有才华的雕塑家之一。他的艺术作品想象力丰富，在美国雕塑作品中实属罕见。爱德华·S.巴塞罗缪不仅不需要通过去外国学习激发想象力，甚至要适度遏制想象力。当然他的作品的价值是不均等的，但《夏娃悔改》《伽倪墨得斯》和《夏甲与以实玛利》将使他名留青史。值得注意的是，爱德华·S.巴塞罗缪是一个色盲。许多人认为色盲并不会影响他成为一位合格的雕塑家，但有些雕塑家反对这一观点，并且认为色感对创作很重要。



《潜水采珠人》，本杰明·保罗·埃克斯雕



《夏甲与以实玛利》，爱德华·S.巴塞罗缪雕

意大利曾经是美国大多数艺术家的家园和第二位母亲，长期以来为许多最杰出的美国雕塑家提供了安身之处，激发了他们的灵感。现在，在佛罗伦萨和罗马定居的艺术家有伦道夫·罗杰斯、威廉·韦特莫尔·斯托利、威廉·亨利·莱因哈特、拉金·J.米德、托马斯·R.古尔德、朗特·汤普森、哈丽特·霍斯默小姐和其他几位雕塑家。我们不能忽视这些雕塑家。伦道夫·罗杰斯创作了许多精美的作品，体现了他的美好感情和幻想。华盛顿国会大厦圆形大厅里的青铜门使他名声大噪。青铜门的八块镶板描绘的是哥伦布航行的历史场景，广阔的视角展示了这位天才的能力。虽然是从基贝尔蒂 [7] 的作品中借来的想法，但伦道夫·罗杰斯有足够的能力为我们呈现一幅原创作品。屹立在哈特福德的《重生天使》是为柯尔特上校 [8] 打造的纪念碑，也是伦道夫·罗杰斯最重要的杰出作品之一。不久前，佛蒙特州的拉金·J.米德因肖像和纪念类作品被广为人知，譬如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林肯雕像，体积庞大，耗资近三十万美元，在规模和重要性方面与普利茅斯的哈马特·比林斯设计的雄伟纪念碑属于同一级别。建造纪念碑的提议给了19世纪一个发展艺术的机会。如果按哈马特·比林斯原来的设计进行建造，19世纪将有一尊完全可以为之自豪

的雕塑作品。缺少资金和热情导致这尊作品的体积比原来缩小了一半。



《重生天使》，伦道夫·罗杰斯雕

马丁·米尔莫创作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城市纪念碑。他利用后期战争素材，竖立了众多纪念死去的英雄的军事纪念碑。1877年，他在波士顿完成的作品是最值得注意的。这些作品表现的艺术层次并不高，因为作品的主题过于平凡，即使一个具有特殊能力的艺术家选择这类主题时也会犹豫。弗兰克林·西蒙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创作了一些和拉金·J.米德、马丁·米尔莫类似的作品，这些作品体现出真正的艺术感，为弗兰克林·西蒙斯的艺术增添了非凡的魅力。弗兰克林·西蒙斯设计的华盛顿的陆军和海军纪念碑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但还是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他最好的作品之一是罗杰·威廉姆斯雕像。另一位杰出的美国艺术家是托马斯·R.古

尔德，他定居在佛罗伦萨，创造了一些非凡且精湛的理想作品。这些作品包括现在屹立在芒特奥本的《向上的精神》《〈哈姆雷特〉中的鬼魂》和《西风》。《西风》因微妙的想象而非纯熟的技法吸引了许多人，但作品的一些细节受到了批评，譬如，由于衣物过于宽大，人们的注意力并没有被人物本身吸引，但这类瑕疵即使在最好的雕塑作品中也很常见。托马斯·R.古尔德的肖像作品非常成功，他现在正在创作一个卡美哈美哈的全身像。卡美哈美哈是夏威夷群岛已故的国王。托马斯·R.古尔德的代表性雕塑作品非常有创意，试图呈现只有高水平绘画作品才会有的艺术效果。此外，寓言类作品突显了他的才能，基督和撒旦的头部雕像的想象类作品暗示着雕塑艺术尚未触及的可能性。



《乔治·蒂克纳》，马丁·米尔莫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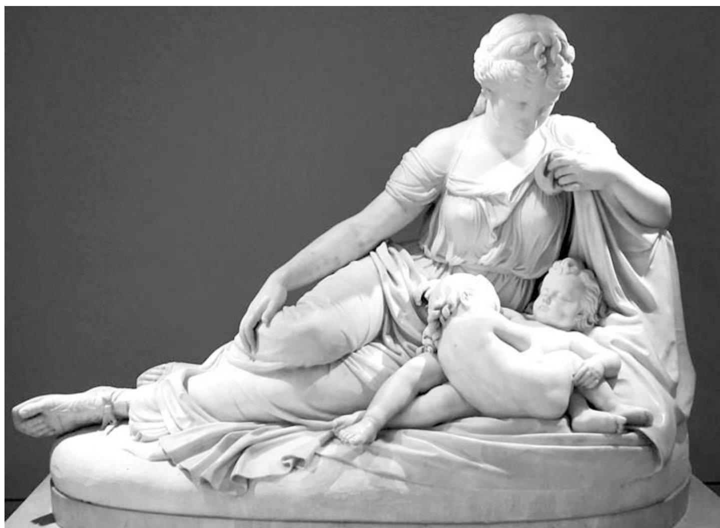
《卡美哈美哈》，托马斯·R.古尔德雕

美国另一位雕塑家在采石场工作，那儿的大理石印上了他的不朽之名，这位雕塑家就是巴尔的摩的威廉·亨利·莱因哈特。威廉·亨利·莱因哈特是美国真正具有理想主义思想的艺术家之一。当你端详他的作品《熟睡的婴儿》，或温柔优雅地观察《拉托那和她的孩子》时，你不会对威廉·亨利·莱因哈特产生任何微词。

在这些艺术家的所有作品中，虽然我们看到了熟练的技法和微妙的情感，但没有一位艺术家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显现出他们的雄厚力量。这一点在威廉·韦特莫尔·斯托利身上体现得最明显。当今艺术界没有哪位美国人能像他那样地位显赫、多才多艺。威廉·韦特莫尔·斯托利很富有，他原来是一名律师，负责准备法律文书，他同时还致力于诗歌、戏剧以及一般的文学创作，后来成了一位非常成功的雕塑家。伦敦有名的杂志称他是自约翰·吉普森去世后的第一位盎格鲁-撒克逊雕塑家。在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中，威廉·韦特莫尔·斯托利无疑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但我们对他的赞扬必须适度，因为我们的赞扬可能会被其他人质疑。我们赞扬威廉·韦特莫尔·斯托利是因为他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很强，并不是因为他做事时的非凡的独创性和胆识。威廉·韦特莫尔·斯托利的雕塑作品反映了丰富的内涵，他的作品是经过深思熟虑创作出来的，精湛完美、古朴素雅。这种风格值得我们尊重但不能激起我们的热情，不能给人启示。威廉·韦特莫尔·斯托利利用自己的才能而不是天赋精心完成了这些大理石雕塑作品。《耶路撒冷悲叹》《西比尔》《克莉奥帕特拉七世》和《米德》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尤其是《耶路撒冷悲叹》。然而，这些雕塑并没有触动观众，引发观众的思考。《萨乐美》也许是威廉·韦特莫尔·斯托利最完美的作品。如果他没有完全依赖外国的原型，可能会创作出更伟大的作品。



《熟睡的婴儿》，威廉·亨利·莱因哈特雕



《拉托那和孩子》，威廉·亨利·莱因哈特雕



《西比尔》，威廉·韦特莫尔·斯托利雕



《克莉奥帕特拉七世》，威廉·韦特莫尔·斯托利雕

哈丽特·霍斯默小姐投身艺术后一直居住在意大利，她的名气几乎与威廉·韦特莫尔·斯托利相当，一部分原因无疑是她的性别。自从萨拜娜·冯·斯坦巴克 [9] 时代以来，很少有女性从事黏土雕塑。哈丽特·霍斯默小姐个性很强，她的作品并不是都很成功，但这些作品具有独立思想和想象力，给人一种充满活力的感觉。她因作品题材广泛闻名，譬如《冰球》《沉睡的哨兵》《沉睡的农牧神》和《季诺碧亚》。她试图通过《季诺碧亚》表达自己心中的理想女人和女王。哈丽特·霍斯默小姐一开始跟着皮特·斯蒂芬森学习雕塑。皮特·斯蒂芬森还没有在国内出名就去世了，但他的艺术才能使他受到了同行的尊敬。他曾经在罗马学习了一段时间，并留下了众多半身雕像和一组名为《尤娜和狮子》的雕塑，这些作品体现了他毋庸置疑的天赋。其他尝试雕塑创作的女性还有艾玛·斯特宾斯女士、传记作者夏洛特·库什曼、费城的J.E.弗里曼女士等，她们创作了一些非常出色的作品。安妮·惠特尼曾在国外留学，但她很明智，没有在那个国家继续工作。她对人物进行了仔细、深入的研究，并被雕塑在艺术中的崇高地位打动。她最重要的作品中有一尊令人印象深刻的雕像——《罗马》，这尊雕像表现的是在颓废中追忆过去的荣耀。此外，她的《非洲》和《塞缪尔·亚当斯》现在屹立在华盛顿国会大厦里。



《沉睡的农牧神》，哈丽特·霍斯默雕



《季诺碧亚》，哈丽特·霍斯默雕

另外几位值得一提的美国雕塑家有亨利·德克斯特、理查德·格里诺、巴比、利奥·W.沃尔克、埃莫尼亚·刘易斯、埃姆斯·范·瓦尔特、C.B.艾夫斯、J.W.A.麦克唐纳、摩西·J.伊齐基尔、查尔斯·卡尔弗利和H.J.哈兹尔廷。他们在肖像类或理想类雕塑中地位颇高，但既定篇幅有限，我们只能介绍几位既有非凡天赋又有独特美国特征的艺术家，奥尔巴尼的伊拉斯塔斯·D.帕尔默是其中之一。伊拉斯塔斯·D.帕尔默因艺术的纯洁性和独创性在国内出名。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从事木匠行业直到三十岁。他天性中对艺术的渴望出现得相对较晚，并在自己居住的城镇里开始从事艺术；但潜心进行艺术研究和创作后，他很快出名，获得了当之无愧的荣誉。伊拉斯塔斯·D.帕尔默是少数几个真正追求理想的人，很少有人能比他更好地表达自己的理想，而且他的艺术美感极具民族特色，这一点是其他艺术家无法企及的。或者说他更能以细腻的诗意解读独特的民族情感和宗教思想。在这位真正的诗人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美而不是力量，一种在民族外在美的欣赏基础上产生的精神美。在美国，这种艺术风格很快得到了大众的回应，因为它是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艺术。伊拉斯塔斯·D.帕尔默最著名的作品是《印第安俘虏》《春天》《白人奴隶》和《坟墓天使》。但我们更喜欢他创作的一些精美的浮雕。在这些浮雕中，他用一种愉快风格表达了民族情感及基督徒内心的渴望和志向。然而，他的艺术缺陷是过于依赖想像力，而不是为了作品直接研究自然，因此很快开始囿于风格主义，后期作品中的风格主义越来越突出。

另一位很有能力的雕塑家是朗特·汤普森。他非常感激伊拉斯塔斯·D.帕尔默在造型艺术方面对他的指导。朗特·汤普森曾是一个贫穷的年轻人，很早就表现出对艺术的热爱。直到有一天，他在阿姆斯比博士[10]的办公室工作时，伊拉斯塔斯·D.帕尔默说自己正在寻找一名助手，问阿姆斯比博士是否可以推荐一位。阿姆斯比博士说朗特·汤普森爱好艺术，但一直未能找到机会表达自己的艺术情怀。于是，这位很有艺术才能的肖像雕塑家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就半身雕塑和全身雕塑来说，美国很少有雕塑家能比得上朗特·汤普森。在他许多成功的作品中，我们会提到西点军校的拿破仑、爱德温·布斯、塞奇威克将军以及耶鲁学院的皮尔森院长的雕塑。遗憾的是，他在国内大获成功后，定居在了意大利。



《坟墓天使》，伊拉斯塔斯·D.帕尔默雕

约翰·罗杰斯是另一位作品完全出自本土的艺术家，他因创作众多小型黏土雕像群闻名。他是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人，曾从事机械工作，后来开始关注造型艺术，并去了欧洲。在欧洲，他似乎从法国雕塑艺术的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中获得了启发，但仅仅是启发而不是影响。约翰·罗杰斯发现自己更愿意生活在国内，于是很快回国，并一直在国内进行创作，从周围平凡的日常素材中寻找主题。他从后期战争中找到了很多有趣的创作素材。他的艺术非常不符合传统，在任何方面都不属于所谓的高雅艺术，但他的艺术源自天性受到的触动，并产生于他所处的时代，因此他将来一定会坐在艺术先驱的位置上，因为他一直忠于自己和时代。



《嬉戏》，约翰·罗杰斯雕

丹尼尔·C.弗伦奇是J.Q.A沃德和托马斯·鲍尔的学生，也是一位年轻的雕塑家。与约翰·罗杰斯一样，他在国内为自己的理想找到了灵感，有希望在美国的雕塑艺术领域占据重要位置。他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艺术指导，但很早就突然成名了。康科德的《一分钟人》雕像就是他的作品。这尊雕像从解剖学角度看并不完美，但很有活力和原创性。

艺术领域逐渐兴起新的现实主义雕塑流派，这个流派的杰出代表是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W.R.奥多诺凡。内战时期，W.R.奥多诺凡坚定地为南方战斗。现在，他孜孜追求和平的艺术。他创作雕塑时并不快，用黏土塑形时，他会深思熟虑，手法显得很娴熟，作品带有天才的个性和独创性。他最成功的作品是肖像雕塑，其中最杰出的作品是艺术家威廉·佩奇的半身青铜塑像，另一尊小男孩的半身塑像充满纯真美。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传达出一种美好的情感和性格，充满活力，令人震撼。



《一分钟人》，丹尼尔·C.弗伦奇雕

很多具有艺术热忱和原创思想的雕塑家创作了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特点的优秀作品，表明美国的造型艺术正处在过渡期，令人激动。这些艺术家中有很多人曾在国外学习，学习结束后非常明智地选择了回国，并成立了一个新的、不断进步的雕塑流派，与这个流派共同成长。辛辛那提已故的弗兰克·当格莱是这些艺术家中的一员，他曾经在慕尼黑学习，是波士顿学院的雕塑教授。J.S.哈特利不久前是学生艺术社团的解剖学教授，现在，他是这个社团的主席。纽约的奥林·M.沃纳和费城的霍华德·罗伯特创作了线条粗重、轮廓清晰的雕像《希帕蒂娅》和《洛特的妻子》。霍华德·罗伯特开始从事艺术创作时在伊拉斯塔斯·D.帕尔默的画室工作，后来前往伦敦和巴黎学习。这些年轻雕塑家的艺术还不成熟，情感表达或抒情意味太浓厚，注重渲染美感但不具备经典作品的严肃性，艺术作品没有沉静感。换句话说，这些作品具有想象力和强大力量，富有蓬勃的思想。毫无疑问，这些艺术家即使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民族雕塑流派的创造者，也是这一流派的先驱。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是纽约人，具有较高的技术才能，他被一位天才打动开始投身艺术。这位天才曾在

巴黎最好的现代造型艺术学校接受培训，创作了精致的名为《天使崇拜十字架》的组雕塑。现在，这组雕塑放置在纽约的圣托马斯教堂里，是美国最重要、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三一教堂圣坛后的《阿斯特屏风》是威瑟斯先生的设计，但他只完成了作品的一部分。《阿斯特屏风》丰富了美国的造型艺术，标志着大西洋西岸出现了迄今为止很少有人沿袭的艺术风格。不久前，威廉·瑞默博士去世，他生前非常擅长设计造型，精通艺术解剖学，并写了一本很有价值的关于艺术解剖学的著作，对正在成长中的雕塑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威廉·瑞默博士几乎没有美感，然而他对艺术解剖学的理解很深刻，虽然他的雕塑模型没有优雅的美感，但充满勃勃生机。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的雕像《角斗士》在巴黎引起了轰动，这尊技法高超的作品是在完全掌握形体知识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因为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不可能一直保持下落的姿势。



《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在工作室》，凯尼恩·考克斯绘

时至今日，木雕、石雕和纪念碑作品以及教堂和市政装饰方面渐渐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托马斯·杰斐逊留下了一张让人好奇的纸，上面是他的设计构思，我们在这里提供的是那张纸的副本。这是美国在原创纪念碑艺术方面的最早尝试之一。雕塑家在这一领域创作的作品随处可见，但美国有太多称不上是艺术却造价不菲的纪念雕塑。人们越来越关注木雕和石雕，辛辛那提的新音乐厅、哈特福德和奥尔巴尼的州议会大厦以及后来建造的教堂里都有木雕和石雕作品。这是一个好的迹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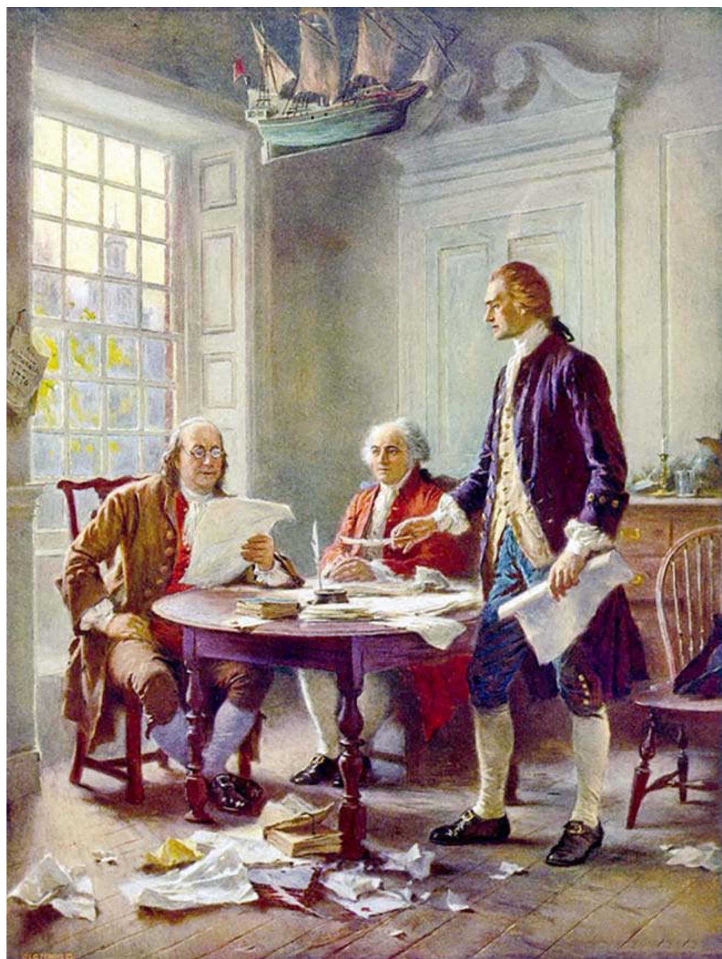
明一个更广阔的领域正在向成长中的美国雕塑家开放，他们可以更好地表达自我。过去十年，美国成立了很多关于雕塑艺术的学校，建立了一些保存古代铸形杰作的画廊。如果最新的艺术要求在美国吐露心声，那么从这些简要介绍中可以看出，雕塑艺术在新大陆已经找到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

不知长眠地下的人对纪念碑或其他纪念他们的物品是否感兴趣，正如阿那克里翁[11]所说：

> 我心欢悦，犹如过节，
不知道什么叫嫉妒，
也从不害怕嫉妒之舌流出的胆汁。
按下面的做，我的灵魂会得到满足。

坟墓上方竖一块三英尺高、没有任何装饰线条的立方体石头，石头上是一尊六英尺高的方尖碑。方尖碑上刻着下面几句话，一个字也不能少：

> 这里安葬着托马斯·杰斐逊。他是《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的起草人，也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
>
> 这些话证明我曾在世间存在过，也是我希望世人能够铭记在心的话。纪念我的柱子用粗糙的石头建造，以后没有人会因为材料的价值破坏它。塞拉基为我做的半身雕像以及底座和下方截去顶部的纪念碑都可以赠给弗吉尼亚大学，看是否可以将雕像放在圆形大厅带有穹顶的房间里。方尖碑上刻着：“生于1763年4月2日，卒于……”



《起草独立宣言》，吉恩·利昂·杰罗姆·费里斯绘

[1] 即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美国著名政治家，佛罗里达州首任州长，1829至1837年任美国第七任总统。在竞选总统之前，他是陆军少将。成为总统后，他积极维护普通百姓的权利。——译者注

[2] 俄耳甫斯是古希腊宗教和神话中的传奇音乐家、诗人和先知。古希腊的一些资料指出俄耳甫斯是色雷斯人。他具有用音乐吸引所有生物甚至石头的能力，试图从冥界找回妻子欧律狄刻。他死在那些听不见他神圣音乐的人手中。——译者注

[3] 即安德烈·德尔·韦罗基奥（1435—1488），意大利画家、雕塑家。他在佛罗伦萨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室。莱昂纳多·达芬奇等著名画家都

是他的学生。威尼斯的雕塑作品《巴托洛梅奥·科莱奥尼骑马像》被认为是他的杰作。——译者注

[4] 即乔治·亨利·托马斯（1816—1870），美国内战期间联邦军少将，西方战区的主要指挥官之一。因淡泊名利，他成为最被忽视的一员猛将。——译者注

[5] 即约翰·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辩论家、学者，曾出任英格兰共和国公务员。史诗《失乐园》是他的伟大作品。——译者注

[6] 凯尼恩是纳撒尼尔·霍桑的小说《玉石雕塑》中的男主人公。在这部小说中，霍桑把《潜水采珠人》描述为凯尼恩的雕塑作品。小说中的凯尼恩是一位具有理性人文主义思想的雕塑家，深恋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希尔达。——译者注

[7] 即罗伦索·基贝尔蒂（1378—1455），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佛罗伦萨的艺术家、金匠、雕塑家。他成立了一个制作金属雕塑的工作室。他因创作佛罗伦萨圣若望洗礼堂的青铜门而闻名，米开朗基罗将之称为《天堂之门》。——译者注

[8] 即塞缪尔·柯尔特（1814—1862），美国发明家、商人。他成立科尔特专利武器制造厂，批量生产左轮手枪。科尔特的制造方法处于工业革命的前沿。通用零件的使用使他成为最早使用流水线的人之一。他创造性地利用艺术、名人代言和公司礼品来推销自己的产品，使他成为广告、植入式广告和大众营销领域的先驱。——译者注

[9] 据说，萨拜娜·冯·斯坦巴克是13世纪阿尔萨斯的一位女性石匠，雕塑家。她是负责修建斯特拉斯堡圣母院的建筑师欧文·冯·施泰因巴克的女儿。父亲去世后，他的哥哥从1318到1339年继续修建教堂的钟塔。萨拜娜·冯·斯坦巴克也受雇于教堂。不过，有人认为萨拜娜·冯·斯坦巴克这个人根本不存在。——译者注

[10] 即詹姆斯·H.阿姆斯比（1809—1875），美国外科医生。1833年，他毕业于佛蒙特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他的努力推动下，

奥尔巴尼成立了医学院（1839）和医院，他任医学院的外科教授和院长。——译者注

[11]　阿那克里翁（前582—前485），希腊抒情诗人，擅长用生动、机智的诗句歌颂爱情。他所有诗歌都是用古代的爱奥尼亚方言写成。阿那克里翁的诗歌主题广泛，包括爱情、迷恋、失望、狂欢、聚会、节日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等。——译者注

第6章　趋势与流变：现实主义、实用技术与本土化理想



人物画家G.H.鲍顿（1833-1905）

本书第四章结尾时曾简要指出，艺术表达的新影响和新形式在美国艺术发展中越来越重要，正在迅速发挥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除特殊情况外，逐渐变化的艺术形式也慢慢产生了新的影响。虽然美国艺术开始呈现出个性的具体时间很难确定，但这种个性却以全新的、区别性的特征出现在了我们民族的审美文化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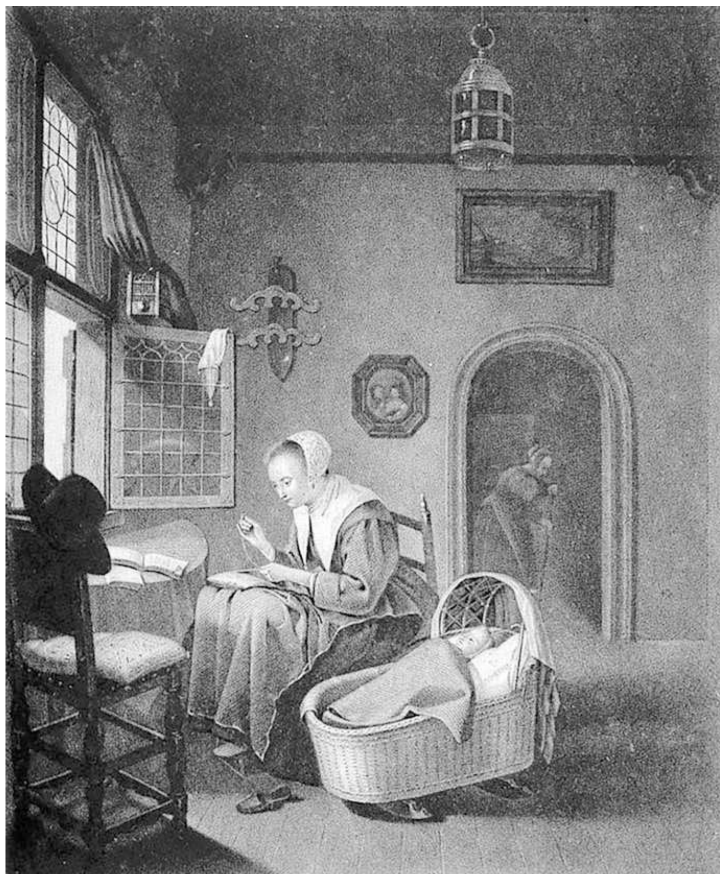
只有当我们回顾整个艺术领域，并将一代艺术家与另一代艺术家进行比较时，我们才能发现这一系列影响消失的时间，并找到艺术领域的新流派的源头。从这一角度出发思考美国艺术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可以将美国艺术的发展分为明确的几个阶段，而且这些阶段是有规律地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就像彩虹的颜色在边缘处混在一起一样，然后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因此，我们可以从几何比例上追溯艺术发展的阶段，从原始的轮廓、粗糙的雕刻发展到现代相对先进的艺术状态。

仔细审视美国的艺术史，我们发现当艺术开始朝着一定方向发展时，带有我们国家其他方面的一些发展特征，这些特征出现得断断续续且出人意料。经过毫无希望的荒芜阶段后，美国艺术突然迸发了活力，变得生机勃勃，迅速开花结果。本杰明·韦斯特和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

是非常成熟的艺术家，他们拥有艺术天赋和才能，在欧洲占据了重要位置。然而，预示着美国正在为这些艺术家的到来做好准备的先兆并不明显。

直到最近，由于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好像还没有能力同时发展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艺术形式。之前的某一时期，历史画和肖像画同时发展，然后是肖像画，包括其间非常成功的微型肖像画，代表画家是约翰·弗雷泽和爱德华·G.莫尔博恩，后起的一些非常有能力的艺术家有T.S.卡明斯、J.H.布朗、萨拉·古德里奇小姐与霍尔女士。然后，突然出现了风景画，而且很快达到了较高水平。与风景艺术携手同行的是非凡的线雕艺术。一个事实证明美国线雕艺术很快达到了卓越水平。1788年，《美国杂志》的编辑在呈现一幅关于挖泥机的粗糙插图时，抱歉地写道："这个清理码头的新机器的插图是我要求的，非常遗憾的是这样的作品缺少漂亮的插图，如果有适合的插图我们一定会用，如果没有，我认为可以将瑕疵的存在归因于美国艺术尚在初级阶段。"此后，不到二十年，皮特·马弗里克在纽约制作钢雕，而且很成功。几乎不到十年，亚瑟·布朗·杜兰德创作了精湛的雕刻艺术作品。他雕刻了约翰·特朗布尔的《独立宣言》和约翰·范德林的《阿里阿德涅》。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一些雕刻师，譬如老詹姆斯·斯迈利、A.H.里奇和约翰·马歇尔，他们使雕刻艺术上升到了卓越之境。约翰·萨廷在美柔汀 [1] 版画领域获得了人们的赞誉。

奇怪的是，美国艺术家成功创作了许多肖像画、风景画和钢雕画，但对其他艺术领域几乎没有感觉。一般来说，对外形的理解和呈现是早期艺术本能的自我表现，但这种表现一直处在长期的觉醒中，较晚出现的造型艺术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人们似乎忽视了单色画法和神秘、联想丰富的明暗对比画法，后来对这两种画法的关注时间也比较短。水彩画几乎被艺术家们忽视了，木雕艺术一直处在令人怜悯的境地，建筑和装饰艺术有名无实，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人们能正确理解这类艺术的意义。这些就是大西洋西岸的艺术发展概况。



《缝衣服的妇女》，约翰·萨廷绘



《劳动者和所罗门王》，约翰·萨廷绘



《乡村选举》，约翰·萨廷绘

几年前，19世纪最杰出的木雕师W.J.林顿来到美国。虽然不能肯定地说从那时起，木雕艺术的迅速发展与W.J.林顿来到美国有关，但通过对比，我们应该说在短短几年中，W.J.林顿对已经取得显著进步的美国雕刻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A.V.S.安东尼是第一个对优秀木雕作品需求的觉醒做出回应的艺术家，他以精湛的技法诠释了美国最出色的艺术家的单色素描作品。查尔斯·马什是一位个性鲜明且具有独创风格的雕刻师。他创作了一些装饰类或理想类主题的作品。在这一方面，我们国家没有雕刻师能够超越他。著名的雕刻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W.H.莫尔斯、J.P.戴维斯、罗伯特·霍斯金、H.沃尔夫、P.安宁、F.炅灵、E.金斯利、R.A.穆勒、J.科尔、史密斯威克-弗伦奇、G.克鲁尔、威廉·J.达纳、约翰·安德鲁和F.S.金。他们不仅能准确表达画作精神，还常常具有个性特征。



《乡村商店》，W.J.林顿绘



《火车站》，W.J.林顿绘

美国的木雕发展最有趣的阶段之一是讨论它在艺术中的地位的那一阶段，以及近来对版画或复制版画方法的优点的讨论阶段。这些讨论非常有趣，也很有价值。这是在艺术领域，艺术问题已经引发讨论、已经表明其重要性的另一条证据。毫无疑问，雕刻是一门艺术，如果一些艺术家还未激烈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就会有些奇怪。这些艺术家往往依赖自己的天赋使公众发现了自己的才能。有些人认为雕刻纯粹属于手工方面的爱好，但一个事实可以驳斥这一说法：雕刻师的艺术感知能力越强，雕刻作品就会越精美。因此雕刻确实是一门艺术。

另外，雕刻师的顾虑很多，他们声称要改进图案或从本质上反对在木头上刻印图案。授予雕刻艺术等级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它毕竟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雕刻确实是一门艺术，但它是一门从属于其他艺术的艺术，它是用来阐释其他艺术的艺术。接受这一事实，明白雕刻师的义务和责任是将画作忠实地刻下来，彰显自己能力的同时不能毁坏画家的声誉，尽最大努力使描摹的复制品接近原作。如果雕刻师被赋予了这样的责任，他显然不应该反对，甚至应该感到满意，并赞成这种观点，使他能够在木材或其他任何材料上更精确地诠释画家的风格和精神。一个聪明的雕刻师可以将笔墨画直接复制到木头上，然后边刻边研究原作，这似乎已经不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过去五年，很多优秀的雕刻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将笔墨画复制到木头上的方法表明了雕塑艺术的进步。雕塑艺术开始包容更多不同的风格，更自由地表达设计者的思想、方法和感觉，也使许多不愿局限在一块木头上进行创作的艺术家用黑白色创作了更新颖的作品。他们用印度墨水或油做单色画，然后复制到木头上。这种方法使艺术家获得了更多自由，他们可以对作品进行更个性的处理，用更优美的语言说出自然的真理。不同的表达形式必须符合艺术的发展进程，还要引导大众，因为大众是直接受益者。插图可以直接送到他们的家门口或交到年轻人手里。年轻人的品味和个性正在形成，他们的想象力是可塑的、易受影响的。

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对木雕艺术直接施加了影响。在插图能力提升的同时，木雕艺术也迅速发展了。过去十年，这个艺术分支发展到了相对卓越的阶段，达到了美国其他艺术无法企及的高度。与广受欢迎的插图同时出现的还有素描画法，尤其是蜡笔画。

塞缪尔·W.卢维斯是一位最早以一种特殊风格的肖像画推动蜡笔画发展的艺术家。因此，他可以列入美国一流的肖像画家行列。他曾用蜡笔做颜料，在美国独树一帜。人物肖像创作方面，塞缪尔·W.卢维斯能准确描绘人物的特征，再现人物的灵魂。他喜欢描绘的所有主题以及创作的许多可爱儿童的肖像将永远被世人铭记。他的成功促使其他艺术家开始大胆尝试蜡笔画创作。在肖像画艺术领域，我们发现在美国的主要城市中有很多已经获得一定成就的蜡笔艺术家，其中包括B.C.孟齐格和弗雷

德里克·W.赖特。一个用木炭进行创作的风景艺术流派因此成长起来。拉兰努和奥古斯特·艾隆曾将木炭作为颜料进行创作，产生了神奇的效果。约翰·R.基是一位著名的油画家，但我们认为他最优秀的作品是木炭画。这类画中光和影的处理显得很柔和，而且构图和谐。J.霍普金森·史密斯是一位著名的水彩画家，但他能像大师一样用木炭进行创作，他还能即兴将自己想到的画面描绘出来，对明暗也很有感觉，是美国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



《伊士曼·约翰逊-资助法案》，塞缪尔·W.卢维斯绘

当提到插图画家时，我们发现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偶尔还有一些颇有天赋的画家。由于插图画家很多，在这里只能选几位非常杰出的画家进行介绍。菲利克斯·O.C.达利是最先表现出在插图画领域具有潜力的艺术家之一，但他的风格逐渐变得矫揉造作。然而，他抓住了美国文化的显著特征，创作出了一些非常新颖、具有创意的作品，并以精致的幻想呈现出幽默与感伤。他为《里普·万·温克尔》和贾德的《玛格丽特》两部作品做线性插图，从而一直稳居美国风俗画艺术家榜单的第二名或第三名。奥古斯都·霍平虽然不是非常多才多艺，创造性也不是很强，但他在美国插图画家中赢得了一个重要位置。路易·斯蒂芬斯以优雅的幽默主题赢得了荣誉。然后是一组风景画家，其中，哈利·芬恩的艺术地位较高，他描绘的大自然的无限风光、乡村的如画风景，以及旧大陆的美景和遗迹都极具诗意。在哈利·芬恩的铅笔的指导下，很多人得到了艺术的

教诲，了解了这个美丽世界的各种可爱事物。托马斯·莫兰和哈利·芬恩是风景画插图领域的大师。我们认为与哈利·芬恩创作的最著名的精美作品比起来，托马斯·莫兰在插图画领域表现出更多独创性和想象力。

最近几年，风俗画插图艺术流派在美国艺术中得到了认可。事实上，我们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流派的源头。风俗画插图艺术家都是在国内接受的教育，与美国其他艺术分支的作品相比，他们的作品综合了更多艺术特质。奇怪的是，虽然现在美国人对单色画很感兴趣，呈现单色画的风俗画家应该很快能达到卓越之境，在大西洋两岸受到赞美，但单色画领域的画家却一直屈居第二。

阿尔佛雷德·弗雷德里克斯以一种优雅飘逸的风格将风景画和人物画结合了起来，因而声名远扬。杰西·柯蒂斯女士擅长描绘童年生活的质朴美好，很乐意探讨能使具有诗意的艺术家动笔的有吸引力的主题。L.B.汉弗莱小姐在选择类似的主题时，发展出一种具有个性的方法，宏大有力。在插图画领域，也许没有比玛丽·哈勒克·富特女士更出色的艺术家了。她的构图风格常常缺乏创意，并不是总能令人愉悦，有时候明暗处理也显得不足。她的画法虽然不够优雅，却令人印象深刻。玛丽·哈勒克·富特认真观察大自然，努力进行创作。她的作品有时也能达到一定效果，好似受到了一种男性勇气和力量的鼓舞，反映出她的知识储备和力量。她的一些现实主义的黑白风景画几乎和居斯塔夫·库尔贝大胆的现实主义彩色画一样真实，有强烈的明暗对比，但表现出的是较好的技能而非丰富的想象。安妮特·毕晓普女士英年早逝，她去世时还没有获得公众对她才能的认可，但她天生具有微妙的诗意幻想和奇特的表达梦想的能力。



《巴尔的摩暴动》，菲利克斯·O.C.达利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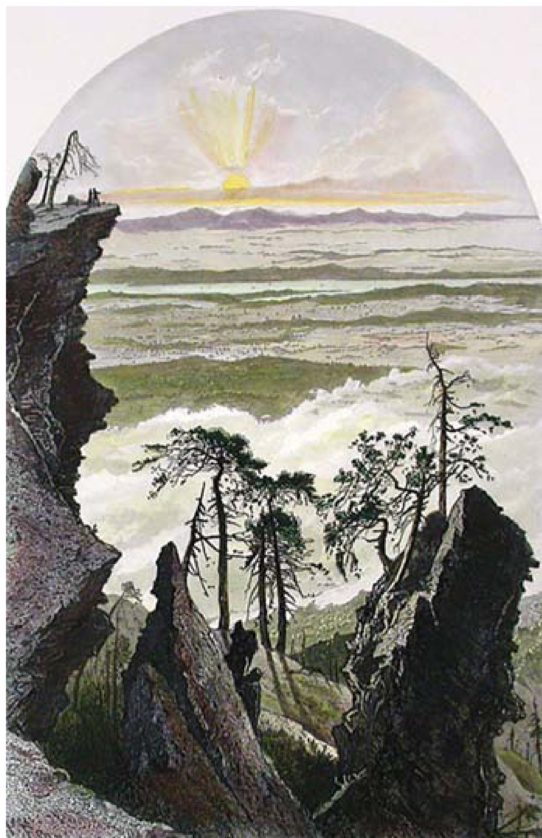
《列克星敦战役》，菲利克斯·O.C.达利绘



《参议员塔佩斯》，路易·斯蒂芬斯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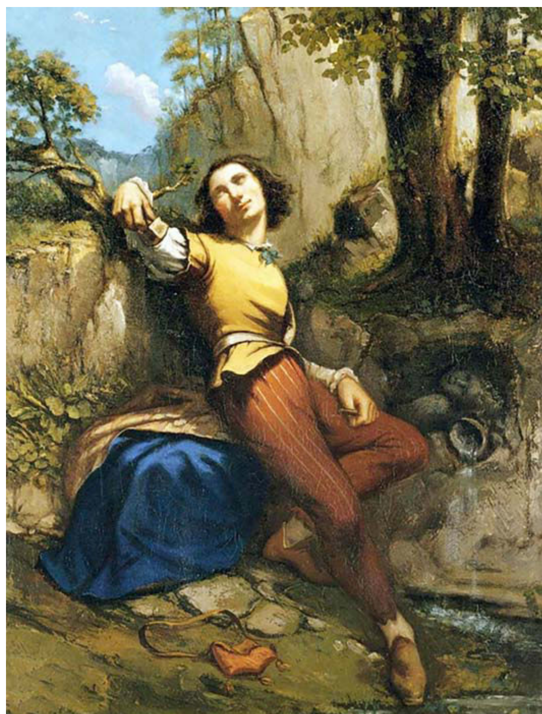
《阅读宣言》，路易·斯蒂芬斯绘



《卡茨吉尔山脉》，哈利·芬恩绘



《卡普里岛》，哈利·芬恩绘



《雕塑家》，居斯塔夫·库尔贝绘

F.S.丘奇是一位想象力丰富的艺术家，擅长油画和水彩画，但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醒目怪异的描绘动物或鸟类生活的素描画。F.S.丘奇对美国艺术来说意义重大，虽然他的风格并不成熟或令人满意，但他的风格源于受到真正的艺术感觉的启发，而且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美国艺术家中的理想主义者太少了。艺术是追求理想的产物，是世界给予人类最宝贵的财富。理想包括信仰、希望和仁慈。追求理想的善行、生活在理想的世界中、渴望并努力创造理想的和谐是艺术家留给人类的财富，让人类相信不朽和境界更高的生命。如果一位诗人或艺术家力求做更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就会离完成自己的使命更近。理想主义者是创造者，是有天赋的人，因此我们热情欢迎每一位出现在美国艺术界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为美国艺术和散文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将灵感融入各个流派的教义中。迄今为止，正如美国文学那样，美国艺术最大的缺陷显然是缺乏想象力。无论理想主义者出现在哪个阶段，我们都将他视为一块里程碑，以此纪念艺术的进步。上帝通过理想主义者将真理传达给人类，因此，我们非常重视素描艺术。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分支能像素描艺术那样以单纯的线条或明暗对比勾勒出广阔的想象空间，伦勃朗·哈尔曼松·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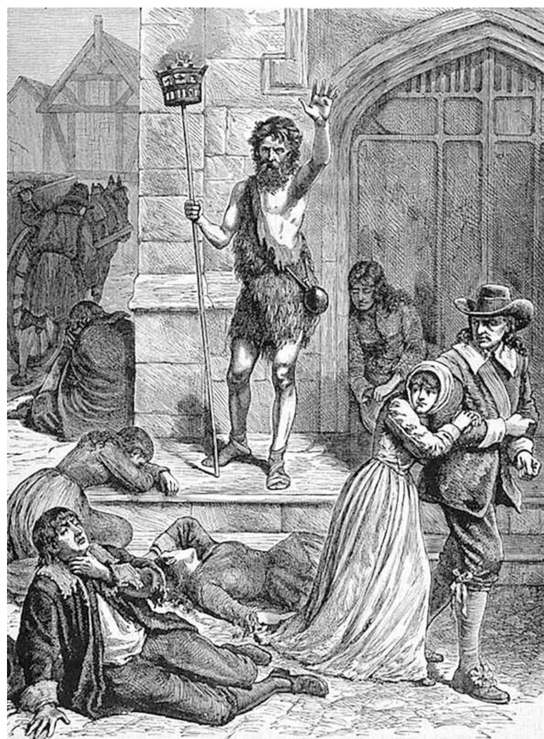
莱因的艺术的巨大力量就在于此。他用看似简单却拥有真正力量的黑白颜料进行创作。光与影在大师的手中像魔术师的魔杖一样，有力地将世界从混沌中解救出来。



《筛谷》，居斯塔夫·库尔贝绘

近期，在素描艺术或书籍插图方面取得成就并获得盛誉的艺术家还有查尔斯·A.巴里、E.B.本塞尔、T.P.谢波德、T.P.戴维斯 [2] 、T.艾迪生·理查兹、索尔·艾金格、亚瑟·B.弗罗斯特、梅里尔、L.S.易普森、沃尔特·舍洛、弗朗西斯·莱斯罗普、罗伯特·刘易斯、查尔斯·帕金斯和朱利安·O.戴维森等。J.E.凯利风格简约，令人印象深刻。他的这种简约风格如果按照旧的程序，几乎不可能准确描绘到木材上。将设计图复制到木材上的设备似乎促进了艺术家-作家流派的发展。这类艺术家不仅要为杂志写作，还要为自己的文字配图。譬如，霍华德·派尔和W.吉普森等出色的艺术家证明了这类艺术可以达到的卓越效果。作为画家，霍华德·派尔和W.吉普森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精湛的技术能力。C.S.莱因哈特已经是一位广为人知的多才多艺的民族插图画家，他借助自己活跃的想象将风景活灵活现地呈现了出来。他不仅擅长描绘古色古香的古代场景，还精于将当代风景与华丽的服饰和人物融合。当C.S.莱因哈特通过大师的优雅将清教徒少女或新港的美女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都应该赞美他。插图艺术家在这一艺术分支中声名远播。毫无疑问，这个艺术流派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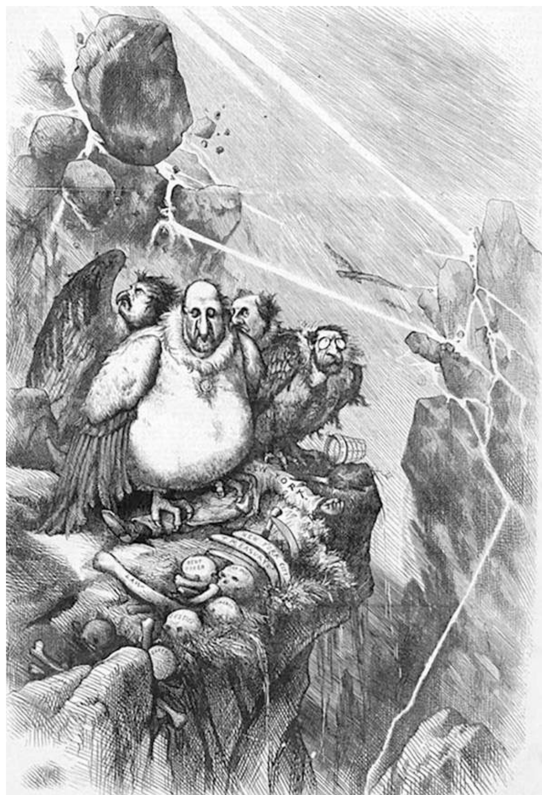
部分地源于美国艺术家对人物越来越细致的研究以及日趋先进的写生设备。这些艺术家大多是年轻人，通过研究学习写生派而提高了自己的能力。美国早期艺术中几乎没有写生流派。虽然将漫画归为伦理学会比归为美学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漫画的迅速成长和惊人影响力与素描画的发展密切相关。漫画的代表画家有托马斯·纳斯特、弗兰克H.T.贝柳、约瑟夫·开普勒和S.库萨克。



《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宣布大难即将来临》，亚瑟·B.弗罗斯特绘

E.A.阿比好像综合了其他素描艺术家身上的所有特质，取得了显著成就，而且有取得更大成就的希望。E.A.阿比很年轻，虽然没有得到太多有利的接受正规美术教育的机会，但他通过自学获得了成功。至今他才首次前往欧洲的画室和画廊进行参观。基于这些不利因素，我们从E.A.阿比创作的插图数量和质量中看出他很有艺术天赋，拥有用之不竭的创造力、清晰生动的构思以及丰富的想象力。他的作品富有诗意美和一种离奇微妙的幽默感，表现出他对一些神秘、奇怪的事物的理解，以及他令人钦佩的明暗处理和绘图构思。当我们发现这么多罕见的综合特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时，我们不再惊奇英国和法国的权威评委对E.A.阿

比天才能力的衷心认可，尽管那时他还没有离开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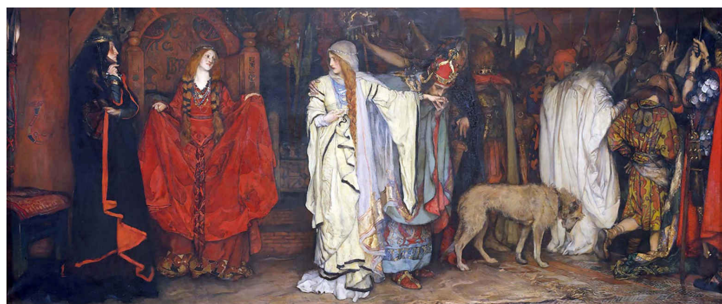


《一群秃鹰等待暴风雨结束》，托马斯·纳斯特绘

我非常赞赏插图艺术家，因为他们理应得到这样的称赞。但如果称赞是不公正的就应该收回，就像收回一些不合理的责备一样。批评不一定像评论家想象的那样具有硫酸和胆汁的本质。陪审团一定会证明好人的清白，严惩有罪的人。

我们应该对美国艺术的另一个分支给予相同程度的赞扬，但对建筑艺术的称赞在美国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很难确切地说在美国国内的城市建筑中，一个能更全面地表达美的新运动即将开始。现在，我们意识到，十年前令人愉悦的对建筑实例的模糊审美已经形成一种明确的、系统的推动力。人们受到这种力量的推动，要求正在发展中的美国城市建立一些在形式和类型方面更具审美的建筑。波士顿大火 [3] 加速了这一过程。园林景观在纽约中央公园和其他城市的公园中发展起来，促进了人们对物质美的追求。但无论艺术的发展受到了哪种影响的推

动，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最近，美国新建的许多建筑物并不是都很重要。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建筑的总趋势是朝着更完善的风格前进，矗立在各处的建筑群或单个建筑的结构都很优雅、宽敞，具有艺术性。如果我们还没有能力建造严格意义上的新建筑柱式，至少应该使传统的建筑柱式以更新颖的方式优雅地适应新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



《李尔王》，E.A.阿比绘

现在，美国的城市建筑已经有了显著进步，外观或轮廓开始呈现出优美、古色古香的特点。以前，具有这种特点的建筑只属于旧大陆。建筑的整体效果对具有艺术眼光的人来说非常亲切。拥有艺术美的建筑实例有很多，譬如，从斯古吉尔河东岸的火车站向费城看去，可以看到以美术学院为中心的一组尖顶和圆顶建筑，这组建筑令人赏心悦目。实际上，每一座建筑的位置都是设计大师精心选择的。二十年前，美国根本没有具有结构美感与和谐轮廓的建筑。现在，从海港对面的岬角望去，马布尔黑德小巧古朴的渔港突然变成了美国最受欢迎的城市之一。这座城市坐落在山上。市政厅建在山顶，是一座整齐的砖砌的建筑物，最上面有优雅的塔。平凡的老城区忽然变成了风景如画的新区。新的结构产生了聚拢效果，使城市有了自己的特征和对称的轮廓。当太阳落山时，城市的轮廓会更加明显，变成拥有金色背景的和谐浮雕，雾霭中的霞光使整座城市呈现出一种色调。这种景观具有最高级的艺术性，与我们经常看到的旧大陆的一些场景非常相似，甚至让人怀疑自己看到的不是美国的景象。



《斯古吉尔河》，约书亚·H.肖绘

我们在奥尔巴尼新的议会大厦或州众议院发现了范围更广的类似效果。从格林布什的哈德孙河的对岸可以看到奥尔巴尼。奥尔巴尼一直是一座风景怡人的城市，位于几座巍峨群山上。城市被山谷隔开，当夜幕降临时，紫色的阴影萦绕在城市上方。即将竣工的巨大建筑物非常庄严地俯视着城市中的八万居民，使这座城市显得更加壮观。整座城因这一建筑变得更加美丽动人，就像散文变成了诗。欧洲各国的城镇里有一些高耸、庄严的大教堂。千百年来，这些大教堂守卫着集聚在自己下面的建筑物。然而，并不是说奥尔巴尼的这座高大宏伟、风格混杂的建筑物是模仿旧时代的建筑杰作，但与美国以前建造并受到赞赏的城市建筑相比，这座建筑前进了一大步。对奥尔巴尼的居民来说，在一个州的首府出现这样的建筑是具有崇高的教育意义的。

新的艺术运动中，美国建筑师采用的风格主要有罗马风格、文艺复兴时期的帕拉第奥建筑 [4] 风格，法国文艺复兴时的孟莎顶和佩罗风格，以及伊丽莎白一世晚期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风格。一些建筑完全沿袭了上述风格，另一些建筑在这些风格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改变。罗马风格和帕拉第奥建筑风格主要用在市政建筑中，宗教建筑主要用的是帕拉第奥复兴时的风格。伊丽莎白一世晚期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风格主要运用在居民建筑中，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成功运用罗马风格的一座建筑是波士顿后湾区的新三一教堂。这座教堂由阿姆布雷尔和理查森设计，是这片大陆上精心完成的最有价值的建筑之一。但这座教堂如果完

全按最初的设计进行建造也许会更宏伟。教堂的窗台下裸露的巨大石块呈现出的力度显得有一点儿造作，和建筑的其他部分的力度不协调，但并没有影响总体效果。加顶的设计和回廊体现了真正的建筑精神。精心挑选的石块渲染了整体效果，这些石块呈现出的色彩恰到好处。近在咫尺的新老南教堂优雅的塔中有相同的石块。这座塔是皮博迪和鲁滨逊设计的，具有意大利哥特式的风格。在大西洋西岸，没有建筑可以超越这座塔的优雅、美丽和庄严。然而，虽然塔附属的宏伟教堂非常华丽，但粉饰太多，整体风格不够肃穆，与钟楼的比例也不和谐。

十年中，波士顿的各个街区建了很多塔和教堂，这些建筑聚集在一处，呈现出一种自然美。毫无疑问，美国的建筑精神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博伊尔斯顿街和邻近大街上出现了民房建筑的佳作，建筑水平达到了自筑丘人 [5] 消失后从来没有过的高度。建筑的整体美感、品味和舒适度预示着美国建筑的广阔发展空间。随处可见的滴水兽、三角墙、飞檐翘角和雕刻图案将人们带回了中世纪。有趣的是，以前常见的假飞檐逐渐被淘汰，其他一些中看不中用的流行装饰也惨遭遗弃。求真务实的精神不仅表现在外在装饰上，还表现在给美国城市增添了许多乐趣的色感方面。砖既可以用来做实墙和层拱，也可以用来做装饰；条状的彩瓦或赤陶雕刻结实耐用，一般用于私人住宅的外部装饰。



新老南教堂

对美的热爱不仅表现在民房建筑方面，还表现在银行和商店的建筑方面。我们在波士顿发现了一条拥有很多丰富优雅的建筑的街道。这些建筑都是精心建造的，全部用于商业。但在席卷全国的建筑运动中，比其他任何一座建筑更具代表性的建筑是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用红砖建造而成，没有沿袭任何一种传统风格。它不仅结合了现代环境，还综合了哥特式晚期不同流派的风格，表面的赤陶浮雕群缓和了本来会扩展的暖色。分组的拱门、塔楼、凸肚窗以及众多边角和山墙处的赤陶装饰都很优雅，但因分布太广显得有点儿混乱，因此整体效果没有集中在一个或两个中心点上。在沿用外国和古代风格或对传统风格加以调整设计的建筑中，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缺点是我们发现的最严重的建筑错误。查尔斯·巴里爵士设计的新议会大厦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美国和现代英国建筑师共同存在的缺点。本世纪建筑中没有比中世纪的一些壮丽宏伟的大教堂和市政厅装饰更华丽的建筑，但所有的豪华装饰都集中在一两个有效的点上，被一个相对简单且没有任何点缀的空间包围。因此，外形的庄严和高贵得以保留，色彩和雕塑的特殊美不会影响整体效果，也不会让人感到厌烦。美国建筑师并不清楚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

对建筑外部装饰的设计过于分散。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随着建筑质量的提高，室内装饰也逐渐显现出其重要性。精致的木雕进入了美国公民的房屋装饰中，绘画被用来装饰私人和公共建筑物的墙壁，但有时，这些装饰显得有点儿造作奢侈，没有品位。然而，毫无疑问，短短几年内，美国室内装饰有了明显进步。约二十年前，M.布鲁米迪为华盛顿国会大厦做了一幅湿壁画。有趣的是，最近，约翰·拉法基设计的神圣壁画以及其他金色和红色的装饰品美化了波士顿的三一教堂和一些公共建筑的内部。已故的威廉·M.亨特后期创作的最重要的作品是为奥尔巴尼州新议会大厦创作的油画壁画。在这个艺术分支已经表现出潜力的其他艺术家还有弗朗西斯·莱斯罗普和弗兰克·希尔·史密斯。

随着装饰艺术的发展，人们逐渐开始追求奢华，对金属浮雕艺术或金属作品，尤其是对贵金属艺术的需求增加了。因此，我们发现，金属制品的技艺越来越精湛。除了一些素描艺术家取得的成就外，在金属浮雕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也许是美国艺术取得的所有成就中最显著的。金属浮雕艺术在国内外获得了应有的赞誉和不绝于耳的掌声，这一切应该归功于查尔斯·T.格罗让、乔治·威尔金森、佩林和E.C.穆尔等设计师。他们在这一时期最优秀的工匠的帮助下，使美国的金属浮雕艺术在法国博览会上获得了人们的认可。

波士顿、纽黑文、纽约和华盛顿几乎同时出现了艺术博物馆或美术馆，虽然建造这些博物馆和画廊花费了很多资金，但当地政府并没有依靠国家资助，这一点表明人们对艺术越来越感兴趣。波士顿和纽黑文的博物馆是提供艺术指导的重要学校，陈列着许多古代造型艺术杰出的精密铸件。

一个伟大民族的艺术觉醒的另一个有力证据是民众对艺术教育的需求。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美国各个地方的主要城市都建了许多艺术院校，满足了人们对艺术教育的需求。早在19世纪初，费城、波士顿和纽约就成立了艺术学院。纽约的艺术学院甚至成为激发人们潜意识中的艺术热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马萨诸塞州师范美术学校在能力出众的沃尔特·史密斯的指导下，一直致力于工业美术的发展。学校的榜样作用极大地促进了大众艺术情感的爆发。公立学校进行艺术义务教育可能会招致很多人的反对，但很少有人反对培养艺术教师。在公立学校增加一项可选的艺术课程对那些家境贫寒却渴望得到艺术指导的学生大有裨益。这些人没有机会利用优秀的艺术学院的资源，譬如库珀研究所、纽约艺术家联盟、美国国家科学院、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或费城艺术学院的资源。可以说，马萨诸塞州师范艺术学校的成立不仅表现了民众对艺术的渴望，还证明该学校是在美国传播艺术知识的强大的代理人。

因此，我们看到，经过一番努力后，艺术突然在美国取得了巨大进步。另一场运动也显著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美国艺术并没有很快得到公众的认可，甚至在一些地区受到了冷遇；但很多迹象表明，我们正处在审美发展的鼎盛期，美国艺术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从本杰明·韦斯特开始，美国画家到欧洲学习和观察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但他们要么因师从那些传统的、日渐衰落的流派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要么还没有能力接受新的艺术大师和流派的方法和原则。一种具有哲学意味的解释可以在指导人类进步的一般规律中找到，但有些人可能会拒绝接受这种解释。因此，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被迫或犹豫不决地沿着前人走过的足迹前行。由于同样的原因，当一个具有非凡才能的艺术家在美国出现时，几乎没有追随者，譬如吉尔伯特·斯图尔特。在艺术方面，他超越了自己所处的时代。但多年来，显而易见的是，一个新的群体进入了美国艺术界，他们强烈要求表达自我，有一定的规模和活力，并通过组织协会、

形成流派、展出作品、向保守派和传统派宣战等方式勇敢挑战大家都尊重或认可的事物。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努力打破常规，将一种新秩序引入美国艺术中。我们仅从改革的角度看待这一运动是不恰当的，因为此时，美国艺术已经获得良好的声誉。此外，考虑到周围的情况，美国艺术与美国文明的其他方面一样，已经进化到一定程度。我们将这一运动作为美国艺术成长中的另一个阶段，当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后，这一运动注定要被更高级的进步运动代替。虽然艺术运动的倡导者证实了一些设想，但这个新团体并没有超越其他流派，也没有理解伟大艺术的所有品质。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艺术流派能够展示、包含艺术的全部可能性，或解释自然与人类的所有真理。未来也许会出现某个通晓各个时代知识的流派，这个流派可以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理解整个艺术领域。但创建这样完美的艺术流派的人还没有出生。宣称自己的艺术包括一切艺术都必须融入情感的艺术家们过于自负，内心虔诚，敬畏艺术，潜心研究，也只能发现丰富艺术世界中的某些真谛。没有什么比艺术更能让人谦卑的了。傲慢与自负迟早会自掘坟墓，但谦卑绝对不会和真诚、热情、进步对立。



库珀研究所

在新的艺术群体形成前，有迹象表明美国艺术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一些艺术家非常希望改革，譬如伊士曼·约翰逊、霍默·马丁和塞缪尔·科尔曼。塞缪尔·科尔曼是一位令人钦佩的油画和水彩画家，他的作品明

暗对比强烈，色彩绚丽。虽然他没有在国外接受艺术培训，但在所有和艺术相关的事物方面，他具有优秀的天主教精神，愿意接受任何流派的优点。本杰明·C.波特精于肖像画的块面刻画，下笔粗犷，色彩效果值得称赞。他的作品是近期的美国艺术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支持改革的艺术家还有温斯洛·霍默、A.H.怀恩特和E.M.班尼斯特，虽然这几位艺术家都是在美国接受的艺术培训，但他们相信影响美国艺术的群体一定会出现，并为此铺平了道路。

R.斯温·吉福德是重要的风景画家之一，他提前利用自身强大的影响力欢迎革新和进步的新群体来到美国，加快了美国艺术对新领域的征服。R.斯温·吉福德曾致力于海景画创作，并创作了很多出色的作品。现在，他仍在创作让人称赞的海景作品。他掌握了大量船舶技术知识，一些海员很赞赏他的轮船作品。他曾在阿尔及利亚逗留，并在欧洲的画廊和工作室学习研究，因此他努力创作的风景画采用的风格很大胆，色彩的调配也很真实。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可以发现法国艺术对他的影响，但他绝没有模仿法国艺术，因为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主题的选择还是创作方法的选取，都很坚持自我。他以遥远的距离和巨大空间为视角，捕捉逐渐缩小隐退的阴郁天空的灰色效果，用阴暗色调描绘德鲁伊[6]精神以及老马萨诸塞州的花岗岩岸萧萧作响的褐色丛生雪松，表达了细腻的情感和雪松暗示出的神秘思想。美国还没有人能超越R.斯温·吉福德。作为库珀研究所的教授，R.斯温·吉福德的影响对美国绘画艺术的未来至关重要。

乔治·英尼斯也是促进美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重要画家之一。他虽然没有在国外的画室学习过，但对艺术真谛的领悟逐渐使他的作品体现出后来欧洲画法的典型特征。起初，他的风格与美国风景画中间流派的风格相似，对细节的处理非常小心谨慎。但乔治·英尼斯的感性以及对艺术哲学原理的认真反思使他的风格变得越来越宏大。他能够更自由地表达自然真理，不再畏手畏脚。处理主题时，尤其是渲染大气的效果时，他的勇敢和洞察力在美国风景画艺术中从未被超越。由于对光与色十分敏感，他在鼎盛时期被列入了艺术大师的行列。他的作品质量并不均等，有时风格明显冲突，因为他完成构图的时间很短，作品充满激情和暗示，然后他带着萦绕在记忆中的遗留物重新审视画作，删去了一些大胆

的想象。对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观察者来说，大胆的笔触为作品增加了力量。



《新贝德福德岩》，R.斯温·吉福德绘

在最新的作品中，乔治·英尼斯表现出越来越倾向现在被称为印象派的风格。印象主义纯粹而简单，正如非常支持这一流派的艺术家呈现出的那样，它试图描绘没有躯壳的灵魂。这种表现方法在另一个世界可能会受到欢迎，但在这个世界，艺术需要支撑灵魂的形体。然而，从哲学的角度考虑，印象派体现了艺术精神的精髓，它试图根据心灵留下的印象再现自然，而不仅仅是描绘留在肉眼中的映像。因此，所有优秀的艺术必须或多或少地有一些受到主观因素影响的迹象。只要艺术通过物质手段表达自我，艺术家就必须对物质的局限性作出让步。当然，在所有艺术中，音乐最接近印象派画家追求的理想。毫无疑问，许多人认为当代印象派画家的一些作品看上去不切实际，但这些作品实际上表现出对外光作用下的色彩效果的独特欣赏力，因此值得关注。然而，这些作品还没有接近成熟状态，这表明艺术家意识到自己仍然无法协调客观和主观、物质和精神阶段的艺术，完美的艺术作品应该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虽然这样的艺术作品十分罕见，但这是艺术家应该保留的理想。目前来说，为我们创作了所谓成品画的艺术家是正确的，他们描绘出了肉眼能够看到的事物。相应地，当艺术家将肉眼看到的事物与精神视觉中意识印象的暗示结合起来时，艺术创作就会达到理想境界。此外，不拘泥于细节的艺术家的创作更具广度，但有时，这类艺术家对自然的描绘是混乱、懒散的，然而目前为止这种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艺术家试图解释艺

术的想象和精神层面。如果二者能达到平衡，不再拘束在意识印象范围内，就可以表现出另一个艺术阶段的一些特征，从而接近艺术的理想目标。约瑟夫·马洛德·威廉·特纳和卡米耶·柯罗都是印象派画家，更早的印象派画家是委拉斯开兹和日本人。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尤其是约瑟夫·马洛德·威廉·特纳和委拉斯开兹最好的作品有使艺术对立的两个极点达成统一的能力，因此他们在艺术界中占据了制高点，并将永远站在这个制高点上。



《拉卡瓦纳山谷》，乔治·英尼斯绘



《内米湖》，乔治·英尼斯绘



《伯克希尔》，乔治·英尼斯绘

迄今为止，可以肯定的是，第三个阶段的绘画艺术开始于已故的威廉·M.亨特，他影响了很多艺术家去学习国外风格，改进了现代美国的设计艺术。1846年，与美国以前的艺术家一样，威廉·M.亨特前往杜塞尔多夫学习，但他对杜塞尔多夫的艺术流派的墨守成规感到不满，于是去了巴黎，成了托马斯·库图尔的学生。威廉·M.亨特是第一个发现、钦慕并模仿让·弗朗索瓦·米勒的人。不知不觉中，他成了一名有强大影响力的艺术家，他的一些狭隘却强烈的个性特征注定会对美国艺术的命运产生巨大影响。后来，他回到了一座非常容易被强大的个性魅力控制的城市——波士顿。波士顿比美国其他任何城市都更乐意将舆论的指引权交给那些它钦慕的人。

威廉·M.亨特先生到巴黎去学习意义深远。在他的影响下，当代艺术家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在国外系统地学习、掌握艺术专业知识，深刻领会艺术基本原理，了解艺术学方面最先进的理论、最新的发现，并将自己的所学传入美国。并非所有到国外学习的美国艺术家都是伟大的，或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具有独特的原创性，但在改进美国艺术教育的方式方面，他们具有一致性。因此，威廉·M.亨特应该被视为美国艺术发展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除非将具有强大个性力量的人视为天才，否则他不能被称为天才，但他对艺术的特点、目标、局限性和可能性有正确的认

识。有时，他表现出的斤斤计较在那些引进新方法、试图创造一个影响圈的人中并不罕见。作为一位集风景画、肖像画、风俗画和装饰画于一身的画家，虽然不能说他的作品以惊人的原创性对整个世界艺术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正确理解了艺术理想的重要性。观察他的作品时，你会觉得他一直试图克服用物质手段表达理想时遇到的种种困难。与大多数著名的美国画家一样，威廉·M.亨特受到了色彩而不是形式的触动。《游泳者》描绘的是一个男孩即将从另一位半浸在池塘中的男孩肩膀上跳下去的情景，池塘被岸边阴郁的树丛包围。有时，这位艺术家用一种令人钦慕的方式综合了各种形状，他对明暗和色彩的处理精致而有力度，色彩和轮廓常常能引发人们的联想。在美国艺术家中，几乎没有人可以与他匹敌。威廉·M.亨特的主要创作手法是法国早期流派的技法，然后加上了个人感觉作为修饰。

然而，威廉·M.亨特最重要的作品与其说是他的绘画作品，不如说是他的影响力。他的身边聚集了一群崇拜者和学生，这些人传播他的观点，模仿他的风格，但很少有人能够取得与他一样的成就。直接从威廉·M.亨特的风格和影响中受益的艺术家有S.T.达拉女士，她以一种低沉、忧郁的笔调生动描绘了灰色的海岸风景。另外还有海伦·M.诺尔顿女士、E.H.巴尔托尔、F.P.文顿和S.S.塔克曼。

威廉·M.亨特的影响力广泛而深远，他引导了许多年轻的学习艺术的学生前往巴黎，甚至还去了慕尼黑。这几年，巴黎和慕尼黑倾向更大胆的艺术手法，因此将准确感知外界的独特风格引入了我国现阶段的艺术中，并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一个人懂得怎样充分表达自我，他的作品的表达效果会更好。



《游泳者》，威廉·M.亨特绘

在许多从国外学习经历中获益、现在居住在波士顿的艺术家中，我们只介绍其中的几位艺术家。约翰·J.恩内金曾在慕尼黑和巴黎的画室学习，他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油画缺少想象力，但在描绘落日灿烂的余晖或低垂的多云天空中不同的灰度时，可以发现他在色彩的处理、明暗的把握以及颜料的调配方面很出色。约翰·J.恩内金多才多艺，他描绘的生活中的人物形象充满活力和清新气息，他的人物画几乎不亚于他的风景画。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大部分作品表现出一种匆忙，因为他没有合理利用自己的能力。他曾在慕尼黑和巴黎学习，并认真研究欧洲所有的艺术流派，拥有坚定独立的理想、极大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在美国艺术的现阶段，约翰·J.恩内金应该有更大的影响力。

我们在E.L.威克斯的作品中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他最显著的特点是强烈的个性，他的作品中充满令人愉悦的闪光效果、让人狂喜的热带风光以及东方建筑和服饰的辉煌灿烂的色彩。这位艺术家具有与拜伦

诗歌中的东方热情类似的情感特质，良好的适应性使他认同了与自己的祖国相对的国家的生活和风景。E.L.威克斯是博纳 [7] 的学生，虽然狂热崇拜现实主义流派——该流派现在受到晚期法国流派追随者的影响，但他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位理想主义者，没有模仿任何流派的风格。这也许对他来说是一种伤害，因为他在掌握专业技术或技法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E.L.威克斯对形状缺乏感知，他的作品常常表现出构图能力不强、颜料使用不透明的缺点，降低了因天才之火产生的灵感创作出来的作品的质量。



《正午的威尼斯》，约翰·J.恩内金绘

J.M.斯通是一座美术博物馆的教授，曾经师从慕尼黑流派，擅长人物描绘，上色构图都彰显出强大的力量，关于狗和马的作品显示了他的艺术天赋。他在陆军服役期间对画马艺术产生了兴趣，可能是受到了战争的启发。C.R.格兰特对色彩和形状有微妙的诗意感觉，他的作品经常带一点儿奇特的幻想，作品的处理手法和主题的选择让人想到了G.H.鲍顿的作品。T.W.戴维是勒菲弗 [8] 的学生，现在定居在波士顿，我们发现他在人物画领域很有潜力，但完全沿袭了杰罗姆 [9] 轮廓鲜明、构图美观的风格，画法有点儿单调。J.福克斯克罗夫特·科尔曾经认真学习了法国风景画鼎盛时期的艺术，但他有独特的个人风格，他的作品逐渐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认可。虽然我们可以在J.福克斯克罗夫特·科尔的作品中看到牛群，但他本质上是一个风景画家。研究他的作品时，我们发现他的作品给人的感觉和印象与卡米耶·柯罗的风景画相似，主要是因为他们大致属于同一格调：作品描绘的主题安静含蓄，只有进行反复观察和

深入思考才能发现他们的作品产生于各自独特的灵感，具有不同的含义和特征。J.福克斯克罗夫特·科尔的风格特点是感情细腻，他对空间和气氛的渲染、田园生活恬淡静谧特点的体现，以及自然中最微妙方面的表达都很细腻，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上色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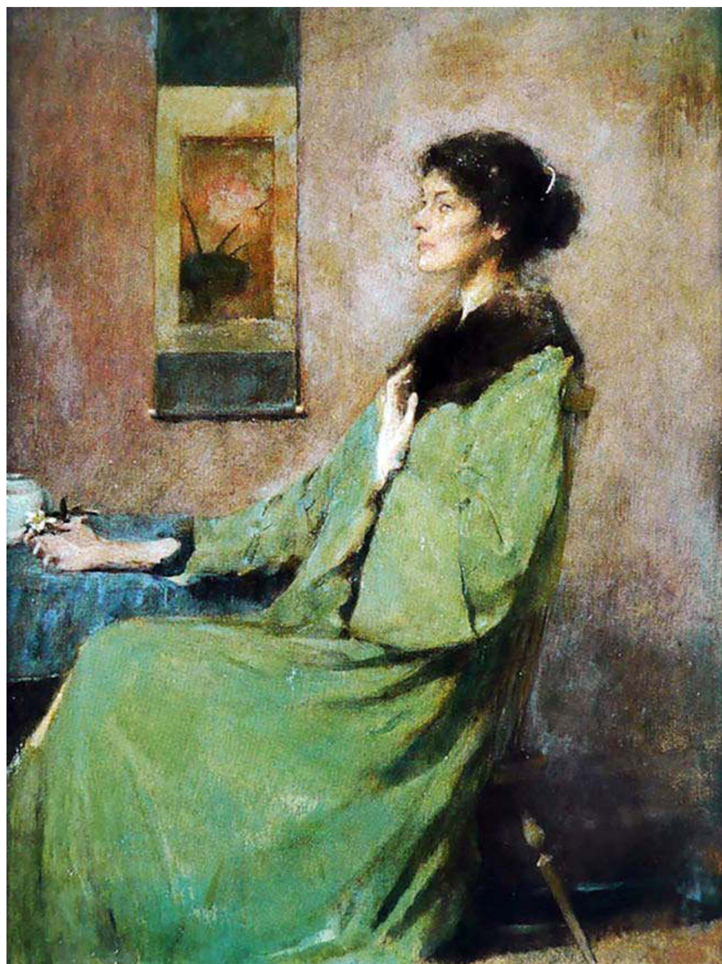
《拉合尔露天餐厅》，E.L.威克斯绘



《摩洛哥城外的驼队》，E.L.威克斯绘



《冬晨散步》，G.H.鲍顿绘



《女人》，T.W.戴维绘

仔细研究波士顿流派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波士顿流派既积极活跃又诚挚认真，但不太成熟。总体来说，当代法国流派对波士顿流派的影响最明显。在意识特征方面，波士顿流派显得非常一致，且乐意效仿美国一流的思想家与艺术家。但当一种影响占据主导地位时并不会产生好的结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种风格的优缺点容易得到过多关注。自由思想受到天主教折衷主义的影响，艺术家们可以学习各种流派的优点，通过与别的风格比较纠正自己风格中的错误，从而深化对自然的研究。因此，对艺术发展中出现问题的见解会更加公正、深刻，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会通过平衡不同流派的优点进行学习，学习的结果不是模仿，而是同化，以此达到健康成长和发展的目的。

纽约的艺术运动似乎基于艺术家们更开阔的艺术视野和更普遍的认同意识，和波士顿的艺术运动一样充满活力，对美国艺术未来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激励作用。在这一方面，和波士顿流派相比，纽约艺术流派中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进一步被分为法国流派和德国流派，艺术家们表现出更强烈的认同意识、广阔的艺术文化视野以及对所有艺术流派的优点的认同，这是在智力改革的曙光中最振奋人心的迹象之一。因此，1870年后，美国确定了向慕尼黑学习的艺术发展趋势，慕尼黑的美国艺术学生群体很快扩大到能够建立一个艺术协会的规模，协会定期举行聚会，展览并讨论参评作品，宣读精心准备的关于艺术主题的论文。人们以豁达直率、热情诚挚和饱含同情的态度交流观点，包容所有人都感兴趣的特殊问题。因此，美国收获了很多注定会影响未来艺术的思想。

我认为在慕尼黑的马克思·伊曼纽尔的咖啡馆里，与一些有才华、有热情的年轻艺术家一起共度美好的夜晚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而且会有很多收获。在那里，几个人会定期聚餐。吃过饭后，每人面前放一个巨大的啤酒壶，然后他们点起烟斗，一圈圈的烟雾使烛光变得柔和，大厅昏暗角落里呈现出雾霭般的诗意，与当时的气氛和谈论的话题完美融合。F.杜韦内克须发蓬松，肩宽背阔，时不时在烟雾缭绕中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整个场景显得很庄重。沃尔特·舍洛严肃沉思的样子和威廉·M.蔡斯深思熟虑的表情偶尔会因一时的动情焕发容光，如果他们对正在讨论的问题感兴趣，就会侃侃而谈，并辅以手势。围桌而坐的其他人或幽默诙谐或言之凿凿，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最近，留学归来后定居在纽约的艺术家中，法国流派的追随者路易·C.蒂法尼地位突出。东方之旅使他找到了一些主题，创作了很多非常优秀的风景画和风俗画。他在水彩画和油画方面也很成功，但现在比较喜欢以美国事物为主题的创作，并将注意力转向了装饰艺术。他本质上是一位五彩画家，对他来说，他看到的色彩就像和谐的和弦音乐的旋律。威廉·萨廷是博纳和伊冯[10]的学生，他擅长着色，作品中的人物和建筑构图准确有气势，在国外创作的作品的构图也十分出色。



《唱歌》，威廉·M.蔡斯绘

查尔斯·米勒的作品表明在外国艺术的影响下，美国艺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查尔斯·米勒曾跟随慕尼黑流派学习，他的内心涌动着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尤其热爱大自然中对比鲜明的场景。在他的作品中，光与影形成了强烈对比，落日灿烂的余晖与天空中巨大的暗灰色云团在雷鸣和昏暗中翻滚，逐渐消失在无尽的远方。查尔斯·米勒以宽广、自由的笔触描绘出了观众想要看到的效果，他的作品很成功，但他的绘图不太有趣。他是一个诗人，想象力丰富，可以将自己看到的事物理想化，并有着和约瑟夫·马洛德·威廉·特纳类似的记忆力，因此他最引人注目的一些作品通常是持久的记忆与用心观察的结晶。他的一些油画作品让人想起了约翰·康斯坦布尔的风景画。

弗雷德里克·迪尔曼曾在慕尼黑学习艺术。他注定要在美国风俗画中留下印记。在色彩和色调，尤其在构图方面，他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他的一些作品表明他很有潜力。J.奥尔登·韦尔和威廉·H.穆尔曼都是很有前途的年轻人物画家，他们代表不同流派对美国艺术的影响。J.奥尔登·韦尔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他的父亲罗伯特·W.韦尔是美国最早的画家之

一。年轻的J.奥尔登·韦尔曾在巴黎学习。他的肖像画作品抓住了人物的特征，人物的眼睛往往画得栩栩如生，非常具有独创性。J.奥尔登·韦尔的风俗画也非常成功，但他倾向风格主义。威廉·H.穆尔曼是辛辛那提人，曾在慕尼黑学习两年。他在慕尼黑没有跟着大师学习，而是通过敏锐的观察全身心投入到水彩画创作中。他在创作中尽量避免使用不透明的颜色，技术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独创性，对形式和色彩都有敏锐的洞察力。他的作品的现实生命力在美国水彩画中显得非常特殊，作品颜色绚丽而纯净。威廉·H.穆尔曼行云流水般的笔法让人钦佩，似乎预示着他将成为这一艺术分支的大师。弗兰克·沃勒、怀亚特·伊顿、韦尔·A.洛、A.P.瑞得、J.H.特瓦克特曼、J.C.贝克威思、A.F.邦纳、海伦娜·德·凯女士、玛丽亚·R.奥基女士都是当时最优秀的艺术家，他们促进了纽约新艺术运动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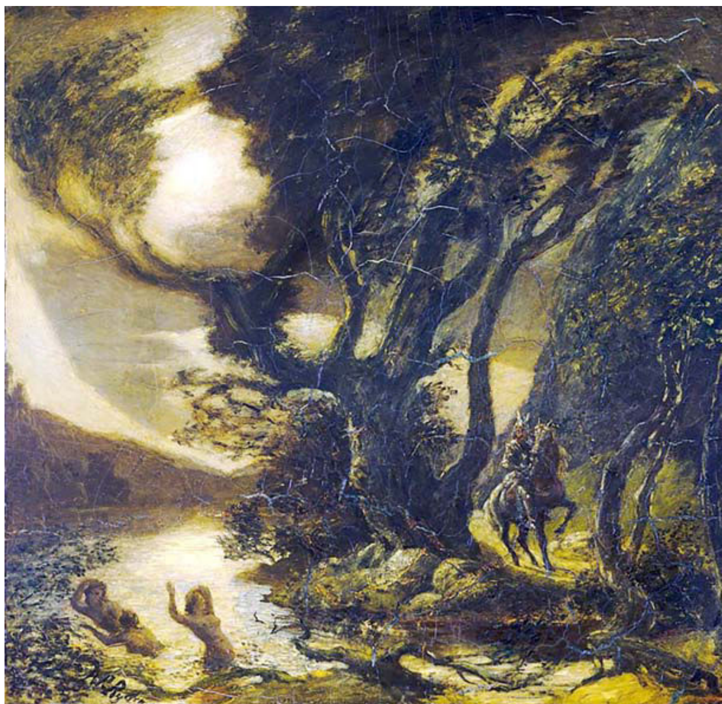


《小狗托比》，弗雷德里克·迪尔曼绘



《滑冰者》，J.奥尔登·韦尔绘

对美国艺术产生了影响且预示着显著成果的晚期事件中，没有比沃尔特·舍洛和威廉·M.蔡斯的回归更值得一提的事件了。沃尔特·舍洛和威廉·M.蔡斯在德国完成学业后回国。虽然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美国艺术一直朝着风景画方向发展；但现在，美国艺术开始朝着人物画方向发展。沃尔特·舍洛和威廉·M.蔡斯的创作有力地证明了美国艺术的发展转向。他们都在人物画方面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他们的影响无疑会成为人物画创作的新推动力。沃尔特·舍洛在学生联盟 [11] 做了一年教授，但现在他放弃了教学工作，因为他认为任何事都不能干扰他的创作。沃尔特·舍洛在曾经培养了弗朗兹·德弗雷格尔、迪耶斯、布赖特和勃兰特等艺术家的学校中接受培训，掌握了慕尼黑在当时可以传授给一位艺术家的关于风俗画方面的所有技术知识。他在色彩处理方面很果断，线条清晰细致，在尝试创作简单作品方面取得了优异成果。他最好的一幅作品描绘的是巴伐利亚一个剪羊毛的人，这幅画吸引了国内外的注意力。他还非常喜欢描绘动物类的作品，尤其喜欢描绘狗和鸟。他钟爱描绘鸟类的生活特征，这一点与日本艺术家很相似。



《齐格弗里德和莱茵河少女》，A.P.瑞得绘



《长岛辛奈考克》，威廉·M.蔡斯绘

威廉·M.蔡斯有艺术天赋，这一点体现在他的单个人物肖像创作方

面。一个事实可以证明他的特立独行。虽然他的老师是皮洛蒂，但他视为卓越楷模的艺术大师是委拉斯开兹。在威廉·M.蔡斯所有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色彩十分敏感，他的做作品《宫廷弄臣》无论是肉体表现出的难以捉摸的微妙色彩，还是大量的红色渲染，都体现了他极好的色感。他创作肖像画时，抓住了人物的特征，作品有时会非常成功，但偶尔也会带有印象派的风格。威廉·M.蔡斯的艺术生活被热烈的情感激发，产生了真正崇高的艺术。《等车》是他精心构思的描绘一位美丽女性的作品。



《宫廷弄臣》，威廉·M.蔡斯绘

费城的新艺术运动有很多强大的盟友，其中最重要的是托马斯·艾金斯，他是杰罗姆的学生，目前是费城艺术学院的一名教授。托马斯·艾金斯最有抱负的绘画作品之一描绘的是解剖学课上的一个外科手术。这幅作品的特点是有很多精湛的艺术特质，然而整体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因

为托马斯·艾金斯是一位令人钦佩的素描画家，所以我们对他在安排人物位置方面的缺陷感到惊讶。在他的这幅作品的群体人物中，母亲显得太小，图中的病人非常模糊，很难看出外科医生正在为病人的哪个部位做手术。这幅作品可能有意使用了单色色调，目的是突出血淋淋的大腿和正在做手术的教授的深红色手指。然而，观众的注意力立刻集中在了那只充满血腥味的难闻的手上，让人觉得这种集中描绘是这幅作品的唯一目的。在里贝拉、勒尼奥以及其他艺术家创作的类似的恐怖绘画作品中，生动的效果并不是通过弱化作品中其他部分的光和色得到的，画面效果既不强烈，也不刺眼。将迄今为止少数几位致力于冷酷主题创作的艺术家的主题，以及将旧大陆的种族主题引入美国艺术中是否合适的问题很可能需要通过公众来判定。在色彩方面，托马斯·艾金斯使用的色调比较低沉，有时几乎是单色调的，但在美国人物素描方面，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他。他的一些肖像画的特点很明显，表现了他卓越的潜力。艾米丽·萨坦致力于创作风俗画和肖像画，并取得很大成功。玛丽·卡萨特小姐的优点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赞扬，因为她的一些作品的色彩十分壮丽，处理手法也很高超，而且构图极佳。

当我们回顾促进美国艺术进步的各种力量时，除了一两个特殊案例，我们发现美国艺术仍然很不成熟。然而，这些影响的合力十分强大，表现出充足的活力，预示着美国艺术事业即将获得成功，艺术注定会发展到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虽然和以前相比，理想的表达成了美国艺术的一个突出特点；但是艺术逐渐朝着现实主义方向发展，并且重视更明确的实用艺术。虽然我们没有在代表新运动的艺术家身上发现明显的原动力，但是他们身上的独立和执著促使他们更有希望实现心中的目标。我们必须依靠这些艺术家的后继者形成一个源自本土的流派，这个流派应该具有更强大的能力，并且更能深谙利用民族素材表达完美的理想。



《摔跤手》，托马斯·艾金斯绘



《池塘戏水》，托马斯·艾金斯绘



《哺乳》，玛丽·卡萨特绘



《洗脚》，玛丽·卡萨特绘

[1] 美柔汀是德国业余雕刻师路德维格·冯·西根（1609—1680）发明的凹版类制版方法，技术上称为“铜版雕刻”。这种制版方法是用特制的、带齿的、称为“摇点刀”的金属工具，将版面做成密密的毛点，然后再通过刮刀和压刀把这些毛点刮平、压平，显出不同的明暗层次，从而制出图像来。美柔汀版画的特点是色调丰富，视觉柔和，极其细腻。——译者注

[2] T.P.戴维斯被称为美国“装饰艺术家”。——原注

[3] 波士顿大火是美国历史上财产损失最大的一次火灾事件。大火始于夏日街商业仓库的地下室。1872年11月9日7时20分开始燃烧，十二小时后火势才被控制。波士顿市区烧毁面积达六十五英亩。七百七十六幢建筑物和很多商业区灰飞烟灭。财产损失达七千三百五十万美元，十三人在火灾中丧生。——译者注

[4]　帕拉第奥建筑是一种欧洲建筑，起源于威尼斯杰出的建筑师安德烈亚·帕拉第奥（1508—1580）设计的建筑。现代帕拉第奥式风格是原始风格的进化。帕拉第奥风格的建筑主要基于古罗马和古希腊古典神殿建筑的对称思想和理念。罗德岛新港的红木图书馆就是帕拉第奥风格的建筑。——译者注

[5]　筑丘人是北美大陆上不同文化的原始居民的统称，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的古居民。他们生活在五大湖、俄亥俄河流域，密西西比河流域及其支流附近。他们在五千年的时间里建造了各种风格的土丘，用于宗教仪式、葬礼等。——译者注

[6]　德鲁伊是古代凯尔特人的上层人士的统称。他们是宗教领袖、执法者、裁决者、探险家和医学家。德鲁伊尽管是有文化的人，但却被禁止以书面形式记录自己的所学。在与他们同时代的罗马人和希腊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德鲁伊的记述。——译者注

[7]　即莱昂·约瑟夫·弗洛伦廷·博纳（1833—1922），法国画家，法国美术学院教授。他创作了很多肖像画。栩栩如生的当代名人肖像是他颇具特色的作品。不过，他最重要的作品是宗教绘画。他还创作了描写意大利农民的风俗画和少量描绘东方场景的风俗画。他的名作有《十字架上的基督》《埃及农妇和她的孩子》等。——译者注

[8]　即朱尔斯·约瑟夫·勒菲弗（1836—1911），法国肖像画家、教育家和理论家。1861年，他获得罗马大奖。1855到1898年，他在巴黎沙龙展出了七十二幅肖像画。1891年，他成为法国美术学院的一员。他的名作有《普里阿摩斯之死》等。——译者注

[9]　即让·莱昂·杰罗姆（1824—1904），法国学院派画家和雕塑家。他的作品题材范围很广，涉及历史、希腊神话、东方民族特征、肖像等。他的作品使学院派绘画达到艺术巅峰。他的名作有《恺撒之死》《奴隶市场》等。——译者注

[10]　即阿道夫·伊冯（1817—1893），法国画家，法国美术学院绘画教师。他师从保罗·德拉罗什，法兰西第二帝国期间成名。1867年，他获得军官勋位。1855年9月，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受政府委

托，绘制了一幅法军在塞瓦斯托波尔抓捕马拉科夫的作品。他的名作有《暗杀尤利乌斯·恺撒》等。——译者注

[11] 即纽约艺术学生联盟。它是1875年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成立的一所艺术学校。创立该联盟的目的是弥补当年国家设计学院课程方面的不足，同时为校外人士以及热爱艺术的人提供长期进修的场所。该联盟在历史上以广泛吸引艺术业余爱好者和专业艺术家而闻名。——译者注

专有名词中英对照

War of Independence　独立战争

Boston　波士顿

Shem Drowne　闪·德朗恩

Cotton Mather　科顿·马瑟

Sir Anthony Vandyck　安东尼·范戴克爵士

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

Sir Peter Lely　彼得·莱利爵士

Sir Godfrey Kneller　戈弗雷·内勒爵士

John Watson　约翰·沃森

Bishop Berkeley　伯克利主教

Yale College　耶鲁学院

Newport　新港

Redwood Library　红木图书馆

John Vanbrugh　约翰·范布勒

John Smybert　约翰·斯米伯特

Washington Allston　华盛顿·奥尔斯顿

New Haven　纽黑文

Blackburn　布莱克本

Cosmo Alexander　科斯莫·亚力山大

John Singleton Copley　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

Robert Feke　罗伯特·费克

Matthew Pratt　马修·普拉特

Benjamin West　本杰明·韦斯特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

Gilbert Stuart　吉尔伯特·斯图尔特

Colonel John Trumbull　约翰·特朗布尔上校

John Vanderlyn　约翰·范德林

Giotto di Bondone　乔托·迪·邦多纳

National Academy of Great Britain　英国皇家学院

William Dunlap　威廉·邓拉普

Departure of Regulus　《雷古鲁斯出发》

Death on the Pale Horse　《死在灰马上》

Death of Wolfe　《沃尔夫之死》

Sir Joshua Reynolds　约书亚·雷诺兹爵士

Conventionalism　因袭主义

Gainsborough　庚斯博罗

Pelham　佩勒姆

Mrs Relief Gill　瑞莉芙·吉尔夫人

Boy and the Squirrel 《男孩和松鼠》

Death of Major Pierson 《皮尔森少校之死》

Death of Chatham 《查塔姆之死》

Charles Wilson Peale 查尔斯·威尔逊·皮尔

Washington 华盛顿

Rembrandt Peale 伦勃朗·皮尔

Jonathan Trumbull 乔纳森·特朗布尔

Connecticut 康涅狄格

Charles I 查理一世

Henrietta Maria 亨丽埃塔·玛丽亚

Saratoga 萨拉托加

John Burgoyne 约翰·伯戈因

Alexander Hamilton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Siege of Gibraltar 《围攻直布罗陀》

Death of Montgomery 《蒙哥马利之死》

Battle of Bunker Hill 《邦克山战役》

Academy of Fine Arts of New York 纽约艺术学院

Rhode Island 罗德岛州

Narragansett 纳拉干西特镇

Cosmo Alexander 科斯莫·亚力山大

George Chambers　乔治·钱伯斯

Caesar　恺撒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

Goethe　歌德

Franklin　富兰克林

Salem　塞勒姆

Judge Story　斯托里法官

Mrs Forrester　福里斯特夫人

Gilbert Stuart Newton　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牛顿

Halifax　哈利法克斯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James Frothingham　詹姆斯·弗罗辛厄姆

Colonel Henry Sargent　亨利·萨金特上校

Landing of the Pilgrims　《朝圣者登陆》

Plymouth　普利茅斯

Court of Death　《死亡法庭》

Babies in the Wood　《树林中的宝贝》

John Wesley Jarvis　约翰·卫斯理·贾维斯

Thomas Sully　托马斯·萨利

Sir Thomas Lawrence　托马斯·劳伦斯爵士

John Naegle　约翰·内格尔

Christ Rejected　《被拒绝的基督》

Ariadne　《阿里阿德涅》

Dead Man Restored to Life　《死人复活》

Aaron Burr　亚伦·伯尔

Theodosia Burr Alston　西奥多西娅·伯尔·阿尔斯通

Marius Among the Ruins of Carthage　《迦太基废墟中的马略》

John Fraser　约翰·弗雷泽

Ray Green　雷·格林

Providence　普罗维登斯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

Waccamaw　沃卡莫

Uriel in the Sun　《阳光下的乌列》

Jeremiah　《耶利米》

Venetian school　威尼斯画派

National Academy of Design　国家设计院

Thomas Birch　托马斯·伯奇

Patience Wright　佩兴丝·赖特

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

North American Review　《北美评论》

Dark Ages　黑暗时代

Gericault　齐利科

Rousseau　卢梭

Constant Troyon　康斯坦·特罗荣

Delacroix　德拉克鲁瓦

William Turner　威廉·特纳

Ciracchi　塞拉基

Wilkie　威尔基

John Constable　约翰·康斯特布尔

Salvator Rosa　萨尔瓦多·罗萨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

Bowdoin College　鲍登学院

William Cowper　威廉·柯珀

Byron　拜伦

Wordsworth　华兹华斯

William Cullen Bryant　威廉·卡伦·布莱恩特

Washington Irving　华盛顿·欧文

James Fenimore Cooper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

Chester Harding　切斯特·哈丁

Robert Walter Weir　罗伯特·沃尔特·韦尔

Thomas Cole　托马斯·科尔

Thomas Doughty　托马斯·道蒂

Asher Brown Durand　亚瑟·布朗·杜兰德

Alleghany　阿勒格尼

Pittsburgh　匹兹堡

Francis Alexander　弗朗西斯·亚力山大

Samuel Waldo　塞缪尔·瓦尔多

Henry Inman　亨利·英曼

Charles Loring Elliott　查尔斯·罗林·埃利奥特

Thomas Hicks　托马斯·希克斯

Thomas Le Clear　托马斯·勒·克利尔

Daniel Huntington　丹尼尔·亨廷顿

William Page　威廉·佩奇

Joseph Ames　约瑟夫·埃姆斯

Miss Sarah Goodrich　萨拉·古德里奇小姐

Henry Peters Grey　亨利·彼得斯·格雷

Judgment of Paris　《巴黎审判》

Mercy's Dream　《默西的梦想》

Sibyl　《女预言家》

William Sidney Mount　威廉·西德尼·芒特

Long Island　长岛

Long Story　《漫长的故事》

Bargaining for a Horse　《谈马价》

Huguenot　胡格诺派

Sailing of the Pilgrims　《朝圣者的远航》

Red Jacket　《塞内卡酋长“红夹克”》

Taking the Veil　《揭开面纱》

Steubenville　斯托本维尔

Monongahela　莫农格希拉

Claude　克劳德

Bunyan　班扬

Scott　司各特

Course of Empire　《帝国兴衰》

Desolation　《荒芜》

Musidora　《慕茜陀拉》

Corcoran　科克伦

Edge of the Forest　《森林的边缘》

Bay of New York　《纽约湾》

Prince of Wales　威尔士亲王

Frederick Edwin Church　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

John Lafarge　约翰·拉法基

Elihu Vedder　伊莱休·维德

Herbert Spencer　赫伯特·斯宾塞

Emanuel Gottlieb Leutze　伊曼纽尔·戈特利布·洛伊策

Düsseldorf　杜塞尔多夫

Worthington Whittredge　沃辛顿·惠特里奇

Achenbach　阿亨巴赫

Valley of the Pemigewasset　《佩米格瓦塞特山谷》

New England landscape　新英格兰风景画

Atchafalaya　阿查法拉亚湖

Jersey　泽西

Chelsea　切尔西

David Johnson　大卫·约翰逊

Green Mountains　格林山脉

William Cowper　威廉·库珀

Thompson　汤普森

Antwerp　安特卫普

Birket Foster　勃克特·福斯特

George Inness　乔治·英尼斯

Samuel Colman　塞缪尔·科尔曼

William Hart　威廉·哈特

James Hart　詹姆斯·哈特

Horace Robbins　贺拉斯·罗宾斯

Arthur Parton　亚瑟·帕顿

James Smillie Jun　小詹姆斯·斯迈利

George Smillie　乔治·斯迈利

Persia　波斯

Peru　秘鲁

Far West　远西地区

Hudson　哈德孙河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

St. Pierre　圣彼埃尔

CHâteaubriand　夏多布里昂

Old World　旧大陆

New World　新大陆

Raleigh　罗利

Balboa　巴尔博亚

Catskills　卡茨吉尔

Cotopaxi　《科多帕希火山》

Heart of the Andes　《安第斯山脉的心脏地带》

Niagara 《尼亚加拉》

Mediterranean 地中海

Parthenon 帕特农神庙

Ægean 《爱琴海》

Snow in Hyde Park 《海德公园的雪》

William Bradford 威廉·布拉德福德

Labrador 拉布拉多

Charles Temple Dix 查尔斯·坦普尔·迪克斯

Portland 波特兰

Harry Brown 哈里·布朗

James Hamilton 詹姆斯·汉密尔顿

Denner 《登纳》

William Hayes 威廉·海因斯

James Beard 詹姆士·比尔德

Spartan 斯巴达

Dance of Silenus 《西勒诺斯的舞蹈》

Bears on a Bender 《酗酒的熊》

Hogarth 贺加斯

Erskine Nicol 欧斯金·尼科尔

Thomas Couture 托马斯·库图尔

General Meade 《米德将军》

Richard Caton Woodville 理查德·凯顿·伍德维尔

Kennedy 肯尼迪

Street 斯特里特

Whittier 惠蒂尔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亨利·华兹渥斯·朗费罗

Prairies 《大草原》

Evangeline 《伊凡吉林》

George Catlin 乔治·凯特林

Charles Deas 查尔斯·迪斯

Republican Court 《共和宫廷》

Battle of Gettysburg 《葛底斯堡战役》

Godiva 《戈黛娃》

Iconoclast 《叛逆者》

Washington at Princeton 《华盛顿在普林斯顿》

Emigration to the West 《西迁》

Washington Crossing the Delaware 《华盛顿渡过特拉华河》

Albany 奥尔巴尼

Andover Seminary 安多佛学院

Venus Rising from the Sea 《维纳斯从海上升起》

Charles Brockden Brown　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

Judd　贾德

Nathaniel Hawthorne　纳撒尼尔·霍桑

Allan Poe　爱伦·坡

Venetian Dancing Girl　《跳舞的威尼斯女孩》

la Regina　《雷吉娜》

Lair of the Sea-Serpent　《海蛇的巢穴》

Death of Abel　《阿贝尔之死》

Lost Mind　《失落的心灵》

Paradise at Newport　《新港乐园》

Keats　济慈

Tennyson　坦尼森

Trinity Church　三一教堂

Mr Lathrop　莱思罗普先生

Rocky Mountains　落基山脉

Columbia River　哥伦比亚河

Yellowstone Park　黄石公园

Taylor　泰勒

Fremont　弗里蒙特

Sierra Nevada　内华达山脉

Albert Bierstadt　艾伯特·比尔施塔特

Thomas Hill　托马斯·希尔

Thomas Moran　托马斯·莫兰

General Lander　兰德将军

Fitz Hugh Ludlow　菲茨·休·勒德洛

Yosemite Valley　《约塞米蒂谷》

Mount Rosalie　罗莎莉山

Taunton　陶顿

Fontainebleau　枫丹白露

Tartarean gorges　地狱峡谷

Jervis McEntee　杰维斯·麦肯蒂

Syria　叙利亚

Homer Martin　霍默·马丁

Corot　柯罗

Ernest Longfellow　欧内斯特·朗费罗

Trout Brook Shower　《鳟鱼溪阵雨》

Making Sail after a Storm　《暴风雨后起航》

After the Collision　《碰撞后》

Ship Running before a Squall　《船在暴风前航行》

Fog-Horn　《雾笛》

Crossing the Grand Banks 《穿越大沙洲》

Arthur Quartley 亚瑟·夸特利

Storm off the Isles of Shoals 《沙洲上的风暴》

Charles Parsons 查尔斯·帕森斯

Gilbert Burling 吉尔伯特·伯林

Miss. Susan Haler 苏珊·海尔女士

Henry Farrar 亨利·法勒

End of the Game 《比赛结束了》

Annapolis 安纳波利斯

Marcus Waterman 马库斯·沃特曼

Gulliver at Lilliput 《格列佛在小人国》

Forging the Shaft 《锻造轴》

Cincinnati 辛辛那提

Yankee Doodle 《扬基歌》

Jim Bludsoe 《吉姆·布鲁杜》

Artemus Ward 阿蒂莫斯·沃德

Walt Whitman 沃尔特·惠特曼

Baltimore 巴尔的摩

Nice 尼斯

Scheveningen 斯海弗宁恩

Grand Menan　大米南

Etretat　埃特尔塔

Ruskin　罗斯金

St. Paul　圣保罗

Gilbert Gaul　吉尔伯特·高卢

Martin Johnson Heade　马丁·约翰逊·海德

Van Huysams　范·惠萨姆斯

Walter Satterlee　沃尔特·萨特利

Virgil Williams　维吉尔·威廉姆斯

Waiting for the Bathers　《等待沐浴者》

Eastman Johnson　伊斯特曼·约翰逊

Winslow Homer　温斯洛·霍默

Old Stage-Coach　《老马车》

Cotton Pickers　《摘棉花的人》

George Fuller　乔治·富勒

Rommany Girl　《吉普赛姑娘》

Hawthorne　霍桑

William Magrath　威廉·玛格拉斯

Bonheur　博纳尔

Schreyer　施莱尔

Henry Peters Grey 亨利·彼得斯·格雷女士

Echo 《回声》

William Henry Furness 威廉·亨利·弗内斯

Darius Cobby 大流士·科布

Rufus Choate 《鲁弗斯·乔艾特》

Prisoners to the Front 《囚犯到前线》

Julian Scott 朱利安·斯科特

In the Cornfield at Antieta 《在安蒂特姆玉米地》

Electoral Commission 《选举委员会》

Wordsworth Thompson 华兹华斯·汤普森

Charles Gleyre 查尔斯·格莱尔

Peter Moran 彼得·莫兰

Thomas Robinson 托马斯·罗宾森

Frans Snyders 佛兰·斯奈德斯

Morland 莫兰德

Sir Edwin Henry Landseer 埃德温·亨利·兰西尔爵士

George Inness Jun 小乔治·英尼斯

Fidelia Bridges 菲蒂利亚·布里奇斯

Frank Rogers 弗兰克·罗杰斯

A Race for Life 《生命的赛跑》

Alexander Pope　亚历山大·蒲柏

Julia Dillon　朱莉娅·狄龙

Henshaw　亨肖

Michelangelo　米开朗基罗

Jove　朱庇特

Thorwaldsen　托尔瓦德森

Flaxman　弗拉克斯曼

Faneuil Hall　法尼尔大楼

New Jersey　新泽西

Bordentown　博登敦

Patience Wright　佩兴斯·赖特

William Rush　威廉·拉什

Fairmount　费尔芒特

John Wells　约翰·威尔斯

Greenwood　格林伍德

Mount Auburn　芒特奥本

Hezekiah Augur　赫齐卡亚·奥格尔

Hiram Powers　海勒姆·鲍尔斯

Horatio Greenough　霍雷肖·格里诺

Shobal Vail Clevenger　肖巴尔·维尔·克莱文杰

Thomas Crawford　托马斯·克劳福德

Clark Mills　克拉克·米尔斯

Green Mountains　青山山脉

Nicholas Longworth　尼古拉·朗沃思

Noah Webster　诺亚·韦伯斯特

Marshall　马歇尔

Greek Slave　《希腊奴隶》

Penseroso　《沉思》

Fisher Boy　《渔家少年》

Proserpine　《普洛塞尔皮娜》

John Gibson　约翰·吉普森

Antonio Canova　安东尼奥·卡诺瓦

Paradise Lost　《失乐园》

Bunker Hill Monument　《邦克山纪念碑》

Fenimore Cooper　费尼莫尔·库珀

Rescue　《拯救》

Joel Tanner Hart　乔尔·坦纳·哈特

Angelina　《安吉丽娜》

Woman Triumphant　《胜利的女人》

Richmond　里士满

Munich　慕尼黑

Orpheus　俄耳甫斯

Tartarus　塔尔塔罗斯地狱

Eurydice　欧律狄刻

Liberty　《自由女神》

Aztec　阿兹特克

Randolph Rogers　伦道夫·罗杰斯

Thomas Ball　托马斯·鲍尔

Winfield Scot　温菲尔德·斯科特

Verrocchio　韦罗基奥

Book of Job　《约伯记》

Ruth　《路得记》

Lincoln Park　林肯公园

Emancipation　《解放》

General Thomas　托马斯将军

Indian Hunter　《印第安猎人》

Newburyport　纽伯里波特

Benjamin Paul Akers　本杰明·保罗·埃克斯

Pearl Diver　《潜水采珠人》

St. Elizabeth　《圣伊丽莎白》

Marble Faun 《玉石雕像》

Eve Repentant 《夏娃悔改》

Ganymede 《伽倪墨得斯》

Hagar and Ishmael 《夏甲与以实玛利》

William Wetmore Story 威廉·韦特莫尔·斯托利

William Henry Rinehart 威廉·亨利·莱因哈特

Launt Thompson 朗特·汤普森

Miss. Harriet Hosmer 哈丽特·霍斯默小姐

Ghiberti 基贝尔蒂

Hartford 哈特福德

Angel of the Resurrection 《重生天使》

Colonel Colt 柯尔特上校

Illinois 伊利诺斯州

Springfiel 斯普林菲尔德

Hammatt Billings 哈马特·比林斯

Martin Milmore 马丁·米尔莫

Franklin Simmons 弗兰克林·西蒙斯

Roger Williams 罗杰·威廉姆斯

Ascending Spirit 《向上的精神》

Kamehameha 卡美哈美哈

Sleeping Babies 《熟睡的婴儿》

Latona and her Infants 《拉托那和她的孩子》

Jerusalem Lamenting 《耶路撒冷悲叹》

Cleopatra VII 《克莉奥帕特拉七世》

Salome 《萨乐美》

Sabina Von Steinbach 萨拜娜·冯·斯坦巴克

Puck 《冰球》

Sleeping Sentinel 《沉睡的哨兵》

Sleeping Faun 《沉睡的农牧神》

Zenobia 《季诺碧亚》

Peter Stephenson 皮特·斯蒂芬森

Una and the Lion 《尤娜和狮子》

Miss Emma Stebbins 艾玛·斯特宾斯女士

Charlotte Cushman 夏洛特·库什曼

Mrs. Hall 霍尔女士

American Magazine 《美国杂志》

Peter Maverick 皮特·马弗里克

James Smillie senior 老詹姆斯·斯迈利

John Marshall 约翰·马歇尔

John Sartain 约翰·萨廷

Robert Hoskin　罗伯特·霍斯金

John Andrew　约翰·安德鲁

Lalanue　拉兰努

Auguste Allongé　奥古斯特·艾隆

Rip Van Winkle　《里普·万·温克尔》

Margaret　《玛格丽特》

Augustus Hoppin　奥古斯都·霍平

Louis Stephens　路易·斯蒂芬斯

Harry Fenn　哈利·芬恩

Alfred Fredericks　阿尔佛雷德·弗雷德里克斯

Jessie Curtis　杰西·柯蒂斯

Mary Halleck Foote　玛丽·哈勒克·富特

Gustave Courbet　居斯塔夫·库尔贝

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

Shepherd　谢波德

Sol Eytinge　索尔·艾金格

Merrill　梅里尔

Walter Shirlaw　沃尔特·舍洛

Francis Lathrop　弗朗西斯·莱斯罗普

Robert Lewis　罗伯特·刘易斯

Charles Perkins　查尔斯·帕金斯

Howard Pyle　霍华德·派尔

Thomas Nast　托马斯·纳斯特

Joseph Kepler　约瑟夫·开普勒

Schuylkill　斯古吉尔河

Marblehead　马布尔黑德

Greenbush　格林布什

Romanesque　罗马风格

French Renaissance　法国文艺复兴

Mansard　孟莎顶

Perrault　佩罗

Elizabeth I　伊丽莎白一世

James I　詹姆士一世

Gambrel　阿姆布雷尔

Richardson　理查森

Old South Church　新老南教堂

Peabody　皮博迪

Robinson　鲁滨逊

Italian Gothic　意大利哥特式

Boylston Street　博伊尔斯顿街

Frank Hill Smith　弗兰克·希尔·史密斯

George Wilkinson　乔治·威尔金森

French Exposition　法国博览会

Walte Smith　沃尔特·史密斯

Cooper Institute　库珀研究所

Artists' League　艺术家联盟

National Academy　美国国家科学院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Druid　德鲁伊

Camille Corot　卡米耶·柯罗

Velasquez　委拉斯开兹

Jean-Francois Millet　让·弗朗索瓦·米勒

Bathers　《游泳者》

Max Emanuel　马克思·伊曼纽尔

William Sartain　威廉·萨廷

Yvon　伊冯

Charles Miller　查尔斯·米勒

John Constable　约翰·康斯坦布尔

Frederick Dielman　弗雷德里克·迪尔曼

Frank Waller　弗兰克·沃勒

Wyatt Eaton　怀亚特·伊顿

Helena De Kay　海伦娜·德·凯

Franz Defregger　弗朗兹·德弗雷格尔

Diez　迪耶斯

Braith　布赖特

Brandt　勃兰特

Bavaria　巴伐利亚

Piloty　皮洛蒂

Court Jester　《宫廷弄臣》

Waiting for the Ride　《等车》

Thomas Eakins　托马斯·艾金斯

Ribeira　里贝拉

Regnault　勒尼奥

Emily Sartain　艾米丽·萨坦

Mary Cassatt　玛丽·卡萨特

Augustus Saint-Gaudens　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

Adoration of the Cross by Angels　《天使崇拜十字架》

St. Thomas's Church　圣托马斯教堂

Astor Reredos　《阿斯特屏风》

Dr. William Rimmer　威廉·瑞默博士

Gladiator　《角斗士》

Anacreon　阿那克里翁



新

新美国：

从门罗主义、泛美主义到西奥多·罗斯福新国家主义的蜕变

THE NEW NATION

Frederic L. Paxson

[美] 弗雷德里克·洛根·帕克森 著　刘岚 译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美国：从门罗主义、泛美主义到西奥多·罗斯福新国家主义的蜕变 /（美）弗雷德里克·洛根·帕克森著；刘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1

（华文全球史）

ISBN 978-7-5075-5017-7

I．①新… II．①弗…②刘… III．①美国 - 历史 IV．①K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8872号

新美国：从门罗主义、泛美主义到西奥多·罗斯福新国家主义的蜕变

作　　者：［美］弗雷德里克·洛根·帕克森

译　　者：刘岚

选题策划：

插图供应：029-85504182

责任编辑：董云梅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1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29.75

字　　数：386千字

版　　次：2019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5017-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作为一个崭新的国家出现，然而它与这场灾难之间的联系却纯属偶然。诞生于冲突与重建时期的《宪法》本质上并未发生改变。19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发展孕育出一个新型社会。到了1885年，这个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国家性质了。南北战争后，美国历史与其作为国家存在的事实和建立在州自治和联邦主义基础上的旧法律体系之间的冲突紧密相关。美国的未来取决于能否找到一种重新调整政府结构与职能的良方，以满足人民对于新生活的需求。本书旨在讲述19世纪下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并揭示这段历史与国家发展这个更大的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

弗雷德里克·洛根·帕克森

目录

序言
第1章　南北战争
第2章　西部与绿背纸币
第3章　南方地方自治的恢复
第4章　1873年大恐慌
第5章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执政
第6章　商业与政治
第7章　新议题
第8章　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
第9章　最后的边疆
第10章　垄断资本主义
第11章　农村、农民与农业
第12章　新南方
第13章　平民主义
第14章　自由铸造银币运动
第15章　反改革运动
第16章　美西战争
第17章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
第18章　大企业
第19章　黑幕揭发运动
第20章　新国家主义
专有名词英汉对照
返回总目录

第1章　南北战争

美国在南北战争中取得的军事胜利维护了联邦的统一，但不得不在政治、金融、商业等方面做出调整，并在随后多年中转变了国家公共事务的发展方向。在当代人的眼中，这样的改变被残酷的战争场面所掩盖——对于那一代的美国人而言，战争的画面给他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当时，战争仿佛成了全部，仿佛共和党保卫了这个国家，仿佛这个国家自己从重重压力与危机中挣脱，展露出新的羽翼。然而，历史事实与亲历者眼中的真相往往并不吻合。与美国其他任何发展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历史事实与幸存者口中的真相出入最大。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美国人民必须面对的现实是执政党既没能拯救这个国家也没能拯救它自己。执政党唯一做到的只是改变了自己的身份。战争期间，美国的经济和工业从未减缓前进的步伐。应新经济的需要，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了。

1861年，在前辉格党和民主党基础上创立的共和党在两次全国竞选活动中培养了年轻的领袖。共和党失去了接受新生活第一波冲击的机会，而正是这种新生活使共和党作为一个反对奴隶制扩张的政党而重获新生。从1856年到1860年间，时代发展的特征日渐清晰，许多政治家开始改头换面。这种变化的产生与其说是源自道德准则，不如说是野心使然。林肯执政后，政治家们纷纷要求回报。19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伦理并没有将利用官职捞取私利视为耻辱。林肯总统虽然厌恶那个时代通过谋求公职榨取私利的行为，但似乎并未意识到政党分肥制与善政基本原则的格格不入。

不可否认的是，一届由共和党领导的政府承受了美国内战带来的第一波冲击。当时，共和党的力量还相对薄弱，林肯总统意识到美国不能仅仅依靠一个政党。因此，培养一种普遍的联邦情感就成为林肯早期政策的目标之一和整个林肯时代的关键。他不得不去考虑并调和共和党人的不同主张，从最激进的废奴主义到纯粹的联合主义。在民主党方面，从强烈的民主党主战派到铜头蛇[1]，主张千差万别。



亚伯拉罕·林肯

为了赢得美国选民中的有效多数，必须考虑接纳愿意联盟的民主党人。林肯总统开始稳步放松党派限制。1862年，国会选举结果显示，当时他离成功还很远。他针对交界南部各州民主党的提案与他的总体方案基本一致。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和埃德温·麦克马斯特斯·斯坦顿都是坚定的民主党人。林肯总统对前者的容忍和对后者的支持则展现了他对属下的宽容和凡事能综合考量的用人智慧。在1864年的选举中，他不仅需要通过游说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还需要得到自己所属党派——共和党——的提名。

1864年，很多人持反战态度，认为林肯总统是个失败者。民主党和平派谴责他为军事独裁者。共和党激进派认为，他优柔寡断。就连他的内阁成员也时有不和。面对这样的局面，任何一个稍微不淡定的人都可能撑不下去。一直做着总统梦的财政部长萨蒙·波特兰·蔡斯，一方面默许支持者帮自己密谋，另一方面却并没有从竞争对手的顾问团中退出。萨蒙·波特兰·蔡斯三番五次以辞职相要挟。林肯总统都对其不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把他劝回来继续任职。直到再次被提名为总统，林肯总统才接受了萨蒙·波特兰·蔡斯的辞职申请，还想任命他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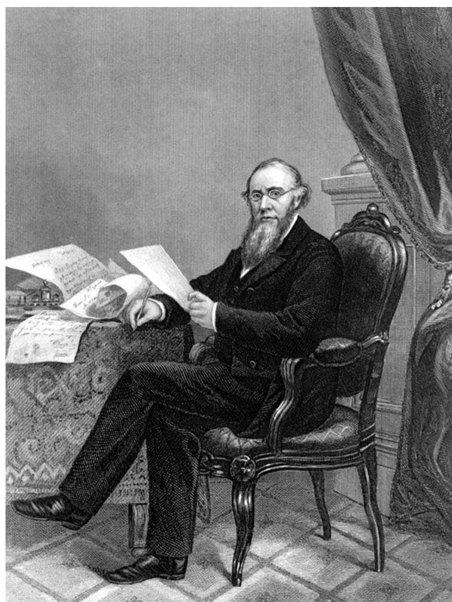
萨蒙·波特兰·蔡斯作为总统的内阁成员，却与对政府不满的共和党勾结，对政府公正构成了威胁。第一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没有萨蒙·波特兰·蔡斯这么能制造麻烦，但闹出的动静也不小。自

1861年林肯将他从军事要职上撤下来后，他就一直心存不满。1864年5月，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召集了很多极端废奴主义者密谋支持自己做总统。1864年11月选举开始前，这一异动就以失败告终。

1864年6月7日，共和党在巴尔的摩召开了代表大会。萨蒙·波特兰·蔡斯未能获得候选人资格，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的威胁也已经可以忽略，林肯连任基本确定。共和党谨慎地隐藏起自己的名字并自称联邦，以争取所有维护联邦统一的党派以及所有以夺取战争胜利为第一要务的民众支持。这样，共和党在事实和名义上就都是联邦了。大会从交界南部各州的民主党代表团中选举产生一位忠于联邦的副总统候选人。1864年，作为执政党的共和党已经远非在1856年抗议《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组织了。它已经拥有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林肯和安德鲁·约翰逊、一个默许保护性关税的政治纲领以及一个有待完善的体制——在该体制下，只有召集代表大会才能确定代表名单。



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与夫人玛丽·埃伦·马尔西



埃德温·麦克马斯特斯·斯坦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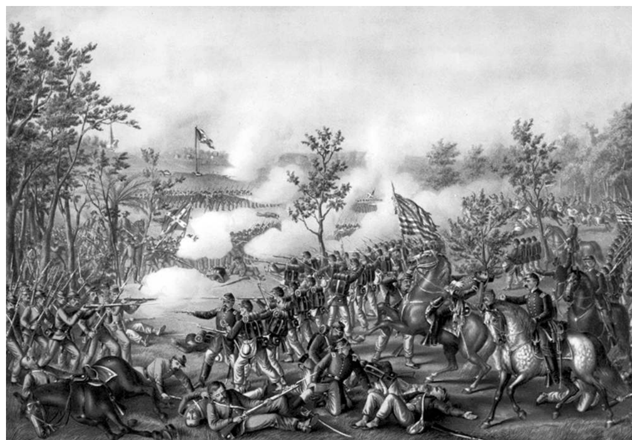
萨蒙·波特兰·蔡斯

民主党的一些过激行为无意中增加了林肯在竞选中的优势，力度丝毫不亚于共和党对林肯的支持。1864年8月，在纽约州长霍拉肖·西摩的主持和克莱门特·莱尔德·瓦兰迪加姆的掌控下，芝加哥民主党总统提名大会不再需要借反战论挫败主张与共和党联盟的民主党人了。就连对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的提名，甚至他违背政治纲领的举动，也未能改变这样

的局面。到底谁会从选举中胜出还是未知数，但可以确定的是，支持联盟、反对分裂成为主题，而选民们会根据自己的希望与担忧来投票。因为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在亚特兰大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戴维·格拉斯哥·法拉格特在莫比尔湾又一次获得胜利，投票一开始，这一主题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帮助联邦候选人赢得了除特拉华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以外其他各州的胜利。

在总统竞选期间，萨蒙·波特兰·蔡斯离开了财政部。在离开之前，他完成了内战财政方面的相关工作，解决了政府的财政困难，并为下一步的财政工作指明了方向。当时，他接受这项工作倒不是因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但很快就掌握了战时财政工作的要领。在报告中，他将国会需要遵循的财政政策基本描述出来，极力主张提高税收以满足民政、债务利息和偿债基金等各项支出的需要。他认为国家不应该逃避眼下的财政负担，战争产生的额外支出应视作联邦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而做出的永久性投资，理应由后辈人承担。因此，他极力主张发行充足的债券来增加财政收入。

第三十七届国会（1861—1863）更倾向于贷款而非征税。1861年以前，美国历史上还未出现过大规模的财政危机。1831年至1861年，美国全年的财政总收入从两千万到八千一百万美元不等，战争爆发时一度高达八千三百万美元，其中四千一百万美元来自贷款而非税收。自1857年大恐慌爆发以来，财政部每年都面临赤字危机，不仅要被迫动用历年结余，还要贷更多款以应对当前需要。关税收入一直都是美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对于战前三年的财政需要来说，这些措施只是杯水车薪。



亚特兰大战役，联邦军取得决定性胜利



莫比尔湾海战，联邦海军取得胜利

如果没有战争，美国这种混乱无序的财政状况可能在1861年就要进行整改并通过增加新税种来缓解了，况且就算采取了这些措施也不可能在1862年或1863年之前起作用。最后美国还是为了应急选择了贷款。1862年，美国贷款总额达到1861年财政总收入的六倍还多；而1865年的贷款总额是1862年的近三倍之多。比起贷款，美国政府似乎更不愿意通过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因为税收带来利益太慢，而且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年，美国税收都没有展示出财政能力。

最受美国青睐的国税种类始终是关税。辅以其他税种（不包括1849年以后的国内税和1839年之后的直接税），关税承担了美国最重的财政

负担。不管各党派的支持程度如何，征收关税是出于贸易保护还是为了财政收入，美国都会继续将关税视为一种重要的财政手段。事实上，当时美国没有其他可用的财政收入来源。正如战争期间，美国军队要想打胜仗就必须不断征募志愿兵，财政部和国会要想将美国的应税资源用于堵上贷款的缺口就必须要研究如何征税。

1861年到1865年期间，美国关税增改多次，终于在1864年取得了1.02亿美元的巨额回报。这是进口量增大和高利率共同作用的结果。像所有经济大恐慌一样，1857年的大恐慌降低了美国人的购买力。艰难时期，奢侈品亏本出售，财政收入锐减。1861年，如果不是战争，美国的商业状况本可以恢复正常。在战争期间，繁荣的北部和西部购买了更多外国商品，根本不考虑价格因素。

关税的税率取决于税收的预期值、保护原则和强加在美国工厂主身上的税务负担。直到1863年，国内税和直接税才引起人们注意。1864年，这两种税的收入超过关税收入，高达1.16亿美元。到了1866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2.11亿美元。消费税、所得税和其他直接税几经更改，税率不断提高，关税的一升再升均源于此。一位美国工厂主宣称，他就是考虑到在与欧洲市场的竞争中会受关税保护才继续经商，却发现自己同时还得背负所得税、以及从事商业交易和商务输出产生的沉重税务负担，只能苦苦抱怨自己所处的尴尬境遇。与他的遭遇一样，外国商人需要面对不断上涨的进口税。到南北战争结束时，美国关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从此基本固定下来，与其说是出于提高财政收入的需要，不如说是为了促使美国生产者继续缴纳国内税。1865年，不到八千五百万美元的税收来自于关税，2.11亿美元则来自于国内税。

就这样通过征税和借贷的方式，1861年美国财政累积了八千八百万美元资金，1862年高达5.89亿美元，1863年为8.88亿美元，1864年为14.08亿美元，1865年为18.26亿美元。1861年以前，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甚微，之后却一跃成为国际信贷的巨头之一。1865年10月，美国欠款高达28.08亿美元，影响了国际金融利率的稳定。这表明，1861年，即使是自负的美国人也未预料这一局面。其中一笔欠款险些对所有欠款的还款保障造成威胁。

1861年，美国很难找到支付贷款和各种费用的实际货币形式，这就像货币所代表的财富一样难以衡量。因为自安德鲁·杰克逊毁掉第二合众国银行之后，美国就没有什么国家货币了，只有少量铸币。当时，造币厂都用金银铸造硬币，而把黄金作为美元的本位。根据1834年的规定，铸币的银金比率为十六比一。金币的实际价值略小于其所能兑换的银币价值。由于人性的规律，这一情况驱使人们保存良币而使用劣币，金币就成了物品交换的度量单位。

但这些铸币并没有广泛地流通开来，而是用于部分政府贸易和银行的实际通货。在美国的各个州，数以百计的州立和私立银行都发行了自己的纸币用于货币流通。理想状态是，从理论上来讲，这些纸币可以按照票面的价值与黄金进行等价交换；最坏的情况是这些纸币全部变成废纸。实际情况是，自1857年大恐慌以来，美国货币多种多样并且一度贬值，内战一开始，这些纸币就成了美国人使用的货币。1861年底前，各大银行就停止用铸币兑换纸币。1862年初，美国财政部暂停了铸币支付。1863年至1879年，流通中的纸币价值就取决于人们对未来某一天能够将纸币再兑换回铸币的期望值。



讽刺漫画：安德鲁·杰克逊毁掉第二合众国银行

在这场危机中，国会授权发行了1.5亿美元的法定纸币以满足财政需要。这种纸币很快以“绿背纸币”的名字为人们熟知，并且成为美国本位币与铸币之间的兑换标准。绿背纸币以票面价值发行，经历了贬值与波动。在1864年最黑暗的时期，一金元可以兑换2.85美元的绿背纸币。这

些钞票还是被称作美元，债权人也不得不接受以美元来还债的方式。同时，这也是一种强制性公债，是从美国人民手里强制贷来的款项。1865年，这项贷款竟高达4.33亿美元。

国债中的绿背纸币威胁到了美国公债的整体信誉度。如果这些美钞以票面价值立即予以兑换，美国政府的信誉并不会下降。但如果绿背纸币以低于票面价值的标准予以兑换，或者美国政府发行更多的纸币，再者政府凭借自己的技术特权大量印制这种“法定货币”以偿还部分公债，那么即使是很少量也可能会使整个美国经济陷入萧条。

1865年以后，美国政治的未来由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和绿背纸币的命运决定。但与之相比，对美国来说，眼下更重要的是要面对一个严峻的事实——在未来的五年里，即将面临高达28.08亿美元的净债务，同时，将通过税收筹得七亿多美元。南北战争之后，一个繁荣的联邦出现了。除了南方以外，美国其他地区都靠这种财富意识逐渐强大起来。



1862年发行的币值一美元的绿背纸币

美墨战争之后，整个美国经历了一段快速发展期。铁路从密西西比河流域一直修到了海岸线。186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美国在十年内总人口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六，但分布不均：与北方和西部地区增长的百分之三十九相比，南方人口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但总体上美国各地人口都在增长。1861年至1871年，尽管内战爆发，美国人口仍持续增长。谁也不曾想到，19世纪50年代，美国历史会因此被改写。二百五十

万美国人至少在三年里被迫离开他们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如果没有战争，三年的时间足够一个青年男子成家立业了。在南方，受战争影响，所有健全的白人几乎都参军了，人口增长还不到百分之九。美国人口从三千一百四十四万三千三百二十一人增加到了三千八百五十五万八千三百七十一人（增幅为百分之二十二），而北方和西部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比南部人口增长最快的十年还多。

如果没有受到1857年大萧条的影响，北方和西部人口还能再增加多少不得而知。当时，北方和西部的铁路、银行、工厂、城市和各行业代理点极为活跃，因此，在大恐慌中，这些地区遭受的损失也最大。工业上遭受的干扰使原本井然有序的北方工业体系变得混乱。相比之下，以耕田为主、拥有大量农村人口和少量铁路的南方情况简单一些，遭受的冲击也小一些。早在战前，南方人就已经把南方在大恐慌之后的免疫能力视为其制度优于其他社会秩序的一种证明。他们误读了那个时代，并预言北方产业组织即将瓦解。

南方先于美国其他地区走出了恐慌时期的阴影。接下来四年的财政收入则展示了联邦各州的财政实力。美国工业也逐渐从萧条中复苏，在战争的炮火声中悄然发展起来，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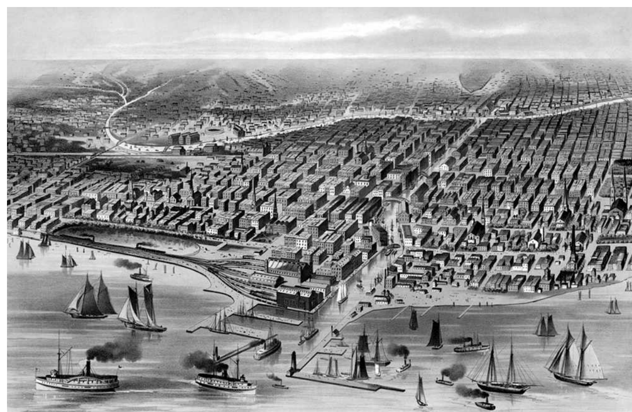
铁路交通给北方各州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857年大恐慌之前，干线铁路网就已经连接起密西西比河与海岸线。1847年至1857年，原来的西北部地区修了近一万英里的铁路。铁路的修建终将影响商业，但直到南方各州脱离联邦，密西西比河河道不能用于西北部地区农产品的出口时，这种影响才得以显现出来。1861年到1862年，从圣路易斯、芝加哥到布法罗、匹兹堡、纽约和费城，美国部分交通运输由新修的铁路来承担。在1863年之前，新修的铁路，尤其是纽约中央铁路、伊利铁路和宾夕法尼亚铁路，都已适应南方强加的贸易需求。自南方脱离联邦后，新奥尔良始终未能重新获得密西西比河河口这样重要地理位置的使用权。

贸易方面的重大转变也促进了北方地区的繁荣发展。为了适应商业新的发展，美国在交通运输方式上做出的改变，除了体现在铁路方面外，还体现在辅助铁路交通的轨道、桥梁、隧道和车站设施的发展上。

经过几年的试验，人们认识到了城市铁路枢纽对大多数铁路线路的重要意义。城市的发展和地价的飙升，尤其是在各市政府及其官员看到铁路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中的利益之后，铁路的建设与发展变得异常困难。19世纪60年代，得益于统一管理，美国铁路发展中表现活跃的主要干线得到了巩固，为北方城市增添了一份繁华与喧嚣。

美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直到其制造业开始形成，通信方式迎来革命，城市人口与资本的集中让美国尝到了甜头。从1850年到1880年，美国超过五万人口的城市增加了一倍多。房屋建造、水电照明和社区排污等工程的实施，给工人们带来了就业机会。随着城市的发展，日渐拉远的距离给有轨电车公司带来了商机，而电车公司对公共街道的占用让政府官员从中看到了诱惑和机会。不断发展壮大的制造业使城市群体得以扩大，增加了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乡村生活悄然发生变化。从开荒发展起来的务农家庭，数代以来一直作为美国典型的社会单元存在。来自城市的诱惑吸引了许多农村家庭的子女到工厂工作。传统的国内产品无论在质量、外观还是价格上都不能与新型工厂的产品相媲美。农民放弃了屠宰业和黄油制造业，就像他们曾经放弃纺织业一样，更加专心地投入到作物种植上。机械进步同样改变了乡村生活。农业机械进入通用领域，新修的铁路把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带到因新兴城市而诞生的市场中。



19世纪70年代的芝加哥



19世纪60年代的布法罗

1860年到1870年之间，美国工人数量增加了一半多，投入的资金和产出的货物翻了一番还多。美国第一次期望有一天能生产出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从芝加哥、圣路易斯、纽约、波士顿、费城到许许多多其他的美国城市，美国人在开发资源方面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食品的生产方式开始从家庭作坊式向城镇工厂式转变，给紧邻农田生鲜产区的城市带来了优势。从西北部地区的面粉加工厂、芝加哥和其他地区的肉类加工厂到伊利诺伊州中部的酿酒厂无一不是对美国主要农产品进行加工然后出口。工厂的出现使各地政府，无论东部还是西部，都被城市的飞速发展、警察权力和善政问题折腾得狼狈不堪。大量的乡村向城市过渡，而美国宪章关于这种处于“半农”状态乡村的说明已不足以应对现在的情况。

得益于伊莱亚斯·豪发明的缝纫机以及戈登·麦凯发明的机械制鞋技术，与食品生产一样，服装生产也走向了工厂。早在战前，这种变化的影响就表现在对棉花日益增长的需求上了。东部的纺织品生产区，包括福尔里弗和费城一带，以及林恩一带的制鞋工厂，迎来了大发展的时代。

机械化生产刺激了对煤和铁的需求，便利的交通将资源运送到需要的地方，熔炉和轧钢机也在此安营扎寨。19世纪60年代中期，亨利·贝塞麦引领了用钢铁进行工业化生产的热潮，标志着铁路、桥梁以及公共和私人建筑革命的开始。匹兹堡成为钢铁工业的中心城市，能掌控这里的年轻人也就掌握了美国商业的未来。在所有行业中，新兴行业是汽油和油品贸易。1864年，仅在匹兹堡完成的油品交易额就高达一千五百万。

伴随着不断发展的支线铁路，在战争早期，各干线铁路就适应了商业的新发展，将新的居民带到城市，将新的产品运到相应的市场，促进了钢铁、煤矿和木材的供应。商人们注重与时俱进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为他们即将取得的巨大财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股份公司拥有可流通股份和债券，让小投资者可以在更大的舞台上共享商业利润，同时可分担相应的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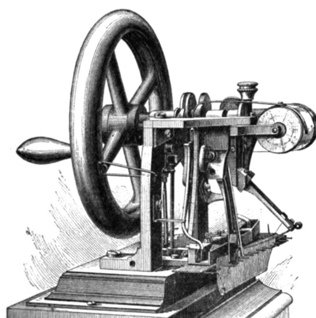
公司的经营和整个商业的发展需要依赖健全的法律体系，而当时美国的法律体系只是适用于小企业和地方贸易。不仅公司需要建立自己的惯例和先例，法院、立法机构和市议会也需要修订美国法律以扩大其适用范围。当新生活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全美国时，商人们和法官们的经验已经不足以面对当前的情况。公众对于即将发生的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还不甚了解。当各州尝试规范大公司事务时，各种矛盾难免产生。南北战争之后的半个世纪令美国人困惑，因而不得不去探索解决问题的关键。

伴随着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繁荣，制造业、运输业、都市生活和商业飞速发展。物质主义的表象误导了许多旁观者，但发展的步伐并没有引起当代人的足够关注，因为当时所有报纸的头版都被战争的消息占满了。当时，控制这些报纸的人并不需要接受严格的审查，因而他们将战争时期的主要原则应用于商业与投机活动，坚持目的就是一切，认为目的决定手段。1861年到1865年期间，战争并非美国的全部，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已然开启。不过，在美国人眼中，物质也常常给利他主义和理想服务观念让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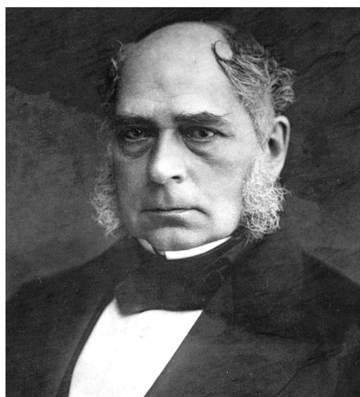
战争早期，许多农业类院校得到了国会的资助，而各州立大学虽然招收的学生较少，但还是靠着自身努力发展起来。新的大学依靠捐款，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教育体制的建立不仅要适应法律、医疗和科技的发展，还应适应商业、农业、工程和教学方式的进步。这一切都体现了美国民主的现实利益。现实与理想总是相距甚远，美国智慧的领袖们仍将度过一段不容乐观的黑暗时期，但美国民众仍然坚信教育是否成功是衡量政府是否受支持的重要标准，并且他们愿意为此奉献出自己的全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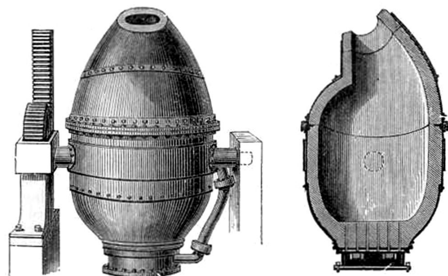
缝纫机的发明者伊莱亚斯·豪



伊莱亚斯·豪发明的缝纫机



亨利·贝塞麦



亨利·贝塞麦改进的贝塞麦变换器，被广泛用于钢铁产业

在四年的南北战争中，美国经历了社会、经济的转型，为之后新的征程做好了准备。政府职能得到了延伸和扩大，促进了公众对政府职能的理解，将来他们认识到政府是一个具备专业技术性的机构，并且必须以科学的方式运转。税务和货币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让那些美国工业的主导者们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随着社会的繁荣发展，联邦获胜成为可能。但当一切结束时，那个对自己的力量和成员并不自信的联邦党则需要面对统一后国家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工业化的北方、荒凉的南方和逐渐消失的边界。

[1] 南北战争中同情南方的北方人。——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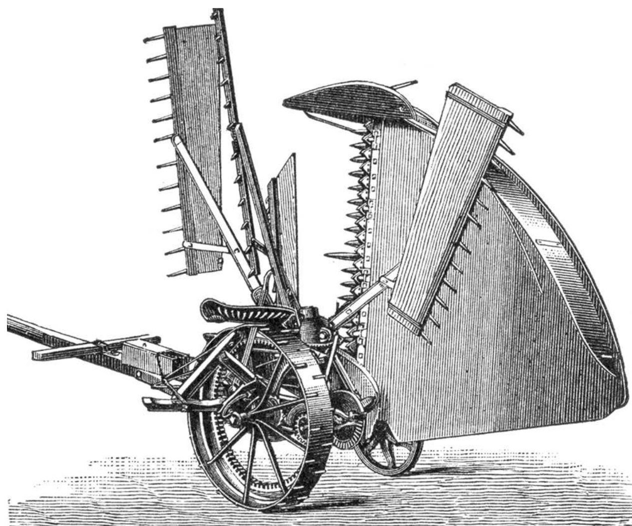
第2章　西部与绿背纸币

1861年到1865年期间，美国西部边疆的新兴社区纷纷效仿北方与东部的发展方式，并将其推而广之。这些社区成立时间从几周到三十年不等。1857年，这些社区以务农为主。在南北战争前，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辛州和堪萨斯州属于边疆地区。随着人口日渐稠密，一些人打破了平静的生活，来到了更加偏远的西部，也就是被称为“美国沙漠”的区域。1868年，国会终于完成了从密苏里河到太平洋沿岸最后土地的进一步划分。至此，一个新的行政区域诞生了。

1857年后开发的最后的边疆是个新兴地区。那里处处都是采矿营地。采矿者在落基山脉到处立桩标划自己的领地，过着无拘无束的日子。1857年之前，大盐湖附近的摩门教徒是堪萨斯东部和加利福尼亚之间唯一一批数量可观的殖民者。如今，人们接连不断地涌向派克峰和科罗拉多准州（1861年），从加利福尼亚州涌向卡森谷和内华达准州（1861年）。多年后，依密苏里河上游村庄而建立的达科他（1861年）农业区展现出布拉克山的富饶资源。1863年，亚利桑那准州依科罗拉多河下游的矿产而生。大陆分水岭北部在同一年划归爱达荷，在1864年蒙大拿成立时又被分出。最后被分出的怀俄明是1868年矿山和铁路的产物。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俄克拉荷马一直未命名。事实上，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通过时，它就已经形成。

这些采矿营地的合法化进程对美国的影响巨大。国会处理有关西部计划的问题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尤其是《1787年法令》[1]颁布之后，这类事务就更加频繁，公共土地的历史也开始由西部的需求来主导。1862年，美国西部农业区的农耕能力因麦考密克收割机的发明而增强。同时，西部颁布《宅地法》，规定土地权归开垦、耕种该土地的农民所有。这是托马斯·哈特·本顿穷其一生争取的事业。但他最终没能等到国家充分尊重农民依法拥有土地权的那一天。最初，农民的行为被认定为擅自非法占有国家土地。后来，国会终于开始考虑开荒者的利益而修订法律。这一进程来之不易。在《宅地法》以及当时仍具效力的《优先购买权法》的影响下，在印第安人被驱逐之后，土地业权在山地各州迅速确

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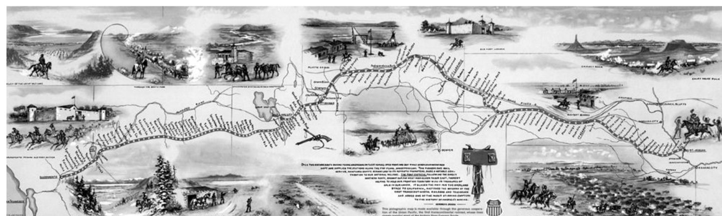
麦考密克收割机



托马斯·哈特·本顿

矿工们不甘过与世隔绝的生活。地处边疆矿业地区的人极力呼吁国会大量拨地，驱逐印第安人，增强治安保护，通邮并修建铁路。国会开始加大力度解决问题。1858年，国会创立的陆路邮递二十五天内就能通过公共马车将信件送至加利福尼亚州。1860年到1861年期间，驿马快信提供了更加快捷的邮递服务。在私人出资建立通向太平洋沿岸的电报

线路后，国会和西部开始着手横贯大陆铁路项目。



美国驿马快信

1862年夏，美国政府授权一大批铁路公司修建从密苏里河到加利福尼亚州的铁路（该铁路段已经从美国东部修至圣约瑟夫）。为获得更全面的政府支持，1864年，美国通过了《太平洋铁路法案》的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每铺设一英里的铁路，政府赠予二十平方英里的土地以及至少每英里1.6万美元的美国公债贷款。西部几乎没有什么资金，而繁荣的东部有更好的投资项目，结果该铁路项目难以找到资金支持。在说服东部投资者们相信横贯大陆铁路可以带来回报之前，西部开发者们四处碰壁，在得到与失去之间备受煎熬。直到1866年，这项铁路工程才算真正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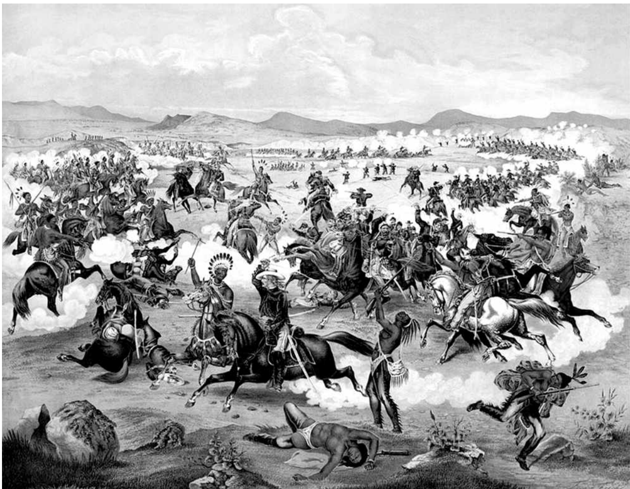
1866年到1869年，联合太平洋铁路工程开展的如火如荼。从康瑟尔布拉夫斯到萨克拉门托，联合太平洋铁路跨越了辽阔的平原、沙漠和高山。在铁路的西端，利兰·斯坦福和加利福尼亚州一批追随他的理想主义者们共同承担了这项任务。铁路东端并没有出现一位促进铁路发展的领袖人物。铁路的两端都需要面对修建铁路所需的木料、石料和钢铁供应问题，但唯独不担心劳力问题。利兰·斯坦福从中国找来苦力承担这项工作。南北战争的老兵们和新移民们则承担了东端的大部分工作。随着东端工程的不断推进，印第安部落也开始眼红。波尼族人、苏族人、阿拉巴霍人和夏延人从新修建的铁路中意识到荒野部落生活已经走到尽头。

伴随着铁路建设而来的还有惨烈的印第安人暴动。印第安部落在怀俄明、科罗拉多和印第安领地作了最后的抵抗。在铁路建成之前，平原上的部落就已经被控制在南达科他和印第安领地的大型集中营里了。这意味着印第安人暴动最惨烈的那段历史已经结束。

1869年春，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竣工，一个盛大的庆祝仪式在犹他准州的奥格登附近举行。工程各处的最后一个步骤都被赋予国家意义，不仅因为国会提供了援助，还因为用铁路将两个大洋连接起来是美国人民的共同愿景。随着铁路工程的完工，国内要面对的问题从令人兴奋的工程和财政风险转移到枯燥乏味的账单支付上，公众热情也自然而然随之减退。



印第安波尼族人



美军镇压印第安人暴动

联合太平洋铁路是19世纪60年代最长的铁路，广受关注。从经济学上来讲，这只不过是北方投机商业扩大化的一个典型。它始于南北战争，并由此发展壮大。正如每次恐慌过后的经历一样，美国开始进入充满希望的发展期。1861年左右，经过几年的萧条与停滞，美国商业得到了恢复。美国的信用度提升，贷款更加自由。资本再次打开雷达，搜索着收益丰厚的投资项目。在新开发的地区，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建设，可开发的领域潜力巨大。在整个西部开发运动达到了高潮。



联合太平洋铁路竣工，工人举行庆祝活动

就像美国西进运动的每个阶段都会出现的情况那样，西部陷入了沉重的债务之中，渐渐地，负债超过了资产。借款解决了移民的大部分费用。最初，西部的开荒者们并没有种植庄稼，只是靠着积蓄和借款度日。他们向当地的商人、银行和新铁路公司竭尽所能地借款。以前必须住在老区以利用积累资产创造盈余用于投资的债权人，现在移居到美国东部甚至是欧洲。殖民与发展提供的必要条件为地区之间新的商业利益联合铺平了道路。远西地区和西北部地区为债务人的利益发声，而东部则代表债权人的利益。自美国财政部在财政重建的过程中启用绿背纸币之后，这种分裂就越发明显了。

1865年，流通中的法定货币绿背纸币一度达到4.33亿美元，不仅构成了战争债务的一部分，还成为现金流通的基础。在战争期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这些绿背纸币与州立银行发行的纸币、地方代用货币以及美国的辅助货币或“乱发纸币”共同构成了美国的货币系统。1862年美国政

府禁止铸币流通，只有在合同规定的情况下才能以金银兑付。1863年，萨蒙·波特兰·蔡斯部长开创了国家银行制度以统一流通中的货币，并以美国公债债券作担保，但该制度直到1865年州立银行纸币退出流通才得以实现。之后，国家银行大量出现，并发行纸币替代了州立银行不稳定的纸币，取得了与绿背纸币同样好的效果。1865年，所有纸币均低于票面价值，黄金短缺并一度退出流通，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878年底。



西部开荒者和他们简陋的家

绿背纸币的贬值反映出人们对南北战争结果的普遍疑虑。自从绿背纸币的购买价值低于一百美分金币价值的标准之后，那些将绿背纸币作为美元接收的人备受其苦。当时，因战争而陷入绝望的联邦政府强迫债权人依照票面价值接受绿背纸币。这显然有失公正，但政府这么做也属无奈之举。后来，绿背纸币迅速恢复到票面价值，财政部立刻意识到和平即将到来。

在1865年任财政部长之前，印第安纳州的休·麦卡洛克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银行家。他提议，如果允许，减少包括绿背纸币在内的所有战时债务为低利率的长期债券，并创建偿债基金以便在债券到期时予以兑付。措施包括撤回流通中的绿背纸币并销毁用于商业往来的绿背纸币。国会批准了这个方案，于是休·麦卡洛克开始逐月撤回绿背纸币，直到1868年2月，绿背纸币总量降至3.56亿美元。

然而，撤回法定货币的措施没实施多久，西部的抗议者们就冲着财政部和国会来了。表现活跃的绿背纸币是当时美国商业唯一可用的货

币，但如贬值货币一样糟糕。如果绿背纸币退出流通，美国还没有任何货币能替代它，除非铸币恢复流通。在商业上升期，货币数量每减少一美元都会使其活跃度进一步增强，带来更大的市场价值。货币升值，所有以货币衡量的商品价格必然下降。出现物价下降的西部认为这是一场金融灾难。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恢复硬币支付意味着商品价格下降，财政部也不得不在强加于民的贬值货币的各种弊端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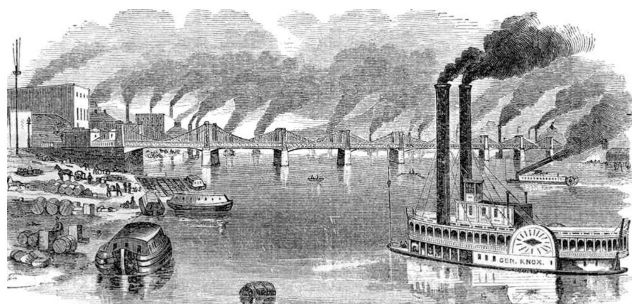
休·麦卡洛克

东部的债权人得意地将预期的增长视为美元的购买价值。他们的自私自利与健全的金融原理协调一致。对于西部的债务人，这个过程却大相径庭。他们被局部利益蒙蔽，忽视了美国的债务问题。

货币开始贬值后，西部的大繁荣局面随之开启。绝大多数的西部债务，不管是建立在殖民者的农田、商人的股票还是实业公司的债券之上，均由贬值绿背纸币对应价值的法定货币美元创建。所以任何绿背纸币增值的可能必定会增加债务的内在价值。如果“美元”在价值六十美分黄金的时候借出，由价值八十美分或更多黄金的“美元”偿还，债务人偿还的要比最初的借款多三分之一。然而，他们对政府信用并不抱希望，因而忽略了自己的损失。令他们不满的不仅是实际货币量的减少，还有增值的那部分金额。

休·麦卡洛克受过专门的财政培训，时刻准备着为了国家的偿付能力而牺牲债务人的利益——而且的确，这两者中总有一方需要低头。国会感到了来自西部的强大压力，特别是在南北战争期间工业体系得到重组的西北部地区，从匹兹堡到芝加哥。1868年2月，法律禁止继续撤回绿背纸币，流通中的绿背纸币总额达到3.56亿美元。战争带来的通货膨胀在和平时期得到合法化。最高法院最终对此做出了规定 [2] ，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法定货币都由国会的自由裁量权来决定。

1868年，正如其他地区一样，西部地区陷入债务危机。就像其他债务方一样，西部倾向于通货膨胀理论，希望通过政治途径来纠正不公。1786年，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的农民们就曾为此追随丹尼尔·谢斯。第二合众国银行在强迫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的银行偿还债务时，遭到强烈抵抗。而现在，西北部采纳了政客们的建议，认为发行更多的绿背纸币会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



19世纪60年代的匹兹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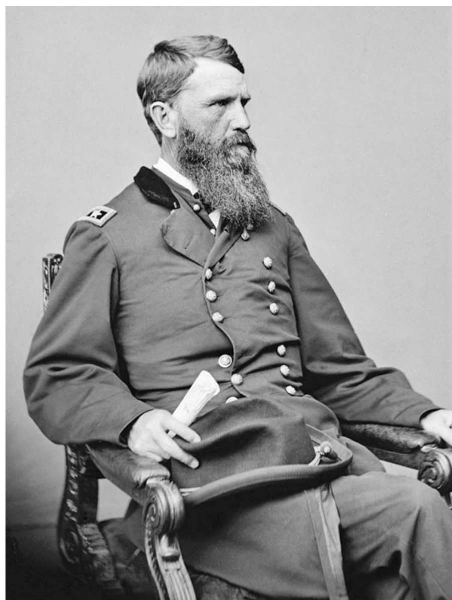
绿背纸币运动的支持者们极力主张保留法定货币作为货币基础，而且所有“合法货币”形式的应付债券和利息应以纸币偿付。因此，他们希望增加绿背纸币的流通量，从而够避免物价下降抑或是给负债者增加压力。全国各地负债累累的债务人都接受该主张。俄亥俄州的乔治·亨特·彭德尔顿更是成为该主张最著名的代言人，该主张也受到了如泰迪尔斯·史蒂文斯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的支持。1868年，乔治·亨特·彭德尔顿更是凭借此主张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1868年7月4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纽约市坦慕尼协会 [3] 总部坦慕尼厅举行。乔治·亨特·彭德尔顿的支持者在会上提出自己的“俄亥俄倡议” [4] ，但该倡议受到仍然觊觎总统之位的首席法官萨蒙·波特兰·蔡斯

以及民主党战时纽约州长霍拉肖·西摩相似观点的挑战。《哈珀周刊》社论发表评论道：“1864年，民主党代表大会发表反战言论。忠于联邦的人们鄙视这种言论并努力争取无条件胜利。1868年，民主党代表大会主张拒付战时债务。该言论同样遭到高尚人士的唾弃。”在第二十二轮投票中，霍拉肖·西摩战胜乔治·亨特·彭德尔顿得到提名，小弗朗西斯·普雷斯顿·布莱尔得到副总统候选人提名。虽然霍拉肖·西摩明确否认“俄亥俄倡议”，但“俄亥俄倡议”还是体现在了民主党的政纲之中。



乔治·亨特·彭德尔顿（右）与麦克莱伦（左）的竞选海报



小弗朗西斯·普雷斯顿·布莱尔

民主党对东部普遍否认的事情做出了承诺，所以在竞选活动一开始就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不但他们的对手指责霍拉肖·西摩是铜头蛇，民主党还公开表示受到了韦德·汉普顿和“参会的上百名其他叛军官员”的恐吓。针对民主党的指控已经包括“叛国罪”和不忠罪了，经过共和党的修改又增加了拒付的罪名，当然，共和党的真实意图是要秘密地让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获得更多支持。

1864年，共和党被迫伪装成“联邦党”。接下来的四年中，它将为此付出代价。林肯总统遇刺身亡后，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人安德鲁·约翰逊宣誓继任总统。将民主党和共和党作为联邦主义者联合在一起的纽带在罗伯特·爱德华·李投降之后瓦解。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终于可以追寻他最初的想法——做一个坚定的重建者。在国会召开1865年至1866年的会议之前，他的政策使他与共和党激进派渐行渐远。1866年，该政策导致他与共和党发生直接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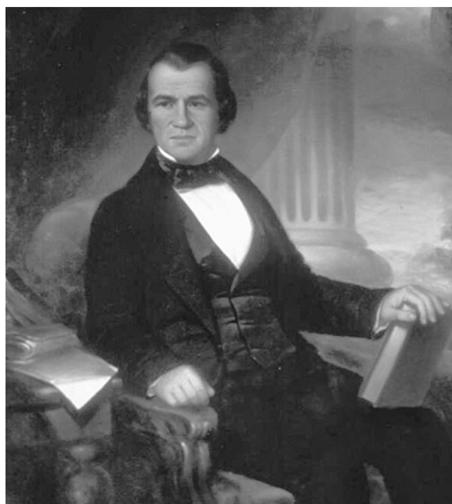
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和共和党领导人之间的冲突起因于他关于美军控制下南方战败各州权利的政见。与林肯的想法一致，安德鲁·约翰逊总统认为纵使这些州曾一度陷入混乱局面，但仍然应保持其州的属性，只不过现在它们属于联邦了。作为总统，他虽然有暴力执行法律法规的权

力，但希望自己成为该时代不再依靠暴力执法的第一人。秉承这一思想，1865年5月，安德鲁·约翰逊大赦邦联诸多将领。接着，他大赦各临时政府，制订并公布相关规则以供战败南方各州修订其宪法，重建有序并忠于联邦的州政府。在国会阻挠这一政策之前，他完成了对最后十一个州的整顿。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接受罗伯特·爱德华·李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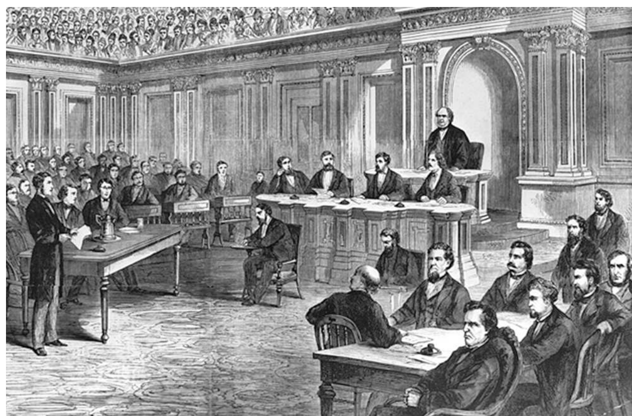
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和共和党同事之间的分歧在于南方选民身份的恢复问题。在脱离联邦时，南方绝大多数州的白人群体受到了影响。在战争期间，没有任何一个南方联邦派系始终忠于联邦。南方将领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赦免，其身份也全面恢复，并作为民主党成员重回国会，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第十三条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将南方黑人代表的名额比例从原来的五分之三提升至与白人同等水平。每个州都可以产生比战前更多的众议员。在北方民主党的帮助下，南方控制国会并非不可能。



美国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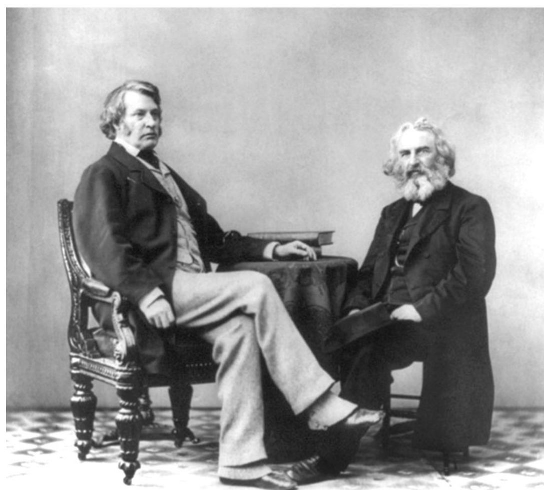
在北方共和党看来，战败的南方将领非但不受罚反而要奖赏的主张，以及任何可能让1864年林肯总统领导联邦人民击败的政党东山再起的重建政策都是不合理的。被竞选成功带来的种种好处所吸引的政客们一想到会失去这些好处就愤怒起来。无私的北方人为了维护联邦统一牺牲了太多。他们认为，现在立即把联邦拱手让于民主党温和派与之前的“叛乱者”风险太大。这是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计划，由共和党激进派操控的国会开始着手阻止这件事。

虽然作为总统的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掌控着任免权，但如果不是出于道德考虑，国会有权限制他对其职权的使用。任何任命必须得到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的批准。1867年，国会制定法律，规定免职同样需要得到参议院的首肯，而《任职期限法案》将此争议推向高潮。比共有权力更重要的是各议院对其成员的“选举、当选和任职资格”做出评判的专有权。南方的参议员们和众议员们脱离国会已久，没有获得两个议院的认可，也没有任何权力可言。安德鲁·约翰逊总统身边有一部分顾问强烈认为包括预先安排的十一个州成员在内的国会只是个“残余组织”，并且没有任何权力，但他们没有影响投票中大多数人的选择，也没有影响到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法案的颁布。



《任职期限法案》辩论现场

在第三十九届国会（1865—1866）中，参议院有查尔斯·萨姆纳，众议院有泰迪尔斯·史蒂文斯。对该届国会成员来说，如何将党派联合在一起以阻止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计划是个重要问题。在众议院，因为共和党占绝大多数席位，问题变得简单了。在参议院，虽然共和党没有那么多席位，但可以通过罢免一个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将人数控制在三分之二。这样一来，无论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就都能公然对抗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了，并且可以不顾他的否决通过一系列议案。从否决设置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和《民权法案》开始，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否决了一系列国会议案。然而，三分之二的投票结果迫使总统接受以上两个议案以及一系列重要的重建法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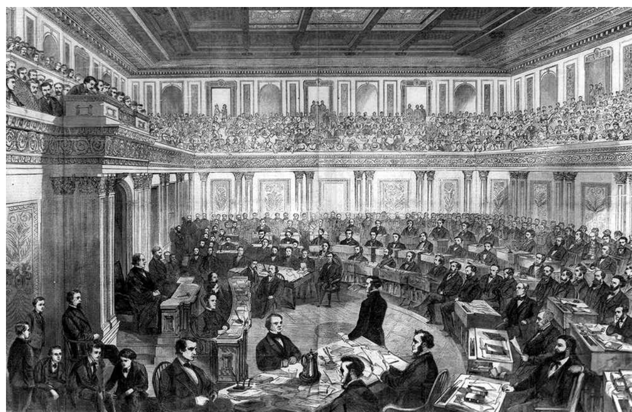


查尔斯·萨姆纳（左）与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

目前，基于法理与诚信的分歧着实令人尴尬。共和党激进派的猛烈攻击加之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过度反击使局面变得不堪。1866年，国会将《第十四条修正案》提交给各州批准。1867年，国会通过一系列法案用于在军方控制下实施重建计划，否决了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撤免官员的议案。

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最终以自己的能力获得了党派之争的胜利。他虽然往往在言语上十分极端，但执行国会通过的各项法案不遗余力，就好像执行的是他自己制订的法案一样。到目前为止，当重建事宜与《宪法》条款相抵触时，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有优先决定权。事实上，《宪法》无法超越逻辑并预见不可控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国会两院均占有三分之二席位的共和党激进派则有权做出决定。作为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几乎无懈可击，没有给对手留下任何把柄。1866年，对手已经虽然开始着手弹劾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却一直找不到任何依据。

《任职期限法案》变成弹劾的导火索。司法部长提出该法案违反《宪法》。于是，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就撤免了促成该法案通过的埃德温·麦克马斯特斯·斯坦顿。这一行为导致他与在战场上指挥军队作战的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决裂，给了国会弹劾他的机会。1868年2月，众议员投票弹劾安德鲁·约翰逊总统。



安德鲁·约翰逊遭弹劾

在参议院，对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审查从1868年4月一直拖到了1868年5月。弹劾的内容冗长，言之凿凿地详细描述了总统的种种罪

状，但只有违反《任职期限法案》这一条适用于埃德温·麦克马斯特斯·斯坦顿的案子，该法案违反宪法的真相也由此得以进一步明确。另外，该法案制订得过于草率，并没有将此案涉及的情况包括进去。事实上，这是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接受审查的策略，这些证据不足以说服三分之二的参议员判他重罪或是轻罪。1868年5月中旬，安德鲁·约翰逊总统被无罪释放，共和党便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挑选他的继任者上。

在与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斗争的过程中，共和党的路线得到了进一步明确。每个渴望提名的联邦主义者都支持国会的重建计划，没有哪个议题能与重建计划相提并论。在一条政治纲领中，绿背纸币运动遭到谴责，其重要性仅次于重建计划。该条目称“任何形式的否决都是国家级的犯罪”。在芝加哥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成为最合适的总统人选。



《任职期限法案》辩论期间《哈珀每周》的社论漫画：战争部长斯坦顿举着火把准备点燃标有“国会”的大炮，他攻击的目标为安德鲁·约翰逊，发射的是名为“正义”的炮弹

几乎没有人能像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那样从默默无闻到声名鹊起，一切都那么实至名归。1861年，他还是一名退役军官，一个失败者。1863年，他已经成为攻克多纳尔森堡和维克斯堡的战斗英雄了，在全国威名大震。在1864年到1865年的军事行动中，正是他过人的毅力和胆识支撑着他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868年，作为陆军司令的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与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反目之后反而非常幸运地成为两党梦寐以求的候选人，因为他本身并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由于他与共和党

领导人的关系，他在芝加哥共和党代表大会的第一轮投票中就得到了提名，而印第安纳州的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则作为副总统得到提名。



斯凯勒·科尔法克斯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得到提名时对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弹劾审查已接近尾声。在宣布延期之前，国会重新接纳了几个在多数共和党人控制下恢复的南方州。田纳西州已经回归，新加入联邦的州有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肯色州。当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在11月当选并且即将在来年3月就任的时候，就只剩下三个州还处于临时管辖的状态。当他宣誓就职时，北方、南方抑或是西部，无人不为他高兴。他结束了绿背纸币危机，因而受到东部的青睐；西部则念着他在密西西比河河谷出生、长大；在南方，他代表着两袖清风的普通军官。在接纳书中，他做出一个备受欢迎的承诺：“让我们共享和平。”

[1] 又称《西北法令》。——译者注

[2] 在诺克斯诉李以及朱利亚德诉格林曼的案子中。——原注

[3] 坦慕尼协会是纽约民主党中央组织成立1789年。因其总部所在地“坦慕尼厅”而得名，后成为“腐败城市政治”的代名词。——译者注

[4] 186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主张以绿背纸币代替黄金偿付内战债券的倡议，受到中西部穷人的欢迎。也称“俄亥俄观点”。——译者注

第3章　南方地方自治的恢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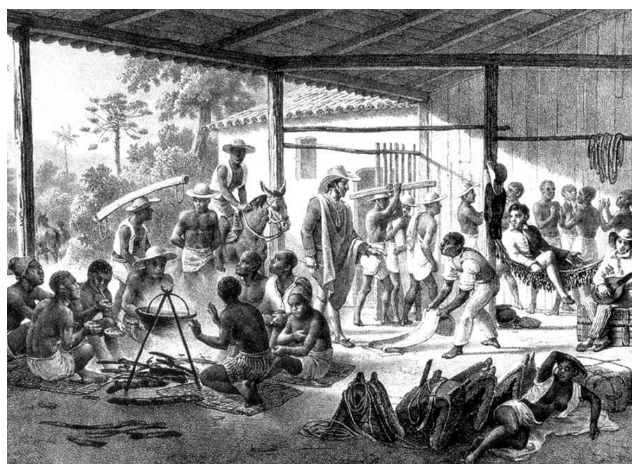
1868年投出选举票的八个南方州不再是1860年拥有同样名字的那八个州了，而且与三个脱离联邦的州一样，也大都在共和党激进派的掌控之下。这八个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与此同时，伴随它们的还有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变革。对这一切而言，“重建”已经不是一个恰当的说法。

确切地说，之前为衡量南方独立付出的代价所做出的努力几乎都以失败告终。事实上，没有哪个计算方案能将所有损失算得清楚。至于总数，一个合理的算法是，该损失相当于一百万个青壮年男子在三年的时间里不得从事日常生产的损失。南方不光损失了生产力，还损失了大量房屋、谷仓和其他基础设施——有的被烧毁，有的因疏于管理而破败不堪。同时损失的还有作为南方财产之一的奴隶。当安德鲁·约翰逊总统颁布特赦令，联邦军队撤回北方时，南方邦联地区赤贫遍野。

1865年春，摆在南方种植园主面前最棘手的问题是处理荒废的房屋、春播作物以及对劳动力需求。没有钱或是贷款，他们需要一个高贵的社会地位以抵挡破产的打击。密西西比河沿岸有一位声望颇高的种植园主。后来，他的女儿说道，19世纪70年代，为了不让女儿们碰洗衣盆，父亲承担了各种洗洗涮涮的家务劳动。一个社会，无论男女持有这样的家务劳动观（女儿们居然让父亲这样做），说明这个社会在得以恢复之前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在美国内战后二十年试验性建设期，同样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南方。

奴工制度一去不复返，但黑奴仍然是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从可以找到的零星记载中不难发现，当时种植园主们当时想要雇佣解放了的黑奴来重新经营种植园。1865年到1866年，他们进行了这样的尝试，但发现黑奴完全不受控制，最后以失败告终。受够了被监管的日子，黑奴们向往自由，却受制于无知和懒惰。几年后，人们逐渐意识到以前落后的种植园时代已经过去，而新的时代还远远达不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以工资雇佣黑奴失败后，种植园主们又开始尝试将自己的部分资产租给黑奴经营。因为佃农们几乎身无分文，所以地主们还得准备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工具和设备，结果，到处可见荒地。原来，黑奴们骑着骡子全国转悠，享受来之不易的自由去了。据人口普查的记录显示，劳工制度改革之后，美国南方种植园面积下降。1860年，美国农场的平均面积是一百九十九英亩，而十一个脱离州农场的平均面积从阿肯色州的两百四十五英亩，佐治亚州的四百三十英亩，到得克萨斯州的五百九十一英亩不等，均高于全国平均面积。其原因在于种植园经济制度的驱使种植园主不断扩增土地面积。1870年以及1880年的相关报告则显示出农场面积骤降的趋势。二十年间，随着集约农业的发展，全国农场平均面积从一百九十九英亩下降到一百三十四英亩，而南方下降得更快。1880年，除了两个州之外，与南北战争之前相比，整个美国农场平均面积少了一半。



种植园里黑人奴隶在休息用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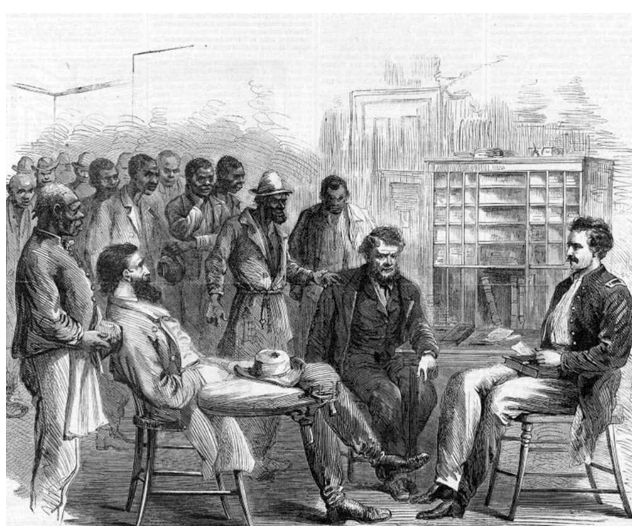
被解放的黑奴们无所事事、终日游荡，成了与经济问题同等重要的社会问题。1865年，对黑奴进行重新定位是立法机构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由安德鲁·约翰逊总统重建计划认定的忠诚之士管辖。当时，有几个州通过了关于合同、学徒制和流浪的法律。在这些法律的约束下，被解放的黑奴将从事固定的工作，雇主也有惩罚他们的权利。法律代表了白人公民的意愿，认为因为奴隶主对黑奴行为的良好保证已经不存在，所以需要制订特殊条款以控制和调节黑人人口。1865年，对于还处于兴奋和紧张氛围中的北方而言，这些法律简直是要公然恢复奴隶制。北方人

试图说服国会以否定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重建计划，让共和党认为前南部邦联支持者声称的忠诚都是虚情假意——所以他们不能立即回归联邦政府或是国会。

直到1867年夏，国会才安排其他政府成员替换了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提拔的原有成员，并继续修订宪法，采纳了在1865年12月就宣布作为美国《宪法》一部分的《第十三条修正案》。1866年春，国会巩固并加强了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的权力。1866年夏，《第十四条修正案》得以通过。

对涌向军队的那些贫穷而无知的黑人，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自有托词。战争快结束时，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得到授权，管理废弃土地资产并帮助被解放者进行农耕。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做了大量的慈善和教育工作帮被解放者适应突变。在恢复和平之后的一年，若不是国会保留该局以对抗安德鲁·约翰逊总统，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险被取缔。直到1872年，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的成员们都处在政治斗争之中。

战败后，南方临时政府就连对激进北方人的态度都是敌对的，而白人居民几乎全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如果民权得到恢复，这些白人居民就会控制南方各州。为确保南方始终“忠于”联邦，发展南方共和党的唯一途径就是解放黑奴。《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制订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不仅需要给黑奴提供吃穿，还要给他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多亏共和党他们才能获得自由。一些人到处散布民主党意图恢复奴隶制的消息，另一些人建立起私人机构。管理黑人选举的白人们责任艰巨，也经常遭到背叛。通常来讲，他们不是当地居民，跟南方群体也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只是从中谋利而已，因而得到“提包客”[1]的蔑称。各准州对这样的管理者早就有所耳闻，但只有真正处于其管理之下才对它的恶处深有体会。



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的办公人员与解放后的黑人奴隶

1867年的《重建法》要求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将南方划分成五个军事管制区，由军事长官代替所有被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复职的州官员管理。有军队作为后盾，这些军事长官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所有二十一岁以上的男性公民登记入选民名单。《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之前，国会赋予被解放黑奴在其所在州的选举权，使其进入选民之列。但所有在南方邦联各大机关供职的白人领袖都被排除在外。不管白人还是黑人，只要参加投票选举，就必须发誓坚定不移地效忠联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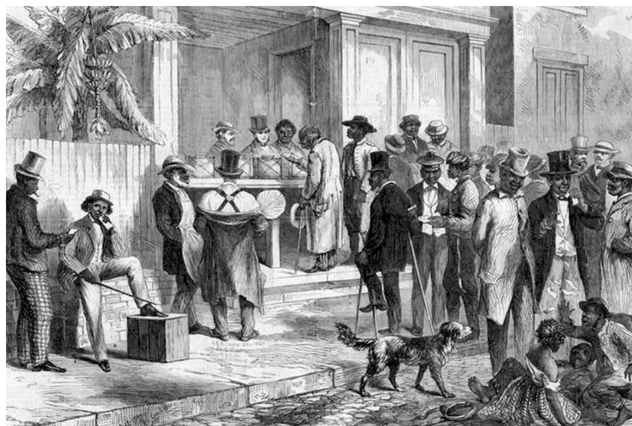
各州依据该选民名单召开代表大会以修订宪法。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必须修改法律，承认被解放黑奴的地位，批准《第十四条修正案》以保障黑奴的民权，并赋予黑人选举权。在军事官员的不断监督下，在上述所有事宜办理妥当之后，修订后的宪法才呈递给国会，等待最后的批准或否决。

当然，宪法条款不可能预见重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引起战争的根本问题是任何州不得脱离联邦。如果这一点成立，所有的州就还是州，那么总统要恢复秩序并撤回军队也是合理的。但这个理论导致一个相当不合理的结果，即在绿背纸币运动威胁到公信基础的时候，立即大规模恢复曾一度有意破坏联邦统一的势力。国会佯装要重新接纳或是恢复各州的行为却否定了它们作为州的属性，并暗示国会承认南方邦联曾一度主张的说法：联邦成员可以脱离联邦。国会的任免权将其置于

完全失控的状态。当诉讼的对象是总统（密西西比州诉安德鲁·约翰逊案）或是战争部长（佐治亚州诉埃德温·麦克马斯特斯·斯坦顿案）时，所有试图诉诸法律加以干涉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在一起个人诉讼案中，上诉人希望能减轻罪行（偏袒一方的麦卡德尔案），但这起案件最后被突然颁布的上诉法修正案规避掉了。这种情况并非预谋，美国《宪法》对此也没有应对条款。最终，对重建的评价必须基于其结果而不是合法性。如果重建给南方带来了和平，恢复了往日的繁荣，保卫了联邦的统一，且没有因为重建本身而带来新的苦难，那它的意义就是积极的，与《宪法》无关。

安德鲁·杰克逊总统认真地执行《重建法》不遗余力，1867年秋，南方代表大会召开，一直开到了冬天。在其中五个南方州，黑人在选民名单上占了大多数，而且无论哪一个州都不允许保守派控制代表团的选举。前南方领袖仍然被剥夺选举权，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相信北方会准许激进派让他们受制于无知黑人的掌控之中。结果，有大量黑人参加的南方各州代表大会或许就在白人共和党、提包客或是无赖汉的支配下进行了。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的官员们积极地指挥黑人选举。被解放的黑奴们通过举行联邦联盟的秘密仪式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只有田纳西州逃过了这场严峻的考验，该州迅速接受了《第十四条修正案》。1866年，国会没有理由不接纳它。

对1867年南方各州会议记录的分析显示出国会强加于南方政治改革的程度。当时南方的工业革命已经处于领先水平。种植园主开始把地产分成几份，并将小块土地委托给租户或佃农。这些租户或佃农被称为“分益佃农”。种植园主承担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幸好还有精明的政府和一笔差强人意的北方商业贷款作为支持，但可能还要面临劳工和资金的问题。那些本来可能控制南方经济未来的人却被联邦政府当作叛徒排除在外，而他们的位置则由北方的冒险家和被解放的黑奴代替。密西西比州代表大会包括被称为“黑棕色”[2]的十七名黑人代表。他们在经验和能力上的不足导致浪费与欺诈现象出现，但代表大会的权力通常都高于其背后的州议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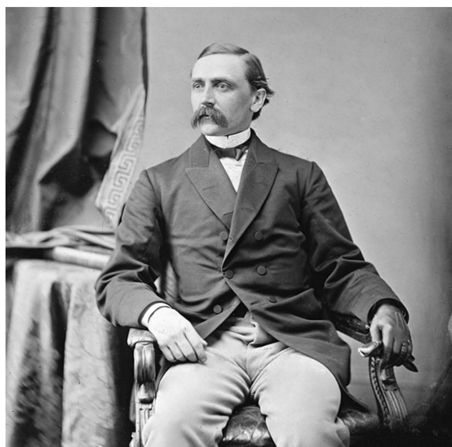
获得选举权的黑人踊跃投票

1868年夏，大多数州应国会要求制订新的宪法，而大部分南方地区还在绝望中沉默地观望。与战争带来的痛苦相比，南方现在痛苦更甚。因为激进派要在1868年各州的投票选举中使用新宪法，新宪法中有七部被及时采纳。亚拉巴马州是第八个采用新宪法的。不过，一开始，该州公民不认可新宪法，但国会仍然迫使该州采用新宪法进行选举。这八个州里只有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没有投票给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1869年，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就任总统时，弗吉尼亚州、密西西比州和得克萨斯州仍未被联邦接纳。

在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第一届国会执政期间，重建才正式完成。1870年2月，密西西比州完成重建工作。1868年，在保守派州长本杰明·格拉布·汉弗莱斯的领导下，该州鼓起勇气否决了重建宪法。他被撤职之后，其位置由一位北方州长接替。保守派因此丧失信心并接受了他们一直否认的重建宪法。这些州迟迟不接受新的宪法再一次使国家陷入尴尬境地。在此期间，国会又递交了《第十五条修正案》，并且准备重新接纳顽固反抗的州。重建的第一个成果是由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新的州议会接受了《第十四条修正案》，并且派北方军事长官阿德尔贝特·埃姆斯和黑人传教士海勒姆·罗兹·雷威尔斯去华盛顿出任密西西比州的新参议员。

1870年1月，弗吉尼亚州回归联邦。该州原来的政府在弗朗西斯·哈里森·皮尔庞特的领导下忠于联邦，并且备受林肯总统的器重，但后来被军事政权取代。1867年，因为拒绝接受《第十四条修正案》，该州失去

了最后一个得到接纳的机会。在国会的操纵下，黑人激进派代表大会制定了新宪法。1870年1月，黑人激进派代表大会强制公民接受了这部新宪法。1870年，得克萨斯州处于恢复期的最后阶段，如弗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一样，重新加入联邦。自1867年《重建法》通过之后，加入联邦的条件变得更加繁琐、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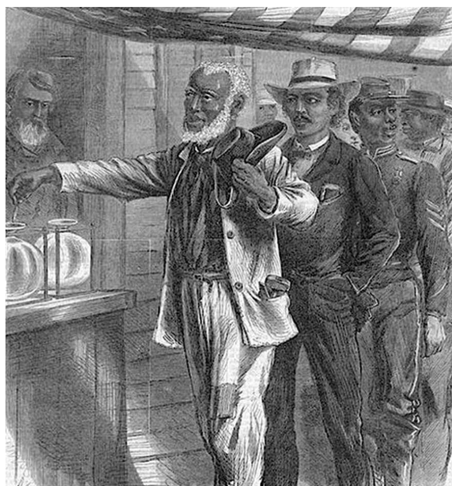
阿德尔贝特·埃姆斯

1870年春，南方邦联十一个州终于恢复完毕，仅剩佐治亚州在恢复之后又被驱逐出联邦，因而成为国会重建计划中的最后一个州。1868年，佐治亚州接受了新宪法，将首府从南北战争之前的米利奇维尔迁到了建在亚特兰大城市废墟附近的新城镇。该州接受了《第十四条修正案》，但它的第一届州议会并没有完全领会国会的意图，竟然驱逐了激进派推举的所有黑人成员。国会因此拒绝在华盛顿为佐治亚州代表团设置席位，并且继续延长对它的观察期。直到该州议会战战兢兢地取消了对黑人的驱逐令，佐治亚州才最终得到了联邦的承认。



黑人传教士海勒姆·罗兹·雷威尔斯

激进派不顾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不断否决，通过了国会独断专行制定的法案。但这样的行为并不为美国《宪法》认可。在战争时期，法律的执行受到阻碍在意料之中。国会一直拖延南方的恢复期，直到大多数人都相信南方各州已经完全忠于联邦。大多数国会成员都只相信各自党派的忠诚，因而制定了一个比实际的重建政策更具争议的政策。国会逐渐动摇了。《第十三条修正案》（1865年12月18日生效）废除了奴隶制，这是众望所归，并不需要借助任何暴力手段来执行。下一个修正案的制定源自一种恐惧和一个希望——害怕被解放的黑奴再次受到压迫，希望他们能成为共和党的政治盟友。在《重建法》通过之前，《第十四条修正案》就已提交给各州。1868年7月28日，《第十四条修正案》写进了美国《宪法》。但只有使用强制手段才能使其获得南方各州的接受。黑人的选举权实际掌握在各州政府手中，因为他们遭到威胁——如果不同意就减少黑人国会代表名额。国会早就在南方各州依法设置了黑人选区。《第十五条修正案》禁止各州因种族、肤色和以前遭受奴役等理由剥夺公民的投票权，这条修正案直到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的就职典礼之后才得以提交给各州。这条修正案被采纳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害怕南方剥夺黑人的民权，害怕付出代价或是南方恢复到民主党的控制之下。1870年3月30日，该修正案公布时，共和党激进派开始竭尽所能地自救，并且出于恶意、无知或是误以为自己在做慈善，使战败各州遭受到在有极少黑人的北方都难以容忍的情况。



解放后的黑人与白人一起参加选举

1870年，南方在名义上完成了恢复工作，但事实上当时的南方无论是恢复还是重建的进程都离“完成”二字相差甚远。在重建的道路上，南方还未扫清奴隶制残余、解散种植园、制订新的土地占有及工资制度、重新整理因战争而荒废的材料和设备。恢复的进程只是刚刚起步而已。很难想象，这样的美国社会群体会允许自己受制于以前最看不起的那群人，但这正是剥夺白人权力并赋予黑人选举权的目的所在。不管有没有法律，只有当各州政府重新回到可靠的白人公民控制之下时，南方的恢复事业才算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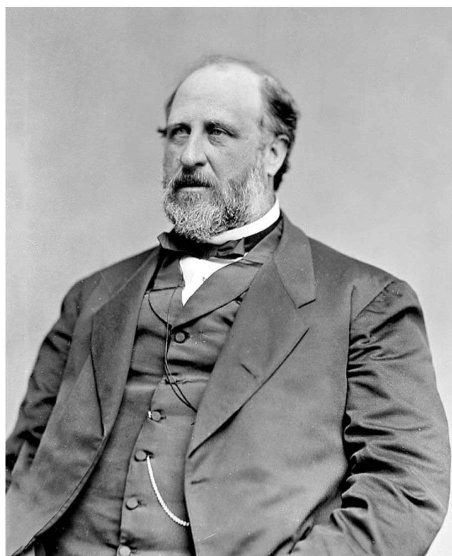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将军

1870年，南方各州政府几乎都按照国会的意愿做出改变。国会里南方各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是共和党，也几乎都是“提包客”之流。南方各州的州长、行政官员和立法委员也都是共和党。他们中很少有人坐拥大量财产或是站在他们所属群体的立场上。如档案所记录的那样，他们大都是目不识丁的黑人。纵使所有人都心怀美好愿景，他们也几乎不会想到根据当地的需求，合理修订法律，从而使当地恢复繁荣，人民得以生存下去。因此，他们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失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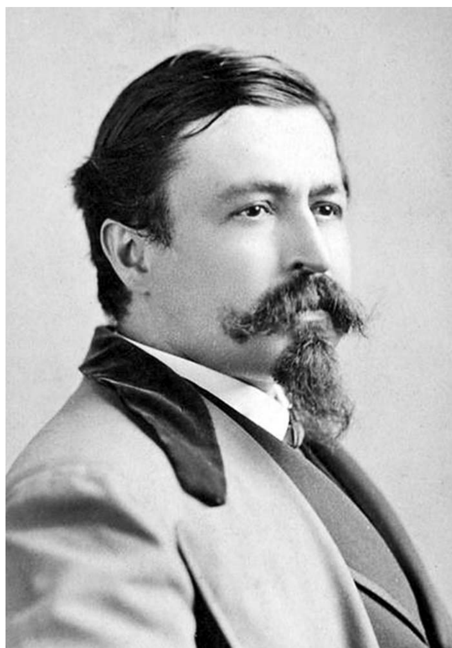
根据当时在美国南方旅行的游客描述、公文、有关南方的传记和回忆录的记载，很容易找到对重建政府奢侈浪费具体细节的描述。没有人清楚政府人员实际做了哪些工作，却只见账单和工资清单源源不断地打印出来。当花销超出了财政预算，重建政府便开始肆无忌惮地贷款。对于只有几个月不在棉花田里劳动的黑人来说，纳税人可能被迫给他们使用的丝绒地毯、红木书桌和进口痰盂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其中一个州的议会大厦还不断提供餐饮丰盛的免费午餐。而无端的浪费只能算是南方所遭受的最小负担。

更过分的是，重建政府把自己所有的腐败行为都归因于国会政策。南北战争时期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处处滥用职权的时期。威廉·马格尔·特威德的所作所为让北方人反感，讽刺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则让公众注意到他的罪行。在其他州，与前者相比流氓没那么野蛮，与后者相比检察官没那么敏锐。恶人无法逃脱，不是因为没有人注意到而是根本无人监管。南方的情况比北方更令人深恶痛绝。在南方，这种现象更猖獗且犯罪手法更拙劣，而这都是“外来者”的杰作。

蓄意盗用公款已经不足为奇。没有哪个州的账目保存完好，让今天的学者可以确定地查到资金流向。政府官员通过签订合同贪污受贿，通过管理学校和实施黑人援助计划欺诈造假，通过售卖执照和选票从中渔利，通过非法发行公债以及不计后果地贷款修建铁路攫取非法盈利，最终导致公债高筑。多年来，南方接二连三否认这些债务的存在，使其信用持续下降。来自缅因州的废奴主义者、共和党员詹姆斯·谢伯德·派克写了一本叫《沮丧之州》的书，对南卡罗来纳州的混乱状态做了生动的描述。同时，其他州的类似情况得到了历史学家的关注。



威廉·马格尔·特威德



托马斯·纳斯特

说到法律，南方当局对黑人占多数的地区满是无奈。应国会要求，当时仍然在值勤的卫戍部队能保障被解放黑奴的安全，却不能长久地约束白人群体。人们对到底是黑人暴力还是白人暴力先出现争论不休，

1867年，局势正朝着通过暴力或欺骗来消除被黑人控制的方向发展。然而，通过法律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除非白人努力为黑人争取选举权，并且将黑人视为平等的公民，但通常来讲这就像是让他们接受黑人的控制一样，是不可能的。

三K党是一个秘密的恐怖组织，并没有什么集中的领导，最早出现在田纳西州，后来几乎遍及整个南方地区。该组织早期主要是为了戏弄对邻居无礼的黑人和提包客。三K党成员夜里戴着面罩，骑着马，按惯例即兴地向受害人示威，既折磨了受害人的身体也挑战着他们的想象力。该组织经常为了个人恩怨通过极端暴力手段复仇。在选举期间，三K党的暴力威胁竟然成了削弱黑人选举权简单而有效的手段。1871年，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和国会都意识到需要采取特别手段来维持南方的治安了。1871年夏，国会派出委员会到南方的几个核心地区视察并收集了大量的证据、证言。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三K党的种种暴行和重建工作的进程。从1872年开始，恐怖活动逐渐平息。三K党虽然极大地阻碍了黑人享有新的权利，但促进了南方自治运动的兴起。

常态下，南方的政治基本处于民主党控制下，这一点由边疆各州的投票结果可以看出。南方必须吸收被解放的黑奴群体参与投票，国会不能干预。1868年，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和肯塔基州的选票并没有投给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而南部邦联只有两个州没有把选票投给他。佐治亚州的民主党人忍气吞声，在一群黑人中间完成投票。1870年，佐治亚州选举产生了一届保守派州政府。田纳西州从一开始就逃过了黑人的控制。在看到南卡罗来纳州和密西西比州遭遇的麻烦之后，较晚为联邦重新接纳的弗吉尼亚州巩固了白人群体的地位，而且从来没有选出过一届激进派的州政府。1870年，经过一场类似南北战争的争斗后，北卡罗来纳州终于选出了一届民主党当政的州政府。南方邦联的其他州一有机会就紧随其后。1872年，州政府选举进程加速。1876年，南方地区已经没有任何共和党当政的州政府了。在南方，共和党几乎一度销声匿迹。一个很大程度上由黑人操纵的光杆组织，继续享受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官方授予的办公室，从而为该党派的全国代表大会贡献出一个个顺从的代表团。南方的选票几乎都投给了民主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方各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了。



美国三K党成员

白人控制下的恢复工作充斥着暴力压迫和欺诈行为，但如果没有来自北方的默许，这些行为不会屡屡得逞。1872年前，北方激进派的敏锐度减弱了。经过深思熟虑的共和党人开始审视他们的工作并做出自我批评。詹姆士·拉塞尔·洛威尔在书中写道：“我们不可能完成重建南方的工作，除非由南方自己的领袖来领导；我们也不会期望南方站在我们这一边，除非我们的重建工作能真正维护南方的利益。”政治独立人士对这样一个需要军队不断维持的社会秩序失去了信心。随着1872年总统竞选的不断迫近，他们公开表达了对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重建计划的不满，并威胁将阻止他再次竞选。



一个白人老妇到访黑人家庭，暗喻白人和黑人只是表面上的和平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令人不满的第一个任期结束了。他任命的官员都被贴上了偏袒和无能的标签。他任命的最荒唐的官员曾代表美国在伦敦出席活动。这个人出过一本关于扑克游戏的专著，还在一家矿业公司担任领导，而被认为根本不配在政府中任要职。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亲信还包括很多狡诈的金融家。南方的腐败和管理不当实际上都源于对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反对情绪，虽然国会恰当地将一切责任都揽了过来。只有看在他对诚信金融的支持、为改善印第安人的基础设施和为解决与英国的争端而付出努力的份上，总统的支持者们才感到荣耀。

与英国达成和解是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最大政绩。1862年夏，当"亚拉巴马"号逃脱了英国官员的管辖出海作乱后，美国驻伦敦大使便坚持要求英国对联邦遭受的一切损失做出赔偿。索赔要求的提出主要是表达对英国的抗议，即英国作为中立国应该遵守中立原则，阻止一切对美国有敌意的军舰在其管辖的海域出海巡航。面对英国官员的断然拒绝和冷嘲热讽，驻英公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立即起草了索赔要求。他的继任者雷弗迪·约翰逊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但遭到参议院的否决和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萨姆纳的抨击。查尔斯·萨姆纳认为美国南北战争由于英国的介入而延长，所以英国对美国遭受损失的赔偿[3]理应增加。1869年到1870年，国际局势变得紧张起来，处于和平状态的美国盟国也都惊恐万分。边界争端、渔业争端以及英美两国在索赔问题上的分歧都加剧了这种紧张局势。1870年，英美两国匆忙召集高级联合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会议集中解决这些争议，并达成了《华盛顿条约》。在随后的仲裁中，美国获得了成功，虽然查尔斯·萨姆纳的极端观点遭到否定，但美国主要的索赔要求得到了支持。英美关系空前稳定。这是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巨大胜利，同时也对他构成了政治威胁，因为负责谈判的官员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有可能成为反对他的共和党自由派总统候选人。



詹姆士·拉塞尔·洛威尔



总统任上的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

共和党自由派包括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反对者，还有对其不满的各类改革家。伟大的德裔美籍独立人士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是共和党自由派的领袖。霍勒斯·格里利和他的《纽约论坛报》为了支持共和

党自由派下了不少工夫。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对共和党自由派很是关注。萨蒙·波特兰·蔡斯想要得到共和党自由派的支持来获得提名。像怀特洛·里德和亨利·沃特森这样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想控制共和党自由派。文官制度改革家组成队伍加入进来。他们对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非常失望，因此寄希望于新的政党，以改进政府职能。1872年5月，共和党自由派在辛辛那提市召开大会，提名霍勒斯·格里利和格拉茨·布朗为候选人。在演讲中他们公然谴责共和党的重建计划，强烈呼吁恢复南方自治，主张文官体制改革、铸币支付以及维护公共信用。民主党从中看到了联盟的机会。1872年7月，民主党在巴尔的摩提名了同一名候选人，这样，分裂变得更加具有威胁性。



《华盛顿条约》美英双方代表的合影：站立者从左到右分别为滕特登勋爵、约翰·麦克唐纳和蒙塔古·伯纳德，就坐者从左到右分别为斯塔福·诺思科特、乔治·罗宾逊和爱德华·桑顿

美国再没有比霍勒斯·格里利更离奇古怪的政治人物了。他是从编辑部走到政治演讲台的人。长久以来，霍勒斯·格里利致力于追求新闻自由。他有过很多主张，包括推动一些不受民众欢迎的社会改革，也曾经不断地否定自己又不断地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托马斯·纳斯特辛辣的讽刺漫画非常善于描绘这样的人物。没有什么能像他荒诞漫画中的对比那样强烈，竟能唤起南方政党支持那些抵制南方奴隶制的有志之士。

在费城召开的共和党代表大会再次一致提名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

为总统候选人，并拒绝让副总统斯凯勒·科尔法克斯连任，转而选择亨利·威尔逊为副总统候选人。1868年，共和党的政治纲领的主题全是追溯往昔的杰出成就，以及该党如何为了南北战争、南方重建和财政业绩而承担全部责任的事迹。自1860年以来，共和党首次在所有州为候选人拉票，并毫不费力地将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推上总统之位。并不和谐的民主党——共和党自由派联盟也增加了共和党在竞选中的权重。从南方回来的人们证实了人们的猜测，即南方即将迎来地方自治。

四年后，南方政府完全恢复自治，不再频繁地参与国家事务，转而继续重振南方经济。在战后的废墟之上，南方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在战后的废墟上逐步恢复人口、振兴商业。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南方也远没有将其政治归于国家统辖之下。



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



霍勒斯·格里利

[1] 南北战争后利用南方局势不稳投机谋利的人，因经常手提毡制旅行袋而得名。——译者注

[2] 主张白人、黑人按比例选举代表的政治团体成员。——译者注

[3] 约二十亿美元或者用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全部北美属地作为替代。——译者注

第4章　1873年大恐慌

“西部政界不是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走向腐败的吗？”1868年，记者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在思考商业与政治的关系时曾这样深刻地批判道。他给了自己一个肯定的回答，并且发现在美国引以为傲的知识分子阶层中有着与他同样悲观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在至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对诚信的回归感到绝望。在牛津大学获得民法博士学位的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在文坛享有盛誉。1876年末，他充满疑惑和沮丧地质疑道：“道德风气败坏就是实施民主的结果吗？我们的政府是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吗？还是为了无赖的利益而以牺牲这些傻瓜为代价？”

他们言辞犀利，但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由战争英雄们执政的这些年，商业在改革中挣扎。如果他们能预见到下一代领导集体的努力，注意到政府新思路的进步、慈善事业和社会救济的不断扩大和政府对全国教育事业的投入，就不需要如此绝望。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创办的《国家》杂志传播崇高理想和深刻评论，但他却不能靠着这些来维持生计。渐渐地，他心灰意冷，仅有的一块地也荒了。在那个时期，年轻的大学校长们在这样一个乱象丛生的国家甚至都找不到谋生之道。在哈佛大学，查尔斯·威廉·艾略特打破了陈旧的人才培养途径；在密歇根大学，詹姆斯·伯里尔·安吉尔证明以税款扶持的政府机构是可以维持健康、学术、非政治性的教育的；在一所新建的大学里，一个叫约翰·霍普金斯的个人捐助者让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有机会证明，在充分民主的环境下，创新奖学金是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1868年，美国基础建设的健全性正如它在1861年拥有的财富一样不可靠，当时，引发暴乱的表面因素暴露出美国公信力不足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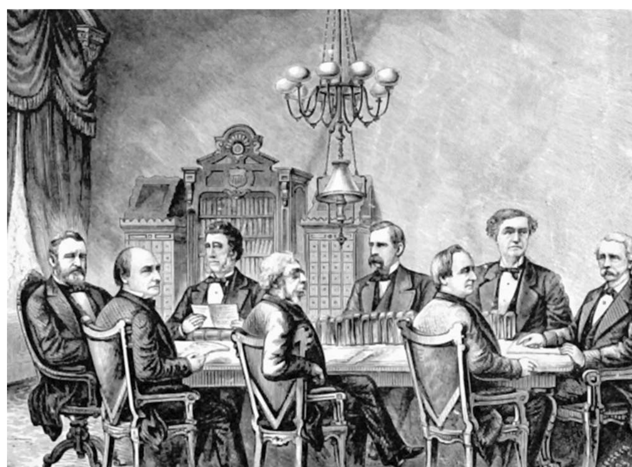
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的漫画形象



青年时期的查尔斯·威廉·艾略特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执政期间，各种丑闻频频曝出，举国震惊，一次又一次让人们对他失去信心。他执政的第一年，杰伊·古尔德和詹姆斯·菲斯克觊觎黄金溢价并试图垄断市场，而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

特公然与投机者交往，招致颇多指责。经过一番抵抗之后，威廉·马格尔·特威德终于遭到检举揭发，被判入狱，由此暴露出城市里官商勾结的种种丑闻实为国家耻辱。罗伯特·卡明·申克和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虽然没有这几位出名，但也算不上廉洁。后者被指控用莫须有的政府赠地修建铁路而在法国被捕。1864年，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与之前的共和党组织和激进派的名誉领袖走得很近，使自己声名狼藉。在伦敦做外交大使期间，罗伯特·卡明·申克在一家矿业公司任董事。他购买股份的钱是从该计划的发起人那里借来的。后来，该公司面临破产并涉嫌欺诈，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不得不将其召回。在看到这些人的不忠与道德的堕落之后，评论家们已经准备在重建政府发现更多官员堕落的证据。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与他的内阁成员



罗伯特·卡明·申克

1872年竞选期间，腐败丑闻继续曝出。当时，有信件曝出国会议员收受贿赂或其等价物——成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幕后股东的始末。动产信贷公司的丑闻震惊了各行各业的人，从副总统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开始，到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威廉·博伊德·艾里森、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亨利·威尔逊、鲁弗斯·道斯，还有其他一些前政府官员都榜上有名。一些人拒绝认罪并自证清白，但没有人能完全摆脱嫌疑——他们对廉洁官员的定义过低，而他们代表了当时共和党人的各个阶层。其中，在1870年，斯凯勒·科尔法克斯还曾毫无顾忌地谈起自己收到的礼物——国会议员送的马车以及快递公司送的马匹。

1872年，声名狼藉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想要成为马萨诸塞州的州长。他并没有得到共和党的提名，却能获得候选资格。这着实表明，为了达到目的，很多选民蒙蔽了自己的双眼，对其不加任何批判。他厚脸皮地在国会中继续任职，并提出法案，要求提升华盛顿官员的工资待遇。同时，该法案也适用于支持该议案的国会议员，并且具有追溯效力。该议案的制定者们后来回到各州向选民们解释他们在“强索工资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其中很多人再也没能回到国会。



讽刺漫画：政府官员牵涉动产信贷公司的丑闻

在第二任期中，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内阁成员的其他不端行为逐渐曝露。战争部长威廉·沃思·贝奈普承认了自己卖官的事实。财政部更是被曝出威士忌欺诈的丑闻，就连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的私人秘书也身陷其中。众议院议长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则被曝出向一家铁路公司索贿，并承诺不会在将来运营时成为“该公司的免费乘客”。



“强索工资事件”：政客们指责对方抢工资

没有什么能比对慈善家、金融家杰·库克的描述更能说明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商业道德问题了。他毫不犹豫地向当时的政治领袖大献殷勤，可谓真挚虔诚、无私慷慨，利用自己的账目帮助他们秘密进行投机，并为政府提供官方服务。在他并不光彩的一生中，无从得知他的文官生涯

在哪里终结，而他的秘密薪水又从哪里得到。杰·库克是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好友，也是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子女的自由赞助人。1873年，他的银行经营失败引发恐慌之时，他还在位于费城外的乡村别墅里款待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



杰·库克

国外以及美国国内金融界动荡不安了好几个月，但几乎没有人能预料到在杰·库克的银行停业后，1873年9月18日，美国信贷全盘崩溃。因为如果这家银行倒了，其他银行也不会安全。在南北战争期间，杰·库克凭借自己的能力为美国公债找到了市场，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战后，他又将自己的能力和声誉带到了铁路领域。1869年，他成为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财务代理。客户们因为看到该公司之前的投资项目赚了大钱而选择继续在杰·库克的指导下进行投资。他个人的追随者也有很多，并且对他充满信心，认为杰·库克的信用就像政府的信用一样可靠，因为政府债券就掌握在他手里。杰·库克垮台之后，曾经让他信心满满的北太平洋铁路公司也已严重超负荷运转。恐慌迅速蔓延，纽约证券交易所关闭了十天之久，以阻止强制抛售可能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四十八个小时之内就至少有三十个银行受到冲击而倒闭。位于商业中心的其他银行也紧随其

后，各种交易因为银行代理的瘫痪而停滞不前。

美国各地区的恐慌程度通常并没有什么区别。在第一波危机中，银行纷纷倒闭，不能满足储户和原始债务的运转。储户们既不能拿回原有的存款，也不能通过原来的途径拿到贷款，最后只能走向破产。银行纷纷倒闭之后，铁路、房地产和工厂也相继倒闭。损失开始遍及各公司的员工、承包商及债权人。美国信用全面崩塌。投入的资金遭受部分甚至是全部损失，还有些则面临无限期的拖欠。数日之后，严重的危机终于过去了，但它带来的大萧条使美国商业陷入全面停顿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工业进步是时代的标志，其发展是必然趋势，然而当时并没有出现什么新企业。从1873年到1879年，美国逐渐从恐慌的黑暗与脆弱中走了出来。

杰·库克的破产引发的这场恐慌带来了五年的经济疲软，其真正原因在于南北战争时期的扩张。19世纪60年代，随着机器应用得越来越广泛，美国的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在满足了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之外还有结余，可以投入基础建设事业。在美国国内创建并通过从国外贷款增加的投资项目刺激了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投机行为。美国对市政建设的投资逐年增长，却没有任何收益。投资铁路收益很慢，而且若投资失误，那些资金就再无收回可能。同时，美国要面对的还有在南北战争中遭遇的损失。波士顿和芝加哥发生的严重火灾无疑雪上加霜。1870年，盈余几乎被消耗殆尽。盈余一旦耗尽，新企业的发展停滞，而首先停掉的一定是筹划不周的项目，否则会拖累其他项目。实际上，在杰·库克破产数月前，美国商业就已经接近危机边缘。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寻找市场失败继而引发破产，陷入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



纽约证券交易所外景



1873年，聚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外等待抛售股票的人群

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货币系统的缺陷就明显暴露了。因为美国信贷的上升、商业的发展以及绿背纸币的缓慢增值，美国货币系统增加了

商业的不稳定性，加剧了恐慌的程度。1865年以后，美国商业交易的频率与总量增长得比货币流通量更快，导致货币流通量增大，更由于需求增长而导致价值上升。由于美元的购买力增加，由绿背纸币作为衡量的物价必然下降，每笔等价的债务必须要以指定数额的美元进行偿还，因而随之稳步上升。来自新农场的产品大量增长，并由新修的铁路运送到各地，为新工厂提供原材料，从而导致物价下降，即使以黄金进行交易。在这个物价下降而现金增值的时期，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大。债务人的负担越来越重，而债权人却不劳而获。以固定工资或收入为生的人在这些波动中频频受益，但对于债务人来说商业交易就变得更加困难。

1868年竞选期间，组织有序的绿背纸币运动在政治上表现突出，并且对1873年以后仍处于艰难时期的债权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1869年，共和党代表大会通过一条关于“加强公共信用”的决议，批准了一系列政治纲领。决议宣布“美国将以自己的信誉郑重承诺铸币或其等价物（绿背美钞）的支付”，也不会利用贬值纸币来偿清债务人的“法定货币”，即债券。所有战前或早年形成的债务遭遇贬值，后期的债务反倒获得了增值。

尽管有此保证，有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作为领导，但恐慌过后，在两党之中支持绿背纸币膨胀的人更多了，他们试图让国会改变政策。在恐慌的关键时期，财政部长威廉·亚当斯·理查德修订法律，重新发行了两千六百万美元的绿背纸币，也就是曾被休·麦卡洛克撤回的绿背纸币。最终，他仍将发行的总数提高到3.82亿。1874年，国会通过一条法案，将这个数字增加到四亿，该法案被反对者称为“通货膨胀法案”。让很多人意外的是，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强烈否决了该法案。考虑到这种不能兑现的纸币可能带来的种种坏处，他选择坚持自己1869年的观点。当年冬，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力劝国会采取措施兑现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曾经做出的承诺。1875年1月14日，财政部规定，1879年1月1日起恢复铸币支付，即用黄金赎兑绿背纸币。



俄亥俄州参议员约翰·谢尔曼

最终国会没有通过绿背纸币党极力呼吁的拒付法案，但绿背纸币运动的繁荣带来一系列新的麻烦，正是这些麻烦让像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和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这样的人陷入困境。东部人面对西部问题基本上像他们面对南方的种族问题一样一窍不通。他们倾向于将不诚信的内在原因归于通货膨胀运动，而忽略了其真正的根源——人们对经济状况的不满。格兰其运动的出现让公众对西部道德标准更加怀疑，而恐慌的出现使该运动扩大了规模，并使它的重要性得以凸显。

1873年到1874年间，美国的西北部地区突然出现一个半秘密状态并带有仪式感的社团，成员自称"美国农业保护者"，但通常人们称其为"格兰其"[1]。在各地的农民俱乐部和农场，格兰其社团纷纷成立。开会时，格兰其成员对政治侃侃而谈，而妻子们则负责为他们准备野餐饭菜，孩子们在门外玩耍。自1867年成立以来，这个社团只是在名义上存在，但恐慌期间却意外地满足了新的需求，发展得极其迅速，曾在一个月内拥有了超过一千个格兰其分会，直到1874年达到最高峰——两万个格兰其分会以及一百六十万会员。从理论上来讲，格兰其分会是按照其所属州来划分的，但后期统一合并为美国农业保护者协会。实际上，格兰其的活动全部在俄亥俄河北部，甚至是芝加哥的西北部一带进行。



格兰其运动的海报

格兰其运动表达了广大美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影响了党派以及政党领袖的行为。与此同时，西北部地区——伊利诺伊州、威斯康辛州和艾奥瓦州——的议会躁动不安，对铁路和铁路管理抱有敌意。这种态度后来成为格兰其的特征之一。经人民认可，1871年至1874年期间，这几个州先后通过了一系列对铁路进行管控的法案，一开始被称为“格兰其法案”，使美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益匪浅。

在东部人看来，绿背纸币运动是恬不知耻的赖账行为。格兰其运动似乎有没收充公的意味，每个格兰其法案都规定了政府当局关于稳定铁路运价的管理办法。这两个运动都应该放到具体的环境中来考察，这样至少可以解释西部人呼吁使用绿背纸币的热情。同时，格兰其运动也表现出西部人令人刮目相看的长远眼光。

南北战争时期是美国铁路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1873年恐慌之前，很少有铁路是由当地修建的，也很少有人能预见，铁路远远不只是为方便出行提供一个除公路和运河之外的选择。1837年的恐慌过后，美国工业开始复苏，所修铁路的长度与日俱增。在1857年又一次恐慌抑制商业发展之前，低洼沿海地区的铁路已完工，阿利根尼山脉被数条延伸向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方向的铁路干线覆盖。那些年修建的铁路只是在已有铁路基础上的增补线路，如伊利运河线、俄亥俄河线和密西西比河

线，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新线路。这些线路将繁荣地区连接起来。新企业的管理者们盘算着从现有的生意中获取更多利润。

19世纪60年代，美国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有的是等待被征服的新土地。大型企业的老板们开始考虑利用公有土地进行发展和投资，并在他们自己一手创建的商业圈寻找新的利益。自然的水路和陆路很少能覆盖芝加哥西部地区，铁路却修到了这片新土地，除了铁路线之间的竞争，没有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可以与之竞争。1857年到1873年间诞生并发展起来的社区是铁路的产物，并依附于这些铁路线。

威斯康辛州、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乃至整个西部地区都不可避免地对铁路产生了依赖，而这种依赖也给这些区域的历史涂上了一层新的色彩。虽然当时还没有面面俱到的铁路服务，但铁路还是吸引着广大美国人蜂拥而至，成了大众运输的新宠，无形中给铁路公司带来了强烈的利益刺激。一旦铁路建成，各地区的民众开始在铁路上消费并出资维护，形成对铁路的依赖。这时，反对修建铁路的声音开始出现。这些铁路通常是用从东部借来的钱修建的，导致债务人和债权人站到了互相指责的对立面。

因为大托运人往往能拿到批发价，而小托运人出价最高，所以私营运输商在零散客户那里能拿到最高利润，渐渐滋生了对铁路公司的敌对情绪。受宠、歧视、回扣就是当时铁路生意的真实写照。铁路公司的经理们对这些反对的声音做出反击，并不是出于对维护统一收费的义务，而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威胁。

在如西北部地区这样依赖铁路的地区，很快就出现了如差别待遇或定价过高的不公平现象。东部地区因为存在线路之间的互相竞争，同时对铁路带来的利益没有那么依赖，所以这种现象并不明显。经济繁荣时，人们虽牢骚不断但也都接受了这种收费方式；经济萧条时，越来越多的绿背纸币压榨着西部的债务人。1873年的恐慌导致美国各地商业停滞，广大农民迅速采取行动，开启了他们共同的事业。他们以格兰其组织原有的架构为基础并赋予了它新的生命。1874年，农民通过该组织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让人们不得不注意到他们的存在。

格兰其法案试图建立一条新的法规，即鉴于铁路运营商提供服务的

性质和享有的特权，铁路具有私营公共事业的性质。在很多情况下，因为经济不景气而想要责难铁路的冲动使人们忽视了这条原则，但在所有法案当中该原则显而易见。习惯法有条旧规定：船夫、面包师和旅馆老板受政府管辖，而现在铁路与这些行业划归一类了。威斯康辛州通过的《波特法》制定了一个分类价目一览表以取代该州原有的铁路价目表。伊利诺伊州成立了铁路与仓储行业委员会，负责对铁路收费定价和取消仓库租赁合同等事宜。在艾奥瓦州，最高定价由法律决定。

铁路公司并没有立刻明白新法律的真正意义，纷纷谴责这些法律没收了它们的收入，并在法庭上痛斥格兰其法案，认为该法在理论上毫无根据，且并不适用。纵使铁路公司接受调控规则，这些法律制订得漏洞百出，几乎难以实行。仅仅根据反对铁路的立场而选出来的农民立法者既不可能在立法中保持公正，也不具备专业知识。这些法律与1873年的恐慌几乎同时到来，因此其法律效果难以准确衡量。多年前，这些法律就已完成修订，但铁路公司的反对声音仍无消减。它们的争议基本上基于两点：一是政府当局调控定价的权限问题，二是州政府调控与国会管理州际贸易的权力是否兼容的问题。

1876年，铁路公司控告格兰其法案违反宪法一案从州立最高法院一直上诉到了美国最高法院。1877年春，美国最高法院对芒恩诉伊利诺伊州案做出终审判决。在这起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意识到“控制铁路公司的实质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调控他们的权力”，认为“当事机构（本案中的仓库）自未经允许自发成立之时，就应该服从于州议院基于公共利益的管制”。同时，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定价法案》，宣布该法案并不侵犯国会权力，并正式批准了一条新的法律条文。

格兰其案件的影响延伸并渗透到美国下一代人的生活中。政府干预的必要与日俱增，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明白，这种控制不能由演说家或者分肥者来执行，而需要科学的策划与可持续的政策。格兰其案件给美国带来了诸多影响，进一步塑造了美国的行政方式。

格兰其运动与1873年的恐慌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不久之后，它又出现在西北部地区。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它很快就消亡了，仅留下成为纪念的调控规则。随着西北部地区逐步恢复昔日的繁荣，新的利益点相继

出现。事实上，早在1877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判决之时，格兰其运动的热情就已消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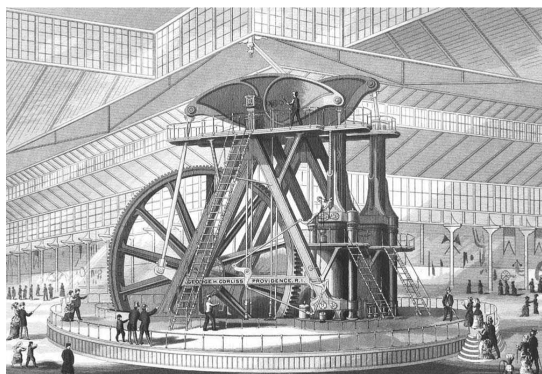
1876年，美国以一种低落暗淡的景象迎接独立后第一个世纪的终点。一方面，悲观情绪在东部精英阶层中间迅速蔓延，公共事务的各个环节都因为高官的行为而备受质疑；当时的南方通过大规模的暴力和欺诈手段争取地方自治；西部仍然处于恐慌之后的萧条之中，对金融状况已丧失信心。另一方面，费城已经在筹备美国独立的百年庆祝活动。在独立后第一个世纪结束时，美国仍然像刚刚获得独立时那样充满希望。

1876年，费城博览会的召开就是对美国独立一百年来发展历程的展示。虽然被随后的各种世界博览会赶超，费城博览会还是广泛地展示了美国的强大资源，也让人们深刻地认识到美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差距。国外展品首先对美国产品的丰富程度和精细程度产生了影响，随后又刺激美国向更高的艺术标准发展。在独创性方面，美国人的智慧足以应对所有竞争。但很少有美国人到国外实地考察，所以他们并不了解那些其实很廉价的生产工艺。结果，无知让美国人陷入一种未经实践证明的优越感当中。百年纪念进入倒计时，美国也开始向欧洲的更高标准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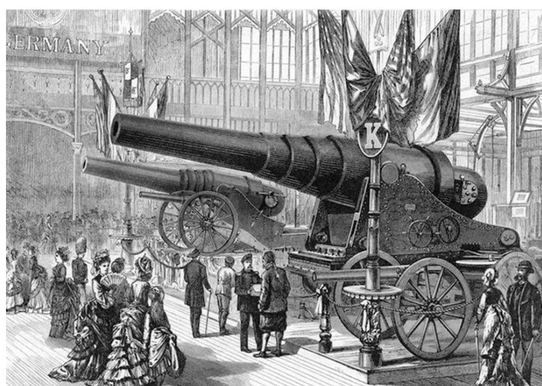
1876年夏，科罗拉多作为第三十八个州加入联邦。自采矿者向着“派克峰或破产”的目标涌向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平原以来，转眼十七年过去了。在采矿的间歇，他们将采矿营地变成了永久的居住地。1864年，他们得到授权将此地建为州，但他们拒绝接受这项任务，因为当时此地只有少量居民。由于印第安人战争的影响，他们几乎完全与美国隔离开来，因而恳求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为他们修通横贯美洲的铁路，但结果却让他们失望——铁路从夏延而不是从丹佛经过。1870年，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一个分公司终于将铁路修到了丹佛。尽管后来经历了1873年的恐慌，科罗拉多州开始发展起来。在首次执政期间，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就开始促成科罗拉多加入联邦，但直到1876年他才签署了接纳该州的文件。该州的加入恰逢其时，在美国有史以来麻烦最多的总统选举中，它为共和党候选人又增加了三张选票。



费城世界博览会场馆全景



费城世界博览会展出的科利斯蒸汽机引擎



费城世界博览会展出的德国克虏伯公司生产的大炮

[1] 意为“农场”。——译者注

第5章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执政

1872年，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毫不费力地再次当选，因为当时并没有什么可以煽动党派之争死灰复燃或是引发新争议的议题出现，以前的一些议题不再激烈。当得知联邦陷入危机时，人们持怀疑态度，或者干脆置之不理。还有很多人对此持否定态度，转而在1872年的选举中将选票投给霍勒斯·格里利，但他们这样选择的目的与其说是被民主党的承诺所吸引，不如说是出于对共和党执政的反感。从全局来看，选择联邦或者共和党的习惯还是保持了下来，共和党还是有众多支持者，足以保证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连任，甚至有可能让未来的共和党继任者都从这种政治惯性中受益。

在第二个任期（1873—1877），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政绩并没有什么起色。在此期间，行政当局的丑闻不断曝光，有时甚至快要威胁到总统本人，但最后除了有损他在鉴别力方面的声誉外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实际损害。这段时间也是美国经济萧条和衰退的一个时期。美国把最好的智慧都用在了对商业、教育以及各行各业的管理上了。政治则基本留给那些之前就已经在控制它的人，也就是那些南北战争时期的杰出人士。

南北战争后，美国出现了新的政治形式，但并没有什么改进。虽然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政治中也存在一些不良行为和过当行为，但国家领袖们都能坚持原则，没有通过奸诈的手段或者利用自身的权威去影响政府高层的决策。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将其他争议一扫而光，唯独放大了一个方针——挽救联邦，并且把这个机会给了刚出现的一批具有强烈狭隘爱国主义思想的人。这一类人在重建期间占主要地位。19世纪60年代，这个群体人数不断增长，主要是在战争中战功赫赫、名声大噪的人。他们利用军事上的影响进军政界，但战场上的丰功伟绩在政治上却丝毫派不上用场。

1861年到1876年之间，只有少数领袖能够在政治上成熟起来，透彻地分析政治而不是南北战争中的问题。1876年之前，这些人里最出色

的几位已经离任。林肯遭到暗杀；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已经连任两届总统；泰迪尔斯·史蒂文斯已不在；查尔斯·萨姆纳在临死前从其党派的荣誉榜中被除名；萨蒙·波特兰·蔡斯虽然去世时还是首席法官，但一直郁郁寡欢。如果这些人都还活着，他们一定会在政治舞台上发出光芒。但他们退出了，一大批能力在他们之下的领袖们掌控了这个舞台，这些人只懂得战争，对其他事务几乎一无所知。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执政期间，这些人的丑闻不断被曝出，一度影响了整个共和党组织的形象。他们提出了一个已经不存在的议题，但在这个议题还存在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什么作为。还是有许多选民因为惯性而将选票投给他们。在他们手上，政府已经变成一个谋利工具，再也不值得民众信任。

就算共和党组织将这些歪曲党派形象的二流政客赶走，反对的声音也不会减弱。民主党通过暴力和欺诈手段得以在南方立足。南方的白人公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判断，他们无法容忍被黑人控制的局面，那将是一个比任何政治腐败更加糟糕的局面，因为至少腐败问题尚有解决的可能。曾在南方邦联占有重要地位的党派领袖无望成为国家领袖。北方人控告他们欺诈，仅仅因为他们威胁会做出更加过分的行为，但他们的对手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南方可以为民主党的选举贡献选票，但不可能贡献出领袖人选。



林肯总统遭暗杀

在北方和西部，民主党仍因为它的过去而处于劣势。19世纪60年代

早期，民主党领袖还没有加入联邦党。他们被称为“铜头蛇”，与前邦联支持者一样几乎销声匿迹了。其中，霍拉肖·西摩虽然反对过林肯总统，但绝对忠诚。1868年，他得到了提名，但最终竞选失败。1872年，民主党没有什么可提名的人选了，最后他们锁定了霍勒斯·格里利。就连共和党执政的众多丑闻也帮不了民主党，除非民主党出现一个没有任何不忠或者有同情南方污点的领袖，而且他必须能力够强，足以领导北方和南方的民主党组织。

由于缺乏领袖候选人，在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的第二个任期，民主党转而关注纽约州一个致力于改革的州长，他用实际的改革成果挽回了党派声誉。19世纪60年代，正如那个时期的许多民主党人一样，塞缪尔·琼斯·蒂尔登鲜有成就，但这是个让他引以为傲的时代，因为他自信在他管辖内的公民能够信任他，而他也会给他们带来切实利益。塞缪尔·琼斯·蒂尔登曾是一个平民律师。1864年，他因为“战争失败论”而与其党派分裂。当坦慕尼协会在纽约市的掠夺计划启动之后，塞缪尔·琼斯·蒂尔登与它配合得相当默契。但后来，他又开始反对该组织，并通过起诉特威德集团显示出自己的本性。在党派内部，他带头要求驱除无赖政客。1874年，他当选纽约州长。作为州长，他力证政府腐败并无党派之分，又揭发了两党中的欺诈行为。这一切做得如此雷厉风行且行之有效。1876年，当民主党代表大会在圣路易斯召开的时候，他成了民主党最热门的候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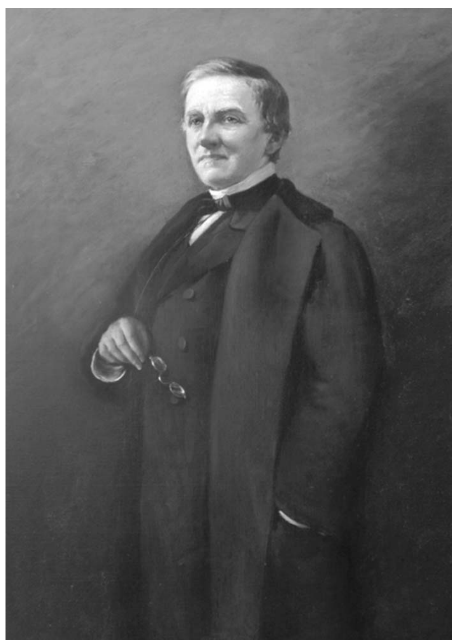


支持霍拉肖·西摩的群众走上街头庆祝他获得提名

与塞缪尔·琼斯·蒂尔登竞争民主党提名的只有那些“受拥戴的地方候

选人”。印第安纳州推选的托马斯·安德鲁斯·亨德里克斯是绿背纸币党。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身份，这个备受质疑的州可能不会被考虑。宾夕法尼亚州推选的是葛底斯堡的战斗英雄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他在战争中的良好战绩为民主党拉了很多选票。其他的候选人则得到了当地人的支持和一些零散的投票，将提名时间往后推延了一轮选举。在第一轮选举中塞缪尔·琼斯·蒂尔登就赢得了一半多的选票；第二轮除了赢得选举必须的三分之二选票以外他还多得了近四十票。托马斯·安德鲁斯·亨德里克斯获得了副总统候选人提名，随后，民主党便投入到改革计划中。

在民主党大会之前数周，共和党就完成了提名，由于缺乏无可争议的领袖人选，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有六个候选人都获得过五十票，在党内只有三个派别能清楚地划分开来。美国政府试图向民众推荐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继续他的第三任期，但收到的反馈显示支持者寥寥无几，反倒是多了几个新的人选——精明的纽约州领袖罗斯科·康克林，以及印第安纳州战时州长奥利弗·佩里·莫顿。彻底的改革者则支持本杰明·赫尔姆·布里斯托——在威士忌酒集团欺诈案中名声大振的财政部长。最大的派别自始至终支持的都是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



塞缪尔·琼斯·蒂尔登



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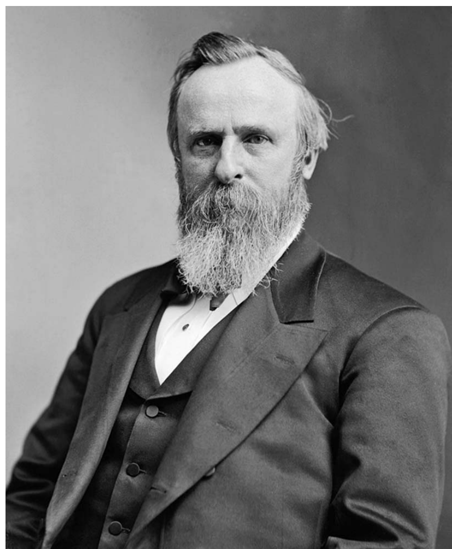
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在政治上的运气证明了一点，即一个政治家在南北战争时期所经历的千难万险能保证他在战后的领导地位。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在战争中历练成一个忠诚的激进派共和党人。他天生极富个人魅力，作为众议院议长，他尽职尽责，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和政治信仰。他从来都没有拥有过什么财富，总觉得有必要通过投机挣点外快以贴补家用。因此，他跟几个铁路公司的老板有了来往，渐渐地模糊了自己作为公职人员的底线，纵使当时还是19世纪60年代。在动产信贷公司丑闻曝出的那段时间，言行失检一度令他名誉扫地，也使他在1876年代表大会前受到一位老同僚的质疑。这是个戏剧性的场景，当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在众议院读着自己几年前写的那些令他蒙受耻辱的“附加一击”[1]的信件时，他试图做出解释，对敌人做出反击，让支持者相信自己的清白，并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勇气与坦荡。但批评者们细细地审视那些信，更加坚信就算他的这些行为不是犯罪，至少也是行为不当，况且任何一个行为欠妥的人都不应该成为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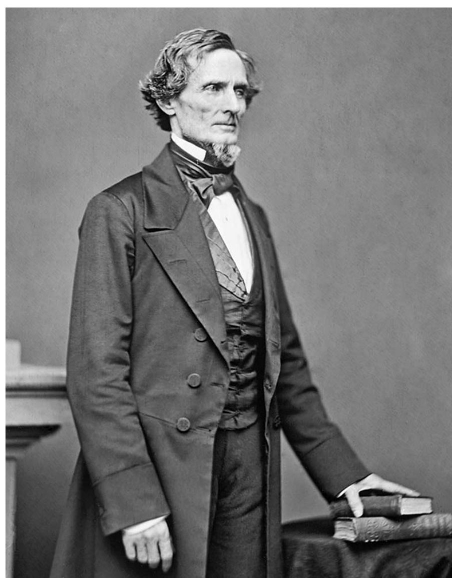
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

尽管有这么多反对的声音，若不是因为中风导致健康问题，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还是有可能赢得提名的。他在代表大会上领跑了六轮投票，但在第七轮时，他的对手却选择了俄亥俄州最受拥戴的候选人——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将军。除了他的军人出身之外，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还因其州长身份留下良好记录。

无论是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还是塞缪尔·琼斯·蒂尔登，都没有带来任何政治议题。他们得到提名只是因为符合候选人的条件而已，并且对于公众提出的所有问题，两党都有众多支持不同观点的选民。就连在三届竞选中都非常奏效的对忠诚和联邦的呼吁都没能刺激美国选民。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的演讲很有号召力。他将此议题重新修改并提出要赦免杰斐逊·汉弥尔顿·戴维斯，但他“挥舞着带血迹的衬衫”[2] 的疯狂举动并没有唤起大众的热情。战争和重建工作都结束了，两个老党派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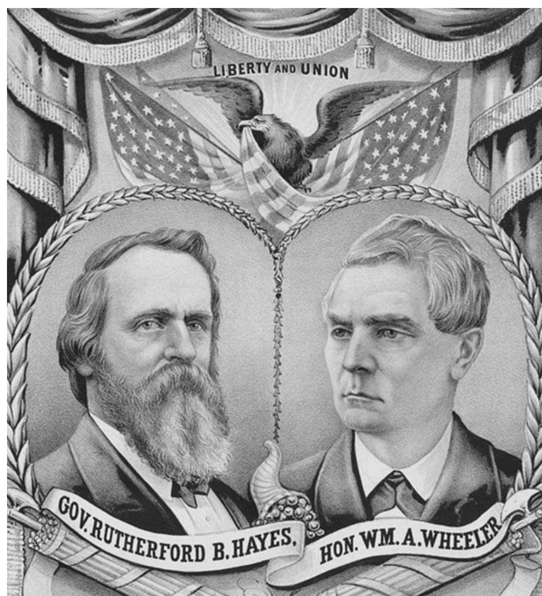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



杰斐逊·汉弥尔顿·戴维斯

在拉选票的过程中，人们对议题性质充满疑惑；同样地，在统计选票时，人们也质疑投票结果。塞缪尔·琼斯·蒂尔登比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多二十五万票左右，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就会赢得总统选举团的多数支持。来自总统选举团的三百六十九票中，塞缪尔·琼斯·蒂尔登和托马斯·安德鲁斯·亨德里克斯毫不费力地得到了一百八十四票；而拉瑟福德·

伯查德·海斯和威廉·阿尔蒙·惠勒也不差，得到了一百六十六票。剩下的十九票（来自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都受到了来自两个党派的影响，而且几乎都建立在欺诈的基础上。只有获得这十九票的支持，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才能反败为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共和党开始行动。



美国总统竞选海报：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左）和威廉·阿尔蒙·惠勒（右）

在总统选举团投票到计票之间的几周内，美国人对于即将到来的结果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根据《宪法》规定，公布选举结果时，国会应该召开两院的联席会议，并由副总统主持会议，启封各州的投票结果，方可开始计票。但《宪法》并没有规定由谁来计票，也没有规定在两个可疑的票数出现时该以哪个来计算。因为选举的结果将由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来决定，所以必须在1877年3月4日之前找到解决方案。

由于在《宪法》中并没有找到针对目前情况的规定，国会决定，成立选举委员会来承担相关工作。选举委员会包括五位参议员、五位众议员和最高法院的五位大法官共十五人。如许多历史学家一样，他们也没能让美国人民相信到底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选举人的说法更可靠。所谓诚实的人信仰也各不相同，委员会成员们始终坚持自己党派的主张。因为十五个成员里有八个是共和党，结果是决定性的十九票一票也没有

投给塞缪尔·琼斯·蒂尔登，使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的当选成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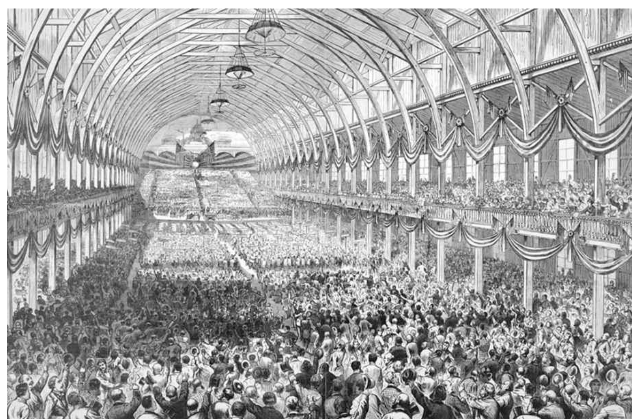
选举委员会重新判定总统选举结果

对于这个选举结果，党派之争异常激烈，本来占据优势的民主党坚称对方抢走了自己原本唾手可得的总统之位。除此之外，当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宣誓就职时，他的追随者跟塞缪尔·琼斯·蒂尔登的追随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清晰的界限。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对此也很苦恼，他手里并没有一个能将自己的政党团结起来，并组成一个有力政府的纽带。

正如前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和马丁·范布伦，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是由于政党的精心策划（而不是凭借人民的支持）才被推上总统之位的。像他们一样，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也不得不去对抗政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他在行政管理上被迫走的每一步都让他狼狈不堪。一开始，他对待南方的政策就疏远了很多共和党人。

早在选举之前，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就已得出结论：南方的高压政策必须解除。南方人民必须在南方的制度下充分自治，如果该制度导致他们受到侵害，也必须由他们自己承担后果。这意味着，在最后一个回归联邦的州，保障共和党政府地位的驻军必须回到民主党的管辖之下。同时，这也意味着持有南方威胁论的人以及将南方威胁论视作政治议题的人将对总统进行攻击，用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的话来说就是“一群无赖控制着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一上台就开始践行他的主张，撤回军队，将南方的问题交给南方人自己解决。国会制

订的政治重建计划在每一个环节都出现了问题，体现在修正案里的宪法重建是否会永久生效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宣誓就职现场

除了抢走政客们的努力成果之外，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还剥夺了他们的战利品。他的妻子主张禁酒，给白宫带来了美国标准中产阶级家庭的氛围。但家属的个人行为丝毫没有为他在华盛顿的受欢迎程度加分。他在政治上对各个政府机关的掌控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1872年，虽然许多共和党自由派人士仍然对自己的党派不满，也看不到该党决心做出改变的任何希望，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将选票投给了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还有一个人甚至成了新任总统的内阁成员。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做了内政部长，第一次给政府机关带来了文官制度改革的希望。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国会就进行过一次相对保守的文官制度改革实验，但不久就流于形式。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宣布将根据个人能力任用下属，后来他也这么做了。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的妻子露西·海斯

一场有关分肥制的风暴随即朝着内政部长席卷而来，并且很快波及总统。政府各个机关不仅汇聚了很多参议员与众议员，控制着众多拥护者，同时也是将各个政党组织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因为缺少共同的奋斗目标，政府机关的这种黏合力就显得尤为关键。但在这场争斗中，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基本上是支持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的。值得一提的是，印第安人事务局从新政策当中受益。不久，因管理不善，美军与印第安人爆发了两次激烈的冲突。在其中一场冲突中，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战败身亡；而在另外一场冲突中，约瑟夫酋长带领着内兹佩尔塞人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中牵制着正规军。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曾经力争提高军队经费以执行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的南方政策。托马斯·纳斯特创作漫画对此进行讽刺，漫画的内容是残暴、野蛮的三K党与国会议员亲切握手，就一项公共政策达成一致。既然印第安人将全部领地加固作为保留地，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和印第安事员预见到改革的必要，就借此时机重整相关事务。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拒绝将所有官职作为战利品送出，并开除了部分有恶性政治活动的官员。其中最典型的一个被开除的官员是纽约

港海关征税官切斯特·艾伦·阿瑟。他的支持者被激怒，包括罗斯科·康克林在内，成了对这个有名无实的党派领袖攻击的主要势力。罗斯科·康克林对新政策的可操作性嘲讽道：“当约翰逊博士说爱国主义是恶棍最后的避难所时，他忽略了字义演变的巨大可能性。”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没有把这个其他总统从来没有过的理想始终如一地贯彻下去，失去了改革者的支持，后来那些改革者就像“坚定派”[3] 那样强烈地抨击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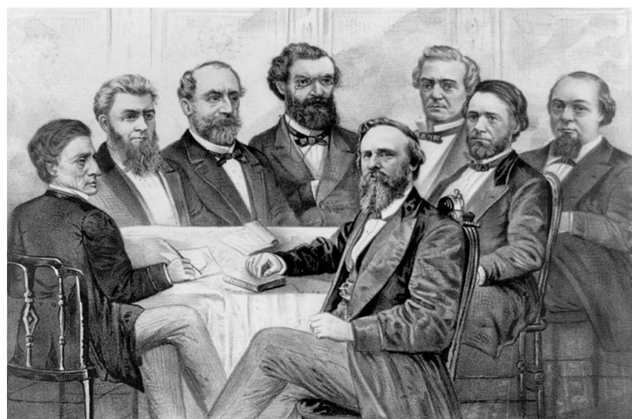


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与印第安人作战·战败身亡



约瑟夫酋长

即使有一个团结的政党能在背后支持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他的行政当局也几乎不可能被贴上“建设性立法”的标签。在1874年的选举中，他的党派已经失去对众议院的控制。1876年与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一起当选的第四十五届国会和1878年第四十六届国会都由民主党控制，足以让行政当局尴尬。不满的共和党人将这个僵局直接交给总统来处理。民主党管辖下的国会审查了行政当局的管理措施，并试图提出自己与之相对的管理措施。因为拨款预算案的失败，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不得不两度召开特别会议。在他执政的第一个冬天，反对的声音使共和党承诺的财政政策陷入危机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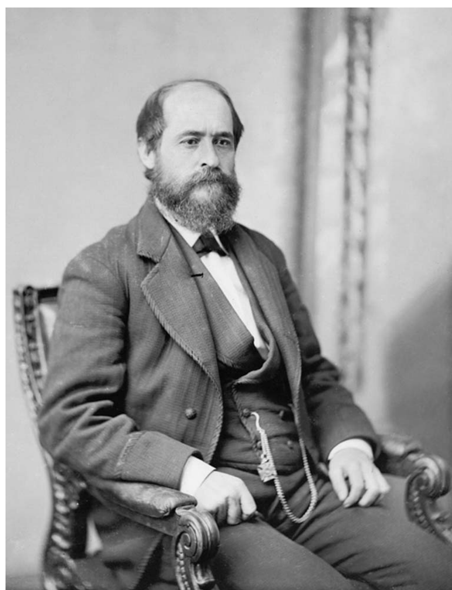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与他的内阁成员

1868年左右，绿背纸币初次引发骚乱。1873年恐慌时期，绿背纸币运动爆发，到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当选总统之后也并未平息。绿背纸币已失去大部分的效力，但在整个西部，在两党中间，还是有一股势力鼓励任何形式的通货膨胀。国会不断争取废除1875年的《恢复硬币支付法案》。1876年，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对其进行了抨击。随着银价突然下跌，一场白银通货膨胀运动紧跟绿背纸币运动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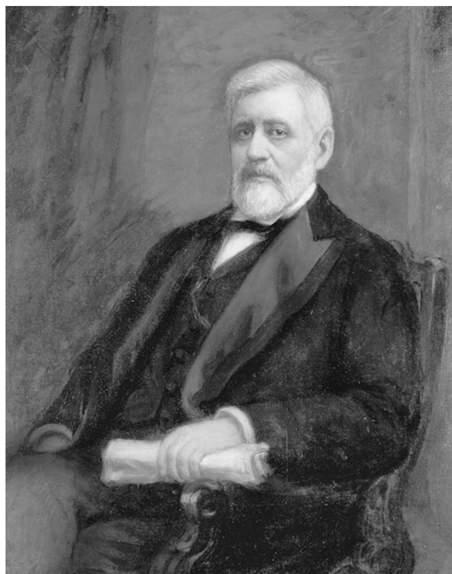
1834年到1862年期间，美国几乎不怎么使用银币，因为十六比一的铸币比率低估了白银的价值，所以用白银铸币不太经济。1862年到1879年期间，美国不用任何铸币作为现金交易，直到恐慌发生的那一年，金银的市场价值接近于往常的平均价值。19世纪70年代，西部新开了九家银矿，导致银价下跌。铸币比率升到了十六比一以上，而从前被低估的白银一跃到了被过高估计的状态。现在，银条持有者可以按法定

价格售出银条以铸为银元，但在停用白银一段时间之后，1873年，国会将银币从本位币的清单上消除。银价下跌之后，矿主们呼吁恢复硬币支付。这一主张也得到了通货膨胀论者的支持，不管是哪种货币他们都希望尽量多发行。1878年冬，在密苏里州的理查德·帕克斯·布兰德领导下，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有关自由铸造银币 [4] 的法案，进入了共和党参议院的考虑范围。

参议院的复金本位论者约翰·谢尔曼不再反对《布兰德法案》。他成为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的财政部部长，并以这样的身份和权力维护复金本位论，支持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对抗分肥者。艾奥瓦州的威廉·博伊德·艾里森为《布兰德法案》增加了一条修正案，取消了该法案自由铸造银币的内容，替换为一条限制内容，即每月购买一定量的银条——从价值两百万美元到四百万美元不等——并铸为银币。众议院通过了这条修正案。1878年2月，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却在对此予以否决。但到最后，该法案还是推翻了总统的否决获得通过。



密苏里州的理查德·帕克斯·布兰德



艾奥瓦州的威廉·博伊德·艾里森

美国政府对这一金融政策感到无可奈何，但没有被击垮。《恢复硬币支付法案》经受住了各种打击。随着恢复硬币支付的迫近，绿背纸币的价格反映出美国信用度的上升。这一天来得比预定的日期提前了整整两周。1879年1月1日周三，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看着经过重重打击并没有受到影响的硬币基础终于迎来转机，约翰·谢尔曼非常满意。流入国库以兑换绿背纸币的黄金比用黄金赎回的绿背纸币更多。霍勒斯·格里利的主张也许是正确的，他认为“恢复的手段就是恢复本身”，也就是说，如果人人都能得到黄金，也就没有人想要黄金了。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对黄金本位论以及恢复硬币支付的坚持使他失去另一个共和党派系的支持。现在，他失去了改革者、分肥者、共和党激进派和通货膨胀论者的支持，没有人指望或是相信他能再次回想起他的承诺，以在1880年再次得到提名并继任总统之位。就像其他竞选议题的崩塌一样，他的党派共和党也完全瓦解。1876年到1880年期间，共和党并没有就某一问题给公众带来任何一个特别的提案，1876年竞选时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加。

两个政党都没有提出新的政策或者出现新的候选人，政府官员也都不是党派领袖。联邦对于议题的执行力下降，美国的工业、社会生活、教育以及宗教也因为政治而停滞不前。除非出现一个新的政治联盟，美

国才有望继续形成竞争政府管理权的氛围。人们开始意识到，形成于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在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执政期间，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已经开始。

[1] 高尔夫球术语。——译者注

[2] 指对民主党的攻击行为。——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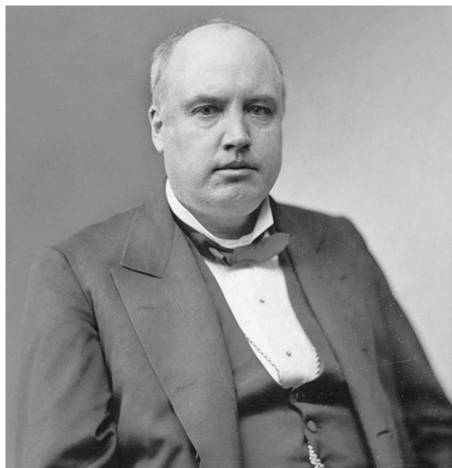
[3]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支共和党派别，也称“司徒瓦特派”、“死硬派”、“中坚派”。——译者注

[4] 19世纪末，美国主要经济议题之一，主张以无限制地铸造银币为特征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也称自由白银、自由银币、自由银币铸造或自由铸银。——译者注

第6章　商业与政治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执政期间，一场商业复兴已经开始影响整个美国。罗伯特·格林·英格索尔预见到了这一点，1876年他这样定义支持的候选人："美国共和党需要真正了解繁荣与复兴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他们就必须一起到来。当他们到来时，他们会手挽手走过金黄色收获的土地；手挽手经过转动的纺锤和车轮；手挽手经过灼热的炉门；手挽手经过舔着火舌的锻铁炉；手挽手经过冒着烈焰的烟囱，与那些辛苦工作的工人亲切问候与拥抱。"1878年到1879年期间，在美国的各个地区和各个行业，商业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制造商们开始进军西部，采矿的热潮给远西区带来了新的生命力。"格兰其"铁路修到了西北地区的麦田，在那里，就连耕地也交给强大的机器来完成，形成了一种新型高产的农耕方式。在西南部地区的平原上，畜牧区不断延伸，形成了新型的"畜牧王国"。东部的工厂区也开始发展。在这个时期，将各个地区连接起来的铁路发挥了新的作用。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美国修建的铁路长度空前。整个美国就好像是从麻醉状态中苏醒过来，测试着自己肌肉的力量，准备投入新的工作。

美国财政部默默地见证了美国在这十年中的繁荣景象。1850年到1860年期间，美国的年平均支出在六千万美元以下；而1880年到1890年期间，年平均支出则在2.44亿美元到2.97亿美元不等，即使这样也没有达到入不敷出的地步。尽管每年消耗巨大，国家积累的盈余也足够应对政府的拮据和国会的堕落了。十年来，国库的总积累量超过十亿美元。



美国的支出上涨得比人口增长更快，虽然这是任何一个新国家都会经历的过程。1860年南北战争爆发前夕，美国人口总量为三千一百四十四万三千三百二十一；1870年增长到了三千八百五十五万八千三百七十一；1880年，这个数字则高达五千零一十五万五千七百八十三。美国居民的迁移率和活跃度增长得比人口更快，这一点从铁路的发展就可以看出——1880年，美国铁路长度增长到了战争爆发时的三倍之多（约8.7万英里）。在原来的边疆地区，人口和铁路增长最快。无论在哪里，人口迁移都非常活跃，而且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专心地审视自己，同时产生了比以往更多的内部矛盾。1878年，莱德维尔银矿事件被视为经济冲突的某种前兆。比这起事件更早的是1877年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和东部地区的铁路工人大罢工。在加利福尼亚州，丹尼斯·卡尼和爱尔兰人打着“美国只属于美国人”的旗号驱赶华人。“莫利·马奎尔社” [1] 制造的谋杀案则给那些在无烟煤矿区无法无天的人以应有的惩罚。整个东部隐约地意识到，一个自称为“劳工骑士团”的秘密社团诞生了。

当时，复杂形势、阶级利益和劳资关系问题将一些人集结在这个社团中。后来，他们占领了该地区，并且开发了大部分的自由土地。美国独立百年纪念掀起了基于爱国主义的美国历史研究热潮。出于对自我剖析的浓厚兴趣，亨利·亚当斯、詹姆斯·斯库勒、约翰·巴赫·麦克马斯特等人纷纷投身于对历史事实的深入研究之中，各高等院校开始设立美国历史教授一职。詹姆斯·福特·罗兹就是其中一位，从政府机关退休之后，他就致力于著书，研究当代的美国历史。接下来的几年中，各个致力于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其研究成果见证着美国作为新国家的存在。



劳工骑士团的徽章

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对于美国历史和制度的研究就开始了，还原了历史事实。事实上，研究关注的是一个基本的经济问题，以及不同视角下在十年中美国所面对的政治问题。



詹姆斯·福特·罗兹

到了1880年，美国已经达到能力极限，再也不能无限制地消耗产出。在独立后的第一个世纪，美国始终保持着富足的状态——足够的食物、足够的工作和自由土地——勤劳的人民从来不需要面对饥饿，虽然他们几乎不可能获取更多财富。像从前一样，人们靠自己的双手和牛马劳力来工作。后来，他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实实在在的机遇

之地。在仅一代的时间里，美国人口数量就增长了一倍，同时号召欧洲所有受压迫者伸出援手改造平原和森林。美国拥有大量劳动力和机遇，很少出现生产过剩和缺乏工作机会的情况。

工业革命从各个方面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性质。1857年到1873年，通信技术的发展成果第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它开拓了待开发的领域，将肥沃的西部平原引向与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农业竞争之中，使美国的主要农作物产量因为运费的降低和产区的扩大而大幅提升。随着流通方式的发展，粮食、棉花和动物性食品比人口增长更快。农场变得越来越小，肥料的使用以及在面积较小的土地上更加精细的耕作方式进一步帮助个体农场主提高了作物产量。

机器的出现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而交通运输的发展则为他们返乡提供了更多的出行选择。在这个新的繁荣发展期，经过重组的工厂认识到，发明创造不仅可以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还能提升产量。机器可以应用于农业、钢铁、纺织、制鞋等诸多领域，使大规模的生产过程接近自动化。当蒸汽机的使用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机器灵敏度的要求时，智慧的人类又发现了电力带来的新希望。

1880年，美国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人口和消费能力的增长速度。然而，美国渐渐发现将产品销售出去一年比一年困难。不难预见，如果不及时做出调整以面对新的问题，生产过剩迟早有一天会成为美国的威胁。美国的应对措施迟迟没有出台，物价开始下降了。

相关研究表明，南北战争之后，本位商品的价格有持续平稳下降的趋势。而战争期间，票面价格体现在贬值的绿背纸币上时，名义价格较常态有大幅上涨，但调整为金本位时，票面价格则并没有什么变化。战争快结束时，物价逐渐下降。1880年，人们开始注意到这种变化，而到了1890年，这一趋势逐渐为大众接受。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1900年，黄金大量产出，银行信贷与支票广为应用，现金的流量与流通性提升，物价上涨。19世纪80年代，通货膨胀论者认为物价水平下降是由黄金增值引起的，并要求增加流通中的货币。生产过剩的出现给物价下降一个比黄金升值论更加合理的解释。下降的物价证明了生产过剩的存在，人们也因此意识到认真研究补救措施的必要。

19世纪8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进，使物价水平恢复正常以及纠正社会不正之风的解决方案越来越多。关税修订支持者称，在适当的自由贸易环境中，关税成为令人头痛的阻碍，而如果没有贸易自由，美国生产过剩的产品就不能走向国际市场。受到保护的制造商们反驳道，只有通过设定更高的关税，制造业才能得到发展，对工人的需求则可以在国内得到满足。一位西部的经济学家并不认同这两个观点。在看到逐渐消失的自由土地后，他认为应对当前形势的关键是另设一种有关土地的新税种。工人阶级一致认为，目前的问题是无限制的移民导致的。在极端理论民主主义者的眼中，原因是政府管理中的浪费和腐败现象。不断壮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队伍认为政府的不作为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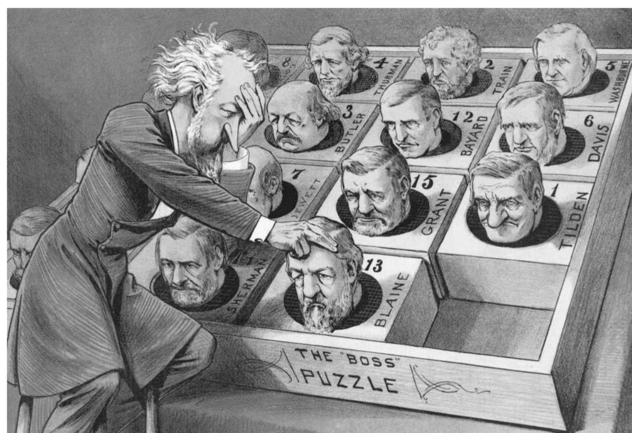
1890年以前，美国就面对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880年，这一讨论才刚刚开始，形势还不明朗，政治领袖们还在对官职的分肥问题争论不休。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在一片不满声中结束了任期，功过则留给历史学家评判。与当代人对他的评价相比，历史学家的评判要柔和得多。他不是政党领袖，却进入政府执政，甚至连一个像样的议题都没有。他疏远了一个又一个的派别，而国会两院都不是共和党的天下，因此他也不能出台任何建设性的法案。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的就职典礼刚过不久，新一轮的提名竞争又开始了。

1880年春，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和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是最有希望得到提名的共和党候选人。前者在以罗斯科·康克林为首的参议院中颇受欢迎，而罗斯科·康克林是被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严惩过的人。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反对美国官员过度参与政治，由此导致切斯特·艾伦·阿瑟和阿朗佐·巴顿·康奈尔被开除公职，也引发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与参议院的长期争论。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赢得了这场胜利，但被击败的领袖们又开始反对总统的南方政策。他们需要一个“强悍的”候选人让南方真正得到控制，认为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是唯一强悍的领袖，并呼吁让他领导政党。1880年，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如同1876年一样渴望胜利。在结束环球旅行返回美国的途中，获得了候选人资格，得到许多南北战争老兵以及对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不满的人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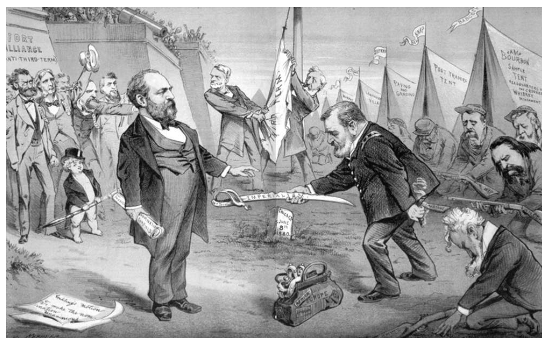
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的支持者与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的支持

者出于同样的考虑。若不是财政部长约翰·谢尔曼的反对，他很可能就得到提名了。因为约翰·谢尔曼的支持者认为，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利用工作之便在支持硬通货的过程中收取了好处。约翰·谢尔曼的支持者中有一股特别的力量，来自一群顺从的黑人代表。他们来自共和党的南方派系，被秘密地带到了芝加哥，在帕尔默旅馆的一间套房内安顿下来，听从约翰·谢尔曼手下的指挥，成批地投票。无论是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还是约翰·谢尔曼，都不能满足美国改革的需要，佛蒙特州的参议员乔治·富兰克林·埃德蒙兹却是个例外。

芝加哥召开的代表大会因为罗斯科·康克林想要争取统一意见和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的提名而令人印象深刻。对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第三任期持反对意见的代表们异常坚定地支持自己的候选人。最后，因为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和约翰·谢尔曼的追随者们转而支持了后者的竞选干事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并在第三十六轮投票中提名他为候选人打破了这一僵局。副总统人选也锁定在罗斯科·康克林一派，最后落在切斯特·艾伦·阿瑟身上。虽然与领袖的意见不一，切斯特·艾伦·阿瑟最后还是接受了候选人的身份。为了纪念共和党曾经的荣耀，1872年和1876年的政治纲领都是“回忆与继承”，对于未来却没有什么清晰的愿景。



政治漫画：罗斯科·康克林在“总统难题”中寻找可能的候选人的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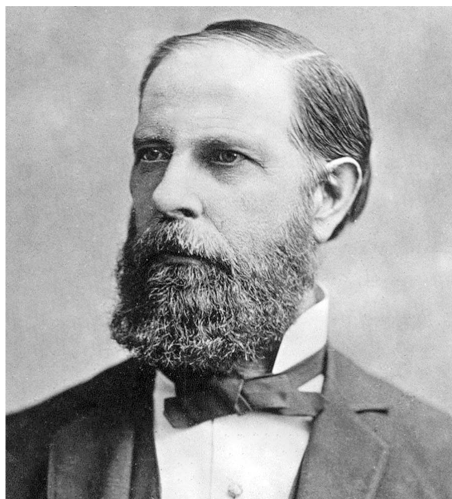
讽刺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提名失败的漫画：罗伯特·爱德华·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向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投降的再版，只不过这次投降的主角换成了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而受降者则是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



切斯特·艾伦·阿瑟

1880年，民主党并没有诞生什么新的领袖或是竞选议题，事实上，这种情况从1860年就开始了。塞缪尔·琼斯·蒂尔登很可能会被再次提名并且继续在1876年没能完成的竞选，但这时他的身体却出现了问题。因此，他不太愿意重新出山，除非民众发自内心地呼吁他参加竞选。在一片混乱之中，民主党转而支持一位自称民主党人、1876年错失提名机会的战斗英雄——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他从来没有积极参政过，现在却战胜了一大批当地的候选人而得到了提名。印第安纳州的威廉·海登·英格利希以富有著称，据说他已经准备在副总统的竞选中以金钱开

道。



印第安纳州的威廉·海登·英格利希

1880年夏，诸位候选人拉选票的游说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而他们的议题大多是有关于个人的。正如1879年约翰·谢尔曼对俄亥俄州的评价，1880年，他对美国评论道：“什么振兴工业、恢复和平与人民幸福，都是共和党企图控制美国的政治诡计。”三届竞选之后，保守派演讲者们对南方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正如一首有关“年轻民主党人”的印第安韵体诗所述：

手持猎枪藏利刃，

快来看看这帮人。

二十四位黑人汉，

辛苦奔命为哪般？

投票选举一开场，

黑人兄弟莫开言。

野蛮行径如这般，

南方何日见青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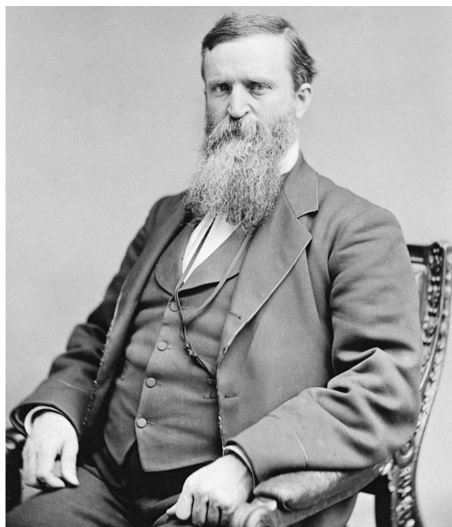
听众们对此并没有什么反应。一位早期的政治记者回忆起竞选末期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生的一幕，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在为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做政治宣传时说道："你们想叠起那件带血的衬衫然后将它放在一边，这对我们来说一点用也没有。这是搁置主要议题，转为自我防守。"直到竞选接近尾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议题才开始出现。

1860年以后，有关保护性关税的主张没有在任何竞选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1868年和1872年，两党都期待着在和平的基础上减少税收，并且为此采取了一些温和的政治纲领。1876年，政治纲领主题更加鲜明，但并没有体现在拉票活动中游说。1880年，在一次演讲中，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被问及关税问题。这一提问纯属偶然，但作为候选人的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作为正规军的指挥官，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闪烁其词地说关税只是一种地方性的问题，将自己的短处暴露给对手。在选举前的最后几天，他的对手将关税问题提升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让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尽显无知，也通过这样的一个计策掩盖了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因为一封伪造的信件而暴露出的缺点。那封信的主要是揭露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和廉价劳工以及华人移民走得很近。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和切斯特·艾伦·阿瑟在选举中险胜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第三位候选人詹姆斯·贝尔德·韦弗带领着绿背纸币党和劳工赢得了三十万八千张选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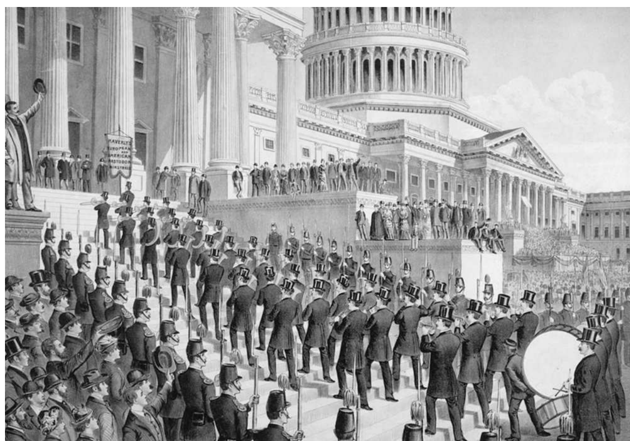
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

1881年，若不是当选为总统，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也许就只是俄亥俄州的一名参议员。他的一生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十年，却见证了他作为典型美国人的职业生涯。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出生于俄亥俄州康涅狄格自然保护区的一个新英格兰移民家庭。他出身农民，却努力拼搏，一路从木头搭建的学校考进大学校园。求学期间，他还在俄亥俄运河上找到了一份拖船的工作。正是由于这样的经历，他在平民中有着很高的声望。大学毕业以后，他教过拉丁语和希腊语，进修过法学，后来进入政界，甚至应征入伍赴过前线。1863年，已经是少将的他离开战场进入国会工作，直到1880年，入选参议院。他是约翰·谢尔曼的支持者，曾做过竞选干事。与他的支持者以及大多数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的看法一致，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认为关税是俄亥俄州走向繁荣的基础。在他竞选期间，来自克利夫兰的年轻商人马库斯·阿隆索·汉纳在当地的制造商中募集资金支持共和党候选人。他们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就职演讲中，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对于威胁到他从政的新议题只字未提，却详细地论述了法律的至高地位、南方的形势、硬通货、宗教自由和行政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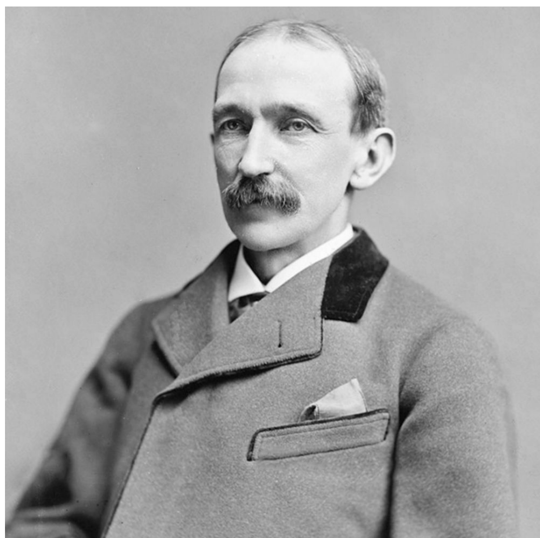


詹姆斯·贝尔德·韦弗

共和党内部出现了分歧，站到与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对立的阵营里。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想通过内阁扭转这一点，希望“有一个在背后支持他的政党”。美国国务院则转而支持他的对手也是同盟的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个人的追随者比任何一个美国政治人物的追随者都多。自1872年退出竞选后，共和党独立派一直心怀不满，只因为宾夕法尼亚州的律师艾萨克·韦恩·麦克维晋升为司法部长而稍感欣慰。在纽约州邮政署的两个任期里，罗斯科·康克林的支持者托马斯·莱缪尔·詹姆斯表现突出，后来被任命为美国邮政总长。在财政事务方面，西部总是嫉妒东部的成就，此时因为明尼苏达州的威廉·温德姆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而略感安慰。“任何一个东部人都可能因为作为‘金钱之王’以及纽约州和欧洲‘金本位支持者’的中介人或者工具而面临指控”。人们欣然接受了整个内阁，但内阁成员承诺的和睦很快就被打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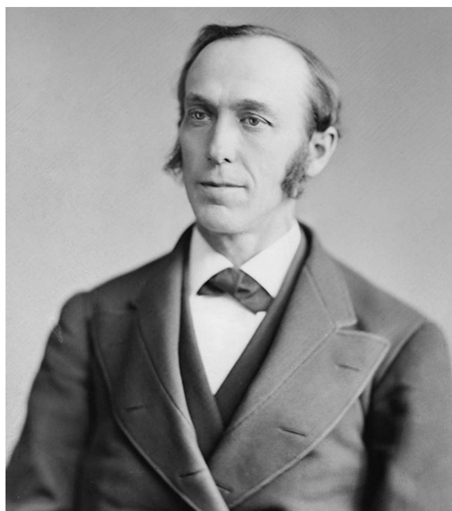
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的就职庆祝活动



艾萨克·韦恩·麦克维

上任几天后，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就任命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为财政部长。这对于罗斯科·康克林是一个打击。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也曾借开除切斯特·艾伦·阿瑟和阿朗佐·巴顿·康奈尔来打击罗斯科·康克林。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决定遵循自己的意愿来安排纽约税收人员的职权。罗斯科·康克林发现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插手该事件，于是转而通过参议员礼遇 [2] 试图阻止对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的任命。当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逼迫总统后，就决定与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决裂，就像当年他与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决

裂一样。这一次，他和来自纽约州的同僚托马斯·科利尔·普拉特一同辞去职务并向纽约州议院提起上诉，然后进入法庭审判。这一策略并不是毫无希望。阿朗佐·巴顿·康奈尔成了纽约州的州长。作为副总统，切斯特·艾伦·阿瑟颇有威望，离开了参议院准备再次竞选并迎接罗斯科·康克林与托马斯·科利尔·普拉特的胜利归来，因为他坚信总统的任命必须征得该州参议员的同意。纽约州议院并没有为这些殉道者洗清冤屈，准许他们回归平民生活。他们的支持者——所谓的坚定派不再支持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



托马斯·科利尔·普拉特

作为罗斯科·康克林的追随者，托马斯·莱缪尔·詹姆斯并没有忠诚到要去步他的后尘，仍然留在了邮政署，虽然他早就发现邮政署大规模的贪污现象。邮政署需要根据邮件的运送方式对其运送路线进行归类，然后在一张总清单上用星号标记那些通过公共马车或骑手运送邮件的路线。这些路线后来被称为“星标路线”。西部民众远离铁路较远，经常需要乘坐公共马车，而星标路线的合同较为灵活，可以满足西部流动人口的需求。当所有邮递路线都在做出调整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时，邮政部门就打着这个旗号随意增加服务项目，加快邮递速度，并且在不重新签订合同的情况下擅自涨价。19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西部较偏远地区，殖民的迅速增长使星标路线的费用飞涨。托马斯·莱缪尔·詹姆斯发现，除了部分涨价合法外，其他均具有勾结欺诈性质。邮政署的主管官员与自称“深谙其道”的前国会议员相互勾结，联合邮递业务承包商，将

业务承包给出价低且无意中标的投标人。将业务承包出去之后，他们不考虑实际需要就提高要价。



托马斯·莱缪尔·詹姆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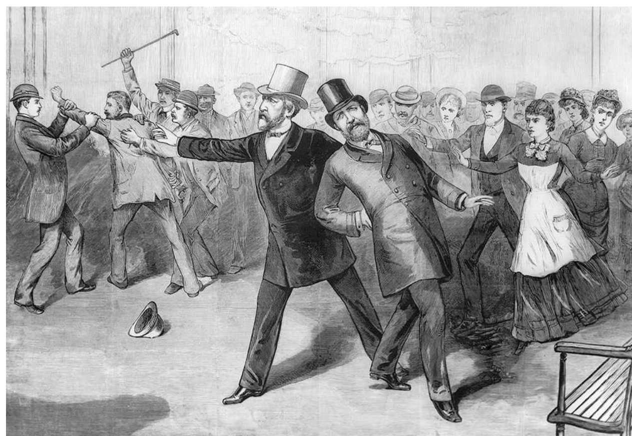
这些不劳而获的所得很快就被狡猾的官商瓜分了，其中也有一部分后来用作共和党的竞选基金。1882年，前参议员斯蒂芬·华莱士·多尔西被控告欺诈。他曾是1880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秘书，也曾急赴印第安纳州挽救该州。他采取的补救措施行之有效，朋友们为他安排了庆功宴，切斯特·艾伦·阿瑟也参加了。在这场宴会上，他治理印第安纳州的手段被模糊地搪塞过去了。邮政署官员托马斯·杰斐逊·布雷迪按照惯例对联邦几个要员职位进行估价，借此敛财作为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的竞选基金。在面对有罪控诉的威胁时，他和其他相关人员伪造了几封信企图证明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早就知晓他们的情况，并且赞成他们的金融政策。他们在抹黑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使自己免罪的路上还能走多远已经永远无从知晓。1881年7月2日，在去参加大学庆祝活动的路上，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遭遇暗枪，1881年9月19日辞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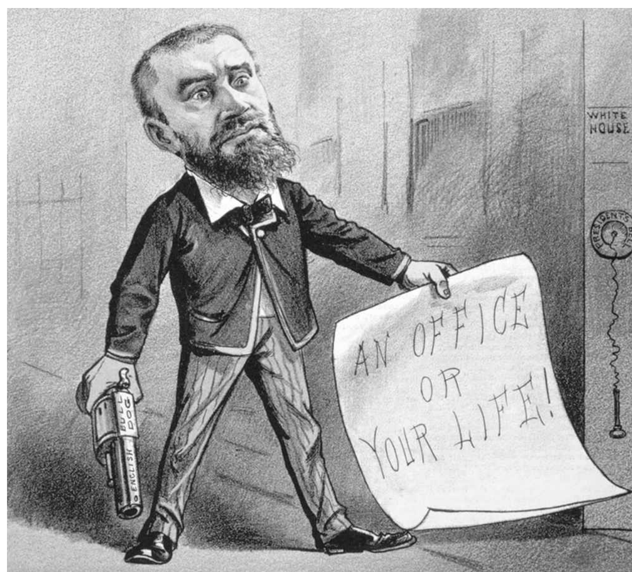
谋杀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的凶手查尔斯·朱利叶斯·吉托对抓捕他的警察说："我是坚定派成员，支持切斯特·艾伦·阿瑟做总统。"不久，人们获悉他是一个失意的政府官员候选人，因为在华盛顿听说詹姆

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的支持者想判他绞刑的谣言，遂起杀机。切斯特·艾伦·阿瑟则认为他只是得了精神病而已。凶手的姐姐，以他的故事写了一本毫无逻辑的书，书中写道：“是的，是‘星标路线’丑闻杀死了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一句‘我是坚定派成员’绞死了查尔斯·朱利叶斯·吉托！”他可能真的是得了精神病，如果是这样，他当然不必负责，但他的罪行与星标路线丑闻和罗斯科·康克林的要求几乎同时发生，情况愈演愈烈，文官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斯蒂芬·华莱士·多尔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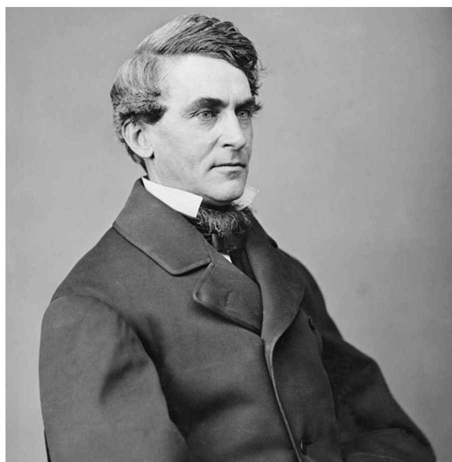


政治漫画：查尔斯·朱利叶斯·吉托拿着手枪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职位或你的命！”

1881年夏，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的伤情拖了整整十一周，公布他伤情的公告板换了一块又一块，牵动着政府里每一个人的心。让切斯特·艾伦·阿瑟继任总统的提议让人们关注到一个事实，即副总统很少被提名继任总统。但经过激烈讨论，最后大会还是决定由切斯特·艾伦·阿瑟继任总统之位。这或许是一个匆忙的决定，又或许只是为了安抚失败的一方。很快，美国通过了《总统继任法案》，对此情况做了充分的说明与规定。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去世后，政府的控制权落到了最讨厌他的共和党派系手里。

作为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内阁的核心成员，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受到了这个噩耗带来的直接影响。应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的邀请，他从参议院调至国务院工作。虽然他也是一个合适的总统候选人，但国务卿这个职位更符合他的要求，让他心满意足。他喜欢与人交际，内心深处有一个民主的愿景。正是这个愿景指引着他去制订一个比其他国务卿的政策更加有建设性的政策。

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注意到，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与英国就地峡运河的谈判一直悬而未决。1881年，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对此事的态度没有得到英国的认同，忽视了美国很久之前就已经接受的义务。他的态度很明确，支持修建一条美洲运河，而这条运河也是他宏伟计划中的一部分。他理想中的美国包括两个大洲，这个理想指引着他憧憬与西半球建立更广泛的贸易关系。在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的支持下，他启程去南美洲调停智利与秘鲁之间那场毁灭性的战争。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去世之后，他一直致力于组建一届能促进各国友好关系的美国国会。当他召集有志之士的邀请刚刚发出，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就重组了内阁，让弗雷德里克·西奥多·弗里林海森出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就这样出局了。这时，已经没有其他公职留给他，他也只能退休回家了。此后他便致力于历史研究，并据此完成了著作《在国会的二十年》。杰斐逊·汉弥尔顿·戴维斯也刚刚完成了他的《联盟国政府之兴衰》。如同美国独立百年纪念，约克城也举行了百年纪念活动。在此期间，这本书一上市便在历史著作领域引起轰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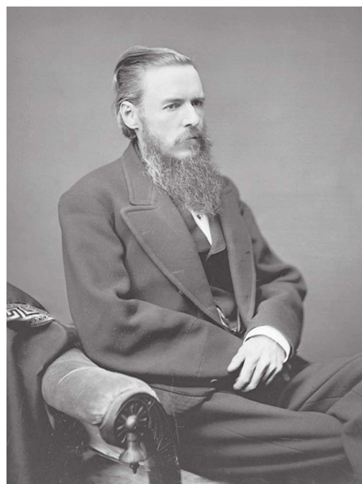
弗雷德里克·西奥多·弗里林海森

[1] 19世纪70年代，爱尔兰移民中的一支秘密恐怖组织。——译者注

[2] 指美国总统在任命某人担任某州职务之前，需先征求该州与其同党的参议员的意见。

第7章　新议题

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还没有会见国会成员就去世了。这是美国的第四十七届国会，是1880年与他一起当选的国会。但生前他预见到了自己会在1875年后第一次参与政党事务。在1874年的选举中，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众议院转而为民主党人所控制，印第安纳州的迈克尔·克劳福德·克尔则取代了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成为众议院议长。1876年，迈克尔·克劳福德·克尔去世，宾夕法尼亚州的塞缪尔·杰克逊·兰德尔继任众议院议长之位，历经了两届国会。其中，在他经历的第二届国会，也就是美国第四十六届国会，他的党派民主党也控制了参议院。在一些重要的事务上，参议院、众议院和总统之间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在经费问题上，他们同样难以达成一致。1880年选举过后，所有的共和党人都与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的夫人有同样的感触。她写道：“你们意识到了吗？众议院在共和党的控制下，而参议院在票数持平时，也会将决定性的一票交给共和党的副总统。可见，赢得胜利并站在强者一方的人占尽优势！”



迈克尔·克劳福德·克尔



塞缪尔·杰克逊·兰德尔

新一届的国会成立之后，塞缪尔·杰克逊·兰德尔不再是议长，转而成了少数派的领袖。俄亥俄州的约瑟夫·沃伦·凯弗接替了议长之位，拥有大多数共和党人的支持。在参议院，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夫人的预言全部应验，切斯特·艾伦·阿瑟意料之外地成为总统，却使参议院失去了副总统。随后，参议院由两个独立人士控制。“从美国最高法院走到政界”的大卫·戴维斯法官虽然当选为民主党监选员，却与共和党投票一致。弗吉尼亚州的威廉·马洪是爱尔兰人也是前邦联成员，自称“重新调整者”，与政府投票一致。这两人使通过国会执行党派政策成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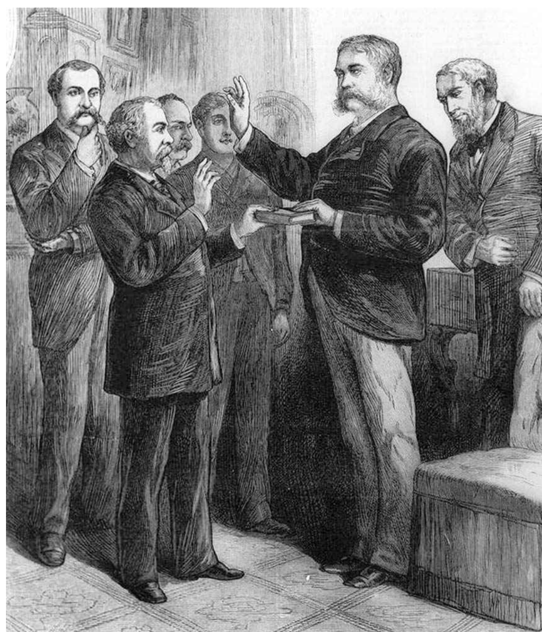


约瑟夫·沃伦·凯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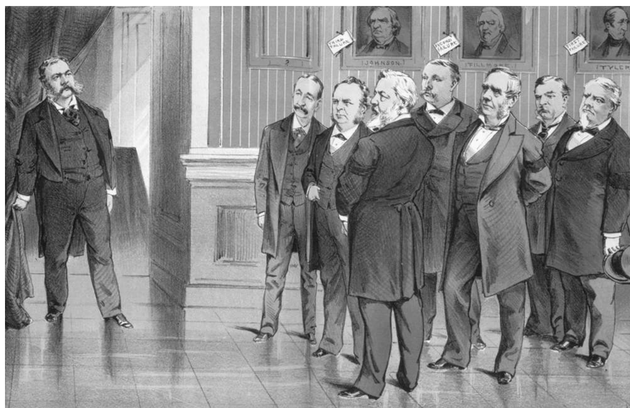
1881年国会会议结束不久，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对内阁进行重组，允许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的支持者辞职，并让自己坚定派的支持者继任。新任国务卿弗雷德里克·西奥多·弗里林海森接手了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的政策，但执行不力。他继承了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修建美洲运河的宏伟蓝图，并尽力扩大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还安排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在英国为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利益奔波——对地方自治的强烈愿望让他们陷入了与英国警方的纠葛之中。他没有采用南美政策，取消了泛美会议发出的邀请，也没有插手智利战争。尽管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对此表示抗议，认为此举使美国蒙羞，但并没有起到作用。

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听取了坚定派的建议，共和党其他派别开始担忧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领导的政府是一届分肥者的政府。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总统发出的第一份咨文减轻了他们的担忧，因为这份咨文是针对差强人意的文官制度以及管理官员开除与任命的考绩制度的。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承诺将以超过改革者要求的力度实施改革措施。1883年1月，他签署了关于文官制度改革的法案。

在四届政府中，利用公职达到党派目的的行为都被两党中的独立人士视作丑闻。19世纪70年代，一连串背叛人民信任的官员名单曝光，改革者们意识到政府的无能与分肥制已经威胁到整个美国的命运。1880年，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一个代表在对一条关于文官制度的政治纲领条款投票表决时，愤怒地大声说道："总统阁下，得克萨斯州受够了这种文官制度……我们并不是为民主党提供官职的……如果可以，赢得这场较量之后，我们要将这些职位给那些有资格接受它们的人。现在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改革者们已逐渐习惯"实用"政治的倡导者以沉默或直言不讳的方式做出的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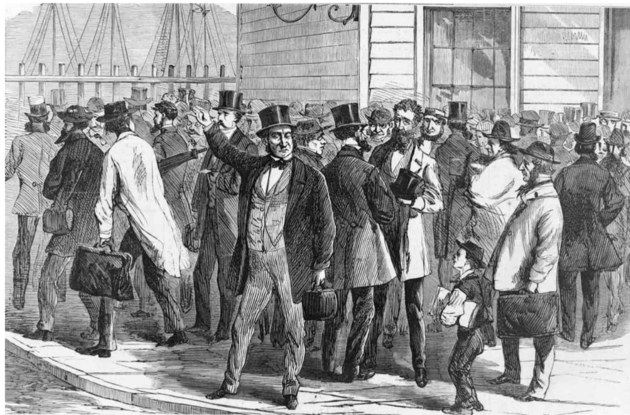


切斯特·艾伦·阿瑟宣誓就职



切斯特·艾伦·阿瑟与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的内阁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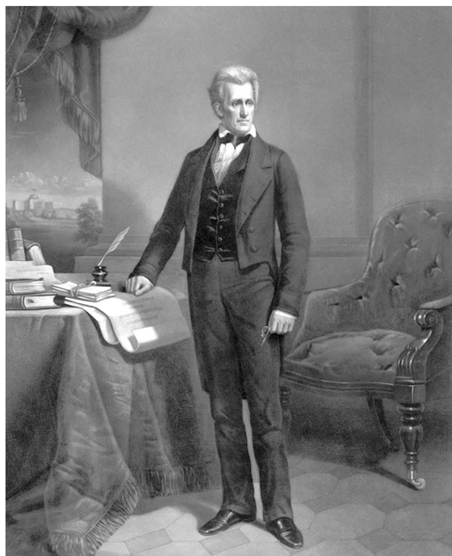
美国文官的历史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1829年之前、1829年到1865年以及1865年到1883年。在第一个时期，文官通常被当作永久官员来对待，很少有文官因为党派原因被开除，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曾发出的悲叹："除极少数人去世外，没有人会辞职。"官职的授予往往基于一个人过去所做的贡献，没有人会觉得开除一个官员需要经过新任总统的许可。



1880年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代表们抵达芝加哥

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实施了一项新举措。在他当选后，美国爆发政治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他的支持者们认为美国共和党已经开始走向腐败。将在任者从其职位上赶走是一个关乎信仰与承诺的问题。垂涎这些职位的爱国者们蜂拥而至。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顾问们，包括来自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顾问在内，已经了解为未来的公共事业保留职务之道。民主党提倡职务轮流制，并且已经开始实施，但很容易妥协

于“战利品属于胜利者”的坚持。



安德鲁·杰克逊

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之后的每一任总统都利用职位达到党派目的，极少有人会在理论层面提出反对意见。当时的美国政府还比较简单，这样的习惯还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分肥制没有进入陆军和海军部门，因为这两个部门的大部分职位都有较高的技术要求。在其他部门，绝大部分官员都是没有什么从政经验的文人。他们的职务很容易就被同他们一样缺乏经验的人所替代，所以经常会有一些熟悉业务的职员留下来指导新职员入职。通常，各部门在总统会见国会成员之前就已经投入他们原有的工作中了。

在利用官职方面，林肯总统与他的继任者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准许政府成员大换血，但实际上当时这一工作已经完成。为了排除政府部门中的南方人，他不得不大范围地任命新官员。在他手中，任免权成了联邦政府一个额外的有力武器，激励着国会的领袖们，同时打击了堕落者。1864年的选举中，联邦党执掌政府所有部门，有望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完成对公职的彻底控制。直到林肯总统去世，一位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人才得以进入白宫。

从理论上来说，有关文官制度改革的讨论始于1865年左右，当时，参议院认识到出于党派考虑而开除公职带来的恶果。安德鲁·约翰逊总统

想要利用战利品达到自己的目的，因而反对国会中共和党激进派的主张。改革者们曾一度保持着这种不公正的惯例。共和党开始做出临时的职位变动。1866年，文官制度委员会成立。在执政早期，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宣布继续将官职作为战利品分配出去。

1871年，国会拨款二万五千美元用于文官制度改革试验。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新制度改革的领袖乔治·威廉·科尔蒂斯。文官制度委员会与美国当时的政治主流相左。后来的事件表明，在关键情况下，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并不支持它。所以，经过短时间的试验之后，国会放弃了这个委员会。要求改革的声音有增无减，1872年，得到了独立人士，也就是共和党自由派的支持。此后，这些人威胁到了共和党的团结。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和乔治·威廉·科尔蒂斯是共和党自由派公认的领袖。1872年和1876年，他们力劝两大政党对文官制度改革做出基本承诺并写进政治纲领。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的内政部长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实现了他们的部分理想。1881年，共和党自由派已经是一个公认的组织了，拥有明确且高效的无党派原则，一个鲜有政客否认但也不支持的原则。

1881年，公众开始关注文官制度改革问题。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和罗斯科·康克林之间的矛盾不仅引发了对总统和参议院任免权问题的讨论，也引发了对利用公职谋求政治机器 [1] 支持的讨论。如果邮政部门的官员们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在星标路线的调查中被揭发的欺诈行为可能根本不会发生。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遭到求官失意者的暗杀，进一步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而这段时期发生的事件共同助推了《文官制度法案》的通过，比支持者们预想的还要早。



乔治·威廉·科尔蒂斯

1881年，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建议对文官制度进行改革。经历了1882年秋季的选举之后，在1882年到1883年间，共和党召开会议开启了文官制度改革的立法进程。多尔曼·布里奇曼·伊顿是其中的一位改革领袖，也是美国文官制度委员会的首任主席。他起草了文官制度改革的法案，国会对此并无异议。痛恨改革的人也清楚，一味地反对并不是明智的做法。1883年，一个只包含三个委员的委员会成立了，主要负责文官职务分级，并制订相关规定，进行一系列的审查工作。从政治中脱离出来的文官职务经过分级之后，从1884年的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个职位增加到1896年的八万七千零四十四个，1911年，增加到二十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个。这个数字在每届总统任期的最后增长得最为迅速，因为即将离任的总统们把他们曾经担任过的职务也加了进来。很多反对者也对文官制度改革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在促成和执行《文官制度法案》方面做得比改革者们预期的还要好。他依法对星标路线案进行审判，甚至在涉及他坚定派支持者时也能保持公正。

1882年，在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的支持下，国会对关税进行改革。这一年，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没能得到明确的关税管理权。实际上，大多数共和党人对目前的关税制度基本满意，但多数民主党人

却主张修订关税和关税纳入财政收入。上一次总体修订关税制度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那时起，一些无法预料的情况逐渐出现，这一趋势意味着美国需要再次调整关税了，一部分公民的利益也将因此受到影响。1865年到1875年期间，通过财政重建，美国保护性关税的实际税率得到了提高，超过了支持者的预期。



总统任上的切斯特·艾伦·阿瑟

1865年，美国财政收入达到了三亿二千二百万美元，主要来自关税和国内税收，远远超过了财政部在和平时期的需要。这两种税收之间存在关联：国内税收增长必然导致关税增长，以免美国制造业承担太大的压力。美国一贯主张保护本国贸易，也从未停止寻找特殊利益的脚步，但战时税收的主要目的还是增加财政收入。

国会希望减轻赋税以缓和紧张形势，却发现每次减轻关税都会刺激与之利益相关的制造商们，每次减轻国内税收则会得到公众的欢迎。本着最小阻力原则，1870年，大多数国内税都被取消，仅剩关税仍居高不下，比贸易保护者的要求还高。大部分的关税税率一直保持与国内收入税持平。但后者被取消无意间形成了一种贸易保护。这是意料之外的，

但仍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关税政策的一些具体条款依据特别法进行了修订。1872年，美国关税稳步下降了百分之十。在1873年的恐慌中，美国财政收入减少，国会为此担忧。1875年，减少的百分之十又涨了回来。1882年，美国的税率基本保持在1865年的水平。意外得到保护的行业为此庆幸。经营者们不曾想过税收的总体下降竟带来这样的好处。

19世纪70年代，美国断断续续进行着关税制度改革，但因为很少有人能依据原则保护关税，所以改革并没能影响到整个社会。关税问题不是一个政治议题。为了对抗共和党和那些与政治圈鲜有交集的理论家与经济学家，部分民主党人对关税政策持反对态度。1868年后，美国开始出现自由贸易组织。其目的并不是形成真正的自由贸易，而是减轻贸易保护以及建立合理的税率。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来自耶鲁大学的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大卫·艾姆斯·威尔斯和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到处宣传将关税纳入财政收入的理论。1875年，大卫·艾姆斯·威尔斯就“自由贸易的信条”在《亚特兰大月刊》上撰文，确信自己找到了1876年的议题。在接下来的两届选举中，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提到这一议题。1880年，关税问题只是为难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的手段，就连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的就职演讲也未曾提及关税问题。

1882年到1883年，关税制度修订的方向与财政收入和支出息息相关。随着新繁荣时期的到来，美国财政收入的增长超过了国会的支出。1879年，美国出现少量财政盈余。1880年，美国财政盈余达六千八百万美元；1881年，达到一亿零一百万美元；1882年，达到一亿四千五百万美元；1883年，达到一亿三千二百万美元。财政盈余必然导致浪费现象的出现，也扰乱了通货秩序。如果财政盈余留在国库，数百万美元将从流通中退出，从而引起通货紧缩；如果用来购买或偿还债券，因为债券归银行所有，则会造成国家银行通货紧缩。如果没有新的用途出现，这些盈余就无用武之地。于是，要求增加津贴的声音越来越多，公共工程也毫无理由地大量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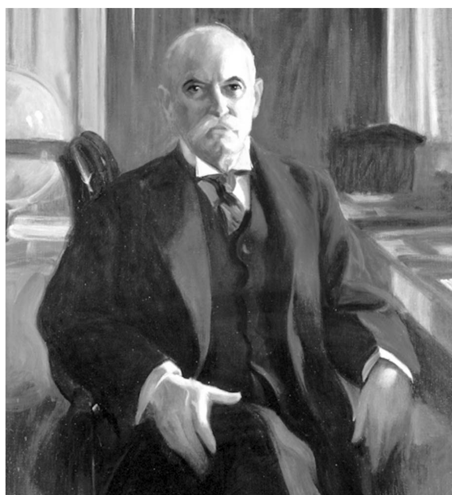
政治漫画：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在**1880**年的关税问题上损害了北方工人的利益，这也成了政敌故意刁难他的手段

公共工程投入上的浪费现象使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开始宣传减少税收的必要性。每年都会有关于《河流与港口法案》项目的支出。1870年，这一支出达到三百九十万美元，1880年，则高达八百九十万美元。1882年，因为贪婪的政客相互勾结，该法案的相关支出竟高达一千八百万美元。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指责《河流与港口法案》不合理且不合宪法，1882年8月，他否决了该法案，但他的否决并没有起作用。1882年11月，共和党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它的失败被认为是对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行为的无罪辩护。马萨诸塞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选出了民主党州长，而在纽约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和印第安纳州，评论家们纷纷预测共和党是否就此走向灭亡。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因为控制权分流，政党议案不可能在下一届国会中通过。这一点激励着共和党尽可能去实施这些法案。1883年初，《文官制度法案》获得通过，就在同一天，众议院开始考虑新的关税政策问题。

1881年，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极力主张降低税收和修订关税制度。1882年5月，国会成立专门委员会针对需要做出的变动展开调研。在1882年的整个夏天，该委员会都在开会讨论此事。委员们来到美国东部的各个制造业中心，广泛听取制造商的意见。为严谨起见，该委员会

既包括了解羊养殖户与羊毛制品制造商需求的委员以及熟悉钢铁业和糖业的委员，也包含懂得行政管理的专家。反对者们却认为该委员会一开始就是以贸易保护为出发点。该委员会早就认识到美国改革和降低关税的必要，认为美国迫切需要坚持贸易保护的基本思想。1882年12月，它将计划书递交众议院审议，要求通过相关法案将关税税率降低至少百分之二十。在此基础上，1883年1月16日，筹款委员会提出法案，进入辩论程序，一直持续到1883年2月20日。后来，参议院通过另一项相关法案，导致众议院废除该法案。

在此之前，《参议院法案》就以《国内税收法案》修订案的形式递交参议院。1883年2月20日，在来自罗德岛州的参议员纳尔逊·威尔玛斯·奥尔德里奇的领导下，该法案获得通过，一周后递交众议院审议。会上，新法案取代了《参议院法案》。两院匆忙做出决定以保证在1883年3月3日得到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的签字确认。



纳尔逊·威尔玛斯·奥尔德里奇

1883年，关税政策没能满足改革的需要。关于关税政策的辩论则显示出关税政策构建的困境。针对贸易保护政策的理论问题，国会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阵营，两党之中都有激进贸易保护主义者和主张关税纳入财政收入的人。主张关税纳入财政收入的一方让事情变得更复杂，因为税率的每次变动都可能影响财政部的声誉。另外，出于经济与财政的迫切需要，负责游说议员的制造商团体不厌其烦地对议员们施加影响，以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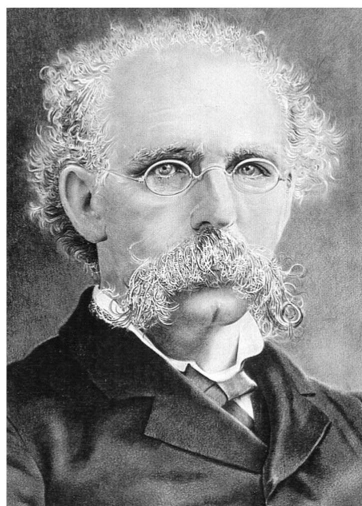
足对其所在行业有利的税率需要。很少有国会议员能在利益面前做到绝对的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地制订关税制度的改革方案。很多人甚至对促进本地收益的欲望完全不加掩饰。1882年，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没有获得关税的决定权，但当法案变成法律进程中，共和党领袖们明显很乐意投票支持所有能令他们得到贸易保护的法案。减少税收的愿望破灭，而反对方的改革提案希望更加渺茫。《国家》评论道：“万花筒变得只有一根头发丝儿那么细了，色彩的变换也很少，但组成它的部分还是那么多。”美国的关税修订至始至终都是对公众信任的刻意背叛。一位民主党领袖愤怒地说道：“（关税政策）这根轴花了大量时间建立，废除对纸牌征收的国内税，超出《圣经》要求征收百分之二十的税是关税政策为自己加冕粉饰的最后一块宝石。”

在整个关税政策的辩论过程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理由最充分。他们声称自己改革关税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劳工的利益。欧洲的贫民劳工待遇不断下降的情况被反复拿来与美国劳工待遇上升的状况对比。美国社会首次关注到这个需要安抚的阶级。

南北战争之前的劳工问题主要集中在征集足够的劳工以应对因西部大量自由土地而引起的竞争。当时，劳工组织和罢工事件在公众眼中并不是正常的社会现象。19世纪60年代，在钢铁、纺织以及其他机器生产领域，制造业的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工人联系在一起。因为拥有共同的利益，工人群体作为一个阶级出现在美国社会。在19世纪7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店铺纷纷倒闭、工人工资不断下降，罢工事件一触即发。1877年左右的罢工事件极大地震惊了美国社会。社会并没有引导劳工们罢工，劳工领袖也不知道如何把握罢工的度。如果罢工失去了度，就不可能留住公众的同情心，也不可能获得胜利。对劳工组织的反感情绪席卷了全美国，威胁到了劳工运动。

在众多劳工组织中，劳工骑士团最不受欢迎。1869年成立的劳工骑士团是一个行业联盟性质的秘密组织，拥有来自各个行业的劳工成员。工人一旦被解雇，几乎都会进入一个秘密组织寻求庇护，使公众感到困惑与恐惧。1882年，“莫利·马奎尔社”的过激行为败坏了所有劳工组织的名声。在团长沃克曼·鲍德利的带领下，劳工骑士团在整个组织中开展了一场公开的、积极的、针对劳动与监督法的学习活动。1881年成立、

1886年接受重组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给此项工作提供了援助，并与劳工骑士团一起说服公众认可他们的工会主义原则。



劳工骑士团团长沃克曼·鲍德利

为应对社会上出现的种种纷乱，州立劳动部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868年，美国社会广泛采纳针对联邦雇员的八小时工作制。1884年，美国内政部增添了劳工委员一职。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原本主张让沃克曼·鲍德利担任这一职位，但后来却选择了在政治宣传中并不活跃的经济学家卡罗尔·戴维森·赖特。在他的带领下，美国劳动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劳动部的报告成了美国劳工问题的数据来源，1903年，劳动部顺利并入美国商业与劳工部。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徽标

被沃克曼·鲍德利称为“不满大军”的工人们要求接受教育和立法保护。1882年左右，他们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阶级斗争上来。初到美国的农民工因为遭受了克扣工资的不公待遇，不久就开始有了阶级意识。在远西区，劳工反对势力极为恶劣，那里的外来者主要是华人。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华人比美国人更加节俭和勤勉。19世纪80年代，他们初饱受蹂躏，在美国许多地区都遭遇过暴力袭击。1880年，一封伪造信让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的威信大打折扣，仅仅因为信的内容显示他欢迎更多的华人来美国。尽管1880年美国曾立下条约保证平等对待华人，但美国国会迫于当时对华人施加迫害的美国人众多，不得不对他们提出的《排华法》做出回应。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否决了第一个排华的法案，却接受了第二个言辞没有那么激烈的法案。此后，美国的劳动力就基本都来自移民了。

在欧洲受到压迫的人来美国寻找机会，这一观念在美国根深蒂固。移民们在美国受到欢迎与同化。1864年，国会专门成立相关部门以鼓励移民来美国，并保证他们的安全。移民的涌入总是在繁荣的年份增加，在萧条时期减少。1878年之后，美国每年的移民人口不断刷新记录。西部的铁路公司乐意让移民使用他们的土地，而制造商们也欢迎他们到制造厂工作。移民人口总数从1879年的十七万七千增长到了1882年的七十八万八千，创造了19世纪美国移民人口之最。这些初来乍到的移民吸

引了美国新闻界的关注，同时让城市各慈善机构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所在，各个工会也意识到要争取移民成为会员。几乎所有的移民都是生产者，而且大多数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美国的移民中来自英国的人数最多，其中爱尔兰人大多定居在美国东部城市。其次是德国人，主要定居于芝加哥、圣路易斯。斯堪的纳维亚人则大多在美国西北部地区的麦田里劳作。

在劳工对投票权的呼吁下，1882年，国会为监督移民行为并且驱逐不受欢迎的移民做出相关规定。1885年，国会宣布禁止熟练合同工移民。当时的劳工运动通常比较势利，仅仅为熟练工提供保护，却忽视了一般工人的待遇。



关于《排华法案》的政治漫画：山姆大叔（代表美国政府）将华人踢出美国。这幅漫画是对美国民主、自由的最好讽刺



关于《排华法案》的政治漫画：一名华人被禁止进入“自由金门”。告示上写着“中国佬不得入内”

当时，各州还未出台关于工厂、雇主责任或是保护如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法律，劳工与移民团体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经济立法领域。劳工与移民团体也使美国政治局势复杂化。南北战争时期，德国人与斯堪的纳维亚人支持联邦，据说是从比他们先到美国的同胞那里吸收了共和党的纲领与信仰。爱尔兰人则基本都是民主党。他们中唯一的共和党领袖是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拥有一大批爱尔兰裔支持者。他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尔兰裔领袖丹尼斯·卡尼结有深交。作为美国国务卿，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维护了那些呼吁地方自治的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利益。他有几个天主教徒的直系亲属。坚持修建美洲运河的主张为他争取了很多有仇视英国倾向的支持者。

1876年和1880年的选举结果显示，这个时期两党几乎势均力敌，以至于任何轻微的受欢迎倾向或是意外事件都有可能在选举中起到决定性作用。1884年，加入美国国籍的外国人突然变得重要起来，所有候选人都想要争取他们的支持。竞选活动不可能以旧的议题来开展，但文官制度改革、关税政策或是劳工问题之中哪一个会成为新议题仍未可知。

[1] 19世纪后期，美国许多城市中盛行的一种准政治组织，由老板或一小群人控制，负责为候选人筹措竞选经费和征集选票，一旦当选便以政府职位、公共资源的分配奖赏追随者。

第8章　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

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执政的一届美国政府证明了一点，正如改革者所言，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从来都不是一个可耻的分肥者，或者换句话说，他始终如一地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有尊严地离任了，但他还是希望通过再次得到共和党的提名而证明自己，陷入一场候选人之争。在提名的结果揭晓之前，无法预测两党分别会支持谁为候选人。

以前共和党人为主要成员的独立人士希望保留上届政府取得的成果。他们希望能延续文官制度改革，并继续关注关税问题。1883年，关税下调方案失败反而让他们心中燃起了希望，决心加强改革力度。长期以来，他们并没有把脱党运动或是其威胁看在眼里，党派团结于他们意义甚微。两党通过提名它们信任的并且能坚持纲领的候选人来获得独立人士的支持，却并不能接受切斯特·艾伦·阿瑟，也厌恶了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

切斯特·艾伦·阿瑟注定不会获得候选资格，因为他特立独行，不免运用政治手段对付了某些政客，既疏远了坚定派，也没能赢得改革者们的支持。1882年秋，他竟允许财政部长查尔斯·詹姆斯·福尔杰在保留原有职务的同时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加纽约州长的竞选，干扰了该州正常的竞选活动。这一事件让人们认为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利用权力插手地方竞选，庇护查尔斯·詹姆斯·福尔杰，引发反对情绪，导致查尔斯·詹姆斯·福尔杰落选。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对《排华法》和《河流与港口法案》的否决让他更加不受欢迎。最终，他没能胜过将他视为阻碍的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而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对下一次全国大会已迫不及待。

1884年，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成为共和党领袖的唯一人选。他深谙自己作为领袖的不足之处，就像他了解自己所有的弱点一样。通过党派斗争获得显要地位的人几乎不可能得到提名或当选。像亨利·克莱、丹尼尔·韦伯斯特和约翰·卡德威尔·卡尔霍恩那样的人，在斗争的过程中

树敌无数，不可能入围全国竞选。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有着与他们一样的缺点。他与罗斯科·康克林的斗争一直在持续，与坚定派之间也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关乎他名誉的老问题也不会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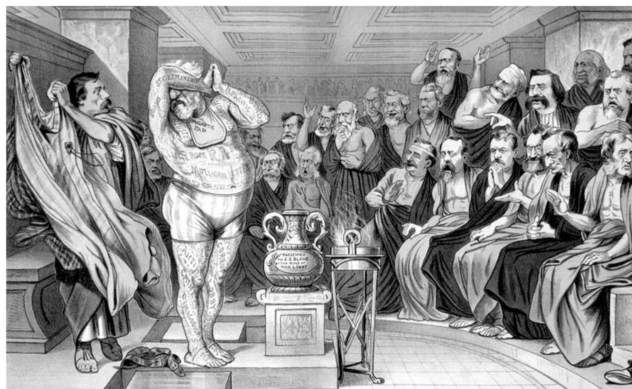
查尔斯·詹姆斯·福尔杰

1884年初，尽管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还是成为领先的提名候选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控制着那些支持他的人。在星标路线事件曝光之后，斯蒂芬·华莱士·多尔西辞去了职务，而他的同事斯蒂芬·本顿·埃尔金斯仍然做着土地投机的生意。局面掌控在脱离党派的人手中，也掌控在那些在1883年阻碍关税政策修订的人手中。在很多独立人士眼中，关税下调政策根本不可能出现在由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执政的政府。他们也质疑他在文官制度改革中的诚意，认为任何一个品质上有疑点的人都不应该成为总统。因此，他们提议提名在1880年就推荐过的参议员乔治·富兰克林·埃德蒙兹，也就是后来的参议院议长为候选人。其他在当地拥有支持者的候选人分别是伊利诺伊州的约翰·亚历山大·洛根将军、约翰·谢尔曼和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

1884年6月，共和党在芝加哥召开代表大会，拉开了党内竞争的序幕。一开始，由乔治·威廉·科尔蒂斯带领的资深独立人士，辅以年轻的马萨诸塞州的亨利·卡伯特·洛奇，以及纽约州的西奥多·罗斯福，打破了全国委员会原提名名单，根据他们的意愿任命了会议主席。但控制着政治纲领的共和党中坚分子联合起来确定了提名，使得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

恩和约翰·亚历山大·洛根当选。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很清楚党内对他的强烈反对，惴惴不安地接受了提名。面对这一结果，改革者们只能悻悻而归，许多人甚至暗下决心坚决不让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领导自己。

随着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的提名，“超然派”[1] 诞生，其影响比最近发生的脱党运动还要大。“超然派”这个名字的由来并不清晰，但它作为一个无礼的绰号而广为人知，而后被党派中坚分子用来指“自以为是”的改革者。一名中坚分子对其引用《启示录》里的一段话：“你既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超然派”对共和党要比对民主党更具攻击性。对于“超然派”，民主党更多的是困惑而不是嘲讽。一位民主党参议员说道：“我知道，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政治改革氛围浓厚的社会。我也清楚，在爱沙尼亚派政治哲学家的神圣指引下，我们不再是某一党派的虔诚信徒，我们不再承认政党义务、政党责任、政党纪律和政党职责，会心甘情愿地献身于政治修道主义。但我会保留一个缺点，即用我卑微的方式注意并警惕共和党领袖的目的、计划和手段，正如我过去一直努力要做到的。”



1884年的一幅漫画嘲弄了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因为他身上有许多不可磨灭的丑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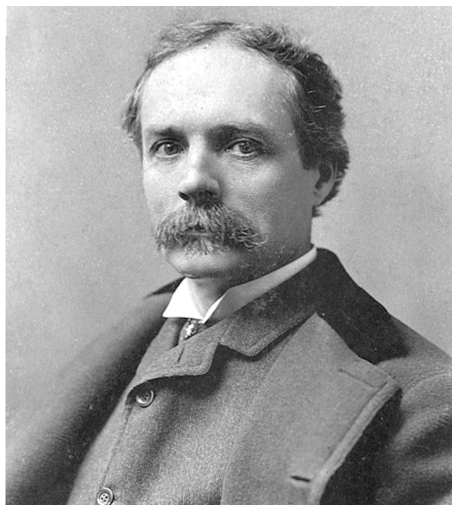
约翰·亚历山大·洛根将军（左二）与同僚的合影

超然派一离开芝加哥就开始与民主党领袖谈判。《国家》《晚邮报》与超然派走到了一起。此后，战时曾是联邦刊物、后来隶属于共和党旗下的《哈珀周刊》不再支持共和党候选人。1884年6月17日，这次叛乱的领袖——《哈珀周刊》的编辑乔治·威廉·科尔蒂斯与超然派在《哈珀周刊》的一处办公地点约见，详谈联盟事宜。他们的问题是，提名一个超然派候选人被击败，还是合作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当选。

并不是所有改革者都厌恶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纽约论坛报》霍勒斯·格里利的继任者怀特劳·里德就仍然是共和党的中坚分子。亨利·卡伯特·洛奇回到马萨诸塞州参与拉选票的游说活动。因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被提名而失意的西奥多·罗斯福也是共和党的中坚分子，从竞选失败中走出来后开始在美国远西区的牧民生活。如许多人一样，他坚信改革必须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进行才能行之有效。越来越多的改革者与超然派站到了一起，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当选的几率受到了影响。

超然派拉开了与民主党领袖合作的序幕，推举年轻民主党律师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为候选人。1881年，他作为布法罗市长进入公众视野，又在1882年当选纽约州长，负责改革事宜。在竞选中，他得到了超然派改革者的支持——这些人不支持查尔斯·詹姆斯·福尔杰做候选人，也不满联邦政府插手地方政治。作为州长，他很快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以倔强、诚实的个性与独立的判断力而闻名。与塞缪尔·琼斯·蒂尔登一样，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成了一位无公认领袖的政党内最有前途的候选

人。



怀特劳·里德

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其他两个候选人反倒使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更快地成为主张改革的候选人。在反垄断代表大会上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指责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是劳工的敌人，但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的声誉并不太好，他的敌意反倒有助于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在了解到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是纽约州长之后，坦慕尼协会的约翰·凯利也开始反对。当然，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的支持者可能会说："我们爱戴他正是因为他的敌人。"在第二轮投票中，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得到了提名，而印第安纳州的托马斯·安德鲁斯·亨德里克斯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政治纲领中充满了"改革"以及"关税"的字眼，但后者并非像改革者们期盼的那样。



1884年的反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政治漫画（摘自《法官》杂志的头版）：标题为“克利夫兰的另一个声音”。参考的故事是：克利夫兰有一个私生子引起臭名昭著的竞选口号：“妈，妈，我爸在哪里？”克利夫兰反对者和克利夫兰支持者回答说：“去白宫，哈！哈！哈！”

正如1884年各党派的立场一样，候选人性格比政治纲领或党派名字要重要得多。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品质吸引了独立人士对他如同对民主党一样的支持。南北战争时期，因为兄长们在军队任职，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需要供养老母亲，所以避开了铜头蛇的嫌疑。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支持健全的货币政策，认为关税应纳入财政收入，并决心进行文官制度改革。不像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那样在各党派中树敌，他对共和党反对者们也有特殊的吸引力，使游说的重点从议题转移到对他个性的讨论上来。

独立人士对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的指责导致共和党的分裂。共和党中坚分子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反驳。候选人的私生活被公之于众让双方都很恼火，而这给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带来的难堪似乎更大。在诚信方面，他没有任何污点可指责，但他的一个明显过失给对手以可乘之机，对手借此对他的人品进行大肆攻击。几年之后，小说家保罗·莱斯特·福特在对纽约州政治的细微研究之作《尊敬的彼得·斯特灵》中就描绘了与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经历相似的情景，但他否认此书是以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为原型创作。在众多媒体中，《波士顿日报》的相关报道最多，忠诚于党派的人士似乎忘记了双方的体面。曾创作漫画讽刺詹

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带血迹的衬衫”一事的托马斯·纳斯特，现在出了新作——“一场闹剧——穿干净衬衫的羽翼骑士”。后来有人指出，事实上，杜撰“羽翼骑士”这个绰号的是星标路线事件中涉嫌诈骗的承包方的法律顾问。

这些报道企图引起双方反对势力的注意。几周来，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一直在犹豫是否要接受反垄断党代表大会的提名。绿背纸币党以及少数劳工党领袖是他主要的追随者，而且据说会得到民主党人的投票支持。在与共和党领袖的会议结束后，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开始运作竞选事宜。之后，共和党领袖被指责资助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参加竞选以打击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共和党人通过强调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对英国强有力的外交手段来吸引爱尔兰人投票。对手则用漫画讽刺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结交众多爱尔兰裔的危险人物。在游说活动的最后，一个偶然的言论都可能影响竞选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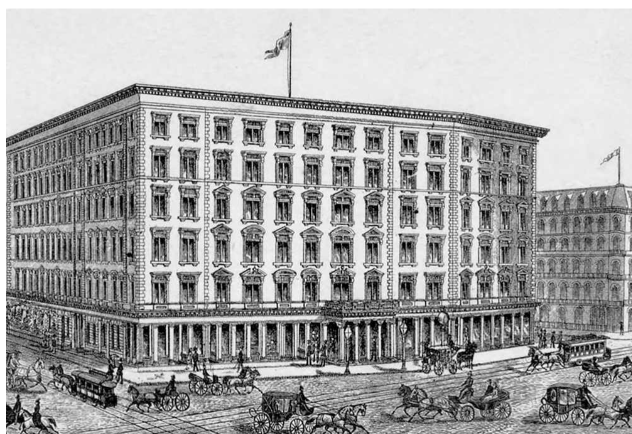
竞选中有关于候选人个性的问题已经讨论得太多，两位候选人都搬出牧师为他们增光添彩。1884年10月，所有教派的牧师在第五大道酒店召开会议支持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最年长的牧师塞缪尔·迪克森·伯查德应邀致辞。在致辞之际，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走神不小心漏掉了一个短语，被其他听众注意到了。民主党抓住这一失误，立即将其夸大并广而告之。民主党因而被指责为“古怪的天主教教义和反叛”的信徒，这一行为是对爱尔兰裔选民投票的无端侮辱。在一周前的选举中，无从得知到底有多少爱尔兰人因此与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反目转而支持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到选举结束时，双方的选票非常接近，一小撮摇摆不定的选票就能决定大局。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在纽约州的选举中获胜，赢得了总统选举团的大多数支持，得到的普选票仅比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多出二万三千张选票，而比其他对手的得票总数少三十万张。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得到了十七万五千张选票，没有击败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对竞选中的种种人身攻击感到厌恶的纯化论者，将禁酒党的选票增加到了十五万张。

1885年3月4日，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州长作为继詹姆斯·布坎南之后又一位民主党总统举行了就职典礼。在过去的六个任期，民主党都没有取得执政权，该党内阁成员在治国理政方面缺乏经验。其中，前邦

联成员奥古斯都·希尔·加兰和卢修斯·昆图斯·辛辛纳特斯·拉马尔二世最引人关注，他们对之前二十年来流行的一种“黑暗且无根据的迷信说法”做了很多证伪的工作。这种迷信的说法曾使半数美国人都与国家统一和国家意志格格不入。见多识广的评论家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认为这是一届典型的美国式政府，对新总统评论道：“我承认，他是典型的美国式精英——是我最尊敬的那种人。”



关于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的漫画：在这幅漫画中他被描绘成关税改革者



第五大道酒店

托马斯·弗朗西斯·贝阿德也参与了1884年的候选人提名竞争，最后接手了国务院的工作。他延续了一种传统，即只有一等一的人才才有资格在政府工作。托马斯·弗朗西斯·贝阿德一接手工作就开始取消近五年来的工作成果，采取与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政策完全相反的政策。

1884年12月，弗雷德里克·西奥多·弗里林海森与尼加拉瓜谈判并达成一项与1850年《克莱顿-布尔沃条约》背道而驰的条约。劝说英国放弃有关地峡运河问题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失败后，弗雷德里克·西奥多·弗里林海森从尼加拉瓜获得了完整的通行权。参议院对此事件迟迟未做决定，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一上任就立即撤销了与尼加拉瓜签订的条约，采用了前辉格党的中立运河政策。

新一届政府的所有部门被迫接受了一场对文官制度改革坚定程度的测验。长久以来，民主党一直在反对政府的决策，要求政府改革，但现在民主党执政了，党内成员也依照惯例要求以官职作为回报。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在纽约州时，就曾与主张分肥制的政客斗争，在当选总统之后，他开始征求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的意见。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即使面对自己最亲密的同僚的反对，他还是坚持文官分级制，并且将分级数量翻了一番。

在1885年到1889年之间，美国的繁荣与发展达到顶峰，主要涉及行政效率而不是政党政策。政府在各个领域都不得不加大改革力度。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则忙于新机器的投入使用，以及应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

1884年，劳工组织从国会劳工管理局得到特许权。1885年，《反合同劳动法》得以通过，给劳工带来了更多希望，但需要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政府来支持。1886年到1887年，劳工领袖们因为一系列的罢工和暴动事件而备受关注。最激烈的一起事件是，地方劳工分会组织、劳工骑士团与西南地区密苏里州太平洋铁路公司以及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下属的古尔德铁路公司发生冲突。1886年3月，几个劳工组织者被铁路公司解雇，继而引发罢工事件。在马丁·艾恩斯的带领下，这场罢工很快蔓延整个西南部地区，导致所有依赖铁路运送燃料和食品的行业备受打击，也因为闲散工人的聚集导致城镇秩序混乱。沃克曼·鲍德利和其他劳工骑士团的主要负责人试图阻止罢工事件继续发酵，但收效甚微。另一方面，铁路公司渲染该事件转移了西部民众对罢工者的同情。劳工骑士团再也没有从罢工失败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总统任上的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

1886年5月，八小时工作制开始普遍推广。密尔沃基接连发生暴动，威斯康辛州长杰里迈亚·麦克莱恩·腊斯克发动民兵将枪口对准了聚众生事的暴徒。芝加哥的工会运动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关，就连反对者也分辨不出其真面目。警察的到来打断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会议，他们在一片骚乱中扔出炸弹致使数名警察牺牲。1887年，一伙无政府主义者的首领被指控犯有所谓的阴谋罪而被处以绞刑。罢工和暴乱导致的动荡局面说明追求全面幸福与满足的旧时代已经过去。

爱国主义的呼声逐渐超过劳工组织在政治上的要求。1865年，参加过南北战争的老兵尚年轻，现在已经步入中年。他们被政治影响，同时出于个人利益进入美国政府。贸易保护支持者们认为，为了国家利益应当给予制造商们一些特权。政府也有同样的想法，通过授予制造商们一些贸易特权作为对他们过去付出的回报。



密尔沃基街头一隅，绘于19世纪末

老兵们组成了一个叫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的机构，这个协会从一个不重要的怀旧联盟变成了争取抚恤金的工具。其他受到诱惑的公民也纷纷要求争取抚恤金，而士兵选民的数量让政客们不得不接受他们的条件。1879年，随着《待付抚恤金法案》的出台，老兵运动开始了。依据该法案，老兵有权要求补发自退役之日起开始计算的抚恤金，而不计丧失工作能力的时间。下一步的行动包括为无工作能力者和依赖抚恤金生活者分配抚恤金，无论这种情况出于何种原因，都要为公职人员打开发放养老金的通道。1887年，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否决了《待付抚恤金法案》。1890年，在其继任者的任期到来之前，他一直阻止通过该法案。因为监督公职人员的行为，他得罪了很多支持者，现在又因阻止老兵对财政部的攻击和否决《待付抚恤金法案》而得罪了更多人。没有人反对给那些在南北战争中负伤的老兵发放抚恤金，但在此案律师的利益驱动下，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领袖的要求演变成针对财政部有组织的攻击行为。他们制定了特殊的私人抚恤金条款，对一般性法律进行补充。四年中，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先后审阅了一千八百七十一项相关法律条款，否决了其中的二百二十八项，大部分条款内容都是在为因理由不充分或欺诈而被抚恤金管理局拒绝的人争取补助金。这在政治上对他大为不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已经“彻底厌倦不停地反对将公款作为礼物发放给那些不应享有此

待遇的人”。他坚持抚恤基金应作为“士兵基金”，其分发与使用应该“排除非正当使用以确保应得者能充分享有这份充满慈善与爱的待遇”。到了1889年，十年间，国会共拨款六亿四千四百万美元用于抚恤金的发放。而在接下来的十年，国会在此项目上的拨款高达十三亿五千万美元。

生产过剩造成浪费现象出现，美国社会开始呼吁减少浪费，而关税似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1883年，民主党控制了众议院，立即就关税政策修订展开讨论，民主党内部很快出现了不同意见。上一位众议院民主党议长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塞缪尔·杰克逊·兰德尔。他接受过亨利·克莱哲学的熏陶，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制造业之州，在信念与联盟归属上都是贸易保护主义者。1883年12月，他得到提名成为第四十八届美国国会议长候选人。从那时起，他就不再领导众议院民主党了，而成为一个内部派系的领袖。后来肯塔基州的约翰·格里芬·卡莱尔继任众议院议长，带领众议院支持关税纳入财政收入。在接下来的六年里，众议院的民主党承诺修订关税，但他们需要面对来自共和党的持续反对以及塞缪尔·杰克逊·兰德尔和其他民主党贸易保护主义者在背后对他们的抨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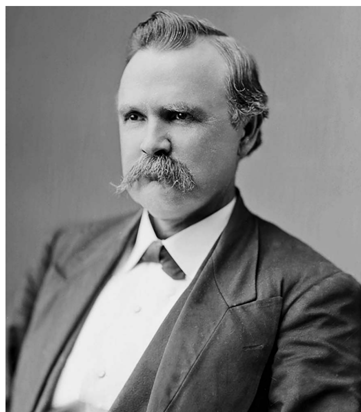
肯塔基州的约翰·格里芬·卡莱尔

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当选使民主党人控制了美国政府的两个分支，但参议院的控制权却落在了共和党手中。在一个分裂的政府讨论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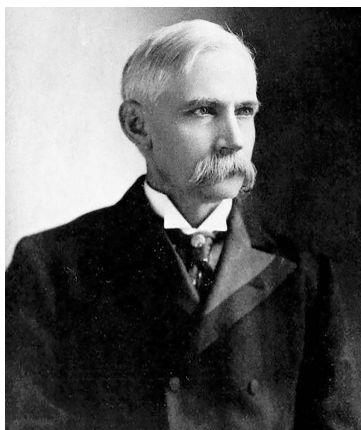
革和任何政党方针都是徒劳。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也因为没有能力履行政党承诺而烦恼。生产剩余的不断累积使国会有了浪费的空间，也激起民众的贪欲。1887年，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在给第二届国会的咨文中对关税问题的关注与努力震撼了整个美国。他为民主党设定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主题，尽管当时还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两个议院会通过关税法案。在发出该咨文之前，他与约翰·格里芬·卡莱尔进行了深入讨论。约翰·格里芬·卡莱尔将改革的重任交给了得克萨斯州的自由贸易主义者罗杰·夸尔斯·米尔斯，并任命他为筹款委员会主席。

1888年4月，关于《米尔斯法案》的辩论拉开序幕，“自美国南北战争以来，伴随着对关税纳入财政收入问题的争论，将关税降到和平基础上的第一次真正尝试”终于开始了。罗杰·夸尔斯·米尔斯与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位大学校长威廉·莱恩·威尔逊共同呼吁将税收减至五千万美元以下。他们的主张遭到共和党的一致反对，但议案做得非常详尽，让人震惊。筹款委员会被指秘密起草议案，而且其中大多数民主党成员都是对制造商需求一无所知的南方人。

因为感受到欧洲贫困劳工带来的竞争威胁，美国劳工也反对《米尔斯法案》。据称，该议案的提出是出于亲英策略，有关英国黄金的传闻从科布登俱乐部流出，颠覆了美国人的观念。尽管遭遇重重阻力，但在民主党的努力下，该议案得以在众议院通过。在共和党把控的参议院，《米尔斯法案》连投票的环节都未能进入，后来只能作为竞选议题搁置。许多顾问都奉劝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不要发布关税政策修订的咨文，以免引起对手的攻击，但他还是冒着个人与其政党失败的危险争取该议题最后的胜利。自1864年以来，这是第一个在政治上能被广泛接受的议题。



约翰·格里芬·卡莱尔



威廉·莱恩·威尔逊

推进《米尔斯法案》是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当局最重要的一个政党方针，虽然最后以失败收场，却再次反映了在1883年就经历过的关税立法困难，也为1888年的竞选提供了议题。1885年，相关法律得以通过。1889年，这些法律条款几乎没有任何党派特征，并且在重新调整联邦法律以适应美国经济新问题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联邦政府开始施展并试验自己的能力。自美国《宪法》施行以来，这种能力就已存在，但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并不能派上用场。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通信方式的变革使美国不得不考虑如何使用这种能力。

[1]　又称“脱党派”、“骑墙派”、“超然独立派”，原意为“大人物”、“大酋长”，后作讽刺语用来嘲笑1884年总统竞选期间不支持共和党候选人自以为超乎党派之上的共和党人。

第9章　最后的边疆

19世纪80年代，得到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签字认可的五条法令显示了美国目前面临的新问题，表明了美国政府的态度倾向。可以看出，美国政府的主要功能不再是调和各州之间的关系，而转移到调节国家层面的利益关系上来。1887年2月4日，《州际商务法》得以通过，承认了美国交通运输系统的国有性质。四天后，主张印第安人享有土地权的《道斯法案》通过，美国边疆的野蛮印第安人从此消失。1889年，美国农业部已经在内阁拥有一席之地，一部针对远西灌溉农业区的法律得以通过，美国开始关注到国内所有地区与人口的利益。1889年到1890年间，随着法律允许六个新州加入联邦，美国北部边界第一次从大西洋横跨到太平洋。自有人踏上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岩起，对美洲开疆拓土的过程至此达到顶峰。

1862年，联合太平洋铁路得到许可开始修建。1869年完工的这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是公认的国家铁路。目的是在地方主义对国家统一形成威胁的时期，将太平洋沿岸各州与美国东部连接起来。该线路的开通是完成向太平洋延伸的铁路交通网的第一步。联邦政府以土地赠与、赋予先行权与债券借贷的方式对该项目给予直接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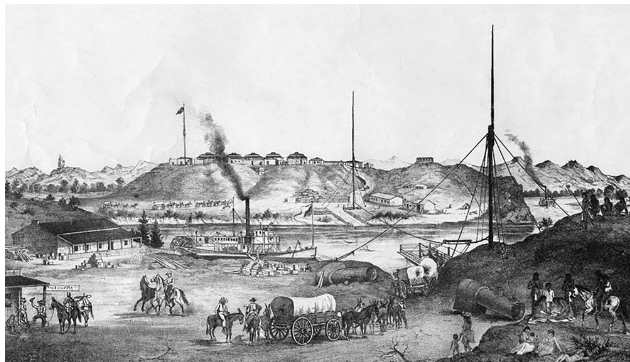
19世纪60年代后期，其他横贯大陆铁路也先后得到授权。1864年，出于将苏必略湖和普吉特海湾连接起来的需要，北大西洋铁路公司应运而生。1866年，大西洋-太平洋铁路得到授权开始修建，该铁路从位于斯普林菲尔德的西南部起点到密苏里州，一直延伸到加利福尼亚州南部。1871年，得克萨斯州的太平洋铁路连接起什里夫波特和德克萨肯纳附近的红河通航起点，直到尤马堡和圣迭戈。丹佛-格兰德河铁路，芝加哥-伯灵顿-昆西铁路，艾奇逊-托皮卡-圣菲铁路等附加线路得到了西部各州的修建许可，并间接接受了国家为吸引铁路公司而赠予的公有土地。1871年，在实行铁路赠地二十年后，国会停止了对铁路公司的土地赠予。



《州际商务法》通过后成立了州际商务委员会。上面的标志为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印章

1873年之前，所有横贯大陆铁路工程已经启动，在五年大萧条时期中止，到1878年得以恢复。与此同时，通洋运河项目重新启动。

自第一个白人站在地峡上方俯瞰太平洋之时，就已预见修建一条跨越两大洋运河的必要性。1848年到1849年，金矿的发现和加利福尼亚的移民热潮刺激了通洋运河的修建。1850年，美国与英国签订的条约对此进行了规划。但当时尚没有修建运河的具体方案，工程就此搁置。直到法国人斐迪南·德·雷赛布完成了苏伊士运河的修建，美国大陆运输系统的发展带来的新利益促进了巴拿马运河的施工。1878年，斐迪南·德·雷赛布创建的法国公司获得了哥伦比亚的特许权。1880年，此工程一开工就立即引起美国的嫉妒。这一点从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和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在取消《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并为美国争取地峡处理权而做出的努力中就可以看出。1885年，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重新采用中立的运河政策，但三十年来双方都没有积累修建运河的经验，技术上还很不成熟。



19世纪70年代的尤马堡

1881年到1885年期间，许多横贯大陆铁路建成引起公众对交通运输事业的特别关注。在南北战争时期，德国通讯记者亨利·维拉德创立了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自1873年起，他便负责帮助外国投资者管理投资，通过一家叫俄勒冈州横贯大陆铁路公司的控股公司接管了部分完成的北太平洋铁路以及俄勒冈州的地方铁路工程。1883年9月，亨利·维拉德在其公司开通的铁路上乘坐满载贵宾的专列，在蒙大拿州赫勒拿附近见证了该工程最后一颗道钉敲进铁轨的历史时刻。最后，他们在俾斯麦停下为达科他准州雄伟的新议会大厦奠基。从德卢斯到塔科马港，新的铁路线带来了众多以货运为主要营生的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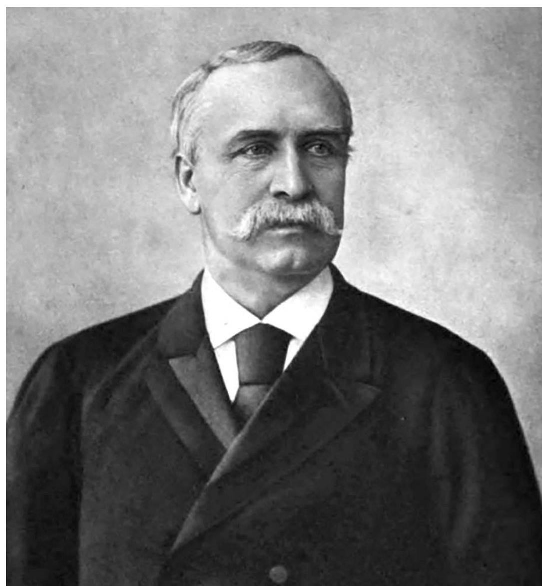


斐迪南·德·雷赛布的漫画形象



通航后的苏伊士运河

北太平洋铁路南段也就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最初修建的干线铁路，从奥马哈市沿普拉特河小道经夏延修到了奥格登，并延伸出一条从堪萨斯城到丹佛和夏延的支线。1882年5月，负责修建芝加哥-伯灵顿-昆西铁路的公司在干线与支线之间又修建了一条通向丹佛的线路。这样，1883年，拥有狭窄轨距的丹佛-格兰德河铁路经阿肯色河峡谷延伸至大盐湖，贯穿了这个分水岭。在长度上，这两条铁路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修建的从密苏里河到奥格登的铁路线形成竞争关系，使该铁路线南起海湾地区、北到俄勒冈州延伸出许多支线铁路。



亨利·维拉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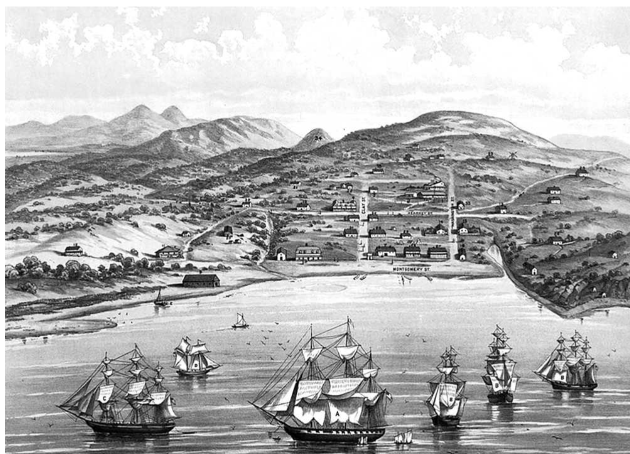
再向南，艾奇逊-托皮卡-圣菲铁路贯穿了整个堪萨斯州，又沿通往圣菲和格兰德河的老路直通向墨西哥旧城。该铁路的拥有者、大西洋-太平洋铁路特许权的拥有者和加利福尼亚州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合作，共同修建艾奇逊-托皮卡-圣菲铁路线上的阿尔伯克基与科罗拉多河沿线的尼德尔斯之间的铁路。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工程横穿了加利福尼亚州的众多山谷。1883年10月，一列列火车沿着这条铁路从旧金山开到了圣路易斯。

加利福尼亚州南太平洋铁路与其他横贯大陆铁路在尤马堡交汇，跨过了科罗拉多河。在1873年大萧条之前，得克萨斯州太平洋铁路只修到了沃思堡市。现在，这条铁路已经跨越得克萨斯州修到了厄尔巴索。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旗下的子公司在厄尔巴索与尤马堡之间修建了一条铁路，1882年1月，开通了直达圣路易斯的联运业务，1882年10月，开通了直达新奥尔良的联运业务。另外一条南太平洋铁路线开通了到圣安东尼奥市和休斯顿的业务，带动了海湾地区的商业发展，1883年2月，开通了前往新奥尔良的列车。

19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各大铁路的开通是世界铁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拿大，唐纳德·亚历山大·史密斯爵士，也就是后来的斯特拉思科纳勋爵，刚开始修建从阿瑟港到温哥华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1883年，欧洲大陆第一列“东方快车”从巴黎开往君士坦丁堡。1883年11月，美国各铁路公司在意识到它们属于一个统一的国家系统之后，同意将所有列车的发车时间统一为标准时间。在这之前，各铁路都以当地时间为标准，导致乘客乘车时间混乱。



大盐湖，摄于20世纪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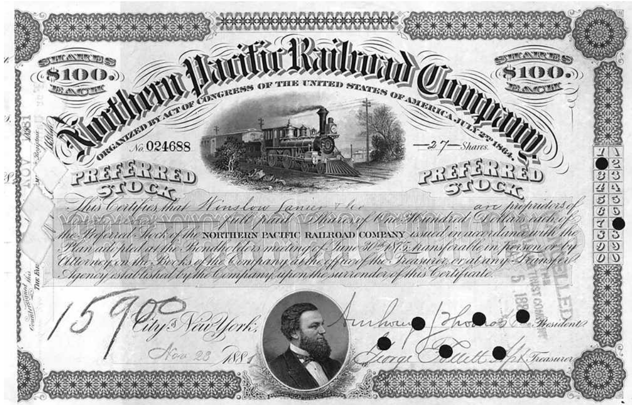


太平洋海岸的旧金山

大多数横贯大陆铁路都接受了大量的政府赠地，通常每铺设一英里的铁路政府赠予二十到四十平方英里的土地。无论铁路公司是否会将这些土地出售，都对铁路经过地区的殖民情况充满兴趣。因此，它们鼓励人们到这些地区移民和殖民。铁路公司的宣传资料散布到了欧洲，成为1878年人口大量迁移的一个重要原因。十年内，随着各铁路的竣工，美国西部六个州先后成立。

19世纪80年代，美国最年轻的准州是1868年建立的怀俄明准州，而最年轻的州是1876年加入联邦的科罗拉多州。继科罗拉多州之后，又

有八个准州加入西部行政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沿线上的达科他、蒙大拿、爱达荷和华盛顿，中部的怀俄明和犹他，以及墨西哥边境的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除了这些准州之外，剩余印第安部落地区称印第安领地，吸引着附近的西部各州拓荒者的贪婪目光。



美国一家铁路公司发行面值**100**美元的股票

农业是涌向铁路沿线平原拓荒大潮的主要依靠。北部的红河谷是小麦的主要产区。正如原来的南方地区将棉花作为主要作物，所以这一新地区选择小麦作为单一作物，在生产中运用机器，雇佣了白人劳工，并采用改良的工厂模式。在小麦产区南部，玉米成为堪萨斯州、艾奥瓦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主要作物，作为粮食或加工成饲料上市或囤积起来。得克萨斯州的棉花种植区开始向新的地区延伸。这样，农田彻底将印第安领地包围。在那里，人们认识到多样化农业的可能和好处。

从加拿大穿过美国到墨西哥，这条农业带从井水灌溉的密西西比河谷底部向落基山脉的平原延伸。对于一般的农业需求来说，西经97度线附近地区降雨量常年不足，但出售土地的人将殖民者吸引到了这个半湿润地带。19世纪80年代，只有极少年份降雨量超过了年平均值，乐观者还在幻想出现永久性的气候变化。1886年，堪萨斯州长称：“堪萨斯州西部三分之一的广阔土地必将肥沃起来。”1888年，东部一位见多识广的参议员预测道：“整个达科他准州地区能留住如艾奥瓦州一样多的人口。”

在以农业为主的边疆与山区之间，铁路为畜牧业带来了新的市场。在利益的驱动下，牧人扩大了牧场范围。从得克萨斯州到蒙大拿州的“漫

长车程”在边疆地区已司空见惯。牛仔们在孤单的眺望中发展出一种典型的美国民歌文学。因为羊群破坏了牧牛人的牧场，所以牧牛人与牧羊人之间一直存在矛盾。虽然这双方都是公有土地的非法侵入者，但牧牛人还是厌恶羊群入侵他们的地盘。

作为西部与西南部铁路和东部铁路的交汇地，堪萨斯城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位于稳定农业区与平原游牧区分界线附近的堪萨斯城成了农产品和畜牧产品的便利市场。在那里，新鲜的牛肉经过包装加工，通过新铁路的冷藏车厢运送至各地。东部的农民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对鲜肉的需求，而远西部平原的鲜肉供应商解决了这一问题。

铁路带给山区的改变没有远西区多。南北战争期间，山区吸引了众多人口开拓营地。后来这些营地得到了扩张，发展得也更为稳定。山区从此变得重要起来，虽然还有很多山谷等着灌溉，很多农田等着耕种。如果没有农业的发展，美国西部地区不可能获得繁荣。

19世纪80年代末，人口越来越多，因而需要更多的宅地。在这样的压力下，俄克拉何马诞生了。在大半个世纪里，印第安部落一直完全占有此地。南北战争之后，平原部落也在这里定居下来。如今，依据《道斯法案》，土地被统一分配给印第安人，原先部落的所有财产一并上交，而广阔地域则分配给白人殖民者。经过了十年被驱逐与限制的岁月，1889年，俄克拉何马州向白人移民开放。加斯里和俄克拉何马城仿佛是一夕之间建立起来的。1890年，俄克拉何马准州也初具规模，基本稳定下来。

在横贯大陆铁路竣工之前，各准州纷纷请求恢复它们州的地位，并为此展示出它们在人口上的优势。1883年，当亨利·维拉德在俾斯麦为议会大厦奠基时，达科他准州已经有三个界限清晰的群体，最后加入进来的是殖民群体。十年中，达科他准州的殖民者们不断制订各种法规并签署了请愿书。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为达科他准州争取申请为州。另一方面，1883年到1889年间，众议院为民主党人控制。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支持那些可能为共和党控制的准州，所以就找出各种借口阻止相关议案通过。发展情况不如达科他准州的蒙大拿准州，以及生产方式还比较落后的爱达荷准州和怀俄明准州，也申请成立为州。亚利桑那准州和新墨

西哥准州也加入申请的行列。自1850年起，犹他准州就开始了申请之路。随着普吉特海湾和斯波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华盛顿准州即将迎来加入联邦的时刻。



铁路线穿过西部落基山脉



19世纪**90**年代的俄克拉何马城

出于党派原因，民主党一直压制各准州的请愿。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888年竞选，共和党在美国政府各机构的势力得到巩固。从此以后，民主党再也没有反对的理由了。1889年，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签署“综合”法案，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蒙大拿州和华盛顿州终于成立。爱达荷和怀俄明的申请未能获得通过，直到1890年它们才在共和党的支持下成立为州。以前无组织的边疆地区消失了，新州的拓荒者们现在像美国其他地区的市民一样，享受着卧铺车厢，读着手里的各种月刊杂志。

1889年到1890年，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先后被剥夺了州的资

格。因为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认为这两个州受民主党控制，所以在接下来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它们一直以准州的身份出现。有着充足人口的犹他准州因为教会组织的种种行径也一直没有被批准为州。联邦政府想以此控制它。1850年，摩门教在犹他准州兴起并发展起来。其他美国人厌恶摩门教徒的一夫多妻制，因而一直反对犹他准州加入联邦。1882年，犹他准州由一个委员会管辖，从此，一夫多妻将受到惩罚。1890年，犹他准州教会放弃抵抗并且正式废除了令人生厌的一夫多妻制。为时已晚，犹他准州没能赶上这一次被政府接纳的机会。

1890年，美国适合耕种的土地几乎全部归私人所有。1885年至1890年，个人很容易得到公有土地。加之铁路公司所做的努力，个人很快就占有了这些土地。随着自由土地的消失，美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美国人立刻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后来，这一点变得更加清晰。

1912年，美国四十八个州共拥有十九亿零二百万英亩的土地，其中二十九个州十四亿四千二百万英亩的土地被国会划归公有土地。1781年和1853年，这些土地曾通过转让、购买或者征服的方式划分出去，现在作为国有资产为国会所管控。到1903年，美国将近一半的公有土地和农田转移到个人名下。国家则保留了数百万英亩的土地，但这些土地大都是山区或沙漠，对于西部典型以个人为劳作单位的农民来说并不可用。

1880年，统计学家们意识到自由土地的时代已经过去，开始关注地产管理中的滥用现象。一开始，强迫西部尊重国家土地法是一件很难的事。没有得到授权非法占有土地的人一直都是统一管理土地的障碍。西部很少有人反对这样逃避法律管辖的行为，希望以最快的方式将公有土地收至个人囊中。在进行文官制度改革之前，受固有观念的影响，美国政府要想在这些地区执行土地法的相关规定几乎不可能。政府必须以正当统一的政策来执行土地管理方案，就像设置土地管理局一样，技术难度很高。《优先购买权法》《宅地法》和《鼓励西部草原植树法案》等都是为了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制定的，但因为在执行的过程中充满欺诈和勾结而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美国政府没有为那些需要大面积土地的行业制定合法占有土地的条款，导致大量欺诈现象出现。

非法占有土地的现象比比皆是，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畜牧公

司得到并守护着所需的一切，用武力赶走“侵入者”。邮政承包商抱怨，他们不敢拒绝的非法附件，使美国邮政偏离了合法的路线。土地基本法反对除美国政府以外的任何土地所有者保留占有的土地。如果美国政府不能或不去干涉，他们将得不到任何补偿。

多年来，这种非法占用土地的现象已被关注，又被少数拥有大量资产的英国贵族广而告之。那几年，外来地主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刺激了爱尔兰人。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上台之后，土地总局局长威廉·安德鲁·杰克逊·斯帕克斯大力加强土地所有制改革，并对此信心满满。同时，他也经常谴责将这种混乱局面归结于共和党的管理不力。出于审查的目的，威廉·安德鲁·杰克逊·斯帕克斯停止授予宅地及优先购买权，要求撤销《优先购买权法》，并成功收回了一些先前因为支持铁路建设而赠予铁路公司的土地。



土地总局局长威廉·安德鲁·杰克逊·斯帕克斯

接受了土地赠予的铁路公司声名狼藉，因为铁路很少能按照合同签订的时间完成，所以按照规定，赠予的土地理应没收。据估计，赠予铁路公司的土地达到二亿一千四百万英亩，但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没收多少土地。铁路为西部带来了人口，铁路公司的规模也得以进一步扩大。看到这些铁路竣工，民主党眼红起来，因而千方百计地想收回之前赠出的土地。在这场斗争中，五千万英亩的政府赠地被收回。但收回土地仅仅

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大多数的良田都已流失。

在要求公共土地改革的声音中，剩余未被划分的土地有了新的意义。在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任期的最后，美国农业部得以成立，本杰明·哈里森任命杰里迈亚·麦克莱恩·腊斯克州长为首位农业部长。杰里迈亚·麦克莱恩·腊斯克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被喻为“内阁之尾”的职位，表示自己迫切期待能“将这些苍蝇驱走”，并着手重新整理和科学设置一批相关的管理部门。如果不进行灌溉，大多数的剩余土地都不能用于耕种。国会进行了大量调查，开启了公共科学的新阶段，实证保护理论开始受到关注。

虽然横贯大陆铁路的完工给美国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通信系统中存在的问题、西部殖民问题以及公共土地问题，但铁路本身也赋予美国交通运输新的意义。格兰其运动的那些年，人们认为铁路的性质是准公有，并且需要接受政府管理。1877年，在格兰其的案例中，美国最高法院允许各州依据法律自主决定运价。即使作为联运运价的一部分，它们制定的运价偶尔也会对州际商业产生影响。19世纪7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这个问题只存在于地方或部分地区。大多数州先后通过了铁路法，并且通过《温德姆和赫本报告》这样的公共调查以及法律诉讼记录暴露出特别优惠和折扣的真相，继而积累了大量铁路行业数据统计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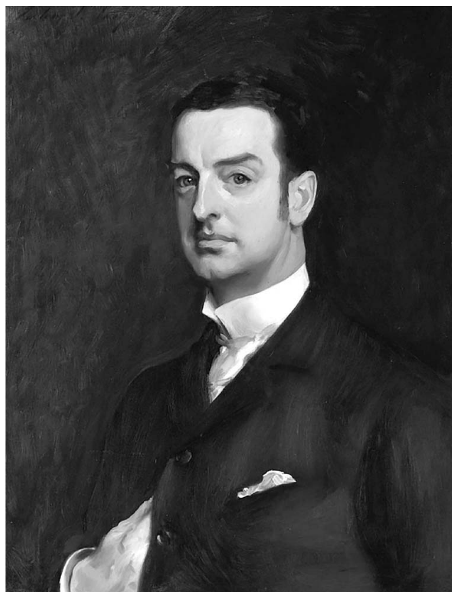
本杰明·哈里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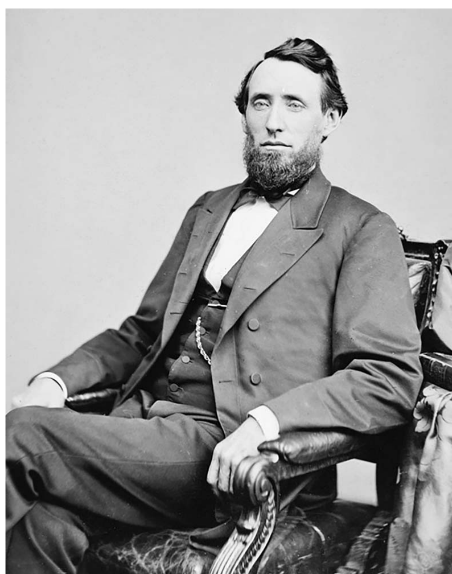
在各州铁路改革继续深化之前，人们发现美国没有哪一个州可以恰当、公正地管理州际铁路事务。亨利·维拉德与杰伊·古尔德以及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与科利斯·波特·亨廷顿建立起来的伟大铁路系统主导着几乎所有地区的铁路运输业，同时引出政府行为有效性的问题。长长的横贯大陆铁路必然要穿过几个州，突显了州权力与可能出现的问题之间的不对等。铁路的国家属性则指向了国家对铁路的控制。

1873年之后，国会一直想要出台一部州际商务法。1885年，以伊利诺伊州参议员谢尔比·摩尔·卡洛姆为首的委员会做了一项新的调查，并在1886年出具报告，说明了监管与宣传的重要性，指出联邦委员会加大取证与账簿检查的力度便是最佳途径。该委员会以及公众都已经达成一致，认为监管州际商务是国家问题。

188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沃巴什铁路公司诉伊利诺伊州案中做出新的决议，认可了这一观点，却在格兰其案件中调转方向，修改了决议。1877年，最高法院曾规定铁路受国家管理，而各州在其警力的配合下也可以管理铁路。现在，最高法院坚持履行这一主要承诺，却宣称因为这种管理影响到州际运价，所以应由联邦专门管辖。最终，最高法院规定这些铁路只能由国会来管理。

州际商业管理并不是政党方针。两党中都有人呼吁对铁路事务进行管理，而铁路方游说团体反对任何政府干预铁路事务的行为。铁路拥有者和主管者在接受铁路事务的准公有性质上比公众要慢。他们需要面对激烈的反对意见。因为铁路系统的规模和影响太大，任何小小的举动都有可能或者实际上影响个人客户的数量，甚至可以成就或毁灭整个西部地区。随着铁路越来越受欢迎，对消除该行业中歧视现象的要求上升到新的高度。


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


伊利诺伊州参议员谢尔比·摩尔·卡洛姆

1887年2月4日，《州际商务法》正式成为一项法律。随后，一个拥有六年任期的五人委员会成立了，并附有限制性条款，规定不得有超过三人以上的委员属于同一政党。《州际商务法》禁止导致不公平待遇的一切行为，并赋予委员会调查与干预不公平现象的绝对权力。该法后来

做出解释，撤销了之前赋予委员会的几项权力。在1887年至1906年间，州际商业委员会都是管理铁路问题的核心角色。该委员会的工作，如灌溉与农耕等，都属于技术性较强的工作，需要向专家咨询。该委员会的很多职能都是第一次发挥作用，推动着国家行政进行角色转变。

第10章　垄断资本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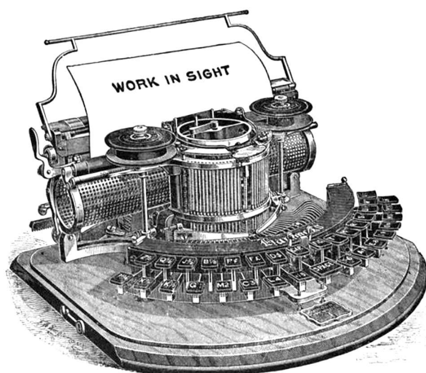
19世纪80年代，运输业是美国两大关键问题之一。随着自由土地和边疆地区的消失，运输业影响了整个美国，为美国西部带来的变化最明显。随着资本的集中和信托的发展，运输业的发展大多发生在拥有资本积累、广阔市场和充足劳动力的东部地区。

随着通信方式的进步，每个州都有可能通过总部的统一指挥高效地运营业务。不仅铁路和电报做出了贡献，电话、打字机、摄影与打印技术的进步以及快递业的发展都意义非凡，改变着美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新闻业的扩张，其管理更加集中。周刊、月刊甚至是都市日报的发行范围都得以扩大，同时，新闻媒体之间互相竞争，实力较弱和地方性较强的报刊容易被淘汰。插图的引用改进了期刊文献的外观。

拥有全国规模和国家视野的社会组织也利用起新的通信方式。商业联盟、慈善机构以及职业协会增加召开年度会议的频率，也使成员深入了解自己的组织。一些杂志和制版师们纷纷开始传播各种时尚潮流信息，服装制造商们纷纷效仿生产，地方小店的老板们开始零售各种潮流服装。邮购业务也因此得到发展。新潮又统一的外观进入了美国人的生活，而落后的地方观念对人们衣着、言辞与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小。几年之内，在美国到处都有可能“与穿着世纪初带荷叶边装饰的衣服，甚至是戴着整个丝囊假发的绅士”坐下来吃饭。但新的潮流标准是大众的标准，贵族要想拥有专属风格或者是与大众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已经变得越来越难。



19世纪80年代的电话机



19世纪80年代的打字机



几名摄影工作者将多台摄影机安装在一个可旋转的架子上，这样可以360°无死角地摄影

全国统一的发展趋势也体现在集中管理上。随着竞争领域的不断扩大，要在竞争中胜出越发困难。一个人的能力不仅体现在其所在城镇或

是州内，还体现在整个美洲大陆。许多公司首脑将通信设备看作行业扩张的基础。在具备了各种可能的条件后，各公司看到了其中的利益，便开始扩大业务范围。

当时，不需论证，很多整合经济的优势已经十分明显。如果一个公司可以承担五个或五十个公司的业务，那么它就能通过更大更好的工厂、更精细的劳动分工以及对副产品更细致的利用来提升利润。公司可以通过裁减大批从事同类工作的销售员以及减少功能重复的行政机构以减少开支。同样的管理经济学理念也使原来的南方地区朝着大型种植园的模式发展，就像之前使美国工业社会向经济整合和托拉斯的方向发展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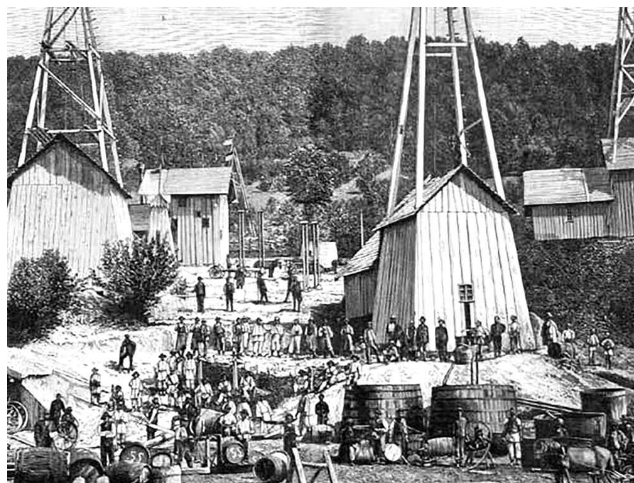
信托组织的技术形式并不重要。严格来讲，它是一系列相互竞争的公司组合。为了统一管理，这些公司的一切控制权都交予受托人。信托的名字由此得来，但在被人描述为任何可以影响其所在行业整个贸易过程的大企业，也就是托拉斯之后，这个名字才为人所知并广泛流传。信托的逻辑结果是垄断，而且信托最初就是出现在那些因为在竞争、专利控制或商业机密中损失太多而存在垄断倾向的行业。

第一个引起公众注意的托拉斯出现在运输业和石油及油品制造业。19世纪60年代，石油提纯的工业化生产过程已经形成，促进了国内照明技术的发展，也刺激了石油产品市场的扩大。石油行业从本质上来说属于投机性质，因为油井里的原油非常廉价，但运送到每个顾客手里时却价格高昂。价格的轻微上涨都会造成生产过剩，使市场陷入困境，而该行业的控制权则落入那些控制运输业的人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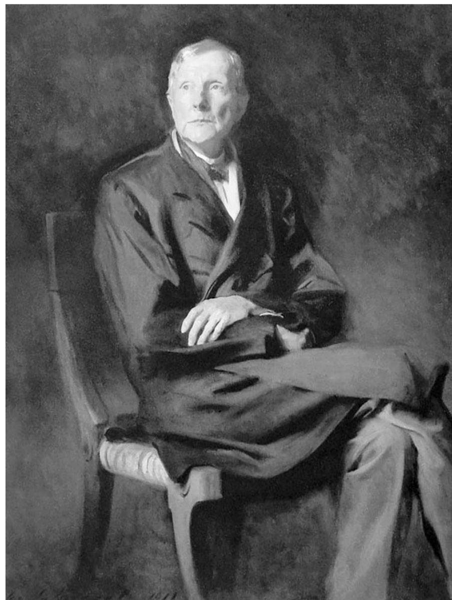
出井后，廉价的大桶装原油便首先会被拉去精炼，然后作为成品油卖给顾客。用来装石油的容器造价高昂，而整个操作中最廉价的运输环节在初期的建设成本却最高。油桶价格便宜，但要搬运油桶却很贵。油罐车的费用更高，但最后的利润也足够补偿那些负担得起它的人了。由于个人无法修建石油运输管道，拥有石油管道的公司能获得很高的回报。

19世纪60年代，在美国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油田竞争中，一些商人认识到运输方式控制价值的策略以及其中的潜在

利润。而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碰巧比其他操纵运输业的人都更成功。他的石油精炼厂规模不断扩大，收购或击败了众多对手。到1882年，大多数运输石油的系统都已经在他的控制之下。他的成功与精明、睿智密不可分，但更多得益于运输系统的重要影响。因为铁路运价还没有被法律约束，所以每家铁路公司都尽可能以最高价格出售其运输服务。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逐渐学会对运费讨价还价，获得铁路公司的特别优惠运价和折扣而拥有超越所有竞争者的优势。他的游说集团让人们很难通过立法手段打击他，而他的律师团面对法庭比起诉人更加游刃有余。对折扣存在的认识促进了《州际商务法》的通过。一批因为折扣发展起来的公司后来都发展成大型托拉斯企业。到了1882年，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的附属公司已经非常多了，而且非常复杂，所以后来他就把这些公司交给一些受托人，像单独的企业一样来管理。



炼油厂工人工作的场景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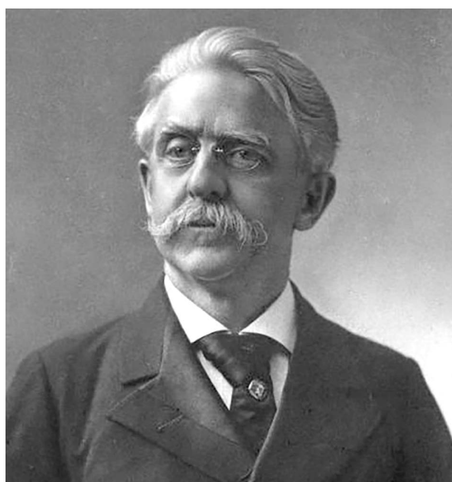
漫画：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站在油桶上，头戴代表着庞大商业帝国的皇冠，这说明他已经成为美国石油工业当之无愧的王者

1887年，威士忌酒和糖托拉斯成立。在酿酒和制糖行业中，运输并不是主导因素，但存在生产过剩和毁灭性的竞争。为了消除这些负面因

素，酿酒厂和炼糖厂签定了信托协议，正如当年标准石油公司的选择一样。为了跟上了这一潮流，其他制造行业极尽所能。在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就职以前，这种趋势既引起了关注，也遭到了压制。

反对托拉斯的声音主要来自那些深受其扰的人。竞争是残酷的，有时甚至跨越了道德底线。因为托拉斯而遭遇毁灭性打击的人都痛恨这个始作俑者。各行各业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很多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并与时俱进。工厂的规模不断扩大，做工越来越精细。与19世纪其他年代相比，19世纪80年代，在美国改变职业角色的工人数量最多。每个人都必须重新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像大多数人一样，工人们也认为托拉斯是社会的威胁。

早在1881年，美国就出现了反托拉斯文学市场。1881年3月，《大西洋月刊》发表了文章《大垄断的故事》。这篇文章的作者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后来成为打击托拉斯行动的领袖之一。因为看到美国的成功，美国人的精明得到了广泛认可，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至于获取成功的方法并没有人考虑太多。标准石油公司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也引发人们去关注工业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

托拉斯带来的恶果与社会和政治都密切相关。从社会的角度来考虑，个人主义是造成托拉斯恶果的元凶，因为人们创造出大量的子公司并交给独立的生产者去经营。作为垄断企业，它们通过要高价来威胁、

勒索大众。人们强烈怀疑，那些大型的托拉斯企业破坏了所有的竞争体系以达到肆意定价的目的。经济学家们则认为价格不可能定得过高，托拉斯企业仍有利可图，因为这些企业不敢核查资源耗费情况。但任何经济法都不可能消除人们对经济压制的恐惧。

托拉斯也给政治带来了恶劣影响，并且通过贿赂官员或施加压力来获得特别优惠待遇。美国人已经习惯了以金钱来影响政治的丑闻，并且对政府官员已经不甚信任。这一时期制定的州宪法已经延伸出具体法律条款以捍卫公众利益，但托拉斯的腐败才刚刚开始，还很少有人能意识到抵制托拉斯的必要性。

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以及很多跟他一样的人相信规范与控制的力量。其中一部分人成了社会学家，另一部分人希望依法恢复竞争机制。给公众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反托拉斯者的文学盟友爱德华·贝拉米。



爱德华·贝拉米

1888年初，爱德华·贝拉米出版了传奇之作《回顾》。这本书的主人公朱利安·韦斯特在1887年陷入沉睡，耳朵里不断听到劳动争议和对托拉斯的谴责，直到2000年才醒过来。主人公醒来时，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工业放任自流的状态已经结束。这本书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狂热推崇此书的人组成一个个俱乐部，试图通过建立贝拉米式的社会来加快国有

化进程。那些并不看好未来托拉斯与州融为一体的人越加强烈地要求对托拉斯加以规范。

规范托拉斯的立法进程正如规范铁路的进程一样，因为国会与各州权力的分化而越发艰难。一个州能否控制全国规模的垄断企业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各州纷纷通过反托拉斯法，就像当初通过铁路法一样。从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州制定的习惯法通过贸易管制杜绝了阴谋的出现。现在，它们要照搬这个模式。其中，俄亥俄州仅根据习惯法对标准石油公司提起诉讼，并在1892年，通过了反对该公司的禁止令。根据经济法的基本精神，打击托拉斯的正式组织相对容易，但这样的集中打击却没能阻止更大的合并企业继续出现。

除施加规范外，同样支持关税政策修订的反垄断者还拥有一个有力武器。他们认为，这些公司的迅速发展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不必要的贸易保护。这种保护使美国失去了这些公司的潜在竞争对手欧洲制造商的援助。反垄断者们坚称关税政策修订会极大地减轻托拉斯带来的负担。1888年，众议院在审议无足轻重的《米尔斯法案》时下令对托拉斯进行调查，为接下来的总统竞选提供了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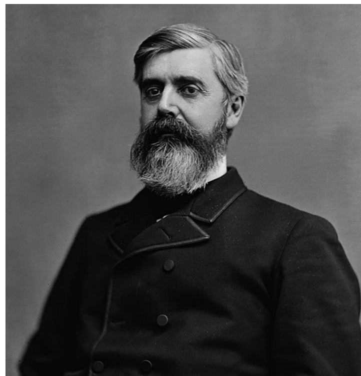
政党方面，1888年，共和党积极采取行动。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强调减轻关税的重要性，但没能得到民主党全党的积极支持。制造商们因修订关税政策的持续威胁而提心吊胆，因此他们转而支持在野党——共和党，并通过在该党内部成立组织改变自身的处境。1888年，制造商领袖改变论调，不再为关税问题辩解，转而依据相关原则——早先亨利·克莱关于美国制度的原则——来维护自身利益，并呼吁继续完善该原则。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先是从佛罗伦萨，后来从巴黎回应了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1887年度的国情咨文。直到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明确表示拒绝候选人的资格后，共和党才在芝加哥召开代表大会，确定了包括约翰·谢尔曼、沃尔特·昆廷·格雷沙姆、昌西·米切尔·迪普、拉塞尔·亚历山大·阿尔杰、本杰明·哈里森和威廉·博伊德·艾里森在内的候选人名单。票选结果最后锁定了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本杰明·哈里森以及纽约州的银行家利瓦伊·帕森斯·莫顿。当时，共和党的政治纲领是“坚定不移地支持美国贸易保护制度”。这一纲领谴责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以及主张修订关税政策者为“欧洲利益”服务，并指责“《米尔

斯法案》整体上对美国商业、劳工和农民利益都造成了损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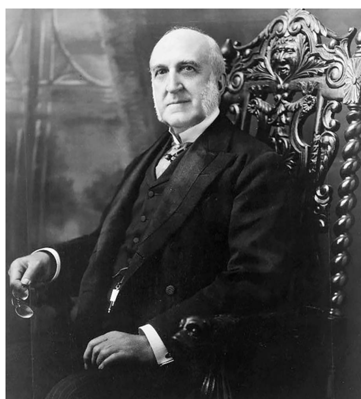
民主党则如同往常一样对执政党权力充满渴望，早在共和党之前就召开了代表大会。民主党人一致同意再次推选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为总统候选人、艾伦·格兰伯里·瑟曼为副总统候选人，并且虽然没有在名义上支持《米尔斯法案》，但对总统和国会众议员在关税下调上做出的努力表示肯定。很多民主党人对捍卫关税政策修订的要求忍无可忍，以至于选择脱离自己的政党，并指责正是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的所作所为让他们不得不选择脱党。

1888年，游说活动并没有受到1884年关于性格讨论的影响，两党都真诚地讨论贸易保护的问题。从欧洲归来的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则带领共和党向对手发起了攻击。竞选活动中唯一的意外事件跟“默奇森来信”事件和竞选基金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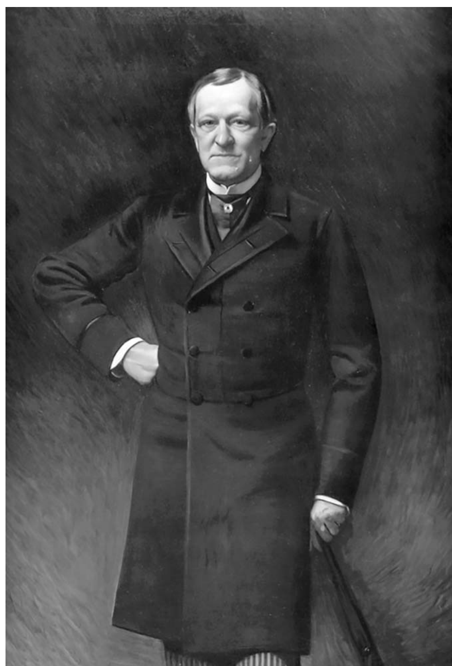
共和党竞选委员会主席、宾夕法尼亚州财务主管马修·斯坦利·夸伊也没能免于受责。据称，在竞选期间，他对受保护的制造商应缴纳的税款进行了评估，并保证一旦共和党胜出便会免除这部分税收。他至少是利用了这些制造商的恐惧心理，大力支持自己的政党对贸易保护所做出的承诺。他的竞选委员会四处散布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对美国不利的言辞，指责其自由贸易政策是亲英政策，并指责布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通过否决抚恤金议案获利。在游说活动快要结束的时候，英国公使韦斯特爵士莱昂内尔·萨克维尔掉进了共和党的圈套，写信给一位自称默奇森、假装入了美国国籍的英国人，称投票支持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对英国最有利。这个不明智的做法铸成大错。结果，在华盛顿，他被立即撤职，帮了共和党，就像1884年塞缪尔·迪克森·伯查德事件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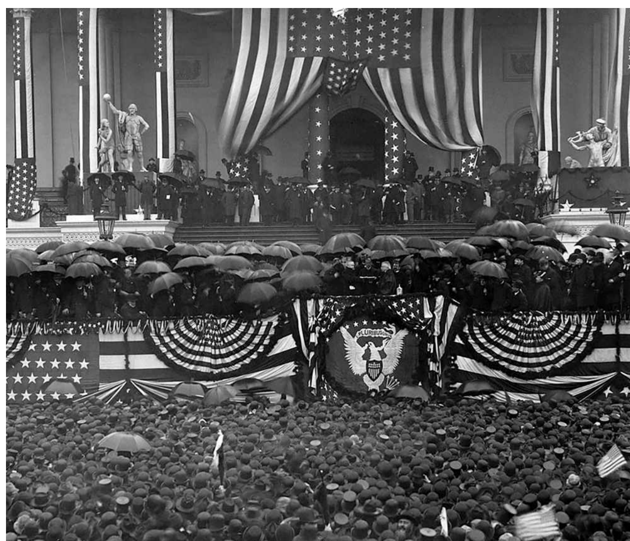
沃尔特·昆廷·格雷沙姆



昌西·米切尔·迪普



利瓦伊·帕森斯·莫顿



本杰明·哈里森的总统就职典礼

1888年11月，本杰明·哈里森作为“少数票总统”当选。而事实上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赢得了更多的支持，但他获得的选举人票太少了。与本杰明·哈里森总统一同上任的还有一届共和党主控的参议院与众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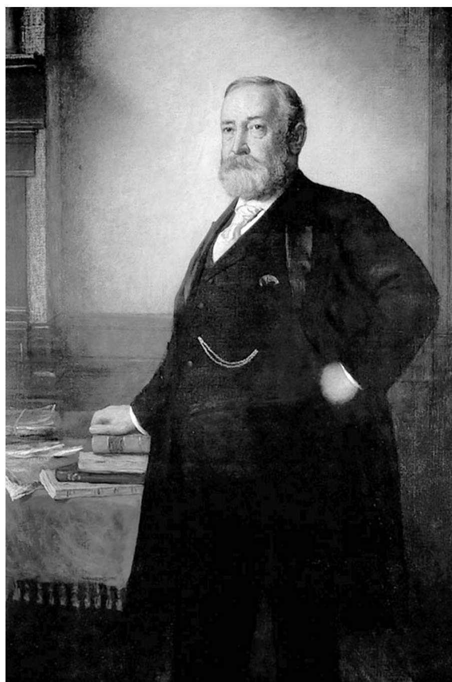
院。自1883年以来，共和党首次实现了全面执政的目的。

当选前，本杰明·哈里森从未做过共和党领袖。他有着良好的战绩，并且曾经做过一整个任期的参议员，能得到提名并不是因为实力而只是因为符合候选人的条件而已。本杰明·哈里森来自立场不明的印第安纳州，因为共和党的州长候选人是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的领袖，他很有可能接管该州。在政党领袖遭到攻击的一刻，本杰明·哈里森展现出的个性和虔诚成为非常宝贵的财富。在政府工作时，他一旦稍微表现出冷漠或是无理，就会失去那些自认为比他实力更强大的同僚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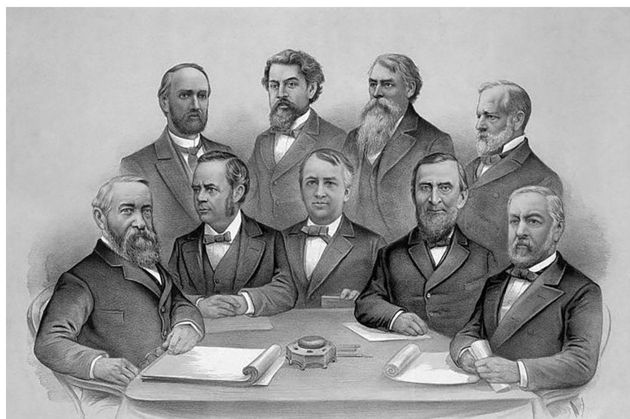
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是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同僚中实力最强的一位，现在已经是国务卿了。不久，他如愿召开在1881年就提议召开的泛美会议。随着深入参与美国事务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他失去了作为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敏锐，开始对外贸燃起热情。后来，他又一次陷入与英格兰的辩论。这一次是关于白令海的海豹，但很遗憾他没能获胜。

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做出的某些任命可以说是在偿还共和党在竞选时所欠下的债。威廉·温德姆又回到了财政部，虽然纽约州的前参议员托马斯·科利尔·普拉特声称共和党曾许诺，若竞选成功会将该职位赠予他。约翰·沃纳梅克曾在费城筹得大量资金用于协助马修·斯坦利·夸伊竞选，但后者最终只成为美国邮政总长。抚恤金管理局因为与士兵结成联盟而显得尤为重要。现在，该机构由一位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的领袖接管。这位领袖最出名的一句话表明了他的意图：“上帝保佑盈余！”

1889年12月，第五十一届国会召开会议，带着极大的热情接管了选举工作。在共和党看来，国会是为贸易保护而修订关税政策。国会选择了缅因州的托马斯·布拉克特·里德为众议院议长，并且修改相关规定以加快立法进程。威廉·麦金利在众议院起草了一份关税修订议案，而另一位俄亥俄州人约翰·谢尔曼则负责在参议院处理托拉斯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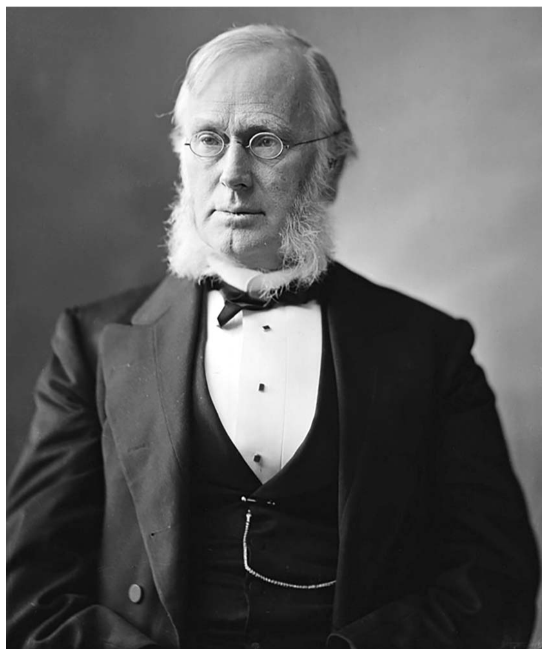
总统任上的本杰明·哈里森



本杰明·哈里森（左一）与他的内阁成员

1890年7月，经过十年的广泛讨论之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终于颁布。此法虽然由共和党人约翰·谢尔曼、乔治·富兰克林·埃德蒙兹和乔治·弗里斯比·霍尔制定，却并不是一个比《州际商务法》更清晰的政党方针。依据《宪法》中有关州际商业的条款，该法规定：“任何用来限制州际与国际贸易或商业的契约、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出现的联合、

共谋均属于非法性质。”同时，该法还提供了违犯该法的处罚方案。对《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最重要的一场辩论是关于密苏里州的众议员理查德·帕克斯·布兰德提出的一项修正案。他主张将禁令的范围特别延伸至铁路公司。而参议院的意见是，该法是一部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其中已经涵盖铁路公司，并不需要在修正案中做特别说明，因而驳回了该修正案。在近十五年的时间里，《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都没有对相关内容做出明确且完整的解释，因为该法最初只是由几位个人请愿者发起，况且美国司法部长对普通的商业行为并无敌意。1893年，美国的金融大萧条反倒对托拉斯起到了暂时的遏制作用。有人怀疑，最初制定这部法律的目的可能并不是用于实施，而是作为与当时等待审议的《麦金利关税法案》对抗的手段。



乔治·弗里斯比·霍尔

1890年，关税政策修订找到了三个理由，生产剩余依然是其中一个原因。1889年，美国财政盈余高达一亿零五百万美元，而这笔财富却持续困扰着财政部。第二个理由是，1888年，共和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共和党领袖将这次胜利视为大众对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和关税制度改革的谴责，也是对更高级别贸易保护的呼吁。事实上，更多的美国人把票投给了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而不是本杰明·哈里森。第三个理由来

自反对的声音，即履行马修·斯坦利·夸伊和其竞选管理人员对为竞选基金捐款的制造商的承诺——这些制造商在改编的歌谣中被调侃为“玛丽”：

玛丽有只小羊羔，

她早已经决定好，

脱去洁白厚羊毛，

利润百分之五十六，

卖得价钱好。



马修·斯坦利·夸伊

1890年4月，威廉·麦金利提出法案要求“平衡对所有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并减少部分税收”。到1890年5月，国会一直在斟酌该法案的具体细节及相关问题。1890年6月，国会为政府中的士兵盟友制定了《伤残军人抚恤金法案》。该法案规定凡是服役九十天以上的伤残军人，以及接受过相关法律援助的士兵，可以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从美国十三亿五千万的盈余中分得抚恤金。1890年7月初，《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通过。1890年7月中旬，国会暂停对关税问题的讨论，应来自落基山脉各州共和党参议员的要求通过了《谢尔曼白银采购法》。这些人是想通过这种形式得到贸易保护。他们人数众多，让此事陷入僵局。

1890年10月1日，关税问题进入立法，成为南北战争以来首个成功通过的关税立法。该法扩大了贸易保护的范围并减少对部分商品的税收。减税部分主要体现在免除对原关税政策中回报率最高的原糖关税，同时给予美国糖厂每磅原糖2美分的补贴，进一步缓解了剩余危机。有关糖业的条款成为《麦金利关税法》的显著特征之一，并且与进口农产品的一系列关税紧密相关。关税保护政策并没有为美国农民带来什么好处，农民因此怨声载道。政府制定农业方面的计划以压制这些抱怨的声

音。

《麦金利关税法》的另一个创新点在于将关税保护延伸至还未出现的行业。比如，以马口铁为例，无论何时，只要总统得知美国工厂开始准备生产马口铁，他就有权对其征收关税。这就是应用这一原则的案例之一，已经超过大多数关税保护支持者的要求。

最后一个创新点是互惠原则，也是国务卿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个人最喜欢的一项计划。他发现，当前对外政策支持的关税壁垒阻碍了友好贸易关系的发展，因此国会允许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对从南美洲进口的主要产品征收关税。随着经验越来越丰富，威廉·麦金利完全接受了这一原则，在临终之际还对此念念不忘。1890年，多数贸易保护者倾向于绝对的排外政策，而不考虑对外关系，并且准备一旦进口商品总额较高就提高关税税率。

在通过《麦金利关税法》的过程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第三方在这样的立法中受益颇多。两院先后通过该法案，但对修正案的制订出现分歧，因而交由两院联合会议委员会仲裁。委员在报告中称，按照规定，《麦金利关税法》不可修正。通过委员会的努力，该法案得以最终形成，并且制定得十分完备，大多数共和党人都不得不接受。两院联合会议委员会中的党派领袖形成拥有专制权力的第三个议院，但他们与制造业发达地区或利益保护的密切关系也引起了公众对其决策公正性的怀疑。共和党对关税是托拉斯之母的说法做出回应，称关税将继续提高，并且禁止托拉斯进入州际商业圈。



《麦金利关税法》的提出者威廉·麦金利



19世纪90年代的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

第11章　农村、农民与农业

共和党的保护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在东部工业区。那里集中了美国制造业的大部分财富。西部的主要农产品能产生的利益很有限，基本与原来南方棉花作物的产出并无二致。即使在共和党管辖的地区，贸易保护的好处也受到质疑。格兰其各州与草原各州也基本上由共和党管辖。19世纪80年代，正如南方的棉花所遭受的情况一样，格兰其各州与草原各州经历了玉米和小麦价格下跌，因而受到鼓励接受了关税改革的建议。1887年，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发布的咨文深深地影响了这些州。1888年到1889年，各种国家文件转移到关税政策修订问题上来，而农民社团和农业期刊纷纷谴责贸易保护政策。共和党领袖感受到了舆论的不满，便通过实施《麦金利关税法》的相关农业计划来平息这种不满情绪，但1889年到1890年，不满情绪在大多数农业区不降反增。

南方农民受到棉价下跌的直接影响，他们内心对保护性关税的厌恶仿佛是世代相传下来的。他们不能相信哪个政党会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努力。19世纪80年代，政党主要议题与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没有丝毫关联。南方农民对文官制度改革并不感兴趣，因为文官制度改革认同并重视专业性，是社会分化的产物。他们习惯了各种纷繁的工作，而对政府管理几乎一无所知，只是认为政府应当把官职分配出去。几乎所有的美国农民都有这样的观点。



美国南方棉花种植园，棉农们在为棉苗疏松土壤

南方农民对抚恤金制度也不感兴趣，而且有批判该制度的倾向。《第十四条修正案》强硬地否认了邦联的所有债务，并强制南方老兵纳税，却将征得的税收作为联邦老兵的福利，将南方老兵排除在外。南方农民虽然在自己的党派中找不到发言人，但也不可能转投共和党。

在北方，农业持续低迷，农民苦不堪言。许多地区的农田几乎荒废。人们开始关注科学种田，但很少付诸实践。运输方式的进步让西部肥沃的新土地成为东部土地在城市市场的竞争对手。在平原地区饲养的牛被运往堪萨斯城或芝加哥屠宰，然后在纽约和费城上市出售。西部生产的优质水果与东部生产的普通水果一同上市竞争。在这里，正如在南方，农民注意到党派之间就制造业相关问题争执不下，而丝毫不关心农民问题。

西部农民最为不满。没有任何地区像西部这样，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集中了如此统一的状况。格兰其各州见证了这样强烈的不满情绪是如何影响政治决策的。19世纪80年代末，在密苏里州和艾奥瓦州西部的新地区，铁路刺激移民到可开垦的大草原周边安居落户。1885年左右，得克萨斯州、堪萨斯州、科罗拉多州和达科他准州开始进入繁荣时期，也促使普通年景不适耕种的地区开垦出新的农田。只有盲目乐观者才会相信半湿润的草原气候会发生改变。年景好时，作物种植向西一直发展到落基山脉，而年景差时，就连堪萨斯州东部也面临干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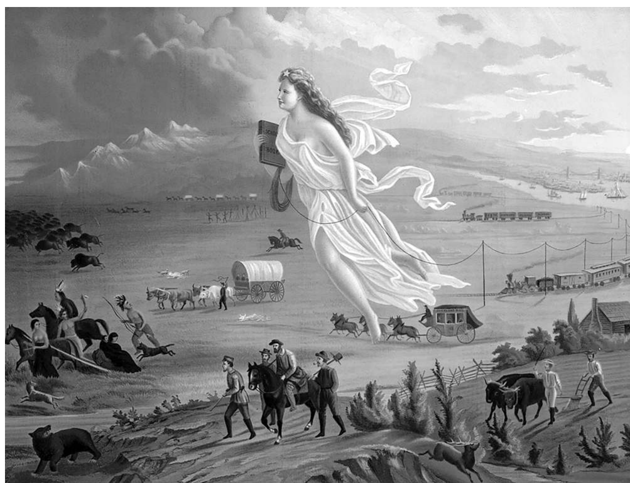
铁路公司为了利益吸引新移民来铁路沿线落户，而他们的投机活动更谨慎了。这几年的风调雨顺也帮了铁路公司的忙，使新移民将草地开拓为居住地或谷仓用地。与此同时，移民的素质参差不齐，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19世纪90年代美国西部的肉牛养殖场

西进运动早期，各边疆地区都已有移民分布。他们主要是之前边疆的占领者，了解怎样的气候和条件适宜农业的发展。越往西偏移，铁路公司提供的便利交通吸引到向平原迁移的农民就越少。他们中有一部分是业余务农者，另外一部分则十分了解不同类型的的耕种方式。必须要面对新情况的人群较之前的开荒者更不容易成功。

19世纪80年代，美国边疆地区的降水极不稳定，给试图在此处开荒种田的农民带来了困难。同时，移民定居点周边情况不容乐观。对于那里的生活而言，运输如同对于格兰其各州一样至关重要，但处于几近失控的状态。1887年，《州际商务法》并没有立即起到显著作用。歧视、不合理定价和过多投资等负面因素仍旧影响着西部的发展。1885年和1886年，劳工组织在西部的罢工运动给需要不断接受培训的农民增添了新的障碍。反铁路运动在各地均有萌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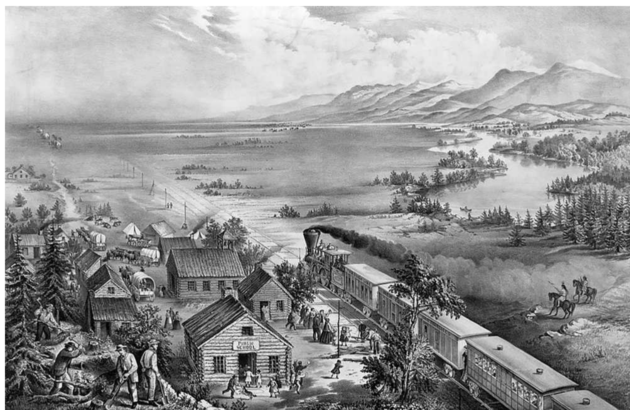


美国画家约翰·加斯特笔下的“西进运动”。这幅画展示了美国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的信念。在圣母玛利亚（象征西方文明）的指引下，殖民者们拖家带口向西部迁移，火车、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开向西部，野蛮的印第安人生存空间受到挤压，随之往西迁徙。文明之光渐渐地将黑暗驱散。“西进运动”使美国西部得到了开发，但也是一部印第安人的血泪史

在美国的新边疆地区，反公司运动的出现在情理之中。那里的居民只能生产农业初级产品，必须从遥远的地方购买生活必需品。高昂的日常开支和低廉的收入形成鲜明对比，使他们举步维艰，渐渐成了反托拉斯煽动者演讲的听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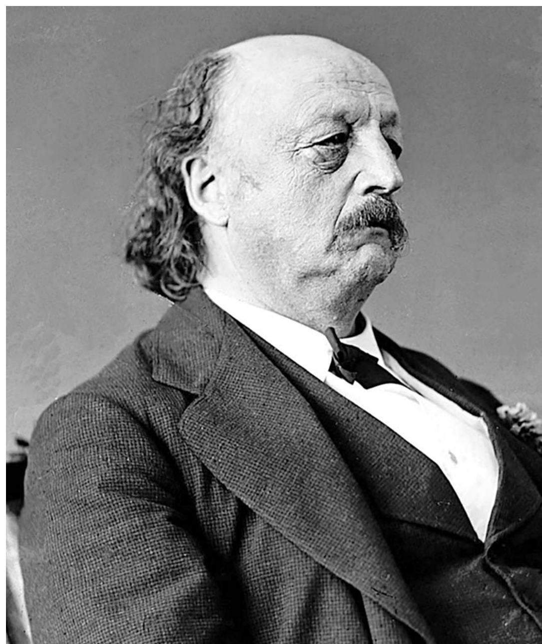
像许多边疆地区一样，新边疆地区靠着借贷发展起来。开拓者们依赖借贷，并且对此满怀希望与投机心理。靠着借贷，他们修建的城镇与铁路已经远远超过实际需要。而他们背负的沉重债务只有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繁荣后才能还清。

开拓者们受到通货膨胀理论的煽动，改变了之前的观点。绿背纸币已经开始通货膨胀。自1879年恢复硬币支付之后，绿背纸币仅仅成为一个毫无根据的政治威胁，支持者寥寥无几。绿背纸币党与劳工和反垄断人士站到了一起。1880年和1884年，他们分别提名詹姆斯·贝尔德·韦弗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为候选人。然而，即使在通货膨胀论者中，投票支持他们的人也不多。通货膨胀新时期比绿背纸币时代要有趣得多，也导致呼吁自由银铸币的声音高涨。



铁路穿过美国西部地区一处定居点

在西部农民的众多呼吁中，最大的问题是偿还债务。其中，最常听到的是要求发行更多廉价货币。东部农民虽然很少有债务负担，但他们知道发行的货币越多物价就越高的道理，认为这样会带来更高的利润。南方农民则债台高筑，但并不考虑眼前和长远的发展问题，因为他们常常提前就把作物抵押出去，让乡下的店主们为他们出资。他们也对通货膨胀十分感兴趣，将其视作常用的补救措施。1878年，《布兰德-艾利森法案》[1]通过后，美国各个地区的农民都在敦促各政党推进自由铸造银币进程。随着银价的下降，白银通货膨胀能够带来的利润相应增加，农民们因此加入开采银矿的行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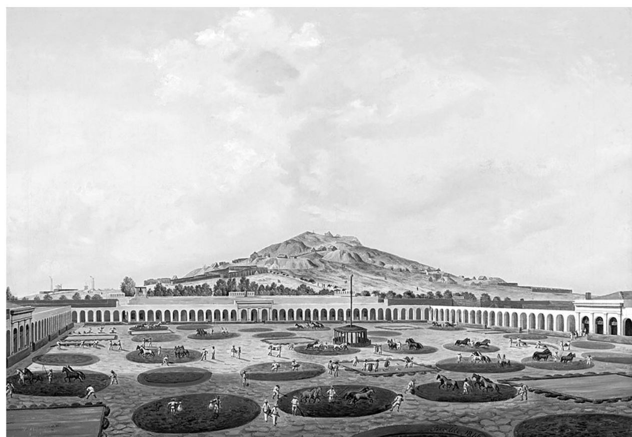


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

在蒙大拿、爱达荷、科罗拉多、犹他、内华达、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银矿一直都是重要产业之一。在西部的多数地区，银矿也备受重视。1873年以后，由于银矿产值下降，银矿主们与东部制造商一致要求政府给予帮助和保护。他们想通过恢复银币支付获得所需的“保护”，要求国会将所有白银用于铸币，并将白银与黄金同列为货币基础。在补救措施方面，银矿主们是农民通胀论者的同盟，但双方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真实目的水火不容。采矿者希望政府允许自由铸造银币以提高银价进而获取更多利润；农民则想要提高货币流通量以降低货币的价值。如果一方关于自由铸造银币的结果预言正确，另一方则注定会失望。但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双方的共同要求被一再重申。在年景好的时候，这一要求还不太激烈，但任何对西部繁荣或信誉的打击都可能刺激不满者爆发一场新的运动。

1889年，降水不足，庄稼歉收，一场危机的到来使西部的不满情绪开始牵动政治领域。1889年，平均降水量达十八英寸的阿肯色州河谷流域的总降水量只有十三英寸。自1869年起，纳尔逊·阿普尔顿·迈尔斯将军一直在平原上追逐着对美国人充满敌意的印第安人。他看到新村庄一英里接一英里地向周边延伸，也看到干旱带来的可怕后果。对于西部农

民的遭遇，他预言道："先是忍受，然后抵押，紧接着是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直至最后被完全逐出。"他写道："如果即将出现的恶劣情况持续数年，没人能预料到之后会发生什么。"19世纪80年代早期，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承诺都成了空谈，所有的城镇郡县都已荒废，农民不得不向政府求助。



19世纪美国西部一处银矿生产的场景



纳尔逊·阿普尔顿·迈尔斯将军（左）

西部发生剧变之后，政党因为失信于民而备受抨击。人们普遍认为政党不守承诺，而美国政府则只为那些本就受到优待的人群争取利益。不满的农民自然会选择投靠已经存在的农业组织，如格兰其会员那样，把选择转移到政治目的上来。

自格兰其运动进入高潮开始，总有各种社团、联盟游走在农民和其组织之间争取选票。在打击了铁路之后，格兰其作为一种社会与经济的纽带继续发展。美国农民联合会和农业动力等农民组织相继出现。劳工骑士团和美国劳工联合会获得的巨大成功刺激美国出现了很多效仿组织，但这些效仿组织的运动并不算成功。农耕能赚取的利润还比较可观，给不了这些组织足够的发展空间。在繁荣时期，农民都是个人主义者。一篇关于美国农民的文章描述了一种新的农民活动，反映出当时农民想要不断争取合作优势的心态。

19世纪80年代，规模最大的农民组织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农业社团联盟——农民联盟，反映了西部和南方的具体情况。1888年，农民联盟以“迅速成长”的态势在南方受到关注，但“只是偶然间在政治上变得重要起来”。自1885年以来，农民联盟在达科他变得活跃起来，为其成员买了火灾和冰雹灾害的保险，并设有采购部门和一家电梯公司。在得克萨斯州，农民联盟还拥有棉花与羊毛加工厂。农民通过该组织为他们共同的事业发声。1890年，随着目标的拓宽，农民联盟并入人民党。1890年夏，在堪萨斯州，农民运动打破了两个老党派的界限，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运动的发起者认为一个新的政党就此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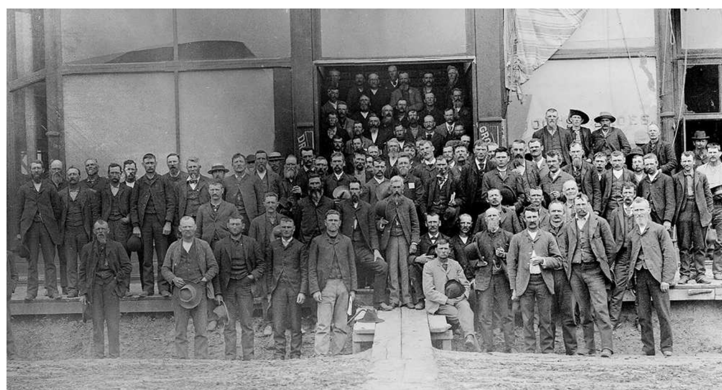


农民联盟的旗帜

1889年，年景艰难，农民的不满情绪上升，引起各方关注。只是当时，还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衡量他们不满的程度。直到通过《麦金利关税法》之后，国会宣布休会，其成员回到各州准备1890年的国会竞选活

动，这部法案成了摆在面前的主要议题。1888年，竞选体现出所谓对贸易保护的普遍需求，但只得到了少数人的投票支持。关税问题以及关税法案通过的渠道被民主党和农民联盟用来作为反对国会的依据。

关税法案通过不久，竞选就开始了。人们甚至还没来得及看到它的真实影响。反对者分析了它可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关税法案并未被驳倒。在1888年及1892年的竞选之前，支持共和党的制造商都利用如果自由贸易者获胜就关门大吉的说法来威胁工人。这一次，形势扭转，制造商开始对他们承诺高额回报。



人民党成员合影

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各种腐败现象使整个西部出现一种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即使在东部，关税改革者们声称，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人得到了过多的关照；制造商们通过给马修·斯坦利·夸伊的竞选基金捐款为其带来豁免权，因而获得更多的保护。农民认为这些指控貌似可信却又无法证明，因为他们倾向于认为两大政党只是为了政客的利益自私地利用政府职权而已。

在每个州，共和党候选人都不得不面对这种怒火以及当地的各种问题。缅因州的托马斯·布拉克特·里德就遇到了这些问题，也得到了来自需要保护一方的支持而获得了大多数的选票。在俄亥俄州，威廉·麦金利失去了职位，一方面因为该州人民对他的强烈反感，但更多的是因为控制州议会的民主党为政党利益改划了他的选区以反对他连任。伊利诺伊州的约瑟夫·格尼·坎农已经连任九个任期，并且即将迎来第十个任期甚至更久，现在却失去了他的职位。威斯康辛州的罗伯特·马里昂·拉弗莱特备受

贸易保护主义者重视，但因为该州一个教育方面的问题使他原本前途光明的职业生涯早早结束。宾夕法尼亚州本质上是维护贸易保护主义的，其民主党前州长罗伯特·埃默里·帕蒂森因为反对马修·斯坦利·夸伊集团而再次当选。



托马斯·布拉克特·里德

在东部，民主党打败了共和党。在西部，农民联盟渐渐削弱了共和党的根基。在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农民联盟控制着最终的结果，使其成员入驻华盛顿，并且让堪萨斯州议会首次拥有了一位人民党参议员。在民主党和农民联盟的支持下，几个州成功争取到了政党联盟的票。在南方，民主党发现此举帮助它赢得了提名——因为真正的南方竞选是在民主党党内进行而并不是全民公投——并坚称民主党以前到现在都是农民。



罗伯特·马里昂·拉弗莱特与妻子、女儿的合影

国会竞选的票选结果显示了事态的发展趋势。在第五十一届国会的各议院共和党均占多数。1890年，新当选的第五十二届国会失去了众议院大多数主张高关税者的支持。该届国会只有八十八位共和党人入选，却有二百三十六位民主党人和八位农民联盟成员。共和党保留了原参议院阵容，因为刚刚被接纳的爱达荷州和怀俄明州是“有名无实的选区”。

民主党以压倒优势获胜的最关键因素在于关税，但这很大程度上仅仅因为关税问题是积攒了十年的不满情绪的爆发点而已。执政党受到了惩罚，因为在其执政期间，一切都进行得不太顺利：托拉斯大肆发展、劳工焦虑不安、物价下降、公有土地和抚恤金管理局不时曝出丑闻、降水不足导致平原地区不断缩小。在新一届的众议院，佐治亚州的查尔斯·弗雷德里克·克里斯普当选议长。本杰明·哈里森总统的后半个任期平静地结束了。美国人对农民联盟的未来有太多猜测。竞选结束六个月后，辛辛那提大会试图联合新生力量组成美国的第三个重要政党。

人民党发起者的目标是将劳工骑士团和农民联盟在政治上联合起来。他们想要将平原上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从眼前的遭遇中解救出来，并取得政府的控制权。在下一个总统任期到来之前，他们有充足的时间组织改革运动。

1890年，美国开始感受到通信机构在瓦解地方主义和引入比较经验上的影响力了。活跃在战前的一代若能活到现在，会发现他们珍视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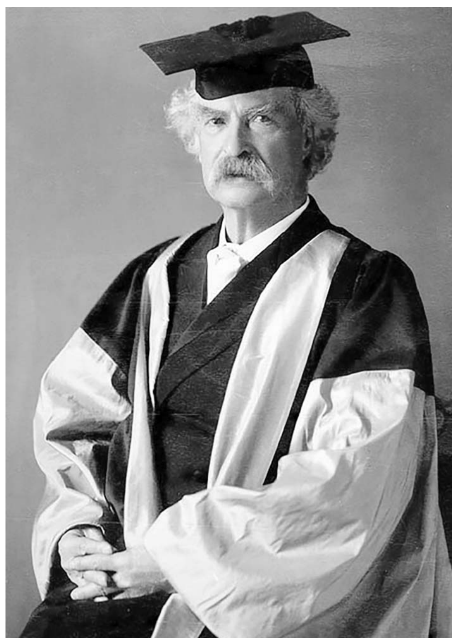
念已经逐渐消失。在公众生活、行政管理、文学乃至宗教等各个领域，旧秩序已经被一扫而空。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这个进程无法阻挡。即使在教区自主权占重要地位的公理教会，似乎也很适合成立一个全国委员会。每一个重要贸易活动都属于这个国家，唯一保留原先地方主义的力量只有法律，而现在法律也必须面对新的秩序。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托拉斯问题都是法律系统漏洞导致的结果，在各州地方权力和国家行为之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但作为国家，已经发展起来，并开始施展其能力。对铁路、移民和劳工的管控、农业实验、土地的灌溉和开垦等只是新铁路带来变化的其中几个方面，伴随而来的还有新的行政机构以及如善政和任期制度这样与时俱进的官员任命观念。那些希望州政府仍为政治权力重心的人已经落后于时代。



查尔斯·弗雷德里克·克里斯普

美国的本土文学逐渐增多。查尔斯·狄更斯也见证了1868年一个新文学流派的诞生，出现了像《咆哮营的幸运儿》和《扑克滩放逐的人们》这样的作品。1890年之前，这些作品的作者布勒特·哈特就已声名鹊起。塞缪尔·兰亨·克莱门 [2] 也见证了美国本土文学的成长，并用自己的力量开拓了这个领域。19世纪80年代，新英格兰流派出现，代表作家有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和詹姆士·拉塞尔·洛威尔。但比起同时期写边疆主题的年轻作家，他们欠缺了

一点美国味道。《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等作品既是生活也是艺术。1885年，这个时代另外一位作家威廉·迪恩·豪威尔斯的作品《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问世，描绘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社会阶层。《小勋爵弗契特勒里》的风靡则证明美国读者的期待比书里描绘的生活更丰富。



塞缪尔·兰亨·克莱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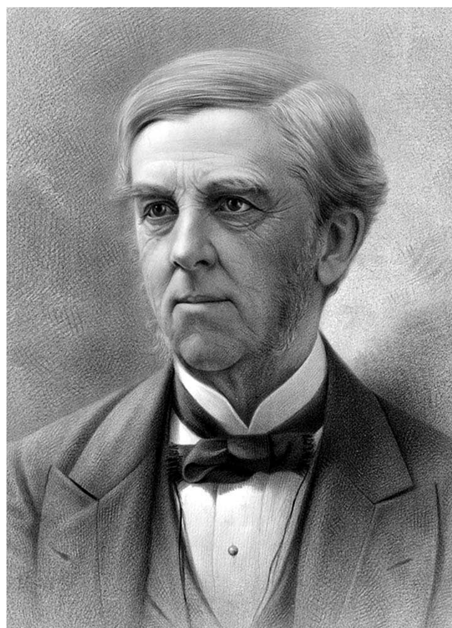
1890年，纯文学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美国主题，用文学手段探索美国人苦苦追寻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并做出解释。亨利·乔治的作品，特别是《进步与贫穷》，让他在六年的时间里成名。到了1885年，这些作品已经"形成了经济思想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纪元"。爱德华·贝拉米创作的乌托邦式的传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证明了读者对于文学的热望。老一辈的弗朗西斯·帕克曼和乔治·班克罗夫特，年轻一辈的亨利·亚当斯、约翰·巴赫·麦克马斯特和詹姆斯·福特·罗兹，则通过历史途径来阐释美国遇到的种种情况。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都开始有了属于各自领域的文学作品。这些领域得到的最后的也是最强烈的冲击来自詹姆斯·布莱斯那部引人深思的《美利坚合众国》。

在期刊方面，美国人越来越高的审美标准支撑着杂志往更宽广的领

域发展。在美国颇有名望的老牌杂志《北美评论》仍是政治讨论的阵地。1890年，该杂志刊登了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和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就保护性关税的好处进行的深入探讨。《哈珀月刊》和《大西洋月刊》聘用了南北战争以来的美国文学领军人物。19世纪60年代，《莱斯利周刊》和《哈珀周刊》对新闻附以插图，在期刊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美国主要的宗教报纸，《独立者》享有自己的地位。《国家》作为批判主义期刊出现。《斯克里布纳杂志》和《世纪》后来也加入到月刊的清单之列，后者主要刊登一些南北战争的重要战役和领袖的回忆录，还有约翰·乔治·尼古拉及约翰·米尔顿·海伊为林肯撰写的传记。铸排机和插图的发展以及收集新闻和分发出版物的便利条件使期刊更快地遍及全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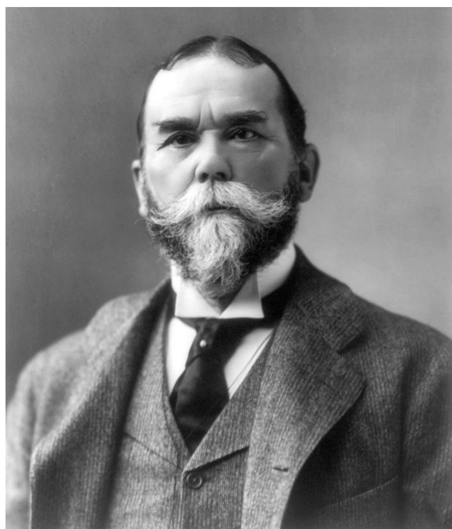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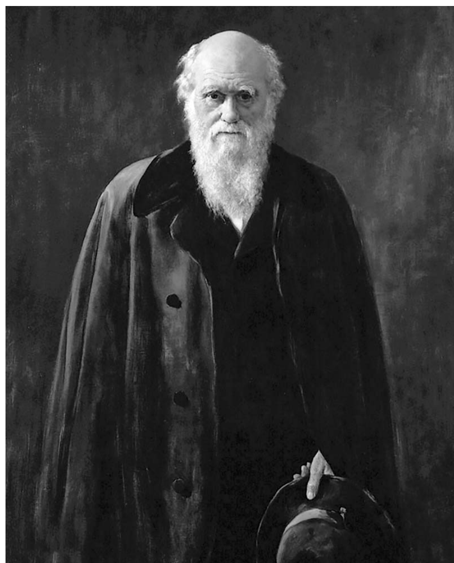
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期刊以其独特的方式获得了以前报纸在美国读者心里的地位。随着霍勒斯·格里利时代的那些伟大的编辑相继离世，报纸作为表达个人观点平台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年轻一代的编辑们将报纸作为投资手段而不是新闻工具。商业广告利用报刊媒体接近客户。新闻素材收集得更加迅速也越来越丰富，但报纸表达的观点却越来越少。报社像买纸和油墨一样从辛迪加企业和社团购买新闻。在这样的管理制度之下，会计室比编辑部的地位还高。



约翰·米尔顿·海伊

美国人的生活在本质上发生的变化通过新文学呈现出来，而在国有化的影响下生活经历了重塑的过程，宗教的接触面不再狭窄。当时同类小说中，宗教小说《罗伯特·埃尔斯米尔》也许是阅读量最大的一部了。正统观念与新批评主义之间的竞争让专业的神学家们失控，渗透到凡人中间。在文本方面，《旧约》和《新约》修订版给了神学以新的讨论基础。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以及他的学派所做的科普工作影响到了宗教领域，使其不得不改动宗教观点的相关措辞。现在，通过科学的途径让人们接受宗教理念已经比较普遍。随着竞争的深入，正教会的普及程度并没有受到影响。新教士开始宣扬新的宗教，正如他们之前在美国所做的那样。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

新的宗教中规模最大的是玛丽·贝克·艾迪女士的宗教，其教义也许可以成为与人民党政治革命并行的宗教手段。基督教科学派的出现使清教徒“脊椎动物耶和华”的说法更易于接受。它是繁荣社会发展的产物，以“治愈系宗教”的形象向普通人展示自己。

1890年，知识、精神、经济和政治上的革命在美国非常普遍。在经历了过去十年的工业革命之后，它们的出现是必然的。美国再次成为一个整体。南方承受了战争和社会重组的最坏结果，并且再次以独立的方式发展起来。美国当下需要面对的问题是革命对政治的影响。

[1] 《布兰德-艾利森法案》又称“1878年布兰德重要计划”。其前身是上文提到的《布兰德法案》，由理查德·帕克斯·布兰德提出，后来威廉·博伊德·艾利森补充了修正案，规定联邦政府每月购买两百万到四百万美元的白银并铸为流通的银币。——译者注

[2] 即马克·吐温。——原注

第12章　新南方

原来的南方是美国两大政党曾以同等条件进行竞争的地方，在南北战争时期毁于一旦。就算经历了重建，南方也没能彻底振兴。最后，新南方在政治上只受一党控制。由于黑人选举权引发的种族问题带来的影响，有社会地位的白人无一例外地投票支持民主党。从南方自治的重新建立到农民联盟政治的出现，南方各州都没有出现任何可以对占主导地位的票选结果造成威胁的议题。19世纪80年代末期，在经济压力之下，以前的白人领袖分道扬镳，甚至为他们的政治方案互相争夺黑人的选票。

在南方，农民联盟对政治的影响不能像在西部一样通过简单的民意测验来衡量。1888年和1890年，在美国大多数州，经常与共和党融合在一起的农民联盟得票量均有所增加。但更大的影响在于民主党在其候选人初选会或代表大会上制定的方针路线。在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中，职业政治家受到质疑，律师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利用价值，而那些声称自己靠近土地的人拥有一项得天独厚的优势。

心怀不满的农民们拥有的选票有了价值，这一点在参议员和众议员为第五十二届国会的《国会名录》撰写的自传纲要中有所体现。那些以前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的人骄傲满满地证明了这一点。得克萨斯州选区的约翰·辛尼格·里根在八届国会中都作为代表出现，自称“美国农业保护者协会”会员，并对其劳工伙伴的事业充满兴趣。现在，他是得克萨斯州格兰其的工头，得克萨斯州农民合作出版协会的会长。还有几位这种类型的众议员来自佐治亚州。其中一位“自1886年起就将自己的全部时间投入到农业上，同时是农民联盟的成员”。第二位作为“农民联盟成员和民主党员”入选。第三位“曾做过十一年佐治亚州立农业协会副会长，也做过四年的会长，现在是佐治亚州农民联盟的主席”。第四位是律师、编辑、历史学家和新运动的领袖托马斯·爱德华·沃森，“无论以前还是现在都对农业充满兴趣”。还有一位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众议员，自称南卡罗来纳州“农业发展组织的成员”。

南方政治动乱在农业上的根源在于最近出现的土地使用权和财政上的变化。南方并不是没有像西部那样前来拓荒的移民。在南方，很多提包客开始发展农业生产。随着西部自由土地的减少，农村投机活动的吸引力增加，机会相应增多。一个债务人阶层就此产生，并为通货膨胀埋下根源。



托马斯·爱德华·沃森

南方在新领域上的发展比不上其工业的发展。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各种植园逐渐解体。1880年第一次体现出来的所有权问题和1890年人种问题的调查数据夸大了这一点。因为这里列举的很多小块地产实际上都是由雇佣劳工在耕种，而登记问题导致数据偏差。地产的面积明显减小。一部分黑人种植园主正逐渐发展起来，进一步导致地产面积缩小。1900年，被解放的奴隶身上展现出的节俭与勤奋让黑人拥有种植园成为可能。当时，整个美国共有五百七十万个农场。其中，南方有两百七十万个农场，而奴隶区就有十四万九千个农场——农场平均面积五十五英亩。黑人佃户、种植户以及很多白人地主监管下的雇佣劳工增加了农民的数量，和其他人一样以种植棉花为生。

南方农业发展所用的资金来自北方的制造商和批发商。这些商人现在成了面向南方的零售商，通过预估作物产量来提高他们在客户面前的信誉度。交易一旦受阻，农民便从银行家和商人手里以后者认为合适的

价格购买所有物资。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商人之间几乎不存在竞争，因为沉重的债务负担让种植户不能另找合作伙伴。价格过高和利息沉重的双重负担，加之现金不足和目前财政制度的弊端，令南方大部分地区受到严重影响。

无论在农业还是财政方面，南方都受到制度的压制。因为棉花销路较好，不能被狡猾的债务人直接消费，所以商人们都想要棉花。这样一来，单一种植得到过度推崇，而多样化的农业和作物的循环种植却几乎没有什么发展。肥料的使用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推动，但农业整体上并没有什么发展。

南方紧紧依附于一个如南北战争之前的种植园制度那样死板的体制，几年间遭受了不成比例的棉花价格下跌。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萧条加重了债务人的负担，导致通货膨胀运动的出现，使南方和西部联合起来要求发行更多的廉价货币。作为南方合理表达不满的工具，农民联盟要求控制铁路、限制托拉斯、进行银行业改革和实行自由铸造银币政策。



美国黑人在农场劳作



一个农场黑人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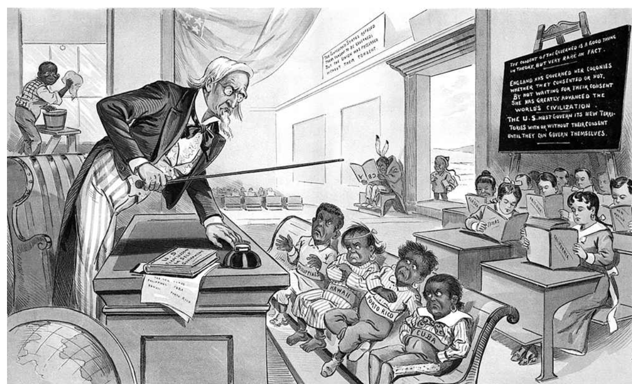
自南北战争以来，南方白人就紧密地团结在一起。1890年，他们面临一个与种族无关的问题。这个问题将社会分成债务人与债权人两个阶级。二十年来，北方心照不宣地达成一致，在法律范围之外对黑人进行压制。在重建时期，偶尔也有黑人得到公职甚至供职国会。一个自称为“聪明的白黑混血儿”的人成为第五十一届和五十二届国会议员。但在南方的大多数地区，黑人还是被禁止参加选举或者在民意测验中被“排除在外”。只有共和党在零星的几个案例中——多数是在山区，可以得到足够的选票使其黑人候选人当选。

农民联盟将白人的选票分散开来，并赋予黑人一项特权。从被所有人打压到成为众人献殷勤的对象，这个燃起他们希望的变化最后却让他们摔得更惨。南方一看到黑人选举可能起到平衡两个平等白人派系权力的作用，就立即采取措施，剥夺这个“不受欢迎”阶层的选举权。

制定《第十四条修正案》和《第十五条修正案》的目的是保证被解放奴隶的平等公民权以保护他们。依据1875年国会通过的《第十四条修正案》，《公民权利法案》规定，禁止歧视任何公民“完整、平等地享有住宿、优惠、使用公共设施和旅馆的权利，以及乘坐陆上和水上公共运输工具、享受剧院和其他公共娱乐场所服务的权利”。对南方教育制度感兴趣的北方慈善家们阻止种族之间同校制度的实施。南方基本无视该法案的强制力，因为在那里种族平等根本不可能。旅馆和铁路公司仍然区别对待他们的顾客。一些经营者也因为这些行为违反法律而被告上法庭。他们为自己辩护，认为《第十四条修正案》禁止各州有任何歧视行

为，但这跟任何公民的个人行为无关；修正案维护了公民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在法律通过之前就已经出现，并没有延伸到社会关系领域——去剧院看戏根本不是一项公民权，可以在不违背《宪法》的前提下通过警力进行恰当的规范。1883年，在民权相关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释放了被告人，并宣布《第十四条修正案》的范围太过狭窄，因此国会通过的相关法规并不合理。重建计划中关于禁止种族歧视的相关工作就此搁浅，而黑人群体则落入其白人邻居的自由裁量权中。

1890年之前，《第十五条修正案》对黑人的保护力受到限制。该修正案禁止美国任何州剥夺公民的选举权。最高法院很快做出规定，禁止在投票过程中以非法手段恶意排挤黑人。在1890年之前，这条规定就得以宣布，但黑人对于个人歧视却毫无防备。是否通过法律剥夺黑人们的选举权还有待考证，但他们绝对得不到任何赔偿。直到农民联盟危机爆发，南方人呼吁为黑人争取选举权，南方才采取最后措施应对破坏重建工作的行为。



讽刺种族歧视的漫画：山姆大叔教授四名儿童，他们分别被标注为菲律宾、夏威夷、波多黎各和古巴。一个黑人男孩在擦窗户，一个土著美国人坐在教室里，一个中国男孩在门外。字幕上写着：学校开学了（上文明的新班级）

《第十五条修正案》的条款说明并不十分清晰。该修正案并没有直接规定黑人拥有选举权，而通过否定的说法规定不得因为“种族、肤色或曾被强迫服劳役”剥夺和限制公民的选举权。种族、肤色和强迫服劳役这三大特征将美国的种族分成了几个部分，但该修正案并没有用其他特征将种族分类。这是公民权利存在的基础，南方十分清楚这一点。黑人普遍都很贫困，任何以财产为基础的条件限制都可以将他们排除在外。他

们通常都是得过且过的流浪者，因此只有人头税和居住条件这些问题才能触及他们。而且他们都是文盲，不能通过教育测试。1890年，南方厌倦了武力和欺诈手段，开启了合法回避《第十五条修正案》的模式。

1890年，密西西比州制定的新宪法对公民权进行明确的规定，对黑人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密西西比州大会的辩论中，与会人员自由而坦诚地讨论取消黑人选举资格的意图。但宪法条款并没有涉及歧视的内容，规定任何二十一岁以上且拥有一定居住条件的男性公民均可参加选举，须在选举之前缴纳两年的人头税和其他相关税，并且在宣布任何宪法章节时，可自行阅读、理解和解释该章节。在此条款之下，在累积税和负责登记选民的官员的极大自由裁量权之间，黑人选民在密西西比州被一再减少直到可以被忽略。其他南方州纷纷效仿。

除了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以外的所有棉花种植州以及大多数前蓄奴州都修改了未来二十年的选举条款。1893年，阿肯色州将公民权建立在一年人头税的基础上。1895年，南卡罗来纳州用居住权、登记制度和人头税来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并通过了一系列支持古巴独立的决议。1897年，特拉华州设立了一项教育测试。1898年，路易斯安那州建立了教育制度以及人头税制度。1900年，北卡罗来纳州建立同样的制度。1901年，亚拉巴马州利用居住权、入职机会和人头税限制黑人的选举权。1902年，弗吉尼亚州将选举权建立在财产、读写能力或者人头税的基础上。1908年，佐治亚州做出同样限制。1910年，新加入联邦的俄克拉何马州延续了南方的这一惯例。

用这样一些条件排挤黑人相对容易，但每条惯例都面临尴尬局面，因为每一条排挤黑人的条款同时排挤掉很多白人选民。几乎在每一个案例中，这些条款都会相应地做出修正以维护白人的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永久性的登记制度之外，南方又增加了一种临时性的登记办法。其中，路易斯安那州制定的办法最受欢迎。该州宪法规定，在特定的时间内，1867年之前参加过该州选举的公民或者其后裔，即使不符合基本条款也可被纳入选民名单。这一条款一出台就被戏称为“祖父条款”，缓解了贫困白人的境遇，并很快被北卡罗来纳州、亚拉巴马州、弗吉尼亚州和佐治亚州效仿。1898年，路易斯安那州长就大肆赞扬这一新发明的条款：“长久以来我们为白人至上的观念而斗争，并为此付出了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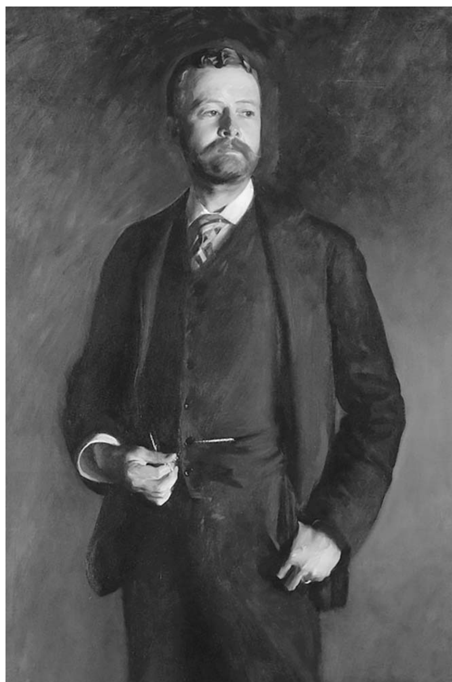
贵的财富甚至是血的代价。现在这个观念融入了宪法，成为整个有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任何托词和借口。因为这条伟大原则得以进入宪法并且被严格执行，所以我们再也不需要为未来竞选的公正和纯粹而忧虑。”在1898年威廉姆斯诉密西西比州案和1903年贾尔斯诉迪司利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修正这些条款里天真的说辞。



19世纪末的种族主义明信片，展示了白人对黑人漫不经心的诋毁

在此之前，法院已经表示并不愿意介入此事，而国会也持同样的态度。在共和党占优势的1889年到1891年，人们主要讨论两种补救措施。其中一种措施是基于《第十四条修正案》的相关规定，即被剥夺选举权公民的比例相应减少，并减少众议院中的南方代表数量。虽然人们已经不止一次愤怒地呼吁，但这一措施并没有付诸实施，也不会影响上述案件的结果。事实上，在上述案件中，人们通过武力强迫而不是法律途径来抵制这一措施。为应对之前的形势，1888年，共和党承诺将努力实施这一措施。将南方选举交由联邦管理的《武力法案》被纳入考虑范围。该法案得到了亨利·卡伯特·洛奇的大力支持，也意味着另一个挥舞“带血迹的衬衫”的机会来了。在托马斯·布拉克特·里德的帮助下，众议院通过了该措施，但参议院核心会议放弃了这一措施。1891年，这一措施销声匿迹，黑人问题留给南方自行处理。一位南方州长曾说道：“摆在每个人面前的只有两面旗帜——要么白，要么黑。你会站在哪面旗帜之下？”

新南方禁止黑人参与政治，但黑人仍是工业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问题，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刚解放时，黑人基本上都是文盲，与破产者为邻。北方的慈善家们从中看到了机会。跟随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来到南方的教士们写的家书引起了人们的兴趣。1867年，乔治·皮博迪在英国和巴尔的摩的善行受到关注。他还设立了一大笔用于贫困地区文盲教育的基金。他的受托管理委员会成了教育信息交流的平台。1882年，康涅狄格州的约翰·福克斯·斯莱特创立了一个类似的基金会。前总统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也是这个基金会的领袖之一。19世纪末期，这些组织密切合作，共同研究南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并在经济上给予援助。1901年，这些组织的领袖们成立南方教育委员会以宣传知识的作用；1903年，国会成立了普通教育委员会，就连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也为该委员会捐赠数百万美元用于教育事业。



亨利·卡伯特·洛奇



约翰·福克斯·斯莱特

受过一定教育的黑人面临新的压力。1880年，十岁以上的美国黑人有百分之七十都是文盲。但1881年至189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七，1900年，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五，1910年，则下降到百分之三十。虽然黑人在不断地进步，但黑人领袖和其白人朋友的社会地位还是天差地别，因此他们必须增强自己的力量以面对新的局面。黑人们追求社会地位的途径各不相同。最有能力的黑人众议员中，威廉·爱德华·布格哈特·杜波依斯对自己曾经遭遇过的歧视与选举权被剥夺的境遇愤恨不已，他采取的初步措施是坚持种族平等。1881年，在亚拉巴马州，布克·托利弗·华盛顿成立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职业学校，并且希望通过通识教育和技术教育解决黑人问题，以引领黑人走向自尊和独立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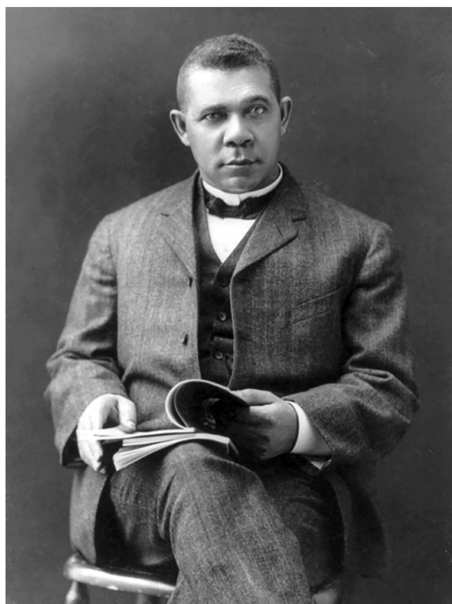
在黑人解放之后，南方的种族摩擦不断升级。自由和政治压力使很多黑人堕落，他们表现出的独立情绪让很多白人恼怒。南方社会仍然带有很多边疆的特征。在那里，人人持有武器，稍有挑衅就会引发暴力袭击。即使在19世纪80年代，这种抗争和袭击事件也没有引起严厉的抨击，而被解放的黑奴就生活在这样不把自制作为主流道德价值的社会中。1880年，亚拉巴马州所拥有的步枪、匕首和手枪的估价几乎是该州所有图书馆价值的两倍、所有农具价值的五倍之多。种族在区域上的分布不均：在亚祖河底部土地上的黑人聚居区，黑人数量远超白人，比例达到十五比一甚至更多；在山区，这个比例则反了过来。但不管在什么地方，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有一些品行不良的人，正是这些人的过

激行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19世纪80年代，尽管南方的种族问题难以解决，但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之下，南方逐渐走向繁荣。北方资金仍是南方农业发展的主要支柱。南方的运输业、制造业和城市发展也从北方得到资金上的支持。1884年，美国农场主协会举行了纪念第一批美国棉花出口的一百周年庆典。在新奥尔良的一个大型博览会上，这些农场主展示了新南方在发展上的实力。



威廉·爱德华·布格哈特·杜波依斯



布克·托利弗·华盛顿

1880年至1900年，美国南方成长为一个现代工业区。其煤矿年产量从六百万吨增加到五千万吨；生铁年产量从三十九万七千吨增加到两百五十万吨；制造业年总产值从三亿三千八百万美元增加到十一亿七千三百万美元，工资总额从七千六百万美元增加到三亿五千万美元。棉花加工厂里使用的纺锤也从六十一万个增加到四百二十九万八千个。随着工业的进步，南方人口发生变化。据人口统计图显示，黑人人口主要集中在黑人聚居区，而白人人口则在煤矿和铁矿附近有所增加。因为能源廉价，皮埃蒙特开始出现工业区，并且吸引着来自临近乡村的技工。新南方的工厂不受北方童工和工厂相关法规的影响，雇佣了妇女和儿童，并且到1900年，消耗掉美国棉花产量的七分之一。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成了第二个匹兹堡。

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南方整体重建铁路系统。1860年，美国铁路全长约三万英里，而南方铁路就占了其中的三分之一。由于战争爆发，这些铁路因为疏于管理而荒废。19世纪60年代末，在联邦的资助下，南方部分铁路逐渐恢复使用。1878年，正如之前所有美国铁路的经历一样，南方的铁路系统突然扩张、发展起来。

1865年至1915年，得克萨斯州经历了彻底的改变。该州的铁路长

度从三百零七英里增加到一万四千多英里。1860年，南方邦联各州只有阿肯色州所修铁路的里程数较少。1910年，没有任何其他州的铁路长度能超过得克萨斯州铁路长度的一半。南方邦联地区的铁路总长度从1870年的一万一千英里增长到了1880年的一万七千英里，1890年，达到三万六千英里，1900年，增长到四万五千英里，到了1910年则高达六万三千英里。1880年后，没有一个邦联州能比得上得克萨斯州。该州拥有广阔的地域，在铁路服务的影响下，为美国出产了大量棉花。19世纪末期，仅得克萨斯一个州就提高了美国作物产量的四分之一。通过扩大交通运输系统，利润可观的棉花种植区扩展速度超过了需求。20世纪早期，由此造成的生产过剩可能是棉花价格下降的原因之一。这一趋势刺激了南方多样化农业的发展。随着棉花价格的下降，农民开始尝试种植其他作物。1899年之前，十个棉花种植州的玉米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棉花种植面积。随着多样化种植的普及，棉花产出总量并没有减少，而且农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也越来越好。在许多地区，果树种植和卡车辅助种植在很多利润可观的农业类型中一马当先。

1910年，尽管南方在工业和交通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与美国其他地区相比，南方仍然属于农业区。1910年，美国拥有五万以上人口的一百一十四个城市中，只有十五个属于南方邦联地区。但与其之前的水平相比，南方城市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1880年，南方只有新奥尔良和里士满两个城市居民超过五万人。1890年，亚特兰大、查尔斯顿、孟菲斯和纳什维尔也加入这一行列。直到1900年，得克萨斯州才有了这么大规模的城市。但到了1910年，该州已经拥有四个这样规模的城市，分别是达拉斯、沃斯堡、休斯顿和圣安东尼奥。随着南方城市越来越多，这些城市通过贸易和社会的纽带与美国其他城市联系在一起，南方的地方主义逐渐消失。南方排挤黑人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但在表面上，南方人逐渐变得和美国其他地区的同胞一样。



得克萨斯州的棉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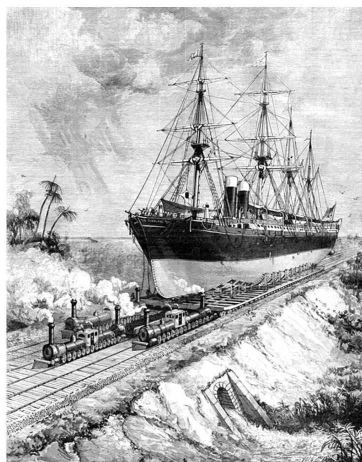
在战争平息之前，地方主义已经将南方划分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区域。在1883年关于关税的辩论开始之后，为了共同的目标，一群南方贸易保护主义者与北方共和党联合起来。糖业、钢铁业和棉花产业也从局限于地域的旧生产模式向自由贸易转向。由于害怕被国家力量控制，原来的南方普遍反对政府对其生产发展的资助。太平洋铁路被推迟修建或多或少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但这种忧虑很快就消失了，因为美国在密西西比河周边发现了一个受南方欢迎的发展领域。



19世纪末的沃斯堡

在南北战争之后，密西西比河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它的重要地位，但它仍是西部各棉花种植州最重要的交通干线。洪水反复无常地冲刷着密西西比河的河岸，肆意地切断新修的渠道，并且每年春天都会淹没数百

万英亩的土地，波及范围之广超过战争和重建期间贫困的南方各州的承受能力。1879年，国会建立了密西西比河委员会。1882年，罕见的洪水爆发引起人们对这种灾害的关注。此后，美国国会便成立用于开罗河岸和海湾地区之间堤防系统的基金会。



詹姆斯·布坎南·伊兹的伟大设想：建设越洋铁路

1879年，常年被泥沼阻塞的密密西比河口被疏通。西部的工程师詹姆斯·布坎南·伊兹设计了一种可以将洪水从原有河道泄入大海的方案。1874年，圣路易斯开放的铁路桥已经证明他治理“江河之父”[1]的能力。1892年，其他工程师建成了孟菲斯大桥。

新南方的飞速发展缩小了它跟美国其他地区的差距，并带领它走进工业革命时代。到1884年时，这个趋势还不太明显。到了1890年，白人在北方和西部的政治问题上出现分歧。随后的几年，对于南方而言，平民主义[2]就像对于美国其他地区一样成了一个大问题。

[1] 美国密西西比河的美称。——译者注

[2] 又称民粹主义。——译者注

第13章　平民主义

1890年，选举让美国的两大老牌政党感到震惊和迷惑。共和党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而民主党为胜利付出了代价一要与新运动势力建立党派联盟。至于新运动的影响力只能靠预估。最初，平民主义因西部和南方的地方问题产生，但这个名字现在在全美国流传开来，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通过1889年和1892年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人民党已经发展成一个拥有州代表和全国委员会的完善组织。1889年12月，农民联盟举行全国大会，为其进一步发展壮大打下基础。会议决定，将劳工、农民和单一税种支持者合并为一个党派。劳工骑士团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对此都不反对，虽然后者认为自己的组织优于其他所有党派。1889年，劳工骑士团的欲望并未因1866年美国劳工联盟衰落暴露出的政治风险而受到抑制。政党领袖们不难发现这一点。他们在未进行民意测验的情况下，承诺支持劳工组织。圣路易斯代表大会结束后，农民党虽然没有赢得劳工组织中平民百姓的支持，但还是将自己的名字并入了“人民党”这个含义更广的名字中。

1890年12月，农民们在佛罗里达州奥卡拉市召开会议，庆祝其在国会取得的胜利，也为1892年制订发展计划。1891年5月，因为原来的两大政党被指不关心人民疾苦以及贪污腐败，美国第三个永久性的政党确立，并且在辛辛那提市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人们坚持的各种改革最后都被通货膨胀论者的要求所掩盖。绿背纸币党之前的总统候选人——艾奥瓦州的詹姆斯·贝尔德·韦弗是辛辛那提市的领袖人物。他身边最著名的助手是明尼苏达州的伊格内修斯·洛约拉·唐纳利，是“培根思想” [1] 和“消失的亚特兰蒂斯” [2] 的信徒，现在积极投身于自由铸造银币事业。1892年2月，一场会议之后，又一个全国委员会在圣路易斯诞生了。1892年7月2日，这个新的党派再次在该城召开首届全国提名大会。

人民党的政治纲领主要针对各种灾害。该党派宣称：“我们在一个处于道德堕落、政治衰退和物质毁灭边缘的国家相遇，民主选举、立法机

构、国会中都充斥着各种腐败现象，连法官也未能幸免。国家面临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危机……各报社接受了大量的贿赂，或者被钳制言论自由，公众对此保持沉默；商业不景气，我们的房子也被抵押了出去；劳工陷入贫困；土地集中在资本家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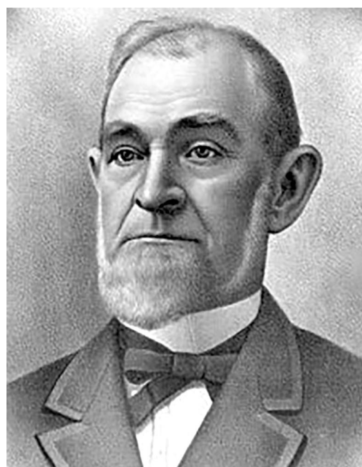
伊格内修斯·洛约拉·唐纳利

放眼望去，最大的罪恶莫过于一个“反人类的巨大阴谋”。这一阴谋使白银退出流通，增加了黄金的购买力，减少货币供应“养肥了高利贷者”。为了弥补这些财政弊端，人民党的政治纲领呼吁“自由且无限量地以现在十六比一的比率铸造银币”，并发行法定货币达到人均五十美元的流通量。其他诸如邮政储蓄银行、累进所得税以及政府经济等问题都是次要的。

毫无疑问，自由铸造银币是所有人民党主张中最受瞩目的一项，但人民党的政治纲领实际上涉及了改革的方方面面。在运输领域，人民党主张政府拥有铁路、电报和电话通信系统。它还呼吁禁止土地垄断，收回部分公共土地，禁止外国人拥有土地。人民党还希望实行澳大利亚式投票制 [3] 、限制移民、实行自由抚恤金制度、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禁止总统和副总统连任的制度、实行参议员直接选举制度和取缔平克顿私家侦探公司，并且对公民立法提案权和公民投票权也很感兴趣。这些主张都是对美国未来二十年改革工作的预言。

在这样的政治纲领下，在思想先进的改革者的支持下，詹姆斯·贝尔

德·韦弗以及詹姆斯·加文·菲尔德作为人民党候选人，带着西部和南方数量可观的追随者们迎接1892年的竞选。很少在选举中支持人民党的工人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他们大多是年轻人。因为联盟，人民党候选人得到西部几个州民主党人的支持。在南方，人民党则与共和党合作。从一开始，这个美国第三个党派就发现独立发展很难立足，所以选择与地方上发展较弱的党派结盟。



詹姆斯·加文·菲尔德

共和党的所作所为使艰难时期雪上加霜。本杰明·哈里森总统执政的第一届国会通过一系列法律引起了人们的反对与批评。在他就任时，《州际商务法》才刚刚通过。紧接着，1890年，新加入联邦的各州以及俄克拉何马准州迎来了《伤残军人抚恤金法案》《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谢尔曼白银采购法》和《麦金利关税法》。在推广这些法案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大多数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给对手留下很多把柄。1891年之后，因为1883年到1889年间政治上的无能表现，众议院中的大多数民主党对其行政机构进行了精简。

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在其任期结束时并没有获得什么威望。他本来只是因为符合条件才获得提名，就连竞选歌曲也频繁提到他的祖父[4]，几乎比提到他自己都多。他对官员的任命既没能让政客们满意，也没能让改革者们高兴起来，只有得到任命官员的亲朋好友才感到开心。他的任命中最令人瞩目的部分恐怕也最令人尴尬。

国务卿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在他任期的前半部分最感兴趣的是有关运河的外交问题。英国和德国在对待入籍美国人问题上的争论已经平息。北大西洋的渔业问题也已经在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的处理下暂时恢复了平静。白令海的海豹捕杀得到了控制。但这并没有为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带来新的荣耀。

毫无疑问，在大多数滨海国家，成群的海豹遭到无情的猎杀，数量急剧下降。在美国的岛屿上，海豹们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每年夏天，它们都聚集在这里交配、繁殖。但那些在海上拿着猎枪对准它们的人并不属于任何陆上组织，因此很难被控制，除非其他国家允许美国警方跨越三海里领海界限对其实施抓捕。在巴黎，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在与英国的仲裁中，竭力想要证明那些海豹属于美国，所以美国有权保护公海领域的海豹，而北太平洋水域也应属于美国领海。仲裁的结果却处处与其理念相悖。



捕杀海豹

唯一一段可能引发战争的插曲发生在智利。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将一个新加入美国国籍的爱尔兰人——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的追随者帕特里克·伊根派去智利做公使。1891年，帕特里克·伊根支持的保守党革命失败。他的对手控告他利用合同不当得利以及近乎本能地反对英国在智利获利。那场革命之后，一名瓦尔帕莱索暴徒通过袭击正在登岸度假的美国水手表达了自己对美国人的不满。帕特里克·伊根惩戒暴徒的极端要

求得到了准备让美国海军出战的本杰明·哈里森总统的支持。最后，智利政府不得不对美国道歉。

同年，在新奥尔良一名美国暴徒对几个意大利人处以私刑，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拒绝在审讯和判决之前协议补偿的要求。在当地的刑事诉讼方面，美国政府无能为力，就连承诺进入审判程序也做不到。因此，意大利公使巴伦·法瓦离开华盛顿，直到美国国会通过为受害者家属提供补偿以修复两国关系后，他才回来。

政府内部关系并不比外部关系乐观。在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的影响下，本杰明·哈里森总统也被激怒了，因而疏远了许多共和党的主要领袖，以至于能否保证自己再一次得到提名都不得而知。马修·斯坦利·夸伊和托马斯·科利尔·普拉特也被触怒。费城政策性银行失败以后，马修·斯坦利·夸伊辞去了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没有人急于筹备总统竞选事宜，本杰明·哈里森总统自己在这一方面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技巧。1892年6月4日，也就是召开明尼阿波利斯市大会的三天前，未来的情况还不明朗，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辞去了职务。他这样做是否只是因为生病和郁闷，还是想要获得提名，都无从得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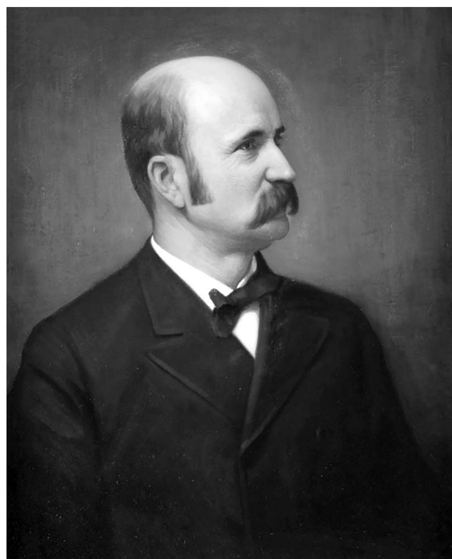


《哈伯周刊》的讽刺漫画：“一个淘气的男孩（帕特里克·伊根）”想挑起一场针对

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的实力和威廉·麦金利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体现得十分明显。第一轮投票中，本杰明·哈里森再次得到提名，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和威廉·麦金利每人都得到至少一百八十票。本杰明·哈里森的任期将于次年冬天结束。而威廉·麦金利现在是俄亥俄州长。1890年，威廉·麦金利选举失利，但在1891年，他当选州长。他是再次提名本杰明·哈里森那届大会的主席，并且重申了“美国保护主义”的重要性，对自由铸造银币政策避而不谈。

南北战争以来，除了支持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外，民主党并没有在党内培养出其他的全国领袖。早在1888年选举失利之前，在民主党中间，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就不受欢迎了。他对关税问题的坚持让民主党中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不悦，并因此落寞离任。离任之后，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来到纽约市，开始了法律实践并重新取得人民信任。1891年，他应邀做了一系列公开演讲，声望逐渐恢复。1892年，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的支持者们开始为他组织宣传活动。大卫·班尼特·希尔反倒因为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反对而受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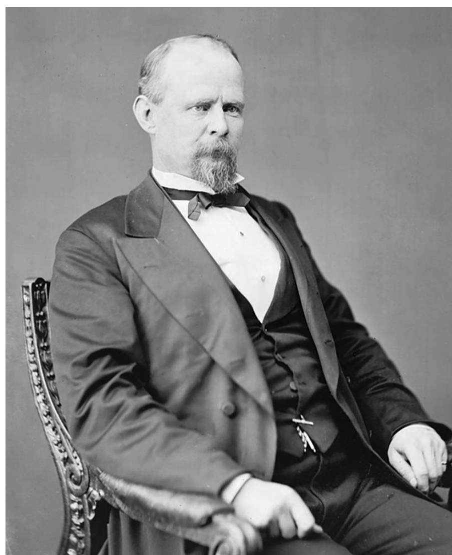
大卫·班尼特·希尔曾当选纽约州长，现在是参议员。他的实力主要来自坦慕尼协会以及纽约州改革者一直抨击的民主党势力。据说，1888年，他击败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是源于他与共和党政治机器之间的一笔交易。通过这笔交易，本杰明·哈里森在总统竞选中赢得选举人票，而他则获得纽约州长竞选的投票支持。1892年初，随着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声望的恢复，大卫·班尼特·希尔组织了一场紧急会议以确保他在纽约州的候选人资格。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纽约州代表团坚定地支持大卫·班尼特·希尔，但实则帮了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忙。因为关税改革者们受到了控制，大会谴责“共和党主张的贸易保护是一种欺诈行为，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对美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剥削”，并重申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所主张的“公职意味着公众信任”的说法，并选举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和伊利诺伊州的阿德莱·尤因·史蒂文森为总统候选人。正如共和党的经历一样，民主党关于货币的政治纲领条款也被选民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进行解读。



大卫·班尼特·希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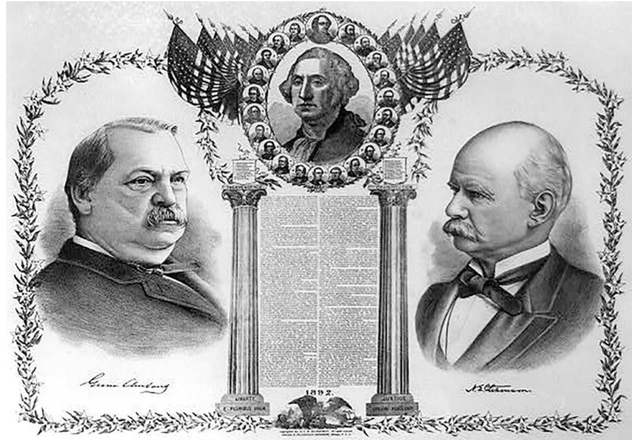
1892年，选举主要有两大辩论议题，表面上只是对关税的重新讨论。《麦金利关税法》，面临被废除的危险，共和党人因而更加审慎地维护着该法案。民主党正式要求削减关税。在会议结束后，一位东部的民主党人对汤姆·约翰逊说："我宁愿看到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被击败，也不愿看到那个愚蠢的自由贸易纲领被采纳。"然而，只要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是候选人，威廉·莱恩·威尔逊是大会的主席，民主党贸易保护主义者就不得不勉强接受这一切。关税辩论中暴露出的不真诚帮助了正在就改革基础进行讨论的人民党。

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以多数选举人票和多数普选票当选。詹姆斯·贝尔德·韦弗以及詹姆斯·加文·菲尔德的得票显示了人们对于两大老牌政党的反对程度。人民党一举拿下了科罗拉多州、爱达荷州、内华达州和堪萨斯州，又获得了二十二张选举人票，并在普选中获得了超过一百万张选票。因为各州的艰难时局和人民的不满情绪，人们的抗议很可能击败本杰明·哈里森。如果这种局势再持续下去，人民党组织就会吸引大量追随者。



阿德莱·尤因·史蒂文森

1893年3月，本杰明·哈里森总统为了掩盖美国在财政上的弊端而苦苦挣扎了几个星期，以避免引起恐慌。从这一点看来，他是极不情愿将政府交给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十多年来，美国立法一直围绕着巨额盈余展开，现在盈余几乎变成了赤字。美国持续繁荣的景象吸引着国会大量拨款。《麦金利关税法》将一部分财政收入用于实行一系列针对糖业的改革方案。《伤残军人抚恤金法案》支出数百万美元。美国国内的发展涉及各个领域。美国的财政盈余从1890年的一亿零五百万美元下降到了1891年的三千七百万美元。1892年和1893年，这个数字分别是九百九十万美元和两百三十万美元。1893年春，美国国库已经所剩无几，一旦遭受意料之外的打击就可能造成无法应对的局面。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美国财政亏空的原因并且提出补救措施。



1892年总统选举海报：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左）与阿德莱·尤因·史蒂文森（右）

美国的财政盈余同时受到了支出增加和收入减少的双重影响。收入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不景气，进口贸易减少，进而导致关税收入减少。与此同时，随着资产质量的不断恶化，美国国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紧张情绪，对自由铸造银币的恐惧加速了恐慌的到来。

传统的美国硬币一直是由白银和黄金铸造，但自1834年以来，白银就很少用来铸币或流通。1862年至1879年之间，无论是银币还是金币都没有被当作常用货币。1873年，在术语编纂中《铸币法》将白银从标准货币的列表中删去，事实上白银在近四十年中都被忽略。不久之后，银价下跌时银金铸币比率达到十六比一，几乎无利可图。恢复银铸币的要求最早是从那些希望刺激白银市场的银矿主开始的。一些人认为，铸币会提高金银的价格；另一些人则认为，政府将通过黄金赎回的方式继续维持银币价值，就像对待绿背纸币一样。1878年，理查德·帕克斯·布兰德推动的《自由铸币法案》发展成有限制的《布兰德-艾利森法案》。根据这一法案，财政部在十二年的时间里每个月都要购买至少价值两百万美元的银条。财政部不断抗议，认为以这些银币增加了黄金储备的赎回负担。随着白银价格继续下跌，银矿主们的要求日渐强烈。1890年，那些由于其他原因需要白银的通货膨胀论者也呼声高涨。

1890年，没有哪个政党明确表示支持或反对自由铸造银币运动，因而该运动并没有什么政治意义。但两大政党中都有人支持自由铸造银币，很少有政客强烈反对。在参议院的支持下、约翰·谢尔曼的影响下，

一场有利于自由铸造银币的运动展开了。1890年7月，自由铸造银币以法律的形式出现。根据该法，财政部每个月都必须以新的国库券支付购买四百五十万盎司的白银。1891年至1893年，美国一直保持用黄金以票面价格兑换南北战争期间发行的绿背纸币、布兰德-艾利森银币和1890年国库券。只有不断地按照客户的意愿兑换任何形式的货币，才能防止格雷欣法则[5]的作用，防止货币贬值到银条价值。

因为害怕蒙受损失，每个债权人都不愿看到白银成为货币基础。不然，他们手里的美元将从其所对应的黄金价值缩减到白银的价值。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一种货币贬值本身就够糟糕了，有意采用这种货币就是一种直接的拒付行为。1890年以后，人们更加害怕这种情况，这种恐惧阻碍了新企业的发展。最后，企业不得不在合同中添加“黄金条款”。只要有可能，人们都会贮藏金子。1890年以前，纽约海关收入大部分是黄金，但在1892年和1893年之间的冬天，其收入只有不到百分之四是黄金。财政部发现财政支出逐渐接近收入，国库中的黄金逐渐减少。商人们非常担心货币的未来，可用资本的实际限度逐渐显现出来。



纽约海关

1878年至1892年，美国经历了繁荣，金融和经济上的动荡相对较轻，并且每年都有业务扩张。美国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已经超过其年度储蓄额。1893年前，美国经济盈余几近耗尽，并且即将面临强制清算。1893年，美国各银行开始缩减开支自救，资金短缺成了普遍问题，萧条发展成了恐慌。1893年4月，美国财政部用于兑现全部白银和纸币的黄金储备已经低于企业认为的最低安全限度——一亿美元。同年夏，

英国关闭了它在印度的造币厂，导致银价继续下跌。1893年7月之前，恐慌已经遍布整个美国 [6] 。

在本杰明·哈里森总统离任之前，恐慌已经迫在眉睫，而这一切都留给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去面对。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已经表示坚决反对自由铸造银币和将白银作为货币基础。他在《谢尔曼白银采购法》里看到了惊人的风险。于是，他一方面在1893年8月召集国会准备废除该法案，另一方面又通过发行债券保证了美国未来两年的黄金储备。这是自南北战争以来，民主党第一次全面控制美国政府的每一个分支。但现在它正面临一个问题，一个可能影响其竞选结果的问题，也是导致该党分裂的问题。

大多数人激烈地反对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描述财政危机和要求废除《谢尔曼白银采购法》的咨文。一些来自两党的西部众议员和来自南方的民主党人则属于剩下的那个少数群体。1890年之后，那些曾经视人民党人为敌的人现在成了他们的朋友，并且超乎想象地提升了他们的实力。即使在民主党的命运遭到威胁时，总统也绝不妥协，并且在东部争取到了能够废除该法案的大多数票。1893年11月，《谢尔曼白银采购法》终于被废除。1894年至1897年，危机之后的债务偿还问题受到了影响。

关税改革并未迎来一个良好的开端。第一次关税改革会议就造成党派分裂的局面，导致对关税改革真正感兴趣的民主党人产生不满情绪。在《麦金利关税法》被废除之前，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就丧失了对西部民主党人的影响力。就像人民党一样，这些民主党人认为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维护的是各大公司和东部的金本位支持者的利益。西部的反公司情绪由于这次事件而升级，使公司和农民对白银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1890年和1892年，主张关税纳为财政收入的观点占了上风。民主党承诺要通过相关法案。议长查尔斯·弗雷德里克·克里斯普任命威廉·莱恩·威尔逊为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廉·莱恩·威尔逊用行动证明了他完成这一使命的决心。在1893年到1894年的例会上，他就提出了相关提案。和之前的法案一样，这项关税法案在众议院得以通过，在参议院经历改

写，后来被两院协商委员会重新改写。参议员谢尔比·摩尔·卡洛姆说：“事实上，我们都是民主党或共和党人，为了保护我们各自所在州的产业，试图对该法案进行修订。”生产盈余不再是削减关税的理由。一群民主党参议员断然否定自由贸易的主张。在他们的领导下，该法案中大部分减少关税的条款都被删去。共和党人抨击这项措施，并愤怒地指责它是1893年恐慌的元凶。1907年，一位共和党总统仍将其描述为“在小麦价格跌破五十美分影响下”的一项措施。当《威尔逊法案》最终呈递给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时，它与《麦金利关税法》一样受到强烈谴责。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曾试图说服民主党对该法案进行大幅修改，但没能成功。因而在1894年7月，他拒绝签署这项法案。这样一来，《威尔逊法案》就成了一项没有总统签名的法案。这部毫无新意只是规定征收所得税的法案是对人民党的让步之举。不久，最高法院就宣布《威尔逊法案》违反宪法。

在与《威尔逊法案》斗争的过程中，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公开冒犯了东部的民主党人，就像他在1893年因为废除《谢尔曼白银采购法》而得罪了西部的民主党人一样。1894年夏，因为干预西部罢工运动，他引起所有劳工组织的不满。

1893年的恐慌导致劳工群体动荡不安，也在众多失业者中留下了一个不稳定因素。同年夏，哥伦布博览会在芝加哥举行，很多失业者被吸引到那里，警方为此担心了好几个月。1894年复活节前后，在雅各布·塞克勒·考克西的指挥下，一群“失业大军”在华盛顿游行。几周后，普尔曼卧铺车公司的员工集体罢工。在尤金·维克托·德布斯的领导下，美国铁路联盟对普尔曼卧铺车公司发起了联合抵制。劳工骑士团也支持罢工。在此影响下，铁路运输在整个西部都受到了阻碍。然而，伊利诺伊州州长约翰·彼得·奥尔特盖尔德没有镇压在芝加哥附近发生的骚乱和暴动，而命令民兵原地待命。当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派联邦军队到芝加哥扫除铁路暴乱时，他也没有介入。



政治漫画：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在与《威尔逊法案》的斗争中落败

联邦政府的干预不仅使仍然坚持州权力至上原则的人不满，也激怒了罢工者和劳工组织。他们认为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维护的是铁路公司的利益。当联邦法官颁布禁令禁止尤金·维克托·德布斯干预罢工时，他们认为法院也在替铁路公司说话。最后，罢工以失败告终。努力维护和平的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与科罗拉多州人民党州长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位州长曾介入矿工大罢工，但他非但并没有逮捕占领矿山的罢工者，还逮捕了地方司法官和驱逐罢工者的地方武装团。戴维斯·汉森·韦特州长表示："让鲜血浸透马的缰绳，我们国家的自由绝不能被摧毁。"1894年，国会将劳动节定为法定假日，但此举并未能安抚劳工组织。

到了1894年夏，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所属的民主党已经分裂到无法修复的地步，而与他交好的大部分都是共和党人。他始终坚持健全的货币政策、关税改革以及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在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之后，他的所作所为疏远了西部、东部和劳工组织，并强化了民主党并不关心劳工利益的形象，因而无意中助推了人民党地位的上升。恐慌导致美国国内出现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因而人们有可能为了摆脱困境而求助于一种新的力量。人民党就是这样一股新势力。眼看着人民党的势力越来越强大，由于缺乏对它的了解，东部对它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

既看不起它又恐惧它。很多漫画中描绘的典型人民党形象都是骨瘦如柴、胡子拉碴、身着衬衫、脚踩靴子、衣冠不整的农民样子。然而，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场运动坚持改革的现实基础。一位讽刺作家把人民党描绘成“堪萨斯州的强盗”，称：“与生俱来的本能指引着我选择了现在处于上升地位的人民党，因为它爱平庸的法则，我爱无知的法则。”



芝加哥哥伦布博览会



普尔曼卧铺车公司的员工集体罢工

[1] 即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的哲学思想，主要包括自然观、物质论等。——译者注

[2] 亚特兰蒂斯是虚构的岛屿，出自柏拉图的对话集《蒂迈欧篇》及《克里底亚篇》。它代表着围攻“古雅典”的海上力量。亚特兰蒂斯最后沉入了大西洋。——译者注

[3] 即无记名投票制。——译者注

[4] 威廉·亨利·哈里森，美国第九任总统，人称“提帕卡农英雄”。——译者注

[5] 指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最早由英国的托马斯·格雷欣爵士（1519—1579）提出，故称格雷欣法则。——译者注

[6] 1893年资金短缺造成的金融恐慌。——译者注

第14章　自由铸造银币运动

金融学者们在经过认真分析之后几乎一致认为，采用自由铸造银币政策将引发格雷欣法则，并将导致美元贬值。然而，与其说现在美国出现的分歧是经济规律使然，不如说是个人利益的驱使。债权人预见到他们的财产有可能因此缩水，所以担心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出现。债务人则认为自由铸造银币政策会减轻他们的债务，因此也会轻易说服自己这项政策是理所应当的，并且这样做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道德层面上的解脱。

在西部看来，19世纪80年代的物价下跌与其说是过度生产和机械发明的作用，不如说是美元升值的结果。白银支持者声称，美国的货币供应已经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商业需求，因而被过度使用的美元逐渐获得了一种稀缺价值，但美元升值带给每个债务人的负担却是不公平的。这是西北部绿背纸币党之前的态度，是债务累累的萧条时期带来的结果。考虑到资金短缺的情况，1873年的法案对西部来说显得格外重要。禁止白银流通成为一种犯罪行为。从西部的立场出发，美元应恢复到以前的价值，即白银的价值。1893年以前，这条规定引发了人们严重的不满情绪，但还不是西部的主要矛盾。为了自由铸造银币的未来，人们不愿意脱离他们的政党，但恐慌驱使他们不得不走出最后一步。

在1892年的竞选中，各大政党选择采用回避性的政治纲领规避自由铸造银币问题，他们普遍对货币规律缺乏了解，最后问题暴露无遗。1890年之前，两大政党都不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而国会议员却敢于迎合这一运动。随着自由铸造银币运动迎来了更多的希望，那些自身利益受到不利影响的人、认识到其理论危险性的经济学家以及谴责赖账行为的道德家们在大规模的教育活动中找到了他们共同的事业。

除极端通胀主义者之外，所有人都宣称他们想要"可靠的"或"稳健的"货币。1892年，两大政党都坚持任何形式的货币都必须保证可以在等价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兑换。它们还强调必须和使用黄金一样使用白银，两党的政治纲领里没有出现与这些主张不一致或不可能实现的条

款。等价使用原则满足了东部债权人的要求，而平等使用金银的原则满足了西部和南方债务人的要求。



1873年铸造的银币

许多不支持自由铸造银币的人呼吁采用金银二本位制，因为他们担心一味地坚持黄金本位会对自己的党派造成影响。只要传统十六比一的铸币比率仍然是商业铸币比率，那么两种金属的自由使用在理论上就是行得通的。但美国的经验表明，商业铸币比率的轻微变化必然会使价值较高的美元退出流通，而更便宜的货币投入使用。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格雷欣法则，对商业铸币比率保持得够久就有可能实现复本位制的观点持怀疑态度。随着银价的急剧下跌，金银二本位制已经不可能出现。如果连政府通过黄金赎回的办法也不能控制流通中的白银，那么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碍银本位的出现了，就连美国法律也无法阻止。唯一的可能就是求助于规定十六盎司白银价值等同于一盎司黄金价值的国际协定以确立这个比例。尽管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但金银二本位制的支持者抓住了这根稻草，试图通过对国际金银二本位制的呼吁来拒绝自由铸造银币的要求。

1893年的恐慌、白银的贬值以及《谢尔曼白银采购法》的废除进一步刺激了自由铸造银币运动，使其正式步入美国政治领域。1893年8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关于白银问题的会议谴责了“1873年的罪行”，而戴维斯·汉森·韦特州长向科罗拉多州议会建议，建立州立造币厂用于铸造作为法定货币的银币。在1893年和1894年的州议会上，两党政治纲领都

涉及白银问题。1893年，内布拉斯加州的民主党人拒绝了这一政治纲领。1894年，奥马哈市支持自由铸造银币的民主党人召开核心会议，决定立即恢复自由铸造银币政策，“而无需等待国家的援助或同意”。

1894年，在国会选举中，共和党人重新获得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权，许多支持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的候选人也在其中。1895年3月，第五十三届国会中约有三十位成员呼吁将自由铸造银币政策作为一项政党方针。金本位制度下还存在一处因不公而引起众怒的地方，即金本位捍卫者们都是富人阶级，而且通常都是各公司的董事。这项措施的成败已经演变成一场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本叫《硬币的金融学院》的小书以简单对话搭配插图的形式普及了西部人对于自由铸造银币的认识，并以直言不讳的风格一经出版就达到了数十万册的销量。1895年，自由铸造银币运动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越了人民党的控制能力，在任何一个党派对其采取包容态度之前，它的势力已经足以令所有改革措施黯然失色。1894年，失去公职的《威尔逊法案》发起人写道：“我从来没有如此失望过，我看到我们南方人愚蠢地采取了一个虚假和破坏性的方案打击了公共和私人信用的根基，丢弃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而让北方获得了在重建热情高涨的日子里都没有获得过的团结。这使南方陷入一片谴责声之中，南方在美国的影响力下降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硬币的金融学院》书中漫画：银是如何被法律行为而不是暴力行为“杀死”的

1895年，第五十四届国会召开会议，托马斯·布拉克特·里德再次作为议长出现，但白银问题带来的情绪削弱了部分党员对党的忠诚。斯蒂

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的年度咨文包含了政府和外交关系中常见的问题，并花了几页篇幅讨论财政部的金融运作和货币问题。最后，该文以强烈呼吁民众支持自由铸币政策作为结尾，呼吁他们“以爱国的立场和熟悉的经验”来重新审视该问题。整篇咨文中没有暗示任何其他议题可能会超越自由铸造银币问题出现在公众视野。十五天后，即1895年12月17日，美国总统向国会发出了关于英国和委内瑞拉之间的那场古老争端的特别咨文，震惊了世界，扰乱了股票市场，并再次带来了门罗主义。

多年来，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之间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一直是引发争端的源头。这两个国家提出的索赔要求是高而模糊的，英国矿工的不断侵扰让委内瑞拉这个弱小的国家陷入恐慌。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委内瑞拉一直向美国求助，要求对争端进行仲裁，但最后总是徒劳无果。美国并没有对这场争端表现出什么兴趣，在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之前还没有人过多地担忧此事。1895年夏，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答应委内瑞拉说服英国接受仲裁，并通过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起草的一系列报告向索尔兹伯里勋爵 [1] 施压。

理查德·奥尔尼的论点是，由于两国在国力上的差异，这一争端适合通过仲裁解决，而且美国也对公平地解决领土问题感兴趣。他阐述了约翰·昆西·亚当斯在詹姆斯·门罗执政期间提出的原则，即南美洲各国的命运影响着美国，并断言这是美国公法的一部分。他列举了自1823年以来出现的相关案例，并没有在其中发现任何一个断然否定门罗主义的先例。长期以来，理查德·奥尔尼维护美国利益和霸权地位的言论未能说服英国外交部。英国外交部认为理查德·奥尔尼应用门罗主义和该主义约束力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因此两国之间的仲裁被拒。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在提交给国会的信中敦促美国对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进行仲裁，并维护仲裁结果。他承认：“在提出这些建议时，我清醒地认识到由此产生的所有责任，也意识到了可能产生的所有后果。”



理查德·奥尔尼的漫画形象



索尔兹伯里勋爵

这篇咨文中传达的战争威胁论转移了公众对白银问题的关注。商人

们被这一决定震惊了，而明智的时事评论员有的质疑门罗主义的价值，有的否认其恰当性。毫无疑问，公众都会支持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的意见，但与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最亲密的顾问团却持反对意见。政敌们指责他利用这个外交问题以达到团结政党的目的，或者制造恐慌来促进股市上的投机行为。英国一方面在媒体上怒斥美国，但另一方面却顺应了美国委内瑞拉委员会的仲裁要求。1897年，该事件以英国同意进行仲裁而告终。



漫画：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扭转了英国狮子的尾巴

无论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关于委内瑞拉的那篇咨文是出于什么动机，它都没有为任何一个党派带来短暂的平静。民主党被白银和关税问题分割成不同派系，而共和党在1896年的计划也已经变得非常混乱。共和党曾有组织地推进美国的贸易保护进程，但这种热情却受到了压制。



漫画：仲裁庭做出裁决之后。门上写着和平与富足。索尔兹伯里勋爵（咯咯地笑）道：“我喜欢仲裁——在适当的地方！”

1890年和1892年，尽管共和党失败了，但他们始终在努力争取贸易保护。1888年，马修·斯坦利·夸伊促成了那些在关税和共和党选民身上有金钱利益可图的制造商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制造业中，人们普遍认为商业繁荣和贸易保护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人预言，如果民主党获胜，美国将会面临破坏性的打击。1893年的恐慌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当民主党通过《威尔逊法案》时，共和党人就曾断言，人们的担忧已经引起恐慌。各党派领袖秘密地与国内市场社团主席达成一致。这位主席在回忆录中写道：“该法案……比我们所担心的破坏性要小得多。”“在经济不景气的这些年，我们的商业并没有盈利，较以前以及它本该获得的利润少了很多。”很明显，当时的美国还不够繁荣，因此人们就更期待繁荣的到来。1896年提名的候选人中有一位是《麦金利关税法》的起草者，而一位俄亥俄州的漫画家在他身上发现了“繁荣的促进剂”。

《麦金利关税法》的名字来自俄亥俄州坎顿市的威廉·麦金利，其起草者是来自克利夫兰市的马库斯·阿朗佐·汉纳。自1880年以来，马库斯·阿朗佐·汉纳一直游走在商业和政治之间的边缘地带。他很早就认识到，从关税方面可在制造商处获利，并将得到的资金用于政治。几年来，他一直在俄亥俄州为竞选筹集资金，根据制造商的利益对其进行评估，让他们对按需捐款的责任印象深刻。这是一种商业交易。马库斯·阿朗佐·汉

纳并没有从中获得特别的收益，但他把对政治的浓厚兴趣和主流的商业标准结合了在一起。1890年左右，他成了俄亥俄州贸易保护主义者的盟友，而后便踏踏实实地为总统选举工作做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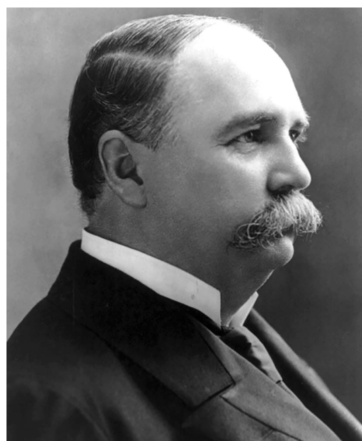
漫画：威廉·麦金利戴上王冠，他的法案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威廉·麦金利是一位机智而称职的国会议员，他支持关税改革，而且对关于关税问题的演讲很有说服力。他有很多热心的朋友，却几乎没有什么敌人，并因为1890年的《麦金利关税法》为很多美国人熟悉。1893年之后，他多次在公共场合被高呼为下一个候选人，但随着白银问题的出现，他似乎很难将自己关注的对象转移到新问题上。在一轮接一轮的辩论中，他更倾向于金银二本位制和自由铸币。因此作为共和党大本营的东部不相信他能公正地处理货币问题。然而，如果威廉·麦金利放弃自由铸造银币，那么他是否能控制住西部的局面就难说了。几个月来，马库斯·阿朗佐·汉纳带领着威廉·麦金利的支持者们，用自己的资金努力让公众保持对关税问题的关注度，而这位候选人则在自由铸造银币这个关键问题上保持着谨慎和令人焦急的沉默。

在总统提名中，威廉·麦金利最重要的竞争对手是本杰明·哈里森和托马斯·布拉克特·里德，但他们都没有像马库斯·阿朗佐·汉纳那样精明能干的竞选经纪人。威廉·麦金利在圣路易斯的第一轮投票中就得到了提名，得到副总统提名的是新泽西州的一名公司律师，金本位支持者加勒特·奥古斯都·霍巴特。

整个1896年春天，共和党政治纲领的性质一直处于争论之中。共和党不愿涉及白银问题，而该党预先确定的候选人也对此迟疑不决。在政

治纲领委员会中，机会主义者暗暗较劲，他们想要继续采取逃避政策；西部人觉得白银对他们的意义大于党派影响；人口众多、商业发达的东部则致力于提倡金本位制。当金银二本位制的支持者们认识到金银二本位制成立的可能性必须建立在国际性的基础上时，他们的宣传工作才取得了一定进展。后来，政治纲领委员会的成员们出于不同的目的最终采用了有关信贷的政治纲领条款。共和党在严厉斥责民主党制造恐慌并重申贸易保护承诺之后，又谴责了货币贬值及信贷的问题。共和党反对自由铸造银币，声称所有货币都必须保持在“与黄金同等的地位”，并承诺为达成关于金银二本位制的国际协议而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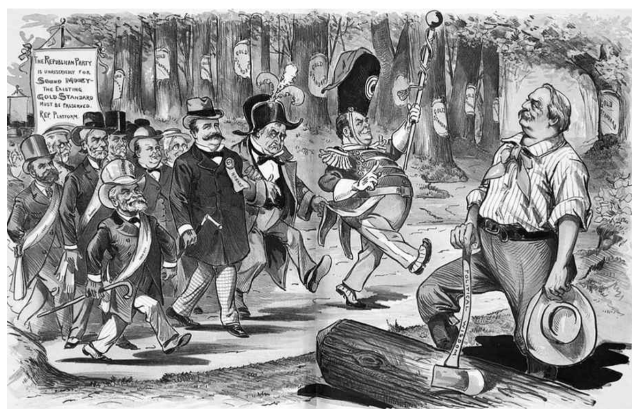


加勒特·奥古斯都·霍巴特

支持自由铸造银币的州代表团在与会人员中发起投票，打响了自由铸造银币之战，最终却因818.5票对105.5票 [2] 的投票结果惨败。为此，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的参议员带领三十四名成员退出了大会以示抗议。就连禁酒党也因对这个议题的不同看法而分裂。幽默周刊《生活》十分严肃地说道：“现在这个国家的两大政党分别是金党和银党。两个旧党派已经暂时失去它们的光芒。”很少有人满意共和党的处理结果，因为在自由铸造银币问题上，虽然共和党的政治纲领指向了一个方向，但候选人的职业生涯却指向了另一个方向。共和党的切身利益和贸易保护问题没有引起任何关注。

1896年7月，民主党在芝加哥召开代表大会，但并没有预先确定总统候选人。人们注意到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连一个建议性的政治纲领也没有。没有任何总统像他那样孤军奋战。他与共和党人就其主要政策

进行讨论，但在自己的党派中却没有追随者。他不紧不慢，耐心、勇敢又固执，曾两次为他的政党兑现了承诺，而且也没有被西部应对财政风险的短暂需求而冲昏头脑。他带领国家行政部门走过八年的扩张和重组的岁月，一直是文官制度改革的忠实公仆。1896年5月，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颁布了新的规定，进一步增加了文官分级职务，增添了约三万一千名员工。这样一来，在十七万八千名联邦职员中文官就达到了八万六千名。因此，在政客们的眼中他的过错又加了一重。在任期结束前至少两年，他就退出了党派政治。1897年，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选择住在了普林斯顿。从那时起，他坚持写作和演讲了十一年。1908年，在他去世之前，人们已经忘记1896年对他的恨意了。在美国人心目中，他的形象仍然高大，因为他的独立和真诚无可非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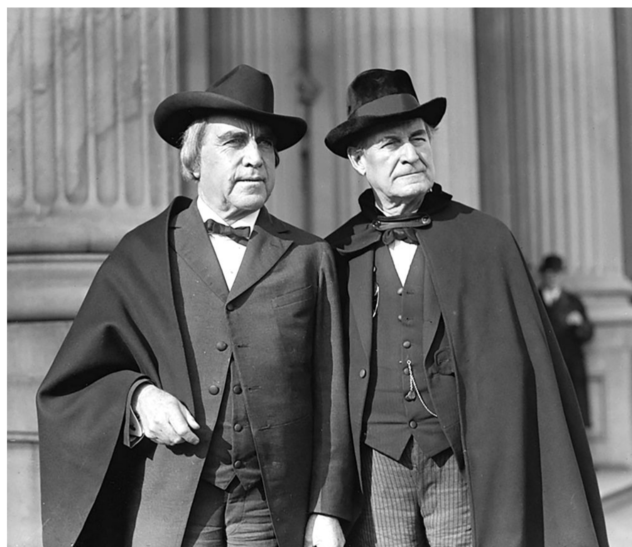


漫画“先锋克利夫兰”：显示共和党走上了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右）闪耀的金本位之路。加勒特·奥古斯都·霍巴特穿着黑色外套（正中左边），佩戴一条带有他的名字的运动丝带，走在威廉·麦金利和前总统本杰明·哈里森（戴着灰色帽子）之间

大势所趋，没有什么能阻挡，民主党与人民党和自由铸造银币运动联盟。1892年，作为弱势党派，它们感到应该联合起来对抗共和党了，对与马库斯·阿朗佐·汉纳和威廉·麦金利的政党做斗争充满责任感，因为这个政党主张在贸易保护和金本位制的基础上发展商业、金融和制造业。人民党和民主党紧密联盟共同抗争并非难事，因为人民党自由铸造银币的观念已经逐渐渗透到西部和南方的民主党人中。在1896年的代表大会上，如1894年内布拉斯加州那样，三十多个州要求立即实行自由铸造银币政策，而大多数民主党代表在他们来芝加哥之前就已经对此做出

承诺。他们在大会的第一轮投票中就已经控制住局面占了上风，并提出政治纲领条款，要求“以目前十六比一的法定比率自由且无限制地铸造金银货币，无须等待任何其他国家的援助或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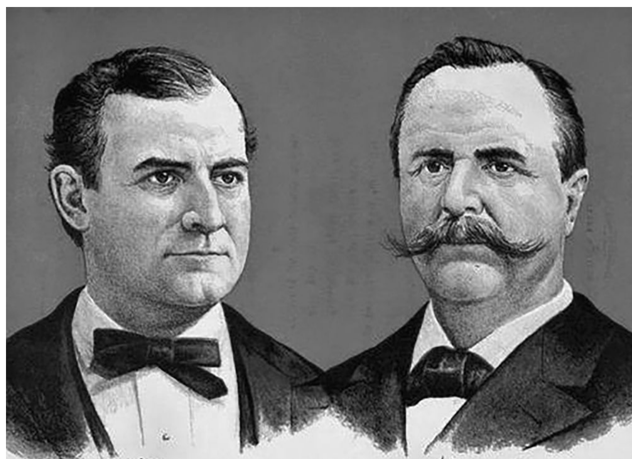
尽管白银政治纲领条款的通过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事，但有关该条款的争论仍然漫长而激烈。这场争论最后终止于内布拉斯加州代表团的领袖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他是前国会议员，后来曾说道：“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得到这样一个机会来终止这场争论，我怀疑如果这个机会给了这个时代的另外一个人，结果会不会一样。”经过几天的激烈辩论，与会人员早已疲惫不堪，那些老政客因为坚持不住就先行离开了，候选人也不在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抓住了这一机会。这一年，他只有三十六岁，其他州没有人熟悉他的相貌或名字，但他一直在用宗教的宣讲力度和演讲技巧宣扬着自由铸造银币的好处。他的演讲通过不断重复而层层深入。当他呼吁实行自由铸造银币政策时，演讲达到了高潮：“如果谁敢站出来公开维护金本位，说它是一件好事，我们一定会抗争到底。”“在我们身后的是美国乃至全世界从事生产的大众。有商业利益、劳动利益和各地工人作为后盾，我们将对呼吁金本位的要求做出回应：你们不能将带刺的王冠强压在劳动者头上；你们也不应该把人类钉死在黄金做成的十字架上。”由于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对白银的热情给人留下强烈印象，加之没有其他候选人出现，在第五轮投票中，大会提名了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并选择缅因州的亚瑟·休厄尔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右）与埃德加·霍德华（左）

1896年7月22日，人民党在圣路易斯召开会议。一位忠诚的领导人抱怨道："如果选择联盟，我们就完了。但如果我们不联盟，所有支持自由铸造银币的人都会离开我们转向比我们更强大的民主党人。"两党联盟控制住了大会导向，通过投票击败了坚持独立的"中间路线"集团。尽管亚瑟·休厄尔提名佐治亚州的托马斯·爱德华·沃森遭到否定，但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得到了提名。1896年以后，人民党的组织还在，但它的活力却永远消失了。

1896年的竞选活动围绕着教育、情感和恐慌等主题展开。反对势力驱使着威廉·麦金利更加坚定地捍卫金本位制。贸易保护再也无法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其他问题也逐渐被淡忘。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的党派吸引了共和党和禁酒党的白银派，并吸收了人民党。经历了几周策略上的犹豫不决后，支持金本位制的民主党人选择脱党。1896年9月，他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会议，提名了约翰·麦考利·帕尔默和西蒙·玻利瓦尔·巴克纳。在这次投票中，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和内阁成员选择支持他们。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四处奔走，到处宣讲他的新观念，被数百万美国人视为"美国人民第一次反对垄断的伟大抗议——这是我们国家人民第一次反抗特权阶级的伟大斗争"。在这场斗争结束时，《国家》评论道："也许再没有人能在人民的生活中成功地引发如此强烈的恐惧，却没有付出生命代价。"



亚瑟·休厄尔（右）与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左）



约翰·麦考利·帕尔默

作为全国委员会主席，马库斯·阿朗佐·汉纳组织了共和党的竞选活动。他让大众认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正在进行的选举活动是“反对十诫”的活动。他筹措资金的来源主要是早就习惯这种要求的制造商和大量的受恐慌影响并且害怕被孤立的捐赠者。各保险公司和国家银行也接受评估并欣然捐赠。这些资金最后流入美国有史以来最广泛的教育活动。

与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不同的是，威廉·麦金利整个夏天都待在家里，各代表团则不得不千里迢迢地来到他在俄亥俄州坎顿住所的阳台上。面对这些人，他讲话简洁有力，带着他在竞选活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自信。马库斯·阿朗佐·汉纳组织了一群演说家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威廉·麦金利的观点。他们通过演讲接触到并努力说服每一个有可能接受白银问题的选民。在竞选活动的最后几天，一场恐慌席卷了保守阶层，也为马库斯·阿朗佐·汉纳的竞选基金带来前所未有的捐款数目，腐败的传闻不绝于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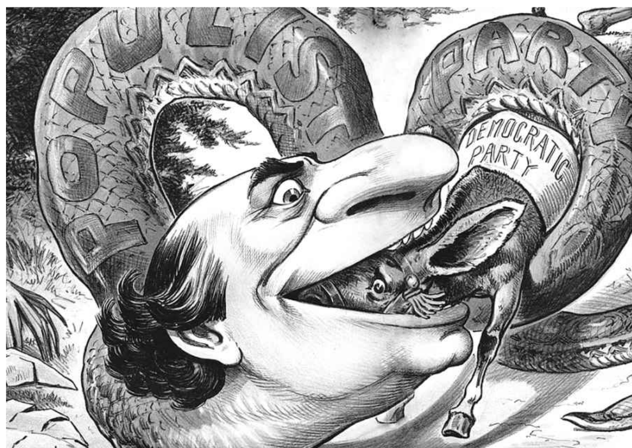
在大选前一周，一位在纽约旅游的英国游客在周志中写道：“当然，到周三为止，我们什么事都做不成。所有美国人都兴奋不已。纽约正处于近乎狂热的状态。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昨天那样的场面。整个城市到处都像印有共和党和民主党标志旗帜的海洋——街道上挤满了人，约有超过两百万人。整个商业区都在进行盛大的游行，历时七个小时，而仅在场的商人就超过了十万人。每个人——事实上，不仅是美国人，还有

英国人和所有欧洲人——现在都在急切地期待着周二晚上揭晓的最终结果。现在，一个更大的问题越发清楚了：不仅仅是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的主张导致——美元相当于五十美分——而不是标准的一百美分——会产生深远的灾难性影响，而且这整场争斗会对良性的建设性力量形成一种无政府和破坏性的影响。”



1896总统选举期间的漫画：想象一下威廉·詹宁斯·布莱恩获胜后的最高法院将会是什么样子。其中的“法官”是伊利诺伊州州长约翰·彼得·奥尔特盖尔德（右中站起）。在他左边，手里拿干草叉的是蒂尔曼

这次投票是在四十五个州进行的——犹他州在1896年刚被联邦接纳。没有哪场选举获得了比预期更多的选票。威廉·詹宁斯·布莱恩获得了六百五十万张选票，比历任总统获得的选票都多了近一百万张，但他还是比威廉·麦金利少了六十万张选票。共和党获胜的地区包括弗吉尼亚州和田纳西州北部的每个州，以及密苏里河以东除了密苏里州和南达科塔州的各州。团结的南方与团结的北方和东部对峙，而西部则出现了分歧。威廉·麦金利得到两百七十一张选举人票，而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得到一百七十六票。



1896年总统选举期间的漫画：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如果当选总统，他会像一条蛇一样吞噬代表民主党的驴子

竞选宣传对于竞选结果的影响不容小觑，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就是恰当的宣传是成功的一半。然而，比起人们的情感倾向和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冷静的分析在当时似乎不占优势。1894年，经济萧条到了最低谷。到了1895年和1896年，美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自由铸造银币运动是一种应对艰难年景的运动，但在经济恢复之后它的影响就减弱了。托马斯·布拉克特·里德对理查德·沃森·吉尔德说："等经济繁荣起来，一切都会变好的。"手里有钱能偿还债务的公民不希望通货膨胀出现。一旦具有了偿付能力，他们就能理解稳健的财政理论了。大环境和黄金很有可能都是帮助马库斯·阿朗佐·汉纳获胜的有利因素。

在宣传中，威廉·麦金利被誉为"繁荣的促进者"。事实上，1897年3月，在他就职之前，美国就已经开始恢复繁荣。1893年的恐慌过后，债务的清算已经开始。威廉·麦金利的当选彻底结束了人们对货币制度进入立法的担忧。商业正在复苏，农业也在发展。西部平原上那些时运不佳的农民，有的可以将农场经营得有声有色，有的因为经营不善不得不放弃了农场。1896年之后，引起金融危机的不是白银，而是黄金通胀。1896年，阿拉斯加又开发了几个大规模的矿，吸引大量移民到育空河流域。不久之后，移民们又来到了诺姆的海滩。另外，金矿及其他贵金属也被发现。到1900年，物价不降反涨，高昂的生活成本取代了之前的低物价水平，吸引了美国人的注意。1881年至1896年，黄金的年平均产量高达一亿三千二百万美元。1896年至1911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三亿

三千七百万美元。威廉·麦金利的当选是共和党的胜利，但实际上却是稳健货币政策的胜利。他代表的是债权人和制造商的利益，并因为所有党派中的金本位制支持者而得以巩固。如果没有后者的帮助，他极有可能因为各种问题与总统之位失之交臂。威廉·麦金利一就职，共和党便控制了国会两院。共和党是因为货币问题在竞选中获胜的，但因为宣传关税改革而成为一个永久性的组织。在威廉·麦金利就职之前，马库斯·阿朗佐·汉纳宣布这次选举的结果将会启动一项新的保护性关税。威廉·麦金利总统早期的官方行为之一就是在1897年3月15日召开国会特别会议，以履行这一承诺。

1896年总统选举期间的漫画《历史会重演》：漫画左半部分显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手持文件，上面写着“我们谴责联邦当局任意干预地方事务，这违反宪法”；漫画右半部分显示，杰斐逊·戴维斯在面对亚伯拉罕·林肯和联邦军队时也持有同样的文件。该图画暗示美国很有可能再次爆发内战

[1] 即罗伯特·阿瑟·塔尔博特·加斯科因-塞西尔，索尔兹伯里侯爵三世（1830—1903），英国19世纪著名的政治家，保守党人，三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2] 为使投票尽量具有广泛性，投票实行半票制，即除拥有完整一票投票权的代表外，其余代表只有半票投票权，有的甚至只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投票权。——译者注

第15章　反改革运动

自由铸造银币运动像楔子一样导致各党派内部均出现分裂。此时，人民党的使命并没有结束，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既使它度过了艰难时期，也让它经历了经济复苏时期。尽管被更大的争议所掩盖，但这些改革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人民党承诺的改革并没有得到认可，但在执政党内部引发了一场反改革运动[1]。事实上，当时这一运动已经在进行中了。因为在1897年至1911年间，共和党在国家政府的每一个分支中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反改革运动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在共和党内部进行的，但本质上却无党派。该运动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内战以来受过教育的一代人。事实上，运动的许多领袖都或多或少受到过民主高等教育的影响，而支持该运动的材料主要源于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对美国社会力量的相关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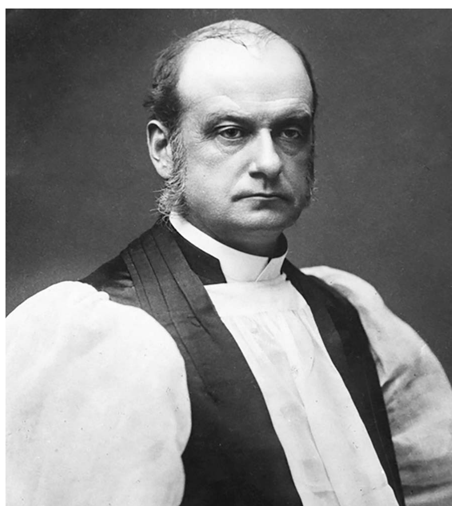
当时，美国政治的实际状况处于内战后三十年的最低点。经过多年的竞争，美国政治已进入疲惫期，美国人关注的重点突然转向各个领域的商业投机活动。公职都留给了有意担任公职的人，公众对政府行为的监督被极大地削弱。行政管理人员自己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利用在选举机构的工作和选民身份获利。在美国的每一个州和城市，政府机关都被选民们占据，而选民们对候选人几乎一无所知，只是根据各个党派的推荐来做选择。对提名的控制意味着对选举的控制，而控制权掌握在坚持参加核心会议和代表会议的人手里，但这些人在操纵选举方面并不太谨慎。针对选举腐败的法律并没有涉及初选中的腐败问题。通过制造业和移民迅速成长起来的城市有着大量选民资源，可以逐渐争取来培养成各位“老板”的支持者。

1870年左右，美国“老板”们开始出现在城市里。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个人对下层阶级——同时是多数选民的集体影响之上的。在取得了政党机器的控制权后，“老板”们指定了候选人名单并制定了政策，而且像曝光的特威德集团那样，利用政府不断争取支持，使自己的权力得以延续。他们不太考虑政党原则，与新企业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各企业不断需要新的法律法规，包括建筑法规、运输法规以及合同解除权或经销权

相关的法律法规。管理选举的资金也来自联盟企业，而且往往用于直接贿赂，尽管不多但最后却很有必要。

1870年以后，政府邪恶的一面逐渐暴露。在大多数城市，市民偶尔会愤而反抗，但从长远来看，他们并不是职业政客的对手。在欧洲各城市政府迅速做出改善的时候，美国各市政府却在不平等的竞争中变得越来越糟糕。美国各州也都受到了机器政治 [2] 的影响。1890年之前，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政党从企业联盟中获得了最宝贵的支持，而这些企业也是通过这种伙伴关系获利的。

随着“老板统治”的罪恶越来越明显，一些美国人开始不断为争取一个更好、更廉洁的政府而努力。其中一位是来自纽约的波特主教，在1887年美国《宪法》的百年庆典上，通过布道拥有了很多听众，并从对国家的祝福谈到了美国政府的现实情况。对这一主题最感兴趣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作者詹姆斯·布莱斯。



波特主教

自1835年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在美国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以来，还没有任何外国学者对美国人的生活进行同样深入的观察与研究。直到19世纪70年代早期，年轻的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莱斯开始通过一系列的美国之行审视这个年轻的国家。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詹姆斯·布莱斯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他的美国访问。在牛津大学任教授期间、在下议院和政府部门任职期间，他就一直过着这样充实的生活。在

美国，他认识了每一个值得认识的人，考查过西部的偏远地区，也领略过东部较为成熟的社会。1888年，他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充满了对美国的赞赏，也对美国不尽如人意的方面进行了剖析。其中一个章节对美国情况的描述非常贴近现实，以至于相关人士以诽谤罪起诉了他。但多数美国人还是认为这本书描绘的是一幅和谐的画面，并认为反对意见其实进一步证明了书中描述的真实性。也许没有一本书能如此深刻地影响这一代美国人的思想，并以如此特别的方式指引美国改革的进程。一时间，这本书成了教科书，揭露了腐败和恶政的无党派本质。人民党将此观点扩大，认为所有的改革运动都是无党派的。

“老板”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政府机制。有些人鼓吹进行精神改革的必要，但也有人认为只有改进体制才能取得成果。选举腐败长期困扰着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但是一个最容易改善的缺陷。在现行的选举制度下，花钱买选票的人很容易就能看到自己投入的资金带来的好处。各州提供投票地点，而候选人或政党提供印制选票。在投票时，政党代理人将这些选票分发给选民，而在投票之前，收到选票的选民一直受到监视。恐吓或直接贿赂很容易也很常见，但秘密交易并不为人所知。忠诚于某一政党的选民将选票存起来，“老板”们则根据需要来处理这些选票。1888年，据推测，根据纽约州的民主党“老板”大卫·班尼特·希尔和共和党“老板”托马斯·科利尔·普拉特之间的一纸协议，许多共和党人被要求投票支持大卫·班尼特·希尔担任州长，而民主党人则被要求投票支持本杰明·哈里森担任总统。

当时，采用无记名投票制是一项合情合理的选举改革措施，这项措施一经提出便迅速在美国普及开来。1888年，马萨诸塞州采用了基于《澳大利亚投票法》的选举制度。同年，纽约州州长大卫·班尼特·希尔否决了建立该制度的法案，却意外将该制度的优点广而告之。1892年，在下届总统选举之前，公开贿赂或恐吓选民的历史正迅速成为过去，因为有三十三个州采用了由政府当局通过的澳大利亚式投票制，并秘密投票。1892年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用尖刻的文字写道：“马修·斯坦利·夸伊、托马斯·科利尔·普拉特和詹姆斯·克拉克森可能会找到一个新的解释，即本杰明·哈里森总统自愿放弃他们提供的竞选宣传服务。”



漫画：大卫·班尼特·希尔（右）在用放大镜努力看清事物的本质

澳大利亚式投票制能保障投票的廉洁，使公民在保密和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投票，但提名仍不在法律可控的范围之内。詹姆斯·布莱斯写道："美国政治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找到所谓廉洁的人担任公职。"只要能主导提名结果，"老板"们还是能接受这种廉洁的选举方式的。在投票改革完成后，党内初选的法律进程才刚刚开始。最极端的初选改革者认为，在每个政党内部都需要进行初步选举，但在法律的保障下，最终应由选民自主选择候选人。直接初选是由年轻人来商讨的。他们雄心勃勃，但由于"老板"们选择候选人的标准十分严格，最终也无能为力。1897年，年轻的前国会议员罗伯特·马里昂·拉弗莱特制定了一个完备的适用于地方乃至全国的初选制度，并为该制度广泛听取意见。初选改革运动必然受到机器政客们的强烈反对，因为虽然该运动进展缓慢，但目标却对准了政客手中的权力。1901年，初选改革运动在明尼苏达州取得了胜利；不久，又在威斯康辛州告捷；直到1911年，初选改革成了改革类政治纲领的核心特征。

初选和投票改革旨在提高公职人员的素质，并辅以直接立法以监督选举结果。瑞士提出了一项新的方案，即公民可以通过请愿的方式制定新的法律或对现行法律投票表决。而在美国，以普选或全民公决的方式提出特别方案的观念由来已久。通过这种方式，各州的宪法和宪法修正案被习惯性地采用，而城市宪章、贷款和特权的问题也往往能确定下

来。通过倡议提出方案的观念还比较新颖，一经提出就吸引了改革者们的关注。改革者们对立法机构感到失望，因为立法机构总是否决他们期望通过的法律，也不愿意通过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法律。1892年，人民党建议对直接立法系统进行调查。1896年，改革者们采纳了这一建议。1894年，美国出现了一本促进改革的杂志。1898年，南达科他州成为美国在宪法修正案中采用倡议和全民公投方式的第一个州。对指责该计划仅仅是政治机器手段的人，改革者们做出的回应是："直接立法并不是解决所有国家问题的灵丹妙药。事实上，对于任何问题而言，它都不是万能药。它仅仅是可以被控制的、用来送药的勺子而已。专项立法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灵丹妙药。"

西部比东部更愿意从现有的实践中脱离出来，开始新的改革，因为西部一直都是美国各地区中较为活跃与自由的一个地区。在1800年到1830年之间，西部引领美国扩大选举权的范围，并消除了财富和宗教因素对选举资格的影响。现在，西部各州又开始触及选举权中的性别问题。随着1890年怀俄明州加入联邦，各州陆续允许妇女参加选举。1893年，科罗拉多州通过了一项关于妇女选举权的修正案。犹他州——用妇女的话说，"在落基山脉的顶峰上完成了真正意义上共和政体的三位一体"，在1896年1月，成为第三个通过妇女选举权提议的州。1896年，爱达荷州也通过了妇女选举权提案。直到1911年，第五个州才加入了这个行列，妇女运动正渗透美国的各个领域。1890年，联邦妇女俱乐部总会成为美国妇女活动的交流中心。妇女运动通过消费者联盟这样的组织成为美国整体改革的一部分。对政府机制缺陷和社会需求更清晰的认识正在迅速蔓延。1889年，简·亚当斯开办的赫尔馆使社会工作者能通过劳动阶层研究工业进步的成果，在城市里被竞相模仿。



联邦妇女俱乐部总会成员

1890年，美国开始出现各种新改革。在1892年到1896年间，这些改革由人民党接手。在1896年之前，两大政党都没有注意到改革的进程，但在每个政党中都有一些年轻人对于改革有着自己的观点。在人民党消亡之前，无党派运动就获得了众多追随者，并且让很多顽抗的组织也开始有所改观。改革整体上以让政府能更好地代表选民，并从可能或经常利用改革扩张个人势力的人手中接管事务为目的。1896年，新改革因自由铸造银币运动而黯然失色，在十年的时间里又因种种意外被公众遗忘，从而推迟了实施。美西战争、经济复兴以及关税立法改革转移了公众的注意力。



简·亚当斯



在赫尔馆求助的劳工家庭

1897年3月4日，威廉·麦金利宣誓就职。他曾在五届国会任职，并担任过三届俄亥俄州长。约翰·米尔顿·海伊曾表示：“他（威廉·麦金利总统）对立法机构的结构、方法和思维习惯都非常了解。”“他对自己的权威和最根本的公正目标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最深的尊重。”威廉·麦金利不会因为直言不讳或缺乏经验而让企业难堪。他性情和善，能认识到政治

手段的价值，对调和不同意见有自己独特的技巧，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及时代表大众表达真实意愿。在这一点上，他与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有着根本不同，他会为了自己眼中的人民利益行事。与他一同当选的内阁成员也都是先前支持他竞选的人。

1897年，共和党顺应当时的趋势，与商业组织结为联盟。1897年至1909年，这个联盟稳步发展。马库斯·阿朗佐·汉纳是联盟发言人。在为东部报纸创作插图的漫画家霍默·卡尔文·达文波特笔下，马库斯·阿朗佐·汉纳真诚而和善的面孔成了讽刺漫画中为博大众眼球而描绘的商业大亨形象。这是极不公正的。马库斯·阿朗佐·汉纳有着强烈的自尊心，认为保护资产是政府的首要职能，而资产也应该为了这个目的而组织起来。他只是为了利益而从事商业活动，把政府看作附属品，并没有怀着什么恶意。他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在1897年成为公众人物之后，又在讲演方面极富声誉。在离世之前，马库斯·阿朗佐·汉纳终于摘掉了在1896年竞选期间因为对手的恶意攻击而强加给他的恶名，但他仍然认为政府只是商业资产利益的最佳代表。他没有进入威廉·麦金利的内阁，但在约翰·谢尔曼的席位空出时，成为俄亥俄州参议员。



漫画：汉纳先生关于劳工问题的立场

共和党人需要一位财政部长来完成对国际金银二本位制的承诺。约翰·谢尔曼虽然年老不坚定，还是被说服去担任这一职务。财政部的日常事务被分配给总统的老朋友、助理部长威廉·鲁福斯·戴伊。来自密歇根州

的火柴托拉斯大亨拉塞尔·亚历山大·阿尔杰进入战争部。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的总裁莱曼·贾德森·盖奇接手财政部的工作。其他部长也都是可靠的人，通常都是白手起家，有望激发人们对商业领域的信心。



威廉·鲁福斯·戴伊

当时出现的新参议员同样代表商业和政治联盟的利益。来自俄亥俄州的马库斯·阿朗佐·汉纳和来自纽约州的美国快递公司的托马斯·科利尔·普拉特就是突出的例子。在宾夕法尼亚州，尽管遭到老伙伴约翰·沃纳梅克的反对，马修·斯坦利·夸伊还是提名了另一个同事博伊斯·潘罗斯。只有在支持自由铸造银币的参议员的帮助下，共和党才能保证参议院的多数席位，使货币立法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但管理者们希望能在国会召开特别会议时，也就是就职典礼两周后，获得多数人对保护性关税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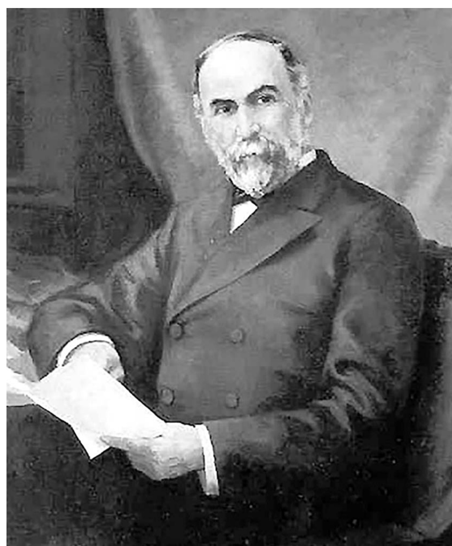


莱曼·贾德森·盖奇

早在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离任之前，修订关税政策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托马斯·布拉克特·里德一定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重新当选议长。同样，缅因州的纳尔逊·丁利也肯定会成为筹款委员会的主席，并在1897年举行关税听证会。制造商向委员会陈述的观点显然带有贸易保护的强烈愿望。比如，经常有人讲起《威尔逊法案》的低利率是如何引起1893年的恐慌的，而一位纽约州的“东方地毯”制造商则要求受到贸易保护以避免与德国制造商而不是东方的竞争，让人哭笑不得。自1890年以来，共和党的力量都用在关税修订上，其领导人暂缓了白银问题，以免计划被取消。现在，尽管货币计划得以继续，但共和党仍然能控制一切，就好像1896年让关税问题占据主导地位一样。对修订关税的呼吁表明了关税立法的必要性。托马斯·布拉克特·里德通过拒绝任命委员会成员来阻止众议院的工作，因为如果没有委员会，其他事务就无从谈起。



博伊斯·潘罗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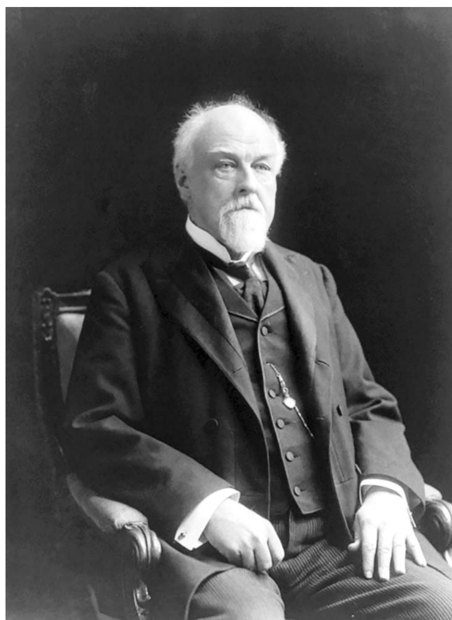
纳尔逊·丁利

在一场敷衍了事的辩论之后，众议院通过了《丁利法案》，所有人都认为这只是参议院和两院协商委员会真正斗争的开始。在参议院，该法案的内容成了财政委员会的一项新举措。财政委员会秘书西蒙·牛顿·德克斯特·诺斯也是羊毛制造商协会的秘书。税收在任何地方都是为贸易保护服务的，直到统计局局长沃辛顿·昌西·福特宣布，将暂缓《丁利法案》的通过以解决赤字问题。在该法案最后通过的时候，来自路易斯安那州

的民主党参议员塞缪尔·道格拉斯·麦克内里选择了脱党，转而投票支持糖业贸易保护。1897年8月，尽管“背叛”了自己的政党，但塞缪尔·道格拉斯·麦克内里还是受到有四百名副会长的接待委员会的欢迎。在内华达州的约翰·珀西瓦尔·琼斯的领导下，支持自由铸造银币的参议员们都支持该法案。1890年，他们曾以同样的策略获得了《谢尔曼白银采购法》的通过。现在，为了平衡权力，他们为自己争取了一系列修正案，涵盖了兽皮、羊毛和矿石等行业。1897年7月初，《丁利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1897年7月24日，成为一项法律。尽管该法的最后通过主要归功于来自艾奥瓦州的参议员威廉·博伊德·艾里森，但还是继续以其被遗忘的创始人纳尔逊·丁利的名字命名。

1897年，共和党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人民党所提倡的无党派改革的载体，但许多年轻的共和党人已经接受这一点。关税立法几乎吸引了所有全国性组织的关注，而经济复兴却打击了人们的改革热情。1897年和1898年美国在政治上做出的反省并不比自1890年以来面对社会混乱和强制经济时期容易。文官制度改革和竞选改革是在经济上升的过程中开始的，但政党机器继续控制着各大组织。

1897年春，参议院的行为让许多改革者感到失望。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把和英国签订的仲裁协议留给参议院处理，但当他离任时该事项却仍然没有任何进展。仲裁是处理英美关系时常用的国际工具。边界、捕鱼权和索赔等问题不断提交给不同的法院或委员会来裁决，甚至影响英国名誉的索赔案也在日内瓦通过仲裁解决。委内瑞拉事件过后，各国在天湖举行的会议上心平气和地讨论仲裁方法的延伸问题。英国在与委内瑞拉的争端中，英国接受了仲裁原则。1897年2月，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也接受了在华盛顿签署的一般性仲裁条约。公众舆论也真诚地接受了该原则，但参议院却迟迟不采取行动。1897年春末，辅以一系列修正案的仲裁原则得到了批准，但去了原有的力量，表明参议员们并不愿接受仲裁原则。和睦稳定的对外关系因此迟迟未能建立。不断升级的古巴起义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外交和改革问题上转移过来。



塞缪尔·道格拉斯·麦克内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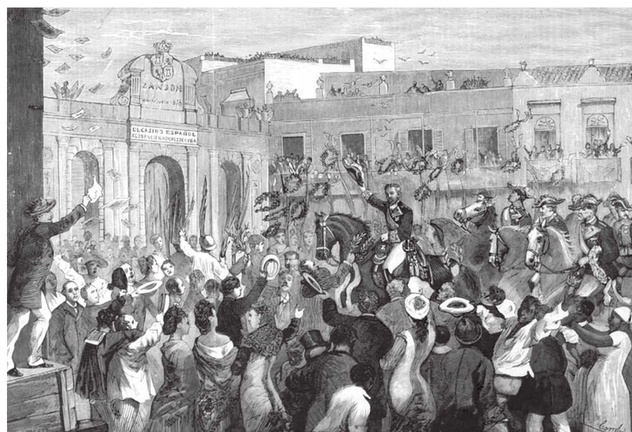
天湖

[1] 与先前改革的结果相反的改革运动。——译者注

[2] 机器政治亦称“老板统治”，指美国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一种政党政治，由一个老板或小集团控制，通过筹款、拉选票扶持某政党上台。——译者注

第16章　美西战争

1895年，古巴起义爆发，这只是古巴众多暴动的其中之一而已。自1878年十年战争结束以来，这个岛屿表面上风平浪静，但一直都吸引着美国的注意力。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只一次关注古巴，在不同时期重申了门罗主义的内涵。美国购买古巴计划的目的是扩大奴隶区，控制加勒比地区或扩大水果和甘蔗种植区。《麦金利关税法》允许糖业进行自由贸易，但1894年这一政策终止。几乎从那时起，当地居民就开始要求独立。



马丁内斯·坎波斯将军进入哈瓦那，标志着古巴十年战争告一段落

1895年，因为西班牙殖民政府的种种过错，古巴起义因其捍卫主权得到了公正的处理。社会等级制度与垄断在古巴人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西班牙人掌管着公职的任命权，享受着由此带来的各种利益，并且拥有着管理商业的特权。古巴西部人口最稠密，受西班牙的影响最大，对起义的支持最少。而在东部，古巴人和黑人以种植甘蔗、榨糖或放牛为生。在不公正的制度和种族歧视下，不满的人民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东部的起义者很快在圣地亚哥、波多普林西比和圣克拉拉等省立足。在丛林或山区，他们派出游击队破坏统治阶级的制糖厂和种植园。军队来追击时，他们便隐藏武器，假装无辜农民。组织这场革命的政府成员却安全地坐在纽约指挥起义，利用美国人对自由的热爱来筹集资金，并将武器、军需品和志愿者用货船运送到前线。为了避免激战和流

亡国外，西班牙爱国人士要求西班牙政府在古巴部署二十万大军，并在西班牙控制的每一个地区驻军。



古巴甘蔗种植园生产蔗糖

从1895年到1896年，战争继续。西班牙当局并没有获胜的希望，美国却对这场战争越来越感兴趣。美国公众同情古巴人，因而来自前线的消息非常受欢迎，很多有胆识的报社都派出了战地记者。这些报道几乎无一例外地夸大对古巴领导人品格的描述和获胜的希望，并抨击西班牙的镇压政策。

1895年，起义者开展了一系列恐怖活动，破坏了反独立者田地里的甘蔗，并烧毁了他们的糖厂。为了保护反独立者和镇压反政府武装，1896年，西班牙摄政王后派瓦莱里亚诺·韦勒将军前往古巴，并下令结束战争。瓦莱里亚诺·韦勒集中力量反击起义者的破坏行动。由于无法将忠诚于西班牙政府的古巴人与不忠诚的人区分开，或者阻止后者帮助叛军，他把可疑分子聚集到大型集中营里，用哨兵和铁丝网在驻扎的城镇和村庄筑起防御工事，并尽力减少防线之外区域的人口。这一代美国公众没有见过战争场面，现在被古巴集中营里的苦难震惊了，在道德层面对西班牙提出抗议。1896年和1897年，美国人对起义者的同情与日俱增，并通过“黄色”报纸散布并夸大苦难和残暴的故事。这些证据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而且往往描述的并不是事实，但它在引导公众舆论干预事件上却十分有效。

在这场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争论中，美国政府因为中立执法而惹上麻

烦。当时的战争并没有公开，因此西班牙在进入真正的古巴水域之前，无法扣押或检查美国船只。突破西班牙的封锁向起义军提供补给并不难，而且这也是经过允许的交易。策划、组织并出兵抢夺补给也很容易，但这样做极不合法，美国试图阻止这一行为。据了解，美国阻止了七十一次袭击中的三十三次，而其他国家，包括西班牙在内，也只截获了十一次。不断被运送上岸的物资极大地帮助了古巴人，也引起西班牙对美国的不满。针对公民的不友好行为，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发布公告，并极尽所能对其执法，而公众和陪审团却同情那些违法的人。因为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坚持中立，即使在国会也没有得到什么支持。



摄政王后与她的儿子阿方索十三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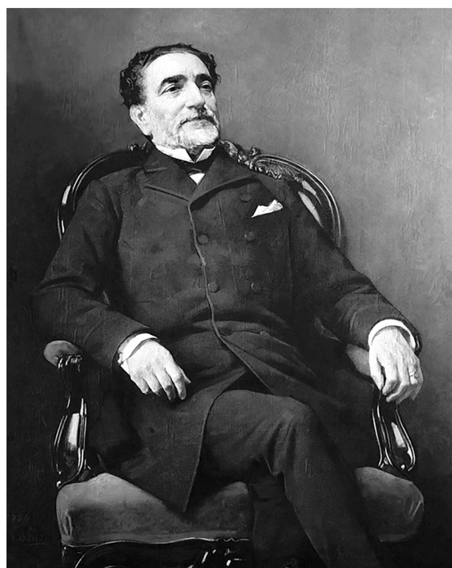
瓦莱里亚诺·韦勒

国会感受到美国民众对古巴人民的同情，并对此做出回应，也对在古巴投资的美国人的要求做出了回应。1896年春，两院达成一项决议，承认古巴的交战状态。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却驳回了这项决议。1896年12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报告了一项关于承认古巴独立的决议。国会个别议员经常从报纸上读到关于恐怖事件的报道，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要求承认古巴独立并调停战争。但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一直控制着局势直到卸任，就像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对待十年战争以及“弗吉尼厄斯号”事件 [1] 那样。他把最终调停的时间和方式的选择留给了自己的继任者。

1896年，一项共和党纲领主张美国有责任“利用其影响力和良好的政府职能帮助古巴恢复和平与独立”，但没有证据表明威廉·麦金利总统在组其内阁时曾考虑过强制介入古巴独立。任参议员时，约翰·谢尔曼曾发表自由言论对古巴表示同情。任国务卿时，他从马德里召回了汉尼斯·泰勒，并派出了斯图尔特·林登·伍德福德将军，指示他寻找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直到1897年秋，古巴问题才得以提上日程，因为西班牙经历了两次内阁更迭，古巴首相被谋杀。1897年9月底，西班牙政府得到消息：威廉·麦金利总统希望在1897年12月的会议上向国会做出积极的和

平保证。

1897年10月，在圣巴西德·马特奥·萨加斯塔领导下，西班牙自由党政府牙成立。该政府拒绝美国调停，反驳道，如果美国保持中立，那么战争很快就会结束。西班牙召回瓦莱里亚诺·韦勒，派出了一个更加温和的新总督，修改了曾激怒美国的内部命令。1897年11月25日，西班牙政府为古巴建立自治制度。1897年冬，西班牙政府尽力不为美国干预提供任何借口，同时采用温和手段恢复古巴和平。在古巴的西班牙人反对自治政策，最后自治政府的建立演变成一场闹剧。1898年1月，一些忠于西班牙的古巴人在哈瓦那发动暴乱。在西班牙的边界之外，起义军嘲笑自治政策，他们下定决心为独立孤注一掷。与西班牙政府保持联系的斯图尔特·林登·伍德福德认为，从长远来看，西班牙人民会让摄政王后从自治走向独立，而不久古巴可能会从西班牙的控制中解脱出来。



圣巴西德·马特奥·萨加斯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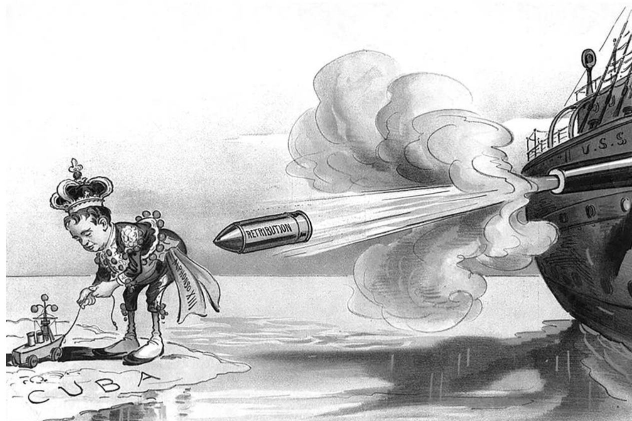
1897年12月，国会还是没有任何积极的消息。到1898年2月，古巴的情况已经成了当时美国最引人关注的问题。《纽约杂志》得到并发表了一封西班牙驻美公使恩里克·杜普伊·德洛姆的私人信件，这封信将威廉·麦金利描述成一个见风使舵的政客。这位公使刚被召回，一艘从北大西洋舰队分离出来的军舰——“缅因”号就被派往古巴保卫那里的美国公民了。1898年2月15日，“缅因”号在哈瓦那港被炸毁。没有证据表明“缅

因”号的毁灭和任何人有关，但报纸肆无忌惮地利用这一事件，并以“记住缅因”这样的字眼来煽动公众的同情和愤慨。1898年2月之后，美国政府只有坚定信念、鼓足勇气才能经受住介入古巴争端、挑起美西战争的代价。



“缅因”号驶入哈瓦那港

1898年2月至1898年4月，美国迅速采取行动，一直在与西班牙谈判。在西班牙的敦促下，威廉·麦金利总统没有对这起事件进行仲裁调查，但他希望尽快结束美国民众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为受苦的古巴民众提供救济，并争取古巴的全面自治。他并没有为古巴独立做出努力，而且提出的每个要求都是经西班牙同意的。尽管如此，1898年4月11日，他还是将古巴信件递交国会并要求进行干预，并把对局势的控制权移交给了这个两年来一直要求强行干涉古巴争端的机构。九天之后，国会做出决定：“古巴人民应享有绝对的自由和独立。”1898年4月21日，美西战争爆发。



“缅因”号被炸毁后创作的漫画：正在玩玩具船的阿方索十三世即将遭到报复

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在发出声明之前就开始为战争做准备。备战的海军规模虽小，但现代化程度很高。美国海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国会意识到陈旧的内战海军已经过时，并开始下令建造现代化战舰。1893年之后的几年，“白色舰队”逐渐成形。本杰明·哈里森总统离任时，服现役的军舰只有两支装甲巡洋舰，但军舰数量增加得非常迅速。到威廉·麦金利总统执政时，可以使用的战舰就包括二等战舰“缅因”号和“得克萨斯”号、装甲巡洋舰“布鲁克林”号、一等战舰“艾奥瓦”号、“印第安纳”号、“马萨诸塞”号和“俄勒冈”号。从威廉·麦金利执政开始，包括所有等级的轻量级战舰在内的战舰，都经过了重重演练和精心编排。美国海军部副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对美西战争早有预料，并全力支持这场战争。他把应急基金全部投入到射击训练。“缅因”号被炸毁时，美国海军的射击水平已经达到最高。1898年3月9日，国会在几小时内就给威廉·麦金利总统拨款五千万美元用于国防建设，海军部则将得到的份额用于新战舰的制造、运输和装备。在海军准将司令乔治·杜威的指挥下，远在香港的东方战舰也调动起来；在太平洋上待命的“俄勒冈”号接到命令后，绕哈恩角的漫长海岸线回国；在切萨皮克附近，大西洋上的战舰进行装备。后者的其中一部分作为一个机动作战部队在温菲尔德·斯科特·施莱的指挥下开始巡航。1898年3月底，威廉·托马斯·桑普森晋升为众多高级军官之首，并受命指挥整个北大西洋舰队，包括温菲尔德·斯科特·施莱的舰队。



西奥多·罗斯福



乔治·杜威

美国海军备战之时，国会正在就一项新的陆军法案进行讨论。直到1898年4月22日，国会才允许小型正规陆军扩增二万五千万人。到战争开始时，这些志愿者中约有二十一万六千人加入此次战争，他们不能被召回，也不能为即将面对的战场做好准备。战争的部分准备工作由美国战争部负责，但那些小职员已经习惯和平时期的日常琐碎工作，没有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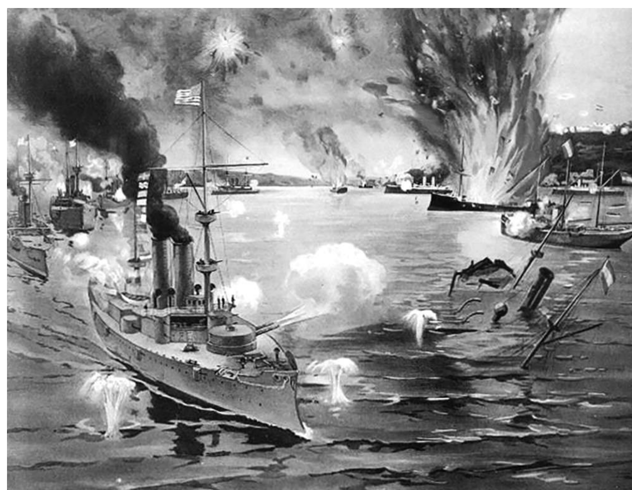
过任何扩大或调动军队的计划，所以备战工作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海军已经做好准备等待宣战，但陆军还没有做好列出作战计划、招募士兵、准备战服、完成训练等工作。只有等这些工作做好后，士兵才能赶赴前线。海军战士们深知责任重大，做了充分准备；但陆军成千上万的平民战士不得不为完全陌生的职责而胡乱应付。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接受了内布拉斯加团陆军上校的职位。西奥多·罗斯福辞去海军部的职务，组建了一支志愿骑兵团。政客们纷纷为自己和盟友在军队中争取职权。内战老兵为重新得到任命而战，很多南方邦联士兵们身着蓝色制服参战，或者派其子弟参战，这说明北方与南方之间的裂痕得到了修复。而战争开始两个月才集结起来的美国陆军显得热情有余而实力不足。

古巴是美西战争的起因和目标，也是整个战略计划的中心。美国海军的任务是保护大西洋沿岸不受西班牙舰队的攻击，而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西班牙舰队比美国舰队实力更强。在陆军方面做好进攻古巴的准备之前，美国海军必须维持对古巴的封锁，并阻止敌人增援部队登陆。乔治·杜威指挥的太平洋舰队接到命令，消灭菲律宾群岛上的西班牙海军，便立即从马尼拉出发。这时，英国宣布将对美西战争保持中立，乔治·杜威的舰队不能在香港水域停留了。

经过重重堡垒，越过危险的水雷区，1898年5月1日一早，乔治·杜威终于带领舰队到达马尼拉湾海峡。菲律宾群岛上的西班牙军队已经与当地的起义军开战，不到夜晚就全军覆没。乔治·杜威展开进一步战略部署，发现此时就是攻城的绝佳时机，并通知美国军方，在港口等待占领军的到来。做好准备后，占领军匆匆赶往旧金山，在韦斯利·梅里特将军的指挥下出发了。乔治·杜威俘获了菲律宾首领埃米利奥·阿吉纳尔多，并把他带回了菲律宾以煽动菲律宾人叛乱，埃米利奥·阿吉纳尔多因此遭到驱逐。1898年6月底，第一批美国援军抵达马尼拉。1898年8月13日，美军占领了这座城市。

在马尼拉意料之外的胜利消息传到美国之前，大西洋沿岸地区都在为西班牙主舰队不确定的作战计划而紧张。1898年4月29日，在海军上将帕斯夸尔·塞尔维拉·托佩特的指挥下，该舰队离开佛得角群岛，随时可能出现在纽约或波士顿。海军战略家们断定，西班牙主舰队一定会去西印度群岛的。沿海的国会议员们迫切地请求保护，而那些耸人听闻的报

纸则将海岸地区描绘成轰炸后的废墟。



马尼拉湾海峡战役，美军大获全胜



帕斯夸尔·赛尔维拉·托佩特

威廉·托马斯·桑普森和温菲尔德·斯科特·施莱接到保护海岸地区的任务后，要继续封锁海岸，并且要在帕斯夸尔·赛尔维拉·托佩特的舰队抵达美国水域的港口之前找到它。圣胡安、古巴圣地亚哥、西恩富戈斯和哈瓦那是该舰队可能的几个目的地。威廉·托马斯·桑普森留意着古巴北部和波尔图，而温菲尔德·斯科特·施莱和机动作战部队则转移到了基韦斯特，

1898年5月19日，开始在古巴沿海巡航。就在同一天，帕斯夸尔·赛尔维拉·托佩特却从古巴东端溜进了圣地亚哥港。当威廉·托马斯·桑普森得知他抵达基韦斯特的消息时，温菲尔德·斯科特·施莱已经出发。温菲尔德·斯科特·施莱坚信帕斯夸尔·赛尔维拉·托佩特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西恩富戈斯。

在古巴附近时，受运煤船和补给船拖累的机动作战部队故意转移到西恩富戈斯，在其港口之外停留了两天。此时，威廉·托马斯·桑普森下令让温菲尔德·斯科特·施莱立即前往圣地亚哥。1898年5月26日，温菲尔德·斯科特·施莱的舰队到达圣地亚哥港的入口，并在附近又逗留了两天。温菲尔德·斯科特·施莱却没有得到帕斯夸尔·赛尔维拉·托佩特在这里的消息。他担心煤会用完，或是海上风浪太大会阻碍运煤船给他提供补给。尽管已经接到命令，但重新考虑后，他还是决定回到基韦斯特。1898年5月29日星期日一早，他再次实行封锁，终于发现西班牙舰队就在此处的海峡停泊，并且已经在那里停留了九天。

当威廉·托马斯·桑普森听闻温菲尔德·斯科特·施莱决定离开圣地亚哥时，便自己带领舰队冲向那里。1898年6月1日，威廉·托马斯·桑普森到达圣地亚哥，加强了封锁。后来，两支舰队合并，温菲尔德·斯科特·施莱到了比他的级别更高的威廉·托马斯·桑普森的旗舰“布鲁克林”号上任职。白天，舰队沿着一个巨大的半圆路线巡查着港口狭窄的出口。到了晚上，舰队成员则轮流用探照灯看守入口处。五个星期以来，他们一直保持着这个状态，但没有进入港口，因为他们接到明确的命令不能冒失去任何作战部队的风险，要等待援军到来与他们一起对抗圣地亚哥的陆地防御。



“布鲁克林”号

1898年6月初，威廉·托马斯·桑普森向其上级请求军事援助。1898年6月7日，美国战争部下令从坦帕市调遣一支军队支援他。该军指挥纳尔逊·阿普尔顿·迈尔斯将军没能领导这次远征，而是被留在了美国。威廉·鲁弗斯·沙夫特将军则在现场指挥战斗。坦帕市面对的是几乎毫无希望的混乱局面。因为给军营运输供给的单轨铁路无法快速转移人员和弹药，所以军需部在没有提单的情况下用列车运送军需品。军队终于登上运输船队，在河上待了一个星期，才接到命令出发挺进圣地亚哥。1898年6月14日，大部分是正规军的一万六千名士兵以及近千名军官和两百名战地记者起航。1898年6月20日，他们与威廉·托马斯·桑普森会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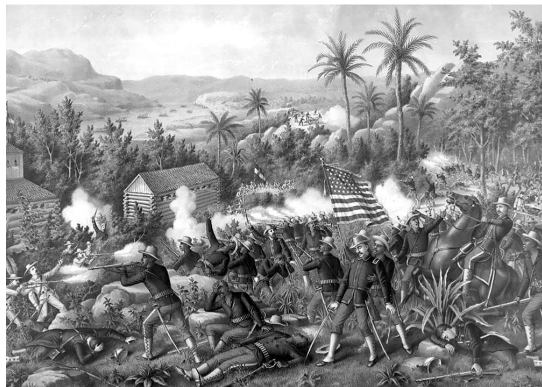
在这次会议上，有人对战略产生了误解。威廉·托马斯·桑普森认为美军可以直接登陆并沿着海岸线抵御港口密集的炮火。尽管威廉·鲁弗斯·沙夫特并没有发出这样的命令，但他还是决定向内陆进军圣地亚哥。1898年6月22日和23日，美国海军既没有备用小艇也没有驳船，因而选择登陆。第一批美军在达基里的铁路码头登陆，然后沿着西波涅海岸向西推进。每个团都独立地沿着通往圣地亚哥的丛林小道向内陆行进。威廉·鲁弗斯·沙夫特也拖着肥胖而病弱的身体随军行进。在陆地上形成对敌军的控制之前，1898年6月24日，该总队的先头部队就已经与敌人在距离圣地亚哥九英里的拉斯瓜西马斯交战。在伦纳德·伍德上校的指挥下，为了参加第一次战斗，西奥多·罗斯福担任中校的第一志愿骑兵团几乎整夜都在行军。在圣地亚哥激烈的交战之后，西军撤退，美军继续以一种更加有序的方式追击。

沿海的西波涅和圣地亚哥之间的狭窄小道大约有十二英里长，小道两边都是茂密的森林。1898年6月底，美军就沿着这条小道行军。那里几乎没有流动的野战医院或马车。如果他们人数再多一些，就更用不上这些了。前线的口粮用骡马运送。美军穿着正规军厚重的深色冬季服装赶赴热带地区，饱受酷热天气、雨水和口粮供给时有时无的折磨。在他们面前，圣胡安河直角穿过了这条小径。远处还有一些低矮的山丘，上面筑有圣地亚哥的防御工事、壕沟和铁丝网。西班牙军队在防御工事的后方可以利用一切有利的优势来战斗。在美军行军路线的右边大约五英里是在埃尔卡尼一个碉堡里的西军左翼。1898年7月1日前的晚上，美军经过商议采取计划，逆着整个西班牙军队的路线行进。

亨利·韦尔·劳顿带领右翼部队朝着埃尔卡尼的方向行进。他想攻下这个地方，把西班牙的左翼团团围住。纵队主力沿着这条小径穿过圣胡安河，冲向远处的山丘并发起猛攻。1898年7月1日，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美军在西军的战壕里睡了一觉，第二天又重新与敌人交锋。1898年7月2日和3日，发生了更多大大小小的战斗。在此之后，圣地亚哥被美军从陆地上包围，就像1898年6月1日它在海上被包围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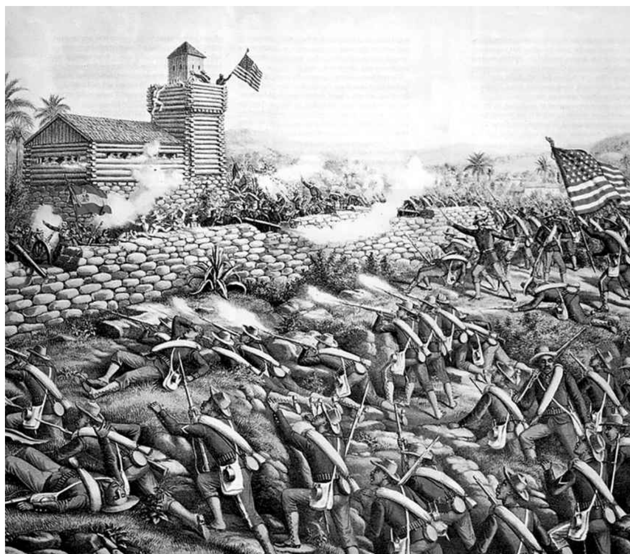


威廉·鲁弗斯·沙夫特在达基里的铁路码头上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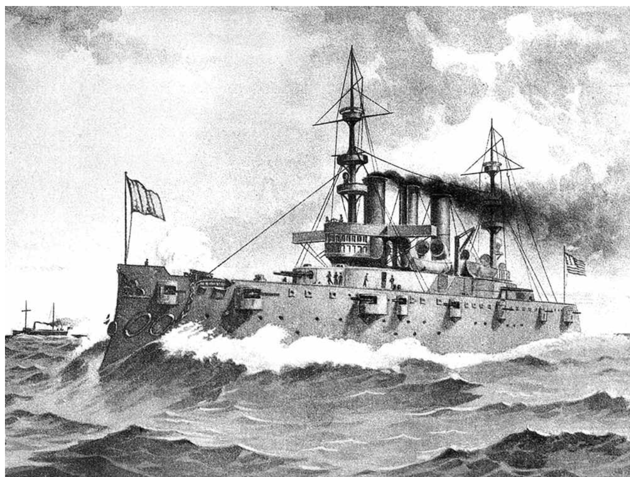
拉斯瓜西马斯战役

看着逐渐逼近的美军，帕斯夸尔·赛尔维拉·托佩特越来越绝望。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舰队的作战效率低下。他的舰队从西班牙起航时毫无准备，缺乏枪支弹药，士气低迷，仅因为公众舆论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如果他们继续留在港口很快就会被美军攻克，如果出海则会被威廉·托马斯·桑普森消灭。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冲出去，四散奔逃，搏搏运气。1898年7月3日，帕斯夸尔·赛尔维拉·托佩特带领舰队成一列纵队驶出港口，向西转向保卫美军左翼的“布鲁克林”号，试图逃跑。



圣胡安山丘战役

为防帕斯夸尔·赛尔维拉·托佩特出逃，威廉·托马斯·桑普森发出了战斗命令。与威廉·鲁弗斯·沙夫特协商之后，威廉·托马斯·桑普森带领着他的旗舰“纽约”号出海。到达港口入口东大约七英里时，他发现敌军舰队并开始战斗，并立刻沿着古巴海岸开始了对西班牙战舰漫长的追逐。帕斯夸尔·赛尔维拉·托佩特的目标——“布鲁克林”号没有逼近他，而是在他的右翼盘旋。在重新回到追捕战队的领头位置之前，“布鲁克林”号还差点撞上临近的“得克萨斯”号。温菲尔德·斯科特·施莱虽然是这场战役中的高级军官，但没有人需要听从或留意他对其他船只发出的命令。在日落之前，西班牙舰队就被全部歼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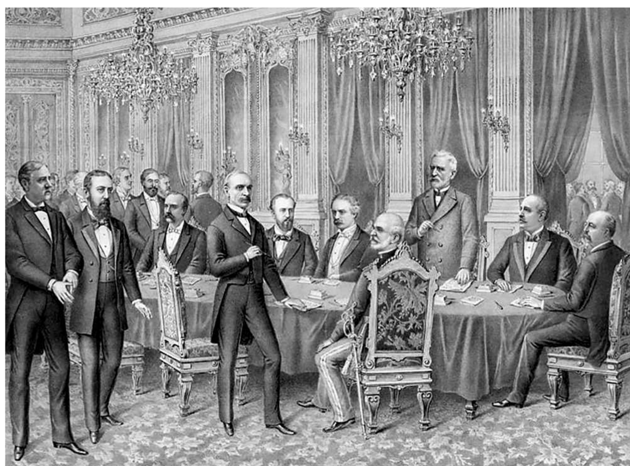
圣地亚哥登陆行动和海战使美西战争走向了终点。数周以来，美军持续进行封锁，士兵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士气开始低迷。1898年7月17日，圣地亚哥的西军投降。1898年7月27日，美军在纳尔逊·阿普尔顿·迈尔斯的指挥下进攻波尔图。1898年8月12日，法国驻华盛顿大使代表西班牙签署了初步和平协议。第二天，马尼拉沦陷，战争结束了，美国军队占领了西班牙剩余殖民地中最有价值的殖民地。

1898年10月，在巴黎西班牙和美国的和平专员会面，为解决后续问题奠定了基础。初秋，美国要求古巴恢复自由而无需赔款，并受美国监护，波尔图划归美国所有。是否将菲律宾列入美国的殖民地还有待商议，因为国内保守人士反对接纳外国殖民地，美国扩张领土的欲望受到了制约。反战人士描绘了帝国主义的恶劣影响，但把这些岛屿归还给西班牙比保留岛屿要困难得多。因此威廉·麦金利总统最终决定，割让地区必须包括菲律宾群岛以及莱德隆群岛上的关岛。美国专员的首领是威廉·鲁福斯·戴伊，在战争早期就接任约翰·米尔顿·海伊做了国务卿。1898年12月10日，在他的主导下，美国和西班牙签订了《巴黎条约》。

美西战争和对菲律宾的征服加速了美国对另一地区的和平扩张。自从19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开始在夏威夷群岛传教以来，那里一直都是美国的兴趣所在。在美国，依靠糖业生存的人群不断增长，一直希望兼并土地。1893年前不久，他们成功地进行了一场革命。本杰明·哈里森总统与临时政府达成了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曾拒绝批准的兼并条约。1898年7月7日，《纽兰兹决议》完成了对夏威夷共和国的吞并。1900年，美国在夏威夷群岛正式建立准州政府。“俄勒冈”号围绕着哈恩角的伟大航程重新唤起人们对地峡运河的渴望。美国人突然又有了扩张领土的想法，而对此很多媒体引用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在《白人的负担》中总结的一个关于责任的新概念。



“得克萨斯”号



《巴黎条约》签订现场



漫画《巴黎条约评述》：乔纳森兄弟（18世纪英国士兵对美国民兵的谑称）挑选了一个被限制了自由的西班牙人的口袋

美国国内的争论似乎一下子从自由铸造银币转到了战争和征服的主题上来。1898年年底，美国战争部几乎在战争的每一个阶段都暴露出不足。时局变化使它不得不临时为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制订殖民政策，并引导古巴走向独立。战争部仍然由拉塞尔·亚历山大·阿尔杰指挥，但由于战争备受争议与批评。1899年，拉塞尔·亚历山大·阿尔杰被勒令退休，纽约州的伊莱休·鲁特接替了他的职位，美国战争部完成了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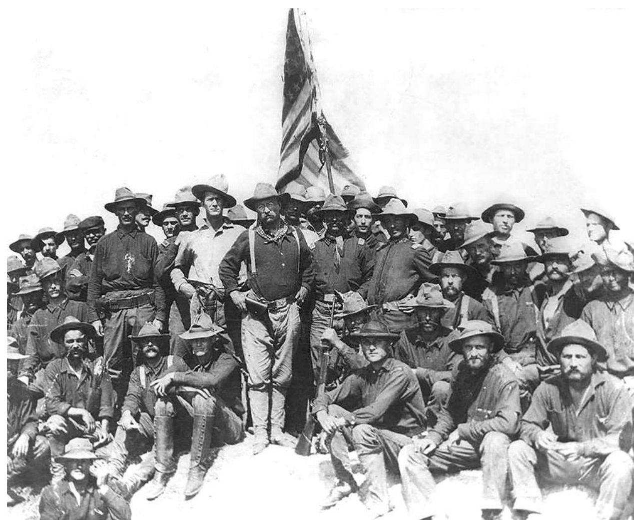
[1] “弗吉尼厄斯”号事件是十年战争期间，1873年10月到1875年2月，美国、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发生的一场争端。古巴起义者租用美国快船“弗吉尼厄斯”号运送军队及军需物品以反抗西班牙统治，后为西班牙捕获。西班牙以海盗罪处决了五十三名船员（多为美国人和英国人），直到英国政府介入才停止。——译者注

第17章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

美国人就战争、拉塞尔·亚历山大·阿尔杰和威廉·鲁弗斯·沙夫特的能力、军粮供应和野战医院、威廉·托马斯·桑普森的失败和与威廉·鲁弗斯·沙夫特的合作、温菲尔德·斯科特·施莱的战术和所谓的弱点、威廉·麦金利外交的诚意等问题展开了无休无止的辩论。在这些可耻的辩论中，只有一个名字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唯一能吸引士兵参与政治、寻求晋升的就是西奥多·罗斯福。那时，他还不到四十岁。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积极进取。1880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西奥多·罗斯福进入了动荡的纽约州政坛。当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还是州长的时候，他就主张立法改革。1884年，他是与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竞争总统提名的对手之一。他并没有为自己拉选票，也没有进入超然派，因为他已经形成一种政治哲学，即只有坚定留在党内的人才有能力进行改革。但他选择辞职，在西部开始了牧场生活。后来，本杰明·哈里森总统任命他为文职机关事务专员，并支持他用文官录用制度严格管理相关事务。1895年，在离任原职就任纽约市警察局长之前，西奥多·罗斯福对政治腐败进行坚决有力的打击已经成为他作为新改革家的标志。他始终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政治家和共和党人，从来没有丧失过对改革的兴趣。作为警察局长，他赢得了新的声誉和更多的支持者。1897年，西奥多·罗斯福担任海军部副部长一职，为发动战争做准备。他还抽出时间写了许多关于美国西部、改革、海军历史和户外生活的书。1898年4月，战争前夕，他辞去原有职务，组织志愿骑兵团，公众很快将其命名为“莽骑兵”。战争期间，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表现英勇的志愿骑兵团。1898年秋，西奥多·罗斯福冒着违反所有学科理论的风险抨击政府的卫生政策。1898年10月，尽管托马斯·科利尔·普拉特公开反对，西奥多·罗斯福还是获得了共和党纽约州长的提名。

在1898年的竞选中，作为候选人的西奥多·罗斯福来到纽约州各地的选民面前，日复一日地站在讲台上演讲。西奥多·罗斯福的政党和身着制服的“莽骑兵”强化了他的善政主张和爱国热情。1898年11月，西奥多·罗斯福当选纽约州长，同一天，共和党对国会的控制也得到了保证。这

样一来，共和党就有可能履行1896年选举时所承诺的最后一项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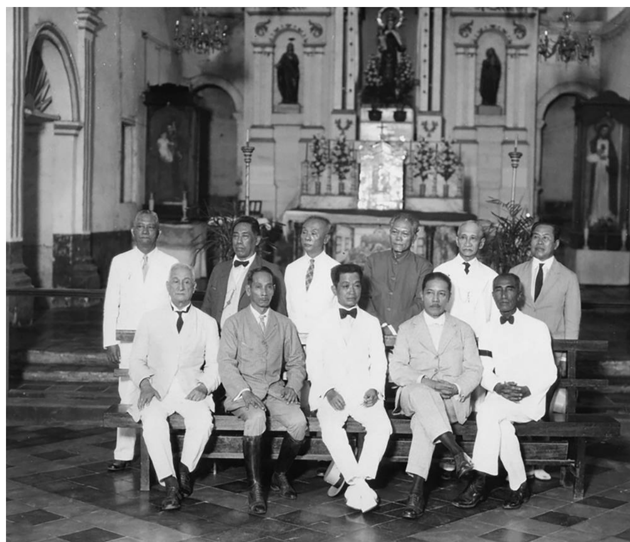
西奥多·罗斯福与“莽骑兵”

1900年3月通过的《金本位制法案》就是共和党努力的结果。它依法将黄金美元作为本位货币，建立了一亿五千万美元的黄金储备，并将维持黄金价值列为财政部的一项职责，用于兑换内战时期三亿一千三百万美元的绿背纸币、五亿五千万美元的白银和银元券、七千五百万美元的《谢尔曼白银采购法》国库券以及1900年国家银行发行的三亿美元纸币。这项货币法案远不能令人满意，它依赖于赎回政策，容易导致价值的突然变化。但这项法案消除了人们对自由铸造银币的恐惧。



漫画：金本位凯旋

1900年春，国会不得不考虑殖民政府的基本问题。自夏威夷和波尔图建立了准州政府之后，美国也准备在菲律宾群岛建立类似的政府，但因为一场叛乱而受到阻碍。在美西战争爆发之前，这些岛屿上的当地人发动叛乱，使美国更容易推翻西班牙的统治。这些岛屿不像古巴那样得到了独立的保证，而是成为美国的领土。1899年2月，在当地领导人埃米利奥·阿吉纳尔多的带领下，一场针对美国的暴动爆发了，获得了很多美国人的支持。美国镇压菲律宾独立势力刺激了反对兼并这些岛屿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菲律宾的共和体制和美国其他外国殖民地格格不入。统治阶级专政的负面影响和罗马帝国灭亡的教训都摆在公众面前。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是此次抗议活动的领导者之一。他的追随者包括许多在倡导关税和文官制度改革方面的著名人士。1901年，美国最高法院支持了领土扩张和帝国控制的合宪性。事实上，早在1900年，它就根据自身利益做了决定。



埃米利奥·阿吉纳尔多（居中坐者）与同僚

在1900年的竞选中，所有提名都毫无争议。1896年，威廉·詹宁斯·布莱恩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确立了领导地位。尽管保守派民主党人仍然不信任他，但被民众对他诚实和仁慈的认可所淹没。在堪萨斯城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约翰·彼得·奥尔特盖尔德说道："四年前，我们不再走中间路线，不再使用具有双重含义的语言。我们带着坦诚赋予的力量来参加美洲大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竞选活动……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美国民主第一次如此一致地支持一个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以重复1896年货币改革需求并谴责帝国主义的政治纲领得到一致提名，阿德莱·尤因·史蒂文森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得到提名。

对帝国主义的强烈谴责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和阿德莱·尤因·史蒂文森得到一群独立人士的支持，也就是共和党媒体所称的"牵着你的鼻子投票"团体。他们强烈支持金本位制度，但认为货币政策没有帝国主义的问题重要。共和党认同美西战争，认为美国在战争中存有善意，并在费城毫无争议地重新提名了威廉·麦金利。副总统加勒特·奥古斯都·霍巴特在任时就去世了，否则他很可能还会得到提名。作为替补者，西奥多·罗斯福因为谣言的攻击而名誉受损。参议员托马斯·科利尔·普拉特则不愿让他再次竞选纽约州长，鼓励他努力竞选副总统。1900年春，西奥多·罗斯福曾多次宣称他不会争取或接受副总统候选人提名。马库斯·阿朗佐·汉纳和威廉·麦金利不希望西奥多·罗斯福得到提名，但代表们在大会上力排众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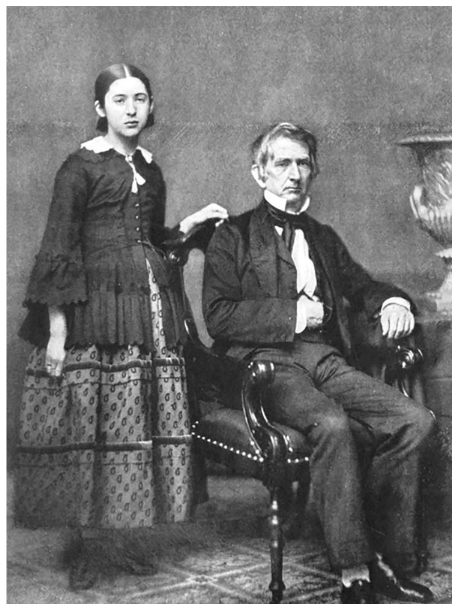
使他不得不接受这项提名。

1900年，威廉·麦金利延续了自己在1896年维护美国尊严的设想，其副总统候选人则表现出与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一样的游说能力。在几乎遍及所有州的数百次演讲中，他们向选民们展现了自己的个性。帝国主义和自由铸造银币这两个问题将选民划分为不同阵营，但政府在各个方面给商业复苏提供了经济基础。共和党人因为国内普遍出现繁荣景象而受到赞誉，支持共和党的漫画家则强调了"满满的饭盒"这一概念作为继续支持他们的理由。与1896年相比，1900年，竞选者的议题并不明确，公民参与投票的比例较小。对两位候选人不满的许多选民把选票投给了禁酒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最后，共和党候选人得到二百九十二张选举人票当选，而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和阿德莱·尤因·史蒂文森获得了一百五十五张选举人票。同时，共和党对国会的继续控制也得到了保证。

继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之后，威廉·麦金利成为又一位获得连任的总统。1901年，他的内阁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伊莱休·鲁特留在美国战争部，他拒绝考虑副总统一职，致力于整顿菲律宾、古巴和美国军队的秩序。国务卿约翰·米尔顿·海伊一直与有关中国的反叛势力存在信件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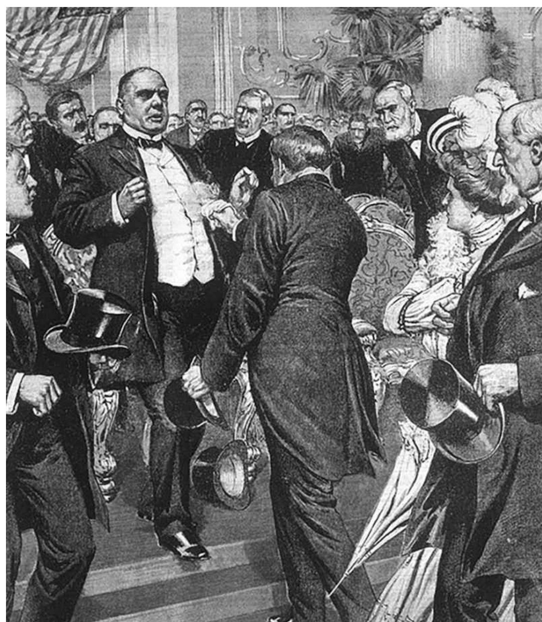
成功的美国外交部长中，只有威廉·亨利·西华德和约翰·昆西·亚当斯能与约翰·米尔顿·海伊相提并论。1838年，约翰·米尔顿·海伊出生在美国的中西部，整个内战期间都担任林肯的私人秘书。在此之后，他接受了一些不太重要的任命，并经常在文学作品中引用他的外交经验。《亚伯拉罕·林肯传》就是他其中一部不朽的作品。他优美的诗句吸引了众多读者。他匿名发表的小说《养家糊口的人》是研究早期劳工运动的重要文献。1897年，威廉·麦金利总统派约翰·米尔顿·海伊驻伦敦担任大使，而按照惯例只有美国精英才能去圣詹姆斯法院任职。1898年秋，威廉·麦金利总统将他召回担任国务卿。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首次为美国的新外交提供了机会。美国一直都致力于实现它的国际理念，这次事件让因为美西战争而变得狭隘的美国外交得以扩大。在约翰·米尔顿·海伊的领导下，美国进入中国解决争议，镇压义和团运动，同时打开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大门。当威廉·麦金利总统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刺杀的时候，约翰·米尔顿·海伊还在忙着交涉。1901年9月14日，西奥多·罗斯福继任

美国总统。



威廉·亨利·西华德与女儿

在威廉·麦金利总统去世的布法罗住宅，西奥多·罗斯福仓促地举行了就职典礼，并宣布将继续完成威廉·麦金利总统未完成的任期。他坚持任用内阁的原有成员，继续先前的工作。他接手了前任总统搁置的工作。几个月来，从政党行政部门到个人行政部门，变化并不明显。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富有进取心，与威廉·麦金利一样和蔼可亲、热忱宽容。通过约翰·米尔顿·海伊娴熟的政治技巧，美国新的政治氛围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政治，超越了自乔治·华盛顿提出中立原则以来任何一位总统执政的时期。



威廉·麦金利被刺杀

古巴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在伦纳德·伍德将军的领导下，美国军队彻底整顿了这个岛屿。当地的医疗机构已经学会驱蚊，并抵抗了黄热病的侵袭。1902年5月20日，古巴人制定的宪法生效。也是在这一天，美国撤出了这个国家，让其自行管理国家的事务，条件是古巴须承诺永远保持独立，并且不会在没有任何解决方案的情况下陷入债务危机，而美国将依法干预古巴事务以维护其独立性及其政府职能。1901年到1902年之间的冬天，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敦促国会采取与古巴商业互惠的政策。他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古巴和美国糖业托拉斯官员的支持，但在参议院却遭到了由甜菜糖业大亨支持的共和党和甘蔗糖业大亨支持的民主党的共同反对。1902年，这一措施没能实现，并且造成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国会之间的矛盾。到了1903年，修改后的互惠条约得到了批准。



总统任上的西奥多·罗斯福

1902年，在海牙，美国成为第一个试验新仲裁法庭效力的起诉方。1898年，在圣彼得堡，俄国沙皇邀请各国代表参加裁军会议。他的动机受到了质疑和嘲讽。1899年夏，在位于海牙豪斯登堡荷兰女王的夏宫，该会议得以举行。在这次会议上，裁军计划被证明无效，但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都接受一点，即应为解决国际争端而达成一项条约。海牙法庭很有可能会因为不被重视而取消。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应一位和平倡导者的请求，向该法庭提交了一个很小的案子请求仲裁。这是一起墨西哥和美国之间有关虔诚基金的纠纷案，涉及加州教会基金的控制权。在这起诉讼中，美国最终获胜，但它的重要性在于这是第一起由海牙法庭仲裁的案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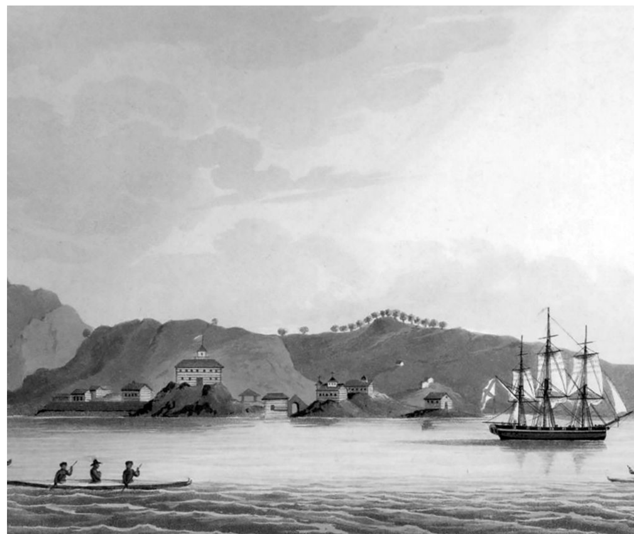
当另一个拉丁美洲国家陷入麻烦时，美国在古巴独立时做出的承诺却没有兑现。因为战争，委内瑞拉陷入对欧洲债权人的债务，并且迟迟未能偿还。1902年12月，为了报复，英国和德国宣布对委内瑞拉的港口进行封锁，很快其他国家也加入英德的行列。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称要在此次事件中保护委内瑞拉，并敦促欧洲索债者停止使用武力而采用仲裁来解决该问题。在他的领导下，联合委员会终于成立，并且在1903年，将相关法律依据提交海牙法庭。这个小插曲涉及对门罗主义的一种新的解释。这种解释清楚地表明，除非美国想要帮助南美国家逃避债务，否

则它必须要为这些国家真正地解决债务问题而承担一些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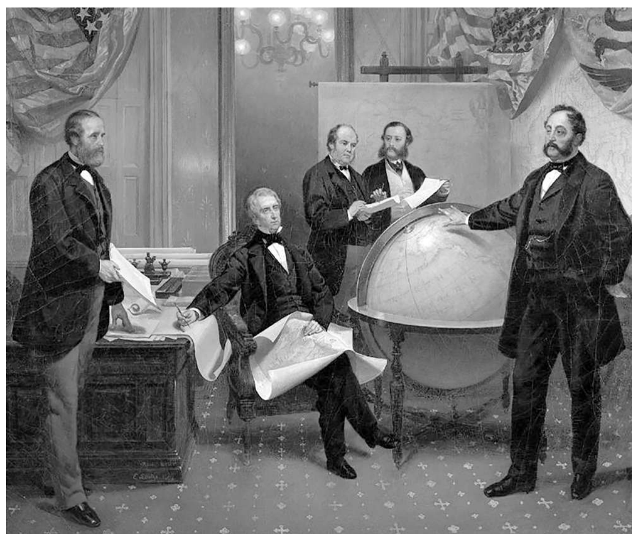
漫画：在荷兰女王的夏宫举行的裁军会议

接下来，阿拉斯加的边界问题成为仲裁的对象。自1897年夏育空地区出现第一波移民热潮以来，当地的采矿营地变得越来越重要。其中，许多营地位于西经141度靠近加拿大的一侧，所有营地通过乘坐内河汽船或从南方走小路就可以到达。通向该地区最重要的入境口岸是位于林恩运河源头的戴亚和斯卡圭。而林恩运河是一个长约九十英里通向大陆地区的狭长海湾。采矿者从这些港口进入内陆，爬上了契尔库山口或奇尔卡特山口，再沿着几条陆路小道就进入了育空地区高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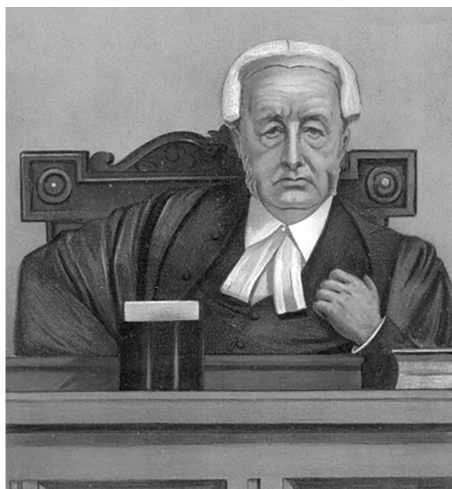
林恩运河

戴亚和斯卡圭口岸的重要性重新引起人们对其所有权和阿拉斯加边界问题的关注。1867年，当威廉·亨利·苏厄德买下阿拉斯加时，阿拉斯加的边界是1825年由俄国和英国通过条约划定的。当时，阿拉斯加的边界线是从圣埃利亚斯山西经141度到北冰洋，东南部沿着不规则的海岸线从圣埃利亚斯山到太平洋北纬54度40分。这条狭窄的海岸边界线被描述为“沿着蜿蜒海岸的线”，如果海岸上有山脉限制的话则以山脉为边界，但在任何情况下边界线都不得超过三十英里宽。狭窄的林恩运河穿过了三十英里宽的边界地带，因而争论主要集中在：运河是否应该看作边界必经的海岸蜿蜒地带，或者看作一条边界可以跨过的溪流。



购买阿拉斯加时的签约现场，中间坐者为威廉·亨利·苏厄德

1867年之后的三十年里，英国和加拿大制定地图把林恩运河和其他类似的峡湾划归美国。但在1897年之后，加拿大为了方便提出该边界应该跨过运河，把戴亚和斯卡圭划归英国。1898年，加拿大和美国联合高级委员会召开会议也无法调和争议。1903年，阿拉斯加的边界问题提交给伦敦法庭来裁决。可疑的是，作为签订条约必备条件的“著名法学家”，三位审裁员伊莱休·鲁特、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乔治·特纳都来自美国。但美国法律顾问提出论点说服了首席法官——英国仲裁员阿尔弗斯通子爵[1]。他的一票加上美国的三票使裁定的结果满足了美国的要求。



阿尔弗斯通子爵

在海牙、古巴和委内瑞拉的问题上，以及阿拉斯加边界争议的问题上，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约翰·米尔顿·海伊第一时间表现出一种坚定而合理的态度，吸引了欧洲人对美国外交的关注。这是前所未有的。美国外交成为美国大学一项热门研究主题。英国和德国似乎希望与美国和解。德国皇帝在美国买了一艘汽艇，派他的兄弟普鲁士亨利王子参加下水仪式，并派一位德国贵族做驻美公使，长期以来，这位公使一直是美国总统的私交好友。虽然美国的坚定态度得到了认可，但在接下来涉及哥伦比亚巴拿马州的事件里，美国在公平方面却备受诟病。



1898年，“俄勒冈”号的危险航程坚定了美国建造地峡运河的信念，此时，《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已经不能满足实际需要。1880年左右，斐迪南·德·雷赛布和他在巴拿马的法国公司引出这一问题，但当时因为一项条约，美国对运河的修建与控制权受限。直到1899年秋，在威廉·麦金利总统的指示下，约翰·米尔顿·海伊进行谈判，这一情况在得以扭转。1900年2月5日，国会就尼加拉瓜运河项目进行辩论。约翰·米尔顿·海伊和庞斯福特勋爵 [2] 签署了一项条约，将运河开放给美国修建，但前提是要保持该运河的中立状态。该条约规定，禁止修建方在运河上设防御工事，也不得将运河用作战争工具。该条约因为参议院的介入而终止。1901年11月18日，约翰·米尔顿·海伊与庞斯福特勋爵又签署了第二项条约，除了运河使用者均享有同等待遇以外，英国放弃了之前所有的权利，并将未来的航道修建问题留给美国的自由裁量权。参议院立即批准这一条约，并迅速完成修建路线和方案的调研。



庞斯福特勋爵

在第二项《海伊-庞斯福特条约》签订时，1899年建立的美国地峡委员会正准备对其指定的运河路线作调查报告。最后，实际可行的路线只剩两条，一条位于巴拿马，另一条从尼加拉瓜经过。第一条路线在法国公司的控制之下。因为该公司有特许权，价格定得过高，所以委员会

建议采用总体上更加可行的尼加拉瓜路线。一开始，美国国会非常支持这一路线，但在1902年，这一倾向被削弱了。参议员马库斯·阿朗佐·汉纳更支持巴拿马路线，并努力为之争取。由于害怕尼加拉瓜路线更受青睐，那家法国巴拿马公司不得不降低价格。马提尼克岛的地震和火山爆发提醒世界，尼加拉瓜比巴拿马更接近活跃的活火山地区，因此更加危险。1902年6月，国会授权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选择巴拿马路线，并立即开始修建运河。

美国与哥伦比亚关于在巴拿马修建运河权的谈判从1902年拖延到了1903年。受长期革命的影响，哥伦比亚意识到在地峡修建航道才是它最有价值的投资。经过了漫长的讨论，哥伦比亚政府授权其驻华盛顿大使签署了一项条约，保留哥伦比亚对地峡地带的主权，但赋予美国修建运河的特许权。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应支付一千万美元的现金和二十五万美元的年金。1903年1月，该条约在华盛顿签署，并被认为是约翰·米尔顿·海伊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外交胜利。尽管尼加拉瓜路线的支持者反对，但1903年3月，该条约还是得到美国参议院的批准。但哥伦比亚国会拒绝这项条约并宣布休会再议。

1903年秋，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决定采用巴拿马路线。那家法国公司也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承接这一项目。而生活在地峡地区的哥伦比亚人急于结束谈判，尽早挖掘运河。1903年10月，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写信给他的一位密友，希望能有一场针对哥伦比亚地峡的起义，但他否认他有任何挑起事端的意图。这位朋友以自己的名义公开了该信内容，但在这封信印刷出来之前，起义就发生了。美国国务院提前得知了这一事件。1903年11月3日，国务院发出电报询问起义发动的时间。这一天晚些时候，巴拿马共和国宣布独立。美国阻止了哥伦比亚的武力镇压，通过电报承认巴拿马作为新的国家出现。1903年11月18日，在华盛顿，美国与巴拿马签署了运河特许权授予条约。几年后，当评论家们指责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政策无异于对弱小邻国的趁火打劫时，他自豪地说道：“是我成就了巴拿马。”



开凿巴拿马运河的工人

外交的纠葛厘清后，运河迅速开始修建。卫生、劳工、物资以及工程等突发问题得到及时而有效的解决。国会毫无顾忌地向该项目注入了大量资金。1914年，第一批船只通过了水闸。1915年，在地峡地区和旧金山的博览会上，美国以海军队伍游行的方式庆祝运河正式开通。

在管理国内事务和发展对外关系方面，美国有着充沛的精力和明确的目标。国会保证两者同步发展，但前者的发展成果没有后者那么引人注目。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做出的任命就像在文官委员会任职六年的人期望的那样。他们中很少有人因为改革受到诟病。在南方舆论的围攻下，特别是在密西西比州印地安诺拉邮局黑人女局长和查尔斯顿口岸黑人收税员的事件中，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一贯坚持，联邦政府任命官员应该在各个地区选择有能力之人，机会之门绝对不能对黑人关闭。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刚就职几周后，在白宫款待布克·托利弗·华盛顿时，他就黑人地位展开激烈讨论。一些南方共和党领导人试图将黑人排除在政党组织之外以建立一个“纯白”的共和党机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因此训诫了他们。



巴拿马运河开凿现场

美西战争后，美国的行政职能范围迅速扩大。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行政部门的科学功能不断得到延伸，导致工作量增加，美国政府不得不设置新的职位。1880年，联邦文官人数为十万七千人，1890年，十六万六千人，1900年，二十五万六千人，1910年则达到三十八万四千人。西南部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开始进行科学开垦。

自大批移民涌向派克峰时期以来，密苏里河与内华达山脉之间的区域一直被认为不适宜居住。这一地区被称为“美国沙漠”，在地图册中被标注为一个到处都是沙子的干旱地区。1825年到1840年间，该地区成为印第安部落聚集地。在移民对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影响下，远西部的真实面貌才展露在更多人面前。但直到横贯大陆铁路建成后，许多居民才得以进入这一地区。从1889年到1890年，“综合”州加入联邦。至此，联邦已经接纳整个西北部和一半之前的沙漠地区。1896年，犹他州紧随其后。1890年之后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俄克拉何马迅速发展。1902年，这几个地区申请成立为州。

美国人口开始向遥远的西部迁移。这表明西部的广袤土地已经可以通过灌溉来发展农业。发展农业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美国的土地法也不鼓励这种做法。19世纪80年代起，美国出现对填海工程的需求。1889年，政府工程师调查了可以修建水库的地点。1902年，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与西部国会议员们一起努力，通过了《新土地开垦法》。通过该法案，位于干旱地区各州的土地销售收入成了用于建设大型公共灌溉工程的基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对大坝、隧道和沟渠的修建力度不亚于对纽约州铁路隧道和巴拿马运河的投入。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处理外交和行政问题上的积极表现使他受到了广泛而特别的拥戴。这一点在西部最明显。与此同时，有许多批评家并不相信总统的个人影响力能改变整个政府，并且怀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判断的可靠性。在个人争论中，咄咄逼人的却总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自己。职业政客对他的厌恶与敬畏交织在一起，因为他总能很快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建立私交。在威廉·麦金利总统的领导下，国会中各州代表控制了他们所在州联邦官员的任命权，因此他们个人的职位得到了保证；但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他们对任命权的控制不再有把握。在立法方面，国会议员们的不满情绪是建设性立法的一个严重障碍。



西奥多·罗斯福视察某工程施工现场

[1] 即理查德·埃弗拉德·韦伯斯特·阿尔弗斯通子爵一世（1842—1915），英国律师、政治家、高级法官。——译者注

[2] 即朱利安·庞斯福特男爵（1828—1902），也称朱利安·庞斯福特爵士，英国律师、法官、外交家。——译者注

第18章　大企业

1893年之前的几年是托拉斯问题形成和实验性的阶段，1893年的恐慌结束了托拉斯问题的第一个时期。这些年对资本组合和日益频繁的劳工组织活动的厌恶情绪不断累积。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暂时平息了反托拉斯运动，而经济萧条则遏制了全国各地近乎猖獗的投机行为。大萧条时期，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关税和货币问题。1897年左右，一个全面复兴的新时代拉开了序幕。

工业复兴的标志是工业范围的扩大，历史上每一个类似的时期都是如此。1837年的恐慌之后，铁路发展成为美国社会众多新活动中的重要一环。1857年的恐慌之后，制造业技术取得了极大的进步。1873年以后，电力开始应用于工业和通信的各个领域，为投资提供了新的方向。1893年以后，随着这些发展，首例无轨引擎——电车——成功运行，城市硬件设施、铁路和郊区住宅先后完成重建。1896年之后，美国民众的信心逐渐恢复。19世纪末，投机活动达到了高潮。

走向垄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托拉斯已经展现出盈利能力。19世纪80年代，通信技术的发展把人力和物力都聚集在了一起，而现在通信的发展远远超出当时人们的想象。在交通领域，恐慌之后，铁路得到了重组，但铁路的数量减少了，而铁路的控制权只落入少数人手中。

1900年，美国铁路全长十九万八千英里，主要由几个强大的铁路组合支撑。美国东部的纽约州中央铁路系统和宾夕法尼亚州铁路系统占主导地位。在美国西部，横贯大陆铁路网形成了新的交通基础。而当时最受关注的是爱德华·亨利·哈里曼对联合太平洋铁路的重建。1897年之后，他对自己的资产进行了重组。受地理位置和邻近铁路的影响，联合太平洋铁路被迫合并。从奥马哈到奥格登的交通依赖于从奥格登到旧金山之间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当拥有南太平洋铁路的加利福尼亚资本家控制了中央太平洋铁路之后，联合太平洋公司不得不单独开拓或购买市场，最后扩展到了俄勒冈州和得克萨斯州。19世纪80年代，杰伊·古尔德就开始对铁路进行整合。在1893年的恐慌之后，爱德华·亨利·哈里曼继

续进行铁路重组。他重建了主干线，提升了资产的价值和信用。1901年，他贷款购买了中央太平洋和南太平洋铁路、亨廷顿线和之后的哈里曼铁路系统以及从密西西比河到太平洋的两条完整铁路的控股权。这已经超出恶性竞争的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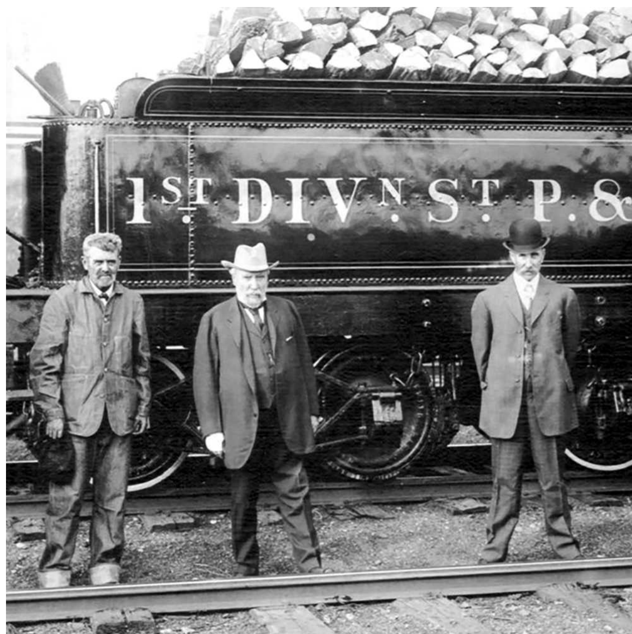
爱德华·亨利·哈里曼

1887年，《州际商务法》刺激了铁路的合并。根据该法规定，联营和运费协议均属非法。运费协议可能导致的另一种情况是恶性竞争，因为没有哪两条线路的实力是完全相等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实力较强的线路买下或租下实力较弱的线路，因为强线不可能和弱线合作，但可能完全买下它们。爱德华·亨利·哈里曼成功地购买了西南部铁路系统。1901年，他又尝试购买北太平洋铁路，但与另一群铁路所有者发生了直接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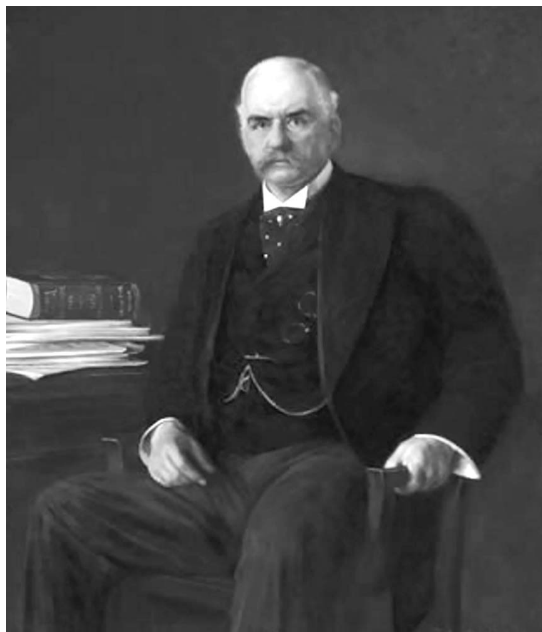
漫画：爱德华·亨利·哈里曼及其铁路受联邦法律和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管辖

1893年后，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詹姆斯·杰罗姆·希尔修建了大北方铁路，弥补了北太平洋铁路的不足。就像爱德华·亨利·哈里曼的铁路覆盖了西南地区一样，芝加哥铁路和伯灵顿-昆西铁路覆盖了西北部地区。在共同管理下，这些铁路的作用可能发挥得比互相竞争时更有效。当爱德华·亨利·哈里曼试图收购北太平洋的控股权时，大北方铁路和伯灵顿铁路的所有者詹姆斯·杰罗姆·希尔和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正在进行全面整合。他们努力争取整合铁路并取得了成功，但他们的竞争使其股票价格上升到每股一千美元，导致了1901年5月9日的证券交易恐慌。虽然只有投机者受到了恐慌的影响，但公众的注意力却被这种巨型组合形式所吸引。这些组合任意地控制着近一半的美国人。



詹姆斯·杰罗姆·希尔（中）与同事

1902年和1903年，小型的公司合并活动紧随其后，但没有一家公司像新泽西州的北方证券公司那样引起巨大恐慌。詹姆斯·杰罗姆·希尔和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决定将自己的铁路交由这家控股公司控制。任何一家公司的命运都可以由持股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东来决定。如果由另外一家公司控股，那么它拥有相似比例的股权就能控制全局。控股公司是一种机器。在这种机器中，资本可以控制几倍于它本身的资产。西北各州的州长们震惊于铁路的垄断，他们开始抗议并走上了诉讼之路，称这种合并说到底就是一场限制贸易的阴谋。1902年3月，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指示司法部长菲兰德·蔡斯·诺克斯试行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并根据该法提起诉讼以解散北方证券公司。1897年之后的几年里，外交事务和大企业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欣赏这些企业的宏大规模和相关活动，但现在大企业引起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国家的担忧。1903年，国会通过《埃尔金斯法案》，禁止铁路公司向所谓的优质客户提供回扣，还通过《考察法案》。以《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州际商务法》为依据的诉讼让司法之轮更快地运转起来。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菲兰德·蔡斯·诺克斯

与铁路整合一样，1897年，美国的工业整合又重新开始了。许多新公司采用了一种新的合并方式，标志着托拉斯的进一步演变。托拉斯早

期的目的是通过单一控制某一行业来消除竞争。石油、糖、钢铁、威士忌和烟草等行业是极端整合的典型例子。随着整合的增加，竞争逐渐改变了原有的特性。它不再意味着同一行业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而是不同生产工序之间的竞争。煤矿主们与冶炼厂竞争以获取更大利润，冶炼厂也以同样的方式与钢铁制造商竞争。对单个行业的控制并没有涉及这一新的竞争形式，但对大量相关工序的整合则有可能避免这种情况。

1901年，最大的综合托拉斯企业美国钢铁公司成立。自贝塞麦炼钢法[1]和其他用于钢铁制造的商业流程可用于铁路、桥梁和建筑工程以来，钢铁行业就一直在扩张。拥有数个匹兹堡工厂的安德鲁·卡内基是最成功的生产商。1901年，他合股经营的公司控制了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的美国成品钢产量。他已经涉足许多相关行业和不同的工业流程，但现在他却允许自己的工厂与竞争对手合并成一个大公司。应运而生的美国钢铁公司拥有并经营着矿床、矿井、煤田、地方铁路、蒸汽货轮、冶炼厂、高炉、轧钢厂和能够将钢铁加工成不同形状以用于销售的钢铁加工厂。该公司拥有新泽西州的经营许可证，注册资本为十一亿美元，引起人们对托拉斯工业阶段问题的关注，就像爱德华·亨利·哈里曼、詹姆斯·杰罗姆·希尔和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铁路托拉斯一样。



美国钢铁公司远景



安德鲁·卡内基（坐者右二）与各界人士的合影

1897年到1902年之间，数十亿的联合资本推动了新型托拉斯的发展。这些托拉斯的出现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恐慌。1898年，国会成立工业委员会。该委员会做了一份长达十九卷的报告，报告内容包含了非常重要的托拉斯历史。1899年秋，在芝加哥，一场关于托拉斯的会议召开，商界人士、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探讨了这场运动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上的可能性。在对托拉斯问题的讨论中，人们愿意听取而且可能会依赖专家的判断，这标志着美国公众对政府态度的转变。1902年，人们反复要求政府解决托拉斯问题。但对于托拉斯公司究竟是好是坏，或者它是否应该被政府废除、由政府监管或完全为政府拥有，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甚至美国在监管常规工业方面拥有什么权力也不确定。但最高法院判决的一系列案件表明美国还是拥有这种权力的。在跨密苏里货运案（1897）中，最高法院宣布《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适用于审理铁路领域的案件；在阿迪斯通管道案（1898）中，巡回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制定的一份反对工业联合的决议得到了终审法院的支持；1904年，始于1902年的北方证券公司案终于成功结案。很明显，只要国会愿意，托拉斯是可以通过法律得到控制的。

在工业和交通运输出现合并之后，劳工组织开始变得更加强大和团结，并表现出对集中控制的强烈不满。随着托拉斯的发展，罢工事件频发也引起人们对工业集中导致社会问题的关注。有时托拉斯公司会使劳工处于不利地位，1901年，联合协会发起针对钢铁公司的罢工。1892年，联合协会曾针对安德鲁·卡内基的工厂进行了一次大罢工，但最后失

败，也失去了公众的同情。联合协会的成员曾有过公开的暴力行为——一个无政府主义支持者曾企图谋杀安德鲁·卡内基的宅地代理人亨利·克莱·弗里克。1901年，罢工影响了钢铁公司的众多的联合工厂，但托拉斯公司只是关闭了相关工厂，并将未完成的合同转移到其他偏远的未联合的工厂。由于托拉斯公司高层的运作，罢工失败了。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比起钢铁公司罢工，对公众影响更大的是矿工们在宾夕法尼亚州无烟煤田的罢工。1900年，在美国矿工联合会的组织下，在约翰·米切尔的领导下，工人开展罢工运动。这一年，他们的罢工运动威胁政府做出让步，部分原因是罢工威胁到了政治环境的稳定和共和党人的竞选。这些矿主大部分都是共和党人，他们被马库斯·阿朗佐·汉纳等人说服结束了这场运动。



亨利·克莱·弗里克与女儿海伦·弗里克

1902年春，罢工再次爆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工人联合会的承认问题。整个夏天，约翰·米切尔召集他的追随者一起面对这个问题，并获得了公众对他事业的大力支持。1902年秋，双方固执己见，作为第三方的公众也开始关注罢工事件。因为担心冬天无煤可用，政治领袖和普通民众都感到惊慌。人们一致认为，公众的利益高于任何一方的主张，但现在既没有法律，也没有公认的机制让公众可以保护自己。1902年10月，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秘密地达成了在必要的情况下将"派遣美国军队占领煤田"的计划。他召集企业经营者和约翰·米切尔到白宫参加会议，并从普通公民有责任为公众服务的角度发表演讲。随着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舆论支持，企业老板们不得不同意对该问题进行仲裁。罢工者回到了工作岗位，他们非常满意总统的处理方式。无论是工人还是公众都认为现在美国工业的和平状态应该归功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

1903年，在克里普尔溪的矿山上，另一个矿工联合会——西部矿工联合会举行了一次大罢工。矿商和运营商代表了中产阶级的利益，但科罗拉多州的公众对其并不了解。随罢工而来的还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和暴力行为。恶意谋杀非联合会成员使罢工事件造成的痛苦升级，民兵抵抗和大肆逮捕都无济于事。工人中间存在的社会主义力量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经济目的，增加了罢工的复杂性。工人联盟领导人查尔斯·莫耶和比尔·海伍德都是社会主义者。对他们来说，罢工只是政治革命的开始。罢工

一直持续，直到愤怒的克里普尔溪市民组成警戒委员会，并将罢工队伍中的主要煽动者驱逐到堪萨斯州。



西部矿工联合会集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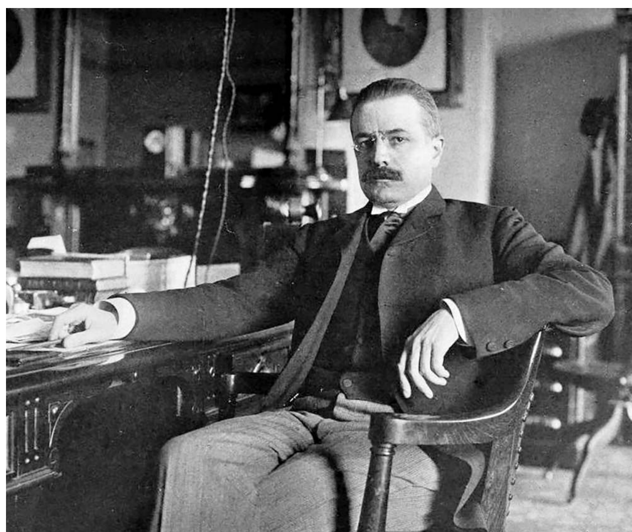
1897年以后，社会主义在劳工问题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1892年和1896年，社会劳工党的候选人获得了少量选票，但社会主义并没有对美国人的思想产生强烈的影响。在新的繁荣出现之后，不断膨胀的移民给社会主义带来了新的生机。1900年，社会民主党投出九万四千张选票支持尤金·维克托·德布斯为总统。1904年，这位候选人获得了四十万二千张选票。随着工业改革的深入，原先不满的阶级则变得更加富有凝聚力和建设性。



查尔斯·莫耶（左四）与比尔·海伍德（左五）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处理交通、工业和劳工问题坚决有力。他援引《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对抗北方证券公司，起诉部分托拉斯公司，并将这些托拉斯公司称为“不良托拉斯”，并强调并非所有的集中都不受欢迎。资本像劳工一样也有它自己的权利，但必须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影响，1903年，国会组建了新的商业与劳工部。乔治·布鲁斯·科特柳成为该部门第一任部长。通过该部门下属企业与劳工部门，对工业运动真相的调查有了新进展。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处理对外关系、干涉大企业、支持劳工事业的力度，导致他和党内许多领导人之间产生了裂痕。马库斯·阿朗佐·汉纳曾通过两场竞选活动鼓吹共和党是企业政党的理论，并吸引了所有支持这一观点或者认为其中有利可图的人的支持。许多共和党人无法理解西奥多·罗斯福做出的努力，或沉默或公开地表示反对他的政策。



乔治·布鲁斯·科特柳

许多共和党人利用马库斯·阿朗佐·汉纳的声望来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相抗衡。1896年之前，马库斯·阿朗佐·汉纳几乎没怎么参与过国家政治。自1897年进入参议院后，他开始发挥巨大的影响力。1900年，他开始在公众面前发表坦诚而富有影响力的演讲，足以抵消讽刺漫画对他形象的歪曲。1900年，他化解了无烟煤矿区的冲突，表示出对劳工问题的兴趣，并因此受到了公众欢迎。马库斯·阿朗佐·汉纳本质上是直率而诚实的人。他坚定地认为保护商业是政府的主要职能。在刚开始接触公共

事务时，他努力扩大公共事务的范围，并对资本的责任和劳动力的需求有了新的认识。1904年，唯一可以与西奥多·罗斯福相匹敌的人就是“马克叔叔”马库斯·阿朗佐·汉纳。

西奥多·罗斯福选择做副总统就是为了摆脱纽约州的马库斯·阿朗佐·汉纳。站在他与白宫之间的那个人被刺客夺去了生命，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西奥多·罗斯福坐上了总统宝座。1904年，他开始为自己的提名而努力了。从1902年夏开始，他越来越关注资本和劳工问题。1902年的一次巡回演讲给他机会向所有人宣扬“公平交易”以及监控托拉斯的观念。在西部的某些地区，有人提出通过关税处理托拉斯问题。

“丁利关税”在西北地区的农民共和党恶人中并不受欢迎。多年来，他们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关税政策，把它当作共和党对自己忠诚的考验。1902年，阿尔伯特·贝尔德·卡明斯州长带领着共和党自由派控制了艾奥瓦州代表大会，并要求修改极端的关税一览表。关税是“托拉斯之母”的说法蔓延开来。艾奥瓦州的建议得到了广泛支持。1902年，共和党组织在国会会议上坚定地反对任何打破关税壁垒的行为。

1902年春，古巴恢复自由，并在美国的主导下成立古巴政府。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认为自己有责任援助这个年轻的国家以及减轻“丁利关税”的压力，便在国会奋力争取对这两个问题立法。显然，他失败了，只提出一个新问题来敦促国会。在1902年夏的演讲中，他显示出修订关税政策的意向，而在1902年秋季对煤矿工人罢工的干预则表明他对资本控制的反对。他与党内其他领导人之间的裂痕究竟有多深还不得而知，但在1902年年底之前，他们“绝不让步”的坚持和对关税不作为的处理态度就已经显现出来。



阿尔伯特·贝尔德·卡明斯（左）与同僚

1902年，按照惯例，各州的共和党代表大会要求在1904年重新提名西奥多·罗斯福。无论他对党内其他领导人有什么影响，民众都很拥戴他，并且十分信任他，就连很多民主党人都支持他，这让许多人认为他的实力比以前更强了。他的候选资格得到了正式的授权，但他的对手们希望马库斯·阿朗佐·汉纳能听从他们的意愿打败西奥多·罗斯福。1903年，西奥多·罗斯福也得到了马库斯·阿朗佐·汉纳的支持。俄亥俄共和党代表大会最终确定了西奥多·罗斯福的候选资格。1904年年初，马库斯·阿朗佐·汉纳去世的消息打破了西奥多·罗斯福共和党内对手的最后希望。代表们参加了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而大会的所有议程都是由白宫安排的，包括指定伊莱休·鲁特为临时主席，而议长约瑟夫·格尼·坎农为常任主席。大会正式重新提名西奥多·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并选择印第安纳州的查尔斯·华伦·费尔班克斯为副总统候选人。

民主党方面，1896年和1900年选举中的主要力量已经不在其控制范围。1904年，遭遇两次竞选失败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不再是总统候选人，开始在美国各地针对各种政治主题发表演讲。1900年竞选失败后，他创立了《平民》周刊，并在该刊专栏中强调他的政治观点。西奥多·罗斯福采纳了他的许多重要观点。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像西奥多·罗斯福一样，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与自己党派领导人的关系并不和睦。民

主党的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派仍然认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在金融事务上的观点是危险和不健全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建议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作为候选人第三次参加总统竞选，但他坚决拒绝再次步入政坛，保守派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候选人。于是，他们选定纽约州法官奥尔顿·布鲁克斯·帕克。威廉·鲁道夫·赫斯特早就声名狼藉了，因为他名下的报纸最喜欢耸人听闻。这一次他也推荐自己为候选人。包括其他几位候选人在内的名单提交到了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尽管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强烈反对，奥尔顿·布鲁克斯·帕克还是获得了提名。当有人对他在白银问题上的立场产生怀疑时，奥尔顿·布鲁克斯·帕克在大会上表示，“金本位的地位坚固不可动摇”。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最终还是投票支持了奥尔顿·布鲁克斯·帕克和西弗吉尼亚州的亨利·加萨维·戴维斯，虽然这并不是他的本意。



1904年总统选举海报：西奥多·罗斯福（左）与查尔斯·华伦·费尔班克斯（右）



威廉·鲁道夫·赫斯特（右）与同事的合影

1904年的竞选活动中并没有出现导致明显分歧的议题。西奥多·罗斯福希望人们能支持他执政，并接受他“公平交易”的基本理论。但很明显，他党内的同僚并不像他那样对改革充满热情，而且其中一些人只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才支持他执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派的民主党人也更多地倾向于西奥多·罗斯福，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党候选人。很明显，奥尔顿·布鲁克斯·帕克代表着保守派的势力，而西奥多·罗斯福则代表着进取精神，但两者都不是他们所属政党的典型人物。奥尔顿·布鲁克斯·帕克是由进步派民主党人推举的，他们坚持要求对托拉斯进行监管；西奥多·罗斯福默许了共和党固守现状派的主张，并没有提倡降低关税。

选举结果证明了公众对西奥多·罗斯福的信任。他在南方各州、密苏里州和马里兰州都获得了胜利。他的普选票数超过了七百五十万，超过奥尔顿·布鲁克斯·帕克两百五十万票。在最后一周的游说中，奥尔顿·布鲁克斯·帕克指责托拉斯支持西奥多·罗斯福，而他对改革的要求只是装腔作势而已。他指出，接替马库斯·阿朗佐·汉纳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乔治·布鲁斯·科特柳曾担任过商务与劳工部长，因此他有资格审查各公司的账目。他暗示，他的对手有敲诈托拉斯的倾向，而许多支持他的文章更是直言不讳地斥责西奥多·罗斯福。在选举前的星期六，针对总统签名一事，西奥多·罗斯福愤怒地否认有敲诈一说。后来的调查证明，许多大公司按照惯例为竞选基金捐款，而西奥多·罗斯福当时曾鼓动铁路巨头爱德华·亨利·哈里曼为纽约州的竞选活动捐款。



奥尔顿·布鲁克斯·帕克（站在花车上左边）

选举结果一揭晓，西奥多·罗斯福就回应了众人众口相传的疑问。他的第一任期持续了三年半的时间，而且他即将迎来第二任期。他将总统任期限制为两届，将此视为一种“明智的惯例”，并表明自己的立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接受再次被提名为候选人。”

[1] 贝塞麦炼钢法是1855年由英国人贝塞麦试验成功的炼钢法，是指将空气吹入铁水，去除杂质、提高温度，以炼成液态钢的方法，这是在平炉炼钢法得到发展之前出现的首个廉价工业炼钢法。——译者注

第19章　黑幕揭发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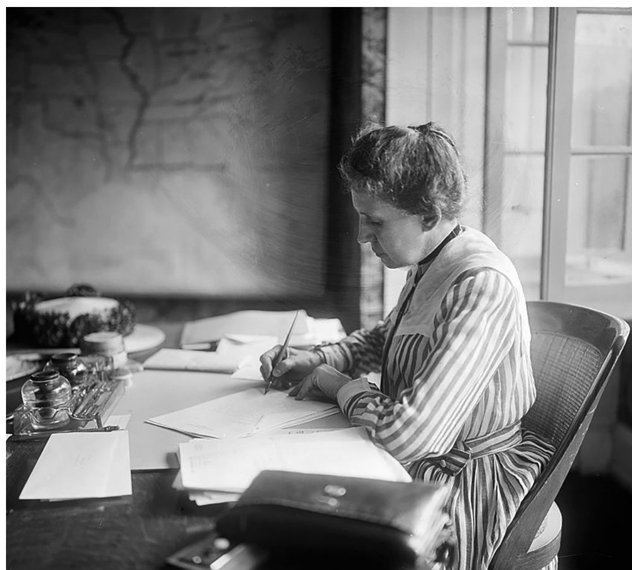
在西奥多·罗斯福第二任期宣誓就职之前，他和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以及其他公民美德的宣讲者就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宣讲全国“复兴”。后来，这场“复兴”席卷了全美国。随着铁路公司、企业和劳工通过合并和集中的方式越来越强大，托拉斯的威胁日渐显现，同时被夸大。人们认识到，巨大的经济利益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威胁到了公众利益。1889年到1897年之间，以建立“民治”政府为目标的政府机制改革再次启动。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存在一个邪恶的剥削阶级因而更加相信改革的力量。

仅仅将托拉斯运动解释为现代通信不可避免的发展方向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认为，托拉斯运动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演变，还倾向于把道德责任归于个人或个人群体身上。托拉斯带来一系列问题纷纷被揭露或曝光。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让公众愤怒有处发泄。反资本家统治运动再次爆发以反抗资本主义的压榨。

艾达·密涅瓦·塔贝尔是一名历史系的女学生，因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特殊的视角解读拿破仑和林肯的人生而获得读者关注。1903年，她在《麦克卢尔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标准石油公司历史的文章。她总结了运输业与石油业垄断之间的联系，揭露了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通过回扣来控制如油罐车或输油管道等运输工具从而建立巨型托拉斯的真相。她还展示了一种在各行各业都很常见的恶性竞争方式，但在垄断企业中，这种恶性竞争被放大了。不久之后，华盛顿·格拉登写道：“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一场新的灾难，深埋在这片土地下的罪恶终被揭开……我们发现，在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旗帜下，没有什么类型的社会能比民主社会更快地走向地狱。”

在艾达·密涅瓦·塔贝尔揭露托拉斯罪行三年前，耶鲁大学校长亚瑟·特文宁·哈德利就曾指出，社会排斥或社会污名可能会成为一种有效的改革工具。其他作家也使用了这个工具。林肯·斯蒂芬斯在一系列关于“城市耻辱”的文章中揭露了贪污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托马斯·劳森以极其夸张的手法将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归因于“疯狂的金融”。《科里尔周刊》

揭露了专利药品贸易中的卑劣手段和欺诈行为。许多揭露者也开始借小说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一本本公开发表的小说将他们所描绘的对象呈现在公众面前。温斯顿·丘吉尔所著的《科尼斯顿》写的是一个铁路公司老板如何控制一个州的故事。厄普顿·比尔·辛克莱在小说《屠场》中揭露了肉类企业主的罪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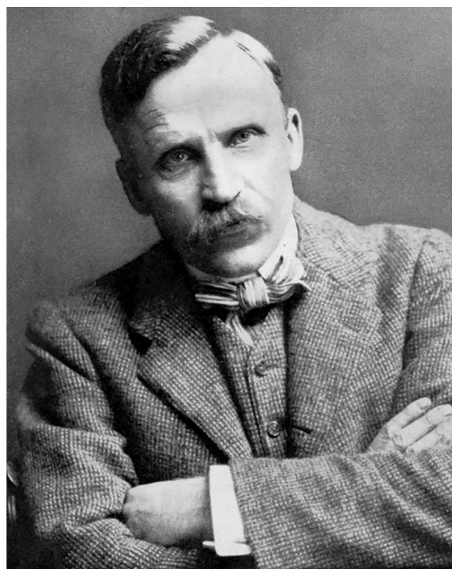
艾达·密涅瓦·塔贝尔

同时，新闻业在揭发社会问题方面也功不可没，而公众揭发丑闻的热情和对曝光文学的渴望也推动了新型新闻事业的发展。19世纪90年代末，在“黄色”报纸的影响下，新闻业重新发展起来，而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商品。这种现象前所未有。然而，日报的发行范围被限制在几百英里之内，因此不可能获得全国性的影响力。一种类似于前文学月刊的新型期刊文学凭借大量及时的新闻报道迅速发展，并在全国发行，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塞缪尔·西德尼·麦克卢尔就是该期刊文学的先驱之一。《人人》《世界主义者》《芒西》《美国杂志》，以及像《科里尔周刊》和《展望》这样的刊物都是传播观点和提倡改革的有力平台。除此之外，一大群效仿的刊物也在一段时间内丰富了揭露黑幕的期刊文学。



温斯顿·丘吉尔

新闻业在引导美国复兴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私家侦探提供了许多事实证据。公共诉讼标志着对黑幕采取行动并探寻解决方案的开始。密苏里州的约瑟夫·温盖特·福克检举了一批圣路易斯的受贿者。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就晋升为政党领袖和他所在州的州长。1903年，建立在真凭实据的基础上，隶属于新商务与劳工部的公司局发表了一系列报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对标准石油公司索取回扣的指控，以及对肉类企业主在不卫生条件下加工肉类的指控。



塞缪尔·西德尼·麦克卢尔

在公众曝光的巨额融资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检点和不道德行为发生在纽约州。1905年，纽约州一场关于公平人寿保险公司管理情况的争论导致所谓的阿姆斯特朗委员会立法调查。该委员会聘请的律师之一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很快就成为检查小组的灵魂人物。他把保险公司的官员一个接一个地传唤到证人席上。虽然他们极不情愿，他还是从他们口中询问出了他们与银行、投机金融以及政治的关系。经他披露，银行家中有一群人与货币托拉斯并无二致，并证明至少在三次全国竞选活动中，保险公司和其他公司一样给竞选基金以大量补贴。这些补贴有时是给两党，但大多数时候是给共和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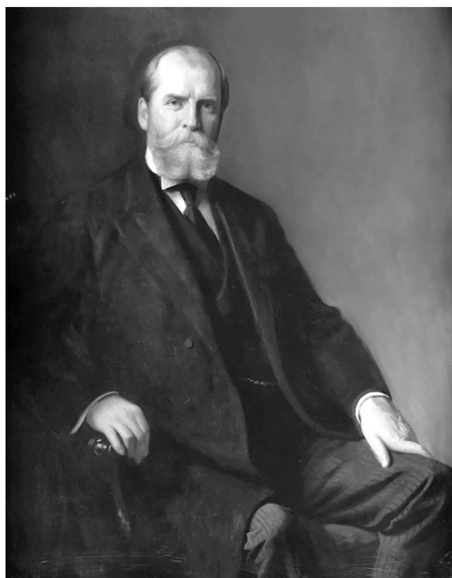
漫画：约瑟夫·温盖特·福克正在把他要检举的人称重，以确定谁的分量最重

每当一名调查员能够产生这样的影响力并且建立起正直、卓越的声誉时，公众就会希望他在政治上发挥作用。1906年9月，纽约州的民主党人提名最会耸人听闻的新闻记者威廉·鲁道夫·赫斯特担任州长。就在同一天，因为党内并没有提出其他候选人，在没有提前授意的情况下，共和党代表大会提名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为纽约州长。1906年和1908年，尽管共和党领导人耿耿于怀，但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还是当选纽约州长。他领导下的州政府对政治中出现的新精神早有预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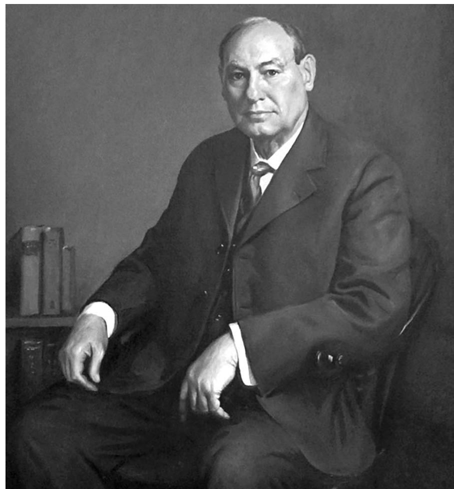
调查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是以前就提出过的，只在对违法者严格执法这一点上提出了要求。其他问题都很简单，这些问题也都有相应的解决方案。1907年，针对企业为竞选活动捐款的乱象，一项法律得以通过，禁止国家银行向任何选举活动捐款，或任何企业向总统或国会选举捐款。1906年，法律禁止州际铁路用免费铁路通行证行贿。1908年，总统候选人承诺在竞选捐款问题上保持廉洁。在1908年和1912年，为资金问题所困扰的竞选管理人员抱怨连连。这表明，法律得到了严格的执行，但还存在一些引发科学调查和立法关注的大问题。

对肉类企业主的调查揭露出肉类加工行业的种种乱象，引发了一场纯净食品运动。多年来，该运动一直拥有大量支持者。随着食品生产的集中和“包装产品”消费的增加，消费者们不再选择自己加工食物，而把

这一环节交给商人。1880年，美国众多典型的家庭产业得到了整顿与分类。缝纫业交给了血汗工厂 [1] ，烘焙业交给了公共烘焙坊，洗衣业也正在调整，肉类的屠宰和保存以及罐头蔬菜和水果加工的分类也都基本趋于稳定。人口跟随从事行业所在的工厂而移动。乡村生活变得单调乏味，失去了吸引力。农村人口根据身体健康状况及个人意愿纷纷涌向城市。1906年，因为公众对制造商的强烈反感，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严格的法案，主要针对屠宰场肉类检验以及对食品和药品生产标签的制定。此后，农业部就成了调节人民和食品之间关系的部门。自1897年以来，艾奥瓦州的詹姆斯·威尔逊一直担任农业部长，直到1913年才卸任。他和他的下属，特别是负责纯净食品工作的哈维·华盛顿·威利博士，在消费者的刺激和制造商的抗议声中执行着这项法律。尽管要面对许多抱怨，但由于集中控制，商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顺利地适应了新的需求和标签制定的相关规定。



查尔斯·埃文斯·休斯



哈维·华盛顿·威利

反铁路运动让公众认识到1887年的《州际商务法》并不是一项完善的法规，该法的实际作用远达不到制定者的预期。司法解释限制了它的适用范围，州际商务委员会无权定价，也无权强制铁路公司实行统一的记账制度，也就无法进行科学的定价。1903年和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针对这一主题发表了演讲。作为对这一公众焦点的回应，国会开始针对铁路制订大量法案。1905年，其中一项法案在众议院得到通过，但在参议院却被搁置，因为当时正在进行继1885年谢尔比·摩尔·卡洛姆的调查之后最彻底的一次州际商业调查。1906年，《赫本铁路法案》通过。该法案的主要条款赋予州际商务委员会调控运价的权力，规定铁路公司以统一的方式记账，并禁止铁路公司发行免费通行证或占有他们所运的货物。威斯康辛州的新参议员罗伯特·马里昂·拉弗莱特发表演讲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铁路的漫长辩论。他曾借用这一议题来竞选州长，并因此与威斯康辛州铁路公司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罗伯特·马里昂·拉弗莱特强调，如果不对铁路进行初步的实体评估，那么政府参与定价就无从谈起，因为只有预先评估才能显示出铁路公司的实际资本总量。他经常谈论这一问题，谈到参议院已经没人有耐心再听下去，从座位上离开。但他预言，那些因忽视而空出的坐位很快就会由新的参议员填补。在假期时，他就同一主题发表公众演讲，并通过“点名”的方式告诉人们，他们的代表是如何投票支持或反对商业特权的。随着权力的扩大，州际商务委员会在反补贴和反歧视方面取得了飞速进展。



西奥多·罗斯福（1906）

1905年，复兴的势头席卷了全美国，但每个月都有耸人听闻的丑闻传出。在满怀期待的公众的引导下，众杂志大量曝光丑闻以满足阅读市场的需求，而此时不理性的愤怒往往取代了理性的调查分析。改革的真正需要面临着被大量谴责声淹没的危险。1906年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向公众疾呼，停止不分青红皂白的谩骂。他借约翰·班扬“揭发丑闻的人”作为演讲主题，指出指责和曝光的使命已经完成，并呼吁通过执法将其造成的破坏变成一种建设。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做出大量努力以“唤醒这个国家沉睡的良心”，现在他希望黑幕揭发运动可以转变为一个永久性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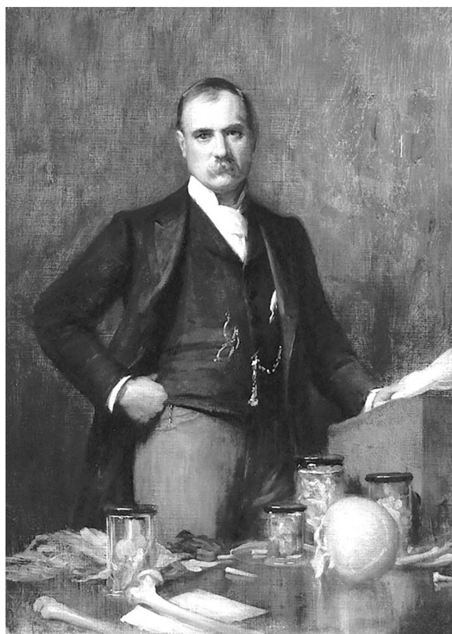
公众批评的势头威胁到了政党利益，因为正是在政党领导下，企业的各种丑恶才日渐增加。因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个人影响力，以及他的同事，伊莱休·鲁特、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菲兰德·蔡斯·诺克斯和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的共同努力，共和党才没有倒下。1906年，国会竞选活动的主题是保持繁荣，对所有违法者严格执法，并加强政府权力。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写下了这个政治纲领的核心内容，并且从1896年开始，共和党就连续六次获得了国会的控制权。游说活动结束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一反先例，离开美国去巴拿马地峡视察运河建设工作。

1903年，《巴拿马条约》签署六个月后，美国就占领了运河区，并开始了挖掘工作。美国必须学习如何管理热带地区的工程。首席工程师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这项工程，专家对于选择海平面式运河还是水闸式

运河意见不一，而国会的立法也不充分。1906年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与曾被从菲律宾召回任战争部长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达成一致，决定修建水闸式运河。1906年11月，对工程实地考察后，在回国的途中，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向国会发了一封附有插图的电报说明了工程进度。1907年，乔治·华盛顿·戈瑟尔斯将军从军队中被选派做“仁慈的独裁者”和运河区的工程师。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多次访问，工人们得到极大的鼓舞，工程进度突飞猛进。1908年，著名的英国外科医生弗雷德里克·特里夫斯爵士参观了运河工程，认为那不仅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且也是主管卫生的官员威廉·克劳福德·戈格斯上校在预防医学上取得的胜利。



西奥多·罗斯福在巴拿马地峡的留影



英国外科医生弗雷德里克·特里夫斯爵士

自1898年以来，世界各国对美国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运河工程和持续、活跃、开放的美国外交。1904年2月，俄国和日本无法就俄国在满洲地区的行为达成一致，并且发动了战争。持续的战争让俄国名誉扫地，日本金融界动荡不安。1905年6月，美国向交战双方发出邀请，称可以促成双方和解。交战双方都接受了这一邀请。1905年夏，俄国和日本的特使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会面，最终达成和平条约。1906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因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和平方面做出的贡献而授予他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1905年至1909年之间，美国对外关系和平而友好。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英国派出了最合适的大使人选詹姆斯·布莱斯。在他周全的处事方式下，接下来的五年里，人们见证了美英之间前所未有的友好关系。那些对美国的管辖总是很敏感的南美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也开始缓和。在此之前美洲国家曾召开过两次会议，一次是1889年在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的倡议下召开的，另一次是1901年在墨西哥召开的。1906年7月，美洲各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美国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在会议上提出建立友好关系的倡议。他从里约热内卢来到南美洲其他国家的首都进行公开演讲，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泛美会议是美国为举行一次更大的会议而做的初步准备。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同意在海牙举行第二次会议。在日俄战争中，他负责谈判事宜，并应沙皇的建议推迟了谈判，然后等着后者发出正式的邀请。1907年，该会议召开，美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第二次海牙会议上，美国代表团由美国律师协会主席、前驻英国大使约瑟夫·霍奇斯·乔特带领。在整个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促使各方进行讨论，促进了常设仲裁法院权力的加强，但没能达成禁止各国交战时在公海抢夺敌方物资的协议。1906年1月，美国在阿尔赫西拉斯召开会议，讨论摩洛哥危机，也调和了东方战争中的紧张关系。借此，美国政府也加强了其在国内的地位。美国不再对欧洲事务漠不关心，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



第二次海牙会议



约瑟夫·霍奇斯·乔特

1907年，美国作为一个强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自从因《朴茨茅斯条约》与日本就对待太平洋海岸的日本侨民问题产生摩擦以来，杞人忧天者就已经描绘出一场可能的战争。1907年末，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海军将进行一次全方位的巡航演习，绕过南美洲驶入太平洋。1907年12月，他检阅了舰队，并在汉普顿锚地为舰队送行。美国舰队受命从太平洋开始环球航行，访问了日本和中国，所到之处极受关注。1909年，美国舰队返航，创造了零故障和零事故的记录。



漫画：通过《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西奥多·罗斯福成功促成了日俄和谈，他也成了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

当舰队进行环球航行时，美国商业正在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建设性法律，一个长久以来困扰美国的问题正式结束了。一度使印第安人问题升级的部落主权问题得到了解决。1887年，《道斯法案》的相关规定取代了印第安部落的土地私有制度。该法案通过后，俄克拉何马准州就在第一批割让的土地上建立起来。因为铁路的纵横交错，俄克拉何马准州的发展速度比以往任何一个准州都要快。1900年，俄克拉何马准州申请成立为州。1906年，该准州得到了授权，1907年，正式成立为州。俄克拉何马州拥有美国最长、最激进的州宪法。对企业财富的恐惧和政府部门的不信任几乎都写进了宪法的每一项条款。

1908年春，美国的四十六位州长几乎都在白宫会见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并提出另一个问题，引发的骚动和启示引起了公众的反思。1900年和1902年的煤矿工人罢工事件促使人们关注政府与煤炭供应之间可能存在联系。在1902年开始的开垦工程中，公共开垦活动因为大量的私人和企业用水而受到阻碍。美国的自然资源一直都服从所有商业活动的需要，并渐渐习惯了为大公司所控制。煤炭、木材、土地和水的浪费也极不合理。山上的乱砍滥伐导致河流沿岸洪水肆虐。现在，由于自私自利的开发活动成了气候，美国的未来变得越发黑暗。在州长会议中，一场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发展起来，但当时还没有得到国会的支持。

通过大众教育，实行新的行政政策以及建设性法律，政府正努力适应现代工业的需要以维护社会稳定。企业因为自身利益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便企图阻碍这一进程。而司法部长菲兰德·蔡斯·诺克斯和他的继任者查尔斯·约瑟夫·波拿巴根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提起的一系列诉讼加剧了商界的反对情绪。在该法刚通过时，从来没有人想要检验它的价值，而在北方证券案出现之前，也没有人抨击声名狼藉的托拉斯。在后来的几年里，法律转而针对牛肉包装商、标准石油公司、烟草托拉斯、糖业托拉斯和美国钢铁公司，而大量的铁路公司和小公司则面临起诉。法律的执行引起了许多受害者的盲目反对，并引发了关于限制企业规模是否符合国家政策的质疑。在关于是否禁止托拉斯和垄断的辩论中，争论双方很难分出胜负。个人对政府实施的法律的敌意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执政最后两年的特征之一。



查尔斯·约瑟夫·波拿巴

1907年，从威廉·麦金利当选总统以来，美国已经经历十年的繁荣期。金融业是伴随着工业和贸易发展起来的，各企业需要处理数以百万计甚至数亿美元的资金，从而导致银行合并，金融权力集中在了一小部分人手中。控股公司极大地促进了这种资本的集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核心集团代表是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和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他们的投机和投资活动因公信的削弱而处于尴尬境地。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全部盈余资本将会投入永久性的建设活动。在1837年、1857年和1873年的

繁荣时期之后，这样的时期都曾出现。在清算期间发生的一些意外事件很有可能会引起恐慌。在1902年至1907年期间的揭发检举运动中，人们对控制商业的代理人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又被耸人听闻的新闻夸大了。1907年秋，一批看似强大的银行因为欺诈行为和投机管理失败，使这一怀疑达到了顶峰。国家商业银行的倒闭和纽约的尼克博克信托公司的暂停营业导致了1907年10月22日的危机。票据交换所、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和美国财政部之间坚决而又愉快的合作减少了公众的损失，但对所有人来说，一段强制经济时期开始了。



国家商业银行大楼

大企业的经理们把恐慌归因于“爱管闲事的西奥多”。他们声称自己的企业是健全而可靠的，而这种剧变是由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起来的。他们认为，总统对商界的攻击摧毁了他们的信心。联邦的起诉、新的法律以及严格审查纯净食品法规的执行，使企业无法生存。他们疾呼道，“让我们自己管理自己”。

一小部分美国人只说服了自己。自1902年以来，不考虑党派因素，面对商业的发展趋势，美国公民开阔了眼界，认为政府当局必须振作起来捍卫民主。在越来越多的案件中，投票脱离了任何党派的控制独立进行。美国的旧观念认为，民主意味着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这一观点现在让位于新观点，即民主机会依赖于对垄断的限制。从总统到各级官

员，再到领导人，他们在表面上都是支持这种新观点的。而如果没有他们，同样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还会继续存在。金融利益集团和华尔街的攻击只会让人们相信，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政策总体而言就是人民的政策，个人利益和政党机器必须让位于人民的利益。

[1] 指工作条件恶劣且工资低的小工厂。——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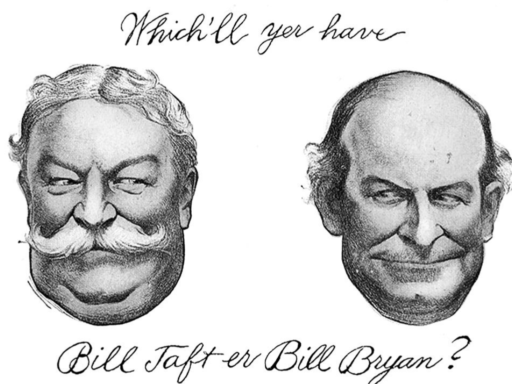
第20章　新国家主义

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就已经开始调整国家行政机构和法律以满足州界限模糊的生活与商业需求。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有必要找到一个支持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政策的继任者，继续贯彻执行这一政策。1908年，有三位符合条件的共和党人作为总统候选人经常被提及。伊莱休·鲁特是三届政府在法律方面的中流砥柱，经常在公开场合受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毫无保留的称赞。然而，他广为人知的公司律师身份将在竞选活动中导致公众对他的反对情绪，削弱了他通过选举当选某一职位的机会。战争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比伊莱休·鲁特更受欢迎。作为联邦法官，长期以来他给人们留下了严格执法的印象，曾多次担任总统的发言人。他比任何美国人都更了解殖民地，并且与巴拿马运河的每一个细节都有联系。他和伊莱休·鲁特都没有在竞争激烈的政坛赢得领导地位。作为纽约州长，第三位候选人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在自己管辖的领域展示了与职业政客斗争的能力。

1907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公开表达了他对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法官的偏爱，并像往常一样排斥有关自己连任的建议。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主导的芝加哥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第一轮投票中得到提名。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代表詹姆斯·斯库克拉夫特·谢尔曼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至此，共和党领袖都转而支持强烈推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政策的政治纲领。

1908年，在丹佛，民主党召开会议，再次受到激进派的控制，并第三次提名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为总统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职业生涯改变了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改革计划的重点。一位周刊记者说道："任何一个反对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的激进派共和党人，在追随西奥多·罗斯福之后，都只会被狠狠地嘲笑。"在随后的竞选活动中，两位候选人提出的目标几乎是相同的，因而他们的支持者们不得不去解释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政策在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或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执政的政府是否会有更好的施展机会。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竞选议题。而且在每一个政党中都有一个强大的少数派，哪个候选人也不支持。但在整个竞

选活动中，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都受到了忽视，但他当选的可能性在独立投票中显示出来，也暴露出政党关系的弱点。共和党全国候选人胜出的四个州却选出了四个民主党的州长。



1908年总统大选明信片：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左）与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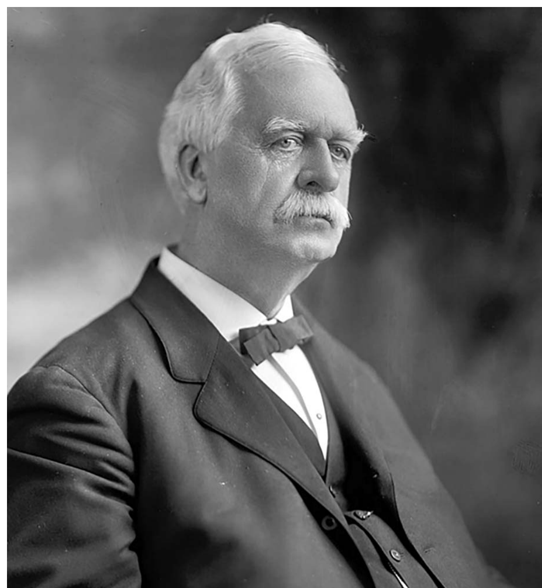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执政受到两党进步分子的衷心欢迎。他的勇气和真诚从未受到质疑。西奥多·罗斯福对他也是赞赏有加。他接受的司法培训使各种政治活动对他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事。这些活动让许多保守派成了他前任的敌人，但他对行政改革的热情毋庸置疑。1909年3月15日，他召集国会修订关税政策，立即兑现了共和党政治纲领的承诺。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关税问题，主张下调关税，以消除任何关税特权的痕迹。



漫画：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戴着王冠被西奥多·罗斯福扛在肩膀上，民众在大声欢呼，表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当选总统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1902年左右，关税改革运动开始随着对托拉斯的反对情绪在中西部地区蔓延开来。1902年和1903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都曾表示过对这一运动的赞同，并为与古巴互惠互利而修订关税政策与国会辩论。但大多数政党领导人都反对干预关税保护体系。议长约瑟夫·格尼·坎农是公开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他捍卫了主张维持关税现状者的立场。1904年之后，总统停止讨论关税问题，把精力全部放在了其他改革方案上，而把关税政策修订的问题留给了继任者。

在提到1909年的关税时，有两个重要人物不得不提，一位是纽约州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塞雷诺·以利沙·佩恩，另一位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纳尔逊·威尔玛斯·奥尔德里奇。新的关税标准在众议院得以通过，与丁利关税相比，新的关税减少了很多。在参议院，关税重新得到了定义，成为比现行法律更有力的关税保护工具。一场关于关税的讨论就此展开，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关注。一群拒绝接受党派核心集团控制的共和党人对修订关税政策的细节进行了解释，认为应该真心实意地下调关税。然而，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相比，他们对关税法案的影响很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迫使两院协商委员会接受了一些降低税率的措施，尤其是在皮革和木材方面，包括一条对企业征收所得税的条款。一项授权征收一般所得税的宪法修正案也是协商结果的一部分。1909年8月，该法案成为法律。有支持自由贸易倾向的《展望》杂志表示："最终形成的关税法案是迄今为止国家历史上最开明的关税保护措施。"已经回归私人生活的西奥多·罗斯福写道："我认为，现在的关税政策比之前的政策还要好，而比更早期的关税政策则要好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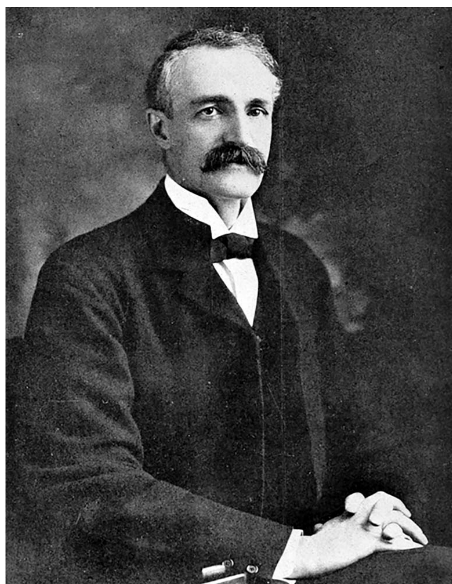


塞雷诺·以利沙·佩恩

无论它与早先的关税有什么关系，《佩恩-奥尔德里奇法案》在美国并不受欢迎。自1897年以来，这个国家就开始对关税立法的方法提出批评。共和党的七名参议员和二十名众议员在该法案通过的最后一个阶段投了反对票，他们代表着中西部地区和新一代美国人。回到家乡后，他们发现当地的选民普遍谴责这一措施是维护特权的工具。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在辩论中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发生冲突。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在西部明尼苏达州威诺纳发表的讲话加深了这一分歧。当时，他为新关税法案进行了辩护，认为这是对党派承诺的遵守。很明显，新总统既无法促成党派立法，也无法维持党内和谐。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虽没能让保守派满意，但推翻了其阵营；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既没能让进步派满意，也没能堵住其悠悠之口。

从1909年秋开始，美国出现了一系列对于政府行政的误解，令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政府大为尴尬。一位即将前往中国任外交大使的官员在离开美国之前突然被撤职，仅仅因为有人认为他言行失检。在农业部，部长詹姆斯·威尔逊和负责执行《纯净食品法》的化学家哈维·华盛顿·威利之间存在着分歧。林务局局长吉福德·平肖公开与内政部长理查德·阿基里斯·巴林杰发生争执，并提出了自然资源保护政策的未来问题。

林业和复垦工作是自然资源保护计划的核心内容，1908年这一计划是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与州长们的会议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1909年，林业部的一名下级官员指责内政部长厚此薄彼，不关注自然资源保护。1909年9月，这名官员被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撤职，于是《科里尔周刊》抨击总统为自然资源保护之敌，并且得到了许多反对关税法案的进步主义者的精神支持。1910年1月，争议越来越多，因为吉福德·平肖不服从命令，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撤掉了他的官职，而国会成立联合委员会调查吉福德·平肖与理查德·阿基里斯·巴林杰的争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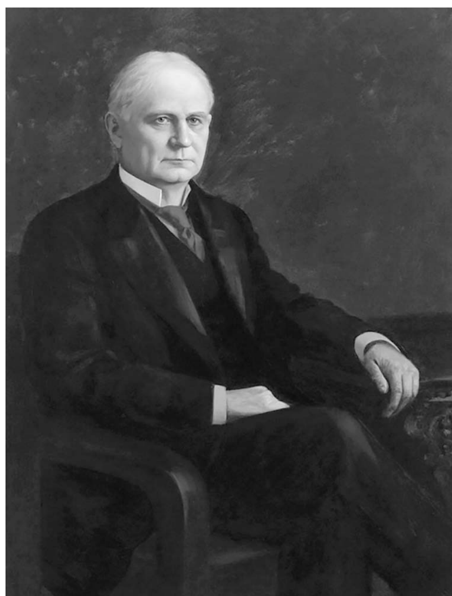


吉福德·平肖

该委员会最终维护了内政部长。这一事件显示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行事风格的根本区别。前者只依照法律行事，而后者则会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尽其所能地去达成目标。尽管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站在他的下属一边，声称他和理查德·阿基里斯·巴林杰两人都积极参与自然资源保护，但大部分公众认为，激进的改革运动已经失去动力。西奥多·罗斯福对这件事的看法已经无从得知，因为1909年他去了非洲，并且直到1910年夏一直处于美国政治圈之外。

1909年到1910年，进步派共和党人开始反对“固守现状派”的控制，因此被扣上了“叛乱分子”的帽子。参议员罗伯特·马里昂·拉弗莱特和阿尔伯特·贝尔德·卡明斯是这些人公认的领袖，而且都想当总统。1910年3

月，叛乱分子在众议院与民主党少数派一起推翻了约瑟夫·格尼·坎农议长的统治地位，修改了众议院的规则，以遏制主管官员的专制行为。他们让国家相信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已经不再是进步分子，并且已经成为“固守现状派”利益集团的盟友。1910年，共和党的分裂使民主党得以控制这个国家，并在众议院获得了绝大多数席位。密苏里州的钱普·克拉克和亚拉巴马州的奥斯卡·安德伍德都是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野心家。他们后来分别成为新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议长和主席。没有一个人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那样，以人格来控制或领导党派。竞争和个别领袖破坏了两党之间的和谐，两党甚至从来都没有就未来的大政方针而达成一致过。1911年1月，叛乱的共和党人组织了一个进步共和党联盟。他们的目的是能够在1912年提名他们中的一个人参加大选，当时暂定的人选是参议员罗伯特·马里昂·拉弗莱特。



钱普·克拉克



奥斯卡·安德伍德（左）与同僚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的政策与他前任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倡导主张的方法上。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一样，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也难以将自己的主张制订为法律。但与西奥多·罗斯福不同的是，他没能获得人民的支持与拥戴。他支出一笔资金用于成立关税专家委员会，以筹备将来的关税政策修订事宜，并为商业法庭处理州际贸易案件。他还支持所得税修正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撤掉了丑闻缠身的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威廉·罗瑞莫。1910年，《州际商务法》得到修订和补充。1910年，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通过了一项授权法案。根据该法案，1912年，这两个地区成立为州。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继续执行西奥多·罗斯福时期就开始的一系列反托拉斯诉讼，并下令解散南太平洋公司、标准石油公司和烟草托拉斯，也处罚了其他许多垄断企业。

在行政领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表现出了经济管理方面的天赋。他敦促国会通过开支预算制度，并聘请了一组专家来帮助行政部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他一直努力扩大行政部门。直到1912年，在三十三万四千名联邦雇员中，只有五万六千人的职务仍未分级。

在涉及与拉丁美洲的贸易、仲裁、中立和互惠方面的对外谈判中，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政府表现最突出。在国务卿菲兰德·蔡斯·诺克斯的协

助下，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继续发展与拉丁美洲的友好关系。批评家们将这一政策称为“美元外交”，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和菲兰德·蔡斯·诺克斯则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称此举是通过健全的金融政策实现对拉丁美洲国家稳定管理的过渡。1911年，发生在墨西哥的一场旷日持久的革命导致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被逐出墨西哥，1912年，引发了反革命运动。在整个骚乱过程中，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坚定地保持中立，并敦促国会禁止向交战方出售武器。这是中立国惯常做法上的一个进步，因为根据国际法，中立国是可以向交战双方出售军火的。



墨西哥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

1908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与英国和其他国家签署了一系列一般性的仲裁条约，其中包含了对涉及国家荣誉和国际争端的一般处理办法。1911年，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与英国和法国签署了更详尽的条约，并成立委员会以规定仲裁审理范围。但参议院拒绝批准这些条约。

与加拿大的互惠政策也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关税政策的一部分。1911年，他召集国会召开特别会议，批准对《佩恩-奥尔德里奇法案》中规定的利率做出调整。众议院的民主党多数派支持这一措施。为了确保法案通过，共和党中坚分子也做了很多努力。但“叛乱分子”反对这一做法，因为这样可能会损害农民的利益。1911年9月，在大选后，加拿大也拒绝了这一措施，因为在该届选举中，对被美国吞并的恐惧是

重要主题之一。



威廉·霍德华塔夫脱和商人的漫画。杰克·卡克（加拿大）：“哦，是的！当你们知道我很繁荣时，你们都伸出快乐的手来。”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统治的政策没有对党派和人民产生影响，但也不像那些丑闻揭发者描绘的那样糟糕。这些政策制定得非常详尽，并具有建设性和启发性，就连许多对手都加入到要求改革的行列中。很多政党领袖也都对此很感兴趣，因为这些政策关注他们个人的命运，也没有像过去八年中那样被总统的个人魅力所掩盖。这些政策出自一位曾经的律师和法官，并因与共和党中最不受新改革影响的一派联盟而获得通过，因此可能面临指责其精神和意图反动的抨击。

1910年6月，共和党的分裂越来越严重，西奥多·罗斯福也回到了美国。几周后，他在西部的堪萨斯州奥萨沃托米发表演讲，提出了改革的政治纲领，称之为“新国家主义”。事实上，这一概念是经历了四十年的历史演变而来的，设想了国家在商业和社会方面的发展道路，并要求政府面对新的问题。“新国家主义”认为宪法权力已经应政府所需的大部分职能而存在，并要求通过制订宪法修正案来补充缺失的权力。该政治纲领受到了强烈的推崇，也遭遇了猛烈的抨击。许多进步人士认为该纲领是对他们信仰的绝佳阐述，因而大力推崇。而保守派则倾向于认为这是一条社会主义或革命主义的纲领。它使西奥多·罗斯福恢复了在公共事务上的地位，并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并没有像他的支持者和前任那样，展现出一种受欢迎的领导能力。它给进步人士以

希望，即通过自己的承诺和按照不成文的传统，已经不可能第三次担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将帮助他们促使共和党在1912年提名一个进步主义者为候选人。

进步派的具体原则包含了一系列政策，希望能推倒小集团控制政治的局面。他们一致要求通过倡议和全民公决、直接初选和直接推举代表参加全国代表大会，以及直接选举参议员。他们中的许多人支持的一种新的召回政策，将被应用于行政官员、法官，甚至是司法判决。妇女参加选举也得到了普遍接受。

自1896年爱达荷州成为第四个允许妇女参加选举的州以来，妇女选举权事业在美国取得了巨大进步。在许多州，地方或学校都修改了选举权的范围。1906年，英国开始了妇女选举权不受限制的新时期，并因为激进的妇女参政论者故意违反法律和破坏秩序的行为而得到了宣传。虽然这种骚乱并不严重，但已经蔓延至美国。1910年华盛顿州，1911年加利福尼亚州，分别允许妇女参加选举。到了1914年，随着亚利桑那州、堪萨斯州、俄勒冈州、伊利诺伊州[1]、内华达州和蒙大拿州的加入，通过妇女选举权的州总数增加到十二个。

1911年和1912年之间的冬天，共和党在下一届全国大选中获胜的希望渺茫。1910年，民主党人获得了众议院的支持，在共和党进步派的投票支持下，他们已经通过几项关税法案并呈递给总统，按一个又一个的计划削减了税率。但每一项法案都遭到了否决，而每一次否决都让进步人士更加坚定地认为，如果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不是固守现状，就是政治上保守。进步派共和党人坚决反对重新提名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而如果他重新得到提名，他们也不太可能大力支持他。许多共和党的中坚分子也认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不可能重新当选。支持进步派总统候选人的政党派系比支持罗伯特·马里昂·拉弗莱特的团队更庞大，而且在各个领域都能听到要求西奥多·罗斯福回归的声音。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中）与友人的

1912年2月，七位共和党州长联名请求西奥多·罗斯福收回他的承诺，接受提名成为候选人，虽然他们所在的州很可能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这一请求得到了西奥多·罗斯福崇拜者的一致认可，他们相信只有这个人才能实现“新国家主义”的理念。那些不相信罗伯特·马里昂·拉弗莱特能获胜的进步人士，以及那些不惜任何代价想要赢得胜利的共和党人则发现，他们只有通过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才能获得胜利。1912年2月24日，西奥多·罗斯福终于宣布他愿意接受提名，并解释说，他之前拒绝接受另一个任期的意思是不接受连任，并参加了针对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们的游说活动。

初选前的竞选活动很难进行。在大多数州，无论是否支持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共和党组织都掌握在那些并不支持西奥多·罗斯福的政客手中。当选民们摆脱州和国家委员会的控制，或者通过现有的政党组织来达成他们的新要求时，一切已经太晚了。这种情况体现在提名流程的缺陷上，但可以通过直接初选加以弥补。在一些州，应公众强烈要求，一系列关于初选的法律得以仓促通过，从而推翻了传统的选举制度。西奥多·罗斯福以极高的声望吸引了罗伯特·马里昂·拉弗莱特的众多支持者。

1912年6月18日，在芝加哥举行会议的一千零七十八名代表中有四百一十一名是西奥多·罗斯福的支持者。还有两百五十多名是受命支持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遭到了西奥多·罗斯福代表团的质疑。当国家委员

会否决了这些人的要求时，西奥多·罗斯福谴责他们的行为是“赤裸裸的盗窃”。因此，他也一定会和反对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政党派系结盟。由伊莱休·鲁特主持的代表大会几乎得到了所有受到西奥多·罗斯福提拔的人的支持，却最终重新提名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詹姆斯·斯库克拉夫特·谢尔曼。西奥多·罗斯福表示，任何诚实的人都不会将选票投给用卑劣手段上位的人。支持西奥多·罗斯福的共和党人并没有退出会议，但在休会时，他们举行了一场群体会议，由他们的候选人发表讲话，后来组成全新的进步党。

民主党顾问受到了共和党分裂和共和党保守派在芝加哥获胜的影响。接下来的那一周，他们在巴尔的摩召开会议，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也出席了会议并表现得十分活跃，但他本人并不是候选人。他们必须在筹款委员会议长钱普·克拉克、主席奥斯卡·安德伍德、俄亥俄州长贾德森·哈蒙、印第安纳州长托马斯·赖利·马歇尔和新泽西州长伍德罗·威尔逊之间做出选择。



漫画：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西奥多·罗斯福——政治敌人

伍德罗·威尔逊生于弗吉尼亚州，是著名的散文学和历史学家。1910年，他辞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一职，进入美国政界。作为州长，他展现出带领政党走向改革进步的巨大能力。在一些方面，他与西奥多·罗斯福和罗伯特·马里昂·拉弗莱特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们的做法都与自己政党中的反对派有着天壤之别。他很久以前就写道：“一个总统无论在法律层

面还是道德层面都是自由的，他要尽可能地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刷新能力的极限……他只能通过公众舆论来影响国会。”之前与民主党派系的关系让伍德罗·威尔逊的立场有些尴尬。他曾态度鲜明地反对特权和企业对政治的影响，并得到了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和那些支持他的年轻人的坚定拥护，因而在第四十六轮投票中得到总统候选人提名，而托马斯·赖利·马歇尔州长得到副总统的提名。



托马斯·赖利·马歇尔（左）与同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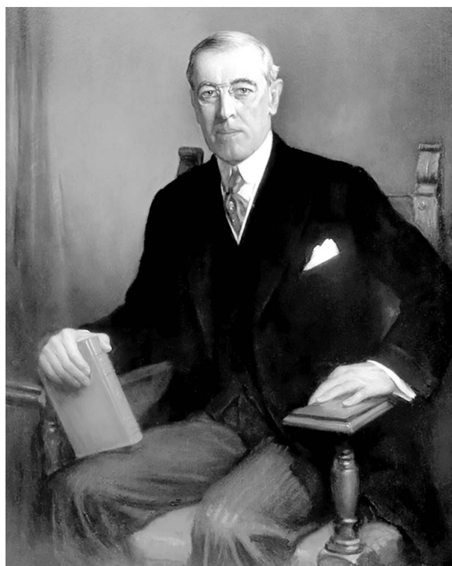
1912年8月5日，进步党在芝加哥召开会议，提名了西奥多·罗斯福和加利福尼亚州长海勒姆·约翰逊。他们倡导的政治纲领建立在社会公正和人权理念的基础上，包括认真推进每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他们认为两个旧党派都不适合推进进步工作。在竞选活动中，他们的候选人和发言人透露了这些前“叛乱分子”的热情和痛苦。

党派分裂使选举的主动权落入民主党人手中。他们得以继续控制众议院，又获得了参议院的控制权，并选出了伍德罗·威尔逊，尽管他在三次竞选中获得的选票都少于威廉·詹宁斯·布莱恩。这场竞争成了一种人身攻击，因为很少有人公然抨击进步党宣称的立法目标。西奥多·罗斯福的声望吸引了许多民主党人从支持伍德罗·威尔逊的队伍中转而支持他。但也有一部分人不支持西奥多·罗斯福。有些共和党人担心西奥多·罗斯福执

政，而一些进步共和党人也不满他重返政坛，这样一来，这部分人就会把选票投给伍德罗·威尔逊或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1912年11月，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只获得了八张选举人票，在民意调查中远远落后于他的两个对手。在一场史无前例的独立运动中，有四百多万张选票来自新成立的第三个政党。社会主义者投给尤金·维克托·德布斯的选票从1908年的四十二万票上升到1912年的八十九万五千票。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笼罩在党内斗争的阴影中，而民主党对众议院的控制也削弱了他的执政效力。对托拉斯的控诉仍在继续，继邮政储蓄银行建立之后，包裹邮递也出现在美国。所得税修正案成为宪法的一部分，而直接选举参议员的修正案也取得了进展。

最终，伍德罗·威尔逊成功当选总统。他组建了一届由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任国务卿的内阁，成员均为之前的进步民主党。1913年4月，他召集国会再次修订关税，亲自发表咨文，推翻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先例。在十八个月的时间里，他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让国会按照他的理解履行承诺。



总统任上的伍德罗·威尔逊

关税、货币和托拉斯是民主党人的主要议题。在这些问题上，民主党人公开表达了他们的积极信念。不考虑党派联盟，大量的进步人士都

要求对这些问题立法。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开始一一解决这些问题，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强大领导能力。事实上，无党派人士的观点通常与他一致，这使大量停留在书本上的建设性立法成为可能。1913年10月3日，关税问题进入法律。毋庸置疑，关税是呈下降趋势的。同年12月23日，《联邦储备法》得以签署。它修订了银行法，以提高其灵活性促进权力分散。1914年1月，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向国会提交了他的托拉斯监控计划，主张成立委员会根据《州际商务法》管理贸易。1914年秋，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采纳了这些建议。与此同时，1912年的《巴拿马运河法案》遭到修改，取消了给予美国船只的特权，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认为这违反了《海伊-庞斯福特条约》中的平等待遇承诺。民主党多数派拥有一份自1890年以来国会通过的最重要的建设性法律的清单。1914年10月24日，该党派同意休会，其成员回到家乡，听取选民关于国情咨文的意见。

经济法律的通过需要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机智与能力。在他执政时期，共和党对其政策没有清晰的认识，内部还有许多反对派。墨西哥内乱不断，使形势变得更加棘手。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职前不久，墨西哥又爆发了一场革命，紧接着维多利亚诺·韦尔塔将军晋升为总统。被废黜的弗朗西斯科·伊格纳西奥·马德罗的追随者立即开始反抗。美国拒绝承认墨西哥的新政府，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府，它的头衔沾满鲜血。美国始终拒绝承认墨西哥这场阴谋的结果。1914年4月，美国军队占领维拉克鲁斯，以报复维多利亚诺·韦尔塔政权的侮辱行为。1914年7月，在美国“观望等待”的持续压力下，独裁者最终辞职。此后，立宪主义者们又骚动起来，但随着时间的推进，来自墨西哥的危机似乎有所缓解。



弗朗西斯科·伊格纳西奥·马德罗

1914年8月，欧洲纷乱不断。19世纪中期，在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战争中，美国的军备政策展现出合理的结果。俄国立即对它的斯拉夫亲戚提供了援助。1914年8月1日，德国对其宣战。又过了几天，英国、法国与俄国联盟反抗德国-奥地利联盟。欧洲大部分国家陷入战争状态。让成千上万因战争而受困的美国游客回国成了美国政府的第一要务。在美国驻欧洲交战各国大使的监护下，以及所有交战国的帮助下，这些美国人得以安全回国。在此之后，美国出现了中立和商业问题。由于出口贸易的中断，特别是棉花出口的中断，美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萧条。一项关于将外国建造的船只转移到美国注册的法律，以及另一项用于联邦战争保险的法律都匆匆通过了。关于建立公共商船队的问题也经过了讨论。在这些问题上，美国花费了大量精力，之后国会宣布休会，暂停了长期以来的繁重工作。

1914年，国会选举深受欧洲战争的影响。1914年初，保守派越发反对民主党的计划，而民主党多数派很可能会被削减。进步党的势力也逐渐被削弱，而共和党的控制权回到了镇压叛乱分子的共和党人手中。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精确中立政策赢得了各党派的信任。尽管像伊利诺伊州的约瑟夫·格尼·坎农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博伊斯·潘罗斯这样的保守派人士赢得了少数民主党和进步人士的支持，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仍然得到了第六十四届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多数支持。在1912年的选举中，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进步派分散共和党力量的影响。1914年，进步派的影

响力可以忽略不计，在共和党的围攻下，民主党维护了自身的权力。

[1] 在伊利诺伊州，妇女选举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仍然包括对总统选举团成员和地方官员的投票权。——原注

专有名词英汉对照

Civil War	南北战争/内战
United States	美国
Constitution	《宪法》
Union	联邦
Republican	共和党
Whig	辉格党
Democrat	民主党
Lincoln	林肯
War Democrat	民主党主战派
Copperhead	铜头蛇
George Brinton Mcclellan	乔治·布林顿·麦克莱伦
Edwin McMasters Stanton	埃德温·麦克马斯特斯·斯坦顿
Peace Democrat	民主党和平派
Radical Republican	共和党激进派
Cabinet	内阁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财政部长
Salmon Portland Chase	萨蒙·波特兰·蔡斯
Chief Justice of the Supreme Court	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
John Charles Frémont	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
Baltimore	巴尔的摩
Kansas-Nebraska Bill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
Andrew Johnson	安德鲁·约翰逊
New York	纽约
Horatio Seymour	霍拉肖·西摩
Shinplasters	乱发纸币
Clement Laird Vallandigham	克莱门特·莱尔德·瓦兰迪加姆
William Tecumseh Sherman	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
Atlanta	亚特兰大
David Glasgow Farragut	戴维·格拉斯哥·法拉格特
Mobile Bay	莫比尔湾
Delaware	特拉华
Kentucky	肯塔基
New Jersey	新泽西

Congress	国会
Thirty-seventh Congress	第三十七届国会
Treasury	财政部
Andrew Jackson	安德鲁·杰克逊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第二合众国银行
Greenback	绿背纸币
Mississippi Valley	密西西比河流域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河
St. Louis	圣路易斯
Chicago	芝加哥
Buffalo	布法罗
Pittsburg	匹兹堡
New York	纽约
Philadelphia	费城
New York Central	纽约中央铁路
Erie	伊利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铁路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
Elias Howe	伊莱亚斯·豪
Gordon McKay	戈登·麦凯
Fall River	福尔里弗
Lynn	林恩
Iowa	艾奥瓦
Minnesota	明尼苏达
Wisconsin	威斯康辛
Kansas	堪萨斯
American Desert	美国沙漠
Missouri River	密苏里河
Rocky Mountains	落基山脉
Great Salt Lake	大盐湖
General Victoriano Huerta	维多利亚诺·韦尔塔将军
Francisco Ignacio Madero	弗朗西斯科·伊格纳西奥·马德罗
Mormon	摩门教徒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
Pike's Peak	派克峰
Colorado Territory	科罗拉多准州
Carson Valley	卡森谷

Nevada Territory	内华达准州
Dakota	达科他
Black Hills	布拉克山
Colorado River	科罗拉多河
Arizona Territory	亚利桑那准州
Continental Divide	大陆分水岭
Idaho	爱达荷
Montana	蒙大拿
Wyoming	怀俄明
Oklahoma	俄克拉何马
Ordinance of 1787	《1787年法令》
Reaper of McCormick	麦考密克收割机
Homestead Act	《宅地法》
Thomas Hart Benton	托马斯·哈特·本顿
Preëmption Law	《优先购买权法》
Mountain States	山地各州
Pony Express	驿马快信
Pacific	太平洋
St. Joseph	圣约瑟夫
Pacific Railroad Act	《太平洋铁路法案》
Union Pacific	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
Council Bluffs	康瑟尔布拉夫斯
Sacramento	萨克拉门托
Leland Stanford	利兰·斯坦福
Pawnee	波尼族人
Sioux	苏族人
Arapaho	阿拉巴霍人
Cheyenne	夏延人
Indian Territory	印第安领地
South Dakota	南达科他
Utah Territory	犹他准州
Ogden	奥格登
Far West	远西地区
Cornelius Vanderbilt	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
Collis Potter Huntington	科利斯·波特·亨廷顿
Indiana	印第安纳
Hugh McCulloch	休·麦卡洛克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
Connecticut	康涅狄格
Daniel Shays	丹尼尔·谢斯
Ohio	俄亥俄
George Hunt Pendleton	乔治·亨特·彭德尔顿
Thaddeus Stevens	泰迪尔斯·史蒂文斯
Benjamin Franklin Butler	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
Harper's Weekly	《哈珀周刊》
Democratic Convention	年民主党代表大会
Francis Preston Blair Jr	小弗朗西斯·普雷斯顿·布莱尔
Wade Hampton	韦德·汉普顿
Ulysses Simpson Grant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
Tennessee	田纳西
Unionist	联邦主义者
Robert Edward Lee	罗伯特·爱德华·李
Confederacy	南部邦联
Thirteenth Amendment	《第十三条修正案》
Representative	众议员
Northern Democrat	北方民主党
Northern Republican	北方共和党
Tenure-of-Office Bill	《任职期限法案》
Thirty-ninth Congress	第三十九届国会
Charles Sumner	查尔斯·萨姆纳
Freedmen's Bureau	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
Civil Rights Bills	《民权法案》
Fourteenth Amendment	《第十四条修正案》
Attorney-General	司法部长
Fort Donelson	多纳尔森堡
Vicksburg	维克斯堡
Schuyler Colfax	斯凯勒·科尔法克斯
North Carolina	北卡罗来纳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
Georgia	佐治亚
Florida	佛罗里达
Alabama	亚拉巴马
Louisiana	路易斯安那
Arkansas	阿肯色

Reconstruction Acts	《重建法》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
Secretary of War	战争部长
Union League	联邦联盟
Benjamin Grubb Humphreys	本杰明·格拉布·汉弗莱斯
Fifteenth Amendment	《第十五条修正案》
Adelbert Ames	阿德尔贝特·埃姆斯
Hiram Rhodes Revels	海勒姆·罗兹·雷威尔斯
Washington	华盛顿
Francis Harrison Pierpont	弗朗西斯·哈里森·皮尔庞特
Milledgeville	米利奇维尔
William Magear Tweed	威廉·马格尔·特威德
Thomas Nast	托马斯·纳斯特
Maine	缅因州
James Shepherd Pike	詹姆斯·谢伯德·派克
Prostrate State	《沮丧之州》
Ku-Klux Klan	三K党
Maryland	马里兰
James Russell Lowell	詹姆士·拉塞尔·洛威尔
Great Britain	英国
Alabama	“亚拉巴马”号
Charles Francis Adams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
Reverdy Johnson	雷弗迪·约翰逊
Joint High Commission	高级联合委员会
Treaty of Washington	《华盛顿条约》
Liberal Republicans	共和党自由派
Carl Christian Schurz	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
Horace Greeley	霍勒斯·格里利
Tribune	《纽约论坛报》
Whitelaw Reid	怀特洛·里德
Henry Watterson	亨利·沃特森
Cincinnati	辛辛那提市
Gratz Brown	格拉茨·布朗
Henry Wilson	亨利·威尔逊
Edwin Lawrence Godkin	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
Oxford	牛津大学
Nation	《国家》

Harvard	哈佛大学
Charles William Eliot	查尔斯·威廉·艾略特
Michigan	密歇根大学
James Burrill Angell	詹姆斯·伯里尔·安吉尔
Johns Hopkins	约翰·霍普金斯
Daniel Coit Gilman	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
Jay Gould	杰伊·古尔德
James Fisk	詹姆斯·菲斯克
Robert Cumming Schenck	罗伯特·卡明·申克
Congressman	国会议员
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贷公司
James Gillespie Blaine	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
William Boyd Allison	威廉·博伊德·艾里森
James Abram Garfield	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
Rufus Dawes	鲁弗斯·道斯
William Worth Belknap	威廉·沃思·贝奈普
Jay Cooke	杰·库克
Northern Pacific	北太平洋铁路公司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纽约证券交易所
Inflation Bill	《通货膨胀法案》
John Sherman	约翰·谢尔曼
Greenbackers	绿背纸币党
Granger Movement	格兰其运动
Patrons of Husbandry	美国农业保护者
Grange	格兰其
Ohio River	俄亥俄河
Granger Laws	格兰其法案
Alleghanies	阿利根尼山脉
Lakes	五大湖
Erie Canal	伊利运河
Potter Law	《波特法》
Rate Laws	《定价法案》
Granger Cases	格兰其案件
Nebraska	内布拉斯加州
Indian Wars	印第安人战争
Denver	丹佛
Samuel Jones Tilden	塞缪尔·琼斯·蒂尔登

Tammany Hall	坦慕尼协会
Tweed Ring	特威德集团
Thomas Andrews Hendricks	托马斯·安德鲁斯·亨德里克斯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州
Gettysburg	葛底斯堡
General Winfield Scott Hancock	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
William Adams Richardson	威廉·亚当斯·理查森
Roscoe Conkling	罗斯科·康克林
Oliver Perry Morton	奥利弗·佩里·莫顿
Benjamin Helm Bristow	本杰明·赫尔姆·布里斯托
Whiskey Ring	威士忌酒集团
Rutherford Birchard Hayes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
Jefferson Hamilton Davis	杰斐逊·汉弥尔顿·戴维斯
William Almon Wheeler	威廉·阿尔蒙·惠勒
Electoral Commission	选举委员会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John Quincy Adams	约翰·昆西·亚当斯
Martin Van Buren	马丁·范布伦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内政部长
Indian Bureau	印第安人事务局
George Armstrong Custer	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
Chief Joseph	约瑟夫酋长
Nez Percés	内兹佩尔塞人
Chester Alan Arthur	切斯特·艾伦·阿瑟
Doctor Johnson	约翰逊博士
Stalwarts	坚定派
Forty-fifth Congress	第四十五届国会
Forty-sixth Congress	第四十六届国会
Resumption Act/Bill	《恢复硬币支付法案》
Richard Parks Bland	理查德·帕克斯·布兰德
Bland Act/Bill	《布兰德法案》
William Boyd Allison	威廉·博伊德·艾里森
Robert Green Ingersoll	罗伯特·格林·英格索尔
Leadville	莱德维尔
Dennis Kearney	丹尼斯·卡尼
Molly Maguires	莫利·马奎尔社
Henry Adams	亨利·亚当斯

James Schouler	詹姆斯·斯库勒
John Bach McMaster	约翰·巴赫·麦克马斯特
James Ford Rhodes	詹姆斯·福特·罗兹
Alonzo Barton Cornell	阿朗佐·巴顿·康奈尔
Palmer House	帕尔默旅馆
Vermont	佛蒙特州
George Franklin Edmunds	乔治·富兰克林·埃德蒙兹
William Hayden English	威廉·海登·英格利希
James Baird Weaver	詹姆斯·贝尔德·韦弗
Connecticut Reserve	康涅狄格自然保护区
Ohio Canal	俄亥俄运河
Cleveland	克利夫兰
Mrcus Alonzo Hanna	马库斯·阿朗佐·汉纳
Isaac Wayne MacVeagh	艾萨克·韦恩·麦克维
Thomas Lemuel James	托马斯·莱缪尔·詹姆斯
New York Post-Office	纽约州邮政署
Postmaster-General	美国邮政总长
William Windom	威廉·温德姆
Money King	金钱之王
New York Legislature	纽约州议院
Stephen Wallace Dorsey	斯蒂芬·华莱士·多尔西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Thomas Jefferson Brady	托马斯·杰斐逊·布雷迪
Charles Julius Guiteau	查尔斯·朱利叶斯·吉托
Presidential Succession Act	《总统继任法案》
Isthmian Canal	地峡运河
Western Hemisphere	西半球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Chile	智利
Peru	秘鲁
Frederick Theodore Frelinghuysen	弗雷德里克·西奥多·弗里林海森
Twenty Years of Congress	《在国会的二十年》
Yorktown	约克城
Michael Crawford Kerr	迈克尔·克劳福德·克尔
Samuel Jackson Randall	塞缪尔·杰克逊·兰德尔
Forty-sixth Congress	第四十六届国会
Joseph Warren Keifer	约瑟夫·沃伦·凯弗

David Davis	大卫·戴维斯
William Mahone	威廉·马洪
Chilean War	智利战争
Republican Convention	共和党代表大会
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
White House	白宫
George William Curtis	乔治·威廉·科尔蒂斯
Dorman Bridgman Eaton	多尔曼·布里奇曼·伊顿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文官制度委员会
Civil Service Act	《文官制度法案》
William Graham Sumner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
David Ames Wells	大卫·艾姆斯·威尔斯
Panama Canal Act	《巴拿马运河法案》
Henry Demarest Lloyd	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
River and Harbor Bill	《河流与港口法案》
Senate Bill	《参议院法案》
Internal Revenue Bill	《国内税收法案》
Rhode Island	罗德岛州
Nelson Wilmarth Aldrich	纳尔逊·威尔玛斯·奥尔德里奇
Bible	《圣经》
Workman Powderly	沃克曼·鲍德利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美国劳工联合会
Commissioner of Labor	劳工委员
Carroll Davidson Wright	卡罗尔·戴维森·赖特
Chinese Exclusion Bill	《排华法》
Scandinavian	斯堪的纳维亚人
Charles James Folger	查尔斯·詹姆斯·福尔杰
Henry Clay	亨利·克莱
Daniel Webster	丹尼尔·韦伯斯特
John Caldwell Calhoun	约翰·卡德威尔·卡尔霍恩
Stephen Benton Elkins	斯蒂芬·本顿·埃尔金斯
General John Alexander Loga	约翰·亚历山大·洛根将军
Mugwump	超然派
Revelation	《启示录》
Evening Post	《晚邮报》
New York Tribune	《纽约论坛报》
Whitelaw Reid	怀特劳·里德

Stephen Grover Cleveland	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
Anti-Monopoly Convention	反垄断党代表大会
John Kelly	约翰·凯利
Thomas Andrews Hendricks	托马斯·安德鲁斯·亨德里克斯
Paul Leicester Ford	保罗·莱斯特·福特
Honorable Peter Stirling	《尊敬的彼得·斯特灵》
Boston Journal	《波士顿日报》
Fifth Avenue Hotel	第五大道酒店
Samuel Dickerson Burchard	塞缪尔·迪克森·伯查德
Electoral College	总统选举团
Purists	纯化论者
Prohibition Party	禁酒党
James Buchanan	詹姆斯·布坎南
Augustus Hill Garland	奥古斯都·希尔·加兰
Thomas Francis Bayard	托马斯·弗朗西斯·贝阿德
State Department	国务院
Nicaragua	尼加拉瓜
Clayton-Bulwer Treaty	《克莱顿-布尔沃条约》
Bureau of Labor	劳工管理局
Gould Railways	古尔德铁路公司
Martin Irons	马丁·艾恩斯
Milwaukee	密尔沃基
Jeremiah McLain Rusk	杰里迈亚·麦克莱恩·腊斯克
Grand Army of the Republic	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
Arrears of Pensions Act	《待付抚恤金法案》
Pension Bureau	抚恤金管理局
John Griffin Carlisle	约翰·格里芬·卡莱尔
Roger Quarles Mills	罗杰·夸尔斯·米尔斯
Mills Bill	《米尔斯法案》
West Virginia	西弗吉尼亚州
William Lyne Wilso	威廉·莱恩·威尔逊
Cobden Club	科布登俱乐部
Interstate Commerce Law	《州际商务法》
Dawes Bill/Act	《道斯法案》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美国农业部
Jamestown	詹姆斯敦
Plymouth Rock	普利茅斯岩

Lake Superior	苏必略湖
Puget Sound	普吉特海湾
Northern Pacific	北大西洋铁路公司
Atlantic & Pacific Railroad	大西洋-太平洋铁路
Springfield	斯普林菲尔德
Texas Pacific	得克萨斯州的太平洋铁路
Red River	红河
Shreveport	什里夫波特
Texarkana	德克萨肯纳
Fort Yuma	尤马堡
San Diego	圣迭戈
Denver & Rio Grande	丹佛-格兰德河铁路
Chicago Burlington & Quincy	芝加哥-伯灵顿-昆西铁路
Atchison Topeka & Santa Fé	艾奇逊-托皮卡-圣菲铁路
Ferdinand de Lesseps	斐迪南·德·雷赛布
Suez Canal	苏伊士运河
Panama Canal	巴拿马运河
Colombia	哥伦比亚
Henry Villard	亨利·维拉德
Oregon & Transcontinental	俄勒冈州横贯大陆铁路公司
Helena	赫勒拿
Bismarck	俾斯麦
Territory of Dakota	达科他准州
Duluth	德卢斯
Tacoma	塔科马港
Omaha	奥马哈市
Platte Trail	普拉特河小道
Kansas City	堪萨斯城
Arkansas River	阿肯色河
Santa Fé	圣菲
Rio Grande	格兰德河
Old Mexico	墨西哥旧城
Southern Pacific	南太平洋铁路公司
Albuquerque	阿尔伯克基
Fort Worth	沃思堡市
El Paso	厄尔巴索
San Antonio	圣安东尼奥市

Houston	休斯顿
Sir Donald Alexander Smith	唐纳德·亚历山大·史密斯爵士
Lord Strathcona	斯特拉思科纳勋爵
Port Arthur	阿瑟港
Vancouve	温哥华
Continent of Europe	欧洲大陆
Orient Express	东方快车
Paris	巴黎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Arizona	亚利桑那
New Mexico	新墨西哥
Guthrie	加斯里
Oklahoma City	俄克拉何马城
Territory of Oklahoma	俄克拉何马准州
Timber Culture Act	《鼓励西部草原植树法案》
William Andrew Jackson Sparks	威廉·安德鲁·杰克逊·斯帕克斯
Benjamin Harrison	本杰明·哈里森
Windom and Hepburn Reports	《温德姆和赫本报告》
Austria	奥地利
Servia	塞尔维亚
Slavonic	斯拉夫
Clayton Anti-Trust Bills	《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
Shelby Moore Cullom	谢尔比·摩尔·卡洛姆
Wabash Railway Company	沃巴什铁路公司
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
Standard Oil Company	标准石油公司
Atlantic Monthly	《大西洋月刊》
Story of a Great Monopoly	《大垄断的故事》
Edward Bellamy	爱德华·贝拉米
Looking Backward	《回顾》
Julian West	朱利安·韦斯特
Bellamistic	贝拉米式
Florence	佛罗伦萨
Walter Quintin Gresham	沃尔特·昆廷·格雷沙姆
Chauncey Mitchell Depew	昌西·米切尔·迪普
Russell Alexander Alger	拉塞尔·亚历山大·阿尔杰
Levi Parsons Morton	利瓦伊·帕森斯·莫顿

Allen Granberry Thurman	艾伦·格兰伯里·瑟曼
Murchison Letter	默奇森信件
Matthew Stanley Quay	马修·斯坦利·夸伊
Lionel Sackville	莱昂内尔·萨克维尔
Murchison	默奇森
Bering Sea	白令海
John Wanamaker	约翰·沃纳梅克
Thomas Brackett Reed	托马斯·布拉克特·里德
William McKinley	威廉·麦金利
Sherman Anti-Trust Law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George Frisbie Hoar	乔治·弗里斯比·霍尔
McKinley Tariff Bill	《麦金利关税法》
Dependent Pension Act	《伤残军人抚恤金法案》
Sherman Silver Purchase Bill	《谢尔曼白银采购法》
Joint Committee of Conference	两院联合会议委员会
Bland-Allison Bill	《布兰德-艾利森法案》
General Nelson Appleton Miles	纳尔逊·阿普尔顿·迈尔斯将军
Farmers' Union	农民联合会
Agricultural Wheel	农业车轮会
Farmers' Alliance	农民联盟
People's Party	人民党
Joseph Gurney Cannon	约瑟夫·格尼·坎农
Robert Marion LaFollette	罗伯特·马里昂·拉弗莱特
Robert Emory Pattison	罗伯特·埃默里·帕蒂森
Kansas Legislature	堪萨斯州议会
Populist Senator	人民党参议员
Public Lands	公有土地
Charles Frederick Crisp	查尔斯·弗雷德里克·克里斯普
Congregational Church	公理教会
Charles Dickens	查尔斯·狄更斯
The Luck of Roaring	《咆哮营的幸运儿》
The Outcasts of Poker Flat	《扑克滩放逐的人们》
Bret Harte	布勒特·哈特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塞缪尔·兰亨·克莱门
Ralph Waldo Emerson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
Oliver Wendell Holmes Sr.	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Tom Sawyer	《汤姆·索亚历险记》
Huckleberry Finn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The Rise of Silas Lapham	《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
Little Lord Fauntleroy	《小勋爵弗契特勒里》
Henry George	亨利·乔治
Progress and Poverty	《进步与贫穷》
Francis Parkman	弗朗西斯·帕克曼
George Bancroft	乔治·班克罗夫特
James Bryce	詹姆斯·布莱斯
American Commonwealth	《美利坚合众国》
North American Review	《北美评论》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
Harper's Monthly	《哈珀月刊》
Leslie's Weekly	《莱斯利周刊》
Independent	《独立者》
Scribner's Magazine	《斯克里布纳杂志》
Century	《世纪》
John George Nicolay	约翰·乔治·尼古拉
John Milton Hay	约翰·米尔顿·海伊
Old Testament	《旧约》
New Testament	《新约》
Charles Robert Darwin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
Mary Baker Eddy	玛丽·贝克·艾迪
Christian Science	基督教科学派
Congressional Directory	《国会名录》
John Henninger Reagan	约翰·辛尼格·里根
Order of Patrons of Husbandry	美国农业保护者协会
Texas State Grange	得克萨斯州格兰其
Overseer	工头
Georgia State Agricultural Society	佐治亚州州立农业协会
Georgia State Alliance	佐治亚州农民联盟
Thomas Edward Watson	托马斯·爱德华·沃森
George Peabody	乔治·皮博迪
John Fox Slater	约翰·福克斯·斯莱特
Southern Educational Board	南方教育委员会
General Education Board	普通教育委员会
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Bois	威廉·爱德华·布格哈特·杜波依斯

Booker Taliaferro Washington	布克·托利弗·华盛顿
Yazoo	亚祖河
Black Belt	黑人聚居区
Piedmont	皮埃蒙特
Richmond	里士满
Charleston	查尔斯顿
Memphis	孟菲斯
Nashville	纳什维尔
Dallas	达拉斯
Forth Worth	沃斯堡
Mississippi River Commission	密西西比河委员会
Cairo	开罗
James Buchanan Eads	詹姆斯·布坎南·伊兹
Father of Waters	江河之父
Populism	平民主义
National Labor Union	美国劳工联盟
Ocala	奥卡拉
Ignatius Loyola Donnelly	伊格内修斯·洛约拉·唐纳利
Lost Atlantis	亚特兰蒂斯
Pinkerton	平克顿
James Gaven Field	詹姆斯·加文·菲尔德
Patrick Egan	帕特里克·伊根
Valparaiso	瓦尔帕莱索
Chilean Government	智利政府
Baron Fava	巴伦·法瓦
Minneapolis	明尼阿波利斯市
Adlai Ewing Stevenson	阿德莱·尤因·史蒂文森
Free Coinage Act	《自由铸币法案》
New York Custom-House	纽约海关
Columbian Exposition	哥伦布博览会
Jacob Sechler Coxey	雅各布·塞克勒·考克西
Pullman Palace Car Company	普尔曼卧铺车公司
Eugene Victor Deb	尤金·维克托·德布斯
American Railroad Union	美国铁路联盟
John Peter Altgeld	约翰·彼得·奥尔特盖尔德
Coin's Financial Schoo	《硬币的金融学院》
Venezuela	委内瑞拉

Monroe Doctrine	门罗主义
British Guiana	英属圭亚那
Richard Olney	理查德·奥尔尼
Lord Salisbury	索尔兹伯里勋爵
James Monroe	詹姆斯·门罗
British Foreign Office	英国外交部
American Venezuelan Commission	美国委内瑞拉委员会
Advance Agent of Prosperity	繁荣的促进剂
Canton	坎顿
Garret Augustus Hobar	加勒特·奥古斯都·霍巴特
Princeton	普林斯顿
William Jennings Bryan	威廉·詹宁斯·布莱恩
Arthur Sewall	亚瑟·休厄尔
Indianapolis	印第安纳波利斯
John McAuley Palmer	约翰·麦考利·帕尔默
Simon Bolivar Buckner	西蒙·玻利瓦尔·巴克纳
Richard Watson Gilder	理查德·沃森·吉尔德
Yukon	育空河
Bishop Potter	波特主教
Alexis de Tocqueville	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Democracy in America	《论美国的民主》
House of Commons	下议院
Australian Ballot Law	《澳大利亚投票法》
James Clarkson	詹姆斯·克拉克森
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	联邦妇女俱乐部总会
Consumers' League	消费者联盟
Jane Addams	简·亚当斯
Hull House	赫尔馆
Homer Calvin Davenport	霍默·卡尔文·达文波特
William Rufus Day	威廉·鲁福斯·戴伊
War Department	战争部
First National Bank of Chicago	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
Lyman Judson Gage	莱曼·贾德森·盖奇
United States Express Company	美国快递公司
Boies Penrose	博伊斯·潘罗斯
Nelson Dingley	纳尔逊·丁利
Dingley Bill	《丁利法案》

Conference Committee	两院协商委员会
Finance Committee	财政委员会
Woo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羊毛制造商协会
Worthington Chauncey Ford	沃辛顿·昌西·福特
Samuel Douglas McEnery	塞缪尔·道格拉斯·麦克内里
John Percival Jones	约翰·珀西瓦尔·琼斯
Geneva	日内瓦
Lake Mohonk	天湖
Years' War	十年战争
Caribbean	加勒比地区
Santiago	圣地亚哥
Puerto Principe	波多普林西比
Santa Clara	圣克拉拉
Queen Regent	摄政王后
Valeriano Weyler	瓦莱里亚诺·韦勒
Virginius Affair	“弗吉尼厄斯号”事件
Madrid	马德里
Hannis Taylor	汉尼斯·泰勒
Stewart Lyndon Woodford	斯图尔特·林登·伍德福德
Prime Minister	（古巴）首相
Práxedes Mateo Sagasta	圣巴西德·马特奥·萨加斯塔
Liberal Government	自由党政府
Havana	哈瓦那
Enrique Dupuy de Lôme	恩里克·杜普伊·德洛姆
North Atlantic Squadron	北大西洋舰队
Theodore Roosevelt	西奥多·罗斯福
George Dewey	乔治·杜威
Chesapeake	切萨皮克
Winfield Scott Schley	温菲尔德·斯科特·施莱
William Thomas Sampson	威廉·托马斯·桑普森
Nebraska Regiment	内布拉斯加团
Philippine Islands	菲律宾群岛
Manila	马尼拉
Manila Bay	马尼拉湾
Wesley Merritt	韦斯利·梅里特
Emilio Aguinaldo	埃米利奥·阿吉纳尔多
Pascual Cervera y Topete	帕斯夸尔·塞尔维拉·托佩特

Cape Verde Islands	佛得角群岛
West Indies	西印度群岛
San Juan	圣胡安
Cienfuegos	西恩富戈斯
Porto Rico	波尔图
Key West	基韦斯特
Tampa	坦帕市
William Rufus Shafter	威廉·鲁弗斯·沙夫特
Daquiri	达基里
Siboney	西波涅
Las Guasimas	拉斯瓜西马斯
Leonard Wood	伦纳德·伍德
First Volunteer Cavalry	第一志愿骑兵团
San Juan River	圣胡安河
El Caney	埃尔卡尼
Henry Ware Lawton	亨利·韦尔·劳顿
Ladrones	莱德隆群岛
Treaty of Paris	《巴黎条约》
Newlands Resolution	《纽兰兹决议》
Joseph Rudyard Kipling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
The White Man's Burden	《白人的负担》
Elihu Root	伊莱休·鲁特
William Henry Seward	威廉·亨利·西华德
Life of Abraham Lincoln	《亚伯拉罕·林肯传》
The Breadwinners	《养家糊口的人》
Court of St. Jame	圣詹姆斯法院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Hague	海牙
Czar of Russia	俄国沙皇
S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
Pious Fund	虔诚基金
Lynn Canal	林恩运河
Dyea	戴亚
Skaguay	斯卡圭
Chilkoot Pass	契尔库山口
Chilkat Pass	奇尔卡特山口
Mount St. Elias	圣埃利亚斯山

Arctic Ocean	北冰洋
George Turner	乔治·特纳
Lord Chief Justice	首席法官
Viscount Alverstone	阿尔弗斯通子爵
Prince Henry of Prussia	普鲁士亨利王子
Lord Pauncefote	庞斯福特勋爵
Hay-Pauncefote Treaty	《海伊-庞斯福特条约》
Isthmian Commission	地峡委员会
French Panama Company	法国巴拿马公司
Island of Martinique	马提尼克岛
Colombian Congress	哥伦比亚国会
Civil Service Commissio	文官委员会
Indianola	印地安诺拉
Newlands Reclamation Act	《新土地开垦法》
Edward Henry Harriman	爱德华·亨利·哈里曼
Huntington Lines	亨廷顿线
James Jerome Hill	詹姆斯·杰罗姆·希尔
Great Northern	大北方铁路
John Pierpont Morgan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Northern Securities Company	北方证券公司
Philander Chase Knox	菲兰德·蔡斯·诺克斯
Elkins Law	《埃尔金斯法案》
Expedition Law	《考察法案》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美国钢铁公司
Bessemer Steel	贝塞麦炼钢法
Andrew Carnegie	安德鲁·卡内基
Industrial Commission	工业委员会
Trans-Missouri Freight Case	跨密苏里货运案
Addystone Pipe Case	阿迪斯通管道案
Circuit Judge	巡回法官
William Howard Taft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Henry Clay Frick	亨利·克莱·弗里克
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	西部矿工联合会
Cripple Creek	克里普尔溪
Charles Moyer	查尔斯·莫耶
Bill Haywood	比尔·海伍德
Socialist Labor Party	社会劳工党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社会民主党
George Bruce Cortelyou	乔治·布鲁斯·科特柳
Albert Baird Cummins	阿尔伯特·贝尔德·卡明斯
Charles Warren Fairbanks	查尔斯·华伦·费尔班克斯
Commoner	《平民》
Alton Brooks Parker	奥尔顿·布鲁克斯·帕克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威廉·鲁道夫·赫斯特
Henry Gassaway Davis	亨利·加萨维·戴维斯
Ida Minerva Tarbell	艾达·密涅瓦·塔贝尔
Napoléon	拿破仑
Washington Gladden	华盛顿·格拉登
Arthur Twining Hadley	亚瑟·特文宁·哈德利
Lincoln Steffens	林肯·斯蒂芬斯
Thomas Lawson	托马斯·劳森
Collier's Weekly	《科里尔周刊》
Winston Churchill	温斯顿·丘吉尔
Coniston	《科尼斯顿》
Upton Beall Sinclair	厄普顿·比尔·辛克莱
The Jungle	《屠场》
Samuel Sidney McClure	塞缪尔·西德尼·麦克卢尔
Everybody's	《人人》
Cosmopolitan	《世界主义者》
Munsey's	《芒西》
American	《美国杂志》
Outlook	《展望》
Joseph Wingate Folk	约瑟夫·温盖特·福克
Bureau of Corporations	公司局
Charles Evans Hughes	查尔斯·埃文斯·休斯
James Wilson	詹姆斯·威尔逊
Harvey Washington Wiley	哈维·华盛顿·威利
Hepburn Railway Bill	《赫本铁路法案》
John Bunyan	约翰·班扬
Panama Treaty	《巴拿马条约》
Canal Zone	运河区
George Washington Goethals	乔治·华盛顿·戈瑟尔斯
Sir Frederick Treves	弗雷德里克·特里夫斯爵士
Colonel William Crawford Gorgas	威廉·克劳福德·戈格斯上校

New Hampshire	新罕布什尔州
Portsmouth	朴茨茅斯
Nobel Committe	诺贝尔奖委员会
Rio de Janeiro	里约热内卢
Russo-Japanese War	日俄战争
Second Hague Conference	第二次海牙会议
Joseph Hodges Choate	约瑟夫·霍奇斯·乔特
Algeciras	阿尔赫西拉斯
Morocco	摩洛哥
Treaty of Portsmouth	《朴茨茅斯条约》
Pacific Coast	太平洋海岸
Hampton Roads	汉普顿锚地
Charles Joseph Bonaparte	查尔斯·约瑟夫·波拿巴
Knickerbocker Trust Company	尼克博克信托公司
James Schoolcraft Sherman	詹姆斯·斯库克拉夫特·谢尔曼
Sereno Elisha Payne	塞雷诺·以利沙·佩恩
Senate Committee on Finance	参议院财政委员会
Payne-Aldrich Act	《佩恩-奥尔德里奇法案》
Winona	威诺纳
Pure Food Law	《纯净食品法》
Gifford Pinchot	吉福德·平肖
Richard Achilles Ballinger	理查德·阿基里斯·巴林杰
Champ Clark	钱普·克拉克
Oscar Underwood	奥斯卡·安德伍德
Progressive Republican League	进步共和党联盟
William Lorimer	威廉·罗瑞莫
Tobacco Trust	烟草托拉斯
Porfirio Diaz	波菲里奥·迪亚斯
Osawatomie	奥萨沃托米
Judson Harmon	贾德森·哈蒙
Thomas Riley Marshall	托马斯·赖利·马歇尔
Woodrow Wilson	伍德罗·威尔逊
Federal Reserve Act	《联邦储备法》



杰斐逊总统

独立战争、国父时代与共和思想在美国的滥觞

〔美〕约翰·T.莫尔斯　著
买天春　译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華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杰斐逊总统：独立战争、国父时代与共和思想在美国的滥觞/（美）约翰·T.莫尔斯著；买天春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075-5042-9

I.①杰…　II.①约…②买…　III.①杰佛逊（Jefferson，Thomas 1743-1826）—生平事迹　IV.①K837.12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89903号

杰斐逊总统：独立战争、国父时代与共和思想在美国的滥觞

作　　者：［美］约翰·T.莫尔斯

译　　者：买天春

选题策划：

插图供应：029-85504182

责任编辑：贺金娥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总编室010—58336239

发行部010—5833621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22

字　　数：280千字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5042-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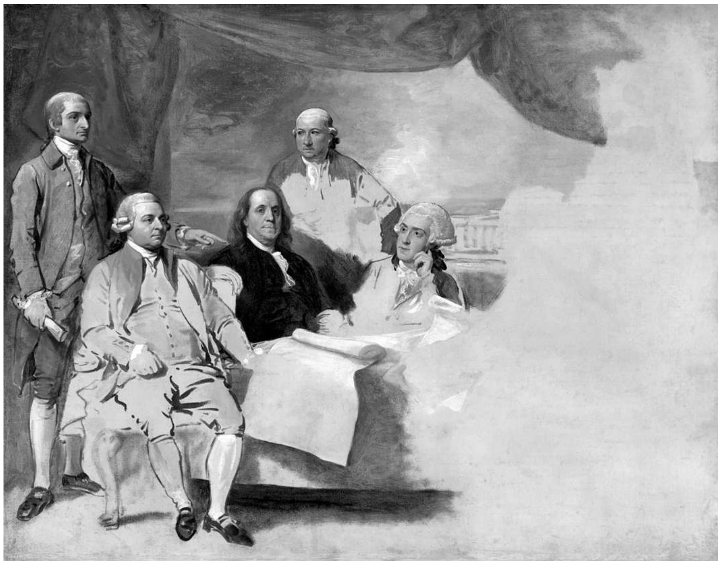
第1章 成长之路与兴趣爱好
第2章 弗吉尼亚议员
第3章 大陆会议与《独立宣言》
第4章 弗吉尼亚的革新与立法
第5章 独立战争中的弗吉尼亚州长
第6章 国会议员
第7章 出使法兰西与法兰西大革命
第8章 出任国务卿与反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第9章 反对君主政体及同联邦党人论战
第10章 美国中立与法兰西特使的阴谋
第11章 国内外政治形势与《杰伊条约》
第12章 担任副总统与竞选总统
第13章 温和的执政与卡伦德的诽谤
第14章 购买路易斯安那
第15章 弹劾法官与再次当选总统
第16章 约翰·伦道夫背弃杰斐逊和阿伦·伯尔叛国
第17章 海上的困境与禁运政策
第18章 退休后的工作与政治观点
第19章 晚年的贡献和最后的时光
专有名词英汉对照
返回总目录



殖民地人民拉倒乔治三世的雕像



1782年11月30日，法美签订《巴黎条约》，法兰西王国正式参加对英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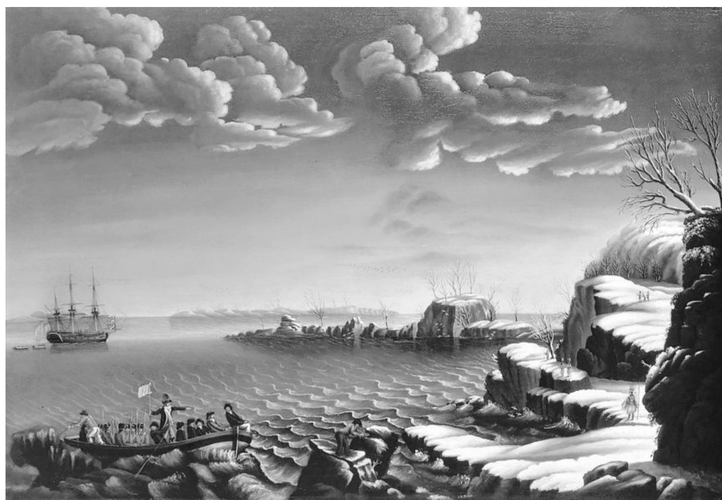


1783年9月3日，英美签署《巴黎条约》，美国独立战争结束



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

第1章
成长之路与兴趣爱好



精彩看点

弗吉尼亚的种植庄园主——彼得·杰斐逊——少年时的教育——威廉-玛丽学院——学习法律——爱情与婚姻——基层法院的工作——经营农场的兴趣——广泛的爱好

大概一个世纪之前，没有贵族的文明国家实属罕见。最早踏上美洲大陆的殖民者并未将贵族制度带到这片蛮荒之地。出于道义，他们权衡利弊，遵循欧洲惯例，依当地风尚，对弗吉尼亚富有的种植庄园主们推崇备至。这些种植庄园主们完全有资格凭借既定身份行事。他们以打牌、赌马、斗鸡的形式肆无忌惮地赌博，并以此为乐。他们生活奢靡，生性慵懒，妄自尊大，总觉得高人一等，认为领导并管理别人既天经地义又责无旁贷。他们拥有大量庄园，保留了长子继承的习俗，异常重视家庭谱系和荣耀。虽然宽敞的住房因管理不善而破旧不堪，但他们依旧热情好客。他们酷爱野外活动，马术精湛，令人艳羡。他们崇尚荣誉，也愿意为之挺身而出甚至流血牺牲。他们慷慨大方，勇猛果敢，兴致高昂，其中一部分人饱读诗书，受过良好的教育。众所周知，他们中最优秀的分子面对艰难困苦考验时的表现，丝毫不弱于已载入史册的精英

们。[1] 但要研究这些卓越的前辈和他们得以应运而生的社会环境，则如同荆棘从中摘葡萄、蒺藜堆里摘无花果一样难。

1743年4月13日，杰斐逊[2] 出生在弗吉尼亚一个平民家庭。有一种说法在杰斐逊家族中世代相传，杰斐逊的祖先曾生活在威尔士斯诺登峰一带，后来移居美洲。“五月花”号载着整船货物从葡萄牙到达新英格兰海岸之前，杰斐逊的祖先已随最早的欧洲移民到了弗吉尼亚。杰斐逊的父亲彼得·杰斐逊身强体健、富有智慧、吃苦耐劳，在弗吉尼亚安家立业。初到弗吉尼亚，彼得·杰斐逊与来自塔卡霍的威廉·伦道夫交好，并在威廉·伦道夫的大片庄园旁边开荒置田，足有千亩。后来彼得·杰斐逊又从朋友手中购得四百多英亩土地。交易价格像“亨利·韦瑟伯恩的一大碗潘趣酒一样便宜”，这在契约中都有记载。1738年，彼得·杰斐逊迎娶了威廉·伦道夫的表妹简·伦道夫。两家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后来，杰斐逊曾轻描淡写地提起，贵族血统的注入使普通的杰斐逊家族变得与众不同。杰斐逊还以典型的民主式口吻嘲讽地说道，自己母亲的血统可追溯到遥远的英格兰和苏格兰。人们认为，杰斐逊所有的信念和优点都源于引以为豪的贵族血统。

彼得·杰斐逊的种植庄园位于里瓦纳河畔。这里平原广阔，西南面是延绵起伏的丘陵，适宜大面积种植小麦。因妻子出生在伦敦沙德韦尔地区，彼得·杰斐逊将此地命名为“沙德韦尔”。丘陵间便是蒙蒂塞洛。后来杰斐逊在此安家落户，经营庄园。彼得·杰斐逊既是上校又是弗吉尼亚议会议员，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很高。1757年，五十岁的彼得·杰斐逊正当年富力强，当年8月却突然撒手人寰。年仅十四岁的托马斯·杰斐逊继承了大笔遗产，母亲娘家又有极好的家庭背景，有此优越条件，日后成就辉煌人生也顺理成章。

杰斐逊在弗吉尼亚最好的教育环境中成长。他结合自身实际，理性地发展自我，注重锻炼身体。少年时的杰斐逊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脸部轮廓棱角分明，发色赤金，眼睛灰褐，看起来并不怎么帅气。但他沉着镇定、宅心仁厚、能言善辩、言谈得体、温文尔雅、富有幽默感。随着年龄渐长，杰斐逊的容貌有所改变，中年时相貌堂堂，步入老年更加端庄潇洒[3] 。杰斐逊热爱运动，喜欢打猎，精于马术，酷爱音乐，擅长拉小提琴。1760年，杰斐逊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到威廉-玛丽学院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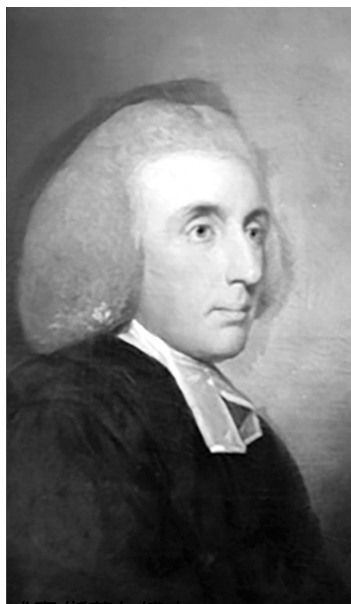
习，年仅十七岁。威廉-玛丽学院位于弗吉尼亚殖民地首府威廉斯堡。鉴于和威廉·伦道夫一家的交情，杰斐逊得以享用威廉-玛丽学院最好的公寓。[4]



“五月花”号到达新英格兰海岸，英格兰殖民者换乘小船登陆



威廉-玛丽学院


威廉·斯莫尔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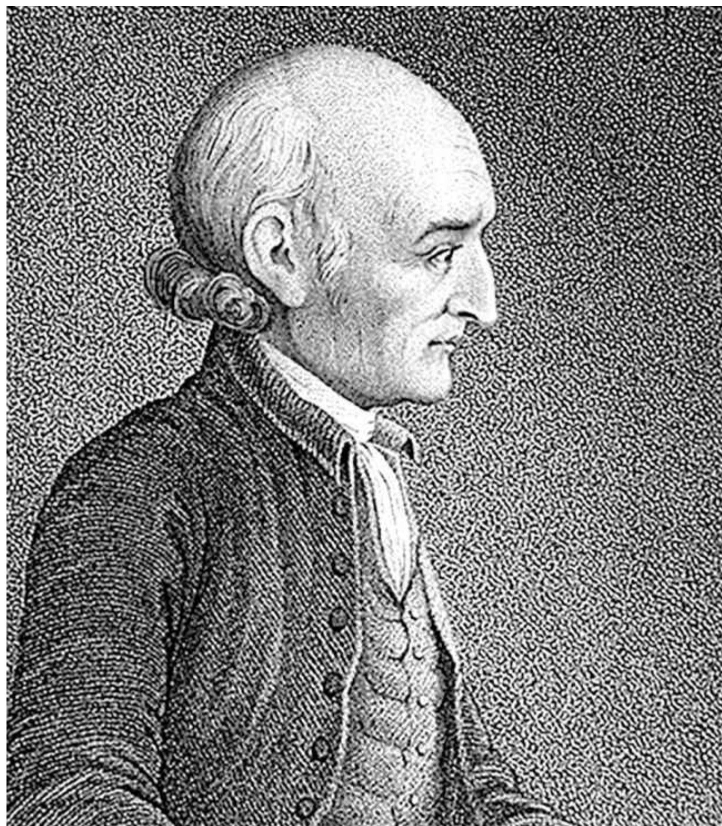
威廉·斯莫尔博士来自苏格兰，是数学教授，临时兼授哲学。他擅长教学，方法巧妙，热爱学习，深深地感染了自己的学生。杰斐逊认为，大学里遇到的这位老师决定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大学二年级时，杰斐逊养成一天学习十五小时的习惯，并在早晨和黄昏苍茫的天色中锻炼身体。1808年，杰斐逊给孙子写信，简要叙述了自己在大学时期的生活。信中不乏对孙子的谆谆教导，也显现出杰斐逊从小与众不同的自律能力。杰斐逊情不自禁地思忖，当时诱惑颇多，年少的自己为什么能够洁身自好。杰斐逊喜欢数学和自然哲学，爱读经典著作。除了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外，他尽力避开那些混在一起、令人讨厌的学问，沉迷于能激发求知欲、学起来轻松愉快的学科。杰斐逊曾毫不避讳地说，上道德哲学课纯粹浪费时间，若有人将道德行为当作科学，只会使别人变成草包的同时也让自己成为可怜的草包。杰斐逊认为，道德永远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成年以后，杰斐逊依然坚持年少时这种有点异端的看法。杰斐逊博览群书，精心选择而不拘泥于一类。他研读了希腊文、拉丁文经典作品与英国文学经典，对法兰西、意大利的作品也有涉猎。杰斐逊曾长期迷恋古爱尔兰诗人奥西恩 [5] 夸张的语言风格。杰斐逊并不讨厌小说，只是很少主动读小说而已。

从威廉-玛丽学院毕业后，杰斐逊师从乔治·威思学习法律。与杰斐

逊同时期的知名人士都认为乔治·威思是一位交际能力超群、专业造诣深厚的绅士。

杰斐逊学习时劲头十足，养成了每天学习十五小时的习惯。大概二十一岁那年，杰斐逊制定了一份学习计划，并念给朋友听。计划如下：早上8时以前专心钻研物理学，8时到12时探究法律，中午12时到13时研究政治，下午学习历史，天黑到睡觉前安排了文学和演说……当时弗吉尼亚其他青年们正吃着蛋糕，喝着啤酒，与年轻的姑娘约会，或在罗利酒馆跳舞，抽时间打打牌、骑骑马，尽情享受美好生活。每天坚持学习十五小时或许令人难以置信，可杰斐逊总能严格要求自己，按时完成学习任务。威廉·斯莫尔博士、乔治·威思先生与他们这位年轻的学生——杰斐逊经常在弗朗西斯·福基尔的豪华住宅内举行“四人论谈”。弗朗西斯·福基尔是弗吉尼亚总督，温文尔雅，富有智慧，思想自由，却嗜赌成性。尽管每天得学习十五小时，杰斐逊仍然常和三位朋友一起吃饭。杰斐逊虽然只是个求学的毛头小伙子，心智不太成熟，但很快与这三位绅士结为好友。更幸运的是，杰斐逊从“四人论谈”中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而没有染上恶习。



乔治·威思



弗朗西斯·福基尔

杰斐逊的好友约翰·佩奇出生于弗吉尼亚声名显赫的佩奇家族，后来成为弗吉尼亚州州长。学习法律期间，杰斐逊不怕费力劳心，几次给约翰·佩奇写信，能幽默时就幽默，多处引经据典，还用了拉丁文，但绝无卖弄才华之意。信中重点提到了一些女孩。她们的脸蛋很漂亮，名字却不怎么好听，如苏姬·波特、朱迪·伯韦尔等。杰斐逊喜欢一个叫“贝琳达”的姑娘，并向她表白，不过，杰斐逊不想马上与这位“贝琳达”订婚。因为他想去欧洲，且归期不定。杰斐逊向“贝琳达”承诺，去欧洲后对她情真意切，永不变心。“贝琳达”觉得从杰斐逊的承诺中感受不到炽热的真情，拒绝了杰斐逊，不久便另嫁他人。情场失意后，杰斐逊还给心爱之人写过一两封信，但最终未能感动她。舒舒服服地过了几年单身生活后，杰斐逊对年轻的寡妇巴瑟斯特·斯凯尔顿萌生爱意，将自己温暖而真诚的心都交给了她。1772年1月1日，杰斐逊和巴瑟斯特·斯凯尔顿结为伉俪。从年鉴编者们冠冕堂皇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杰斐逊的新娘具有女性身上一切引人瞩目的优点。巴瑟斯特·斯凯尔顿风姿绰约，落落大方、

性情温顺、才华横溢。她父亲约翰·威思是一位律师。巴瑟斯特·斯凯尔顿与杰斐逊结婚大约六个月后，约翰·威思就去世了。杰斐逊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岳父的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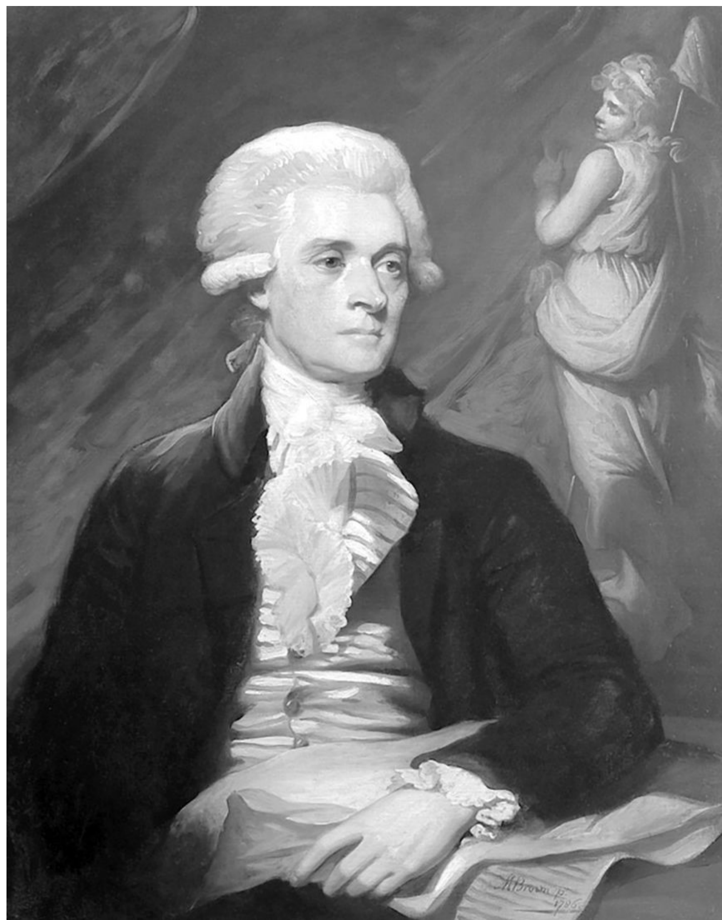
约翰·佩奇

杰斐逊并非为了得到巴瑟斯特·斯凯尔顿的财产才娶她为妻。他自己虽未富甲一方，可生活充裕，财富积累也不慢。杰斐逊原有土地一千九百英亩，结婚时又购置了一些，婚后多达五千英亩，原有奴隶三十人，后来增加到五十二人。杰斐逊的薪酬每年高达三千美元， [6] 还能从农场收入两千美元，当时在弗吉尼亚也算高收入了。杰斐逊致力于改善公众生活，无暇发家致富。他好像命中注定有积累财富的本事。人们不知道他的理财能力有多强。

1767年，杰斐逊二十四岁。当时他经营着一个酒吧，七年后关门

了。酒吧关门后，杰斐逊放弃了经商，步入令人羡慕的法律行业。或许法律诉讼是弗吉尼亚人的首选职业，或许是杰斐逊意外地交了好运。基层法院工作期间，杰斐逊第一年接了六十八个案件，第二年上升到一百一十五个，第三年为一百九十八个。基层法院成立之前的案件没有记录在案。亨利·兰德尔先生说，杰斐逊声音沙哑，没能成为出色的辩护律师，主要做咨询律师的工作。

从杰斐逊所做的笔记可知，无论何时何地，他经营农场的兴趣始终如一，并未因公务繁忙而有所减退。实际上，与自己的开支相比，杰斐逊经营农场获得的收入显得微乎其微。已出版的《杰斐逊文集》第一卷收录了一篇醒目的文章，有点儿残缺不全，也未标注写作日期。文中写道："是否我的国家因我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我对以下事情责无旁贷。"然后列举了诸如弗吉尼亚政教分离、取消不动产限嗣继承制、禁止进口奴隶、起草《独立宣言》等事件。一张不太长的清单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将马赛的橄榄、非洲高山旱稻引进到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来代替夏天易生疫病的水稻等重大事项。杰斐逊说："为国家引进一种可栽培的作物，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粮食作物比石油更重要。"在另外一页，杰斐逊写道："地球上劳作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有了选民，就得让他们吃饱，这才是真正的美德。"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农民道德败坏的现象鲜而有之。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其他公民与农民的比例就是道德不健全的人与道德健全的人的比例，反映了本国的道德水准。杰斐逊认为千万不可引进欧洲的工匠。这些工匠待在欧洲的车间里更合适。让他们"去给工人们送饭、供水、递材料，并要按工匠们自己所定的规矩进行。不能让别人为他们做这些事情。"这种观点在政治经济制度健全的当下显然有点匪夷所思。由此可见，杰斐逊富于想象，容易产生不现实的想法。黄热病侵袭时，杰斐逊在沉思中得到慰藉，觉得上帝将世间万物管理得井然有序。他认为恶是善的根源。黄热病将减缓大城市的发展。大城市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的道德、健康和自由有害无益。丰富的阅历未能改变杰斐逊以往的观点。1785年，杰斐逊在巴黎写道："农民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民。他们精力充沛、独立自主、心地善良。他们永远与自己的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工匠们是邪恶的始作俑者，他们颠覆了国家的自由。""我坚信自己的理论，希望我们的国家既不经营商业、航海，也不与欧洲保持联系，像中国一样自给自足。"



从事律师职业时期的杰斐逊

杰斐逊对农业情有独钟，再忙也要抽时间记录什么时候该种植，什么时候蔬菜和水果会成熟。杰斐逊画了一个表格，记录了三十七种可食之物，并标明连续八年内它们各自在华盛顿市场上最早的上市时间。杰斐逊观察敏锐，才思敏捷，走在田间地头，总能获得一些新知识，不经意间发明一些有用的东西。在忙碌的从政生涯中，杰斐逊一直关注土地和农民，不停地比较不同耕种方法所产生的结果，向各地发放新种子，甚至向耕种者提建议，帮助农民做试验。从杰斐逊的经历可以证实，弗吉尼亚的种植庄园主们不思进取的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杰斐逊做事雷厉风行，根本没有盎格鲁-撒克逊人保守的一面。

杰斐逊是功利主义者，文学鉴赏力不强，想象力丰富，常关注那些不起眼却很实用的领域，尽可能为民众谋些实际利益。他认为农业和政

治一样重要。杰斐逊的梦想与自己同胞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将理想变为现实是杰斐逊一生的追求。杰斐逊乐于探索新生事物，思想和行动颇具个人风格。不想安于现状的民众很乐意接受他的建议。

杰斐逊的爱好十分广泛。奥西恩的作品、青年时代的生活、爱情的经历深深影响着他。杰斐逊曾对别人的一些做法嗤之以鼻。譬如，计算哪些活要用独轮手推车完成，哪些活得用两轮手推车完成；修一段木栅用多少颗钉子，花多少钱；砌一堵石墙要用几磅石灰、多少块石头等等。不过，在完成装饰性工作时，杰斐逊筹划周详，精于计算。杰斐逊曾幻想，在公园中荒僻的溪谷选择一处“埋骨之地”。溪水汩汩流淌，古老珍贵的橡树环绕四周，常青之树郁郁葱葱。中间要有一座外观独特的哥特式小神殿。这里一半留给自家，另外一半给投宿者、仆人使用。骨灰瓮要放在刻有墓志的基座上。忠诚的仆人死后，其坟墓要用粗糙的石头堆成金字塔状。此处还得开凿一个漂亮的石洞，并用晶莹剔透的鹅卵石和漂亮的贝壳装饰。溪水缓缓流过，睡椅上长满青苔，林间仙女在此安然入睡。岩洞壁上用英文和拉丁文刻上箴言。杰斐逊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这些无聊的幻想，更没有打算建造迷人的坟茔。他正关注着一份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



爱尔兰诗人奥西恩，坐在他身边的女子为玛尔维娜

注解：

[1] 在成名之前，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以及詹姆斯·麦迪逊都未能有幸成为弗吉尼亚贵族家庭所组成的排外小圈子内的一员。——原注

[2] 即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彼得·杰斐逊之子。——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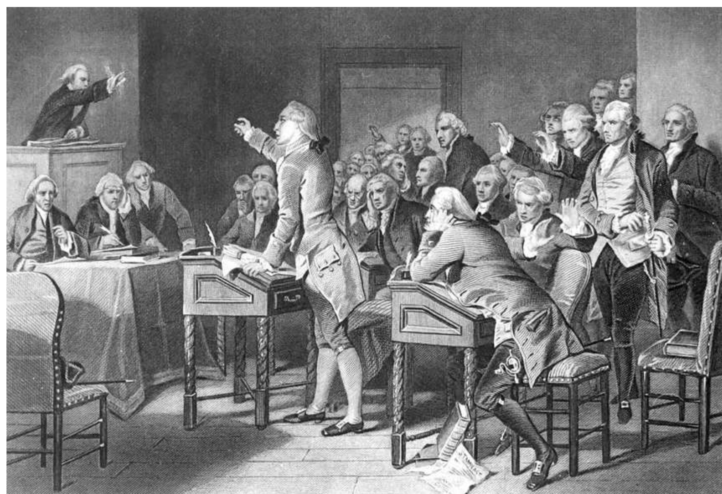
[3] 塔克：《杰斐逊传》，第29页。——原注

[4] 不要把威廉斯堡想得太过完美，这是一个村子，住着二百多户人家，白人、黑人共有一千人。除商人外，有十到十二家绅士在此常住。只有在冬季立法会议期间，这里才“挤满了贵族”。帕顿：《杰斐逊传》，第20页。——原注

[5] 奥西恩又译为“莪相”，3世纪时爱尔兰诗人。实际上，所谓“奥西恩的作品”大部分是苏格兰诗人詹姆斯·麦克菲森自己的创作。——译者注

[6] 婚后七年中，杰斐逊每年平均花费三千美元。——原注

第2章
弗吉尼亚议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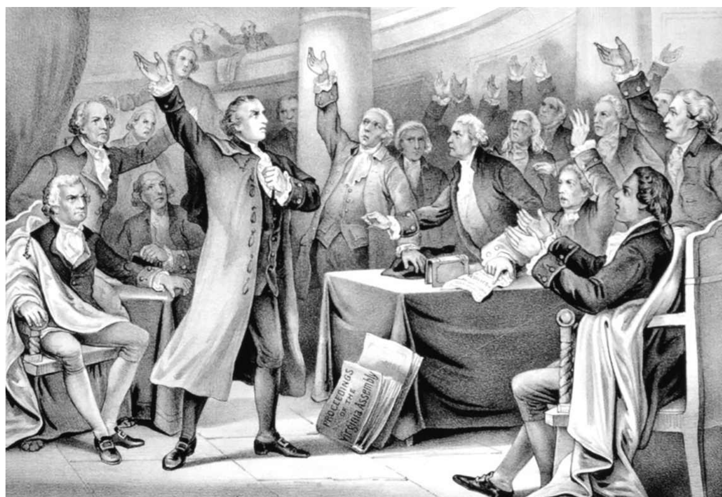


精彩看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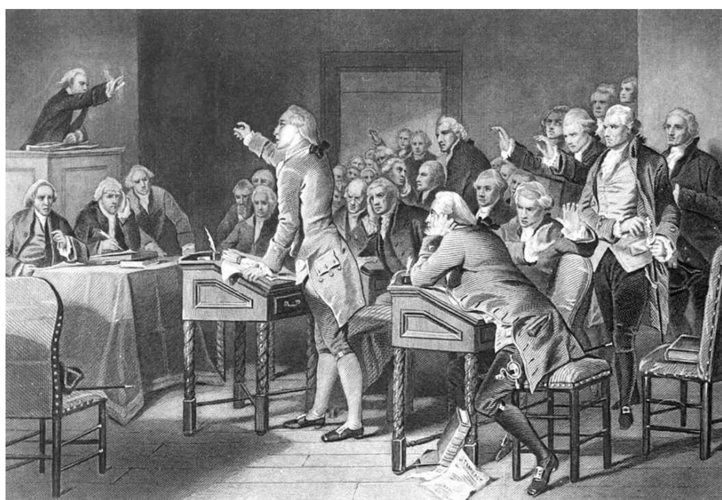
帕特里克·亨利的演讲——当选议员——起草决议——联络委员会——禁食和祈祷日——最叛逆的决议——弗吉尼亚代表大会——殖民地的宣言——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大陆会义代表

上大学的时候，杰斐逊结识了帕特里克·亨利。帕特里克·亨利是一个家庭贫寒、滑稽可笑、默默无闻的乡下人。当时帕特里克·亨利刚刚成年，对法律一无所知。杰斐逊与帕特里克·亨利很快成为挚友。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议会工作时，经常住在杰斐逊威廉斯堡的单人公寓里。1765年5月，帕特里克·亨利掷地有声地发表了反对税收的演讲，成了弗吉尼亚爱国人士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帕特里克·亨利演讲时，杰斐逊站在大厅门口出神地聆听，思考帕特里克·亨利说的“正如荷马所写的那样”意味着什么。帕特里克·亨利才华横溢，颇具吸引力，影响了更多本已蠢蠢欲动的青年，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叛逆者。杰斐逊生性勇敢，追求自由，富有思想，遇事沉着冷静，绝不心浮气躁。那些年，杰斐逊密切关注公共事务。北美大地上独立战争的火种已经点燃，呈澎湃发展之势。杰斐逊对革命颇具同情心，满腔热情地加入了革命队伍。1768年，弗吉尼亚

来了新总督。弗吉尼亚议会必须进行选举。杰斐逊抓住机会积极参与，自荐为阿尔伯马尔郡的候选人。杰斐逊盛情款待来客，准备了喝不完的潘趣酒，站在投票站旁边，彬彬有礼地向投票的选民鞠躬，一切都按照弗吉尼亚当时的风俗进行 [1] 。功夫不负有心人，杰斐逊最终成功当选弗吉尼亚议员。1769年5月11日，杰斐逊开始在弗吉尼亚议会任职。博特托尔勋爵诺伯恩·伯克利代表英国王室发表演说。杰斐逊起草了决议，作为回复的主体部分。谁也没想到杰斐逊起草的决议遭到否决。杰斐逊觉得自己受到了严重的屈辱，于是亲自去回复。1769年5月13日，弗吉尼亚议会通过了一些类似《人权法案》的决议。弗吉尼亚总督博特托尔勋爵诺伯恩·伯克利惊慌失措，认为议员们可恶之极，立刻解散了议会。1769年5月14日，弗吉尼亚所有议员聚集在罗利酒馆狭长的“阿波罗”大厅开会，包括杰斐逊在内共八十八人。会上成立了“禁止进口联盟”，形成了抵制英国商品的决议。该决议上签名的所有议员都由选民重新选举产生。后来，英国“葛斯比”号巡逻艇在纳拉甘塞特湾被殖民地居民烧毁。英国议会做出极端的决定：殖民地的任何居民“摧毁”“水手大衣的纽扣” [2] ，都将被带到英国受审，并处以死刑。1773年3月，弗吉尼亚议会的议员们又一次开会，心情极不舒畅。杰斐逊和其他五六个人私下里进行了磋商。杰斐逊说：“我们的先驱缺乏时代所需的热情和进取心。”会上产生了常务委员会，负责与姊妹殖民地设立的同级委员会通信联络。当时的总督邓莫尔勋爵约翰·默里解散了弗吉尼亚议会。弗吉尼亚联络委员会在议会解散后的第二天开会，向各殖民地发出了邀请信。后来人们无聊地争论，是马萨诸塞还是弗吉尼亚首先用这种联络方式。杰斐逊明确指出，弗吉尼亚领先于马萨诸塞，而且拿出了证据。马萨诸塞人认为，他们比弗吉尼亚早两年提出了这个建议，因没有付诸实践，所以知道的人很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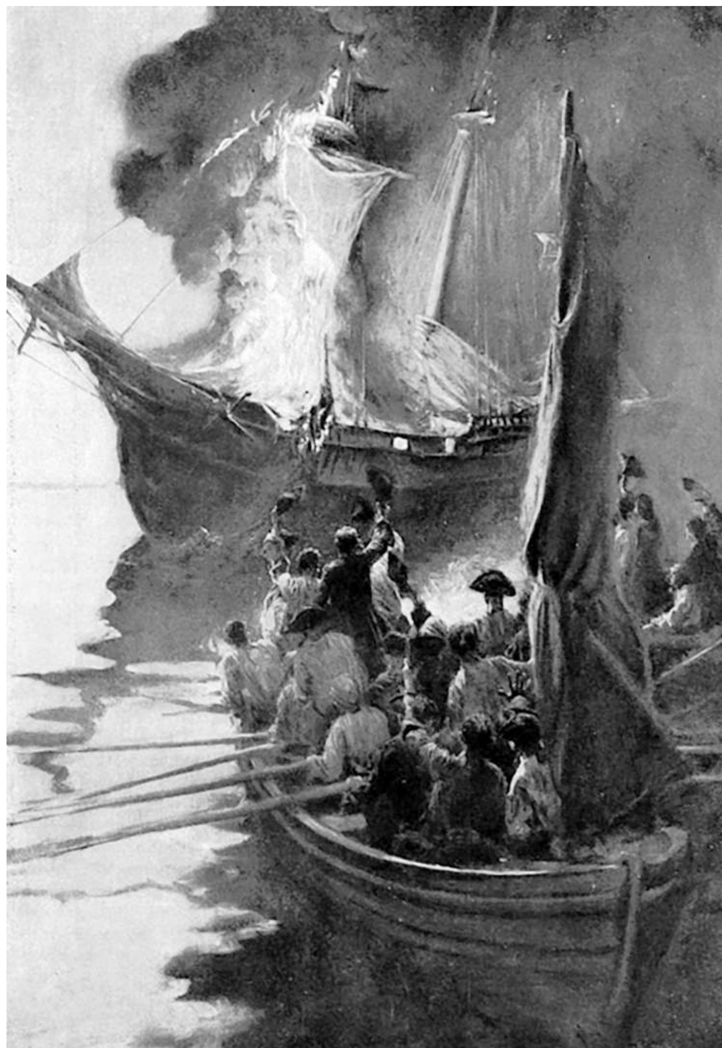
帕特里克·亨利激情演讲



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议会发表演讲

1774年春，弗吉尼亚议会的议员们正在开会，传来了《波士顿港口法案》的消息。杰斐逊和另外十余位议员一致认为“处理这些问题时，众议院的领导席位不应该再留给老议员们了”，并且认为弗吉尼亚“必须英勇地和马萨诸塞站在一起”[3]。杰斐逊与其他议员秘密会面，制定了相应措施，确定了禁食和祈祷日，在弗吉尼亚议会中形成决议，并付诸实践。总督邓莫尔勋爵约翰·默里又一次解散了弗吉尼亚议会。杰斐逊与其他议员又去了“阿波罗”大厅，通过了最叛逆的决议。其中之一是要求联络委员会利用每年殖民地大会的便利条件，向其他殖民地征求意见。还有一项是拟定于1774年8月1日在威廉斯堡举行弗吉尼亚代表大会。阿尔

伯马尔郡的世袭地产保有人再次选举杰斐逊为议员和大会代表。



“葛斯比”号巡逻艇在纳拉甘塞特湾被殖民地居民烧毁



邓莫尔勋爵

去参加弗吉尼亚代表大会的路上，杰斐逊得了痢疾，未能亲自前往。杰斐逊准备了一份提案，希望参加弗吉尼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能将该提案转交给大陆会议。帕特里克·亨利收到了提案副本，却没有传给任何人看，因为他不同意杰斐逊的观点。帕特里克·亨利“也许”懒得去读。很幸运，提案的另一份副本交给了大会主席佩顿·伦道夫。佩顿·伦道夫将其放在桌上，别的议员们正好也看到了。大家认为杰斐逊的提案不错，于是以《英属北美民权概述》为标题，将之刊印成了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传到英国，“被反对派所接受，反对派领袖埃德蒙·伯克先生对其做了补充”[4] 后，在英国广泛流传，很快形成了若干版本。



佩顿·伦道夫

那时的北美殖民地，宣言随处可见。许多“笔杆子”都在起草文件。有政府的，有私人的，有的出了名，有的不为人们所知，但没有一个不是精益求精、生气勃勃、慷慨激昂又言简意赅的。杰斐逊的提案也难免染上俗流。他像别人一样鼓吹自由民主的权利，反对君主压迫。在一篇义无反顾地表达积极进取精神且论证合理的文章中，这些小小的瑕疵又能算得了什么呢？杰斐逊认为，现代英国人的祖先“撒克逊”人也是从别处移民到英国的，“这与英国人移民到美洲殖民地没什么分别。来美洲的移民们没有声称自己有多么优越，也没有人依赖自己的祖国——英国。他们宣称大不列颠国王的臣民们深信祖先们赋予他们的权利，对国家的君主顶礼膜拜，难免脱离实际又显得自命不凡。撒克逊人曾征服了英格兰。英国人与撒克逊人本质上没有差别。英国人征服了北美，将其作为殖民地。北美殖民地的稳固与发展以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为代价，与英国人无关。”



埃德蒙·伯克

英国人对待北美殖民地的方式如同将斧头放在了树根上，只是还没有用力去斩草除根罢了。殖民地与母国的确存在联系。在巧妙的解释之下，这种联系似乎变得微乎其微。杰斐逊说，来美洲新大陆的移民们“臣服于同一君主，继续与英国保持联系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君主协调了大英帝国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是他们的核心。”“英国和这些殖民地的关系正如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即位到不列颠联合王国成立这段时间内的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关系，也像现在英国与汉诺威的关系，除了有共同的君主，再没有别的必然联系。”所以，“英国议会无权干涉北美事务。英国议会如果一意孤行，那就是用自由独立的立法权剥夺了我们的立法独立和自由。”

杰斐逊的革命性言论和不到两年后美国人所期望的《独立宣言》相差无几。要是英国人带杰斐逊去威斯敏斯特大厅的话，这些言论足以让杰斐逊掉脑袋。如果殖民地的暴力反抗延续的时间再长一点，英国人或

许真会带杰斐逊去英国。《英属北美民权概述》的小册子流传不久，英国议会出台《剥夺公民权利法案》，法案中附了一份很长的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人员名单，其中就有杰斐逊的名字。这本小册子也被英国人采取紧急措施抑制在萌芽状态。杰斐逊的支持者们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惊讶，认为“大多数民众并不适应激进式的跨越”。多年后，杰斐逊也坦率地承认，当时民众的选择很明智。1775年4月，鉴于佩顿·伦道夫可能会离开大陆会议，弗吉尼亚的议员们又选举杰斐逊为候补人员。几周后，杰斐逊接替了佩顿·伦道夫的职务。杰斐逊花了不少时间代表弗吉尼亚议会给诺斯勋爵弗雷德里克著名的“橄榄枝”式的“和解提议”写答复。乔治·尼古拉本愿意承担这份工作，可大家担心他的思想已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于是就让杰斐逊起草答复。



詹姆斯一世



诺斯勋爵弗雷德里克

1775年6月10日，弗吉尼亚议会接受了杰斐逊的草案。“乔治·尼古拉和默瑟先生对草案顾虑重重”，稍微修改了一下。杰斐逊认为，这种修改“到处泼凉水，生怕言辞过于激烈。”几天后，杰斐逊带着答复前往大陆会议任职。大陆会议也期望这份答复能成为率先进入英国内阁议题的殖民地答复。

注解：

[1] 詹姆斯·帕顿：《杰斐逊传》，第88页。——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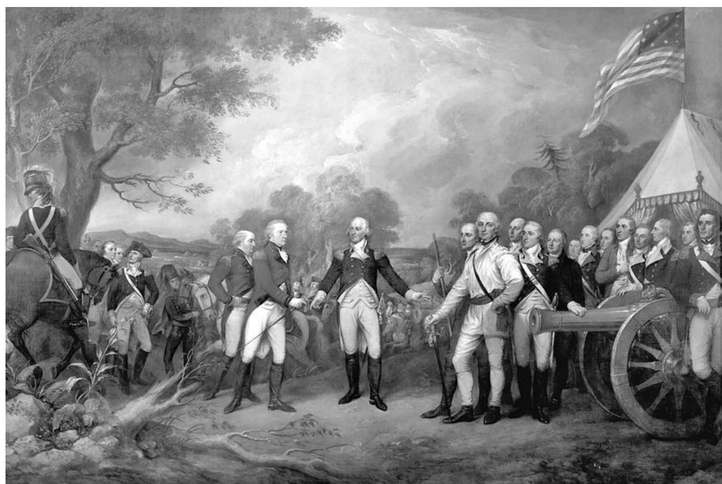
[2] 18纪末，英国海上势力日渐强大，经常派出舰船到殖民地巡逻。此处作者借用“水手大衣的纽扣”指代所有用来保护大英帝国利益的坚船利炮。——译者注

[3] 杰斐逊后来写道，事实证明“亨利、利斯、佩奇、梅森等人大无畏的精神完全符合事态的发展，我全力支持他们的观点。我们的选民很明智，意见一

致，这很重要。我们总希望事情发展得快一点。如果我们放慢了脚步，那些缺乏革命热情的同胞就可能会赶上我们。这些同胞已经改变固有的谨慎，阔步向前，巩固了英国的力量。在大胆与谨慎和谐共存的当下，我们与选民们团结一致，共同奋进，永不分开。”——原注

[4] 亨利·兰德尔：《杰斐逊传》，第1卷，第89到90页。——原注

第3章
大陆会议与《独立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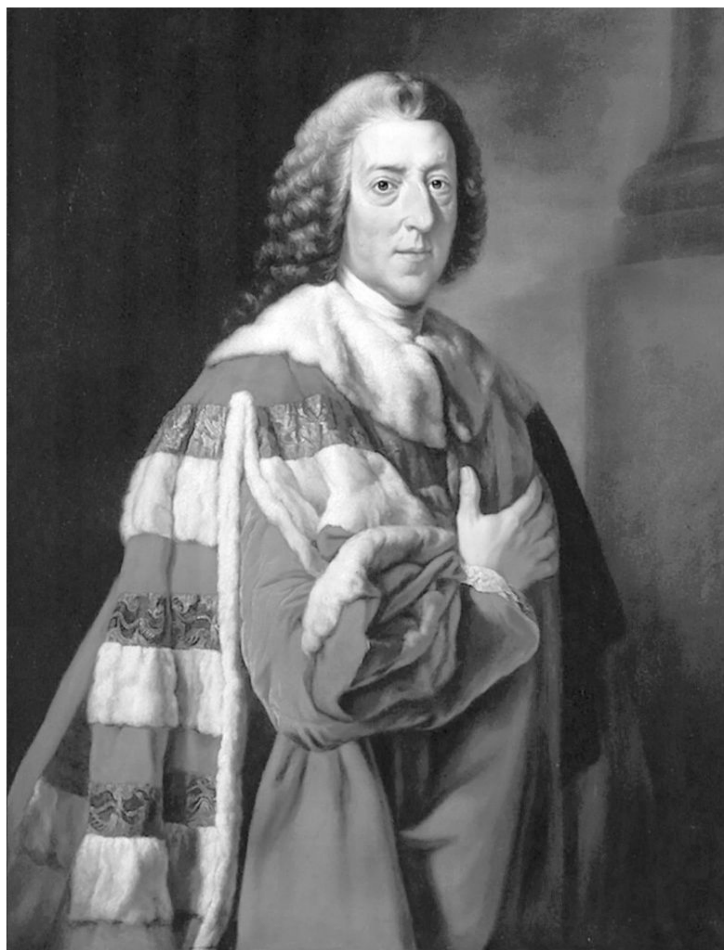
精彩看点

到达费城——讨厌争论——约翰·迪金森的声明——大陆会议委员会成员——代表们的争论——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起草《独立宣言》——讨论理查德·亨利·李的决议——如何对待奴隶贸易——约翰·汤普森的故事——签署《独立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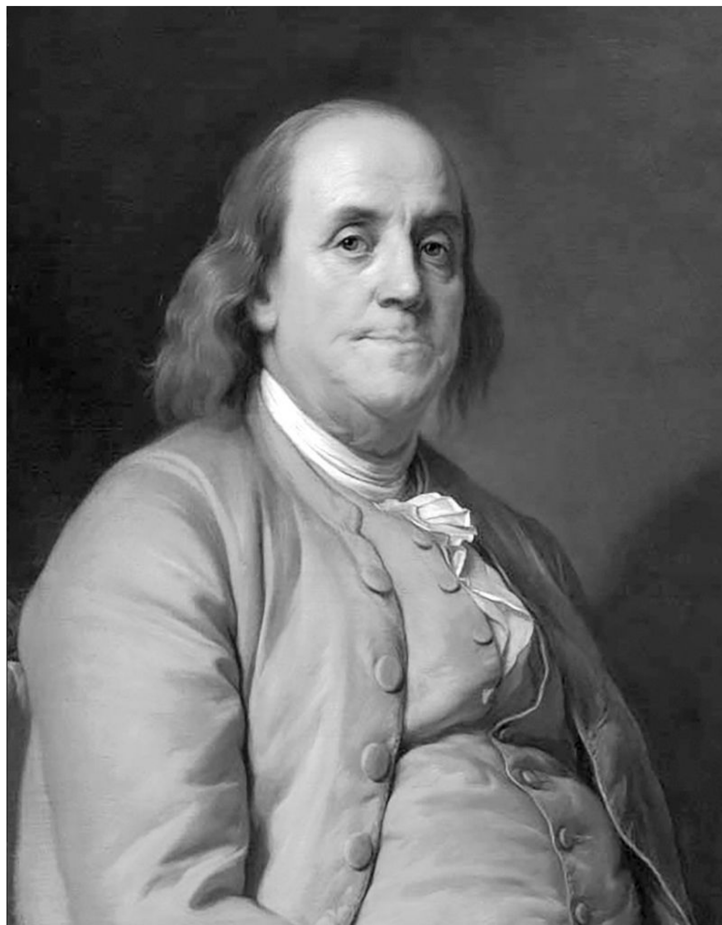
杰斐逊整整走了十天才到达费城，于1775年6月21日参加了大陆会议。查塔姆勋爵威廉·皮特发自内心地说，与会成员们空前优秀。他们推理严密、聪敏睿智、善于总结。三十二岁的杰斐逊与其他几位年轻代表在同一个集体中工作 [1] ，另外还有七十一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七十六岁的爱德华·拉特里奇。几位老者常帮助年轻人。大陆会议的代表们代表着北美殖民地的所有选民。杰斐逊学识渊博，文采飞扬，有主见，一时名声大振。参加大陆会议的大多数人都支持他，认为他前途无量。谁也没有料到，杰斐逊并不擅长辩论。即使在民主讨论时，他也经常讲不好。一方面他声音沙哑，另一方面他生来就讨厌争论。

杰斐逊写文章时见识超群，与别人争辩时却退避三舍。他当然知道议会辩论中有力的武器便是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无论在与人交谈还是开会时，他都将笔、墨水和纸摆在自己面前，看起来非常显眼，似乎要

向人们表明——从十三个殖民地中选出的六十个代表中，他是名副其实的一员。杰斐逊工作能力强，很快取代了约翰·杰伊为大会起草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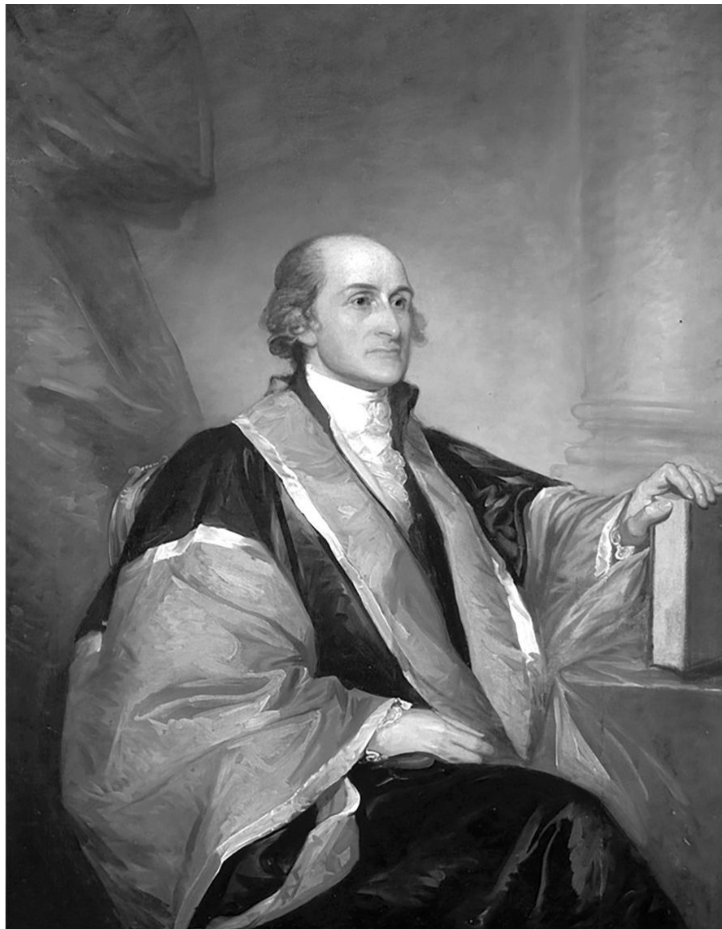


查塔姆勋爵威廉·皮特



本杰明·富兰克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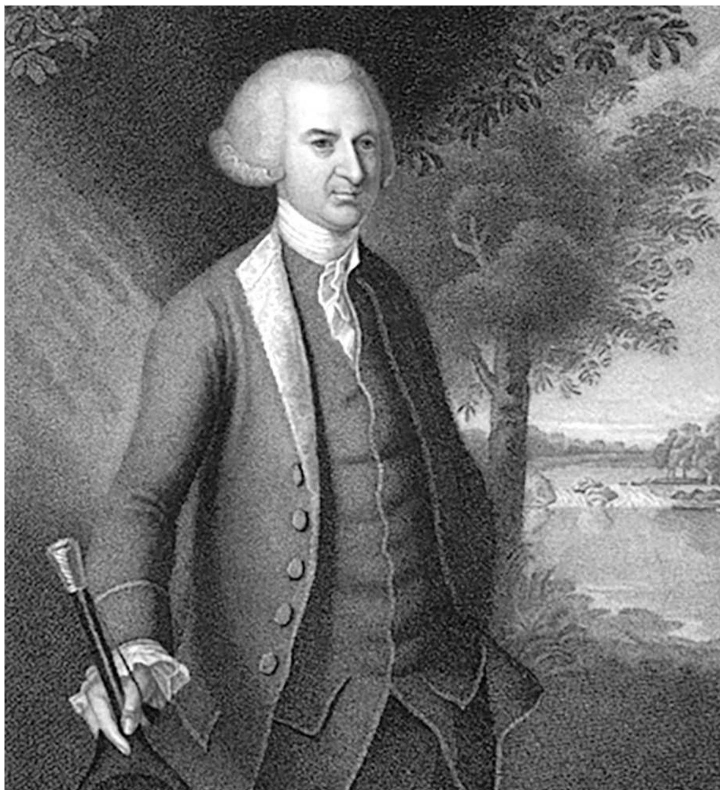
邦克山战役的消息传到费城，与会代表们认为必须发表声明，将这次流血事件公之于世。作为委员会成员，杰斐逊承担了起草声明的工作。出于对约翰·迪金森这位谦恭有礼、受人欢迎的绅士的尊重，同时从政治上考虑也不能太出风头，杰斐逊将自己的文章呈给约翰·迪金森，请约翰·迪金森帮助修改。约翰·迪金森勉强算是一位爱国人士，不太满意杰斐逊起草的声明。约翰·迪金森不愿惹是生非，做事瞻前顾后。他觉得杰斐逊的文章太过犀利，另外准备了一份自认为合适的声明。在声明最后的四个半句子中，约翰·迪金森引用了杰斐逊的话。仰慕杰斐逊的人认为，正是因为这四句半话，约翰·迪金森的文章 [2] 不再空洞无力。这四个半句子的内容意义重大：“我们并不想退出历史悠久的联盟。它的存在让各加盟地区快乐相处。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与英国言归于好。我们与联盟的关系还没有恶化到分道扬镳的地步。”



约翰·杰伊



邦克山战役



约翰·迪金森

一个月以后，因为文章写得好，杰斐逊又交好运。大会委员会的成员以所得总票数确定，然后再按他们各自得票多少排名。杰斐逊在大会委员会中排名第二，受大会委托为诺斯勋爵弗雷德里克的“和解提议”写回复。该回复以给弗吉尼亚议会的回复为蓝本。诺斯勋爵弗雷德里克爽快地接受了，杰斐逊感到十分满意。

几天后大陆会议宣布休会，杰斐逊回到弗吉尼亚代表大会任职。后来，杰斐逊又被选为大陆会议代表，在所有代表中排名第三。

在大陆会议召开之前，与会代表们就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统治、最终走上独立的道路是何人在何时提出的问题争论不休，浪费了许多时间。最终，所有可能看到的证据都搜集了，但结论未能得出。有人考虑与英国对抗的结果；有人焦虑不安，没有主见；有人意气风发，坚决要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因此，大家很难形成统一的看法。在不同的情绪左右之下，人的情感体验有所不同。杰斐逊认为，北美各殖民地脱离英国的日子为期不远，于是就公开声明各殖民地应该脱离英国，并阐述了继续处在英国压迫之下可能产生的一系列灾难。真到了北美各殖民地要脱离英国时，杰斐逊的心情确变得沉重。他犹豫不决，看起来很不情愿。约翰·伦道夫是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检察总长，也是杰斐逊的亲戚，反对殖民地独立，1775年夏准备移民英国。杰斐逊友好而认真地给约翰·伦道夫写信，阐明了自己一些深思熟虑的想法，希望约翰·伦道夫在合适的时候将信呈给英国政府。杰斐逊不赞成人们争论，更反对无休止的混乱状态。杰斐逊说，英国“试图让我们冒着风险接受他们的援助。北美各殖民地要永远脱离英国统治，根本不需要他们帮忙。有些人仍然希望与母国重新统一，认为很难脱离英国。我就是其中的一员，非常愿意依靠英国。说得更清楚一点，我们不能依靠其他国家，也不能没有国家可依靠。我和其他人一样，绝不接受英国议会为我们设立法律的行为。事实表明，他们的行为十分卑劣。我真想亲手将整个英国的岛屿埋葬在海洋中”。以上是1775年8月25日所写的内容。三个月后，杰斐逊更加深情地写道：

> 大英帝国拥有乔治三世这样的国王是一种极大的不幸……早期我们写了请愿书，只想表达一项诉求。我们的诉求没有得到重视，他的诉求又强加到我们身上。英王乔治三世应该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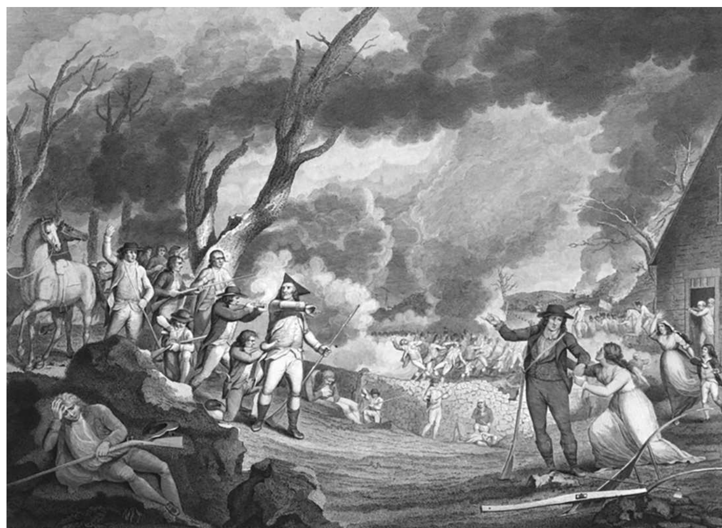
白，如果所有的殖民地都跟他对着干，大英帝国毁灭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英国采取的措施迫使我们不得不马上与他们脱离。他们似乎唯恐我们不这样做。相信我的话吧，亲爱的国王陛下，我们十分热衷于与大不列颠结盟。我们不想通过欺骗或暴力的方式来宣告独立。我们所缺的是决心。这种决心正在国王陛下的亲手培养下迅速成长。或许一次血腥的运动能够决定我们未来永久的事业，可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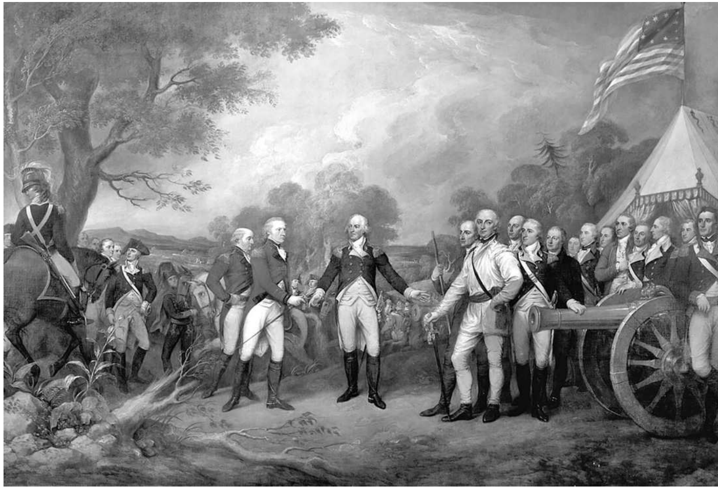
乔治三世

1775年秋，杰斐逊参加了在费城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1776年

初，他回到家乡。1776年5月13日，他当选为弗吉尼亚殖民地的代表，去参加大陆会议。十年前，北美独立运动像冰川运动一样缓慢而有力，十年之后会迅猛发展。在大西洋西岸，托马斯·潘恩 [3] 的著作《常识》中的思想早已漂洋过海，在美洲广为传播，彻底唤醒了人们的意识。自从列克星敦和查尔斯镇的流血事件以来，法尔茅斯被烧毁，诺福克被炸。乔治·华盛顿围攻波士顿取得了胜利，像法兰西人或西班牙人一样，是英国的劲敌。乔治·华盛顿已不是英国的叛逆者，而是彻底与英国决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北美人。如果殖民地不能彻底与英国决裂，那么参加大陆会议的所有人都免不了面对绞刑的绳索。这些时代的佼佼者，无论是军人还是市民，都到了生死关头，要么争取殖民地的独立，要么被绞死。弗吉尼亚代表已向大会提议，宣布“所有殖民地团结起来，争取自由和独立。”1776年6月7日，理查德·亨利·李 [4] 也向大会提交了同样的提议。1776年6月8日和6月10日的辩论中，杰斐逊说，各殖民地的确“还没到成熟得从母体上脱落下来的程度，但它们正在快速达到那种程度”。为了节省时间，防止争论不休，大会于1776年6月11日成立《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辩论时总得给思想“落后者”一些时间赶上思想“超前者”。为了达成一致，大家一直辩论到1776年7月1日。《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成员按得票总数排名，依次为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罗杰·谢尔曼、罗伯特·R.利文斯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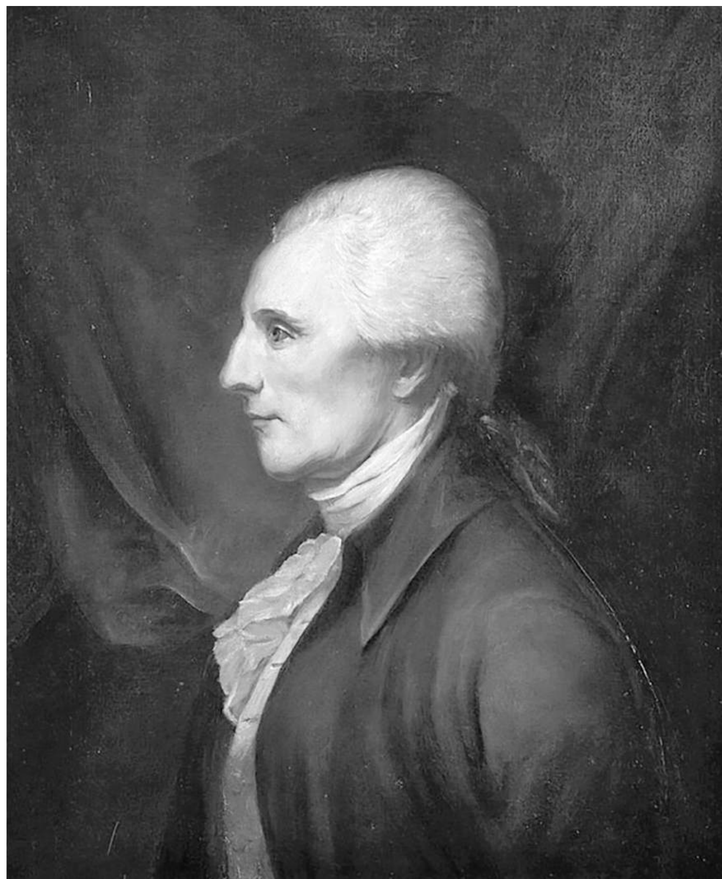


列克星敦流血事件



波士顿之战，乔治·华盛顿将军接受伯戈因将军投降

一百多年来，美国人在孩子启蒙教育阶段就告诉他们，《独立宣言》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最初的手稿后来存放在美国国务院。除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做了几处语言上的修改外，《独立宣言》的内容都出自杰斐逊的手笔。这份宣言的草案最终以杰斐逊所拟为准，提交大陆会议讨论。多年以后，约翰·亚当斯谈起杰斐逊是如何成为这份重要文件的起草者时，说法与杰斐逊本人有点不同。这种小小的差别根本不重要，就像有经验的律师处理案件时，期望从两个诚实的证人证词中发现不一样的地方。有些内容因天长日久而记错了，有些因没有备忘录的帮助想不起来了。杰斐逊的说法似乎更可信，但有待进一步证实，因为叙事者都认为自己说得最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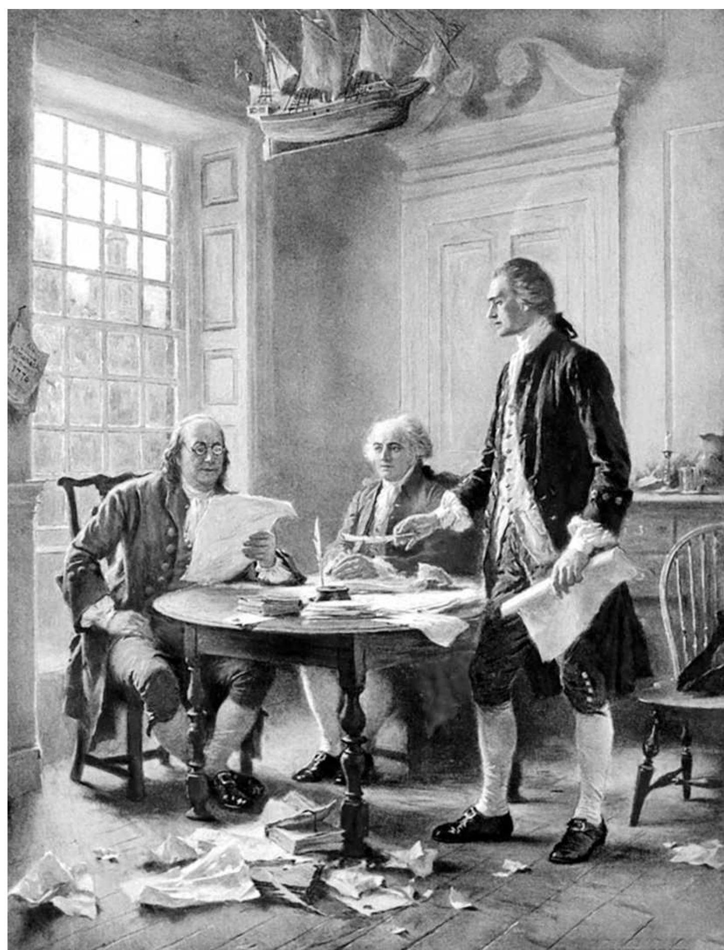


理查德·亨利·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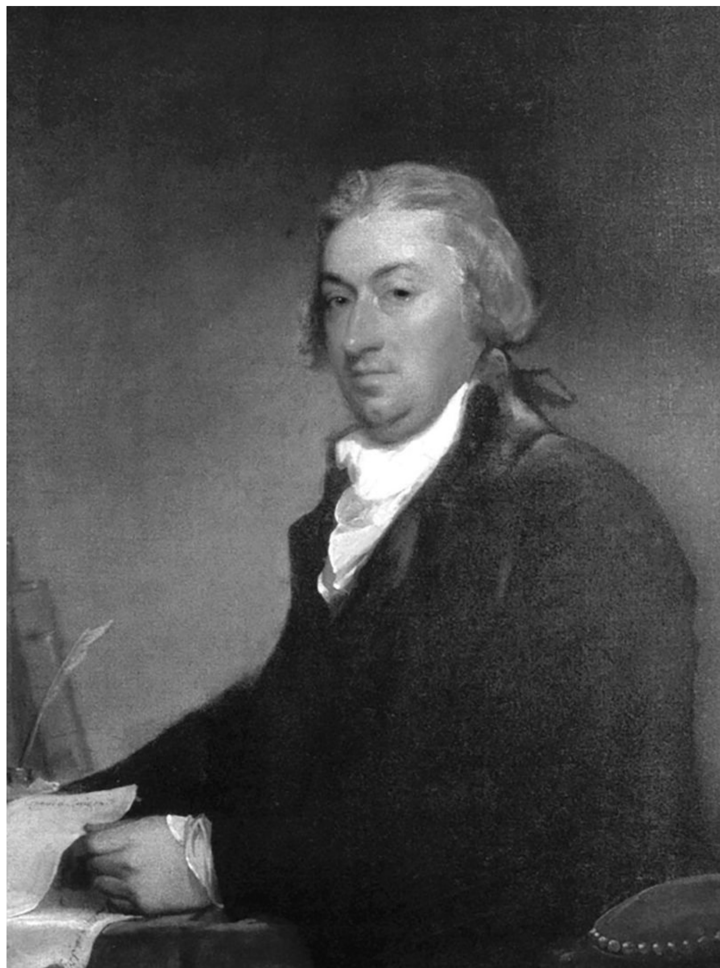
杰斐逊说，在委员会会议上，同事们一致同意让他起草宣言。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担此重任。草案完成之后，杰斐逊又向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和约翰·亚当斯先生征求修改意见。他们“只做了两三处语言上的改动”，“修改意见就写在字里行间”。《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通过了该草案。杰斐逊又照原文抄了一份，提交大陆会议。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值得商榷。为什么《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名单上杰斐逊的名字排在第一，而没有理查德·亨利·李的名字？理查德·亨利·李是决议的最初倡导者。按照大会礼仪，他应该担任大会主席。对此有很多说法，其中有的是讲述者根据自己的嗜好杜撰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杰斐逊没有政敌，所以是完成这份特殊而艰巨的起草任务的最佳人选。激烈的争辩中，杰斐逊能很好地调控情绪，从来不发怒，也不激怒别人。

当时杰斐逊所在的著名集体内派系林立。各派不乏阴谋诡计，少不了拌嘴斗舌，充溢着人类不和谐的因素，时常让人心痛不已。其中就有反对乔治·华盛顿的派系。人们都怀疑是约翰·亚当斯和弗吉尼亚贵族气十足的利斯在从中作梗，和自己的同胞唱对台戏。约翰·亚当斯坦率地说，自己不太受人欢迎，理查德·亨利·李根本不可能与自己做朋友。反对乔治·华盛顿的只是派系小圈子内的人，根本算不上什么党派，但数目不小。约翰·杰伊与理查德·亨利·李之间也有个人恩怨。理查德·亨利·李的妻子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生病了，他便以此为借口溜之大吉。杰斐逊在《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中排在第一的位置，自然要承担大量的工作。一方面能者多劳，另一方面如此重要的工作容不得掺杂半点个人恩怨。



起草《独立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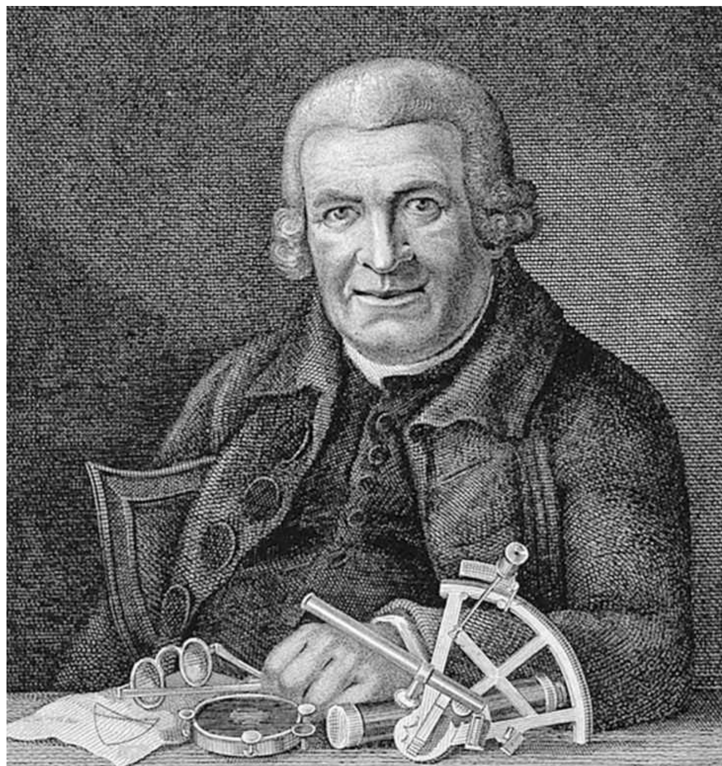


罗伯特·R.利文斯顿

1776年7月1日，依大会日程安排，大陆会议全休委员会成员重新讨论理查德·亨利·李提出的决议。九个殖民地赞成该决议。南卡罗来纳和宾夕法尼亚投了反对票。特拉华的两位代表意见不合。纽约的代表们表示，就个人而言，他们完全同意该决议，相信纽约的选民们也会同意，但1775年纽约殖民地议会决议认为，与英国和解很有可能，绝不允许任何人阻碍和解。爱德华·拉特里奇[5]宣布休会一天。部分代表本不同意他的决定，但为了全体一致，只得少数服从多数。第二天，南卡罗来纳的两位代表改变了立场，特拉华有代表寄来了信件，同意投票赞成。宾夕法尼亚同样改变了主意。几天后纽约殖民地议会也支持了该决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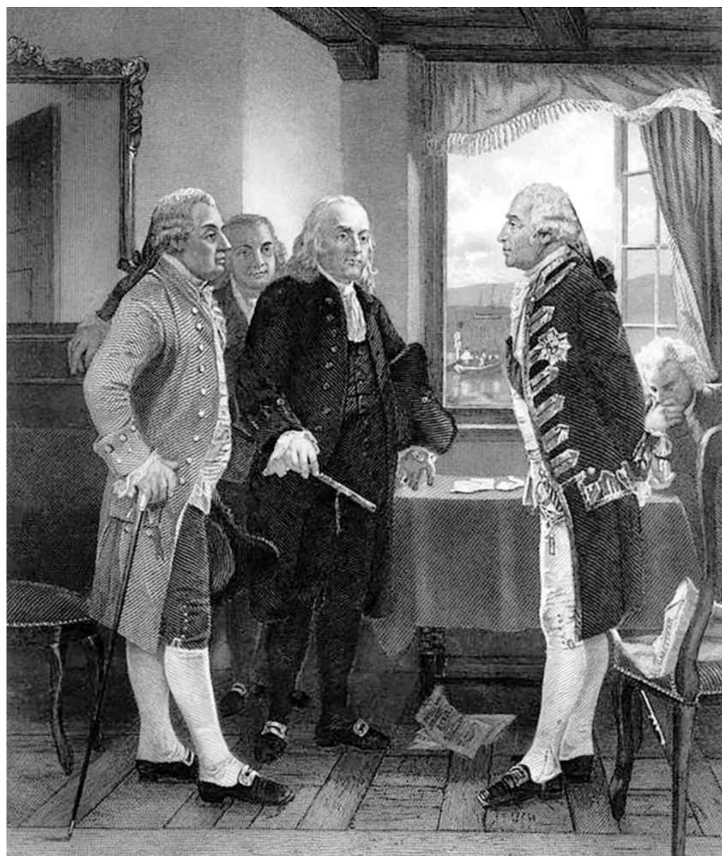


乔治·华盛顿



约翰·亚当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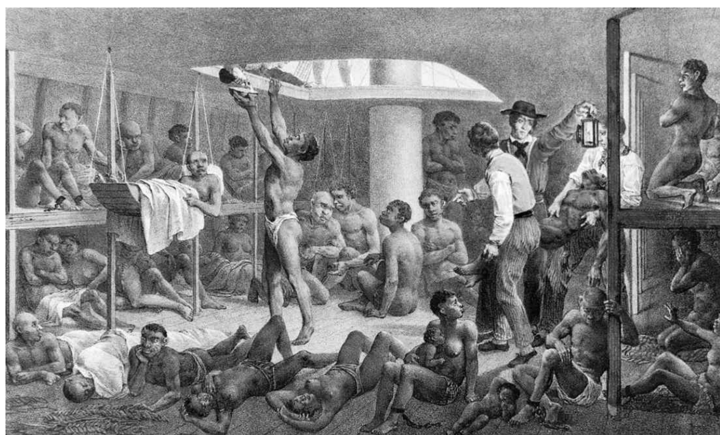
1776年7月2日，大陆会议接受了杰斐逊先生的《独立宣言》草案，作为当日以及接下来几天的议题。辩论一直持续到1776年7月4日下午很晚的时候。在辩论过程中，代表们对草案的语言做了多处修改。大部分修改有助于更加准确地表述。有两三处直接被删去了。删去的部分中，杰斐逊公开指责英王乔治三世支持奴隶贸易。就奴隶贸易而言，北方的贩奴者执意保留，南方的购买者更不愿意停止。英王乔治三世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南方殖民地千方百计想通过立法来制止奴隶贸易。英王乔治三世始终不愿意批准禁止奴隶贸易的法案。南方殖民地的努力化为泡影。以此为由来攻击英王乔治三世恐怕有失偏颇。杰斐逊写道，英国在北美招募雇佣军意味着“我们永远失去这些无情的弟兄”，让我们“努力忘却以前曾对他们充满爱意，而像对待其他人那样对待他们。战争中是敌人，和平时是朋友。”在会上，这段话也被删去了，与会代表普遍认为最好不要说任何谴责英国人的话。除了删去的部分外，最终也没有增加新的内容。



爱德华·拉特里奇（左一）与同僚

辩论的结束完全值得杰斐逊庆贺。三天以来，草案多次受到尖锐的批评。杰斐逊一直非常郁闷。在辩论中，杰斐逊一言不发，或许担心自己在激烈的唇枪舌剑中落败，或许认为“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后，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听到别人刻薄地批评几处内容时，杰斐逊很痛苦。坐在旁边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给杰斐逊讲帽子制造商约翰·汤普森 [6] 的故事“来安慰他”。杰斐逊很明智地避开了与约翰·亚当斯的辩论。整个辩论中，约翰·亚当斯一往无前。杰斐逊称他是“辩论巨人”。后来每当杰斐逊说起当时的情况，常常会给这庄严的时刻添上一点滑稽可笑的色彩，并以此为乐。杰斐逊说，当时的辩论好像没完没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结束。天气异常闷热，会议室里挤满了各地的代表。会议室旁边是个马厩，饥饿的马蝇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落在在代表们的腿上，隔着他们薄薄的丝袜使尽咬。代表们迫不及待地投票赞成后，赶忙到桌子上签了名，迅速离开会场，以避开这些可怕的马蝇，似乎叛国事小，舒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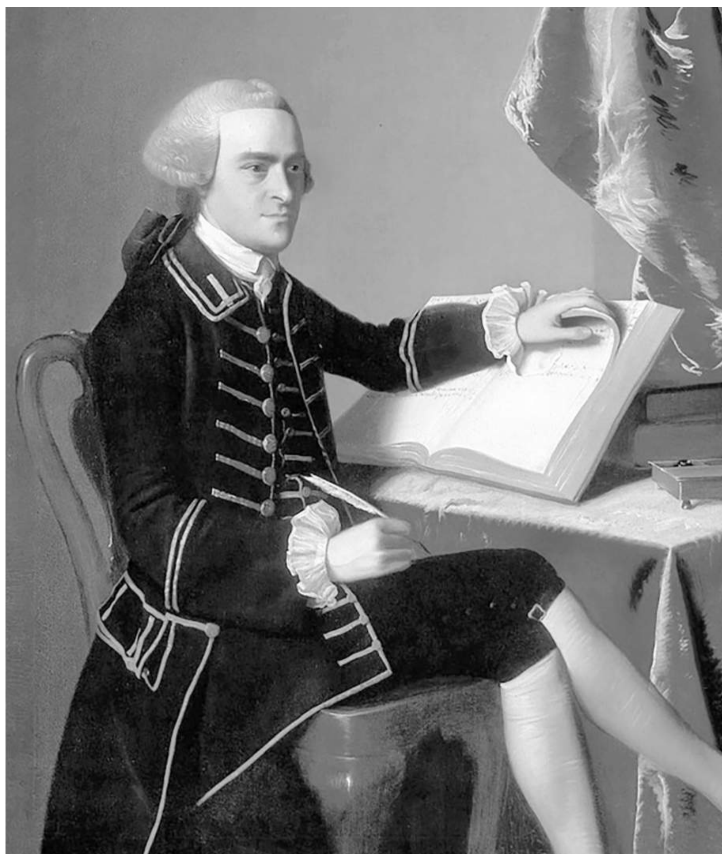
大。约翰·汉考克 [7] 以大家熟悉的大字体签名，并开玩笑地说，那些“约翰牛” [8] 不戴眼镜也能看见。然后，他突然严肃起来，强调大家必须“团结一致”。“是的，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否则我们一定会被一个一个地绞死。”本杰明·富兰克林打断了约翰·汉考克的话。本杰明·哈里森 [9] 接着说：“执行绞刑时，弗吉尼亚雍容华贵的绅士，马萨诸塞的瘦小子埃尔布里奇·格里 [10] ，都统统往后站。我要先于你们在空中蹬腿而去。无论干什么我都不能落在别人的后面。”那个夏日的黄昏，看到自己亲手执笔起草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签署通过，杰斐逊的心情隐约有点儿沉重。杰斐逊是殖民地忠诚的“送葬者”，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接生婆”。



奴隶在运奴船中生活的场景



奴隶贸易：运奴船抵达北美海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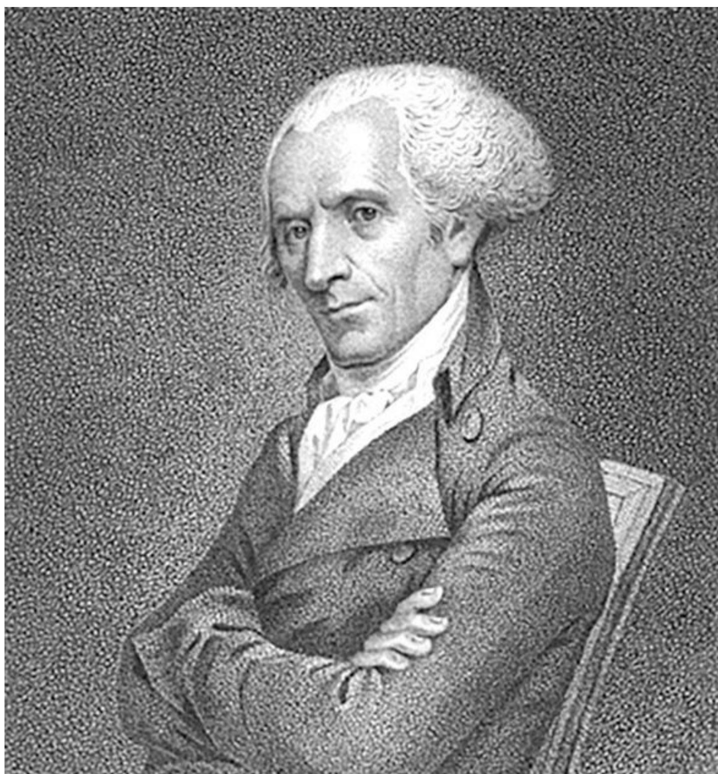


约翰·汉考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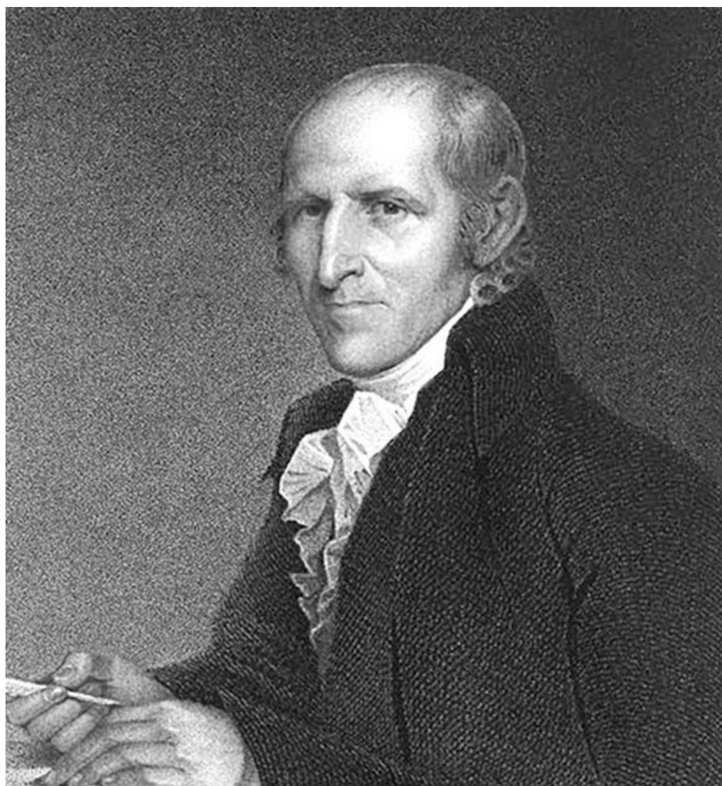
吹毛求疵地批评这份宣言真是多此一举。在五千万同胞心目中，它就像主祷文一样熟悉。文中所谓的瑕疵主要是受到当时的文风和时代精神的影响。杰斐逊勇猛果敢、积极向上。他的精神理智而独立，最能激发人们的行动，但将他的精神写在文章中或直接说出来，就难免有点像在宽泛地夸夸其谈。约翰·亚当斯和蒂莫西·皮克林[11]后来特别憎恨杰斐逊，认为他是政治上的恶魔，指责他的文章没有创造性，每个观点都那么陈腐，一半是别人以前公开讲过的内容。文中的主张既正确又荒谬，同时还有点存心不良。北美殖民地人民争论了好几年，打了好几个月仗，不会不清楚自己信奉什么学说，追求什么目标。有些人偏要鸡蛋里面挑骨头，尽做些荒唐的事情。杰斐逊认为乱哄哄的争论根本不是什么明智之举。面对别人的指责，杰斐逊的回应合理而富有智慧，“有人说我的主张是别人已经提出的观点，可我从来不认为这是对我的指责。”



签署《独立宣言》



埃尔布里奇·格里



蒂莫西·皮克林

有人说，人人生而“平等”的说法容易让人误解，可有哪个智力正常的人误解过，除非是故意的。对那些毫无意义的批评要漠然视之。《杰斐逊传》的作者塔克教授公正地评价了《独立宣言》。他说，这篇大作“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地位，任何赞美之辞都是多余的，任何批评也是徒劳的”。

注解：

[1] 杰斐逊常说自己是这里“唯一最年轻的人”，其实这种说法不太准确，除了爱德华·拉特里奇生于1749年，约翰·杰伊生于1745年外，这儿还有别的年轻人。——原注

[2] 最后几段的作者没有确定为杰斐逊，而是约翰·迪金森。能证明最后几段是约翰·迪金森所写的证据明显不足，而且与杰斐逊在《自传》第11页中的主张不一致。杰斐逊的主张也有合理之处。之所以说它们是约翰·迪金森写的，是因为这些话包含在约翰·迪金森的文章之内，由此推断而已。见美国杂志《纪元》，第八期，514页。——原注

[3] 托马斯·潘恩（1737—1809），英裔美国思想家、作家、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革命家、激进民主主义者。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撰写的小册子《常识》极大地鼓舞了北美人民独立的斗志。——译者注

[4] 理查德·亨利·李（1732—1794），美国政治家、演说家，两届大陆会议的弗吉尼亚代表。在第二次大陆会议上，他提出了著名的“李决议”，是第一个提出摆脱英国统治而宣布独立的大陆会议代表，也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译者注

[5] 爱德华·拉特里奇（1749—1800），美国独立初期的政治家，起先反对美国独立。后来，因其他人都同意独立，他也跟着签署了《独立宣言》。——译者注

[6] 第二次大陆会议期间，杰斐逊所起草的《独立宣言》在讨论时受到别人尖刻的批评，杰斐逊很痛苦。为了安慰杰斐逊，富兰克林讲了帽子商人约翰·汤普森的故事。约翰·汤普森开了一家帽子店，拟了一块招牌，上面写着“约翰·汤普森制作并出售各式礼帽”，还在招牌下面画了一顶帽子。约翰·汤普森认为招牌很醒目，可他的朋友们不以为然，多次提出修改意见，最后只剩下名字和帽子图案，几经删改后招牌更加简洁、醒目。杰斐逊听了这个故事，开始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译者注

[7] 约翰·汉考克（1737—1793），美国革命家、政治家，富商出身，《独立宣言》第一个签署人。英文中“约翰·汉考克”成为亲笔签名的代名词。——译者注

[8] 约翰牛是英国讽刺小说《约翰牛的生平》中主人公。他是一位头戴高帽、足蹬长靴、手持雨伞的矮胖绅士，愚笨而且粗暴冷酷、桀骜不逊、欺凌弱小。后来，他成为英国人自嘲的形象。国际上也用“约翰牛”指代英国人。——译者注

[9] 本杰明·哈里森也叫本杰明·哈里森五世，美国第9任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的父亲，大陆会议代表，在《独立宣言》上签了字。——译者注

[10] 埃尔布里奇·格里（1744—1814），美国外交家、政治家。他是大陆会议代表，曾在《独立宣言》上签字。1813到1814年任美国副总统。——译者注

[11] 蒂莫西·皮克林（1745—1829），美国政治家、联邦党人，1795到1800年任美国国务卿，1803到1811年任参议院议员，1813到1817年任众议院议员。——译者注

第4章
弗吉尼亚的革新与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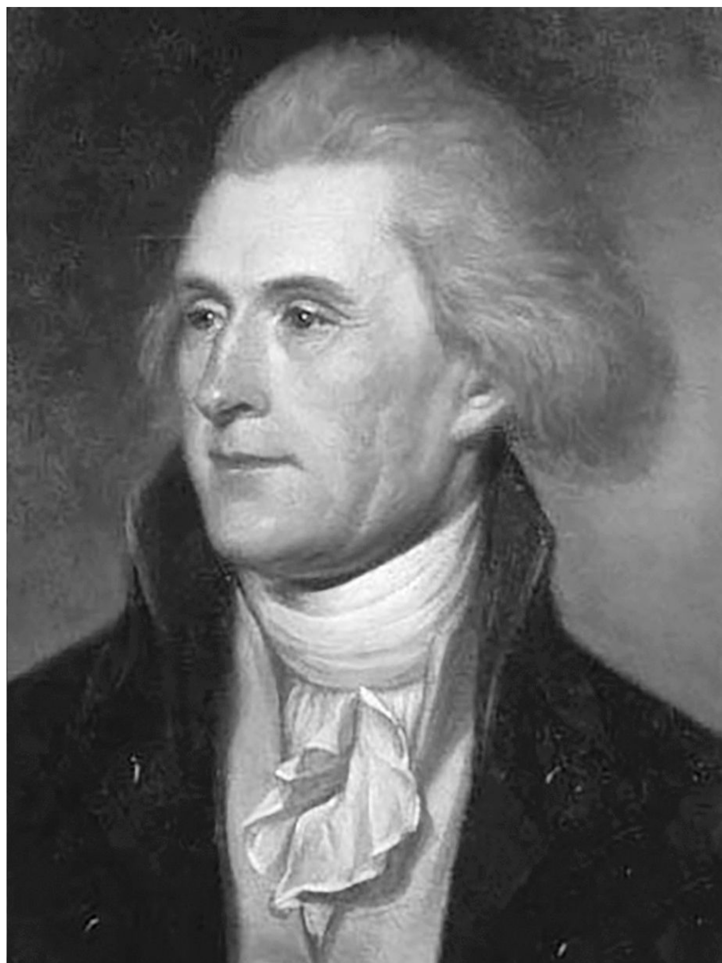
精彩看点

拒绝担任大陆会议代表——共和政府——废除限嗣继承制——摧毁贵族制度——宗教改革——修改弗吉尼亚法律——创新学校体制——反对奴隶制

1776年6月20日，杰斐逊拒绝再次担任大陆会议的代表。当时，他的理由是“家中有事”，要办理“私事”。弗吉尼亚议会没有允许杰斐逊去打理家事。多年以后，杰斐逊说出了当时不想参加大陆会议的另外一个原因：“1776年，我要离开大陆会议。当时认为，我们要重新审视所有的法典，让其适应共和政府的形式。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没有议会、州长、国王的消极限制。所有法案都应该修订，以便更好地服务于

共和政府。我们应对民众怀有好感，要理性地看待问题。”“在君主制国家，立法有许多缺点。我们要抓紧时间进行改革。我要在推进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前殖民地很容易以独立国家的形式重新组织起来。1777年8月13日，杰斐逊给本杰明·富兰克林写信：“弗吉尼亚的民众已将君主体制抛在脑后，纷纷选择了共和政府，就像脱掉旧衣换上新装一样惬意。我们现在正静下心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有条不紊的政府工作中。”政府形式转变得很快，别的方面进行变革的时机也随之成熟。当时，革命、破坏和重建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全面改变已有法律和社会形势的时机也已来临。民众就像刚刚犁过的田地。政治种子的散播者们正将新的观念和新创的学说撒向“田间”，满怀期待，盼着早日收获。杰斐逊是激进的改革家，知道改革的机会已经悄然而至，便满怀热情地去承担责任。杰斐逊用自由之手将强壮而健康的种子播撒在早已开好的犁沟里。一部分种子立刻生根发芽，大部分种子却长期埋在地下。十年后，杰斐逊任议员的两年中所起草的法案大部分成为法律。通过努力，杰斐逊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弗吉尼亚的政治经济制度。当然，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并非杰斐逊一人独自奋斗的结果。乔治·梅森、乔治·威思以及新来的年轻人詹姆斯·麦迪逊都是杰斐逊的得力助手。



18世纪80年代的杰斐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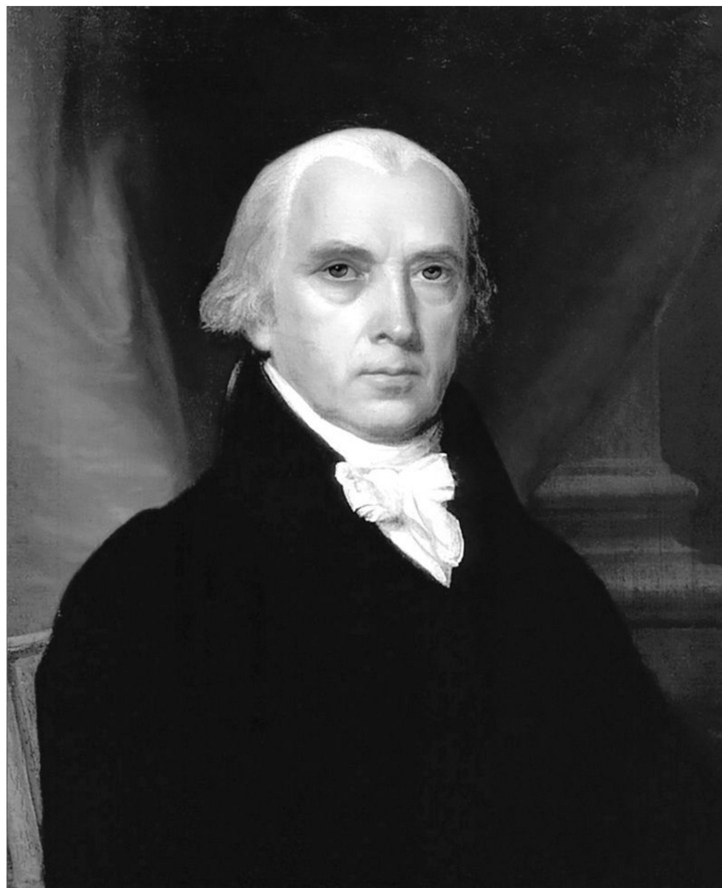
1776年10月7日，杰斐逊在弗吉尼亚议会任职。其间，他参与了多个委员会的工作。1776年10月12日杰斐逊获得议会许可，制定了一项法案。该法案规定限嗣继承财产保有人有绝对的权利和自由处理所继承的财产。1776年10月14日，杰斐逊又制定法案废除了限嗣继承制。在弗吉尼亚，土地和奴隶被当作最珍贵的财产代代相传。法律保护财产所有者的利益，也保全了他们奢侈的生活方式。杰斐逊大胆地提出了废除限嗣继承制，贵族们苦不堪言。这项建议是在一次大会上提出的，参加会议的人中不乏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只考虑自家的利益，严正捍卫旧的制度。一般情况下，改革只有经过激烈的辩论后才能缓慢进行。杰斐逊这项突如其来的改革让人们惊讶不已，感到无所适从。弗吉尼亚的限嗣继承制几乎在一天内分崩离析，贵族阶层顿时黯然失色。

随后，长子继承制也被废除。贵族阶层不断指责杰斐逊。埃德蒙·彭德尔顿 [1] 乞求道，如果长子不能继承父亲的全部土地和奴隶，那么就让长子多分一份财产。杰斐逊说，长子不能同时吃两份饭，不能同时干两份活，没有理由多分财产。这样一来，如死者未立遗嘱，子嗣们可以平分财产了。当时的贵族们都偏向长子，但法律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很大，遗产分配的差别很快就消失了。

短短的几个月中，杰斐逊博爱慈善、满怀信心，推动了弗吉尼亚的社会变革。后来，他说起当初自己发起各项改革“不是为了威胁或伤害富有的贵族阶层，而是为了给贵族们打开美德和智慧之门，让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会有所贡献，多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杰斐逊也为自己辉煌的胜利付出了代价。他摧毁了贵族中等级制度，昔日的贵族自然痛斥制度的破坏者，长期怀恨在心。贵族家庭第二代、第三代的子孙们恶意诅咒这位政治家，伺机报复，因为是斐逊让他们和普通民众平起平坐。



乔治·梅森



詹姆斯·麦迪逊



埃德蒙·彭德尔顿（右）与同僚

杰斐逊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是圣公会。杰斐逊的宗教观念让他的传记

作家们感到很头痛。他们费尽心思让杰斐逊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从来不管杰斐逊的自由思想。没有证据证明杰斐逊这一时期的信仰究竟是什么，但他的确没有藐视也没有公开反对过基督教。杰斐逊对基督教教义持包容的态度，而不是顶礼膜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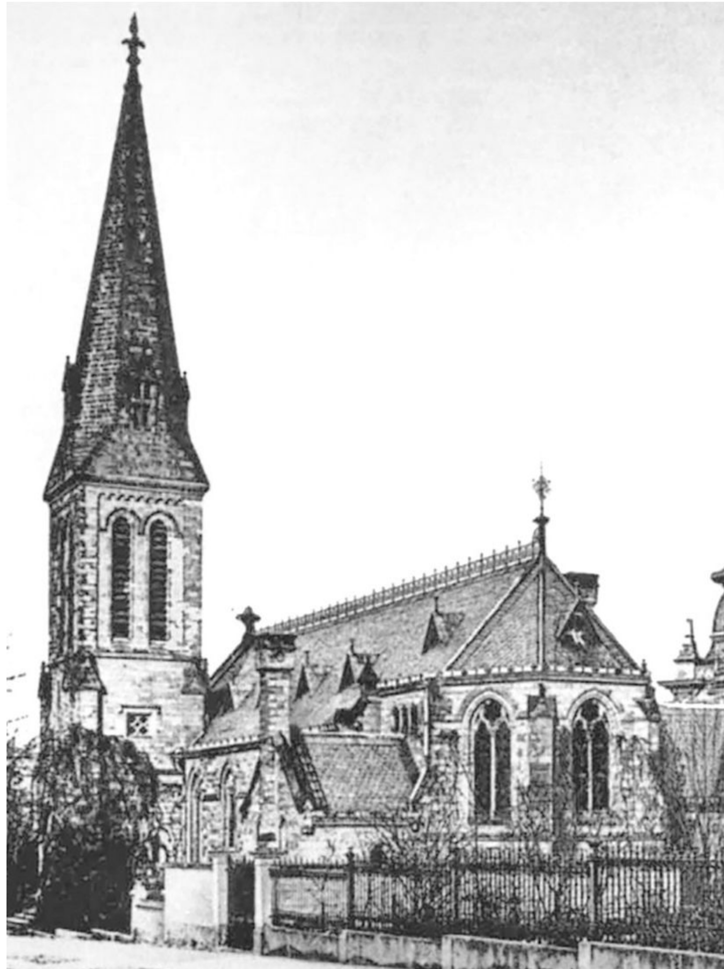
1787年8月10日，杰斐逊写信给尚未成年的儿子彼得·卡尔，用相当长的篇幅详述了宗教问题。他告诉儿子："要独立地审视宗教问题。"杰斐逊对这句话的解释苍白无力，就像一个执法如山的法官痛苦地面对陪审团的指控而不能做出判决一样。面对特殊且棘手的宗教问题，模棱两可的态度反而成了一种消极的偏见。杰斐逊指出，基督教教义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不能教条式地维护。尽管杰斐逊格外小心，试图隐藏自己的偏见，但人们本能地认为这封信不是出自一个基督教信徒之手。若是杰斐逊虔诚地信奉基督教，就不会把一个年轻人置于信仰和不信仰的两扇门中间，把两扇门都打开，但没有指明怎么走是对的，怎么走是错的。关于杰斐逊是否信仰基督教的问题，任何推断都没有真正的依据。唯一有必要说的是，1777年，杰斐逊对当时弗吉尼亚中世纪式的宗教立法十分憎恨。

杰斐逊在"砍伐"社会改革中的"障碍之木"时坚强有力，也要将宗教中的"朽木"收拾得干干净净。这看起来苟延残喘的"干枝"进行了强烈的抗争。杰斐逊所要的是彻底的宗教自由，就是美国现已广泛存在的这种宗教自由。为了能够建立良好的开端，杰斐逊只能从说服议会议员开始。议会主要由神职人员把持。随后的几年中，在杰斐逊的推动下，立法者们最终达成一致，同意杰斐逊宗教改革的建议。杰斐逊起草的《宗教自由法案》顺利通过。有人修改过该法案，但只是隔靴搔痒式地做了一些补充。1786年，杰斐逊宗教改革的目标完全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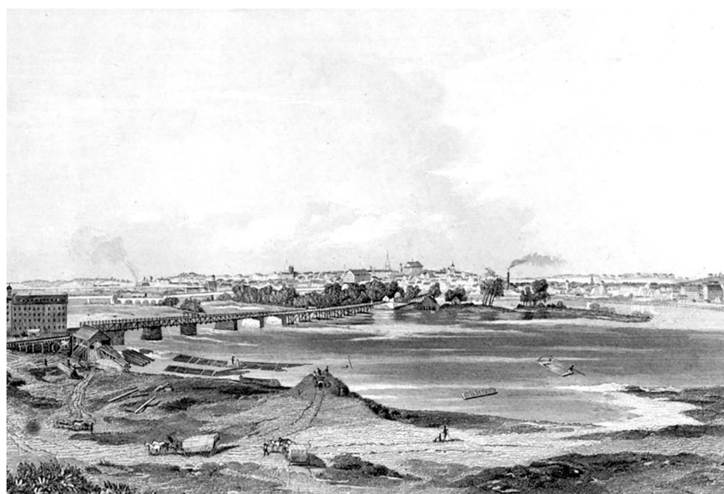
作为一名议员，杰斐逊是唯一在改革中获得成功的人，是不计其数的民众的代言人，是势不可挡的社会运动的领导者。大多数人都对美国圣公会 [2] 颇有异议，决定不再资助它。杰斐逊说："源源不断的请愿书涌向第一个共和立法机构，要求废除宗教暴政。"杰斐逊感到自己的坚强后盾便是无数优秀的民众。他们虽然有点无知，但人数众多。很难想象，面对民众大声的抗议和喧哗，杰斐逊是如何纠正他们的错误认识，如何劝说一些被误解的人们的。早期的从政生涯中，杰斐逊常常与群众

同甘共苦，用心聆听他们的抱怨。杰斐逊站在高处，算不上口齿伶俐，但别人能理解他说什么。民众的大声呼喊使他倍受鼓舞。民众的广泛参与使他获得了力量。民众的称赞使他的信心更加坚定。

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任职期间，杰斐逊担任五人委员会的领导，负责修改弗吉尼亚法律。繁重的工作大大超出了杰斐逊应有的工作量。法律修改委员会的报告不仅肯定了杰斐逊的立法活动，而且提到了其他重要事项。弗吉尼亚州政府所在地从威廉斯堡的商业中心迁到里士满的一个村庄。村庄虽小，却位于里士满的中心。后来，别的州政府选择所在地时，都纷纷效仿弗吉尼亚的做法。一项促进外国人迅速同化的法案为国家以后处理同类问题提供了范式。该法案因未提出进行知识、智力、健康等检查，就轻易允许接纳外国人而受到谴责。处理大部分事情时，杰斐逊很民主。在个别事情上，杰斐逊却与自己一贯的做法大不相同，显得不太合乎情理。当时制定的刑法典改进了残忍而严厉的旧刑法典，但不合理地保留了同态复仇，既不合情理也有悖于杰斐逊的初衷。杰斐逊还精心设计了一套学校体制。富裕的种植庄园主们出于狭隘的偏见，没有将这套体制全面采纳并合理地付诸实践。



美国圣公会



杰斐逊任弗吉尼亚议员的两年中，弗吉尼亚颁布了大量的法律，大部分长期以来都未曾改变过。杰斐逊所制定的法律为北美殖民地的刑法提供了深厚的法律渊源。立法机构不时地援引杰斐逊所制定的法律，直到独立战争结束后，这种援引才停止。后来的立法以杰斐逊制定的法律为基础，并未改变多少。如果将1786年至1787年弗吉尼亚的法律称为“杰斐逊法典”的确有点夸张，但他的思想渗透到每一部法律当中。尤其是社会立法方面，杰斐逊的影响力很大。

解放奴隶的任务任重而道远。杰斐逊和几位仁慈而高尚的助手为解放奴隶而做的努力彻底失败了。弗吉尼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杰斐逊虽然没有像他的朋友乔治·威思一样解放自己的奴隶，但很早就强烈反对奴隶制。当时，许多善良而明智的弗吉尼亚人都反对奴隶制。法律修改委员会的成员们没有深入思考这个难题，没能消除弗吉尼亚奴隶制的弊端。法律修改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满足于以前的法律，在修改法律时“仅对现有法律做了解释，没有任何彻底解放奴隶的计划，也没有以修正案的方式增加解放奴隶的内容。后来的修正案规定，同意给某一天以后出生的奴隶自由。达到一定年龄后，这些奴隶就被送境外。”这些计划都未能实施。1821年杰斐逊在自传中写道：“公众在思想上不愿接受解放奴隶的提议，即使到今天也难以接受。但在不远的将来必须接受，否则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法律如果不规定给予奴隶的自由，那么还能规定什么？”杰斐逊和具有先见之明的同行们有幸说服了弗吉尼亚人。他们的远见已超出了所处的时代。他们正在进行着一项伟大的事业。然而，如果详细审视杰斐逊的计划，计划刚开始，杰斐逊失败的命运就注定了。解放奴隶的法案通过后，“由奴隶所生的黑人将获得自由。达到一定年龄之前，他们要和父母住在一起。然后由政府出钱，依他们各自的天赋，让他们学习耕种、艺术和科学，直到女性满十八岁、男性满二十一岁。作为奴隶的黑人住在殖民地时，政府可以提供工具，让他们安家，学习手工技术、播种技术以及饲养家畜等本领”。然后，“宣布他们为自由独立的人，属于我们这个联盟，受我们保护。待他们足够强壮时，将他们装在船上，运到世界别的地方，再运回数量相等的白人。同时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吸引白人移民美国。”[3]

杰斐逊认为，这个耗资巨大而又精心设计的计划可能得以实施。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杰斐逊思想中最致命的弱点。他常常陷入幻想，只凭自己的感觉做出判断，根本不管计划可行不可行。当时，杰斐逊等时代骄子们都在创建社会和政治学说，敢于针砭时弊，善于把握时代潮流。

在早期，奴隶制问题似乎难以解决。杰斐逊的种族观使奴隶制问题变得更加无法解决。通过观察，杰斐逊完全相信所有白人都认为黑人的智力不如他们。杰斐逊认为“两个种族，即使同样自由，也不能由同一政府管理”。他认为，如果两个种族处在同一政府之下，将会使“弗吉尼亚四分五裂，出现动乱。只有其中一个种族消失了，动乱才可消除”。杰斐逊未能提出与解放奴隶有关的更好的方案。在殖民地时期，杰斐逊多次试图禁止进口奴隶，但在英国的阻挠下，最后只能不了了之。1778年，“在弗吉尼亚共和政府第一次会议上”，杰斐逊又提出停止奴隶进口的法案。该法案顺利通过后，杰斐逊很高兴。他说：“要阻止这种道德和政治上邪恶的观点继续发展。民众的意识已日渐成熟，人性可获得彻底解放。”[4] 无人知晓这模糊不清、看似荒谬的话究竟所指何意。杰斐逊的说话风格一贯如此。杰斐逊总是唠叨“人性的彻底解放”。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他在改革中的丰功伟绩。



渴望得到自由的奴隶

注解：

[1] 埃德蒙·彭德尔顿（1721—1803），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政治家、律师、法官，大陆会议成员。——译者注

[2] 美国圣公会是圣公会（即英国国教）在美国的教区。美国独立战争后不久，由于英国圣公会的所有神职人员都必须宣誓效忠英国君主，圣公会美国教区被要求与英国圣公会断绝关系。——译者注

[3] 参阅托马斯·杰斐逊：《弗吉尼亚笔记》。——译者注

[4] 参阅托马斯·杰斐逊：《弗吉尼亚笔记》。——译者注

第5章
独立战争中的弗吉尼亚州长



精彩看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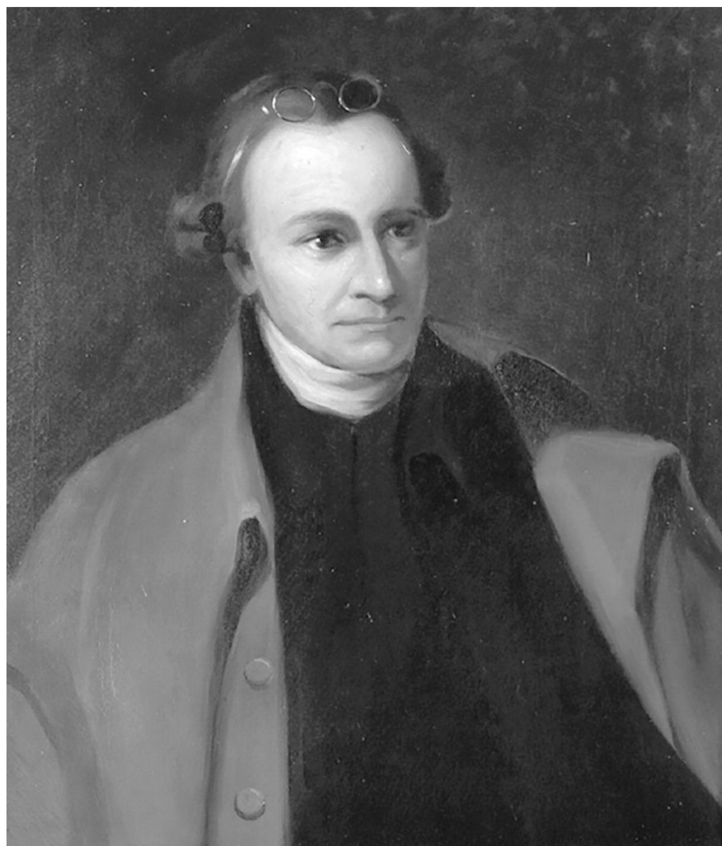
接任弗吉尼亚州长——筹备战争物资——迎战英国军队——如何对待俘虏——英国人的突袭——弗吉尼亚的危机——抓捕叛徒——躲避抓捕——英国军队在抢劫——伤心卸任——再不参与公共事务

帕特里克·亨利是弗吉尼亚独立以来的第一任州长，曾成功连任三年。根据宪法，他再无资格竞选下一届州长。1779年1月，经立法会选举决定，同年6月1日由杰斐逊接任弗吉尼亚州长。杰斐逊并不贪求荣耀。在选举中，他意外地发现年青的约翰·佩奇 [1] 得票很高，自己只是以微弱的优势取胜。在共事过程中，两位竞争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杰斐逊卸任时，似乎更愿意约翰·佩奇能成为州长候选人，而约翰·佩奇却不太乐意为之。杰斐逊的传记作家们指出，人们普遍认为，在杰斐逊任州长期间，政府工作效率低下。亨利·兰德尔详细谈论过杰斐逊任州长时的实际情况以及关于杰斐逊的争论。热心于公众事务的人难免出现失败之处。杰斐逊也被指控不能胜任州长的工作。有人说，杰斐逊用华丽的辞藻和超群的写作能力感染和说服别人，为自己进行完美的辩护。作为州长，杰斐逊勉勉强强，无大功也无大过，算不上人们心目中的好州长。

确切地说，他真不适合当“战时州长”。他尽管尽心尽力，但和别的州长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弗吉尼亚承平日久，从未遭到外部势力的侵犯。帕特里克·亨利第三个任期快结束时，一切都变了。这片土地呼唤着爱国志士们去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弗吉尼亚就像一匹任劳任怨的坐骑，三年来一直在帕特里克·亨利这位勇猛的骑手的鞭策下向前飞驰。当帕特里克·亨利要休息时，它难免气喘吁吁，筋疲力尽。

杰斐逊上任后发现弗吉尼亚的人力、马匹、军队、钱财都已挥霍殆尽。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动员大家积极捐赠。这是一件令人苦恼的差事。心甘情愿捐出自己财物的人并不多，捐赠进行得异常缓慢。杰斐逊别无他法，只得精打细算，最后各方面都获得了补给。杰斐逊到南卡来罗纳和北卡罗来纳为格林军招募新兵时，一切都很顺利。许多农民放下早已荒芜的田地，踊跃参军。1780年9月，将要出征的战士手中没有武器，更谈不上一分钱的军饷。马车和马匹只得强行征用。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该征用的还得征用。杰斐逊的农场也征用了一辆马车、两匹马、两个驾车的黑人。杰斐逊不懈地尽最大努力置办一切，但士兵们依旧缺乏夜晚遮体的毯子。他希望新的征税方案能够万无一失，确保军中一半人可住进帐篷。



帕特里克·亨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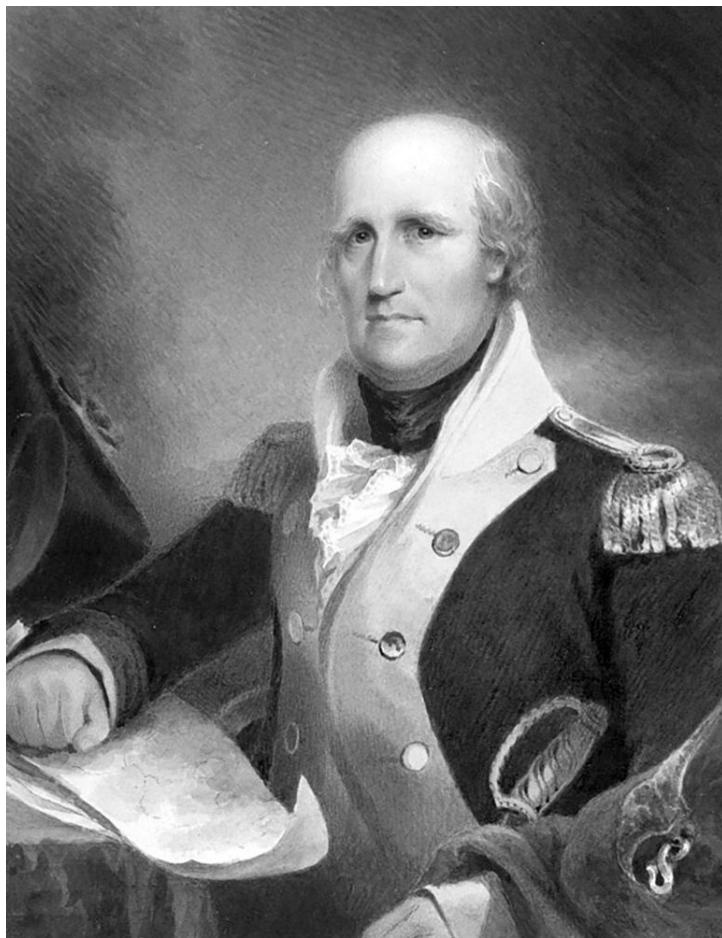
查尔斯·康沃利斯 [2] 正带领凯旋之师向北进发，直指弗吉尼亚。大批用来雪中送炭的物资不是被毁就是被抢，给杰斐逊带来沉重的打击。查尔斯·康沃利斯的部队在离弗吉尼亚边境不远的地方驻足不前。杰斐逊既感到很意外，又暗自庆幸。杰斐逊正为下一步行动忧虑不安时，有人愤愤不平地指责他，说他没有将南卡来罗纳和北卡罗来纳的物资用在该用的地方。杰斐逊将所有的人力、物力都集中在要打仗的地方是无可挑剔的。因为除此之外，无法确保弗吉尼亚取胜，也无良策让战争远离弗吉尼亚。如果向前线运送的物资不足，英国人便可大获全胜。

在弗吉尼亚西北部的一次战斗中，乔治·罗杰斯·克拉克 [3] 将军和士兵们英勇奋战，俘虏了英国詹姆斯·英格利斯·汉密尔顿 [4] 上校。詹姆斯·英格利斯·汉密尔顿上校被指控犯了重罪，或许有点言过其实。杰斐逊判断力超群，对詹姆斯·英格利斯·汉密尔顿上校和其他战俘一视同仁 [5] ，命令下属将他和另外两个被俘的军官带上镣铐，严密监禁起来。英国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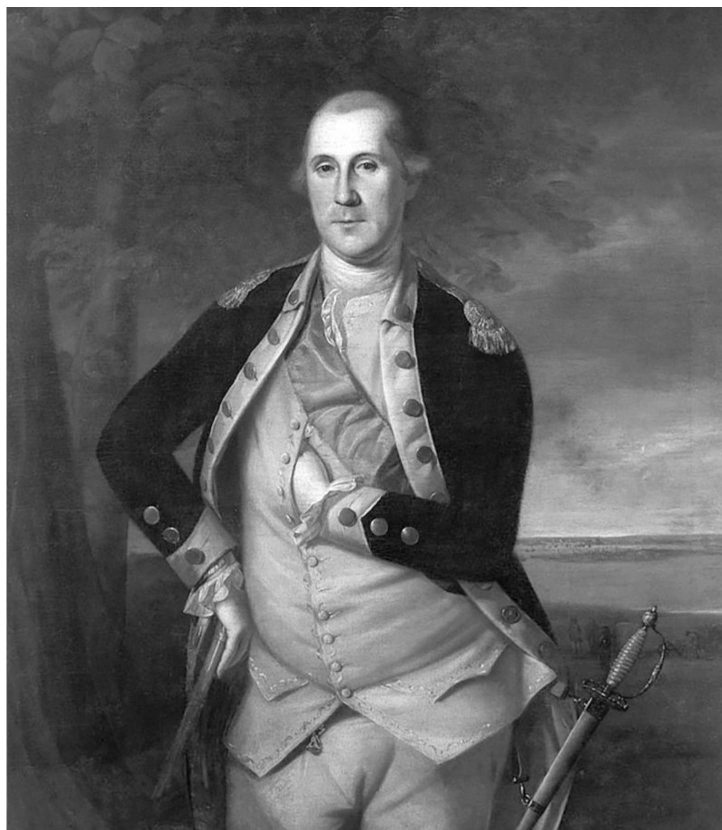
军菲利普斯提出了抗议。杰斐逊向乔治·华盛顿征求处理意见。乔治·华盛顿也犹豫不决，迟迟无法回答，最后建议缓和激烈的对峙。杰斐逊准确把握处理事情的分寸，采纳了乔治·华盛顿的两全之策，做了充分的准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杰斐逊关押了许多英国俘虏，其中不乏高官、贵族。杰斐逊公开宣称，自己以德报怨，对俘虏和自己的同胞一视同仁，坚决不用绞刑、不关监狱。杰斐逊以德报怨的做法使许多英国官员一改昔日残忍的性情。



查尔斯·康沃利斯



乔治·罗杰斯·克拉克



独立战争期间的乔治·华盛顿

帕特里克·亨利任州长时，英国人常常突袭弗吉尼亚。十几艘英国船满载两千多军队，盘桓在弗吉尼亚重要的港口，肆意地抢掠了好几天。英国人能轻而易举地破坏弗吉尼亚的物资供应区，严重威胁着弗吉尼亚的安全。1780年10月，英国人又故技重演。1780年10月22日，杰斐逊得知六十多艘船停靠在汉普敦水道，四艘船上载着军队。上岸后，英国人组成了大约两千五百多人的队伍。弗吉尼亚州刚刚建立不久，还没有足够的防卫能力，许多士兵都没有配备滑膛枪。传来这种情报，真让人感到心惊肉跳。杰斐逊悲伤地写道："一个民族的能力和热情足够打败敌人，但竟然要抱着膀子等待防卫用的武器，想起来真让人心痛不已。"过了几周后，弗吉尼亚军队的状况依旧"十分糟糕"。阿尔伯马尔港口附近大约有四千名战俘。他们是约翰·伯戈因 [6] 的军队，被派往弗吉尼亚执行安保任务。在离弗吉尼亚边境一百五十英里的卡姆登，查尔斯·康沃利斯刚刚打败霍雷肖·盖茨 [7] 的军队。亚历山大·莱斯利 [8] 将军的一名信使被弗吉尼亚军民抓获了。该信使是入侵部队的指挥官，口含一物——

是亚历山大·莱斯利将军写给查尔斯·康沃利斯的纸条。纸条上写着两军协同作战的计划。火烧眉毛的危急时刻，全州上下都显得很无助。最终险境得以化解。一方面弗吉尼亚运气不错，另一方面英国军队失去了斗志。北卡来罗纳的爱国民众不停地袭击查尔斯·康沃利斯的军队，最后迫使其向南撤退。亚历山大·莱斯利按兵不动一个多月后，坐着船走了。弗吉尼亚又可以出人意料地休养生息了。



汉普敦水道示意图



约翰·伯戈因

1780年12月31日是星期天。杰斐逊再次得到情报，二十七艘大船已于12月20日进入切萨皮克海湾，弗吉尼亚陷入危机。无论以前的情况如何，杰斐逊这次因马虎大意而难辞其咎。杰斐逊总以为船上装的是去巴尔的摩的法兰西人。他很清楚英国人的攻击目标是威廉斯堡、彼得斯堡或者里士满。当时是冬天最寒冷的时候，弗吉尼亚正是农闲时节。在无法准确把握敌情的情况下，不知杰斐逊为什么未做最坏的打算。他只是信心十足地命托马斯尼尔森 [9] 将军率部驻扎在地势较低、河流众多的县内，然后守株待兔。

1781年1月2日早上，五十个小时的珍贵时间已经浪费了。其间，杰斐逊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传来的消息和杰斐逊掌握的情报似乎都表明他做了蠢事。那支船队来者不善，顺着詹姆斯河上溯。杰斐逊这时才恍然大悟，做了星期天早上就该做的事情。他从最近的县里派出四千

七百多人，精力充沛地投入战斗。他带上公文和一些值钱的物件来到河对面的一个隐蔽之处，然后不辞辛劳，忙忙碌碌地在全州策马飞奔。后来自己的马累死了，不得不骑上一匹尚未驯服的小雄马。连续八十四个小时内，杰斐逊鞍马劳顿，奔前跑后。英军占领了河道，进入里士满，一路“扫荡”，然后重新上船，突然顺流而下。这时，弗吉尼亚民兵才开始集结。英国军队早已回到了亚历山大·莱斯利丢弃的营地，挖战壕将自己围了起来。杰斐逊回到一片狼藉的村子后，重新组织州政府应敌。杰斐逊不善于快速做出决策，天时地利都与他失之交臂。



18世纪70年代的巴尔的摩



早期的彼得斯堡

英国军队似乎要在营地里安家落户。他们的军需物资非常充足，防备森严，根本没有离开的意思。弗吉尼亚无正规部队，民兵组织没有配备武器。杰斐逊写道：“这儿的情况和北卡罗来纳一样糟糕。人们都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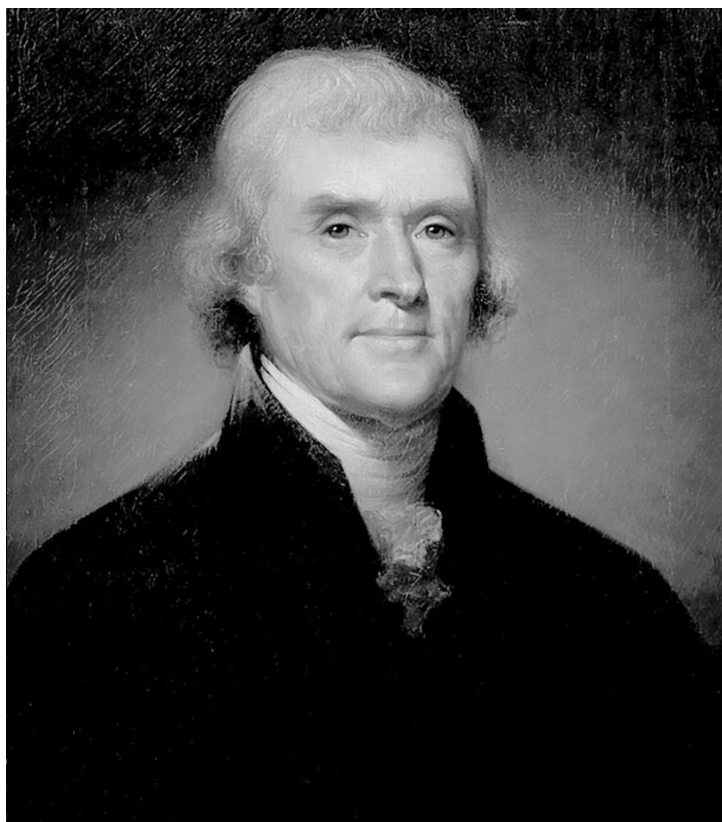
敌人能自我克制，谨慎小心，不来进攻，但这些全是痴心妄想。”叛徒本尼迪克特·阿诺德 [10] 在这片土地上指手画脚，让弗吉尼亚人更加怒发冲冠。杰斐逊想方设法捉住他。不过，本尼迪克特·阿诺德这只“鸟”却怎么也不上“猎手”的当。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

几个月以来，英国人将弗吉尼亚扰得人心惶惶。冬去春来，时光荏苒，杰斐逊心情沉重，度日如年，终于熬到自己任期届满之时。1781年6月10日，他将卸任。杰斐逊明智地决定不再参加竞选。别人的不满虽未明说，可足以让他感受到自己任期内的败笔。杰斐逊在自传中说：“英国人入侵时我们压力很大。民众对我的领导信心十足。来自民众的力量使我这个军事指挥官倍受鼓舞。军民应该迅速有力地行动起来，保卫自己的国家。任州长的第二年末，我辞去了自己的职务。”这段忧郁的日子里，一些垂头丧气的弗吉尼亚人对杰斐逊指指戳戳，说他像一个独裁者。杰斐逊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典型的权宜之计，他自己也想把事情做

好。后来，杰斐逊说："指责我是独裁者的人们脱离了民众，失去了作人的原则。"



担任弗吉尼亚州长期间的杰斐逊

1781年5月，这位筋疲力尽的州长就要卸任了。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四月下旬，查尔斯·康沃利斯向北进军，一路"扫荡"，进入弗吉尼亚。1781年5月20日，查尔斯·康沃利斯已到达彼得斯堡，整个弗吉尼亚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杰斐逊并无良策，只得向乔治·华盛顿求教。弗吉尼亚州议会已三次闻讯逃离里士满，一直处于休会状态，后来决定于1781年5月4日在离蒙蒂塞洛不远处的夏洛茨维尔村开会。直到1781年5月20日，法定人数才凑齐。日子一天天过去，杰斐逊的任期已满，但新州长尚未选出，他不能丢下手头的工作一走了之。1781年6月4日清晨，一匹快马飞驰而来，停在州长家门前。骑手从东边一个镇上连夜策马赶来，向杰斐逊报告敌情。原来，一队英国骑兵在伯纳斯特·塔尔顿 [11] 上校的带领下，气势汹汹地沿着大路直奔蒙蒂塞洛和夏洛茨维尔而来，三小时

后就会到达。杰斐逊异常勇敢，没有半点惊慌失措的样子。他没去夏洛茨维尔通报情况，因为议员们能自己撤离。杰斐逊平静地吃过早饭，安排家人转移，从容不迫地藏好贵重物品和文件后离开了家。杰斐逊走出家门，马上隐蔽到树林中。伯纳斯特·塔尔顿上校失望地无功而返。杰斐逊说，自己能够脱险全靠运气，与聪明和警惕没有关系。如果当时杰斐逊落入敌人手中，人们一定会认认为他是最愚蠢的人。伯纳斯特·塔尔顿走后，弗吉尼亚州大部分官员都给杰斐逊抹黑，言过其实地散播他执政时的缺点。杰斐逊非常愤怒，认为官员们的做法极不光彩。甚至有人说，如追究法律责任，杰斐逊应该停职几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杰斐逊被认为是胆小如鼠、生性懦弱的人。杰斐逊自愤愤不平，躲避敌人仿佛成了他一生的耻辱。那些官员认为，当伯纳斯特·塔尔顿的骑兵冲过来时，杰斐逊应该独自站在门口朝骑兵开枪。



伯纳斯特·塔尔顿

伯纳斯特·塔尔顿的军队在杰斐逊家中拿了点吃的喝的，别的东西丝毫没动。杰斐逊本人热情好客，别人在他家吃点喝点休息一下，他从不计较。杰斐逊后来说：“伯纳斯特·塔尔顿对我很客气。”英国派来的一些地方长官，说是肩负和解的使命，可不做什么正事。他们宣称，殖民地必须脱离法兰西，英国也不想占法兰西什么便宜。这种含沙射影式的说法是他们以后采取实际行动的前奏。后来，英军将解决战争冲突放在一

边，专门到处掠夺抢劫、搞破坏，杰斐逊家也未能幸免。杰斐逊强烈谴责这种野蛮行径。查尔斯·康沃利斯带人抢了他的粮食，宰杀了牛、羊、猪共一百五十头，充作军粮。英军肆意地糟蹋了正在生长的庄稼，将杰斐逊的庄园篱笆付之一炬，掳走了杰斐逊多匹良马，就连小马驹也不放过，残忍地割断了它们的喉咙。离开之前，英军还抓走了三十个奴隶。杰斐逊说，查尔斯·康沃利斯“要是能真正给他们自由，可算做了一件好事。怎奈他的军营中天花蔓延，热毒难驱，腐烂病无法控制。在死神面前，这些奴隶无一幸免”。难怪后来杰斐逊对英国人充满仇恨，他们不仅损坏了杰斐逊在同胞们中间的名声，而且侵占了他的财产，仿佛要赶尽杀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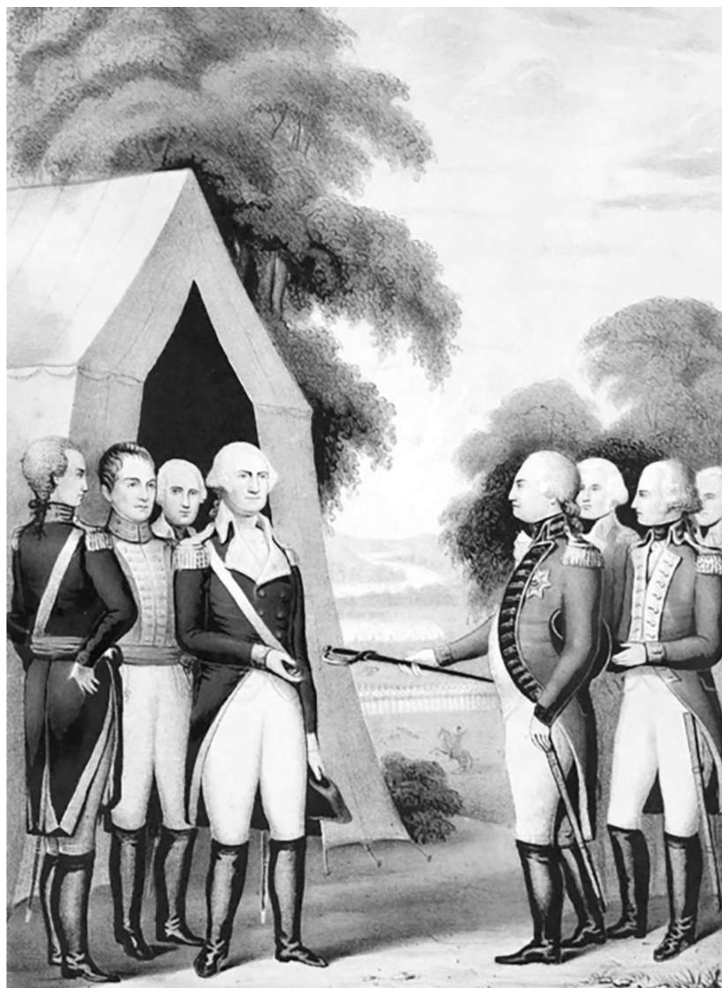
伯纳斯特·塔尔顿在弗吉尼亚纵兵抢掠，遭到民兵袭击

一些弗吉尼亚人认为杰斐逊爱挑剔。据说他任州长的最后几个月里，有人在一次议会会议上公开表达了这一看法。不过可以肯定，乔治·尼古拉曾提议对杰斐逊进行质询 [12] ，不少人支持该提议。乔治·尼古拉的提议深深地伤害了杰斐逊。杰斐逊十分痛苦，辞去了弗吉尼亚州州长，下定决心再也不参与公共事务，只希望能参加下届州议会，去直面具有威胁性的质询。阿尔伯马尔郡十分推崇杰斐逊，全票选举他当议会代表。杰斐逊向州议会声明，自己很愿意面对别人的指责，但没有人回复他。后来，杰斐逊当着众人的面读了乔治·尼古拉提供的“反对意见”，

并且做出了自己的答复。弗吉尼亚州议会中依旧没有人站起来质问杰斐逊。1781年11月，查尔斯·康沃里斯在纽约投降，战争造成的艰苦局面有所好转。杰斐逊的朋友们大胆地提出一项决议，并且顺利在弗吉尼亚议会通过。该决议表达了对杰斐逊的感谢，说他任州长时“不偏不倚、诚实正直、尽心尽力”，证明了杰斐逊“为人清廉、人格健全、能力超群”。该决议还宣称要为他洗清“所有不明之冤”。决议结尾部分用词精挑细琢，委婉地表扬杰斐逊的战时政绩，里面不乏抚慰之辞，对那些不友好的批评却漠然视之。乔治·华盛顿百忙之中抽空给杰斐逊写了信，信的结尾部分都是谦恭赞美之辞，赞扬了杰斐逊良好的品行。在别人的评价中，杰斐逊能找到的安慰也就这些了。杰斐逊不幸出任战时州长，不适合这一职位，但换作别人也一样差强人意。杰斐逊接受了别人的赞美也面对了别人的责难，但更多的是不公平的责难。他真是个命苦之人。经历了战时的波折之后，杰斐逊决定退出政界，去过属于自己的生活。



查尔斯·康沃里斯率军打出白旗准备投降



查尔斯·康沃里斯交出佩剑向乔治·华盛顿投降

注解：

[1] 约翰·佩奇（1743—1808），美国民主共和党成员，1776到1779年任弗吉尼亚议会主席，1793到1797年任美国众议院议员，1802到1805年任弗吉尼亚州州长。——译者注

[2] 查尔斯·康沃利斯（1738—1805），英国军人、殖民地官员及政治家。1776年前往北美镇压美国独立战争，1778年起任北美英军副总司令，1781年在约克镇战役大败后率军投降。——译者注

[3] 乔治·罗杰斯·克拉克（1752—1818），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弗吉尼亚当过测量员、士兵和军官，后成为西北边境最高军官。——译者注

[4] 詹姆斯·英格利斯·汉密尔顿（1742—1803），英国将军，1775年到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任英军指挥官。萨拉托加战役中，他率英军投降，被关押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译者注

[5] 塔克教授在《杰斐逊传》中为詹姆斯·英格利斯·汉密尔顿辩护，但不过

是在说自己认识詹姆斯·英格利斯·汉密尔顿，认为他本性不坏，有绅士风度，不应该对别人的指控负责。——原注

[6] 约翰·伯戈因（1722—1792），英国陆军上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伯戈因的部队在萨拉托格被美国将军霍雷肖·盖茨的部队击败。——译者注

[7] 霍雷肖·盖茨（1726—1806），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将军，在萨拉托加战役中大胜，在卡姆登战役中惨败。——译者注

[8] 亚历山大·莱斯利（1731—1794），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陆军少将，1782年接替查尔斯·康沃利斯担任英军南方指挥官。——译者注

[9] 托马斯·尼尔森（1738—1789），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将军，大陆会议代表，《独立宣言》签署者，独立战争时期曾在弗吉尼亚指挥民兵作战。——译者注

[10]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1741—1801），美国独立战争中最具战略才华、足智多谋的领导人之一。1780年，在扼守哈德逊河的时候，他打算将要塞献给英军。事情败露后，他逃到英军寻求保护，后来被任命为英军准将，指挥英军在弗吉尼亚作战。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在美国一直以来都被视为美国独立事业最大的叛徒而饱受非议。——译者注

[11] 伯纳斯特·塔尔顿（1754—1833），英国陆军将领、政治家，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任英军指挥官，进攻大陆军。他表现突出，深受倚重，却被北美人民痛恨。——译者注

[12] 后来，杰斐逊与乔治·尼古拉关系友好，杰斐逊说乔治·尼古拉能干、诚实，作为一个热情奔放的年轻人，只是他做事的动机错了。乔治·尼古拉也向杰斐逊道歉，表达了对他的敬意。——原注

第6章
国会议员



精彩看点

退隐在家——中年丧妻——给孩子们的教导——外交使命——有原则的国会议员——各州联合委员会——确定货币单位——划定共有区域——奇思妙想

辞去州长后，杰斐逊极度痛苦，一直愤愤不平。他憋着一口气退隐在家，反复重申自己决心已下，再也不管公众之事。杰斐逊忙着经营种植园，教育孩子，照顾生病的妻子。1782年初，冬寒还迟迟未去，杰斐逊将1781年春天的一些感想写了下来，这便是著名的《弗吉尼亚笔

记》。1782年春，杰斐逊还是州议会议员，但他执意拒绝参加会议。杰斐逊的对手们严厉地批评了他的这种做法。鉴于这种情况，杰斐逊的朋友们也不好为他辩解。詹姆斯·麦迪逊私下里为杰斐逊不与人为善的脾气悲叹。詹姆斯·门罗公开写信直言不讳地批评杰斐逊，但杰斐逊不为所动，只是反复地诉说自己内心受伤后的痛苦，不断地声明自己再也不参政。

杰斐逊执意这样做的确是出于气愤，同时还有更令人为之动容的原因，只是他过于自尊，内心受伤太深，不愿意说罢了。当时杰斐逊妻子的健康每况愈下。1782年5月，她躺在六个孩子的身边，再无康复的希望。杰斐逊履行丈夫的责任，温柔、勤快、悉心地照顾妻子。1782年9月，她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妻子死后，杰斐逊连续三周未出家门。后来一段时间内，杰斐逊只在山间茂密树林中的小路上徘徊，以寻找一点儿寄托。在极度悲痛的日子里，杰斐逊的长女玛莎一直陪伴着他。她曾留下令人悲伤的文章，展现了杰斐逊性格中的深情和脆弱。



詹姆斯·门罗



杰斐逊的长女玛莎

据说，杰斐逊夫人在弥留之际乞求丈夫不要给孩子们找继母。杰斐逊当即答应，并恪守诺言，鳏居一生。玛莎是杰斐逊的第一个孩子，也是他的掌上明珠。在六个孩子中，玛莎和玛丽是杰斐逊亲生的，并且都活到了成年以后，却只有玛丽晚于父亲去世 [1] 。杰斐逊的妹夫达布尼死后，妹妹家里很穷。于是，杰斐逊将妹妹和六个孩子都接到家中，视为己出。杰斐逊对孩子们和蔼可亲，关心他们的成长，一直孜孜不倦地教导他们。杰斐逊常给孩子们写信，信中只是最平常不过的教导，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孩子们对这些信件饶有兴趣，颇感亲切。杰斐逊的传记作家认为这些信息很有价值，赋予了无数赞美之辞。

1776年9月，大陆会议曾提名杰斐逊与本杰明·富兰克林、迪恩一同去法兰西，与法兰西结盟并签订贸易条约，杰斐逊拒绝了。1781年6

月，杰斐逊被委以重任派往国外，和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杰伊等人一同参加一项和平条约的谈判。杰斐逊以个人事务为借口拒绝了。1782年12月，在弗吉尼亚安特希尔种植园的朋友盖理上校家中，杰斐逊正给孩子们进行预防接种，又被委以出使法兰西的重任。这项委任很及时，有助于杰斐逊换个环境，从丧妻的阴郁中走出来。杰斐逊欣然答应，并做好了启程的准备。当时，法兰西巡洋舰要离岸，耽搁了其他船只的航行。杰斐逊还没有离开，就得知谈判已经提前进行，无须再出访。1783年2月，杰斐逊又回到了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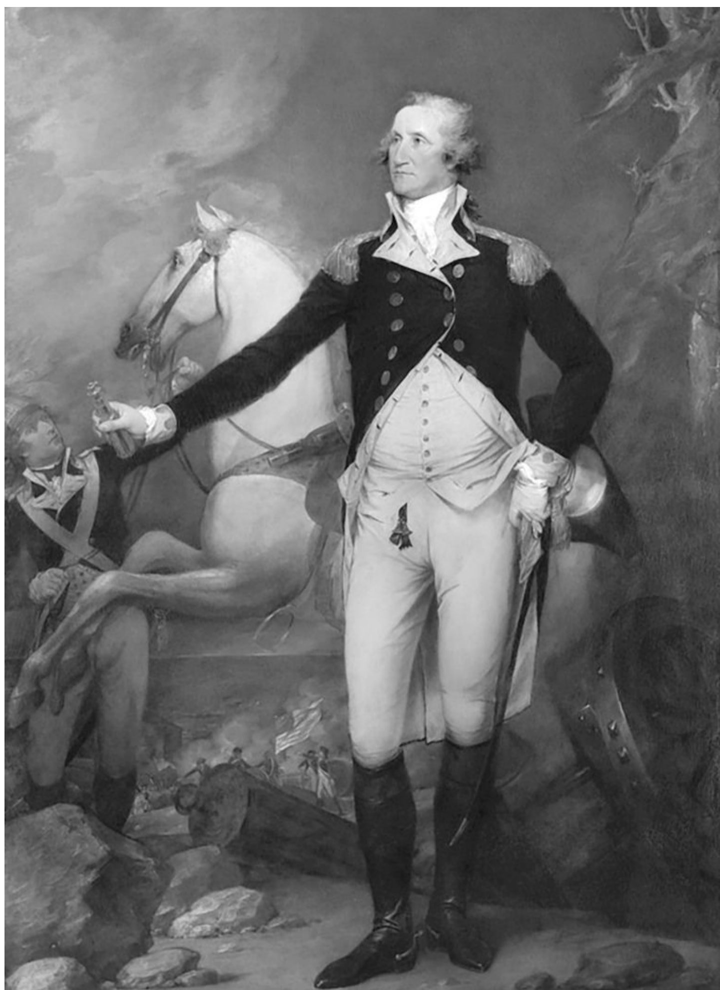
1783年6月，弗吉尼亚州议会选举杰斐逊为国会议员，任期从1783年11月开始。国会议员们对杰斐逊的到来略显轻视。这些绅士们认为作为议员是一种荣耀，不想因杰斐逊的加入惹上麻烦。杰斐逊去上任时，碰巧国会要批准美国与英国的和平条约。至少有九个州赞同才可批准，但只有七个州参加。一些议员提议，七个州参加也可批准。在这个节骨眼上，英国绝不会发现赞成票数不够的情况。杰斐逊和另外一些议员竭力反对，因为这种权宜之计会损害国会的名声。最后在国会的紧急呼吁之下，未参加投票的各州都先后赶来。杰斐逊很乐意在这个条约上签字，因为该条约使自己七年前在《独立宣言》中的倡议变成了现实。乔治·华盛顿的大陆军总司令辞职仪式就要举行，负责安排和筹划的重任落在了杰斐逊肩上。

杰斐逊认为国会的各项权能应一直存在，不能断断续续。他提议设立“各州联合委员会”，由每州选一名代表组成。国会休会期间，该委员会继续工作。国会采纳了这一提议，但因委员会内部出现派系斗争，该提议以失败而告终。古弗尼尔·莫里斯 [2] 就国家的资金问题做了报告。通过精准的计算，他设计出了一种货币单位。该货币单位为美元的一千四百四十分之一，能实现各州货币的精确兑换。杰斐逊指出，这种换算将日常生活中简单的计算变得极为烦琐。比如说，一块面包的价格为二十分之一美元，可换算后变成七十二个单位，一磅黄油为五分之一美元，合二百八十八个单位，一匹马为八十美元，合十一万五千二百个单位，而一个国家的债务是八千万美元，则要换算成一千一百五十二亿个单位。为了避免这种愚笨的做法，杰斐逊建议还是用美元作为货币单位。

杰斐逊向国会推荐了弗吉尼亚的做法，提议在美国西北部划出一块区域为各州共有。后来成立了专门负责在该区域建立政府的筹备委员会，杰斐逊也是成员之一。因为杰斐逊起草了国务院的草案，所以该报告自然由他起草。报告包含了著名的《西北土地法令》的内容，其中最可敬的条款是“自1800年之后，除惩治犯罪外，所有上述各州都要取消奴隶制和非自愿奴役。”除了作为政治家高尚而尊贵的一面之外，我们也可以窥见杰斐逊思想中的荒谬之处。杰斐逊的崇拜者们尽力为他开脱，称他为“哲学家”。有件事情虽小却引人深思。杰斐逊将所划定区域的各个地方分别命名：喜瓦尼亚、密希高尼亚、雪龙斯、阿森尼西亚、美索不达米亚、伊利诺亚、萨拉托加、乔治·华盛顿、波力波塔米亚和皮力西比娅。幸好这些奇思妙想的地名未能流传下来，若不然，现在上学的孩子们将会苦恼不堪。杰斐逊在报告中所写的关于取消奴隶制的条款最终未能通过。会上只有中部和西部六个州的代表投了赞成票，他大失所望。



吉弗尼尔·莫里斯



任大陆军总司令期间的乔治·华盛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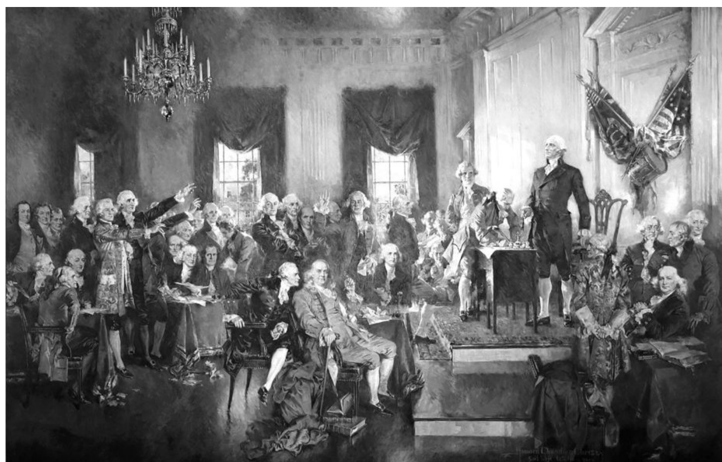
以上是杰斐逊任国会议员时从事的立法活动。1784年5月7日，杰斐逊离开了国会。

注解：

[1] 杰斐逊有以下子女：玛莎·杰斐逊，1772年9月27日出生，1790年2月23日嫁给托马斯·曼·伦道夫，1836年10月10日去世；简·伦道夫·杰斐逊1774年4月3日出生，1775年9月去世；一个儿子，1777年5月28日出生，1777年6月14日去世；玛丽·杰斐逊，1778年8月1日出生，1797年10月13日嫁给约翰·W.埃普斯，1804年4月17日去世；1780年11月3日出生的是个女孩，1781年4月15日去世；露西·伊丽莎白·杰斐逊，1782年5月8日出生，1784年去世。——原注

[2] 古弗尼尔·莫里斯（1752—1816），美国著名政治家、开国元勋和外交官，曾任美国驻法大使。——译者注

第7章
出使法兰西与法兰西大革命



精彩看点

远赴法兰西——法兰西人的友好——美国的债权人——英国人态度——新闻报道中的谣言——战争与和平的矛盾——参与法兰西大革命——谨慎行事——观点和情感——丹尼尔·谢司起义——有报纸而没有政府——对宪法的观点

杰斐逊离开国会后，第四次奉命参与外交事务。他的使命是协助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和约翰·亚当斯进行贸易谈判。1784年7月5日，杰斐逊乘船离开波士顿。1784年7月30日，他到达朴次茅斯，然后立刻赶往法兰西，住进了体面的房子，后来又搬到更加富丽堂皇的住宅。杰斐逊精心安排自己的生活，尽量活得有头有脸，富有品味。杰斐逊年薪九千美元，还有自己私人财产收入做补贴，但这些收入与他当时的花费相比，就显得捉襟见肘了。杰斐逊将女儿玛莎送到当时法兰西最时尚、最高级的女修道院学校。

不久，杰斐逊觉得自己只是忠诚地代表了美利坚合众国，给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做了好榜样。除此之外，再不能为自己的祖国多做一点事情。1785年春天，本杰明·富兰克林回了美国，约翰·亚当斯去了英国。外交家三人小组解散了。杰斐逊成了名副其实的驻法公使。欧洲古老的

君主政体下，人们还不了解遥远的美洲大陆上新建的共和国。他们不知道美国的经济状况如何、贸易总量是多少，不太重视与美国签订的贸易条约。法兰西以前侵占过北美新大陆，现在为了顾全美国人的脸面，谦恭有礼地公开接待北美来的代表们，殷勤地表现法兰西王室热情好客的一面，以求与其他强国建交。但这些所谓的强国已非同往昔，变得文明、强盛，不再需要法兰西保护，并不在乎法兰西友好的意愿。实际上，法兰西在贸易中并没有多少自信。杰斐逊就美国在自由贸易中的优势提出自己的看法，不遗余力地设法让法兰西轻易不变的贸易条例有所变通。杰斐逊、蒙莫林伯爵阿尔芒·马克和法兰西外交大臣维尔热纳伯爵查尔斯·格拉维尔常有外交通信往来，信中谈论的都是散发着臭气的鲸油、咸鱼、烟草。

因为美国财政困难，所以外交官受辱的事情常有发生。杰斐逊也未能幸免，因为他周围都是美国的债权人。这些债权人虽不以还钱为由敲诈勒索，但折磨得他苦不堪言，仿佛他们的钱多么有价值。按照惯例，杰斐逊气愤而无奈地代表自己的同胞们向法兰西献上可耻的“贡品”。在北美，强大而文明的国家倒是习惯性地给予海盗一些施舍。杰斐逊曾多次极力主张用战争来消除海盗隐患，因为战争比受窝囊气更划算，更有荣耀感，代价更小。杰斐逊还提出要发展国际贸易，组建联合海军，让那些海上强盗在自己的水域瑟瑟发抖。他满怀希望，也曾为此殚精竭虑，最后却功亏一篑。

1786年暮春，杰斐逊去伦敦协助约翰·亚当斯进行各种悬而未决的商贸谈判。杰斐逊按照惯例觐见了英王乔治三世和王后，“他们对我和约翰·亚当斯漫不经心，我们从未受过这种轻视。”外交大臣是来自卡马森郡的一位侯爵，说话时含糊其辞、不谈正事，似乎要让杰斐逊明白，英国“所有讨厌的事都与美国有关”。杰斐逊一无所获，只好闷闷不乐地离开，印在他脑海中的全是英国人的冷漠和傲慢。此次英国之行后，杰斐逊认为英国对美国充满敌意，更加轻蔑和仇视英国。后来，杰斐逊在信中多次言辞激烈地提起此事。

英国仇恨我们。英国大臣仇恨我们，国王乃至所有的人都仇恨我们。在签订贸易条约时，我们的主动提议换来的却是冷嘲热讽……英国人对我们的敌意是现在而不是战时产生的。

尽管两国签订了各种条约，可英国依旧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对我们的仇恨根深蒂固。他们唯一想做的就是将我们连同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全部从地球上抹去。

英国不希望在政治上与我们建立联系。贸易谈判中，他们会牵着我们的鼻子走，要求我们言听计从。英国的执政党和在野党都不支持我们，甚至全国上下都反对我们。

目前，英王乔治三世、大臣们、英国民众都对我们充满敌意，比战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英王乔治三世、王后与他们的孩子们

这种敌对意识在英王乔治三世心中酝酿已久，又在臣民中蔓延开来，影响了大部分行政机构。

我直言不讳地说……英国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敌人，是地球上唯一希望我们彻底毁灭的国家。我确信若我们的国家被大海吞没，整个英国大地上将会亮起点点篝火，庆祝我们的灭亡。

杰斐逊极不信任英国，甚至认为“英国人有可能给阿尔及利亚人提供

帮助”。

欧洲各国的新闻报道中，英国不断变本加厉地对美国恶语相加。杰斐逊非常愤怒。他说：“和平时期，整个欧洲对我们非常热情，这根本就是个谣言。英国每天利用报纸为美国造谣生事，令人印象深刻，可见英国是多么厚颜无耻。这些谎言登在欧洲许多国家的报纸上，反而使英国民众更加相信美国有多恶劣。”杰斐逊说，美国在国外的声誉不好，“一方面是美国自身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伦敦的报纸到处散播谣言。主管新闻报道的部长出钱支持散播谣言，就是为了让英国民众也加入反对我们的行列。难怪每一份报纸上都有若干反对美国的言论”。

英国人普遍反美，杰斐逊感到未来一片渺茫。“英国民众的呼声往往会影响国家的管理。臣民们只尊崇英王乔治三世的意志，前途令人担忧。”“不知什么时候，美国民众也开始仇恨英国……我们的同胞充满激情，热衷自己的事业，无暇顾及自己的得失。”这种敌意渗透到民众中间，“影响他们的所作所为，长此以往会引发灾难”。杰斐逊说：“这个时代，罗马和迦太基时期的事情不可能再发生。”他也不免自我安慰地认为：“我们的国家还年青，存在的时间一定会比英国长。他们就像腐朽的机器，将在困难中被压得粉碎。”

杰斐逊爱好和平，习惯在和平的环境中发挥自己的才能。杰斐逊曾指出“只有战争胜利了才不会赔偿损失”，但他一生都对掠夺恨之入骨。杰斐逊反对与英国开战，又十分痛恨英国。他并不好战，内心深处早就埋下了向往和平的种子。杰斐逊知道英国人想干什么。仇恨英国的同时，他也清楚地看到美国长期以来的堕落和固执。杰斐逊满怀正义地说：“十二年来，我们的敌人一直与理智背道而驰，这是他们一贯遵循的原则。我早已看穿了英国人的伎俩，对他们下一步的行动了如指掌。他们根本不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杰斐逊有点冒险地说：“英国如此无理，就是欠揍。”[1] 平心而论，杰斐逊认为英国的政府体制的确很有特色，对政府各部门和那些地位显赫的官员们却嗤之以鼻。

令人懊恼而乏味的英国之行结束后，杰斐逊又回到了他感觉比较和谐的法兰西。巴黎愉快的时光已过去几年，这些时间对美国来说似乎没什么重要的意义。杰斐逊感到很满足，当时还不知道这段时光对自己有

什么影响。这段时光就像是一个播种的季节，直到杰斐逊成为美国一个强大政党的领袖后，才到了收获的季节，结出了成熟的果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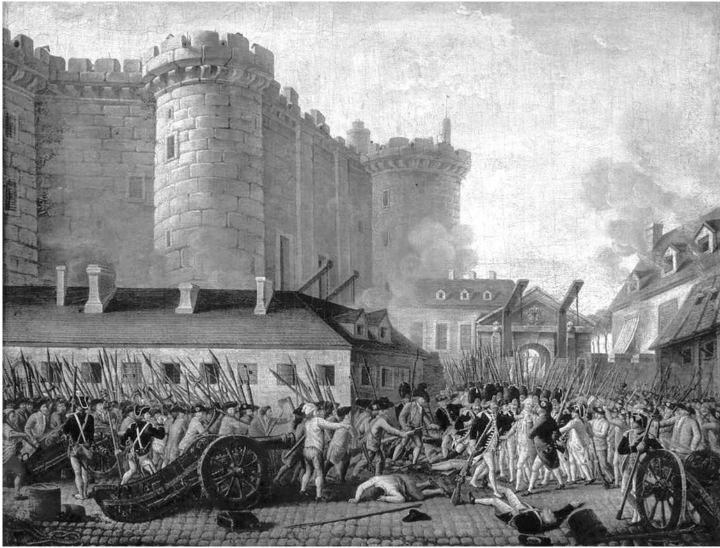
杰斐逊在法兰西长达五年。他刚到法兰西时，法兰西君主政体尚且稳固。等他离开时，巴士底狱已被攻破，街上血流成河。暴动的民众威慑法王路易十六，杀死了内阁大臣。杰斐逊比任何一个法兰西人都更加饶有兴趣地观察法兰西革命，也没有人比他有更好的机会来观察法兰西逐渐高涨的革命热情。杰斐逊与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 [2] 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一开始就进入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领导的自由爱国的政党内部。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领导的改革者行事稳重、头脑理智，与后来的暴力革命者们完全不一样。他们发现杰斐逊身上有一种与自己相似的精神：杰斐逊常思考他们正在思考的问题，拥有他们正在逐步获得的信念。他们立刻请杰斐逊当顾问，并把杰斐逊当作知音。他们认为杰斐逊是一位关心人权、推理严密的思想家，是传播政治自由激进学说的布道者，执政理论的设计者，表达含糊却极具概括力的提议者，更是现实中阻碍社会发展势力的谴责者。按当时流行的话来说，杰斐逊简直就是一位“哲学家”。杰斐逊憎恶法兰西王权的专治，仿佛自己就是法兰西人，每天都兴致盎然地去凡尔赛宫前参加法兰西国民公会的辩论。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和其他人都去征求杰斐逊的意见。波尔多大主教是法兰西国民公会中某一委员会的负责人，负责起草宪法。深思熟虑后，他邀请杰斐逊“参加宪法审议”。杰斐逊很明智地拒绝了。几个朋友私人聚会时，杰斐逊慎重提议道：“在神圣的王权之下，路易十六的权利应由权利宪章来规定。该宪章应由国王路易十六和法兰西国民公会每位成员共同签署。”杰斐逊起草了该“宪章”最主要的部分。



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



巴黎暴动



法兰西民众攻打巴士底狱



占领巴士底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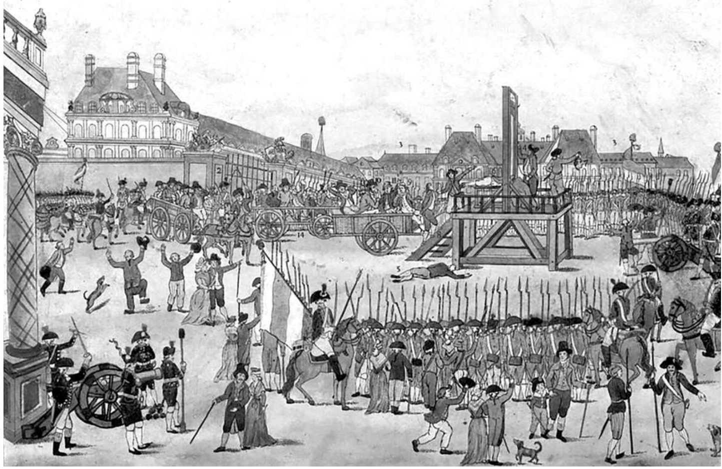
凡尔赛宫

杰斐逊的行为似乎不合规矩，但他对身边异常的政治事件特别感兴趣。杰斐逊与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等人友谊深厚。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等人也尊重杰斐逊。杰斐逊很可能也从中受到影响，经不住诱惑而卷入一些政治事件。总体上来说，杰斐逊谨慎小心，懂得自我克制。一次，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事先没有征求杰斐逊的意见，安排了六到八个法兰西国民公会自由党不同地区的领导到杰斐逊家吃饭，希望这些领导人能达成协议。杰斐逊对朋友的这种“漫不经心”感到十分恼火。第二天早晨杰斐逊要求蒙莫林伯爵阿尔芒·马克 [3] 做出解释。事后，杰斐逊写道：“蒙莫林伯爵阿尔芒·马克做了解释，说他已经知道所发生的一切，认为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等人不该在那种场合使用我的房子，请我不要生气，还真诚地希望我能一如既往地参加他们的会议。他确信我能缓解紧张气氛，切实促进改革向好的方面发展。我告诉他，我对国王路易十六、对法兰西王国、对美国都负有责任，不干涉法兰西王国的内政。我要以旁观者的身份积极主动、不偏不倚、百折不回地坚持那些对法兰西王国最有利的措施，并让其推广开来。”

人们普遍认为，杰斐逊在法兰西形成的观点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影

响深远。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且有失公允。杰斐逊青年时期就从事理论学习，经常处理政治和社会事务。去法兰西前，他在各个方面已经完全成熟，做事更加独立。杰斐逊的性格和激进的思想经国外历练后更加趋于稳定。杰斐逊喜欢法兰西、仇恨英国的情感不是到欧洲后才形成的。去欧洲之前，两种情感就在他心里酝酿已久。杰斐逊驻留法兰西的时间较长，去英国只是简短的出行。通过对比后，杰斐逊对法兰西更加情有独钟，对英国的成见越来越深。有人说，杰斐逊后来的执政是将法兰西政治的“种子”带到异国他乡生根发芽，并非是本国环境中土生土长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不了解杰斐逊。在性格形成以前，杰斐逊从未去过美国以外的地方。一直以来，杰斐逊都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仇恨英国而喜欢法兰西，同情法兰西大革命。欧洲之行证实了杰斐逊先前的观点，强化了他长期藏在心中的情感。杰斐逊对英国和法兰西王国的看法与情感形成强烈的对比，如能彼此中和就会更加有益。如果杰斐逊看到法兰西的恐怖统治和罗伯斯庇尔的权势，看问题就不会如此泾渭分明。1789年9月，杰斐逊强烈要求告假回家，从法兰西勒阿弗尔乘船回美国。世事多变，这次回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美国。

人们认为，过去五年里，杰斐逊并非背井离乡、被流放国外，他一直在为自己的祖国增光添彩。法兰西的确有许多迷人之处，但跟自己亲爱的祖国相比，一切都显得相形见绌。杰斐逊说：“伦敦比巴黎美，可再美也美不过费城。”就教育而言，在欧洲只能多学到点现代语言知识和不道德的行为。国外最好的课程只能达到威廉-玛丽学院的水平。杰斐逊建议詹姆斯·门罗去法兰西，并说：“那里的土壤、气候、平等、自由、法律、民众以及人们的行为举止都会让你对自己的祖国羡慕不已。”杰斐逊预言，许多欧洲人会来美国定居，但“绝不会有哪个美国人想搬到欧洲去定居。”杰斐逊认为自己的同胞们“天生洁身自好，品德高尚，丝毫没有受到浩瀚的大洋那边的欧洲人的影响。”“我们的宪法确有瑕疵之处……我们的政府若与欧洲的政府相比，简直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英国就如同天堂和地狱之间的中转站。”



恐怖统治



罗伯斯庇尔

杰斐逊是纯粹的爱国主义者。在他眼中，自己祖国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比国外好。马萨诸塞州丹尼尔·谢司 [4] 的起义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新宪法的通过。杰斐逊认为，丹尼尔·谢司领导的起义值得称赞。

> 这些起义并没有引起多么可怕的事情，反而证明人民有足够的自由。我不希望他们的自由有所减少。如果以这些小小的起义来保全人民大众的幸福，再划算不过了，就是发生流血冲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严厉惩治起义将压制保护自由的民众。”“偶尔出现小小的起义反而是件好事……遵循这些道理，可以使管理者们在惩治起义时变得温和一点，但绝不是鼓励人们多起义。起义也是给政府疗伤的一剂良药。”“假如十一年中，十三个殖民地中有一次起义，平均每个州一百四十多年或者一个半世纪才发生一次起义，这个数量比现在别的政府管理下的起义少得多。不同政府惩治起义的轻重程度也彼此有别。”“历史上有如此体面地进行的起义吗？上帝不允许我们二十年中没有一次暴动。一两个世纪内丢掉几条性命又有什么呢？有了爱国志士的流血牺牲和暴君的断头，自由之树才会长青。”

一个真正伟大的政治家说出这样愚蠢的话，真会动摇人们的信仰。杰斐逊的这些思想并非受了法兰西大革命的影响。最后的这些话是在1787年9月说的。当时杰斐逊大概正在向法兰西温和派传授这些离奇的观念，而不是从他们那里学习什么狂热的思想。看到“国王路易十六和贵族们的阴谋”，杰斐逊引身而退，并没有参与其中。在一段时间内，杰斐逊曾鼓吹过荒谬的“无政府”论。杰斐逊说：“民众的意志是政府得以建立的基础，首先得要保证意志的正确性。”杰斐逊的这种观点还算明智，若是将民众意志当作上层建筑的基础，就有点荒谬。杰斐逊补充道：“如果让我选择有政府而没有报纸，还是有报纸而没有政府，我宁愿选择后者。”“印第安人的社会没有政府，但我相信，他们的民众肯定比欧洲政府管理之下的人们幸福得多。有了政府，公众意见受到法律的约束，道德对人们的抑制也像法律一样强大。”“社会应按以下三种形式存在：一、像印第安人一样没有政府。二、政府管理之下，每个人的意志都得以体现。三、强权政治的管理之下……我现在还没有想明白第一种状况

是否最好。”一位智者如此讲话，可见杰斐逊失去了耐心。

杰斐逊在国外的主要任务是签订贸易条约。国外的经历使他明白，若要与外国建立关系，美国各州就得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关于丹尼尔·谢司起义，杰斐逊的看法与别人截然不同。显而易见，杰斐逊还没发现，国内更需要牢牢地抱成一团。杰斐逊说：“在对外事务上，美国各州要牢牢结为一体，处理纯属国内的问题时可各抒己见。”美国宪法颁布时，杰斐逊感到其中的许多内容不是残缺不全，就是毫无根据。杰斐逊在公文中写道：“我很难同意国会的做法。”他曾十分严厉地批评国会。后来，杰斐逊看到了联邦党人的争论，通过与詹姆斯·麦迪逊、詹姆斯·门罗等人通信，经深思熟虑后，逐渐改变了对宪法的观点。1788年5月，杰斐逊说：“我殷切盼望新宪法全部得以批准。就我们现在的处境而言，这件事举足轻重。”杰斐逊虽然对宪法中的一些细节心存芥蒂，但在情感上却能与大多数新宪法热心的倡议者们共鸣。杰斐逊最终像其他人一样接受了新宪法。杰斐逊“十分满意新宪法将为民众带来的利益，并希望找出有利的时机来修正其中的瑕疵”。杰斐逊希望能有九个州接受新宪法。他说：“为了使宪法中好的内容得以保留，一段时间后，可能对其做一些必要的修订。”杰斐逊后来明确表示，马萨诸塞州的计划“更胜一筹”，并且希望其他犹豫不决的州也能效仿马萨诸塞州。1788年11月4日，杰斐逊写道：“看到十一个州接受新宪法后，我欣喜若狂。第十二个州也没有反对。第十三个州反对与否已不太重要。”杰斐逊对新宪法的看法很多，但其要旨完全相同。杰斐逊的观点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对新宪法的真实情感，有力地驳斥了后来的政敌们不公正的指责。杰斐逊曾很有个性地声明：“我不是联邦主义者，我的思想体系从不属于任何人、任何党派。无论在宗教、哲学、政治上，还是其他任何领域，我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如果不加入一个党派就无法去天堂，那我情愿不去。我也绝不是反联邦主义者。我始终支持新宪法中的绝大多数内容。”杰斐逊表明自己完全支持新宪法，对此坚信不疑，别人无须再争论。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相比，新宪法很有可能更接近杰斐逊的理想。杰斐逊之所以一直反对新宪法，是因为新宪法有两个缺点：一是缺少《权利法案》，二是总统可以连任连选。第一个缺陷已被迅速而明智地补全，第二个缺陷实际在杰斐逊自己英明地开创的惯例中受到了限制。



新宪法通过

注解：

[1] 艾尔伯特·杰伊·诺克：《杰斐逊传》，第109页，1926年出版。——译者注

[2] 吉尔伯特·德·莫蒂（1757—1834），法兰西贵族，立宪派首脑，1789年出任法兰西国民军总司令，参与起草了《人权宣言》。——译者注

[3] 蒙莫林伯爵阿尔芒·马克（1745—1792），法兰西政治家，曾任法兰西王国外交大臣和海军大臣。——译者注

[4] 丹尼尔·谢司（1747—1825），美国军事家，独立战争时的军官。1786年马萨诸塞州发生经济危机，他领导被迫负债和遭受政府错误政策压迫的农民起义。——译者注

第8章
出任国务卿与反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精彩看点

出任国务卿——内阁成员——战时债务承担——政治交易——无力的辩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方案——奇异的想法——分歧越来越大——错误的说法——不共戴天——对死人的诽谤

1789年10月23日，杰斐逊从英国考斯乘船回国，1789年12月23日到达蒙蒂塞洛。庄园里的奴隶们热烈地举行了欢迎仪式。离开法兰西时，杰斐逊本想用几个月的时间回趟家，然后迅速返回，去亲眼见证轰轰烈烈的法兰西大革命。一到美国，乔治·华盛顿总统就邀请杰斐逊担任国务卿一职。杰斐逊并不想去，因为他最感兴趣的是法兰西大革命。杰斐逊向乔治·华盛顿回复，自己应该遵从总统的意愿，但并不想改变自己的现状。乔治·华盛顿再次写信，极力劝说杰斐逊任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 [1] 亲自到蒙蒂塞洛向杰斐逊说明情况，让他任国务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让他发挥个人影响力。迫于压力，杰斐逊很不情愿地放弃了继续去法兰西的想法，接受了国务卿的职务。杰斐逊办理好自己的家事后，于1790年3月21日到达纽约任职。

当时，内阁成员只有四人。约翰·杰伊为临时国务卿，正式任命的国务卿一到，他就出任首席大法官。乔治·华盛顿总统就职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任财政部长，同时亨利·诺克斯被任命为战争部长。后来，埃德蒙·伦道夫出任首席检察官。内阁公共事务中，最大的反对力量来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精力充沛，才华出众，善于承担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所有与国家外债和内债有关的问题，都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议后提交国会处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了由联邦承担各州战时债务的计划，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相互对立的两派有的兴高采烈，有的叫苦连天。众议院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了该承担方案，讨论结果为：三十一票赞成，二十一票反对。方案随即被提交到众议院大会。适时，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到了，事情发生了扭转。1790年3月29日，该方案被否决。从人们的情感状态来看，一场严重的危机正威胁着这个年轻的国家。国会每天都在开会、休会，并未解决任何问题。敌对的派系在任何议题上都很难达成一致。除了战时债务的问题外，议员们都不屑于思考和谈论别的事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为财政部关乎着新政府的命脉。有了民众的支持，国家才有财政收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深谋远虑，正面展开稳步攻势的同时，也策划从侧面进行迂回包抄。他想到了新策略，决定要充分发挥杰斐逊的作用。

正在这个时候，国会内部就首都选址问题产生产了局部分歧。南部各州想选波托马克为首都，中部和东部各州想再往北一些。最后，支持在北方选址的一方占了微弱的优势。关于战时债务承担问题，辩论中也分成了两派。中部和东部各州支持战时债务承担方案，南方各州持相反意见，最后南方各州占了微弱的优势。就目前状况来看，两个问题还有商量的余地，也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只要理由正当，就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决定做一笔交易，准备支持波托马克为首都，以此为交换，让投票支持选择波托马克但反对战时债务承担方案的那些州投票支持战时债务承担方案，这样就可以为自己的债务承担方案多赢得几张选票。为实现其政治交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选择了杰斐逊这个得力的伙伴。一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街上遇到杰斐逊。他们边走边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悲切地描绘了国家的危险处境，情真意切地请求杰斐逊，希望他能够利用自己和朋友们的影响力来挽救国家。杰斐逊回答道，他对整件事情“知之不多”，但如果要维护祖国利益，那么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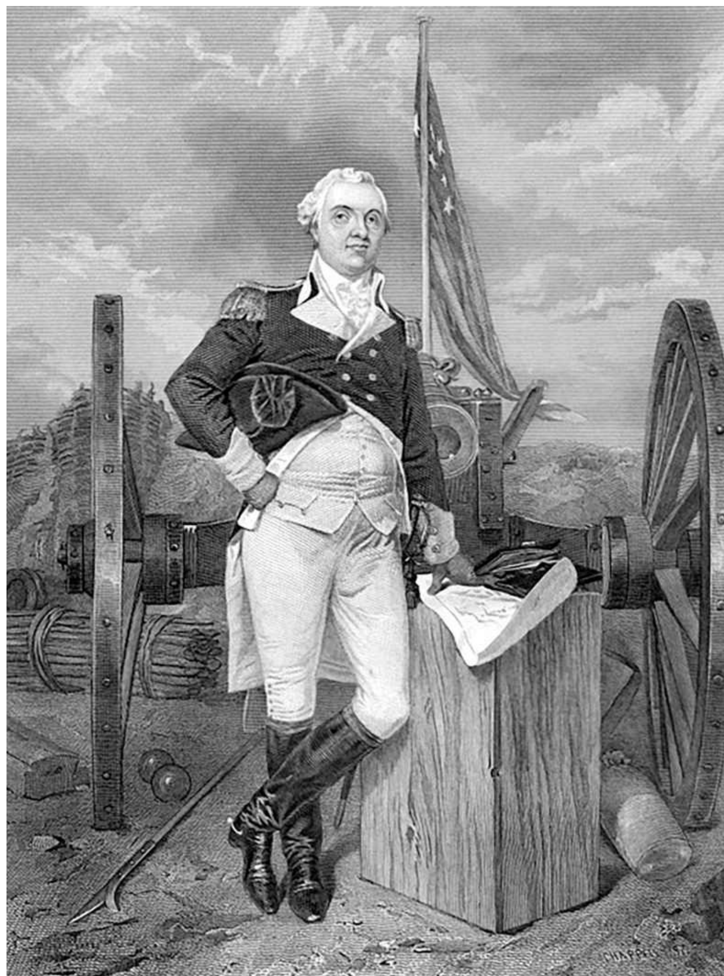
责无旁贷。杰斐逊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第二天一起吃饭，还要请一两个朋友，希望共同设计一个两全其美的“折中方案”。结果，饭局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杰斐逊后来写道，他“不可能亲自参与讨论，只是牵线搭桥，促成了此事，并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饭桌上，双方提出了各自的条件，马上达成一致。这笔交易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完成了，既能实现定都波托马克的目标，又可赢得战时债务承担方案的通过，双方各得其所。按事先约定，双方将选票提交国会。这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方案稳占优势。



埃德蒙·伦道夫（右二）与同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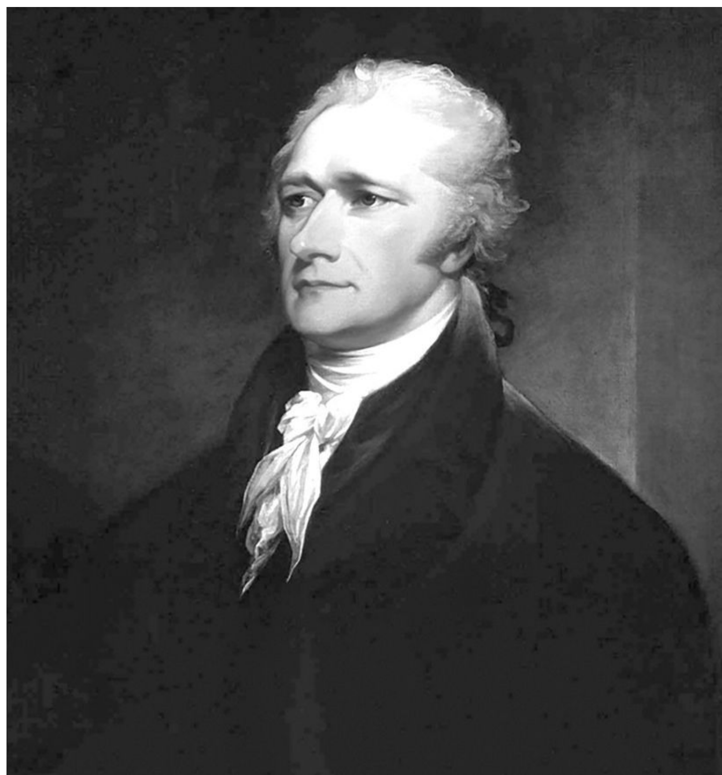
战场上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亨利·诺克斯

后来，杰斐逊很后悔自己参加了这笔交易。杰斐逊从个人的角度看待问题，犯了严重的错误，很大程度上帮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树立了威望，扩大了影响力，有效地促进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财政方案的成功实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后来成了杰斐逊政治上的劲敌。无奈之下，杰斐逊找到参与谋划的那伙人寻求解释，就像一只为逃离陷阱而不得不咬断自己腿的狐狸。为了否定此事，杰斐逊完全牺牲了自己特有的精神品质，忘记了自己在政治上精明的一面。他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下了套，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上了人家的当。财政部长在进行一笔缺德的交易，而他作为国务卿，却“非常无知地拿着蜡烛为其照亮，”站在一边推波助澜。这种辩解似乎表明杰斐逊不适合从政。同时这种辩解也贫乏无力，可信度不强。杰斐逊如此为之，可能另有缘故。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

笔交易简单明了，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明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战时债务承担方案十分健全，杰斐逊本期望能听到别人对它的议论，不料一无所获。该方案的确立一波三折，杰斐逊最清楚其中的苦衷。如果杰斐逊当初没有拿定主意支持该方案，那么他就显得太轻率、太鲁莽。杰斐逊既然当初没有慎重考虑，就无权指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不应该提出并宣扬自己的观点 [2] 。其实，透过杰斐逊的各种理由和实际行动，事情的真相显而易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方案如同人皮肤下面的肌肉，表面之下才是力量所在。杰斐逊怀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财政方案强大的影响力之前，就有人征求过杰斐逊的意见。当时杰斐逊同意参与其中，这才是事实真相。杰斐逊实际上十分愿意推行该财政方案。该财政方案让联邦得以持续，产生的影响更加深远。后来，杰斐逊很欣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因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能出奇制胜地操纵财政，能采取适当的财政措施，使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相当可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方案应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集中力量为社会谋利益。



从政期间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杰斐逊的想法逐渐被人们知晓。他觉得自己糊里糊涂地受人欺骗去改变政府的运行原则，做了自己深恶痛绝的事，对此异常愤怒。杰斐逊也对自己曾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交易牵线搭桥、推波助澜而懊恼不已。杰斐逊觉得这种做法违背了自己的本意。他不仅参与了此事，还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起寻求同伴，共同谋划。最后，杰斐逊算是看清了事情的真相，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其实充分利用了他的天真，引诱他去宣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用自己的智慧打败了杰斐逊。杰斐逊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恨之入骨。杰斐逊曾是种植园主，经营种植园时有自己得心应手的办法，但不是财政专家。杰斐逊热情难抑，要将以前的经验变为理论，用来处理错综复杂的国家财政问题。杰斐逊的思想有时狂热不已，常常荒谬地异想天开。去内阁任职的几个月前，杰斐逊曾有一个奇异的想法，他说："这样的结果不仅值得做出决策，而且要成为政府基本准则。"后来，大家才知道他的伟大而令人迷惑的学说指什么。杰斐逊认为任何公共债务存在的时间不能比设立债务的这一代人的寿命更长。他像一位大胆而独到的逻辑学家，提出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活着的人在土地上设立了用益物权，人死了之后再无权使用它。"他说，一旦一项公共债务存在的时间比设立它的一代人的寿命长，"土地上"设立的益物权就变成了一种死人强加给下一代的负担。这种说法与"不证自明"的前提背道而驰，显然不对。杰斐逊认为，假如一个人在二十一岁有权设立债务，大多数在二十一岁时活着的人会再活三四十年。由此推断，一代人可能会背负长达三四十年的债务。"一代人由各个年龄段的人组成，法律的制订是以二十一岁以上的所有人为对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会死去，三四十年的合同期太长。"于是他将该负债时间减少到十九年。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说这样的废话，真让人感到可笑、可怜又可怕。由此可见，杰斐逊在批评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财政专家时，难免让人感到有点遗憾。

杰斐逊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不善于处理财政问题，毫无顾忌地批评别人，实在是一种危险的做法。杰斐逊总是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就是一个谜，民众从来不能理解也无法质询。1802年，杰斐逊在写给艾伯特·加勒廷[3]的信中提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 他想将财政问题复杂化，乔治·华盛顿总统和国会都无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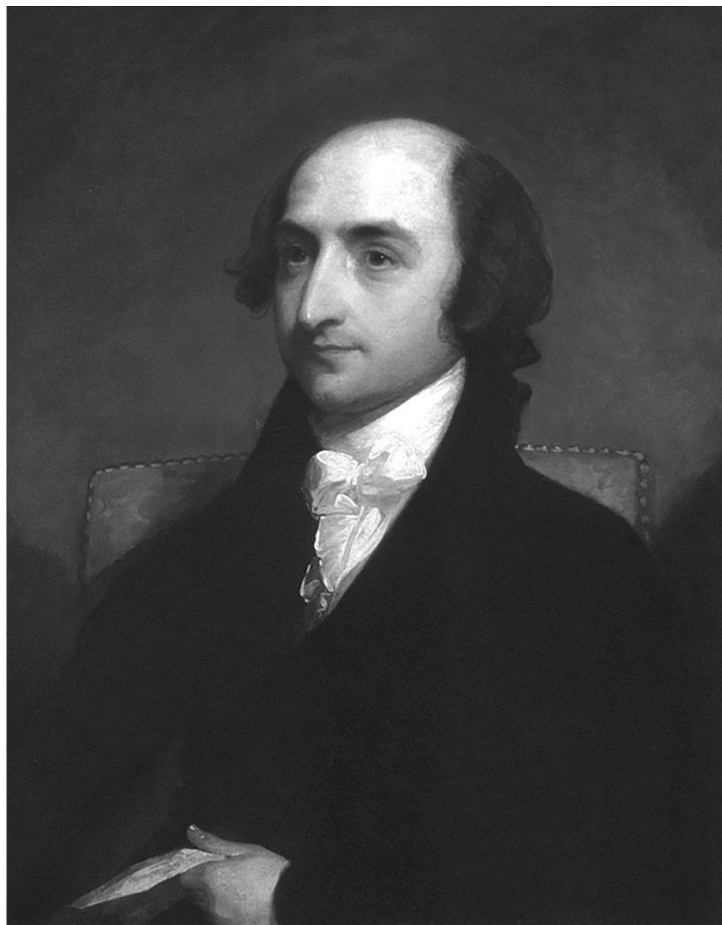
解，因此也无法控制他，政府几乎成为他操纵的机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先通过负债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然后将这些东拼西凑来的财政收入作为自己的财政拨款，用在不同的对象上。实际上，好多收入根本不存在，整个财政系统被他搞得乌烟瘴气。这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的最武断、最不可思议的财政政策。

1818年，杰斐逊才公开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立的财政体系在实际运行中完美无比，根本无懈可击。杰斐逊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指责绝对真实，因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一直是杰斐逊无法破解的“难题”。尽管如此，杰斐逊还是盲目地仇恨和谴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滔滔不绝地讲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杰斐逊对具体问题吹毛求疵时，对经济原则却一无所知，思维异常混乱。相比之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宏大而简洁，有总的大纲，也有具体的操作细则。他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清晰易懂，就连妇女儿童都能理解。杰斐逊不太熟悉这个领域，没有什么难题要解决，也算是一件幸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日趋完善，控制了除国家银行以外的其他政府机构。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有人认为，乔治·华盛顿组建内阁就是为了合并政党，将持相反政见的主要代表人物召集在一起，让他们成为政治上的搭档。这种说法以两种错误的判断为依据，显然不正确。第一，杰斐逊反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支持的宪法。这已证明是错的。第二，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分别从一开始就建立了相互对立的财政体系。可事实并非如此。一段时间内，所有人都对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疑心重重，捉摸不定新政府的政策。结果表明，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做的一切都十分符合事实逻辑，也符合国家和民众的实际特点。他们已离我们远去，我们不得不改变对他们的看法。这两位主要人物的思想特点过了好长时间才得以显现。他们曾相互学习，相互影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有一定的友情基础。他们自己也很清楚，他俩不可能和睦友好地去奉行同一种政策。起初，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确没有两个政党，更没有两种体制。只是人们思想观念中自然而然地觉得他们是两个党派，这种观念就像是斜躺在矿坑里的矿石，有一半不为人们所见，尚未加工成形。

有人曾旗帜鲜明地反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所有观点，但他们不是有组织的党派，也没有明确的政治原则。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逐步趋于完善，人们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位创立者的了解也更加全面。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立了财政秩序，增加了财政偿付能力，使政府越来越强大。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自己的准则来解释宪法，为政府的运行奠定了基础。政府有了更多的权力。人们都知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推崇君主政体。他没用多长时间就将一个共和政府变得如此强大。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人们对此惊恐不已，他们牢牢抱成一团。这些人中间，杰斐逊的民主主义思想最强，对君主政体最警惕。回想杰斐逊宁愿无政府也要有报纸的观点，我们不难想象，杰斐逊看到一个联邦如此迅速地转变成君主政体的国家时，该有多么伤心。不久杰斐逊又有了奇思妙想。他认为就当时情况来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如同开着船航行在一条毁灭之路上，而他杰斐逊要在乘客中低声发出警告，组织一场哗变，来对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因为真正有权掌舵的是他杰斐逊，而不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相互信任的时间不长，有过短暂的友谊。没想到他们后来成为政治上的劲敌。两个朋友相互指责、攻击，各自的追随者们也参与其中。不久以后，他们彻底撕破了脸，相互之间的攻击日益尖刻，甚至反目成仇，不共戴天。

由于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斗争，杰斐逊开始准备撰写著名的《语录》，为自己树立好名声。杰斐逊的朋友们不敢为这些令人恐怖的言辞辩护。有人以向杰斐逊道歉的方式进行辩解，倒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杰斐逊的著作出版时，编辑以责任为借口，借杰斐逊之名，诽谤杰斐逊已死去的政敌，并将这些诽谤永久地保留下来。其中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传了再传的谣言和闲话，以及充满恶意的故事，目的是攻击敌人的名誉。而这位编辑所谓的“敌人”从来也没有攻击过他本人一次。更令人可憎的是，这位编辑让这些恶毒的片断整理出版。当时他所攻击的“敌人”早已死去，已无法以现有的证据反驳，而他自己死后，也无人将他叫来当面对质，更不能惩罚他。编纂这些臭名昭著的片断可算是历史上最卑鄙的行为，严重损害杰斐逊的名誉，远远超过了杰斐逊一生中所犯的错误和政敌们对杰斐逊的攻击。如果这位编辑能够抵挡住诱惑，不要对这些已死去的所谓的“敌人”卑鄙地进行报复，那么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会更加高尚。



艾伯特·加勒廷



总统任上的乔治·华盛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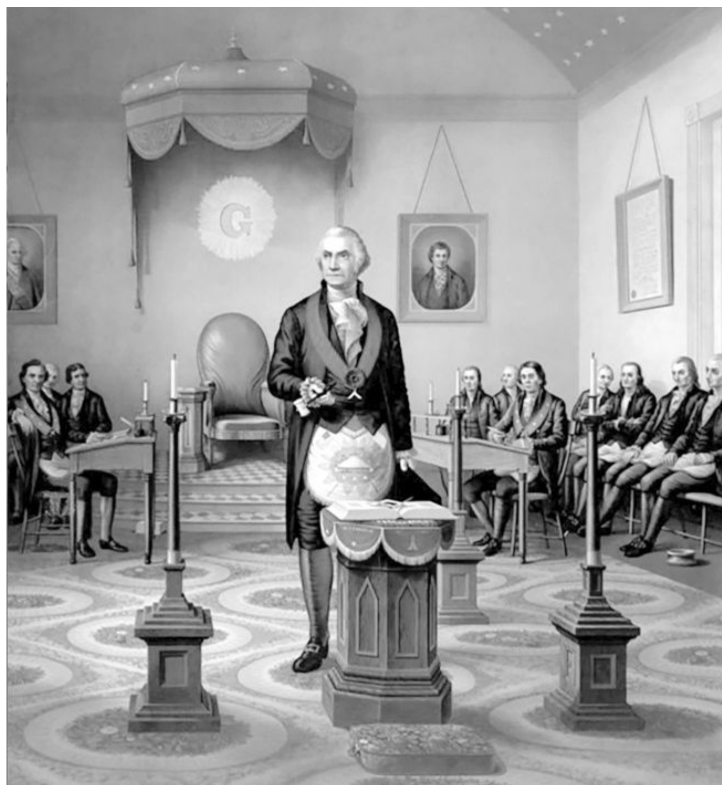
注解：

[1] 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美国民主共和党成员，美国第四任总统，大陆会议代表，制宪会议的主要人物，担任总统期间领导了第二次美英战争，保卫了美国的共和制度，为美国赢得彻底独立。——译者注

[2] 在杰斐逊1790年6月20日写给门罗和1790年6月27日写给吉尔默的信中，可找到证据，他当时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理解到位，并对此寄予希望。——原注

[3] 艾伯特·加勒廷（1761—1849），美国民主共和党成员，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外交家、政治家，曾任美国财政部长。——译者注

第9章
反对君主政体及同联邦党人论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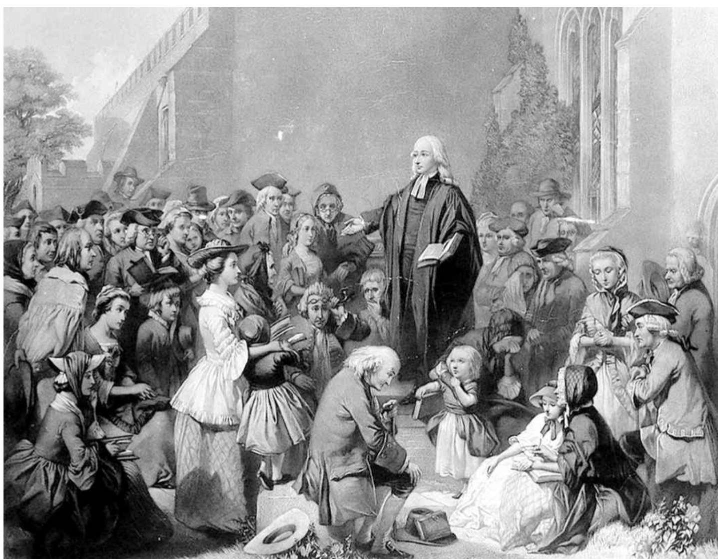


精彩看点

成功的政治家——君主政体的影子——支持共和的人——坚持自己的观点——财政政策——投机活动——银行法案——银行促生了腐败——国债——支持新宪法——广大民众的支持——菲利普·弗瑞诺引起的论战

杰斐逊才华卓越，智慧超群，是位成功的政治家，在美国历史上就像一颗璀璨的明星。他与别人之间不太受人称颂的斗争也众说纷纭。杰斐逊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具有政治家所没有的一些优点。杰斐逊还是一位思想家，深刻地思考政府理论以及社会、政治组织原则。他是激进分子中的激进分子，是激进阶级中的民主主义者。他从未宣称过民众应该组织政府，因为他的潜意识中，政府根本不应该存在。“人权”是当时

最流行的词语。杰斐逊认为“人权”意味着完全没有政府控制。相对温和的政敌们称杰斐逊为“空想家”。他那些不合实际的空洞理论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更尖刻的攻击者们指责杰斐逊不诚实。杰斐逊也有不聪明的时候。他以自己惯常的方式处理问题，从不计较小事，总是粗心大意。杰斐逊信守自由学说，奉行宽松的民主，坚持无政府主义，不放弃宗教立场，对宗教的热忱和激情堪比穆罕默德或约翰·卫斯理 [1] 。杰斐逊总是怀疑与自己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他们邪恶可憎，在人类最关切的问题上散播谎言。杰斐逊有可能听信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传言，对持不同观点的人早就怀有成见。杰斐逊善于观察，才思敏捷，很快就看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用什么办法迅速组织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式团体。杰斐逊看到，支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都是能力非凡、雄心勃勃的人。有些人得到了公众的信任，获得了权力；有些人狂敛了大笔财富；还有些人树立了广泛而强大的社会、政治影响力。看着这些毫无前途的发展，杰斐逊既恐惧又反感，情不自禁地担忧人类的自由将在美国彻底毁灭。透过联邦主义者神秘的政策，展现在杰斐逊眼前的是君主体制的影子。杰斐逊觉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位财政部长的每一项措施都是君主政体下的狡猾手段。联邦主义者们每次集会，杰斐逊都仿佛能听到那些“君主主义者们”的小声谋划。如果有人饭后喝了酒，说了大话，传到杰斐逊的耳朵里又会被夸大。他会将听到的话记下，作为君主政体计划有力的证据。杰斐逊将自己写在纸上的偏激思想寄给了朋友们。这些片断后来被收集到一起，形成了他的《语录》。杰斐逊悲伤地将别人为自己散播的流言蜚语告诉了乔治·华盛顿，并一再重复，但乔治·华盛顿却说他在胡说八道。



约翰·卫斯理向民众讲解基督教教义



约翰·卫斯理向印第安人传教

多年之后，杰斐逊回忆起这段时光时说，他刚到纽约不久，就看出了这种可怕的君主政体倾向。

杰斐逊说：“总统热诚地接待了我，我的同事们及圈内所有重要的人物都明确表示欢迎我的到来。两个对立的政治派系都对我这个初来乍到者谦恭有礼，将我当作他们中间的一员。他们饭后谈论的内容让我感到很惊奇，也很没面子。他们谈论的主题当然是政治。他们更愿意要君主

政体，而不愿选择共和政府。我不是一个放弃自己信仰的人，也不是一个伪君子。我发现在场的所有人中间，我是唯一支持共和的人。”

这些话萦绕在美国大地上，一直是人们争辩的内容。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任何夸张的说法都会被认为是谎言。事实上，杰斐逊后来发现自己的政治信仰并不完美，也曾痛苦万分。听到君主政体，杰斐逊就觉得是对民主的冒犯。宪法不可能做到让每个人都满意，宪法的作用通过政府才能体现出来。人们公开讨论宪法的效力，还未从心底里忠诚于宪法，也没有萌生对宪法的自豪感和深情。杰斐逊对君主政体深感忧虑。他甚至想改变政府形式，指控君主政体的拥护者。

杰斐逊觉得君主政体十分恐怖，认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坚决反对宪法。这种说法不攻自破。长期以来人们都普遍认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宪法最忠实的支持者。谁是谁非，乔治·华盛顿总统心知肚明。杰斐逊说：“他（乔治·华盛顿）认为，目前之所以争论不休，是因为有人怀疑某一党派做得太过分了。也许有人想把政府的形式变成君主政体，但他不相信有阴谋。也许有人希望在上流社会，特别是大城市里，实行君主政体，但东部、南部各州的绝大多数人都坚信共和。”这些话是杰斐逊自己说的，可靠性强。

我们要像探求真理一样对待杰斐逊的思想，不必过分关注他的行动。杰斐逊深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为了君主政治搞阴谋诡计，认定他们背叛了宪法。杰斐逊的信念刚开始时如同一粒芥菜种子一样微小，但他坚持不懈地反复声明自己的信念。他的信念不断增强，变得像参天大树一样茂盛。杰斐逊经常重申自己所持的观点，并找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天长日久，他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一位读者从杰斐逊的信件和回忆录中发现，杰斐逊将多年来挂在嘴边的“君主主义者”和“独裁主义者”们描述得像水蛇一样毒。这位读者认为，杰斐逊经常提到的这些人应该存在，若不然他就是将一些子虚乌有的东西说成事实。一谈到这个话题，杰斐逊往往真情流露。这种情感至深至强，难以言表，根本不像虚情假意。

杰斐逊认为君主主义者做事的目的令人厌恶，其手段也很卑鄙。他们连同拖欠的利息全额付清了国内债务，然后出台了各州债务承担方

案。一年半的时间内，君主主义者们提供了许多投机机会。当时人们的热情高涨，就是现在生活在华尔街的人也望尘莫及。

城市里有资本、有远见和有事业心的人们低价购买了证券。尤其是纽约和费城的民众简直就是国会肚子里的蛔虫，什么信息都能预先知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追随者们也大胆加入这场投机活动。有人认为君主主义者们像稻草人一样虚张声势。后来，支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人获得了巨额财富，赢得了政治权力和社会影响力。杰斐逊等人感到既震惊又恐惧。他们指控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利用财政部长的职位，为他人提供牟取暴利的机会，让更多的人追随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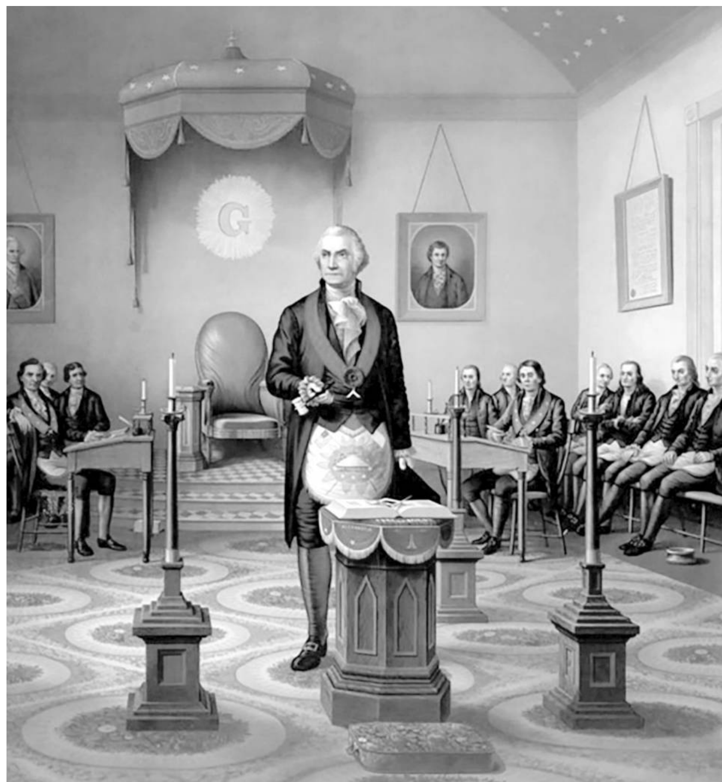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利用庞大的金融体系将美国从濒临破产的不景气状态变成了偿付能力较强、信誉良好的国家。杰斐逊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一切，认为这样的金融体系就像一台巨大、复杂而高效的机器，正在生产国内最危险的贵族政党。

杰斐逊讨厌军事机构，憎恶政府权力。他认为所有税收应该留给各州，取消消费税。从杰斐逊给国家银行的建议中也看不出他对银行有半点好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准备通过政治手段推行财政政策，得到了大家的充分赞赏。财政部再也不会说自己难以支撑，联邦的存在已岌岌可危了。《银行法案》首先要合法，而且要从长远着眼。由于存在是否合法的问题，通过该法案困难重重。乔治·华盛顿向内阁官员们征求书面意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国内一篇著名的文章为论据来支持该法案。杰斐逊则从另一方面入手，强有力地论证只有自己能理解的法律问题。乔治·华盛顿瞻前顾后，最终决定签署该法案。乔治·华盛顿总是不愿干涉各位部长的工作。如果总统违宪了，最高法院可予以纠正。法庭上，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 [2] 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论证没做任何补充，证实了银行的合宪性。法庭拒绝采纳杰斐逊的观点，牵强附会地解决了纯粹的法律问题。该问题的关键是从严解释宪法还是从宽解释宪法。杰斐逊认为应该从严解释宪法。不少人支持杰斐逊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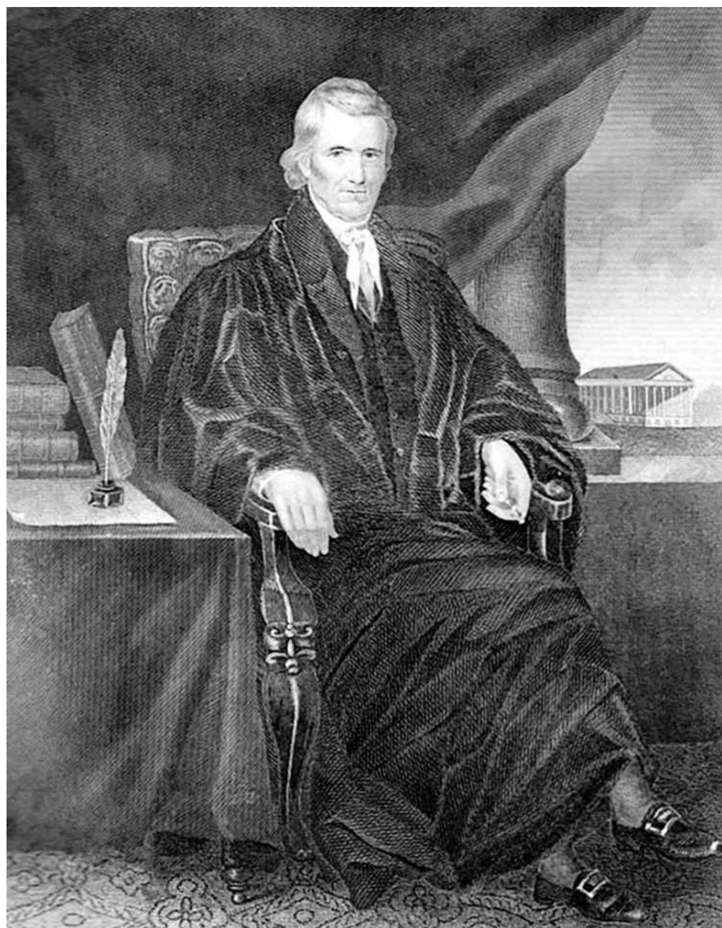
杰斐逊只想到了该法案的合法性、合宪性问题及其政治意义，并没有考虑到它与国家财政、商业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银行法案》签署

后，黄金和白银禁止流通，纸币一统天下。杰斐逊认为这种做法有百害而无一利，马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讲了不少荒谬的废话。资本家们争先恐后地认购股份。他们的认购远远超过了股本。杰斐逊开始担忧货币问题，闷闷不乐地给詹姆斯·门罗写信说："我们每年将以八百万美元纸币中的百分之十三作为流通代价，若用金银，则可免去这笔费用。其中百分之七被认购者以利润方式拿去，百分之六为公共费用。纸币流通后，有六万纸币或两百万硬币作为特别存款，不能被提取，令人难以相信。人们为了寻求安全保护而存入银行的现金可能满足现金流通需求。"杰斐逊不知道银行的特别存款是违法的。显而易见，他不懂金融。

银行无论是否合宪，都能为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杰斐逊认为银行就像是一台多产的机器，也能制造出更多腐败分子支持那些危险而又有预谋的君主主义者。杰斐逊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称为"财政党"，变本加厉地指责他们，一生也没改变过对他们的看法。1818年，杰斐逊在《语录》的前言中写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君主主义者。他的目的是建立腐败的君主政体。"杰斐逊说，银行变成"影响力持久的生产腐败的机器"，腐蚀了立法机构，对财政系统的影响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杰斐逊认为，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们不仅经常被当作"董事"，根据该机构首脑的意愿投票，而且要和"股东们"一起谋划怎样可以让联邦党的得票占绝对优势。1793年3月3日，国会讨论威廉·贾尔斯 [3] 谴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著名决议。杰斐逊写道："组成众议院的成员比较复杂，有银行董事、银行股票持有人、股票经纪人、盲目投资者。有些人很无知，还有一些人又懒又幽默，不愿意谴责别人。有人预测，银行董事、银行股票持有人、股票经纪人占了众议院议员的三分之一。盲目投资者、无知的人、懒人又占了剩余人数的一半。"杰斐逊指出，反联邦党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指控无中生有，不太光彩，最终将以失败而告终。杰斐逊认为《银行法案》的实施让人感到遗憾，也令人悲伤，对其中的错误深表同情。



《银行法案》会议上的乔治·华盛顿



约翰·马歇尔

大规模的投机活动结束后，杰斐逊开始担心国债。杰斐逊认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派想巧妙而隐蔽地使用国债来永久性地腐化立法机构。一部分国债到期已好几年了，还没有兑现。杰斐逊认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打算永远不让民众来兑现国债。他说，每个人都在观望，害怕“财政部的胆小鬼”和他们的“阴谋诡计”，“买了国债的人认为国债对公众是好事，越久越好，希望这笔债越来越多，让政府永远也还不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了短期内促进还债的计划，但杰斐逊仍然怀疑他。杰斐逊绝不相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政治上能做出一件诚实的事来，对他的偏见根深蒂固。

乔治·华盛顿总统密切关注着部长们，发现他们互不信任，已经组建了敌对的政党。乔治·华盛顿是全国人民的总统，决不与任何党派往来。

对立党派的领导人争论不休，不断相互指责、互相抱怨，乔治·华盛顿不能充耳不闻。1792年5月23日，杰斐逊给乔治·华盛顿写了一封长信，探讨了两党争斗这个“令人焦虑的问题”。因为两党争斗与整个国家事务息息相关，“搅”得大家不得安宁。杰斐逊说，新形势下增加国债不可避免，但国债多得无法偿还，这是“人为地将债务人和债权人账户的全部金额相加而造成的。”国家资金被挥霍无度，产生了“许多腐败分子，他们把持了立法机关”大有“摆脱宪法限制的意向。”“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共和政体到君主制的转变做好准备。”杰斐逊认为，“腐败的立法机关”将成为“国王、贵族、公爵和平民的产生地，成为任人操纵的工具。”债务人在南方，债权人在北方。这种分配上的不均衡使联邦面临解散的危险。杰斐逊深信，只有乔治·华盛顿继续执政，才能避免这种危险。杰斐逊将反对总统连任的理由搁置一边，恳求乔治·华盛顿不要退休。一有机会，杰斐逊就反复说这件令人担忧的事。1792年7月10日，杰斐逊力劝乔治·华盛顿，说：“没必要再增加国债，因为它不断腐蚀立法机关。参议院和众议院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投票支持纸币和股票经纪人的利益。审查这些人的投票时发现，他们对财政部每一项措施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些措施大多数是由少数人制定，然后由多数人投票通过的。”

1792年2月至3月，杰斐逊曾告诉乔治·华盛顿，财政部惹得人们怨声载道：

> 这种金融体系不用真金白银，而是用纸币来哄骗各州。民众不再热衷于商业、制造业、建筑业和其他各种实用的工业，而带着他们的资金都卷入一场赌博，败坏了道德，并将不正之风带进了政府。事实上，法律正在审议的时候，某些议员借机大赚一笔，然后投票支持法律……议员们的提议和以前大不相同。许多人都开始关注议员们的提议，因为这些提议让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有限制的政府还是没有限制的政府之下。

杰斐逊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发表看法。“这份报告打着奖励某些制造业的旗号”，旨在掌控国会，控制社会福利、货币使用等一切事务。1792年10月1日，杰斐逊向乔治·华盛顿报告：

> 民众是可靠的，许多派系中有君主政体的意图，财政部长

就是其中之一。我曾听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过，宪法软弱无力，不甚完善，还需改进。我回想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议会会议中曾力主设立英式宪法，没能成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所有措施都殊途同归。有些措施引起了立法机构的腐败。许多议员对这位财政部长百依百顺，叫他们往东，他们绝对不敢向西。看到这些现象，我们心中自然不舒服。

1793年2月7日，杰斐逊再次表示："国会中有不少议员对财政部言听计从。"他们投票时本应忠诚于选民，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致使制定的法律违背了民众的本意，引起了南方的不满。

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外，杰斐逊很少攻击别人。1791年5月8日，他却借别的事情狠狠地攻击了约翰·亚当斯。杰斐逊说："恐怕是印刷工粗心大意将内容印错了，致使我攻击了约翰·亚当斯。他是我诚实、无私的朋友。长期以来，我们都信奉共和，观点一致。我对他更是尊敬有加。即使他改变信仰，去追随世袭君主制和贵族制度，我们的友谊仍在。"杰斐逊对乔治·华盛顿这样说，对其他人也这样说。早在1791年2月4日，杰斐逊写信给乔治·梅森上校[4]，说："我们中间有些人相信英国宪法包含了最完美的制度。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在民众中地位很高。"1791年7月29日，杰斐逊在写给托马斯·潘恩的信中提到，"这里有一派人，名声很大，人数不多"，错误地认为人们正在"皈依"有国王、贵族和平民之分的"君主政体"。杰斐逊又很有礼貌地补充道，这种错误已"得到制止"。随着托马斯·潘恩《人权》的出版，人们都"回过头来信奉共和。"1792年6月16日，杰斐逊写信给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说："我们中间有一派人，宣称支持新宪法，不是因为新宪法本身有多好，而是新宪法和英国宪法非常接近，在他们眼中很完美……好多股票经纪人和宣扬君主政体的人进入了我们的立法机构，影响了不少议员。"面对众多繁杂事务，杰斐逊恐慌过、焦虑过，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杰斐逊真诚地热爱自己的国家，有坚定的信仰，发现民众也在追求共和，顿时倍受鼓舞。杰斐逊的信仰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遭到了冠冕堂皇的政治家和上流社会的反对。杰斐逊总会抓住时机摆脱不利因素。如果他发现某种思潮意义深远，与自己的追求一致，符合自己的期望，就会精神焕发，期待着这些思潮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影响国家的发展。杰

斐逊有深刻的政治洞察力。他认为，民众参与政治、建立自由政体是大势所趋。上流社会的人们都佩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政治才能。杰斐逊信心十足地认为，只要像自己这样能干的人运筹帷幄，广大民众就能以绝对的优势战胜那个只有少数人组成的小团体。

杰斐逊信任民众，坚定地认为他们是不可战胜的力量，而且坚信这种力量完全可以发挥出来。杰斐逊认为，民众有足够的智慧做出分辨，会选择像自己和詹姆斯·麦迪逊这样诚实、能干的人主持国家事务。杰斐逊认为，在最理想的政体中，人们会发现自己的贫乏和无知，崇尚高贵的品质和杰出的智慧。当时，贫乏、无知的民众参与政治的确有点不可思议，但杰斐逊坚持认为他们谦逊质朴，懂得自我克制。杰斐逊想当然地认为民众总是好的，这是值得称颂的地方。自杰斐逊的学说形成以来，实际上没有多少人发生令人满意的变化。杰斐逊也不可能改变民众。杰斐逊所设想的民主政体中，民众会选择最优秀的人来管理国家。如果期望无法实现，杰斐逊无疑会失望而愤慨地放弃自己的观点。这只是一种推测，不知正确与否。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民主政治并未像杰斐逊所期望的那样发展。杰斐逊如果能看到后来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一定会大为震惊。

按当时的习俗，高级官员在报纸上交流政治观点时必须匿名。这种习惯有利有弊。它会使人与人之间相互怀疑、怨恨甚至敌对起来。杰斐逊与约翰·亚当斯之间的误会就源于此。当时杰斐逊犯了一个荒唐的错误。

约翰·亚当斯的《达维拉的演讲》现在读起来有点乏味，当时有民主倾向的读者们对它厌恶至极，因为书中言辞激烈地批评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说来也巧，《人权》在美国“唯一的副本”传到了杰斐逊手中。杰斐逊读完后“寄给了乔纳森·贝亚德·史密斯，让他的弟弟去重印。”杰斐逊说：“我不认识乔纳森·贝亚德·史密斯。我写了一封信，向他解释为什么我这个陌生人寄给他一本小册子。我告诉他，我很希望这本书能够被重印，并要求他在重印时把那些枯燥的笔记部分去掉。我们终于可以公开反对政治异端邪说了。”这位印刷工居然将那份笔记附在了书的最前面。杰斐逊看后大吃一惊。联邦党的作家们立刻像一群黄蜂似的对托马斯·潘恩进行口诛笔伐。一位叫“爱民者”的人还对托马斯·潘恩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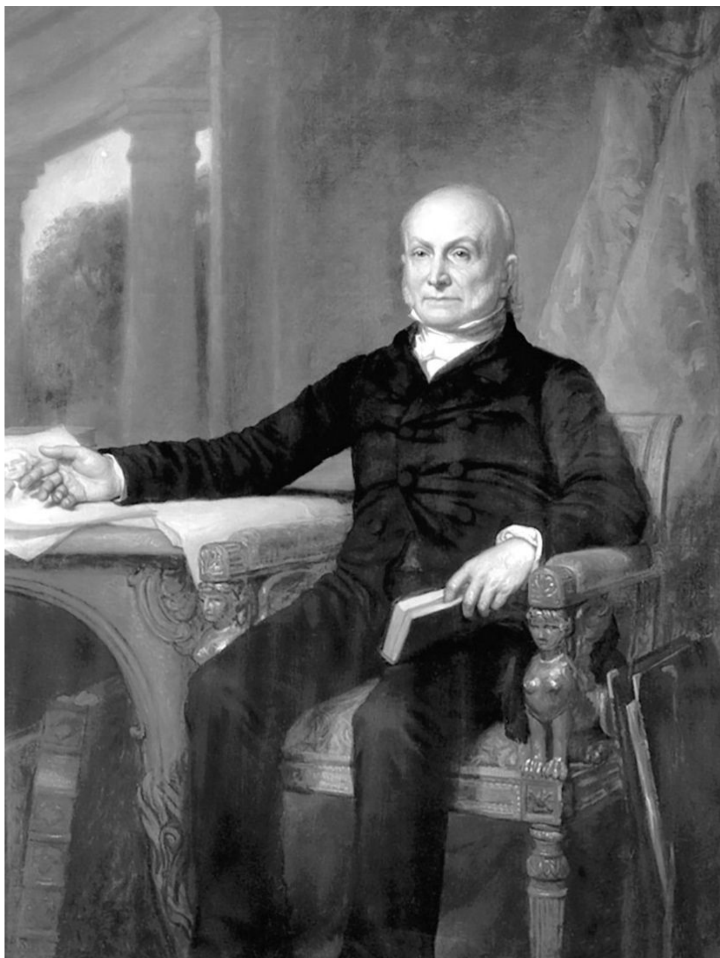
尖刻的讽刺。杰斐逊急忙给约翰·亚当斯先生家写了两封信解释，希望不要争吵，要与那愤愤不平、略显蔑视之意而又搬弄是非的“爱民者”对话。杰斐逊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写了这么多表达和平意向的信，这位“爱民者”居然是约翰·昆西·亚当斯——约翰·亚当斯引以为豪的儿子。这就是匿名在报纸发文章这种可怕的习惯带来的危险。

讽刺漫画：托马斯·潘恩拿着卷轴，上面写着“人权”，体现了他反对“君主政体”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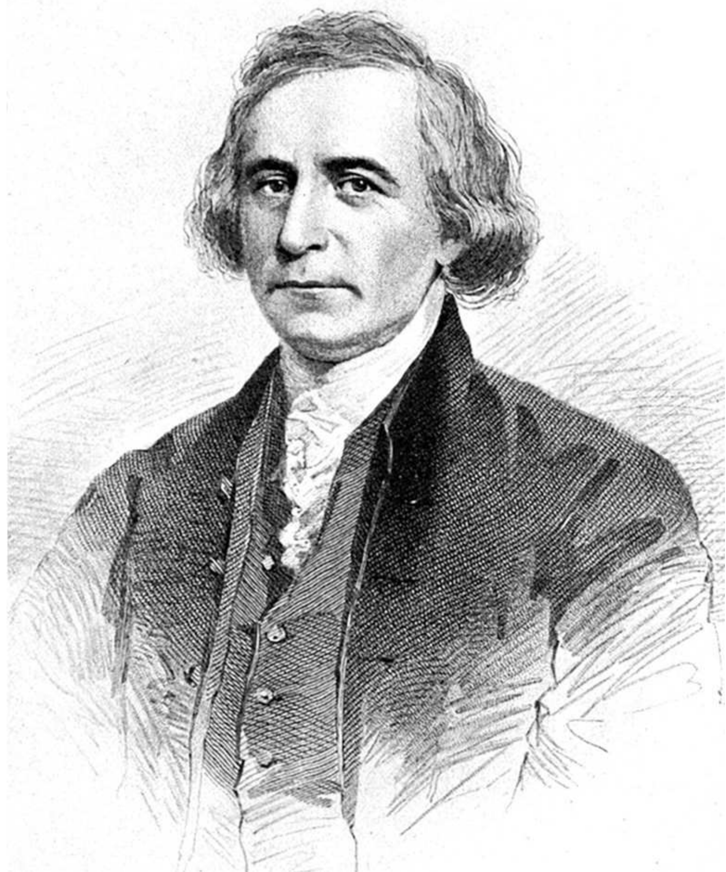
更严重的是当时的《国家公报》也参与这场风波、制造麻烦。杰斐逊任国务卿不久，詹姆斯·麦迪逊写信推荐菲利普·弗瑞诺作书记员。菲利普·弗瑞诺是民主主义者中的三流作家，诗写得也不怎么好。当时杰斐逊没有空缺的职位，后来需要一个“外语书记员”，工资为“每年二百五十美元”。工资这么少，也是为了让其他在职的书记员们安心地工作。杰斐逊亲切地给菲利普·弗瑞诺写信，给予他这并不起眼的职位。没想到这件小

事却引起了一场没完没了的麻烦。这位收入低微的外语书记员为了维持生计，又找了一份兼职，在《国家公报》任编辑。更凑巧的是，菲利普·弗瑞诺先生对自己部门的领导特别信任，对财政部十分反感。

《芬诺公报》是为财政部代言的报纸，无人与之匹敌。新的《国家公报》却以莫大的勇气和进取精神，用不太文明的语言指控财政部，积极地支持国务院。菲利普·弗瑞诺不但信念坚定，而且笔锋犀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他的同党很快在菲利普·弗瑞诺的攻击下退缩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及其同党认为菲利普·弗瑞诺无足轻重，根本犯不着为他生气，国务卿才是此事的幕后操作者，是他们真正指控的对象。他们说，杰斐逊十分阴险，将所在部门的材料和信息提供给了那愤愤不平、下流不堪的文章作者，并发布在了报纸上。杰斐逊的同事不怀好意，不计后果地对别人恶意中伤。杰斐逊要对乔治·华盛顿总统负责，要对一切发生的事情负责。杰斐逊怒不可遏地驳斥了这些指责，表明自己与《国家公报》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时，杰斐逊开诚布公地说，《芬诺公报》上刊登的文章非常出色。杰斐逊既没有开除菲利普·弗瑞诺也没有责备他。一场指责过后，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杰斐逊应该有所举动，没想到他却无动于衷。杰斐逊明确表示，自己完全没有干涉过那篇文章，如果要干涉，以自己的足智多谋，肯定会阻止文章作者攻击乔治·华盛顿。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支持杰斐逊的观点。杰斐逊也称赞过这篇文章。不能轻易地说杰斐逊在这件事上做错了。菲利普·弗瑞诺或许无意间从杰斐逊那儿获得了灵感，用无限巧妙的语言写了那篇文章。让杰斐逊为该员工在编辑部所做的工作负责，那就太过分了。后来人们讨论，写了文章的职员就在杰斐逊的部门中，整天指责国家政策，恶语中伤内阁成员，杰斐逊是有意让他留在自己身边。这也反映出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杰斐逊与同事们之间的关系。



约翰·昆西·亚当斯



菲利普·弗瑞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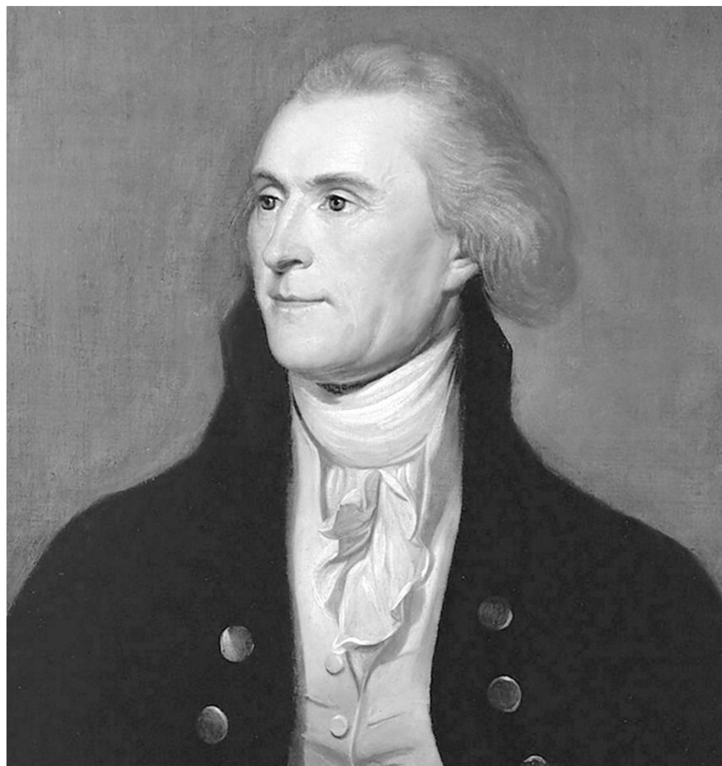
1792年8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怒不可遏，亲自参与了论战。他化名“一个美国人”，突然出招，就像侏儒中的巨人，让众人震惊。虽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没有直接表明身份，但谁都知道那可怕的攻击出自谁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第一篇文章猛烈抨击杰斐逊没有开除菲利普·弗瑞诺，还继续和他保持联系。接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又指控杰斐逊对宪法和政府不忠。杰斐逊看到这猛烈的攻击后无动于衷，什么也没说。菲利普·弗瑞诺写文章明确表示，自己写文章时根本没有和杰斐逊沟通过，杰斐逊不知道这件事，从来没有写过、也没有讲过文章中的只言片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轻蔑地表示，除了杰斐逊外，别的对手都不配和自己交手。盛怒之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写的文章论点明确，铿锵有力。维护国务卿的人也不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论战伊始，就不得不和一群小打小闹者交锋。他对这些人的攻击也满不在乎。杰斐逊极其谨

慎，不愿卷入激烈的论战。

看到这场突如其来的论战，乔治·华盛顿极为恼怒。这位品德高尚的总统很伤心也很失望。他努力地消除两派之间的分歧，去填平这历史以来就有的沟壑。乔治·华盛顿以个人名义分别给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写信，劝他们团结一致，以国家利益为重。在回复总统的信中，他俩对乔治·华盛顿彬彬有礼、体贴入微。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完全相悖，不可能和谐共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表示必须面对这场冲突，尽量不再卷入其中。杰斐逊也有理有据地为自己和所在的党派辩护，指责联邦党人及其政策。

杰斐逊曾说，他“进入政府时，决心不干涉立法机关，尽可能不干涉各部门的工作”。杰斐逊一丝不苟地遵守着这一明智的决定。每当回忆起自己曾参与了战时债务承担法案时，杰斐逊总是显得很痛苦。“我上了财政部长的当，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成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推行计划的工具。在政治生涯中，我犯过许多错误，每当想起此事，就后悔不已。”杰斐逊承认，他不同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政策。因为“这位财政部长通过自己的部门影响立法机构，反对自由，处心积虑地破坏共和。”杰斐逊指责国会中的“腐败队伍”，他们听命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通过投票改变形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操纵着他们“一步一步地破坏了宪法的原则，还宣称宪法无足轻重。”杰斐逊始终约束自己不去干涉财政部的工作，没想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但不思回报，反而伸出手来干涉外交事务，支持英国敌视法兰西王国，完全与自己背道而驰，也有悖于乔治·华盛顿的意愿。随后，杰斐逊开始关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化名“一个美国人”在《芬诺公报》上对自己的攻击。杰斐逊承认自己反对过宪法，但后来的宪法修正案正好说明对宪法的批评是正确的。如果说杰斐逊比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更反对宪法，说杰斐逊不忠于宪法，纯粹是无稽之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所以对宪法不满，是因为“其中没有国王，也没有英国式的上议院”。杰斐逊认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希望国债“永远不要偿还，以此腐化和操纵立法机构”，而杰斐逊则希望“明天就能兑现”。杰斐逊喋喋不休地批评腐败问题：“财政部上百名职员及上千名收税官中，不知有多少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子侄、亲戚；不知有多少是参议员、众议员、印刷工人的亲戚朋友；不知有多少追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党派

主义者。这些人都是在得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默许后才进入财政部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像洗纸牌一样，将数百万的钱倒来倒去。将纸币换成金银，又将金银换成纸币，从美国倒到欧洲，又从欧洲倒到美国，在适当的时间，以自己喜欢的方式与朋友们秘密交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想方设法运用手段，抓住任何机会结交朋友。谁也想不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指控我的理由竟然是因为我以二百五十美元的年薪安排诗人菲利普·弗瑞诺做外语书记员。”杰斐逊讲述了菲利普·弗瑞诺文章的来龙去脉，表明自己刚开始并不知道这篇文章。至于后来的事情，杰斐逊坚定地说：“我对天发誓，我从未发表过只言片语的观点，从来没企图它能产生任何影响。我自己没写过、也未口授过任何内容，也未间接地指示别人这样做过。我在报纸上所写的文章都有署名。我绝不会借别人的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当我来这儿任职时，我就下定决心要尽快体面地退休。最好的时机莫过于宪法进行周期性修订或公务员更新时。对我来说，退休还为时尚早……我像一个饱经风霜的水手，最终看到了陆地，渴望停船靠岸的那一刻。我看到了自己退休的那一天，从现在到退休这段时间里只能度日如年。”杰斐逊说自己“完全无视所任职位带来的荣耀和酬金”，真正珍视的是“同胞们尊重我，并认为尊重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杰斐逊“不想在退休时受到别人的诽谤。历史将会证明，制造诽谤的人曾炮制阴谋反对自由，全然不顾生他养他、为他带来了无数荣誉的国家”。杰斐逊在一封信中曾含沙射影地说，民众并不认为他是“共和国的敌人”“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家”，也不认为他“浪费了国家的税收”“为了腐败而出卖了灵魂”。这封信写得有声有色，可以和著名的演讲词相媲美。信中的论点扑朔迷离，谴责时气势磅礴，抨击时尖酸刻薄，巧妙而真诚地将事实与传言交织在一起，义正辞严的抗议中不乏勇气和哀叹。信中包含了一些话特别实在，写得很真诚。乔治·华盛顿并未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失去信心。乔治·华盛顿明白，双方都有很大的让步空间，而且双方都认为对方存心不良，和解的希望很渺茫。多年以后，杰斐逊说，历史证明他的对手与众不同，历史也会嘲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国家养育了他，他却反对自由的国家。



任国务卿期间的杰斐逊

联邦主义历史学家们不认同信中的观点，认为杰斐逊总是疑神疑鬼，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争论不休。他们说，部长们的私人通信可以证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并没有诋毁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想费尽心机地写一封信去攻击别人并为自己辩解，但杰斐逊这样做了。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争论时都不知道对方要做什么，这样倒也公平。联邦主义者们争论的真正原因或许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杰斐逊气势磅礴的文章束手无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长期斗争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追随者们说杰斐逊阴险恐怖，常暗中诽谤和中伤别人，自己要承担风险时总会让部下出手。他们眼中的杰斐逊是一个可鄙而怯懦的人。这种说法若无事实根据，就有点夸大其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天生争强好胜、热情奔放、目空一切、自信十足，随时准备着和别人一较高下。虽胜负各半，但他并不悲观。杰斐逊倒像是一位平民中的教友派信徒，不愿与别人争论，也不想在报纸上发文章与别人展开论战。批评杰斐逊的人认为，杰斐逊不想表明政治观点，却在晚饭后和朋友谈论政治；不愿为报纸写政治文章，却在信中表达政治观点。杰斐逊情感真

挚，不会在公开场合与任何人和解，更不会私下里诋毁别人。正是遵循这些原则，杰斐逊才会在谈话中或信中公开谈论其他公众人物和各种时事。

财政部门主管国家债务的清算，规定支付条款，负责建立银行和造币场，确定关税，组织税收。这些都是政府的主要业务。遇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杰斐逊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即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不太健全，杰斐逊对金融知识知之不多，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身居要职，管理得当，令人羡慕，影响力巨大，威望很高。杰斐逊完全有理由抱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越权行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情不自禁地认为自己在全国的地位至高无上，习惯于制定政策，并坚定不移地执行所制定的政策。杰斐逊的愤怒和沮丧并不奇怪，因为对金融领域不熟悉，同时，他不对放弃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斗争。若要稳操胜券，杰斐逊就得将斗争转移到施展自己才能的领域。幸运的是，这种转变正在迅速向前推进。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反对者们从多次失败中吸取了深刻教训，更加团结一致，普遍承认杰斐逊就是他们的领袖。国内政策已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的外交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面对新问题，杰斐逊和追随者们重新振作起来。他们最初被消极地称为“反联邦主义者”，后来成了有组织的政党，名称也很响亮。他们视君主政体为异端，自称“共和党人”表示忠诚于宪法。共和党人信奉民主。一部分共和党人称自己的政党为“民主共和党”。后来，共和党人觉得“民主”和“共和”放在一起不太恰当，故删去了“共和”二字。

注解：

[1] 约翰·卫斯理（1703—1791），18世纪英国国教（圣公会）神职人员和基督教神学家，为卫理宗的创始者。——译者注

[2] 约翰·马歇尔（1755—1835），美国政治家、法学家，曾任美国众议院议员、美国国务卿和美国首席大法官，曾判决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奠定了美国法院对国会法律的司法审查权的基础。——译者注

[3] 威廉·贾尔斯（1762—1830），美国民主共和党成员，美国第二届和第三届国会议员，曾任弗吉尼亚州州长。——译者注

[4] 乔治·梅森（1725—1792），美国政治家，1787年成为美国制宪会议代表，撰写《弗吉尼亚权利宣言》，被认为是《美国权利法案》之父。——译者注

第10章
美国中立与法兰西特使的阴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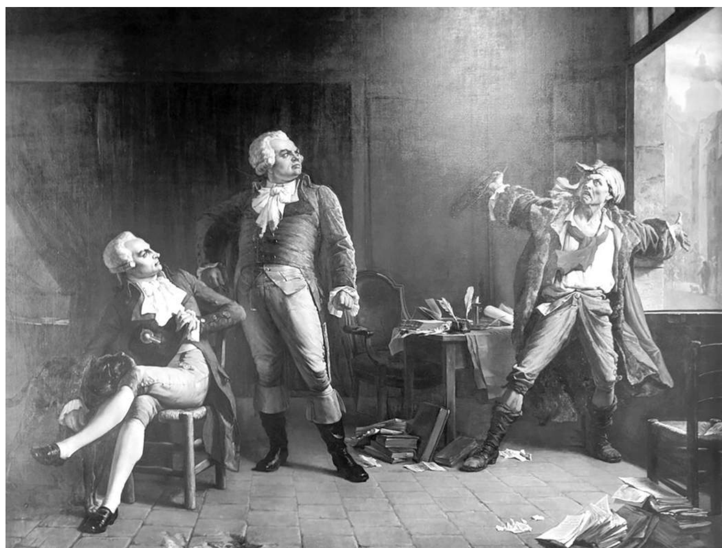


精彩看点

法兰西大革命——国内政治形式——美国的中立——法兰西特使埃德蒙·查尔斯·热内——英国出现了破产——热内的真实意图——偿还法兰西债务——财政部长越权行事——党内的狂热分子——盼望着退休——自相矛盾的指责

法兰西大革命的风暴在大西洋上空咆哮着。消息传到美国后，共和党人顿时扬眉吐气，觉得终于有了出头之日。法兰西大革命的剧变掀起了美国政治上的波澜。在法兰西大革命早期，美国人民全体一致，强烈支持法兰西大革命。随着事态的发展，面对无政府状态、流血事件和长期对峙，天性保守的美国人又本能地开始怀疑法兰西大革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联邦主义者认为法兰西共和国 [1] 和美国并非姐妹共和国。法兰西小说中不忠的妻子像是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主妇。法兰西的共和主义和美国的共和主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杰斐逊坚定不移地支持法兰西人民的事业。无论法兰西人多么糟糕多么卑微，杰斐逊都热爱那片土地，对法兰西共和国的热情不亚于自己的祖国。读完从法兰西共和国寄来的信后，杰斐逊认为君主制度非常可怕，是人类社会极大的不幸。他

表现出由衷的厌恶之情。法兰西摧枯拉朽的革命风暴并没有让杰斐逊感到震惊，因为只有摧枯拉朽的革命风暴才能将“充满罪恶的空气”过滤干净。法兰西革命经历“九月大屠杀”后，美国人对法兰西革命者依旧充满善意，称赞拉法耶特侯爵吉尔伯特·德·莫蒂和乔治·雅克·丹东带领吉伦特派推翻了君主体制，同时对推翻吉伦特派的雅各宾派拍手叫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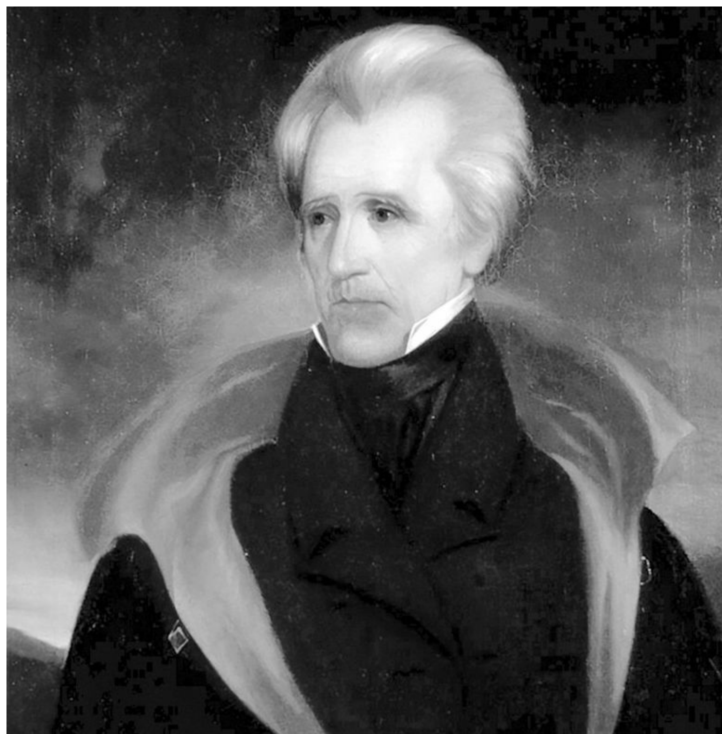
罗伯斯庇尔（左）、乔治·雅克·丹东（中）和马拉（右）



吉伦特派倒台

法兰西共和国向英国宣战后，美国人对法兰西大革命的热情空前高涨，支持法兰西大革命的浪潮势不可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他追随者

们既惊恐又不情愿，不安地看着这位声名鹊起的国务卿依靠的力量稳操胜券。杰斐逊自然很满意，认为自己总能把握住政治态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掌握着国家的情报和金融系统，集结了庞大的政治追随者队伍，政党实力空前强大。杰斐逊对民众充满信心，知道有无数的民众支持自己。他们虽然受教育程度不高，但人数众多。有了民众的支持，杰斐逊便可在斗争中战胜联邦主义者。联邦主义者们虽受过良好教育，可终归是少数。杰斐逊的判断完全正确。安德鲁·杰克逊 [2] 的智慧远不及杰斐逊，但他同样坚定地相信民众，后来在民众的支持下，以一种更加盲目的方式，取得了和杰斐逊一样的胜利。国内政治上的惨淡时期过后，人们开始关注国外政治。共和党人的领袖杰斐逊终于有望在政治上取得优势。如果充盈着那个时代的只是一种谨慎的高卢热，而不是盲目的狂热，那么杰斐逊有可能在约翰·亚当斯之前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



安德鲁·杰克逊

1793年4月4日，法兰西共和国向英国宣战的消息传到美国。五天后，法兰西共和国特使埃德蒙·查尔斯·热内 [3] 到达查尔斯顿。这两件事掀起了美国的政治风暴，使政府陷入了焦虑。美国政府希望保持中立，

但由于诸多原因，做到绝对中立异常困难。首先，美国与法兰西共和国的条约义务纠缠不清。根据与法兰西王国的条约，在任何战争中，美国必须保证为法兰西王国保护好西印度群岛。法兰西共和国向英国宣战，性质是不是防御性的？这很必要商榷。此条约是与君主体制下的政府签订的，对后来的政府是否具有约束力也值得怀疑。其次，不管美国是否有中立的权利，两个参战国都明确要求美国不要中立。他们都认为，如果美国不和自己站在一起，就是反对自己。再次，埃德蒙·查尔斯·热内抓住机会肆无忌惮去实现他蓄谋已久的目的，想尽办法将美国拖入法兰西共和国与英国的战争。第四，真正中立的美国人并不多。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支持英国，杰斐逊支持法兰西共和国。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当时美国人和所有的欧洲人一样，革命的激情已变成好战的狂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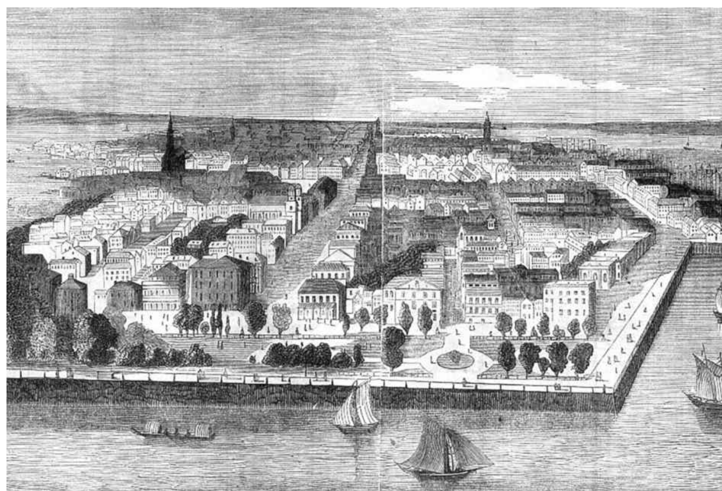
埃德蒙·查尔斯·热内

《中立宣言》必须先由内阁会议决定，然后由总统签署才能正式生效。杰斐逊提议“中立”一词不能在宣言中出现，中立的真实意图也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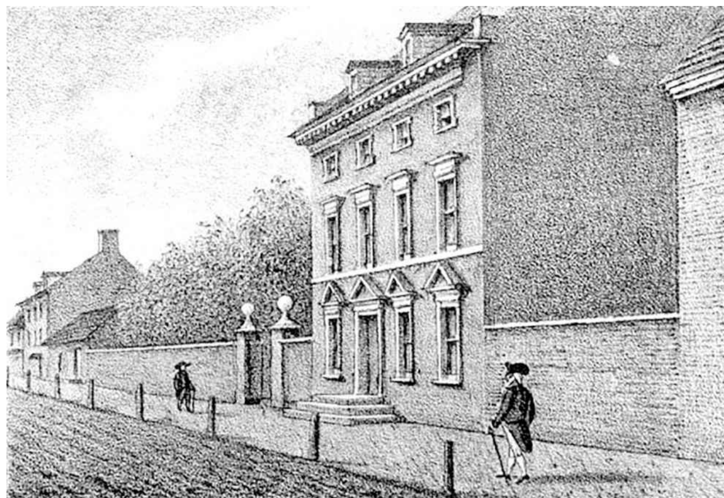
对外公开。杰斐逊认为最好不要正式宣布中立，这样参战的两个强国“都认为我们有价值，而竞相争取我们的支持。我们就可以提出自己的条件，理所当然地和他们讨价还价，获得中立国家最广泛的特权”。杰斐逊的政策没有被完全采纳，还受到了别人的批评。中立的声明最终发出去了，杰斐逊很不高兴。起草声明的重任由国会承担，却让性格温和的司法部长埃德蒙·伦道夫起草。杰斐逊感到十分懊恼。内阁投票中，亨利·诺克斯总是给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投票。埃德蒙·伦道夫经常很不情愿地把票投给杰斐逊，激怒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埃德蒙·伦道夫像一个游击队员，某种程度上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比较忠诚，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并没有因此而感谢他。杰斐逊说：“在原则性问题上，埃德蒙·伦道夫总是尽量与我的观点保持一致，但最后却倒向别人的观点。”埃德蒙·伦道夫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首鼠两端，两面讨好。受他轻视的法兰西人和共和党人都视他为朋友，而他所倚重的联邦党人却把他当作敌人。”实际上，埃德蒙·伦道夫是一个头脑清晰、心平气静的人，精通国际法，一直担任总检察长。杰斐逊很不满意地给詹姆斯·麦迪逊写信，说：“你一定能从优柔寡断的语言判断出《中立宣言》出自何人之手。显而易见，起草宣言之人生怕别人看出自己的想法，尽量避免灾祸。这种低劣的恐惧恰恰在引祸上身。如果政府没有尊重民意，那么我们的选民也许会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埃德蒙·查尔斯·热内在查尔斯顿派出了武装民船，雇用了军官，在美国海域肆意攻击并抢掠英国船只。他来美国时所乘的船上装满了战利品。后来他得以面见乔治·华盛顿总统。虽然埃德蒙·查尔斯·热内做了这些出格的事情，但在缓慢北去的路上，民众欢欣鼓舞，表达了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无限热情。费城的市民们设宴接待他，在宴会上唱《马赛曲》，到处传递红色的自由帽，互相称对方为“公民”。杰斐逊很明智，从不参加这些活动，只在一旁观察，不反对也不支持。杰斐逊十分厌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支持英国的联邦党。除了“君主主义者”和“独裁主义者”之外，杰斐逊又用“亲英分子”和“盎格鲁人”来指责联邦党人。杰斐逊高兴地对詹姆斯·门罗说：“法兰西伏兵占领英国的画眉山庄，美国民众在特拉华州呼唤着向法兰西致敬，却遭到抓捕，这是对国际法的公然挑衅。希望我们能够将民众的情绪控制在中立的范围之内。如果我们拒绝英国人的任何要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将惊慌失措，立即采取惯用的

卑鄙做法。我们在议会中哪怕是偷偷进行中立，对方都会寸步不让，和我们拼个你死我活。联邦党和共和党投票的结果一般不相上下。”杰斐逊满足地说，英国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破产现象，“最新消息表明，他们的破产总额已达到了一千一百万英镑，而且还在上升。”杰斐逊一直厌恶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人。1792年12月5日，杰斐逊洋洋得意地写道：“我们刚刚接到令人振奋的消息，普鲁士军队被迫撤退，等待他们的将是灾难。听到这一消息，独裁主义者们会面有难色，我们伟大的民众将感到由衷的喜悦。”1793年6月28日，杰斐逊很自信地进行预测，说：“英国的破产将会继续，直到金融彻底崩溃。”杰斐逊说，英国“也在发行国库券……法兰西共和国的纸券是以土地为基础的，而英国的纸券却依赖针、线、纽扣、啤酒花以及以国库估价两倍的价格典当的物品。五百万件这样的物品在伦敦市场上被迫出售，没有现金，也不会有存储利息。”



早期的查尔斯顿



埃德蒙·查尔斯·热内前往费城总统府

法兰西共和国的任何举动都不会让杰斐逊震惊，也不会削弱他的信仰。1792年12月19日，杰斐逊写道，共和党正在“自称雅各宾派，两个月前，这个称号对他们来说还是一种耻辱。”几天后，杰斐逊就恶名昭彰的法兰西大屠杀发表看法，尽管“有罪的人未经审判就被杀了，还殃及一些无辜之人”，但“斗争”是“必要的”。杰斐逊说：“我听到此事深感遗憾。有些人的死亡将使我在有生之年难以忘怀。若他们在战斗中阵亡，我将以应有的方式致以哀悼。依靠民众的力量虽然有点盲目，但不像子弹和炸弹那样不长眼睛。那些革命烈士为了革命事业而献身，我心中悲痛欲绝。革命不会失败，我也不会看到地球上的一半地方会荒无人烟。每个国家若只剩下自由自在的亚当和夏娃，就不可能过上比现在更好的生活。”

无奈之余，杰斐逊给法兰西公使写信，指出法兰西共和国非法占领了画眉山庄，必须归还。此外，杰斐逊还要制止狂热分子埃德蒙·查尔斯·热内的其他活动。这些事做起来令人乏味，但杰斐逊还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当有人无法无天地侮辱一个中立国家时，杰斐逊却不能正面表示愤慨。杰斐逊不得不给埃德蒙·查尔斯·热内写信，信中提到了购置装备武装民船，以及派遣武装民船攻击英国船只所引起的后果。杰斐逊一直使用毫无感情色彩的语言给埃德蒙·查尔斯·热内写信，好像在写国际法方面的论文。

埃德蒙·查尔斯·热内回信表达了对杰斐逊的信任。杰斐逊又写信给詹姆斯·麦迪逊："埃德蒙·查尔斯·热内充满革命热情。他的使命任重道远……他并无所求。"弗吉尼亚邮政系统行动缓慢，这封信还没有送到詹姆斯·麦迪逊手中，杰斐逊的说法就变了。因为埃德蒙·查尔斯·热内的实际行动表明，他并非来做什么贡献，而是真有所图。埃德蒙·查尔斯·热内真正的使命是利用美国的一切资源援助法兰西共和国。美国已中立，但埃德蒙·查尔斯·热内要将美国的港口变成反对英国的海军基地。他在美国港口非法武装民船，在美国公民中雇佣大量海军、陆军，让他们参与战争。埃德蒙·查尔斯·热内大胆妄为，在美国设立海事法庭，授予法兰西共和国的领事权力，通过审判确立武装民船俘获战利品的合法性。杰斐逊不得不告诫埃德蒙·查尔斯·热内，美国无法容忍他的所作所为。杰斐逊由衷地厌恶埃德蒙·查尔斯·热内的做法，但写信时仍然心平气和，用铿锵有力的语气将事情说得清清楚楚。杰斐逊不时地抓住机会，在内阁中提出与法兰西共和国有关的其他议题。例如，法兰西政府提出了一项紧迫的要求，美国得向法兰西偿还独立战争后期欠下的债务。还债的时机已经成熟，法兰西共和国急需援助。1792年10月，杰斐逊给时任法兰西公使的古弗尼尔·莫里斯写信，说债务偿还必须暂时中止，"因为没有人有权接收这笔债务，也没有人会毫无争议地宣布我们已偿清债务。"1793年6月6日，杰斐逊向乔治·华盛顿建议道："我个人认为，只要不冒战争风险，不发生双重支付，与法兰西共和国保持友好非常重要。若无风险，我们应该提前偿还今年到期的分期付款债务。"



埃德蒙·查尔斯·热内雇用的武装民船袭击英国船

一段时期内，杰斐逊很乐观，高兴地说自己的喜怒哀乐“就是绝大多数公民的爱恨情愁”。“圣公会的前途并不明朗”，除了为君主政体寻求“垫脚石”的“小党派”外，整个国家充斥着共和党人，纷纷拥护宪法。共和党人胜利在望，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位永不服输的财政部长坚忍不拔的性格让杰斐逊烦恼不已。1793年5月13日，杰斐逊尖刻地抱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越权行事。因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议海关官员观察法兰西船违反中立的行为，并秘密向他报告。为了免得别人说美国“仅对英国中立”，杰斐逊不得不摆出事实，说：“乔治·华盛顿总统并不希望与法兰西敌对，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选民热情支持法兰西。”

到美国后，埃德蒙·查尔斯·热内从来没有安分过，每天都在做一些不法勾当。杰斐逊刚开始还对他热情友好，但很快对他的行为感到忧虑。埃德蒙·查尔斯·热内不但不知收敛，而且变本加厉，这使杰斐逊愤怒不堪。杰斐逊起初非常冷静地给埃德蒙·查尔斯·热内写信，后来则十分愤怒地谴责他。杰斐逊发现埃德蒙·查尔斯·热内的目的是让美国正式卷入战争。杰斐逊政治敏锐性很高，一眼就看出埃德蒙·查尔斯·热内蔑视美国法律，无视美国的存在，肆意胡作非为。圣公会必然很快做出反应。杰斐逊绝不能默默地看着自己的祖国卷入战争。杰斐逊给门罗写信说，埃德蒙·查尔斯·热内的“行为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这位盲目自大、自以为是的法兰西人后来直接侮辱乔治·华盛顿，还略带威胁地说，自己是外国人，出于外交礼节，要向美国总统和民众发出呼吁，他只会尊重总统的政治观点，议员们少说废话。杰斐逊对埃德蒙·查尔斯·热内无可救药的蠢行忍无可忍，甚至有点粗暴地指责盲目追捧埃德蒙·查尔斯·热内的狂热分子，认为他们蠢到了极点，阻碍了共和党快速走向胜利。杰斐逊认为，必须让法兰西共和国召回埃德蒙·查尔斯·热内，同时渴望埃德蒙·查尔斯·热内早点离开美国，就算免他的职，也不算侮辱。杰斐逊写信给古弗尼尔·莫里斯，让他在巴黎重新审视埃德蒙·查尔斯·热内自从到达查尔斯顿后的所作所为，所用的语言要尽量使那些“盎格鲁人”满意。杰斐逊指出：“如果我们的公民还没有自相残杀，那也不是因为埃德蒙·查尔斯·热内先生的自我节制。”埃德蒙·查尔斯·热内后来严厉指责杰斐逊，说杰斐逊曾私下里煽动和鼓励他，后来又公开抛弃了他。也许杰斐逊反对埃德蒙·查尔斯·热内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道义，而是由于自己处理问题时缺乏

智慧，才使这位公使做了出格的事。杰斐逊的愤怒仅限于埃德蒙·查尔斯·热内，丝毫没有影响他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感情。1793年9月1日，杰斐逊写信给詹姆斯·麦迪逊，谈到了“友好的国家”和“敌对的国家”，“分别指法兰西共和国和英国”。和以前相比，杰斐逊显得更不中立了。

埃德蒙·查尔斯·热内来美国的这段时间内，希望、愤怒和失望在杰斐逊心中反复交织。作为一个政治家，杰斐逊的所作所为无可挑剔，值得称颂。面对英法战争，杰斐逊尽力支持法兰西共和国，但始终不越雷池半步，担心美国卷入战争。内阁会议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支持英国，杰斐逊同情法兰西共和国。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美国订下了“中立原则”，为文明国家提供了先例。这些原则在杰斐逊的公文中都可以找到出处，让研究杰斐逊性格的人们对他卓越的政治智慧兴趣盎然。杰斐逊第一次参与法兰西大革命时，他的政治智慧体现得淋漓尽致。杰斐逊高瞻远瞩，能准确把握政治动向。当抛头露面有损声望时，他能审时度势，暂时作壁上观。待时机成熟后，他又重新领导政治工作。人们或许会争论杰斐逊的功过是非，但谁也不怀疑他非凡的政治敏锐性。杰斐逊看到共和党内一些有头有脸的人为埃德蒙·查尔斯·热内无法无天的蠢行辩护，打着自由的幌子，喊着革命的口号，狂热地组织民主团体，四处结交朋友。杰斐逊了解这些人的本性，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这些狂热分子目光短浅，似乎要成为共和党的领袖。杰斐逊相信民众不会站到他们一边，更不会追随他们。这些狂热分子盲目激进，步调与民众脱节，最终难免失败。杰斐逊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并没有阻止这些轻率的行为。因为他知道，若是加以阻止，也终将徒劳一场。杰斐逊不想看到内讧，不想因判断失误而使自己威信扫地。杰斐逊很遗憾地看到党内的灾难马上就要来临。他相信，眼前的逆境马上会变得柳暗花明。面对灾难，杰斐逊提高警惕而避之。灾难过后，大多数人才想起杰斐逊的智慧和远见，更加毫无保留地信任他。那些鲁莽的狂热分子不得不对杰斐逊佩服得五体投地，感激杰斐逊让他们免受公众的指责。杰斐逊始终不偏不倚地追求自己的事业，巧妙地避开党内争执和忌妒，力求少犯错，不树敌。杰斐逊准确鉴别民众运动的性质，表现出非凡的能力，在同时代的政治家中显得与众不同。

尽管有很多人和杰斐逊一道支持法兰西，但杰斐逊却诚惶诚恐，在

内阁任职时感到不甚爽快。实际上，遇到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样强硬而不知疲倦的“斗士”，杰斐逊这种性格的人根本不会有自在可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满足于一时的胜利，渴望持续不断的斗争，让杰斐逊疲惫不堪。杰斐逊希望能避开这种生活。不少人想任国务卿而求之不得，杰斐逊却巴不得逃离这牢笼般的工作。早在1792年3月18日，杰斐逊就写信给威廉·肖特 [4] 表达了这一意愿。杰斐逊说，乔治·华盛顿总统第一任期届满时自己就退休。1792年9月9日，杰斐逊写信给乔治·华盛顿表示反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封信非常有名，信中说：“我盼望着退休的那一天，就如一名饱经风霜的水手终于看到了陆地，不停地计算着何时何地能够靠岸。”说这种话的人不少，可真想退休的恐怕只有杰斐逊一人。乔治·华盛顿坚决不同意杰斐逊退休，杰斐逊只好无奈地继续留在任上。当时，杰斐逊觉得任职的时间越短越好。1793年7月31日，杰斐逊写信给乔治·华盛顿，说：“本季度末似乎是我退休的最佳时间。”乔治·华盛顿强求杰斐逊继续留任，让他务必坚持到年底。后来，杰斐逊如愿以偿地回到蒙蒂塞洛，就像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犯人一样轻松快乐。



威廉·肖特

杰斐逊根本无法逃避别人的指责。以前有人指责他占着职位不让，现在又来指责他“临阵逃脱”。正是这些人一直指责杰斐逊是反政府头子，顽固地把持着政府部门，明目张胆地阻挠政府的政策。杰斐逊退休时，他们却说杰斐逊应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方便退休时再退休。他们公开宣称，乔治·华盛顿重新组建内阁将会显得非常尴尬，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财政部的工作尚未完成，杰斐逊应等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完成全部工作后，这对冤家再找个合适的时间一起滚蛋。这些指责完全不公正。乔治·华盛顿很了解内阁的状况，给杰斐逊施加了任何可以施加的压力，讲明了国务卿肩负的重任，希望能够挽留杰斐逊。乔治·华盛顿认为，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斗争中势均力敌，用责任约束不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却能够约束杰斐逊。无论乔治·华盛顿多么尽力，都未能改变杰斐逊回家的决心。杰斐逊绝不可能拒绝退休。如果让他为了无限的任期而讨好政治上的劲敌，简直是荒唐可笑之事。他根本不知道亚历山大·

汉密尔顿想不想辞职。杰斐逊不相信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继续留任也极为不满。如果他辞职后也能迫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辞职，那就最好不过了。别人对杰斐逊的两种指控自相矛盾，表明杰斐逊的所作所为并无不适之处。

注解：

[1] 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共和国成立。——译者注

[2] 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美国民主共和党创建者之一，首任佛罗里达州州长，第七任美国总统，美国“杰克逊式民主”因他而得名。——译者注

[3] 埃德蒙·查尔斯·热内（1763—1834），法兰西大革命期间担任法兰西驻美国大使，曾试图将美国拉入战争，从而使法美关系变得紧张。——译者注

[4] 威廉·肖特（1759—1849），美国早期外交官。杰斐逊任法兰西公使时曾担任杰斐逊的私人秘书，杰斐逊是他的导师和朋友。——译者注

第11章
国内外政治形势与《杰伊条约》



精彩看点

在家耕作——国外政治形势——关于贸易的报告——民主社会团体——总统的行为令人忧虑——威士忌酒税暴动——《杰伊条约》——反对共和党的巨人——乔治·华盛顿的继任者——共和党的前景

杰斐逊在家耕作，无比逍遥自在。他说："现在我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自己对生活的追求。年轻时根本不知务农如此悠闲。现在看来，它比学习更有乐趣。"杰斐逊将别人的来信推了又推，迟迟不回，只有下雨天才待在室内写信，与农夫没什么两样。他一个月看不完一份报纸，发现自己"无比幸福"。他说自己"只想着一个政治话题，就是向同胞们宣布，第一届和第二届国会的议员们唯财政部马首是瞻，都是些无耻的腐败分子。"

没有报纸可读的情况下，这位"农夫"也要想尽办法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不断了解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杰斐逊遗憾地看到"同胞们在英国的欺辱下痛苦呻吟。……希望法军的胜利能点燃欧洲民众心中的怒火，希望他们起来反抗那些将他们带入邪恶的混蛋，将国王、贵族、牧师们统统送上断头台。断头台好久未受过人类鲜血的洗礼了。我一想起这些罪

恶之人就心潮澎湃，不过我很少想这些。我更愿意默默地观察自己亲手种的紫花苜蓿和土豆安静地生长”。杰斐逊说，“我们应追求和平，以和平为荣”，与英国和解。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杰斐逊总是“提议与英国断绝联系，因为英国残暴之极”。得知参议院未通过《禁止进口法案》，杰斐逊生气地写道，参议院“唯议员们的意志是从，有意搁置该法案。不知议员们是否想过，他们不仅在表达自己的意愿，还代表着广大民众的意愿。议员们无疑是在引火烧身。”

杰斐逊所写的一份有关贸易的报告引起了国会议员们激烈的争论。詹姆斯·麦迪逊和威廉·贾尔斯支持这份报告，共同反对为追求商业利益而抱成一团的联邦主义者，鼓励与法兰西共和国进行贸易，提议削减与英国的贸易总量。杰斐逊指出，国家贸易不能受感情的影响。他坚定地认为，与法兰西共和国的贸易对美国更有利。杰斐逊的观点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商人们谁都不愿意去冒险，谁都不愿意放弃已有的贸易渠道而另外寻求新的贸易伙伴。就该报告中提出的贸易方案，共和党人和联邦党人长期争论不休。

美国民众模仿法兰西雅各宾派，建立了自己的民主社会团体，不久就遭到联邦党人的非议。杰斐逊很苦恼地指出，这是“独裁主义者身上所特有的一种过激行为”。面对联邦党人的非议，乔治·华盛顿迫于压力，不情愿地做了让步，提到这些民主社会团体时颇有微词，很不高兴。杰斐逊认为：“乔治·华盛顿总统自己成为攻击言论自由，攻击写作、印刷、出版自由的代言人。”杰斐逊为乔治·华盛顿总统的所作所为深感忧虑，又有点猜疑他。杰斐逊觉得总统正在失去公正，从国家首脑变成了政党首脑。杰斐逊也十分担忧乔治·华盛顿总统的前途。杰斐逊更担心的是乔治·华盛顿原本诚实正直，一旦在政治上犯错，民众将会高呼“他有失德之处，联邦党和共和党毁坏了他的国家！”

宾夕法尼亚州发生了“威士忌酒税暴动”。杰斐逊对此表示无限同情。1794年12月28日，杰斐逊在写给詹姆斯·麦迪逊的信中表明，这些事情“只不过是暴动而已”。从前，某次国会会议上的确讨论过州与联邦的分离问题，但讨论一个问题并不意味着就该问题做出决议，更不一定依此采取行动。杰斐逊继续写道：“我倒要看看法庭上律师们、威严的法官和未来的公使们如何理解这件事情。向威士忌酒征税的法律明显要将

人们逼上绝路。承认该法律的合宪性已经错了，依据该法律去征税更是错上加错，若该法律的实施导致了联邦分裂，将是大错特错。如果联邦分裂了，我们就会感到漂浮不定，不知道跟着谁走好。”



威士忌酒税暴动



乔治·华盛顿总统率军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平息“威士忌酒税暴动”

杰斐逊坚决反对《杰伊条约》[1]。该条约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曾严重威胁到乔治·华盛顿的执政。民众对《杰伊条约》十分不满，杰斐逊更与之水火不容。刚看到该条约，杰斐逊就不假思索地“决定反对它”。人们对《杰伊条约》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化名“库尔提斯”和“卡美卢斯”加入论战。杰斐逊感到十分不安。看到共和党内部反对该条约的人“表现平平”，杰斐逊恳求詹姆斯·麦迪逊亲自出马。杰斐逊劝詹姆斯·麦迪逊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真是一位反对共和党人的巨人。无须任何帮手，他自己就是一支精锐之师。联邦党人已走上了隘路，必定筋疲力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才华出众，不屈不挠，他们可能安全脱离险境……说实话，他若还要一意孤行，能对付他的人非

你莫属了……看在上帝的面上，请拿起你的笔，给他以猛烈的回击。”杰斐逊不愿意亲自参与斗争，似乎根本没有亲自拿起笔来参与论战的意愿。

时任国务卿的埃德蒙·伦道夫背信弃义，去支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乔治·华盛顿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影响下最终批准了《杰伊条约》。杰斐逊称“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众议院反对《杰伊条约》的议员们掌握了与该条约有关的外交文件，拒绝参与保证条约实施的任何立法活动。《杰伊条约》最终未能实施。激烈的斗争中危险重重。共和党人积极进取，杰斐逊本人也全力以赴。当时，政治形势一片大好，政党领导人们谁都不关心杰斐逊在内阁磋商中就《杰伊条约》的原则性问题提出的意见，杰斐逊陷入矛盾之中。联邦党人在《杰伊条约》的斗争中最终取得胜利，共和党人落败。杰斐逊也不怎么悲观，说：“这次胜利是他们应得的，是用金钱买来的胜利，会给联邦党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除了乔治·华盛顿总统在民众中的功绩之外，联邦党人没什么可以依靠。乔治·华盛顿退休时，如果他的继任者是位独裁主义者，选民们的共和意识将会压倒这位继任者。如果是一名共和党人，继任后的新总统自然会运用自己的共和意识，以莫大的耐心引导政府与民众和谐相处。

人们一致认为乔治·华盛顿的继任者将是一位坚定的共和党人。共和党的前景变得一片光明。事实上，就整个国家民众的情绪状态而言，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同情和对英国的厌恶都源于对《杰伊条约》的憎恨。共和党的胜利不会像民众政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那样一帆风顺。一直以来，联邦党推行自己的政策时不受民众欢迎，并树敌不少。联邦党人正在失去自己的阵地，但他们绝不会迅速退却而让共和党控制下一届选举。杰斐逊尚需“耐心”等待。

注解：

[1] 《杰伊条约》是1794年美英双方签署的通商与航海条约。因美方代表美国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而得名。——译者注

第12章
担任副总统与竞选总统



精彩看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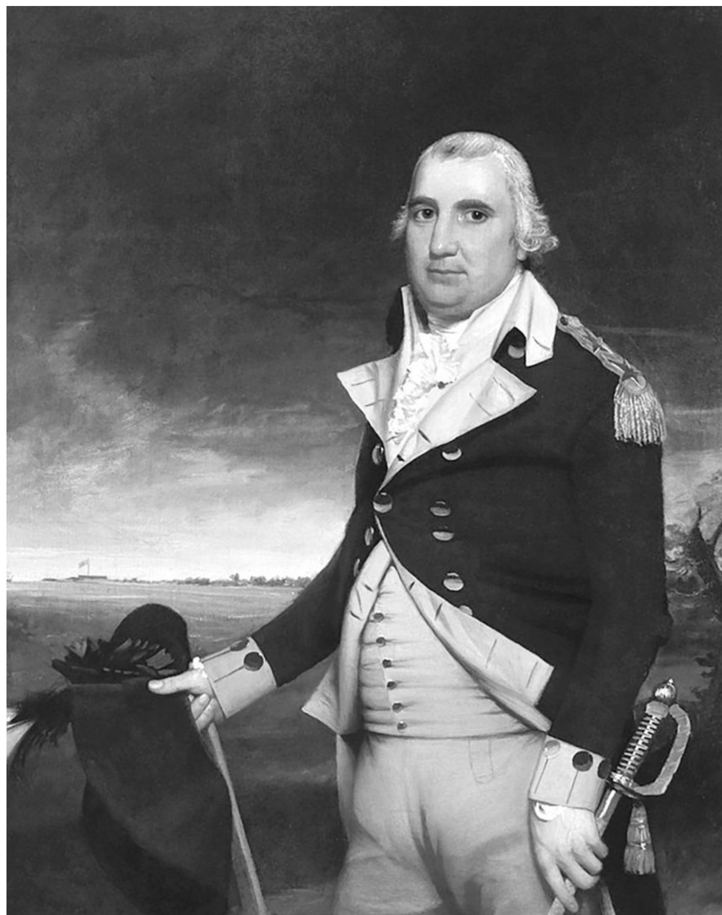
选举总统和副总统——联邦党内的阴谋——不愿担任职务——特别的任职方式——与约翰·亚当斯交好——总统和副总统的分歧——来自法兰西的抱怨——写给马泽伊的信——“XYZ”事件——反对备战——抗议违反宪法的行为——州与联邦分离——联邦党人的诽谤——竞选总统——联邦党人的阻挠——宪法的缺陷

美国第三届总统选举时，选举人仍有较大的自主性。选举人给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同时投票，得票最多的人任总统，得票仅次于总统的任副总统。杰斐逊有希望当选总统，约翰·亚当斯也有可能与总统失之交臂。联邦党人本有足够的能力控制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但他们的选举委员会缺乏配合，低估了风险，也没能妥善防范。联邦党人普遍认为约翰·亚当斯理应成为总统候选人，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 [1] 应该排第二。联邦党内部人才济济，可任领导的人众多，很容易选出至少十几个总统候选人。众多候选人当中，并不是所有人都与约翰·亚当斯一个鼻孔出气。约翰·亚当斯也不是理所当然的第一候选人。相反，不少人质疑约翰·亚当斯的主张，是他的对手。约翰·亚当斯的追随者们怀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南方的共和党人会暗中操作，联邦党内本来要投给约翰·亚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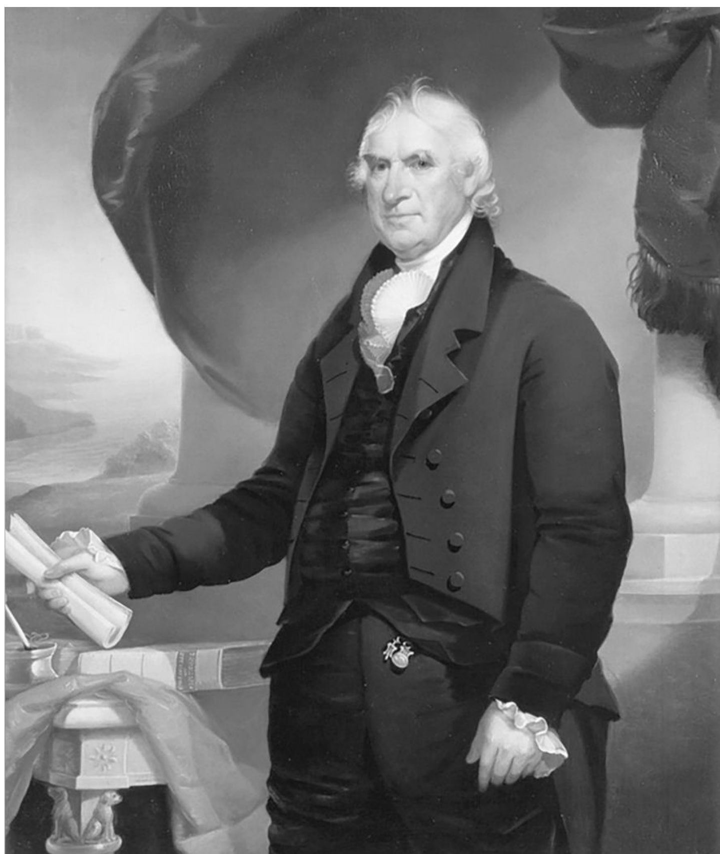
斯的选票可能会不幸地投到别处。有些人虽在约翰·亚当斯所在的部门供职，而不属于他所在的派系，可能会给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投票。约翰·亚当斯有当选副总统的可能性。共和党内部情况没这么复杂。杰斐逊毫无疑问是共和党人的领袖。詹姆斯·麦迪逊处理政治问题的智慧远远不如杰斐逊。乔治·克林顿、阿伦·伯尔、詹姆斯·门罗和艾伯特·加勒廷都是二流总统候选人。联邦党人互不信任，但共和党人内部意见统一，全党上下团结一致，力争在选举中获得成功。为了确保约翰·亚当斯在选举中免受共和党人以及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同党阴谋的影响，约翰·亚当斯的追随者们放弃了第二次投票。选举结果表明，杰斐逊领先于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再有四票就可击败约翰·亚当斯 [2] 。

由于管理不善，部分联邦党人在选举中不怀好意。结果联邦党人失去了副总统的位置，并严重影响到总统的位置。杰斐逊不允许在他领导的政党内出现这种拙劣的行为。

1796年12月17日，杰斐逊写信给詹姆斯·麦迪逊，说："我由衷地希望你能担任总统候选人。你若拒绝，我希望别人能够担此重任，而不是我自己。我的得票数处于较领先的位置，我焦虑不已。"十天以后，杰斐逊给爱德华·拉特里奇写信，说："没想到，在我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大家又将我作为候选人，我不希望如此。我在上帝面前声明，我发自内心地为逃脱政务而感到高兴。我没有统治别人的野心。没有什么事比我在暴风雨中快乐地策马驰骋更有激情……我所依恋的是我的家……"1797年1月1日，杰斐逊告诉詹姆斯·麦迪逊："我根本不想担任总统。副总统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职位，我还没有考虑过是否愿意担任此职。"杰斐逊总是在反复表达自己不情愿再次出山的想法。这也可以理解，大多数人在类似的情况下也会如此。杰斐逊认为，在家里安静地生活比贪求别的什么都好。后来，在首都任职的十二年中，杰斐逊连续担任副总统、总统，再未说过要拒绝担任职务。



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



乔治·克林顿

共和党人与联邦党人的斗争中，杰斐逊高超的政治手段和良好的心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他从未忽视过做好表面文章。通过做表面文章，杰斐逊赢得了见识肤浅的旁观者们的信任。杰斐逊煞费苦心地做出安排，决定不派特别信使通知他当选。邮政是最好的联系方式，简单、廉价，常为共和党人所青睐。杰斐逊说：“我不希望举行任何就职仪式，我要毫不张扬地去任职。如果托马斯·米夫林 [3] 州长有安排就职仪式的想法，请设法阻止他。”一切如杰斐逊所愿，他悄无声息地去任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恰恰相反，约翰·亚当斯却希望自己的任职能引起广大民众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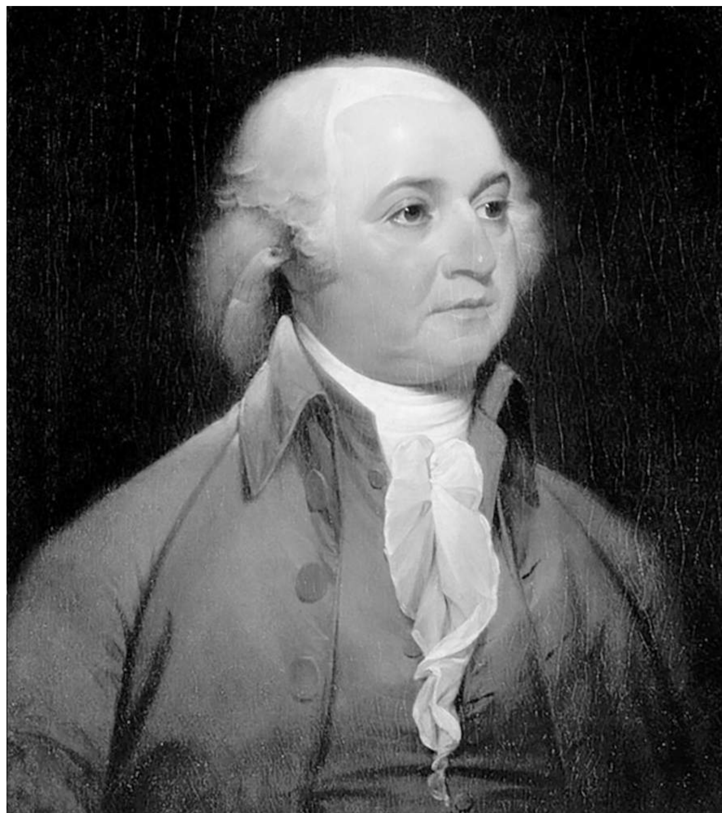
杰斐逊乐观而愉快地出任了副总统，清楚地看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再也无法控制一个统一的政党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联邦党人中最可怕的人。杰斐逊再也不为乔治·华盛顿的离职而感到遗憾。长期以来，杰

斐逊一直认为乔治·华盛顿是个联邦主义者、温和派，热爱国家、为人诚实，但他的影响太大，比任何党派都要危险得多。1797年6月17日，在致阿伦·伯尔的信中，杰斐逊承认自己“一直希望乔治·华盛顿在民众心中的影响力有所减退。这样一来，民众渴望自由的情感便会油然而生，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将取得平衡。此二部门已在乔治·华盛顿强大的影响力之下失去了平衡”。杰斐逊认为，自己应该主动与约翰·亚当斯先生搞好关系。以杰斐逊的精明，完全可以影响这位率直、冲动而任性的总统。杰斐逊将仇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作为约翰·亚当斯和自己联盟的纽带。这也是他们友谊的基础。杰斐逊想巧妙地利用约翰·亚当斯的嫉妒和多疑的天性，来控制这位性情急躁的新英格兰人。1796年12月28日，杰斐逊写信给约翰·亚当斯，说：“你纽约的老朋友可能用狡猾的伎俩欺骗了你，让他作你的接班人。他能够让你真正的朋友变成他手中的工具，使你们的希望完全破灭。”从那时起，直到和约翰·亚当斯见面，杰斐逊都有意识地向约翰·亚当斯表达自己的诚意，温文尔雅地向他说些好听的话。杰斐逊就像将诱饵抛向一只精明的鸟，能否捕到还尚未可知，只是希望能把它引诱过来。杰斐逊上任两天后，一切似乎应验了他的预感。1797年3月2日，杰斐逊来到费城。他说：“我立即拜访了约翰·亚当斯先生……第二天早上，约翰·亚当斯又来拜访我……他发现我一个人在房间里，便关上了门。他说很高兴见到我独自一人，希望和我自由交谈。”在愉快的“自由交谈”中，约翰·亚当斯总统表示，自己不希望美国马上与法兰西共和国国决裂，准备立刻派遣“代表团到法兰西督政府”，“第一个愿望”就是任命杰斐逊为特使。两人都认为这样不合适，于是约翰·亚当斯建议共和党人埃尔布里奇·格里、詹姆斯·麦迪逊和联邦党人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一起担任政府特使。约翰·亚当斯总统和副总统杰斐逊之间的融洽关系保持的并不长。三天后，约翰·亚当斯和杰斐逊一同去乔治·华盛顿将军家参加晚宴。回家的路上，杰斐逊非要对约翰·亚当斯说詹姆斯·麦迪逊拒绝去法兰西共和国是正确的选择。约翰·亚当斯立即答复，有人反对詹姆斯·麦迪逊等人的任命，他还没有考虑过这些意见。约翰·亚当斯继续尴尬地找借口。他们各自走上回家的路……也从此分道扬镳。从那以后，约翰·亚当斯只字不提当晚和杰斐逊讨论过的事，制定政府的任何措施时也不征求杰斐逊的意见。约翰·亚当斯总统和副总统杰斐逊之间的以礼相待很快消失了。他们的关系陷入了困境。杰斐逊对外交程序中的关键环节把握得并不准确。事实上，约翰·亚当斯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争

斗。约翰·亚当斯执政期间，美国的党派之间以及不同派别个人之间的仇恨比任何时候都要深。后来，联邦党和共和党在外交上进行了一次真正的较量。共和党人认为不宜与法兰西共和国冲突，如果与法兰西共和国不和就有点像内讧。法兰西督政府为拿破仑·波拿巴的胜利疯狂不已，正在寻找反人类战争的根源。甚至有人传言，法兰西共和国对美国产生敌意的诱因就是没有选杰斐逊任总统。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在美国是否应该被迫宣战，而是法兰西共和国是否会发动战争。美国不得不承认与英国签订的《杰伊条约》违反了与法兰西共和国的约定。法兰西共和国以《杰伊条约》作为美国与英国交好的证据。当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接替詹姆斯·门罗担任法兰西公使时，法兰西共和国傲慢地拒绝了，并一反常态地颁布法令反对与美国进行贸易，肆意劫掠美国的航运，令人难以容忍。法兰西督政府用恭维的话让詹姆斯·门罗离开了法兰西共和国。这是对詹姆斯·门罗本人的轻薄，是对召回詹姆斯·门罗的美国政府的侮辱。法兰西督政府还宣称，美国若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抱怨不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他们不会接受任何公使。究竟法兰西共和国因何事而抱怨美国尚未可知。令人恼火的消息接连不断，惹得约翰·亚当斯总统怒不可遏。本来温和的美国民众也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做法感到十分厌恶。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政党力量进一步增强了。1797年5月，美国国会额外召开了一次会议，约翰·亚当斯总统建议组建一支海军，在港口设防，为防御战争做好准备。副总统杰斐逊麾下的共和党人开始焦虑，甚至有点垂头丧气，因为事态的发展似乎对他们不利。杰斐逊指出：“选举后期所发生的变化对共和党人不利。”尽管“和平是普遍的愿望，但国会现在可能会从幕后走到台前，制订一些火药味颇浓的措施，并以威胁的姿态引起对方的敌意。”杰斐逊说：“战争并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贸易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手段，如果操控得当，能使欧洲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公正地对待我们。”杰斐逊认为，战争的呼声“是我们中间的亲英党派发出的，他们与英国人关系密切，感情深厚。”1797年6月17日，杰斐逊高兴地写道：“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兰西共和国取得了胜利，莱茵河上也传来捷报，奥地利实现了和平。英国的计划彻底破产，驻守在泰晤士河诺尔锚地的海军哗变 [4] ，英王乔治三世提出了和平措施进行劝诫。”美国的亲英派在惊恐之下变得格外顺从。



托马斯·米夫林与夫人



总统任上的约翰·亚当斯



担任法兰西督政府第一执政期间的拿破仑·波拿巴

约翰·亚当斯天生好斗。他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持和平。法兰西共和国仍愤怒地威胁美国。约翰·亚当斯任命埃尔布里奇·格里、约翰·马歇尔、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一起去巴黎担任特使。杰斐逊恳求埃尔布里奇·格里去法兰西共和国担任特使。杰斐逊写道："我国的首要目标是和平，同时也要考虑国家的利益和荣誉。权衡之下，和平比利益更重要，要不顾一切地追求和平。暂且将荣誉放在一边，它还不能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从1793年初到今天，交战双方对我们的侮辱和伤害至今还在继续，我们却不能为了摆脱这种侮辱和伤害与任何一方交战。"杰斐逊对君主制还是心有余悸。他说："我们现在有激情固然很好，可我们还不够强大。一旦卷入战争，我们的联邦就极有可能被战争拖垮。我们的希望全

在于你是否接受这一使命。”埃尔布里奇·格里迫于压力接受了这一使命。



代表们想出了应对诺尔河兵变的办法



菲利波·马泽伊

杰斐逊说，当时的态势不容乐观，政治上的对手们不再“区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不再“互相交流”。“那些一生都很亲密的人过马路时为了避免见面，把头转到另一面。”杰斐逊说：“上了岁数的人最爱宁静。”他觉得当时的一切都在折磨着自己。1797年夏天，杰斐逊写给菲利波·马泽伊 [5] 的那封著名的信被公之于众。杰斐逊更加不得安宁。这封信是杰斐逊在1796年4月24日写给弗吉尼亚的老朋友、邻居，意大利

人菲利波·马泽伊的。后来，菲利波·马泽伊去了欧洲。这封信“从英语翻译成意大利语，从意大利语翻译成法语，又从法语翻译成英语”。原信中重要的一段如下：

> 自从你离去，我们的政治形势又生变故。我们热爱崇高自由的共和政府，也在斗争中取得过胜利。现在圣公会君主贵族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他们已经具备了英国政府的形式，现在他们的目标是控制我们，将政府变成名副其实的英式政府。大多数民众依然信奉共和。共和党拥有大量的土地权益和优秀人才。我们反对行政部门、司法部门、立法部门中三分之二的机构，以及所有政府的官员和那些想成为官员的人。我们也反对所有喜欢专制下的平静而不喜欢太多自由的胆小鬼、英国商人、投机者和银行公共基金持有人。我们更瞧不起那些用于腐败的伎俩，以及让我们化为腐朽去融入英国模式的阴谋诡计。有些人叛党去信奉异端邪说。有些人像战场上的大力士参孙[6]一样英勇，和所罗门一样聪明，但他们始终不渝地倒向英国一面。如我说出他们的名字，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简而言之，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经历无数的危险，我们才能拥有自己的自由。我们一定要保护自由。我们人数众多并拥有大量有利条件，别人不会再威胁我们。共和党人和广大民众定能摆脱一切不利条件，最终赢得自由。

最终，这封信在美国出版。杰斐逊认为，信的“主要内容”仍和他写的一样，只有一个错误需要改正[7]。联邦党人立刻怒吼起来。他们说，杰斐逊表面上看起来是乔治·华盛顿的朋友，实际上卑鄙无耻，虚情假意，对朋友背信弃义、恶语中伤。杰斐逊很明智，不做任何解释，以免纠缠不清。许多年后，他才说，自己当时指责的不是乔治·华盛顿，而是辛辛那提州的其他人，乔治·华盛顿本人不可能对那封信产生误解。联邦党人中的历史学家们并不认可这些事后的解释，对这封信的态度并不比当时的联邦党人好多少。后来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乔治·华盛顿看到信后认为事情很严重，让杰斐逊做出解释。杰斐逊诚恳地道歉并做了解释。杰斐逊的道歉信和乔治·华盛顿的日记都找不到了。人们猜测，杰斐逊大概是在乔治·华盛顿私人秘书李尔的帮助下将信和日记拿走了，因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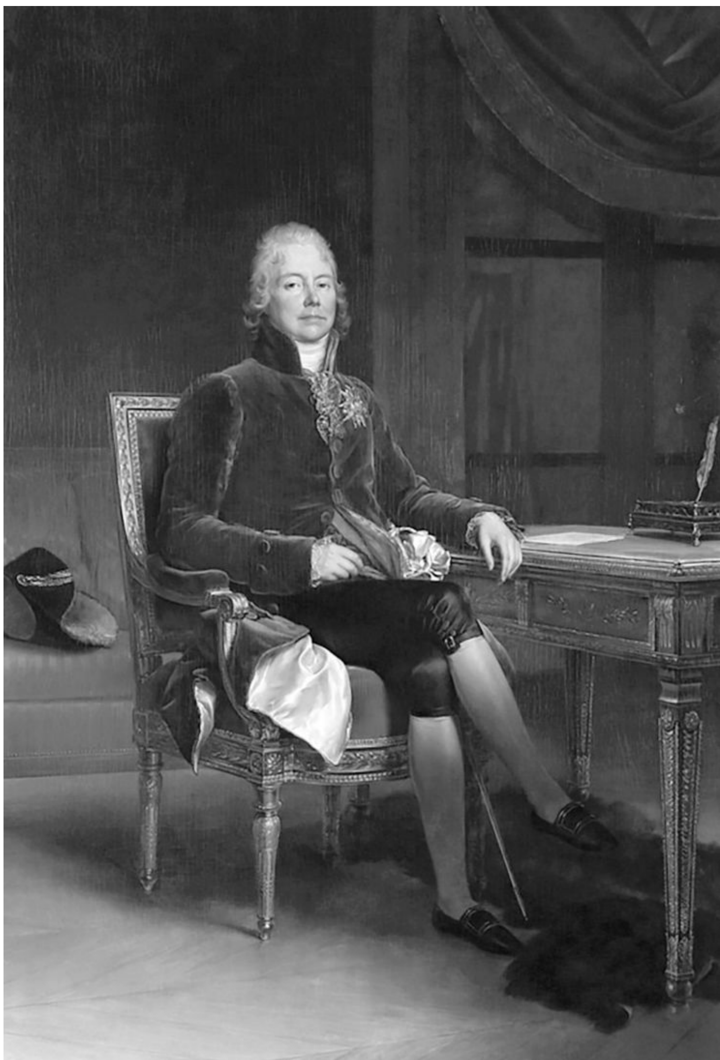
杰斐逊与李尔是好朋友。这也只是猜测罢了，没有什么真凭实据。杰斐逊极力否认这一切。像理查德·希尔德雷斯 [8] 这样的党派人士也承认“这个故事过于牵强附会”。当时的联邦主义者，以及后来的联邦主义作家们都坚定不移地认为杰斐逊让乔治·华盛顿丧失了信心。如果这成了事实，那么这封信就会使其他所有人都丧失信心。纯粹的联邦主义者认为，杰斐逊看似完美的政治智慧是对乔治·华盛顿总统的亵渎。杰斐逊并没有犯过这种错误。杰斐逊崇敬乔治·华盛顿的优秀品格，这一点毋庸置疑 [9] 。他对乔治·华盛顿以诚相待，没有半点虚伪。有时他会向朋友抱怨乔治·华盛顿总统影响力太大。杰斐逊可能低估了乔治·华盛顿的智慧，但与乔治·华盛顿关系亲密。坚定的联邦主义者蒂莫西·皮克林在遗留下的手稿中对乔治·华盛顿颇有微词，杰斐逊却没有留下类似的只言片语。一些声名狼藉的共和党作家用粗俗的话攻击乔治·华盛顿，根本不怀好意。有人马上严厉地谴责杰斐逊，说他应该出面消除这种负面影响。有人认为杰斐逊应该用自己的影响力去约束这些共和党作家，或者当面告诉他们不许如此，但杰斐逊无动于衷。一个政党的领导人不应对自己追随者的个人行为负责。人们认为，乔治·华盛顿的情况是独特的，杰斐逊应在党内定下不许冒犯乔治·华盛顿的规矩。杰斐逊能够制止这些作家的行为，但他对这种粗鄙的诽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不可原谅。相信子孙后代们会头脑冷静地做出清醒的判断。人们认为杰斐逊完全能够运用党内权威有效地限制这些行为。杰斐逊辩解称自己推崇言论自由，从来不会强迫性地控制这些追随者们。美国民众所不能原谅的是，在共和党新闻记者的恶语中伤下，乔治·华盛顿感到很悲伤，而杰斐逊却袖手旁观。杰斐逊默默忍受着这些恶毒而子虚乌有的攻击。借此机会，联邦党人便认为杰斐逊是恶意中伤乔治·华盛顿的罪魁祸首，并以此作为攻击他的有力武器，认为杰斐逊在政治争论中不太诚实。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约翰·马歇尔和埃尔布里奇·格里三位去巴黎的特使受到了不公待遇。法兰西共和国根本没有用外交礼节接待他们。法兰西督政府提出，约翰·亚当斯总统在国会演讲中攻击法兰西共和国，若美国不道歉，法兰西民众所受的委屈得不到满意的补偿，那么就拒不接待美国公使。三位公使愤愤不平，烦躁不安。完成使命如同雾里看花。三位公使正考虑很不体面地回到美国。这时，法兰西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塔列朗的几位私人密使意外地来找他们。这些密使以中间人的身份提出，如果美国向法兰西督政府提供一笔公共贷款，并向塔列朗支付数量可观的贿赂金，谈判就会顺利进

行。这些无耻的提议只是枉费口舌，自然没有什么结果。约翰·马歇尔和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愤然离去。密使们找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借口说服了埃尔布里奇·格里，让他独自在法兰西共和国待了一段时间。埃尔布里奇·格里的这种愚蠢行为充其量是礼节方面的问题，并没有什么不纯的动机。联邦党人却强烈地谴责他，说他并不是被人愚弄，而是心甘情愿地为法兰西督政府做事。

1798年3月，约翰·亚当斯总统义愤填膺地在国会向全国宣布了这次外交上的失败，在民众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联邦党人认为战争已不可避免，提议马上采取行动，加强陆军和海军的防御能力。共和党人人心惶惶，坚决反对战争。共和党人的作用就像车轮上的刹车片，只能让事态不要进一步扩大，却不能完全阻止它。共和党人很快就无法掌控事态的发展了。约翰·亚当斯总统要求公开特使们的信件，法兰西督政府的可耻行为被公之于众。因为当时法兰西共和国外交部派出的三位中间人的真实姓名用X、Y、Z代替了，所以整个事件被称为“XYZ”事件。真相大白后，全国怒潮狂涌。约翰·亚当斯总统也热血沸腾，失去了以往的理智。他公开宣布，如果法兰西共和国事先不承认美国的公使代表“伟大、自由、独立、强大的美国”，不能对公使们以礼相待，美国就绝不再向法兰西共和国派出一名公使。联邦党人促使国会一项接一项地通过有力的战争措施。两个党派各持己见，本就摇摆不定的民众完全倒向了联邦党。共和党人惊慌失措，几乎绝望。有人在一时的绝望和困惑中保持沉默，有人则像希腊塞莫皮莱的斯巴达人一样，在绝望中继续战斗。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认为战争即将来临。

面对当前的混乱和疯狂，共和党人意志消沉，杰斐逊却表现出罕见的冷静，不得不令人钦佩。杰斐逊刚得知“XYZ”事件时，也感到震惊和悲伤。他像往常一样，以莫大的勇气迅速振作起来。杰斐逊认为塔列朗就是个流氓，法兰西共和国和美国之间根本没有必要彼此疏远。杰斐逊有一种深刻而永恒的政治信念，任何不幸和失败都不能动摇它。他那些忠诚而没有头脑的同事所犯的错误，埃德蒙·查尔斯·热内所犯的错误，塔列朗和法兰西督政府卑鄙的行径，都没能动摇他对自由事业和为民众谋福祉的永恒信念。杰斐逊虽然有时也缺乏智慧，言行不一，但对自己的做事原则始终充满信心。杰斐逊一贯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不是一个伪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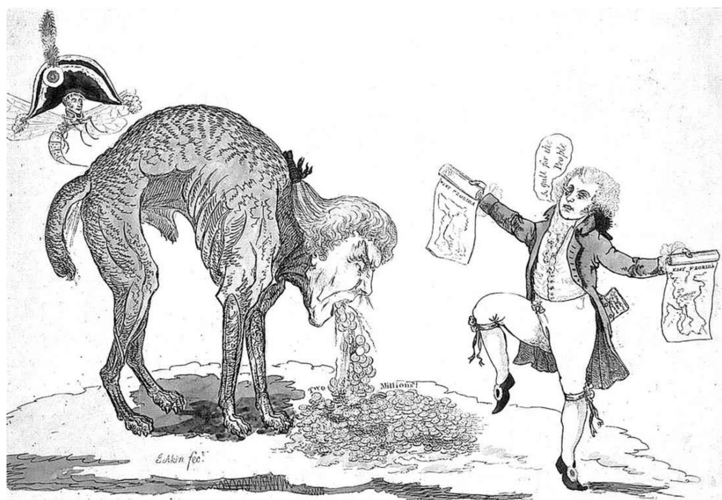
子、投机者和煽动家。他始终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杰斐逊很精明，总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具体问题具体对待，面对任何压力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原则，也从未失去过信心和勇气。信奉民主的人也会干蠢事、犯错误。杰斐逊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民主思想。在政治的茫茫大海中，杰斐逊并没有因为偶尔的不如意去改变自己的方向。前途渺茫的漫长岁月里，杰斐逊总能耐心等待。杰斐逊相信，自己的祖国经历了狂风巨浪之后，一定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无论怎样，杰斐逊都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高瞻远瞩、目标宏大，处理政治问题时手段高明，一个纯粹的政治家远不能及。当前途未卜，人们看不到希望时，杰斐逊说，一切都将过去，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问题，事态总体上向好的方向发展，一时的失意并不影响大局。杰斐逊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争取时间，敦促大家坚决反对一切备战措施。



塔列朗



1798年5月“XYZ”事件后英国对法美关系的讽刺：五名法兰西人非礼女性（美国），而六名代表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则旁观。约翰牛（英国）坐在“莎士比亚的悬崖”上大笑



漫画《草原狗》。寓意是与法兰西共和国打交道只会让美国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当时看来，杰斐逊反对备战的措施丝毫没有合理之处。后来，事实证明他的做法完全正确。当时的态势并没有像杰斐逊预料的那样发展，他显得很不高兴。杰斐逊认为，随着法兰西共和国在欧洲的胜利，美国民众会很快打消战争的念头，答应法兰西共和国的要求要比开战好得多。事实上，事情并非以这种耻辱的方式结束。法兰西共和国与众不同、令人吃惊的和解方式和约翰·亚当斯总统的非凡举措化解了当时剑拔弩张的事态。丑行被公之于众后，塔列朗惊慌失措。他非常聪明，默默自认倒霉，同时宣称整个“XYZ”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不久，塔列朗向美国驻海牙公使万斯·默里表示，法兰西共和国希望在友好的基础上重新与美国谈判。另外约翰·亚当斯总统也以莫大的勇气坚持己见，当机立断，亲自向法兰西共和国派遣了一个新的使团，成功地缔结了条约，避免了战争。约翰·亚当斯总统亲手赠予了美国一份厚礼。同时，内部本来不和的联邦党从此分裂成敌对的两派。他们各自心怀恶意，互相仇恨，常常内讧。

约翰·亚当斯执政期间，联邦党人时常犯错，愚蠢地争吵不休，还犯有名副其实的政治罪行。《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中有一段文字，字面意思自相矛盾，与宪法精神极不一致，法兰西共和国为此幸灾乐祸。杰

斐逊认为，联邦党人的这种做法是极端的挑衅行为。一向冷静睿智的杰斐逊一反常态，采用以毒攻毒、以牙还牙的办法，制定了邪恶的《肯塔基州决议案》，抗议违反宪法的法令，但这种强烈的抗议远远超出了宪法的限制。杰斐逊还起草了一份具有革命性质的法案。就算州议会比较激进不顾后果，通过该法案时也要做大量修改。这些修改过的法案为后来南方各州的分离主义提供了先例和权威依据，也对南卡罗来纳州议会拒绝执行联邦法律的行为以及1861年内战爆发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人认为，杰斐逊反抗联邦党人极端挑衅的方式是一种叛国行为。杰斐逊在辩解中称，拒绝联邦法令的运动和分离主义后来愈演愈烈，在自己执政时期并不明显。在杰斐逊的影响下，詹姆斯·麦迪逊也很快起草了《弗吉尼亚州决议案》，比杰斐逊的杰作逊色不了多少，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异议。人们对杰斐逊等人的这种做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给国家带来多大的损害，对他们本人也无严重影响。



美国驻海牙公使万斯·默里

联邦党人发现有些州与联邦分离的危险一触即发，杰斐逊才意识到自己做了蠢事。1798年6月，他写道：

> 如果联邦内一个政党临时占了优势，而另外一个政党就想办法分裂联邦，联邦政府就不可能存在了。如果我们与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脱离关系，分裂了联邦，不幸之事难道就不会再发生了吗？如果新英格兰各州从联邦分离出去，我们的本性会改变吗？如果这些州都从联邦分裂出去，南方还有充满激情的民众，在尚存的联邦内马上会出现一个宾夕法尼亚党和一个弗吉尼亚党。在不同政党精神影响下，公众也会分为两派。一个党派为了威胁另一个党派，将会与北方的邻居联手。我们可以进一步推理，如果我们把联盟缩小到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那么这两个州各自的议员们也会分成两派，两个州最终将四分五裂。

换句话说，州与联邦分离并不是一剂济世的良药，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

1800年3月，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忙着准备秋季的大选。杰斐逊写道："联邦党人秘密举行演说，他们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对我的态度表明，他们对秋季的选举非常恐慌。"杰斐逊指出，有几个州的情况无法准确把握，并谨慎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上届选举中，我被骗了一两张选票，这次的情况更无法确定。"杰斐逊并未预言共和党会在选举中取得成功，但他非常乐观，委婉地表达了共和党有望在选举中获胜这层意思。

联邦党人为了竞选真是豁出去了。他们编造故事，捏造谎言，到处攻击杰斐逊，说："他的财产要么是骗来的，要么是抢来的。有一次，他作为遗嘱执行人，以四十分之一的价格骗取了一对孤儿寡母一万英镑的遗产。"杰斐逊向一位朋友陈述了如下事实：

> 独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发生过两件类似的事情。一件事情中的确有一个寡妇和几个孩子。寡妇是我妹妹，她的地产自始至终由她自己管理，我从来没有占过她一寸土地。另外一件事中，我只是作为合伙人分到自己应得的份额。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处理过别人的私人事务，根本没有做过所谓的遗嘱执

行人……我的绝大多数财产是继承来的，我自置的土地价值七八百英镑，都是从名副其实的绅士手中买来的，与孤儿寡母毫无关系。

杰斐逊向朋友保证，自己绝没有做过别人所说的那种事情，并叮嘱道："请你务必妥善保管我的信件，以免它上了报纸。那是一片是非之地，别人冷不防就会向我挑衅。"此乃明智之举。杰斐逊很了解联邦党人。他们觉得选举中不是杰斐逊的对手，无论于公于私都对杰斐逊深恶痛绝，恶意十足。看到选举中毫无取胜的希望，联邦党人便肆无忌惮地搞人身攻击。

选举的日子一天天来临，联邦党人心灰意冷，感到前途未卜。内讧使联邦党分成了两派。他们互相敌视，互相嫉妒，自然不能齐心协力一致对外。约翰·亚当斯造成的党内分裂无法弥合，国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变得四分五裂，内讧不断。共和党人在选举中占尽先机，令人羡慕。一切都预示着联邦党人既定的败局。1800年秋天之前的民意调查显示，在选民数量上，共和党人要比联邦党人占很大优势。联邦党领导人能力卓越，影响力大，能够长期保持联邦党的统治地位。共和党人已彻底团结起来，热情高涨，信心十足。他们发现联邦党内部不和，更加欢欣鼓舞。选举中的纪律和组织选民的工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善，这副重担落到了杰斐逊一个人的肩上。在纽约，杰斐逊只有阿伦·伯尔一个能干的副手。他们制定了良策，化解问题于无形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民众都愿意支持共和党，准备在选举中为共和党投票，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完成这一壮举后，杰斐逊顿时声名鹊起，被认为是美国最有能力的领导人。杰斐逊认为，自己真诚地信任社会底层三分之二的民众，本能地忠诚于他们。反过来，民众也感激和信任杰斐逊。多年来，民众敬佩杰斐逊的为人，认同他坚持不懈地追求的事业，这就是杰斐逊赢得民心的秘密所在。杰斐逊已使民众牢牢地团结在一起，与选民达成一致，形成了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像拿破仑·波拿巴领导法兰西共和国未经训练的民兵取得的军事胜利一样令人鼓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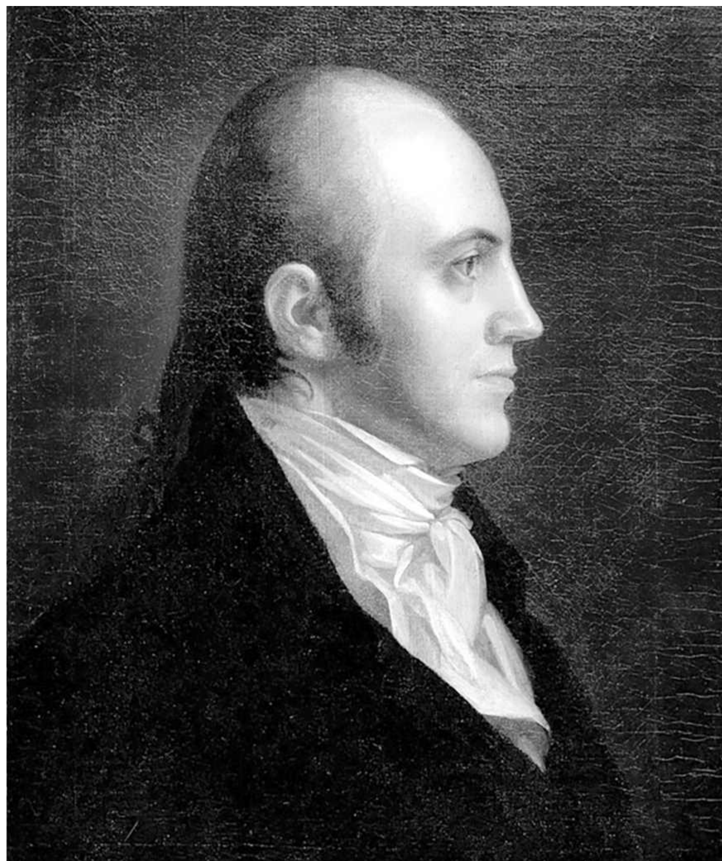
选举中，联邦党和共和党实力上的差距显而易见，稍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对选举结果感到惊讶。联邦党人曾想撤回约翰·亚当斯几张选票，把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排到约翰·亚当斯前面来。联邦党领导人意识

到联邦党的处境比较危险，及时避免了这种愚行。共和党内部也有危险，为了防止两名候选人出现势均力敌的局面，一些共和党人可能选择弃权。1800年12月15日，杰斐逊写道："出于礼貌，我在竞选中的表现并不积极。我从来没有问过别的党众，为了不让一半共和党人失望，党内是否已经做出安排去阻止选民们故意放弃选票。我相信，党内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安排。"尽管如此，共和党人还是出现重大失误。就像选杰斐逊任副总统时一样，杰斐逊事先特地警告过一些问题不可以出现，结果还是出现了。选举结果令人难以置信，杰斐逊与阿伦·伯尔旗鼓相当。投票过程中，两党都没有浪费任何力量，投票结果为：杰斐逊七十三票，阿伦·伯尔七十三票，约翰·亚当斯六十五票，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六十四票，约翰·杰伊一票。杰斐逊和阿伦·伯尔所得票数相等，无疑要在众议院进行再次投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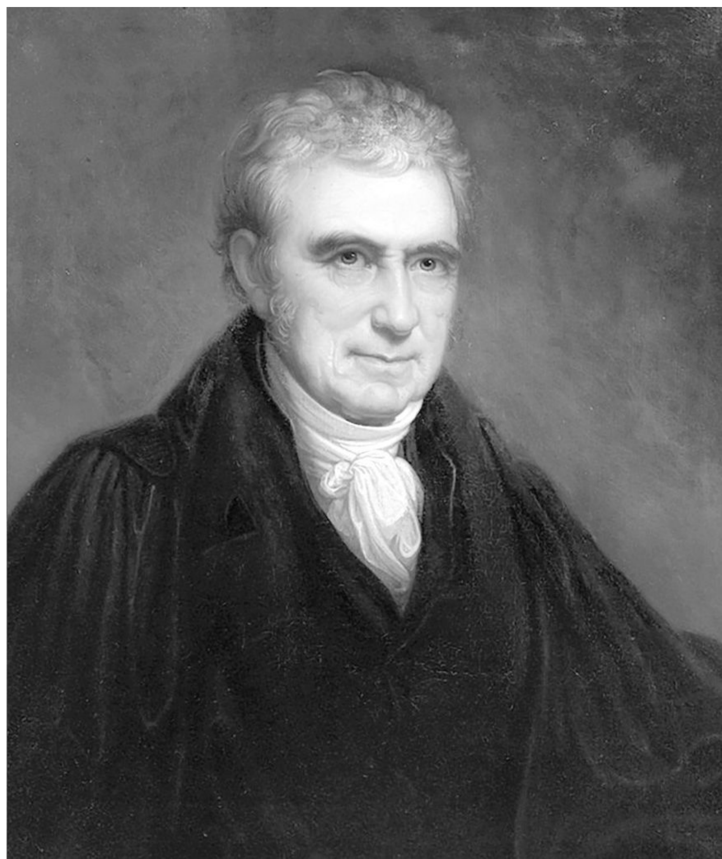
这段时间内，杰斐逊和美国民众一样焦急。从众议院的人员组成来看，共和党人不能控制投票结果，联邦党人更不可能控制投票结果，但联邦党人可以牢牢团结在一起阻止选举。联邦党这样做无疑会犯下重大的政治罪行。1800年12月15日，杰斐逊写道："几个雄心勃勃的联邦党人已经表明了他们的决心……阻止众议院做出选择……要让政府把权力移交给参议院议长。"

面对这种威胁，"共和党人个个精神沮丧，联邦党人却沾沾自喜。联邦党人公开宣布……将临时任命参议院议长代理总统职务，并称这是宪法的延伸解释"。一些联邦主义者还断言，宁愿处于无政府状态，也不能让杰斐逊成功当选。1800年12月31日杰斐逊写道："现在困难重重，我们不知道结局会怎样。联邦党人……打算阻止众议院选举，让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或者国务卿约翰·马歇尔制定方案，将政府权力移交给参议院，或者暂时由国务卿代理总统职务至1801年12月。这样联邦党就可赢得一年的时间来伺机占据优势。共和党人建议加快选举进程，如果选举不能继续进行，共和党内的两名品德高尚的候选人一定会达成一致，阻止解散政府，防止出现无政府的危险状态。这只是万般无奈的下策，但也比让立法机构攫取民众的权利，任命政府首脑要强。"危机过后，杰斐逊解释道："首先，如选不出总统，联邦政府就会像钟表一样停止运转。我对这样的发展前景感到无比慰藉。没有政府就不会有动武的念头，更

没有动武的理由。国会中的共和党成员将邀请实质上的总统与副总统，在八周内举行会议，修改宪法中的缺陷，让宪法发挥更大的效力。”杰斐逊之所以能够如此平静、举重若轻描述一件可怕而危险的事，是因为此时真正的危险已经过去，自己登上总统宝座已经两个多星期了。对国家来说，最幸运的是杰斐逊和朋友们没有被迫做出违背宪法的事。全国民众在看着他们，强大的联邦党中有少数勇敢的领导人一直敌视他们。有人放出威胁性言论，如果真要计划让约翰·杰伊或约翰·马歇尔代理总统，就要用武力解决此事。如果大打出手，这个刚刚诞生的国家处境将会更加糟糕。杰斐逊写道：“联邦党人想将政府交到国会官员手中，但没有法律依据，他们无法阻止选举。最好彻底公开表明我们寸步不让，绝不向这种篡夺政府权力的做法屈服，一天也不行。一旦有这样的法案通过，中部的一些州可能会武装起事。我们宣布要召开大会改组政府，联邦党人对我们公开宣布计划的做法大吃一惊，对‘大会’一词感到很恐惧。”杰斐逊的有些话自相矛盾。他总是被热情所左右，解释问题时只考虑说话时的目的和情感。如果“中部一些州会武装起事”的严重威胁使联邦党人忧心忡忡，那么杰斐逊就不应该沾沾自喜地说“没有武力的念头，也没有任何使用武力的理由”。这看起来有点虚伪。杰斐逊无时无刻不想为自己的政党和政治信仰增光添彩。



阿伦·伯尔



约翰·马歇尔

也许是担心出现上述后果，也许是由于联邦党的领袖们恢复了良知和爱国情怀，他们除了心中不快之外，再也没有什么过分之举。众议院投票开始之前，联邦党人计划要让杰斐逊落选，以满足他们的期望。虽然选举人不能标明哪一票投给总统，哪一票投给副总统，但是大家都知道，共和党人都一致赞成杰斐逊当选总统。事实上，阿伦·伯尔也不是共和党人的第二总统人选。只是考虑到时阿伦·伯尔当时的影响力，共和党人毫不犹豫地决定让他担任副总统。联邦党人根本不管这些事，对杰斐逊既恨又怕。共和党人却无比信任和爱戴杰斐逊。若想让杰斐逊落选，成功的希望只有一半。许多联邦党人看到约翰·亚当斯被击败后很高兴。虽然联邦党人并不希望共和党人获胜，但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心甘情愿地接受共和党候选人成功当选，对自己党派内的事不怎么感兴趣。联邦党内部，反对约翰·亚当斯的人想借此机会报复他，不再与共和党人对抗。由于联邦党人不可能把共和党分成两派，而与其中一派联合，所以他们

没有立刻实施自己的计划，这让共和党人喜出望外。这时幸运地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挺身而出支持杰斐逊当选美国总统。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影响下，共和党人才免受联邦党人带来的耻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像往常一样，仍竭力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次选举中，最初很少有人听他的，但他那神奇的力量又像过去一样发挥了作用，许多联邦党人开始支持杰斐逊，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件怪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伟大的联邦主义者。他支持杰斐逊绝对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而不是向杰斐逊表达善意。也许杰斐逊根本不会感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自己的支持。当然，杰斐逊一点儿也不会反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么做。1801年2月17日，投票进行到了第七天，人们的焦虑终于结束了。长期的焦虑使杰斐逊和美国民众都感到心情沉重。佛蒙特州联邦党人代表缺席，来自马里兰州的两名联邦党人投了空白票。十个州全票支持杰斐逊，所投票数足以让杰斐逊当选总统。杰斐逊高兴地说，在选举中没有人改变立场，联邦党人中也没有人叛党变节，而是采取了更合适的做法——弃权。同时，宪法也经历了从未遇到过的严峻考验。为了避免选举中再发生这种危险情况，国会马上修订宪法。修正案规定，以后选举中，总统和副总统分开投票，选举人应在投票中指明所选的总统是谁、副总统是谁。

联邦党作家们声称，宪法中这些“条款”是杰斐逊为了当选总统事先加上去的。这些人有意让杰斐逊的所作所为蒙上污点。他们的论断毫无证据，没什么可信度。1801年2月15日，杰斐逊说：“我已经明确地宣布，绝不会作茧自缚，为了当总统而放弃自己的原则。”杰斐逊绝不会做这种事，因为他不是那种禁不起诱惑的人。据杰斐逊一个朋友陈述，如果当选总统，杰斐逊并不打算推翻过去十二年中联邦党人所制定的重要法律，也不会开除在政府供职的联邦主义者。朋友的陈述清楚地表明了杰斐逊的真实意图，给联邦党人带来了安慰联邦党人对杰斐逊的害怕已达到荒唐的地步。选举过程中，杰斐逊两袖清风，受人尊敬，也经历了艰难险阻。杰斐逊当选总统是理所当然、众望所归的事。

相比之下，阿伦·伯尔的表现很糟糕。他违背了共和党人共同的愿望，想通过与联邦党人联盟的卑鄙手段来获得总统职位。政治生活中，很难想象对别人信任的背叛是多么恶劣的行为。事实表明，阿伦·伯尔个

人野心膨胀，完全不顾共和党的大局。他或许能以公开宣传党的意愿为理由替自己辩护，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与杰斐逊相比，阿伦·伯尔因失信显得更加可鄙。慢慢地，所有明智之人都开始厌恶阿伦·伯尔。阿伦·伯尔本来特别需要朋友们的支持，但在总统职位的诱惑下，他的所作所为使正直之人都离自己远去。杰斐逊一直对阿伦·伯尔很真诚。众议院投票之前，杰斐逊就写信给阿伦·伯尔说："我们可以预料，敌人会设法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设法将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分开。我想你一定会提防此事，我对此也格外警惕。"无论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还是对他个人的考虑，杰斐逊都反对党内纷争。杰斐逊信任阿伦·伯尔，对他充满善意，但阿伦·伯尔却辜负了杰斐逊，不顾一切地成为杰斐逊的竞争对手。姑且说这是人之常情吧。

注解：

[1] 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1746—1825），美国开国元勋、政治家，联邦党成员，大陆会议代表，美国宪法的主要签署人，曾两次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译者注

[2] 约翰·亚当斯得71票，杰斐逊得68票，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得59票，阿伦·伯尔得30票，其余选票为别的候选人获得。——原注

[3] 托马斯·米夫林（1744—1800），美国政治家，1783年当选为大陆会议主席，宾夕法尼亚州第一任州长。——译者注

[4] 1797年5月12日，泰晤士河诺尔锚地的海军因不满当时的待遇而哗变，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后来，哗变者的要求变得激进，要求英王解散议会，与法兰西共和国停战，激怒了海军部。诺尔锚地的军舰比较分散，不属于一个舰队，哗变者很难团结一致。加上缺乏食物，哗变最终失败，二十九名带头哗变者被绞死，其他人被鞭打、监禁或流放。——原注

[5] 菲利波·马泽伊（1730—1816），意大利医生，杰斐逊的密友，1775年从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是弗吉尼亚的武器代理商。——译者注

[6] 参孙是圣经《士师记》中的犹太士师，生于前11世纪的以色列。神赐予他极大的力气。他徒手击杀雄狮，只身与以色列的外敌非利士人战斗。——译者注

[7] 见杰斐逊1797年8月3日写给詹姆斯·麦迪逊的信：《杰斐逊集》，第四章，193页。——原注

[8] 理查德·希尔德雷思（1807—1865），美国记者、作家、历史学家，著有《美利坚合众国史》，强烈支持联邦党和废除奴隶制。——译者注

[9] 见1824年6月29日杰斐逊写给范布伦的信。该信摘自《杰斐逊集》。其中，杰斐逊对这一著名争议表明了立场，详细地做了陈述。——原注

第13章
温和的执政与卡伦德的诽谤



精彩看点

即将下野的联邦党人——总统就职仪式——过度的简单朴素——梅里先生的不满——乌托邦式的和谐——两党建立了共同的原则——新英格兰的复兴——对联邦党人的宽容——官员免职——卡伦德的诽谤

1801年3月3日是联邦党人执政的最后一天。当天晚上，联邦党的官员们忙碌地干了一些不太体面的事情。约翰·亚当斯总统忙着提名联邦党人担任各种官职，参议院马上确认他的提名，国务卿约翰·马歇尔则热情地迅速签署任命状。午夜的钟声响起，将要出任司法部长的李维·林肯戏剧性地拿着杰斐逊的手表走进约翰·马歇尔的办公室，要求十二点钟务必完成办公任务。这时桌子上还有许多没有签完的任命状。联邦党人的行为的确不太光彩。杰斐逊曾郑重承诺，执政后不会影响以前在政府任职

的官员。联邦党人公开宣称相信杰斐逊的承诺，却在下野之前大量安排自己人担任各种要职。约翰·亚当斯觉得，看到第二天新总统任职时的壮观场面后，自己有失脸面，于是连夜驾车黯然离开了华盛顿。某种意义上，这种“壮观”场面倒值得一看。杰斐逊坚定地践行民主，决不会像“君主主义者”一样在就职活动中讲排场。翌日，杰斐逊刻意身穿便装，屏退侍从，骑马来到国会大厦，下马后亲自将马拴在栅栏上，信步走进参议院议事厅。杰斐逊的就职演说文采飞扬，字里行间流露出无限的博爱情怀。杰斐逊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向人们传达了他坚定的信念。他的就职开启了人类发展历程中一个辉煌的时代。演讲结束后，杰斐逊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见证下宣誓就职。简单的就职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杰斐逊一向对招摇过市的做法嗤之以鼻。执政生涯中，杰斐逊始终保持自我克制，从不炫耀。有时这种谨慎的克制有点过头，反而显得自命不凡，矫揉造作。英国驻美国公使梅里先生来任职时“身着官服”，和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先生一起到总统官邸面见杰斐逊总统。梅里对当时所看到的一切很震惊，做了如下描述：

> 会议室内空无一人，詹姆斯·麦迪逊似乎也有点吃惊，于是径直向总统的书房走去。我跟在他后面，心中猜度着，莫不是总统要在书房隔壁的房间与我见面吧。詹姆斯·麦迪逊走进了另一个门，总统就在一间刚能容纳三个人的房间内。为了腾出一点儿空间，我不得不退出房间。当时的场面很尴尬，詹姆斯·麦迪逊向总统介绍了我的情况。后来，我从杰斐逊的言谈举止中得知，杰斐逊在这种地方接待我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有意安排。接待过程中，我穿着官服，杰斐逊作为美国总统却身着便装，而且还穿着拖鞋，脚后跟露在外面。他的男式马裤、外衣和贴身衣物都显得不修边幅，一副邋遢样，好像故意穿成了这样。

杰斐逊常常将简单朴素看作原则问题。实际上，朴素和形式化的仪式各有千秋，只是个人虚荣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在外交场合，过度的朴素除了有点装腔作势之外，还会造成严重不良的影响。这位英国来的公使十分不满。他认为，整个场面都是提前安排好的，这样的接待方式不是对他个人的侮辱，而是侮辱了英王乔治三世。杰斐逊的目的并不是

取悦梅里先生或乔治三世，他的衣着和举止都符合自己选民所在的社会阶层的标准。就像一个技艺超群的演员知道自己的观众喜欢什么一样，杰斐逊也能准确把握自己选民们的嗜好。



李维·林肯

任副总统时，杰斐逊曾说：“当副总统既体面又轻松，总统虽气派却很痛苦。”从以上轶事中可知，杰斐逊根本不讲排场，常常苦中作乐。国内外一致认为，杰斐逊执政期间美国变得平静而繁荣。当时共和党处于执政地位，杰斐逊清楚地预见，未来许多年里，共和党会继续兴旺发达。杰斐逊的思想和言行洋溢着博爱和善意。他认为，政府应该温和、理性、仁慈，远离邪恶的专制。如果美国政府是一个动物园，杰斐逊就是那里的管理者。他要让联邦主义的“狮子”们安静地躺在共和党的“羔羊”中间，极少数不可救药的“君主主义者”必须像蛇一样安全地关在他们自己设计的牢笼之中。杰斐逊说：“在共和党执政期间，我希望联邦党和

共和党能够精诚团结。因反对法兰西共和国而加入联邦党的人可以重新加入共和党。纯粹的君主主义者人数较少，掀不起什么风浪。”杰斐逊的就职演说辞藻华丽，真情洋溢，他宣称：“我们是秉持相同原则的兄弟，只是名字不同，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我们虽然观点不同，却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因此，让我们鼓起勇气，满怀信心，追求我们自己的联邦和共和原则，共同向联邦奉献我们的忠诚。”

杰斐逊的讲话中不再区分共和党和联邦党，力求建立一个和谐的联盟。就职前两周，杰斐逊认为某些联邦党人在选举中的行为就像是在“宣战”，“但他们让我们看到全体联邦党人一边向人们警告解散政府的危险性，一边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焦急地关注着他们所反对的新政府”。几天后，杰斐逊谈到联邦党人时说：“除个别的领导人之外，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站在了一起，对政府有感情也有信心。如果政府一开始就不做令联邦党人伤心的事，不抛弃他们，他们就会对政府产生好感。不久大家就一定会紧密团结在一起。”1801年3月14日，杰斐逊说：“许多因欧洲革命而陷入恐慌的民众已恢复正常。民众的情绪彻底恢复正常后，党内就不会有大的分歧。联邦党的领导人们还没能和我们站在一起，可现在他们已是孤家寡人。”

杰斐逊是位政治空想家，乌托邦式的和谐社会是他的理想之一。杰斐逊眼光敏锐，精神乐观。依他看来，全国大多数人都会成为共和党人，并长期占据优势，处于执政地位，从而出现民众所期望的局面。作为政治家，杰斐逊预见将来的政治形势肯定如自己所愿，也由衷地希望共和党人胜利地走向这样的未来。这种毫无半点自私和恶意的喜悦清楚地表露了杰斐逊的可敬之处和爱国情怀。杰斐逊为民众感到高兴，而不是个人在沾沾自喜。他并不是因为当了总统而高兴，真正让他快乐的是联邦党和共和党建立了共同的原则。1801年8月26日，杰斐逊写道：“执政期间，我一定要让国家成为统一的整体。”为了这个崇高的目标，杰斐逊全力以赴。他说，联邦党人“发现自己与以前的领导人划清了界线。如果共和党人没有过激的行为，将联邦党人当作自己的新朋友，不要让他们的感情受到伤害，过不了多久，联邦党人将会与共和党人团结一致。我们的国家也将恢复和谐团结的局面，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大好处”。

面对伟大的事业中取得的种种成功，杰斐逊兴奋不已。杰斐逊认为

新英格兰一直是极端联邦主义的大本营，像一个政治黑暗的王国。1798年6月1日所写的信中，针对州与联邦分离的蠢行，杰斐逊写道：“如非要找人争论，我宁愿留住我们新英格兰的同胞，不愿看到我们的争论转移到别人身上。新英格兰的同胞们受到种种限制，人口密度很大，但人数并不多。他们被认为像犹太人一样，性格异常乖戾。这种情况下，联邦党和共和党自然会分裂。”1801年5月3日，杰斐逊说：“罗德岛的复兴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我希望新英格兰真正的精神开始复活，新英格兰将永远强大起来。罗德岛之后，佛蒙特州将会摆脱神权政治的枷锁。”杰斐逊认为，新英格兰民众的思想不断进步，真是让人喜出望外。新英格兰的传教士们常干涉政治。杰斐逊认为这些谙熟教义的人是最危险的敌人。杰斐逊说：“神职人员们并无怜悯之心，将救世主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律法禁止他们杀人，但无法禁止他们的谎言和诽谤。尽管这些人阻挠了共和思想，常常误导民众，可不久之后，马萨诸塞州一定会信奉共和。”担任总统一年后，杰斐逊说：“共和党在众议院占据多数席位，获得二比一的优势。在参议院，共和党获得十八比十五的优势。再进行一次选举之后，共和党人在参议院也将形成二比一的优势……联邦党人坦率地承认他们从此一蹶不振。”杰斐逊很机智地补充道：“共和党现在如此强大，肯定会再次分裂，但必须改用别的名称。人们对联邦主义者没有好感，若用“联邦党”这个名称，肯定无法兴旺发达。”

杰斐逊明智而温和地进行官员任免。杰斐逊对联邦党人实行了宽大政策，但联邦党人不但不领情，反而指控他播下了邪恶的种子，称这种政策为“政党分肥制”。联邦党人在杰斐逊就职前曾大量任命官员。杰斐逊完全能够以此为借口，大规模地免去联邦党人的官职。面对联邦党人不合理的指控，杰斐逊并没有这样做。恰恰相反，他对自己的对手非常宽容。杰斐逊以后的总统中除约翰·昆西·亚当斯外，没有人能像杰斐逊一样宽容政治对手。安德鲁·杰克逊执政时期所提倡的只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民主与宽容，与杰斐逊大相径庭。1801年2月14日，在回复别人的来信时，杰斐逊针对这个有趣的话题说道：“按照自己职责行事的人都不会害怕我。那些作恶的人可能无所期待，没有政治原则……自从有了共和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之分后，共和党人在担任公职中一直受排挤。共和党人对职位的要求是合理的。他们应该在国家机关中占有足够的职位。”杰斐逊自然期待“联邦党人的良知”能够促使他们与共和党人“公平

地达成一致。1800年3月3日晚上9点钟，共和党人举行了执政前第一次会议。联邦党人霸占了几乎所有的职位，可始终没有人承认……现在看来，共和党人完全应该填补可能出现的空缺，实现两党任职中的平衡”。

问题的关键不是如何填补空缺，而是怎样让一些职位空出来。坦率地说，摆在杰斐逊面前的问题是按照常规等待在职官员死亡、辞职或任期届满，还是勇敢地将大批官员免职。若要免职，被免职的必须是那些渎职或不称职的官员，数量不可太大，而且要逐步进行。将联邦党内不称职的官员清理干净毫无不妥之处。杰斐逊说：“1800年12月12日，选举结果已经揭晓。约翰·亚当斯先生快马加鞭，在联邦各部门任命了许多联邦党人。该工作一直持续到他卸任当天晚上十二时。别人看来，约翰·亚当斯并不是为自己任命官员，而是为继任者代劳。因为关乎国家大事，这种冠冕堂皇的做法使人敢怒不敢言。我认为约翰·亚当斯十二月以来所做的任命全都无效。”当然“官方的不当行为”也可以作为免职的理由。“那些称职、勤勤恳恳工作的人自然不能免职，因为没有拒绝他们的理由。虽然政治原则不同，可他们在尽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杰斐逊唯一想免职的是“法院的执行官和检察官”。杰斐逊认为，法院是“联邦主义者坚定而不可撼动的大本营。共和党人担任执行官和检察官后，才能进一步进入法院，才能保护公民中的共和党人”。司法部门的确既诚实又能干，共和党人也有充分的理由埋怨和不信任司法部门。最高法院有权解释新宪法，政治上的重要性与政府不相上下。然而，当时美国几乎所有法院的法官、地区检察官和执行官都是联邦党人，而且不可否认，他们大多都是党派主义者。联邦党在国会额外设立了一些席位，由约翰·亚当斯先生的得力朋友们所占据。杰斐逊上任后不久，共和党人就在国会废除了这些额外的席位。其他法院却不能用这种办法，那些执行官和检察官的职位只能通过免职才能空出。司法部门体系庞大、牵扯面广。杰斐逊认为，共和党有充分的理由在司法部门占有一席之地。杰斐逊将官员的渎职和不称职作为免职的依据，无疑引起了一种极端的倾向。人们开始相信证据不明的可疑指控。“挑选陪审团”就是常见的一种。这就像是披着体面的外衣，指控一些实质上并不该受谴责的事情。

杰斐逊制定了官员免职的原则，以书面形式发布，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杰斐逊宅心仁厚，本不愿免去任何人的官职，也坚决反对强行免

职。过了一段时间后，杰斐逊也慢慢地懂得运用权力，强行将那些表现十分恶劣的官员免职。杰斐逊说："免去别人职务是一件痛苦而糟糕的差事。许多人对我恶言相加，蓄谋激怒我，将联邦主义者们统统革职。"最后，杰斐逊将不再受人拥戴，联邦主义者也会认为杰斐逊迫害他们，共和党人与他们达成的和解也将付诸东流。杰斐逊说："我根本没有激情来履行这令人讨厌的职责，更没有半点儿快乐可言。"执政两年后，杰斐逊写道："国会第一次会议结束时，十六位官员因违反政治原则被强行免职。若不是有人违法乱纪，我也不会下决心免去任何人的职务。国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到第二次会议结束后，又有九人被免除职务。前后加起来共有二十五人因违反政治原则被免职，为共和党人腾出了职位。"1804年3月3日，杰斐逊对一项免职的原则做了说明："决不赞成公开反对国家意志的人担任公职"。当然也拐弯抹角地指出，敌视执政党的人也不能担任公职。令人敬佩的是，杰斐逊的确没有违背他开始执政时所确立的原则。他以莫大的勇气和真诚留任了大量在职官员，而这些官员所在的党派一直在排斥共和主义者。如果当时执政的是联邦党而不是共和党，联邦党的领导人决不会像杰斐逊一样做出承诺。众多免职的官员中就有担任波士顿银行破产专员的约翰·昆西·亚当斯。联邦主义者认为这明显是在公报私仇。后来，杰斐逊写信给约翰·亚当斯夫人，对她的指责做了清楚的答复。杰斐逊为了腾出空职位而免除官员时，并不知道约翰·昆西·亚当斯当时所任何职。

选任官员很重要，也很困难。杰斐逊痛苦而谨慎地推进此事。他说："我并不急着做出任命，没有比这更难办的差事了。很有必要了解预任官员的特点，但这种了解十分有限。"于是，杰斐逊请自己信任的朋友提供信息。不过，杰斐逊也难免有犯错误的时候。一位老迈无能的撒母耳主教出任了纽黑文市的收税官。别人对杰斐逊的攻击接踵而来。杰斐逊却辩解该任命无可挑剔。杰斐逊从不将一个官员过去的政治表现作为推荐任职的标准。他也会怒斥那些存心干预政治的联邦党官员。1801年2月2日，杰斐逊写道："今后无论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的官员，只要干涉选举，统统免职。在联邦政府内，宪法救济受到限制，选举中根本无济于事。"后来，杰斐逊将"干涉选举并公开反对当前政府"列为官员免职的原则之一。杰斐逊所规定的免职原则对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一视同仁。1804年9月，杰斐逊对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说："联邦政府的官

员严重干涉选举，我们应私下里告诫他们，还是将他们的行为公之于众……”

杰斐逊对联邦党在职的官员也算得上仁至义尽了，但联邦主义者并没有在报纸上大书特书杰斐逊的善行。偏偏这时候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1] 编造了荒唐的故事，恶语中伤杰斐逊。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出生于苏格兰，因写了一本《大不列颠政治演变》的小册子而被起诉，后来逃到美国避难，成了共和党的“笔杆子”。起初，杰斐逊认为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很能干，对别人的攻击粗俗而猛烈，善于毫无顾忌地谈论一些身居高位的人们不愿意让别人提及的隐私。就品德而言，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是个地地道道的可鄙之人，完全不顾忌别人的尊严和面子。就是他发现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与雷诺兹夫人的恋情，并通过卑劣的手段将取得的证据公之于众。他还写了一些下三烂的文章攻击乔治·华盛顿。他的所作所为真是有点居心叵测，不可饶恕。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能力平平，只会粗鄙地指责并侮辱他人。如细作分析，他就是个无知的白痴。他的讽刺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常以为他是一个喝得烂醉如泥，写低俗文章的政治雇佣文人。杰斐逊说，自己打心眼里讨厌这位党徒。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几乎成了人人憎恨的害群之马。杰斐逊也曾三番五次地让他停止这种卑鄙的做法。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杰斐逊时不时地给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一些钱，接济他的生活。杰斐逊认为，这是因为自己心肠太软。联邦主义者们则指责杰斐逊，说他内心之中对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的工作很满意。

约翰·亚当斯执政期间，依据《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十个有罪之人被捕入狱，并处以罚款。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便是其中之一。杰斐逊执政后，赦免了他们的牢狱之灾，退还了罚款。联邦主义者称这是“滥用权力”。杰斐逊认为：“《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自始至终无效。国会似乎要强迫我们趴下来像尊神一样尊崇它的光辉形象。那些对国会的光辉形象有微词的人就违反了《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而身陷囹圄，遭受磨难。国会早应废止该法，将这些人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尽管杰斐逊担心自己卷入纷争，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毫不逃避责任。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之前得到了杰斐逊的慷慨资助，又受到了杰斐逊的鼓励，理应对杰斐逊感激涕零，但他不但没有半点感激之情，反而露出贪婪的本

性，渴望得到更多的好处。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刚刚被释放出狱，就迫不及待地怂恿杰斐逊将里士满邮政局长革职，任命自己担任此职。这位邮政局长是位联邦主义者，曾任过编辑。杰斐逊很尊敬他，不想撤换他。这种正直的做法并没有使世俗的人们感到良心不安，反而使杰斐逊本人痛苦不堪。要求被拒绝后，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马上笼络了里士满《记录报》的编辑们，在报纸上接连不断地编造故事贬损杰斐逊。那些故事有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自己写的，也有别人提供的。《记录报》本是地方上不值一提的出版物，因登了这些故事传遍了美国的大街小巷。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猛烈的攻击虽卑鄙无耻，但相当有效。他说，杰斐逊过去是他的朋友，曾经向他提供资金，他们共同诽谤过乔治·华盛顿。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主要攻击的是杰斐逊的私生活。他所写的故事可谓自取其辱，让人讨厌到了极点。这些诽谤性的故事比起对一般婚外情的指控更加骇人听闻，自然没有重提的必要。任何正派的人都不愿意涉足这些龌龊的事情。有人认为，为了实现卑鄙的复仇目的，联邦主义者怂恿了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与他做了一笔交易。至少这些联邦党的绅士们应该记得，他们不久前还指责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是低俗而不可相信的骗子，何况此人还攻击过乔治·华盛顿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当时的记者们也捕风捉影，做了一些让人厌恶的龌龊之事。联邦党的作家们忙着从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的诽谤故事中大量汲取素材。杰斐逊淫逸放荡的谣言在美国变得家喻户晓。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杰斐逊从未试图否认这些诽谤。本指望联邦主义的历史学家们能对此做出公正的评价，没想到他们却认为杰斐逊的沉默正好证明了他的罪行。杰斐逊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不可能屈服于这些诽谤和诬蔑，也无法证明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所说的不是事实。也许我们认为，对这些诽谤最好置之不理，但当时它们严重影响了杰斐逊的心情和名声。作家们也在反复做着有损杰斐逊名誉的事情。人们心中的杰斐逊将会成为一个异常放荡淫乱之人。在当时崇尚道德、思想纯真的年代，在提倡感恩的国度，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智者贤人、爱国志士都无法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当然，绝不是说杰斐逊不如同时代的这些风云人物。实际也没有人会这样想。杰斐逊不可能做出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所说的事来。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的诽谤没有一点事实根据。杰斐逊的道德操守绝对不会逊色于和他地位相同的那些人。遇到官员任免的敏感事情，无论谁任总统都会遭到类似的诽谤。



丑化杰斐逊的漫画：杰斐逊与莎莉·赫明斯

注解：

[1] 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1758—1803），美国著名的政治作家和报纸编辑，曾发表一系列文章诽谤杰斐逊，宣称杰斐逊和奴隶莎莉·赫明斯生了孩子。——译者注

第14章
购买路易斯安那



精彩看点

不盲目崇拜宪法——密西西比河上的权利——新奥尔良港口——西班牙与法兰西的条约——“故友”变成“宿敌”——与英国交好——美国西部尚武精神——众议院长的决议——购买路易斯安——接管密西西比地区——应对联邦党人的异议——宪

法修正案

杰斐逊一贯尊重宪法和法律，但绝不盲目崇拜宪法。根据自己抽象的政治理论，杰斐逊将宪法看作维持国民生计的神圣原则。若宪法束缚了国家的发展，可以按民众的意志修改或废除。国家做出重大决策时都得以宪法为准则。如果一项政策违背了宪法，却符合民众的意愿，也符合自己的意愿，杰斐逊会毫不犹豫地声称尊重宪法，但实际执行政策时又无视宪法的存在。杰斐逊也许是美国历史上唯一敢为天下先的总统。他公开声明，要谋划做一件宪法没有授权的大事。理由很简单，其一，这是一项明智之举；其二，为了国家的利益。这便是购买路易斯安那的真实写照。

多年前，杰斐逊就开始关注美国在密西西比河上的各种权益，并强调这些权益对美国极为重要。杰斐逊曾设想，在密西西比河上发展交通，将新奥尔良变成商业大都市。在当时看来，杰斐逊的确有点异想天开，但这些地方的发展不会逊色于国内其他地区。1790年夏，英国和西班牙的关系即将破裂。杰斐逊洞察秋毫，抓住时机，提出要通过谈判解决密西西比河上公开存在的矛盾。西班牙占据河口两边。美国经常对西班牙声明，不能因占有河口而影响美国船只在密西西比河上的通行权。1790年8月，国务卿杰斐逊写信给时任马德里法院的美国代表卡迈克尔，叮嘱卡迈克尔提醒西班牙驻美公使“有必要尽早彻底解决此事”。杰斐逊说：“除非西班牙能够当机立断，一开始就做出让步，让我们完全拥有通航权，否则我们就得三番五次地谈判。”如果在一开始就做让步，那以后也没什么可谈的了。杰斐逊大胆提议，西班牙应该答应“从海、河两路来的美国船只都可停靠在港口装卸货物，雇佣的船只也可安全顺利地通行”。杰斐逊说，一定要认真对待此事，“要对得起西部民众的祖先。我们要努力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他们临终前未曾实现的愿望，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他们当时很有耐心，并没有将危险强加给别人，倘若他们当时就向西班牙宣战，不知我们现在会怎样。所以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更不能放弃他们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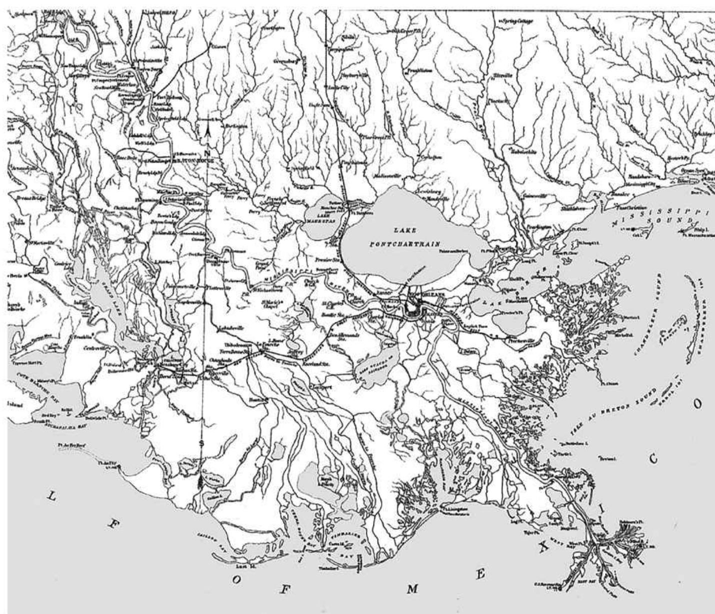
路易斯安那地理位置示意图



密西西比河沿岸风光

几个月来，为了国家利益，杰斐逊一直以莫大的热情和坚定的意志殚精竭虑地工作，很快提出了处理港口问题的建议。杰斐逊说："西班牙应该让出该港口的所有权和管辖权，以免美国和西班牙每天纷争不断。"否则，就只能以"战争的方式解决此事了"。杰斐逊又机智地补充道："无论刚开始这里处于什么状态，大自然已经决定了新奥尔良地理位置，将它从毗邻的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的土地上分离出来，最终在两道海峡之间形成了狭长地带。"杰斐逊认为这一大胆的提议"乍一看，的确令西班牙人很不愉快，不过不会对西班牙带来任何危险，因为这里是西班牙领土的一部分，是西班牙人重要的居住地"。杰斐逊又高兴地表示"如果西班牙人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就会理解我们的提议"。事实证

明杰斐逊说的完全正确。杰斐逊以高超的外交手段和惊人的毅力使西班牙人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让西班牙国王了解了美国人的“想法”。1795年，西班牙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同意与美国签订条约。美国取得了在新奥尔良港口为期三年的自由通航权。三年之后，西班牙将给美国划拨同样方便的港口。尽管杰斐逊离开国务卿的职位之后该条约才成功签订，但最终的功劳非他莫属。杰斐逊任国务卿时国内对西班牙有抵触情绪，许多人暗地里给他制造障碍。西班牙驻美公使觉得美国对密西西比河的态度尚不明朗，没有立即答应杰斐逊的要求。事实上，是杰斐逊的政治智慧促成了该条约的最终签订。



新奥尔良地区

世间有许多机缘巧合。几年以后，该条约以詹姆斯·门罗的名字命名。在一段时期内，人们都认为一旦英国与西班牙反目成仇，英国便会支持美国占领西班牙在北美的领地。杰斐逊写信给古弗尼尔·莫里斯[1]：“我们希望你向英国外交部做出暗示，在领土问题上我们绝对不会袖手旁观。我们应该提高警惕，密切关注邻居们的变化。欧洲各国在寻求力量上的平衡，我们也应在自己的边境上获得应有的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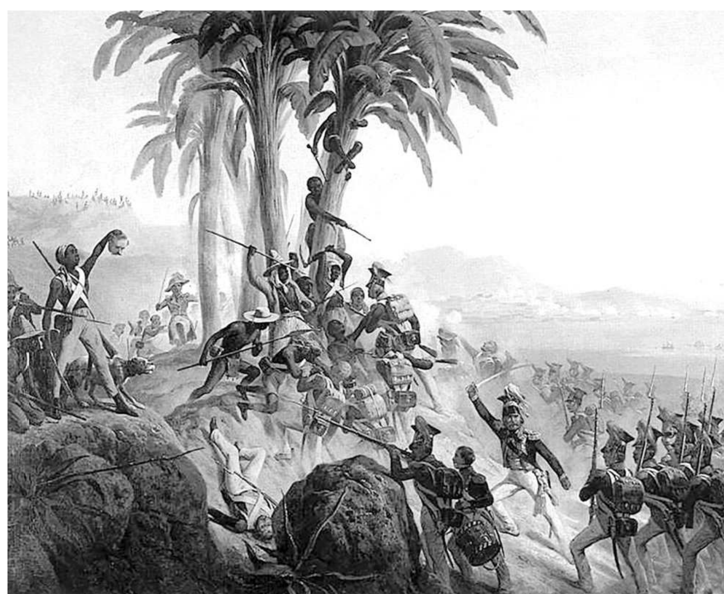
1795年，美国与英国就西班牙在北美的领土问题达成多项协议，在接下来的许多年中一直在发挥作用。然而，美国一些更有远见的人并不

满足现状。他们正在等待时机，以获得更稳定的立足之地。早在1790年，美国就怀疑法兰西王国可能占领墨西哥湾。那时杰斐逊正想方设法让法兰西王国帮助美国对抗西班牙，很担心法兰西王国泄露了自己的计划。杰斐逊说：“莫斯蒂伯爵埃伦·弗朗索瓦·埃利在美国表明，法兰西王国会在美洲建立殖民地，直接将此事告诉了密西西比河沿岸的民众，而且将密西西比河沿岸获取的大量信息提供给了法王路易十六。”该计划被搁置了好几年。直到1800年初，法兰西共和国在美洲建立殖民地的传言才在民众中传播，但没有造成大骚乱。1800年10月1日，西班牙将路易斯安那割让给法兰西共和国。这时美国驻伦敦、巴黎和马德里的公使才接到总统训令，要尽量防止西班牙将领地割让给法兰西共和国。西班牙割让路易斯安那给法兰西共和国的条约早已签定，一切为时已晚。该条约签定后一直没有对外公布，直到1802年春天，美国人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杰斐逊当时非常懊恼，因为他最清楚该地区对美国有多重要。原本属于弱国的这块风水宝地转眼到了强国手中，杰斐逊有点儿寝食难安。

如果抛开总统身份，仅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杰斐逊大可不必如此踌躇满志，并且可以避免联邦主义者的猜疑和尖刻的指责。联邦主义者说，杰斐逊更热爱的是法兰西共和国而不是美国。可是权衡两国民众之间的利益，想到以后两国可能产生的冲突，杰斐逊纯粹的爱国之情顿时显现出来，对法兰西人的同情瞬间化为无奈的遗憾。从国家利益考虑，法兰西共和国已从“故友”变成“宿敌”。1802年4月18日，杰斐逊写信给驻巴黎的罗伯特·R.利文斯顿[2]说：

> 西班牙割让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给法兰西共和国，对美国影响很大。国务卿已写信向你详细说明了该问题。我觉得此事关系重大，不禁向你再次提起，因为它使美国所有的政治关系发生了逆转……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地方，谁拥有它谁就扼住了我们的咽喉，就是我们的宿敌，这个地方就是新奥尔良。法兰西共和国和美国对这里都很敏感，难以长期保持友好关系……如果法兰西共和国占领新奥尔良，一切将不可挽回。我们现在要将目光放长远一点，提前做出安排。法兰西共和国占领新奥尔良之日，就是我们与英国联合之时。英美两国倘若联手，其舰队便可控制整个大西洋。

杰斐逊自愿向英国抛出橄榄枝，别人听来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多少年来，杰斐逊都认为与英国交好是难以容忍的事情。杰斐逊十分认真地对待此事。他的信写得情真意切，显然是心潮澎湃时所写。杰斐逊总能在失望中找到乐观之处，在愤怒之时也不乏老练。他说："尽管我们曾表明无意冒犯法兰西共和国，也不会对他们造成威胁，但法兰西督政府如果看出我们想与英国交好，后果难以设想。"像往常一样，杰斐逊将希望寄托于时间。他说，法军要想接管路易斯安那，就得先征服圣多明戈。杰斐逊自信地说，征服圣多明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还得消耗大量的兵力。杰斐逊希望利用这段时间再做一做法兰西督政府的工作。1802年10月，西班牙割让新奥尔良的消息传出几个月后，西班牙驻新奥尔良总督就发布了一项法令，取消了美国在该港口的存栈权，美国不得在新奥尔良港口存放货物。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杰斐逊的希望一点点化为泡影。顿时，美国西部大地上的好战者们怒火冲天。他们把枪挂在壁炉上方或放在门后面，随时做好开战准备。他们极力主张直接向新奥尔良进军，用武力解决一切问题。杰斐逊感到惴惴不安，怕自己设想的计划受到严重干扰。杰斐逊认为战争是万不得已时才能采取的手段，但这种明显的尚武精神或许有助于外交活动顺利开展。杰斐逊也担心擦枪走火的事情发生。在美国西部，人们陷入了爱国热情无法自拔，很有可能会破坏杰斐逊的计划。杰斐逊很同情这些愤怒的同胞们，对他们毫无怨言。



杰斐逊最烦恼的就是联邦党人。联邦党残余势力看到杰斐逊与法兰西共和国的矛盾激化，觉得重新掌权的机会来了。他们不顾国家利益，大声疾呼，要求立即开战。1803年1月13日，杰斐逊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 民众思想的骚动……达到了极端。西部大地上的民众绝对没有不良动机。为了能增加商业的利润，住在港口的人们渴望战争。国会议员中联邦主义者的目标是伺机迫使美国参与战争，扰乱美国的财政周转。如果这个目的能够达到，联邦党人就可乘机拉拢西部广大民众，与他们联合起来，重新掌权。在西部，到处都是民众签了名的抗议书和请愿书。

联邦党人早已衰败，成为小的派系，而且内讧不断，根本无法击败杰斐逊。全国上下都对杰斐逊充满信心，而且国会中多数人都支持他。

在众议院，约翰·伦道夫有点飞扬跋扈地领导着大多数人，不假思索地对杰斐逊言听计从。1802年下半年，约翰·伦道夫带领众议院议员召开秘密会议，与联邦党人针锋相对，给杰斐逊总统创造私人通信的机会，并就此进行立法。在1802年冬天的几个星期内，所有公开和私下里进行的工作对政府来说有百益而无一害。联邦党人表现出莫大的愤怒和热情，想赢得西部民众的支持。他们提出决议，旨在阻止事情和平解决，但众议院多数议员否决了他们的提议。最后，整件事情都交给杰斐逊决定。众议院又给杰斐逊提供了二百万美元的资金，供他酌情使用。

当时杰斐逊的计划是购买新奥尔良以及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地区。杰斐逊更像是一个文明的商人，认为自己采用的方案更便宜、更明智、更人性化。他要购买的是这一片土地上的收费权，而不是要通过战争去占领这里并取得它的地役权。这二百万美元要用于贿赂法兰西共和国那些德高望重的立法者中一些有影响力的人，为下一步计划铺平道路，因为这些人像国王一样拥有权力。杰斐逊让巴黎的罗伯特·R.利文斯顿率先行动起来，但这位公使在没有了解杰斐逊的真实目的之前就表达了与杰斐逊截然不同的观点。罗伯特·R.利文斯顿告诉法兰西督政府，只要航行权和存栈权不受干涉，美国根本不在乎在密西西比河河口的邻居是法兰西

共和国还是西班牙。后来罗伯特·R.利文斯顿改变自己的说法，就购买路易斯安那的问题展开谈判。西部民众和联邦党人对罗伯特·R.利文斯顿缺乏信心。为了让他们安心，也为了在西部民众和联邦党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力量，杰斐逊特地选派了一位特使。杰斐逊总统用白纸黑字写成的外交训令明确提出了要完成的任务。这是一份难办的差事，还存在一定的风险。詹姆斯·门罗弗吉尼亚州长的任期刚刚结束。杰斐逊认为詹姆斯·门罗是最佳人选。1803年2月11日，杰斐逊任命詹姆斯·门罗为法兰西特使。该任命很快得到国会的认可。联邦党人也提了不少反对意见。他们声称，法兰西共和国出现财政困难，杰斐逊只是想借此机会帮助自己政治上的朋友。詹姆斯·门罗与杰斐逊多次面谈，充分了解了杰斐逊总统的计划后，毅然动身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没带任何书面文件。很显然，如果他的上司以后不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詹姆斯·门罗空口无凭，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过杰斐逊的朋友们一向对杰斐逊信任有加。

在购买领土的问题上，杰斐逊表现出精明的商业头脑，让商人们也引以为荣。杰斐逊写信给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穆尔[3]，敦促他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并提出了一些建议："我们的处境十分不妙，我们的工作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密西西比河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来维护它。"杰斐逊及时暗示了这是"最后的解决办法"。杰斐逊补充道："路易斯安那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完全可以花些钱确保我们的购买万无一失。我们是一个农业国家，不但缺钱而且还欠债。要想在未来十五年内分期偿还这些债务，我们就要实行严格的经济制度。我们的原则是，无论做了什么，我们都要立即付诸行动，绝不要做我们不能做、也不打算做的事。我已经计算了财力，我们的手头并不宽裕。最近的经验告诉我们，通过借贷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们想购买的土地……是贫瘠的沙地……我们又不能把土地卖给个人来赚钱。只有通过和平的方式，法兰西共和国才能将这块土地割让给我们，我们的目标才能实现。"



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穆尔

犹太人和律师谁能更巧妙地讨价还价呢？一个非常贫穷的购买者很愿意购买一件值得投资的东西时，绝对不会追求日后的回报，而且为了避免不和，一定会按时付款。除了价格上占便宜之外，卖方还会在交易中间接地获得其他好处。或许交易的财产根本没有市场，或许交易的背后可能有战争的因素在作祟。尽管众说纷纭，但若非碰巧欧洲政治发生了变化，詹姆斯·门罗不可能在谈判中取得成功。当时在法兰西共和国，拿破仑·波拿巴以第一执政官的身份行使皇帝的权力，决心在北美大陆上建立殖民地。美国第一次提出购买领土的建议时，野心勃勃的拿破仑·波拿巴嗤之以鼻。詹姆斯·门罗本来想买通拿破仑·波拿巴身边出谋划策的人，让他们去说服拿破仑·波拿巴放弃自己的想法。在美国西部，民族的愤怒已遍及阿勒格尼河两岸，但若想以此威胁拿破仑·波拿巴这位欧洲的征服者，根本没有多大用处。杰斐逊真是交了好运。詹姆斯·门罗到达法兰西共和国时，在法兰西北部城市亚眠，短暂的和平即将结束，大规模

军事行动一触即发。拿破仑·波拿巴根本然顾不上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当时法兰西共和国国库空虚，财政难以维系战时的开支，拿破仑·波拿巴急于出售这片土地。恰好美国派去的特使们也急着要购买。根据杰斐逊的指示，詹姆斯·门罗只考虑购买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土地。拿破仑·波拿巴想要尽快出售可变卖的资产，马上将钱弄到手。他暗示要高价卖掉路易斯安那的全部土地。双方都渴望交易的时候，交易就能迅速达成。詹姆斯·门罗对杰斐逊的意图把握得十分准确，所以他有恃无恐。过了几天，詹姆斯·门罗和罗伯特·R.利文斯顿不再讨价还价，痛快地以六千万里弗赫 [4] 法币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另外约定，为了满足法兰西商人们各式各样的要求，美国应额外再付二千万里弗赫法币。美国还要赋予法兰西共和国和西班牙的船在新奥尔良港十二年的通行权。

几位特使向国内报告了签订条约的情况，承认自己的行为已超出总统的训令要求。他们谦卑地说，希望自己没有犯错误。几位特使的行为的确超出了总统训令的字面要求，但没有超越训令的精神。詹姆斯·门罗很清楚，杰斐逊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联邦党人后来说，他们认为这次谈判的代表们表现出色，购买路易斯安那可能带来的任何好处都是谈判代表们的功劳，与杰斐逊总统无关。这种诡辩明显有失公允，充其量也只能说杰斐逊总统的计划取得了成功，几位经办人只是依照杰斐逊的意愿行事，所有的功过是非都应算在杰斐逊名下。

联邦党人开始吹毛求疵。他们并不需动多少脑筋，就能对整个交易过程及其细节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宪法中并没有条款赋予总统购买外国领土的权力，也没有赋予政府权力，让政府迅速接受外国领土、将新领土作为新州并入联邦的权力。将新奥尔良港的贸易特权授予西班牙和法兰西共和国更是直接违背了宪法。路易斯安那的边界在东部和西部都有争议，很可能需要战争才能解决。西班牙反复强调，法兰西共和国无权出售这片土地，而西班牙有权拒绝出售。这些批评完全正确。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购买路易斯安那对美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再多的批评也显得苍白无力。反对意见恰恰给杰斐逊提供了许多实用的建议。路易斯安那的边界的确存在争议。这里是蛮荒之地，多年来一直没有明确的边界，但也没有引起严重的敌对行动。在这段时间内，美国日渐强大，西班牙却不断衰落，最终选择了和平，对美国做出了让步。后来，杰斐

逊提议，政府应该提供奖金来吸引大量充满活力而富有智慧的居民到路易斯安那。这里的人口大量增加后，民族性格会逐渐形成。到那时，周边不太听话的邻居便会安分守己。有人说，购买佛罗里达要比购买路易斯安那更好一些。也有人说，难道不能再将佛罗里达也买来吗？杰斐逊指出，美国对边界提出的要求“将是与西班牙谈判的主题，一旦西班牙处于战争状态，我们就可以一方面推波助澜，一方面对其开出高价，利用大好时机，获得佛罗里达全部的土地……有人主张，要用路易斯安那或其中的一部分来交换佛罗里达。我们可以不要佛罗里达，但我们不能把密西西比河的一寸水域让给任何一个国家，因为独立航海权对我国的和平非常重要。如果得不到我们的同意，没有我们的警察监督，绝不许任何国家的船进入波拖马可河或特拉华”。



路易斯安那购买条约签订后美国军官与法兰西军官会面，商谈交接事宜



三色旗降下，星条旗升起，法兰西共和国向美国交接路易斯安那

时间证明杰斐逊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

人们估计，西班牙可能会拒绝向美国交付占有权，而杰斐逊并不想在这件事上小题大做。购买路易斯安那的条约一被国会批准，杰斐逊就“命令密西西比州州长和威尔金森带着军队到新奥尔良，从法兰西总督皮埃尔·克莱门特·洛萨 [5] 手中接管路易斯安那。皮埃尔·克莱门特·洛萨如果愿意执行拿破仑·波拿巴的命令，很可能指挥新奥尔良的志愿军向我们移交该地区的管辖权。如果他不愿意移交，我们就直接占领，然后让法兰西督政府处理自己的事情，获得西班牙的认可，并履行条约将新奥尔

良移交给我们”。



威尔金森接管密西西比地区

杰斐逊轻而易举地推翻了从宪法的角度提出的反对意见。联邦党人理由充足，如果此时与联邦党人辩论，杰斐逊注定要失败。这时，保持沉默并让国会迅速投票决定是最好的办法。事实上，也别无他法。杰斐逊认为：“宪法上的难题说得越少越好，……国会应该在沉默中做必要的事情。国会认为有必要做的任何事情，都尽可能少辩论，特别是在宪法面临的难题方面更要少争论。”作为反对派的联邦党人试图强行展开旷日持久的论战，但收效甚微。绝大多数官员不想听长篇大论，只是想表明他们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是明智的，只是法律并不允许这样做。联邦党人的演讲毫无意义，只提出了几个要答复的问题。在参议院，势力强大的共和党人痛快地以二十四票赞成、七票反对的结果迅速批准了这项条约，超出既定通过票数十票。杰斐逊感到胜券在握。众议院绝大多数议员是共和党人。他们在约翰·伦道夫的坚强领导下，首先要做的事是拨款，然后由杰斐逊总统交付给领土所有国政府。当时众议院给予杰斐逊和前西班牙国王一样大的权力。杰斐逊认为很不合适，但没有拒绝。

杰斐逊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交易，与自己多年来倡导的重大原则以及共和党的政治信仰背道而驰。从今以后，杰斐逊和他的追随者们在总统招待会上，将对乔治·华盛顿贵族气派的仪式，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建立的美国银行，以及对那些所谓的宪法自由解释者和“君主主义者”们扭曲宪法的行为该做出怎样的评价呢？这位来自共和党的伟大总统喜欢高谈

阔论，其所作所为在本质上完全超越了宪法，细节上更与宪法背道而驰，超越了任何“独裁主义者”。“君主主义者”们也只敢梦想，不敢付诸行动。这些事实无可否认。在众议院，约翰·伦道夫掌控绝大多数席位，竟然滑稽地试图将《路易斯安那条约》与美国《联邦宪章》相提并论。显而易见，杰斐逊完全抛弃了自己以前的理论。1800年8月，杰斐逊宣称：“我们宪法的理论无疑是最明智、最好的。各州相互独立，在一切对外事务上联合为一体。”根据这个理论，“我们的政府可以简化为一个非常简单的组织，不用这么大的开销，只需一些人做些简单的服务工作即可。仅为外交的特定目的而设计一个简单的联盟原则，就再好不过的了。”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笔交易与联盟的原则大相径庭，获得的“财产”由联邦共同管理，利益由各州共同分享。这样一来，国内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统一。

杰斐逊反复倡导各州应有独立的权利。无论公开还是私下里，他都直接或间接地表明了这种观点。杰斐逊起草了《肯塔基州决议案》，但肯塔基州拒绝承认联邦法令并脱离联邦的理由，与因购买路易斯安那所造成的东部各州拒绝承认联邦法令并脱离联邦的理由不可同日而语。杰斐逊一直坚称，宪法是独立党派之间的契约，在明确规定的条款之外，对任何一方都没有约束力。依照杰斐逊自己的逻辑，任何一个州都可以合法地退出联邦。

杰斐逊不喜欢前后矛盾，但重申自己的一贯原则时，却常常前后矛盾，就像站在自己曾制造的废墟之中。实际上，杰斐逊抓住了这个特殊的时刻，极力地主张各州的权利，同时还夹杂着一些多愁善感和无用的官话。杰斐逊说，联邦党人“从购买路易斯安那中看到了一个新的联邦正在形成，它包含了密西西比河的所有水域，以及从联邦分离出去的东部地区”。杰斐逊认为这是绝不可能的事。不过，这种形成新联邦的可能性并不能成为阻止购买路易斯安那的理由。因为“在不久的将来，大西洋沿岸和密西西比的居民是我们的同胞。我希望能看到他们在新的联盟中幸福地生活，但事实可能不会如此。如果他们因寻求利益而与联邦分离，我们也要支持密西西比的同胞们。就像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大儿子和小儿子一样，我们还会和他们站在同一边。愿上帝保佑，不要让他们与联邦分离，若他们从联邦分离会生活得更好，分离也未尝不可”。杰斐逊

坚定地拥护各州的权利。杰斐逊的州与联邦分开治理的政治智慧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中很有道理。大约六个月后，杰斐逊用通俗的话语重申："不管我们继续是一个联盟，还是要组成大西洋和密西西比联盟，我认为这对大家的幸福都不是很重要。西部的民众和东部的民众一样是我们的同胞。"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停下来思考，假如在1861年杰斐逊会向民众灌输什么样的思想？他会不会还坚持"和平相处"呢？那倒不一定，因为杰斐逊总是自相矛盾，只做他认为明智的事情，根本不会考虑所做的事情受不受欢迎。

以上问题很容易让人们误解杰斐逊。然而，每个人都必须承认，政府应该购买路易斯安那。同时也必须承认，根据共和党人的理论，购买路易斯安那是应该被禁止的行为，但不能因购买路易斯安那而废止共和党的理论。从法律的角度讲，购买行为是不合法的，但无论宪法有什么规定，购买路易斯安那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杰斐逊个人而言，命运女神最喜欢做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让他成为最伟大的政治家和最明智的哲学家，又让他必须在合理的抽象原则和与之相矛盾的理智行为之间做出选择。杰斐逊感到进退两难。他的所作所为与伟大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也没什么大的分别。杰斐逊抛弃了自己确立的政治原则，做了该做的事情。我们会发现，杰斐逊做事时总是考虑明智不明智，很少考虑合不合逻辑。他只管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而不管自己的行为是否前后一致。当然，人们也为此公开指责和嘲笑杰斐逊。全国各地，联邦党人谩骂连篇，抨击杰斐逊由民主主义者变成了独裁者。他们轻蔑地指责，杰斐逊原本是严格的宪法解释者，但一下子把宪法抛到了九霄云外。杰斐逊默默地忍受着这些冷嘲热讽。杰斐逊的政治哲学在人们的苛求中显得有些牵强，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声望却越来越高。杰斐逊说："购买路易斯安那的条约几乎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联邦党人投了反对票，但现在他们的认数少得可怜。"民众的大力支持可能促使杰斐逊抛开法律我行我素，但他能很好地把握自己，并没有产生过我行我素想法。杰斐逊通常能辩证地看问题，并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举重若轻地处理问题。面对和蔼可亲的民众，他不想对这笔交易做过多的粉饰。杰斐逊坦率地承认，自己违背了宪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必须得这么做。杰斐逊又诚实地说，即使事情仍悬而未决，自己也要抛开国会中官员们提出的诡辩：

宪法没有规定我们拥有外国的领土，更没有规定把别的国家并入我们的联邦。政府抓住了转瞬即逝的机会，为国家谋得了极大的利益，同时其行为超出了宪法的规定。立法机关像是冒着危险忠实于国家的仆人。他们背后暗藏玄机，必须批准《路易斯安那条约》并为其支付费用。为了国家，他们必须考虑国家的利益，积极处理一些宪法并没有授权的事。

杰斐逊有自知之明。他认为应该尽快制定宪法修正案并得到民众的正式认可。杰斐逊甚至草拟了一份宪法修正案，并向内阁和国会的朋友们暗示，希望自己草拟的宪法修正案能顺利通过。可内阁和国会的人不像杰斐逊那么谨慎，也不太关心杰斐逊的修正案，所以暂时搁置了此事。也许杰斐逊本不必急于修改宪法，但他没有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

从某种程度上说，杰斐逊基本上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他相信民众的意愿，始终为民众谋利益。杰斐逊尊重宪法，因为宪法正式表达了民众的意愿并在很大程度上保全了民众的利益。关键时刻这白纸黑字的成文法律并没显现出这些鲜明的特点，似乎失去它应有的约束力。杰斐逊很难科学准确地表达民众的意愿，但如果说他以实现民众的意愿为幌子，借购买路易斯安那这件事故意去违反宪法、反对宪法，确实荒谬至极。如果立即进行投票，通过必要的宪法修正案，购买路易斯安那的将在一周内完成。杰斐逊的所作所为虽然正确，但他也是冒险做了先人们未曾做过的事。历史表明，购买路易斯安那的过程中，作为一个政治家，杰斐逊无疑始终在奉行教条主义式的空论。对杰斐逊怀有敌意的人至今不认同他的观点。

注解：

[1] 古弗尼尔·莫里斯（1752—1816），美国政治家、开国元勋和外交官，曾任美国驻法大使，1787年参加美国制宪会议，美国宪法签署人之一。——译者注

[2] 罗伯特·R.利文斯顿（1746—1813），美国《独立宣言》五人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美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在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时起了关键作用。——译者注

[3] 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穆尔（1739—1817），法兰西作家、经济学家、出版商和政府官员。法兰西大革命期间他移民美国。——译者注

[4] 里弗赫，法国旧时流通的货币单位，当时1里弗赫价值相当于1磅白银。——译者注

[5] 皮埃尔·克莱门特·洛萨（1756—1835），法兰西著名政治家，第二十四任路易斯安那总督。——译者注

第15章
弹劾法官与再次当选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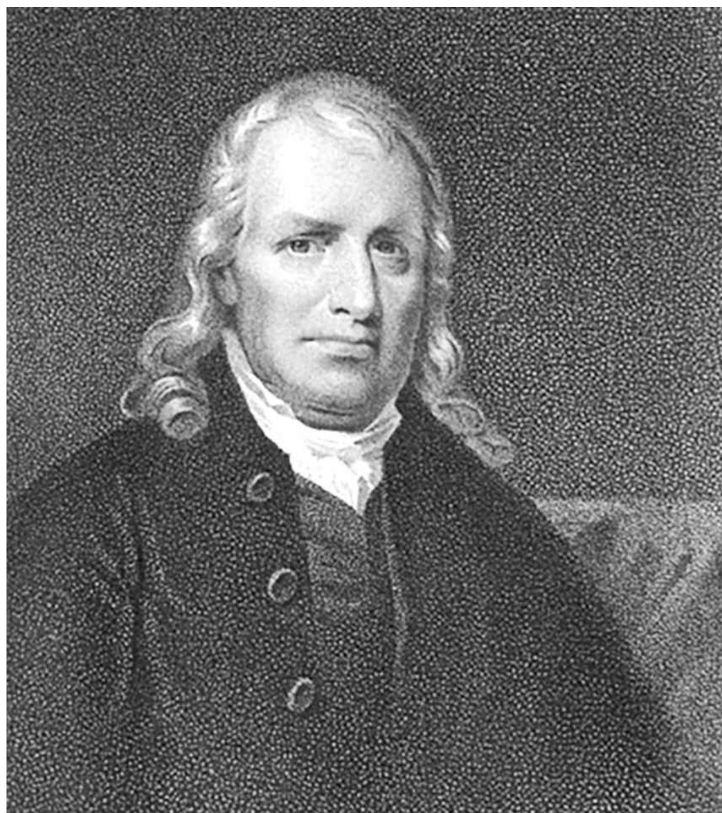
精彩看点

指控皮克林——弹劾塞谬尔·蔡斯——约翰·伦道夫的缺点——个人权威——政绩斐然——精简节约的政策——下一届总统候选人——总统任期——连任的理由——共和党内部的纷争——再次当选总统

杰斐逊深恶痛绝的人有三类：一部分“独裁主义者”、新英格兰牧师，还有美国法官中的联邦主义者。在这三类人中，法官们又首当其冲。联邦党人操控着法庭，杰斐逊早就对此心存芥蒂。杰斐逊准备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彻底改革司法机构，深刻地教训那些长期占据法官

席位的人。杰斐逊给众议院写信，揭露了新罕布什尔州地方法院法官皮克林的丑恶行径，指出他是一个道德败坏、精神颓废的家伙。皮克林立刻被众议院依法定程序弹劾到参议院，被判有罪并免职。联邦党参议员们投票支持这位不幸的被弹劾者，也无济于事。

牛刀小试之后，更高级别的弹劾主要针对马里兰州最高法院法官塞缪尔·蔡斯进行。塞缪尔·蔡斯为人正直且能力超群，是极端的联邦主义者，向陪审团提出指控时也不能排除联邦主义偏见。毫无疑问，塞缪尔·蔡斯犯了严重的错误。作为法官，他的行为有失偏颇，不可容忍。据说，塞缪尔·蔡斯曾收过一笔非正当的佣金，但该说法无法得到证实。塞缪尔·蔡斯的所作所为未曾引起过什么实际不良后果，只是有损公务人员的形象，尚不知能否作为弹劾他的理由。杰斐逊及其追随者们下定决心要试一试。一方面为了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塞缪尔·蔡斯个人的做法让共和党人十分愤怒。因为塞缪尔·蔡斯最近向大陪审团发表演讲，严厉指责共和党废除《司法条例》的行为。无论这长篇大论式的演讲多么不合理，也不能作为弹劾他的有力证据。于是有人就其他问题对塞缪尔·蔡斯进行指控。共和党人重新审视了近五年内对弗里斯和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的审判，发现塞缪尔·蔡斯明显表现出的政治偏见可以作为指控他的证据。这些都是老掉牙的故事，如果事情真如所说的那么可恶，共和党人当时就不该粗心大意，应以此为契机推行官员免职。过了这么长时间，又将其拿来作为指控的证据，充分说明了共和党人所采用的证据说服力不强。共和党人广泛收集塞缪尔·蔡斯的不当行为。这些行为或许足以证明塞缪尔·蔡斯不配做一名法官，但参议院要确定的不是塞缪尔·蔡斯适不适合做司法工作，而是根据证据判断他是否真的有罪。



塞缪尔·蔡斯

杰斐逊很精明，也有点私心。他渴望得到满意的结果，认为既然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就得小心谨慎。凡事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杰斐逊不愿去冒这个险。杰斐逊或许认为，自己在政治上的威望就如战场上将军的生命一样重要，决不能因自己的声望受损而殃及党众。弹劾塞缪尔·蔡斯的过程中，杰斐逊并没有像弹劾皮克林那样提出清楚完整的建议，只是偶尔暗示一下。约翰·伦道夫是杰斐逊忠实的追随者。他性子急，做事不大谨慎，缺乏判断力，常常糊里糊涂地陷入争辩之中。乔治·尼古拉是约翰·伦道夫的朋友，也是下议院的主要成员。1803年5月13日，杰斐逊让乔治·尼古拉捎信给约翰·伦道夫，信中写道："你一定知道巴尔的摩市向大陪审团指控塞缪尔·蔡斯的案件非同寻常。煽动别人攻击宪法所确立的原则，以及攻击参议院的诉讼都要受到应有的惩罚。像你这般鲁莽草率，会给别人留下许多指控你的把柄。请你务必考虑这些问题，我还是不干涉为好。"在弹劾过程中，杰斐逊只是一个饶有兴趣的旁观者，并没有涉足其中。看到资深的法官、雄辩的律师为约翰·伦道夫罗列的许多

罪名，杰斐逊非常失望。随着事情的发展，杰斐逊不得不承认，只有毫不手软地发挥政党的力量，才能促使三分之二的参议员将弹劾继续进行下去。由于弹劾的证据不是太充分，杰斐逊也不敢向国会施加压力。约翰·伦道夫在激烈的辩论中失利后，杰斐逊暗自恼火，并未明确表态。执政党在辩论中被击败了，可其精明的领导人却显得很中立。杰斐逊的朋友所犯的错误并没有影响到杰斐逊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杰斐逊从此事中得到深刻教训，再没有进一步干涉法官席位。他的政治理论在别处都成功得以实践，在弹劾法官时却遭遇了障碍。

在第一届总统任期内，杰斐逊虽然政绩斐然，但觉得已取得的成功远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国家治理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显赫一时的联邦党人似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首都洋溢着轻松愉快的气氛，深深影响着政府内部的各个机构。人们甚至认为陆军和海军的设立都失去了实际意义。共和党人在政党建设方面效果显著。他们领导的政府机构内有前届政府留任的官员，也有任命的新人。在处理重大问题上，民主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杰斐逊是民主主义者，但他比“独裁主义者”约翰·亚当斯更善于运用个人权威。事实上，自乔治·华盛顿以来，没有哪个总统能像杰斐逊一样直接能对国会发号施令，也没有一位总统像杰斐逊一样让民众百依百顺。当时的人们却不这么认为。国会议员不认为他们在接受命令，民众也丝毫不觉得别人在领导他们。杰斐逊从不发号施令，更没有领导的架子。他潜移默化地以奇特的方式影响着国家和民众。杰斐逊只是同信任他的个别人谈一些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在落实杰斐逊的建议和意见时，别人没有被强行约束的感觉，反而对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充满莫大的敬仰和无限的信任。在人们心目中，杰斐逊处事明智，品德高尚，尤其在谋求党派利益时，他的精明与智慧更显得无与伦比。正是在这个时候，共和党更名为“民主党”，共和党人不再称自己为“共和主义者”，取了更加独特的名称“民主主义者”。这个更改后的名称至今还在使用。名称虽已更改，但共和党的本质特征依然如故。联邦党却因为党的原则发生变化，多次分裂，几易其名。联邦党人宣称自己是民主原则的守卫者。实际上，他们经常将自己置于个别人的独裁之下。联邦党曾改名为“辉格党”，后来又改为现在所用的名称“共和党”。联邦党中间没有一个人像杰斐逊或安德鲁·杰克逊一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民主主义者似乎在一位独裁者的统治之下显得强大无比，并

且也习惯于这种统治方式。

执政四年来，杰斐逊所宣扬的政治理论概括抽象，但他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毫不含糊。杰斐逊穿着朴素，在别人都关注他的场合尤其如此，好像是故意为之。人们看到乔治·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时期君主式的招待会已成为历史。杰斐逊裁减军备，改革军队，只保留了很少一部分军事力量。联邦主义者认为海港防务需要加强，海军也应具备一定的规模。杰斐逊在各个部门推行精简节约的政策。令人讨厌的国内税被取缔，财政收入大量增加，以惊人的速度偿还了国家债务。这些成就的取得，除了政府节约外，还得益于高效的财政管理，根本原因是国家强大、经济繁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健全的经济体系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在政治上，杰斐逊是一位“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他虽然不承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像一位播种者，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但自己却像一位收获者，坐享其成。人们不再对欧洲的混乱状态感到焦虑，但这并不是杰斐逊的影响所至。好运垂青于杰斐逊，他一时名声大噪 [1] 。看到眼前的大好光景，人们往往不会考虑事情的前因后果，觉得自己生活安逸，处在太平盛世，自然会对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奉上溢美之词。若不是杰斐逊提倡节俭而摒弃联邦主义者的财政政策，国家开支将居高不下，税收不会减少，也不可能迅速偿还国家债务。杰斐逊渴望与其他国家建立和平的外交关系。几年来，美国远离了外交事务中滋生的各种矛盾。杰斐逊温和的执政理念渗透到美国的每一个角落，全国上下安定团结。友好善良是杰斐逊一生的夙愿。他执政四年来，国力昌盛，经济繁荣，国家安宁，民众对政府毫无半点怨言，政治上的反对派逐渐销声匿迹。联邦党正日薄西山，尽失往日雄风，活动范围非常有限。联邦党党众们似乎生来就牢骚满腹，没有他们满意之事。他们的势力已微不足道，根本不像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



讽刺漫画《宪法的支柱》：两个醉汉晃晃悠悠地从酒馆走出。寓意联是联邦党就像头脑糊涂的醉汉一样

1804年2月底，国会中的共和党成员召开秘密会议，提名杰斐逊为下一届总统候选人。他们决定不再支持阿伦·伯尔，于是提名乔治·克林顿[2] 为第二总统候选人。杰斐逊本不想连任，但共和党内部都支持他。因此，他也无法拒绝。有人指责杰斐逊说一套做一套，本想继续任总统，还要找出体面的借口。杰斐逊最初的观点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任期应为七年，期满后再无当选总统的资格”。他又“觉得七年任期时间太长，中间又不能离职……如将任期定为八年，每四年选举一次，符合自己的想法，实践证明也是可行的”。杰斐逊高兴的样子可能在最狡猾的耶稣会信徒的心中也会播下嫉妒的种子。按照这一原则，杰斐逊补充道：“乔治·华盛顿总统在八年任期结束后退休，为我们树立了好的榜样……我也会像他一样在第二任期结束时退休。有了更多这样的先例，以后谁想设法延长自己的任期都无法进行。”上面是杰斐逊的抽象理论，以下才是他连

任总统的动机：

> 我初任总统时就想在本届任期结束时退休，过一种平静的生活。可联邦党没完没了的诽谤迫使我不得不服从国家和民众的意愿，继续努力奋斗。这是联邦党人在强迫我连选连任，我对此深感遗憾。今后四年里，如果我们的国家像一艘大船稳稳当当地沿着她的航向前进，我就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可以自由地享受天伦之乐，去照顾家庭，经营农场，读一读未曾读完的书。

由此看来，联邦党人倒是要感谢其憎恨的政治对手能够连任总统。他们一定能从声明中看到杰斐逊不想连任，从而得到莫大的安慰。

像“共和党”或者称“民主党”这样人员众多、势力强大的政党，长期以来难免内部纷争。共和党早已显露出一些分裂的迹象。阿伦·伯尔的追随者们认为，让别人取代阿伦·伯尔竞选总统的资格是对阿伦·伯尔的侮辱。在纽约，部分共和党人争论不休。在宾夕法尼亚，共和党内部的纷争已充满了敌意。东部各州的共和党人也对弗吉尼亚人的权势感到厌恶。联邦党人似乎看到了希望，乘机浑水摸鱼，怂恿共和党内相当一部分愤愤不平者与共和党决裂，与自己结成同盟。有了这些重要的伙伴，联邦党人就可以卷土重来。杰斐逊早就意识到这些阴谋诡计，但他只是轻蔑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并没有说什么。选举中，全国的共和党人团结一致，以绝对优势获胜。就连马萨诸塞州的选票也投给了杰斐逊。联邦党人既惊讶又懊恼。选举结果表明，共有一百六十二票投给了杰斐逊和乔治·克林顿。十四名忠实的联邦党人将票投给了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和鲁弗斯·金 [3] 。共和党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注解：

[1] 杰斐逊毫不犹豫地称赞自己执政以来所取得的成就。1802年4月，他写道：“共和党自召开第一次国会会议执政以来，已快四年了。在这段时间内，民众团结一致，他们的愿望得以满足。海陆两军大幅度裁减，政府机构精简，行政人员再无特权。在这些节约性政策下，国内税收已取消，可国家仍有能力在十八年内偿还所有公共债务。联邦党人执政期间，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在司法机关安插了大量像寄生虫一样的官员，他们无所事事，全被免职。美国敞开怀抱迎接其他国家因受压迫而逃亡的人们。所有的繁文缛节都被废止，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政府形象。”——原注

[2]　乔治·克林顿（1739—1812），美国军人、政治家，民主共和党成员，曾任纽约州州长、美国副总统。——译者注

[3]　鲁弗斯·金（1755—1827），美国政治家、外交家、联邦党领袖，大陆会议代表，1787年美国宪法的签署者之一。——译者注

第16章
约翰·伦道夫背弃杰斐逊和阿伦·伯尔叛国



精彩看点

辉煌中的忧虑——坚持中立——在和平中发展——美国的两难处境——西班牙的威胁——约翰·伦道夫背叛——民众的深思——叛国阴谋——阿伦·伯尔受审——法庭指控——宪法的首要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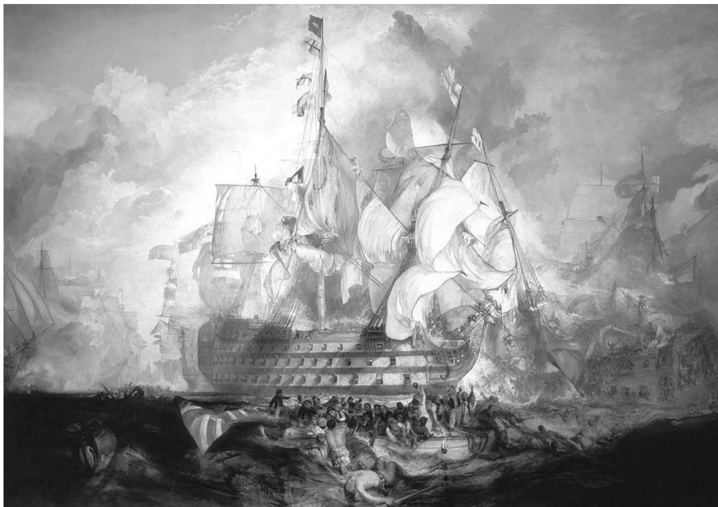
自执政以来，杰斐逊好运连年。他领导的政府受到人民空前的拥护，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切随着1804年选举的辉煌胜利达到了顶点。如果杰斐逊是寓言故事中聪明的王子，他肯定为自己的好运感到吃惊。他不知道自己的聪明才智能持续多久，但知道辉煌的成功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很快就会过去。显然，杰斐逊并没有不祥的预感，在第二任期中表现得泰然自若。杰斐逊的这种性格不是个人虚荣，也不是批评者们所谓的唯我独尊。杰斐逊坚信自己的执政理论建立在永恒的真理之上，在实践中取得成功，自己获得声望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知是自负还是自信，杰斐逊从心底里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恩于人类。别人的怀疑随之而来，杰斐逊深感疑虑。从以往的经验可知，不管杰斐逊获得怎样的政绩，都不可能将繁荣长期延续下去。

詹姆斯·门罗和罗伯特·R.利文斯顿购买路易斯安那后不久，欧洲又爆发了战争。战争范围进一步扩大，美国难免经历拿破仑·波拿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欧洲的海军习以为常地四处掳掠，无法无天，对美国的贸易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在第二届总统就职前的几个月里，杰斐逊也听到过民众的抱怨之声。杰斐逊坚定而乐观，决心不偏不倚地保持中立。他相信自己的坚持会得到回报，美国的中立权利也将受到应有的尊重。乔治·华盛顿执政时期，杰斐逊对法兰西情有独钟，显得很不中立。多年来，看到法兰西人不遗余力地支持拿破仑·波拿巴的事业，杰斐逊对法兰西的好感逐渐消失，觉得美国更应该与英国交好。杰斐逊尊重英国的地位，因为英国是拿破仑·波拿巴军事专制的主要障碍。早在1802年10月，杰斐逊就曾给罗伯特·R.利文斯顿写过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说："正式向你通知……我们再不能认为法兰西共和国和我们之间还有友谊。"1803年夏，杰斐逊说："我们密切关注英国所处的地位。英国就像对抗洪流的堡垒，一直压制着法兰西共和国。如果人类真要面临拿破仑·波拿巴带来的灾难，只有英国能独当一面……我们认真对待与英国的关系，对法兰西共和国也没有敌意。对英法两国，我们都一视同仁，以诚相待。我们不会像前辈们一样想从他们那里获得什么。"面对英法两个敌国，杰斐逊"感到有点恐惧，好像自己已经与欧洲的政治联系在了一起"。杰斐逊希望欧洲国家打仗时，美国能作壁上观，不偏不倚地保持中立，抓住机会，利用中立国的地位，通过各种渠道发展商贸，迅速积累财富。美国要通过和平获得财富，变得强大。杰斐逊怀着梦想愉快地写道："我们都能看到那一天，其他国家在海上应遵守的法律将由我们来制订。与此同时，我们已经签署的每一项条约都不得再改变。"杰斐逊的中立政策很明智，值得尊重。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随着人口增加、财富积累和工业全面发展，美国国力空前强大，这就是杰斐逊当时追求的目标。

当时，杰斐逊的心态就像是教友派信徒设法与愤怒的拦路强盗进行友好的交易。这种心态决不能长期保持。杰斐逊的理性和温和的主张像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一样，深深影响着那些愤愤不平而追求个人利益的好战分子。对他们来说，和平和中立是可恶的言辞。英国内阁提出，美国如果不做英国的盟友，就是英国巡洋舰掠夺的对象。法兰西帝国[1]也在奉行同样的政策，但杰斐逊毅然致力于安定和繁荣，推行中立政策，坚持抗议和谈判。杰斐逊不断向英国表达善意。他说："英美两国本

是朋友，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如果执意要把他们分开的话，那么英美两国的领导人一定是没头没脑的笨蛋。”杰斐逊坚定的友善换来的却是英国的暴力和抢劫，让人难以容忍。1805年10月21日，特拉法加海战爆发，英国在海上独霸天下，美国的处境更加艰难。

杰斐逊第二任期的第一年，在法兰西帝国的支持下，西班牙威胁美国，要在路易斯安那东部边界上制造严重的麻烦。杰斐逊很恼火，做好了打仗的准备，但他坚守一贯的原则，更愿意和平解决问题。1805年12月6日，杰斐逊要求众议院像购买路易斯安那一样批准一笔拨款，该拨款由他自由支配。行政主义者们对此既惊讶又困窘。众议院委员会做出了一份与杰斐逊的指示精神完全不同的报告，委员会主席就是约翰·伦道夫。这份反常的报告确实令人震惊。约翰·伦道夫一贯领导众议院支持政府。他勇猛果敢、能力出众，很有影响力。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些优点使约翰·伦道夫后来成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在通过购买路易斯安那的法案时，约翰·伦道夫对逻辑和法律不屑一顾，是杰斐逊最坚定的支持者。在塞缪尔·蔡斯弹劾案中，约翰·伦道夫受到了严厉的斥责，经历了惨痛的失败，但表现得十分勇敢。这说明他是杰斐逊最忠诚的追随者。这次，约翰·伦道夫突然站在了杰斐逊的对立面，滔滔不绝地责骂杰斐逊，反对他的政策，指责他的政治操守。杰斐逊因约翰·伦道夫这种奇怪的行为大吃一惊。若要购买佛罗里达，杰斐逊总统有权得到与购买路易斯安那时同样的支持。杰斐逊在思忖，约翰·伦道夫的叛离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杰斐逊焦虑不安地看着众议院的辩论，看到投票结果后才安心。在约翰·伦道夫的召唤下，众议院共有十一人背叛了，但仍有八十七人支持杰斐逊总统。约翰·伦道夫显然高估了自己的个人影响力，十一个追随者并非全都对他忠心耿耿。约翰·伦道夫的目的不仅在一件事上与杰斐逊相悖，而是要站到杰斐逊对立面上，一条道走到黑。杰斐逊宣布，众议院议员们“应一如既往地工作。一位杰出领导人的背叛使议员们陷入沮丧和困惑。他们很快又团结一致，坚持自己的原则。约翰·伦道夫只带着自己的五六个追随者与别的议员分道扬镳……从这次分裂中我们得到了警示，如果掉以轻心，我们内部就可能不再和谐团结。总的来说，各位议员能够坚守原则，使我对政府的稳定更有信心。我更加确信，无论何时，一旦政府出现问题，民众将和平地行使他们的选举权，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利”。



特拉法加海战



特拉法加海战

多么经典的话语啊！随着岁月的流逝，杰斐逊变得越来越乐观。

约翰·伦道夫的所作所为没造成多大的政治影响，却引起了民众的深思。约翰·伦道夫不自私也没有失望，而是真正不满政府的事务。正如杰斐逊所言，约翰·伦道夫在政治上是一个纯粹主义者。约翰·伦道夫信奉共和，衷心地追随杰斐逊。他相信在这位英明的共和党领袖的影响下，纯粹的政治行为将会盛行。随着共和党逐步取得胜利，约翰·伦道夫慢慢从错觉中醒悟过来，看到自己所崇拜的偶像用的正是政客们惯用的手段，政府事务像联邦主义者执政时一样糟糕。这位急躁的改革家既痛苦又愤

怒。约翰·伦道夫明白，最好的办法是抛弃这不守誓言的总统。如依批评家所立的标准来看，约翰·伦道夫对杰斐逊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并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从约翰·伦道夫对杰斐逊的苛评中得知，执政早期，杰斐逊不该对自己不应该插手的事情指手画脚，并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希望。杰斐逊曾梦想过、承诺过要遵守政治原则并言行一致，但没有把梦想变成现实，也没有遵守诺言。事实上，杰斐逊也曾努力过，但不幸地发现自己的梦想和诺言在现实的政府中根本不可能实现。他认为理想的政治科学还没有形成。

1805年到1806年又发生了一场骚乱。阿伦·伯尔胆量过人，政治抱负远大，有独特的个人魅力，更有操纵政治的天赋。不过比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阿伦·伯尔还有一定的差距。阿伦·伯尔认为，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处处敌视、排挤自己。阿伦·伯尔在选举中没能扭转局面，又在决斗中射杀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2] ，使自己的处境变得更糟，感到懊恼无比。阿伦·伯尔下定决心，宁可叛国也不能在政治上失败。他不惜给国家带来政治动乱和经济损失，炮制了臭名昭著的计划。阿伦·伯尔想占领墨西哥，坐上“蒙特祖玛二世 [3] 的宝座”，并把阿利根尼山脉以西的所有领土全都吞并。阿伦·伯尔的阴谋未得到及时控制，谣言在疯狂流传。杰斐逊没有放松警惕，凭借自己超强的判断力，对事情的结果似乎有十足的把握。实际上，杰斐逊的预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阿伦·伯尔微薄的势力很快被粉碎，以“叛国罪”被捕。

当阿伦·伯尔被带到里士满受审时，杰斐逊总统对法律程序很感兴趣。联邦主义者完全忘记了阿伦·伯尔手上曾沾满了一名在联邦党内功勋卓著的杰出人物的鲜血。这位杰出人物曾为联邦党赢得过莫大荣誉。联邦主义者清楚地看到，只要阿伦·伯尔的计划有一项获得成功，就会使杰斐逊政府颜面尽失。联邦主义者觉得阿伦·伯尔很不幸，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表达了他们的钦佩之情。他们假惺惺地把阿伦·伯尔当作无辜的人，认为他因为私人之间的恩怨而受到杰斐逊的迫害。联邦主义者口是心非，不会成为阿伦·伯尔真正的拥护者。杰斐逊特别愤恨阿伦·伯尔的所作所为。惩罚这位叛国者也许会平息杰斐逊心中的怒火。阿伦·伯尔的犯罪行为已成事实。作为总统，杰斐逊要求给阿伦·伯尔定罪是职责所在，其中有个人的感情成分，也尊重了民众的意愿。根据既定的规则，总统

有权对阿伦·伯尔的行为质疑。联邦党人的行为非常可耻，宁可不计较阿伦·伯尔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谋杀行为，也不让杰斐逊得到半点好处。



阿伦·伯尔射杀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蒙特祖玛二世

杰斐逊认为，阿伦·伯尔的叛国罪行是不争的事实，在约翰·马歇尔主持的法庭上不会有任何不当的影响。杰斐逊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审判过程。他无权这样做，只能把想到的事实或建议告诉政府律师。杰斐逊关注着整个审判过程，对其中的一些事件愤愤不平。例如，路德·马丁公开在法庭上支持阿伦·伯尔，指控杰斐逊总统使用“暴君式的命令”，“违背了宪法和法律”，千方百计地“毁坏一位无辜之人的生命和财产”。实际上，路德·马丁本人并不清白，人们怀疑他曾与“备受尊敬的朋友”阿伦·伯尔勾结。被告人的律师提出申请，要求法院发出传票，迫使杰斐逊亲自出庭作证，并携带战争部的文件和记录。法院批准了这一请求，但承认

无权强制执行传唤。杰斐逊对这种权利的主张非常生气，因为法律并没有强制性规定。杰斐逊准备向法庭提交全部相关文件，但拒绝了法院出庭作证的要求。当时人们如果敢质疑约翰·马歇尔的裁决，要么是对法官职业的亵渎，要么就是胆大包天。这种说法似乎出自联邦主义者之口，约翰·马歇尔不可能说这种话。如果约翰·马歇尔所有的裁决公开受到批评和怀疑，将有辱他的名声。

杰斐逊在给乔治·海伊的信中写道：

> 约翰·马歇尔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所有人都应服从传票，除非能在他的法律书籍找到不服从的依据，否则无一例外……根据宪法，总统在六百万人民的关注之下行使职权。法律的效力在宪法之下，法院不能对总统呼来唤去，因为总统代表的不仅是他个人。我们可以把约翰·马歇尔自己的学说应用到他和同党身上。根据法律，联邦法官也是各州治安官的组成部分。假如亨里科郡的治安官从法官席上召唤约翰·马歇尔来平息亨里科郡某处的骚乱，约翰·马歇尔会放弃主要职责而履行次要职责吗？同样，新奥尔良或缅因州的法院用传票命令所有最高法院的法官出庭，这些法官们会执行吗？他们能放弃法官的职位，放弃数百万人的利益而去为个人服务的吗？美国宪法的首要原则是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机关相互独立。法官们常对此忌妒不已。如果听命于司法机关，总统会因不服从命令而受监禁；如果几个法院都呼来唤去，那么总统难免会拖着疲惫的身躯在全国各地东南西北来回跑；宪法赋予总统的职权也会被完全撤销。如此一来，行政机关还能和司法机关相互独立吗？



路德·马丁

如果阿伦·伯尔没有因失去监禁而逃到国外，在俄亥俄州就受到审判，那么杰斐逊的论述就会成为坚强有力的范例。当时，英国巡洋舰在弗吉尼亚海岸虎视眈眈，美国与英国的关系危如累卵，总统坐镇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杰斐逊听从了传票的召唤，肯定会远离首都出现在审判现场，国家利益就会受到很大损失。杰斐逊对约翰·马歇尔的决定漠然置之，传唤最后不了了之。只有联邦党人将杰斐逊的行为作为指控他实施暴政、违法乱纪的有利证据。

本案最终审判结果宣布时，杰斐逊指示政府律师乔治·海伊，待证人们把所有证词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后，再支付报酬遣散他们。杰斐逊说：“整个诉讼过程的所有记录都要提交给国会，以便他们确定本案在犯罪证据、法律适用方面有无瑕疵。这些记录还能为过去和未来的案件提

供参考。”杰斐逊言出必行，随后做出指示，义正辞严地呼吁国会关注此事。在杰斐逊的努力下，国会通过了一些关于叛国罪的立法，但未涉及对阿伦·伯尔的特殊审判，也未牵扯到任何与此案有关的人。显然，一个案件产生的深远影响要比惩罚一个犯罪之人更应受到关注。

注解：

[1]　1804年11月6日，法兰西公民投票通过《共和国十二年宪法》，宣布拿破仑·波拿巴为法兰西皇帝，法兰西帝国建立，历史上称之为“法兰西第一帝国”。——译者注

[2]　在1800年总统选举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支持杰斐逊，阻止阿伦·伯尔当选。阿伦·伯尔耿耿于怀。1804年，阿伦·伯尔竞选纽约州州长时，受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公开指责。竞选失败后，阿伦·伯尔要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收回指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拒绝收回。阿伦·伯尔提出了决斗的挑战。1804年7月11，两人在新泽西州的维霍肯决斗。阿伦·伯尔一枪打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胸部。1804年7月12日凌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去世。——译者注

[3]　蒙特祖玛二世（1466—1502），古代墨西哥阿兹特克帝国君主，曾一度称霸中美洲，最后却被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蒂斯打败，导致阿兹特克帝国灭亡。——译者注

第17章
海上的困境与禁运政策



精彩看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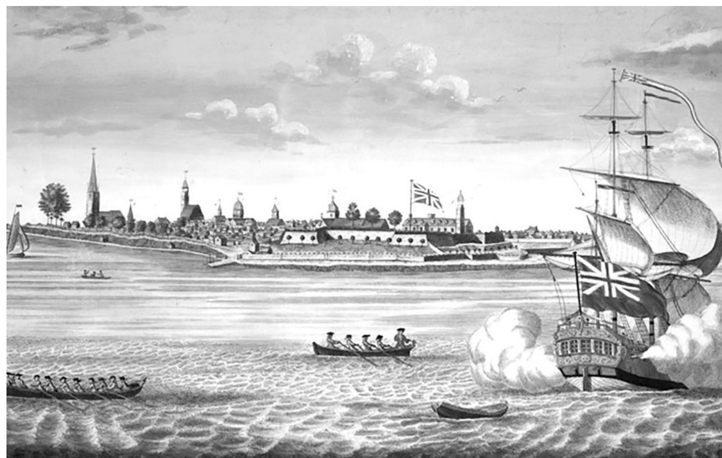
航运危机——“奎兹”联盟——桑迪岬岛事件——美国的海军——是否应该降低关税——内部改良学说——与英国的条约——“切萨皮克”号事件——《禁运法案》——美国的损失——禁运的理由——禁运政策的废除——载誉而退

滚滚的乌云笼罩着大西洋。无论哪位心地善良、热爱和平的执政者，都会对这儿发生的不幸之事怒不可遏。杰斐逊对欧洲列强别无他求，只希望美国能够独立发展，不要与欧洲纠缠在一起。法兰西帝国和英国不愿意让美国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拿破仑·波拿巴不可能容忍美国中立。英国也露出了贪婪的本性，对美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垂涎三尺，既要自己获得利益，又要遏制美国的发展，想蛮横无理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全然无视国际法和人权的存在。1804年11月，杰斐逊不得不承认，即使在美国的港口，美国船也难免受到英国大炮的威胁。法兰西帝国同样做好了劫掠的准备，只不过还没有和美国撕破脸皮。杰斐逊总统满怀希望地说：“各国政府与我们友好相处，认同我们的和平外交政策。他们的官员和臣民都奉行这样的政策。大家在其他方面也无多大分歧。”杰斐逊的希望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年之后，事情变得更加糟

糕。在1805年3月的一份信中，杰斐逊非常不满地说：

> 我们的沿海地区被侵扰，港口被私人的武装船只监视。其中有些是无组织行为，有些是非法行为，还有些行为看似合法，但没有得到合法组织的授权。英法两国在美国的港口以及公海上抢掠美国生意伙伴的货船，而且连美国货船也不放过。他们打着法律裁决的幌子将船只带走。可他们哪敢接近法院，只是顺手将船只洗劫一空，在偏僻之地击沉船只，让别人无据可查。美国船员受到虐待，被丢弃在公海上或荒芜的海岸上，缺吃少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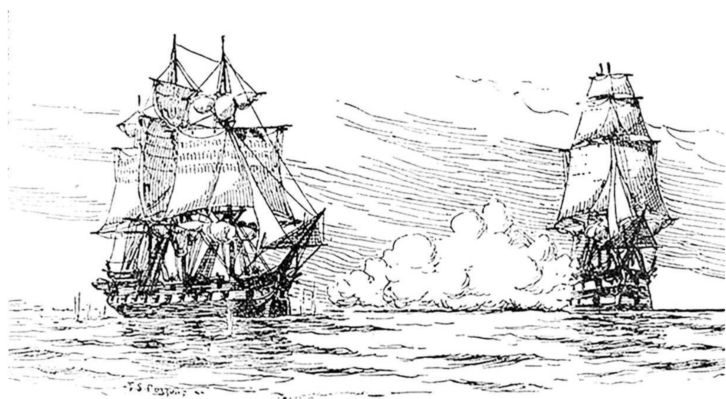
1806年1月17日，杰斐逊不得不就同样令人恼火的话题再一次发表言论，并提到“纪念几位美利坚商人”的问题。随后的争论中，来自新英格兰商业区的联邦党人与约翰·伦道夫以及六名追随者组成了一个叫“奎兹”的独特联盟。约翰·伦道夫大胆地宣称，那些怨声载道的种植庄园主和东部的商人并无共同利益，“美国是个农业大国，如任由塞勒姆、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诺福克和查尔斯顿几个地方任意摆布的话，民众自有公论”。新英格兰的联邦主义者和约翰·伦道夫反对政府的理由如出一辙。他们本没有共同的目标，联合起来也无济于事。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绝大多数人支持杰斐逊总统的措施。该措施明确指出，1806年11月15日以后，禁止从英国本土进口特定商品，也不能从其他地方进口英国制造的商品。拥有无限权力的杰斐逊先生可能会说：“参议院的多数席位意味着一切措施都能够顺利实施……众议院的状况也和以前一样好。”杰斐逊很清楚贸易带来的压力，但还是坚持执行自己的措施。



早期的纽约

令人惋惜的是该措施并未奏效。相关法案通过后不到一个月，在美国桑迪岬岛附近，英国“利安德”号军舰向美国一艘近海贸易货船开火，导致一名男子死亡。杰斐逊命令“利安德”号军舰驶出美国水域，并下令逮捕该舰的指挥官。杰斐逊担心自己太过温和的措施可能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于是写信给美国驻英公使詹姆斯·门罗，让詹姆斯·门罗向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 [1] 先生新成立的友好内阁提出强烈抗议。杰斐逊说：“民众要求我们比以前更加有所作为。绝不能让新成立的英国内阁以为我们期待他们做什么，绝不能让他们把这件事看作是其先辈们的措施带来的后果，更不能让他们认为我们在请求他们改变这些措施。希望英国内阁能妥善处理此事。”显然，杰斐逊忘记了英国人的本性，但也没有万全之策来对付这些邪恶之人。有人说，在这个关键时期，如果不是杰斐逊倡导和平，坚持理性和正义，摒弃了虚张声势式的威吓，美国后来十年的历史可能将会重写，战争也不会到1812年才发生。当时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英国在1807年、1808年或1809年完全可以像1812年那样随时开战。当然也有可能如此，若美国乘全国民众情绪高涨之际陷入了战争，几年内肯定会饱受战争之苦。正是杰斐逊和平、正义、理性的主张让国家避免了长期而沉重的负担。有人猜想，当时若杰斐逊主张开战，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其实杰斐逊是绝不会放弃和平的。就算美国民众支持杰斐逊制定政策参与战争，他也不可能接受。战争风起云涌，政治矛盾此起彼伏，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显得很无助。杰斐逊的处境和独立战争时期任弗吉尼亚州长时一样悲惨。杰斐逊丝毫没有为战争做准备的打

算。他厌恶军事力量，海军的状况依然如故。在军事方面，杰斐逊认为最过分的做法是建造炮艇。谁都在嘲笑美国那些摆设式的小型舰队。据说它们平时被保存起来，太阳晒不着，雨也淋不着。战争来临时，它们才会被运到海中，然后再从邻国请人来驾驶它们，去迎战训练有素的英国舰队。英国舰队曾在特拉法加海战中取胜，在尼罗河上挫败了法兰西海军，将哥本哈根夷为平地。似乎正是因为这些美国的舰艇不会威胁到别人，杰斐逊才愿意保留。至少制造这些舰艇的花费并不高，杰斐逊也愿意花十万美元制造十来艘。杰斐逊对海军事务有如此独特的见解。英美两国的冲突却令美国人怒发冲冠。



英国“利安德”号军舰向美国商船开火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

在非重大问题上，杰斐逊偶尔也会私下里暗自伤怀。有时，他因好战的西班牙人大发雷霆，有时却默默地准备与西班牙开战，去解决路易斯安那的边界问题或佛罗里达的归属问题。杰斐逊曾说："我们要把整个墨西哥湾看作我们水域的一部分，禁止在该水域发生任何敌对行动，不让别的国家巡航。只要我们同意使用武力，就可立即禁止这里的一切活动。我们决不允许任何武装民船在该水域航行，也决不允许我们的港口有外国的巡洋舰通过。这对我们国家的安定和贸易发展至关重要。"杰斐逊的这番豪言壮语是在一封信中说的。当时，美国军舰遭到炮击，美国水手在自家港口被残忍地杀害。杰斐逊义愤填膺，说话时自然情真意切。

英国人像海盗一样在大西洋沿岸横行霸道，但杰斐逊始终对自己的和平措施充满信心。民众对杰斐逊的信心也没有动摇。共和党人在选举中再次获胜，整个国家都在坚定地支持共和党。1806年12月1日，第九

次国会会议召开。1806年12月2日，杰斐逊给国会送来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与英国政府谈判中的拖延事出有因。无论怎样，我都要在会议期间将谈判的最后结果告诉你们。"会上提出拨款建造炮艇的议题，因为战争也是为了保卫和平。



尼罗河之战



英军轰炸后，哥本哈根几成废墟

当时国库出现了盈余，杰斐逊需要考虑如何使用这些盈余。这段话虽然在目前的叙述中是一段插曲，但特别值得一提，希望大家注意。

> 我们是否应该降低关税，让国外产品比国内产品获得更大的利润？降低日常用品和生活必需品的关税无可非议，但征收关税的大部分商品是外国奢侈品，有钱人才买得起。这些富人具有爱国情怀，他们支持继续征收关税，将其用到公共教育、道路、河流、运河以及其他公共设施的改善上。他们还认为关税可适度增加，而宪法所规定的联邦权力并不是他们关心的对象。

杰斐逊提议制定宪法修正案，使国库的开支合法化，这与共和党一贯谴责的内部改良并不矛盾。杰斐逊的提议与以前大不一样。那些认为共和党总是反对内部改良的人们感到很困惑。共和党人的计划的确超越了宪法。杰斐逊过去就提出，联邦只有在对外事务上是一个整体，各州拥有而且应该拥有独立的政府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来处理各自的内部事务。杰斐逊的确在推行内部改良学说。他认为，分清联邦和各州的权力后，民众会精诚团结，政府管理将集中统一。杰斐逊说："各州之间将形成新的沟通方式，彼此之间的隔阂也会消失。各州的利益明确，关系将牢固而持久，进而巩固了他们之间的联盟。对杰斐逊这种不同寻常的变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理应按他的原则发表一番有趣的评价。"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外交事务。1806年12月3日，杰斐逊发出特别指示，建议"暂停"尚未生效的《禁运法案》。杰斐逊认为，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先生出任英国首相，应该会珍视两国之间的友谊。绝大多数人支持杰斐逊的观点，联邦党人的反对显得微不足道。1807年2月19日，杰斐逊宣布，詹姆斯·门罗和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与英国达成了和平协议。人们在传言，英国法律允许战舰指挥官在美国强制征用人员的条款依然存在。几天之后，美国收到了协议，人们失望之极。这次谈判就像约翰·杰伊先生的谈判一样，尽了最大的努力，结果却异常糟糕。杰斐逊认为和平谈判是处理问题的最好方式，但谈判的结果完全出乎预料。从长远考虑，杰斐逊不愿为美国眼前的利益而开战，但绝不会妥协。当时参议院正在开会，杰斐逊没有将条约转给参议院，而是立即发给了詹姆斯·门罗，表示协议上的条款美国根本办不到，应该重新进行谈判，希望达成与上次完全不同的协议。杰斐逊处理协议的方式无可挑剔，但联邦党人抨击他，说拒绝协议的方式专横跋扈。这种做法的确带有专制色

彩。然而，当年约翰·亚当斯这样做时，杰斐逊并没有如此尖刻地提出批评。

杰斐逊沉着冷静地退回了协议，一丝不苟地行使国会赋予自己的自由裁量权，中止了《禁运法案》。英国的观点很简单：美国人不愿意打仗，所以更容易成为掠夺对象。法兰西帝国紧跟着做出响应：既然美国人被抢劫了，法兰西帝国必须参与分赃。英国不时发出枢密院令。拿破仑·波拿巴攻占柏林、在米兰取得胜利后，法兰西帝国颁布了报复性法令。除了表明英法两国的沿海贸易对美国船只开放之外，这些法令再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世界贸易一半被英国人垄断，另一半被法兰西人霸占。海上的商船若不遵守英国的规定就会被英国巡洋舰捕获，若遵守了英国的规定又会被法兰西帝国扣押，反之亦然。美国公民在自己的港口也不能安全地贸易。英国战舰常在美国领海徘徊，强行征用海员，短短几年内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深受其害。1807年6月，英国“猎豹”号战舰用排炮向美国“切萨皮克”快速护卫舰开火，打死打伤船员若干，事发地点就在汉普敦水道外。“切萨皮克”号在丝毫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受到袭击。英国指挥官登上甲板，带走了四名海员，至少有三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其中一个人被绞死在哈利法克斯。



拿破仑·波拿巴攻占柏林

消息传开后，举国上下群情激愤。杰斐逊说：“自从莱克星顿战役以来，我从未见过全国上下像现在这样怒不可遏。”新英格兰各州的极端联邦主义者中，有些人害怕与英国敌对，认为英国指挥官的行为并无不当

之处。大多数联邦党人对这种行为咬牙切齿，和共和党人一道愤怒地抗议。杰斐逊说："联邦党人经常谴责我们的一举一动，但在这件事情上，双方因共同的目标携手共进。"虽然杰斐逊怒气冲冲，但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因一时头脑发热而做出不可挽回的事情。杰斐逊认为："不能任由国会在战争、外交和别的措施之间做出选择，这是我们的责任。"杰斐逊立即派遣一艘军舰前往英国要求赔偿，并建议国会于1807年10月26日召开特别会议。杰斐逊说："我们给英国人承认事实和赔偿损失的机会，这是文明国家的理性和惯例。我们得让商人有时间积累财产，让海员们有时间调集船只。"杰斐逊当时预见到了战争，说自己正在全力以赴地为战争"做好准备"，因为美国人"有作战的能力"。当时杰斐逊有可能真的认为国家马上要进入战争状态。美国的炮艇少得可怜，只能略微加固港口的防御工事，并筹集少量的物资。后来国会拨出了很少一部分钱支付了这些费用。

1807年10月26日，国会正常举行会议。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共和党人占绝对优势，用"行政主义者"描述国会议员们最恰当不过，因为他们完全在杰斐逊的个人影响下行事。无论杰斐逊建议采取什么措施，参议院和众议院都能迅速执行。大家都知道，杰斐逊善于把握事态的发展，要等到英国对"切萨皮克"号事件做出回复后，再制订政策。直到1807年12月的第二个星期，英国才做出答复——将派特使处理此事。



英国"猎豹"号战舰炮击美国"切萨皮克"号护卫舰

1807年12月18日，杰斐逊做出了简短而重要的指示。他说：“无论在公海上还是别处，好战的欧洲列强正威胁着我们的商船、海员和货物，而且这种威胁会越来越大。保护我们的人员和物资的安全至关重要。我有责任建议国会考虑此事。国会一定会认识到，禁止美国船只离开自己的港口才是上策。”英国枢密院令定于1807年11月11日发出，而到了1807年11月17日才公布，该命令宣布“封锁”美国商船进入法兰西帝国和英国同盟国的港口。联邦主义者支持英国内阁的做法，认为杰斐逊并不知道英国枢密院的命令，禁运建议是不成熟、不正当、不友好的行为。行政主义者们反驳道，杰斐逊经非官方渠道早知道这个命令。若英国能够对美国以诚相待，这样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沟通解决。英国假装派罗斯先生为特使去美国解决“切萨皮克”号事件，但又用各种荒谬的方式阻挠他。罗斯离开伦敦一段时间后枢密院令才发出。美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按外交礼仪迎接并招待了这位特使，给予他应有的尊敬。罗斯先生只能将真实情况公布于众，起航回家。英国的表现很不友好，但杰斐逊为迎接英国特使做了充分的准备。作为一名特使，罗斯应该为英国卑鄙的做法脸红。

杰斐逊总统没有选择战争，而是通过禁运来保护贸易。杰斐逊执政后期的历史无非就是联邦主义者的攻击和行政主义者的辩护。在参议院，约翰·昆西·亚当斯抛弃了联邦党，投票支持杰斐逊的禁运政策。他说：“总统先生提出了这个建议，体现了他对国家高度的责任心，我会毫不犹豫地付诸行动。总统无疑是在高瞻远瞩，这项政策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在杰斐逊的建议下，参议员们召开了四个小时的秘密会议，通过了《禁运法案》。在众议院，联邦主义者们却秘密地争论了三天。他们除了拖延时间之外，根本无力回天。《禁运法案》最终以八十二票支持、四十四票反对获得通过。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些政策连同杰斐逊的两栖炮艇都成为历史。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杰斐逊的“禁运政策”是错误的。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七十多年前没有人怀疑过该政策。1807年到1808年间，人们认为禁运是卓越的治国之道，既能有效防守又能主动进攻。当时，这种观点深入人心，人们都习惯性地认同并支持。现在也有人赞同这项政策。联邦党人的报纸曾为该政策大声疾呼。许多最有影响力的商人，为了使

竞争力较差的对手筋疲力尽，也站出来强烈支持禁运。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次禁运和以前一样，持续时间不会太长。联邦党人提醒大家，杰斐逊的《禁运法案》与以前有关禁运的法案不同，并没有任何时间限制，但很少有人担心会有危险发生。

杰斐逊认为，商船上公民的财产和海员的安全若想得到保护，商船就得停泊在美国港口，而到了公海上，货物和人都可能被掳走。对外贸易的限制不亚于对国内贸易的限制。杰斐逊认为禁运政策并没有损害美国形象。他描绘了英国工业不景气时商人遭受损失，大量的英国工匠流离失所、无饭可吃的情景。杰斐逊说，英国的劳动者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轻而易举地找到新的工作。他们也不会像美国农民那样有存粮可吃。听杰斐逊说话的口气，好像所有美国人都是农民。杰斐逊完全没考虑到靠贸易生存的沿海居民。杰斐逊认为，沿海居民充满爱国热情，受到损失后也不会闹事，美国的禁运会引起许多英国人的不满，他们将会叫嚷着威慑英国议会和政府。全国大多数人都对杰斐逊的禁运政策充满信心。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先生从英国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证实了该政策对英国造成的压力。这些都是杰斐逊实施禁运政策的正当理由。行政主义者们在辩论中认为，有两方面的问题必须要搞清楚：第一，既然禁运是一项国内措施，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商船和海员，就应该同时积极备战。若一直用禁运来保护自我未免有些荒谬。因为禁运时间一长，就会带来负面影响。只要各国找到处理彼此关系的新方式，禁运就该解除。第二，禁运涉及外国事务——其实就是为了影响英国的立法，就像在做实验。既然实验注定要失败，我们就应该放弃。

事实上，应从这两个方面做出权衡。若从第一方面入手，为解除禁运而辩论是不可取的，因为事情还没有发展到用充足的武力保护人和财产的地步。政府的政策显然管不了国外的事情，禁止商人在海上贸易就是为了间接地保护他们。当国家有足够的实力，能够直接用武力保护他们时，自然就解禁了。如果要为后来的解禁辩护的话，必须从禁运政策对国外的影响入手。英国政府对美国的禁运政策置若罔闻。美国中断贸易后，商人们可能只是暂时受到损失。无论如何，他们是国家政策的受害者。禁运政策注定要对国家的航运和贸易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英国的既定目的是搞垮美国的贸易，因为美国贸易给英国带来了严重威

胁。在英国内阁成员的眼中，禁运是竞争对手自己送上门来的好事，他们高兴都来不及。杰斐逊应该明白英国能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的政策，赚取比美国更多的利润。在英国，受到禁运影响的英国人不多。而在美国，整个航运业和商业界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最终将导致贸易的彻底毁灭。禁运在美国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能帮助英国实现自己的计划。禁运是一项长期政策，如果禁运失败了，美国将一败涂地。即使成功了，美国贸易也会遭受严重的损失，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立足。无论怎样，英国人定会获得相当大的利益。美国贸易遇到的每一次挫折都促进了英国贸易的发展。



讽刺《禁运法案》的漫画：商人躲避禁运

如果禁运对英国没有什么好处，那对法兰西帝国也没有什么好处。禁运政策没有造成任何损失，法兰西帝国当然愿意美国继续禁运下去。英国人在雄心勃勃地发展贸易。拿破仑·波拿巴非但没有感到不安，看到敌人的补给被切断反倒感到十分满意。

英国的政策既精明又有效。1812年战争之前，美国商人已饱受挫折，在战争中他们又历经艰险，遭受损失。贸易和航运利益受损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自己造成的。如果政府的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商人们就可以保存足够的实力。杰斐逊的禁运措施出台之后，进行相关立法时考虑欠佳，使商人们本有的一点实力毁于一旦。杰斐逊曾对贸易比较反感，现在却无意中让美国贸易受损，很难恢复元气。他这样做不是出

于恶意，而是完全不懂贸易。

杰斐逊没有意识到自己给商人们带来了损失，更不会承认这有悖于自己的初衷。联邦党人讽刺道，联邦党执政期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强大的政府”。联邦党人的禁运与杰斐逊这可怕的无限期禁运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联邦党人真正讨论的是禁运时间长短的问题，而不是该不该禁运的原则性问题。如果禁运是一种合法的措施，禁运期限应该按照当时的情况而定。有人认为，《禁运法案》没有明确规定禁运结束的时间，所以该法案没有效力。也有人认为，禁运毁坏了贸易，与宪法相悖，最高法院可以将其废除。杰斐逊将美国公民关在国门之内，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安全，这是温情主义政治的极端做法。就其本身而言，禁运政策不但不民主，而且极其愚蠢。杰斐逊也许认为自己很明智，商人们的本金不受损失，还有利润可赚。商人们并非愚蠢无能，比杰斐逊更了解贸易。

杰斐逊似乎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强行禁运。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明智合理的措施。这种说法正确与否，需依据美国和英国出现的实际情况来判断。实施禁运后，美国国内并无异样，国外也没引起什么骚动。杰斐逊无法影响国外之事，这无可厚非，但国内的事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若杰斐逊主张建立海军，增强国防，或者有意开战，只要向国会知会一声，国会就会立刻照办。杰斐逊用至高无上的权力坚定地维护了和平。

杰斐逊的传记作家们起初很愿意充满热情地讲述，杰斐逊之所以实施禁运，是因为国会和民众都不反对这项政策，后来又说这个理由有点勉强。这种说法难以让人信服。杰斐逊作为总统就应该比普通民众更有智慧，就应该承担引导民众的责任。国会坚持禁运的理由与他们第一次实施禁运时的理由相同。约翰·亚当斯先生认为实施禁运是“总统的职责”。这也是美国国会内外多数人认同禁运的原因。杰斐逊起初只是支持约翰·亚当斯的观点，后来却对其大力宣扬。直到后来禁运政策变得不得人心，成为败局时，杰斐逊才开始觉得总统的这种“责任”使自己筋疲力尽，厌烦透顶，欲去之而后快。说句公道话，当政府犯错误时，反对派通常会提出合理的反对意见。没有人能给杰斐逊提出合理的意见，因为联邦主义者们比行政主义者更加盲目。联邦主义者对禁运的批评表明他

们对禁运的真正后果一无所知。他们只看到了禁运给英国造成的伤害，污蔑地称“禁运”是杰斐逊为暗中帮助法兰西帝国而制定的一项“狡诈”的政策。除了对英国人的要求卑躬屈膝外，联邦主义者们也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

1807年12月18日，杰斐逊向国会提出禁运的建议。1808年3月23日，杰斐逊写信给马萨诸塞州的李维·林肯，说：“法案得到了批准，除了你所在的州外，其他州的联邦党人都同意该法案。实际上，除战争之外，我们能打的最后一张牌只有禁运。”1808年6月23日，杰斐逊写道：“不可能继续延长禁运期限，战争已为期不远。”1808年8月9日，杰斐逊总统写信给战争部长亨利·迪尔伯恩，信中的语气与“威士忌酒税暴动”发生时所用的语气截然不同。这话是说给大西洋彼岸的敌人听的，而不是针对正在受禁运之苦的美国公民。杰斐逊说：“波士顿的托利党人公然进行威胁，如果禁止进口面粉，他们就要暴动。当务之急是阻止他们暴动。恐怕当地的州长控制不了这里的叛乱局面。一旦出现非法暴力事件的征兆，希望你能火速抵达现场，帮助州长平息骚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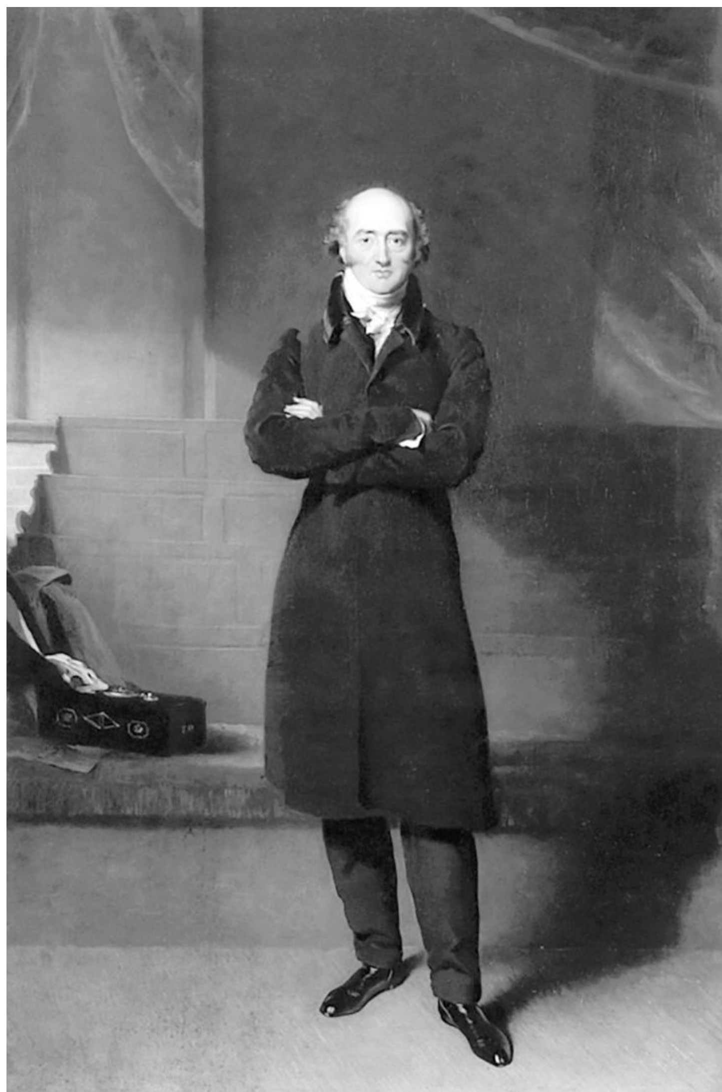


亨利·迪尔伯恩

杰斐逊既没有被这来自新英格兰强烈的怨言所吓倒，也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想法。杰斐逊认为战争已“为期不远”，可这一天始终没有到来。

1808年9月，杰斐逊感到很失望。他本想通过长期禁运迫使英国改变对美国的政策，但毫无成效。与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谈判时，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先生推断英国有可能废除枢密院令。杰斐逊说：“我不太相信外交中得出的推断，更不相信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的诚意。”转眼间到了1808年11月7日，国会又开始开会。全国上下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想听听杰斐逊对国会有何指示，是否会宣布战争即将开始？国外的失望，国内的不满，以及后来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在新英格兰各州的失利，会不会对杰斐逊产生影响呢？杰斐逊没有明确表态。杰斐逊说，自己曾向英国暗示，不管法兰西帝国采取什么行动，只要英国撤回枢密院令，美国就会停止对英国的禁运。英国内阁并没有注意到杰斐逊

的这种意向。杰斐逊坦率地承认，通过禁运影响英国立法的措施已化为泡影，并说必须“依靠国会的智慧决定最适合当前事态的政策”。显然，杰斐逊不想再提出任何建议，也不想再承担责任。杰斐逊有点得意，因为禁运“向外国表明了美国国会多么坚定，多么能克制自己”。杰斐逊没提及英国人令人恼怒的自满情绪。他们看着美国人长期忍受痛苦，自己却从中受益。杰斐逊也没有提及美国驻英公使曾向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提议，如果英国废除了枢密院令，美国将停止禁运。乔治·坎宁这位刻薄的绅士说愿意帮助美国摆脱禁运，英国发现禁运给美国造成了很多不便，可英国不能因此而撤回枢密院令。拿破仑·波拿巴还以讽刺的口吻发布了一项法令，要求扣押所有在海上发现的美国商船。还说，法兰西帝国出于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帮助美国阻止因犯法而逃跑的船只。杰斐逊并没有向国会提起拿破仑·波拿巴的这番话。



乔治·坎宁

为了避免战争，杰斐逊开诚布公地说自己不想发动战争。禁运本是一项临时措施，但在杰斐逊的支持下成为一项长期的政策。事实表明，杰斐逊像君主一样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众议院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支持继续实施禁运。在参议院，一项直接废除《禁运法案》的决议最终以六票赞成，二十五票反对未能通过。1808年12月21日，参议院又通过一项强制执行《禁运法案》的法案。不久，杰斐逊和行政主义者就发现，自己做的蠢事令人害怕。马萨诸塞州议会谴责《禁运法案》不公正，具有强制性和压迫性，违背了宪法，没有法律约束力。康涅狄格州

州长小乔纳森·特兰伯尔拒绝依照杰斐逊的新法案征兵，并向州议会建议要拒绝执行这项联邦法令。康涅狄格州议会通过了与马萨诸塞州相似的决议。公众舆论也认为《禁运法案》有不妥之处。有影响力的联邦党人开始提议，如果不为该法案制定明确的计划，各州应脱离联邦。

听到这些威胁后，杰斐逊变得犹豫不决，情绪不太稳定。1808年11月，杰斐逊还没有废除禁运的想法。1809年1月14日，杰斐逊说，最初制定禁运政策的目标已经实现，禁运政策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到了该废除的时候。几天后，国会又通过了一项法案，决定在1810年5月额外举行一次国会会议，并在1810年6月1日废除《禁运法案》，然后“以武力恢复和维护航海权”。从杰斐逊1809年1月14日的观点来看，他显然为国会的决议感到高兴。实际上，杰斐逊依旧痛苦地坚持和平的愿望。他抱怨道：“如果现在开战，恐怕我们永远不可能看到还清债务的那一天。如果能再和平发展八年，我们将摆脱债务，我们的收入必定能够足以应对任何战争，不用收税也不用贷款。我们的地位和实力将日益增长，终将超越别的国家。”1809年1月25日，来自弗吉尼亚的威尔逊·尼古拉提出1809年6月1日废除禁运的决议。威尔逊·尼古拉是杰斐逊的朋友，也是众议院的行政主义者的领袖。通过激烈的辩论，废除《禁运法案》的日期定在1809年3月4日。这次投票预示着政府禁运政策的失败，将废除禁运的日期提前了三个月。十八个月后，杰斐逊写道：“当时联邦党人暂时占了优势，迫使政府废除禁运，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人们都不知道杰斐逊这时候在想什么。他知道自己的政策失败了，但不愿意承认。杰斐逊失望而痛苦地看到自己的政策无法推行，内心极其焦虑，极想摆脱尴尬。此时，杰斐逊很渴望辞去总统职务，比当年想辞去弗吉尼亚州长的那种感觉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离职前，杰斐逊不想做出任何决定，不想提任何建议。1808年12月，他甚至说：“我不参与制定任何措施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政务将交给我的继任者。我的主要任务是去做一个旁听者。”换句话说，离职之前，杰斐逊已宣布提前三个月卸任了。1809年1月底，杰斐逊重申：“现在我快要退休了，除了表决以外，我不参与任何事情。我的继任者现在应该开始参与制定措施，因为他将执行这些措施并承担责任……再过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摆脱这难以忍受的苦差事了。”

国会决定缩短禁运期限时，杰斐逊未发表任何观点。1809年3月4日，杰斐逊卸任时就像八年前任总统时一样高兴。他从失望、失败中解脱了出来，也摆脱了即将面临的尴尬。在执政的最后几个月中，杰斐逊很无助、很困惑，也很值得同情。杰斐逊的禁运政策最终失败了。他的个人声望虽然有所减损，但依然很高。全国绝大多数人认为他是足智多谋、品德高尚的伟大政治家。杰斐逊成功地将政府交给了继任者詹姆斯·麦迪逊。詹姆斯·麦迪逊深受杰斐逊的影响，在政治上支持杰斐逊。杰斐逊卸任后，他们仍然保持着好友关系。这种现象在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杰斐逊无权提名自己的继任者。詹姆斯·麦迪逊之所以成为下一任总统，是因为他政治地位高、功勋卓著、执政能力强。在选举中，詹姆斯·门罗是詹姆斯·麦迪逊的竞争者，选举活动进行得很艰难。杰斐逊公开宣称，自己对两位竞选者不偏不倚，每一位都是他爱慕和信任的人。詹姆斯·门罗将信将疑，情绪比较冷淡。在杰斐逊的抚慰下，詹姆斯·门罗别无选择，只能保持沉默，因为丝毫没有杰斐逊支持詹姆斯·麦迪逊的证据。杰斐逊在很久之前就想让詹姆斯·麦迪逊继任总统，别人肯定也知道他的意愿。

民众中许多有影响力的人恳求杰斐逊继续担任总统候选人。若杰斐逊想成为候选人，一定会得此殊荣，但他急流勇退，没有半点犹豫和徘徊。杰斐逊已多次强调总统任职期限的原则问题。他现在引退比继续担任候选人更能获得好声誉。再者，时局动荡不安，国家的前景不容乐观。

杰斐逊在总统第二任期结束时六十五岁，从政约四十年，中间偶有中断，也可忽略不计。杰斐逊从政期间好运连年，在世界历史上极为罕见，在民主政体中更是史无前例。杰斐逊在总统职位上载誉而退，一点也不比乔治·华盛顿逊色。在七百万人口的自由国度，难免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但杰斐逊的廉正和政治判断力为自己树立了坚定的信心，不论制订对外还是对内政策，他都有权发号施令。杰斐逊没有军功，但对美国的影响深刻而久远，任何人都不能和他相提并论。杰斐逊虽然有缺点，但真正为民众着想。杰斐逊认为，民众的福祉是政府的最高目标，但他并没有像上级对下级的施舍一样给予民众恩惠。杰斐逊尊敬民众，认为他们有无限的聪明才智和力量。别人称杰斐逊是煽动家，但他在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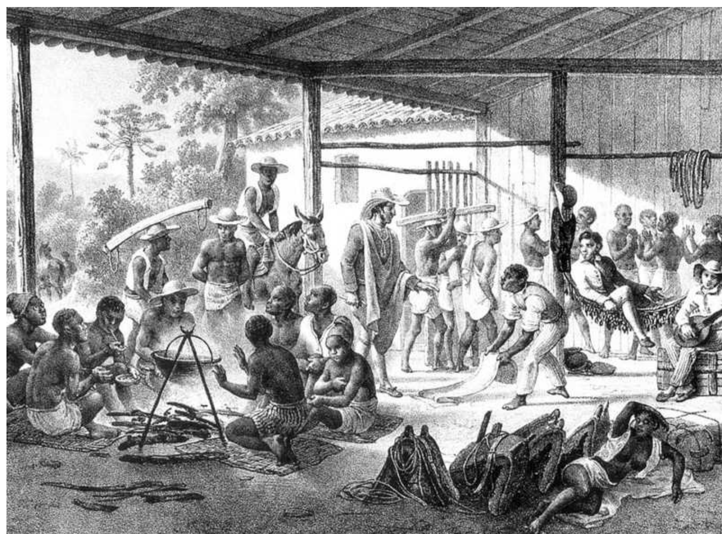
传自己的学说时不乏真诚。杰斐逊坚信自己的政治原则，不仅因为这些原则十分正确，而且他确信这些原则最终会盛行。杰斐逊和那些趋炎附势的政客不同。他把个人成功的希望寄托于正确的原则之上。杰斐逊也不同于事必躬亲的政治家。他制定了具体政策，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在杰斐逊开创的宽阔政治道路上，具体政策就像是铺路的石子。杰斐逊也有不真诚的时候，而且常常前后矛盾，善于趋利避害。从总体上看，从弗吉尼亚议会进行重大改革起，杰斐逊所确定的目标和制定的政策都以人道主义为崇高目标。直到今天，民众仍然怀念和敬重杰斐逊，以表达对这位朋友的感激之情。许多总统都和杰斐逊一样曾服务于民众，但没有人像他那样尊重民众，让民众感到荣耀。



注解：

[1]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1749—1806），英国辉格党资深政治家，从政四十年，曾三次短暂地在内阁供职。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严厉谴责策划派兵镇压革命的首相诺斯勋爵及英王乔治三世，1806年被委任到“贤能内阁”供职，第三次出任外相。——译者注

第18章
退休后的工作与政治观点



精彩看点

退休后的工作——扩大美国领土——给财政部长的建议——对战争的看法——邪恶的一面——密苏里妥协案——南北分界线——关于奴隶解放的观点——与司法部门的斗争——声明和抗议

杰斐逊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已成为内在需求，一时半会儿难以消失。退休后，杰斐逊经常与新总统保持书信往来，偶尔行使党内职权。这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内的权力完全不同。人们恶意的调侃也随之而来，言下之意是现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只是前总统杰斐逊的傀儡。詹姆斯·麦迪逊当然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的傀儡，但别人的调侃无疑会伤害新总统的感情并降低他的威信。杰斐逊敏锐地察觉到詹姆斯·麦迪逊的处境，减少了与新总统的往来。

大家应该注意杰斐逊提出的关于公共事务的一些观点。杰斐逊认为，新政府领导下的国家会在一段时期内和平而繁荣，战争是一种“亏本的买卖，而非无限制的掠夺手段”，能避则避。杰斐逊指出：“现在的欧洲处于狂热状态，我们不能以正常的眼光审视荣誉。”当时国家正准备签

订一个贸易条约，杰斐逊力劝詹姆斯·麦迪逊，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不能像过去签订的《杰伊条约》那样，让英国迫使美国立约。

杰斐逊做梦都想扩大美国领土。他说：

> 拿破仑·波拿巴会以低价将佛罗里达及其附近地区卖给我们，以阻止我们与西班牙殖民地的残余势力联合。这些地区本该属于我们。战争爆发后，我们才意识到佛罗里达及其附近地区特别重要。尽管困难重重，我还是同意古巴加入我们的联盟……我们应该在独立战争中就把北方纳入联邦。我们应该拥有一个辽阔无边的自由国度。我相信，我国的宪法在扩大领土和自治方面早已十分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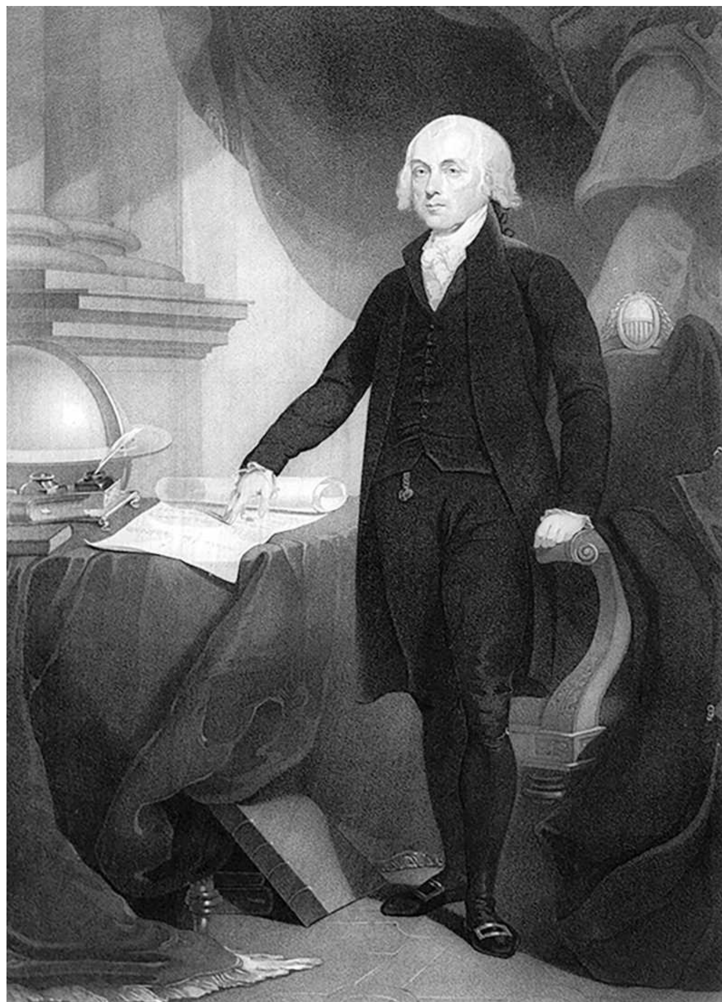
这些话是杰斐逊在1809年说的，完全是在做白日梦！

到目前为止，杰斐逊已经改变了自己对商业和制造业的敌视态度。他说："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平衡发展是我们独立的必要条件。制造业满足我们的消费，又能促进原材料的生产。商业则将我们过剩的农产品推向市场，换来自己不能生产的物品。"

杰斐逊写信给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敦促他要不遗余力地偿清国债。杰斐逊说："还清债务对政府的命运至关重要，这完全取决于詹姆斯·麦迪逊先生和你自己……实现这一目标将给你带来荣誉，国家也会感激你。"杰斐逊很尊重艾伯特·加勒廷。1810年冬天，有人攻击艾伯特·加勒廷，共和党内也产生了分歧。杰斐逊尽其所能阻止这一分歧。杰斐逊高谈雄辩，宣扬党内和解，并制定了党内一致性原则。激进派和保守派欣然接受了这一折中性的原则。

1812年春，杰斐逊意识到英国和美国的战争一触即发。他写信给一位英国朋友，说："英美两国就要开战，但不是我和你开战。两国本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互惠互利，为什么要开战呢？上帝肯定会宽恕我们的政府诉诸战争的做法，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承受过如此多的苦难。"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的忍耐力为常人所不及，他们为避免即将到来的战争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杰斐逊以乐观的态度审视这场灾难性的战争。他希望美国能够保卫自己的港口并收回英国所占的领土。杰斐逊说："今年，我们获得加拿大至魁北克附近的土地，为我们接下来进攻哈利法克斯做好铺垫，最终要把英国人赶出美洲大陆。"由此可见，杰斐逊军事方面的才能的确难登大雅之堂。杰斐逊说："英国的支持者竭力怂恿我们选择海洋作为战场，那是美国的弱点、英国的强项。"奇怪的是，许多地方都强烈要求杰斐逊担任1812年的总统候选人。杰斐逊的党众对他的敬仰已达到了盲目的程度。亨利·兰德尔先生还告诉我们"詹姆斯·麦迪逊的一位知己听詹姆斯·麦迪逊亲口说，要把国务卿的职位交给杰斐逊"。1812年10月1日，杰斐逊就这一话题写信给威廉·杜安[1]，说："我信奉罗马人的观点，昔日的将军如果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有益的事，今天就是当下士也值得尊敬。若为了一己私利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则是虚荣。岁月不饶人，我已经老了，体能衰减，精神也大不如以前。"杰斐逊显得忧郁而且顾虑重重。信的最后，杰斐逊满意地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有多大，并不想让朋友们来可怜自己，无论何时退休都无所谓。"这可能是一个借口，也可能不是，因为杰斐逊总是唠唠叨叨地说自己早已年老体衰。



总统任上的詹姆斯·麦迪逊



威廉·杜安

杰斐逊乐观地推断，和平最终会到来。他希望“英国能够承认在海上强制征兵的暴行，并承诺摒弃这样的暴行”。否则，英美之间只有战争，永远无法和解。杰斐逊强烈反对英国对美国的敌视和仇恨，希望上帝保佑这一切能够改变。他说：“我非常真诚地希望能和英国平等友好地交往……我知道英国人的走狗将我描绘成了英国的敌人。相信这种说法的人要么是傻瓜，要么认为我是傻瓜。我也不希望看到英国受到侮辱和伤害，也不反对英国政府罪大恶极的行事准则，更不想与英国制订对外政策的人为敌。我无法确定英国是否会在政治原则中讲一点道德，不知道英国是否会对我们以礼相待，或至少以中立态度对待我们。我要强调的是，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一样，让我们为了与之建立友谊而做出如此大的牺牲。”

杰斐逊善于消除仇恨。他总是希望和解、原谅，让失去或破裂的友谊重归于好。与约翰·亚当斯吵完架后，杰斐逊非常诚恳地和约翰·亚当斯沟通。这只是杰斐逊人格魅力的诸多例证之一。人们觉得杰斐逊和蔼可亲。最令人遗憾的是，根据记载，他也像魔女“阿拉斯”一样，具有邪恶

的一面。人们普遍认为，杰斐逊总是充满善意，但杰斐逊有时也会纵容自己无情地报复别人。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民众对他的看法会大不一样，好像透过杰斐逊仁慈和友善的一面，窥视到了他本性的另外一面。

1820年，杰斐逊对《密苏里妥协案》深感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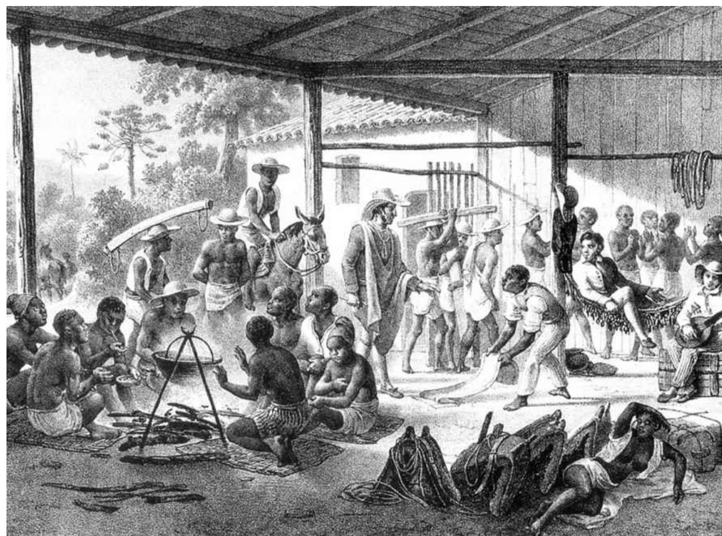
杰斐逊说：“该法案事关重大，就像夜晚的火警警铃一样惊醒了我。我立刻意识到该法案对我们的联邦是一种凶兆。暂时相安无事，但不知最终会如何。”“《密苏里妥协案》标志着美国南方和北方的领导人就密苏里地区变为自由州还是蓄奴州的问题，在道德和政治原则上相互妥协达成一致，并在地理上画出一条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分界线来。这条分界线一旦被确定，恐怕再也无法从我们的头脑中抹去。该分界线会在不同的场合被反复提起，不断激起人们的愤怒，直到彼此之间产生致命的仇恨。总体来说，分为两个不同的州也比一直不和更可取。”

杰斐逊预见到了内战，说：“我们会不会再次看到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联盟？是否会再一次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杰斐逊虽然预见了未来可怕的战争，但没能认清冲突的性质和结果。杰斐逊说：“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权力问题。《密苏里妥协案》的目的是从地理位置上划出一条线来，作为选举总统时的准则。如果法案不生效，争论将会一直延续下去。”人们都认为道德因素隐含在表象之下，杰斐逊却认为以后的冲突与道德无关，南北分裂后北方受到的影响更大。杰斐逊预测道：“北方人会发现，南北的分界线与北纬三十六度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分界线完全是两回事。以制造业和航海为生的各州将为了自己的生计而纷争不断，经历一些困难之后，他们将言归于好，根本不用担心。”

此外，杰斐逊认为国会干涉了各州的权利。他谴责“国会为新成立州的人口设定了不同条件。这本来是各州的特权，宪法不能剥夺各州的权利而将其赋予联邦政府”。杰斐逊奴隶解放的观点始终没变，但他比以前更加注重实际困难。他说：“这种财产（奴隶）的割让是无足轻重的小事，‘奴隶’这种称谓本来就不对，我不会再考虑此事。通过财产割让，可在大范围内实现奴隶解放和迁移，而且我认为，若能谨慎处理，奴隶解放将会慢慢变为现实。我们现在似乎骑虎难下，既无法消除奴隶制，

也不能让它继续存在。”

1821年，杰斐逊再次表达了对司法部门的不满，并就此写了一些文章。后来，在约翰·昆西·亚当斯执政期间，杰斐逊对内部改良政策的彻底胜利颇感恼火，放弃了与司法部门的斗争，绝望地服输了。杰斐逊认为“舆论的洪流不可抗拒”，并因此暗自伤怀。他无法接受从宽解释宪法。杰斐逊认为，无论从宽解释宪法有多大优势，都是对宪法的扭曲。显然，杰斐逊比以前更不能容忍从宽解释宪法了，因为从宽解释宪法后无法控制贸易，不能为政府带来声望。杰斐逊从理论层面入手，用一种抽象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学说不受侵犯。在实践中，杰斐逊的学说却显得苍白无力。杰斐逊为弗吉尼亚州议会起草了冗长的《声明和抗议》，并以一般性立法的方式加以确立，其中列举了国会的无能。因为美国各州有权批准国会尚未通过的内部改良法案。杰斐逊认为，用国家的资金建设运河和道路违反了宪法，可能导致联邦分裂。他说，国家的资金“在人们遭受了巨大灾难时才能使用”。杰斐逊的惊慌毫无根据，他提出的措施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杰斐逊的确已悄然老去，这是他所参与的公共事务中最后一件值得提起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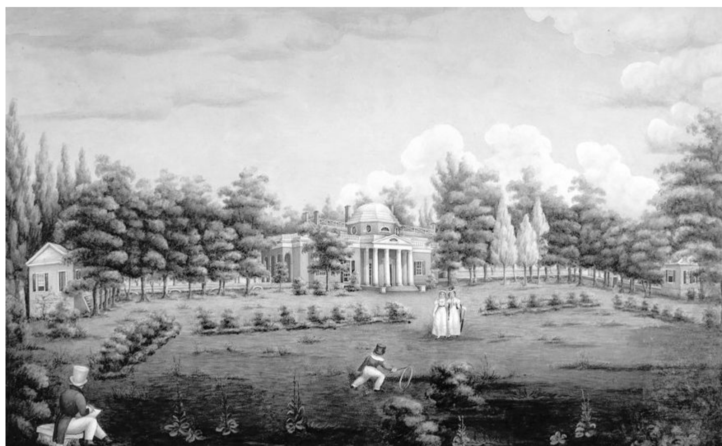
奴隶主与黑人奴隶

注解：

[1]　威廉·杜安（1760—1835），美国记者，生于纽约，1788年移居加尔各答，1791年创办《孟加拉日报》，1794年移居美国，创办了《费城极光报》，曾

在1800年支持杰斐逊成功竞选总统。——译者注

第19章
晚年的贡献和最后的时光



精彩看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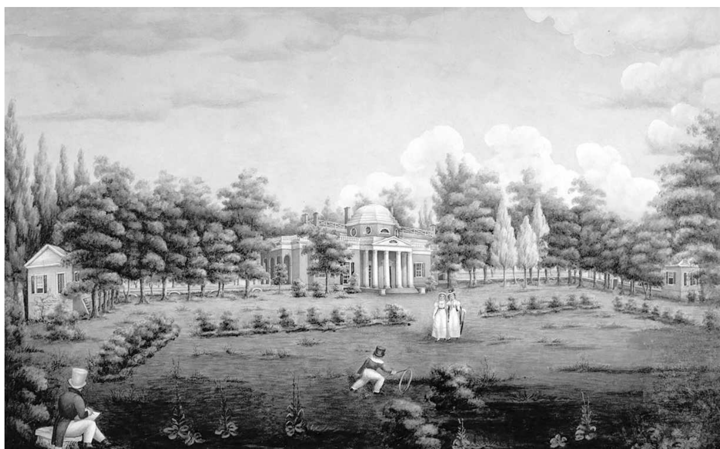
“圣人”形象——好客的前总统——源源不断的参观者——妻子的债务——经济上的困难——处理财产——全国各地的资助——弗吉尼亚大学——是不是基督徒——最后的岁月

杰斐逊的个人形象颇具戏剧色彩。卸任总统职务之后，这位老人展现出善良与睿智、慷慨和理性，一副“蒙蒂塞洛圣人”的模样。杰斐逊觉得这样的形象无可厚非，认为在这个时候就需要保持这样的形象。杰斐逊将这样的形象一直保持到了最后。起初，杰斐逊想做蒙蒂塞洛的隐士，但很快发现，像他这样的隐士一般会为声名所累。全世界的慕名者都纷至沓来，一探究竟，所以还不如退休来的稳妥。杰斐逊十分好客，在以好客闻名的弗吉尼亚也很少见。他的客人络绎不绝，源源不断。有亲戚携家带口而来，也有父母带着孩子前来拜访，一待就是几个月。朋友们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一般。各路社会名流时常到此小聚一番，这让杰斐逊十分开心。蒙蒂塞洛就像展览馆一样，有上进心的文明人都来“参观”前总统。美国各行各业的人们仿佛迟早都能找到去往蒙蒂塞洛的理由，去拜访这位“隐者”。亨利·兰德尔有一封信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一年中至少有八个月的时间几乎是每天都有零零散散的客人来访。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来自国外，有的来自美国各州。他们中间不乏商人富贾，也有时尚达人。有公务人员，也有技术人员，有军人，有医生和律师，也有牧师和神父。国会议员、外交部长、传教士、印度来的代理商、旅行者、艺术家、陌生人，以及杰斐逊自己的朋友都会到杰斐逊家中做客。他们到此，有的是出于个人对杰斐逊的尊重，有的只是来猎奇，有的是经他人推荐，有的只是来看看偶像，也有来凑热闹的。

人们挤满杰斐逊的房子。一些人甚至站在走廊边上看着杰斐逊在屋里来回走动。杰斐逊在树下休息或者去广场小坐时，都会有人蜂拥而至，盯着他看。这样的情形让杰斐逊即开心又烦恼。在周围人的眼里，杰斐逊仿佛就是传说中的怪物。有时杰斐逊也会去远处的农场躲两天清静。任何时候都显得谦和善良，这也是他的本性所致。在农场小住的日子里，有人从窗外偷偷地向屋里观望，也有人私下里向杰斐逊的朋友抱怨前总统躲在农场里不肯见人。

杰斐逊理应预见到自己退休后最初几年的生活。他的家就像是一个宽敞而出名的旅店，客人们来的很多，却没有人想过要支付相应的费用。最多的时候，需要为来客准备五十张床。家里的佣人和马夫们忙得无暇顾及劳动生产，大部分的吃喝用品都需另外购买，家里的钱日渐耗尽，娱乐的方式不得不变得简单，但杰斐逊觉得这样的付出很值得。当时在别人眼里，杰斐逊的生活令人艳羡，但高额的开支必然使他的生活更加拮据。此外，其他方面的压力相继而来。在独立战争之前，杰斐逊的妻子曾欠下英国人的债务。杰斐逊尽管极为诚信，但还是很难偿还。杰斐逊将妻子名下的部分土地以金价售出，最终只卖得相当于总价百分之二点五的价钱，而且还是纸币。根据战时法令，杰斐逊若将这笔钱上缴国库，所欠英国人的债务就由国家承担，并可宣告债务人无罪。战争快要结束时，杰斐逊拒绝了这项对自己有利的债务承担方式。在给债权人的信中，杰斐逊写道：



蒙蒂塞洛

> 我很愿意与您商议此事。如您所愿，您将收到我偿还的款项。如果您满意的话我将十分欣慰。不论是现在弗吉尼亚的法律条文还是将来会出现的新的法律条文，都不会影响我的决定。我希望以真正的正义来对待此事，这样的正义来自理性而并非专制或强权。我会解决这笔款项带来的种种问题，毕竟这笔欠款由我产生。我会支付三十七万四千九百一十二美元的欠款，这相当于我一半的财产。

保持诚信虽然代价巨大，但是值得。当杰斐逊从国库领到微薄的资助款后，想起了那些曾拥有过的土地。他惋惜地说：“这些钱能买个不错的外套。”亨利·兰德尔曾说，由于英国军队的掠夺，杰斐逊的收入来源愈来愈少，“他损失的财富相当于英国人掠夺的财富以及这些财富所产生的利益的总和”。在政府供职期间，杰斐逊主要靠工资生活，时常会入不敷出。只有在担任副总统时才积累了一些存款。据亨利·兰德尔估计，卸任总统时杰斐逊的个人资产有二十万美元，但扣除债务后具体数目就不得而知了。这笔相当可观的资产中包含了房产和家居陈设，以及价值不菲的藏书，还有土地和奴隶。实际上蒙蒂塞洛的财产和奴隶都已经用来抵债。杰斐逊的个人收入已经满足不了日常开支。经济上的困难使杰斐逊日渐潦倒，变得一无所有。其实在情况变糟以前，杰斐逊就以两万三千九百五十美元的低价将自己的藏书卖给了国会。这笔钱也未能维持多久。1819年，杰斐逊为自己的好友威尔逊·尼古拉做了两万美金的担保。威尔逊·尼古拉并没有被人诟病，但这次担保使杰斐逊的经济状况变得更

糟。虽然杰斐逊内心煎熬，但他依然友好地与威尔逊·尼古拉相处。杰斐逊的所作所为常为人们所称赞，也曾有人为之动容。

无论欠款人多么善良、诚实、与众不同，欠款都必须偿还。杰斐逊这位昔日的美国总统当时的境遇和其他农场主一样，濒临破产。那时也不是将资产都变卖为现金的最佳时间。如果将最后的这点财产变卖，杰斐逊就会一无所有，成为彻底的穷人。杰斐逊试图从已经废除的弗吉尼亚州法律中寻找解决办法。杰斐逊请求立法机构，希望能以公平的、现实的办法处理自己的财产。杰斐逊说："我可以保留蒙蒂塞洛的房子以及周边的农场，这样我余生就有地方住，死后也有地方安葬。如果不能如愿，我就只能将这里的所有房产变卖，带着家人住到贝德福德郡去，那里起码有一间木屋可供我们安身。"杰斐逊的请求一提出就遭到了反对。在信中，杰斐逊谦逊地说："与我之前的担忧相比，现在的问题更多。我不确定立法机关是否会无视我的请求。我本来信心十足，却发现是我高估了自己，心中不免有点失落。"事实并未让杰斐逊失望，授权法案在两院以高票通过，杰斐逊十分欣慰。这个方案最终并未实行。这一消息传开后，全国各地都有人出钱给予杰斐逊帮助。有人集会倡议，大一点的城市已经开始捐款。就像亨利·兰德尔所说，"那些曾受过这位前总统恩惠的人们，现在看来要回报他了"。杰斐逊拒绝了国库借款和赠予者的好意。他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拿国库一分一毫。政府偶尔给予我补助，我已经很满意了。我乐意接受他人自愿给予我的帮助。我的付出是我收入的三倍。我要把我的一生都奉献给美国民众。"杰斐逊还说："人们以这种崇高的方式，自告奋勇地帮助我这位年迈的退休公务员，使我不至于无家可归。这些钱没有一分是从纳税人身上榨取的，它们都是来自纯粹的善心，完全出于自愿。"

别人的慷慨只能让杰斐逊最后的时光过得较为安稳，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帮助。杰斐逊离世后，他的财产依然笼罩在债务的阴影下，捐助也已停止，遗嘱执行人必须处理所有的遗留问题。田地以每亩三到十美元的低价出售。即使如此也无法偿还欠款。所幸的是遗嘱执行人偿还了剩余的欠款，没有一个债权人因为杰斐逊的离世而遭受损失。

人生的最后几年中，杰斐逊将自己的主要精力和财力都投入到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办上。作为该校的校长，他工作勤勉有成，但过程却曲

折艰难。弗吉尼亚大学的办学初衷是一所非基督教大学，引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也让杰斐逊耗费了不少精力。在杰斐逊看来，大学不应该有任何特殊的宗教信仰。他一生坚持的宗教观念引发了很多争议。杰斐逊的竞争对手不断攻击他，而他的朋友一直坚持反驳这种指责。人们的争论让杰斐逊十分恼火，但他不想站出来辩驳并结束这场争论。谈到此事，杰斐逊的语气里透着不快。这是他个人的选择，并且他也表示不会援手建立宗教裁判所。杰斐逊的孙子说，家人对杰斐逊宗教观念的了解也不比其他人多多少。杰斐逊不可能成为坚定的基督教信徒，也没有谨慎地反驳他人。从收集到的各种证据来看，杰斐逊不是基督徒。当然，对于这些证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亨利·兰德尔认为杰斐逊是基督徒，但给出的证据也不过是关于杰斐逊相信上帝和超神力的一些言论。这些都不足以证明杰斐逊信仰基督教。杰斐逊会穿着整齐地去教堂，也会像一位布道者一样庄严地谈论上帝，但总是慎言笃行，除了尊敬地称基督为人类的导师之外，不发表任何对上帝的评价。杰斐逊在一封信中曾写道："只有上帝希望每个人都信仰他的时候，我才是一个基督徒。我比任何信徒都崇尚上帝的教义，因为上帝拥有了所有人类的智慧，却别无所求。"杰斐逊将基督、苏格拉底和埃皮克题图做了比较后说，基督在三十三岁时离世，他的理性还没有发挥最大的作用，他对人类的劝诫也还没见效，也许再有三年，基督就能够建立一个拥有完美道德体系的社会。杰斐逊传播的教义零零碎碎、残缺不全，有些时常让人产生误解。杰斐逊认为基督是一位道德家，没有特殊的灵感，与神没有联系。正如莎士比亚不同于一般的戏剧家一样，基督也不是普通的说教者。他们的能力远高于一般人，且承担了自己应承担的责任。杰斐逊的追随者认为基督具有神性，他们中有人对杰斐逊的见解持反对态度，但却无力反驳。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杰斐逊专注于客观地记录自己经历的事情。也许杰斐逊是当时最伟大的书信作家。他精力充沛，一直自由地写作。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杰斐逊又为自己找了一份繁重的工作——给每一位读者回信。杰斐逊时常走神或者犯错，自己的想法必须写下来才能记住。他曾说："一厢情愿地出版自己的书信是一件危险的事，这样的人应该关进监狱。"杰斐逊认为自己1790年到退休前所有的信都被保留下来了。这些信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文库，后人可从信中了解准确的历史。与此同时，杰斐逊还尖锐地批判了约翰·马歇尔所著的《华盛顿传》，认为

其内容太过片面。得知约翰·昆西·亚当斯将要编辑约翰·亚当斯的作品，杰斐逊忧心忡忡地说：“我们需要了解真相，因为历史一旦被扭曲就会变成根深蒂固，很难更正。”去世前不久，杰斐逊写信给詹姆斯·麦迪逊说：“你是我一生的支柱，在我人生的最后时刻请您来看看我。”杰斐逊甚至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焦虑，为后世的史书中对联邦党人的赞誉超过共和党人而忧心不已。事实证明杰斐逊的焦虑不是没有道理。在广大读者面前，联邦党确实比共和党更具实力和优势。

岁月催人老，杰斐逊不再是那个大家熟悉的精力充沛的人了。他陷入了无助的恐惧之中，智力减退，身体衰弱，各种迹象表明他的精神也陷入了一种病态的不安之中。杰斐逊甚至猜想自己真正的状态要比别人看到的差得多。即或在逐渐丧失记忆的时候，杰斐逊依旧保持着清醒的意识。虽然在出版的书信中很少发现杰斐逊抱怨的只字片语，但却能感受到他的忧郁和愁苦。杰斐逊再也不能对工作吹毛求疵，不能因完成工作而欢欣鼓舞，但他在历史上的权威依然存在。退休后，杰斐逊依然透露出勇敢和友善。比起死亡的威胁，杰斐逊也许更害怕失去工作的能力。1826年初，杰斐逊的身体状况变得更糟。1826年5月中旬，杰斐逊彻底病倒了。春天的时候他还手不释卷地阅读《圣经》和希腊悲剧，但很快阅读也成了奢望。1826年的7月4日，杰斐逊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亲人们都围在他的身边。他多希望能够看到第二天的太阳啊！时间在慢慢流失，杰斐逊也愈来愈虚弱。朋友们不想让他失望，毕竟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渴望是如此神圣。在弥留之际，杰斐逊的意识已经模糊，但他仍然坚持着这份渴望。生命就是这样，无论杰斐逊的求生欲望多么强烈，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就在杰斐逊去世前大约一小时，约翰·亚当斯在佛罗里达州加斯登县昆西镇与世长辞。约翰·亚当斯在最后的时刻挣扎着说：“托马斯·杰斐逊还活着！”在历史上，这样的巧合绝无仅有。

专有名词英汉对照

Wales	威尔士
Snowdon	斯诺登峰
Mayflower	“五月花”号
Tuckahoe	塔卡霍
William Randolph	威廉·伦道夫
Henry Weatherbourne	亨利·韦瑟伯恩
Punch	潘趣酒
Rivanna	里瓦那河
Shadwell	沙德韦尔
Monticello	蒙蒂塞洛
Williamsburg	威廉斯堡
Tucker	塔克
Parton	帕顿
William Small	威廉·斯莫尔
Ossian	奥西恩
Raleigh	罗利
Francis Fauquier	弗朗西斯·福基尔
John Page	约翰·佩奇
Bathurst Skelton	巴瑟斯特·斯凯尔顿
John Wayles	约翰·威思
Henry Randall	亨利·兰德尔
Marseilles	马赛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
Georgia	佐治亚
Patrick Henry	帕特里克·亨利
Albemarle	阿尔伯马尔
Botetourt	博特托尔
Narragansett Bay	纳拉甘塞特湾
Earl of Dunmore	邓莫尔勋爵

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	联络委员会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
Boston Port Bill	《波士顿港口法案》
Peyton Randolph	佩顿·伦道夫
Edmund Burke	埃德蒙·伯克
James I	詹姆斯一世
Hanover	汉诺威
Westminster Hall	威斯敏斯特大厅
Lord North	诺斯勋爵
George Nicholas	乔治·尼古拉
Mercer	默瑟
Philadelphia	费城
Lord Chatham	查塔姆勋爵
Benjamin Franklin	本杰明·富兰克林
Edward Rutledge	爱德华·拉特里奇
Bunker's Hill	邦克山
John Dickinson	约翰·迪金森
Thomas Paine	托马斯·潘恩
Lexington	列克星敦
Charles-town	查尔斯镇
Falmouth	法尔茅斯
Norfolk	诺福克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
Richard Henry Lee	理查德·亨利·李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
Roger Sherman	罗杰·谢尔曼
Robert R. Livingston	罗伯特·R.利文斯顿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
George III	乔治三世
John Hancock	约翰·汉考克
District Court	地方法院
Benjamin Harrison	本杰明·哈里森
Elbridge Gerry	埃尔布里奇·格里

Timothy Pickering	蒂莫西·皮克林
George Mason	乔治·梅森
George Wythe	乔治·威思
James Madison	詹姆斯·麦迪逊
Edmund Pendleton	埃德蒙·彭德尔顿
Peter Carr	彼得·卡尔
Episcopal Church	美国圣公会
Richmond	里士满
Revolutionary War	独立战争
Carolina	卡罗来纳
Greene	格林军
Charles Cornwallis	查尔斯·康沃利斯
George Rogers Clarke	乔治·罗杰斯·克拉克
Phillips	菲利普斯
Hampton Roads	汉普敦水道
John Burgoyne	约翰·伯戈因
Camden	卡姆登
Horatio Gates	霍雷肖·盖茨
Leslie	莱斯利
Chesapeake	切萨皮克
Baltimore	巴尔的摩
Petersburg	彼得斯堡
Thomas Nelson	托马斯·尼尔森
Benedict Arnold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
Charlottesville	夏洛茨维尔
Banastre Tarlton	伯纳斯特·塔尔顿
James Monroe	詹姆斯·门罗
Martha	玛莎
Mary	玛丽
Dabney	达布尼
Dene	迪恩
Ampthill	安特希尔
Gary	盖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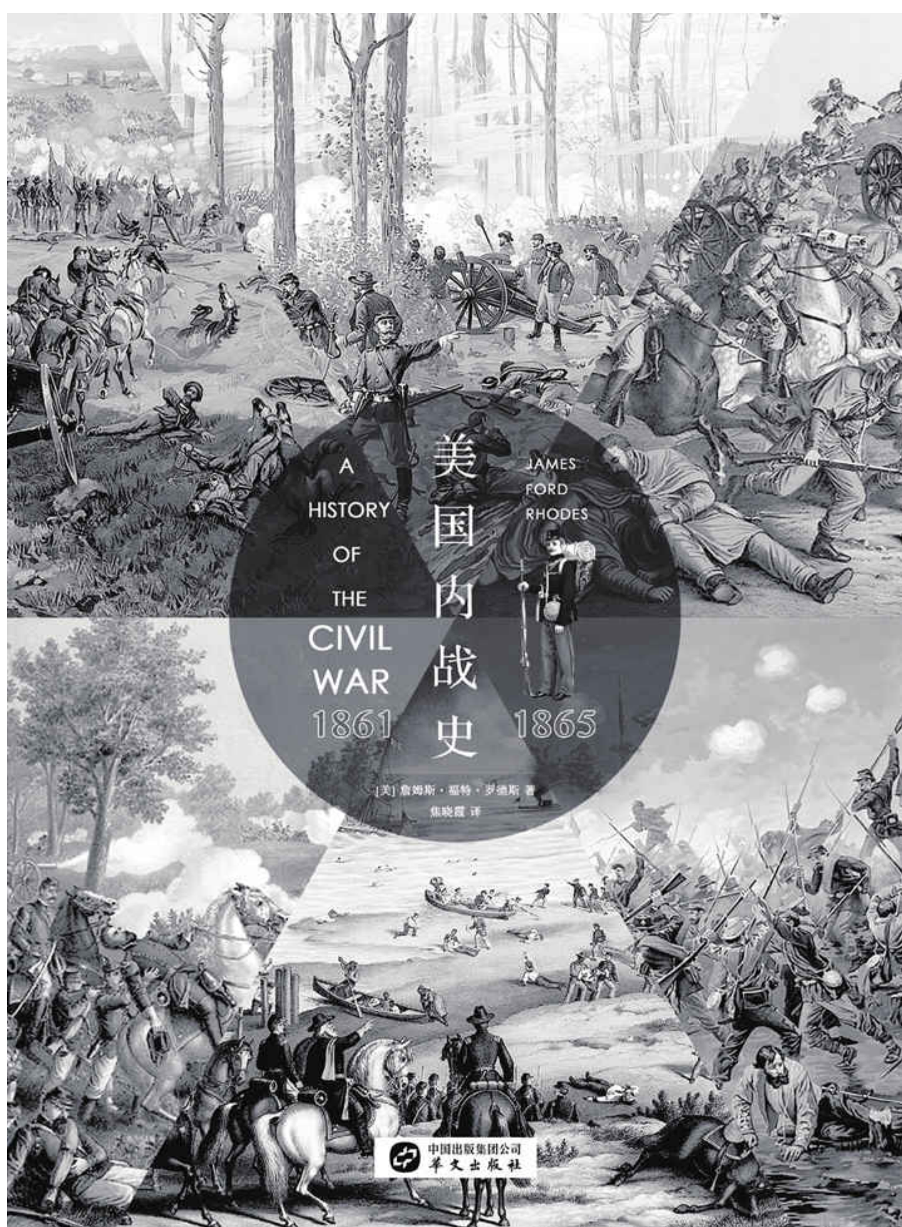
Gouvernail Morris	古弗尼尔·莫里斯
Sylvania	喜瓦尼亚
Michigauia	密希高尼亚
Cherronesus	雪龙斯
Assenisippia	阿森尼西亚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Illinoia	伊利诺伊
Saratoga	萨拉托加
Polypotamia	波力波塔米亚
Pickering	皮克林
Pelisipia	皮力西比娅
Portsmouth	朴次茅斯
Count of Montmorin	蒙莫林伯爵
Count of Vergennes	维尔热纳伯爵
Carthage	迦太基
Bastille	巴士底狱
Lafayette	拉法耶特
Versailles	凡尔赛宫
Archbishop of Bordeaux	波尔多大主教
Reign of Terror	恐怖统治
Robespierre	罗伯斯庇尔
Havre	勒阿弗尔
Daniel Shays	丹尼尔·谢司
Alexander Hamilton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Cowes	考斯
Henry Knox	亨利·诺克斯
Edmund Randolph	埃德蒙·伦道夫
Potomac	波托马克
Albert Gallatin	艾伯特·加勒廷
Mahomet	穆罕默德
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
John Marshall	约翰·马歇尔
William Giles	威廉·贾尔斯

Colonel George Mason	乔治·梅森上校
John Quincy Adams	约翰·昆西·亚当斯
Philip Freneau	菲利普·弗瑞诺
Georges-Jacques Danton	乔治·雅克·丹东
Girondins	吉伦特派
Jacobins	雅各宾派
Andrew Jackson	安德鲁·杰克逊
Gallic	高卢
Genet	热内
Charleston	查尔斯顿
Grange	画眉山庄
Delaware	特拉华
William Short	威廉·肖特
Jay's Treaty	《杰伊条约》
Charles Cozsworth Pinkney	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
George Clinton	乔治·克林顿
Aaron Burr	阿伦·伯尔
Mifflin	米夫林
Directory	督政府
Nore Anchorage	诺尔锚地
Filippo Mazzei	菲利波·马泽伊
Samson	参孙
Solomon	所罗门
Cincinnati	辛辛那提
Lear	李尔
Richard Hildreth	理查德·希尔德雷斯
Talleyrand	塔列朗
Thermopylae	塞莫皮莱
Spartans	斯巴达人
Vermont	佛蒙特
Maryland	马里兰
Levi Lincoln	李维·林肯
Merry	梅里

Samuel Bishop	撒母耳主教
New Haven	纽黑文
James Thomson Callender	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
Reynolds	雷诺兹
Louisiana	路易斯安那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
Court of Madrid	马德里法院
Carmichael	卡迈克尔
Florida	佛罗里达
Island of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岛
St. Domingo	圣多明戈
Dupont de Nemours	杜邦·德·穆尔
Napoléon Bonapart	拿破仑·波拿巴
Allegheny	阿勒格尼河
Amiens	亚眠
Florida	佛罗里达
Wilkinson	威尔金森
Pierre Clément de Laussat	皮埃尔·克莱门特·洛萨
New Hampshire	新罕布什尔
Bedford	贝德福德郡
Christ	基督
Socrates	苏格拉底
Epictetus	埃皮克题图
Supreme Court	最高法院
Samuel Chase	塞缪尔·蔡斯
Copperfield	科波菲尔
Dick	迪克
Fries	弗里斯
Whigs	辉格党
Rufus King	鲁弗斯·金
Sermon on the Mount	登山宝训
Trafalgar	特拉法加
Moctezumas	蒙特祖玛二世

Alleghanies	阿利根尼山脉
Luther Martin	路德·马丁
War Department	战争部
Henrico	亨里科郡
Maine	缅因
Ohio	俄亥俄
Quids	奎兹
Salem	塞勒姆
Leander	利安德
Sandy Hook	桑迪岬岛
Charles James Fox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
Copenhagen	哥本哈根
Gulf Stream	墨西哥湾流
Orders in Counci	枢密院令
Berlin	柏林
Milan	米兰
Halifax	哈利法克斯
Lexington	莱克星顿
Rose	罗斯
Tories	托利党人
George Canning	乔治·坎宁
Connecticut	康涅狄格
Quebec	魁北克
William Duane	威廉·杜安
Anas	阿拉斯
Missouri Compromise	《密苏里妥协案》
Athenian	雅典人




美国内战史
A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1861
1865
JAMES FORD RHODES
[美] 詹姆斯·福特·罗德斯 著
焦晓霞 译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内战史：1861—1865 /（美）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焦晓霞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5

（华文全球史）

ISBN 978-7-5075-5096-2

Ⅰ．①美…　Ⅱ．①詹…②焦…　Ⅲ．①美国南北战争－史料　Ⅳ．①K712.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5757号

美国内战史：**1861—1865**

作　　者：［美］詹姆斯·福特·罗德斯

译　　者：焦晓霞

选题策划：

插图供应：029-85504182

责任编辑：佟玉梅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总编室010-58336239　发行部010-5833621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35.25

字　　数：568千字

版　　次：2019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5096-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

“我写的主题是历史……”

——詹姆斯·福特·罗德斯

“历史旨在发现真相，尽可能清楚地记录真相。”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认为，自己和历史学家们应该遵循的标准和原则就是历史本身。

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自学成才，不仅严于律己，为人正直，还慎独好思，是敏而好学、兢兢业业的历史研究者中的杰出代表。1848年，詹姆斯·福特·罗德斯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由于生逢艰难时世，童年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恰逢詹姆斯·福特·罗德斯高中毕业。后来，在大学学习两年后，他决定出国旅行。旅行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历史、文学、新闻、玄学等方面的著作，养成了字斟句酌、博览群书的习惯，并受用终生。

在欧洲旅行时，詹姆斯·福特·罗德斯无意间研习了冶金学。回国后，他开始帮助父亲打理煤矿和铁矿的开采生意。由于经营得当，公司的生意越来越好。但对詹姆斯·福特·罗德斯来说，这只不过是实现目标的一种途径。他常谈起1877年的一个夜晚，说：“……当我读理查德·希尔德雷斯的《美国史》时，我会放下书，问自己为什么不写一写美国的历史。”1885年，三十七岁的詹姆斯·福特·罗德斯已经实现经济独立，因此，他退出了商界。然而，年轻时的游历、从商经历及战后重建时期的动荡和压力一直伴随着他，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未来。

1885年后的三年时光里，詹姆斯·福特·罗德斯潜心研读修昔底德、塔西佗、希罗多德、爱德华·吉本、托马斯·卡莱尔、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等历史学家的著作，仔细聆听他们讲述曾经发生的一切，就像接受大学专业知识的熏陶一样。现在，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试图跻身于这些伟大的历史学家之列。

1891年，詹姆斯·福特·罗德斯的《1850年妥协案以来的美国史》前两卷授权出版，并于1893年问世。此时，詹姆斯·福特·罗德斯已经搬到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在坎布里奇，他虽然没有进入文学界的资历，但他的作品反响热烈。因此，他不但进入了文学界，还登上了哈佛文人

榜。随后，他又撰写了五卷书，记录了1877年以前美国国内的分分合合。然而，让他声名鹊起的著作是记录内战历史的前五卷书。后来，实业出身、没有学术基础的詹姆斯·福特·罗德斯成了美国历史学界的领军人物。1898年，他当选美国历史协会主席。

“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想成名，就必须在其作品中有所创新。”詹姆斯·福特·罗德斯做到了这一点。当时，他的作品确实有独创之处，也由此赢得了声誉。与詹姆斯·福特·罗德斯同时代的人深受内战的影响，虽然摆脱了战乱纷争，但战争的阴影伴随了他们一生。詹姆斯·福特·罗德斯明理善辩，能够中立地看待战后和平与战争阴影之间的冲突，客观阐述那段动荡不安的历史。他收集了书籍、回忆录、报纸、手稿、采访稿等大量文献资料，通过敏锐的辨别力筛选、提炼出了有价值的信息。因此，他对美国内战的理解非常独到准确，首次将美国内战全面公正地呈现在了世人面前。他客观评价了美国内战，认为北方没有暴力血腥的极端分子，南方也没有顽固不化的激进分子。

詹姆斯·福特·罗德斯遵循的原则是：历史学家“应该言必有据”。写作前，他会先找到证据，阐述他人的观点，然后准确无误地总结自己的观点。当然，他的观点有时也会掺杂一些偏见，毕竟人无完人。但这些掺杂偏见的观点并非意气用事或受人蛊惑，而是有理有据，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他明确指出，奴隶制是导致南北分裂和战争的主要原因，但南方并不需要为奴隶制负全责。他反对战争源于少数人的阴谋的说法，是第一个体恤和理解战败的南方的北方作家，认为这场战争的起因并不是非南即北。

虽然詹姆斯·福特·罗德斯用了大量篇幅叙述北方，但并不意味着他对南方邦联的评述不够客观。他熟悉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的社会结构，而且善于分析政治形势，洞悉军事动向和社会局势，能够合理完整地叙述历史。

研究美国内战的学者都不会忽略詹姆斯·福特·罗德斯的著作。学习历史编纂学的学生也会从他的著作及其发表的文章中学习历史研究方法。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认为，历史学家不仅要刻苦勤奋、力求准确、热爱真理、不偏不倚，还要熟读史料、精心筛选，做到叙事言简意赅，层层推

进。他还认为学生应该目标明确，据理力争。詹姆斯·福特·罗德斯的记者经历也许对他撰写历史类文章帮助很大，总之，他的历史著作行文简洁、通俗易懂。此外，他认为叙事必须始终围绕历史主线，不能随意插入奇闻逸事或某个自圆其说的故事。



詹姆斯·福特·罗德斯（1848—1927）

世纪之交，詹姆斯·福特·罗德斯的著作已经成为历史界的一个标杆。他为历史题材的写作开辟了一条新道路，朴实无华的文风值得后人学习。他的行文风格毫不浮夸，言辞恳切坦率，很少用华丽的辞藻掩饰知识或能力方面的不足。迄今为止，他的影响力一直只增不减。当代一些研究美国内战的著名历史学家继承了詹姆斯·福特·罗德斯的衣钵，但对历史的研究和挖掘已经扩展到整个美国史。詹姆斯·福特·罗德斯深入挖掘历

史，精心筛选编辑，审慎分析判断，将美国内战史呈现在了世人面前。他以自己的方式叙述历史，启发读者思考探索。更重要的是，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让阅读历史变成为一件令人愉悦的趣事，而不再是一件令人乏味无聊的琐事。

然而，一些人认为，詹姆斯·福特·罗德斯描述战后重建和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的两卷史书，没有之前的书那么有影响力，甚至存在一些不客观的论述。也许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和经历的事，使他无法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那样看待历史。此外，他的九卷史书和两卷讲稿得到了读者的高度赞扬。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詹姆斯·福特·罗德斯有幸看到了很多关于美国内战的第一手印刷资料。他曾说，官方的航海记录、海军日记、怀旧物件、书信及关于内战军事情况的回忆录、自传、研究等文献资料，帮助他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内战。他认为是时候汇总这些资料，为大众读者写一部编年史，让读者可以简洁明了地了解历史，从而避免对历史资料感到应接不暇。

因此，1913年，在出版商的建议下，詹姆斯·福特·罗德斯不仅开始重写早期作品，还在此基础上，以简明清晰的框架再现了美国内战史。这部历史著作成了他的最佳独著之一。1917年，《美国内战史（1861—1865）》首次出版，詹姆斯·福特·罗德斯在此书中并没有谈及战前复杂混乱的局势，而是直接叙述国家分裂和政局动荡造成的后果。他的叙述清晰明了，总结精炼简洁。他从战役和战斗的角度全面阐述军事事件，虽然没有一一描述细节，但在叙述中恰当地保留了血腥味。他认为内战事关联邦政府的存亡，因为它不仅影响了其他国家，还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影响。其间，南北方人民深受其害。

读完这部新版的历史著作，读者会深刻感受到詹姆斯·福特·罗德斯的伟大之处。这部作品以第一版为基础，保留了之前的准确性和严谨性，运用新的方法重新修订，并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是激发学生学习美国内战历史的优秀基础读物。1917年，詹姆斯·福特·罗德斯因《美国内战史（1861—1865）》荣获普利策历史奖。著名军事专家威廉·罗斯科·利弗莫尔在美国权威期刊《美国历史评论》上写道：“这部书极具魅力，为

大众读者提供了了解美国内战的清晰框架。此外，对内战非常感兴趣的人可以在这部书中找到关于内战的详细叙述和评论出处。它绝对不负盛名。”《纽约时报》中也提到：“作者的总结能力非常强，而且没有脱离本心、生命及事件的本质。他的知识储备扎实，大胆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为叙事注入了活力，重塑了美国内战时期的历史。”

詹姆斯·福特·罗德斯一直秉持公正的态度，从本质上理解南方。因此，他用了大量篇幅叙述北方历史，尤其是政治部分，对南方邦联政府和海军事务只做了简单介绍。尽管如此，这部书的整体描述比例依然非常恰当，无论读者属于哪一个政治派别，都会为美国的内战历史感到骄傲。对詹姆斯·福特·罗德斯来说，林肯是美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但罗伯特·E.李和托马斯·J.杰克逊也是他作品中的英雄。

人们可以通过阅读各种书籍、翻阅各类手稿，或亲临战场追溯美国内战，也可以专攻特定的课题。但任何一个“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或“业余的”历史爱好者，都需要读一些基础性书籍。这些书籍会让读者再次完整回顾和仔细思量美国内战史。任何程度的学生都应该以詹姆斯·福特·罗德斯为镜，激励自己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

詹姆斯·福特·罗德斯为人谦逊，他的研究历经数年，他常与当时的其他历史学家交流沟通。他蓄着胡子，身材魁梧，思维开阔，待人和蔼可亲，对事一丝不苟，很多政界领袖和学术泰斗都是他的朋友。他还屡获嘉奖，影响深远，即使在处处谄媚奉承的年代，他也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始终在思想言论方面保持独立。詹姆斯·福特·罗德斯属于那个时代，属于那个战火四起、满目疮痍，最终迎来了新生的时代。他目睹了新生国家的砥砺前行，并通过自己的内心、灵魂和思想撰写历史。他曾写道：“一位历史学家应该时刻铭记要为读者负责。”詹姆斯·福特·罗德斯做到了这一点。

埃弗里特·比奇·朗

伊利诺伊州奥克帕克

1960年12月

前言

这部书并非改编自我关于美国内战的三卷书，而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我的书只是众多权威参考书中的一本。每当遣词造句成篇时，我都会以此为参考，因为研读了一手权威资料后，我发现第一版作品中的结论是最准确的。1895年、1899年和1904年分别出版这三卷书以来，我又读到了许多新的原始资料，了解了关于内战时期的一些有价值的论述。我非常有幸读到了《联邦和同盟海军的官方记录》《吉迪恩·威尔斯的日记》《约翰·罗林斯传》[1]、约翰·海伊的《书信和日记》、海伦·尼古拉女士的《林肯的个人特质》《乔治·米德将军传》、威廉·罗斯科·利弗莫尔的《内战故事》、小约翰·比奇洛的《钱斯勒斯维尔战役》、W.R.赛耶的《约翰·海伊传》《卡尔·舒尔茨回忆录》等。我很感谢我的儿子丹尼尔·P.罗德斯为我编辑这部书，同时感谢D.M.马特森在历史研究和审读手稿方面提供给我的帮助，感谢我的秘书怀曼女士，感谢波士顿图书馆管理员查尔斯·博尔顿及助理怀尔德曼女士和卡塔那奇女士。

1917年

写于波士顿

[1] 这本书出版前，詹姆斯·H.威尔逊（James H. Wilson）允许我阅读手稿。——原注

编者注释说明

詹姆斯·福特·罗德斯是一位细心、严谨的历史学家。对编辑来说，发现几乎没有必要修正的事实是一件愉快的事。每个作家都会不小心出错，但詹姆斯·福特·罗德斯极少出错。我的职责是纠正他的极少数问题，更重要的是在相应的地方添加新的解释性脚注。当然，詹姆斯·福特·罗德斯的观点完全是他自己的，文中未做任何改动。在个别例子中，与他观点不同的地方已经做了说明，即脚注中有“编者注”的地方。与以前一样，作者或编辑感谢他人的慷慨帮助。我要感谢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的艾伦·内文斯博士及芝加哥的拉尔夫·G.纽曼和富兰克林·J.迈因，还要感谢芝加哥纽贝里图书馆和芝加哥公共图书馆。我的妻子制作了出版商提供的卷首地图。在准备序言时，我拜读了詹姆斯·福特·罗德斯的著作、讲稿和论文，研究了有关他作品的学术评论。能有机会参与这部著作首发四十四年后的再次出版工作，我由衷地感激。本着谦逊的态度，我完成了詹姆斯·福特·罗德斯作品的编辑工作，深入了解了美国历史学家们做出的贡献。通过他们，我更加了解美国的历史。

埃弗里特·比奇·朗

目录

序言
前言
编者注释说明
第1章　帷幕拉开：布尔溪战役
第1节　奴隶制瓦解
第2节　南卡罗来纳州理论
第3节　《克里滕登妥协法案》
第4节　南方邦联
第5节　林肯的就职演说
第6节　罗伯特·安德森少校与萨姆特堡
第7节　威廉·H.苏厄德的对外政策
第8节　罗伯特·安德森少校的补给
第9节　轰炸萨姆特堡
第10节　北方起兵
第11节　巴尔的摩暴乱
第12节　封锁
第13节　华盛顿岌岌可危
第14节　边境州
第15节　内战爆发
第16节　毫无准备
第17节　杰斐逊·戴维斯
第18节　林肯
第19节　进军里士满
第20节　布尔溪战役
第21节　林肯鼓舞士气
第2章　外部环境：英美冲突
第1节　国会
第2节　战事起因——奴隶制
第3节　约翰·C.弗里蒙特
第4节　乔治·B.麦克莱伦
第5节　英国的态度

第6节　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
第7节　维多利亚女王的指令
第8节　林肯和威廉·H.苏厄德的处理方式
第9节　释放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
第3章　战争前期：势均力敌的较量
第1节　西蒙·卡梅伦
第2节　埃德温·斯坦顿
第3节　多纳尔森堡战役
第4节　多纳尔森堡投降
第5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
第6节　乔治·B.麦克莱伦的短暂任职
第7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亨利·W.哈勒克
第8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威廉·T.谢尔曼
第9节　夏洛战役
第10节　林肯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
第11节　封锁
第12节　“梅里马克”号
第13节　“监视”号
第14节　戴维·法拉格特和古斯塔夫斯·福克斯
第15节　新奥尔良战役
第16节　乔治·B.麦克莱伦进军弗吉尼亚半岛
第17节　托马斯·J.杰克逊
第18节　费尔奥克斯战役
第19节　罗伯特·E.李
第20节　盖恩斯磨坊战役
第21节　乔治·B.麦克莱伦丧失斗志
第22节　罗伯特·E.李和乔治·B.麦克莱伦
第23节　罗伯特·E.李和托马斯·J.杰克逊
第24节　七日之战
第4章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第1节　法定货币法案
第2节　林肯对奴隶制的态度
第3节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草案

第4节　林肯和贺拉斯·格里利
第5节　征兵“三十多万”
第6节　约翰·波普和亨利·W.哈勒克
第7节　约翰·波普战败
第8节　乔治·B.麦克莱伦再获指挥权
第9节　罗伯特·E.李进军马里兰州
第10节　安蒂特姆战役
第11节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第5章　危机：北方联邦军接连失利
第1节　1862年秋季选举
第2节　辛辛那提的恐慌
第3节　乔治·P.比尔和奥利弗·P.莫顿
第4节　乔治·B.麦克莱伦被撤职
第5节　安布罗斯·伯恩赛德
第6节　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
第7节　内阁危机
第8节　林肯的政治智慧
第9节　林肯和萨蒙·P.蔡斯
第10节　林肯和威廉·H.苏厄德
第11节　默夫里斯伯勒战役
第12节　国会的作为
第13节　人民的态度
第14节　约瑟夫·胡克
第15节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
第16节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的影响
第6章　走出困境：乔治·米勒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胜利
第1节　罗伯特·E.李进军宾夕法尼亚州
第2节　乔治·米德接任约瑟夫·胡克
第3节　葛底斯堡战役
第4节　乔治·皮克特的进攻
第5节　罗伯特·E.李与乔治·米德
第6节　林肯与乔治·米德
第7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远征维克斯堡

第8节　维克斯堡战役
第9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
第10节　维克斯堡投降
第7章　英国的态度：保持中立
第1节　英国的民意
第2节　“亚拉巴马”号
第3节　英国提议调解
第4节　威廉·E.格拉德斯通
第5节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
第6节　约翰·拉塞尔伯爵
第7节　拿破仑三世
第8节　反奴情绪
第9节　《泰晤士报》和《星期六评论》
第10节　托马斯·卡莱尔和查尔斯·狄更斯
第11节　蒸汽铁甲舰
第12节　英国和法兰西帝国
第8章　胜利的曙光：奇克莫加战役和查塔努加战役
第1节　纽约征兵暴乱
第2节　葛底斯堡战役后的乔治·米德
第3节　威廉·罗斯克兰斯
第4节　奇克莫加战役
第5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指挥作战
第6节　乔治·托马斯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
第7节　查塔努加战役
第8节　征兵
第9章　北方联邦军的反攻：尤利西斯·S.格兰特担任总指挥
第1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
第2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进军威尔德内斯高原
第3节　冷港战役
第4节　查塔努加-亚特兰大战役
第5节　威廉·T.谢尔曼和乔治·托马斯
第6节　林肯和萨蒙·P.蔡斯
第7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进军里士满

第8节　林肯再次得到总统提名
第10章　失望背后的胜利曙光：莫比尔湾战役
第1节　林肯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
第2节　华盛顿岌岌可危
第3节　对尤利西斯·S.格兰特感到失望
第4节　招兵
第5节　约瑟夫·E.约翰斯顿和约翰·B.胡德
第6节　渴望和平
第7节　对林肯的不满
第8节　莫比尔湾战役
第9节　攻占亚特兰大
第10节　菲利普·谢里登
第11节　林肯再次当选总统
第11章　战场后方的北方人民
第1节　北方的生活
第2节　物资匮乏
第3节　邮资货币
第4节　辅币
第5节　北方人的沮丧和绝望
第6节　商业活动
第7节　肆意逮捕
第8节　“铜头蛇”
第9节　霍雷肖·西摩和克莱门特·L.法兰迪加姆
第10节　民主党人
第11节　林肯对肆意逮捕的态度
第12节　卫生义卖会
第13节　与南方通商
第14节　财务状况堪忧
第15节　北方的州长们
第16节　埃德温·斯坦顿和林肯
第12章　南方邦联的处境：物资极度短缺
第1节　南方的不安
第2节　茶叶和咖啡匮乏

第3节　面包和肉匮乏
第4节　交通困难
第5节　铁资源匮乏
第6节　战时军需品
第7节　偷过封锁线
第8节　黑奴
第9节　南方征兵
第10节　法定货币的狂欢
第11节　南方物价飞涨
第12节　强制征税势在必行
第13节　南方女性
第14节　焦虑与物资匮乏
第15节　充满宗教色彩的南方
第16节　南北对比
第17节　北方：独裁
第18节　南方：社会化国家
第19节　杰斐逊·戴维斯与林肯
第13章　战争尾声：威廉·T.谢尔曼的战略布局
第1节　威廉·T.谢尔曼和乔治·托马斯
第2节　威廉·T.谢尔曼向海边进军
第3节　就地觅食
第4节　破坏
第5节　黑人
第6节　攻占萨凡纳
第7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乔治·托马斯
第8节　纳什维尔战役
第9节　《第十三条修正案》
第10节　南方邦联的困境
第11节　罗伯特·E.李和杰斐逊·戴维斯
第12节　汉普顿锚地会议
第13节　宽宏大量的林肯
第14章　南方投降及林肯遇刺
第1节　威廉·T.谢尔曼行军北上

第2节　南卡罗来纳州
第3节　威廉·T.谢尔曼的军队
第4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威廉·T.谢尔曼
第5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罗伯特·E.李
第6节　撤离里士满
第7节　罗伯特·E.李投降
第8节　林肯遇刺
专有名词英汉对照
返回总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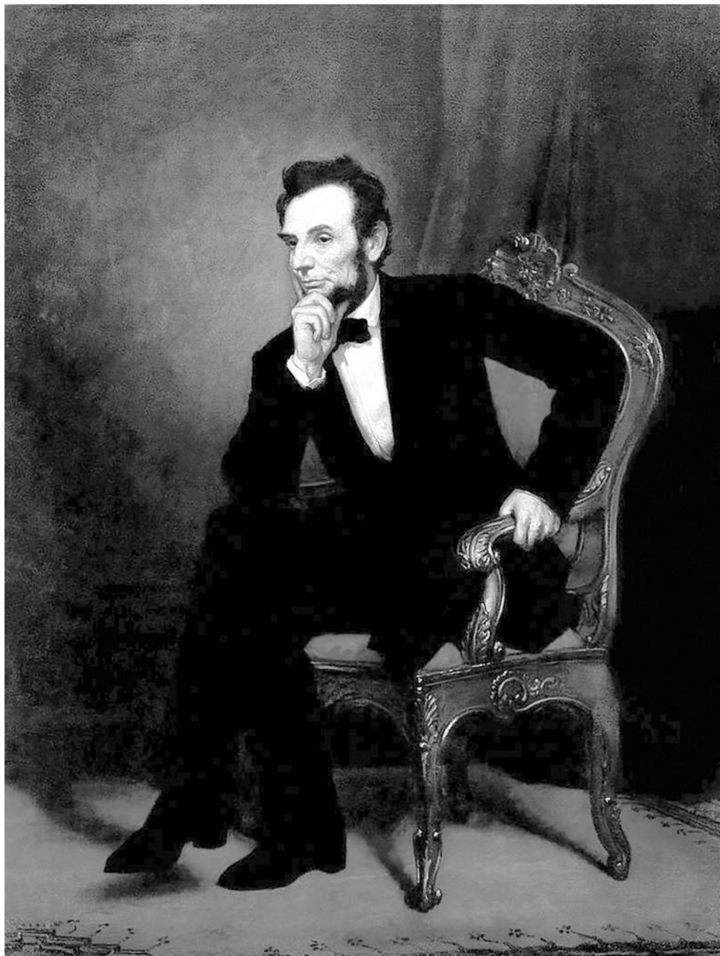
第1章　帷幕拉开：布尔溪战役

第1节　奴隶制瓦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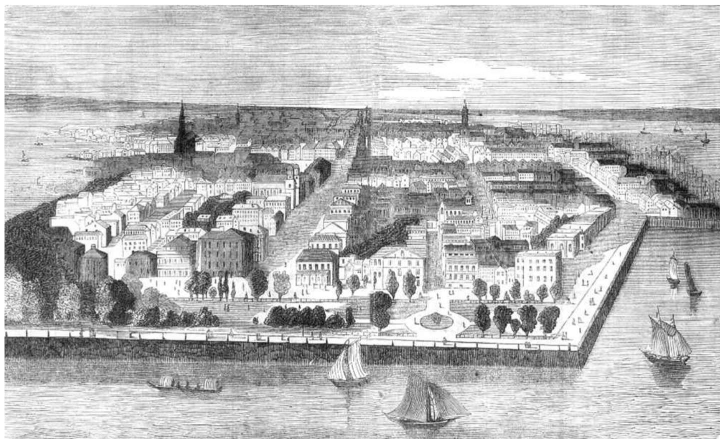
1860年，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1]，宣布反对奴隶制扩张到其他地区，奴隶制开始瓦解。其他地区指隶属美国的领土，但由于人口稀少和其他一些原因，一直没有建州。这些地区的管辖权仍在美国国会和总统手中。共和党人反对林肯干涉蓄奴州的政务，但坚决要求解放密苏里河以西的大片无政府领土。我已经在《美国史：1850年妥协案至1877年战后重建》中详细论述了林肯当选总统的影响[2]，在牛津大学出版的《讲稿》[3]第一篇中也有简要论述。林肯只获得了部分地区的支持。在南方的十一个州中，有十个州拒绝为林肯投票。后来，这十一个州脱离了北方联邦，重新组建了南方邦联[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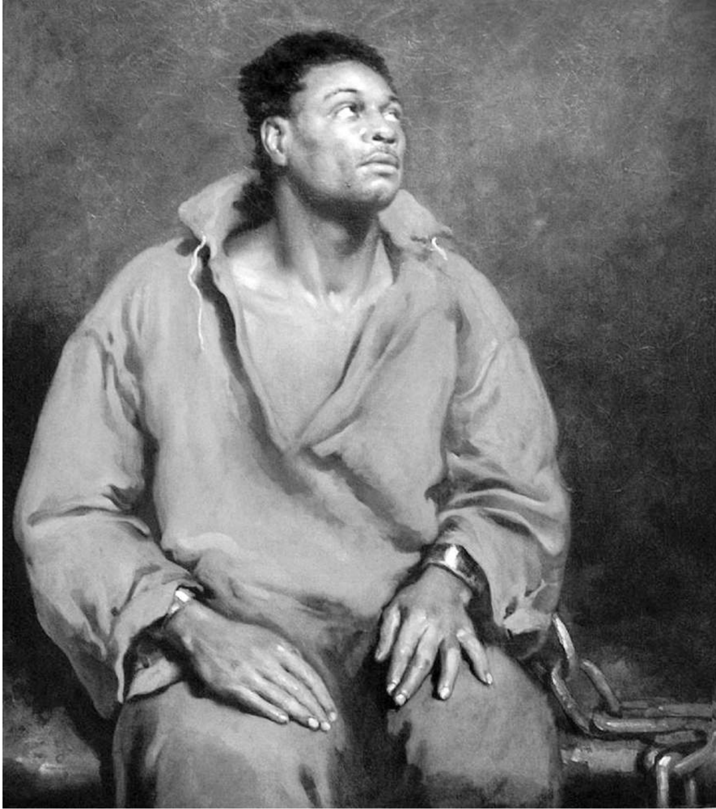
第2节　南卡罗来纳州理论

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非常支持奴隶制，希望尽快独立。虽然查尔斯顿当局和北方城市一样，为林肯的当选欢呼雀跃，但查尔斯顿人为南方邦联的成立呐喊助威[5]。查尔斯顿人得到了南卡罗来纳州其他地区民众的广泛支持。林肯当选后，他们看到自己珍视的奴隶制遭到攻击，因此，不想再支持一个视自己为邪恶势力的政府。他们将奴隶视为私人财产，认为自己有权将奴隶带到公共场所，就像北方居民有权将马和骡子视为财产一样。林肯如果当选总统，就一定会取缔他们的特权。换句话说，林肯会剥夺他们将黑人奴隶占为己有的权利。林肯在演讲中强调了奴隶制的弊端，坚信奴隶制是错误的，并宣称会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与奴隶制抗争到底，阻止奴隶制扩张。查尔斯顿人问道：自由人能否在不遭到他人质疑的情况下，表达不满之情？他们是否已经失去1776年以来的独立和自由精神的庇护？难道在受到侵略前，他们不应该果断出击吗？每个人都在谈论“革命”二字。这次危机就像修昔底德描述的那样：“当词义不再指对应的事物的时候……匹夫之勇被视为忠心之举，缓兵之计被视为懦夫之辩，适可而止被视为胆怯畏缩……破死忘生才是真正高贵的品质。”南卡罗来纳州人民热情高涨，异口同声地要求脱离联邦。当地政府迅速做出了回应。南卡罗来纳州按例召开了大会，并通过了脱离联邦法案，即《南卡罗来纳州独立宣言》[6]。



林肯（1809—1865）





手戴沉重铁镣的奴隶

南卡罗来纳州和其他棉花种植州的人们认为，《南卡罗来纳州独立宣言》通过的基础是《宪法》赋予各州的保留权利。查尔斯顿人奏起了军乐，点燃了篝火，鸣枪，放焰火，装彩灯，欢呼呐喊，庆贺《南卡罗来纳州独立宣言》的通过。对他们来说，《南卡罗来纳州独立宣言》标志着革命的开始，与1776年通过的《独立宣言》一样值得纪念[7]。

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组建了一个十三人委员会，商议在1776年的《独立宣言》精神下做出让步。托马斯·杰斐逊曾说，1820年，联邦的丧钟已经敲响，奴隶制“就像午夜响起的火警铃声，让我感到恐惧”。幸运的是，《密苏里妥协法案》拯救了联邦[8]。1850年，南北方再次因奴隶制陷入僵局。南方人制造了多起危机，导致联邦分裂。最后，亨利·克莱提出了妥协法案[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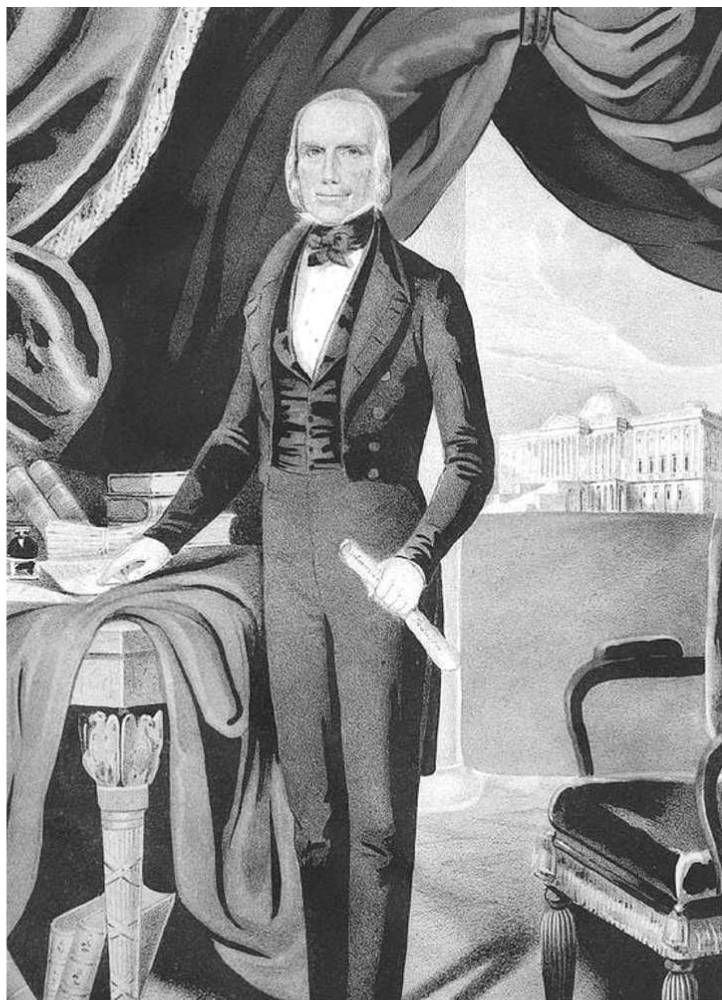
第3节　《克里滕登妥协法案》

1860年，北方各州和忠于联邦的边境州极力维护联邦，坚信国会可以像从前那样，以某种方式平息争端。参议院的十三人委员会希望留住六个[10]棉花种植州[11]，于是立即采取了唯一的权宜之计，即《克里滕登妥协法案》。这部法案的撰写者是肯塔基州的参议员约翰·J.克里滕登，法案以他的名字命名。法案中关于奴隶制边界的条款涉及统一与分裂问题。约翰·J.克里滕登提议修正宪法，将《密苏里妥协法案》中提到的北纬36°30′作为蓄奴州和自由州的分界线，规定北纬36°30′以北地区禁止奴隶制，以南地区保留奴隶制。据说，参议院的十三人委员会中，来自北方民主党和边境州的六位议员非常支持分界线条款。来自棉花种植州的两位议员不明白的是，在《密苏里妥协法案》拟定的分界线以南地区，奴隶制受到了保护。如果明白了这一点，他们也许会接受分界线条款。其他五位共和党议员反对分界线条款。一般情况下，具有约束力的条款必须获得五位共和党议员中多数人的支持，因此，妥协法案中的分界线条款被否决了。威廉·H.苏厄德[12]是十三位参议员中的一员，也是国会中共和党人的领袖，有望成为林肯内阁的领导人。他如果能得到林肯的支持，一定会赞成分界线条款。然而，林肯虽然愿意在其他争议问题中妥协，但在领土划分问题上，态度一直很强硬。当然，林肯更关心的是将来的领土划归问题。1860年，美国的部分领土被分割了出去。正如丹尼尔·韦伯斯特描述的那样，被分割出去的领土自愿为“自然法则”和“上帝意志”“献身”。林肯愿意提供一个机会，让奴隶主在密苏里妥协线以南的新墨西哥建立一个政治意义上的蓄奴州[13]。但他担心的是，如果将一条纬线定为蓄奴州和自由州的分界线，那么“南方地区可能会阻挠议案通过，纷纷成立蓄奴州，脱离联邦政府的控制”。他还写道：“我们只有将古巴作为棉花种植州留在联邦，才能结束这件事。”于是，林肯借助总统选举的间接影响力，命共和党议员否决《克里滕登妥协法案》。因此，共和党议员不得不声明自己不支持修正宪法的提议。后来，约翰·J.克里滕登提议让人民为他的议案投票。维护联邦的呼声很高。如果由人民投票，大多数人可能会一呼百应，支持《克里滕登妥协法案》。虽然只是一次民意投票，但国会无法掌控投票结果。约翰·J.克里滕登决心凭借人民的呼声赌一把，但由于共和党议员无声的反对，他

的计划戛然而止，想要留住六个棉花种植州的希望也破灭了[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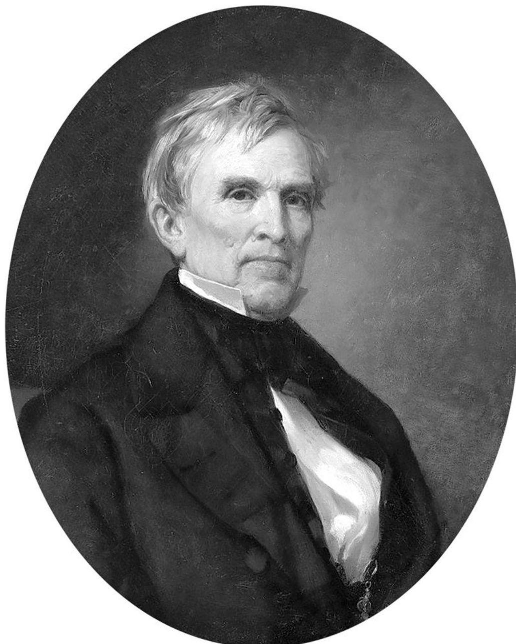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



亨利·克莱（1777—1852）



约翰·J.克里滕登（1787—1863）



威廉·H.苏厄德（1801—1872）

第4节　南方邦联

1861年1月9日至1861年2月1日，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均召开了大会，并通过了分裂法案。1861年2月初，南方邦联成立。来自六个棉花种植州的代表齐聚蒙哥马利[15]，按照既定程序建立了一个政府。新政府的宗旨是“……坚信黑人生而为奴”。会议选举了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16]，并仿照美国《宪法》制定了邦联《宪法》。但不同的是，邦联《宪法》明确承认奴隶制和国家分裂[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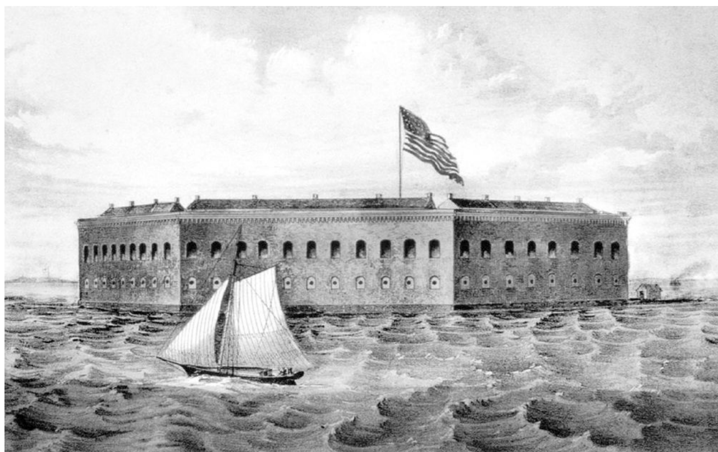
第5节　林肯的就职演说

1861年3月4日，林肯就任美国总统。当时的政治形势十分严峻。林肯获得了三十三个州组成的联邦支持，但上任之初，他已经失去了七个州。林肯认为："在未经其他州同意的情况下，任何州都无权脱离联邦。此外，总统有责任……让国家正常运转。" [18] 因此，他必须针对南方邦联的各州制定相关政策。然而，为了留住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和密苏里州及与它们关系密切的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阿肯色州 [19] ，林肯必须制定一套复杂的政策。上述七个州热爱北方联邦，但也垂涎南方奴隶制带来的利益。因此，林肯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将这些州对蓄奴州的同情转变为对北方联邦的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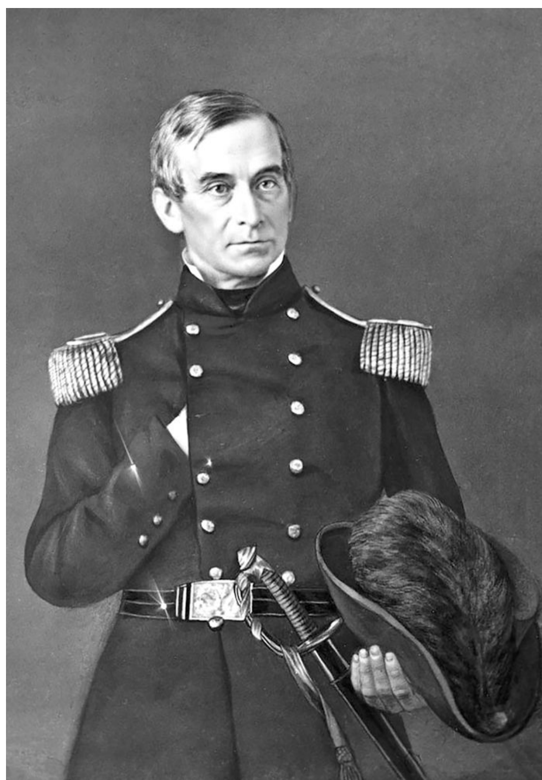
人们很难看出林肯如何改进他在就职演说中提到的政策。他说："我认为各州的联盟是永久的……我们紧紧相依……我将用大家赋予我的权力管理、维护、坚守属于政府的财产和土地。"身为总统，虽然难免会说一些豪言壮语，但这些话比安抚性言辞更能打动人心。林肯在演讲结束时，激动地呼吁"不知足的国人们"不要发动内战，但依然于事无补。

第6节　罗伯特·安德森少校与萨姆特堡

在国家分裂的战火中，棉花种植州将境内属于联邦政府的要塞、军火库、海关大楼和其他财产占为己有，并适时上交给了南方邦联。因此，截至1861年3月4日，林肯能够控制的南方要塞只有四个。其中，查尔斯顿的要塞萨姆特堡是最重要要塞之一[20]。内战爆发后，北方一直密切关注着南卡罗来纳州的动向。多年来，南卡罗来纳州始终抗拒联邦的束缚。查尔斯顿见证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瓦解[21]及民主党的分裂和1860年的共和党执政。随后，美国分裂，南方邦联成立。1860年12月，由于一起特殊事件，萨姆特堡引起了北方的关注。罗伯特·安德森少校率一小支部队占领了莫尔特里堡。但他知道一旦查尔斯顿人发动进攻，自己根本守不住莫尔特里堡。因此，1860年12月26日夜晚，罗伯特·安德森少校率军秘密撤到了一个更坚固的据点——萨姆特堡。1860年12月27日清晨，查尔斯顿人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愤怒，但北方人为此欢呼雀跃，甚至将罗伯特·安德森少校视为英雄[22]。林肯认识到了萨姆特堡的重要性，打算竭尽全力保护边界州及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阿肯色州，不再做出任何妥协。弗吉尼亚州正在召开大会，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阿肯色州静观其变，战事一触即发。与此同时，最大的困难逐渐显现。林肯必须守住萨姆特堡。但对弗吉尼亚人来说，坚守萨姆特堡夹杂着胁迫之意。在这种情况下，胁迫意味着迫使一个脱邦州重归联邦。然而，一旦北方联邦军有任何胁迫举动，弗吉尼亚州就会立即加入南方邦联。现在，南方邦联将北方联邦视为抢占南方要塞的“外国”敌人。北方联邦将美国国旗插在了南方的要塞上，对南方邦联来说，这是一种侮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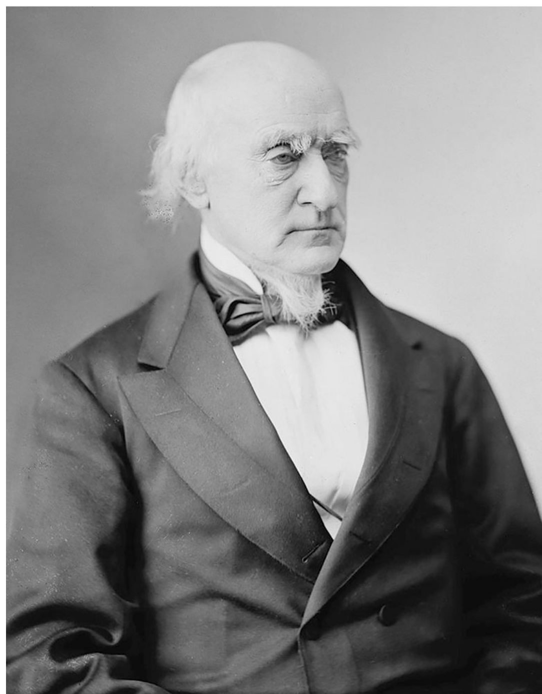
萨姆特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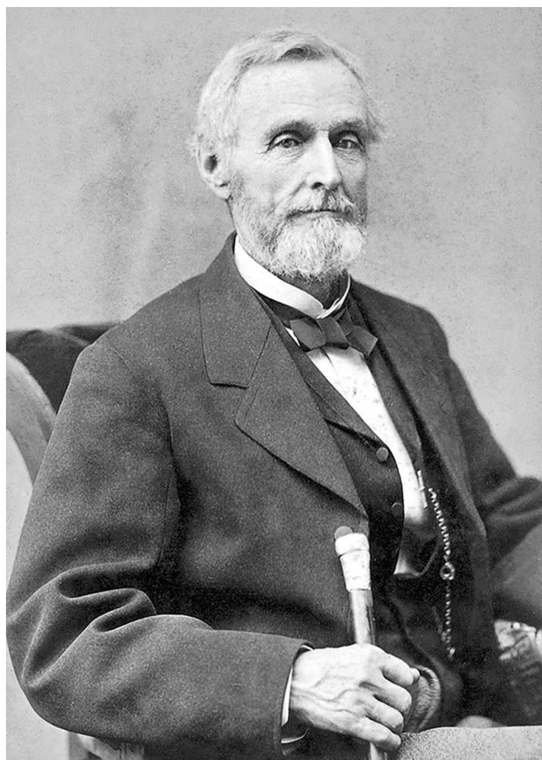
罗伯特·安德森（1805—1871）

第7节　威廉·H.苏厄德的对外政策

为了保护萨姆特堡，南方邦联试图与华盛顿政府进行间接谈判。林肯最信赖的顾问——国务卿威廉·H.苏厄德向南方邦联做了保证，使南方人备受鼓舞。威廉·H.苏厄德承诺南方邦联，北方联邦军将撤出萨姆特堡。林肯如果知道了他的承诺，一定会惴惴不安，中止谈判，避免让南方委员们上当受骗。1861年4月1日，一份名为《浅思总统之忧》的文件使林肯倍感忧虑。这份文件是威廉·H.苏厄德私下递交的，也是一份亟待实施的政策提要。文件内容包括：萨姆特堡的撤军、增援南方的联邦军及其他军事要塞，要求西班牙王国和法兰西帝国 [23] 立即做出解释，如果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则要求林肯召开国会特别会议，宣布对这两个国家发动战争，要求英国和俄国做出解释。威廉·H.苏厄德曾与约翰·A.坎贝尔法官进行谈判。约翰·A.坎贝尔法官是威廉·H.苏厄德和南方委员之间的调解员，受杰斐逊·戴维斯的委托来到华盛顿。谈判期间，威廉·H.苏厄德对自己的治国理念盲目自信，并向林肯不断施压，指出相关政策应该由内阁成员执行，而这个成员就是指他自己。他提出的外交政策不仅没有考虑后果，还毫无根据。美国与西班牙王国、法兰西帝国、英国及俄国相处融洽。1861年3月前，威廉·H.苏厄德说："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是可敬的利益伙伴。" [24] 他认为，如果美国挑起一场外战，棉花种植州与北方就会像兄弟一样团结在同一面国旗下，同仇敌忾。当然，林肯认为威廉·H.苏厄德的外交政策荒谬且愚蠢。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并未在《浅思总统之忧》的回复中提到该政策，而且密存了相关文件 [25] 。林肯既没有要求威廉·H.苏厄德辞职，也没有讽刺或责备他。



约翰·A.坎贝尔（1811—18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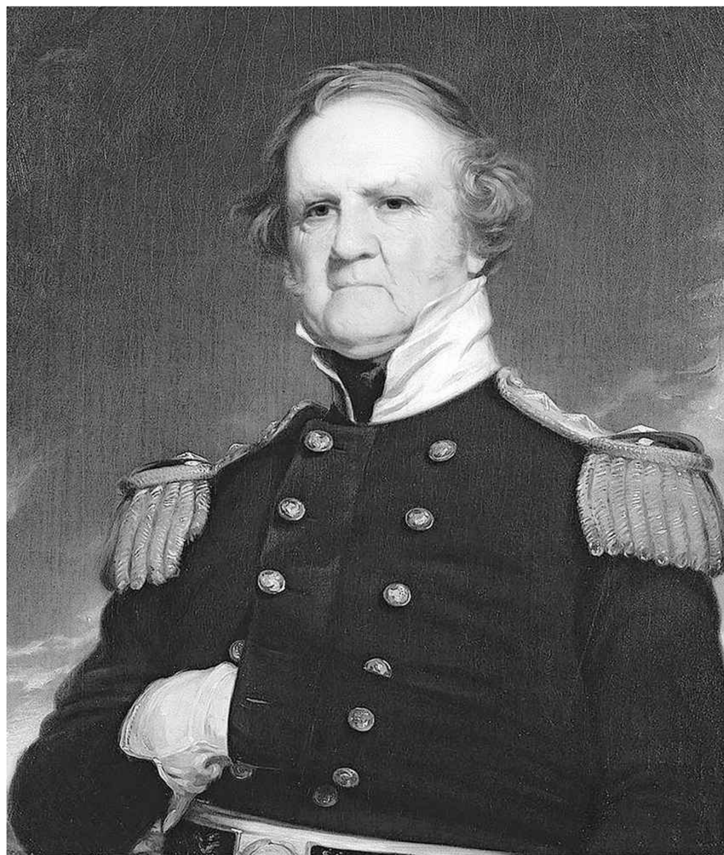


杰斐逊·戴维斯（1808—1889）

此外，林肯遇到了另一件棘手的事，即白宫办公室的争夺。威廉·H.苏厄德写道："白宫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觊觎办公室的人。"林肯说："我看似坐在宫殿里，实际上是为争执不休的房客指派房间。然而，宫殿正燃着熊熊大火，可能会瞬间化为灰烬。"[26] 本来，林肯应该专心考虑如何应对试图脱离联邦的州，但现在，他的政策连连受阻。此外，支持他的人不断为自己谋取私利，内阁负责人提出的建议也不合理。

第8节　罗伯特·安德森少校的补给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萨姆特堡问题。罗伯特·安德森少校认为，只要得到两万援兵的增援，就可以守住萨姆特堡。1861年3月5日，林肯得知了罗伯特·安德森少校的想法[27]。罗伯特·安德森少校的军队必须渡海抵达萨姆特堡附近地区，然后一路奋战到萨姆特堡。与此同时，南卡罗来纳人在查尔斯顿港建了炮台，并加固了萨姆特堡对面的几个堡垒。罗伯特·安德森少校的军粮只能撑到1861年4月中旬。军队主将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建议从萨姆特堡撤军，然后向南方进军。军中其他将领也赞成这一合理建议。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说道："任性的'姐妹'们，安静地离开吧！"[28] 1861年3月15日的内阁会议上，林肯询问自己的顾问，能否为萨姆特堡提供补给？威廉·H.苏厄德回答道不能，四人附议，其他两人认为可以一试[29]。林肯也想过撤离萨姆特堡[30]。他注视着弗吉尼亚州，希望大会延期，或不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只要弗吉尼亚州如期举行会议，就会导致国家分裂。他也许答应了一位弗吉尼亚代表，承诺如果弗吉尼亚州的大会无限期休会，他就召回罗伯特·安德森少校。然而，相关记载相互矛盾，无法证实这一点。但如果林肯真的承诺了什么，那么他的提议也并未转达给弗吉尼亚州当局，更不能左右弗吉尼亚州代表大会的召开[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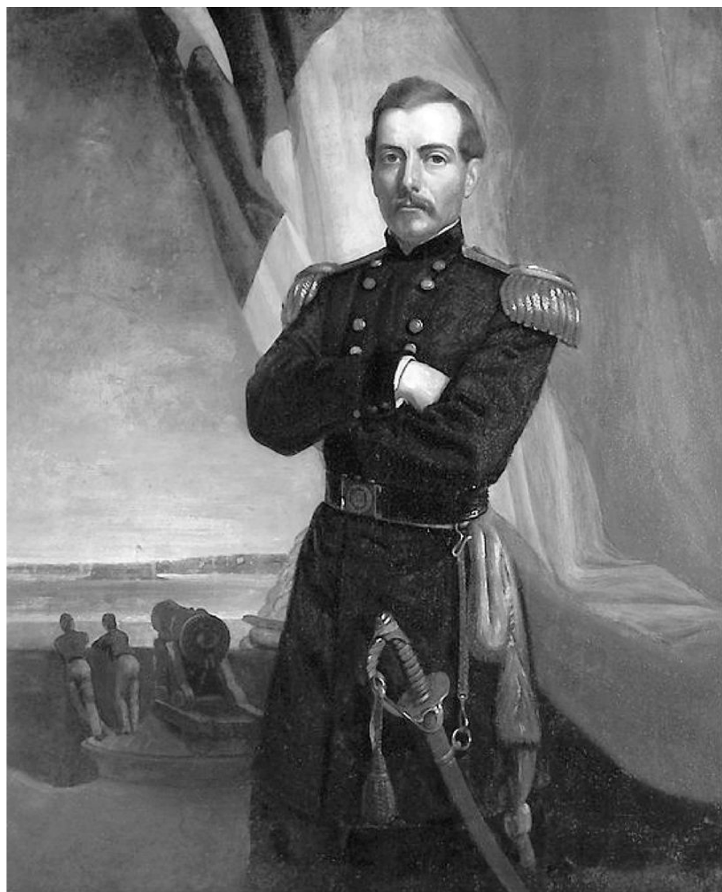


温菲尔德·斯科特（1786—1866）

北方的民意对林肯最后的决定有一定影响。放弃萨姆特堡似乎意味着接受和平分裂，允许南方各州脱离联邦，实行自治。最后，林肯得到了内阁的支持，做出了明智的决定。从军事层面看，增援萨姆特堡是不现实的。如果想要抵达萨姆特堡，北方必须打响战斗的第一枪。然而，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林肯决定“给罗伯特·安德森少校提供补给”。只有这样，罗伯特·安德森少校才不会因物资短缺放弃萨姆特堡。根据之前的承诺，林肯向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表达了自己的意图。查尔斯顿的南方邦联军指挥官皮埃尔·博勒加德与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一起听了林肯的正式通告，然后将通告内容发给了驻蒙哥马利的南方邦联政府。1861年4月10日，皮埃尔·博勒加德接到命令：如果北方联邦军拒绝撤离萨姆特堡，就发起进攻。

第9节　轰炸萨姆特堡

皮埃尔·博勒加德向北方联邦军提出了撤军的要求。与此同时，罗伯特·安德森少校也写好了回绝信。罗伯特·安德森少校对皮埃尔·博勒加德派来的信使说：“即使你们不将萨姆特堡夷为平地，我们也会在数日内弹尽粮绝。”[32] 皮埃尔·博勒加德立即向蒙哥马利的南方邦联政府汇报了罗伯特·安德森少校的回复。南方邦联政府认为，双方之间的敌意不能再加深，于是谨慎地回复道：“不要轻易轰炸萨姆特堡，如果罗伯特·安德森少校给出撤离萨姆特堡的具体时间……你们应该避免伤亡。”1861年4月11日，皮埃尔·博勒加德再次派人向罗伯特·安德森少校提出了撤军的要求。罗伯特·安德森少校再次拒绝了，但他在回信中写道：“如果在1861年4月15日中午12时前，我没有收到政府的指令或补给，我会……立即撤军……”[33] 皮埃尔·博勒加德的副官认为这些话“毫无意义”[34]，于是按照指示，命令约翰逊堡的驻军发起进攻。1861年4月12日凌晨4时30分，战斗打响。战火熊熊燃起，全民震惊，长达四年的美国内战拉开序幕。



皮埃尔·博勒加德（1818—18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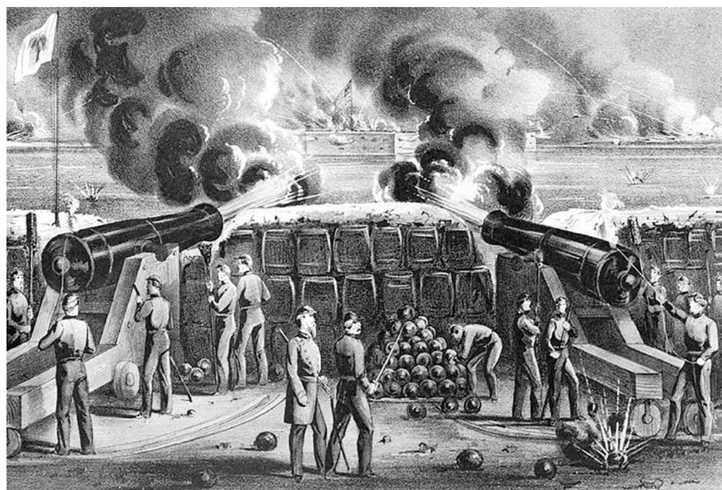
实际上，轰炸萨姆特堡并没有必要，因为萨姆特堡已经像被轰炸过一样。皮埃尔·博勒加德担心的不是罗伯特·安德森少校会得到补给，而是本该增援萨姆特堡的联邦救援队会潜伏在港口处，袭击南卡罗来纳州海岸。他的一位副官报告说：“港口外能清楚看到四艘停泊的大船。”查尔斯顿人以为海面上有六艘战舰 [35] 。有趣的是，通过岸上的通用警报，查尔斯顿人可以了解到救援队遭遇的情况。按照计划，救援队由四艘战舰、三艘蒸汽拖轮和“波罗的海”号商船组成。“波罗的海”号上的古斯塔夫斯·福克斯是救援队的长官。“波罗的海”号驶离查尔斯顿一个半小时后，轰炸开始，但海上只能看见一艘战舰 [36] 。1861年4月12日清晨7时，另一艘战舰 [37] 到达港口。最重要的战舰“波瓦坦”号 [38] 还未赶到。所有军需品都在舰船上，因此，军舰只能按兵不动，根本无法给萨姆特堡提供补给。由于行政效率低下及威廉·H.苏厄德的阻挠和海上风暴

的影响，救援任务失败。古斯塔夫斯·福克斯和同伴们空有一腔怒火，却无力帮助战友，只能眼睁睁看着萨姆特堡惨遭轰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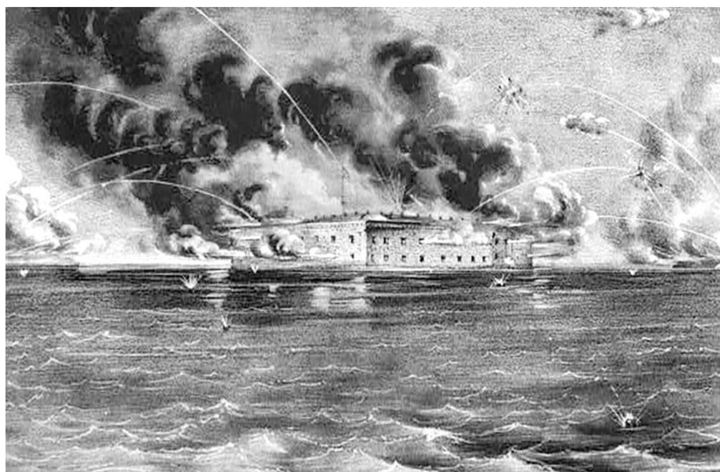
离开萨姆特堡前，皮埃尔·博勒加德的副官写信通知罗伯特·安德森少校，称一小时后，南方邦联军将向萨姆特堡开炮。罗伯特·安德森少校和其他军官来到炮塔上，叫醒了睡觉的士兵，宣布马上会有袭击，并命令士兵们天亮后再回击。约翰逊堡打响了第一炮。1861年4月12日凌晨4时30分，炮弹“射向天空，逐渐下落，差点儿直捣萨姆特堡”[39]。随后，卡明斯角响起了炮声，据说是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分裂主义者开的炮，他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官方文档中并没有记载这件事，但负责指挥的中校写道：“在轰炸过程中”，一位年长的弗吉尼亚士兵驻守在卡明斯角的一个炮台上，“他的热情感染了其他人，他成了士兵们的榜样”[40]。后来，所有炮台纷纷开火，萨姆特堡“被一片火海包围”[41]。与此同时，堡内的士兵遇到了从未经历过的一幕，眼睁睁看着炮弹迎面袭来。情况十分危险，他们被迫退回了防空洞，等待常规的列队点名和早饭指令。面包已经吃完了，早餐只有猪肉和碎米。1861年4月12日清晨7时，罗伯特·安德森少校下令向卡明斯角开火，随后交战激烈。一个半小时后，萨姆特堡向莫尔特里堡开火，双方“持续交锋了整整一天”[42]。查尔斯顿的民众聚集在屋顶、码头和炮台上，只为观看这场空前激烈的炮战。查尔斯顿人已经对北方联邦失去了信心，甚至憎恨美国国旗，就像威尼斯人憎恨奥地利人一样。虽然他们也担心自己的丈夫、儿子和兄弟的生命安全，但也为此刻的战役感到兴奋，因为他们的港口和城市再也不用受制于人了。

1861年4月12日下午，萨姆特堡的火力逐渐减弱。由于弹药紧缺，所有“多余的衣物、草纸和医用床单”都派上了用场，“堡内的六个注射针一直循环运作”[43]。1861年4月12日夜晚，萨姆特堡停火，南方邦联的炮台依旧炮声连连。天气骤变，暴雨大作，莫里斯岛和沙利文岛的驻兵预计“联邦救援队会派兵从周边小岛登陆，或派兵乘小船潜入萨姆特堡”[44]，因此，他们一直很警觉。1861年4月13日凌晨，轰炸再次开始。堡内的士兵吃完了最后的猪肉和碎米，很快投入战斗。莫尔特里堡的长官写道：“萨姆特堡很早就开火了，火力很猛，主要针对莫尔特里堡。”[45] 很快，莫尔特里堡和其他炮台发起了猛烈反击。萨姆特堡营房失

火，火药库岌岌可危。罗伯特·安德森少校派人将五十桶火药搬出来，分放在炮塔周围，然后紧锁火药库的门，并用土封住了大门。与此同时，木制营房燃起大火，危及到了炮塔的火药。罗伯特·安德森少校命人留下五桶火药，将其余火药扔进海里。1861年4月13日下午1时，守卫国旗的士兵倒下了，国旗坠落。但很快，国旗再次扬起。滚滚浓烟和熊熊战火昭示着罗伯特·安德森少校已经身陷囹圄。卡明斯角派出一名副官，手举白旗来见罗伯特·安德森少校。皮埃尔·博勒加德也派出了三名副官。经过谈判，双方签订了条约。罗伯特·安德森少校叙述道："1861年4月14日下午，旗帜飘扬，鼓声喧天，我率军离开了萨姆特堡，鸣枪五十下以示对国旗的敬意。"[46]



邦联军轰炸萨姆特堡



萨姆特堡遭轰炸



罗伯特·安德森少校升起国旗

在萨姆特堡战役中，双方无一人阵亡。当时的信件和报告比两年后撰写的军事资料更有意义，是军人们了解战争概况的基础读物。这些文献资料可以帮助士兵很快精通破城之术。萨姆特堡战役艰苦卓绝，一开始就是一场炮击决斗。

皮埃尔·博勒加德的副官们下令打响了第一炮，应该对战役负主要责任。他们本应该将罗伯特·安德森少校的回复告知皮埃尔·博勒加德，使南方邦联政府和平占领萨姆特堡，而不是提前用火力强攻。如果皮埃尔·博

勒加德收到了罗伯特·安德森的回复，一定会请示蒙哥马利的南方邦联政府。当然，联邦救援队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危险信号。然而，正如皮埃尔·博勒加德想到的那样，这一危险可以通过防御措施或炮轰萨姆特堡避免[47]。但南卡罗来纳州的人民渴望攻下萨姆特堡。皮埃尔·博勒加德的副官们受到了民众的鼓舞，决定下令开战。

1861年4月，大战一触即发。联邦众议院四分五裂，矛盾重重，而且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即使谈判也无济于事。因此，对林肯来说，南方反叛未必是一件坏事。杰斐逊·戴维斯据理力争[48]，并签署了相关文件。如果南北方士兵在休战旗下会面，或南方邦联兵和北方联邦兵坐在一起开玩笑，也许会提出一些问题。譬如，是谁发动了这场战争？是谁先开火的？是谁摧毁了萨姆特堡的城墙？[49]杰斐逊·戴维斯的文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第10节　北方起兵

1861年，亨利·亚当斯在华盛顿写道："总统大声疾呼全国武装起来。"[50] 亨利·亚当斯指的是林肯号召七万五千名志愿军参战的宣言。1861年4月14日，罗伯特·安德森少校离开萨姆特堡。林肯写道：这些士兵首战很可能去"夺回那些本属于联邦的堡垒、领土和财产"。林肯政府谨遵1795年2月28日通过的法案，将召集到的民兵分配到二十七个州，试图镇压七个棉花种植州通过违背"正常司法程序"建立的联盟。1861年7月4日，林肯召集国会成员召开了特别会议。陆军部向几位州长陈述了一些细节，譬如志愿兵的服务期限固定为三个月，但并未考虑到战事可能会延长。林肯遵循了1795年的法案。法案规定，在下次国会大会结束后，志愿兵只能服役三十天。

北方人因战败愤愤不平。1861年7月6日，他们看到了林肯的征兵告示。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写道："当萨姆特堡打响第一炮时，所有自由州团结了起来。"乔治·蒂克纳说："当时，举国沸腾。我从来不知道群情激昂是什么样子。北方从未有过这样的景象。"[51] 无论在哪里举行会议，州长、立法部门和个体公民都会精诚合作。人们并不在意自己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爱国的热情已经淹没党派之分。在萨姆特堡，南方邦联军首战告捷，并将华盛顿列在了攻陷名单上。北方联邦军必须全副武装守卫华盛顿。



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1819—1891）



乔治·蒂克纳（1791—1871）

第11节　巴尔的摩暴乱

马萨诸塞州第六兵团最先响应林肯的号召，于1861年4月17日离开了波士顿，1861年4月19日抵达巴尔的摩。巴尔的摩是乘火车到达华盛顿的必经之地，但巴尔的摩人十分赞成分裂。因此，准备抗击南方入侵的北方联邦军遇到了阻碍。在费城，马萨诸塞州第六兵团的指挥官得知巴尔的摩的情况后，于1861年4月19日上午抵达了巴尔的摩。在巴尔的摩，马车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乘客通常乘马车从费城前往一英里外的华盛顿车站，然后转乘巴尔的摩到俄亥俄州铁路段的火车，经四十英里后到达目的地。马萨诸塞州第六兵团的七个连队就这样穿过了巴尔的摩。然而，一群愤怒的暴徒集结起来，拆毁了铁路，并设了路障阻止其他队伍通过。马萨诸塞州第六兵团的其他四个连队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步行到车站。但他们还未动身，暴徒们就来了。暴徒们手持象征分裂的旗帜，威胁说如果军队穿过街道，所有“白人奴隶”都会被杀。军队指挥官命军队继续前进，由一名警察带路。前行途中，暴徒们向士兵们投掷砖块和石头。军队只走了一百码，就发现前方的一座桥已经被毁。指挥官说：“我们只能跳过去了。”他下令“加快行军步伐”。暴徒们以为士兵们没有弹药或不敢开枪，于是，气焰越来越嚣张，甚至向士兵们开枪。一名士兵阵亡。指挥官下令“开火”，立即击毙了几名暴徒。巴尔的摩的警察局长赶到现场后，站在队列的前面。他写道：“暴民们越来越大胆，袭击变得越来越暴力。双方都有人员伤亡。”巴尔的摩的市长也赶来了，但骚乱并没有平息。于是，市长离开了队列。四支连队继续前行，杀出了一条路，向前方的战友迈进。警察局长带领五十名士兵殿后。在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州，暴民们向士兵疯狂投掷石头，激怒了其中的一名士兵。这名士兵射杀了一位旁观的名流。终于，火车出发了，并在1861年4月19日傍晚时分抵达了华盛顿。这次暴力冲突中，马萨诸塞州第六兵团共有四人遇难，三十六人受伤。暴徒的伤亡人数更多[52]。

巴尔的摩陷入了动荡。警察局长说：“马里兰州人的鲜血染红了街道。”猖獗的分裂分子和支持南方的人抹杀了巴尔的摩对北方联邦的热爱。他们专断地拿走了一切，对巴尔的摩当局指手画脚。马里兰州州长和巴尔的摩市长向林肯发了一份联合公文，说：“这里的骚乱非常可怕，

请不要再派兵来了。”骚乱愈演愈烈，马里兰州和巴尔的摩市的部分军队已经出动。市民们自愿入伍，并分配到了武器，在警察局的带领下进行防御。人们聚集在纪念碑广场，明确表示反对一切高压政治。巴尔的摩市长和警察局长担心的是，如果北方军继续穿过巴尔的摩，可能会引起更多斗争和流血事件。因此，他们下令烧毁费城、威尔明顿和巴尔的摩境内的铁路线及北方中央铁路线和哈里斯堡铁路线上的一些桥。每条铁路线上都有三座桥被烧毁，通往北方的交通网彻底瘫痪了[53]。

第12节　封锁

萨姆特堡撤军后，不好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1861年4月17日，弗吉尼亚州召开了秘密大会，并通过了一项分裂法案。1861年4月18日，华盛顿当局获悉了弗吉尼亚州的分裂法案。杰斐逊·戴维斯回应了林肯集结七万五千名士兵的号召，要求获得针对联邦商船的捕押特许证[54]。1861年4月19日，林肯回应，宣布封锁南卡罗来纳州至得克萨斯州的南方港口，并声明南方邦联“伪政权”授权的任何私掠船一律按海盗船处置。1861年4月18日，弗吉尼亚州哈珀斯费里的指挥官知道自己无力防御，于是拆毁了武器库，烧了兵工厂，弃城逃走了。1861年4月20日，北方联邦军摧毁了戈斯波特的部分海军码头。很快，弗吉尼亚人占领了戈斯波特的海军码头。1861年4月20日，罗伯特·E.李辞去了联邦委员职务，意味着他已经决定与南方共进退。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曾称赞罗伯特·E.李，说罗伯特·E.李是南方邦联军中唯一能与他齐名的军官。罗伯特·E.李虽然一直未被南方邦联政府任命，但一直担任着指挥官一职。

第13节　华盛顿岌岌可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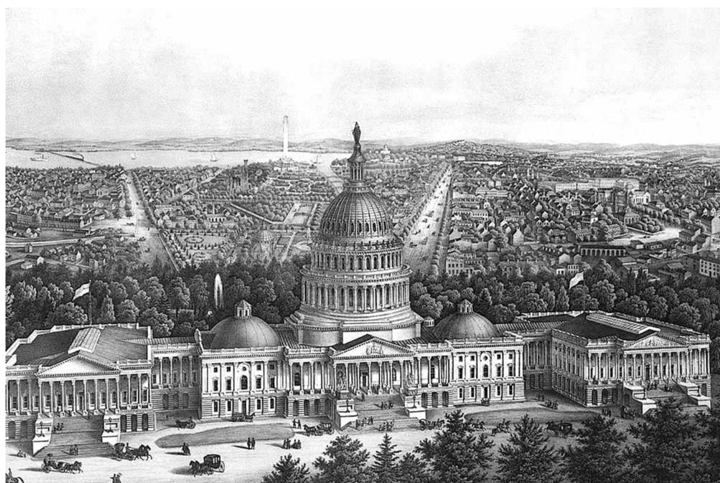
形势十分危急，巴尔的摩的暴乱 [55] 导致华盛顿与北方联邦军失去了联系，局势越来越紧张。1861年4月21日夜晚，华盛顿已经收不到北方联邦军的电报。联邦政府、效忠联邦的州政府和人民只能通过私人信使联系。信使历经千辛万苦，穿过危机四伏的马里兰州，将信息传递了出去。由于无法及时获知真实战况，谣言四起。联邦政府和民众都很担心华盛顿遭袭，也担心皮埃尔·博勒加德率领的南卡罗来纳军会很快乘火车北上，与里士满的弗吉利亚军会合。如果双方联手，华盛顿必定会失守。华盛顿已经做好应对围攻的准备。想要谋求一官半职的人惶恐不安，决定北上。在华盛顿，很多支持分裂的民众准备南下，因为他们担心城里所有男性会被征召入伍。1861年4月22日，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写道："南方邦联军包围了华盛顿的部分地区，华盛顿岌岌可危，一两天内可能会遭到全面袭击。"马萨诸塞州第八兵团和纽约州第七兵团通过水路到达了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催促马里兰州州长向林肯总统发电报，建议"勿派军队进入马里兰州"，并提议"请英国大臣理查德·莱昂勋爵 [56] 担任我国南北冲突的调节者" [57] 。

当时，约翰·海伊是林肯的一名秘书。他在日记中生动记录了那段战时岁月。描述马萨诸塞州第六兵团驻扎在国会大厦的情景时，约翰·海伊写道："以前，参议院会议厅里都是威严的老议员，现在，会议厅里都是稚嫩的年轻人，让人感到心寒。大多数年轻人的言行举止透露出新英格兰的气息。有人倚着桌子，有人坐着，有人站在走廊，有人踱来踱去。一些人写信很慢，因为他们干过农活的手比较僵硬。从握笔的手势中，可以看出他们刚学会写字。加卢沙·A.格罗 [58] 耐心地站在桌旁，等着为议员们免费寄信……1861年4月20日夜晚，华盛顿到处都是关于袭击的谣言……1861年4月21日早晨，我们登上行政大厦的城垛。林肯总统沿着海湾眺望远方，想着军队应该已经过了门罗堡、切萨皮克湾和波托马克河，到达了目的地。但他并没有猜中……我们截获了一份发往巴尔的摩的电报。电报中说，1861年4月22日，马萨诸塞州第八兵团和纽约州第七兵团到达了安纳波利斯。士兵们虽然已经筋疲力尽，但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我们可能明天就能见到他们……主妇们开始担心闹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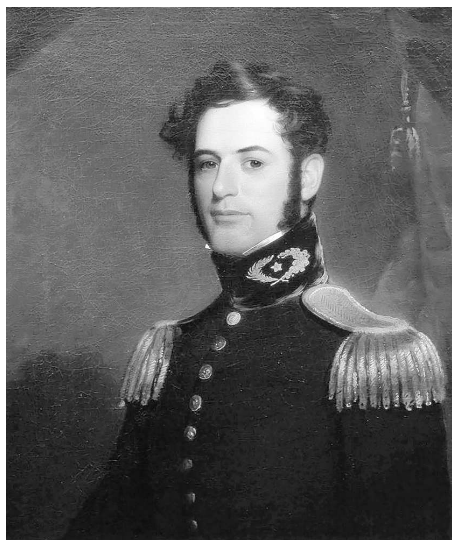
荒，因为面粉突然暴涨到了每桶十八美元。”[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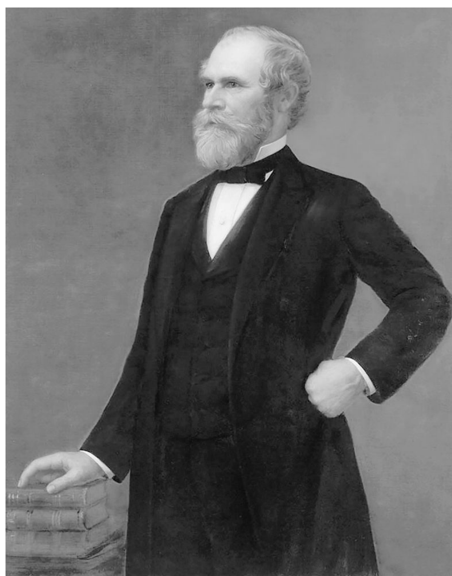
哈珀斯费里



国会大厦



罗伯特·E.李（1807—1870）



加卢沙·A.格罗（1823—1907）



理查德·莱昂勋爵（1817—1887）

林肯非常清楚守住华盛顿的重要性，很担心华盛顿失守。1861年4月23日过去了，但军队依然没有到来。林肯焦急地在行政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看着窗外的波托马克河，期待着船只的出现。他独自思索着，苦恼地感叹道："他们怎么还不来呢？他们怎么还不来呢？"当天，林肯收到了一封三天前从纽约发来的邮件。邮件里的报纸上写着："暴徒队伍越来越大，气焰越来越嚣张，北方的叛乱仍未平息。纽约州第七兵团已经出发，罗得岛州的军队也在路上。"约翰·海伊写道："1861年4月24日是充满怀疑、黑暗的一天。每个人似乎都心存疑虑，行为鲁莽。早上，林肯和马萨诸塞州第六兵团的志愿兵代表聊天时，似乎也感觉到了这种气氛。他说：'我认为除了你们，北方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了。纽约州第七

兵团还是个未知数。罗得岛州已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你们现在是北方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 [60]

与此同时，纽约州第七兵团和马萨诸塞州第八兵团正在向安纳波利斯的铁路交叉口迈进。在安纳波利斯的铁路交叉口，他们找到了一列可以迅速到达华盛顿的火车。1861年4月25日，纽约州第七兵团率先抵达华盛顿。士兵们一下车就列队穿过了宾夕法尼亚街，向着白宫行进，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华盛顿居民看到了纽约州第七兵团的兵力。林肯检阅了军队。纽约州第七兵团的到来表明，北方地区通往华盛顿的路开了，其他兵团也在路上，很快就能抵达华盛顿。华盛顿安全了 [61] 。然而，直到1861年5月9日，其他北方联邦军才艰难穿过巴尔的摩，从佩里维尔乘船出发，冒着枪林弹雨登陆。随后，在警力的护送下，北方联邦军乘车穿过南巴尔的摩，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阻挠。1861年5月13日，即交通中断二十四天后，费城的第一班列车抵达了华盛顿。很快，北方各城市间的民用、军用铁路交通恢复正常 [62] 。

南方邦联认为，林肯召集七万五千人是在宣战，意味着北方联邦军会进军南方，危及南方各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南方的暴乱和北方的暴乱非常相似。南方邦联人民宣称，只要他们手上有人力和财力，就会与林肯政府抗争到底。南方邦联的人民、各州长和杰斐逊·戴维斯同心，北方人与林肯同心。读官方记录时，如果不知道1861年美国各州的州名或公众人物的名字，想要区分所读内容是关于北方还是南方的，就只能参照编辑标出的“联邦”或“邦联”通讯录了。

第14节　边境州

林肯和杰斐逊·戴维斯的第一把赌注是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密苏里州和阿肯色州。虽然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爆发了游行示威，但一部分有影响力的人依然热爱北方联邦，马里兰州州长便是其中之一。在林肯总统的战略指导和州长的带领下，马里兰州更倾向北方联邦政府。

萨姆特堡遭到轰炸前两天，即1861年4月10日，在查尔斯顿，弗吉尼亚州的分裂主义者罗杰·A.普赖尔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他说道："各位，我要告诉你们，不到一个小时，一次重创就会让弗吉尼亚州加入南方邦联。"他了解自己的同胞。弗吉尼亚人与棉花种植州的人民一样躁动。面对林肯七万五千人的征兵令，弗吉尼亚州州长代表人民轻蔑地拒绝了。蒙哥马利听闻弗吉尼亚州"正燃烧着对林肯征兵令的熊熊怒火"[63]。1861年4月17日，弗吉尼亚州召开了大会，以一百零三票比四十六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分裂法案。如果1861年5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人民投票认可了分裂法案，该法令将生效[64]。弗吉尼亚州当局已经预料到公众的投票结果，因此，欣然加入了南方邦联。弗吉尼亚州州长发电报给蒙哥马利，说明了弗吉尼亚人的期望。很快，他收到了杰斐逊·戴维斯的加急信。信中说："联盟决议已经收到，邦联衷心接纳你们的提议，专员将乘下一班列车出发。"[65]为了兑现承诺，南方邦联副总统亚历山大·H.史蒂芬斯出发去了里士满。虽然他在信中写到了联盟实施中的"困境和难处"，但双方的共同目标是确定的。于是，他提议南方邦联政府和弗吉尼亚州建立军事联盟，弗吉尼亚州军队由杰斐逊·戴维斯控制和指挥[66]。1861年5月7日，南方邦联大会同意弗吉尼亚州加入邦联，并同意了1861年4月27日大会上的提议。1861年5月21日，里士满成为南方邦联首都[67]。



亚历山大·H.史蒂芬斯（1812—1883）

北卡罗来纳州长回复战争部长时说："我认为政府的征兵令违反了《宪法》，存在滥用职权的嫌疑，目的是镇压南方各州。我不参与……这场解放一个自由民族的战争。您不会从北卡罗来纳州得到军队。"[68] 林肯征兵前，北卡罗来纳州有三分之二的人反对脱邦[69]。然而现在，北卡罗来纳州迅人速召开了大会，并全票通过了分裂法案。北卡罗来纳州成为南方邦联的一员[70]。

1861年5月6日，阿肯色州召开了大会，通过了分裂法案，而且仅有一票反对分裂法案。很快，阿肯色州加入了南方邦联。田纳西州州长回应林肯的征兵令时说："田纳西州不会迫于高压提供兵力。"[71] 田纳西州并未正式通过分裂法案，但1861年5月，该州的立法机构与南方邦联建立了军事联盟。1861年6月8日，经人民投票决议，田纳西州成为南方邦联的一员。约五万八千名田纳西人赞成脱邦，支持加入南方邦联[72]。

肯塔基州州长在电报中说："肯塔基州不会出一兵一卒对抗南方各州

的同胞。”[73] 但他并未参与分裂运动。肯塔基州内意见不统一，并没有决定是否脱邦。林肯很了解自己的家乡，对支持联邦的人民非常宽容，有策略地引导他们逐渐加强其影响力。1861年8月，在新选举成立的立法机构中，每个部门约有四分之三的人支持联邦[74]。

密苏里州州长赞成脱离联邦，回应征兵令时说："我认为从目标来看，您的征兵要求是非法的、违宪的、不人道的、残忍的，甚至是具有革命性质的……密苏里州不会参与这种罪恶之举。"[75] 然而，他的强劲对手小弗朗西斯·P.布莱尔血气方刚，胆识过人，在圣路易斯具有很大影响力，人们都很爱戴他。他们之间展开了历时四个月的政治和军事较量。最终，小弗朗西斯·P.布莱尔获胜，密苏里州留在了联邦[76]。

第15节　内战爆发

南北两大阵营形成。十一个南方邦联州对阵二十三个北方联邦州，九百万南方人对阵两千两百万北方人。九百万南方人中，约有奴隶三百五十万人[77]。双方各具优势[78]，但互不了解。南方如果事先知道分裂会带来战争，而且敌人是团结的北方，那么是否会走向穷途末路还不一定。北方如果知道会与团结的南方较量，那么是否会开战也不一定[79]。威廉·皮特曾说："三百万自由的灵魂怎么可能被征服？"这句话已经成为英国人的一句格言。但现在，北方人面对的是五百五十万热忱勇敢的南方人。当南方人在前方浴血杀敌时，后方有三百五十万奴隶在为他们种地、照顾妻小。北方人为联邦而战，并认为大多数南方人受到了少数拥有权势、寡廉鲜耻的人的压制，他们实际上不想分裂，厌恶内战。南方人如果受到保护和鼓励，一定会投身保卫国家的运动。林肯理解北方人的想法，但他从不公开发表不确定的观点。1861年7月4日，在国会的特别会议上，林肯说："很多人可能存在疑虑，想知道具有合法资格的大多数选民是否支持国家分裂。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在所谓的脱邦州中，支持统一的人也占多数。"

《美国史》中详细阐述了上述内容，在此不再赘述。不过，我发现在我第一次讨论南北阵营问题二十年后，再次翻看原始资料时，更加确信的是：林肯发布征兵令后，南方邦联各州变得更团结了。我在第三卷书中引用了威廉·亨廷顿·拉塞尔写给《泰晤士报》的信和他的日记中的内容，这些引文足以佐证我的论点。威廉·亨廷顿·拉塞尔是一个聪慧、公正的人，痛恨奴隶制，坚信南方所谓的州权只是为了"保护奴隶制，拓展奴隶制地区，扩大与外界的奴隶自由贸易"。因此，他与北方同仇敌忾。1861年4月14日至1861年6月19日，威廉·亨廷顿·拉塞尔去了南方各州，坚信南方邦联人民已经团结起来。在总结旅途经历时，他写道："我到哪里都能深刻感受到邦联的团结和实力。人民与邦联同心协力，齐声呐喊力争'州权'，打算与发起战争的人抗争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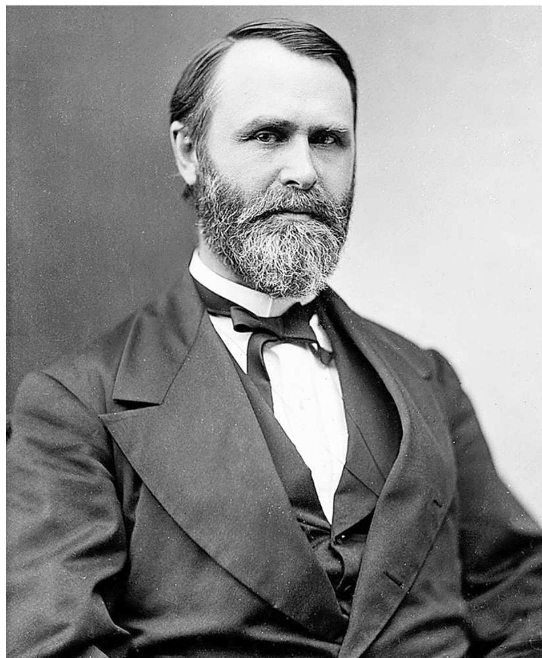
小弗朗西斯·P.布莱尔（1821—1875）

虽然威廉·亨廷顿·拉塞尔的评论有些言过其实，但他仍然希望北方赢得胜利，因为他预见到，北方的胜利意味着奴隶制的瓦解。然而，他也怀疑北方能否获胜。1861年4月，在查尔斯顿，威廉·亨廷顿·拉塞尔写道："联邦永远不会恢复原样了，它已经支离破碎。世上没有哪种力量可以使它回到过去。"1861年5月31日，在新奥尔良，威廉·亨廷顿·拉塞尔写道："分裂已经到来，《宪法》再也无法将破裂的碎片粘在一起。"他乘密西西比河上的一艘轮船，从南方邦联的营地前往开罗。在船上，他遇到了一位很健谈的英国船员。显然，他很赞成这名船员的结论，并引用了船员的话："这场战争完全是关于黑奴的。我在美国待了十六年，发现黑人最适合的身份就是奴隶。我了解南北双方。我告诉您，先生，北方人不可能彻底击败南方人，让他们尽力而为吧。"[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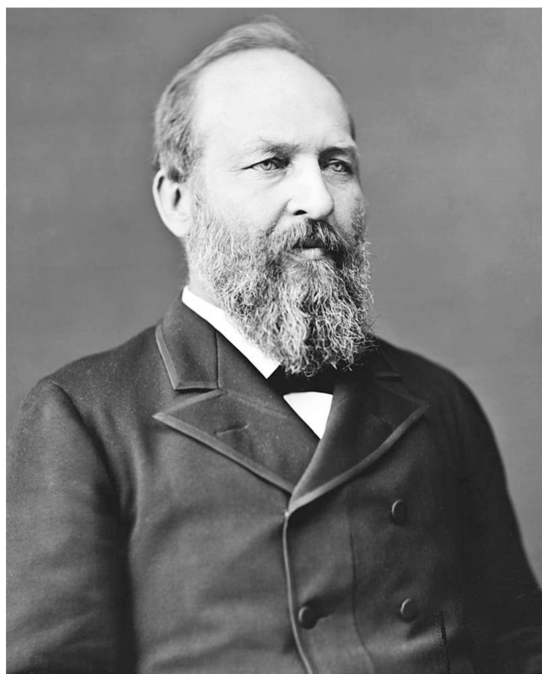
令人遗憾的是，南北双方坚持要以武力解决矛盾，并认为联邦应该分裂。在查尔斯顿，威廉·亨廷顿·拉塞尔遇到了一位老先生，老先生谈到内战的前景时，泪流满面，但他认为美国内战是“北方对南方无礼、不公和侵略的必然结果”。因此，他并不忧心战争结果。关于分裂，玛丽·切斯纳特写道：“这种痛苦太可怕了。”弗吉尼亚州大会在讨论脱邦法令时，一位持反对意见的代表当场语无伦次，泣不成声。另一位持赞成意见的代表一想到要切断南北方之间的纽带，哭得像孩子一样[81]。亨利·亚当斯回忆了1861年冬季的华盛顿，他写道：“美国没有一个人想要，或期待，或图谋发动内战。”海伦·尼古拉女士在斯普林菲尔德任林肯的私人秘书时，也有同感，她说：“没有人愿意打仗。”[82] 当战争来临的时候，雅各布·D.考克斯、詹姆斯·A.加菲尔德和俄亥俄州立法机关的成员接连叹息道：“内战是耻辱、荒唐的行为，是引起民愤的举动”。[83]

第16节　毫无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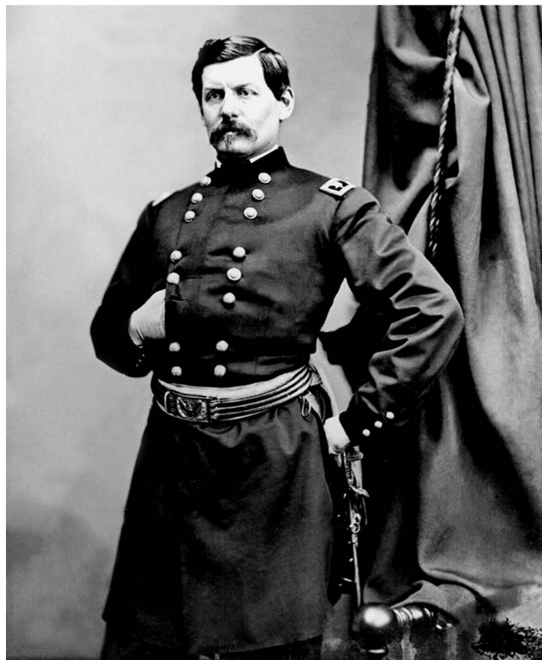
约翰·T.莫尔斯为林肯写了传记。这部传记成为当时的权威文献，并激起了人们研究伟人的兴趣。他写道："历史学家夸张地说，北方人见到武器恨不得急奔过去。如果真的有武器，他们肯定会这样做。但事实上，北方极度匮乏枪支。"[84]《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三的第1卷收录的信件可以证实约翰·T.莫尔斯的说法。在与联邦陆军部的通信中，好几个州的州长请求配备枪炮。没过多久，他们的请求变成了央求。俄亥俄州无疑是阿勒格尼山脉以西各州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在检查军火库时，俄亥俄州民兵团少将乔治·B.麦克莱伦发现几箱滑膛枪支已经生锈受损，两三架发射六磅炮弹的大炮变成了网状，之前的战马用过的马具已经发霉。检查完毕后，乔治·B.麦克莱伦无奈地说："好大一堆即将参战的军需品。"[85] 艾奥瓦州州长向联邦陆军部提出要求说："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我们一些武器吧！"这是所有人的想法。其他州也想要枪支，但联邦政府只能提供一部分。当各州收到老式步枪或类似装备时，发现自己不应该再将注意力放在必需品上。印第安纳州州长奥利弗·P.莫顿说，印第安纳州收到的武器"质量下等，都是老式步枪"，还说"经常得用锤子将刺刀砸进枪套里，许多枪的刺刀已经松动欲坠"。艾奥瓦州长写道："我们的士兵不愿拿着老式步枪与装备精良的南方邦联军交战。"马萨诸塞州意识到联邦政府已经无能为力，于是派人去欧洲购买精良武器。纽约州购买了英国的恩菲尔德式步枪。几个州的州长央求联邦政府发放装备、军装和其他物品。他们的军队急需军帽、军裤、法兰绒短上衣、法兰绒衬衫、军靴、军袜、军大衣和毛毯。战争部长在给奥利弗·P.莫顿的回信中写道："短时间内，政府无法为临时征召的军队提供军装和其他衣物。"[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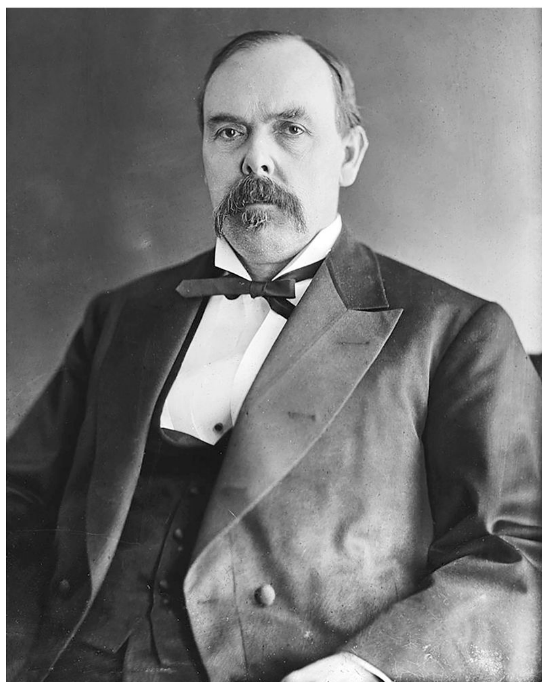
雅各布·D.考克斯（1828—1900）



詹姆斯·A.加菲尔德（1831—1881）



乔治·B.麦克莱伦（1826—1885）



奥利弗·P.莫顿（1823—1877）

乔治·B.麦克莱伦描述俄亥俄州的军队时说："他们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军人，都很健壮，但缺乏组织和纪律意识。"[87] 正规军的一名上尉将各州的军团纳入了联邦军队。由于没有军装，士兵们都穿着红色的加里波第法兰绒衬衫。正规军的上尉感叹道："我的上帝！他们天生是当兵的料！"[88] 马萨诸塞州第六兵团的约翰·海伊写道："年轻的士兵长相英俊，活力十足，让他们当炮灰实在太可惜了。"[89] 同样的话可以用在各州征召的所有服役期为三个月的士兵身上。

1861年4月底，林肯决定进行一场持久战。服役期为三个月的志愿兵迅速集结。但一些自告奋勇的人也想入伍。于是，林肯决定充分利用这些人的爱国热情，同意他们入伍三年。1861年5月3日，林肯宣布扩军[90]。针对不同的征兵要求，他在1861年7月4日的信中回应道："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是，如何避免军人数量的增加速度超过政府供给的速度。总之，如果联邦政府恪尽职守，人民就会支持它。"战争初期的官方通信表明，战争部长西蒙·卡梅伦性情温厚，但办事效率低下，目光短浅。林肯深谙时局，一再敦促陆军部收编愿意入伍三年的志愿兵，并给他们配备武器和军装，发放军饷。因此，在任职初期，甚至在任职后期，林肯首先考虑到的都是联邦的真正需求。军队会有的，军需供给也会有的。

南北方都对战事没有准备，但南方人购买武器和弹药的难度更大。过去，南方人习惯从北方兵工厂购买军火，而现在，他们只能在自己的领地内建立军工业。由于缺乏资金和商业信誉，南方人很难从国外采购军火，而且北方的封锁严重阻碍了他们的军火交易。1861年5月3日，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写道："大西洋和墨西哥湾港口对我们很重要，但很快会被完全封锁。"[91] 1861年7月16日，玛丽·切斯纳特在里士满与杰斐逊·戴维斯一起进餐，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亟须弹药，但封锁切断了所有渠道。"南方邦联战争部长勒罗伊·P.沃克缺乏亲和力，从他与各州长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有点儿刻薄。但新政府将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此，他的刻薄并不是一位政府官员应该具有的禀性。

与此同时，杰斐逊·戴维斯的行政能力比林肯强。西点军校的训练、墨西哥的服役经历及四年的陆战队经历使他熟知军理知识。但林肯需要加倍努力才能很快掌握军理知识。弗吉尼亚军队的指挥官罗伯特·E.李是

里士满市长的得力助手。里士满是南方邦联最重要的军事据点。然而，南北双方都高估了彼此的实力。罗伯特·E.李与艾奥瓦州长一样，认为敌人有很多精良的武器装备[92]。

在轰炸萨姆特堡和布尔溪战役[93]期间，仔细阅读北方联邦与南方邦联之间的密信时，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南方和北方都没有备战行动，而且美国的军情与欧洲形成了对比。1870年，法兰西帝国战争部长向法王和其他政府官员表示，法兰西帝国已经做好准备，并时刻准备参战。此外，他还向国家立法委员会声明："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即使美国内战会持续两年，我们也有充足的准备。"十天内，通过铁路，法兰西帝国战争部长将二十万人送到了美国边境地区，其中包括大炮、马匹和弹药。与此同时，德意志帝国[94]首相俾斯麦询问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我们获胜的概率有多大？"赫尔穆特·冯·毛奇回答道："我认为这是一次军事竞赛，没有人能预测到一场伟大战事的结果。"他还说："总体来说，相比缓兵之计，速战速决对我们更有利。"两个多星期内，赫尔穆特·冯·毛奇手下的普鲁士军队人数相当于法兰西边境地区法军人数的两倍[95]。



俾斯麦（1815—1898）



赫尔穆特·冯·毛奇（1800—1891）

如果南方或北方能像法兰西帝国一样做好准备，而另一方又无法跟进，那么做好准备的一方就可以所向披靡；如果南方和北方能像普鲁士那样组织得当，内战可能会结束得更早。但美国不可能像普鲁士那样，拥有完备的军事体系。即使有，也不会被重视。与古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一样，美国人更喜欢“轻松愉快地面对危险，而不是经过艰苦训练后投入战争。”[96]

第17节　杰斐逊·戴维斯

1861年4月29日，杰斐逊·戴维斯在给国会的信中指出，林肯征兵七万五千人是在向南方邦联宣战，要求国会制订防御措施。他辩称每个州都有自主权，“起码有权判断对错，有权决定纠错的方式和措施”，试图证明分裂和组建邦联的正当性。他还声明：“我们认为我们的事业是公正而圣洁的……我们只要求联邦政府不要干涉南方邦联。从未统治过我们的人也不应该试图通过武力征服我们。如果受到压迫，我们必将奋起反抗，我们也必须奋起反抗。”身为南方总统的杰斐逊·戴维斯必须妥善应对令人担忧的局面。他曾经反对战争，希望南方同胞远离战争。1861年6月底，在里士满，玛丽·切斯纳特与杰斐逊·戴维斯谈了近一个小时。谈话中，杰斐逊·戴维斯“比较悲观”，“他的语气听起来并不乐观。”他预料到战争会很漫长。有人吹嘘说：“一个南方人能敌三个北方兵”。杰斐逊·戴维斯笑道：“只有傻瓜才会质疑北方军人的勇气，或质疑他们为正义而战的主动性。”[97]

第18节　林肯

1861年7月4日，林肯在信中说：“南部邦联迫使国家面对一个独特的问题，即‘要么立即解散，要么血洗沙场’。令人遗憾的是，武力保卫政府的职责落在了总统肩上。他要么履行职责，要么放弃政府。”林肯向“普通民众”[98] 说明了支持他的理由。

1861年，林肯坚信，如果没有危及奴隶制，南方人不会在分裂中提到州权。然而，他在信中对此只字未提，原因不言自明。林肯将恢复联邦的完整性作为战争的目标，赢得了民主党人约翰·贝尔[99] 和爱德华·埃弗雷特[100] 等人及共和党人的支持。但一提到奴隶制问题，就会立即引起党派之间的争论。不过，林肯一直清楚矛盾所在。他曾对支持自己的私人秘书说：“对我来说，我认为这场战争的核心是，我们必须证明联邦政府并不荒唐。现在，我们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在一个自由政府中，少数人是否有权随时分裂政府？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只能证明人民无法通过自己实现自治。到时，可能要考虑搁置最终决议，但这不是我们应该提前考虑的。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国家存在一个影响深远的不安因素。这一不安因素在其他自由国家中从未出现过。但目前，我们还不能这么说。我们的政府原本如此，我们期望大多数人能够保护它。”[101]



约翰·贝尔（1796—1869）



爱德华·埃弗雷特（1794—1865）

第19节　进军里士满

1861年7月1日的一份官方报告显示，北方联邦军共十八万六千人[102]。各家报纸，尤其是《纽约论坛报》，已经呼吁联邦军队向里士满进军。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敦促政府，称不要浪费志愿兵的三个月服役期[103]。政客们担心拖延战事会影响公众情绪，因此，积极响应了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的呼吁。经验丰富、是非分明的人也加入了呼吁者的队伍。1861年5月，马萨诸塞州长州约翰·安德鲁抱怨北方"缺乏行动力"。参议员威廉·P.费森登[104]写道："每天，我都希望听到联邦军进攻的消息。"[105]威廉·亨廷顿·拉塞尔在克里米亚半岛的经历让他了解了欧洲的生活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记述了华盛顿营地附近的士兵所处的艰苦环境。他估计可以参战的士兵有三万人，并写道："我反对国家自吹自擂，但我坚信，在有能力的指挥官的领导下，一万名英国正规军[106]或一万两千名有正规炮兵装备的法兰西人，不但可以轻而易举击退华盛顿营地的军队，而且只要他们乐意，可以随时发动进攻，战胜华盛顿营地军队，或长驱直入华盛顿。"[107]

林肯耳畔一直萦绕着"进军里士满"[108]的口号。最后，他被迫同意北方联邦军的请求，在弗吉尼亚东部发动战争。只要取得一次胜利，就能巩固萨姆特堡轰炸后形成的团结态势。因此，弗吉尼亚东部的战争将是一场重要的战役。有了这次战役，北方人的爱国热情将继续高涨，反对党中可能发生的分歧也会消失，欧洲将继续保持友好态度。现在，欧洲各国赞同林肯主张的国家权力，并派使臣访问美国。但最好让欧洲各国意识到，联邦政府有更强大的军队。此外，如果服役期为三个月的优秀志愿军积极投入战斗，北方联邦军将很快掌控战场。志愿军的服役期即将结束。林肯考虑了所有因素后，在内阁会议中召集了一些将军。欧文·麦克道尔毕业于西点军校，曾在墨西哥战争中任参谋一职，现任波托马克河弗吉尼亚州一侧的军队指挥官。他表示，如果能阻止谢南多厄河谷拥兵九千人的约瑟夫·E.约翰斯顿联合布尔溪畔拥兵两万一千九百人的皮埃尔·博勒加德，他将进攻皮埃尔·博勒加德。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认为欧文·麦克道尔的军队不能在弗吉尼亚州开战，但还是遵从了林肯的意愿，并说："如果约瑟夫·E.约翰斯顿联合皮埃尔·博勒加德，我会让罗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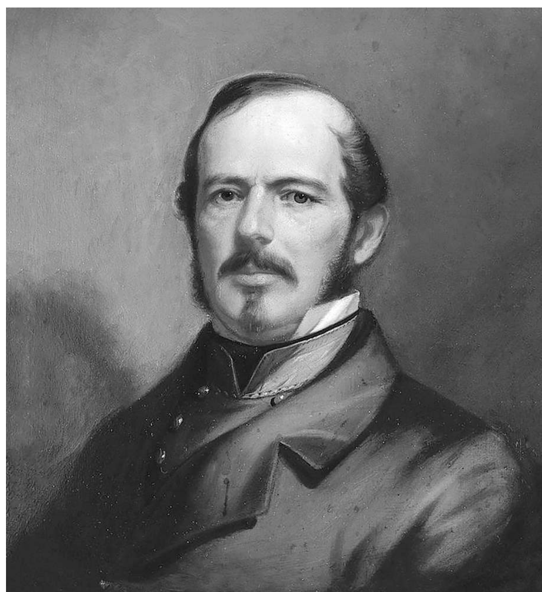
特·帕特森紧随其后。”罗伯特·帕特森率领一支一万八千人到两万两千人的军队，受命密切监视约瑟夫·E.约翰斯顿，等待时机将其歼灭或滞留在山谷中。

1861年7月16日下午，欧文·麦克道尔率三万精兵强将赶赴前线。其中，服役期为三个月的志愿兵占多数，另有一千六百名正规军。1861年7月18日，欧文·麦克道尔的军队占领了森特维尔。当代的美国将军从未统率过这么多人。但在墨西哥任参谋时，欧文·麦克道尔统领的士兵很少。除了正规军，士兵和大多数军官都没有实战经验。此次行军二十七英里，算得上一次壮举，但如果发生在1862年，就只能算作一桩小事了。旅指挥官威廉·T.谢尔曼写道：“士兵们毫无纪律意识。在行军途中，我虽然已经尽力，但还是无法阻止他们掉队去戏水、摘黑莓或其他他们想干的事。”欧文·麦克道尔说，军队不知道如何合理分配供给，“以便度过战事”，而且战士们兴奋到“烧杀抢掠”。幸运的是，欧文·麦克道尔及时制止了战士们的罪恶行径。

约瑟夫·E.约翰斯顿收到一封从里士满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要求他在可行的情况下，与皮埃尔·博勒加德联盟。1861年7月18日中午，约瑟夫·E.约翰斯顿设法避开罗伯特·帕特森，向布尔溪进发。他写道：“我已经习惯正规军稳定行军的步伐，根本无法描述那天行军中的窘况。”士兵们缺乏纪律，时常无缘无故掉队。约瑟夫·E.约翰斯顿已经放弃按时与皮埃尔·博勒加德会合了。他根据实际情况计划了最后一段行程。行军二十三英里后，他率步兵团坐火车走完了剩下的三十四英里。骑兵和大炮依旧由马车运送。1861年7月20日，约瑟夫·E.约翰斯顿率领六千人与皮埃尔·博勒加德会合。



谢南多厄河谷



约瑟夫·E.约翰斯顿（1807—1891）



罗伯特·帕特森（1792—1881）

欧文·麦克道尔听到了约瑟夫·E.约翰斯顿和皮埃尔·博勒加德会合的消息，但并不相信，依旧按原计划行事，打算进攻南方邦联军的左翼。1861年7月21日早晨，欧文·麦克道尔发起了进攻。由于官兵们缺乏作战经验，加上行军部署延误，进攻推迟了三个小时。1861年7月21日10时，北方联邦军与南方邦联军交战，以绝对优势追击南方邦联军。南方邦联军立即撤退。退到亨利豪斯[109]所在的高原[110]斜坡时，恰好遇到了正在静静等待进攻的托马斯·J.杰克逊。巴纳德·E.毕将军鼓舞撤退的士兵，大声喊道：“看呐！托马斯·J.杰克逊像石墙一样屹立在那儿。”后来，“石墙”一词伴随了托马斯·J.杰克逊一生。

第20节　布尔溪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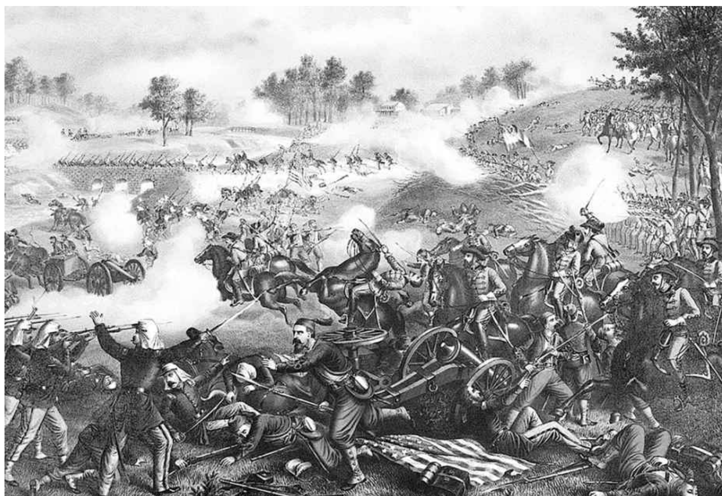
罗伯特·帕特森高估了约瑟夫·E.约翰斯顿的实力，不敢轻易进攻。他带着恐慌向北挺进，直接绕开了南方邦联军，并未追击撤退的南方邦联军。南方邦联军的将领们还没有察觉到罗伯特·帕特森的举动，以为罗伯特·帕特森会前去与欧文·麦克道尔会合。因此，在援军到来前，皮埃尔·博勒加德认为应该率领右翼和中锋进攻北方联邦军。约瑟夫·E.约翰斯顿赞成皮埃尔·博勒加德的计划，但由于命令被误传，被迫取消了行动。与此同时，欧文·麦克道尔突然发动了袭击，炮声轰鸣。约瑟夫·E.约翰斯顿意识到欧文·麦克道尔打算进攻他的左翼军。他和皮埃尔·博勒加德距战场四英里，因此，他们快马加鞭赶往前线。约瑟夫·E.约翰斯顿说：“我们一刻也没有延误。”南方邦联军士气低落，溃不成军。此刻，他们最需要的是意志坚定、胆识过人的将领力挽狂澜。皮埃尔·博勒加德指挥前线部队全力作战。约瑟夫·E.约翰斯顿绕向后方赶来增援。

1861年7月21日正午，约瑟夫·E.约翰斯顿和皮埃尔·博勒加德来到战场。战役一直持续到1861年7月21日下午3时。攻打北方联邦军占领的亨利豪斯高地时，战况十分激烈。1861年7月21日下午2时，皮埃尔·博勒加德下令前进，收复亨利豪斯高地。他的命令鼓舞了士气。托马斯·J.杰克逊的军队直捣北方联邦军的主营地。其他邦联军队也奋力前进，突破了北方联邦军的防线，将北方联邦军赶出了亨利豪斯高地。北方联邦军重整军力，再次攻克了亨利豪斯高地，将南方邦联军驱逐到了树林里。很快，欧文·麦克道尔看到了亨利豪斯战场，思考着最后的决战，坚信胜利是属于联邦的。

里士满的杰斐逊·戴维斯十分焦急。他已经按捺不住，乘火车来到了前线。当他走到马纳萨斯铁路交界处时，看到一辆辆前往军队后方的马车驶过，扬起一阵尘土，战火声犹在耳畔。许多人带着伤痛离开了马纳萨斯，他们向杰斐逊·戴维斯生动描述了南方邦联军战败的场景。一个胡须花白的老人面容平静，举止沉稳，鼓舞了杰斐逊·戴维斯。杰斐逊·戴维斯问老人：“战役怎么结束的？”老人回复道：“我们的防线破了，军队陷入一片混乱，四散溃逃。我们战败了。”列车员不愿继续前行，但杰斐逊·戴维斯一再坚持。他只好卸下车头，将火车开到了指挥部。在指挥部，

杰斐逊·戴维斯找到了一些马。两名军官带他去了战场。途中，他遇到了大批散兵，散兵警告他前方很危险。但战火声逐渐减弱，似乎暗示着南方邦联军取得了进展，战役很快会结束。在一个可以俯瞰战场的高地，杰斐逊·戴维斯见到了约瑟夫·E.约翰斯顿。当时，他可能模仿阿金库尔战役 [111] 中的亨利五世，问道：“我能否知道战斗结果？”约瑟夫·E.约翰斯顿立即肯定地告诉他：“我们赢得了战斗。”

1861年7月21日下午3时，欧文·麦克道尔看到南方邦联军退到了树林里，以为战斗已经结束。他的军队占领了亨利豪斯高地。但现实残酷地否定了他的想法。1861年7月22日凌晨2时，欧文·麦克道尔率领的士兵从梦中惊醒，被迫作战。士兵们的体力严重透支，其中一支分队已经不眠不休行军千里。天气炙热，战斗持续了四个半小时 [112] 。大部分士兵扔了自己的干粮袋和水壶，他们满口尘土，饥渴难耐，筋疲力尽。皮埃尔·博勒加德下令集合现有的所有军力，包括后备军，试图亲自上阵作最后一搏，拿下亨利豪斯高地。与此同时，远处传来了生力军响亮的欢呼声。这支生力军是谢南多厄河谷战役中的生还者，他们曾跟随约瑟夫·E.约翰斯顿赶火车，奉命进攻欧文·麦克道尔的右翼。皮埃尔·博勒加德率领的士兵说：“约瑟夫·E.约翰斯顿的军队来了。”皮埃尔·博勒加德推进了自己的整条战线。“莫名的恐慌迅速弥漫在北方联邦军中” [113] 。士兵们散乱了，纷纷跑下山坡。欧文·麦克道尔和军官们试图召集士兵，但只有常规军听从他们的命令，志愿兵都在撤退。志愿军越过布尔溪的浅滩，拥挤在沃伦顿关卡，场面混乱不堪。南方邦联军紧随其后 [114] 。欧文·麦克道尔打算在森特维尔进行抵抗，但显然是不可能的。费尔法克斯郡法院也不可能批捕慌乱的逃兵。欧文·麦克道尔发电报说：“大部分士兵就像一群乌合之众，萎靡不振。他们毫无秩序地涌入了费尔法克斯郡。”抵达波托马克河南边的堡垒后，志愿军不再逃跑，许多士兵越过长桥进入了华盛顿。很快，志愿军意识到，自己一直因一个假想的敌人逃跑，南方邦联军根本没有追来 [115] 。



布尔溪战役（一）



布尔溪战役（二）



欧文·麦克道尔（1818—1885）

华盛顿的林肯和里士满的杰斐逊·戴维斯都很焦虑。林肯从教堂回来后，立即浏览了陆军部和司令部发来的电报。电文由距战场最近的电报站发出。开战前，发报非常频繁，汇报了炮击的过程和进展情况。谈论电报内容时，林肯显得有些不耐烦。他来到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的办公室，发现年迈的将军正在午休，便叫醒了他。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告诉林肯，目前收到的报告没有任何价值，还说坚信北方联邦军一定会胜利，然后又淡然地睡了。电文不断发来好消息。南方邦联军被击退了两三英里。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的一位副官递交给林肯一份来自森特维尔军械中尉的电文。电文中说，欧文·麦克道尔已经击退南方邦联军，并命令后备军继续前进，希望立即得到援军支持。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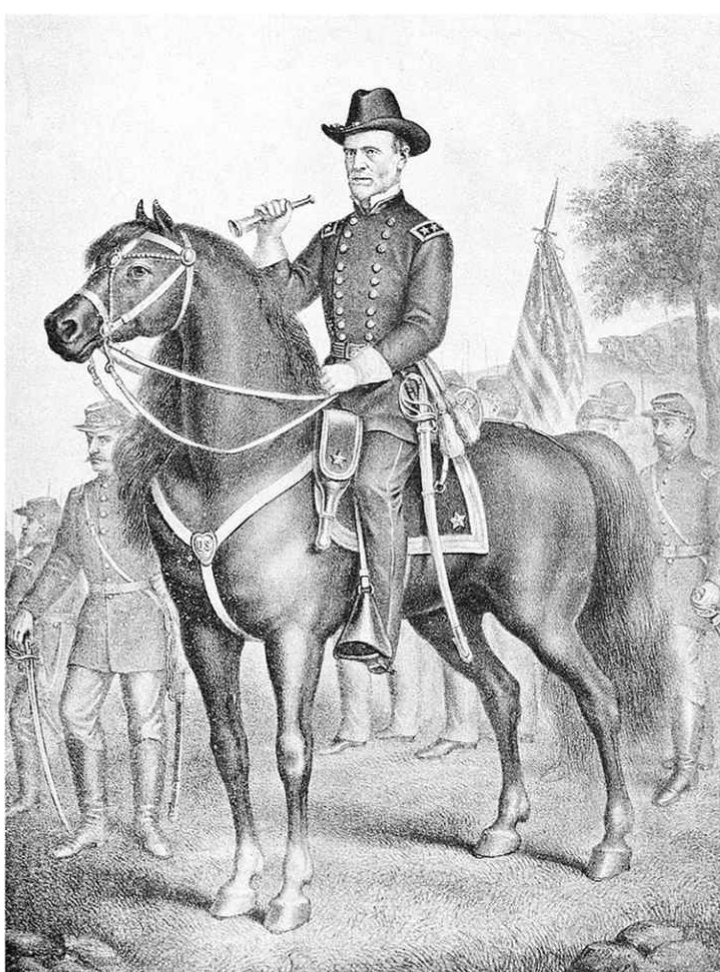
这份电文是可信的。林肯一边思索着所有可疑之处，一边像往常一样，命人准备马车去夜游。1861年7月22日清晨6时，威廉·H.苏厄德来到白宫，面色显得苍白憔悴。他大声询问林肯的私人秘书们道："总统在哪里？"秘书们回答："驾车出去了。"威廉·H.苏厄德继续问道："你们知道最新的消息吗？"秘书们给他读了捷报电文。他说："不要告诉任何人，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战败了……欧文·麦克道尔正在率全军撤退，请求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守住华盛顿。" [116] 一个半小时后，林肯回来了。听了威廉·H.苏厄德的消息后，他来到司令部，看了一个军械上尉的电报。电报称："欧文·麦克道尔的军队正从森特维尔全面撤退。战败已成事实。请守住华盛顿，保住军队的生还者……军队已经溃散，无法重组。""当天晚上，林肯彻夜未眠。1861年7月21日清晨，林肯依旧坐在办公室的躺椅上，" [117] 听着跟随欧文·麦克道尔前往森特维尔的记者和平民们谈论战事。战败后，这些人怕丢了性命，匆忙返回了华盛顿。华盛顿的星期一有些阴沉，一阵细雨使其变得愈发阴沉。1861年7月21日中午，人们才得知南方邦联军并没有追击撤退的北方联邦军，也没有夺取华盛顿的意图。

第21节　林肯鼓舞士气

布尔溪战役的失败使一些联邦要员惶恐不安，但林肯显得很平静。他虽然对结果很失望，但一直没有表现出灰心或失控的情绪。1861年7月21日至1861年7月28日，他去了华盛顿周围的营地，其中一个是威廉·T.谢尔曼带他去的。威廉·T.谢尔曼站在路边，“并肩坐在敞篷马车里”的林肯和威廉·H.苏厄德认出了他。威廉·T.谢尔曼询问他们是否进营，林肯回答道：“当然。我们听说你们战胜了恐慌，决意要过来看看战士们。”林肯让威廉·T.谢尔曼乘他的马车带路。威廉·T.谢尔曼察觉到了林肯的情绪，觉得他想给士兵们讲话，因此，冒昧地提醒林肯说：“请不要鼓舞他们。在布尔溪河畔，我们已经听到太多欢呼声、嘈杂声，感受了太多困惑，这些足以毁掉很多人。现在，士兵们需要的是冷静、反思和拼搏，而不是更多欢呼声和豪言壮语。”林肯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来到第一个营地后，林肯站在马车里开始讲话。威廉·T.谢尔曼描述道：“这是我听过最睿智、最精彩、最富有感情的演讲。总统谈及了我们在布尔溪战役中的挫败及我们肩负的崇高责任和光明未来。演讲中，曾有士兵试图欢呼，但总统叫停了他们，然后说，‘勇士们，请不要欢呼。我承认我也想欢呼，但威廉·T.谢尔曼将军告诉我，欢呼对战争无益。我想我们最好听他的。’” [118] 林肯巡视了各个营地，向其他士兵发表了相同的演讲。他的巡视反响很不错。他也很快在军中树立了威严。

威廉·T.谢尔曼认为，布尔溪战役部署周密，但仗打得很糟糕。约瑟夫·E.约翰斯顿认同他的观点，并写道：“如果北方联邦的部署和行动一致，我们可能会战败。”然而，约翰·C.罗普斯认为，欧文·麦克道尔的战术比约瑟夫·E.约翰斯顿的高明。其他人并不关心他们的分歧，认为布尔溪战役不过是两支各为其主的暴民在野外遇到，鼓起勇气打了一架。

人们如果俯瞰亨利豪斯高地，就会看到许多穿着鲜艳军装的北方联邦士兵。1861年7月4日入伍以来，他们已经习惯这套军装。显眼的步兵军服，宽大的红色或黄色裤子，加上一顶红色无边圆筒帽或头巾帽，深受很多人的喜欢。这套军装与后来战争中北方联邦军朴素的蓝色制服形成了鲜明对比。前者像是响应“进军里士满”口号而穿的节日盛装，后者体现了北方镇压南方邦联的坚定意志。



威廉·T.谢尔曼（1820—1891）

在布尔溪战役中，两军战士有生之年第一次听到了炮弹声，目睹了炮弹炸平树林，飞过头顶的景象。他们眼睁睁看着身旁的朋友或兄弟被炸死，同伴和战马倒在血泊中。他们没有作战经验，却已血迹斑斑。伤亡人数“说明了战事的激烈” [119] 。

在南方，除了报纸的报道，其他人几乎都没有谈及布尔溪战役。当权者从不认为北方会放弃战斗。相反，他们认为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斗。

北方遭遇了挫败，但雪上加霜的是，一直与联邦保持统一战线的英国认为，联邦解体已成既定事实。从这次胜利中，南方的盟友看到了南方胜利的希望。为了加快南方独立的进程，他们竭尽全力将问题复杂

化。在一封从伦敦寄来的私人信件中，美国驻英国大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120]写道：“令人惊奇的是，我们努力使人们相信，我们是为关税而战，与奴隶制毫无关系……我无法掩饰事实。英国人很高兴看到我们战败。”[121]

美国内战结束五十二年后，法兰西作家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的一句话也许能够说清楚欧洲各国的感受：“我们并不会因最好的朋友遭遇不幸感到闷闷不乐。”但在战争期间，对为了神圣事业浴血奋战的士兵们来说，隔海同胞的冷漠态度会让他们心生悲痛。

[1] 《美国史》（*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第2卷，第308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1860年。《在牛津大学发表的关于美国内战的讲稿》（*Lectures o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delivered at Oxford*）以下简称《讲稿》，第46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1913年。——原注

[2] 《美国史》，第1卷，第2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3] 《讲稿》中的《论美国内战》，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1913年。——原注

[4] 林肯在弗吉尼亚州获得了一千九百二十九张选票，但在其他南方州的选举中，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同样，南方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布雷肯里奇也没有获得北方三个州的选票。其他候选人有北方民主党人斯蒂芬·道格拉斯和立宪联邦党的约翰·贝尔。参见《总统史》（*A History of the Presidency*）第1卷，第297页，爱德华·斯坦伍德著。——编者注

[5] 《美国史》，第3卷，第115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6] 1860年12月20日，《南卡罗来纳州独立宣言》出台。——原注

[7] 《美国史》，第3卷，第112页到第114页，第192页到第206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讲稿》，第65页等，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8] 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法案》在州数上维持了蓄奴州和自由州的平衡，规定缅因州为自由州，密苏里州为蓄奴州。北纬36°30′以北的路易斯安那州购置地境内没有奴隶制，以南地区的奴隶制合法。——编者注

[9] 亨利·克莱的妥协法案指《1850年妥协法案》。1850年，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承认加利福尼亚州为自由州，也没有限制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境内的奴隶制，但规定了“人民主权”，即人民能够自己决定自己州的性质。哥伦比亚特区制定了更严格的逃奴法案，且禁止奴隶贸易。——编者注

[10] 不包括南卡罗来纳州。——译者注

[11] 被列为棉花种植州的有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原注

[12] 《美国史》，第1卷，第2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13] 建立真正的蓄奴州是不可能的。新墨西哥州花了七年时间，才有了二十二名奴隶。《美国史》，第3卷，第176页，第268页注释，第313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14] 《美国史》，第3卷，第150页到第179页，第253页到第265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讲稿》，第68页等，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约翰·J.克里滕登的提议是解决分裂问题的一次重要尝试，但也有其他尝试，譬如弗吉尼亚州支持的1861年的《和平公约》（*Peace Convention*）。——编者注

[15] 一开始，得克萨斯州并没有派代表出席会议。《美国史》，第3卷，第291页，注释四，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16] 《美国史》，第1卷，第389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17] 1861年3月16日，临时大会第一次会议落幕。《美国史》，第3卷，第291页到第296页，第320页到第325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讲稿》，第77页等，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18] 《林肯全集》（*Lincoln Complete Works*），第1卷，第660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19] 除了这些州和已经脱离联邦的州，特拉华州也是一个蓄奴州，但其举动与马里兰州息息相关，从未脱离联邦。1861年，三十四个州中，蓄奴州共有十五个。——编者注

[20] 《美国史》，第3卷，第280页，第285页注释，第321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21] 《美国史》，第2卷，第450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22] 《美国史》，第3卷，第216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一个世纪以来，南方邦联代表和北方联邦代表之间的谈判内容都是历史研究和推测的主题之一。近期研究表明，林肯至少知道威廉·H.苏厄德与南方邦联的使者见过面。威廉·H.苏厄德从萨姆特堡撤军的承诺落空后，南方邦联领袖有理由相信自己上当了。——编者注

[23] 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频繁，法兰西的称呼也不尽相同：987年至1792年，称法兰西王国；1792年至1804年，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804年至1814年，称法兰西第一帝国；1848年至1852年，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52年至1870年，称法兰西第二帝国；1870年至1940年，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译者注

[24] 《威廉·H.苏厄德传》，第2卷，第134页，第136页，第157页，弗雷德里克·班克罗夫特著。——原注

[25] 1888年2月，约翰·尼古拉和约翰·海伊在《世纪杂志史》（History in the Century Magazine）中首次公开了这份文件。——原注。林肯是否回复了威廉·H.苏厄德并不能确定，他可能写了回复，然后私下与威廉·H.苏厄德谈了话。《林肯选集》，第4卷，第316页到第318页。——编者注

[26] 《美国史》，第3卷，第326页到第327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27] 《林肯传》，第4卷，第66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正规兵的全部兵力是一万七千人。——原注

[28] 《美国史》，第3卷，第341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29] 实际上，只有邮政部长蒙哥马利·布莱尔支持给萨姆特堡提供补给。财政部长萨蒙·P.蔡斯态度暧昧。威廉·H.苏厄德、战争部长西蒙·卡梅伦、海军部长吉迪恩·威尔斯、内政部长凯莱布·B.史密斯及司法部长爱德华·贝茨都反对提供补给。《林肯传》，第3卷，第385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编者注

[30] 《美国史》，第3卷，第341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31] 《美国史》，第3卷，第344页，注释三，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书信与日记》（*Letters and Diary*），第1卷，第47页，1861年10月22日，约翰·海伊著。贺拉斯·怀特的私人信件，1908年6月11日至1909年3月7日。《莱曼·特朗布尔传》（*Life of Trumbull*），第158页，贺拉斯·怀特著。——原注

[32] 《美国史》，第3卷，第348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33]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Official Records of the Union and Confederate Armies*），第1卷，第14页，第301页。此处无需附两次信件内容。——原注

[34]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卷，第60页。——原注

[35] 《南方各州记事》（*A Diary from Dixie*），第33页，第39页，玛丽·切斯纳特著。来自纽约的“纳什维尔”号轮船和一些商船抵达萨姆特港口，等待轰炸的结果，并向海港附近的大型海军舰队发送信号，暗示舰队离开港口。《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卷，第249页。《美国内战缘由》（*Causes of the Civil War*），第333页，弗伦奇·恩索尔·查德威克著。——原注

[36] 名为“哈里特莱恩”号的军舰。——原注

[37] 这里指“波尼”号。——原注

[38] “波瓦坦”号失联，没有抵达查尔斯顿。1861年4月13日下午2时，“波卡洪塔斯”号抵达港口。——原注

[39] 《美国内战的起源》（*The Genesis of the Civil War*），第427页，塞缪尔·克劳福德著。——原注

[40]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卷，第35页，第44页，第46页，第54页。——原注。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在萨姆特堡，弗吉尼亚人埃德蒙·拉芬打响了美国内战的第一炮。近来，这一传说被修正为埃德蒙·拉芬看到信号弹后开了第一炮。然而，根据现有研究，这一点似乎不太可能。可以肯定的是，埃德蒙·拉芬在他驻守的炮台开了第一炮，但查尔斯顿港其他炮台在换岗时已经开炮。很多文献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美国国会图书馆珍藏的埃德蒙·拉芬的日记中，并未对这次开炮有任何说明，只提到莫里斯岛的卡明斯角炮台有一架六十四英镑重的大炮。《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卷，第54页。——编者注

[41] 《美国内战的起源》，第427页，塞缪尔·克劳福德著。——原注

[42]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卷，第40页。——原注

[43]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卷，第19页，第21页。——原注

[44]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卷，第31页。——原注

[45]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卷，第41页。——原注

[46]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卷，第12页。——原注

[47] 《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卷，第252页，第262页。——原注

[48] 《美国史》，第3卷，第351页，注释三，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49] 《南方邦联军中的生活》（*Life in the Confederate Army* ），第98页，威廉·沃森著。《我的南北记事》（*My Diary North and South* ），第204页，威廉·亨廷顿·拉塞尔著，1863年。——原注

[50] 《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论文集》，第43卷，第687页。——原注

[51] 《美国史》，第3卷，第357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52] 《1861年4月19日的巴尔的摩》（*Baltimore and the Nineteenth of April，1861* ），第53页，乔治·威廉·布朗著。——编者注

[53]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二，第51卷，第1册，第3册。《林肯传》，第4卷，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1861年7月18日的《美国国会议事录》。《马萨诸塞州第六兵团》，约翰·汉森著。《约翰·A.安德鲁传》，亨利·皮尔森著。——原注

[54] 捕押特许证指国家允许私人在船上配备武器，以便截获外国商船的书面许可证。——译者注

[55] 1861年4月19日，巴尔的摩发生暴乱。——原注

[56] 理查德·莱昂（Richard Lyons，1817—1887），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原注

[57] 《美国史》，第3卷，第364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58] 加卢沙·A.格罗（Galusha A. Grow，1823—1907），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后成为众议院议长。——原注

[59] 《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14页等，约翰·海伊著。——原注

[60] 《美国史》，第3卷，第368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23页，约翰·海伊著。约翰·海伊还写道："威廉·H.苏厄德派出的信使并未按计划返回。"一名副将从华盛顿发来电报说："十日内，华盛顿将弹尽粮绝。"《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51卷，第1册，第367页。——原注

[61] 《美国史》，第3卷，第372页等，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62] 《美国史》，第3卷，第389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林肯传》，第4卷，第172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63]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51卷，第2册，第11页。——原注

[64] 1861年5月23日，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人认可了分裂法案。三万两千一百三十四张反对票主要来自西部诸县。《美国史》，第3卷，第387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65]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51卷，第2册，第18页。——原注

[66] 这一切都是基于人民的投票认可。《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四，第1卷，第242页等。《美国史》，第3卷，第379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67] 《美国史》，第3卷，第396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四，第1卷，第256页。——原注

[68]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51卷，第2册，第831页。——原注

[69]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三，第1卷，第72页。——原注

[70] 《美国史》，第3卷，第383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71]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三，第1卷，第81页。——原注

[72] 《美国史》，第3卷，第391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林肯传》，第4卷，第240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各类投票显示，在萨姆特堡战役和林肯的征兵令发布前，阿肯色州、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多数人可能反对分裂。1861年4月中旬后，这些人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编者注

[73] 《美国史》，第3卷，第384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74]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三，第1卷，第83页。——原注

[75]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三，第1卷，第70页。——原注

[76] 《美国史》，第3卷，第393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77] 这些数字指的是脱邦州和非脱邦州。因为密苏里州、马里兰州和肯塔基州给南方邦联和北方联邦都提供了兵力，西弗吉尼亚州、田纳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给北方联邦提供了部分兵力，此外，北方还有一些黑人军队，所以很难给出精确的总数。但总体比例是基本正确的。——编者注

[78] 《美国史》，第3卷，第397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讲稿》，第95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79] 总体来看，在战争中，虽然北方人支持联邦政府，但在不同时期，也有一些人反对开战。此外，肯塔基州、密苏里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先后分裂。南方也有许多反对邦联政府的地区，譬如田纳西州的山区。——编者注

[80] 《我的南北记事》，第106页，第251页，第315页，第329页，威廉·亨廷顿·拉塞尔著，1863年。《美国史》，第3卷，第407页注释，第423页注释，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讲稿》，第157页等，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81] 《我的南北记事》，第117页，威廉·亨廷顿·拉塞尔著，1863年。《南方各州记事》，第50页，玛丽·切斯纳特著。《美国史》，第3卷，第386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82] 《林肯的个人特质》，第153页，海伦·尼古拉著。《马克·吐温传》（*Life of Mark Twain*），第1卷，第160页，艾伯特B.佩因著。——原注

[83] 《美国史》，第3卷，第359页注释，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84] 《林肯传》，第1卷，第252页，约翰·T.莫尔斯著。——原注

[85] 《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Battles and Leaders of the Civil War*），第1卷，第90页，雅各布·D.考克斯著。——原注

[86]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三，第1卷。——原注

[87] 《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1卷，第97页，雅各布·D.考克斯著。——原注

[88]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51卷，第1册，第333页。——原注

[89] 《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13页，约翰·海伊著。——原注

[90] 四万两千零三十四名志愿军入伍三年，两万两千七百一十四人收编正规军，一万八千名水手收编海军。——原注

[91] 1861年4月27日，林肯下令封锁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三，第1卷，第122页。——原注

[92]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51卷，第1册，第4册。《南方各州记事》，玛丽·切斯纳特著。《林肯传》，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美国史》，第4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93] 美国内战时期，马纳萨斯会战中的两次战役都发生在一条小溪附近，均已南方邦联的胜利告终。——译者注

[94] 当Germany一词是“国家”含义时，962年至1860年，称神圣罗马帝国；1815年至1866年，称德意志邦联；1871年至1918年，称德意志帝国。——译者注

[95] 《自由帝国》（L'Empire Liberal），第15卷，埃米尔·奥利维耶著。《法兰西第二帝国史》（*Histoire du Second Empire*），第6卷，皮埃尔·德·拉戈尔斯著。《二十五年史》（*History of Twenty-five* Years），第2卷，斯宾塞·沃波尔著。《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一版）中勒伯夫这一条目。《德意志帝国的建立》（*The Foun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海因里希·冯·西贝尔著。《俾斯麦回忆录》（*Bismarck's Autobiography*），俾斯麦著。——原注

[96] 战争本来就是危险的。《修昔底德》，第2卷，第39页，本杰明·乔伊特著。——原注

[97] 《南方各州记事》，第111页，第299页，玛丽·切斯纳特著。——原注

[98] 这是他越来越喜欢的一种称呼。——原注

[99] 约翰·贝尔（John Bell，1796—1869），1860年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之一，反对奴隶制，是北方联邦的拥护者。——译者注

[100] 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1794—1865），美国政治家，1860年立宪联邦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北方的支持者之一。——译者注

[101] 《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31页，1861年5月7日，约翰·海伊著。——原注

[102] 《我的南北记事》，第3卷，威廉·亨廷顿·拉塞尔著，1863年。——原注

[103] 《美国史》，第3卷，第360页，注释二，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104] 威廉·P.费森登（William P. Fessenden，1806—1869），林肯时期的政治家，在内战前任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代表。——译者注

[105]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三，第1册，第182页，第244页。——原注

[106] 显然，他在向英国的盟友讲话。——原注

[107] 《我的南北记事》，第403页到第404页，威廉·亨廷顿·拉塞尔著，1863年。——原注

[108] “进军里士满”的口号源于1861年6月26日的《纽约论坛报》，报上的大标题写着“举国呐喊”“进军里士满！”——编者注

[109] 亨利豪斯高地，亚拉巴马州佩里郡马里昂市的一处历史古迹。——译者注

[110] 这里通常被称为亨利豪斯山，并非高原。战场所在地布尔溪流域是连绵起伏的农田，附近山丘并不陡峭，是绝佳的军事据点。——编者注

[111] 阿金库尔战役发生于1415年，是英法百年战争中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战役。英军在亨利五世的率领下，以一比三的人数劣势击溃法军。1419年，英军征服了整个诺曼底。——译者注

[112] 虽然战斗时长并不确定，但普遍认为这场战斗持续了约六个小时，并非四个半小时。——编者注

[113] 《修昔底德》，第4卷，第125页，本杰明·乔伊特著。——原注

[114] 南方邦联军并没有继续追击，因为欧文·麦克道尔驻扎在布莱克本岛浅滩和森特维尔附近的后备军将为这些逃兵殿后。——原注

[115] 北方联邦军惊慌失措地渡过布尔溪后，明显出现了溃败。然而，是骚动、疲劳和缺乏经验迫使他们井然有序地撤退，并非溃败。在复述过程中，北方联邦军的溃败可能被夸大了。——编者注

[116] 《林肯传》，第4卷，第353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117] 《林肯传》，第4卷，第355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118] 《威廉·T.谢尔曼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189页。——原注

[119] 北方联邦军的伤亡人数是两千九百八十四人，南方邦联军的伤亡人数是一千九百八十一人。《美国内战史》，第1卷，第154页，约翰·C.罗普斯著。《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Numbers and Losses in the Civil War*），第77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原注。詹姆斯·福特·罗德斯指的伤亡人数包括阵亡、受伤和所有失踪人口。托马斯·L.利弗莫尔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77页记录道：北方联邦阵亡四百八十一人，受伤一千零十一人，失踪一千二百一十六人，共计两千七百零八人；南方邦联阵亡三百八十七人，受伤一千五百八十二人，失踪十二人，共计一千九百八十一人。比较后期的战役，布尔溪战役中的伤亡人数占参战人数的比重相对较低。——编者注

[120]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1807—1889），美国政治家、外交官，曾任美国驻英国大使。——译者注

[121] 《约翰·默里·福布斯书信回忆录》（*Letters and Recollections of J. M. Forbes*），第1卷，第234页，萨拉·F.休斯著。——原注

第2章　外部环境：英美冲突

第1节　国会

布尔溪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即1861年7月23日，国会照常开例会处理日常事务。与会人员至少表面上是冷静的。在只有四票反对的情况下，众议院通过了1861年7月21日提出的《克里滕登妥协法案》，体现了全国人民对战争目标的态度。《克里滕登妥协法案》声明，发动战争不是为了征服或镇压南方，也不是为了推翻或干涉南方各州的权利或相关机构，而是为了维护联邦《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维护联邦众合国。1861年7月26日，参议院以三十票比五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克里滕登妥协法案》[1]。为了支持林肯“速战速决”的计划，1861年7月4日，国会召开大会，同意林肯征用五十万志愿兵，并授权财政部长“以联邦名义借贷”两亿五千万美元。志愿兵的服役期为三年，除非提前解散。国会虽然没有根据实际情况有效利用税收权力，但在支援战争方面做了一些事情。譬如提高关税税率，向各州和地区征收两千万美元的直接税[2]和3%的所得税，八百美元起征。

国会对林肯非常有信心，竭尽所能支持他。正如一位国会成员后来写道，会议期间，国会只是“一个庞大的筹款委员会”。但国会对林肯的两部独裁法案犹豫不决。两部法案分别是宣布征募服役期三年的志愿兵，扩大陆军和海军及为了公共安全，命令陆军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必要时亲自或派人在费城至华盛顿沿线的任何地点取消人身保护令[3]特权[4]。1861年8月6日，即会议的最后一天，独裁法案中关于提高士兵薪资的附文通过，扩大陆军和海军也正当化，但对暂时取消人身保护令的问题，参议员们意见不合，无法达成一致。一些参议员认为，必须由国会法案通过暂时取消人身保护令的决议，因为人身保护令是约翰·马歇尔大法官的提议，是约瑟夫·斯托里和罗杰·塔尼的意见，更是英国坚守了两个世纪的惯例。一部分参议员同意将联邦《宪法》权力仅授予国会，赞成林肯暂时取消人身保护令的提议。其他参议员并不关心采取何种行动，认为林肯作为陆军和海军总司令，完全有权取消人身保护令，

不希望用一纸确认书质疑总统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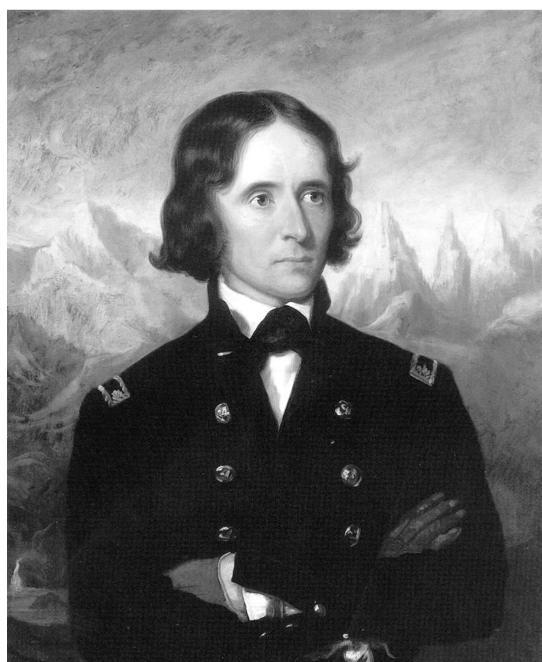
林肯和国会的态度鼓舞了所有人。人们很快从布尔溪战役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并发起了新的战斗。许多北方人响应号召参军入伍，服役期为三年。乔治·B.麦克莱伦在西弗吉尼亚州数次获胜。1861年7月27日，他受命统领华盛顿的军队。很快，他命名自己的军队为波托马克军[5]。

第2节　战事起因——奴隶制

林肯和杰斐逊·戴维斯都想掩盖冲突的真正原因。林肯不希望边境州、北方民主党和保守的共和党人知道发动战争的真实目的，即废除奴隶制。杰斐逊·戴维斯知道南方人支持奴隶制，但如果表现得太明显，可能会影响欧洲各国对南方邦联的认可。北方联邦军向南方进军时，遇到了一些黑人，打算保护他们。弗吉尼亚人投票通过分裂法案的第二天，三名黑人来到门罗堡。黑人的主人派人前来认领他们。北方联邦军指挥官本杰明·巴特勒将军拒绝交出三名黑人，因为他们是反对联邦州的公民，曾被雇佣来建炮台，是“战时违禁品”。本杰明·巴特勒将军承认，使用“违禁品”一词并不会受到法律制裁。然而，约翰·T.莫尔斯写道：“具有讽刺意味的‘违禁品’一词虽然不太准确，但并未影响本杰明·巴特勒将军表达联邦的原则。” [6] 很快，通过“违禁品”一词，人们理解了对黑人应有的态度。但一个词并不能解决当前的难题。北方联邦军的阵线内不断出现“违禁品”或逃亡奴隶。如何处理他们成了林肯最头疼的问题。经过慎重考虑，林肯想出了一个对策，并向本杰明·巴特勒将军发出了指示，称：“关于是否召回从联邦奴隶州主人手中逃脱的奴隶的问题，将军不应该干涉。但依据《充公法令》 [7] ，总统无权干预曾在南方邦联军中服役的黑人的归属问题。”虽然废奴主义者和一些激进的共和党人私下抱怨林肯的指示，但在密苏里州的宣言中，当约翰·C.弗里蒙特将军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时，大多数北方人已经默认林肯的权宜之计 [8] 。



本杰明·巴特勒（1818—1893）



约翰·C.弗里蒙特（1813—1890）

第3节　约翰·C.弗里蒙特

后来，林肯将约翰·C.弗里蒙特称作布莱尔兄弟[9]的门徒和红人。在布莱尔兄弟的提携下，约翰·C.弗里蒙特成了一名少将，并受命管理包括密苏里州在内的西部地区。约翰·C.弗里蒙特是一位富有浪漫精神的英雄，也是“勇敢的探路者”，曾在落基山脉的高峰上插下了美国国旗，并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排名第一，获得了很多民众的支持。在第一次竞选中，林肯对约翰·C.弗里蒙特的出色表现记忆犹新，非常赞赏他，想要任命他为驻法兰西大使。据说，约翰·C.弗里蒙特是天生的将才。早在1856前，共和党人就将他视为神圣事业的捍卫者，非常支持他担任指挥官。但竞选结果令林肯和布莱尔兄弟大失所望。在圣路易斯司令部，约翰·C.弗里蒙特第一个月的表现说明他根本不能胜任指挥官一职。约翰·C.弗里蒙特非常喜欢炫耀，希望自己像欧洲君主一样受万人瞩目，身边围绕的都是一些谄媚小人。高级军官、文职官员及联邦名流如果想要见约翰·C.弗里蒙特，一般需要等上几天，因为他们心中唯一的目标是打败南方的支持者和邦联军队，争论焦点也是密苏里州归属问题。其他人更关心如何捍卫利益丰厚的合同，这正是约翰·C.弗里蒙特喜欢听的。联邦的有识之士请求约翰·C.弗里蒙特下派一名得力干将，他却对此充耳不闻[10]。密苏里州有影响力的富人不再信任联邦政府。投机者阿谀奉承。密苏里州政府被指控谋取私利，忽视了国家利益。1861年8月29日夜晚，约翰·C.弗里蒙特睡觉前，一直在想如何将北方高涨的反奴热情化为己用。忽然，他脑海中闪过了一道灵光[11]。不管怎样，他决定解放奴隶。1861年8月30日，他发表了宣言，宣布密苏里州所有奴隶获得自由，有权拿起武器反抗邦联政府。头脑冷静的人都知道，约翰·C.弗里蒙特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演了一出戏。蒙哥马利·布莱尔在写给查尔斯·萨姆纳的信中说：“事实上，约翰·C.弗里蒙特受到身边一帮小人的操控，发表了违反法律准则的宣言，就像风尘女子念诵经文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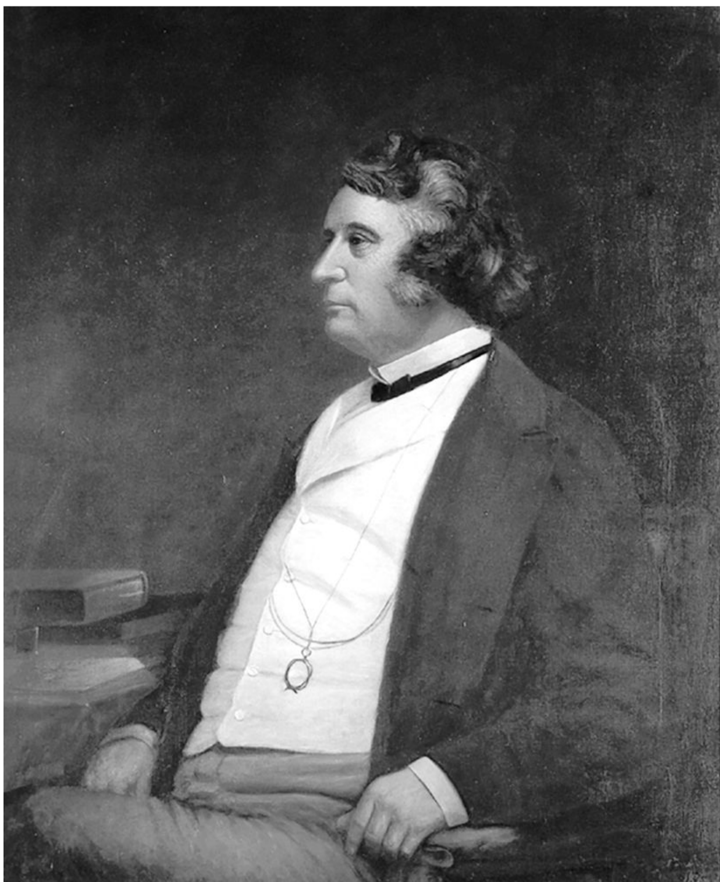


约翰·C.弗里蒙特在落基山脉高峰上插下美国国旗

林肯在报纸上看到了约翰·C.弗里蒙特的宣言及约翰·C.弗里蒙特为实现奴隶解放设立的“废奴局”消息。任职只有两个月的约翰·C.弗里蒙特并没有仔细研究全局，也没有考虑多方利益，冲动地解决了林肯、内阁和国会一直谨慎对待的问题。1861年9月2日，林肯写给约翰·C.弗里蒙特的信充满善意和智慧。他写道：“从叛变的奴隶主手中解放奴隶可能会吓到南方邦联的朋友，使他们转而反抗我们，甚至毁掉肯塔基州的未来。因此，请允许我要求你根据自己的意向修改宣言 [12] ，以符合”国会的《充公法令》。”这封信是本着警示而不是责难的态度写的。但约翰·C.弗里蒙特不愿撤销自己的宣言，除非林肯公开下命令。为了维持公共秩序，林肯很乐意这么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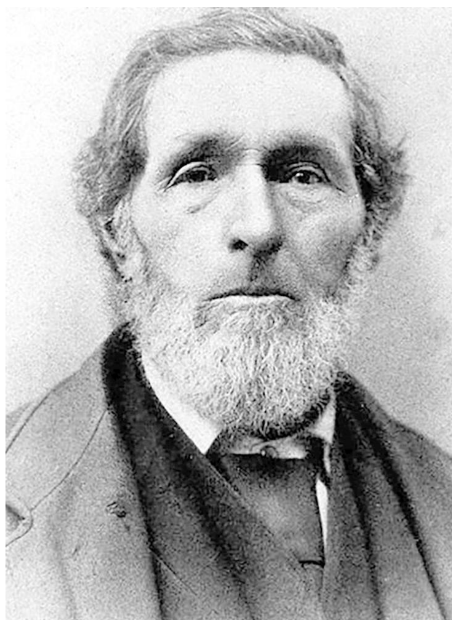


蒙哥马利·布莱尔（1813—1883）



查尔斯·萨姆纳（1811—1874）

约翰·C.弗里蒙特的宣言激发了北方人反对奴隶制的热情，许多州频频称赞他。查尔斯·萨姆纳写道：“现在，我们的总统是独裁者，是最高统治者。然而，拥有上帝的力量却不像上帝那样使用它是多么徒劳啊！”俄亥俄州人非常愤怒，他们在一位杰出的律师和法官的言论中找到了合适的表达：“由于约翰·C.弗里蒙特和政府争执不下，我们的人民处在极度惊愕和愤怒中。民众完全站在约翰·C.弗里蒙特将军一边……如果明年秋天举行选举，让约翰·C.弗里蒙特离职反而意味着让他成为总统。”伊利诺伊州的威廉·赫恩登是林肯以前的律师合伙人，后来，他写了关于林肯的传记。他说：“约翰·C.弗里蒙特的宣言是正确的，林肯对此的修改是错误的。”艾奥瓦州参议院的詹姆斯·格兰姆斯写道：“民众与约翰·C.弗里蒙特战线统一，与他‘风雨同舟’……在西北地区，所有人，不分教派、党派、性别和肤色，都赞成他的宣言，绝不允许联邦政府毫无理由地处置令人钦佩的、有道德、有理想的宣言发布者。”[13]



威廉·赫恩登（1818—18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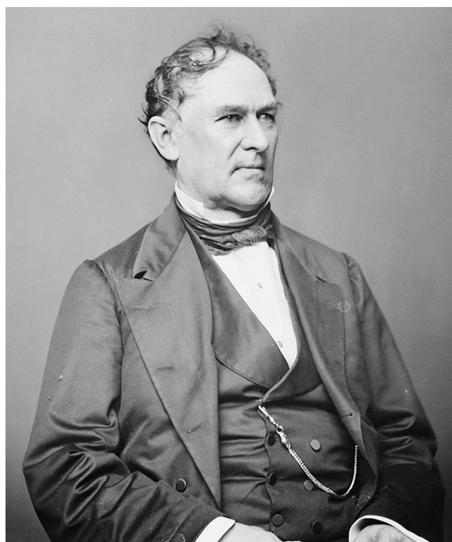
詹姆斯·格兰姆斯（1816—1872）

上述私人信件说明，当时的人民是理智的。但林肯依然对此感到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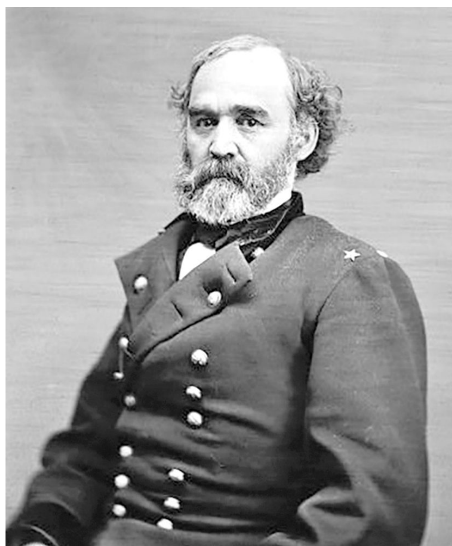
扰，他写给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奥维尔·H.布朗宁的秘密信件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奥维尔·H.布朗宁虽然被认为是保守派人士，但他也赞成约翰·C.弗里蒙特的宣言。1861年9月22日，林肯写道：“肯塔基州岌岌可危，我认为失去肯塔基州相当于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一旦失去肯塔基州，密苏里州和马里兰州也就保不住了。到时，我们无法应对反叛者，也无法处理手头事务。只能被迫同意分裂，失去华盛顿。”林肯在人民心中有一定影响力，公众舆论一直支持他。等了一段时间后，他开始了下一步行动。他从未想过因为一个宣言罢免约翰·C.弗里蒙特，但他认为必须改变密苏里州的管理不善和腐败现状。他行事谨慎，先后派出蒙哥马利·布莱尔和陆军总军需官蒙哥马利·C.梅格斯及战争部长西蒙·卡梅伦及其副将洛伦佐·托马斯，前往圣路易斯进行彻底、真实的调查。

蒙哥马利·C.梅格斯听到了一个传言，称约翰·C.弗里蒙特有一个类似阿伦·伯尔[14]阴谋的计划。1863年，林肯曾向私人秘书和两位朋友说过在1861年9月的某一天，约翰·C.弗里蒙特太太带着一封信，信中是约翰·C.弗里蒙特将军为自己的宣言做的辩解，她说了很多事，让我大费脑筋，只能尴尬地应对，避免与她争吵……她不止一次地暗示，约翰·C.弗里蒙特如果想和我做个了结，定会亲自前来。对此，林肯在伊利诺伊州的老朋友、现任美国驻普鲁士大使回应道：“很明显，约翰·C.弗里蒙特认为联邦必然灭亡，并认为只要自己攻克孟菲斯，组建军队，就能建立独立政府。”[15]林肯认为，驻普鲁士大使的报告有一定依据。约翰·尼古拉在一封密封中留下的文件表明了这一点。信封背面写着“私人文件，1861年10月2日与总统的对话”，其中一个标题是“约翰·C.弗里蒙特准备反叛”[16]。尽管如此，林肯依然不会因一份报告感到不安，或影响自己的行动。此外，蒙哥马利·布莱尔建议以效率低下为由罢免约翰·C.弗里蒙特。西蒙·卡梅伦和洛伦佐·托马斯的调查结果也让罢免约翰·C.弗里蒙特势在必行。西蒙·卡梅伦和洛伦佐·托马斯汇报说，约翰·C.弗里蒙特“无法胜任也不适合处理重要的指挥工作”，而且他“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时，会多多少少将物资供给作为考虑因素。”1861年10月24日，林肯下令罢免约翰·C.弗里蒙特。罢免令生效前，林肯的好朋友伊莱休·B.沃什伯恩任众议院政府契约小组委员会负责人。他在圣路易斯待了两周，收集了控告约翰·C.弗里蒙特及其朋友的大量证据，并写信给萨蒙·P.蔡斯[17]说：“无法想象，在约翰·C.弗里蒙特的管理下，西部地区抢掠、欺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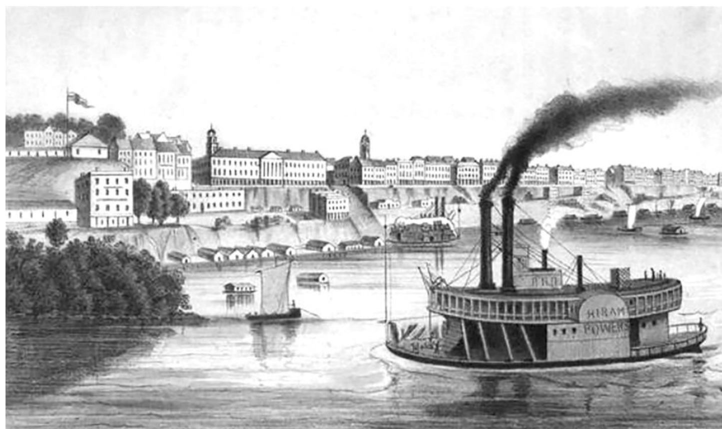
奢侈、贪污之风盛行。一个有组织的抢掠体系在他的眼皮底下形成……他确实组建了一个高于政府的权力机构，而且蔑视联邦政府的指令。如果联邦政府不打压他及其强盗团伙，就得承认自己失败了。”林肯一定看了这封信。如果必须进一步解释罢免约翰·C.弗里蒙特的原因，伊莱休·B.沃什伯恩的信已经足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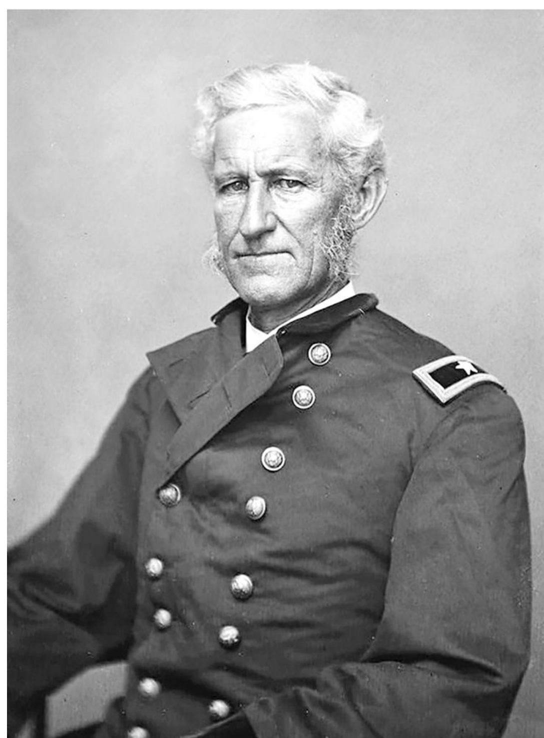
奥维尔·H.布朗宁（1806—18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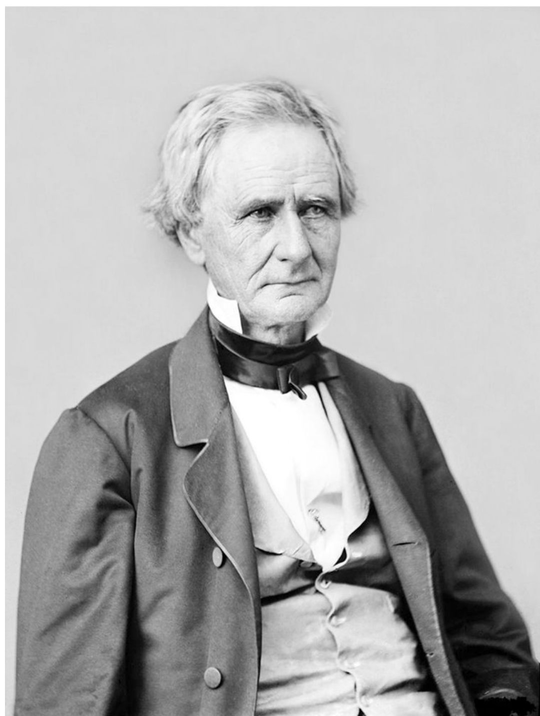
蒙哥马利·C.梅格斯（1816—18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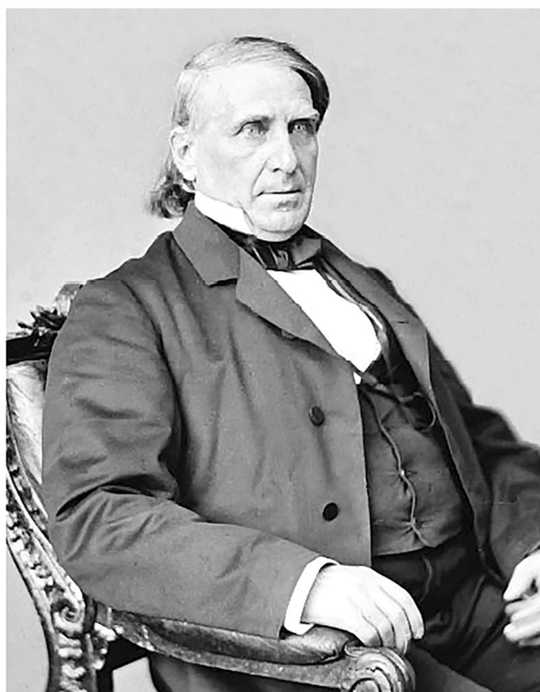
孟菲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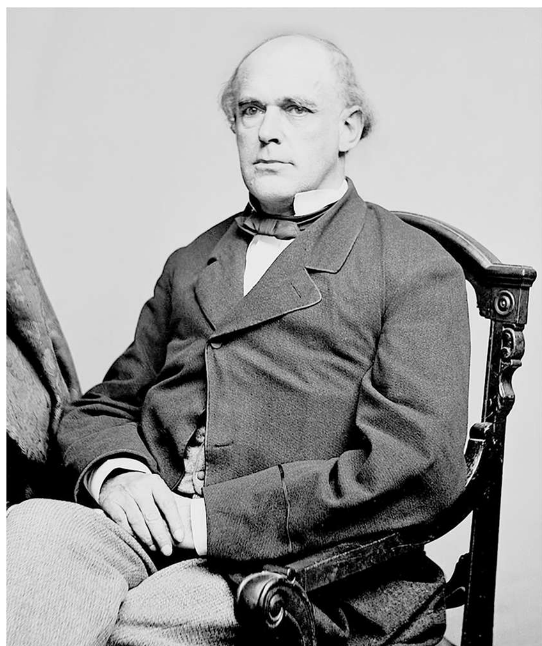
洛伦佐·托马斯（1804—1875）



西蒙·卡梅伦（1799—1889）



伊莱休·B.沃什伯恩（1816—1887）



萨蒙·P.蔡斯（1808—1873）

虽然美国人无法看到机密信件和报告，但林肯的举动已经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然而，一些人依然将约翰·C.弗里蒙特视为反奴事业中的英雄。许多富人被骗入了歧途，因为骗子知道如何利用他们心中所想。譬如，亨利·沃德·比彻 [18] 在教堂里说：“我必须严肃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们的政府对密苏里州的事业及对高贵的约翰·C.弗里蒙特将军的处理都极其不公。在很大程度上，公众也是如此。”再如，著名的共和党杂志《辛辛那提公报》的编辑理查德·史密斯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联邦政府知道西部受到了革命的威胁吗？一直忠心耿耿、坚决支持战争的人烧毁总统肖像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突然核对入伍名单……人们认为约翰·C.弗里蒙特已经成为一名烈士……结果，欧洲也认为他是美国最受欢迎的人。约翰·C.弗里蒙特之于美国相当于拿破仑之于法兰西帝国，总统却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19]

第4节　乔治·B.麦克莱伦

与此同时，乔治·B.麦克莱伦显得精力充沛，准备一展身手。他在华盛顿周围建筑了防御工事，并组建了波托马克军。乔治·B.麦克莱伦执行力很强，做事有条不紊，全身心投入备战工作，恪尽职守。他每天穿梭在不同的团旅之间，十分了解自己手下的军官和士兵。他是一位高尚的绅士，带着对士兵的尊敬和钦佩来到华盛顿，很快因人格魅力赢得了士兵们的爱戴。除了乔治·B.麦克莱伦，没有任何一个北方将军能获得北方联邦军的绝对忠诚。人们高度赞扬他在弗吉尼亚州西部的胜利，称他为“年轻的拿破仑”。因此，军队、政府和国家都相信他的军事天赋。起初，乔治·B.麦克莱伦似乎非常清楚自己的目的。1861年8月4日，他写信给林肯说：“政府的军事行动刻不容缓。叛军选择弗吉尼亚州作为战场。同时，弗吉尼亚州也适合我们展开第一场伟大战斗。”

乔治·B.麦克莱伦勤勉尽责，加上其他人的积极配合，他的组织才能得以充分发挥。林肯、财政部、陆军部、国务卿和北方各州的州长都鼎力协助他。军官们饱含热情，对他忠心耿耿。乔治·B.麦克莱伦拥有君主一般的影响力。一开始，这种和谐局面是鼓舞人心的。随着北方人民日趋高涨的热情，北方联邦军的人数迅速增加。1861年7月27日，北方联邦军人数已达五万两千人，三个月后扩至十六万八千人。

然而，乔治·B.麦克莱伦很快暴露了一个缺点。他虽然很勇敢，但担心战士们会退缩。此外，他获取的南方邦联军的情报并不准确，或者他从掌握的准确信息中得出的推论并不可靠。1861年8月，乔治·B.麦克莱伦一直担心南方邦联军人数会超过自己的军队及南方邦联军会攻击波托马克河弗吉尼亚州一侧的地区，并渡过华盛顿北边的河流。然而，此时的约瑟夫·E.约翰斯顿并不打算行动。他因兵力薄弱、食物和弹药缺乏、军纪涣散及疾病蔓延苦恼。1861年9月至1861年10月，约瑟夫·E.约翰斯顿在费尔法克斯郡法院大楼内扎营，并在距华盛顿六英里半的山丘上建了牢固的岗哨。林肯和联邦将军可以清楚看到山丘上的南方邦联旗帜。1861年10月19日，约瑟夫·E.约翰斯顿率军撤到森特维尔和马纳萨斯中转站。虽然远离了华盛顿，但占据了地理优势。

1861年10月27日过后不久，乔治·B.麦克莱伦在写给战争部长西蒙·卡梅伦的信中说："现在，我们需要实现的伟大目标是彻底击败马纳萨斯的叛军。" [20] 北方联邦军人数充足，战斗力旺盛，足以击败南方邦联军。联邦当局一致认为，乔治·B.麦克莱伦凭一己之力组建波托马克军有点儿不可思议。新兵满足现役要求一般需要六个月时间，但乔治·B.麦克莱伦只用了三个月就做到了。威廉·亨廷顿·拉塞尔认为，从布尔溪战役前的"大军"到乔治·B.麦克莱伦的波托马克军，称得上是一个奇迹。他认为，1861年7月，北方联邦军被人数只有其三分之一的英国常规军打败，也许在1861年9月，他们可以像曾经"被世间某种力量集结起来"时那样，拥有"钢筋铁骨" [21] 。



费尔法克斯郡法院大楼

当乔治·B.麦克莱伦和欧文·麦克道尔一起穿梭在波托马克河南边的各个营地的时候，乔治·B.麦克莱伦常指着马纳萨斯说："我们将从那儿进攻。"毋庸置疑，猜测战事是没有意义的，就像猜测生活中的琐事一样。但重要的是，1861年秋季，林肯和国民开始质疑乔治·B.麦克莱伦的军事能力，质疑的理由也合情合理。1863年8月4日，乔治·B.麦克莱伦在报告中致歉，并在自传中致歉 [22] 。但当代的相关文献和研究资料很少佐证这一点。根据乔治·B.麦克莱伦的叙述，1861年10月27日，他的可用兵力是十三万四千人，"可随时行军的士兵"有七万六千人。与此同时，约瑟夫·E.约翰斯顿只有四万一千人。北方联邦军的大炮非常先进 [23] ，步

兵的武器装备也十分精良，而且士兵们个个身体强健，但南方邦联军的士兵们身体状况很不好。天气晴朗干燥，道路也适宜行军。然而，布尔溪战役和李斯堡战役的胜利使南方邦联军士气大振 [24] 。尽管如此，波托马克军的军官和士兵们依然忠诚于乔治·B.麦克莱伦，渴望战斗。如果乔治·B.麦克莱伦愿意率领他们作战，他们很乐意追随他。

南方邦联军的纪律性比北方联邦军稍强一些。他们的将军谨慎小心，愿意采取攻势。1861年10月1日，约瑟夫·E.约翰斯顿向杰斐逊·戴维斯报告说，希望邦联政府再派出一万九千名强健的士兵，并配上必要的“运输工具和武器装备”，他将“渡过波托马克河，让敌方领地燃起战火” [25] 。当时，约瑟夫·E.约翰斯顿非常清楚北方联邦军的兵力优势。

乔治·B.麦克莱伦在军事评论中含蓄自省了自己作为指挥官的不作为。1861年8月8日，他写信给华盛顿的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说：“我断定前方的南方邦联军至少有十万人。我如果是手握军队指挥权的皮埃尔·博勒加德 [26] ，一定会攻击波托马克河另一岸的阵地，同时率军渡过华盛顿市区的河流。” [27] 然而，实际情况是，乔治·B.麦克莱伦率军七万六千人，对抗南方邦联军四万一千人。但直到1861年11月，他一直按兵不动，并未按之前的部署行动。他对林肯说：“我没有蠢到在敌人指定的地点进攻马纳萨斯。”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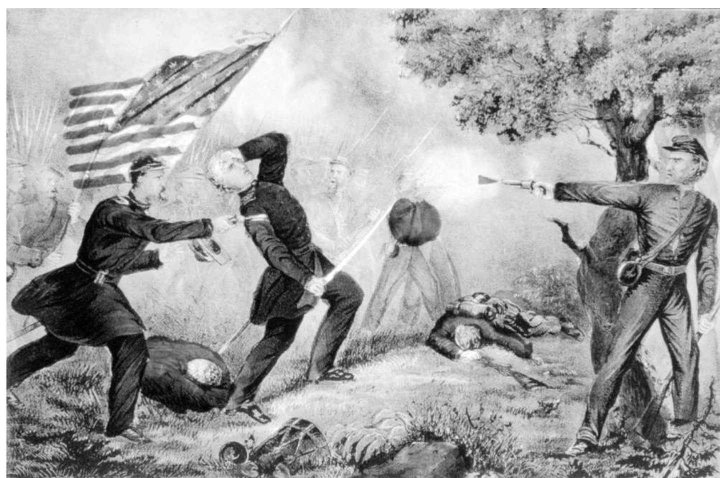
从乔治·B.麦克莱伦当时的私人信件判断，他似乎认为联邦的政府官员有意加大任务难度。他写道：“我处处遭到无能者的阻挠和欺骗。” [29] 事实上，“从林肯到站在门外的勤务兵” [30] ，每个人都在按照他的部署协助他。李斯堡战役的惨败并不是林肯、内阁、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或参议员们的错，而是乔治·B.麦克莱伦的错。乔治·B.麦克莱伦妄想南方邦联军有十五万人，以此为自己的不作为辩解。约翰·海伊与乔治·B.麦克莱伦夜谈后，“失望地意识到，乔治·B.麦克莱伦毫无计划” [31] 。

林肯与乔治·B.麦克莱伦严肃讨论了李斯堡战役的惨败。谈到爱德华·D.贝克的牺牲时，乔治·B.麦克莱伦说：“在战役结束前，会有许多戴着肩章的优秀战士战死沙场。所有损失都是可以弥补的。总统先生，如果我倒下了，您会立即派人坐上我的位置。”林肯回复道：“我希望你多珍重。” [32]

约翰·海伊写道，1861年10月26日晚，“由参议员莱曼·特朗布尔、撒迦利亚·钱德勒和本杰明·韦德代表的雅各宾派站了出来，不希望政府卷入战争。”“1861年的夏天，骚乱卷土重来。林肯辩护说，乔治·B.麦克莱伦只是太过谨慎。”在前往乔治·B.麦克莱伦司令部的路上，雅各宾派的代表受到了人们的议论。“林肯不希望民众太心急，但也承认这是事实，应予以考虑。他说：‘同时，将军，你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再战。’乔治·B.麦克莱伦回答：‘如果败了，我将无颜再见您或任何人。’林肯说，‘我打算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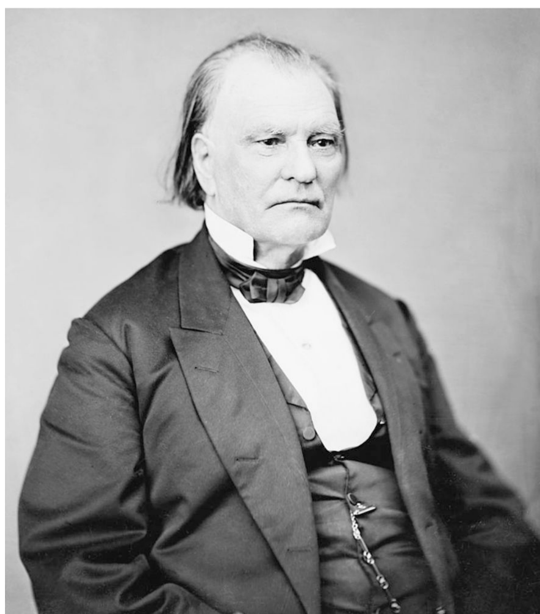
李斯堡战役



在李斯堡战役中，爱德华·D.贝克上校战死



莱曼·特朗布尔（1813—1896）



本杰明·韦德（1800—1878）



撒迦利亚·钱德勒（1813—18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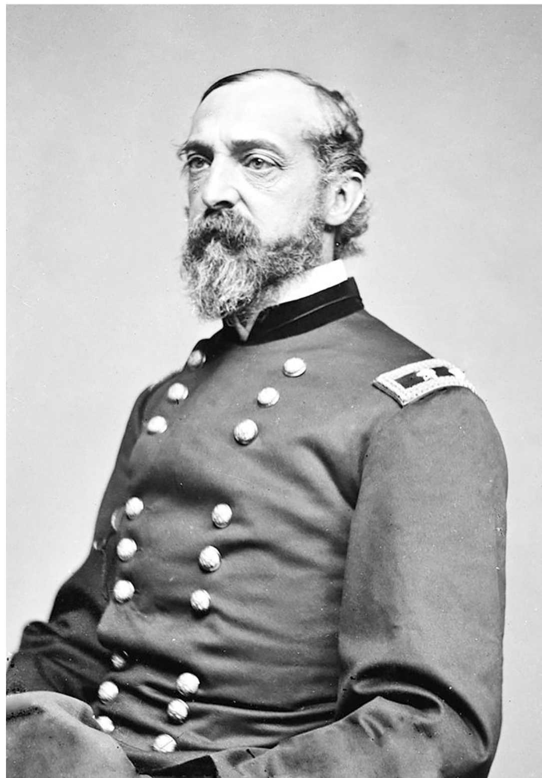
1861年10月31日，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自愿离职。乔治·B.麦克莱伦接替了他，统领北方所有联邦军队。1861年11月1日夜晚，在司令部，林肯命约翰·海伊宣读任命书，宣布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卸任，由乔治·B.麦克莱伦掌管军队指挥权。乔治·B.麦克莱伦和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之间曾有摩擦。林肯说：“我由衷希望这份重任不会让你感到不安。”乔治·B.麦克莱伦回答道：“总统先生，真是太好了！今天，我觉得有好几吨重物从我肩上卸了下来。现在，我能与您和威廉·H.苏厄德国务卿交流了，我没有因新的重任感到不安。”林肯又说：“那好，我拭目以待，静候佳音。除了指挥现在的军队，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也是一份重担。”乔治·B.麦克莱伦自信地说：“我可以做到的。”[34]

联邦政府有权要求乔治·B.麦克莱伦进攻。乔治·B.麦克莱伦容易低估

自己军队人数和战斗力。七万六千名“可随时行军的士兵”很有可能扩充到十万人。乔治·B.麦克莱伦应该向约瑟夫·E.约翰斯顿开战，或用计谋诱使约瑟夫·E.约翰斯顿离开马纳萨斯，抑或加强波托马克河下游的封锁或占领诺福克 [35] 。1861年秋天，乔治·B.麦克莱伦的任何举动都可以振奋民心，重获人民和林肯的信任，而且意义重大。但他毫无作战计划，根本没有能力统领十万大军。此外，当时北方联邦军中是否有可以胜任统帅的其他将军还不确定。战争结束很久后，尤利西斯·S.格兰特谈到乔治·B.麦克莱伦最初承担的“重大而残酷的责任”时，说：“如果乔治·B.麦克莱伦像威廉·T.谢尔曼、洛伦佐·托马斯或乔治·米德将军一样，积极开战，一路奋勇杀敌，他的荣誉将和他们一样高。” [36] 现在，威廉·T.谢尔曼是乔治·B.麦克莱伦军队中的一员。1864年，威廉·T.谢尔曼以出众的军事才能率领着一支十万人的军队。但当时，他告诉林肯，自己的“最大愿望”是“以下属身份参战，绝不参与任何上级指挥” [37] 。为了使进军、演习、供给和战斗达到最佳效果，十万北方联邦军几乎挖掘了人类的潜能极限 [38] 。约瑟夫·E.约翰斯顿显得“平静而悲伤” [39] ，认为自己最多率领六万人发起进攻。布尔溪战役中，他指挥着三万兵力，作战经验丰富。



约翰·海伊（1838—1905）



乔治·米德（1815—18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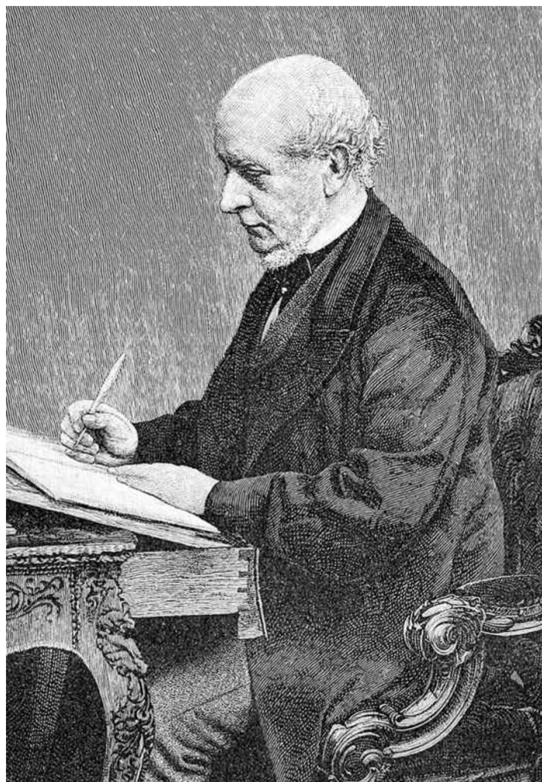
乔治·B.麦克莱伦如果能像林肯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那样谦逊，可能就不会受到众人的批评了。但功名富贵来得太快，他逐渐自负膨胀了起来。从他对林肯的无礼态度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一次，乔治·B.麦克莱伦以高人一等的姿态描述林肯道："他诚实、善良。"[40] 1861年11月13日夜晚，林肯、威廉·H.苏厄德和约翰·海伊来到乔治·B.麦克莱伦家。门口的仆人说乔治·B.麦克莱伦去参加一名军官的婚礼了，很快会回来。约翰·海伊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件事："我们进去等了一个小时，乔治·B.麦克莱伦回来了。他根本没有在意门卫的话，走过林肯总统和威廉·H.苏厄德等候的房间，径直上了楼。林肯总统和威廉·H.苏厄德又等了约半个小时，再次让一个仆人告诉乔治·B.麦克莱伦，他们还在，得到的回复却是他已经上床睡觉。我只叙述前所未有的军权带给他的傲慢，不做任何评论。"约翰·海伊还写道："我第一次看到具有威胁性的至高军权。回家后，我与林肯总统谈起这件事，但他似乎没有特别在意，说现在最好不要太过注重礼节和个人尊严。"[41] 还有一次，乔治·B.麦克莱伦没有守约来见林肯。林肯说："没关系，只要乔治·B.麦克莱伦能为我们赢得战

争，我愿为他牵马。”[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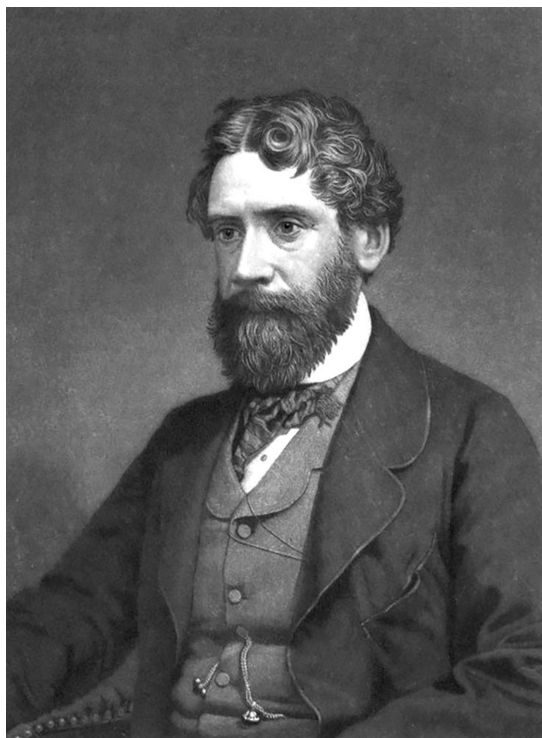
1861年12月，乔治·B.麦克莱伦得了伤寒。林肯、波托马克军和全国人民都在等他康复。

第5节　英国的态度

英国官方认为，美国南北“确实爆发了战争”[43]。杰斐逊·戴维斯申请捕拿特许证[44]。林肯宣布封锁美国附近海域。上述两种行为只在战时才被允许，表明美国南北冲突将会扩至其他国家的海域。1861年5月13日，英国发布了《中立声明》，但北方据不接受，因为《中立声明》承认南方邦联是一个交战国。联邦政府认为南方人是叛国者。因此，一旦欧洲国家将反叛者视为交战国，联邦政府的立场就会被误解[45]。因此，威廉·H.苏厄德和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对《中立声明》的谴责符合外交惯例。此外，约翰·洛斯罗普·莫特利关于波士顿民心的报道也不足为奇。他写道：“约翰·拉塞尔伯爵[46]宣布南方的私掠者是战士，引起了热爱英国的美国人的极大愤慨。”[47]在不热爱英国的北方地区，人们的愤慨情绪空前高涨。1862年，在反对英国认可南方邦联的运动中，北方人的所有不满可能起了一定作用。然而，经过客观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英国认可南方邦联诸州的交战权是合理的。发布《中立声明》的英国外交大臣说了一句令人信服的话。在一封写给爱德华·埃弗雷特的私人信件中，约翰·拉塞尔伯爵写道：“超过五百万自由人公开反抗美国总统和国会，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如果联邦政府试图拦截英国商人，我们也没有理由将五百多万自由人视为海盗，逮捕他们的水手。但如果不将他们视为海盗，我们便不能否认他们的交战权。”[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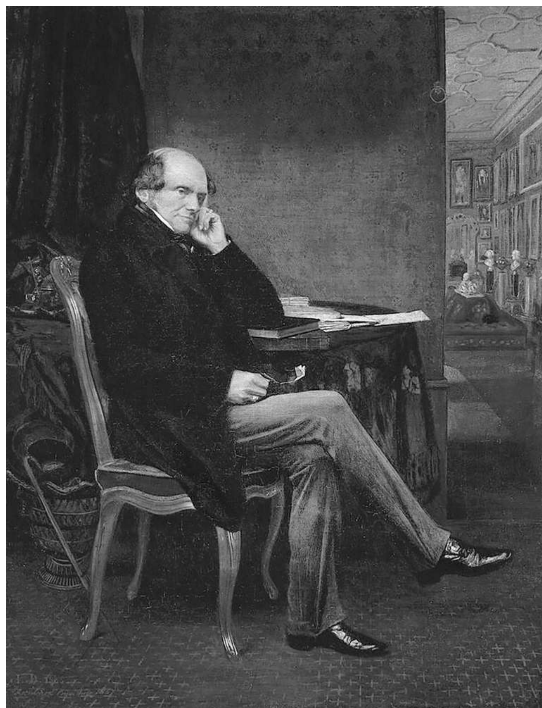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1807—18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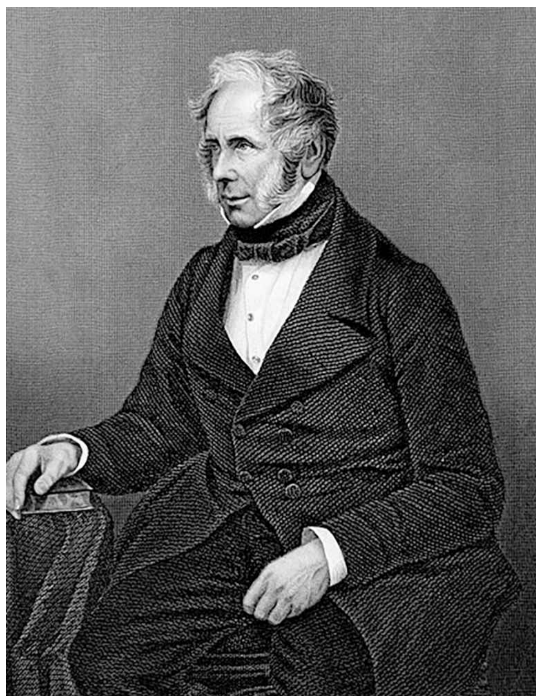


约翰·洛斯罗普·莫特利（1814—1877）

英国承认南方邦联的交战权并非恶意。英国通过公开和私人途径，一再解释自己的立场。北方人逐渐明白，英国认可南方的交战权与认可南方邦联独立是两回事，因此，怒气慢慢消退。林肯表示理解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并相信联邦政府得到了各国的支持。1861年5月31日，驻伦敦的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道："美国的高层人士对联邦的态度开始转变，但大部分人态度依旧。"[49]



约翰·拉塞尔（1792—18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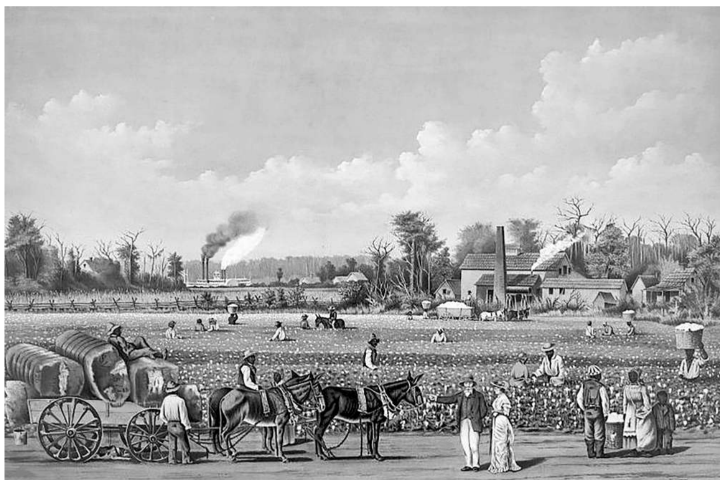


亨利·约翰·坦普尔（1784—1865）

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恰当描述了英国人的观点："我们不喜欢奴隶制，但我们想要棉花，而且我们不赞成你们的莫勒尔关税。" [50] 庞奇声明支持北方，但也坦言："连接我们与美国南方的强大纽带是棉花……没有黑奴的辛劳，何来我们的印花布？"

当时，"北方制约着美国的商业贸易"。因此，人们意识到了"责任的划分"，必须在"自由贸易和兄弟情谊" [51] 中做出选择。但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道："毕竟美国人非常赞同伏尔泰的观点，即'上帝总会站在大炮的一边'" [52] 。

就联邦政府在英国的处境来说，没有赢得布尔溪战役是不幸的，因为北方的战败引起了英国强烈的反感。英国贵族和上中产阶级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说道："美国的民主泡沫破了。"1861年秋天，从事商业和制造业的英国人逐渐意识到，布尔溪战役的结果也影响到了他们，因为联邦政府切断了棉花的供应。通常，他们在初秋时节就能收到新棉花，但现在什么也没有。棉花库存迅速减少。《泰晤士报》说："制造业养活了英国五分之一的人口，但现在正在走向终结。" [53] 英国工厂缩短了工时，制造商降低了工资。面对即将到来的棉花荒。棉纺织业主和劳工们都很沮丧，横在他们和棉花供应之间的封锁线阻断了正常贸易，劳工们忍饥挨饿。英国制造商的个人利益和贵族的情感偏好时而融合，时而对抗，两大阶层都希望美国北方战败。对英国来说，最好的结局是美国分裂成两个国家，尤其是南方邦联可以为英国提供自由贸易，使英国的制成品获得一个广阔市场，从而支付原料棉的成本。有了愿望，才会有想法。如果研究一下布尔溪战役，就会发现已有定论。英国贵族和上中产阶级得出的结论是：北方无法征服南方，美国必然分裂。《泰晤士报》和《星期六评论》支持这一观点。许多报道的言辞具有讽刺意味，刺到了美国北方读者的痛处。查尔斯·萨姆纳呼吁威廉·亨廷顿·拉塞尔，"帮助我们博得英国的同情"。威廉·亨廷顿·拉塞尔回复道："不要忘记，我祈祷国内真的迎来光明主义和共和主义。"保守的报纸有意打击美国，"美国就是抵抗打击的盾牌。" [54]



黑奴在棉花种植园劳作

英国的劳苦大众认为，英国《宪法》和政府不仅是世界上最好的，而且是迄今为止最好的 [55] 。他们以“一种轻蔑和侮辱的口气” [56] 随意批判美国北方。战斗在生死线上的北方人对此感到非常愤怒。嘲笑北方联邦军在布尔溪战役中的怯懦恐慌是一个民族打压国民独立意向的常用手段，但这种嘲笑令人难以忍受。在美国时，爱德华·戴西 [57] 与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讨论什么是“对英国无礼的敌意”。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回答道，可能自己的感受被过分夸大了。他指着一位英俊青年的画像问道：“你如何解读这名青年献身悲壮事业的做法？像他这样的美国军官怎么会是懦夫呢？”画像上的青年是他的一位近亲，也是马萨诸塞州第二十团的上尉，在李斯堡战役中阵亡。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写信给爱德华·戴西说：“美国内战与我息息相关，我非常不安，无法忍受南北方之间的矛盾。我有一个优秀的孩子，任某军团的上尉，他的军团因战斗和疾病折损惨重，他自己也受过两次枪伤，九死一生。”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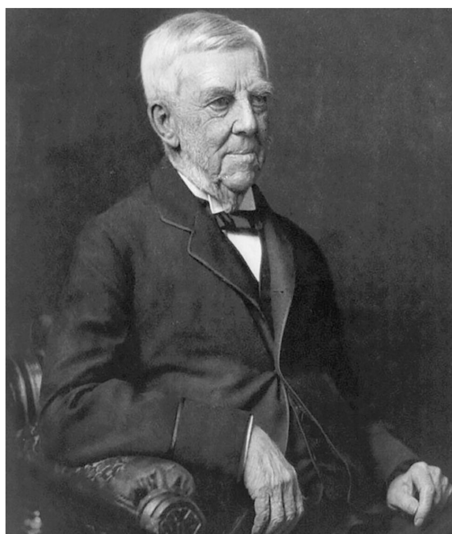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一些人认为，1859年的意奥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和公众都支持意大利。意大利人为自由而战，取得的所有进展使英国人坚信，他们应该摆脱可憎的专制统治，建立属于自己的政府，并得到文明世界的美好祝愿。有英国人问，我们既然曾支持意大利对抗奥地利，那么现在不应该支持抵抗北方镇压的南方邦联吗？这种观点影响了思想开放的亚瑟·格罗特，也影响了考虑到等级或商业和制造业的人的观点 [59] 。

但能力出众的英国政治家和作家清楚，美国北方发动战争是为了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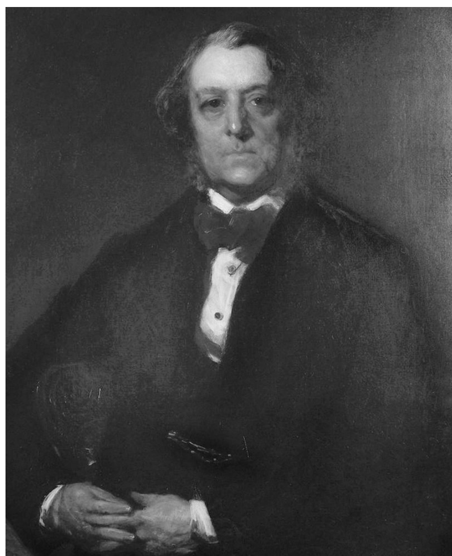
对奴隶制。他们担心的是，北方人从事的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会大失所望。但他们一直支持联邦大业。饥肠辘辘的工人是英国政治家和作家的追随者，但和英国上层阶级一样，工人们也意识到联邦大业是英国的民主大业。

1861年11月下旬前，英国一直保持绝对中立。在对美政策中，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虽然并未表达法兰西人的立场，但正式要求英国与其联手认可南方邦联，打破封锁线。约翰·拉塞尔伯爵在给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的一封信中指出，“英国和法兰西帝国打破封锁线不是为了得到棉花”，但两国可能会调解美国南北之间的冲突，警告拒绝调解的一方 [60] 将会成为英国和法兰西帝国的敌人。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回信说：“最好的政策是保持初心，看清楚美国南北之间的冲突。” [61] 后来，他在市长晚宴的讲话中“清楚表明，英国绝不会为了棉花干涉美国南北冲突。” [62]

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媒体人显得没有责任感，正在与英国媒体展开论战。在激烈的反驳中，他们发泄了对伦敦报刊狭隘评论的愤慨情绪。首当其冲的报刊是《纽约先驱报》，报道说：“英国人和西班牙人应该好好审视自己的行为，否则我们可能会找他们算账。”1861年11月20日，约翰·布莱特在写给查尔斯·萨姆纳的信中说：“遗憾的是，你们的《纽约先驱报》言辞鲁莽，而且毫无悔意。《泰晤士报》和《纽约先驱报》对英美两国都造成了伤害。”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09—1894）



亚瑟·格罗特（1814—18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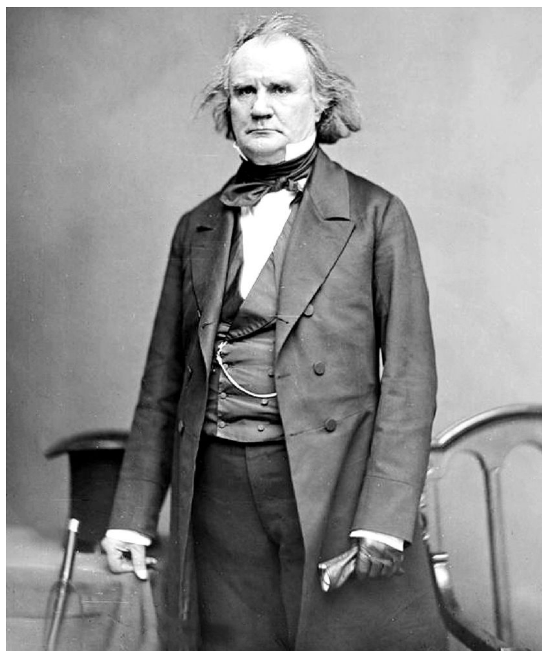


拿破仑三世（1808—18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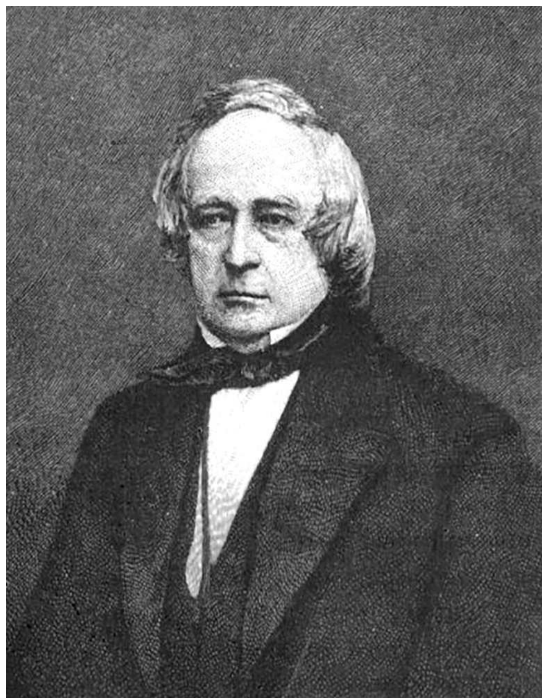
虽然英美两国的媒体之间摩擦不断，但两国政府依然互相理解。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威廉·H.苏厄德和林肯耗时六个月争取到了有利条件，却在短短一小时内，被一位莽撞的、“野心勃勃和自负任性的”[63] 海军上尉破坏，甚至将英美两国带到了战火边缘。

第6节　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

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是南方邦联派到英国和法兰西帝国的特使。他们乘一艘小型邦联轮船从查尔斯顿出发，一路躲过封锁，抵达古巴的一个港口，从古巴港口前往哈瓦那，乘英国邮轮“特伦特”号前往加拿大的圣托马斯。圣托马斯有直接前往英国南安普敦的轮船。1861年11月8日，离开哈瓦那后的第二天，在巴拿马运河上，查尔斯·威尔克斯指挥的美国军舰“圣哈辛托”号发现了“特伦特”号。查尔斯·威尔克斯开了一枪，子弹从“特伦特”号的船首上空飞过，并没有击中目标。紧接着，查尔斯·威尔克斯又开了一枪，击中了目标。他命令一名中尉率一些军官和海军陆战队员上船搜查，并下令一旦发现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立即监禁他们。英方船长不允许美军的任何搜查行为，也不同意出示相关文件或旅客名单。但约翰·斯莱德尔和詹姆斯·M.梅森自证身份，从而被捕。他们虽然进行了反抗，“特伦特”号的船长和负责邮轮的皇家海军指挥官也表示抗议，但仍然被强行带到了“圣哈辛托”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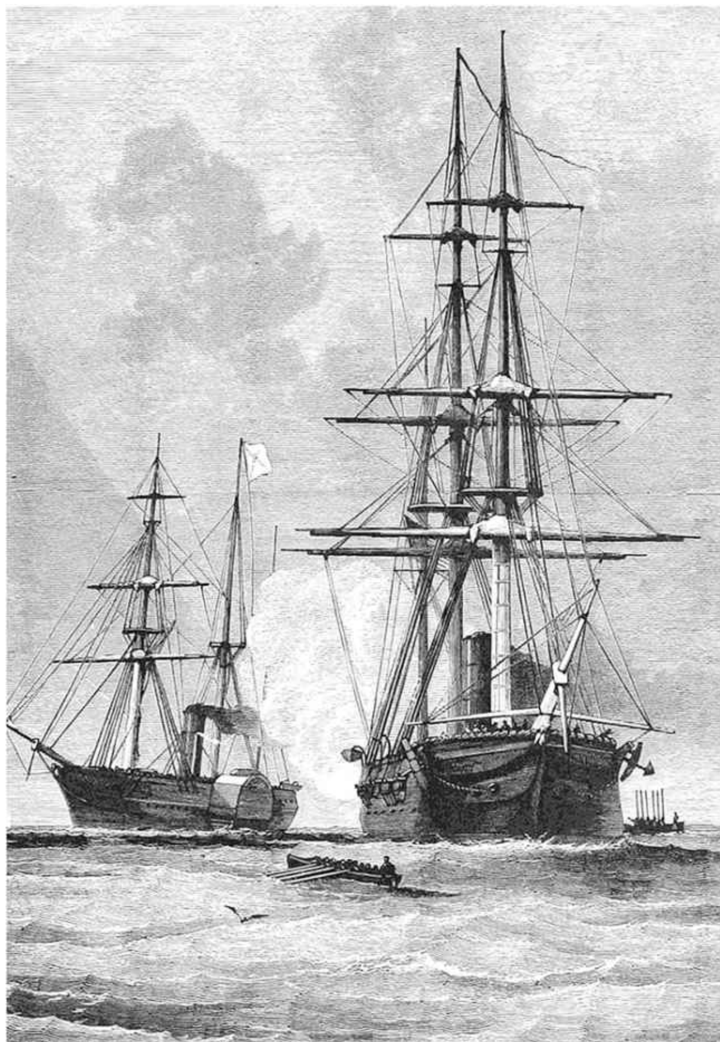
詹姆斯·M.梅森（1798—18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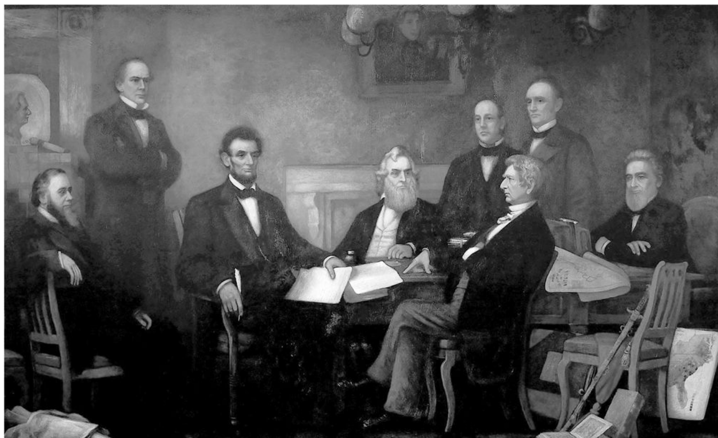
约翰·斯莱德尔（1793—1871）

1861年11月15日，查尔斯·威尔克斯抵达门罗堡。1861年11月16日，美国人得知了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被捕的消息。北方人完全被抓捕行动冲昏了头脑，像大战胜利一样欢庆。他们渴望胜利。现在，他们手中有两名南方人 [64] 。他们对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的痛恨仅次于对杰斐逊·戴维斯和约翰·B.弗洛伊德 [65] 的痛恨。英国可能会支持南方，因为这次抓捕也打击了英国。除了蒙哥马利·布莱尔，林肯内阁的其他成员都为抓捕感到高兴。战争部长西蒙·卡梅伦向办公室工作人员大声念出关于此次抓捕的电报，和大家一起欢呼雀跃。约翰·安德鲁和其他人也非常开心。约翰·安德鲁认为，与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相比，“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算得上一位圣人”。波士顿举办查尔斯·威尔克斯的庆功宴时，约翰·安德鲁说，在这次“著名的南北战争事件”中，查尔斯·威尔克斯做出了“明智的判断”，他还说：“今晚我们齐聚一堂，为勇敢的查尔斯·威尔克斯庆功，他举起了联邦的国旗，向插着英国国旗的船头开了一枪。” [66] 海军部长在一封写给查尔斯·威尔克斯的祝贺信中写道：“感谢你在抓捕行动中做出的伟大贡献” [67] 。会议第一天，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感谢查尔斯·威尔克斯“做出勇敢、机敏、

爱国的举动”[68]。



“圣哈辛托”号拦截“特伦特”号，拘捕两名邦联外交官



林肯内阁：从左到右依次是战争部长埃德温·M.斯坦顿、财政部长萨蒙·蔡斯、亚伯拉罕·林肯、海军部长吉迪恩·威尔斯、内政部长卡勒布·布拉德·史密斯、国务卿威廉·H.苏厄德、邮政部长蒙哥马利·布莱尔、司法部长贝茨

蒙哥马利·布莱尔谴责查尔斯·威尔克斯的行动是“未经授权的、不正规的、非法的” [69] 。当时，波士顿的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立刻回应道：“我们必须放了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 [70] 林肯也反对庆功情绪的扩散。消息传到华盛顿时，他说：“我担心两个叛国者根本没有价值。我们必须坚持美国关于中立者权力的原则。我们与英国据以力争，从理论和实践上坚持认为查尔斯·威尔克斯有权逮捕叛国者。” [71] 当时，林肯应该立即采取行动，与查尔斯·萨姆纳进行磋商，确定此次抓捕行动是否有法可依，有史可鉴。从一封私人信件中可以明显看出，查尔斯·萨姆纳的建议是“立即采取行动，并按照先例放人” [72] 。威廉·H.苏厄德后来的行动表明，如果林肯催促他，他会赞成在南方邦联提出要求前放了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林肯也许采纳了蒙哥马利·布莱尔的建议，即派查尔斯·威尔克斯将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带到前往英国的美国军舰上，并将他们交给英国政府 [73] 。这样做会显得有风度、机智、可敬。与罢免约翰·C.弗里蒙特时表现出的勇气相比，此刻的林肯并不需要太多勇气面对公众舆论，因为他有查尔斯·萨姆纳、威廉·H.苏厄德、蒙哥马利·布莱尔和乔治·B.麦克莱伦做后盾 [74] 。如果许多律师和政治家宣称，根据国际法，联邦政府应该行为正当，在引起民众骚乱前立即放人，联邦政府一定会默认之前收到的简洁报告，即坚持一直据以力争的原则。然而，林肯虽然意识到，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在监狱里说的话比联邦代表在伦敦和巴黎说的话更有说服力，但

依然害怕放了他们。实际上，作为一个政策问题，联邦政府应该让《逃奴法》的作者 [75] 去伦敦，让阻挠奴隶制议案通过的拥护者 [76] 去巴黎，因为他们的请求绝不可能影响联邦大业。至少在英国，他们代表了奴隶制。林肯行动迟缓，犹豫不决，错过了最佳时机。实际上，他的一句话可能相当于在战场上赢得一场战役。林肯是民意的引领者和代表者，但在关键时刻，他更像一个代表，而不是引领者。他和美国的普通民众都认为，与英国发生争端时，单方面考虑会使他无法做出明智决策。因为林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也没有发表任何公开言论，所以他的沉默被民众误解了。相关报道说他“固执己见”，并宣称他曾说：“我宁愿死，也不会放了他们。” [77]



查尔斯·威尔克斯（1798—1877）

由于还没有铺设大西洋电缆，直到1861年11月27日，英国才收到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被捕的消息。英国人认为这是对英国国旗的侮辱。约翰·布莱特在写给伦敦的查尔斯·萨姆纳的信中说：“在英国，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被捕的消息引起了巨大轰动。粗鲁

的、易怒的‘大不列颠统治’阶层非常愤怒。”[78]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在写给威廉·H.苏厄德的一封急件中说：“局势非常紧张。在英国，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被捕的消息甚至盖过了其他所有热点话题。”[79] 威廉·H.苏厄德的朋友查尔斯·麦凯[80] 写信告诉他和林肯：“英国人非常愤怒，如果全民投票，我担心一千人中会有九百九十九人赞成立刻开战。即使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愿意，也无法抑制人民的怒火。如果他被迫承认缉捕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是对英国国旗的侮辱，联邦当局必定会在两周内垮台。”[81]

英国内阁决定将扣押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一事定性为“一种侮辱英国国旗和违反国际法的暴力行为”，要求联邦政府释放南方邦联特使并“正式道歉”。根据英国内阁的决定，1861年11月30日，约翰·拉塞尔伯爵准备给理查德·莱昂勋爵发一封急件。他在信中语气柔和，使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指令听起来亲切友好。虽然阿尔伯特亲王直言不讳，不太符合女王和亲王应有的和蔼可亲，但约翰·拉塞尔伯爵的言辞依然是礼貌的外交用语，而且没有改变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的本意。1861年12月1日，维多利亚女王的一位信使奉命前往华盛顿。



查尔斯·麦凯（1814—1889）

英国开始备战，并将维多利亚女王的指令派送给了理查德·莱昂勋爵和驻美国水域的英国舰队指挥官。与此同时，八千名英国士兵[82]被派往加拿大。维多利亚女王宣布，禁止英国出口武器弹药。英国政府禁运了三千吨硝石。这些硝石是最近市场上能购买到的、可以立刻运往美国的所有储量。

第7节　维多利亚女王的指令

奇怪的是，和美国政府一样，英国政府虽然回应了民意，但并未依据法律和先例做出解释。1861年11月12日，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被捕后的第四天，也就是消息传到英国前十五天，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应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的邀请，在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的书房与他会面。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认为，当时，南方邦联特使乘英国邮轮前往英国，南安普敦的一艘美国战船监视着这艘邮轮，试图强行带走南方邦联特使。他说："我不会质疑你们是否有权这么做。也许你们能为此辩解……或许不能……但你们的做法非常荒唐……如果查尔斯·威尔克斯……在英国人可以看到的海域内做出侮辱英国国旗的举动，一定会引起英国人的厌恶。从中，我没有看到可以作为补偿的好处。当然，也不认为乘英国邮轮前往伦敦的美国人增加一二，可以改变联邦政府已定的政策。" [83]

《约翰·T.德莱恩传》出版前，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曾友好地提醒约翰·T.德莱恩。但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和美国作家都不知道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的提醒内容。约翰·T.德莱恩是《泰晤士报》的编辑，在政治上与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建立了深厚友谊。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会见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前一天，曾写信给约翰·T.德莱恩说："亲爱的约翰·T.德莱恩，我想以下内容可能对你有用。今天，我和史蒂芬·勒欣顿法官 [84] 、三名检察官、乔治·格雷爵士 [85] 及萨默塞特公爵爱德华·西摩 [86] 在财政部会面。毫无疑问，我们是为了商讨怎样妥善处理美国巡洋舰搜查载有南方邦联特使的英国邮轮一事。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根据斯托厄尔爵士威廉·斯科特 [87] 制定的、我们一直践行的国际法原则，交战国有权拦截并搜查任何非战船，或出现在公海海域、携带敌方急件的中立船只。因此，根据国际法原则，美国巡洋舰可以拦截英国邮轮，并对英国邮轮进行搜查。如果美国海军在英国邮轮上发现了南方邦联的人及其信件和证件，就可以带走他们或扣下英国邮轮，并将其带回纽约进行审判。" [88]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道："因此，根据国际法原则，'圣哈辛托'号可以拦截'特伦特'号，并对其进行搜查。如果'特伦特'号上有南方邦联的人，'圣哈辛托'号上的军官

可以和查尔斯·威尔克斯一样行事，将南方邦联的人带走，然后让'特伦特'号继续航行。”[89] 1861年11月11日，在假设情境下，英国政府官员提出了上述意见。但在1861年11月29日，当英国检察官确定“特伦特”号事件是一起真实的扣押事件时，根据国际法的原则和惯例，他们改变了之前的决定，宣布“依据国际法”，查尔斯·威尔克斯的行为“是不正当且非法的”[90]。换句话说，英国检察官并没有遵循英国的先例，而是借鉴了一些美国人的论点。这一论点更多的是依据蒸汽时代和19世纪后半叶的海上条约提出的。英国民众愤怒地指出，英国政府官员在1861年11月11日提出的意见已经陈旧过时，必须阐明法律依据。此外，在某种程度上，英国政府必须加强其论点。



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



阿尔伯特亲王（1819—1861）



史蒂芬·勒欣顿（1782—1873）



乔治·格雷爵士（1812—1898）



爱德华·西摩（1804—18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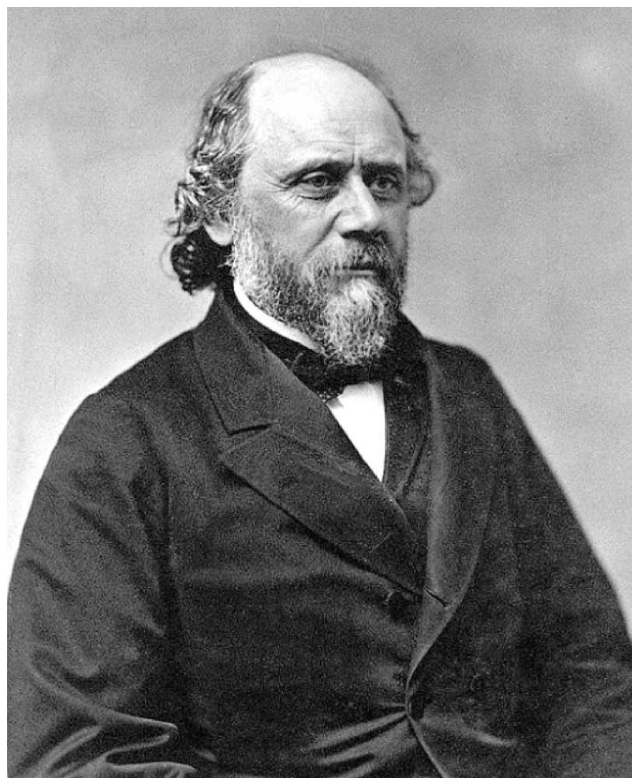
威廉·斯科特（1745—1836）

人们普遍认为，驻英国的外交大臣和大使流连于奢靡的英国上层社会，参加伦敦贵妇的晚宴，拜访名流权贵等各色人物，灵魂很容易受到腐蚀。但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显得与众不同。他深入伦敦社会，经常接受名流的邀请，前去乡间府邸参加宴会。事实上，当他听到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被捕的消息时，正在约克郡霍顿爵士理查德·蒙克顿·米尔恩斯的家里。但他参加晚宴、招待会和乡间聚会都是为了工作，为了力所能及地协助联邦政府。在英国的处理结果未出来前，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虽然深知“特伦特”号事件的严重性，但一直显得心平气和。1861年12月6日，他在给威廉·H.苏厄德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英国人非常激动，如果联邦政府袒护查尔斯·威尔克斯，英美冲突在所难免。”[91] 我们可以从他的私人信件中明显看出，如果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是联邦政府的国务卿，他会建议政府立即释放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他写信给约翰·洛斯罗普·莫特利说：“在强调中立权力，尽可能减少‘特伦特’号事件的影响方面，我们的政策趋向统一。我认为，

在当前的诱惑面前，让英美两国改变立场并非对局势有利。”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对理查德·H.达纳说：“最让我恼火的是，我们竟然同意收下并穿上英国扔掉的破衣服。”[92]



理查德·蒙克顿·米尔恩斯（1809—1885）



理查德·H.达纳（1815—1882）

1861年12月18日晚11时30分，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使将约翰·拉塞尔伯爵的急件和两封私人信件交给了理查德·莱昂勋爵。信中是维多利亚女王经过深思熟虑后下达的详细指令。1861年12月19日，理查德·莱昂勋爵拜访了威廉·H.苏厄德，向威廉·H.苏厄德解释说明了维多利亚女王官方急件的要旨。威廉·H.苏厄德问理查德·莱昂勋爵："指令中是否规定了美国政府必须回复的时间期限？"理查德·莱昂勋爵回答道："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希望尽量避免一切冲突。"威廉·H.苏厄德迫切想知道一些私密信息。理查德·莱昂勋爵清楚威廉·H.苏厄德的意图，回答道："我会告诉您的。根据我接到的指令，我必须在七天内得到您的回复。"然后，威廉·H.苏厄德"私下很随意地"向理查德·莱昂勋爵要了一份急件副本，因为"做出决定前，他必须阅读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件，仔细研究其措辞。"对此，理查德·莱昂勋爵回答道，如果自己正式提供了信件副本，"七日之约必须立即生效"。威廉·H.苏厄德说，提供副本只是为了让林肯总统和他知道，急件已经送到。理查德·莱昂欣然同意了威廉·H.苏厄德的要求，回到大使馆后立即将副本装在了写有"私密"字样的信封内，

并寄给了威廉·H.苏厄德。威廉·H.苏厄德立即回复道他很高兴，“这封急件诚恳友善，毫无专断和威胁之意”。现在，他信心满满地问道：“如果我在七天内回绝你，或提出商讨‘特伦特’号事件的建议会怎样？”理查德·莱昂勋爵回答道：“我接到的指令非常明确。我没有任何自由裁量权。如果回复不符合信件提出的要求，尤其是不能立即释放扣押人犯，我拒绝接受。”[93] 1861年12月23日上午，因为威廉·H.苏厄德公务繁忙，而且想了解详情，所以他一直拖着没有回复理查德·莱昂勋爵。理查德·莱昂勋爵再次来访，读了急件内容，并给威廉·H.苏厄德留了一份副本。1861年12月23日起，七天漫长的等待开启。

英国人要求英国政府就“特伦特”号事件给出最后结论，在措辞中没有过多考虑美国人的痛处，在私人信件中亦是如此。理查德·莱昂勋爵贯彻了维多利亚女王信件中的精神，并执行了信中的指令。毫无疑问，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人们支持他体恤威廉·H.苏厄德的困境。公布关于扣押的消息时，理查德·莱昂勋爵写信给约翰·拉塞尔伯爵，说：“我无法隐藏自己的悲痛”。在消息未得到证实前，保持缄默并没有错。他写道：“我尽可能避免谈论‘特伦特’号事件。只能说这是一起不幸事件，我对此深感遗憾。”[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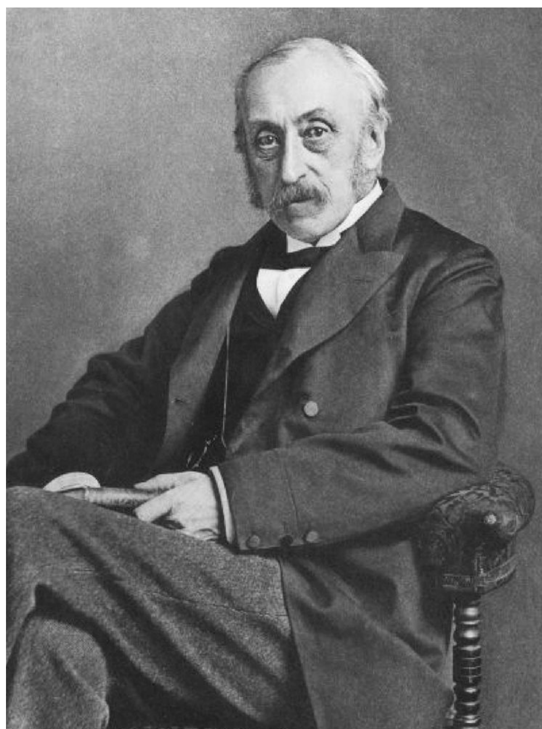
第8节　林肯和威廉·H.苏厄德的处理方式

显然，林肯将“特伦特”号事件交给了威廉·H.苏厄德处理。只要威廉·H.苏厄德不同意查尔斯·萨姆纳、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和蒙哥马利·布莱尔的观点，并建议立即释放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就做到了以身作则。威廉·H.苏厄德沉默寡言，善于听取国内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95]。1861年11月27日，在与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通信中，他解释说，查尔斯·威尔克斯没有得到任何指令便采取了行动，而且联邦政府在“听到英国政府谈及此事”[96]前，也没有行动意向。毫无疑问，在与理查德·莱昂勋爵的两次会面中，威廉·H.苏厄德得出的结论是：必须释放南方邦联的两位特使。随后，他开始有条不紊地着手解决此事。做出决定后，他必须首先请示林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请教当权者”[97]。林肯对威廉·H.苏厄德说：“你当然可以继续准备对英国的答复。按照我的理解，你的答复中应该说明释放南方邦联特使的理由。现在，我想说一说不应该释放他们的理由。我们来对比一下各自的观点。”[98]林肯起草了一份急件，表示他不相信英国“迫切地想要一个明确答复”，并说希望搁置问题，留待以后讨论，以便美国充分解释自己的处境。此外，联邦政府愿意通过“友好仲裁”处理“特伦特”号事件。但如果英国不同意仲裁，听完联邦政府的解释后依旧要求释放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那么联邦政府会释放他们，前提是处理此事的方式应该成为两国将来行事的准则。林肯急件中的关键点是：“和英国一样，我们的权利也受到一群人的觊觎。”[99]显然，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林肯对自己起草的急件并不满意，因此并未呈交内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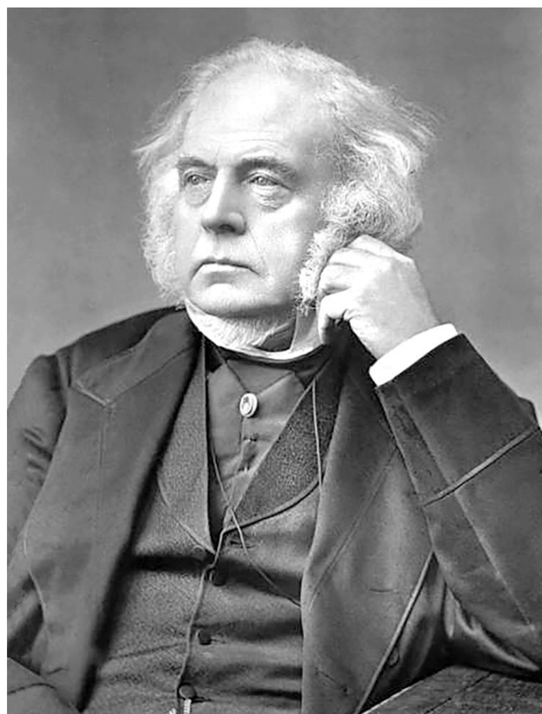
1861年12月20日，威廉·亨廷顿·拉塞尔在日记中写道：“威廉·H.苏厄德将控制局势。”最终的结果证实了他的说法。1861年12月19日，查尔斯·艾略特·诺顿从纽约写信给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说：“显然，战争并不会因民愤或政府缺乏立场和判断爆发。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威廉·H.苏厄德已经重获多数人的信任。他足够强大，而且不狂热、不暴力。”[100]

1861年12月25日上午10时，联邦内阁举行了会议。会上，只有威廉·H.苏厄德和蒙哥马利·布莱尔赞成释放南方邦联特使。威廉·H.苏厄德

派人给理查德·莱昂勋爵送去了回信。他的回复符合英国的要求。查尔斯·萨姆纳应邀前来开会，并读了约翰·布赖特和理查德·科布登的信。约翰·布赖特和理查德·科布登是北方联邦忠实的朋友，他们在信中转述了英国的民意，提出了一些建议。约翰·布赖特总结道："即使不惜一切代价，也绝不能让此事演变成英美之间的战争。"[101] 如果有人问查尔斯·萨姆纳的态度，他肯定会说自己非常赞成威廉·H.苏厄德的决定。会议一直持续到1861年12月25日下午2时，第二天继续。威廉·H.苏厄德认为，英国政府的主张是正当的，没有"表现出无礼"[102]。司法部长爱德华·贝茨表示赞成威廉·H.苏厄德的观点，认为与英国开战会导致联邦的毁灭[103]，但他在日记中写道："内阁的一些成员，甚至林肯总统，都非常不愿意释放南方邦联特使。"然而，由于考虑到查尔斯·威尔克斯的做法违背了先例，违反了国际法，而且联邦政府没有能力与英国开战，因此，所有人都站到了威廉·H.苏厄德一边。1861年12月26日，内阁批准了威廉·H.苏厄德的回复。威廉·H.苏厄德在给理查德·莱昂勋爵的长信中说，南方邦联的特使"将如愿获得自由"[104]。否定查尔斯·威尔克斯的做法被视为联邦政府最真诚的道歉。



查尔斯·艾略特·诺顿（1827—1908）



约翰·布赖特（1811—1889）

第9节　释放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

威廉·H.苏厄德担心释放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会引起北方人的民愤。与理查德·莱昂勋爵商议后，他认为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不能乘波士顿港口的英国船只离开。因此，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乘一艘美国蒸汽拖船到达了普罗温斯敦，然后登上一艘英国战舰，立即前往英国的哈利法克斯。

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离开沃伦堡时，波士顿及其他北方地区都没有爆发骚乱。爱德华·贝茨解释说，林肯和一些内阁成员并不支持威廉·H.苏厄德，因为担心"引起北方人的不满，受到人民的指责" [105] 。林肯和内阁成员误解了民意。在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被捕到释放的四十天里，北方人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团结一致支持"联邦政府的决定 [106] 。这似乎表明，如果林肯和威廉·H.苏厄德早一点做出最后决定，北方人会立即将联邦政府作为坚强的后盾，而且英国与美国北方后来的关系也会大不相同。事实证明，联邦政府的拖延划开了一道溃烂的伤口。许多美国人认为，联邦政府被迫接受了英国的专断要求，让国家蒙羞。在内阁会议期间，萨蒙·P.蔡斯表达了上述观点。他虽然"支持威廉·H.苏厄德的决定"，但他说："对我来说，这就是苦胆和茵陈，痛苦至极。我宁愿付出自己拥有的一切，也不愿同意释放南方邦联的特使。" [107] 处理"特伦特"号事件期间，英美两国彻底误解了彼此。其他国家普遍认为，美国北方"决心挑衅英国" [108] 。然而，美国人普遍认为，英国只是在找借口挑衅美国。在写给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的信中，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说："我不相信英国政府试图开战。如果真的是这样，开战只会自食其果。"其他国家认为，英美两国盲目的爱国者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误解由此产生。事实上，英国和美国北方的大多数人都很乐意和平解决"特伦特"号事件，但美国南方邦联显得非常失望。

[1] 关于《充公法令》和《邦联镇压法令》，参见《美国史》，第3卷，第463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美国南部邦联》、（*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第111页到120页，约翰·C.施瓦布著。——原注

[2] 直接税指直接向纳税人征收的税，与商品税、服务税等间接税不同。——译者注

[3] 人身保护令是法官签发的手令，命令将拘押人员交送至法庭，决定其拘押

是否合法。人身保护令是通过法律程序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手段。被拘押的人可以质疑拘押的合法性，并迅速获得法庭裁决。紧急情况下，一些地方可以暂时取消人身保护令。——译者注

[4] 《林肯全集》，第2卷，第39页，第45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美国国会议事录》，第393页。——原注

[5] 《美国史》，第3卷，第4卷，第229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林肯传》，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美国国会议事录》。《罗杰·托尼回忆录》（*Memoir of Taney*），塞缪尔·泰勒著。《詹姆斯·格兰姆斯传》（*Life of Grimes*），威廉·索尔特著。《美国金融史》（*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戴维斯·R.杜威著。——原注

[6] 《林肯传》（*Life of Lincoln*），第2卷，第6页，约翰·T.莫尔斯著。——原注

[7] 1861年8月6日通过。——原注

[8] 《美国史》，第3卷，第466页到第468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9] 邮政部长蒙哥马利·布莱尔和其弟小弗朗西斯·普雷斯顿·布莱尔。——原注。除了蒙哥马利·布莱尔和小弗朗西斯·普雷斯顿·布莱尔，在马里兰州的银泉，他们的父亲老弗朗西斯·普雷斯顿·布莱尔的影响力依然很大。托马斯·杰克逊当局以来，布莱尔家族一直是美国政界的一股力量，内战期间也是如此。——编者注

[10] 约翰·C.弗里蒙特在密苏里州的指挥权问题仍有待讨论。毫无疑问，他不会或不能杜绝机构内的各种不光彩行为，而且他本人也不够诚实。有人说，约翰·C.弗里蒙特的主要目的不是为北方联邦服务，也不是为他人创造私人财富，而是为了在西部“建立一个自己的”独裁政权。也有人认为，约翰·C.弗里蒙特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组织者，对他的批评有些言过其实。1861年8月，位于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附近的纳撒尼尔·莱昂准将正面对一支兵力强盛的密苏里州南方邦联军。1861年8月10日，威尔逊溪战役爆发，北方联邦军战败，纳撒尼尔·莱昂准将阵亡。约翰·C.弗里蒙特声称，他曾试图增援纳撒尼尔·莱昂。但其他人指控他不够重视威尔逊溪战役。——编者注

[11] 约翰·C.弗里蒙特的夫人记叙他在密苏里州的职业生涯时，认为解放奴隶的命令是一夜之间想出来的。但一些人则认为，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与约翰·C.弗里蒙特关系密切，解放奴隶的想法可能已经酝酿了很久。参见加利福尼亚大学班克罗夫特图书馆中的《约翰·C.弗里蒙特文稿》（*Fremont Papers*）。《约翰·C.弗里蒙特著西部先驱》，第499页到第502页，艾伦·内文斯著。——编者注

[12] 约翰·C.弗里蒙特的宣言规定，将密苏里州邦联人民的动产和不动产充公。但因为关于奴隶的规定更重要，所以我只关注了这一部分。《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卷，第466页，第469页。——原注

[13] 除了威廉·赫恩登的信，其他信件均写于1861年9月。——原注

[14] 阿伦·伯尔（Aaron Burr，1755—1836），美国第三届副总统。在1800年的选举中，他与托马斯·杰斐逊的票数相当，但众议院投票选举托马斯·杰斐逊为总统，阿伦·伯尔为副总统。后来，阿伦·伯尔与詹姆斯·威尔金森将军图谋在自俄亥俄河流域至墨西哥的广大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帝国。1806年，由于有人告密，他被批捕，以叛国罪起诉，但法院宣布他无罪。——译者注

[15] 《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133页，约翰·海伊著。——原注

[16] 《林肯个人特质》，第177页，海伦·尼古拉著。——原注

[17] 萨蒙·P.蔡斯（Salmon P. Chase，1808—1873），美国财政部长。这封

信写于1861年10月31日。伊莱休·B.沃什伯恩并不知道约翰·C.弗里蒙特的罢免令已经发布。1861年11月2日，约翰·C.弗里蒙特将指挥权移交给了戴维·亨特。——原注

[18] 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1813—1887），美国牧师，当时最雄辩的演说家之一。他强烈反对奴隶制，在南北战争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呼吁群众支持北方。——译者注

[19] 《美国史》，第3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林肯传》，第4卷，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卷。《作战联合委员会报告》，第3册。《书信与日记》，第1卷，约翰·海伊著。《林肯的个人特质》，海伦·尼古拉著。《查尔斯·萨姆纳传》（*Life of Sumner*），爱德华·L.皮尔斯著。《詹姆斯·格兰姆斯传》，威廉·索尔特著。——原注

[20]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5卷，第11页。——原注

[21]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5卷，第5页。——原注

[22]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卷，第493页。——原注

[23]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卷，第10页。——原注

[24] 1861年10月21日，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附近爆发李斯堡战役。其间，由于指挥不善，北方联邦军大败，但伤亡人数并不多。林肯的好朋友、受人爱戴的军官爱德华·D.贝克上校在战斗中牺牲。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失去了一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北方人民万分沮丧。虽然这次惨败发生在乔治·B.麦克莱伦率领的军队中，但很少有人将这次失败归咎于他。《美国史》，第3卷，第496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布尔溪战役是一场小规模战役，但极具争议性。北方联邦指挥官查尔斯·P.斯通被撤职收监。在李斯堡战役中，查尔斯·P.斯通的属下爱德华·D.贝克似乎非常鲁莽。波托马克河陡岸上的战斗对内战影响很小，但由于爱德华·D.贝克阵亡，南方邦联军直逼北方联邦军，趟过了波托马克河。爱德华·D.贝克的军队伤亡惨重。因此，李斯堡战役轰动一时。此外，李斯堡战役也促使联邦国会成立了作战联合委员会。——编者注

[25]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5卷，第884页。——原注

[26] 乔治·麦克莱伦以为皮埃尔·博勒加德指挥南方邦联军，但实际上，皮埃尔·博勒加德只指挥南方邦联军第一军团。——原注

[27]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1卷，第3册，第3页。——原注

[28] 《书信与日记》，第1卷，1861年10月17日，第45页，约翰·海伊著。——原注

[29] 《乔治·麦克莱伦自传》，第177页，乔治·麦克莱伦著。——原注

[30] 《林肯传》，第4卷，第444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31] 《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46页，1861年10月22日，约翰·海伊著。——原注

[32] 《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46页，1861年10月22日，约翰·海伊著。——原注

[33] 《书信与日记》，第1卷，1861年10月22日，第48页，约翰·海伊著。——原注

[34] 《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50页，约翰·海伊著。——原注

[35] 1861年10月，南方邦联“封锁了波托马克河的航线，在弗吉尼亚州沿河建了二三十英里的炮台。”《半岛：1862年麦克莱伦的作战》，第13页，第168页等，亚历山大·S.韦勃著。《美国内战史》，第1卷，第181页，第222页，约翰·C.罗普斯著。《林肯传》，第4卷，第450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36] 《与格兰特将军走遍世界》（*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第2卷，第217页，约翰·R.扬著。——原注

[37] 《威廉·T.谢尔曼将军回忆录》，第2卷，第193页，威廉·T.谢尔曼著。——原注

[38] 写于1914年欧洲战争前。——原注

[39] 《乔治·麦克莱伦自传》，第85页，乔治·麦克莱伦著。雅各布·D.考克斯写道：“约瑟夫·E.约翰斯顿被公认为仅次于南方邦联将军罗伯特·E.李的将军。”——原注

[40] 《乔治·B.麦克莱伦自传》，第176页，乔治·B.麦克莱伦著。——原注

[41] 《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52页，约翰·海伊著。——原注

[42] 《林肯传》，第4卷，第468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43] 《约翰·拉塞尔伯爵传》（*Life of Lord John Russell*），第3卷，第418页，注释二，斯宾塞·沃波尔著。——原注

[44] 习语letters of marque，汉译为捕拿特许证，来自古法语marcar，即投名状，用抓捕或抢劫证明忠心。捕拿特许证源于中世纪，西欧各国通过官方文件鼓励本国海盗进行抢劫，抢劫所得一部分上交政府，一部分留作己用。——译者注

[45] “其他海上强国都以英国为效仿对象，因为英国在北美的权利和商业涉及范围很广，南北开战对其影响最大。数周内，法兰西帝国、西班牙、荷兰、普鲁士和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英国。”《威廉·H.苏厄德传》，第2卷，第176页，弗雷德里克·班克罗夫特著。——原注

[46] 约翰·拉塞尔（John Russell，1792—1878），第一代拉塞尔伯爵，19世纪中期的英国辉格党及自由党政治家，曾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47] 《美国史》，第3卷，第421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48] 《威廉·H.苏厄德传》，第2卷，第178页，注释，弗雷德里克·班克罗夫特著。《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论文集》，第45卷，第77页，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著。——原注

[49] 《美国史》，第3卷，第429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50] 1861年3月2日，《莫勒尔关税法案》通过，英国人视其为高度保护措施。——原注

[51] 《美国史》，第3卷，第433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52] 《美国史》，第3卷，第434页注释，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53] 《美国史》，第3卷，第503页，注释一，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54] 《美国史》，第3卷，第508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55] 《民主与自由》（Democracy and Liberty），第1卷，第21页，威廉·莱基著。——原注

[56] 《美国史》，第3卷，第575页，注释三，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57] 爱德华·戴西（Edward Dicey，1832—1911），英国作家、记者和编辑。1862年来到美国，曾在《观察者》等出版物上发表关于美国内战的文章。——译者注

[58] 《美国史》，第3卷，第514页注释，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59] 《美国史》，第3卷，第76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民主与自由》，第1卷，第488页，第490页，威廉·莱基著。——原注

[60] 即北方联邦，因为南方会积极接受他们的提议。——原注

[61] 《约翰·拉塞尔伯爵传》，第2卷，第344页，斯宾塞·沃波尔著。《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传》（*Life of Lord Palmerston*），第2卷，第218页，伊夫琳·M.阿什利著。——原注

[62] 《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论文集》，第45卷，第53页，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著。——原注

[63]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87页。——原注

[64] 詹姆斯·M.梅森和约翰·斯莱德尔监禁在波士顿海港的沃伦堡。——原注

[65] 约翰·B.弗洛伊德（John B. Floyd，1806—1863），弗吉尼亚州第三十一任州长，美国内战时期南方邦联将军。——译者注

[66] 《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论文集》，第45卷，第49页，第94页，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著。《约翰·安德鲁传》，第1卷，第319页，注释一，亨利·皮尔森著。——原注

[67]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二，第2卷，第1109页。——原注

[68] 《林肯和威廉·H.苏厄德》（*Lincoln and Seward*），第186页，吉迪恩·韦尔斯著。——原注

[69] 《美国国会议事录》，第5页。——原注

[70] 《查尔斯·萨姆纳传》，第4卷，第52页，爱德华·皮尔斯著。——原注

[71] 《美国内战》（*Civil War of America*），第2卷，第156页，本森·J.洛辛著。——原注

[72] 《查尔斯·萨姆纳传》，第4卷，第61页，爱德华·皮尔斯著。——原注

[73] 《林肯和威廉·H.苏厄德》，第186页，吉迪恩·韦尔斯著。——原注

[74] 《威廉·H.苏厄德传》（*Life of Seward*），第327页，桑顿·K.洛斯罗普著。《乔治·B.麦克莱伦自传》，第175页，乔治·B.麦克莱伦著。《我的南北记事》，第575页，威廉·亨廷顿·拉塞尔著，1863年。——原注

[75] 指詹姆斯·M.梅森。——译者注

[76] 指约翰·斯莱德尔。——译者注

[77] 《我的南北记事》，第588页，威廉·亨廷顿·拉塞尔著，1863年。——原注

[78] 《美国史》，第3卷，第525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79]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二，第2卷，1106页。——原注

[80] 1857年，查尔斯·麦凯去了美国，并写了一本关于美国的书。在美国期间，他受到威廉·H.苏厄德的款待，两人于1859年在伦敦再次见面。威廉·H.苏厄德很尊重查尔斯·麦凯，两人友谊深厚。1862年2月，查尔斯·麦凯被派往纽约成为《泰晤士报》的记者。《威廉·亨廷顿·拉塞尔传》（*Life of William H. Russell* ），第2卷，第92页，约翰·阿特金斯著。——原注

[81]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二，第2卷，第1107页。——原注

[82] 《二十五年的历史》（*History of Twenty-five Years* ），第2卷，第44页，斯宾塞·沃波尔著。《英国议会议事录》（*Hansard* ），第168卷。——原注

[83]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二，第2卷，第1078页。《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论文集》，第45卷，第53页，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著。——原注

[84] 史蒂芬·勒欣顿（Stephen Lushington，1782—1873），英国海事高级法院法官和上诉法院院长，著名法学家。——原注

[85] 乔治·格雷（George Grey，1812—1898），英国内政大臣。——原注

[86] 爱德华·西摩（Edward Seymour，1804—1885），萨默塞特公爵，英国海军大臣。——原注

[87] 威廉·斯科特（William Scott，1745—1836），斯托厄尔爵士，英国法官、法学家。——译者注

[88] 《约翰·T.德莱恩传》，第2卷，第36页，乔治·W.达森特著。《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论文集》，第45卷，第54页，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著。——原注

[89] 《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论文集》，第45卷，第56页，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著。——原注

[90] 《阿尔伯特亲王传》（*Life of the Prince Consort* ），第5卷，第419页，西奥多·马丁著。《约翰·拉塞尔伯爵传》，第2卷，第354页，斯宾塞·沃波尔著。——原注

[91]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二，第2卷，第1119页。——原注

[92] 《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论文集》，第45卷，第93页，第95页，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著。——原注

[93] 《理查德·莱昂勋爵传》（*Life of Lord Lyons* ），第1卷，第65页，托马斯·W.牛顿著。——原注

[94]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二，第2卷，第1095页，第1097页。——原注

[95] 《威廉·H.苏厄德传》，第2卷，第234页，弗雷德里克·班克罗夫特著。——原注

[96] 《威廉·H.苏厄德回忆录》（*Seward's Memoir* ），第3卷，第43页，弗雷德里克·W.苏厄德著。——原注

[97]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二，第2卷，第1102页。——原注

[98] 《威廉·H.苏厄德传》，第2卷，第234页，第3卷，第26页，弗雷德里克·

班克罗夫特著。——原注

[99] 《林肯传》，第5卷，第33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100] 《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的书信》（*Letters of Charles Eliot Norton* ），第1卷，第248页，萨拉·诺顿、德沃尔夫·霍伊著。——原注

[101] 《美国史》，第3卷，第536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102]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二，第2卷，第1076页，第1154页。——原注

[103] 查尔斯·萨姆纳向林肯详细说明了与英国开战的种种劣势。《查尔斯·萨姆纳传》，第4卷，第58页，爱德华·皮尔斯著。——原注

[104]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二，第2卷，第1154页。——原注

[105] 《林肯传》，第5卷，第36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106] 《美国史》，第3卷，第539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107] 《萨蒙P.蔡斯传》（*Life of Salmon P. Chase* ），第394页，罗伯特·沃登著。——原注

[108] 《威廉·H.苏厄德传》，第231页，弗雷德里克·班克罗夫特著。——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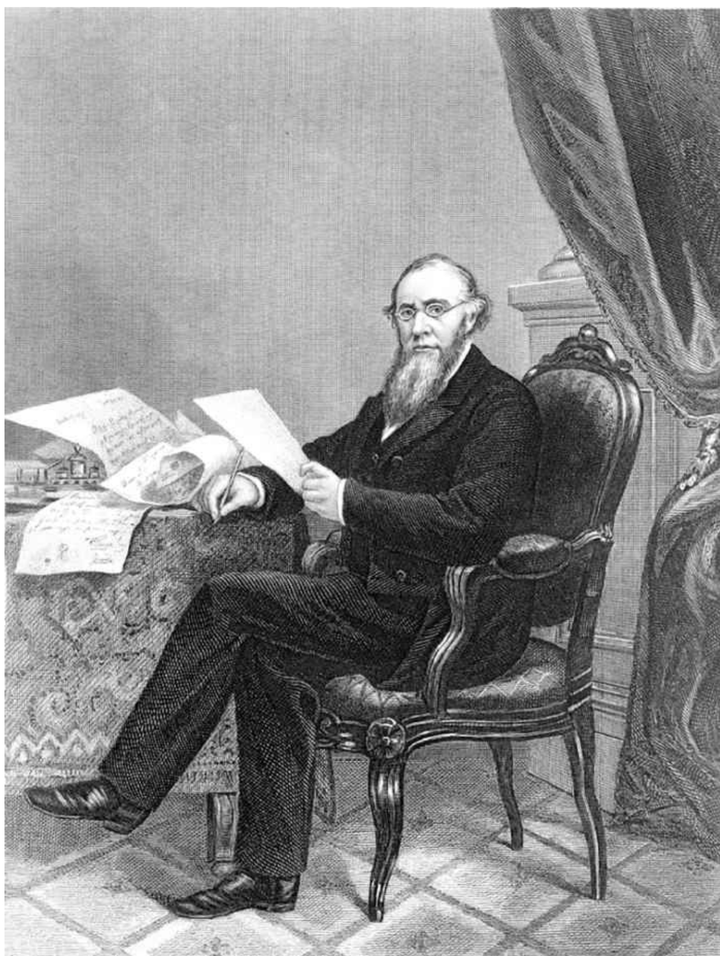
第3章　战争前期：势均力敌的较量

第1节　西蒙·卡梅伦

不幸的是，林肯任命西蒙·卡梅伦为战争部长。西蒙·卡梅伦并不能胜任指挥大战一职，他将陆军部管理得像个政治机器。但他有两个工作能力很强的得力干将，分别是总军需官蒙哥马利·C.梅格斯和陆战副部长托马斯·A.斯科特。然而，西蒙·卡梅伦所到之处，贪污与他如影随形。他经常奖励自己的政治追随者，表彰他们过去的贡献，或鼓励他们更好的工作。奖励金额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西蒙·卡梅伦十分慷慨，经常另付佣金，但收到的大多是劣质商品。1861年早秋，林肯意识到了西蒙·卡梅伦的问题。海伦·尼古拉女士在“私人文件《1861年10月2日与总统对话》”中写道，林肯认为“西蒙·卡梅伦完全无视战事的进展及其可能出现的后果，自私狭隘，不仅对总统公然不敬，还对国家政务置若罔闻，没有能力构建并执行总体作战计划或安排细节工作。”[1] 詹姆斯·格兰姆斯在给参议员威廉·P.费森登的信中写道：“贪污腐败和时间的车轮会将我们带向毁灭。”[2] 为了让人民不再关注自己的弊政，西蒙·卡梅伦效仿约翰·C.弗里蒙特，极力呼吁废除奴隶制。1861年12月1日，他在呈给林肯的报告中，建议联邦政府将黑人奴隶征召入伍，解放奴隶。这一建议势必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但他并未将报告呈给林肯，而是直接寄给了各大城市的邮政局长，并下令，只要国会宣读完林肯的报告，就立刻将他的报告转给新闻媒体。林肯得知这件事后，下令召回所有已经印发的报纸，并根据相关奴隶制政策修改了报道内容[3]。

第2节　埃德温·斯坦顿

1862年1月11日，林肯发布公文罢免了西蒙·卡梅伦，委任其为驻俄国大使。罢免理由是西蒙·卡梅伦行政效率低下，而且全国人民都认为陆军部贪污腐败，甚至存在反叛行为。这些理由足以让林肯做出罢免决定。随后，林肯任命埃德温·斯坦顿为战争部长。1861年夏天，埃德温·斯坦顿在私人信件中曾直率地写道："林肯昏庸"，政府无能。埃德温·斯坦顿心无城府，大胆直言。在华盛顿时，他曾与朋友公开谈论政事。如果林肯注意听华盛顿的八卦，可能会听过很多类似的故事。但即使在考虑任命埃德温·斯坦顿前，他确实听到了一些风声，也不会影响他信任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律师埃德温·斯坦顿[4]。不论是出身还是从政经历和自身能力，埃德温·斯坦顿都能胜任战争部长一职。威廉·H.苏厄德、萨蒙·P.蔡斯及国会和北方人都赞成任命埃德温·斯坦顿为战争部长，因为埃德温·斯坦顿在担任詹姆斯·布坎南内阁的成员时，表现出的爱国精神让他获得了人民的信任。任命西蒙·卡梅伦是一个错误之举，但任命埃德温·斯坦顿是值得称赞的。埃德温·斯坦顿是天生的大将之才，作战时有勇有谋，而且精力旺盛，他痛恨一切腐败[5]。



埃德温·斯坦顿（1814—1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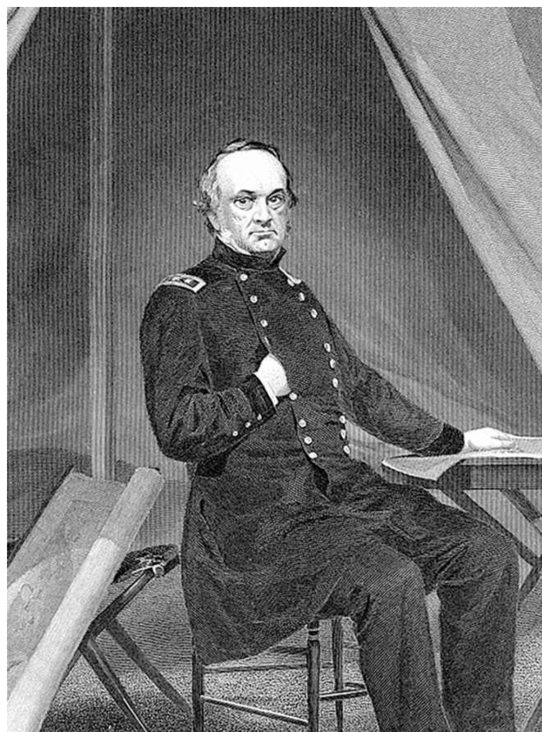
1862年1月10日，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给威廉·H.苏厄德写信说：“如果联邦能取得一次显著胜利，也许可以免去一场外战。”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信到达华盛顿后不久，他的愿望就达成了。

田纳西河上的亨利堡和坎伯兰河上的多纳尔森堡是通往南方西南部要道上的重要关卡。田纳西河和坎伯兰河相隔十一英里。海军军官安德鲁·H.富特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认为，占领亨利堡是可行的，于是请示圣路易斯司令部的亨利·W.哈勒克指挥官，允许他们一搏。1862年1月30日，请示电报发出。1862年2月1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收到了亨利·W.哈勒克指挥官的详细指示[6]。1862年2月2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安德鲁·H.富特率领四艘装甲舰、三艘木质炮艇和一些运送先遣部队的运输

船，从开罗出发。1862年2月6日，安德鲁·H.富特向亨利堡开火。这一次，北方联邦军没有退缩。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交火”，南方邦联的旗帜落下了。作战过程中，南方邦联军之间“因道路泥泞、水位高涨”无法合作[7]。1862年2月6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发电报给亨利·W.哈勒克，说：“亨利堡是我们的了！我会在1862年2月8日夺取并摧毁多纳尔森堡。”[8]



安德鲁·H.富特（1806—18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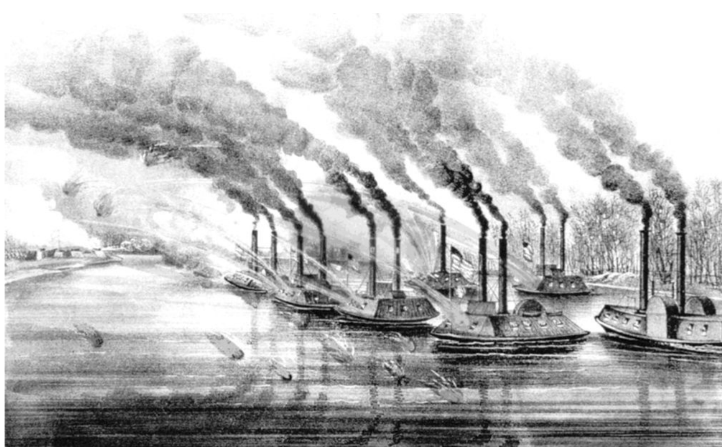


亨利·W.哈勒克（1815—1872）

第3节　多纳尔森堡战役

杰斐逊·戴维斯认为，南方邦联军的指挥官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是南方最杰出的将领。亨利堡失陷后，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心灰意冷，决心“为守卫纳什维尔，在多纳尔森堡开战”，将军队中的精锐派到了前线[9]。

由于一场大雨，路面变得泥泞不堪，大炮和车辆暂时无法通行。前去配合尤利西斯·S.格兰特作战的炮艇也因故障滞留在了途中。因此，尤利西斯·S.格兰特无法履行电报中的承诺，但已经派炮舰和部分军队驻守在附近水域。1862年2月12日上午，尤利西斯·S.格兰特率领主力军离开亨利堡，穿过田野，朝多纳尔森堡前进。1862年2月12日正午，主力军到达南方邦联军阵前。尤利西斯·S.格兰特命人封锁了堡垒，展开了一系列小规模战斗。1862年2月13日，他开始率军攻击南方邦联军的两翼[10]。1862年2月14日，安德鲁·H.富特命炮艇攻击南方邦联军，希望像亨利堡一样取得胜利。战士们的勇气和决心一如既往，但战况与亨利堡的战役大相径庭，运气也十分不佳。安德鲁·H.富特的军队似乎无法抵抗南方邦联军的炮火。与此同时，两艘装甲舰“偏离正道，无奈掉进了河里”，另外两艘装甲舰也严重受损，随后掉进了河里。安德鲁·H.富特负伤，海军暂时无法参战[11]。尤利西斯·S.格兰特写道：“我竭尽全力封锁了多纳尔森堡，加固了部分防御工事，等待炮舰修理完成。”[12] 1862年2月14日夜晚，北方联邦军的很多士兵身体不适，显得非常沮丧。他们离开亨利堡时，天气非常温暖，因此，很多士兵没有带毛毯和大衣。但1862年2月15日，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带来了暴风雪，暴风雪持续了两天。士兵们既没有帐篷，也不敢生火，因为怕被南方邦联军发现。极端天气考验着他们的耐心和毅力。



联邦舰队炮轰亨利堡



“卡龙德莱特”号在多纳尔森堡作战

由于亨利堡失陷，南方邦联军的将领们非常沮丧。但现在，他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因为没有费一兵一卒，北方联邦军炮艇就被击退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援军已经抵达，很快能对多纳尔森堡发起围攻。为了解救驻军，南方邦联军必须从围城军中突围出去，打通前往纳什维尔的路。于是，南方邦联军决定在1862年2月15日清晨发起进攻。

援军到来后，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军队人数增加至两万七千人。约翰·A.麦克莱恩德的军队在大军右翼，镇守通往纳什维尔的道路。卢·华莱士的军队在大军中心，查尔斯·F.史密斯的军队在大军左翼。

多纳尔森堡的防御工事向外扩展为一条约两英里长的蜿蜒战壕。战壕的一些地方设了铁丝网围成的屏障。两万一千名南方邦联战士攻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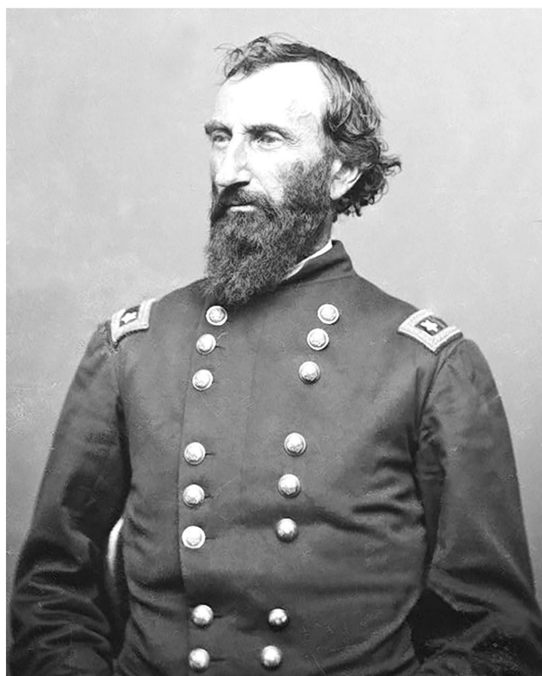
战壕[13]。1862年2月15日凌晨5时，南方邦联军向约翰·A.麦克莱恩德的军队发起了进攻。约翰·A.麦克莱恩德率军顽强抵抗，但由于敌方兵力占优势，他被迫匆忙撤退。逃到卢·华莱士军队驻扎的背面山上的士兵带来了“灾难来临的消息……一名军官骑马飞奔而来，喊着‘我们被打散了’。”[14] 南方邦联军占领了通往纳什维尔的路。经过残酷战斗，北方联邦军已经筋疲力尽，无法在冰雪覆盖的路上有序撤退。士兵们的口粮都吃完了，也没有应对南方邦联军来袭的撤退措施。

1862年2月15日早晨，安德鲁·H.富特邀请尤利西斯·S.格兰特来他的战舰上商议要事。他因为重伤无法下船。尤利西斯·S.格兰特应邀前往。因此，南方邦联军发起进攻时，他并不在战场。会谈结束后，尤利西斯·S.格兰特见到了自己手下的一名上尉。尤利西斯·S.格兰特突然“面色苍白，非常担心……军队的安危”[15]。他以最快速度策马赶了四五英里冰路，回到了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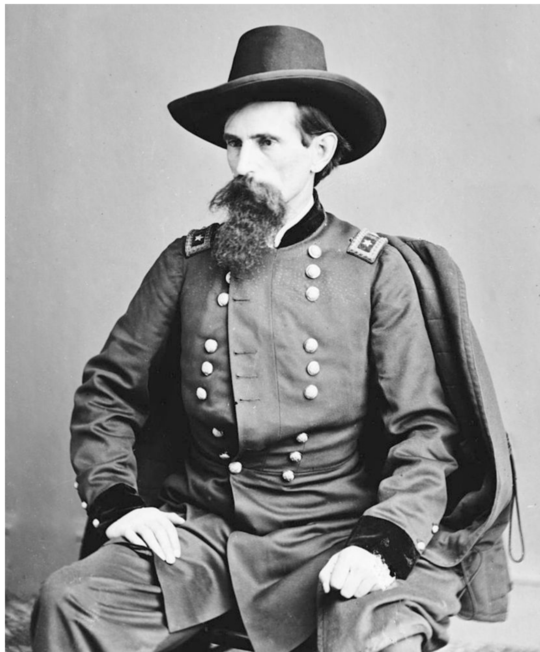
此刻是尤利西斯·S.格兰特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多纳尔森堡战役给了他一个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如果这场战役失败，他就再也没有机会扬名立万了。此外，他缺席1862年2月15日清晨的战役势必会引起人们的误解。

经历过挫折的人都知道，有时候，如果一开始就不顺利，后面的一切都会出错，毫无补救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往往会陷入困顿，不知何去何从，但伟大的人物可以掌握全局，与同伴一起克服困难，化失败为成功。多纳尔森堡战役就是这样。尤利西斯·S.格兰特返回营地后，很快改变了军中的混乱局面。战士们在绝望中萌生了斗志。当得知军队右翼受损后，尤利西斯·S.格兰特面色泛红，揉皱了手中的文件，但依然平静地对约翰·A.麦克莱恩德和卢·华莱士说：“各位，我们必须夺回右翼阵地。”随后，他快马加鞭赶往左翼阵地，中途停下来给安德鲁·H.富特发了一份急件[16]，请求支援。途中，他听到一些人说：“南方邦联军背着背包，拿着装满口粮的干粮袋出来了。”他知道，南方邦联军发起突围只是为了逃离堡垒。于是，他对同行的军官说：“我们的一些士兵情绪非常低落，南方邦联军肯定也是如此，因为他们试图突出重围，却失败了。此刻，谁先发起进攻谁就能胜利。我们行军时，召唤士兵们‘迅速填充弹药盒，然后列队。南方邦联军试图逃跑，我们绝不能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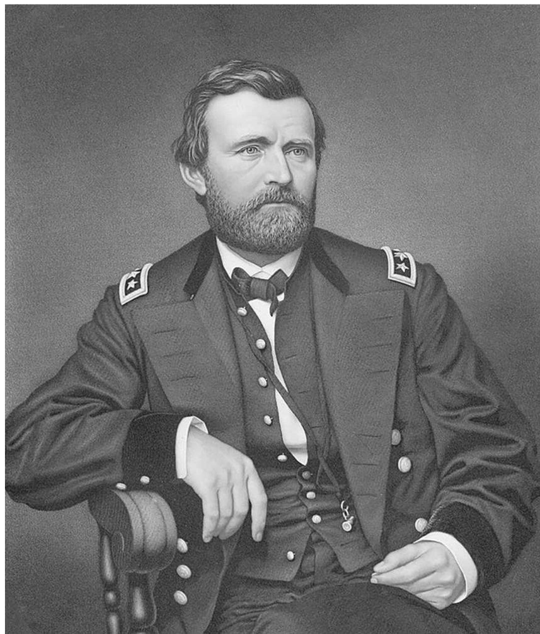
他们如愿。’” [17] 尤利西斯·S.格兰特经过的地方，北方联邦军迅速重整旗鼓，恢复了信心。他立即前往查尔斯·F.史密斯的司令部，命令查尔斯·F.史密斯发起进攻，保证说南方邦联军只有一小队人马。查尔斯·F.史密斯率军勇往直前，穿过兔子都无法穿过的铁丝网，拆毁了南方邦联军的前哨防御工事，很快“攻下战壕”，占据了“关键位置” [18] 。尤利西斯·S.格兰特给查尔斯·F.史密斯下达完命令后，又命约翰·A.麦克莱恩德和卢·华莱士进军。约翰·A.麦克莱恩德和卢·华莱士立即率军收复了早上失去的阵地，夺回了通往纳什维尔的道路。与此同时，除了从河里或从河道上逃出多纳尔森堡，南方邦联军已经无路可逃。尤利西斯·S.格兰特命军队在1862年2月16日破晓时分发起进攻。北方联邦军的胜利势在必得。



约翰·A.麦克莱恩德（1812—1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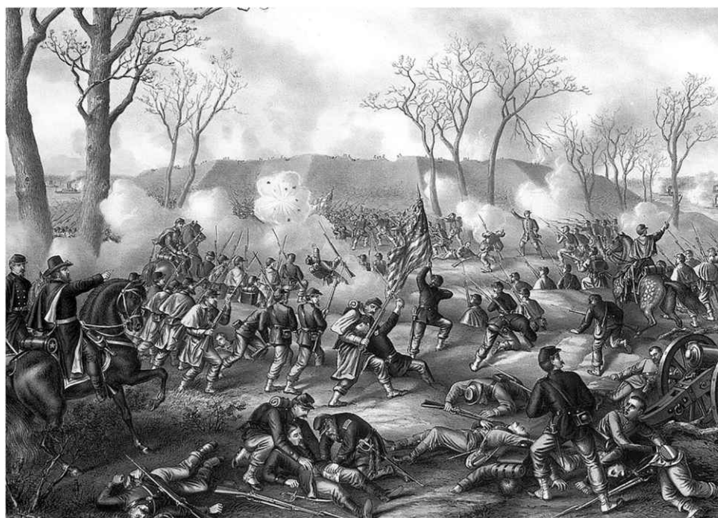
卢·华莱士（1827—1905）



尤利西斯·S.格兰特（1822—1885）



查尔斯·F.史密斯（1822—1885）



多纳尔森堡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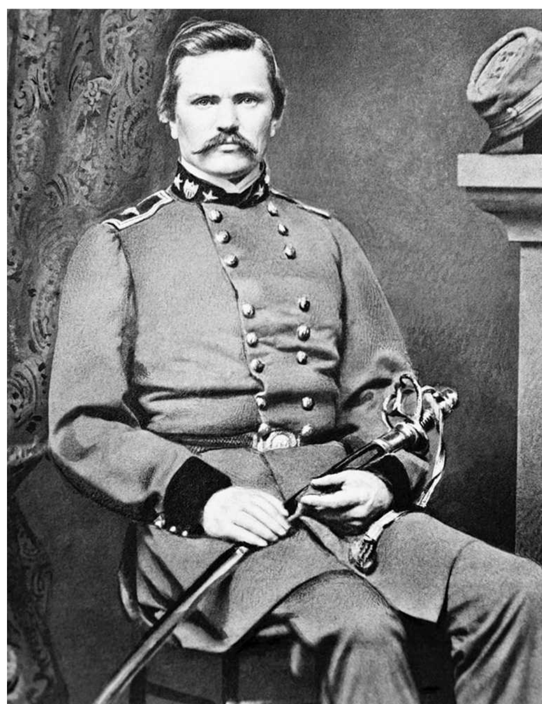


联邦军夺取多纳尔森堡

第4节　多纳尔森堡投降

多纳尔森堡内，南方邦联军士气低落，将领们也认为北方联邦军必胜。两名高级军官将指挥权交给了西蒙·B.巴克纳 [19] 。其中一名军官带一小队人马乘援军汽艇逃走了，另一名军官乘舟渡过了河。骑兵试图从漫水的公路上骑马逃出，但发现水位“已及马鞍” [20] 。

1862年2月16日凌晨，尤利西斯·S.格兰特收到西蒙·B.巴克纳寄来的一封信。西蒙·B.巴克纳提出投降，并提议正午时签订停战协议。对此，尤利西斯·S.格兰特做出了著名的回复：“我方已收到你方关于停战及相约商谈投降协议的信件。我方只接受你方的无条件投降，其他条款免谈。我建议你们立即投降。” [21] 西蒙·B.巴克纳被迫接受了“不公平的、没有风度的投降条件”。1862年2月16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在发给亨利·W.哈勒克的急件中说：“我已经俘获囚犯一万两千至一万五千人，缴获枪支两万支、火炮四十八门、重炮十七门，马匹两千至四千匹及大量军需物资。” [22]



西蒙·B.巴克纳（1823—1914）



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1803—1862）

约翰·C.罗普斯写道：“从军队士气和战略方面来看，夺取多纳尔森堡是美国内战的转折点之一。”[23] 南方邦联军从纳什维尔撤离，北方联邦军继续行军两百多英里。在美国内战中，肯塔基州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南方邦联失去了田纳西州的大部分领地。田纳西州精兵辈出，物资富裕。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在给杰斐逊·戴维斯的信中写道：“民众惊慌不已，一些队伍士气低迷。多纳尔森堡战役对军队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几乎无法弥补。”[24] 田纳西州长宣布，南方邦联军必须撤离纳什维尔，并将立法机关迁至孟菲斯。此时，南方民众陷入了恐慌，随之而来的是骚乱、动荡和劫掠[25]。

北方为多纳尔森堡战役的伟大胜利欢呼雀跃。萨蒙·P.蔡斯写道：“叛乱的源头似乎已经被连根拔起。”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说：“似乎所有人都认为，南方的叛乱遭到了致命打击。”在英国人眼中，夺取多纳尔森堡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胜利，对北方影响深远[26]。

第5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

多纳尔森堡战役的胜利应归功于尤利西斯·S.格兰特。对多纳尔森堡战役研究得越清楚，就会越坚信北方梦寐以求的大将已经出现。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军事天赋有目共睹。他能迅速看穿对方的计策及其困境，很快制订计划并付诸实施及在战败的右翼军队面前掩藏失望与惊慌，立即做出决定，抢占先机。实际上，当命令各军冲向南方邦联军的时候，尤利西斯·S.格兰特并不确定能否获胜，而且非常希望得到炮艇的协助[27]。约翰·C.罗普斯认为，自己也许只做了一件平淡无奇的事[28]。但当时，没有几个将军能像尤利西斯·S.格兰特一样反败为胜。在查尔斯·F.史密斯占领战壕及右翼军收复失地后，尤利西斯·S.格兰特预料到南方邦联军士气低落。西蒙·B.巴克纳的投降信件证实了他的猜想。在回信中，尤利西斯·S.格兰特用了名字的首字母缩写，此后，他的名字一直与“无条件投降”如影随形。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回信表明，他想要的是一次完全胜利。在美国内战中，他当时的态度尤显大将之风。南方邦联军投降五天后，即1862年2月11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在写给好友伊莱休·B.沃什伯恩的信中说：“在战斗中，我们的志愿兵和欧洲正规军一样英勇。我非常感谢您，是您给了我指挥这样一支军队的机会。我只希望自己没有让您失望。”[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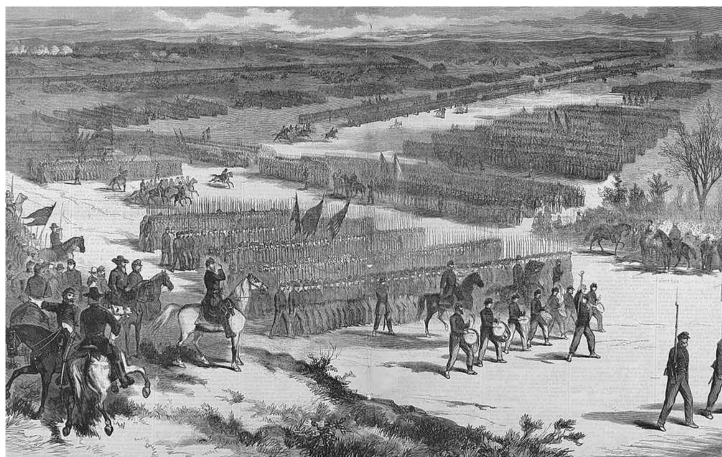
亨利·W.哈勒克和约翰·A.麦克莱恩德[30]都只会纸上谈兵，认为多纳尔森堡战役并非一次意义重大的胜利，并有点儿嫉妒尤利西斯·S.格兰特。亨利·W.哈勒克发电报给约翰·A.麦克莱恩德说：“尤利西斯·S.格兰特未经授权就离开了司令部，前往纳什维尔。我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汇报、报告或相关资料。他对此次胜利非常满意，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不考虑未来。我受够了他的怠慢和无能。”约翰·A.麦克莱恩德回复道：“如果为了对战事有益，就应该立即逮捕尤利西斯·S.格兰特，派查尔斯·F.史密斯指挥军队。”1862年2月12日，亨利·W.哈勒克发出一份电文。他在电文中说：“近日的一些传言称，尤利西斯·S.格兰特攻克多纳尔森堡后，重拾酗酒的恶习……我虽然认为不应该逮捕他，但已经派查尔斯·F.史密斯指挥远征田纳西州的行动。”这些信件对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评价极其不公。多纳尔森堡战役胜利以来，他做事一直很得体、谨慎、合规矩。

多纳尔森堡战役的胜利虽然意义重大，但其影响并没有立即显现出来。与此同时，北方联邦军急需速战速决。尤利西斯·S.格兰特行动迅速，率军对抗南方邦联军。如果没有亨利·W.哈勒克不公正的评判，他可能已经得到应有的嘉奖，从而继续英勇作战，坚守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甚至攻占维克斯堡和查塔努加市[31]，占领兵源和物资丰富的南方邦联地区。

里士满由于南方邦联军的战败阴云密布。1862年2月22日，即多纳尔森堡失陷后的第六天，南方邦联政府取代了临时政府，杰斐逊·戴维斯就任总统，任期六年。多纳尔森堡战役影响深远，杰斐逊·戴维斯称其为“我们斗争中最黑暗的时刻”。与此同时，因生病和悲伤显得面色苍白、消瘦憔悴的杰斐逊·戴维斯发表了就职演说。其间，他承认南方邦联军“近来损失惨重”[32]。逆境使南方邦联走向了极端。就职后第六天，即1862年2月28日，依据一项秘密通过的国会法案，杰斐逊·戴维斯宣布，里士满及周边十英里地区戒严，暂停当地的人身保护令特权。1862年4月16日，在杰斐逊·戴维斯主持下，南方通过了一部严苛的征兵法案。

第6节　乔治·B.麦克莱伦的短暂任职

尤利西斯·S.格兰特如果指挥波托马克军团，一定会及时利用南方邦联军的低落士气。与此同时，乔治·B.麦克莱伦似乎想要奋起而战。1862年2月20日，他在写给亨利·W.哈勒克的两封信中明显表现了这一点。他说："在三四周内，如果西部的军队能够攻克或暂时拖住纳什维尔的南方邦联军，我就有希望夺取里士满和诺福克。""叛乱分子坚守马纳萨斯。两周内，我将调动波托马克军团。希望你进入纳什维尔后立即进军里士满。"[33] 1862年2月24日，北方联邦军占领了纳什维尔，乔治·B.麦克莱伦终于等来一个绝佳机会[34]。就士兵的平均水平来说，乔治·B.麦克莱伦麾下的十五万士兵比大多数欧洲士兵优秀。与1860年4月的撒丁岛军队在意大利南部行军时的条件相比，乔治·B.麦克莱伦军队的行军条件并不差[35]，行军道路也没有田纳西州的路难走。北方联邦军曾在田纳西州行军，并成功克服艰苦环境继续前行。毫无疑问，乔治·B.麦克莱伦首先应该进攻马纳萨斯的约瑟夫·E.约翰斯顿。他的军力是约瑟夫·E.约翰斯顿军力的三倍。虽然我们无法预测一场伟大战争的结果，尤其是乔治·B.麦克莱伦与约瑟夫·E.约翰斯顿之间的战争，但北方联邦军的获胜概率明显更大。此外，约瑟夫·E.约翰斯顿即将离开马纳萨斯。1862年2月22日，他开始筹备撤离工作，1862年3月7日，撤离正式开始。1862年3月11日，他率军安全抵达拉帕汉诺克河南岸。乔治·B.麦克莱伦曾说："这是一次打败正在撤退的南方邦联军的绝好机会。"[36]



波托马克军团

摘自《哈珀周刊》

第7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亨利·W.哈勒克

占领多纳尔森堡后，尤利西斯·S.格兰特又做了一些事。1862年3月22日，他在写给伊莱休·B.沃什伯恩的私人信件中，提到了他对亨利·W.哈勒克的误解，写道："进驻多纳尔森堡后的两周内，亨利·W.哈勒克将军一直没有收到我的信，我也没有收到他的信。我每天都给他写信，有时甚至一天写三封，向他汇报我的每一次行动、调整和军队的情况等。亨利·W.哈勒克将军没有收到我的信，自然会生气。正如我知道的，他每天都会寄信谴责我。但我没有收到他的信。因此，他的谴责并没有起作用。我收到了一封信，从中没有看到任何公平的言辞。于是，我回信反驳并提出了辞职。随后，我发了三份电报，每份电报中都提出了辞职请求。但现在，一切已经真相大白，我确信亨利·W.哈勒克将军非常满意。事实上，他曾写信拒绝了我的辞职请求，并对我赞赏有加。"[37] 但尤利西斯·S.格兰特看了亨利·W.哈勒克的整封信后，在1885年2月的《世纪杂志》和《个人回忆录》中，严厉批评了亨利·W.哈勒克。然而当时，亨利·W.哈勒克得到了华盛顿陆军部的信任，被任命为美国西部唯一的指挥官[38]。1862年3月13日，他恢复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对田纳西州军队的指挥权[39]。1884年，尤利西斯·S.格兰特写道："我一直坚持认为，多纳尔森堡陷落后，通往西南各地军队的路已经打通。如果一位勇于承担责任的将军指挥阿利根尼山脉以西的所有军队，他可能会率军进入查塔努加、科林斯、孟菲斯和维克斯堡。随着北方志愿军的迅速壮大，这些城市的军力足以抗击附近任何南方邦联军队。"[40] 事实上，受到亨利·W.哈勒克莫名其妙的冷落后，尤利西斯·S.格兰特再度成为军队的领袖。重获指挥权后，他有了再次采取行动的机会。当时，如果他尽其所能，得到政府和人民的信任，一定会成为统帅的不二人选。



查塔努加

1862年3月的最后几天，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司令部设在萨凡纳[41]。南方邦联军在匹兹堡栈桥有五个师。匹兹堡栈桥在面向南方邦联军的田纳西河西侧，高九英里。卢·华莱士的一个师驻扎在匹兹堡栈桥同侧下游五英里的克伦普栈桥。乔治·P.比尔率领约三万六千人的俄亥俄州军队前往萨凡纳，与尤利西斯·S.格兰特会合。会合后。他们向科林斯及其附近的南部邦联军发起了进攻。

虽然多纳尔森堡的挫败令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非常悲伤，但杰斐逊·戴维斯的支持和理解让他倍感宽慰。杰斐逊·戴维斯写信给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说："我对你的信心从未改变。"[42] 与此同时，有人认为，皮埃尔·博勒加德应该离开弗吉尼亚，前去西南部支援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并希望通过他的个人声望，唤醒南方人抵抗外地入侵的热情[43]。乔治·P.比尔与尤利西斯·S.格兰特通力合作。在科林斯，一支四万人的北方联邦军集结起来。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说："人民想要的是战斗和胜利。"他希望在乔治·P.比尔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会合前，打垮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军队。1862年4月3日，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打算突袭北方联邦军，于是离开了科林斯[44]，希望在1862年4月5日发起进攻[45]。但由于延误，直到1862年4月6日凌晨，南方邦联军才发动了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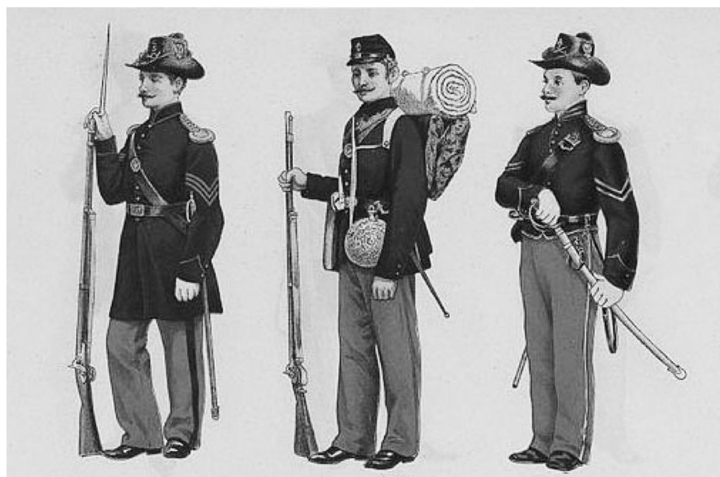
第8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威廉·T.谢尔曼

夏洛 [46] 战役前夕，尤利西斯·S.格兰特在多纳尔森堡战役中展现出了预测南方邦联军动态的军事才能，但后来，他的这一军事才能似乎逐渐消失了。他从来没有向罗伯特·E.李一样，仔细研究对方军队的指挥官。夏洛战役中，他没有想到的是，绝望会让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发起进攻。尤利西斯·S.格兰特本来笃定南方邦联军会等待他的攻击，而且固执地忽略了南方邦联军的明显行动迹象。1862年4月4日，战斗打响前，尤利西斯·S.格兰特发电报给亨利·W.哈勒克说："南方邦联军主力在科林斯。""我从未想到我军会大范围地遭到袭击。如果想到了，我一定会做好准备。" [47] 1862年4月4日3时，他对乔治·P.比尔军队的上校说："匹兹堡栈桥不会有战斗，我们必须向叛军集结地科林斯进发。" [48] 与此同时，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的军队离联邦营地两英里远，其余四万人也在支援范围内 [49] 。

威廉·T.谢尔曼除了指挥自己的军队外，还指挥着匹兹堡栈桥的另外三支军队 [50] 。他比尤利西斯·S.格兰特更粗心，因为他离夏洛很近，却没有观察到南方邦联军的任何动向。然而，虽然亨利·W.哈勒克下令尤利西斯·S.格兰特加强防守，但威廉·T.谢尔曼并没有接到修筑战壕的命令。"在战场上不宜使用临时修筑的战壕" [51] ，但值得注意的是，约有六万至八万 [52] 南方邦联军驻扎在距夏洛不到二十三英里的地方。足智多谋的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威廉·T.谢尔曼不会让士兵们拿着锄头和铁锹战斗。威廉·T.谢尔曼写道："在战役后期，我们本来可以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扭转局势。" [53]

威廉·T.谢尔曼"躁动、狂热、激进" [54] ，曾不止一次察觉到了南方邦联军的异动。1862年4月4日下午，在巡查时，威廉·T.谢尔曼抓获了十名俘虏。俘虏们交代自己是皮埃尔·博勒加德派出的先锋队。皮埃尔·博勒加德正在向北方联邦军营地进发。一名受重伤的士兵告诉俄亥俄州某团的上尉，说皮埃尔·博勒加德率领的大军有五万人，会在十二小时内发起进攻。上尉立即将消息告知了威廉·T.谢尔曼。俄亥俄州军团的纠察队提醒上尉注意"冲进防线的邦联先锋队"，因为他们看到了一队整齐的骑兵和步兵。威廉·T.谢尔曼接到相关报告后，依然固执地坚持自己对局势的

看法，坚信邦联先锋队只是一支侦察兵。他说皮埃尔·博勒加德不会发起进攻，还说他很了解皮埃尔·博勒加德的思维习惯。威廉·T.谢尔曼坚守在营地，并不打算进攻南方邦联军的营地[55]。1862年4月5日，他寄信给尤利西斯·S.格兰特说："我军前方有一队南方邦联骑兵。南方邦联军在两英里外可能有两支步兵团和一组火炮。""南方邦联军很无礼，但昨天吃到了苦果，不会再逼近我们的纠察队了……我并不担心我们会受到袭击。"[56] 与此同时，南方邦联军的一个团已经做好战斗准备，在离营地不到两英里的地方集结，其他三个团在后方支援。"[57]



南方邦联军

如果皮埃尔·博勒加德任南方邦联军的总指挥[58]，威廉·T.谢尔曼的猜想就不会错得太离谱。皮埃尔·博勒加德同意进攻北方联邦军，但不会同意在1862年4月5日发起进攻。他担心的是，1862年4月4日的冲突、鼓声和号角声会使北方联邦军变得更加警觉，也许北方联邦军正藏在战壕里等待南方邦联军的进攻。因此，皮埃尔·博勒加德建议南方邦联军撤回科林斯。在讨论中，两名军团指挥官与他意见相左。最后，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说："我们明日白天发起进攻。就算北方联邦军有一百万人，我也会战斗到底。"[59] 威廉·T.谢尔曼即使早已知道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是南方邦联军的总指挥，也会像尤利西斯·S.格兰特一样，不相信绝望会促使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孤注一掷。

第9节　夏洛战役

两军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军队进行操练时，皮埃尔·博勒加德听到了鼓声。经探查，鼓声是从北方联邦军的营地传来的。于是，他命令军队暂停操练[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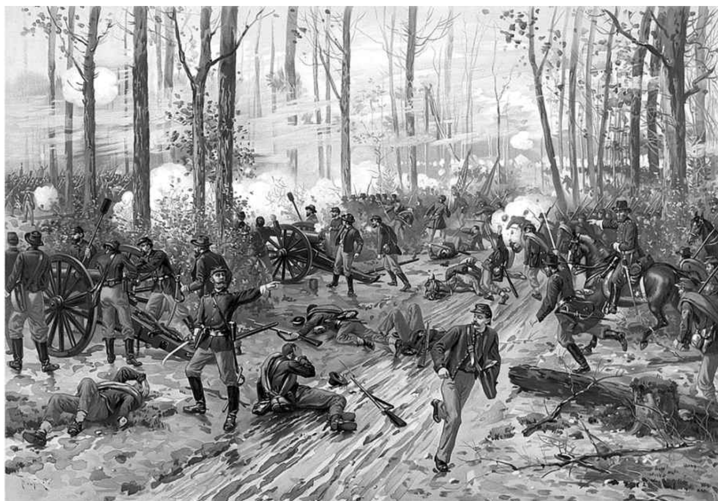
经过1862年4月4日午夜的狂风暴雨后，1862年4月6日，天空放晴，太阳像“奥斯特利茨的太阳”[61]一样。空气格外清新，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的内心非常喜悦，他说：“今晚我们将在田纳西河畔喂马。”[62]与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威廉·T.谢尔曼相比，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的消息更灵通。他知道北方联邦军的确切位置，打算攻打北方联邦军左翼，切断对方在田纳西河附近的退路，迫使他们投降。1862年4月6日凌晨5时14分，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正在喝咖啡，忽然听到了第一声枪响。大战序幕由此拉开。尤利西斯·S.格兰特、威廉·T.谢尔曼和官兵们非常震惊。俄亥俄州军团的一位少校还未起床，仆人和炊事兵正在准备早餐，一个小贩的商店刚刚开门，“哨兵们踱着步子，警卫旅的换班小分队正向岗哨走去。”[63]枪声响起后，北方联邦军的军营里立即乱作一团。1862年4月6日早晨7时至8时，北方联邦军第六师的营地被攻克。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的副官说：“突袭成功了。敌人丢弃了军旗、武器、军需品和弹药，他们的早餐还在桌子上，军官们的行李和衣物还在帐篷里。”[64]

威廉·T.谢尔曼在1862年4月10日的报告中写道：“直到1862年4月6日早晨8时，军队左前方出现了南方邦联军步兵亮晃晃的刺刀……我才确信南方邦联军谋划了一场全面进攻。”[65]威廉·T.谢尔曼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来不及懊悔，仓促投入了战事。他迅速做出了部署，并亲自参加了战斗。在激烈的战斗中，他骑的三匹战马被杀，自己也负伤两处。1862年4月13日，亨利·W.哈勒克从匹兹堡栈桥寄出了一份报告。后人可能会对这份报告存有疑虑。亨利·W.哈勒克写道：“大家都认为威廉·T.谢尔曼将军扭转了局势。”[66]威廉·T.谢尔曼得到了约翰·A.麦克莱恩德和其他军官的支援。然而，1862年4月6日10时，南方邦联军攻克了威廉·T.谢尔曼和约翰·A.麦克莱恩德的营地。北方联邦军被包围，但军队一直在撤退。午夜时分，约翰·A.麦克莱恩德的军队如果没有被俘或顺利逃

走，有可能占领第八个据点[67]。

当时，北方联邦军有三万六千人，南方邦联军有四万人。约瑟夫·E.约翰斯顿的军队几乎完全没有作战经验。尤利西斯·S.格兰特率领的六十三个团中，有二十五个团曾参加了多纳尔森堡战役。北方联邦军中有很多散兵和逃兵。战役打响时，许多新组的军团很快溃散了。但守护军旗和支持威廉·T.谢尔曼的士兵们依然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夏洛战役中，尤利西斯·S.格兰特已经不再是多纳尔森堡战役中的尤利西斯·S.格兰特了。尽管如此，他依然知道自己太过轻敌，竭尽所能弥补过错。1862年4月6日早晨6时，尤利西斯·S.格兰特在萨凡纳吃早饭时，听到司令部的一个执勤列兵说，匹兹堡栈桥传来了炮声。尤利西斯·S.格兰特立即起身，写信给乔治·P.比尔军队的指挥官威廉·纳尔逊将军，命威廉·纳尔逊将军率军支援匹兹堡栈桥。随后，他乘轮船前往匹兹堡栈桥，中途在克伦普栈桥停留，命卢·华莱士率军随时准备战斗。约1862年4月6日上午8时，尤利西斯·S.格兰特抵达匹兹堡栈桥，来到了前线。他立即命卢·华莱士前来增援。军事评论家说，在夏洛战役中，尤利西斯·S.格兰特显得无足轻重[68]。普通人会将他早期和后期的军事生涯联系起来，认为在多次会见各军军官和下达口令期间，他的冷静和果敢有助于鼓励惊慌失措的士兵们。1862年4月6日中午，尤利西斯·S.格兰特“变得非常焦虑”[69]。他传令卢·华莱士的军队加快前进步伐，并向“匹兹堡栈桥附近的先遣部队，即乔治·P.比尔的军队的指挥官”发出了求助信。他写道：“现在，援兵将会产生巨大作用，不仅能助长我军的志气，还能削弱南方邦联军的威风。你们必须加快行军步伐。如果你们将所有行囊放在战场附近的河东岸，可能会多争取一天时间，从而帮助我们扭转局势。叛军估计有十万多人。”[70]乔治·P.比尔收到信后，立即赶到了萨凡纳。现在，他正乘轮船向前顺河而上。



夏洛战役



尤利西斯·S.格兰特率军发起冲锋



威廉·纳尔逊（1824—18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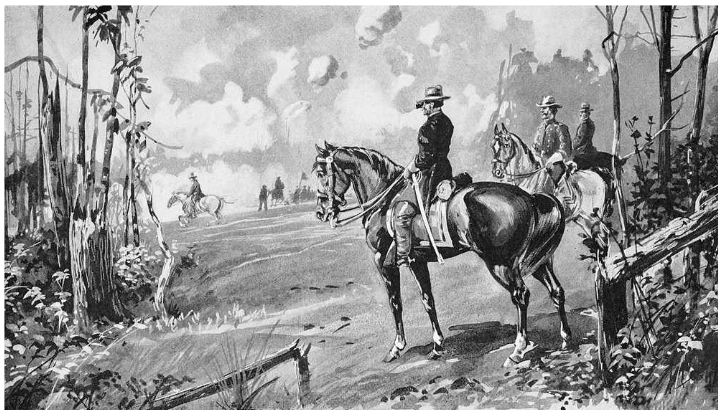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南方邦联军为首次大捷欢呼雀跃。在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的鼓舞下，战士们精力充沛，继续前进，保持着良好的作战状态。如果要攻克北方联邦军的左翼军队，南方邦联军必须主动发起进攻，占领一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山。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拼尽全力，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死里逃生。但当北方联邦军从山顶撤退的时候，双方并没有停止交火。一颗子弹打中了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腿部的动脉，鲜血立即从伤口处涌出。十到十五分钟后，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因失血过多而死。如果当时随行医生在身边，他也许还能获救。然而，在行军途中，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看到了很多伤员，其中很多是北方联邦军。他命自己的随行医生留下，并说："这些人刚才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是我们的囚犯。你照顾他们。"[71] 1862年4月6日下午2时30分，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阵亡。皮埃尔·博勒加德接管了设在夏洛教堂的司令

部。1862年4月5日晚上，威廉·T.谢尔曼还在夏洛教堂的木屋里。随后，战斗暂时平息了下来。但不久，战火再次燃起。北方联邦第六团展开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战斗。士兵们一边撤退一边争夺战场，但他们的将军被包围了。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北方联邦第六团的将军带领两千两百人投降[72]。

1862年4月6日下午5时30分，南方邦联军决定放手一搏，准备袭击北方联邦军的左翼，占领匹兹堡栈桥。但在这之前，他们必须攻下一座由一组步枪和两艘炮艇守卫的小山。南方邦联军已经领教过山上猛烈的火力。“尤利西斯·S.格兰特安静地骑在马背上，一动不动，似乎在思考着什么。有人问他：‘战况是否不乐观？’他轻声回答道，‘并不是。南方邦联军今晚不可能冲破我们的防线，已经太迟了。对我们来说，拖延时间至关重要。明天，只要援兵到了，我们就能发起反攻了。’”[73] 夜幕已经降临，虽然卢·华莱士还没有抵达匹兹堡栈桥，但援军就在眼前。精力充沛的威廉·纳尔逊将军正率军从萨凡纳赶来。他率军先走了三英里大路，随后，穿过了一片黑沼泽和一片森林，那里的积水淹没了道路。军队离匹兹堡栈桥越来越近，甚至听到了从匹兹堡栈桥传来的炮火声。当到达匹兹堡栈桥两英里处时，通讯员疾驰赶来，停在队伍前面传达了将军的指令：“快点，否则我们会一败涂地。南方邦联军向我们发起了猛攻。”[74] 威廉·纳尔逊将军的军队一到河东岸，就立即乘船渡河，爬上一百英尺高的河岸，遵照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乔治·P.比尔的命令，“冷静、镇定”[75] 地排兵布阵。1862年4月10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写道：“进攻一开始就取得了进展，敌人很快被击退了。”夜色逐渐消退，皮埃尔·博勒加德命令军队停止战斗，就地休息。



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阵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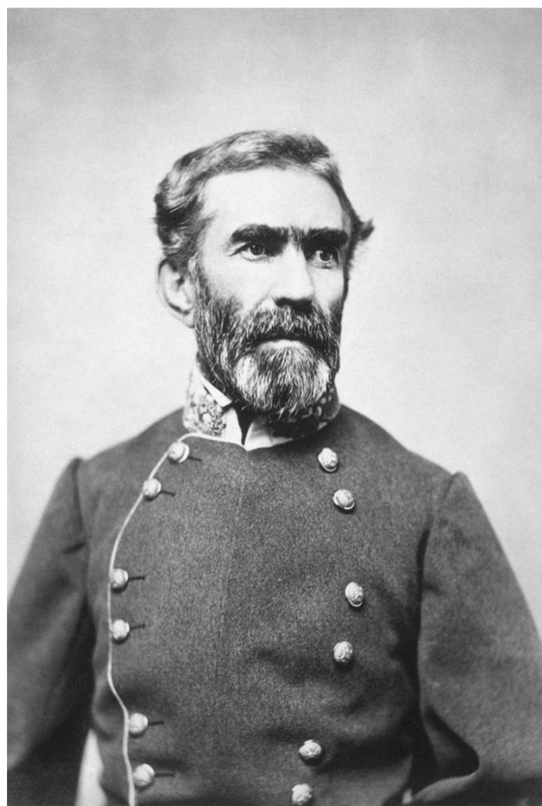


夏洛战役中的尤利西斯·S.格兰特



联邦军炮兵打击邦联军

战斗持续了十二个多小时。最终，南方邦联军获胜，北方联邦军队退到了距匹兹堡栈桥一英里半到两英里的地方，失去了夏洛教堂。尤利西斯·S.格兰特写道："我们失去了重要据点。"[76] 但这场胜利并没有达到约瑟夫·E.约翰斯顿的预期。他本来希望俘获北方联邦军或至少完全击溃北方联邦军。离开科林斯时，他觉得自己的期望很有可能实现。遭到突袭后，尤利西斯·S.格兰特率领的部分军队士气低落。这种情绪持续了一整天。傍晚渡河时，威廉·纳尔逊将军看到了对岸垂头丧气的军队，印象深刻。1862年4月10日，威廉·纳尔逊将军写道："我发现河岸旁蜷缩着七千到一万名惊慌失措的士兵，毫无斗志。他们见到我们时，哭喊着说，'我们遍体鳞伤，被打得溃不成军。'"[77] 亨利·斯通写道："1862年4月6日的战役就像一场传统的摔跤比赛，参赛者可以采用任何姿势，将对方摔倒在地。"[78]



布拉克斯顿·布拉格（1817—1876）

1862年4月7日，乔治·P.比尔训练有素的两万名士兵、卢·华莱士的六千五百名士兵及在1862年4月6日的战役中冲锋的四支军队，统一听从

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乔治·P.比尔的号令，向皮埃尔·博勒加德的军队发起了进攻。此时，北方联邦军的人数远超皮埃尔·博勒加德的军队。经过八小时的激战，北方联邦军击退了南方邦联军，收复了失去的阵地。皮埃尔·博勒加德的军队元气大伤，撤到了科林斯。1862年4月8日，在撤退途中，南方邦联军第二军团指挥官布拉克斯顿·布拉格写信给皮埃尔·博勒加德说："我们的情况很糟糕。军队溃不成军，士兵们萎靡不振，道路几乎无法通行，粮草也没有了……直到天亮，北方联邦军才停止追击。"[79]

在内战时期的大多数战役中，无论是北方联邦军的还是南方邦联军，都不曾长途追击过敌人。除了卢·华莱士的军队，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军队已经筋疲力尽，无法乘胜追击。尤利西斯·S.格兰特虽然获得了亨利·W.哈勒克的授权，担任北方联邦军的总指挥，但并未对乔治·P.比尔的军队行使指挥权。亨利·W.哈勒克的命令和他亲自担任指挥官的作战计划使追击成了不可能。

夏洛战役中，北方联邦军的伤亡人数是一万三千零四十七人，南方邦联军的伤亡人数是一万零六百九十四人[80]。美国从未发生过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南方邦联没能洗雪多纳尔森堡战役的惨败。此外，尤利西斯·S.格兰特如果事先预料到了南方邦联军的突袭，一定会击垮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战役结束后，在写给亨利·W.哈勒克的信中，尤利西斯·S.格兰特说他缺乏准确的消息来源，军队遭到了南方邦联军一百六十二个团的袭击，数量远超之前的预估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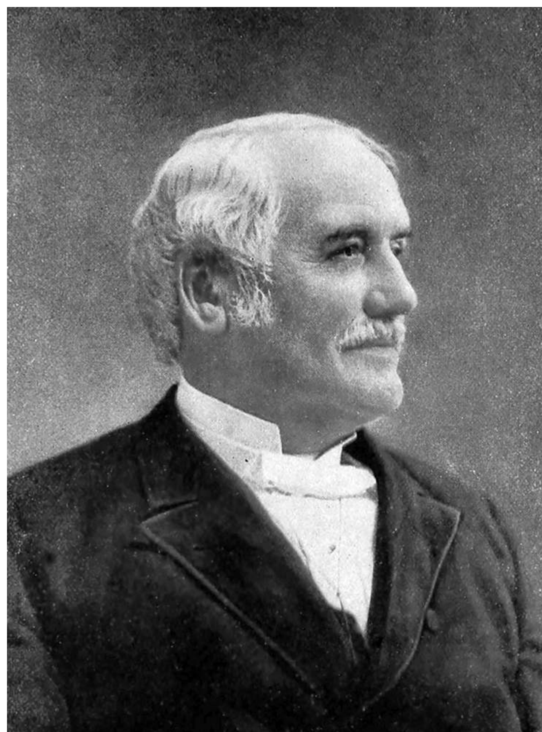
第10节　林肯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

夏洛战役是美国西南人和西北人之间的一场战役，双方都死伤严重。多纳尔森堡战役的胜利带来的喜悦已经消散，现在，芝加哥人因夏洛战役悲痛不已。战士们给西部各州的亲人寄去了家书，讲述了这场无谓的杀戮，并激起了人们对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愤慨。新闻界和联邦国会议员公开表达了对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不满。众议院的伊莱休·B.沃什伯恩和参议院的约翰·谢尔曼极力为尤利西斯·S.格兰特辩解。约翰·谢尔曼在写给兄长威廉·T.谢尔曼的信中说："批评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声音非常高涨，我努力为他辩解，但收效甚微。"[81] 尤利西斯·S.格兰特受到了各方的指控。埃德温·斯坦顿给匹兹堡栈桥的亨利·W.哈勒克发电报说："总统希望知道……是否是尤利西斯·S.格兰特或其他军官的疏忽与不当行为造成了我军的惨重伤亡。"[82] 亨利·W.哈勒克立即做出了回复，但回避了这个问题。在1862年5月2日的信件中，一个省略号发人深省。但根据我掌握的信息[83]，在所有官方记录中，并没有证据证明尤利西斯·S.格兰特存在不当行为[84]。悲哀的是，在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军事生涯中，只要他有过错，人们就会翻出他在正规军中的早期记录，评判他的过失，拿他酗酒的缺点说事[85]。很多北方人认为，在夏洛战役中，酗酒导致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误判。他们向林肯施压，要求罢免尤利西斯·S.格兰特。亚历山大·K.麦克卢尔叙述道，"民愤"势不可挡，林肯只能顺应民意。在"总统的朋友们都认为尤利西斯·S.格兰特有罪"的情况下，人们强烈要求林肯立即罢免尤利西斯·S.格兰特。一天深夜，亚历山大·K.麦克卢尔在白宫与林肯密谈了两个小时。他诚恳建议林肯罢免尤利西斯·S.格兰特，巩固国民对总统的信心。他还叙述道："我毫无保留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随后，我们都沉默了。林肯似乎沉默了很久，然后……他以诚挚的口吻说道，'我不能罢免尤利西斯·S.格兰特，他已经竭尽全力为国战斗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林肯当时的口吻。"[86] 在给伊莱休·B.沃什伯恩的信中，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情绪非常低落，但同时，他决定为自己的失败和面对南方邦联军袭击时采取的行动辩护。他写道："说我不为各种评论所困是不对的，因为我有父母和妻儿。他们看到了相关评论，痛苦不堪，我必须与他们共患难。同样，听命于我的士兵们看到了这些指责，他们对我的信心可能已经大减。在目前的战斗中，

人民的指责会削弱我军的战斗力……夏洛战役中，我军以三万人军力对抗五万南方邦联军，而且大部分都是新兵。一些人希望看到的是，我们能在战场上坚持一整天，等待援军的到来。他们对战争知之甚少……回顾过去，我没有任何需要纠正的重大问题。”[87]



约翰·谢尔曼（1823—1900）



亚历山大·K.麦克卢尔（1828—1909）

1862年4月11日，亨利·W.哈勒克抵达匹兹堡栈桥。1862年4月30日，他替代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成为北方联邦军的总指挥。在重整军队的时候，他剥夺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实际指挥权，任命尤利西斯·S.格兰特为副指挥。尤利西斯·S.格兰特非常愤怒，不止一次要求辞职，决定离开这一徒有虚名的职位。他对威廉·T.谢尔曼说："您知道我在这儿是个障碍。我已经受够了。"后来，威廉·T.谢尔曼与尤利西斯·S.格兰特成了一生相伴的朋友。当时，威廉·T.谢尔曼坚决要求尤利西斯·S.格兰特留下来。他说："你走了并不能改变什么，但你会被军队彻底抛弃。然而，如果你留下来，总会找到机会重新获得人民和战士们的信任，拿回实权。" [88] 尤利西斯·S.格兰特接受了威廉·T.谢尔曼的建议，继续留在军中。

威廉·T.谢尔曼与尤利西斯·S.格兰特谈话后，北方联邦军占领了科林斯。亨利·W.哈勒克率十万大军向科林斯进发，每次修整时都命人挖壕沟防守。因此，威廉·T.谢尔曼称此次行军为"掘击" [89] 。亨利·W.哈勒克逼退了科林斯的驻军，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但亨利·W.哈勒克如果能重创

皮埃尔·博勒加德的军队，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就[90]。



亨利·W.哈勒克率领联邦军向科林斯进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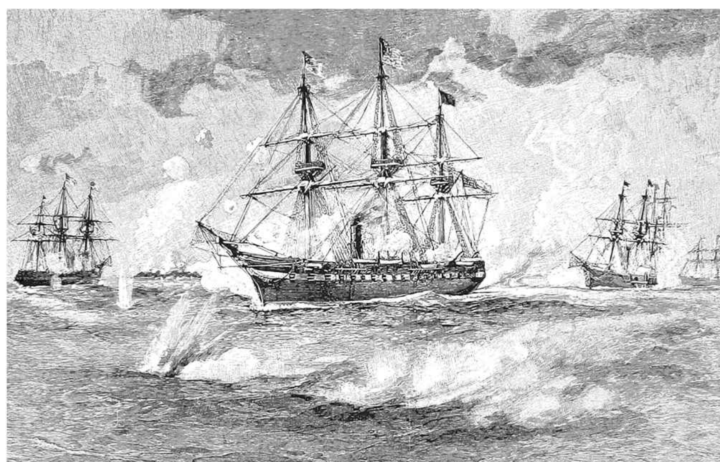
第11节　封锁

孟菲斯战役爆发时，北方联邦海军的规模很小，许多舰船正在远航，很久后才收到要求返航的命令。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和副部长古斯塔夫斯·福克斯通过各种渠道，购置和租用了一些商船，成立了一支临时海军。这支海军的军力足以实施一次全面封锁。现在，海军需要的是封锁南方邦联舰队的基地及其他海军军事行动的基地。北方联邦海陆联合军队相继占领了哈特勒斯湾、皇家港和洛亚诺克岛[91]。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道："如果真的实施了封锁，英国人一定会遵守美国的相关规定。但他们如果从中发现了缺口，也会置之不理。"[92] 1861年，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对棉花很感兴趣。英国和法兰西帝国想要棉花，美国南方渴望用棉花换取大炮、步枪、武器弹药、各种铁器和一般商品。但封锁有效阻碍了这类交易。1862年3月的一天，古斯塔夫斯·福克斯的封锁被南方邦联军突破。北方人担心大西洋所有港口的封锁都会被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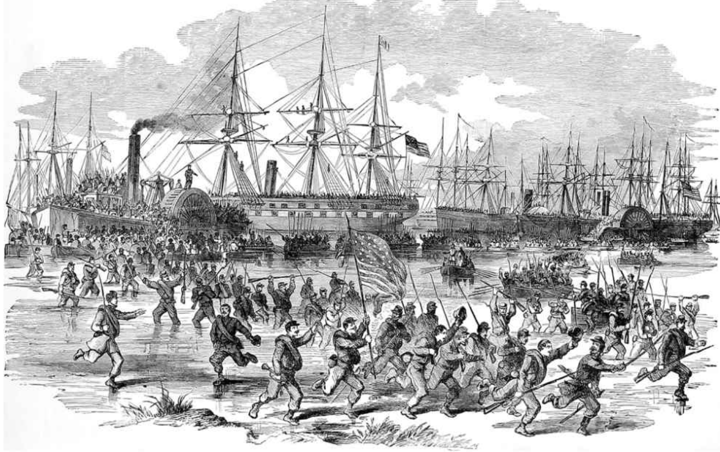
第12节　“梅里马克”号

1858年前，各国海军的船都是木制的。1858年，法兰西人为护卫舰“光荣”号配备了护甲。于是，英国海军立即建造了重达九千两百吨的“勇士”号轮船。虽然欧洲各国海军的建设即将发生巨大变化，但美国海军依然进展缓慢。里士满的海军建设走在了华盛顿前面。早在1861年5月8日，南方邦联海军部长写道：“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拥有铁甲舰。”[93] 1861年7月，他下令将“梅里马克”号护卫舰[94] 改为装甲舰。虽然南方的制造业和机械条件并不完善，但改装“梅里马克”号的任务依然如期完成了。

根据1861年8月3日通过的法案，联邦国会成立了海军部。1861年8月7日，海军部登报征集“适合在南部诸州浅水河和港口航行的”[95] 装甲舰设计图和报价。约翰·埃里克森递交了一份设计图，但遭到了拒绝。在一位朋友的劝说下，他去了华盛顿，证明自己的“设计实用性强，理论基础坚实”。“海军部对他的设计很满意”[96] ，并采纳了他的提议。吉迪恩·韦尔斯部长让约翰·埃里克森立即动工，不必等正式签合同，因为“梅里马克”号的改装速度惊人。约翰·埃里克森设计的装甲舰是“监视”号。1861年10月25日，“监视”号的船身建成。1862年1月30日，“监视”号下水，1862年3月6日从纽约出发前往门罗堡[97] 。



联邦军舰在哈特勒斯湾战役中轰炸哈特拉斯堡



联邦军在皇家港登陆，展开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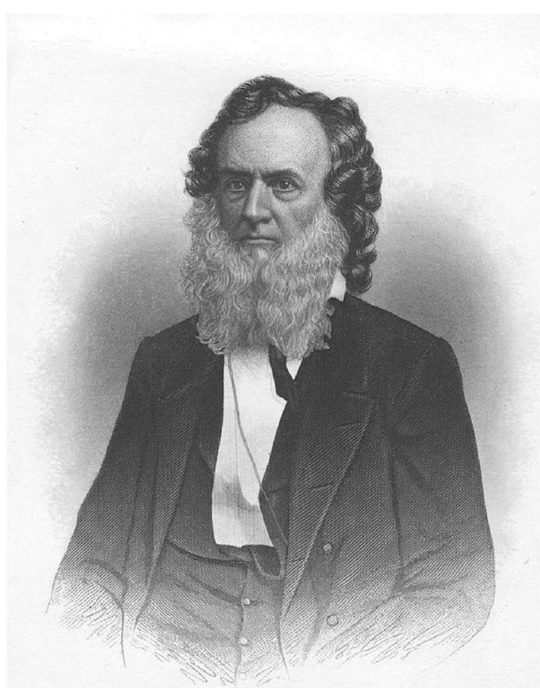
洛亚诺克岛战役

1862年3月8日，天气晴朗，海面平静，汉普顿水道上的封锁舰正在进行日常巡逻。“国会”号护卫舰和“坎伯兰”号单桅战船都是帆船，分别配炮五十门和二十四门，停泊在纽波特纽斯港。1862年3月8日正午过后，一只像“潜浮的巨大鳄鱼”的船喷着烟雾从诺福克方向驶来。美国水域从未出现过这种船，即使出现过，也像其他地方一样，几乎没有人见过类似的船，但所有人都立即明白过来，这艘船是“梅里马克”号。“国会”号和“坎伯兰”号整装待发。“梅里马克”号向“国会”号开火，“国会”号舷炮齐射，“梅里马克”号回击。“坎伯兰”号和岸上的炮台也开始向“梅里马克”号开火，但打在“梅里马克”号铁甲上的炮弹反弹了回来，就像打在

弹性橡胶上一样。“梅里马克”号全速前行，超过“国会”号后径直向“坎伯兰”号驶去，瞄准联邦海军的单桅战船开火，弹无虚发，并猛撞“坎伯兰”号。“坎伯兰”号的“侧面被撞开了一个口子，足以驶进一辆马车”。水顺着口子漫进了船里，“船体左倾”，桅杆摇摆不定。“坎伯兰”号最后发射了一颗炮弹，沉了下去，“最后，水面上只剩下一面美国国旗”[98]。整个过程持续了三十分钟。看到“坎伯兰”号的遭遇后，“国会”号迅速收锚降帆，借助拖船驶向了岸边，希望在浅水区避开二十二英尺处的“梅里马克”号，但依旧在其射程范围内。“梅里马克”号“扫射了‘国会’号”[99]。“国会”号上燃起大火，船上的海军降下了美国国旗，挂起一面白旗。“梅里马克”号误解了“国会”号的投降行为，全力开火，很快彻底击毁了“国会”号。



约翰·埃里克森（1803—1889）



吉迪恩·韦尔斯（1802—1878）



汉普顿水道

看见“梅里马克”号后，“明尼苏达”号护卫舰立即离开门罗堡的停泊处，前往纽波特纽斯支援“国会”号和“坎伯兰”号。但船在途中搁浅了。离天黑还有两个小时，“明尼苏达”号只能任凭“梅里马克”号摆布。然而，“梅里马克”号的领航员不敢在落潮时穿过海峡，于是回到了苏埃尔

岬角，等待天亮。“梅里马克”号的指挥官希望天亮后回去摧毁“明尼苏达”号和门罗堡的其他舰船。

1862年3月8日夜晚，北方联邦舰队及门罗堡和纽波特纽斯港口的海军都很惊慌。早上时，人们都认为是一艘巨型军舰。现在，面对强大的“梅里马克”号，北方联邦军舰完全束手无策。1862年3月9日，焦虑情绪笼罩着华盛顿。威廉·H.苏厄德、萨蒙·P.蔡斯、埃德温·斯坦顿和吉迪恩·韦尔斯立即赶往白宫，与林肯商谈战事。林肯非常不安。约翰·海伊在日记中写道：“埃德温·斯坦顿吓得手足无措。他说南方会攻下我们的舰队，占领门罗堡，直抵华盛顿。” [100] 林肯和埃德温·斯坦顿“多次走到窗前，俯视着波托马克河，观察‘梅里马克’号是否向华盛顿驶来。” [101] 1862年3月9日，联邦陆军部的信件反映了民众的不安和担忧。人们夸大了“梅里马克”号的战斗力，但有一点不容忽视，即“梅里马克”号已经攻破了诺福克的防线，很有可能攻破其他港口。白宫正在召开会议，吉迪恩·韦尔斯对林肯及其谏言团说：“现在，‘监视’号在汉普顿水道。我相信它可以与‘梅里马克’号抗衡，甚至打败‘梅里马克’号。” [102]



门罗堡

第13节 “监视”号

“监视”号从纽约出发，经历了一路暴风骤雨后，于1862年3月8日晚上9时抵达了汉普顿水道。随后，“监视”号接到命令，继续前行了两个半小时后，到达了“明尼苏达”号附近的一个岬角。1862年3月9日清晨，南方邦联海军看到“一艘从未见过的船，像一块巨大木板漂浮在水面上，船中央是一个庞大的‘乳酪盒’，无帆、无轮、无烟囱、无组炮。”[103] 南方邦联海军知道这艘船是“监视”号。1862年3月9日8时，“梅里马克”号冲向“明尼苏达”号，并开火。与此同时，联邦海军上尉约翰·L.沃登指挥“监视”号向“梅里马克”号进发，“停在一旁”，然后开火。“监视”号负重七百七十六吨，前行了仅十五英尺。随后，一座旋转炮塔上的两门十一英寸长的达尔格伦大炮[104] 开火。“梅里马克”号负重三千五百吨，载着十门大炮。据说，“监视”号与“梅里马克”号看起来就像是矮人与巨人决斗，或是大卫遇到了哥利亚[105] 。

随后，“梅里马克”号与“监视”进行了近四个小时的近距离激战。两艘战船间的距离时而半英里，时而几码。“‘监视’号不断发射炮弹”，但效果并不显著，虽然接近了“梅里马克”号的舷侧，但就像“小孩子掷石子一样”[106] 。指挥“梅里马克”号的海军中尉罗杰·琼斯曾问道：“乔治·G.埃格尔斯顿先生，你为什么不开火？”乔治·G.埃格尔斯顿回复道：“为什么？我们的弹药十分珍贵，连续开火四小时后，我发现每两分半钟发射一次炮弹的损伤很大。”[107] 罗杰·琼斯决定猛攻“监视”号。1862年3月8日，“坎伯兰”号也曾遭到猛攻。然而，“梅里马克”号的引擎和锅炉出现了故障，航速仅有五节[108] ，船体笨重，铁制船首已经扭曲，与“坎伯兰”号相撞时失去了航向。因此，“监视”号全速航行，轻而易举地躲开了炮弹，只有侧面受到了袭击。轮机长写道：“‘梅里马克’号重重地向我们撞来，但丝毫没有伤到我们。”[109] 在撞击过程中，“梅里马克”号损失惨重，出现了裂缝。罗杰·琼斯写道：“‘梅里马克’号中弹，船内的机体已经无法正常运行。”[110] 但约翰·L.沃登受伤了。“监视”号的领航员的房间是按照小木屋的样子建造的铁屋子，屋内，约翰·L.沃登战在瞭望口指挥战舰。一枚炮弹飞过来，落在了瞭望口外面。约翰·L.沃登的眼睛伤得很重，以为领航员的房间严重受损，于是“下令向右转舵，避开炮弹”

[111] 。罗杰·琼斯可能认为“监视”号已经弃战，加上“梅里马克”号漏水严重，因此，他指挥战船驶向了诺福克，战斗就此结束。“监视”号并未受损。如果“梅里马克”号第二天继续出现，“监视”号依然可以与其交战。但“梅里马克”号受损严重，无法继续战斗，只能靠岸修理，一个月后才重返汉普顿水道。



罗杰·琼斯（1831—18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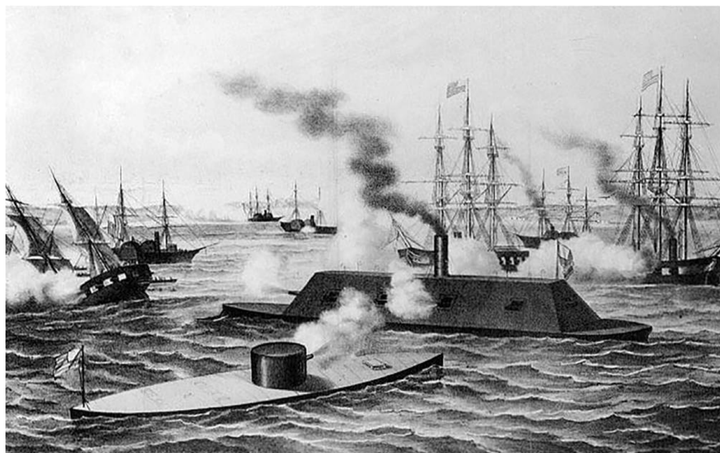
约翰·L.沃登（1818—1897）

1862年3月9日，汉普顿水道上“监视”号的轮机长写道：“约翰·埃里克森先生，祝贺您设计的战船大获成功。今天，有很多人祝贺您。我听到全船的战士都在为您欢呼。大家都认为是您保住了汉普顿水道，帮助我们击败了一艘装甲舰。在我们抵达汉普顿水道前，‘梅里马克’号正以自己的方式击毁我们最强大的舰船。”[112]

这场战役说明，未来的海军舰艇必须是铁甲舰。“英国的木质军舰”已经不再是保障[113]。

1862年3月8日，“梅里马克”号的毁灭性攻击引起了华盛顿和北方各地的担忧。“监视”号在1862年3月9日的表现并未彻底打消人们的担忧。乔治·B.麦克莱伦决定将门罗堡作为军事基地，派自己的军队前往门罗堡，通过约克河和詹姆斯河之间的半岛向里士满进军。为了实施计划，北方联邦军必须守住汉普顿水道和门罗堡的海域。“如果‘梅里马克’号再次出现”，此次行动很可能夭折。因此，1862年3月12日，乔治·B.麦克

莱伦问驻守在门罗堡的古斯塔夫斯·福克斯："'监视'号能否牵制住'梅里马克'号，以便将门罗堡作为军事基地？"古斯塔夫斯·福克斯回答道："目前为止，'监视'号完全有能力与'梅里马克'号抗衡，但下次战斗就说不准了。因此，我建议您不要对'监视'号抱太大希望。"华盛顿的蒙哥马利·C.梅格斯依然有些惊慌失措。1862年3月13日，他写道："我不会将华盛顿的命运寄托在'监视'号上。一旦'监视'号有任何闪失，'梅里马克'号就会将其击败。"1862年3月15日，吉迪恩·韦尔斯承认，"北方人对'梅里马克'号装甲舰的恐惧很难消除"。



"监视"号冲向"梅里马克"号



"监视"号与"梅里马克"号激战

后来，“梅里马克”号又在汉普顿水道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1862年4月11日，“梅里马克”号指挥一艘邦联装甲舰和一艘炮舰，俘获了三艘商船。“监视”号发现了“梅里马克”号，但并没有冒险攻击对方。第二次是在1862年5月8日，在指挥官的命令下，“梅里马克”号“直接驶向敌方，准备开战”。但“监视”号及随航舰船没有迎战。国务卿萨蒙·P.蔡斯陪同林肯和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对门罗堡进行了一次短暂视察。他记录道：“‘梅里马克’号慢慢逼近，随后，一片清澈的水域横在它和‘监视’号之间。紧接着，‘梅里马克’号时进时退，最终在所谓的安全区域停了下来。”1862年5月11日，由于乔治·B.麦克莱伦的进攻，诺福克的南方邦联军撤离。“梅里马克”号中弹，“熊熊大火烧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梅里马克’号爆炸沉没。”[114]

第14节　戴维·法拉格特和古斯塔夫斯·福克斯

“监视”号的出现恰合时宜，对联邦海军部来说也是运气。“监视”号的建造得益于联邦海军部的深谋远虑。然而，从本质上来说，“监视”号对“梅里马克”号的牵制依然是防御战，作战时需要联邦海军的配合。联邦海军功不可没。海军领导人戴维·法拉格特已经六十岁，从少年时起就在海军服役，渴望建功立业，却一直没有机会。“梅里马克”号出现后，他的机会终于来了。在华盛顿，他给家人写信说：“我即将在海湾战场上竖起一面旗帜。接下来的事就靠我自己了。”[115]

很早以前，北方就意识到了密西西比河的重要性[116]。如果北方能够占领密西西比河，南方邦联诸州就会一分为二，西部的丰富物资也将无法运到东部。新奥尔良距密西西比河口一百英里，管辖着密西西比河的下游，是南方主要的商业城市之一。占领新奥尔良将对南方邦联造成致命打击。联邦海军部副部长古斯塔夫斯·福克斯虽然是平民出身，但已经在海军服役十八年，指挥过邮轮，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性经验。此时，古斯塔夫斯·福克斯制定了实现目标的计划。新奥尔良的主要防御工事是两座坚固的堡垒，即圣菲利普堡和杰克逊堡。两座堡垒位于新奥尔良下游约七十五英里处的河流两侧。古斯塔夫斯·福克斯提议，先派一艘装甲舰穿过圣菲利普堡和杰克逊堡，继而控制新奥尔良。在密西西比河航行并不困难。古斯塔夫斯·福克斯的提议得到了吉迪恩·韦尔斯的认可。他们在与林肯、乔治·B.麦克莱伦和戴维·D.波特开会时，提出了这一计划[117]。戴维·D.波特曾带兵封锁了密西西比河的西南通道，他建议海军舰队配备一支迫击炮舰队，负责在起航前分散圣菲利普堡和杰克逊堡的注意力。乔治·B.麦克莱伦派波托马克军队的轮机长代表自己调整细节事务。轮机长立即同意了戴维·D.波特的建议，写道：“仅用一艘军舰穿过圣菲利普堡和杰克逊堡，然后到达新奥尔良，算得上一次偷袭，但不是占领。”[118] 古斯塔夫斯·福克斯虽然对戴维·D.波特的评价很高，但仍坚持自己原来的计划。因此，计划被搁置到了选出远征军指挥官后。青年时期，戴维·D.波特认识了戴维·法拉格特，两人关系亲密。吉迪恩·韦尔斯和古斯塔夫斯·福克斯根据戴维·D.波特对戴维·法拉格特的评价，选择任命戴维·法拉格特为远征军指挥官。戴维·法拉格特被召到了华盛顿。他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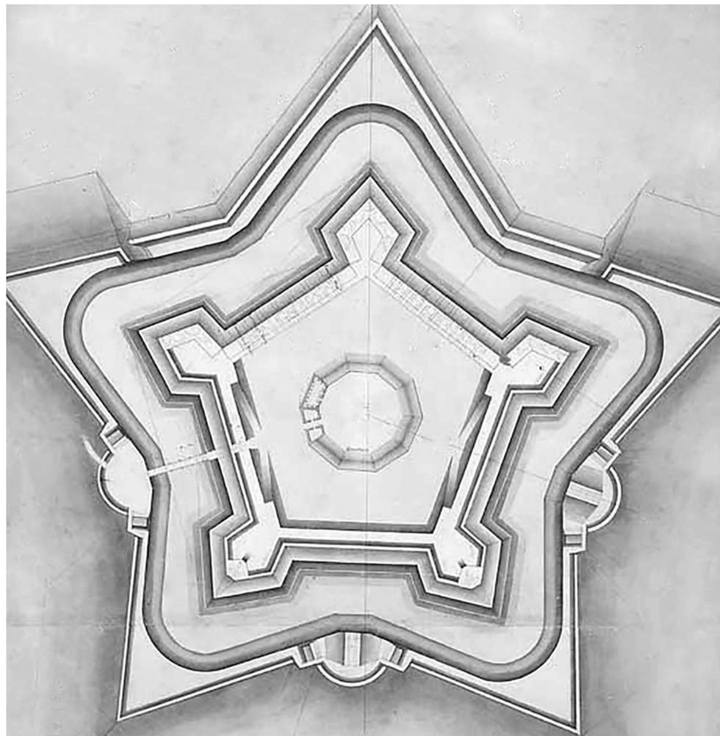
古斯塔夫斯·福克斯口中了解到了此次远征的目的、船只数量和进攻计划，满怀激情地接受了任务，坚信舰队能够穿过圣菲利普堡和杰克逊堡。但他对迫击炮舰队几乎没有任何信心，甚至认为迫击炮舰队极有可能误事。然而，远征计划已成定局，戴维·法拉格特愿意一试。他说："我会成功收复新奥尔良，否则绝不回来。" [119] 与古斯塔夫斯·福克斯对戴维·法拉格特口头解释相比，吉迪恩·韦尔斯的指令并不明确。他在指令中称，戴维·法拉格特应该"摧毁通往新奥尔良的防御工事"，进而"抵达新奥尔良" [120] 。



戴维·法拉格特（1801—1870）



戴维·D.波特（1813—1891）



杰克逊堡平面图

第15节　新奥尔良战役

在距密西西比河口约一百英里的军事基地——船岛，戴维·法拉格特写信给吉迪恩·韦尔斯说：“由于多纳尔森堡的陷落和纳什维尔的投降，新奥尔良的南方邦联军士气大减。”他还说：“现在是我们发起进攻的最佳时机，也许你想等迫击炮舰队到达后再进攻。”[121]

1862年4月中旬，戴维·法拉格特指挥着六艘舰船和十二艘炮艇。戴维·D.波特指挥着十九艘双桅纵帆船和六艘装甲舰，主要任务是防守和施救。所有船均已到达杰克逊堡和圣菲利普堡。1862年4月18日，迫击炮舰队开始炮轰杰克逊堡 [122] 。炮轰持续了整整两天，杰克逊堡损失惨重，但南方邦联军并不打算投降。1862年4月20日上午10时，在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戴维·法拉格特从“哈特福德”号旗舰上发出了信号，召集舰队的各级将领会面。没有参战的将领都来了。 [123] 戴维·D.波特指挥着迫击炮舰队，无法参会，但写信告诫戴维·法拉格特，劝他不要绕过杰克逊堡和圣菲利普堡。他在信中说：“我们首先应该拿下杰克逊堡和圣菲利普堡，然后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克新奥尔良。如果我们炮轰杰克逊堡和圣菲利普堡，就可以将敌人甩在后面。”[124] 一些将领同意戴维·D.波特的观点。正如戴维·法拉格特向古斯塔夫斯·福克斯承诺的那样，他已经派迫击炮舰队炮轰杰克逊堡。但长达两天的炮轰并没有削弱杰克逊堡的兵力。因此，戴维·法拉格特启用了最初的计划。会议结束时，他下达了命令。“戴维·法拉格特听取了各位将领的意见后，认为无论做什么，都必须尽快完成……攻克杰克逊堡和圣菲利普堡。”[125] 随后，他以最快的速度实施了计划。会议结束后的当天晚上，戴维·法拉格特派出一支舰队，清除了通往杰克逊堡水域的障碍。“八艘舰船紧紧相连，稳稳停泊在河面上。”[126] 虽然一切并没有按原计划进行，但联邦舰队已经完全可以顺河而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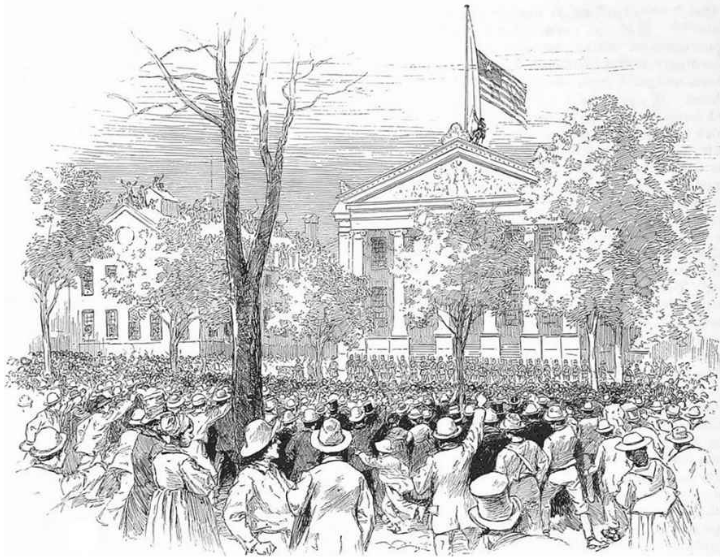


“哈特福德”号轰炸杰克逊堡

现在，戴维·法拉格特必须拿出所有的勇气和决心。戴维·D.波特指挥才能出众，他并不赞成戴维·法拉格特的计划。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下达给戴维·法拉格特的指令含糊不清。一旦战败，戴维·法拉格特就会被视为一个有勇无谋的将领，因为他面对强大的防御工事和敌人的战船炮艇，违背了海军的战略原则，在时速三英里半的水流中率舰队逆流而上。然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戴维·法拉格特防微杜渐，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朝着自己的目标大步迈进。1862年4月23日，他将一切安排妥当后，写道：“1862年4月23日下午，我视察了每艘舰船，以便了解各船将领是否理解我的命令，确认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我早已注意到各个将领的效率，他们完全理解自己接到的命令，非常期待开战，但也显得有些焦虑……1862年4月24日凌晨2时5分左右，出发的信号响起。”[127]“随后，水面上响起铁链的‘哐啷’声，海员将锚挂了起来。”[128]一个半小时后，所有船起航。准备出发前，为了助力此次行动，迫击炮舰队对杰克逊堡“发起了猛攻”。前行途中，联邦舰队攻击了杰克逊堡，但南方邦联军很快做出了回击。1862年4月25日，戴维·法拉格特写道：“穿过杰克逊堡和圣菲利普堡时，我见到了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情景。烟雾滚滚，只能看到时不时闪现的大炮和火攻船。”火攻船是巨大的平底船，甲板上松散地堆放着二十英尺长的木材，船上装满焦油和树脂，一百英尺高的火苗直冲云霄[129]。为了避开一艘火攻船，“哈特福德”号旗舰搁浅了。一艘拖船将火攻船推到了一边。“刹那间，‘哈特福德’号旗舰的左舷一侧烧

了起来，很快烧到了主桅和尾桅。”戴维·法拉格特以为失败已成定局[130]，感叹道：“上帝让一切都结束了！”[131]但消防部扑灭了大火。与此同时，“哈特福德”号旗舰避开了火攻船，来到圣菲利普堡的对面。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南方邦联的炮艇和两艘装甲舰加入了战斗，但大部分被摧毁了。戴维·法拉格特写道：“火势终于减弱了，硝烟逐渐散去。我们惊讶地看到，舰队已经到达杰克逊堡和圣菲利普堡的上游。”他对戴维·D.波特说：“我们经历了一场激战，但幸运的是，我军的伤亡人数非常少。”[132]

与此同时，在杰克逊堡和圣菲利普堡上游，戴维·法拉格特舰队的十三艘舰船会合，四艘失踪，一艘被击沉。戴维·法拉格特留下两艘炮艇保护部分远征军登陆，自己继续向新奥尔良前进。他在沿途看到了一些顺流而下的船，船上的棉花燃着熊熊大火及其他毁坏财产的迹象。一切证明，新奥尔良已经被恐惧笼罩。1862年4月25日上午，戴维·法拉格特到达距新奥尔良三英里的沙尔梅特炮台，发起了猛烈攻击。三十分钟后，炮声戛然而止。他发了一份电报说：“舰队已泊于新奥尔良港。”戴维·法拉格特攻克了新奥尔良。他写道：“堤坝上一片荒凉，舰船、轮船、棉花、煤炭等已经付之一炬。”[133]正如他预言的那样，穿过杰克逊堡和圣菲利普堡后，就可以迫使南方邦联军撤离新奥尔良并投降。此外，由于南方邦联军的通讯已经被切断，杰克逊堡和圣菲利普堡投降了。1862年4月29日，戴维·法拉格特发电报给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说：“我们的旗帜飘扬在杰克逊堡、圣菲利普堡和新奥尔良港口的上空。”[134]新奥尔良战役为本杰明·巴特勒将军的军队乘船抵达新奥尔良扫清了道路。1862年5月1日，戴维·法拉格特正式与本杰明·巴特勒将军交接了新奥尔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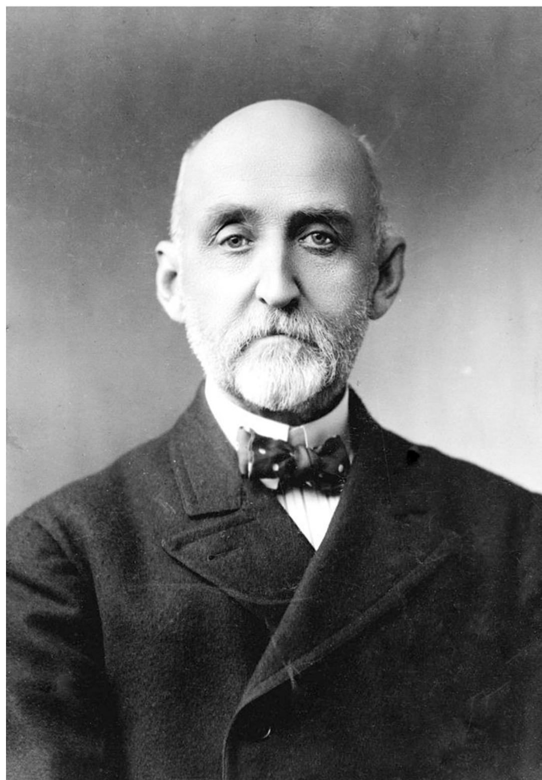


新奥尔良被攻克，邦联旗帜降下

取得胜利后，同事们的赞赏令戴维·法拉格特非常高兴。古斯塔夫斯·福克斯说：“我仔细研究了此次战役中的地理特征和防御工事，非常欣赏这一了不起的进攻。你一定会名垂青史。”[135] 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T.马汉说：“攻克新奥尔良，击破其防御工事……都是美国海军的本职……这场胜利是在精妙的指挥下，一支机动部队通过英勇作战，克服万难取得的。”[136] 南方邦联战争部长写道：“这是噩运的顶峰”[137] 。北方人不太公正地认为，新奥尔良战役的胜利并不及多纳尔森堡战役伟大。无论怎样，两场战役相同的一点是：每场胜利中都涌现出了一位能力出众、胆识过人的杰出指挥官，然后将一切付诸实践[138] 。如果将伤亡较小的原因考虑在内，与联邦陆军的胜利相比，联邦海军的胜利毫不逊色。但北方人依然态度冷淡，原因可能是看似极难完成的任务被轻易完成了。



本杰明·巴特勒（1818—1893）



阿尔弗雷德·T.马汉（1840—1914）

新奥尔良有十六万八千人，是南方最主要的商业港口之一，也是南方最大的城市之一及欧洲人心中重要的贸易点之一。北方联邦海军占领新奥尔良后，拿破仑三世动摇了，对南方邦联产生了质疑。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本来想联手拿破仑三世打破封锁，但现在暂时放弃了计划[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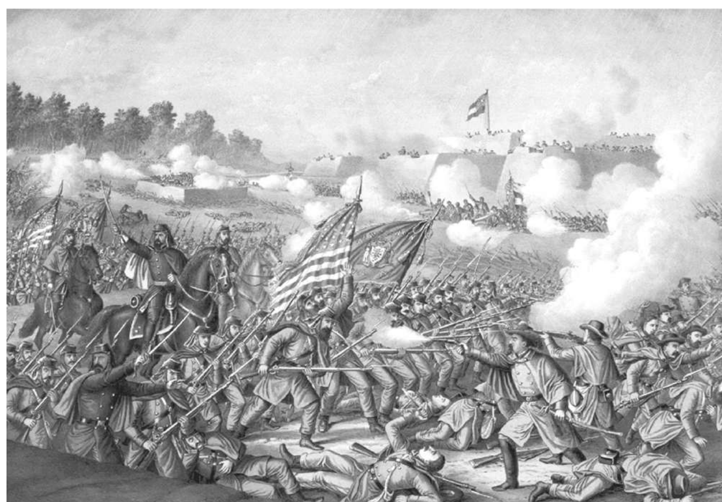
1862年4月7日，约翰·波普和安德鲁·H.富特攻下了密西西比河上的重要堡垒——十号岛屿。北方联邦军占领了科林斯，皮洛堡的南方邦联驻军被迫撤离。密西西比河下游的通道由此打开。1862年6月6日，在孟菲斯战役中，北方联邦炮舰击败了南方邦联炮舰，占领了孟菲斯[140]。此时，南方邦联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据点只剩下维克斯堡和哈德逊港。

第16节　乔治·B.麦克莱伦进军弗吉尼亚半岛

多纳尔森堡失陷后，里士满的军队士气低落。然而，乔治·B.麦克莱伦并没有抓住机会，利用南方邦联军低落的士气。此外，“梅里马克”号进一步阻碍了他的军事行动。为了确保“监视”号和其他战舰牵制“梅里马克”号，乔治·B.麦克莱伦实施了自己的计划，但与林肯产生了分歧。林肯希望直接派出陆军，但乔治·B.麦克莱伦建议通过水路前往门罗堡，继而向里士满进发，再到弗吉尼亚半岛上游。实际上，指挥官只有拿到决策权和指挥权才能实施自己的计划。于是，林肯做出了让步，但依然不放心将最高指挥权交给乔治·B.麦克莱伦。1862年3月11日，除了波托马克军的指挥权，林肯解除了乔治·B.麦克莱伦的所有军事指挥权，将军队整编为四个军团，亲自任命了军团指挥官。在守卫华盛顿的必要兵力问题上，林肯误解了乔治·B.麦克莱伦。为了确保华盛顿的安全，他扣留了欧文·麦克道尔三万五千人的军队 [141] 。林肯曾将一万波托马克军派给约翰·C.弗里蒙特。由于激进分子不断向林肯施压，约翰·C.弗里蒙特只能受命驻扎在谢南多厄河谷一带 [142] 。现在，很难找到解决波托马克军指挥问题的办法。目前，还没有能取代乔治·B.麦克莱伦的合适人选。乔治·B.麦克莱伦深受士兵们的爱戴和信任。此外，林肯依然坚信，乔治·B.麦克莱伦在战场上定能有所成就。

1862年4月，乔治·B.麦克莱伦率十万大军围攻约克镇。南方邦联军正在重整军队，加强里士满的防御工事。1862年4月6日，林肯发电报给乔治·B.麦克莱伦，说：“我认为你应该立刻攻破敌人的防线。” [143] 乔治·B.麦克莱伦对林肯的电报很不屑，写信给妻子说：“我很想回复道，他最好亲自来攻破敌人的防线。” [144] 1862年4月9日，林肯非常友好地写信给乔治·B.麦克莱伦说：“我必须再说一次，你应该出击了。对此我无能为力。” [145] 但林肯的建议和请求都没有发挥作用。1862年4月9日，约翰·海伊写信给约翰·尼古拉说：“除了南风，所有的风都带来了好消息……在约克镇，‘小拿破仑’乔治·B.麦克莱伦战战兢兢地坐在几个人面前，犹豫是开战还是逃跑。埃德温·斯坦顿对他非常失望。如果可以的话，他想撤下乔治·B.麦克莱伦。” [146] 约瑟夫·E.约翰斯顿在写给罗伯特·E.李的信中说：“只有乔治·B.麦克莱伦对进攻犹豫不决。” [147] 经过充分

考虑后，北方联邦的所有军事部门认为，北方联邦军人数是南方邦联军人数的三倍[148]。一个月前，乔治·B.麦克莱伦本来可以攻破约克河和詹姆斯河之间的防线，到达奇克哈默尼河，但他错过了时机。1862年4月17日，约克镇的南方邦联军已经有五万三千人，由约瑟夫·E.约翰斯顿亲自指挥。因此，北方联邦军只能通过严密围攻取胜。乔治·B.麦克莱伦是一位能干的工兵，设计了周全的围攻计划。1862年5月3日，约瑟夫·E.约翰斯顿撤离约克镇。随后，在威廉斯堡的一场战斗中，他的军队被北方联邦军队逼退，最终溃败。1862年5月21日，乔治·B.麦克莱伦来到距里士满七至十二英里的奇克哈默尼营地。与此同时，威廉·B.富兰克林率军从水路增援乔治·B.麦克莱伦。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对面，一支三万五千人至四万人的军队准备走陆路和乔治·B.麦克莱伦会合，助他一臂之力。



威廉斯堡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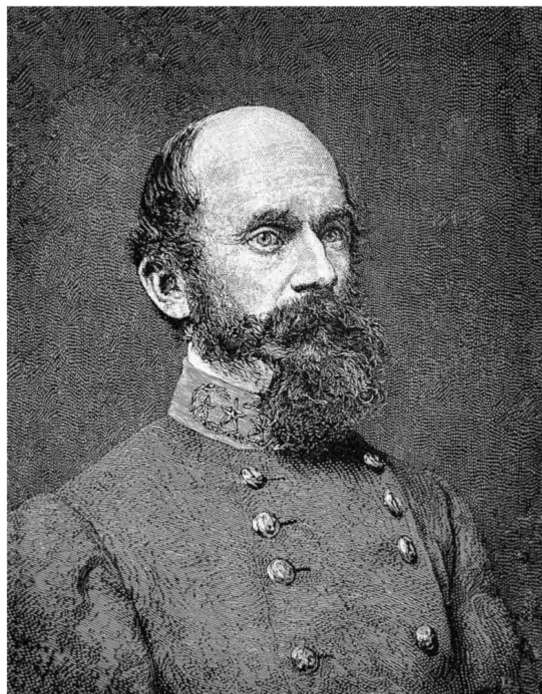
威廉·B.富兰克林（1823—1903）

不久前，“梅里马克”号被击毁。同时，“监视”号和其他战船向詹姆斯河进发。里士满人立即警觉起来，担心重蹈新奥尔良的覆辙，纷纷收拾行囊逃走了。邦联政府将档案打包后搬到了林奇堡和哥伦比亚。邦联内阁官员的家属也逃离了家园。杰斐逊·戴维斯将妻儿送到了罗利，打算独自面对考验，并在圣保罗教堂接受坚信礼[149]。在特定的一天，他进行了庄严祈祷。里士满检察官对他的行为深感痛心，批判他“站在角落里数珠子，祈祷奇迹发生，从而拯救国家。”乔治·B.麦克莱伦如果像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戴维·法拉格特一样，认识到速战速决的重要性，一定会配合联邦海军进攻里士满。他完全有机会攻克里士满。即使失败了，他的身后也有林肯。林肯曾写信命他发起进攻[150]。

第17节　托马斯·J.杰克逊

当乔治·B.麦克莱伦在里士满犹豫不决的时候，罗伯特·E.李 [151] 制定了一系列作战计划，由托马斯·J.杰克逊执行。其间，托马斯·J.杰克逊利用林肯对华盛顿的担忧，成功破坏了欧文·麦克道尔强化波托马克军的计划。1862年5月8日，托马斯·J.杰克逊击败了约翰·C.弗里蒙特的一支联邦小分队 [152] 。随后，他向里士满发了一份电报说："上帝保佑我们武装夺取胜利！"目前，除了打败约翰·C.弗里蒙特的军队，他还有更大的战役要打。与此同时，理查德·S.尤厄尔打算进攻谢南多厄河谷的纳撒尼尔·P.班克斯。为了配合他，托马斯·J.杰克逊折返了回去。与理查德·S.尤厄尔会合后，托马斯·J.杰克逊的军队人数是一万七千人。

托马斯·J.杰克逊常读的两本书是《圣经》和《拿破仑战争箴言集》 [153] 。从这两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性格特征。他逐字逐句地解读《圣经》，遵循书中的圣训，时刻心系宗教，非常虔诚。此外，他常为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事祈求上帝的指引。但面对作战策略，他并未向约书亚 [154] 求助，而是求助于拿破仑。他一遍遍读着《拿破仑战争箴言集》中的箴言，深受启发 [155] 。谢南多厄战役中，他的学习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谢南多厄战役完全是"拿破仑"式的。托马斯·J.杰克逊军队的口号是"速度与保密"。他常在二十四小时内，率军急行三十英里。他的步兵被称为"托马斯·J.杰克逊的步行骑兵"。显然，只要他不觉得疲劳，就认为其他人应该和自己一样有耐力。"经过一次彻夜行军和艰苦作战后，他对军官们说：'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此外，他将骑兵改编成了步枪骑兵。他的作战格言是"迷惑、误导、突袭"，作战方式是"在敌人最不希望遭到攻击的地方发起猛攻" [156] 。



理查德·S.尤厄尔（1817—1872）



纳撒尼尔·P.班克斯（1816—1894）

1862年5月23日，在弗兰特罗亚尔，托马斯·J.杰克逊突袭了纳撒尼尔·P.班克斯军队的一个分队，占领了弗兰特罗亚尔的大部分地区。当时，纳撒尼尔·P.班克斯在斯特拉斯堡，拥兵六千八百人。1862年5月24日，纳撒尼尔·P.班克斯担心后路被敌人切断，于是决定与托马斯·J.杰克逊同时赶往温彻斯特。追兵紧随其后，后卫部队奋力作战。纳撒尼尔·P.班克斯赶在托马斯·J.杰克逊之前到达了温彻斯特。然而，通过两天的作战，托马斯·J.杰克逊战果颇丰。华盛顿的陆军部收到一封接一封的战区急报。众人非常担忧。巴尔的摩的援兵立即前去支援纳撒尼尔·P.班克斯，哈珀渡口也派出了一部分援兵。

1862年5月24日前，北方联邦军的部署存在一定缺陷，主要是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的命令导致的。现在，林肯试图调整作战策略，命令约翰·C.弗里蒙特进军谢南多厄河谷，绕到托马斯·J.杰克逊后方。与此同时，他命欧文·麦克道尔与乔治·B.麦克莱伦暂缓联合计划，要求欧文·麦克道尔派两万人前往谢南多厄河谷，支援约翰·C.弗里蒙特。林肯暗示欧文·

麦克道尔，如果约翰·C.弗里蒙特的军队没有及时赶到，他的兵力必须独当一面，完成作战计划。

1862年5月25日黎明时分，在温彻斯特，托马斯·J.杰克逊打败了纳撒尼尔·P.班克斯，乘胜追击“溃散的逃兵”。纳撒尼尔·P.班克斯的军队差一点全军覆没。最后，北方联邦军被逼到了波托马克河对岸。纳撒尼尔·P.班克斯写道：“1862年5月26日正午，我们站在对岸，每一个人都心存感恩。”[157]



托马斯·J.杰克逊（1824—1863）与他的军队

1862年5月25日，送到华盛顿的信件震惊了林肯和陆军部。1862年5月24日，北方联邦军的主要目标是俘获托马斯·J.杰克逊的军队。但现在，华盛顿已经岌岌可危。埃德温·斯坦顿向几位北方州长发了急件，说：“各方情报明确表明，敌人的大军正在向华盛顿进发。请您组织所在州的所有民兵和志愿兵，立即出发。”这封急件及州长们的回复体现了华

盛顿的恐慌。整个北方被恐慌情绪笼罩。后来，马萨诸塞州称这次战役为“极大的恐慌”，其他地方称其为“大溃败”。北方州的许多民兵和志愿兵集结起来，包括纽约州第七军团的一些兵团，立即赶往巴尔的摩和哈珀渡口。此次行动被称为“北方的第三次崛起”。林肯对全国所有铁路拥有军事控制权。他在写给乔治·B.麦克莱伦的一封信中说：“我认为形势非常紧急。为了保卫华盛顿，你要么进攻里士满，要么辞职。”欧文·麦克道尔的一部分军队被召回华盛顿。埃德温·斯坦顿写道：“我们面临的情势十分危机。我们无法为波托马克军提供军需，南方邦联军就在眼前。” [158]

在1862年5月26日前，林肯和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认为华盛顿是安全的。事实上，华盛顿从未陷入险境。罗伯特·E.李和托马斯·J.杰克逊的真实意图是造成华盛顿的恐慌，让林肯暂缓增援乔治·B.麦克莱伦。结果，华盛顿当局的表现完全符合他们的期望。但现在，托马斯·J.杰克逊面临危险。北方联邦军试图围攻他。听到消息后，他于1862年5月30日迅速撤退，并写道：“仁慈的上帝保佑，联邦军队在我军后方集结前，我已经越过斯特拉斯堡。”1862年6月1日，托马斯·J.杰克逊的安全得到了切实保障。北方联邦军紧追其后。两次交战均已托马斯·J.杰克逊的获胜结束。此后，北方联邦军不再追击 [159] 。

陆军中校乔治·F.R.亨德森写道：“托马斯·J.杰克逊如同从天而降一般，出现在北方联邦军面前，震惊了敌人。他同时对北方联邦军的左翼和右翼发起了进攻，导致北方联邦军无法联合。他击败了每一个从他面前经过的联邦小分队。” [160] 托马斯·J.杰克逊率领一万七千人，一个月内赢得了五场战役，缴获了大量战利品，俘获了许多俘虏，造成了华盛顿的恐慌。在里士满，他阻止了四万人与北方联邦军会合 [161] 。

乔治·B.麦克莱伦逐渐意识到，托马斯·J.杰克逊在谢南多厄河谷大肆洗劫时，自己应该抓住机会进攻约瑟夫·E.约翰斯顿。1862年5月25日，他向林肯致电：“时机已经成熟，我将进攻里士满。”他的军队有十万人，约瑟夫·E.约翰斯顿有六万三千人。然而，乔治·B.麦克莱伦是否会主动出击值得怀疑。他总是觉得没有“准备妥当”，高估了南方邦联军的力量，却低估了南方邦联指挥官的能力。1862年5月27日，他在电报中说：“邦联政府敦促约瑟夫·E.约翰斯顿发动攻击。但目前，南方邦联军

的炮艇离我们很远。我认为约瑟夫·E.约翰斯顿很可能发起进攻。”[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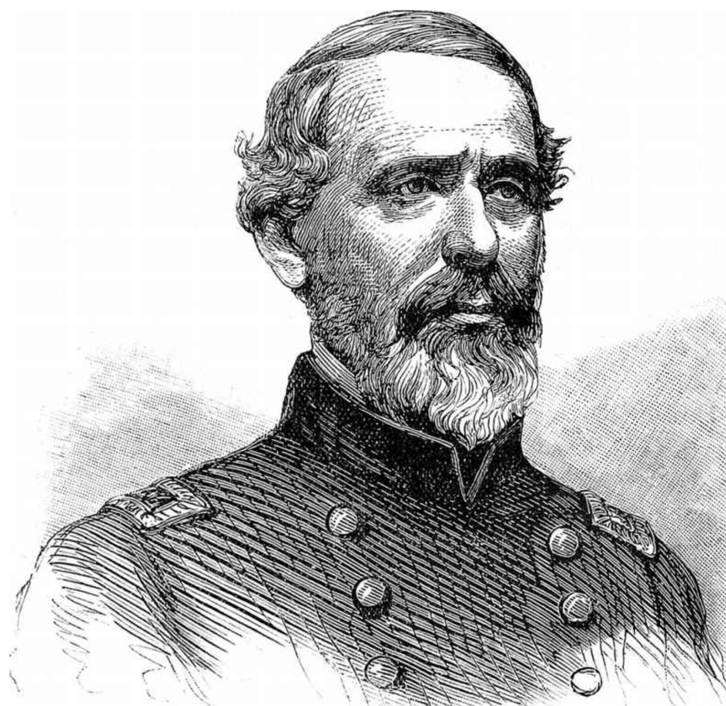
第18节　费尔奥克斯战役

约瑟夫·E.约翰斯顿对北方联邦军的位置、动向和人数了如指掌，知道乔治·B.麦克莱伦在奇克哈默尼河北岸有三个军团，在里士满一侧有两个军团，也知道支援欧文·麦克道尔的波托马克军不会来了。因此，他决定在1862年5月31日进攻离里士满最近的两个北方联邦军团。1862年5月30日夜晚，忽然下起了大雨，奇克哈默尼河水位高涨，河两岸的北方联邦军队处境艰险。虽然道路泥泞，很难搬运大炮。但约瑟夫·E.约翰斯顿依然想发动进攻。1862年5月31日正午过后，约瑟夫·E.约翰斯顿向北方联邦军发起了猛烈攻击。北方联邦军节节败退，几近惨败[163]。此时埃德温·V.萨姆纳挽救了危局。他接到乔治·B.麦克莱伦的命令后，立即做好了增援准备。他比乔治·B.麦克莱伦更了解危险所在。因此，接到命令后，他即刻率军前往奇克哈默尼河上的两座桥，在那里焦急等待渡河的命令。终于，乔治·B.麦克莱伦下达了渡河令。埃德温·V.萨姆纳率军走过摇曳的桥梁，使北方联邦军的左翼免遭溃败。战斗即将结束时，约瑟夫·E.约翰斯顿被一枚炮弹碎片击中坠马，身受重伤，昏厥在战场上。南方邦联军损失惨重。

1862年6月1日，战斗再次打响。北方联邦军击退了南方邦联军。一部分北方联邦军左翼部队继续前进，抵达距里士满四英里处。但他们并没有收到继续前进的指令，因此，退至战斗前占领的阵地。经过两天战斗，约瑟夫·E.约翰斯顿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最终还是失败了[164]。

近一个月来，北方联邦军静静驻扎在奇克哈默尼营地，养精蓄锐。北方联邦军的警戒线位于营地六英里范围内。守卫梅卡尼克斯维尔桥的哨兵站在岗哨上报告道：“距里士满四英里。北方联邦军可以看到里士满的建筑物，听到教堂里的钟声，甚至可以听到时钟报时。”南方邦联军的前哨在北方联邦军的步枪射程范围内。里士满人可以看到敌营的火光，听到敌人的军号声[165]。大雨滂沱，奇克哈默尼河洪水泛滥，搬运大炮变得更加困难。北方联邦营地成为一片沼泽，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瘴气，滋生了很多疾病。喝了沼泽水的士兵们逐渐病倒，病菌迅速蔓延。因此，1862年6月1日到1862年6月20日，北方联邦军的士气明显下降。乔治·B.麦克莱伦请求增援。一支两万一千人军队通过水路前来增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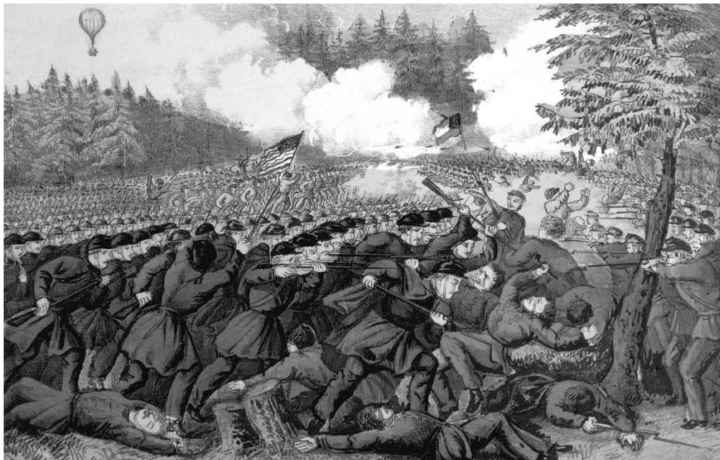
1862年6月中旬，天气晴朗，路面干燥。正如乔治·B.麦克莱伦经常承诺的那样，是时候发起进攻了。他留下一个军团驻守营地，率军抵达奇克哈默尼的南侧，试图炮轰里士满。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写道：“乔治·B.麦克莱伦围攻里士满的计划非常明智。如果南方邦联军实施原来的计划，可能有机会获得胜利。”[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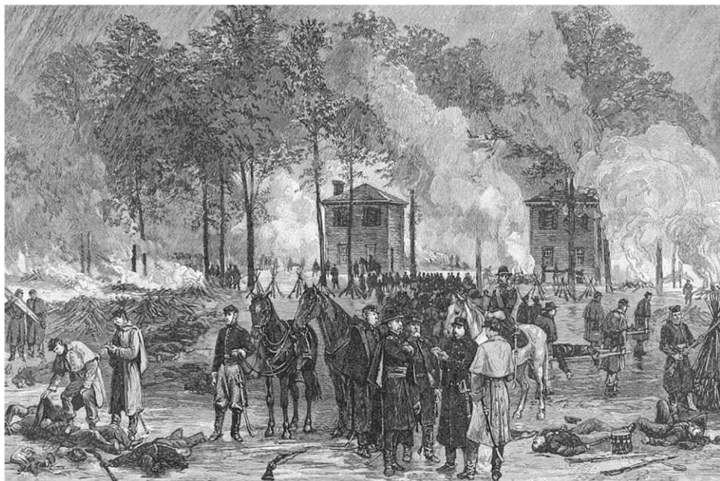
埃德温·V.萨姆纳（1797—1863）



费尔奥克斯前线联邦军官合影，从左至右分别为罗伯特·克拉克中尉、约翰·C.蒂德博尔上尉、威廉·N.丹尼森中尉、亚历山大·彭宁顿上尉



费尔奥克斯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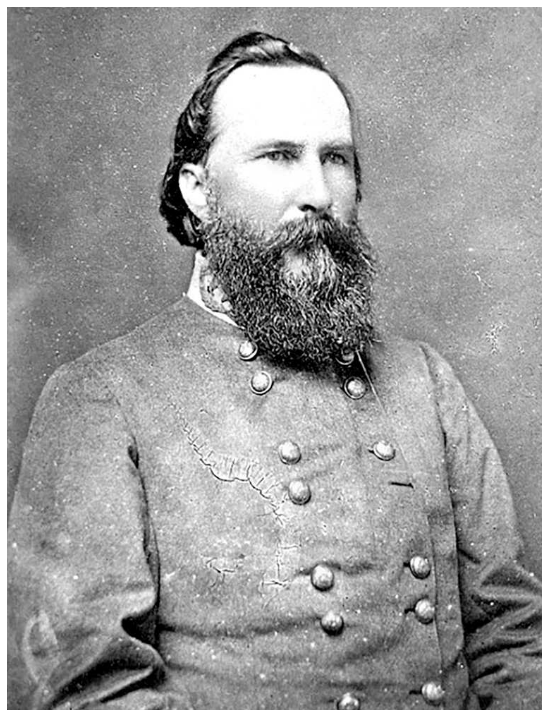


联邦军掩埋阵亡者并焚烧马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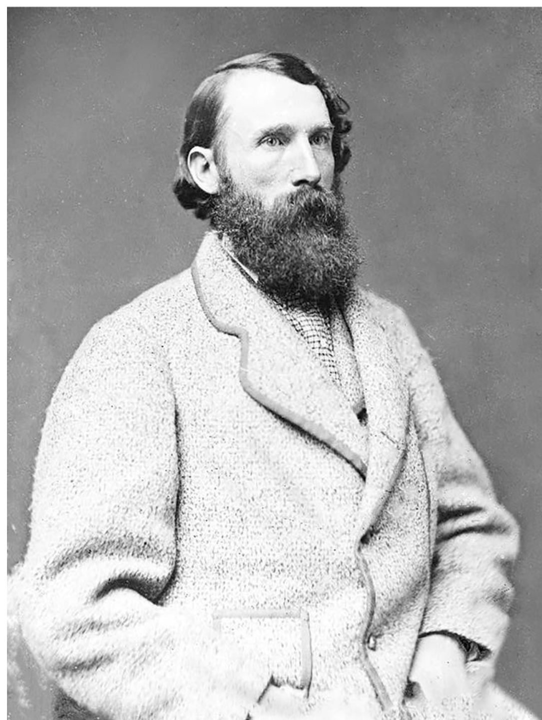
第19节　罗伯特·E.李

约瑟夫·E.约翰斯顿是一位能力出众的指挥官。由于约瑟夫·E.约翰斯顿受伤，北弗吉尼亚州军队由罗伯特·E.李指挥。但在战争中，罗伯特·E.李立刻显示出了优秀的领导天赋，一点儿也不恃才傲物。他待人友善，与杰斐逊·戴维斯和托马斯·J.杰克逊关系亲密。约瑟夫·E.约翰斯顿曾与杰斐逊·戴维斯发生争执，在来往书信中常常意见不一。但罗伯特·E.李像林肯一样，对同事宽容尊重，没有人愿意与他争吵。托马斯·J.杰克逊一直渴望得到援兵。当他听说罗伯特·E.李的任命后，对一位朋友说："看吧，女士，我终于有援兵了。"

罗伯特·E.李的组织才能与乔治·B.麦克莱伦不相上下。阅读内战时期的军令、信函和军队沿革时，会发现他为军务管理注入了新的活力。仔细研究了军情后，罗伯特·E.李指出，必须立刻加强里士满的防御工事。南方士兵非常讨厌体力劳动。在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时，他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他一直亲自监工，鼓励士兵们，最终创造了奇迹。很快，他做好了防御准备。与此同时，他每天都会骑马巡视营地，与军官们越来越熟，赢得了他们的尊重。他认为攻击乔治·B.麦克莱伦的左翼军"虽然可行，但并不明智"。用杰斐逊·戴维斯的话说，就是"让我们的士兵用胸膛对抗敌人的战壕"。此外，罗伯特·E.李根据骑兵获取的信息和自己侦察到的北方联邦军情况，试图在河北岸袭击北方联邦军。他派兵增援了驻扎在谢南多厄河谷的托马斯·J.杰克逊，要求他返回里士满参加袭击。托马斯·J.杰克逊命军队迅速隐蔽前行，自己与军队分离，疾速前往里士满。1862年6月23日正午，在达布斯豪斯召开的会议上，罗伯特·E.李见到了托马斯·J.杰克逊、詹姆斯·朗斯特里特、丹尼尔·H.希尔和安布罗斯·P.希尔[167]。罗伯特·E.李阐释了自己的作战计划，给每个将领分配了相应的任务。托马斯·J.杰克逊准备于1862年6月26日上午发起进攻。



詹姆斯·朗斯特里特（1821—1904）



安布罗斯·P.希尔（1821—1904）

第20节　盖恩斯磨坊战役

菲茨·约翰·波特是北方联邦第五兵团[168]的指挥官，坚守在奇克哈默尼河北岸的联邦右翼阵地，负责保护与华盛顿的通信线路。罗伯特·E.李偷袭了菲茨·约翰·波特，破坏了部分通信线路。

托马斯·J.杰克逊遇到了一些麻烦，延误了战事。1862年6月26日下午，安布罗斯·P.希尔焦急地等待着托马斯·J.杰克逊的进攻，一直等到了1862年6月26日下午3时。他担心耽误作战计划，于是直接渡河来到了菲茨·约翰·波特的阵前，发动了攻击。南方邦联军损失惨重，溃不成军[169]。

1862年6月26日傍晚，乔治·B.麦克莱伦去了菲茨·约翰·波特的司令部。战斗仍在继续。乔治·B.麦克莱伦和菲茨·约翰·波特知道，此次袭击由罗伯特·E.李直接指挥，托马斯·J.杰克逊也在附近。托马斯·J.杰克逊很可能会与其他军队联合，发起进攻。一回到河南岸的司令部，乔治·B.麦克莱伦就做出判断，认为菲茨·约翰·波特的阵地守不住了。他命菲茨·约翰·波特撤到盖恩斯磨坊以东的阵地，保护横跨奇克哈默尼河的桥梁。这些桥梁连接了北方联邦军的左翼和右翼。一旦被迫撤退，桥是必不可少的。1862年6月27日凌晨2时左右，菲茨·约翰·波特接到了乔治·B.麦克莱伦的命令。天亮时，他开始行动，率军井然有序地前往指定地点。工兵将领约翰·G.巴纳德指引菲茨·约翰·波特来到了新阵地。菲茨·约翰·波特托约翰·G.巴纳德带话给乔治·B.麦克莱伦，说他需要增援部队。事实上，虽然他的请求至关重要，但乔治·B.麦克莱伦从未收到该请求。1862年6月27日早上约9时或10时左右，约翰·G.巴纳德到达乔治·B.麦克莱伦的司令部，“得知他正在休息”，便回去了[170]。一场大战即将开始。大部分北方联邦将军兴奋不已，但乔治·B.麦克莱伦显得很平静。然而，由于约翰·G.巴纳德还有其他要事要做，便没有再次转述菲茨·约翰·波特的请求。南方邦联军方面，托马斯·J.杰克逊既没有休息也没有睡觉，一直在回顾自己的准备工作，“焦急地在房间里踱步，虔诚祈祷上帝”的保佑[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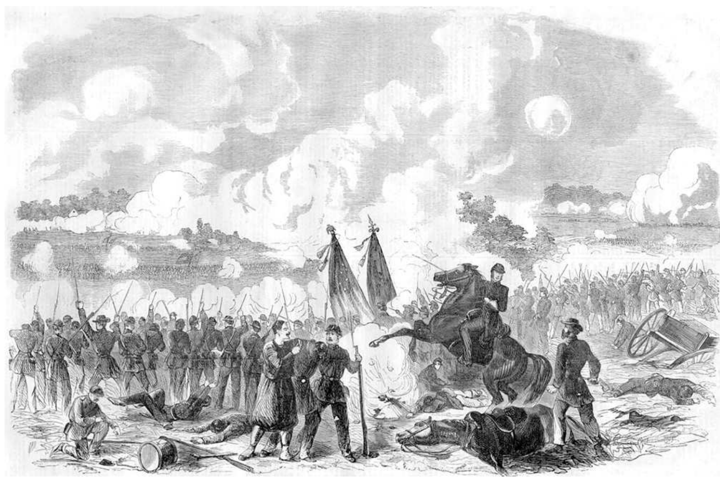
菲茨·约翰·波特（1822—19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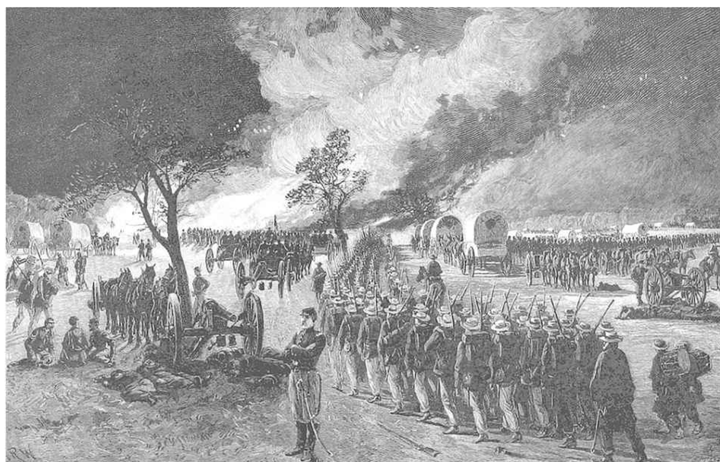
约翰·G.巴纳德（1815—1882）

1862年6月27日，盖恩斯磨坊战役[172]爆发。战斗打响时，菲茨·约翰·波特以两万五千人军力，对抗托马斯·J.杰克逊、詹姆斯·朗斯特里特、丹尼尔·H.希尔和安布罗斯·P.希尔联合部军队的五万七千人[173]。随后，罗伯特·E.李接到了命令。在第一次进攻中，南方邦联军遭到了北方联邦军的顽强抵抗，退了下来。1862年6月27日下午2时，菲茨·约翰·波特请求增援。但当时，乔治·B.麦克莱伦并不在战场上，而在奇克哈默尼河南岸的司令部。他派九千人增援菲茨·约翰·波特。菲茨·约翰·波特如同“游行时一样镇定”[174]，甚至在战火最激烈的时候，他的战术依然没有缺陷。他一直激励将领和战士们竭尽全力，成功击退了兵力是自己两倍的南方邦联军。在报告中，罗伯特·E.李和托马斯·J.杰克逊高度赞扬了菲茨·约翰·波特。罗伯特·E.李写道：“北方联邦军的主力在奇克哈默尼河北岸。”他和托马斯·J.杰克逊都提到了“对方的军力更胜一筹”[175]。关于两军战士的纪律和勇气，相关记录都是一致的。南方邦联军出击迅猛。托马斯·J.杰克逊描述说，自己的一个兵团“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胆量和勇气”。他将南方邦联军的防守描述为“负隅顽抗”和“困兽犹斗”。在盖

恩斯磨坊战役中，乔治·米德和约翰·F.雷诺兹的表现也十分出色。



盖恩斯磨坊战役



盖恩斯磨坊战役后，联邦军撤退

罗伯特·E.李声明：“北方联邦军的主力在奇克哈默尼河的北岸。”由此可以推断出，如果他是乔治·B.麦克莱伦，一定会发动进攻。乔治·B.麦克莱伦高估了南方邦联军的军力。根据情报机构负责人艾伦·平克顿[176]的报告，乔治·B.麦克莱伦认为，南方邦联军共有十八万人，其中七万人正在进攻菲茨·约翰·波特，其余十一万人潜伏在里士满的战壕里。事实上，进攻菲茨·约翰·波特的南方邦联军有五万七千人，潜伏在里士满战壕里的兵力只有三万人。潜伏在战壕里的南方邦联军不时袭击北方联邦军

的前哨，向北方联邦军的兵工厂频频开火。因此，乔治·B.麦克莱伦和各兵团指挥官高估了南方邦联军的人数。派兵支援菲茨·约翰·波特时，乔治·B.麦克莱伦显得犹豫不决，战术过于谨慎。他非常赏识菲茨·约翰·波特，对菲茨·约翰·波特取得的胜利欣喜若狂。从他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非常渴望全力支援菲茨·约翰·波特。此外，从军事角度考虑，他也应该派军支援菲茨·约翰·波特。1862年6月27日夜晚，乔治·B.麦克莱伦给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发了一份电报，说他“在奇克哈默尼河靠近里士满的一侧，四面受敌，南方邦联军人数很多。”[177] 这封电报记录了他对南方邦联军军力的误判。



约翰·F.雷诺兹（1820—1863）



艾伦·平克顿（1819—1884）

即使将领用兵如神，战士们骁勇善战，也无法在没有战壕，仅依赖一些障碍物的情况下，以三万四千人的军力战胜五万七千名南方邦联军，更何况南方邦联军将领指挥英明，战士们同样骁勇善战。1862年6月27日傍晚7时左右，战斗结束。罗伯特·E.李和托马斯·J.杰克逊发起了总攻。南方邦联军冲破北方联邦军的防线，缴获了许多大炮，将菲茨·约翰·波特的军队击退到了奇克哈默尼河岸边的树林里。埃德温·V.萨姆纳的两个旅被派去支援菲茨·约翰·波特，但由于去得太晚，只能掩护疲惫不堪的队伍撤退。北方联邦军沮丧地退到了奇克哈默尼河南岸。

第21节　乔治·B.麦克莱伦丧失斗志

盖恩斯磨坊战役期间的信件中，乔治·B.麦克莱伦并没有表露出恐慌。1862年6月27日下午5时，他猜想菲茨·约翰·波特可能会坚持到天黑。三个小时后，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了。1862年6月27日午夜，乔治·B.麦克莱伦已经丧失斗志。在他写给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关于萨维奇车站战役的信件中，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他写道：“现在，我了解了1862年6月27日发生的所有事。在奇克哈默尼河右岸，我们多次击退了南方邦联军的猛烈进攻。在奇克哈默尼河左岸，我们的士兵竭尽全力，奋勇作战。虽然我启用了后备军，但南方邦联军优势明显，我们被击败了。双方都损失惨重……我们的残余军队依旧有战斗力……因为我们的兵力太薄弱，所以打了败仗……今晚我太认真了。我亲眼看见了很多流血牺牲的战友，感觉联邦政府不会再支援这支军队了。现在，如果没有您的支援，我们必输无疑。如果我能与军队共渡难关，一定会直率地告诉您，我不会感谢您或华盛顿的任何人，因为你们已经打算牺牲我的军队了。”

对林肯来说，乔治·B.麦克莱伦战败的消息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花费了大量财力和人力武装军队，非常希望取胜，时刻关注着战况，似乎联邦的命运就在乔治·B.麦克莱伦指挥的军队肩上。现在，北方联邦军大败，即将溃散或被俘虏。林肯必须直面不幸，但他并未做到。他忽视了乔治·B.麦克莱伦信中的反抗精神。因此，他写给乔治·B.麦克莱伦的回信明智而和善。林肯慎重谨慎，为此次战败做了最仁慈的解释。他写道：“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保护您的军队。我们会尽快派出援兵……我与您和战士们感同身受。如果这场战役战平或战败了，就是我们为了保护华盛顿付出的代价。我们守住了华盛顿，南方邦联军却集中火力进攻您。如果我们放弃了华盛顿，南方邦联军可能会在攻击你们前，先进攻我们……这是这场战役的本质，您或联邦政府不应该受到责备。”[178]

第22节　罗伯特·E.李和乔治·B.麦克莱伦

随着盖恩斯磨坊战役的结束，波托马克军的进攻态势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们的质疑。作家们几乎都认为，乔治·B.麦克莱伦应该积极增援菲茨·约翰·波特。当时，菲茨·约翰·波特独自率兵抵抗南方邦联军，直到晚上才有机会撤退，甚至有希望赢得胜利。乔治·B.麦克莱伦如果知道罗伯特·E.李的作战计划，清楚南方邦联军的军力其实是分散的，一定会按照军事评论家们的建议行事。然而，毫无疑问，乔治·B.麦克莱伦不应该根据掌握到的信息做出判断。罗伯特·E.李对北方联邦军的信息了如指掌。但乔治·B.麦克莱伦不可能像罗伯特·E.李一样，获得南方邦联军的准确信息，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曾写道："我如果只记得自己的荣耀，就会选择在自己的国家开战，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间谍，我可以获悉敌军的一举一动。"[179] 罗伯特·E.李的优势之一是间谍众多，但除此之外，他十分了解乔治·B.麦克莱伦。只有在应对一位胆怯的指挥官时，罗伯特·E.李才会分散兵力。在部署盖恩斯磨坊战役时，杰斐逊·戴维斯说："如我所料……乔治·B.麦克莱伦如果发现我们的大部分军队在奇克哈默尼河北岸时，一定不会停下来一决胜负，他会立即前往里士满。"罗伯特·E.李回答道："如果您能将他拖在战壕附近，在他后退回到独立防御工事中时，我会在他到达那里之前跟上来。"[180] 毫无疑问，罗伯特·E.李一定会按自己说的那样作战，但乔治·B.麦克莱伦既没有适时地增援菲茨·约翰·波特，也没有勇敢地向里士满进军。战役当天，乔治·B.麦克莱伦与河南岸的将领们之间的通信表明，里士满的守卫部队不断佯动，使北方联邦军失去了进攻的勇气。一些作家认为，当菲茨·约翰·波特与人数较多的南方邦联军交战的时候，乔治·B.麦克莱伦本来可以轻易进入里士满。但与此同时，罗伯特·E.李的兵力与乔治·B.麦克莱伦的兵力对等[181]，因此，进军里士满并不是毫无风险。增援菲茨·约翰·波特无疑是明智的。此外，正如林肯预料到的那样，北弗吉尼亚州军的伤亡和攻克里士满都起到了进攻作用。

第23节　罗伯特·E.李和托马斯·J.杰克逊

没有必要猜测南方邦联军获胜的原因。南方邦联军的胜利应该归因于罗伯特·E.李和托马斯·J.杰克逊出色的指挥才能。陆军中校乔治·F.R.亨德森对托马斯·J.杰克逊的山谷战役非常感兴趣，他写道："与北方联邦的二十万大军相比，罗伯特·E.李和托马斯·J.杰克逊为南方邦联做出的贡献更多。" [182] 虽然没有必要逐字解读这句话，但真相不言自明。无论是策略还是战术方面，罗伯特·E.李和托马斯·J.杰克逊都胜过对手。乔治·B.麦克莱伦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但并不缺乏勇气。侦察南方邦联军情况时，他能在炮火中保持冷静。然而，他无法忍受血腥场景。陆军中校乔治·F.R.亨德森写道："托马斯·J.杰克逊在前线镇静前行，无惧枪林弹雨。" [183] 罗伯特·E.李热衷战斗，并渴望参与其中。他的儿子、杰斐逊·戴维斯总统及其他朋友都反对他涉险。有一次，他正准备冲锋陷阵，但他的属下强烈要求道："将军，请您到后方去！"他曾说："幸好战争过于恐怖，不然我们会喜欢上战争。" [184]

罗伯特·E.李和托马斯·J.杰克逊与乔治·B.麦克莱伦的军力并不相当，因此，乔治·B.麦克莱伦落了下风。乔治·B.麦克莱伦和林肯的朋友产生了争执，争论乔治·B.麦克莱伦命令军队撤退和所谓的失败及增援等问题。但我们只需要看清楚乔治·B.麦克莱伦提出的一点。因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决策不当，北方联邦军的迎战军力并不充足。由于受到连连胜利的鼓舞，1862年4月3日，乔治·B.麦克莱伦不再招募新兵。但当时，招募新兵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也不需要调查志愿兵的动机 [185] 。然而，无论派给乔治·B.麦克莱伦多少军队，他都无法指挥士兵们打败罗伯特·E.李和托马斯·J.杰克逊。可以肯定的是，与乔治·B.麦克莱伦一样，林肯和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都热切地渴望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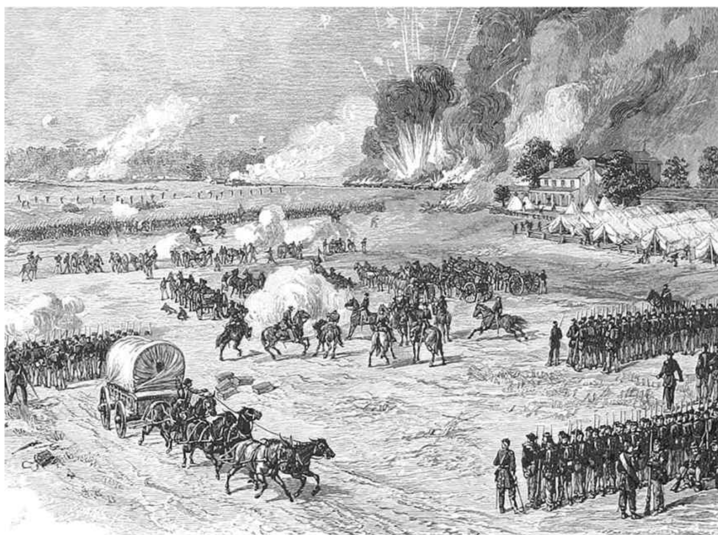
乔治·B.麦克莱伦虽然未能率领十万人发动进攻，但部署了一次成功的撤退。 [186] 他执行了林肯"保护你的军队"的命令。一个小人物可能做不到这一点。罗伯特·E.李希望俘获或消灭北方联邦军，却没有早早预料到乔治·B.麦克莱伦的计划，未能阻止北方联邦军撤退。他坚信乔治·B.麦克莱伦会撤到弗吉尼亚半岛，但乔治·B.麦克莱伦将营地转移到了詹姆斯河。乔治·B.麦克莱伦与白宫的通信一旦被切断，罗伯特·E.李就会一举歼

灭北方联邦军。在盖恩斯磨坊战役中，罗伯特·E.李向各军团指挥官下达了指令。1862年6月28日，指挥官们开始准备，一整天都没有休息。罗伯特·E.李军队的日常军需包括六百吨弹药、粮食、草料、药品和其他物资 [187] 。兵力相当的南方邦联军就在眼前，转移营地非常困难。如果联邦政府没有封锁海域，乔治·B.麦克莱伦根本无法转移营地。1862年6月29日太阳升起时，南方邦联军发现北方联邦军已经逃向詹姆斯河，于是立即开始追击，并在萨维奇车站发动了一次攻击，但被击退了。1862年6月30日，在格兰岱尔或费拉泽农场发生了一场鏖战 [188] 。双方势均力敌。战后，北方联邦军继续有条不紊地撤退。一些人认为，如果托马斯·J.杰克逊及时出现，乔治·B.麦克莱伦的一部分军队定会被消灭或被俘虏 [18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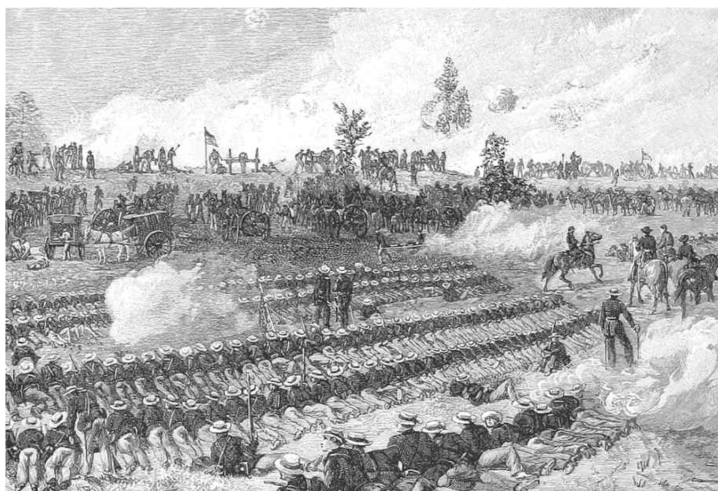
第24节　七日之战

1862年7月1日早晨，北方联邦军驻扎在詹姆斯河附近的莫尔文高地。1862年7月1日正午，南方邦联军发起了进攻，但被北方联邦军猛烈的炮火和指挥得当的步兵击退了。菲茨·约翰·波特也参战了，而且表现出色。南方邦联军被全面击退，其损失是北方联邦军的两倍。在撤退过程中，乔治·B.麦克莱伦始终没有和作战部队一起参战，但一直在为接下来的战事做准备。在1862年6月25日至1862年7月1日的七日之战中，乔治·B.麦克莱伦折兵一万五千八百四十九人，罗伯特·E.李折兵两万零六百一十四人[190]。虽然损失较大，但罗伯特·E.李一直在进攻，并将北方联邦军赶出了里士满，最终赢得了胜利了。通过七日之战，罗伯特·E.李赢得了士兵们的爱戴。战士们相信他可以战无不胜，并将这种信念延续到了内战结束。

莫尔文山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即1862年7月2日，乔治·B.麦克莱伦率军退到了詹姆斯河的一个安全地带——哈里森栈桥。在哈里森栈桥，他可以得到炮舰的协助。此外，海军保证了他与华盛顿的通讯。与此同时，里士满高耸的建筑物已经变得模糊。弗吉尼亚半岛战役已成败局。1862年初，乔治·米德私下写信给朋友说：“乔治·B.麦克莱伦总是要等到万事俱备时才发起进攻，但在他将一切安排妥当前，南方邦联军已经发起了突袭。因此，他的一切计划都落空了……这样的将军可以逃过灾难，但永远不会获胜。”[191]



萨维奇车站之战



格兰岱尔之战



莫尔文山战役



七日之战中的联邦军

1862年7月8日，罗伯特·E.李回到里士满附近的营地，写信给妻子说："我们的胜利并没有想象中的伟大或彻底，但上帝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192] 尽管如此，这场胜利依然点燃了南方人的希望。南方人深受鼓舞，热情高涨。邦联政府的紧急征兵工作有了保障。

[1] 《林肯个人特质》，第178页，海伦·尼古拉著。——原注

[2] 《美国史》，第3卷，第574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3] "一些收到西蒙·卡梅伦报告的报纸登载了部分被删除的内容。马萨诸塞州代表托马斯·D.艾略特在《国会议事录》上记录了被删除的内容。"《莱曼·特朗布尔传》，第172页，贺拉斯·怀特著。——原注

[4]　1814年，埃德温·斯坦顿出生在俄亥俄州。他曾是俄亥俄州东部的执业律师。1847年，他搬到了匹兹堡，1856年又搬到了华盛顿。詹姆斯·布坎南执政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任司法部长一职。人们普遍认为，埃德温·斯坦顿强化了詹姆斯·布坎南反对分裂的立场。——编者注

[5]　《美国史》，第3卷，第5卷，第179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林肯传》，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萨蒙·P.蔡斯传》，罗伯特·沃登著。《约翰·默里·福布斯书信回忆录》，第1卷，萨拉·F.休斯著。《回忆录》（*Memories*），M.B.菲尔德著。《埃德温·斯坦顿传》（*Life of Edwin M. Stanton*），第1卷，乔治·G.戈勒姆著。《莱曼·特朗布尔传》，第172页，贺拉斯·怀特著。《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127页。——原注。埃德温·斯坦顿是美国内战时期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有人将他描绘成一个邪恶的天才，认为他参与了各种邪恶活动。此外，也有人认为他是北方联邦军的核心人物，为林肯承担了许多重责。——编者注

[6]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121页。《个人回忆录》，第1卷，第288页，尤利西斯·S.格兰特著。——编者注

[7] 安德鲁·H.富特的报告。《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123页。——原注

[8]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124页。——原注

[9] 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报告。《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159页。——原注。南方邦联军的防线很长，从密西西比河附近的哥伦布开始，经过鲍灵格林，直通坎伯兰山口，但很脆弱。1862年1月19日，在米尔斯普林斯战役、比奇格罗夫战役和萨默塞特战役中，北方联邦军成功突破了南方邦联军的防线。多纳尔森堡战役打响时，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率一支不足一万四千人的队伍撤出了鲍灵格林，退到了纳什维尔。在那儿等待多纳尔森堡的消息。人们指责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没有亲自率军前往多纳尔森堡，或没有及时撤离。——编者注

[10]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269页。——原注

[11]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166页。——原注

[12]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159页。——原注

[13]　多纳尔森堡的南方邦联军的人数很难确定，但两万一千人或许有些夸张。大多数资料显示，投降的南方邦联军约一万四千人，伤亡约两千人，逃跑人数不确定。——编者注

[14]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237页。——原注

[15]《个人回忆录》，第1卷，第306页，尤利西斯·S.格兰特著。——原注

[16]　急件内容是："如果所有能用的炮艇直指南方邦联军，我们就有可能胜利。否则，我们可能一败涂地。我与你会谈时发生了一场恶战，现在军队士气低落，我想南方邦联军更是如此。如果炮艇不出现，南方邦联军会重拾信心。到时，我们的军队士气定会一落千丈。因此，你必须确保炮艇出现。我并不指望炮艇作战，但必须出现，远程发射几枚炮弹。"《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618页。——原注

[17] 《个人回忆录》，第1卷，第307页，尤利西斯·S.格兰特著。——原注

[18]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163页。——原注

[19] 《美国史》，第3卷，第692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詹姆斯·布坎南的前任战争部长约翰·B.弗洛伊德负责镇守多纳尔森堡。吉迪恩·约翰逊·皮洛是约翰·B.弗洛伊德的副将。他们都没有将帅之才，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防守时毫无章法，军队混乱不堪。他们将指挥权交给西蒙·B.巴克纳之前，已经犯了致命的错误。因此，西蒙·B.巴克纳投降了。——编者注

[20]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161页。——原注

[21]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295页。——原注。这封信使尤利西斯·S.格兰特名声大噪，其原件在芝加哥历史学会。所署日期是1862年2月15日，而不是1862年2月16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可能记错了日期。——编者注

[22]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626页。——原注

[23] 《美国内战史》，第2卷，第34页，约翰·C.罗普斯著。——原注

[24]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259页。——原注

[25] 内森·B.福里斯特、约翰·B.弗洛伊德及他人的报告和声明。《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427页到第432页。《内森·B.福里斯特将军传》（*Life of General Nathan B. Forrest*），第73页，约翰·A.韦思著。《纳什维尔志》（*History of Nashville*），第193页，约翰·伍尔德里奇著。——原注

[26] 《美国史》，第3卷，第598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27] 1862年2月15日的战争中并未使用炮艇。——原注。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说，在1862年2月15日的战斗中，炮艇“没有参与”，他犯了一个小错误。取代受伤的安德鲁·H.富特接任指挥官的本杰明·达夫对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指令做出了回应，派圣路易斯号和路易斯维尔号前往多纳尔森堡。本杰明·达夫说：“圣路易斯号发射了数枚炮弹……”但是，在14日的战斗过后，海军因受创而未能积极参战。《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3卷，第588页，第589页。——编者注

[28] 《美国内战史》，第2卷，第36页，约翰·C.罗普斯著。——原注

[29] 《格兰特致一位朋友的书信》，第4页，伊莱休·B.沃什伯恩著。——原注

[30] 约翰·A.麦克莱恩德仍然掌管美国所有的军队。——原注

[31] 1862年春，维克斯堡和查塔努加市均无大规模防御。北方联邦军虽然需要长途跋涉，粮草供给也存在问题，但只要速战速决，就能拿下这两个地方。——编者注

[32] 《美国史》，第3卷，第881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33]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640页。——原注

[34] 1862年1月中旬，乔治·B.麦克莱伦生病，现在已经恢复。——原注

[35] 爱德华·戴西，第3卷，第604页。——原注

[36]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5卷，第51页。《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5卷，第7卷，第10卷，第2册。《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1卷。《个人回忆录》，第1卷，尤利西斯·S.格兰特著。《美国史》，第3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美国内战史》，第2卷，约翰·C.罗普斯著。《格兰特致一位朋友的书信》，伊莱休·B.沃什伯恩著。《约翰·罗林斯将军传》，詹姆斯·威尔逊著。《林肯传》，第5卷，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马萨诸塞州军事历史学会文献》，第7卷。《波托马克军》，威廉·斯温顿著。《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呼吁武装》《约瑟夫·E.约翰斯顿记事》，詹姆斯·K.霍斯默著。《乔治·B.麦克莱伦自传》，乔治·B.麦克莱伦著。《半岛：1862年乔治·B.麦克莱伦的作战》，亚历山大·韦布著。关于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描述，见《美国史》，第3卷，第594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37] 《尤利西斯·S.格兰特致一位朋友的书信》，第8页，伊莱休·B.沃什伯恩著。——原注

[38] 1862年3月11日任命，1862年3月13日接受指挥权。——原注

[39] 阿利根尼山脉以西的军队是多纳尔森军队的援军。——原注

[40] 《个人回忆录》，第317页，尤利西斯·S.格兰特著。——原注

[41] 田纳西州的萨凡纳位于田纳西河东岸，是一个很适合设立司令部的河边小镇。田纳西河和坎伯兰河向北流入俄亥俄河。——编者注

[42]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0卷，第2册，第365页。——原注

[43] 1862年1月，米尔斯普林斯战役“惨败”后，乔治·H.托马斯将军打败了南方邦联军。此次战役发生在多纳尔森堡战役之前。——原注。詹姆斯·福特·罗德斯在《美国史》的脚注中谈到过南方邦联军在米尔斯普林斯战役中的惨败。此次战役也被称为渔溪战役、洛根十字路口战役、萨默塞特战役或比奇格罗夫战役。——编者注

[44] 当时，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离匹兹堡栈桥二十英里。——原注

[45] 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最初定于1862年4月4日发起进攻，后来又定在了1862年4月5日。——编者注

[46] 夏洛即匹兹堡栈桥。——编者注

[47]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0卷，第1册，第89页，第10卷，第2册，第94页。——原注

[48]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0卷，第1册，第331页。——原注

[49] 《马萨诸塞州军事历史学会文献》，第7卷，第52页，亨利·斯通。——原注

[50] 约翰·A.麦克莱恩德不在威廉·T.谢尔曼的麾下。——原注

[51] 《美国内战史》，第2卷，第97页，约翰·C.罗普斯著。——原注

[52]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0卷，第2册，第93页。——原注

[53] 《威廉·T.谢尔曼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229页。——原注

[54] 《马萨诸塞州军事历史学会文献》，第7卷，第61页，亨利·斯通。——原注

[55] 《马萨诸塞州军事历史学会文献》，第7卷，第115页等。——原注

[56]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0卷，第2册，第93页。——原注

[57] 《马萨诸塞州军事历史学会文献》，第7卷，第52页，亨利·斯通。——原注

[58] 皮埃尔·博勒加德是南方邦联军的副指挥。——原注

[59] 《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1卷，第555页。——原注

[60] 《马萨诸塞州军事历史学会文献》，第7卷，第136页。《皮埃尔·博勒加德传》（*Biography of Confederate General Beauregard*），第1卷，第277页，阿尔弗雷德·罗曼著。——原注

[61] 1805年，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境内爆发奥斯特利茨战役。参战方是法军和俄奥联军。最终，法军大胜。法军得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拿破仑将尼古拉·苏尔特将军指挥的一个军隐藏在普拉岑高地谷底的浓雾中。太阳升起后，浓雾消散，法军立即向俄奥联军的中路发起了猛攻。此后，在关于拿破仑的传奇故事中，“奥斯特利茨的太阳”具有重要意义。——译者注

[62] 《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1卷，第556页。——原注

[63] 《马萨诸塞州军事历史学会文献》，第7卷，第138页等。——原注

[64]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0卷，第1册，第403页。——原注

[65] 身处战场的人给出的时间并不准确的。从几份可靠的报告中，并没有找到相同的时间记载。可以肯定的是，威廉·T.谢尔曼知道，第六团营地陷落前会有一场大战。《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0卷，第1册，第249页。——原注

[66]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0卷，第1册，第98页。——原注

[67]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0卷，第2册，第119页。——原注

[68] 《美国内战史》，第76页，约翰·C.罗普斯著。《马萨诸塞州军事历史学会文献》，第7卷，第74页，亨利·斯通。——原注

[69]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0卷，第1册，第181页。——原注

[70]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0卷，第2册，第95页。——原注

[71] 《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1卷，第565页。乔治·塔克先生为我提供了V.沃纳写给他的信。——原注

[72] 北方联邦第六团由本杰明·普伦蒂斯指挥，一部分兵力在夏洛的霍尔内特内斯特。——编者注

[73] 怀特洛·里德听到了这段对话。《战时的俄亥俄州》，第1卷，第375页，怀特洛·里德著。——原注

[74]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0卷，第1册，第332页。将军可能指乔治·P.比尔。——原注

[75]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0卷，第1

册，第333页。——原注

[76]《个人回忆录》，第338页，尤利西斯·S.格兰特著。——原注

[77]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0卷，第1册，第324页。——原注

[78]《马萨诸塞州军事历史学会文献》，第7卷，第95页。——原注

[79]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0卷，第2册，第398页。——原注

[80]　《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79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原注

[81]《威廉·T.谢尔曼将军与参议员之间的通信》，第147页。——原注

[82]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0卷，第1册，第98页。——原注

[83]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0卷，第1册，第98页。——原注

[84]　官方记录数量庞大，任何评论都会在文本中保留下来。詹姆斯·威尔逊在《约翰·罗林斯将军传》中写道："尤利西斯·S.格兰特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名誉受损。"——原注

[85]《美国史》，第3卷，第595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86]《美国史》，第3卷，第627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87]　《尤利西斯·S.格兰特致一位朋友的书信》，第10页，伊莱休·B.沃什伯恩著。——原注

[88]《威廉·T.谢尔曼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255页。——原注

[89]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7卷，第2册，第83页。——原注

[90]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0卷，第1册，第2册。《马萨诸塞州军事历史学会文献》，第7卷。《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1卷。《美国内战史》，约翰·C.罗普斯著。《个人回忆录》，尤利西斯·S.格兰特著。《威廉·T.谢尔曼将军回忆录》。《林肯传》，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波托马克军》，威廉·斯温顿著。《呼吁武装》，詹姆斯·K.霍斯默著。——原注。1862年5月3日，亨利·W.哈勒克发动了针对科林斯的主要行动。北方联邦军虽然急行军二十五英里，但之后的行军速度非常慢。1862年5月30日，皮埃尔·博雷加德率军撤退后，北方联邦军才攻占了科林斯。1862年4月初，约翰·波普将军占领了密西西比河上的十号岛，随后与亨利·W.哈勒克会合。由于密西西比北部的战役，1862年6月初，密西西比河上的皮洛堡驻军撤离。1862年6月6日，在孟菲斯战役中，北方联邦炮艇击败了南方邦联舰队，打通了从密西西比河前往南方邦联军设防的维克斯堡的通道。——编者注

[91]　《美国史》，第3卷，第489页，第581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92]　　《约翰·默里·福布斯书信与回忆》，第1卷，第236页，萨拉·F.休斯著。——原注

[93]《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1卷，第630页。——原注

[94]　　戈斯波特海军工厂被摧毁时，"梅里马克"号是部分烧损沉海的船只之一。《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1卷，第730页。——原注。大多数人称这

艘船为联邦“梅里马克”号，官方称其为“梅里马克”号，南方邦联称其为邦联“弗吉尼亚”号。——编者注

[95] 《美国史》，第3卷，第364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96] 《美国史》，第3卷，第731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97] “梅里马克”号是一艘木制护卫舰，配备铁装甲。“监视”号完全是一艘铁舰，对现代海军舰艇的发展影响深远。——编者注

[98] 《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698页，第712页。《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21页。——原注

[99] 《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23页。——原注

[100] 《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54页，约翰·海伊著。——原注

[101]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85页。——原注

[102]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63页。——原注

[103] 《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53页。——原注

[104] 达尔格伦炮是一种前装滑膛炮，外形像啤酒瓶。——译者注

[105] 哥利亚是传说中的著名巨人之一。公元前10世纪，以色列希律王执政时期，非利士人兴兵入侵，其中一个武士叫哥利亚，身高八尺，手持巨戟，出阵四十天，以色列人不敢迎战。一次，少年大卫见此情景，主动要求作战，并用智慧和勇气杀死了哥利亚。——译者注

[106] 《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11页。——原注

[107] 《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26页。——原注

[108] 节指船和飞机的行驶速度，约为1853米每小时。——译者注

[109] 《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1卷，第702页。——原注

[110] 《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1卷，第59页。——原注

[111] 《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1卷，第727页。——原注

[112] 《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27页。——原注

[113] 《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中的通信和报告。《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1卷。《美国史》，第3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吉迪恩·韦尔斯著。《书信与日记》，约翰·海伊著。《波托马克军》，威廉·斯温顿著。《南方各州记事》，玛丽·切斯纳特著。其他南方邦联的船和炮艇、北方联邦的护卫舰和拖船及邦联和联邦的岸上炮台都参加了这场战役。但我认为它们并不重要，因此并没有提及。——原注

[114] 1862年12月，“监视”号在哈特勒斯角附近沉没。《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99页到第101页，第127页，第220页，第335页到第337页，第342页，第387页。《萨蒙·P.蔡斯传》，第428页，罗伯特·沃登著。《林肯传》，第5卷，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115] 《林肯传》，第5卷，第257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116] 虽然南北方都意识到了密西西比河的重要性，但北方联邦军迟迟没有采取相关行动。战争初期，只需要几艘船就能控制密西西比河流域。肯塔基州的哥伦布驻军撤离并占领新奥尔良后，北方联邦军依然可以通过快速远征守住维克斯堡和哈德逊港。此后，这些堡垒连通了密西西比河东岸和西岸的南方各邦联州。——编者注

[117] 根据亨廷顿图书馆收藏的《吉迪恩·韦尔斯文稿》，古斯塔夫斯·福克斯在1871年6月19日写给吉迪恩·韦尔斯的信中，提到了林肯、乔治·B.麦克莱伦、吉迪恩·韦尔斯和古斯塔夫斯·福克斯在会上讨论并通过的进攻新奥尔良的最初计划。随后，戴维·D.波特参会，提出了关于迫击炮舰队的意见。《戴维·法拉格特与新奥尔良》《银河杂志》，吉迪恩·韦尔斯著，1861年11月。戴维·D.波特将大部分功劳归功于自己，并将威廉·H.苏厄德列入与会人员名单，删去了古斯塔夫斯·福克斯的名字。《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2卷，第23页到第24页。关于进军新奥尔良的详细分析可参见《战败之夜》，第135页到148页，查尔斯·L.杜富尔著。——编者注

[118] 《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8卷，第23页。——原注

[119] 《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8卷，第8页。——原注

[120] 《林肯传》，第5卷，第257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121] 《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8卷，第47页。——原注

[122] 杰克逊堡位于圣菲利普堡下游半英里处，离迫击炮舰队更近。——原注

[123] 没有参战的将领指戴维·法拉格特指挥的战舰将领。迫击炮舰队的将领来了一位，但“被荒唐地告知，信号并不是给我的”。《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8卷，第143页。——原注

[124] 《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8卷，第146页。——原注

[125] 《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8卷，第160页。——原注

[126] 《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8卷，第156页。——原注

[127] 《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8卷，第156页。——原注

[128] 《戴维·法拉格特传》，第151页，阿尔弗雷德·T.马汉著。——原注

[129] 《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2卷，第60页。——原注

[130] 《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8卷，第154页。——原注

[131] 《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2卷，第64页。《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8卷，第142页。——原注

[132] 《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8卷，第142页，第154页。阵亡三十七人，负伤一百四十七人。《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2卷，第73页。——原注

[133] 《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8卷，第158

页。——原注

[134] 《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8卷，第245页。——原注

[135] 《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8卷，第148页。——原注

[136] 《戴维·法拉格特传》，第172页，阿尔弗雷德·T.马汉著。——原注

[137]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四，第2卷，第281页。——原注

[138] 参见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T.马汉对新奥尔良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的详细对比。《戴维·法拉格特传》，第137页，阿尔弗雷德·T.马汉著。——原注

[139] 《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8卷。《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2卷。《戴维·法拉格特传》《海湾和内陆水域》，阿尔弗雷德·T.马汉著。《林肯传》，第5卷，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美国史》，第3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南方各州记事》，玛丽·切斯纳特著。——原注

[140] 孟菲斯战役没有陆地防守，南方邦联的八艘炮舰中，只有一艘幸免于难，其余七艘都被击沉或被俘虏了。——编者注

[141] 1862年3月8日，林肯签发《第二号全面战争令》，设立了军团，任命欧文·麦克道尔、埃德温·V.萨姆纳、塞缪尔·P.海因策尔曼和伊拉斯谟·D.凯斯为波托马克军中各兵团指挥官。《林肯选集》，第5卷，第149到第151页，第155页。——编者注

[142] 约翰·C.弗里蒙特指挥的实际上是山区作战部，主要包括弗吉尼亚州蓝岭山脉以西的领土。——编者注

[143] 这条防线指约克河与詹姆斯河之间的防线。《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1卷，第1册，第14页。——原注

[144] 《乔治·B.麦克莱伦自传》，第308页。——原注

[145]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1卷，第1册，第15页。——原注

[146] 《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67页，约翰·海伊著。——原注

[147]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1卷，第3册，第456页。——原注

[148] 1862年4月4日，乔治·B.麦克莱伦开始围攻约克镇。起初，北方联邦军对阵的是约翰·B.马格鲁德率领的一万两千至一万四千名南方邦联军。几天后内，前来支援的军队解了约翰·B.马格鲁德的燃眉之急。但乔治·B.麦克莱伦并不打算进攻约克镇。一些人认为，在围城期间，即使是在南方邦联军得到增援的时候，乔治·B.麦克莱伦依然占据着兵力优势，完全可以打破敌人的防线，重创南方邦联军。——编者注

[149] 坚信礼是基督教的一种礼仪，教徒通过洗礼加固与上帝建立的关系。——译者注

[150] 1862年5月15日，进攻里士满下游八英里处的德鲁里断崖炮台时，“监视”号和联邦炮艇被击退。——原注

[151] 当时，罗伯特·E.李是杰斐逊·戴维斯的军事顾问。——原注

[152] 指谢南多厄河谷以西弗吉尼亚州的约翰·C.弗里蒙特的军队。——编者注

[153] 他的行囊里总装着这两本书和《韦氏词典》。——原注

[154] 约书亚是《圣经》中摩西的继承人，以色列人的首领。——译者注

[155] 拿破仑说：“仔细品读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凯塔维斯、蒂雷纳、尤金和腓特烈二世的八十八场战役，将他们视为榜样，是成为伟大领袖和掌握战争秘诀的唯一方法。你的才智会因此受到启发，从而摒弃与伟人的做法相悖的思想。”《托马斯·J.杰克逊与美国内战》，第1卷，第504页，乔治·F.R.亨德森著。——原注

[156] 《托马斯·J.杰克逊与美国内战》，第1卷，第308页，第518页，第519页，第539页，乔治·F.R.亨德森著。——原注

[157]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1册，第551页。——原注

[158] 《美国史》，第4卷，第19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269页。——原注

[159] 1862年6月8日，在克罗斯基斯，托马斯·J.杰克逊打败了约翰·C.弗里蒙特。1862年6月9日，在里帕布利克港，托马斯·J.杰克逊打败了北方联邦军，结束了“‘石墙’托马斯·J.杰克逊的进军”。——编者注

[160] 《托马斯·J.杰克逊与美国内战》，第1卷，第516页，乔治·F.R.亨德森著。——原注

[161] 威廉·B.富兰克林的一个师派给乔治·B.麦克莱伦后，欧文·麦克道尔的军队约有三万五千人到四万人。《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1卷，第1册，第2册，第12卷，第1册，第2册。《美国史》，第4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美国内战史》，第2卷，约翰·C.罗普斯著。《托马斯·J.杰克逊与美国内战》，乔治·F.R.亨德森著。《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2卷。《乔治·B.麦克莱伦自传》，乔治·B.麦克莱伦著。《林肯传》，第5卷，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约瑟夫·E.约翰斯顿记事》，约瑟夫·E.约翰斯顿著。《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的书信》，第1卷，第253页，萨拉·诺顿、德沃尔夫·豪著。林肯和卡尔·舒尔茨的通信参见《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7卷，第3册，第379页，第398页。《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270页。——原注

[162] 《美国史》，第4卷，第23页，第24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163] 即费尔奥克斯战役或称七松战役。——原注

[164] 《美国史》，第4卷，第23页等，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165] 《托马斯·J.杰克逊与美国内战》，第2卷，第2页，乔治·F.R.亨德森著。《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1卷，第3册，第233页。《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276页。——原注

[166] 《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2卷，第404页。《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275页。——原注

[167] 达布斯豪斯距里士满一英里半。《罗伯特·E.李传》，第2卷，第107页，道格拉斯·索撒尔·费里曼著。——编者注

[168] 1862年5月9日，林肯授权乔治·B.麦克莱伦，任命菲茨·约翰·波特为兵团指挥官。《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1卷，第3册，第154页。——原注。实际上，1862年5月18日，菲茨·约翰·波特和威廉·B.富兰克林分别担任第五兵团和第六兵团的指挥官。詹姆斯·福特·罗德斯在《美国史》的脚注中提到了1862年5月9日的通信，信中记录了有关这些兵团指挥官任命的信息。

林肯不愿联邦军队分裂，授权乔治·B.麦克莱伦暂停目前的计划，适时而定。因此，乔治·B.麦克莱伦任命了两位与他相处融洽的兵团指挥官。《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1卷，第1册，第2页。——编者注

[169] 指梅卡尼克斯维尔战役和比弗丹溪战役。——编者注

[170]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1卷，第1册，第118页。1862年6月27日，乔治·B.麦克莱伦发电报告诉妻子，称自己已经“两夜未眠了”。《乔治·B.麦克莱伦自传》，第442页。——原注

[171] 《托马斯·J.杰克逊传》，第439页，第440页，罗伯特·L.达布尼著。——原注

[172] 也称奇克哈默尼战役。——原注

[173] 派去增援的亨利·W.斯洛克姆的军队可能有九千人。《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82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原注

[174] 《第二军团史》，第62页，弗朗西斯·A.沃克著。——原注

[175]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1卷，第2册，第492页，第556页。《南方各州记事》，第197页，玛丽·切斯纳特著。——原注

[176] 艾伦·平克顿（Allan Pinderton，1819—1884），著名侦探和间谍，在获取军事情报方面，他和下属未能获得有价值的军事情报。——编者注

[177]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1卷，第3册，第266页。——原注

[178] 《美国史》，第4卷，第43页，第44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179] 《托马斯·J.杰克逊与美国内战》，第1卷，第497页，乔治·F.R.亨德森著。——原注

[180] 《美国史》，第4卷，第36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181] 根据相关数据，七日战役中，罗伯特·E.李的兵力与乔治·B.麦克莱伦的兵力并不对等。截止1862年6月20日，乔治·B.麦克莱伦军队总人数为十二万七千三百二十七人，可用兵力为十一万五千一百零二人。《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1卷，第3册，第238页到第239页。罗伯特·E.李的可用兵力约为八万五千人。因此，乔治·B.麦克莱伦的兵力比南方邦联军多出约三万人。《罗伯特·E.李传》，第2卷，第116页，道格拉斯·索撒尔·费里曼著。——编者注

[182] 《托马斯·J.杰克逊与美国内战》，第1卷，第502页，乔治·F.R.亨德森著。——原注

[183] 《托马斯·J.杰克逊与美国内战》，第1卷，第539页，乔治·F.R.亨德森著。——原注

[184] 《罗伯特·E.李将军传》，第260页，第294页，菲茨休·李著。《罗伯特·E.李回忆录》，第338页，阿米斯特德·L.朗著。《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1卷，第3册，第632页。——原注

[185] 《美国史》，第3卷，第636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268页。——原注

[186] “在军事行动中，撤退是最累人的。拿破仑说，‘尤其是经历两场战役后的撤退’。”——原注

[187] 《托马斯·J.杰克逊与美国内战》，第2卷，第37页，乔治·F.R.亨德森著。——原注

[188] 格兰岱尔或费拉泽农场战役指1862年6月30日的白橡木沼泽战役。相关记载中，此次战役至少有八个名称。——编者注

[189] 《托马斯·J.杰克逊传》，第466页，罗伯特·L.达布尼著。《杰斐逊·戴维斯传》，第121页，弗兰克·H.阿尔弗林德著。《美国内战史》，第2卷，第196页，约翰·C.罗普斯著。《托马斯·J.杰克逊与美国内战》，第2卷，第59页等，乔治·F.R.亨德森著。——原注

[190] 1862年6月25日，在七松战役前发生了一场小规模战斗。《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86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原注

[191] 《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345页。——原注

[192] 《罗伯特·E.李的往事与书信》，第75页。——原注

第4章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毫无疑问，战争必定会耗费大量财力和人力。大多数人认为，人命比金钱更重要，因为战争的罪恶之一就是牺牲无辜的生命。《荷马史诗》中曾谈到一个战死的健壮的年轻人，诗中描述道：“他还没来得及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1] 战争中，冲锋在前的往往是斗志高昂的勇者，蜷缩在后的大多是贪生怕死的懦夫。大多数士兵并不想参战。死里逃生的士兵对约翰·福斯塔夫说：“有勇有谋才能救我一命。”[2]

第1节　法定货币法案

在讲述内战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许多平民参军入伍，卷入了血腥战争。战争往往意味着牺牲和杀戮。但现在，我们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金钱，即军饷。联邦政府必须维护自己在欧洲各国中的信誉。然而，军队的日常支出已经从十七万八千美元增加到一百五十万美元[3]，想要维护信誉需要强大的财政能力。1861年12月31日，美国财政部和各银行合作，发放了约两千五百万无息贷款，使战事得以延续。其间，所有交易都通过钱币完成。但贷款耗尽了银行的财力。1861年年底，各银行被迫中止钱币贷款。联邦政府陷入财政困境。美国人和英国人都认为，联邦政府面临破产的危险。1862年1月底，联邦政府累计欠款达到一亿美元。1862年6月30日前，联邦政府仍然需要两亿五千万至三亿美元维持开支。人民和国会都同意直接或间接征收重税，但可以肯定的是，联邦政府无法及时制定出解决危机的税收法案。最终，联邦政府采用了一项权宜之计。这项措施成为财政上的一大创新。国会授权财政部长发行一亿五千万美元，持有人可用其付款，不计利息，并将纸币作为公共和私人债务的法定货币[4]。

联邦政府在实施新法案前，并没有经过慎重考虑和讨论。财政部长萨蒙·P.蔡斯“不愿意将法定货币定论为必要的”[5]。参议院的财政大臣约翰·谢尔曼和财政部财政委员会主席威廉·P.费森登意见相左。约翰·谢尔曼赞成法定货币法案。威廉·P.费森登反对该法案，并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无论从正当性还是权宜方面，我都反对法定货币法案，因为它颠覆了我对政治、道德和国家荣誉的认识。”[6]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撒迪厄斯·史蒂文斯非常赞成多数人的观点，认为“法定货币法案是必要之举，没有选择的余地。”查尔斯·萨姆纳也支持法定货币法案，但告诫参议院道：“《宪法》能解一时之困，但并不是长久之计。”查尔斯·萨姆纳、威廉·T.谢尔曼和其他大多数参议员及代表都赞成法定货币法案，但认为该法案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通过将不可兑现的文书变成法定货币，联邦政府暂时缓解了财政危机。这种缓兵之计就像兴奋剂一样，需要一直使用。1864年1月3日，财政部发放了被称为美钞的法定货币，发行数额近四亿五千万美元[7]。按照1862年2月25日通过的法案规定，

第一笔法定货币已经发行。现在，国会已经授权发行五亿债券，面值为五至二十美元，利息为6%，其中可能包含法定货币。债券的利息是用硬币支付的。此外，外国进口关税也是用硬币支付的。



撒迪厄斯·史蒂文斯（1792—1868）

想要读懂法定货币法案，就必须了解法定货币。支持者认为，对避免破产和展开军事与航海行动来说，法定货币法案十分有必要。然而，该法案的缺点很快显现，不仅增加了战争成本，还误导了大众。很多人认为，只要政府下令，就能造出钱。当时，如果采用备用方案，结果可能会大有不同。然而，因为法定货币法案违反了既定的财政原则，加上没有先例可循，所以其他方案也许值得一试。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发行美钞，也有人反对将美钞作为真正的法定货币。正如拿破仑战争时期，威廉·皮特限制了英国货币的面值，如果仅在政府和公众中发行一定数量的法定货币，我们就可以认为，战争可能会持续六个月或一年以上，甚至更长。此外，财政部长萨蒙·P.蔡斯应该对1862年2月25日通过的法案中

的第二条做出恰当解释。萨蒙·P.蔡斯有权以市场价出售面值为五至二十美元、利息为6%的五亿债券，交易物为钱币或美钞。他解释说，市场价就是标准。如果在市场上出售时，债券的交易物不确定，那么所得结果与萨蒙·P.蔡斯解释下的结果将大不相同。法定货币法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无息强制贷款与自愿贷款不同，自愿贷款以实际市场价出售债券作为保障。坚持执行法定货币法案的财政家们认为，通过立法赚钱比通过交易赚钱更容易、更可取。但结果是，联邦政府反受其害[8]。

在第二次会议[9]上，林肯得到国会授权，在必要时可以掌控铁路和电报线路，以维护公共安全[10]。大会制定了一项全面详尽的内部税收计划。1862年7月1日，林肯批准内部税收计划。内部税收计划可以简单地描述为对一切征税的法案。法案建立的原则是："购买一件商品或产品、达成一次交易、找到一份工作或有收入来源时，请纳税。"[11]此外，更重要的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实行了分级征收联邦所得税的法案。收入低于一万美元的纳税人应缴纳3%的所得税，收入超过一万美元的纳税人应缴纳5%的所得税，但可免税六百美元，在申报时会扣除一些费用。法定货币和债券的利息收入是征税收入的1%和0.5%。居住在国外的美国公民需缴纳5%的所得税，没有免税资格。1862年7月14日，林肯批准了征税法案。进口关税随之增加[12]。

第2节　林肯对奴隶制的态度

林肯并不擅长处理金融问题，因此，他让财政部长萨蒙·P.蔡斯负责有关金融问题的事务。萨蒙·P.蔡斯虽然难免犯错，但依然是一位恪尽职守的财政部长。林肯也会插手一些容易处理的外交事务。内战时期，他刻苦学习战术，在困境和失败中吸取经验，摸索出了适合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方案。此外，面对奴隶制问题，他的处理方式一直近乎完美。



戴维·亨特（1802—1886）

1862年春和初夏，国会采取的行动表明，自萨姆特堡打响第一炮以来，废除奴隶制是人心所向。持中立态度的共和党人认为，废除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制是明智的选择。1862年4月，国会通过了关于废除哥伦比亚特区奴隶制的提议，同时适当地补偿了奴隶主。1862年6月，在正式法令中，国会明确提出了共和党的基本原则，也是其存在的根基，即坚决反对联邦所有领土上的奴隶制[13]。在废除奴隶制方面，林肯做得比国会多。早在1862年3月，他就提议逐步废除奴隶制，并对奴隶主进行赔偿。当时，国会通过了他的提议。该提议是在北方军获胜的时候提出的。除了联邦边境蓄奴州，其他联邦州并不认为自己能从中获益。但林肯的提议包含所有州。此时，如果南方人放下武器，尊重他们本应接

受的国家政府，那么在逐步解放奴隶的过程中，释放一个奴隶可以获得约四百美元补偿 [14] 。

林肯谨慎考量了各种相关的因素，试图将奴隶制问题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1862年5月9日，南方军区指挥官戴维·亨特将军下令，释放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的所有奴隶。1862年5月16日，林肯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一消息，同时收到了萨蒙·P.蔡斯的来信。萨蒙·P.蔡斯在信中推测，戴维·亨特将军下达的命令并非本意。总统回复道："在没有征求我意见的情况下，指挥官不应该迫于压力做出这样的事。"1862年5月19日，林肯发布公告，声明戴维·亨特将军的命令无效。在公告中，林肯恳切呼吁联邦边境奴隶州，将自由逐渐还给奴隶，并接受他和国会提供的补偿。他说："我不争辩，但请你们为自己辩护。你们即使对时局视而不见，也不能如此。"废除奴隶制"会像天降甘露般悄然而至，滋养万物"。

后来，乔治·B.麦克莱伦的惨败使林肯坚信，必须废除奴隶制 [15] 。林肯越来越渴望制定循序渐进的废奴政策和补偿奴隶主的政策及海地、南美和利比里亚已解放黑人的殖民化政策 [16] 。他认为，联邦各奴隶州废除奴隶制后，南方邦联将无法继续战斗。1862年7月12日，在国会休会前，林肯邀请参议员和联邦边界奴隶州的代表来到白宫，诚恳地请求他们改变自己的态度，同意废奴政策。林肯说："如果战事持续太久，你们各州的奴隶制也会因战火而逐渐消亡……奴隶制终将消失。到时，你们将得不到任何补偿。你们应该引导人民行动起来，缩短战争的时间，做好针对必将消亡的奴隶制的实质性补偿工作。这样做才是真正对人民有益的。"林肯还提到了自己因反对奴隶制承受的压力及政府的激进派对他的不满，预言"那些团结但并不强大的州一定会分裂"。他还说："我们的国家处在危险之中。"只有政府官员高瞻远瞩，行事果敢，才能彻底废除奴隶制。因此，林肯请求各州长释放奴隶。但边境州是否会同意他的计划还是未知数，因为奴隶制与其社会和政治生活息息相关，所以边境州的人民并不相信奴隶制的末日已经到来 [17] 。

接连失败的战事阻碍了林肯的废奴计划，也阻碍了他的其他行动。林肯曾计划，从利息为6%的国家债券支出一部分资金，作为对奴隶的补偿。虽然大多数人认为，拥有资产的黑奴会很危险，但鉴于政府的巨额

支出、近期失利的战事和南方邦联的现有实力，补偿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自明。现在，北方联邦衡量财富的一个标准是黄金。1862年6月3日，黄金加价3.5%。1862年7月12日，由于乔治·B.麦克莱伦战败，联邦政府授权发行纸币 [18] ，黄金加价14%。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边境蓄奴州立即采取行动，定会收到数量可观的国家债券作为补偿，从而避免因释放黑奴而遭受经济损失。

埃德温·斯坦顿部长会见边境州代表后的第二天是他幼子的葬礼。林肯在前往葬礼的路上，向威廉·H.苏厄德和吉迪恩·韦尔斯提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里士满的挫败和南方邦联强大的实力让他相信实施新计划是有必要的。奴隶们为南方邦联的士兵们种粮食，军队出征时充当车夫劳工，所以林肯“得出结论：我们释放奴隶是作战所需，是救国所需，否则我们就会被压制。” [19] 正如林肯后来描述此时的情景：“事情一直在恶化，直到我发现我们已经走到了实施计划的尽头，我们只能打出最后一张牌，必须改变策略，否则必败无疑！”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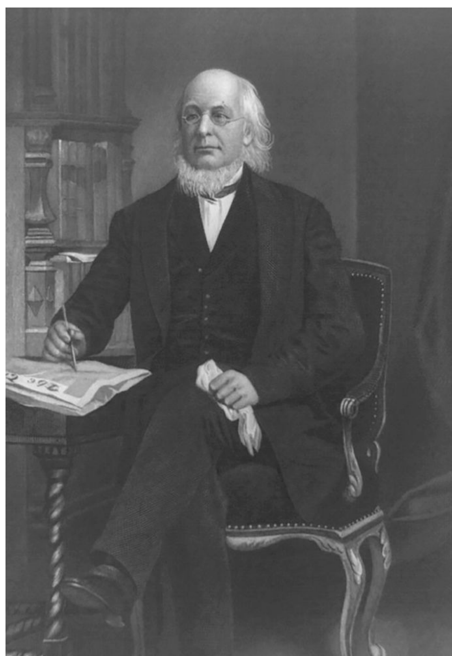
第3节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草案

1862年7月22日，除了威廉·H.苏厄德和吉迪恩·韦尔斯外，令其他人感到意外的是，林肯向内阁宣读了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计划。他重申了打仗的目的，即重建联邦政府，提出解放“是实现目标的必要军事措施”。威廉·H.苏厄德请求延缓发表宣言，因为现在民众情绪低落，可能会将宣言“视为联邦政府走投无路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或认为“在最后一声撤退信号响起时，联邦政府向埃塞俄比亚伸出了手。”威廉·H.苏厄德补充道：“我虽然赞成发表宣言，但请求您推迟发表宣言的时间，最好在打了胜仗后发表，而不是在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发表。”林肯之前并未想到这一点。由于威廉·H.苏厄德的反对，他“将宣言草案放在一边，等待胜利的到来。”[21]

内阁会议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激进派并不知道林肯愿意妥协，因此，一直在继续批判林肯。1862年7月31日，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写道：“遗憾的是，林肯本不应该发表一份独特而有说服力的公告！”[22]萨迪厄斯·史蒂文斯将林肯的补偿政策描述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假的命题”，并说“国会和内阁的智囊团决定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会不会在坟墓中腐烂。”他说，政府应该下令释放奴隶，招募和武装他们，“如果奴隶主不服从命令，就让奴隶们拿起武器反抗。”[23]查尔斯·萨姆纳焦虑地踱着步子，举起手感叹道：“我祈祷林肯的延缓是对的，但担心他是错的，甚至确信他错了。我相信他的诚心，但无法理解他。”[24]卡尔·舒尔茨和查尔斯·萨姆纳的观点一样，指责林肯的延缓决定，但后来，他坦白承认林肯比自己明智[25]。贺拉斯·格里利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两千万人的祈祷》。他对林肯说：“由于您反对奴隶制，联邦大业已经受创，并且还在受创。”1862年8月22日，林肯公开答复道：“在这场斗争中，我的首要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为了拯救联邦摧毁奴隶制……我对奴隶制和黑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拯救联邦，我认为这样做对联邦有益。我觉得冲动对联邦毫无益处，因此，我选择了忍让克制。”



卡尔·舒尔茨（1829—1906）



贺拉斯·格里利（1811—1872）

第4节　林肯和贺拉斯·格里利

林肯和贺拉斯·格里利是补偿政策和延缓发表宣言政策的代表人物。他们私底下毫无共鸣，看待事物观点也不同。林肯知人善用，贺拉斯·格里利不识人才；林肯幽默风趣，贺拉斯·格里利呆板无趣。在多年的交往中，林肯从未与严肃认真的贺拉斯·格里利聊过趣事或开过玩笑。1854年至1860年，贺拉斯·格里利和《纽约论坛报》的舆论影响虽然不大，但传达了许多重要人士的观点。林肯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在写给贺拉斯·格里利的公开信中，声明了自己的政策，称赞了贺拉斯·格里利和《纽约论坛报》支持的人士。林肯的回复信迅速传播开来，北方人几乎都读了他的信。林肯的观点合情合理，并中肯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他的政策只是一项正确的权宜之计，不仅唤起了人民的理性，还点燃了他们的希望 [26]。

1862年7月至1862年8月，如果没有林肯的领导，北方人可能会弃战。乔治·B.麦克莱伦和波托马克军撤到了詹姆斯河，人们对他们的信心大打折扣。查尔斯·艾略特·诺顿问乔治·威廉·柯蒂斯："你认为詹姆斯河畔的军队安全吗？" [27] 查尔斯·艾略特·诺顿道出了很多人心中的忧虑。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写出了无数人的忧虑，他写道："我看不到有什么能够拯救我们，除非发生奇迹。" [28]

历史已经回答了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的问题，即"是林肯把握住机会还是机会从他眼前逃走呢？他是否已经足够优秀？" [29] 卡尔·舒尔茨写信给林肯道："你对舆论和道德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30] 。现在，北方人重新燃起希望，继续战斗。从乔治·B.麦克莱伦1862年6月28日的信中，林肯获悉进攻里士满的行动失败了。他必须扩充联邦军队。考虑到要开始征兵，林肯给威廉·H.苏厄德写了一封信，说明了必须扩充军队的原因。在前往纽约、波士顿和克利夫兰的途中，萨蒙·P.蔡斯向几位名流和州长传达了林肯的信。林肯在信中声明："我希望能维持这场战争，直到胜利，或直到我死，或直到我战败，或直到我卸任，或直到国会和国家抛弃我。如果不是为了避免引起民众的恐慌或逃亡，我会公开呼吁全国人民支持扩充军队。如实理解一件事真的很难。"威廉·H.苏厄德通过与林肯和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协商及会见重要人士，将一封电报寄给了

联邦各州的州长，要求他们联合致函林肯，建议林肯号召各州积极征兵，“迅速镇压叛乱”。各州长赞同威廉·H.苏厄德的计划。林肯接受了州长们的“爱国”提议。他和威廉·H.苏厄德进行了交流，威廉·H.苏厄德和各州长也进行了思想交流。随后，林肯发出征兵三十万的号召[31]。

第5节　征兵“三十多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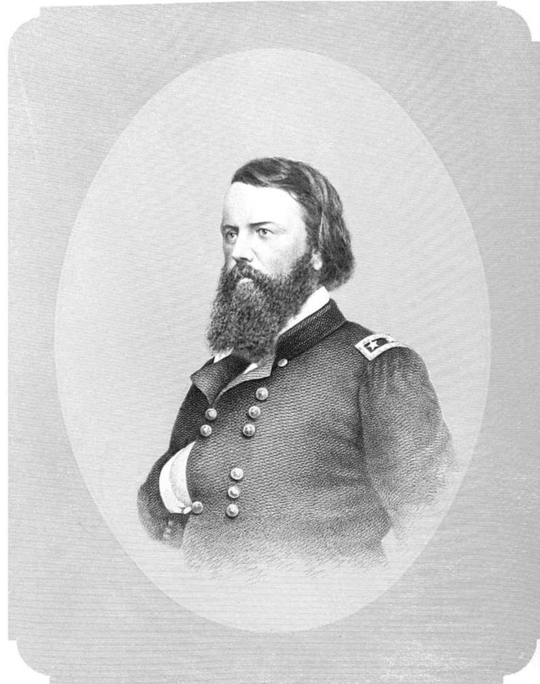
1862年6月28日至1862年7月1日，林肯一直没有得到有关乔治·B.麦克莱伦的消息，不知道他的军队是否安全。其间，林肯瘦了一大圈，显得非常憔悴。在写给卡尔·舒尔茨的信中，查尔斯·萨姆纳绝望地说：“真希望你能在这里，为林肯指明道路。很多人认为，他的征兵号召是徒劳的。我一直坚持认为，他应该号召奴隶，让南方邦联的后卫部队变成联邦的前锋部队。” [32] 1862年8月，查尔斯·萨姆纳意识到了林肯对人民的影响力，写信给约翰·布赖特说：“人民积极响应了最后一次征兵号召，因为他们认为征兵有助于推动战争进程。内阁或林肯从未想过弃战。”林肯在1862年8月4日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我们很容易征到新兵。”虽然波托马克军战败了，但联邦政府有人民大众的支持。林肯感受到了芝加哥群众集会的热情，听到了诗朗诵。诗的主题是：“三十多万人来了，林肯” [3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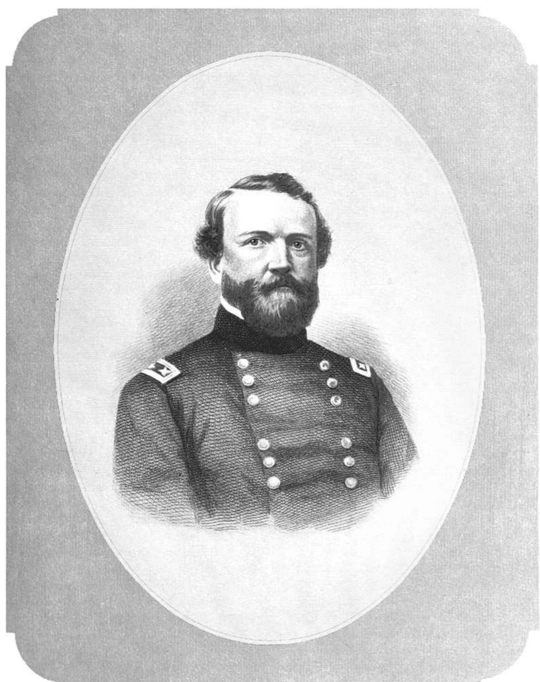
克利夫兰

第6节　约翰·波普和亨利·W.哈勒克

现在，北方联邦军前景堪忧，指挥上的连连失误更是雪上加霜。1862年5月，乔治·米德写道：“如果军队不能由一位杰出将领指挥，那么不幸在所难免。”[34] 林肯对此非常清楚。两年来，他一直在苦苦找寻一位“杰出将领”。如果能找到，他愿意将所有军务交付于这位将领。与波托马克军相比，西部的北方联邦军取得了可喜战果，展示了其能力。这种作战能力正是林肯一直找寻的。他将约翰·波普召了回来。约翰·波普在西部立下了战功[35]，成为弗吉尼亚军的指挥官。弗吉尼亚军由欧文·麦克道尔、纳撒尼尔·P.班克斯和约翰·C.弗里蒙特的各军团组成。与此同时，林肯任命亨利·W.哈勒克为美国陆军总司令，司令部设在华盛顿。然而，约翰·波普所谓的“在密西西比河和科林斯的绝妙军事行动，并未得到充分证实”。安德鲁·H.富特“常常嘲笑约翰·波普信口开河”[36]。亨利·W.哈勒克的晋升很容易理解。他获得的荣誉远比他在夺取亨利堡和多尔森堡的战役中获得的荣誉多。因此，进军科林斯后，他赢得了北方人和大部分士兵的信任[37]。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林肯并没有考虑其他三位真正能干的将军，即尤利西斯·S.格兰特、威廉·T.谢尔曼和乔治·托马斯。他们的战功远胜约翰·波普和亨利·W.哈勒克[38]。



约翰·波普（1822—18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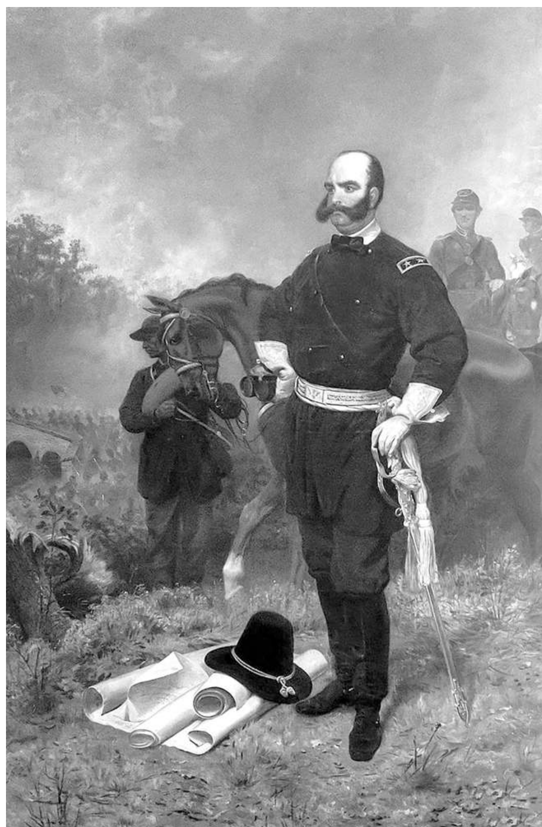


乔治·托马斯（1816—1870）

通过一篇笨拙的致全军演讲，约翰·波普开启了短暂的指挥官生涯。他说：“我从西部来到你们中间。在西部，我看着敌人落荒而逃……我的职责是为联邦政府服务，领导你们抗击敌人。这是我的使命，你们必须迅速行动起来。”演讲结束后，约翰·波普下达了四项命令，其中的一项命令完全不合理，无法执行，另外三项命令也毫无必要。因此，罗伯特·E.李立即开始调查约翰·波普。

托马斯·卡莱尔写道，腓特烈二世“能在战斗结束一两个月后，了解自己的对手，然后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地对付敌人。”在内战期间，了解自己的对手相对比较容易，因为在西点军校或在墨西哥服役期间，大多数敌对的指挥官已经熟悉彼此。詹姆斯·朗斯特里特与约翰·波普是同班同学。他非常肯定地告诉罗伯特·E.李，在西点军校上学期间，约翰·波普“英俊潇洒、精力充沛，是一名出色的骑兵，但他并没有全心全意地专注于读书。”无论如何，罗伯特·E.李对约翰·波普的总体评价是：喜欢自吹自擂，野心勃勃，并非刻苦之辈，亦非善思之人。罗伯特·E.李听说约翰·波普的军前演讲后，更加蔑视这位对手。约翰·波普忘记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军事格言：“不要轻视你的敌人。”

乔治·B.麦克莱伦的军队驻扎在詹姆斯河的哈里森栈桥[39]。他焦急地等待着援兵，渴望再次向里士满发起进攻。起初，林肯支持乔治·B.麦克莱伦的作战计划，但1862年7月8日巡视陆军回来后，他感到不知所措。1862年5月，他对乔治·米德说：“我正在履行我的职责，但没有人知道这些职责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40] 1862年7月，情况越来越糟糕。激进派不仅要求林肯发表反对奴隶制的宣言，还敦促他罢免乔治·B.麦克莱伦，甚至谴责他无能、不忠，根本不想废除奴隶制。他们还借约翰·C.弗里蒙特在密苏里州的无能表现，说服林肯撤换约翰·C.弗里蒙特。此外，激进派非常支持本杰明·巴特勒。但与其他人相比，约翰·波普接受过军事教育，看似非常反对奴隶制。埃德温·斯坦顿和萨蒙·P.蔡斯希望林肯撤下乔治·B.麦克莱伦，派约翰·波普指挥詹姆斯河的军队。林肯拒绝了他们的建议，打算将波托马克军的指挥权交给安布罗斯·伯恩赛德，但遭到了安布罗斯·伯恩赛德的果断拒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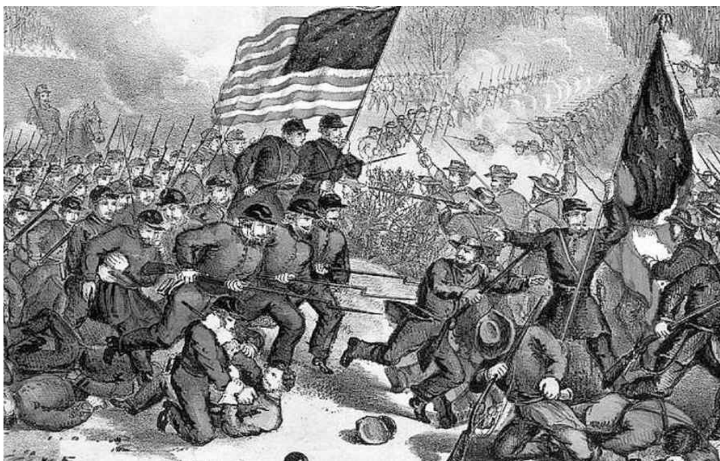
安布罗斯·伯恩赛德（1824—1881）

1862年7月23日，亨利·W.哈勒克抵达华盛顿。1862年7月24日，他去了波托马克军的司令部，与乔治·B.麦克莱伦进行了交谈。乔治·B.麦克莱伦渴望留在詹姆斯河，称如果有两到三万援兵，他就能渡过詹姆斯河，进攻重要的铁路中心彼得斯堡，切断里士满与南方各州之间的交通。亨利·W.哈勒克不同意他的计划。回到华盛顿后，他和其他人建议林肯下达命令，不顾乔治·B.麦克莱伦的反对，将其大军撤到了阿奎亚溪。当时，罗伯特·E.李决定进攻约翰·波普。约翰·波普消息灵通，谨小慎微，在兵力更强的南方邦联军到来前，迅速撤退了。在一座小山上，罗伯特·E.李看到了约翰·波普的举动，失望地叹了一口气，对詹姆斯·朗斯特里特说："将军，我万万没想到，敌人竟然会在开战前撤退。"

第7节　约翰·波普战败

约翰·波普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亨利·W.哈勒克优柔寡断，没有能力指挥军队行动，使约翰·波普一错再错。同时，波托马克军并不想真心配合约翰·波普。亨利·W.哈勒克、约翰·波普、林肯、埃德温·斯坦顿、萨蒙·P.蔡斯和乔治·B.麦克莱伦都参与了军队管理。他们的对手是能力出众的罗伯特·E.李及托马斯·J.杰克逊和詹姆斯·朗斯特里特。托马斯·J.杰克逊率军迅速前往约翰·波普的后方，拆毁了铁路，切断了电报线路[41]，阻断了北方联邦军的供给和与华盛顿之间的通讯往来。但在约翰·波普追上来之前，他已经逃走，并占领了一处有利据点，静待詹姆斯·朗斯特里特的到来。约翰·波普得到波托马克军两个军团的增援后，于1862年8月29日袭击了南方邦联军，却被击退，但他认为自己获胜了。1862年8月30日，他凭借获胜的错觉发动了第二次布尔溪战役[42]。战役期间，他似乎一直顺着罗伯特·E.李的意愿，将自己送入了敌手，惨遭失败。北方联邦军惊慌错乱，逃离了战场。

华盛顿的人们普遍认为，1862年8月29日，约翰·波普获得了胜利。1862年8月30日，约翰·海伊在日记中写道："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令人欣喜。我们上床睡觉，希望日出时听到好消息。但1862年8月31日8时左右，我正穿衣时，林肯总统来到我的房间，叫我出去。"他说："哎，约翰，我们恐怕又失败了。南方邦联军加强兵力对付约翰·波普，击退了他的左翼军。他撤退到了森特维尔，说那儿能保住剩下的兵力。我不喜欢他的说法，也不愿听他承认士兵们需要保护。"[43] 约翰·波普的来信确实令人担忧。在其中一封信中，他问林肯，如果他的军队全军覆没，华盛顿能否安然无恙。在另一封信中，他说自己对波托马克军没有信心，将领们对他也没有信心。与此同时，乔治·B.麦克莱伦在亚历山大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说道："我并不认为叛军会逼近华盛顿。华盛顿是安全的。我如果能悄悄回到华盛顿，会给你送来一些财物。"[44]



第二次布尔溪战役



联邦军战败撤退

第8节　乔治·B.麦克莱伦再获指挥权

1862年9月2日，华盛顿笼罩在一片焦虑中。清晨，约翰·波普来信称，军队士气低落，波托马克军中的许多军团非常拖拉。他说："如果不采取措施整顿军纪，军队可能会悄无声息地解散。"林肯很快想出了补救方法。他虽然知道自己会遭到反对或收到谏言，但还是指派被剥夺了实权的乔治·B.麦克莱伦，命他率所有将士保卫华盛顿[45]。亨利·W.哈勒克命约翰·波普率军靠近或进入防御工事。随后，约翰·波普将军权交给了乔治·B.麦克莱伦。由于"华盛顿岌岌可危"，亨利·W.哈勒克命所有可用军队即刻前往华盛顿。一支炮艇舰队接到命令后，立即沿河上行，停泊在华盛顿附近。民政部门的所有职员和政府大楼里的所有雇员都应招入伍，共同保卫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禁止售卖烈酒。此刻，每个人都显得焦虑不安。

乔治·B.麦克莱伦接到命令后，迫不及待地前往军营。途中，他遇到了雅各布·D.考克斯，说道："看，将军，我重掌了指挥权。"雅各布·D.考克斯向他表示了热烈祝贺。两人一起前行，直到遇到了行进的队伍。队伍最前面是约翰·波普和欧文·麦克道尔。当士兵们得知乔治·B.麦克莱伦重获指挥权的时候，立即"欢呼雀跃"。战士们的信任使乔治·B.麦克莱伦深受鼓舞。他积极投入到了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几天内就做好了作战准备。林肯评价道："乔治·B.麦克莱伦兢兢业业。停职反省后，现在的他斗志昂扬。"



约瑟夫·胡克（1814—1879）

1862年9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响起了反对乔治·B.麦克莱伦的声音。埃德温·斯坦顿很激动，尽力压低声音讲话[46]。萨蒙·P.蔡斯认为，乔治·B.麦克莱伦曾是一名失败的军事指挥官，没有及时前去支援约翰·波普，这一点证明他不值得信任。萨蒙·P.蔡斯在日记中写道："我可以肯定地说，将指挥权交到乔治·B.麦克莱伦手中，相当于将华盛顿交到叛军手中。"除了不在华盛顿的威廉·H.苏厄德，国会其他成员和蒙哥马利·布莱尔"一致同意"萨蒙·P.蔡斯的观点。林肯非常为难，表示自己"愿意辞职，但找不到比乔治·B.麦克莱伦更胜任目前工作的将领。"萨蒙·P.蔡斯回答道："约瑟夫·胡克、查尔斯·萨姆纳或安布罗斯·伯恩赛德都可以做得更好。"[47]

林肯虽然将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安布罗斯·伯恩赛德，但依然坚持道："虽然这样的安排能让您和陆军部不再反对乔治·B.麦克莱伦，但我依然认为，没有人能比乔治·B.麦克莱伦更适合领导军队。"

1862年9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除了蒙哥马利·布莱尔，其他人都一致反对乔治·B.麦克莱伦，几乎要公然抨击林肯，指责他恢复了乔治·B.麦克莱伦的指挥权。1862年9月5日，林肯对约翰·海伊说："虽然乔治·B.麦克莱伦最近的表现很糟糕，但我们必须重新任用他。在控制防御工事和组建军队方面，军中没有人能做到他的一半……无可非议的是，他对约

翰·波普的态度确实不对。他希望约翰·波普失败，这是不可原谅的。但现在，他非常重要，我们不能牺牲他。”后来，林肯说：“乔治·B.麦克莱伦虽然不会打仗，但擅长组织他人备战。”[48]

有情报称，罗伯特·E.李正率军渡过波托马克河，打算进入马里兰州。因此，联邦政府必须派军追击罗伯特·E.李及指定一名指挥官。林肯对乔治·B.麦克莱伦说：“将军，由你出任战场指挥官。”约翰·波普接到了解除职务的命令[49]。

战争结束后，指出军事行动中的错误是很容易的。当时的一些记载表明，林肯非常信任亨利·W.哈勒克和约翰·波普，但将希望寄托在了一个靠不住的人身上。吉迪恩·韦尔斯认为，亨利·W.哈勒克“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不“具备决断力”，“几乎没有军事才能”。在西部时，安德鲁·H.富特是亨利·W.哈勒克的下属，认为亨利·W.哈勒克“没有军事才能，但可能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政府官员”。蒙哥马利·布莱尔很了解约翰·波普。在1862年9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他说：“约翰·波普喜欢吹嘘和说谎，虽然勇敢，但没有谋略。”在1862年9月12日的会议上，蒙哥马利·布莱尔称，“不应该将指挥权交给”约翰·波普，还说：“乔治·B.麦克莱伦虽然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但却是所有将领中最优秀的一个……我们不乏能干的军官。因此，我们应该将他们找出来，委以重任。战争部长有义务挖掘人才。”蒙哥马利·布莱尔想到的一个合适人选是威廉·T.谢尔曼[50]。

第9节　罗伯特·E.李进军马里兰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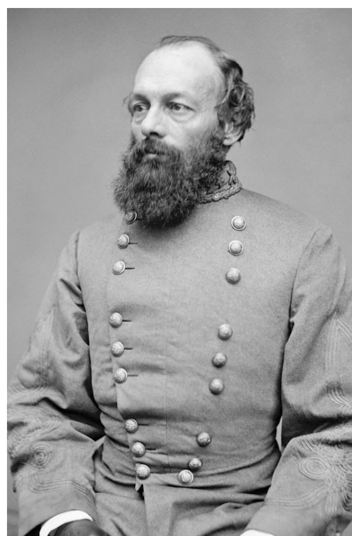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詹姆斯·朗斯特里特见到了罗伯特·E.李。以前，罗伯特·E.李是一名体格健硕、士气高昂的士兵，每一次行动中总会冲在最前面，显示出机警勇猛的男子气概。现在，他像一名坐在教室里的学生，专注地看着地图和文件。遇到不理解的地方，他经常会请教詹姆斯·朗斯特里特，然后找到切入点。当时，罗伯特·E.李在尚蒂利[51]，正面临一个困局。他并不打算在华盛顿附近的防御工事中进攻北方联邦军，因为现有军队无法包围北方联邦军，军队的供给也没有保障。他要么撤到一个更具优势的营地，要么进军马里兰州。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同气连枝。罗伯特·E.李认为，在马里兰州作战对自己更有利。但所有迹象表明，罗伯特·E.李更有可能“随时进攻北方联邦军”。如果计划成功，他会进军宾夕法尼亚州；如果战争继续，他会消灭乔治·B.麦克莱伦“兵力衰弱、士气低落的”军队，取得胜利。然而，他的士兵衣衫褴褛，一些人甚至没有鞋子。南方邦联军缺乏“物资储备，无力前行”。罗伯特·E.李写道：“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停下来。”他决定渡过波托马克河。除了“弹药和物资储备”，他没有其他可担心的事。他渴望获得别人的理解，于是，与詹姆斯·朗斯特里特聊到了墨西哥战争。在墨西哥战争中，威廉·J.沃思的军队“在吃了两天烤玉米和青橙的情况下，绕蒙特雷”行军。詹姆斯·朗斯特里特认为，他们完全可以依赖“马里兰州长满玉米和水果的田地”。

1862年9月3日，罗伯特·E.李开始向北行军。1862年9月4日，他写信给杰斐逊·戴维斯，说：“如果您不反对，我会向马里兰州进发”。但在他的信到达里士满前，北弗吉尼亚军已经越过波托马克河，高歌“马里兰州，我的马里兰州”，继续向弗雷德里克市行进。1862年9月6日，托马斯·J.杰克逊带领的先锋部队到达弗雷德里克市。

罗伯特·E.李渡过波托马克河的目的之一是，给马里兰州人民“解放自我的机会”。因此，他向马里兰州人民发表了讲话，称南方“非常理解”他们的错误，“看到姊妹州被剥夺了所有权力，沦为战败州时，心中无比愤慨”。“帮助你们挣脱枷锁”是我们进军的目标。但他很快意识到，马里兰州人虽然受到了压迫，但完全没有起义的意愿。无人响应的后果是，他无法获得军需品。罗伯特·E.李决定采购物资，但用的都是南方邦

联的货币或邦联各州的借据。农民、磨坊主和牧民不愿收南方邦联的货币或借据，因此，也不愿卖给南方邦联军小麦、面粉和牲畜。罗伯特·E.李曾打败了乔治·B.麦克莱伦和约翰·波普，却无法让农民们打麦，让磨坊主们磨面，更无法阻止牧民们将牲畜赶到宾夕法尼亚州。弗雷德里克的市民根本不欢迎南方邦联军，纷纷关了店门。

罗伯特·E.李希望，南方邦联能够与北方联邦和人民和平解决争端，条件是北方联邦必须承认南方各州独立。民主党拒绝了他的提议。这可能有助于民主党在即将到来的秋季选举中胜出。届时，南方会选出新的众议院成员，民主党人可能会宣布终止冲突。罗伯特·E.李不打算进攻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但可能会进攻哈里斯堡或摧毁横跨萨斯奎汉纳河的宾夕法尼亚铁路长桥。由于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州之间的交通已经被切断，一旦宾夕法尼亚铁路长桥被毁，萨斯奎汉纳河两岸的各州就只能顺着沿河铁路绕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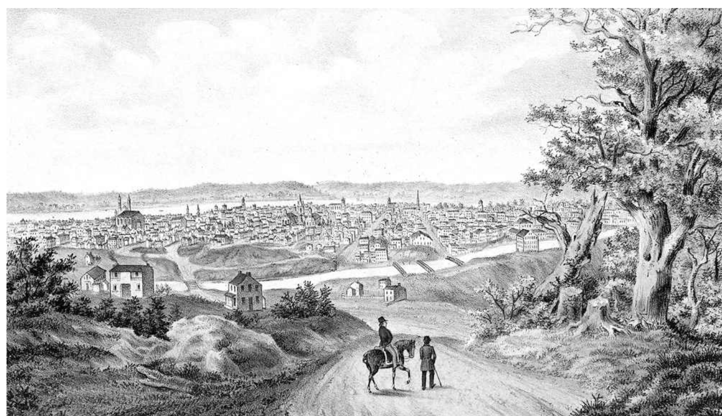


柯比·史密斯（1824—1893）

与此同时，如果罗伯特·E.李将北方联邦军驱逐出华盛顿，并击败北方联邦军，就可以阻止北方联邦军撤退到华盛顿的战壕中。内战期间，南方邦联的前景从未如此光明。1862年8月30日，柯比·史密斯打败了肯塔基州的一支北方联邦军，占领了列克星敦。路易斯维尔和辛辛那提岌岌可危。柯比·史密斯派一支军队前往辛辛那提的肯塔基州郊区的卡温顿。布拉克斯顿·布拉格率大军躲开了乔治·P.比尔，向北前往路易斯维

尔，希望肯塔基州同意他加入邦联。辛辛那提和路易斯维尔陷入一片不安与惊慌中。

罗伯特·E.李发现，自己不能再指望邦联政府。于是，为了获得足够的面粉供应，他决定在谢南多厄河谷开辟一条交通路线。然而，一支北方联邦军驻守在哈普斯渡口[52]。按照书中的军事理论，当南方邦联军渡过波托马克河的时候，北方联邦军就应该放弃哈普斯渡口。罗伯特·E.李曾想过撤离谢南多厄河谷。当时，乔治·B.麦克莱伦建议放弃哈普斯渡口，但亨利·W.哈勒克拒绝了他的建议。1862年9月10日，罗伯特·E.李被迫兵分两路。一路由托马斯·J.杰克逊指挥，从北方联邦军后方进入弗吉尼亚州，攻克了哈普斯渡口；另一路跟随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前往黑格斯敦。



辛辛那提



安德鲁·柯廷（1817—1894）

北方立刻陷入恐慌。华盛顿和巴尔的摩受到了罗伯特·E.李的威胁。哈里斯堡和费城的安全也受到他的威胁。布拉克斯顿·布拉格威胁着路易斯维尔和辛辛那提。面对层层威胁，最冷静的人也会感到紧张。掌握了相关消息的人比普通大众更焦虑，尤其是联邦内部委员会的成员。南方邦联军的兵力虽然被夸大了，但凭借其行动力和天才将领，实力依然不容小觑。罗伯特·E.李、托马斯·J.杰克逊和詹姆斯·朗斯特里特率五万五千名士兵，昂首阔步、信心十足地离开弗雷德里克。北方人完全陷入了恐慌，如同一个濒临灭绝的群体。在华盛顿，人们不再担心固若金汤的首都是否安全，而是担心伟大的事业就此终结。埃德温·斯坦顿最担心的是，南方邦联军可能会切断华盛顿与北方各州的通讯。他的不安很快流露了出来。“林肯说自己感觉很不好”“非常困惑和苦恼”[53]。纽约市的人们“惊慌失措”。罗伯特·E.李离开弗雷德里克后，直接去了宾夕法尼亚州。边境州的农民送走了妇女儿童，赶走了牲畜，武装起来准备抵抗南方骑兵，保卫自己的家园。哈里斯堡的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安德鲁·柯廷在信中表示，非常担心华盛顿。他集结了五万民兵，打算保卫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人民的言论正如在恐慌时期，人们从一个富庶城市听到的那样。吉迪恩·韦尔斯写道：“整个国家显得消沉绝望。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乔治·B.麦克莱伦的复职给军队带来了活力和希望。官兵们团结在乔治·B.麦克莱伦的周围，宣誓追随他。”[54]只有乔治·B.麦克莱伦及其军队才能扭转现在的局面。

1862年9月5日，乔治·B.麦克莱伦命军队从华盛顿出发。1862年9月7日，他也启程了。他必须改编自己的军队，保护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乔治·B.麦克莱伦向来比较谨慎，加上不确定南方邦联军的动向，因此，他一直行军缓慢。乔治·米德写道："最近的战事大大挫伤了我军的士气。南方邦联军的士气却节节攀升。"然而，好运降临在了乔治·B.麦克莱伦身上。罗伯特·E.李向三位将军下达了书面命令。命令中写明了南方邦联军的部署和行军方案。一位将军"将命令放在衣服里面的口袋里"，另一位将军詹姆斯·朗斯特里特记住了命令，"然后将密令吞了下去"，第三份命令丢失了。北方联邦军的一名列兵捡到了第三份命令，立刻将其交给了乔治·B.麦克莱伦。乔治·B.麦克莱伦给林肯总统发了电报，兴奋之情流露在了纸上。他说"我拿到了叛军的所有部署安排。如果我军能够很好地应对这次战事，我们就能胜券在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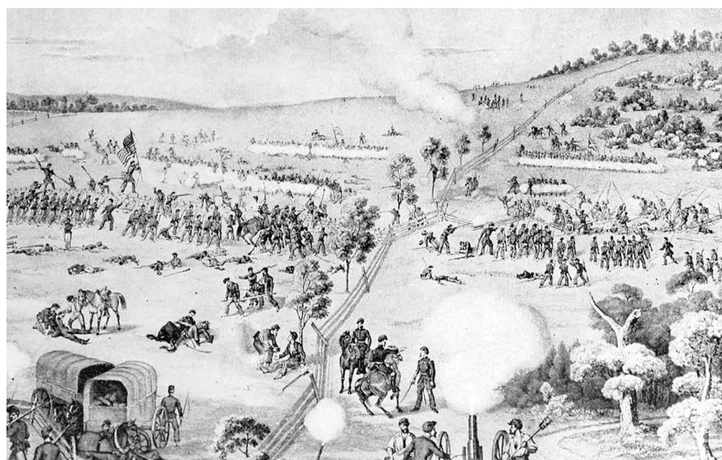
乔治·B.麦克莱伦的行动力很强，但与罗伯特·E.李或托马斯·J.杰克逊在类似情况下表现出来的行动力不同。他率军前行。1862年9月14日，北方联邦军赢得了南山战役，打通了南山山麓到安蒂特姆战场的道路[55]。此次胜利重振了北方联邦军的士气，鼓舞了林肯和北方人民。然而，乔治·B.麦克莱伦并没有为哈普斯渡口的驻军解围。

第三份丢失的命令被送往乔治·B.麦克莱伦处时，一位忠于南方邦联的公民也在场。他知道这份命令对南方邦联的重要性，于是赶往前线，在夜幕降临后，将信息告诉了一名邦联骑兵军官。该军官立即将消息告诉了南方邦联指挥官。1862年9月14日天亮前，罗伯特·E.李得知了消息，对乔治·B.麦克莱伦的疾速行军感到沮丧和不安。他率军离开了黑格斯敦，打算阻止北方联邦军越过南山，占领安蒂特姆河后面的夏普斯堡附近的据点。按照南方邦联军的部署安排，托马斯·J.杰克逊和攻克哈普斯渡口的分遣部队完成任务后，会直接前去与大军会合。罗伯特·E.李兵力微弱，正在等待托马斯·J.杰克逊和分遣部队的到来。至此，罗伯特·E.李进军马里兰州的计划宣告失败。现实打败了他。现在，他只能通过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恢复威望。费城和哈里斯堡已经脱离危险。与此同时，罗伯特·E.李的军队身处险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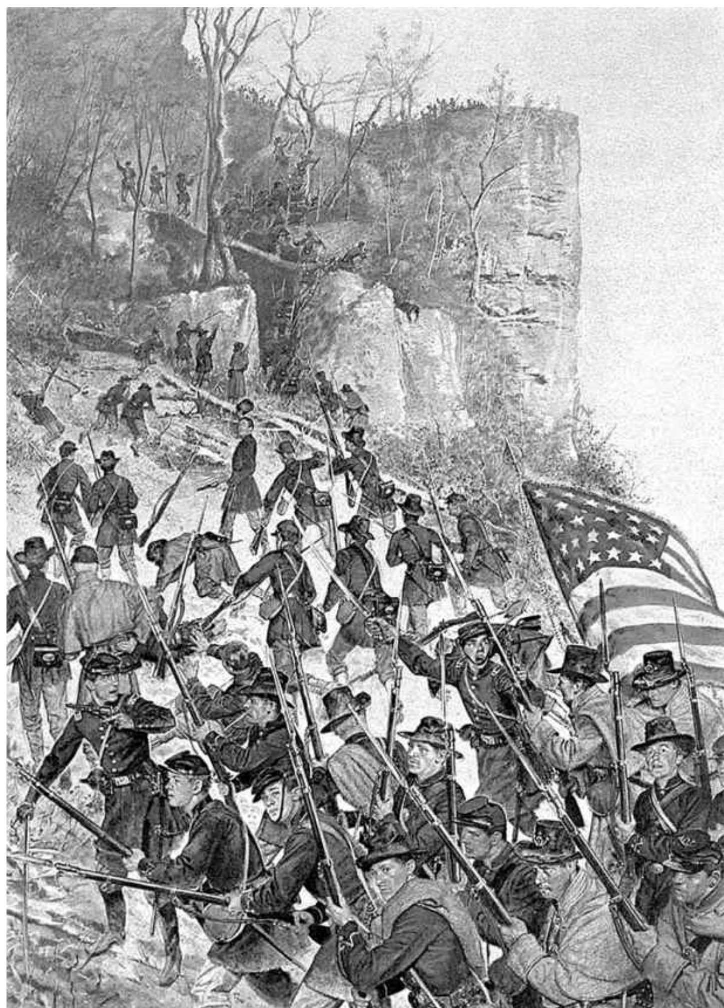
第10节　安蒂特姆战役

人们普遍认为，乔治·B.麦克莱伦应该在哈普斯渡口的分遣部队与罗伯特·E.李会合前，进攻罗伯特·E.李，而不是等到1862年9月17日，迎战整个南方邦联军。1862年9月17日，安蒂特姆战役爆发。罗伯特·E.李的“进攻孤立无援，枉费心力”。七万五千名联邦士兵对阵五万一千名邦联士兵。罗伯特·E.李对相对弱势的兵力“过于苛求”了。北方联邦军的伤亡人数达一万一千六百人，与南方邦联军的伤亡人数差不多[56]。

最终，乔治·B.麦克莱伦获胜。1862年9月19日，罗伯特·E.李撤出战场，重新渡过波多马克河，进入弗吉尼亚州。当时，乔治·B.麦克莱伦本来可以做得更多。但现在看来，只要乔治·B.麦克莱伦还是乔治·B.麦克莱伦，罗伯特·E.李还是罗伯特·E.李，就不可能有其他结果。尽管如此，对北方联邦军来说，战胜罗伯特·E.李依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乔治·B.麦克莱伦的大军自豪地穿过弗雷德里克的街头，唱着《留在我身后的女孩》，看起来像“一群溃不成军的逃犯”。安蒂特姆战役结束后，北方人的消沉变成了振奋[57]。



南山战役



联邦军攻下南山

第11节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安蒂特姆战役的主要历史意义在于，为林肯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提供了保障。前文已经提到，1862年7月22日，林肯暂缓发表宣言，希望在北方联邦军取得一次大捷后再发表。其间，林肯为发表宣言做了很多努力。虽然已经做出决定，但他的真正目的不是直接打击奴隶制，而是正式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1862年7月22日的内阁会议上，林肯说明了自己的意图。1862年9月22日的内阁会议上，他告诉顾问团，《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即将发表。他竭力抓住所有机会，为宣布解放奴隶不懈努力。这一点从他的书信、正式会面和私下谈话中都可以找到。面对奴隶制问题的激进一面，林肯与保守派争辩道："只要有一人可以用，我就不会放弃战斗。"面对激进派，他提出了保守的观点，强调要谨慎行事。他对筹办民族解放纪念仪式的牧师委员会说："我不想发布一则全世界都会看到，却注定无效的公文。"

有人支持林肯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也有人反对。林肯与保守派和激进派进行了交谈，聆听他们的观点，与他们分析利害，给不同的人留下了不同的印象。他的大部分言论都是边想边说的。与意气相投或强词夺理的人交流时，他有很多机会反复考虑自己的想法，看到问题的各个方面。事实上，林肯需要考虑的很多。他授权的依据是《宪法》赋予的战争权。虽然很多高级军官强烈反对为黑人而战，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不仅有助于他们的军事行动，还可以激发奴隶们对自由的渴望，使奴隶成为北方的支持者。这样一来，就可以削弱南方邦联军的实力，引导更多黑人加入北方联邦军。林肯的观点得到军官们的认可后，还必须确保得到北方人民的支持。可以肯定的是，激进派虽然吹毛求疵，但其支持会转变成一股力量。在筹集人力和财力方面，激进派的影响力非常大。然而，林肯不确定的是，普通百姓、主和的共和党人和好战的民主党人是否愿意支持《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此外，一直支持联邦的边境蓄奴州可能会反对解放奴隶。林肯对此非常苦恼。"但作为与不作为都面临重重困难。"与此同时，欧洲一定会支持林肯的《解放解放黑人宣言》。当横在南北阵营之间的真正问题被揭开时，英国和法兰西帝国必定不会承认南方邦联。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公然进行反奴隶制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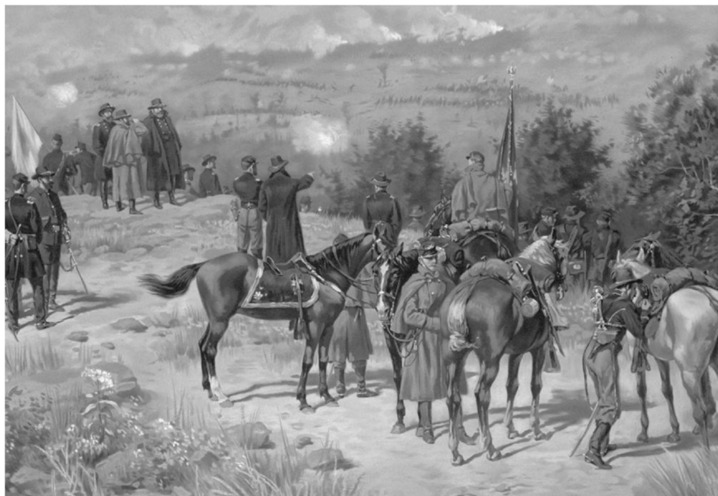
争会重新激起民主党人的反对，给他们一张反对联邦政府的“牌”。但林肯认为，民主党人的反对并不能阻碍伟大时刻的到来，因为在北方，党派反对政府的现象司空见惯。总之，林肯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打消了所有疑虑。他认为宣布解放奴隶是军情所迫，北方人会理解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林肯越来越坚信自己在1862年7月得出的结论，认为民意正在朝自己靠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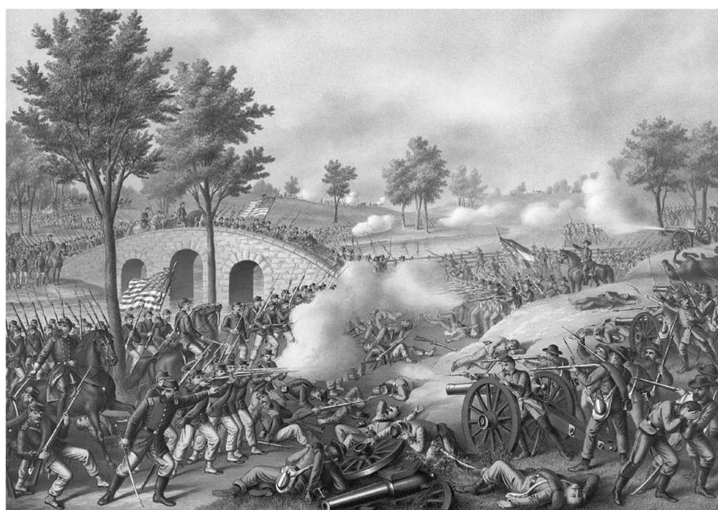
在安蒂特姆战役中，联邦军向邦联军射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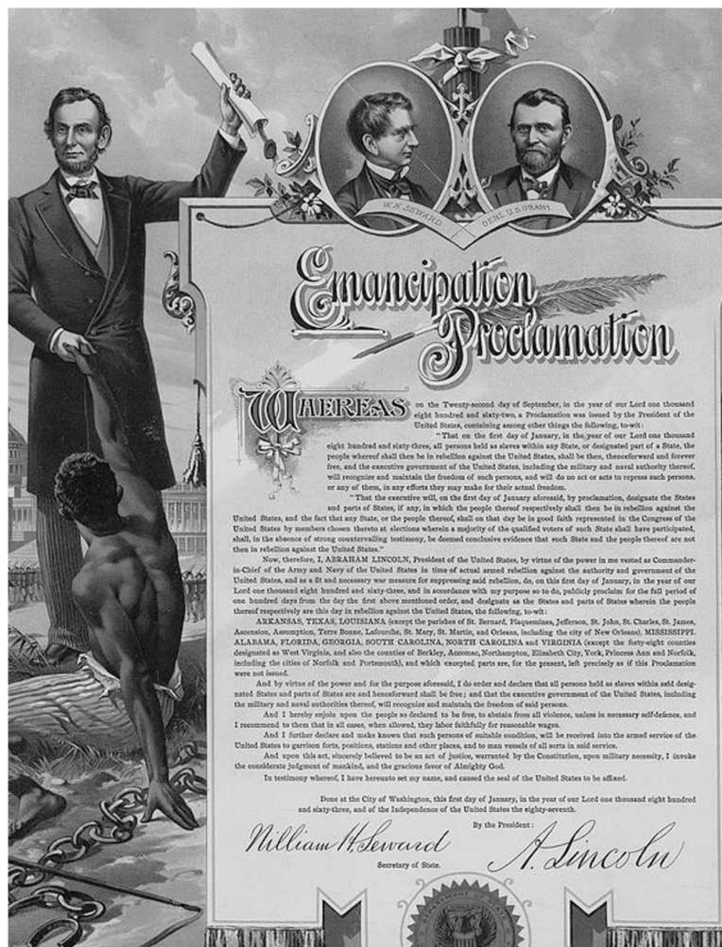
在安蒂特姆战役中，联邦军炮击邦联军



乔治·B.麦克莱伦遥望安蒂特姆战场



安蒂特姆战役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WHEREAS on the Twenty-second day of September,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one thousand eight hundred and sixty-two, a Proclamation was issu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taining among other things the following, to-wit:

"That on the first day of January,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one thousand eight hundred and sixty-three, all persons held as slaves within any State, or designated part of a State, the people whereof shall then be in rebellion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be then, thenceforward and forever free, and the executiv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the military and naval authority thereof, will recognize and maintain the freedom of such persons, and will do no act or acts to repress such persons, or any of them, in any efforts they may make for their actual freedom.

"That the executive will, on the first day of January aforesaid, by proclamation, designate the States and parts of States, if any, in which the people thereof respectively shall then be in rebellion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ct that any State, or the people thereof, shall on that day be in good faith represented in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members chosen thereto at elections wherein a majority of the qualified voters of such State shall have participated, shall, in the absence of strong countervailing testimony, be deemed conclusive evidence that such State and the people thereof are not then in rebellion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Now, therefore, I, ABRAHAM LINCOLN,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virtue of the power in me vested as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Army and Nav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ime of actual armed rebellion against the authority and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 a fit and necessary war measure for suppressing said rebellion, do, on this first day of January,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one thousand eight hundred and sixty-three, and in accordance with my purpose so to do, publicly proclaim for the full period of one hundred days from the day the first above mentioned order, and designate as the States and parts of States wherein the people thereof respectively are this day in rebellion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the following, to-wit:

ARKANSAS, TEXAS, LOUISIANA (except the parishes of St. Bernard, Plaquemines, Jefferson, St. John, St. Charles, St. James, Ascension, Assumption, Terre Bonne, Lafourche, St. Mary, St. Martin, and Orleans, including the city of New Orleans), MISSISSIPPI, ALABAMA, FLORIDA, GEORGIA, SOUTH CAROLINA, NORTH CAROLINA and VIRGINIA (except the forty-eight counties designated as West Virginia, and also the counties of Berkley, Accomac, Northampton, Elizabeth City, York, Princess Ann and Norfolk, including the cities of Norfolk and Portsmouth), and which excepted parts are, for the present, left precisely as if this Proclamation were not issued.

And by virtue of the power and for the purpose aforesaid, I do order and declare that all persons held as slaves within said designated States and parts of States are and henceforward shall be free; and that the executiv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the military and naval authorities thereof, will recognize and maintain the freedom of said persons.

And I hereby enjoin upon the people so declared to be free, to abstain from all violence, unless in necessary self-defence, and I recommend to them that in all cases, when allowed, they labor faithfully for reasonable wages.

And I further declare and make known that such persons of suitable condition, will be received into the armed serv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garrison forts, positions, stations and other places, and to man vessels of all sorts in said service.

And upon this act, sincerely believed to be an act of justice, warranted by the Constitution, upon military necessity, I invoke the considerate judgment of mankind, and the gracious favor of Almighty God.

In testimony whereof, I have hereunto set my name, and caused the seal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affixed.

Done at the City of Washington, this first day of January,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one thousand eight hundred and sixty-three, and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eighty-seventh.

By the President:

William H. Seward, Secretary of State.

A. Lincoln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1862年9月22日，林肯召集内阁，从阿蒂默思·沃德 [58] 寄给他的一本书中，选读了一篇题为《尤蒂卡的高压暴行》的故事。故事内容如下：

1856年秋天，我在尤蒂卡表演。尤蒂卡是纽约州最大的城市之一。人们热烈欢迎我，报社对我大肆褒奖。一天，我像平常一样，站在华丽的舞台上讲述野兽与蛇的故事。忽然，我看到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他走向装有《最后的晚餐》中的人物蜡像的笼子，抓住犹大蜡像的一只脚，拖了出去。然后，他开始狠狠地揍蜡像。这一幕让我感到震惊和厌恶。

我喊道："你到底在干什么？"

他说："你为什么将这个懦夫带到这儿来？"然后又在蜡像头上狠狠打了一拳。

我说："你这个恶棍，那只是一个象征叛徒的蜡像。"

他说："你说的很对。但我告诉你，犹大这种人绝对不会在公开场合露出本来面目。"话音未落，他已经将蜡像的头砸了一个坑。

这个年轻人来自尤蒂卡的一个大家族。我向法院起诉了他。陪审团判他为三级纵火罪。

林肯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非常开心地读着。除了埃德温·斯坦顿，其他内阁成员也一起笑着。随后，他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谈起了1862年7月22日以来，他的思想变化。林肯说："现在，叛军被赶出了马里兰州。我将履行我对自己和上帝的承诺。我想让你们听听我写的内容，但不期望你们对此提出建议。我已经下定决心。"随后，他宣读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自1863年1月1日起，各州或某州指定地区的所有奴隶及参与反叛联邦的所有人，将永远自由。"[59] 对于坚持奴隶制的州，林肯再次声明了有偿解放和重获自由黑人的殖民化政策，并表示，他会在适当的时候提议补偿叛乱州的忠诚公民的损失。除了蒙哥马利·布莱尔，内阁的所有成员几乎都认可了解放宣言。蒙哥马利·布莱尔认为，解放宣言只是一项权宜之策，并非长久之计。1862年9月23日，《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发表。

[1] 《伊利亚特》，第4卷。——原注

[2] 《亨利四世》《亨利五世》，威廉·莎士比亚著。——原注

[3] 《美国金融史》，第267页，第329页，第145页，戴维斯·R.杜威著。——原注

[4] 进口关税、债券利息均需用铸币支付。一亿五千万美元包括1862年7月授权发行的五千万美元，其中的两千五百万已经发行。——原注

[5] 《法定纸币史》，第59页，埃尔布里奇·G.斯波尔丁著。——原注

[6] 《威廉·P.费森登传》，第1卷，第194页。——原注

[7] 实际数额为四亿四千九百三十三万八千九百零二美元。《美钞》，第139

页，约翰·J.诺克斯著。——原注

[8] 《法定纸币史》，埃尔布里奇·G.斯波尔丁著。《美国史》，第3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美国金融史》，戴维斯·R.杜威著。《威廉·P.费森登传》，第1卷。《约翰·谢尔曼四十年的回忆》，第1卷。《萨蒙·P.蔡斯传》，罗伯特·沃登著。——原注

[9] 指1861年12月2日到1862年7月17日进行的第三十七届国会第二次会议。——原注

[10] 该法案于1862年1月31日通过。——原注

[11] 《美国金融史》，第301页，戴维斯·R.杜威著。——原注

[12] 《美国史》，第4卷，第58页等，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充公法令》见第60页。《莱曼·特朗布尔传》，第173页等，贺拉斯·怀特著。《美国革命史》，詹姆斯·G.兰德尔著，1912年10月。——原注

[13] 《美国成文法精选著1861—1898》，第35页，第42页，麦克唐纳著。——原注

[14] 《国会联合决议》的影响力并没有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说得那么大。1862年4月10日通过的决议规定："联邦应该与逐步废除奴隶制的州合作，给予其经济援助，补偿体制变化造成的公共和个人的损失。援助费用由该州自主支配。"国会并未同意这项决议，只是声明"应该"合作。国会态度比林肯预想的更模糊。但这一决议几乎没有得到北方奴隶州的回应，对南方邦联也没有什么影响。参见第三十七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的《国会议事录》。——编者注

[15] 不确定的是，在七日之战中，北方联邦军的战败是否让林肯"坚信"必须废除奴隶制。我们并不知道林肯下定决心的具体时间。各种言论和行动都表明，林肯很快会有动作。七日之战无疑加快了林肯做决定的速度。戴维·荷马·贝茨说，1862年7月初，林肯已经开始拟写废奴令。《电报局的林肯》，第138页到第142页。1862年7月22日，林肯将废奴令递交给了内阁。1862年7月1日，乔治·麦克莱伦领导的战役结束。——编者注

[16] 最初，林肯主要依靠中美洲殖民地区，尤其是煤矿地区。——编者注

[17] 1862年7月14日，二十位边境州代表和参议员提交了一份回复。在回复中，他们就林肯的补偿性政策展开了争辩。补偿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南方奴隶主疏远联邦。大多数人反对向已经脱离联邦的州颁布解放宣言。其他八名国会议员同意林肯的提议。《林肯选集》，第5卷，第319页。《纽约论坛报》，1862年7月19日。——编者注

[18] 1862年7月11日，国会通过授权法案，授权财政部额外发行一亿五千万法定货币。——原注

[19]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70页。《美国史》，第4卷，第69页，注释二，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20] 《在白宫的六个月》，第20页，弗朗西斯·B.卡彭特著。——原注

[21] 《在白宫的六个月》，第22页，弗朗西斯·B.卡彭特著。——原注

[22] 《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的书信》，第1卷，第255页，萨拉·诺顿、德沃尔夫·豪著。——原注

[23] 《美国国会议事录》，第1154页，第3127页，1862年3月11日，1862年7月5日。《萨迪厄斯·史蒂文斯传》，第183页等，詹姆斯·伍德伯恩著。——原注

[24] 《卡尔·舒尔茨回忆录》，第2卷，第314页。——原注

[25] 《卡尔·舒尔茨的发言、书信和报告》，第1卷，第206页，弗雷德里克·班克罗夫特著。《林肯传》，第93页，卡尔·舒尔茨著。——原注

[26] 《美国史》，第4卷。《讲稿》及其参考文献，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27] 《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的书信》，第1卷，第225页，1862年7月31日。——原注

[28] 《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的书信》，第1卷，第322页。——原注

[29] 《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的书信》，第1卷，第255页，1862年7月31日。——原注

[30] 《卡尔·舒尔茨的发言、书信和报告》，第1卷，第206页，1862年5月16日。——原注

[31] 林肯于1862年7月1日发表了呼吁，并要求士兵服役期为三年。——原注

[32] 《卡尔·舒尔茨的发言、书信和报告》，第1卷，第209页，1862年7月5日。——原注

[33] 1862年8月4日，林肯下令扩充民兵部队，征兵三十万，服役期为九个月。此次共征得八万七千五百八十八人。——原注

[34] 《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269页。——原注

[35] 虽然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约翰·波普在新马德里和第十号岛的胜利并不重要。但在当时，这些胜利反响强烈，约翰·波普成为北方人心中的英雄。当然，约翰·波普的胜利有助于北方联邦军占领密西西比河。成立弗吉尼亚军是为了促进华盛顿附近的防御合作及减轻乔治·B.麦克莱伦的压力。1862年6月26日，林肯组建了弗吉尼亚军。——编者注

[36]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120页。——原注

[37] 《威廉·T.谢尔曼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254页。《威廉·T.谢尔曼将军与参议员之间的通信》，第153页。——原注

[38] 在当时的背景下，将领的名声很重要。与其他人相比，约翰·波普和亨利·W.哈勒克更出名，更受人民的重视。在肯塔基州，威廉·T.谢尔曼遇到了困难，因夏洛战役受到了严厉批评。乔治·托马斯鲜为人知。尤利西斯·S.格兰特也受到了夏洛战役的影响。对他们三个人来说，没有卷入华盛顿和弗吉尼亚州的困局是幸运的。——编者注

[39] 哈里森栈桥即现在的伯克利种植园，是哈里森家族的故居。种植园上游沿詹姆斯河的低地南侧，是联邦军的营地和补给船的停泊处。——编者注

[40] 《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207页。——原注

[41] 托马斯·J.杰克逊暂时占领了马纳萨斯中转站，破坏了当地的交通。——编者注

[42] 一般认为，第二次布尔溪战役发生在1862年8月29日和1862年8月30日。——编者注

[43] 《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62页，约翰·海伊著。——原注

[44] 美国内战中，第二次布尔溪战役是最具争议性的一场战役。南方邦联军取得了辉煌胜利，北方联邦军惨败。战败责任落在了几位联邦军官身上。约翰·波普并不是一位能担重任的大将。此外，大量证据表明，乔治·B.麦克莱伦一直没有

派援军支援约翰·波普，他和一些将领对约翰·波普充满敌意。第二次布尔溪战役引发了著名的“菲茨·约翰·波特事件”，即乔治·B.麦克莱伦的好友菲茨·约翰·波特被指控违背军令，被解职，直到战后才复职。——编者注

[45] 乔治·B.麦克莱伦率波托马克军从哈里森栈桥向亚历山大行进。其中一些队伍已经不受他指挥，跟随约翰·波普参加了第二次布尔溪战役。据称，乔治·B.麦克莱伦的部分队伍被扣留，被迫推迟了从弗吉尼亚半岛到亚历山大的行动。但有趣的是，他在军中的影响力仍然很大。——编者注

[46]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104页。——原注

[47] 《萨蒙·P.蔡斯传》，第459页，罗伯特·沃登著。——原注

[48] 《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64页，约翰·海伊著。——原注

[49] 约翰·波普率领的弗吉尼亚军随即解散。约翰·波普成为西北边疆的军队指挥官，总部设在圣保罗。他觉得华盛顿的人对他都很不友好，包括林肯。在西北地区，他很有作为，使当地居民免受了印第安人的骚扰。——编者注

[50]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104页，第119页，第120页，第125页，第126页。《美国史》，第4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51] 尚蒂利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1862年9月1日，尚蒂利战役爆发。——译者注

[52] 内战期间，哈普斯渡口位于谢南多厄河谷与波多马克河的交接处，拥有军械库和兵工厂。因此，北方联邦和南方邦联都想得到哈普斯渡口。——译者注

[53] 《萨蒙·P.蔡斯传》，第466页，罗伯特·沃登著。——原注

[54]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129页。——原注

[55] 南山战役中，南北双方都只有部分兵力参战。罗伯特·E.李知道计划已经泄露，因此，他命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和丹尼尔·H.希尔守住关口，协助他攻克哈普斯渡口，然后集结兵力进攻乔治·B.麦克莱伦。——编者注

[56] 《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92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原注。1862年9月13日，托马斯·J.杰克逊围攻哈普斯渡口。1862年9月15日，哈普斯渡口的北方联邦驻军投降。1862年9月17日，托马斯·J.杰克逊与罗伯特·E.李会合，展开了安蒂特姆战役。安蒂特姆战役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862年9月17日下午，留下清理哈普斯渡口的安布罗斯·P.希尔赶到战场，在著名的石桥遏制了安布罗斯·伯恩赛德的进攻。乔治·B.麦克莱伦并没有全军出动。1862年9月18日，战斗暂停，罗伯特·E.李有了喘息的机会。因此，乔治·B.麦克莱伦受到了多方谴责。——编者注

[57] 《美国史》，第4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58] 阿蒂默思·沃德（Artemus Ward，1834—1867），美国喜剧作家查尔斯·法勒·布朗的笔名。——译者注

[59] 这只是一份拟写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最终的宣言于1863年1月1日发表。在最终的宣言中，林肯的陈述为：“凡叛乱诸州或地区的奴隶，将永远自由。其他蓄奴地区奴隶的地位依旧不变。”因此，实际上，该宣言并没有真正解放每一个奴隶，但为解放所有奴隶的宪法修正案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战争制定了政策。——编者注

第5章　危机：北方联邦军接连失利

第1节　1862年秋季选举

1862年秋季的选举投票趋势似乎对总统不利。在1862年10月和1862年11月的选举中，纽约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表态反对林肯。之前，除了新泽西州，其他州都投票支持林肯。民主党人赢得了国会议员的支持。他们如果在其他州拥有多数席位，将控制下一届众议院。在失利的情形下，新英格兰州、密歇根州、艾奥瓦州、加利福尼亚州、明尼苏达州、堪萨斯州、俄勒冈州和边界蓄奴州拯救了林肯。造成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发表。为联邦而战变成了为黑人而战，很多人视其为一种耻辱。相反地，"《宪法》革新，联邦守旧"成为大众的普遍观点。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导致了林肯的失利[1]。但造成各州不满的原因，主要是战场上一直没有传来捷报。虽然安蒂特姆战役大捷令北方人欢欣鼓舞，但随后，罗伯特·E.李的大军重渡波托马克河，未伤一兵一卒。如果乔治·B.麦克莱伦消灭了罗伯特·E.李的大军，乔治·P.比尔在肯塔基州大获全胜，那么林肯一定会得到联邦各州的支持。

激进分子卡尔·舒尔茨的观点值得关注。通过他的观点，我们了解了林肯受到的谴责。卡尔·舒尔茨在军中写信给林肯说："选举结果是对政府的严厉谴责，"而且政府应该受到谴责。"政府将共和党人领导的主要军力置于南方邦联军手中……在这场战争中，哪位共和党将军有过公平的机会？难道乔治·B.麦克莱伦、乔治·P.比尔、亨利·W.哈勒克和他们的属下心腹没有申明、获得、提出要求吗？政府是时候改变了。让我们接受全心全意作战的将军们的指挥吧……让所有不能胜任指挥官的将军们卸下盔甲吧……西点军校如果难当大任，就让它名声扫地。"[2]另一名激进分子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写道："如果战场上捷报频传，那么秋季选举中的失败将对政府毫无影响。"[3]

第2节　辛辛那提的恐慌



戴维·托德（1805—18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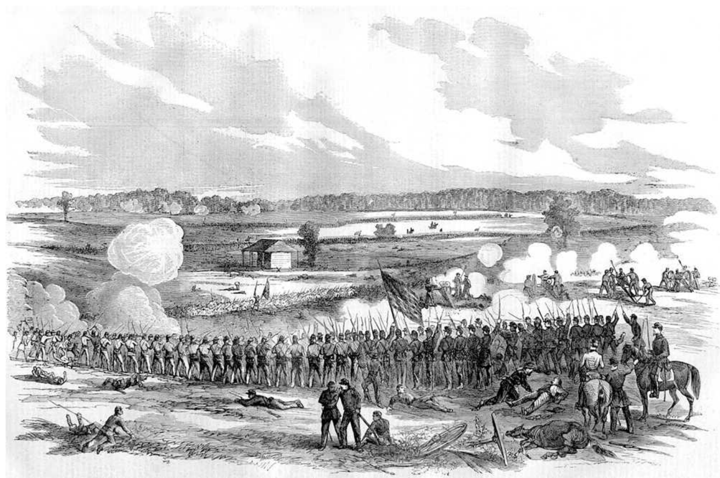
当罗伯特·E.李在弗吉尼亚州推进南方邦联大业的时候，布拉克斯顿·布拉格和柯比·史密斯正在肯塔基州展开行动，努力挽回南方邦联在西部的损失。柯比·史密斯打败了北方联邦军，占领了列克星敦。列克星敦是亨利·克莱的家乡，也是国家花园——蓝草区的中心。印第安纳州州长奥利弗·P.莫顿发电报给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说：“失去列克星敦相当于失去肯塔基州的心脏，打通前往俄亥俄河的道路。”柯比·史密斯的军队确实威胁到了辛辛那提和路易斯维尔，造成了当地人的巨大恐慌。辛辛那提宣布军事管制，关闭了所有商铺，责令暂停了所有交易。能打仗和能干活的人全部受命聚集在投票处，以便进行军事演习或劳动。街上的汽车都停了下来，人们排成长队操练，其中不乏名流、部长、法官等，许多人已经年过四十五岁。据说，一家报社发表了反动言论，但很快受到了镇压。俄亥俄州州长戴维·托德赶到辛辛那提，号召所有忠于联邦的人参军入伍。与此同时，柯比·史密斯派一支小分队驻扎在距辛辛那提几英里的地方。恐慌笼罩着整个辛辛那提。清晨，号声响起，召集士兵们武装起来。数百名劳工领命加固战壕，妇女们为即将到来的战役准备棉布和绷带。每个人都知道，战争已经临近。恐慌在俄亥俄州迅速蔓延。俄亥俄州州长戴维·托德召集武装民兵的号令迅速得到了回应。数千人带着双筒散弹枪和小口径步枪涌进辛辛那提。后来，他们被称为步枪猎

人。此时，柯比·史密斯认为自己没有足够军力进攻辛辛那提。在等待布拉克斯顿·布拉格的军队期间，柯比·史密斯撤回了部分小分队。辛辛那提如释重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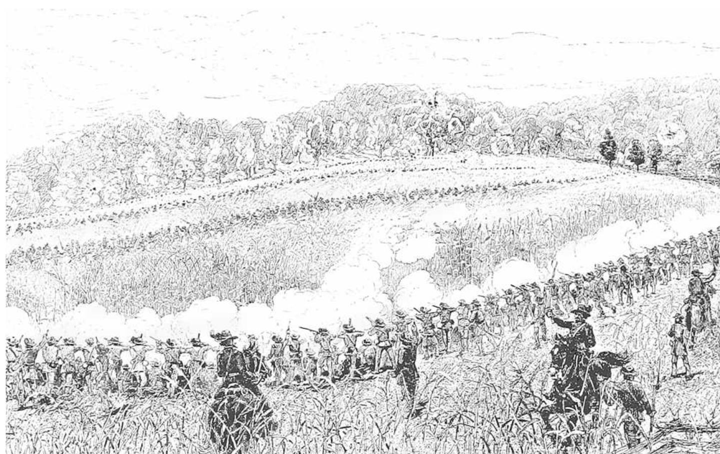
为了争夺路易斯维尔，布拉克斯顿·布拉格与乔治·P.比尔展开了一场较量。南方邦联军的行军路线较短，暂时领先，驻扎在路易斯维尔和北方联邦军之间。布拉克斯顿·布拉格如果全速前进，可能已经攻克路易斯维尔，但他拖延了。也许是由于战事的重担让他心生畏惧，对南方邦联军失去了信心，不愿继续前行。与此同时，乔治·P.比尔来到布拉克斯顿·布拉格的后方。两军对峙，战争一触即发。两位指挥官都想开战，但不愿在自己选择的战场上冒险一战。随后，一场对抗演习开始。乔治·P.比尔担心开战会使路易斯维尔沦陷。布拉克斯顿·布拉格担心战争会折损兵力。双方的物资都不充足，几乎都只剩三天的物资。布拉克斯顿·布拉格离开了正北的大道。乔治·P.比尔一路畅通，迅速进入了路易斯维尔。因此，南方邦联军进军肯塔基州的计划失败，进军马里兰州的计划也失败了。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南方邦联军选择进军的地区，大部分人支持北方联邦。布拉克斯顿·布拉格写道："我们必须放弃肯塔基州的蓝草区，任其自由发展。肯塔基人对安逸生活的热爱和对损失金钱的恐惧，是导致我们失败的最大原因。"

第3节　乔治·P.比尔和奥利弗·P.莫顿

路易斯维尔已经脱离危险。于是，乔治·P.比尔乘胜追击。两军在佩里维尔进行了一场恶战，双方将军都声称自己赢了[4]。1862年10月9日，布拉克斯顿·布拉格率军撤退，向南行进。乔治·P.比尔并没有全力追击，也没有追上南方邦联军，但依然将南方邦联军赶出了肯塔基州。



佩里维尔战役



佩里维尔战役中联邦军在玉米田里作战

因为东部的激进派反对乔治·B.麦克莱伦，所以西部的激进派也反对

乔治·P.比尔。激进派有自己的领袖，即印第安纳州州长奥利弗·P.莫顿。奥利弗·P.莫顿是好战的西部各州长中最出众、最活跃的州长。北方各州的州长是影响初期战事的重要因素。联邦政府要想实现征兵目标，必须依靠北方各州的州长，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他们的装备。由于印第安纳州的地理位置和其边境民主党人的强烈反对，奥利弗·P.莫顿要克服的困难比其他州长多。他全身心投入战斗，希望自己为州政府付出的努力能够在军事上体现出来。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乔治·P.比尔的蔑视，甚至在与华盛顿的通信中，公然指责乔治·P.比尔“支持反叛”。奥利弗·P.莫顿虽然廉洁，但其副官都是一些粗俗狡诈的小人。他测试副官是否适合文职和军职的标准是，他们对自己是否忠诚或绝对服从自己，而不是内在的诚实和高尚的品质。他视乔治·P.比尔为敌人，认为打垮不能为自己所用的人是对国家负责，对自己负责。

林肯意识到了联邦政府的不满情绪。1862年10月16日，他提议，如果更换指挥官是最好的方法，那么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他对乔治·P.比尔的拖延心怀不满。奥利弗·P.莫顿和埃德温·斯坦顿向他不断施压，加上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的民意，林肯决定更换主将。于是，乔治·P.比尔被撤职，由威廉·罗斯克兰斯接替。在做决定时，林肯犯了一个错误。内战结束后十四年，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观点无疑是合理的，他说：“乔治·P.比尔的天赋足以担任最高指挥官。”[5]

第4节　乔治·B.麦克莱伦被撤职

现在，如果波托马克河两岸的情形发生转变，主将换成乔治·B.麦克莱伦，最后采取的行动也是一样的。乔治·B.麦克莱伦没有及时发起攻击，林肯和北方人对此很失望。1862年10月1日，林肯前去看望乔治·B.麦克莱伦，在军中待了三天。其间，林肯召集各将领举行了会议。经多方观察，他命乔治·B.麦克莱伦回到华盛顿后，“渡过波托马克河，向南方邦联军开战或驱其南下。”然而，乔治·B.麦克莱伦迟迟未动，一心想着“待万事俱备”。吉迪恩·韦尔斯在1862年10月13的日记中写下了“令人痛心的情报：叛军的骑兵部队围着凯旋的波托马克大军绕了一圈，先从其上方渡河……然后从乔治·B.麦克莱伦和我军的下方再次渡河。”[6] 乔治·米德写道：“对乔治·B.麦克莱伦来说，这是个耻辱。我担心此次战役会对他造成严重伤害。”[7]

1862年10月22日，吉迪恩·韦尔斯在日记中写道：“安蒂特姆战役结束一个多月后，北方联邦军安静地待在营地休整。整个北方都很焦虑，却无计可施……乔治·B.麦克莱伦按兵不动，应了敌人之前的断言。林肯称之为‘迟迟未动’，乔治·B.麦克莱伦为此非常苦恼。”[8] 乔治·米德非常敬重乔治·B.麦克莱伦，但认为“他过于谨慎小心，如果能稍微果断一点，其将军威望可能会更大。”[9] 1862年10月26日，十一万六千名北方联邦军开始渡过波托马克河。1862年11月1日，最后一支师团顺利渡河。南方邦联军迅速后撤。1862年11月7日，在沃伦顿附近，北方联邦军集结。从林肯那儿得知，乔治·B.麦克莱伦已经被撤职。安布罗斯·伯恩赛德担任了北方联邦军总指挥。1862年11月8日，乔治·米德写道：“全军上下士气低落。据说，安布罗斯·伯恩赛德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公开说自己不适合担任此职。现在，只有乔治·B.麦克莱伦能掌控集结的大军。”[10] 以埃德温·斯坦顿和萨蒙·P.蔡斯为首的激进派不断向林肯施压，影响了罢免乔治·B.麦克莱伦的决议。除非林肯和埃德温·斯坦顿找到具备同样指挥能力的将领，否则不应该罢免乔治·B.麦克莱伦。林肯逐渐意识到确实应该如此。在给卡尔·舒尔茨的一封信中，他说“战争需要的是军事知识”，而不是“政治关系”[11]。激进派参议员本杰明·韦德向林肯施压，要求罢免乔治·B.麦克莱伦。林肯对他说：“请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我罢免了乔治·B.麦克莱伦，应该任谁担任此职呢？”本杰明·韦德说：“任何人都可以。”林肯回复道：“韦德，任何人都会效忠你，而不是我。我必须慎重选择。”[12]

乔治·米德和约翰·F.雷诺兹及军队的其他将军前来拜访乔治·B.麦克莱伦，对其离去表示遗憾，“真诚希望他能尽快回来”。乔治·米德写道：“乔治·B.麦克莱伦非常感动，差一点儿涕泪交零。他说离开军队是对他最沉重的打击。”乔治·米德还说：“大军士气大减。”弗朗西斯·A.沃克事后写道：“官兵们都认为，一个能牵动大军心弦的人绝不是平庸之辈，一个能重创约瑟夫·E.约翰斯顿和罗伯特·E.李的将军也不是等闲之辈。”和南方邦联军交战时，乔治·B.麦克莱伦军队的伤亡人数也许就证明了弗朗西斯·A.沃克的判断。几乎每场战役中，南方邦联军的伤亡人数都超过了乔治·B.麦克莱伦军队的伤亡人数。北方联邦军的后备军力多于南方。因此，在北方联邦军能够继续作战的情况下，南方邦联军如果继续大规模伤亡，定会走投无路。弗朗西斯·W.帕尔弗里写道：“虽然南方邦联军正方兴未艾，军队规模庞大，但乔治·B.麦克莱伦运筹帷幄，重创了南方邦联军，战绩骄人。”

内战结束十四年后，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坦率语录具有重要意义。他说评论乔治·B.麦克莱伦时应该考虑到，战争期间，焦虑的人民和国会都盯着他，他肩负着巨大而沉重的责任。“如果他没有获胜，可能是因为获胜的条件尚不充分。如果他能像威廉·T.谢尔曼、乔治·托马斯或乔治·米德一样作战，如果他能一路浴血奋战，我断然不会认为他毫无功绩。”罢免乔治·B.麦克莱伦十九天后，林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给卡尔·舒尔茨的信中，他写道：“我确实对乔治·P.比尔和乔治·B.麦克莱伦的按兵不动心存不满，但在罢免他们之前，我非常担心找不到能够胜任的继任者。很抱歉，我必须说，我的忧虑从未减少半分。”[13]

第5节　安布罗斯·伯恩赛德

林肯虽然认为必须从政治角度出发，做出正确的决定，但在选择乔治·B.麦克莱伦的继任者一事上，他本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在坎布里奇，一个静养深思的激进分子提议进行考评。1865年1月，威廉·T.谢尔曼申请考评 [14] 。林肯、埃德温·斯坦顿和亨利·W.哈勒克应该认真考虑考评。“安布罗斯·伯恩赛德或许能够在战场上指挥十万人，但他真的能吗？”[15] 他无法证明自己适合担任总指挥，也拒绝了两次，再三告诉林肯和埃德温·斯坦顿，说自己不能胜任总指挥一职，乔治·B.麦克莱伦是该职位的最佳人选。如果只是要求安布罗斯·伯恩赛德接受任命，他一定会拒绝。但当晋升的命令下达时，他必须服从命令。



安德鲁·A.汉弗莱斯（1810—1883）

约翰·C.罗普斯认为，总指挥一职应该由威廉·B.富兰克林担任 [16] 。乔治·米德、约翰·F.雷诺兹或安德鲁·A.汉弗莱斯可能都在林肯的考虑范围内。乔治·米德曾在七日之战中担任旅长，战绩显著。在安蒂特姆战役中，他在战火“最密集”的时刻率兵作战。约瑟夫·胡克受伤时，乔治·B.麦克莱伦命乔治·米德指挥军队。战后，林肯巡视安蒂特姆时，乔治·米德陪

同林肯和乔治·B.麦克莱伦视察了战场。其间，乔治·B.麦克莱伦高度赞扬了乔治·米德的工作 [17] 。令人惊讶的是，乔治·米德虽然给林肯留下了好印象，乔治·B.麦克莱伦也对他大加赞赏，但并未成为波托马克军将领的候选人。当时，他本来可以证明自己的能力，但在八个月后才做到 [18] 。

安布罗斯·伯恩赛德品格高尚，性情温和，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却在任总指挥的八十天里闷闷不乐。很快，他的表现证明自己无法胜任总指挥，甚至常常坦白自己的无能。罢免乔治·B.麦克莱伦意味着激进分子占了上风。下次作战时，北方联邦军可能会发起一场猛攻。安布罗斯·伯恩赛德赞成主动出击，但他和林肯都没有充分考虑到敌方指挥官的文韬武略。

第6节　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

1862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安布罗斯·伯恩赛德率十一万三千名精兵强将驻扎在拉帕汉诺克河的北岸，正对着弗雷德里克斯堡。弗雷德里克斯堡驻扎着罗伯特·E.李的七万两千名大军。安布罗斯·伯恩赛德提议渡河，并选定了进攻南方邦联军。对罗伯特·E.李来说，北方联邦军的任何举动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开战前一天晚上，安布罗斯·伯恩赛德意识到自己能力不足，心存畏惧，变得越来越任性、急躁、鲁莽。他稀里糊涂地想出了一个华而不实的计划，下令左翼军队发起进攻。这种作战方式必败无疑。更疯狂的是，他派右翼军展开了无用的杀戮。右翼军缓慢有序地撤退，许多士兵“歌唱欢呼”，战斗就这样结束了。南方邦联军伤亡五千三百零九人，北方联邦军伤亡一万两千六百五十三人[19]。

1862年12月14日，安布罗斯·伯恩赛德非常悲痛，指着对岸战死的战士们，哀叹道：“哎，将士们！对岸的将士们！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们。”一怒之下，他想出了一项孤注一掷的计划。他打算亲自率领自己的旧部——第九军团，进攻防御工事中的南方邦联军。南方邦联军对其右翼军进行了毁灭性攻击。查尔斯·萨姆纳将军、威廉·B.富兰克林和其他军队的将领都曾劝安布罗斯·伯恩赛德不要这样做。1862年12月15日夜晚，狂风四起，暴雨骤下，安布罗斯·伯恩赛德顺利将大军撤到了河北岸。

安布罗斯·伯恩赛德军队的死伤和失踪的人数很多，但与士气锐减相比，军队战斗力的折损并不重要。官兵们觉得自己做了无谓的牺牲，不再信任指挥官。在检阅第二军团时，达利斯·N.库奇[20]和各师长要求士兵们欢迎将军。将领们骑马经过列队，挥舞着手中的帽子或剑，但士兵们没有任何欢迎之举，一些士兵甚至冷嘲热讽。事实上，北方联邦军的士气持续衰落，将领们纷纷卸任，士兵们也连连卸甲[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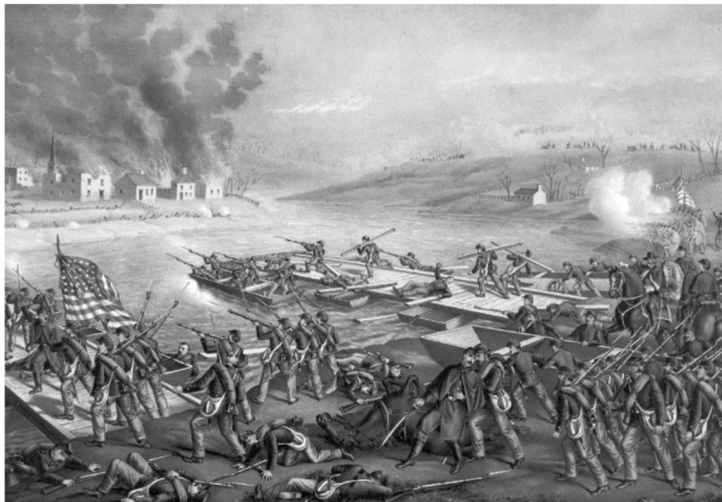
林肯心烦意乱[22]，对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惨败感到非常沮丧。他必须和安布罗斯·伯恩赛德一起承担责任，因为安布罗斯·伯恩赛德是他任命的。1862年9月，林肯向内阁承认，自己正在失去北方的民心。他知道民心是成功的必要条件，我们也深知此理。此后，他在投票选举中接连

失利，战场上也没有传来捷报。更换总指挥的错误决定加剧了人们的沮丧感。如果乔治·B.麦克莱伦重新担任总指挥，那么对安布罗斯·伯恩赛德倍感失望的士兵们一定会欢呼雀跃。

北方人民得知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后，对无谓牺牲的将士们悲痛不已。忧伤和消沉随之而来，与之相伴的还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一位俄亥俄州议员在日记中写道："似乎是上帝帮助了叛军，让他们的事业得以延续。"之前，林肯也曾表达过类似的想法："我就是上帝手中一个谦卑的工具……如果我的努力失败了，我相信是上帝有意为之，但我不知道上帝的意图是什么。"[23] 乔治·米德也说："看来上帝也针对我们。"[24]

安布罗斯·伯恩赛德认为，自己在任职期间殚精竭虑，制定了渡河计划，试图通过进攻南方邦联军扭转败局，但将领和战士们对他没有信心，反对进攻计划。此外，埃德温·斯坦顿和亨利·W.哈勒克办事效率低下，林肯又犹豫不决，甚至下达了限制令："军队的任何总攻行动都必须告知我。"在华盛顿，林肯和安布罗斯·伯恩赛德见了面。当时，埃德温·斯坦顿和亨利·W.哈勒克也在场，但林肯和威廉·H.苏厄德并没有提供应时的专业建议，会议最终无果而终。随后，安布罗斯·伯恩赛德坚持渡河计划，想要再次开战。林肯同意了他的计划，并给了忠告，但与他曾给乔治·B.麦克莱伦的忠告大不相同。林肯写信给安布罗斯·伯恩赛德说："谨慎一些！不要认为国家或政府在逼迫你。"安布罗斯·伯恩赛德率军沿河而上，行进了四英里。乔治·米德写道："船舶、大炮和所有物资都及时跟进。我们都认为，第二天早上桥会被毁掉，我们应该赶到那儿。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25] 1863年1月19日晚9时左右，一场可怕的暴雨袭来，持续了一整夜。接下来的两天，雨一直在下，道路泥泞不堪，行军无望[26]。然而，各种干扰因素对北方联邦军非常有利。安布罗斯·伯恩赛德率领士气低落的将士们，打算进攻罗伯特·E.李率领的整肃忠诚的军队。这是一次无谓的牺牲。卡尔·舒尔茨在军中给林肯写信说："我确信士兵们已经陷入绝望。几位将领彻底熄灭了他们对安布罗斯·伯恩赛德的信心。我听说，将领、副官和士兵们都认为我们必败无疑，并说：'所有努力和艰辛都是徒劳，我们最好还是回家吧。'此外，军队在泥泞中紧紧挤在一起，疾病正以可怕的速度蔓延。令人灰心的种种因素使逃兵人数不断增加。你如果看到军队溃散，溃散速度令人痛心，也

不会感到惊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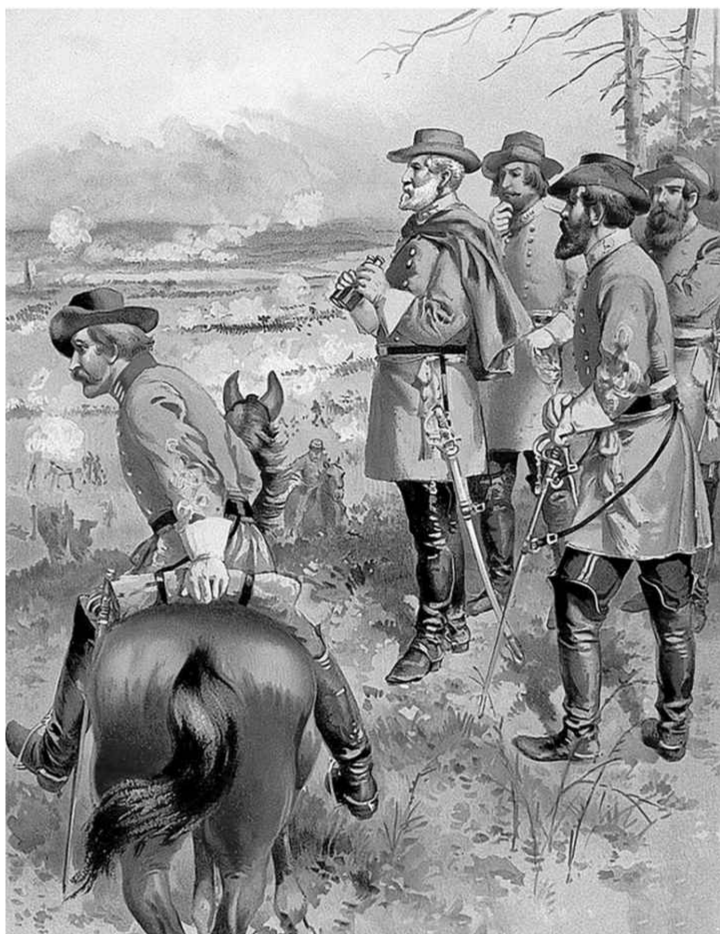
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



联邦军在石墙后面向邦联军射击



联邦军发起冲锋



罗伯特·E.李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前线

第7节　内阁危机

费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的惨败导致了内阁危机[27]。然而，国家的灾难需要有效的行政活动解围，这是英国和美国宪法之间的差异。林肯是政府首脑、军队总司令。除了安布罗斯·伯恩赛德，需要对拉帕汉诺克河的挫败负责的还有总统。民主党人坦诚声明了这一点。同样地，在私下谈话和保密信件中，共和党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尽管他们在公开场合一直保持沉默。如果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一样，由林肯担任首脑，那么国会可能会投票反对他。这样一来，林肯可以辞职或解散议会，举行大选。1862年9月22日，林肯重申："如果我确信有人能比我获得更多民心，知道他可以通过《宪法》替代我，那么他可以取代我，我很乐意让位。虽然我认为自己没有之前那么深得人心，但综合考虑所有因素后，我不知道谁能获得更多民心。除非有人比我更受人民拥戴，否则我绝不会辞职。我一定会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全力承担责任，在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上前行。"[28]由于《宪法》的限制，在连续两次领导层秘密会议上，共和党参议员以为自己在为其政党和国家的大多数人说话，却不知不觉遵循了早期的英国先例。他们的言行清楚表明，战败的原因是林肯过于听信威廉·H.苏厄德的建议，任由其摆布。其中九人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打算向林肯陈述自己的观点。林肯将会议安排在1862年12月18日夜晚，为进攻做好部署准备。威廉·H.苏厄德听说参议院秘密会议的议程后，立即提交了辞呈。1862年12月17日，林肯收到了威廉·H.苏厄德的辞呈。



奥姆斯比·M.米切尔（1810—1862）

林肯和九人委员会的谈话激烈而随意。本杰明·韦德说，开战与否主要取决于不赞同开战的人。西部的共和党人认为，林肯在近期选举中的失利源于将军权交给了愤世嫉俗、心怀不轨的民主党人，即乔治·B.麦克莱伦、乔治·P.比尔和亨利·W.哈勒克。威廉·P.费森登说，参议院坚信林肯忠诚爱国，但共和党参议员认为，威廉·H.苏厄德与内阁的多数人意见不合，对战事产生了消极影响。他还说，大部分常规军将领支持奴隶制，有浓厚的南方情节，不会与共和党站在一起。他列举了约翰·C.弗里蒙特、戴维·亨特、奥姆斯比·M.米切尔[29]等人，说明“非常不幸的是，几乎所有反对奴隶制的将领都遭到了冷落。”查尔斯·萨姆纳、詹姆斯·格兰姆斯和其他参议员表示，并不信任威廉·H.苏厄德[30]。



威廉·P.费森登（1806—1869）

1862年12月19日，除了威廉·H.苏厄德，其他内阁成员都到了。林肯告诉内阁成员，参议员们的指责“核心”是威廉·H.苏厄德，控诉威廉·H.苏厄德“不仅有不臣之心，态度中立，无心战事，还不闻国事，干涉和左右总统及行政决策”[31]。林肯用朴实的语言描述了参议员们的态度：“他们虽然相信我的正直，但同时认为，当我有好的初衷或意向时，威廉·H.苏厄德会想方设法让我放弃。”[32]最后，林肯要求内阁成员于1862年12月19日晚，在白宫与参议院委员会成员会面。参议员们非常吃惊，没有想到自己要面对内阁成员和林肯，但还是应林肯的要求，前来继续召开前一晚的会议。会议开始时，林肯为内阁和政府做了辩护。“财务部长萨蒙·P.蔡斯完全赞同林肯的观点。”[33]激进派的参议员们很吃惊，因为他们视萨蒙·P.蔡斯为领袖。萨蒙·P.蔡斯对林肯和威廉·H.苏厄德的苛评影响着他们。然而，当萨蒙·P.蔡斯陷入绝境的时候，发现自己受到军队士气的影响。此外，多年来，与威廉·H.苏厄德在反奴隶制事业中的共同努力也影响了他。因此，他勇敢站起来支持威廉·H.苏厄德和其他同僚。“詹姆斯·格兰姆斯、查尔斯·萨姆纳和莱曼·特朗布尔尖锐且坚定地反对威廉·H.苏厄德，怀疑威廉·H.苏厄德对内战的热情和诚意。每个人都显得冷酷无情……林肯恪尽职守，积极表态，表现出老练、精明和能干……他认为，无论自己如何看待参议员们的干涉，也应该恭敬地安抚他们。”[34]威廉·P.费森登反对在同僚面前讨论内阁成员的优缺点，于是，内阁成员纷纷离开。虽然已近午夜，但威廉·P.费森登和一些参议员依旧热烈讨论着。威廉·P.费森登对林肯说：“关于罢免威廉·H.苏

厄德一事，您已经问过我的意见了。现在，有传言说他已经辞职。如果是这样，我的意见就无关紧要了。”林肯承认威廉·H.苏厄德递交了辞呈，但自己并未接受。威廉·P.费森登说：“总统先生，这样一来，现在的问题似乎是，是否要求威廉·H.苏厄德收回辞呈。”林肯说：“是的。”威廉·P.费森登回复道：“我必须说，既然威廉·H.苏厄德觉得辞职是合适的，我建议接受他的辞呈。”1862年12月20日凌晨1时，参议员们离开白宫 [35] 。

1862年12月20日早晨，林肯派人去请萨蒙·P.蔡斯。萨蒙·P.蔡斯来到白宫后，林肯对他说“这件事给我造成了很大麻烦。”萨蒙·P.蔡斯说：“昨夜的会议让我很痛苦……我已经准备好辞呈，打算辞去财政部长一职。”林肯眼睛一亮，立即说：“在哪儿？”萨蒙·P.蔡斯从口袋里拿出了辞呈，说道：“今天早晨写的，我一直随身带着。”林肯伸出手说：“给我吧。”萨蒙·P.蔡斯紧握辞职信，似乎不愿意放开，犹豫着要不要递过去……林肯接过信后，迅速打开，带着胜利的喜悦说：“真是快刀斩乱麻……现在，我能不费吹灰之力处理问题了。我看清了自己的路。”在总统办公室里，与萨蒙·P.蔡斯一起的还有埃德温·斯坦顿。埃德温·斯坦顿也递交了辞呈。林肯回复道：“你应该回到你的岗位上，我不想接受你的辞呈。”他拿出萨蒙·P.蔡斯的信说：“我想要的只有这个。这能让我解脱。现在，方向明确了，麻烦也解决了。我不会挽留你们。” [36] 萨蒙·P.蔡斯、埃德温·斯坦顿和吉迪恩·韦尔斯离开后不久，林肯仍然拿着萨蒙·P.蔡斯的辞呈，对前来拜访的参议员托马斯·哈里斯说：“现在，我应该振作起来。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37]

第8节　林肯的政治智慧

不难理解，当林肯同时拿着激进派领袖和保守派领袖的辞呈时，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攻击威廉·H.苏厄德的激进派参议员看到萨蒙·P.蔡斯辞呈时，一定会非常沮丧。到时，威廉·H.苏厄德和萨蒙·P.蔡斯要么都走，要么都留。1863年，林肯说道："当时，如果我做出让步，罢免了威廉·H.苏厄德，事态一定会继续恶化，支持我们的人也会所剩无几。当萨蒙·P.蔡斯递交辞呈的时候，我已经明白，这场政治游戏仍然在我的掌控之中，因此，我接下了辞呈。"[38] 林肯婉言拒绝了威廉·H.苏厄德和萨蒙·P.蔡斯的辞呈，命他们回到各自的部门继续工作。威廉·H.苏厄德笑着接受了，萨蒙·P.蔡斯显得有些不情愿。内阁危机结束。

林肯展现出了少有的政治智慧，为国家留下了优秀的政府官员。虽然内阁内部并不融洽，国会也知晓此事，但林肯认为，"大众的利益不允许"威廉·H.苏厄德和萨蒙·P.蔡斯辞职。后来的事件表明，面对内阁危机时，林肯的做法是正确的[39]。

当不幸和沮丧降临的时候，任何支持继续战斗的声音都不应该被忽视。威廉·H.苏厄德和萨蒙·P.蔡斯代表两大阵营的不同观点，但他们在一项关键政策上观点一致。因此，对内阁来说，他们都很重要。失去任何一方或失去双方，都意味着支持联邦政府的人越来越少。林肯不希望失去威廉·H.苏厄德和萨蒙·P.蔡斯。1861年4月以来，威廉·H.苏厄德一直忠心支持林肯，甚至放弃了自己当总统的抱负，开始认可林肯的才干，真心实意地支持他。他是一位能力出众的大臣。虽然奴隶制是阻碍英法认可南方邦联的绊脚石，在外交关系中，林肯、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和查尔斯·萨姆纳的影响力也十分重大，但为了避免欧洲国家插手美国内战，威廉·H.苏厄德申请了大量贷款，以便处理部门事务。现在，这些贷款还没有还清。

萨蒙·P.蔡斯是财政部的负责人，撰写了1862年12月1日的总统国情咨文中的财政部分。林肯没有学过财政方面的知识，像许多律师一样，他对国家的资源和财政几乎没有概念，对金融也毫无兴趣，从未试着学习金融理论。此外，他必须掌握兵法和外交手段。身为一个门外汉，他

很明智地放弃了学习财政知识。然而，林肯虽然对金融一无所知，但能慧眼识人。因此，他留下了萨蒙·P.蔡斯。事实证明，萨蒙·P.蔡斯是一位忠诚、思维开阔的财政部长。战事已经持续了近两年，耗资巨大，但联邦政府依然有能力购买粮食和军火，支付军饷。除了北方人民的爱国精神和奉献精神，财政部长萨蒙·P.蔡斯功不可没。

第9节 林肯和萨蒙·P.蔡斯

萨蒙·P.蔡斯可能并不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财政部长，性情与林肯完全不同，两人不可能有共鸣。萨蒙·P.蔡斯英俊潇洒，身材高大，衣着得体，彬彬有礼，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深受其他律师的敬畏。他博览群书，在内阁任职时，经常抽时间阅读英语和法语著作。他既不喜欢打牌，也不喜欢看戏。在生活中，他是一个认真周到的人，在处理部门事务时，也很严谨负责。

林肯相貌平平，不修边幅，既不会优雅的生活，也没有绅士的修养，但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他从不系统地规划时间、计划工作。担任总统期间，他经常读的书籍是军事文献和宪法及国际法方面的著作，偶尔也会抽时间阅读莎士比亚的著作，在政府文件中证明自己不曾忘记《圣经》。他喜欢看戏，曾对哈克特扮演的约翰·福斯塔夫做了评论，也非常喜欢哈姆雷特，尤其是埃德温·布斯扮演的哈姆雷特。他极具幽默感，擅长讲故事，与萨蒙·P.蔡斯的严肃认真格格不入。萨蒙·P.蔡斯毫无幽默感，不善识人。



埃德温·布斯（1833—1893）

令人惊讶的是，萨蒙·P.蔡斯的私人信件表明，他和许多奸邪小人来往甚密。这些人主要是他的政治追随者。萨蒙·P.蔡斯试图依靠他们争夺梦寐以求的总统职位。他的抱负，或者说不恰当的作为，阻碍了他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对林肯的评价并不高。林肯一定觉察到了萨蒙·P.蔡斯的敌意，但依然毫不掩饰地评价道：“萨蒙·P.蔡斯非常能干。”

当时，除了萨蒙·P.蔡斯质疑林肯的能力，许多参议员和代表都不相信林肯的能力和人品。林肯不够严肃，言行举止怪异，在别人沮丧时开玩笑。因此，他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在战事接连失败的情况下，林肯的怪异表现可能会在军中产生不好的影响。内阁危机期间，威廉·P.费森登讽刺了林肯、内阁和参议员们的会议。他说：“林肯……讲了几件轶事，其中大部分我都听过。”[40] 虽然林肯越来越不受欢迎，但与华盛顿的人民相比，全国人民依然觉得他很伟大。人民没有与林肯有过私人接触，只能通过正式的国家文件和议案评价他。后人通过他最终取得的胜利评价他，钦佩他肩负重担时的耐心和决心。对林肯怪异行为的描述可能会让英雄崇拜者失望，但叙述真实的历史时，需要这类描述解释人们

对林肯的轻蔑之词，为无法用今天的视角看待1862年至1863年冬天的人提供事实依据。如果在华盛顿庄严的氛围中，林肯的其他素质有所提高，就不会有那么多假象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很多人并不觉得林肯伟大。早期的社会环境并没有赋予林肯成为杰出领导人的外在特征，然而，毋庸置疑，他虽然起步慢，但逐渐拥有了非凡的精神力量。

第10节　林肯和威廉·H.苏厄德

威廉·H.苏厄德为人和蔼可亲，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虽然也存在种种不足，但他对林肯帮助很大。在做决定时，林肯常常思维迟缓，需要参考威廉·H.苏厄德提出的各种权宜之计。一般情况下，决策者会从若干方针中选出一项实施，因为这比制定一项政策更容易。在人民眼中，当时的建言献策者有威廉·H.苏厄德、萨蒙·P.蔡斯和埃德温·斯坦顿。历史学家对他们比较关注。林肯最依赖的是威廉·H.苏厄德和埃德温·斯坦顿。彬彬有礼的威廉·H.苏厄德是林肯最喜欢的顾问。

林肯虽然做决定的时间一般较长，但一旦做出决定，就不会轻易改变。他一步步制定了解放政策。从1862年9月22日的草拟宣言到1863年1月1日的正式宣言，林肯在政党选举中接连失利，北方联邦军屡遭失败，但他从未想过放弃。草拟宣言的形成表明，一些或所有南方邦联军可能会放下武器，避免奴隶流失，但其可能性并不大。南方人民无疑会团结起来，誓死保卫独立。如果《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会影响他们，那也只会让他们进一步强调，北方开战是对南方社会制度的挑衅，从而奋起反抗。1863年1月1日，林肯写道：我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视为“一种合理且必要的战争手段，我下令并宣布”，在反抗联邦政府的奴隶州或州内地区，“所有奴隶获得自由……我对《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公正性深以为然，它符合《宪法》规定，符合军事需求。因此，我祈求得到人类的慎重评判和万能上帝的慈悲恩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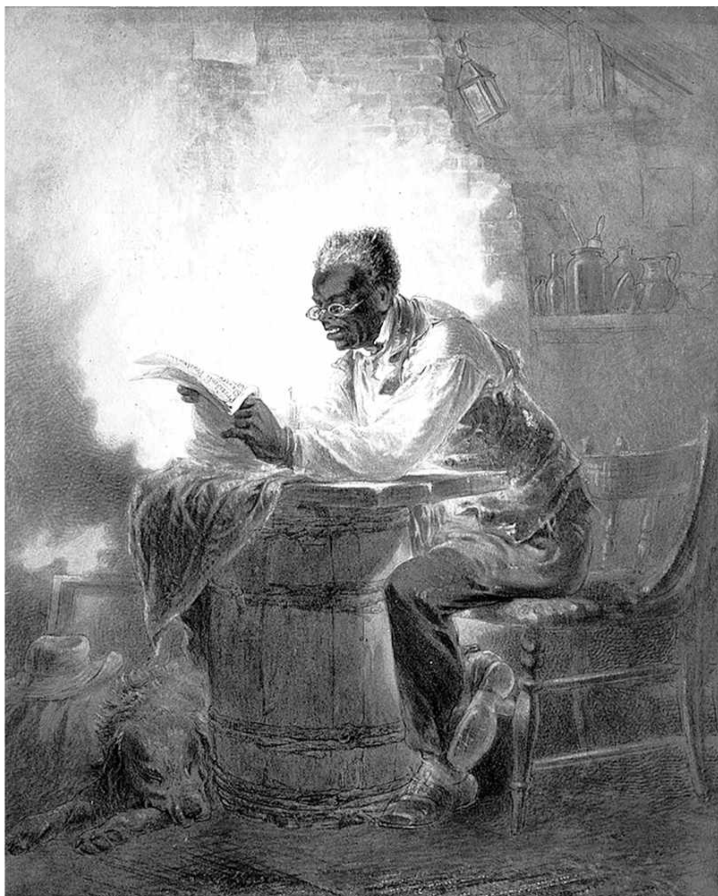
林肯对《宪法》和法律充满敬意。虽然在《宪法》或其他法令中没有找到《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依据，但他想到了自己认为的合理依据。后来，林肯写道：“我发誓会竭尽全力维护《宪法》，因此，我会通过一切必要手段保卫以《宪法》为基本法的政府和国家……我认为，在保卫国家的过程中，如果一些违宪手段是维护《宪法》所必需的，就可以成为合法手段……我并不认为自己为维护《宪法》付出了一切。如果与废除奴隶制相关，我同意将政府、国家和《宪法》一同毁灭……我认为，在战争期间，总统可按《宪法》使用战争法。既然奴隶是财产，那么根据战争法，友方和敌方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支配财产，这样有问题吗？曾经有过问题吗？”《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中明确阐述了战争的本

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英国的民意。众议院已经认可《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战场上的捷报使《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获得了大部分北方人的支持。

除了军事解放，林肯还打算严格遵循法律，将自由还给奴隶，确保北方联邦政府补偿奴隶主。1862年12月1日，在给国会的年度致辞中，他以文本形式发表了众所周知的合法声明，称："没有奴隶制，内战不可能存在；没有奴隶制，内战也不会继续。"在争论中，林肯表明了自己对奴隶制问题的理解。根据后来的历史经验，他的理解证明自己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林肯提出逐步解放奴隶，预计在1900年1月1日完成解放，使"两个种族"免于"突如其来的战争"。令人遗憾的是，林肯的展望性提议并没有因内战胜利而实现，正如恺撒和拿破仑说的那样。事实证明，参议院和众议院都不信任林肯。此刻，林肯在人民心中的声望已经削弱，因为北方联邦军毫无进展。因此，林肯提出的循序渐进的补偿性解放没有得到国会和人民的认可。尽管如此，他还是及时抓住了机会，发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从1862年9月的安蒂特姆战役到1863年7月的葛底斯堡战役，北方从未获得真正的胜利，波托马克军经历了两次惨败[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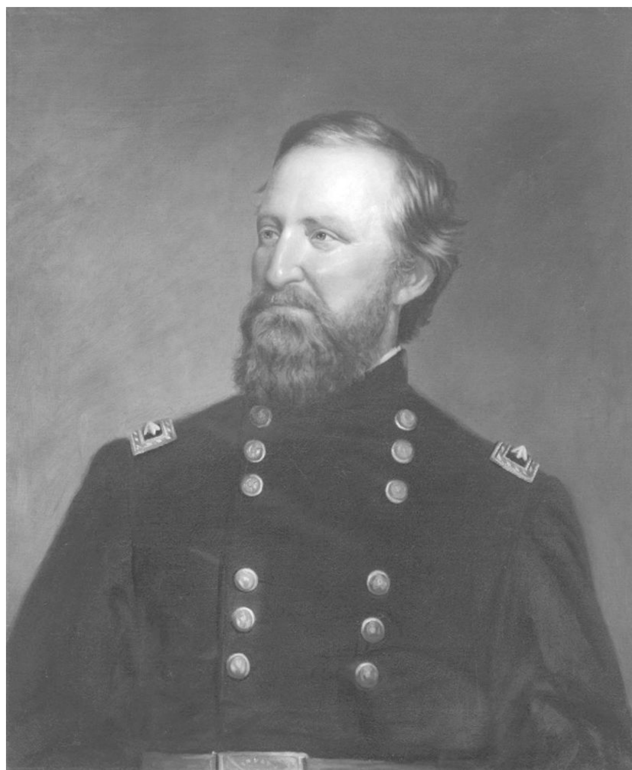
联邦士兵为黑人奴隶诵读《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黑人在烛光下阅读林肯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第11节　默夫里斯伯勒战役

西部传来的捷报暂时驱散了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的阴影。毫无疑问，威廉·罗斯克兰斯受到了林肯渴望胜利的影响。1862年12月26日，他抓住时机，从纳什维尔出发，试图进攻南方邦联军。行军几天后，他率军展开了小规模战斗，攻克了田纳西州默夫里斯伯勒附近三英里内的一个据点。当时，布拉克斯顿·布拉格的军队驻扎在默夫里斯伯勒的冬季营地。1862年12月31日，威廉·罗斯克兰斯决定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布拉克斯顿·布拉格决定采取攻势，并取得了先机。随后，默夫里斯伯勒爆发了一场血腥战役，四万一千名北方联邦军对阵三万四千名南方邦联军[42]。虽然南方邦联军获胜，但威廉·罗斯克兰斯坚守住了阵地。1863年1月2日，布拉克斯顿·布拉格再次袭击了北方联邦军，却遭受了挫败。1863年1月3日夜晚，南方邦联军显得士气低落。布拉克斯顿·布拉格从默夫里斯伯勒撤军。威廉·罗斯克兰斯抓住时机，宣称大战告捷。林肯向他致电，称“上帝保佑”。亨利·W.哈勒克称，默夫里斯伯勒战役是内战中最精彩的胜仗之一。捷报很快传遍了北方。最后，北方人的愤怒逐渐消散，伟大的将军随即出现。默夫里斯伯勒战役中，敌对双方伤亡惨重[43]，需要一段时间重整旗鼓。虽然威廉·罗斯克兰斯军队的伤亡人数更多，但与士气低落的南方邦联军相比，北方的资源优势抹平了伤亡劣势。然而，1865年，尤利西斯·S.格兰特称：“对北方来说，默夫里斯伯勒战役并未获胜。”[44]　当时，威廉·T.谢尔曼写道：“在默夫里斯伯勒中，威廉·罗斯克兰斯付出的代价太大。”[45]



威廉·罗斯克兰斯（1819—1898）

如果学生只参考默夫里斯伯勒战役的相关文献，会认为林肯和北方人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大肆宣扬一次普通胜利；但如果展望未来，会发现林肯和北方人其实很聪明，因为他们知道，布拉克斯顿·布拉格需要通过一次决定性胜利保住田纳西州，但他的失败和南方邦联军遭受的重创，为北方联邦军进入查塔努加敞开了大门。此外，佩里维尔战役和默夫里斯伯勒战役表明，西部的北方联邦军正在培养将才，本土军事人才正在崛起。弗吉尼亚人乔治·托马斯与华盛顿和罗伯特·E.李一样优秀，担任乔治·P.比尔和威廉·罗斯克兰斯的副指挥官。他拥有专业的军事才能，对上级忠心耿耿，即使与自己的观点不同，也坚信联邦大业的正义性，坚决支持联邦大业。起初，乔治·托马斯认为，在乔治·P.比尔被罢免时，自己没有成为坎伯兰军的指挥官非常不公，但他心胸宽广，不遗余力地支持威廉·罗斯克兰斯。威廉·罗斯克兰斯这样评价他："议事时明智，作战时勇敢。"[46] 在佩里维尔战役中，菲利普·谢里登表现出色。现在，在默夫里斯伯勒战役中，他依然表现得英勇无畏。



默夫里斯伯勒战役



联邦军与邦联军短兵相接

默夫里斯伯勒战役虽然意义重大，但无法彻底驱散国会和北方人的沮丧情绪。查尔斯·萨姆纳意识到了潜在危险，但并未失去信心。在写给弗朗西斯·利伯的信中，他说：“这段岁月是黑暗的。一些参议员满心绝望，我虽然不是……但也担心北方联邦军的处境。”贺拉斯·格里利在其杂志中提出，让某个欧洲国家调解美国的南北问题。为此，他进行了私人访谈，并与法兰西大使奥古斯特·梅西埃通了信，称美国人欢迎任何有助于结束战争的外国调解。他对助理亨利·J.雷蒙德说：“我有意实施调解计划，结束战争。我会让林肯支持我的提议。”1863年2月3日，法兰西

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南北调解书被送到威廉·H.苏厄德手中。林肯当即拒绝了调解书。调解书和林肯的回复同时公开。虽然通过一些传言，美国人对此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但由于受到物质利益的驱动，欧洲强国试图涉足美国内战的事实依然令人震惊。北方人更加沮丧。



弗朗西斯·利伯（1798—1872）



亨利·J.雷蒙德（1820—1869）

第12节　国会的作为

查尔斯·萨姆纳在写给弗朗西斯·利伯的信中说：“林肯总统告诉我，相比战机，他更担心‘后方起火’，即民主党，尤其是西北地区的民主党。”印第安纳州州长奥利弗·P.莫顿向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致电说：“一些人提出建议，让我关注本州召开的州议会，并试图通过一项承认南部邦联的决议，敦促西北各州解除与新英格兰的所有法律关系。伊利诺伊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州议会都是民主党的，由上一次秋季选举选出。奥利弗·P.莫顿其实是杞人忧天，但州议会成员与他发生了争执，拒绝支持积极作战。他获得了共和党人的支持，争执变得异常激烈。最终，印第安纳州议会休会，取消了州政府未来两年内的必要拨款。在伊利诺伊州，众议院通过了停战决议，建议召开全国大会，商议解决各州矛盾的决议，但参议院否决了提议。因此，伊利诺伊州议会和共和党州长产生了争执。

1862年12月1日至1863年3月4日，通过国会的授权，总统掌控了全国的武装力量和财政大权。战场上的失败令人灰心，战期的延长令人疲惫，但经商环境的改善增加了就业机会。至此，志愿入伍告一段落。由于各州的征兵效果不佳，为了补充军力，联邦政府必须采取强制手段。1863年3月3日通过的《征兵法》直接面向全国人民，不再像以前那样，各州可以按照自己的机制征兵。联邦政府划分了各征兵区，总体上与不同州的国会选区一致。每个征兵区由一名宪兵司令掌管，其顶头上司是宪兵总司令。在华盛顿，宪兵总司令的办公室是陆军部的一个独立部门。所有符合参军要求的人都要登记，在必要时入伍服役。符合条件的人可以找人代替服役，或缴纳三百美元免服役费[47]。

财政立法方面，争执同样激烈。1862年，联邦政府开始发行不可兑现的法定货币，现在，财政部的无底洞急需填补。筹款委员会发言人埃尔布里奇·G.斯波尔丁在众议院说：“人民手中的法定货币数量不多……他们想要更多法定货币。因此，我们不必为继续发行法定货币担忧……为了起到刺激作用，甚至可以大量发行法定货币，便于人民缴税和政府放贷。”埃尔布里奇·G.斯波尔丁明确表明，接下来的十八个月里，财政部必须借到十亿美元。政府每天的开支为两百五十万美元，包括星期

天。海关税收和其他收入不超过六十万美元，每日赤字一百九十万美元。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借款维持收支平衡。在所谓的九亿美元的贷款法案中，国会授权发行更多有息债券和国库券，债券可以按法定货币的面值变现。国会还授权发行更多无息法定货币和辅币，取代现有的白银替换物。白银从流通中消失。该法案赋予财政部长很大的酌处权。在下届国会召开宪法会议前，财政部长可以发行总价值九亿美元不同形式的纸质债券。



埃尔布里奇·G.斯波尔丁（1809—1897）

根据林肯和财政部长萨蒙·P.蔡斯的建议，国会在宪法会议上通过了建立国家银行的法案。后来，国家银行成为现行制度的核心。

相比赞美，批评民主制度的立法机构更容易一些，尤其是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大国，情况更是如此。1863年，西部和东部为了共同的战争目的联盟，但双方仍然存在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平等交换是所有立法理论的精髓。即使从最广泛的层面定义平等交换政策，并严格遵守，也无法满足个人或政党的欲望。然而，在本届宪法会议上，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占多数。作为一个整体，共和党人的工作值得赞扬。他们认识到，

只有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才能消除人民的阴郁情绪，恢复军队的信心。此外，他们必须向国民表明，共和党同意采取相关措施，促使战争胜利。1862年12月，内阁危机结束，但内阁成员对林肯的部长们依然没有信心。在众议院的共和党重要会议上，萨迪厄斯·史蒂文斯曾提出一项决议，但需要获得内阁的支持。激进派不愿意留任威廉·H.苏厄德，继续想方设法逼他下台。虽然林肯执意要求留下威廉·H.苏厄德，但内阁通过投票给了当局者足够的权力。议会中的大多数共和党人同意约翰·谢尔曼的观点。约翰·谢尔曼的观点几乎都是中立的。他写信给威廉·T.谢尔曼说："我并不看好现任的一些当局者，但在他们受权管理政府期间，依然会真心支持和协助他们。"只有让林肯拥有特权，才能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参议员和代表们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威廉·P.费森登写道："国会虽然犯了很多错，但已经是一个愿意做出牺牲的伟大国会……我们承担着巨大责任，将权力交到了一个专制政府手中。将来，人们会理解我们的动机，理解我们做的和遭受的一切。"[48]

第13节　人民的态度

联邦各州的许多城镇举行了支持“战争”或“联邦”的会议。通过会议，人民对国会工作做出了回应。最具代表性的是纽约的会议。纽约的民主党人占据优势，且受到人民欢迎。他们在库珀学院提出了“人民大起义”。随后，“忠诚的国家同盟”或“联邦同盟”成立。加入同盟后，成员们签署了一份简短有力的承诺。联邦同盟在音乐学院举行了一次大型会议。之后，又在库珀学院举行了会议。还有一次会议是为庆祝萨姆特堡战役周年纪念日举行的。其间，费城联邦同盟、纽约联邦同盟和波士顿联邦同盟相继成立。联邦同盟无疑是因爱国诞生的。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写信给乔治·威廉·柯蒂斯说：“联邦同盟、征兵法案、金融法案等都不适用于本国。只有胜仗才对我们有利。我们如果能攻克查尔斯顿和维克斯堡，就胜利了。但如果攻克不了呢？”[49] 然而，为了将国家从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后的萧条中拯救出来，国会倾注了全部精力。波托马克军通过改编，成为一支精良部队。此外，众所周知的是，林肯和内阁坚信会获胜。因此，人民流露出了些许喜悦之情。

1862年12月，国会召开会议，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陷入低谷。很多士兵已经五个月没有领到军饷。负责发放军饷的军需官拖欠了至少三个月的军饷。因此，截止1863年1月7日，陆军和海军拖欠的军饷已经高达六千万美元。政府不再出售债券。现在，一切都变了。萨蒙·P.蔡斯制定了相关计划，打算任用一位有能力、有活力的总干事，运用政府的各部门职能，通过广泛宣传和其他商业手段，唤醒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奉献精神，说服他们借钱给政府。因此，他计划发放面值为五至二十美元的债券，让人民认捐。推动这一进程的是国会金融立法的规定，尤其是九亿美元贷款法案中的相关条款。该条款规定，1863年7月1日，终止用法定货币兑换面值五至二十美元债券。国会休会后，人民开始积极购买债券。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政府的信任。1863年3月底，萨蒙·P.蔡斯告诉查尔斯·萨姆纳，称自己对金融状况感到满意。1863年6月，萨蒙·P.蔡斯认为全民贷款计划已经成功。日均认捐金额超过三百万美元。德意志人也购买了债券。1863年4月26日，查尔斯·萨姆纳写信给阿盖尔公爵夫人[50] 说：“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告诉我，1863年2月28日前，名册中显

示有八十万武装军人领到了军饷。相比以前，战士们现在穿得暖，吃得饱……除了军队，现有的贷款足以满足联邦政府的所有需求。”

第14节　约瑟夫·胡克

1863年1月1日，安布罗斯·伯恩赛德告诉林肯，埃德温·斯坦顿和亨利·W.哈勒克都没有得到官兵们的信任。实际上，安布罗斯·伯恩赛德的真实意图是催促林肯罢免他们，还说自己“应该解甲归田”。1863年1月5日，在总司令部，他写信递交了辞呈。林肯回复道：“我认为，调整波托马克军的主将并没有任何益处。”1863年1月23日凌晨，安布罗斯·伯恩赛德面见了林肯，要求林肯罢免约瑟夫·胡克，原因是“约瑟夫·胡克无端非议上级……其报告和言论产生了不良影响”。总之，约瑟夫·胡克“不适合在关键时刻担任要职”。安布罗斯·伯恩赛德还提议罢免三位准将，解除威廉·B.富兰克林、柯比·史密斯和其他一些将领的军职。他说：“要么批准我的提议，要么接受我的辞呈。”1863年1月25日上午，林肯召见埃德温·斯坦顿和亨利·W.哈勒克，告诉他们自己的决定，即罢免安布罗斯·伯恩赛德，任约瑟夫·胡克为波托马克军指挥官。他没有征求埃德温·斯坦顿和亨利·W.哈勒克的意见，他们也没有提出任何意见[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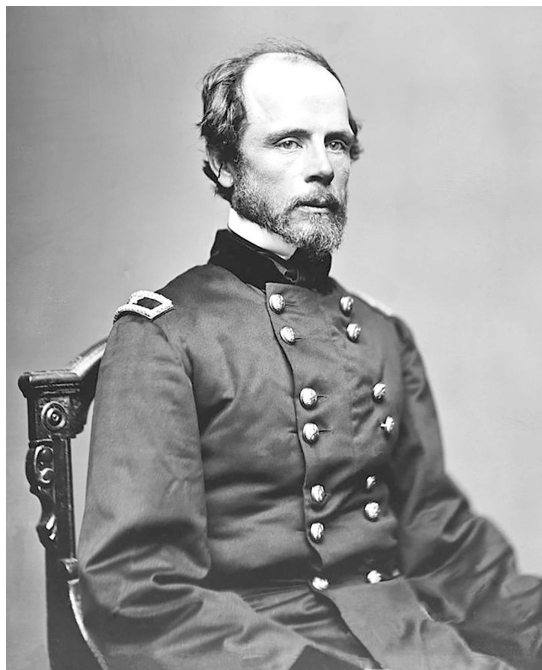
阿盖尔公爵夫人（1824—1878）

之前，林肯曾多次与内阁谈起约瑟夫·胡克。在第二次布尔溪战役后，他问吉迪恩·韦尔斯："谁能接管波托马克军？这些将军中谁可以胜任？"吉迪恩·韦尔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约瑟夫·胡克。"林肯似乎赞同他的意见，但说："和你一样，我也想到了约瑟夫·胡克，但我担心他太活跃。"蒙哥马利·布莱尔说："他和'大麦约翰' [52] 是至交。"吉迪恩·韦尔斯说："如果他有酗酒的恶习，就不应该被委以重任。"林肯任命约瑟夫·胡克后，吉迪恩·韦尔斯在日记中写道："我对林肯的决定很吃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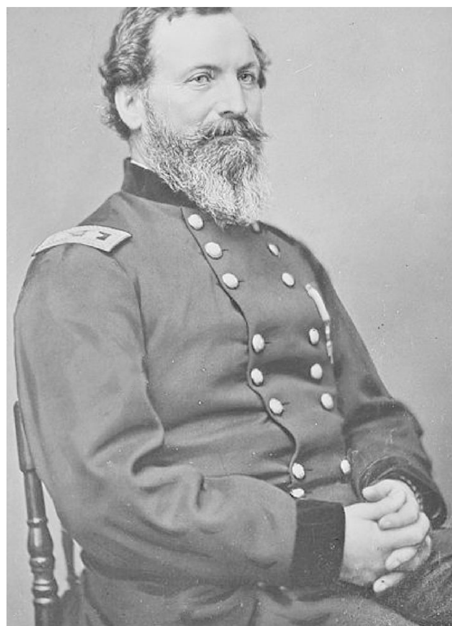
林肯显得有些沮丧和愤怒，但为了大局考虑，最终接受了民意要求。他意识到，普通士兵和北方人都倾向支持"好战的约瑟夫·胡克"。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林肯写道："很多人认为，我重军功、轻政治。" [53] 当时和后来，林肯一直崇尚西点教育，但并没有现在的人们那么崇尚。

我们知晓整个内战史，拥有敌对双方的相关文献记录；因此，可以严谨、明确地证明，军校的培养对内战影响深远。约瑟夫·胡克虽然毕业于西点军校，是一位出色的将领，但从未想过自己会被任命为总指挥官。据说，亨利·W.哈勒克反对林肯的任命，埃德温·斯坦顿也附议。 [54] 大多数“年长的正规军军官”都对“约瑟夫·胡克充满敌意”。乔治·米德的观点显得中肯一些，认为约瑟夫·胡克“是一名优秀的士兵和指挥官”，但怀疑“他没有能力指挥一支大军” [55] 。

在华盛顿，人们对约瑟夫·胡克的质疑是众所周知的。但令人惊讶的是，从来没有人向林肯呈报相关意见，因为波托马克军中有约翰·F.雷诺兹和乔治·米德两位将军。在性格、素养和能力方面，约翰·F.雷诺兹和乔治·米德都可以胜任总指挥一职。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结束后，波托马克军的总指挥明显需要调整。人们议论纷纷，讨论约翰·F.雷诺兹和乔治·米德谁更适合。约翰·F.雷诺兹对指挥权似乎无意，也许不会接受。此外，如果林肯或埃德温·斯坦顿与亨利·W.哈勒克召集约翰·F.雷诺兹、达利斯·N.库奇和约翰·塞奇威克 [56] 参加会议 [57] ，几位将军一定会一致推选乔治·米德。虽然他们资历较深 [58] ，但很乐意受乔治·米德指挥。乔治·米德与妻儿的通信证明，他是波托马克军总指挥的最佳人选。他很爱妻儿，忠于宗教信仰，品德高尚。通过他对内战的认真思考，人们了解了林肯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他写道：“这场战争永无止境，除非一方战败。只有战斗才能结束战争。”众所周知，乔治·米德是一位“好战的将军”，与大军将领们相处融洽。然而，作战部的激进分子本杰明·韦德、撒迦利亚·钱德勒和乔治·H.科沃德对乔治·米德看法不一。按照激进派的观点，乔治·米德值得信赖，因为他愿意指挥黑人军队。 [59] 与我们通过私人信件了解乔治·米德相比，1863年的华盛顿人可能更了解乔治·米德。因此，我们认为，约瑟夫·胡克的任命是民意所向。威廉·罗斯科·利弗莫尔写道：“想要成为一名出色的指挥官，不仅需要独到的理解力，还要长期刻苦学习。”按照这一标准，乔治·米德显然比约瑟夫·胡克更具优势。



达利斯·N.库奇（1822—1897）



约翰·塞奇威克（1813—1864）

约瑟夫·胡克担任总指挥后，波托马克军士气低迷，甚至几近绝望。

士兵们“频繁”出逃。[60] 约瑟夫·胡克试图改变现状。随后，全军上下都感受到了他出众的组织才能。卡尔·舒尔茨写道：“很快，军营里的阴云消散了，自信和希望的新气息迅速弥漫开来。”[61] 1863年3月30日，乔治·米德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现在，我军士气高涨，已经准备好大战一番。”[62] 1863年4月初，林肯已经“筋疲力尽”，但还是前去拜访了约瑟夫·胡克，检阅了军队，并对看到的一切“倍感欣慰”[63] 。北方人也看到了约瑟夫·胡克的工作及成就，心情逐渐恢复平静，充满希望地讨论着胜利。

第15节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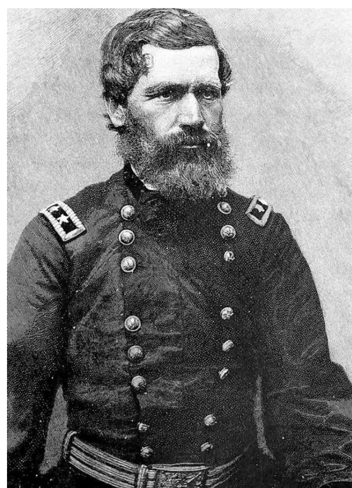


丹尼尔·西克尔斯（1819—1914）

林肯来访后不久，约瑟夫·胡克认为，军队已经准备好发起攻势。因为服役期为九个月和两年的两万三千名士兵即将期满，所以约瑟夫·胡克显得有些急迫。他率十三万人驻扎在拉帕汉诺克河北岸，对阵驻扎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罗伯特·E.李率领的六万人。结果，北弗吉尼亚军遭到詹姆斯·朗斯特里特的先遣部队和部分兵团的攻击，兵力被削弱。约瑟夫·胡克命骑兵向里士满行进，切断南方邦联军的通信。但由于连续几天的暴雨，河水上涨，骑兵被耽搁了，并没有协助到约瑟夫·胡克的作战计划。1863年4月27日，约瑟夫·胡克不再等待骑兵，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上游二十七英里处，调动三个兵团横渡拉帕汉诺克河，然后渡过拉皮丹河，向河流南侧的钱斯勒斯维尔进军。卡尔·舒尔茨写道："大军状态极好，精神振奋。官兵们似乎已经意识到正在发起一场史无前例的进攻。行军途中，士兵们一路欢声笑语，消除了多日来的疲惫。"[64] 为了隐藏主力部队，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下游附近，约翰·塞奇威克率第六军团强行渡过了拉帕汉诺克河。1863年4月30日，在美国境内的浅滩，达利斯·N.库奇率第二军团顺利渡河，向钱斯勒斯维尔进军。1863年5月1日，丹尼尔·西克尔斯率第三军团随后跟进。1863年5月1日早晨，约瑟夫·胡克召集了五个军团，亲自指挥[65]。乔治·米德写信给妻子说："现在，我们已经过了河，在谋略上胜过了南方邦联军，但还没有摆脱困境。"[66] 然而，约瑟夫·胡克充满信心[67]，并夸下海口："最近三天的行动已经证明，

除了飞过或绕过我们的防线，敌人没有其他办法与我们正面作战。我们一定能消灭他们。”他对林肯说：“我指挥着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68] 1863年5月1日，他率大军进攻南方邦联军，对南方邦联军军力的判断十分准确[69]。

罗伯特·E.李虽然希望詹姆斯·朗斯特里特率军前来支援，但也绝不会因北方联邦军顺利渡过拉帕汉诺克河感到不安。他与托马斯·J.杰克逊配合默契。相比乔治·B.麦克莱伦，他们并不惧怕约瑟夫·胡克。如果知道了约瑟夫·胡克虚张声势的命令，他们一定会认为对手是像教皇一样自大的人。1863年5月1日的战况非常简单，即约瑟夫·胡克进攻，罗伯特·E.李反击。随后，约瑟夫·胡克心生畏惧，命军队撤退。乔治·米德描述自己的军团时写道：“我们刚要迎敌，就被召回了。”如果约瑟夫·胡克坚持最初的命令，命各军团和各师继续进军，一定会引发一场激烈的战役。虽然结果并不明朗，但北方联邦军不会因撤退士气低沉，约瑟夫·胡克也不会因犹豫不决失去将领们的信任。军队撤退后不久，达利斯·N.库奇见到了约瑟夫·胡克，感觉他看起来“已经战败”。


奥利弗·霍华德（1830—1909）

1863年5月2日，罗伯特·E.李和约瑟夫·胡克进行了一场智力竞赛，也是托马斯·J.杰克逊和奥利弗·霍华德的实战对决。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中，我们已经了解了南方邦联军的两位将领。但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威廉·罗斯科·利弗莫尔的专业分析[70]值得参考。实际上，战争结果与我们真实记录的一样。历史似乎正在重演，约瑟夫·胡克不知如何统领十万大

军，为第十一军团选任了一位没有能力的指挥官。后来的作战中，第十一军团受到了南方邦联军的猛烈攻击。[71] 卡尔·舒尔茨是奥利弗·霍华德的下属，指挥着一个师，但不认为奥利弗·霍华德“智慧过人”。他写道：“在与奥利弗·霍华德的对话中，能明显感受到他已经筋疲力尽，做决定时犹豫不决。”[72]

撤退后，约瑟夫·胡克决定进行防守。他预感到，罗伯特·E.李会正面进攻自己的中间部队，因此，做好了充分的防御准备。但罗伯特·E.李并未按敌人的想法行动，觉得从正面进攻“难度太大，伤亡较重，因为约瑟夫·胡克占据了地理和兵力方面的优势。”[73] 北方联邦军可以看到南方邦联军的军营。罗伯特·E.李和托马斯·J.杰克逊打算袭击弗雷德里克斯堡平原上的约翰·塞奇威克，但因不切实际放弃了[74]。然而，他们从未想过“落荒而逃”，一心想要进攻北方联邦军。1863年5月1日夜晚，他们坐在两个旧箱子上，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罗伯特·E.李“决定试着进攻约瑟夫·胡克的右翼，攻克北方联邦军的后方，同时在前方留一支军队牵制北方联邦军，隐藏自己的真实行动。”他命托马斯·J.杰克逊执行计划。显然，罗伯特·E.李蔑视敌将，面对敌方的优势兵力时，打算兵分两路。

1863年5月2日清晨，“伟大的副将”托马斯·J.杰克逊开始行军，绕到了北方联邦军的右翼，打算进攻。北方联邦军的右翼是奥利弗·霍华德率领的第十一军团。托马斯·J.杰克逊率领三万一千七百人，罗伯特·E.李只有一万三千人。罗伯特·E.李将三分之二的步兵和五分之二的炮兵派给了托马斯·J.杰克逊，留下剩余兵力对阵约瑟夫·胡克的前锋部队[75]。亨特·麦圭尔博士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托马斯·J.杰克逊。他向约瑟夫·胡克的后方进军时，显得激动而紧张。他脸色苍白，眼神闪烁，薄平的双唇间发出了一份简洁的指令：向前冲，向前冲！”[76] 托马斯·J.杰克逊衣衫不整，头戴旧帽，士兵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举着已经破了的旗帜，看起来就像一群“散漫的乌合之众”。他们顶着烈日，饱受饥渴的折磨，却坚持行军[77]。队伍停下来休息了三次，每次二十分钟。其间，骑兵将领菲茨休·李带托马斯·J.杰克逊来到山顶，看到了北方联邦军第十一军团的防御工事。防御工事后面的一些士兵已经摆好枪支，有的在聊天，有的在抽烟，有的在打牌，还有一些士兵正在杀猪宰牛，准备晚饭。托马斯·J.杰克逊看到北方联邦军并未做好应战准备，非常惊喜，但只是双

唇微动，默默向战神祈祷[78]。他估计，从山顶处继续行军两英里，可以直接攻克北方联邦军的后方军团。于是，军队继续前进。行军十五英里后，托马斯·J.杰克逊在寄给罗伯特·E.李的最后一张便条中写道："如果可行，我希望尽快进攻。我相信仁慈的上帝会保佑我们大获全胜。"现在，他在北方联邦军的西边，与罗伯特·E.李的阵地正面相对。

与此同时，1863年5月2日黎明时分，约瑟夫·胡克前去视察右翼军队。回到司令部时，邮差正在等他，打算汇报托马斯·J.杰克逊的行动。约瑟夫·胡克看到，托马斯·J.杰克逊的一部分军队正在南下，像是要撤回里士满。因此，他认为南方邦联军的目标可能是袭击自己的右翼。他的推理顺理成章，因为1862年，罗伯特·E.李曾用同样的方式袭击了约翰·波普。1863年5月2日上午9时30分，约瑟夫·胡克向奥利弗·霍华德发出了警告[79]。随后，他又向奥利弗·霍华德和第十二军团指挥官亨利·W.斯洛克姆发出了联合声明，建议他们做好侧翼受击的准备，因为"我们有理由猜测，敌人正在向我们的右翼进军。"[80]关于南方邦联军行动的其他报告陆续送到了约瑟夫·胡克手中。丹尼尔·西克尔斯在报告中写道："三个小时内，南方邦联军的步兵、炮兵、辎重队和流动医疗队陆续向南行军。"约瑟夫·胡克命丹尼尔·西克尔斯阻挠南方邦联军的行动。不久，北方联邦军中很多人认为，南方邦联军已经全线溃退。约瑟夫·胡克采取了防御攻势，一如既往地摇摆不定，无视全面防御的重要性。最后，他也认为南方邦联军正在溃退。1863年5月2日下午4时10分，他寄给约翰·塞奇威克一封信，写道："我们知道敌人正在逃跑，试图袭击其辎重队。执行袭击计划的军队中，其中两个师由丹尼尔·西克尔斯指挥。"



菲茨休·李（1830—1909）

一名干练警惕的军团指挥官本可以做很多事，从而弥补总指挥官的失误。但奥利弗·霍华德与约瑟夫·胡克一样，轻视了南方邦联军。卡尔·舒尔茨十分清楚，敌人的大部队由东向西行进了两英里多。因此，他力劝奥利弗·霍华德做出部署，击退南方邦联军的侧翼攻击。他在1863年5月12日的报告中写道："我们的右翼完全孤立无援，后方也在敌人的掌控中。"他建议奥利弗·霍华德部署军队，说："如果真的打算采取防御战术，就必须守住全军的右翼和后方。按照我们的实际情况，如果不改变前线部署，我们将对西面和西北方向的袭击毫无抵抗力。"[81] 他催促奥利弗·霍华德做出部署，但奥利弗·霍华德认为南方邦联军在全力撤退，不愿意劳神劳力，为一场根本不会发生的进攻备战。他感到非常疲倦，准备午睡，命卡尔·舒尔茨有重要军情时再叫醒他。当约瑟夫·胡克的第一封警告急件送到的时候，卡尔·舒尔茨叫醒了奥利弗·霍华德，大声读了急件内容，并将其交给了奥利弗·霍华德。奥利弗·霍华德和军官们立即开始讨论军情。与此同时，一名年轻军官递上了第二封急件 [82] 。两封急件表明，卡尔·舒尔茨的建议完全合理。但奥利弗·霍华德依然不为所动。后来，为了服从约瑟夫·胡克的命令，奥利弗·霍华德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增援丹尼尔·西克尔斯。此刻，丹尼尔·西克尔斯被派去阻拦所谓的南方邦联

军的撤退。此次任务注定是徒劳的。奥利弗·霍华德细读了约瑟夫·胡克的第三封急件后，坚信南方邦联军正在撤退。于是，他协同增援部队，一起占领了罗伯特·E.李的后方。然而，关于托马斯·J.杰克逊真正行动的警报接连发来，"奥利弗·霍华德和约瑟夫·胡克逐渐明白，北方联邦军的右翼已经危机四伏。"[83]

与此同时，托马斯·J.杰克逊已经准备就绪。"士兵们默默守在自己的位置上，低声传达上级的命令。军号也不响了，士兵们不再像往常那样，用欢呼声向将军致敬。"[84] 北方联邦军第十一军团静静待在原地，对即将发生的灾难毫不知情。除了少数几名将士，北方联邦军的大多数将士赞同约瑟夫·胡克的意见。一些士兵正在准备晚饭，其他人在吃饭或休息，还有一些人正在玩纸牌。1863年5月2日傍晚6时，南方邦联军吹响了军号。托马斯·J.杰克逊派出大部分兵力猛攻北方联邦军第十一军团的九千兵力。南方邦联军的第一次攻击像一次快速进军，追赶着荒原上疾奔的鹿和兔子。随后，"反叛者的呐喊"和具有毁灭性的炮火声响起。经过短暂的抵抗，北方联邦军第十一军团溃逃了。与托马斯·J.杰克逊一起的爱德华·波特·亚历山大写道："任何军队都会采取类似的行动。战士们在战斗中都是以一敌六。"[85] 对南方邦联军来说，胜利的代价是高昂的。随后，托马斯·J.杰克逊的大军穿过茂密的树林时，陷入了困境。托马斯·J.杰克逊竭力整顿队伍，带着护卫队来到战线附近，想要探明约瑟夫·胡克的意图。忽然，北方联邦军队发起了攻击，他只好带着护卫队撤退。在黑夜中，南方邦联军将护卫队误认为北方联邦骑兵，于是开了枪。托马斯·J.杰克逊不幸中弹 [86] 。将军受伤，意味着军队不可能获胜了。丹尼尔·西克尔斯陷入了危局，但由于星空朗照，明月近满，他成功突围了出去，重新占领了护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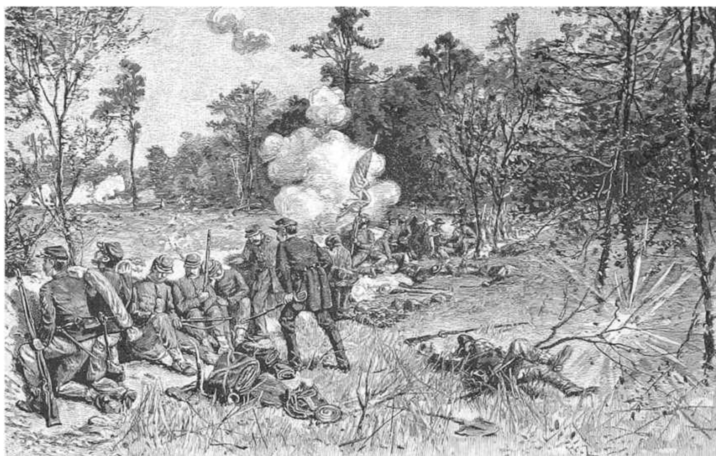
当北方联邦军第十一军团溃败的时候，约瑟夫·胡克忧心忡忡，沮丧不已，完全没有能力承担重任。1863年5月3日，约瑟夫·胡克虽然已经尽力，但依然无法胜任，甚至濒临崩溃，胡乱应付着一场没有希望的战役。他的对手显得精明、自信。1863年5月3日清晨，托马斯·J.杰克逊的军团一边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托马斯·J.杰克逊永存"，一边发起了进攻，罗伯特·E.李率军前来支援。北方联邦军顽强抵抗。南方邦联军的努力值得称赞，但他们没有领袖，司令部也没有实质性的指令。三万至三万五

千名新兵近在咫尺，渴望参战，却迟迟不见命令传来。1863年4月，林肯视察了波托马克军，离开时劝告约瑟夫·胡克：“下次战斗时，一定要启用全部兵力。”但他的劝告并未受到重视。

1863年5月3日上午9时左右，一枚炮弹击中了司令部的一根柱子，靠着柱子的约瑟夫·胡克被撞晕了[87]。此时，北方联邦军几乎已经战败。罗伯特·E.李在报告中说：“截止1863年5月3日上午10时，我们已经完全占领了战场。”

关于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的其他信息，我们无须知道。1863年5月4日午夜，约瑟夫·胡克召集了各军指挥官，共同商议是否撤回河北岸。达利斯·N.库奇和丹尼尔·西克尔斯赞成撤退。乔治·米德、约翰·F.雷诺兹和奥利弗·霍华德认为，应该继续战斗。当时，约瑟夫·胡克说自己会一人承担撤退的责任[88]。于是，北方联邦军撤到了河北岸。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中，北方联邦军伤亡一万六千七百九十二人，南方邦联军伤亡一万两千七百六十四人[89]。

在担任总指挥期间，约瑟夫·胡克从来没有因为喝酒误事。他原来喜欢喝威士忌，但从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开始，或到达钱斯勒斯维尔后，一直滴酒未沾[90]。约瑟夫·胡克战败的原因是能力欠缺，勇气不足。与此同时，乔治·米德的描述解释了整起事件。他在1863年5月8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在紧要关头，约瑟夫·胡克毫无战斗力，所有人对他很失望。实际上，他比乔治·B.麦克莱伦更谨小慎微，遇事喜欢躲闪，在不用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总会夸夸其谈。当自己担起责任的时候，应该行动起来；当别人担起责任的时候，应该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战斗结束后，约瑟夫·胡克不顾大部分指挥官的反对，决定撤军……决定撤退后，他非常沮丧地对我说，他准备将波托马克军交给我，还说自己已经受够了，宁愿从未来到这个世上。”[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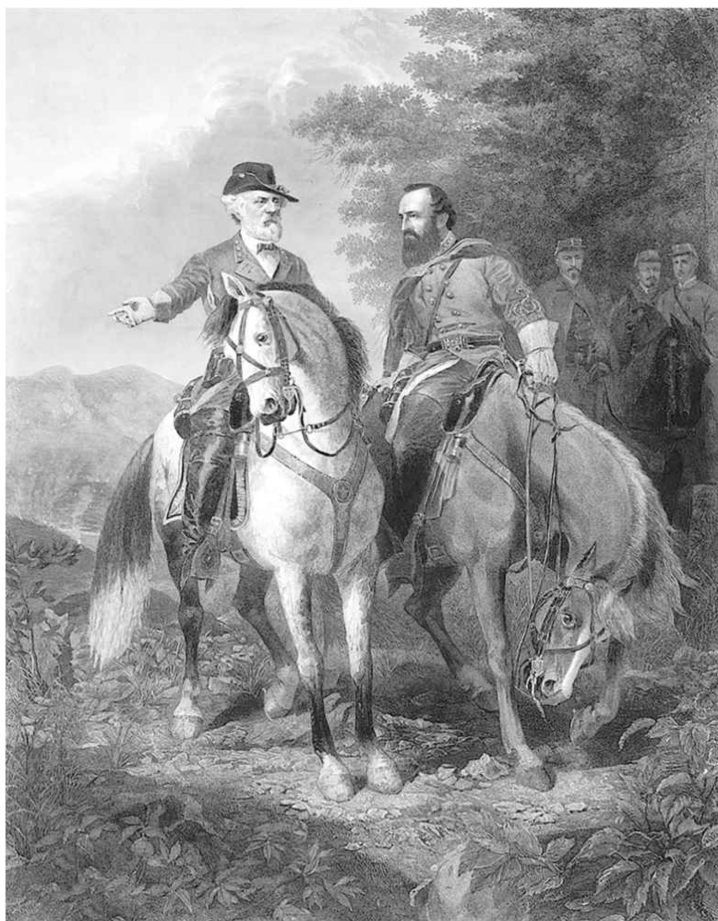
联邦军在战壕里向邦联军射击



联邦军指挥官指挥军队作战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



然而，无论如何，对罗伯特·E.李来说，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仍然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只有足智多谋、品德高尚的将军，才能率领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士兵，战胜一支人数成倍、装备精良的北方联邦军。南方邦联军的推测明显合理。他们时时警惕，无畏牺牲。北方联邦军与此恰好相反。在进攻南方邦联军右翼的前一晚，托马斯·J.杰克逊睡在一棵松树下，副官给他盖上了一条披肩。但当副官睡着的时候，他将披肩盖在了副官身上，自己什么也没盖，结果被冻醒得了风寒。早上，他没来得及吃早餐，便立即率军继续前进[92]。在一场“可笑又恼人的偷袭”[93]发生前，年仅三十三岁的奥利弗·霍华德正在午睡。

第16节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的影响

罗伯特·E.李平静地等待着托马斯·J.杰克逊的攻击结果，时刻保持警惕。其间，他给杰斐逊·戴维斯写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信的内容包括他对此次战役的风险评估及万一失败后的应对之策。他写道："如果由我全权指挥，军队粮草充足，我会更坦然自若。但我判断，北方联邦军更具兵力和地理方面的优势。" [94] 当托马斯·J.杰克逊击败北方联邦军的右翼时，"约瑟夫·胡克和两名助手正坐在司令部的阳台上，享受着夏日夜晚的凉爽" [95] 。直到北方联邦军第十一军团战败溃逃，他才警醒到，战争真的爆发了。

陆军部和林肯收到的消息并不详细，也不准确。吉迪恩·韦尔斯在1863年5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下午，我在陆军部见到了林肯总统。他一直来回走动，非常想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前线传来的消息都不可靠。大家似乎都感觉到，我们的军队获胜了。但实际上，我军死伤惨重，更加激烈和可怕的战役迫在眉睫。" [96] 当林肯收到电报，称大军撤到了拉帕汉诺克河北岸时，喊道："天哪！天哪！国民会怎么说？国民会怎么说？" [97] 1863年5月6日，查尔斯·萨姆纳见过"垂头丧气"的林肯后，来到吉迪恩·韦尔斯的办公室，"举起双手，惊叹道，'败了，败了，一败涂地啊！'" [98]

由于陆军部对电报的审查非常缓慢，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的消息很久才传到北方。人们知道了战役过程后，万分沮丧。现在，许多支持战争的人都不再抱有征服南方的希望。《芝加哥论坛报》上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条严肃建议，即由林肯担任波托马克军的指挥官。令人痛心的是，北方一直没有找到一位能担大任的将军。正如文章的作者总结的，我们由衷地认为，"老亚伯" [99] 可以带领我军取得胜利。"如果他做不到，还有谁能做到呢？"

然而，第一次和第二次布尔溪战役、乔治·B.麦克莱伦在里士满战败及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后，北方人内心的沮丧和创伤久久无法抹去。但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后，北方人显得没有那么沮丧了。实际上，报纸已经不再像战争初期那样，准确反映公众情绪了。大量的社论写作都是为了

让读者心怀希望，但后来出版的回忆录或口口相传的往事，都在纠正当时报纸上的言论。因此，我们推论：从性质和程度方面来看，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失败后的沮丧不同于其他时期蔓延的沮丧。1862年秋天开始，商业活动日益兴盛。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已经开始，证券交易频繁，合法交易增多，人们将存款投资在政府债券上。此外，值得注意的一个观点是：战争促进了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政府是最大的买家，一项活动联系着另一项活动。虽然国家正处在困境中，大多数人选择通过正当途径赚钱，但也有一些投机倒把的行为。当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大败的消息传到纽约时，黄金价格突然上涨。一开始，铁路公司的股票很不稳定，但很快又以良好的态势上涨。政府债券一直很稳定，公众继续认购面值为五至二十美元的债券。人们不再参军入伍，因为大多数人厌倦了战争，繁荣的商业也带来了许多就业机会。就平民入伍来说，战争已经成为一种贸易活动。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城镇和各市行政区提供了入伍奖励金，鼓励人们积极参军。

[1] 《美国史》，第4卷，第164页，第176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2] 《卡尔·舒尔茨的发言、书信和报告》，第1卷，第209页，第210页，第211页，第217页，第218页。——原注

[3] 《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的书信》，第1卷，第258页。——原注

[4] 1862年10月8日，佩里维尔战役爆发。——编者注

[5] 《美国史》，第4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奥利弗·P.莫顿传》，第1卷，威廉·福克著。——原注

[6]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169页。——原注

[7] 《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320页。第318页记有乔治·B.麦克莱伦的部分辩解。——原注

[8]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176页，第177页。——原注

[9] 《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319页。——原注

[10] 《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326页。——原注

[11] 《卡尔·舒尔茨的发言、书信和报告》，第1卷，第213页。——原注

[12] 《林肯的个人特质》，第255页，海伦·尼古拉著。——原注

[13] 《卡尔·舒尔茨的发言、书信和报告》，第1卷，第220页。——原注

[14] 1865年1月22日，威廉·T.谢尔曼在写给参议员的信中说：“我在战斗中统率十万人，行军中果断坚定，指挥得当，有口皆碑。”《威廉·T.谢尔曼将军与参议员之间的通信》，第246页。——原注

[15] 《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的书信》，第1卷，第258页。——原注

[16] 《美国内战史》，第2卷，第442页，约翰·C.罗普斯著。——原注

[17] 《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317页。——原注

[18] 《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330页。——原注

[19] 弗吉尼亚州的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爆发于1862年12月13日。——编者注

[20] 达利斯·N.库奇（Darius N. Couch），时任第二军团指挥官。——原注

[21] 《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348页。——原注

[22] 《约翰·默里·福布斯书信回忆录》，第1卷，第343页，萨拉·F.休斯著。——原注

[23] 《林肯全集》，第2卷，第243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24] 《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327页。——原注

[25] 《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348页。——原注

[26] 1863年1月20日至1863年1月24日，安布罗斯·伯恩赛德进行了著名的"泥中行军"。大部分队伍抵达了班克斯福特附近，距弗雷德里克斯堡四至七英里。《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1卷，第1册，第752页到第755页。——编者注

[27] 当时，内阁危机是联邦政府用到的一个英国政治用语。——原注

[28] 《萨蒙·P.蔡斯传》，第482页，罗伯特·沃登著。——原注

[29] 奥姆斯比·M.米切尔（Ormsby M. Mitchel，1810—1862），美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演说家。1862年，他负责为黑人奴隶创建一套姓氏体系。1862年10月30日，因患黄热病去世。——编者注

[30] 《威廉·P.费森登传》，第1卷，第240页。——原注

[31]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195页。——原注

[32] 《林肯传》，第6卷，第265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33]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196页。——原注

[34]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197页。——原注

[35] 《威廉·P.费森登传》，第1卷，第247页。——原注

[36] 《威廉·P.费森登传》，第1卷，第202页。——原注

[37] 《林肯传》，第6卷，第271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38] 《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114页，约翰·海伊著。——原注

[39]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威廉·P.费森登传》，第1卷。《林肯传》，第6卷，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美国史》，第4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书信与日记》，第1卷，约翰·海伊著。《威廉·H.苏厄德传》，第2卷，弗雷德里克·班克罗夫特著。《萨蒙·P.蔡斯传》，罗伯特·沃登著。《约翰·默里·福布斯的书信回忆录》，第1卷，萨拉·F.休斯著。——原注

[40] 《威廉·P.费森登传》，第1卷，第245页。——原注

[41] 《美国史》，第4卷；《讲稿》，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42] 《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97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原注

[43] 北方联邦军伤亡一万两千九百零六人，南方邦联军伤亡一万一千七百三

十九人。《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97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原注

[44] 《林肯传》，第10卷，第281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45] 《威廉·T.谢尔曼将军与参议员之间的通信》，第182页。——原注

[46] 乔治·托马斯是威廉·罗斯克兰斯手下的军团高级指挥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副指挥官。他曾拒绝取代乔治·P.比尔，但也曾拒绝服从军衔低于自己的威廉·罗斯克兰斯。林肯调整了威廉·罗斯克兰斯的委任状，提高了其军衔后，乔治·托马斯才开始忠心服从威廉·罗斯克兰斯。——编者注

[47] 该草案虽然没有征募到很多士兵，而且常被滥用，但也招募了一些志愿军。——编者注

[48] 《威廉·P.费森登传》，第1卷，第264页。——原注

[49] 《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的书信》，第1卷，第261页。——原注

[50] 阿盖尔公爵夫人（Duchess of Argyll，1824—1878），英国女贵族，废奴主义者。——译者注

[51] 林肯曾劝安布罗斯·伯恩赛德收回辞呈。随后，他下令解除了安布罗斯·伯恩赛德的职务。《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1卷，第941页，第944页，第954页，第998页，第1004页，第1009页。《作战联合委员会报告》，第1卷，第718页。——原注

[52] 指酿酒的麦芽或啤酒等含酒精饮料的拟人化名称。——译者注

[53] 《林肯全集》，第2卷，第252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54] 《作战联合委员会报告》，第1卷，第175页，1865年。《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3卷，第239页。——原注

[55] 《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318页，第351页。——原注

[56] 在安布罗斯·伯恩赛德卸任时，约翰·塞奇威克指挥第九军团。1863年1月26日，约瑟夫·胡克担任总指挥。1863年2月5日，约翰·塞奇威克被派往第六军团。——原注

[57] 召集他们参加会议很容易，因为他们距华盛顿只有几小时路程。——原注

[58] 1862年7月4日，约翰·塞奇威克和达利斯·N.库奇成为少将，级别高于乔治·米德。1862年11月29日，约翰·F.雷诺兹和乔治·米德成为少将，但在排名榜上，约翰·F.雷诺兹排在乔治·米德前面。——原注

[59] 《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340页，第347页，第349页，第356页，第365页。——原注

[60] 《波托马克军医疗往事》，第101页，乔纳森·莱特曼著。——原注

[61] 《卡尔·舒尔茨回忆录》，第2卷，第403页。——原注

[62] 《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362页。——原注

[63] 《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364页。——原注

[64] 《卡尔·舒尔茨回忆录》，第2卷，第408页。——原注

[65] 约翰·塞奇威克率第六兵团距弗雷德里克斯堡约十一英里，约翰·F.雷诺兹率第一军团距弗雷德里克斯堡约十三英里，两军相距约二十三英里。——原注

[66] 《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370页。——原注

[67]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第130页，第236页、第237页，小约翰·比奇洛著。《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369页。——原注

[68]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第130页，小约翰·比奇洛著。——原注

[69]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第112页，小约翰·比奇洛著。——原注

[70] 《美国内战纪事》，第1卷，第124页，第178页，威廉·罗斯科·利弗莫尔著。——原注

[71]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第41页，小约翰·比奇洛著。——原注

[72] 《卡尔·舒尔茨回忆录》，第2卷，第405页。——原注

[73] 罗伯特·E.李的报告。《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5卷，第1册，第798页。——原注

[74] 《托马斯·J.杰克逊与美国内战》，第2卷，512页，乔治·F.R.亨德森著。——原注

[75]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第273页，小约翰·比奇洛著。——原注

[76]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第275页，小约翰·比奇洛著。——原注

[77]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第13页，艾伯特·C.哈姆林著。《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第276页，小约翰·比奇洛著。——原注

[78] 《罗伯特·E.李将军传》，第247页，菲茨休·李著。——原注

[79]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第276页，小约翰·比奇洛著。——原注

[80]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5卷，第2册，第360页。——原注

[81]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5卷，第1册，第651页。——原注

[82] 《卡尔·舒尔茨回忆录》，第2卷，第416页。——原注

[83]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第287页，小约翰·比奇洛著。——原注

[84]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第292页，小约翰·比奇洛著。——原注

[85] 《一名邦联兵的战争回忆录》，第337页，爱德华·波特·亚历山大著。——原注

[86] 托马斯·J.杰克逊的手臂受了重伤，被迫截肢。1863年5月10日，他因肺炎逝世。随后，J.E.B.斯图尔特接替了他的职位。——编者注

[87] 约瑟夫·胡克清醒后，指挥军队撤退。——原注

[88] 《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3卷，第171页，达利斯·N.库奇。——原注

[89] 《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98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原注。为了回应约瑟夫·胡克1863年5月3日下达的命令，约翰·塞奇威克进攻了朱巴尔·厄尔利率领的南方邦联军。经过激烈战斗后，约翰·塞奇威克攻占了马里耶高地，将朱巴尔·厄尔利驱逐了出去。在萨勒姆教堂的战斗中，罗伯特·E.李派拉斐特·麦克劳斯协助朱巴尔·厄尔利，阻止约翰·塞奇威克与约瑟夫·胡克会合。约翰·塞奇威克被迫撤退。——编者注

[90] 《美国史》，第4卷，第264页注释，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365页。——原注

[91] 《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372页，第373页。——原注

[92] 《“石墙”杰克逊传》，第675页，第677页，罗伯特·达布尼著。——原注

[93]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第60页，艾伯特·C.哈姆林著。——原注

[94]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5卷，第2册，第765页。——原注

[95]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第301页，小约翰·比奇洛著。——原注

[96]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291页。——原注

[97] 《林肯时期的华盛顿》，第58页，诺亚·布鲁克斯著。——原注

[98]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293页。——原注

[99] “老亚伯”“正直的亚伯”是林肯的昵称和外号。——译者注

第6章　走出困境：乔治·米勒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胜利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表明，约瑟夫·胡克没有能力指挥一支大军，应该被罢免。此外，也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萨蒙·P.蔡斯及其激进派追随者有意保住约瑟夫·胡克。实际上，虽然萨蒙·P.蔡斯支持约瑟夫·胡克，但如果林肯愿意听谏言，亨利·W.哈勒克在军事方面的建议会更有分量。众所周知，林肯其实并不信任约瑟夫·胡克，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也有同感。林肯是约瑟夫·胡克忠实的朋友。战后不久，他视察了波托马克军，认为不应该指责任何人，因为失败已成定局。因此，约瑟夫·胡克很快振作起来，以为自己的位置保住了，不再刻意关注战士本对他的质疑。乔治·米德写道："从找到继任者的难度和每次战败后更换总指挥的荒谬程度来看，我认为约瑟夫·胡克是安全的。"[1] 吉迪恩·韦尔斯在日记中写道："林肯很喜欢约瑟夫·胡克。如果其他人妥协，他会继续任用约瑟夫·胡克。"[2] 在华盛顿时，约翰·F.雷诺兹的一位朋友说，人们正在讨论让他担任波托马克军的总指挥。于是，约翰·F.雷诺兹"立即去找林肯，称自己不想当总指挥，也不会当。"但他在此次会面中大谈约瑟夫·胡克的缺点。林肯说："我不会因一次哑火扔一把枪。"[3]

第1节　罗伯特·E.李进军宾夕法尼亚州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结束后，罗伯特·E.李命军队休整数周。利用这段时间，他改编了军队，将军队分成三个军团，分别由詹姆斯·朗斯特里特[4]、理查德·S.尤厄尔和安布罗斯·P.希尔指挥。他认为“继续防御”毫无意义，因此，决定进军宾夕法尼亚州。此次行动会威胁到华盛顿，诱使约瑟夫·胡克追击南方邦联军，使弗吉尼亚州免受北方联邦军侵扰。以前，罗伯特·E.李可能不会满足于这类小成就，但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和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后，他谦逊了很多。他期待时机成熟时与波托马克军开战。他的军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士兵们非常信任他。他确信南方邦联军会获胜，甚至打垮北方联邦军，然后轻而易举地攻克华盛顿，继而和平占领北方。此刻，南方邦联政府最担心的是尤利西斯·S.格兰特在维克斯堡的行动。解救维克斯堡的方案很多，但最有效的是攻克北方联邦首都。进攻华盛顿的最佳时机就是现在，因为南方邦联军势头正盛。如果继续耽误下去，南方邦联军一定会败在进攻效率上。罗伯特·E.李在写给杰斐逊·戴维斯的信中说：“我们的兵源不断减少。如果北方联邦军团结一致对抗我们，那么我们与北方联邦军之间的兵力差距会越来越悬殊。”罗伯特·E.李恪尽职守，密切关注着北方的报纸。他从各种新闻、评论和预测中得出了大量正确推论，很少遗漏关键信息。考虑到大部分北方人已经厌倦了战争，而且自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和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以来，民主党的力量日益强大，他写信给杰斐逊·戴维斯说：“我们应该明白，分裂和削弱北方联邦军没有所谓的光荣手段。因此，我们应该始终忠于事实，全力支持北方兴起的和平政党。”[5]



骑在马上的约瑟夫·胡克

1863年6月3日，在弗雷德里克斯堡附近，罗伯特·E.李开始派兵。1863年6月10日，他命理查德·S.尤厄尔率兵前往谢南多厄河谷。理查德·S.尤厄尔击退了温彻斯特和马丁斯堡的北方联邦军。1863年6月15日，他的部分军队渡过了波多马克河，后续部队随即跟上。安布罗斯·P.希尔和詹姆斯·朗斯特里特率军前进，于1863年6月26日渡河到达了马里兰州。

罗伯特·E.李的北上行动已经非常明显[6]。因此，约瑟夫·胡克撤离了拉帕汉诺克河岸的营地，向波托马克河进发，沿着蓝岭以东行军，试图保护华盛顿。在此次行动中，约瑟夫·胡克领兵有方。1863年6月22日，在马里兰州黑格斯敦待命的理查德·S.尤厄尔接到前进命令。罗伯特·E.李写道："如果条件允许，我打算占领哈里斯堡。"理查德·S.尤厄尔率军进入宾夕法尼亚州，在钱伯斯堡停留了一天，补充粮草。1863年6月27日，他抵达了卡莱尔，并派朱巴尔·厄尔利率军攻占了约克县。当地官员和民众代表正式投降。朱巴尔·厄尔利强制他们缴税，获得了一千顶帽子、一千两百双鞋子、一千双袜子和三天口粮及两万八千六百美元。他还烧毁了通往约克县的铁路桥，随后率军前去占领萨斯奎哈纳河上的哥

伦比亚桥。哥伦比亚桥是一座木质结构的桥，由若干石柱支撑，长一点二五英里，上面有一条铁路、一条供马车行驶的路和一条运河的曳船路[7]。朱巴尔·厄尔利打算率军过桥，切断宾夕法尼亚州的铁路线，占领兰卡斯特，然后强行征税，进攻哈里斯堡后方的北方联邦军。到时，理查德·S.尤厄尔会率军从正前方进攻北方联邦军。但在南方邦联军到来前，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民兵团烧毁了哥伦比亚桥。火势迅速蔓延，朱巴尔·厄尔利的军队无法扑灭大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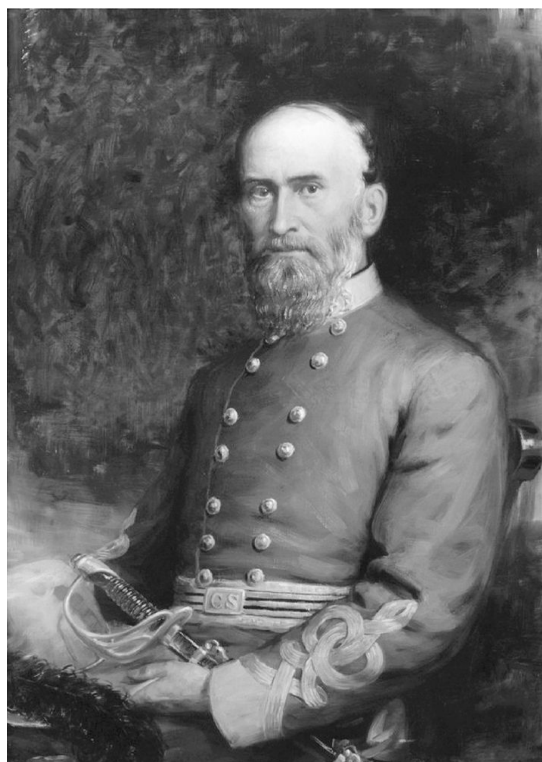
钱伯斯堡

与此同时，理查德·S.尤厄尔通过征用、搜查店铺等方式，补充了军火、药品及其他物资，得到了“近三千头牛”和五千桶面粉。其间，在一支炮兵小分队的支援下，他的骑兵部队来到距哈里斯堡三英里的地方，向达利斯·N.库奇麾下的守军纠察队发起了进攻。1863年6月29日，理查德·S.尤厄尔准备就绪，打算进军哈里斯堡。1863年6月27日，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和安布罗斯·P.希尔已经到达钱伯斯堡，与罗伯特·E.李会合。在宾夕法尼亚州，南方邦联军已经有七万五千人。

虽然北方人很担心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但令人惊讶的是，南方邦联军已出现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坎伯兰山谷。由于罗伯特·E.李的直接指挥，南方邦联军几乎没有任何劫掠破坏行为。1863年6月21日，罗伯特·E.李下达了命令，叮嘱士兵们不得侵犯私人财产。到达钱伯斯堡后，他在1863年6月27日的命令中公开表示，对军队的整体表现感到满意，但也提到了之前因疏忽误事的事情，告诫士兵们应该与北方联邦军速战速决。罗伯特·E.李充分考虑到了军纪和民心，希望在北方“宣传和平理念”。此外，他用南方邦联货币支付了军需品，虽然毫无意义，但谈到动

机，不能忘记的是他用自己唯一拥有的货币进行了交易。如果南方邦联军打败宾夕法尼亚州的北方联邦军，南方邦联货币将迅速升值。[8]

无论发动战争的方式多么温和，战争终归是残暴的。罗伯特·E.李的军队行至坎伯兰山谷，惊慌和噩运随之而来。坎伯兰地区流言四起，称南方邦联军正在入侵途中，老少妇幼纷纷逃离。乔治·皮克特写道："北方联邦军带着所有军需品进入了坎伯兰山区，渡过了萨斯奎哈纳河。我们大方支付了所需物品，用的是邦联货币。"[9] 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以为，只要渡过萨斯奎哈纳河，人身和财产就安全了。在连接坎伯兰山谷和哈里斯堡的桥上，一辆辆装满家具和家居用品的马车陆续走过。黑人们害怕再次受到奴隶制的束缚，因此，在南方邦联军兵临城下前，慌忙逃走了。



朱巴尔·厄尔利（1816—1894）



乔治·皮克特（1825—1875）

1863年6月26日，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安德鲁·柯廷发表声明，打算征兵六万，号召人们团结起来“保卫家园，守护家人”。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及民众都意识到，哈里斯堡危在旦夕。除了炮兵和骑兵及来自纽约的十九个军团，宾夕法尼亚州的三十个民兵团都归达利斯·N.库奇指挥。达利斯·N.库奇善用兵力，派大部分军队驻守哈里斯堡。哈里斯堡的所有商铺都关门了，民众们手持锄头和铁锹，加紧修建防御工事。大部分男性应征入伍，在公园或大街上受训。在火车站，志愿兵接踵而至，受到惊吓的男女结队离开，场面非常混乱。南方邦联军的动向十分明确。哈里斯堡先是传来南方邦联军已距城二十三英里的消息，后又传来不足十八英里的消息。1863年6月28日，隆隆的炮声已经持续近两个小时，南方邦联军在距国会大厦四英里的范围内。1863年6月28日夜晚，费城上下人人自危，都在传南方邦联军正在炮轰哈里斯堡。成千上万人簇拥到切斯特纳特大街和马尔凯特大街上，迫切想知道发生了什么。1863年6月29日，两位有名望的市民向林肯发电报说，他们得到可靠消息，称南方邦联军正在向费城大规模进军。其他名流希望林肯授权达利斯·N.库奇，让他宣布戒严。所有商业贸易暂停。零售商、铁器制造商、机械加工商和

煤炭经营商举行了集会，呼吁工人们积极参军，保卫自己的州。谷物交易所为五个连提供了军需品。参加了1812年战争的一些士兵和神职人员分别集结起来，准备参战保卫家园。据说，银行家和零售商正在准备转移铸币和其他贵重物品。宾夕法尼亚州的铁路运营已经暂停。虽然事事错乱，愁云密布，但还不至于引起恐慌。1863年6月27日到1863年7月1日，骚乱愈演愈烈。1863年7月1日，面额为五至二十美元的政府债券的销售额达到一百七十万美元。在宾夕法尼亚铁路的东段，几乎没有火车运行，多处轨道被毁。然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以五十美元为基价，在费城出售股份。1863年6月27日的售价是六十一点七五美元，1863年7月1日的售价是六十美元。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古罗马历史学家提图斯·李维曾写道，在距罗马三英里的地方，北非古国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巴卡率军扎营。与此同时，该地区被售出，价格丝毫未受入侵者的影响。虽然纽约的黄金价格持续上涨，但并未引起股市的动荡。

虽然南方邦联军入侵宾夕法尼亚州的警报已经发出，但当北方人惶恐不安地拿起晨报或看着当天的通告时，看到的却是波托马克军更换总指挥的消息。当权者将拯救哈里斯堡、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的希望寄托在了波托马克军身上。人民大众虽然对当前的形势一知半解，但也认为波托马克军是自己的支柱。

第2节　乔治·米德接任约瑟夫·胡克

由于与亨利·W.哈勒克的观点不一致，1863年6月27日，约瑟夫·胡克提出辞职[10]。约瑟夫·胡克的辞职请求恰逢其时，因为前一天，即1863年6月26日，正如吉迪恩·韦尔斯在日记中记录的那样：“林肯非常偏袒约瑟夫·胡克，但在一次谈话中显露出对他的不信任。林肯说：‘如果我们的总指挥指挥得当，就能打败南方邦联军。在军事行动中，总指挥至关重要。约瑟夫·胡克可能会像乔治·B.麦克莱伦一样，犯类似的错误，错失良机。我们很快就能见分晓，但我认为，约瑟夫·胡克胜券在握。’”[11]

1863年6月27日下午3时，林肯接到了约瑟夫·胡克的辞职请求，很快做出了决定。他派一名军官前往波托马克军下达命令，解除约瑟夫·胡克的职务，由乔治·米德接任总指挥。

虽然约翰·F.雷诺兹和乔治·米德完全有能力胜任总指挥，但林肯依然觉得压力很大。一边是乔治·B.麦克莱伦，一边是约翰·C.弗里蒙特，他必须做出明智的选择。约翰·F.雷诺兹拒绝担任总指挥，因此，林肯只能选择乔治·米德。1863年6月24日，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乔治·米德非常谦虚地谈到，自己很可能被任命为总指挥，但并不确定林肯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他推测会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作为回应，他写道：“众所周知，在作战记录中，包括好战的约瑟夫·胡克在内，没有一位将军参加的战斗比我多，比我更有经验。我唯一可以说的是，我是否有能力成功率领一支大军，需要拭目以待。我愿意承认众人公正的论断。然而，我被任命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在政界或其他领域，没有人愿意为我说话。许多人都有重要人物为他们出头。我仅凭功绩就想担任总指挥，简直荒唐。”[12]



骑在马上的乔治·米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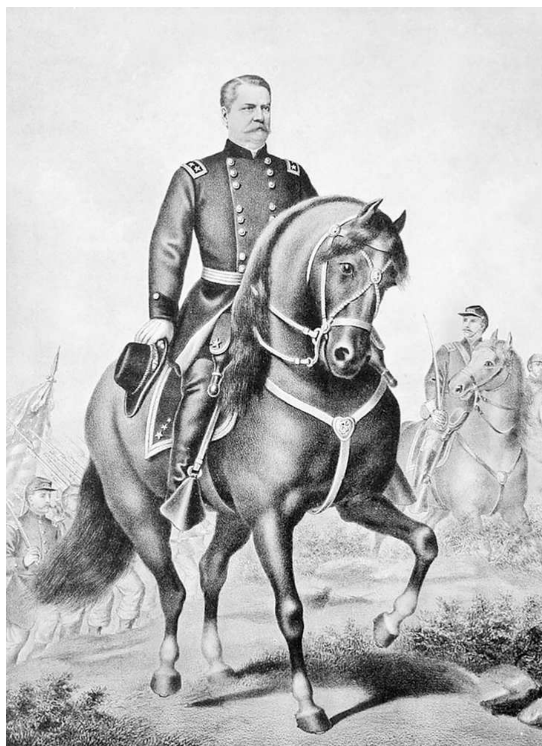
面对此次晋升，乔治·米德最有发言权。他在1863年6月29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是万能的上帝让我接任了总指挥一职，一个我们曾经一直提到的职位。1863年6月28日凌晨3时，一名来自华盛顿的军官走进我的帐篷，叫醒了我，说他来找我麻烦。起初，我以为他要解除我的职务，或者逮捕我……他递给我一封信。信中是一道命令，内容是解除约瑟夫·胡克的总指挥一职，任命我为总指挥……这似乎是上帝善意的举动。无论如何，作为一名士兵，我只能服从命令，尽全力指挥大军……我当即向罗伯特·E.李进军……一场战斗将决定国家的命运和联邦大业的成败。诚心祈祷，祈祷我们的国家兴旺发达，祈祷我能取得胜利。”

第3节　葛底斯堡战役

1863年7月，第二军团的参将弗兰克·哈斯克尔详细记录了葛底斯堡战役。他写道："总体来说，无论是将领还是士兵，都对约瑟夫·胡克没有信心。一些人对他的人品没有信心，另一些人质疑他的能力。"当得知更换总指挥的消息时，他写道："我们满怀欣喜和希望。上帝与我们同在，乔治·米德将军掌管了波托马克军……战士们欢呼雀跃，踏着欢快的步伐继续前进。"[13] 约翰·F.雷诺兹立即前去拜访乔治·米德，承诺会竭尽所能协助他。

林肯全权授权乔治·米德。乔治·米德率军北上，志在"寻得南方邦联军所在，发起进攻"。他当机立断，下属挥之即去。目前，将领们放下所有敌意和猜忌，全心全意投入战事。士兵们也表现出了坚强的意志，在6月末的酷暑中快速前行。

乔治·米德一路北上。罗伯特·E.李的军队集中在坎伯兰山谷以北地区。"因局势所迫"[14]，罗伯特·E.李召回了理查德·S.尤厄尔。理查德·S.尤厄尔原本计划攻打哈里斯堡。随后，他在葛底斯堡与大军会合。与此同时，安布罗斯·P.希尔和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受命前往葛底斯堡以西八英里的卡什敦[15]。罗伯特·E.李和乔治·米德都希望打一场防守战，并为此进行了演练。



温菲尔德·S.汉考克（1824—1886）

1863年7月1日，在葛底斯堡，一支南方邦联军和约翰·F.雷诺兹率领的军队发生了冲突，其中缘由无须赘述 [16] 。约翰·F.雷诺兹战死。随后，他的军队遭到重创。对乔治·米德来说，约翰·F.雷诺兹的死讯是一个晴天霹雳，就像罗伯特·E.李失去了托马斯·J.杰克逊一样。当他听闻约翰·F.雷诺兹的死讯时，立即派温菲尔德·S.汉考克前去接管约翰·F.雷诺兹的军队。温菲尔德·S.汉考克很快使军队恢复了秩序。然而，在葛底斯堡战役的第一天战斗中，南方邦联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17] 。

1863年7月1日下午6时，乔治·米德意识到，“葛底斯堡的一场大战正在逼近我们” [18] 。于是，他下令所有军团向葛底斯堡集结。1863年7月1日午夜时分，乔治·米德赶到了战场，面色苍白，满脸倦容，眼神空洞，因失眠、焦虑和重任显得疲惫不堪 [19] 。

1863年7月2日上午8时左右，在一名参谋兼勤务兵的陪同下，乔治·米德骑马前去视察右翼军。卡尔·舒尔茨与乔治·米德说了几句话，很惊讶“他胡子拉碴，面容憔悴，疲惫不堪，好像一夜没睡。”卡尔·舒尔茨写

道："显然，他已经筋疲力尽。但这位朴实、严肃的将军用务实的心态激发了战士们的信心。将领们和士兵们聚集在一起，用好奇的眼神看着他，然后转身离去，虽然不太热情，但显得很满意。他迅速查看了我们大军的位置……赞同地点了点头。几句寒暄过后，我问他战场上有多少人。我清楚地记得他的回答：'我预计大约有九万五千人，足够完成此次任务了。'他再次快速看了一眼战场，若有所思地说道：'嗯，我们可以在这儿一决高下，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 [20]

1863年7月2日下午，罗伯特·E.李和乔治·米德将全部兵力投入战场。罗伯特·E.李召集了七万人，乔治·米德召集了九万三千人 [21] 。在战斗打响的第一天，北方联邦军的伤亡人数远超南方邦联军。双方军队相距约一英里。南方邦联军占据了崎岖的神学院山脊，北方联邦军驻扎在墓地山脊突起的一面。墓地山脊非常适合防御。乔治·米德决定等待对方进攻。南方邦联军显得精力充沛。乔治·米德如果仔细研究了罗伯特·E.李的性格和战绩，可能会确信对方会先发起进攻。然而，詹姆斯·朗斯特里特与罗伯特·E.李意见不同。在第一天战斗结束后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应该包围乔治·米德的左翼军，让大军横在北方联邦军和华盛顿之间，乔治·米德被迫采取了攻势。与此同时，罗伯特·E.李显得非常焦虑，对与自己的既定计划相悖的提议感到恼火，说道："不对。北方联邦军就在那儿，我打算发起进攻。" [22] 从入侵一开始，他就毫不掩饰对北方联邦军的蔑视。虽然他认为乔治·米德比约瑟夫·胡克优秀，但觉得在关键时刻更换司令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一方面，自乔治·米德担任总指挥以来，波托马克军的行动非常迅速敏捷，令罗伯特·E.李印象深刻；另一方面，罗伯特·E.李认为南方邦联军所向披靡。几乎所有将士都坚信这一点，因为罗伯特·E.李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称得上战无不胜。罗伯特·E.李说："以前，从未出现过类似的军队。如果领导得当，我军将一往无前，百战百胜。"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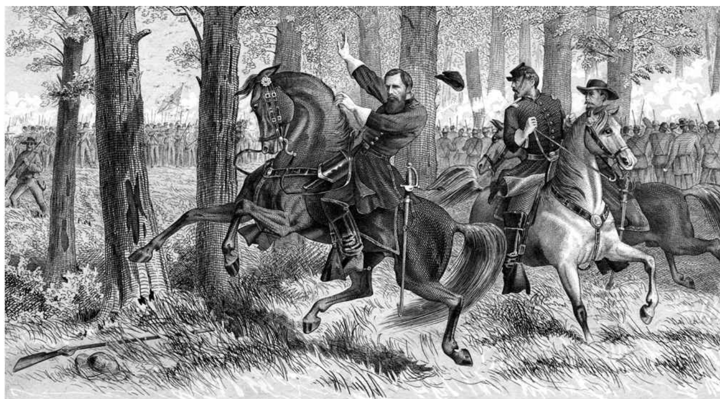
1863年7月2日，罗伯特·E.李准时起床。由于军队行动缓慢，他失去了快速集结兵力的先机。最后一支联邦军团，即第六军团，行军三十二英里，用时十七小时，于1863年7月2日傍晚抵达了战场。罗伯特·E.李随即展开进攻。后来，罗伯特·E.李详细讲述了当天的战斗过程和双方受到的重创。他说："我们拼尽全力驱逐北方联邦军，虽然有所进展，但并不

能占领其阵地。”[24] 南方邦联军的攻击毫无章法，进展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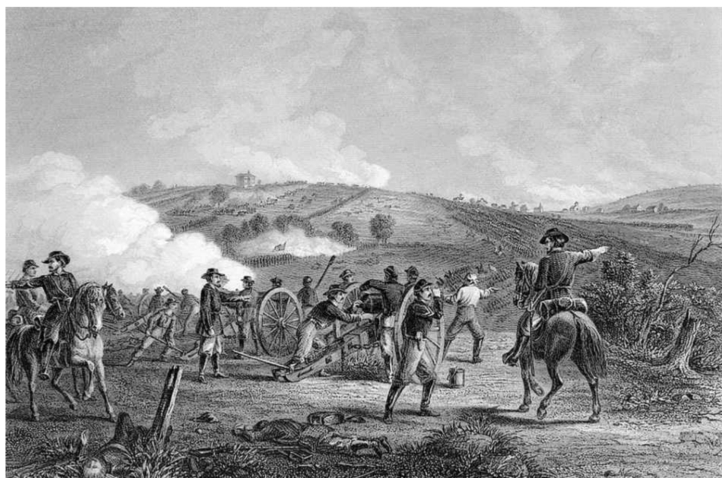
乔治·米德宣称获胜。1863年7月2日，他发电报给亨利·W.哈勒克说：“今天下午4时左右，南方邦联军袭击了我军。在最激烈的一场战斗结束后，南方邦联军被全面击退。”[25] 在电报中，他无意识地夸大了事实。1863年7月3日早上8时45分，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昨天，我们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战斗。南方邦联军发起了进攻，我们完全击退了他们。但两支军队都溃不成军。”[26]

1863年7月2日夜晚，乔治·米德召开了战事会议。会议期间，几位军团指挥官做了报告。从他们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北方联邦军的伤亡人数，约有两万人。虽然兵力严重受损，但将士们并未灰心丧气，提议“继续战斗”。会议结束后，乔治·米德对第二军团临时指挥官约翰·吉本说：“明天，如果罗伯特·E.李发动进攻，你的军队会是南方邦联军的第一个目标。”约翰·吉本询问原因。乔治·米德说：“他已经进攻过我们的侧翼，都失败了。如果决定再次尝试，他一定会进攻我们的腹地。”约翰·吉本说：“我希望如此。如果他这样做，我们会击败他的。”[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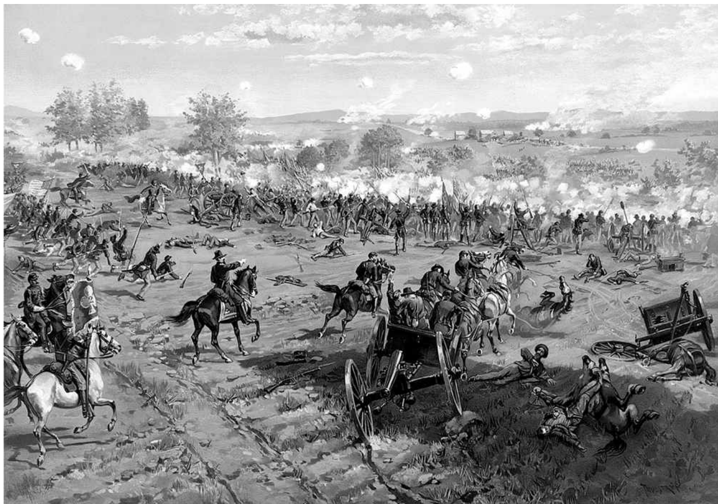
1863年7月3日凌晨，北方联邦军右翼遇袭。乔治·米德写信给妻子说：“此次战役的结果需要拭目以待。我军士气高昂，人人视死如归。”[28] 与此同时，罗伯特·E.李和詹姆斯·朗斯特里特视察了北方联邦军的阵地后，罗伯特·E.李决定进攻北方联邦军腹地。詹姆斯·朗斯特里特说：“我的上帝！看，罗伯特·E.李将军，我们的军队和北方联邦军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山峰陡峭，枪炮林立，壁垒重重，我们无法发起有效进攻，只能命步兵连对抗北方联邦军的炮兵连。看看我们要冲锋的阵地。在北方联邦军枪林弹雨的攻击下，我们离阵地约一英里。”罗伯特·E.李坚定地说：“北方联邦军就在那儿。詹姆斯·朗斯特里特上将，我必须进攻。”[29]



约翰·F.雷诺兹战死



联邦炮兵向邦联军射击



联邦军与邦联军展开白刃战



联邦军攻击前进

进攻、反击，进军、撤退。连战两天后，过去一个月的大小战役似乎都是在为这一刻做铺垫。耗时三四个小时的部署工作将决定战事前景。“1863年7月3日上午11时到下午1时，是一段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30] 突然，南方邦联军连发两枚信号弹，一百五十门大炮齐发。北方联邦军的迎战武器是八十杆枪[31]。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北方联邦军的高地具有一定优势，不会遭到南方邦联军炮兵的轰炸。南方邦联军的主要火力集中在北方联邦军第二军团。温菲尔德·S.汉考克重掌第二军团

的指挥权。他在报告中写道："这是我经历过的最猛烈的炮火"。但南方邦联军的炮火并没有重创北方联邦军。北方联邦军躲在城墙后面，受到地势和防御工事的保护。南方邦联军的炮火从他们头顶飞过，炸平了后方的空地。军旗飘扬，温菲尔德·S.汉考克骑马从军队前方走过，面色冷静，神态严肃，鼓舞士兵们鼓起勇气。他的一位准将说："将军，军团指挥官不应该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温菲尔德·S.汉考克回答道："有时，军团指挥官的性命不值一提。" [32] 南方邦联军的猛烈炮轰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乔治·米德知道，战斗才刚刚开始。他希望引诱南方邦联军继续进攻，于是，下令军队停止射击。北方联邦炮兵连的将领亨利·J.亨特一直在等待停战指令，因为他的弹药已经不足 [33] 。

第4节　乔治·皮克特的进攻

乔治·米德的计策成功了。詹姆斯·朗斯特里特以为炮轰发挥了作用[34]。指挥南方邦联炮兵的爱德华·波特·亚历山大“确信北方联邦军饱受重创。”[35] 乔治·皮克特骑马去见詹姆斯·朗斯特里特，打算接受进攻指令。他写道：“我发现他就像一只被困的雄狮。我从未见他如此愁容满面。我问候了他，接下来的几分钟，他一言不发地看着我。然后痛苦地对我说：‘乔治，我一想到进攻造成的死伤就心如刀绞。我已经下令给爱德华·波特·亚历山大，让他留意炮轰北方联邦军的结果。一有结果，他就会下令给你，因为我不能下令。’”[36]

罗伯特·E.李已经下令进攻。爱德华·波特·亚历山大虽然想逃避自己的责任，但仍然对此次进攻充满信心。他见了乔治·皮克特，发现乔治·皮克特积极乐观，于是更加尽职尽责。他不敢再等待了，派人给乔治·皮克特送了信。与此同时，乔治·皮克特正和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在一起。信中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快来吧。再不来，我的弹药就不够用了。”乔治·皮克特将信递给了詹姆斯·朗斯特里特，问道：“我是否应该听命前往？”乔治·皮克特写道：“詹姆斯·朗斯特里特看了我一会儿，用一只手握住了我的手，没有说话，将头低到了胸前。我不会忘记他脸上的表情和他紧握的手。我说：‘那么，将军，我会带着我的部队前进。’”[37]



亨利·J.亨特（1819—1889）



爱德华·波特·亚历山大（1835—1910）

乔治·皮克特写道："我率领勇敢的将士们一路前行。1863年7月3日下午3时15分左右，军队准备就绪。战士们虽然都知道即将面对什么，但依旧满怀希望，坚信胜利就在前方……在墓地山的山脊上，北方联邦军看到……一支南方邦联军出现在眼前。"[38] 温菲尔德·S.汉考克期待着南方邦联军的进攻，准备迎敌。他在报告中写道："南方邦联军队伍井然有序，显得坚不可摧，派兵布阵也十分严密，让见过他们的人心生钦佩。"[39]

乔治·皮克特率一万五千人，已经到达距坎伯兰山谷一英里的地方[40]。军旗飘扬，军队"如盛装的阅兵队一样有条不紊地"前进。此次进军的目标是北方联邦军第二军团。北方联邦军第二军团的弗兰克·哈斯克尔写道："我们看到了南方邦联军浩浩荡荡的武装队伍。南方邦联军看上去势不可挡，昂首阔步地向我们走来。一个团接一个团，一个旅接一个旅，陆续从林子里走出来，迅速排好阵型，形成攻势。乔治·皮克特引以为豪的一支五千人的军队和其他军队守住右翼。第一条战线形成后，第二条和第三条战线很快形成，纵队作为辅助。南方邦联军的前线约有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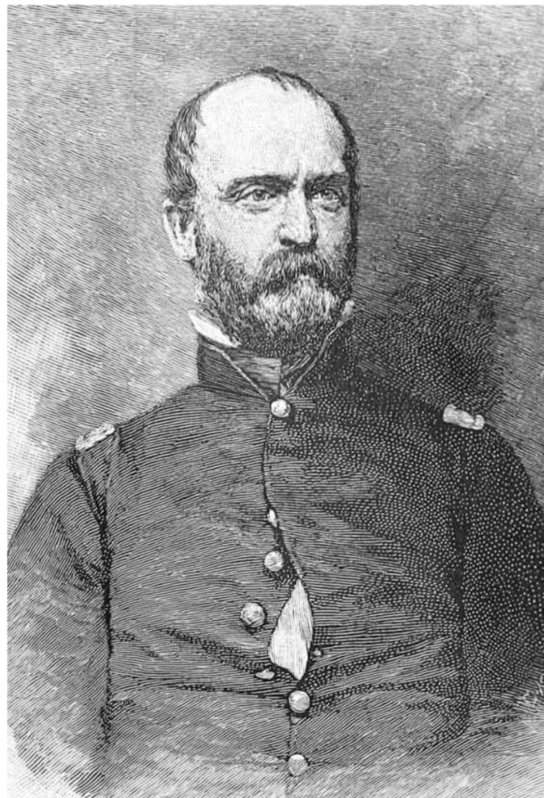
英里长，黑压压的人群展开后至少有一千码长。将士们肩并肩，队伍一排连一排，战线一道接一道。旗帜飘扬，骑兵来回走动，一万八千名步兵的枪和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犹如倾斜的一排排钢铁。士兵们齐心协力、有条不紊地前进，没有受到壕沟、城墙或溪流的阻碍，很快越过了山脊和斜坡，穿过果园、草地和麦田。行军队伍非常壮观，士兵们显得坚定、势不可挡。”[41] 北方联邦炮兵已经准备好牵制此次进攻，打算“在七百码外向行进的南方邦联军开火。炮火会持续到两军面对面。”[42] 南方邦联军依旧稳步前进。南方邦联炮兵开火，炮弹从行进的南方邦联军头顶飞过，试图将墓地山脊的致命火力引到这儿。北方联邦军的火力并没有改变目标，继续扫射乔治·皮克特的队伍。枪林弹雨倾泻而下，南方邦联军死伤无数。乔治·皮克特率领的五千人毫不气馁，依旧打头阵，砥砺前行，其他旅紧随其后。现在，北方联邦步兵开火[43]，南方邦联军回击。理查德·B.加尼特刚刚大病初愈，负责指挥乔治·皮克特麾下的一个旅。他冷静从容地“骑马跟在前进队伍的后方”。查尔斯·S.佩顿少校写道：“理查德·B.加尼特努力维持军队秩序，整装待发。在距城墙约二十五步的地方，他在队伍中心附近中弹坠马。我们的队伍虽然被打散了，但仍然继续前行。距城墙二十步的时候，对方的炮垒和埋伏的步兵突然向我们开火。在北方联邦军的猛烈攻击下，我们被迫后退。与此同时，詹姆斯·L.坎伯率军出现在右翼，路易·A.阿米斯特德率军出现在后方。三支军队会合后，战士们怀着坚定的决心和昂扬的斗志继续前行，在北方联邦军的城墙上插下了南方邦联的旗帜。”威廉·R.艾利特写道：“在所有人眼中，路易·A.阿米斯特德一直表现出色。他走在队伍前方五十码处，将帽子顶在剑上挥舞着，沉稳地带领军队逼近北方联邦军……他提前发起了进攻，攻破了北方联邦军的防御工事，虽然受伤了，但一直坚持着将北方联邦军赶出了阵地，亲眼见证邦联的旗帜插在北方联邦军的堡垒上。”查尔斯·S.佩顿少校写道：“北方联邦军最坚固的最后一道防线被攻破了，邦联的战旗在堡垒上飘扬。城墙上的战斗都是近身肉搏，战士们殊死一战。但我军已经有一半人倒下，无力击退北方联邦军。”[44]“前进的大军浩浩荡荡，不知北方联邦军能否抵抗来势汹汹的南方邦联军。但双方交战后，所有担忧都消散了。南方邦联军意识到已经战败，于是，很多人放下武器投降了。其余人躲开追兵，穿过田地逃往神学院山脊。”[45]



理查德·B.加尼特（1817—1863）



詹姆斯·L.坎伯（1823—1895）



路易·A.阿米斯特德（1817—18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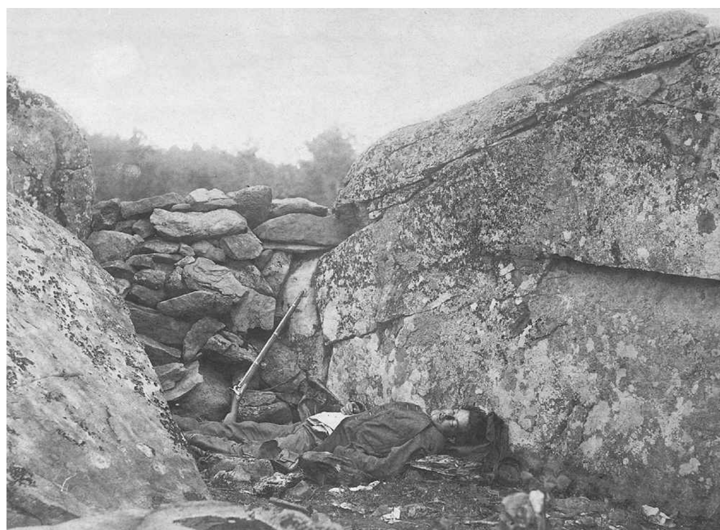
在葛底斯堡战役中，温菲尔德·S.汉考克写信给乔治·米德说：“这是我见过最猛烈的进攻。幸好我们的军队足够精锐，否则必败无疑。”[46] 弗兰克·哈斯克尔的描述证实了温菲尔德·S.汉考克的判断。参加了葛底斯堡战役的托马斯·L.利弗莫尔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乔治·米德“脸色苍白，愁容满面，神色严肃而忧虑”，骑马去见弗兰克·哈斯克尔，急切地问道：“情况怎么样？”弗兰克·哈斯克尔回答：“将军，我认为南方邦联军已经被击退。”“什么！已经被击退？”“是的，将军。”乔治·米德惊呼道：“感谢上帝！”[47]

罗伯特·E.李孤身一人，骑马前去鼓励溃军，打算重整军队。之前的不安已经消散，失望中没有半点埋怨。他镇定自若，谈到此次战败时，依旧显得士气高昂。他说：“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战败了。”[48]

罗伯特·E.李还说：“对我们来说，今天是悲伤的一天，悲伤的一天。”[49] 乔治·皮克特与詹姆斯·L.坎伯的事迹已被编入史册。詹姆斯·L.

坎伯“身受重伤”[50]。乔治·皮克特写道：“高级将领中，七名阵亡，一名伤势严重。九名中校负伤，三名中校阵亡。只有一名校级军官没有受伤，很多尉级军官也阵亡了。”[51] 战斗结束时，三个旅中的两个旅由少校指挥。五千人的军队伤亡人数近两千九百人[52]。

乔治·皮克特没有受伤。他的参谋也没有一人出现在伤亡名单中。出发时，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但半途就停了下来，并未上前线。1863年7月4日，他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说：“你的爱人还活着，悲痛不已。但为了你，他愿意回到战场，和逝去的战士们一起永眠于无名的坟墓中。”[53] 然而，南方人不禁会问：“乔治·皮克特能否共享他的军队赢得的荣耀？”历史会揭晓答案，但也不能忽视罗伯特·E.李的判断，因为他知晓当时的所有情况，并且坚守事实，公正无私。1863年7月9日，罗伯特·E.李写信给乔治·皮克特说：“在葛底斯堡战役中，你的军队损失惨重。对此，我万分悲痛，也万分感激将士们的英勇无畏。”后来，在一封没有日期的信中，罗伯特·E.李写道：“你和你的将士们为自己赢得了荣耀之冠。”[54]



倒在葛底斯堡战场上的邦联士兵

乔治·皮克特进攻虽然是一次冒险之举，但绝非无望之举[55]。如果乔治·米德和温菲尔德·S.汉考克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没有掌握军队指挥权，那么此次进攻很可能成功。如果让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中犹豫不决的约瑟夫·胡克指挥北方联邦军，情况会截然不同。对比钱斯勒斯维尔战役

和葛底斯堡战役的组织形式，将证实亨利·W.哈勒克的判断，即约瑟夫·胡克“不仅会失了军队，还会失了首都”[56]。

第5节　罗伯特·E.李与乔治·米德

此外，罗伯特·E.李必须决定继续进攻还是迅速撤退。如果撤退，南方邦联军可以依靠政府存活下来，但如果继续集结，战士们会食不果腹。最后，好斗的性格让他做出了决定，但他似乎低估了乔治·米德的能力，高估了南方邦联军炮火的威力。如果打破北方联邦军防线的南方邦联军能够顶住，一定会得到充足的援兵。到时，罗伯特·E.李说的“一次坚决、彻底的打击”[57]就有可能实现。如果他能彻底击败波托马克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攻下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也许，他应该冒险一试。

当谈到葛底斯堡战役的时候，军旅作家们常常争论的问题是，乔治·米德是否应该立即穿过坎伯兰山谷反击，或在1863年7月3日天黑前，进攻南方邦联军的右翼，抑或在1863年7月3日下午，阻断罗伯特·E.李撤退的后路，然后第二天清晨发起总攻。1863年7月5日，乔治·米德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吐露了心声，他说：“南方邦联军等了一天，猜想我会因胜利洋洋得意，会在他们面前玩老把戏，即在他们从堡垒后方袭击我们时，发起进攻。”[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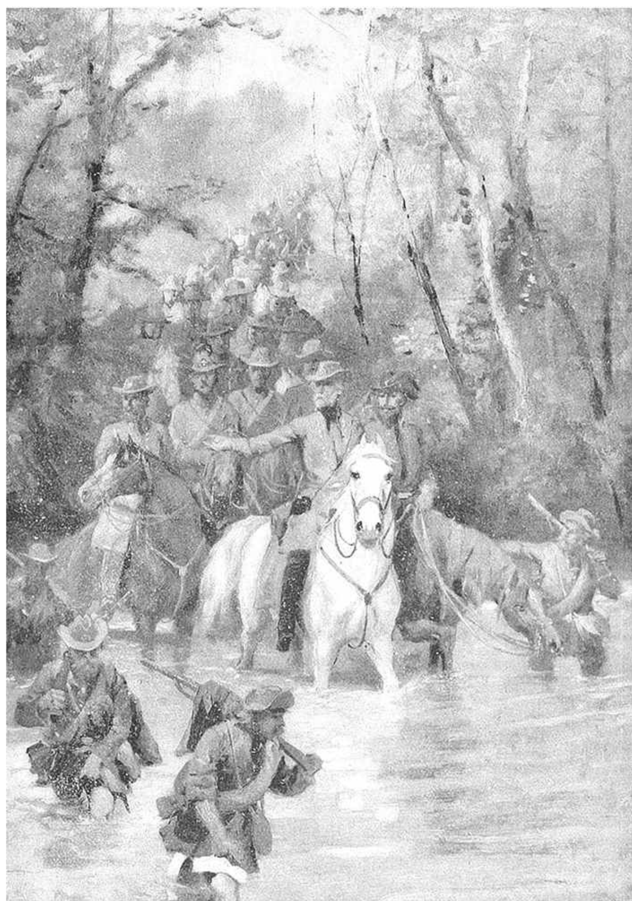
1863年7月4日，“在夜色和大雨的掩护下”，罗伯特·E.李开始撤退。乔治·米德紧随其后。在此次行动中，乔治·米德压力倍增。1863年7月8日，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担任总指挥以来，已经十多天了。其间，我没有换过衣服，晚上没睡过安稳觉，甚至好几个晚上没有合眼，好几天没有洗漱，没按点吃过饭，精神一直处于焦虑中。事实上，我觉得这几天就像过了三十年一样。”这封信是在弗雷德里克市写的，信中还说：“在罗伯特·E.李渡河前，我认为还有一场战斗。”[59]

由于暴雨和高涨的河水，罗伯特·E.李无法立即渡过波托马克河。1863年7月11日，乔治·米德追了上来，已经到达可攻击南方邦联军的距离内。他小心翼翼前进，决定于1863年7月13日发起进攻，但有些犹豫不决，因责任重大不敢轻易做决定。因此，他召开了作战会议。六位兵团指挥官中有五位反对进攻。乔治·米德迟迟没有下令。1863年7月13日，他探查了南方邦联军的阵地、兵力和防御工事。1863年7月14日，他率军进行了武力侦察，打算条件有利就进攻，但发现南方邦联军已经

连夜渡过波托马克河。与此同时，亨利·W.哈勒克发来电报说：“没有再战就让罗伯特·E.李逃走了，林肯总统对此很不满。”乔治·米德请辞，但遭到拒绝。

第6节　林肯与乔治·米德

1863年7月12日到1863年7月13日，林肯显得忧虑而焦躁。1863年7月14日中午时分，他得知罗伯特·E.李及其军队安全渡过了波托马克河，“深感悲痛”。他说：“我的上帝，这是波托马克军的最后一战！已经敦促乔治·米德进攻了，但只有一位兵团指挥官支持立刻突袭罗伯特·E.李，其他人都退缩了。吉迪恩·韦尔斯先生，这意味着什么？天哪！这意味着什么？”[60] 林肯还说：“南方邦联军就在我们的掌握中。我们只需要伸出双手，就能打败他们。但我无法让军队行动。”[61] 后来，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林肯说：“罗伯特·E.李渡过波托马克河逃走后，我感到非常羞愧，因为摧毁他的军队意味着结束战争，何况他的军队已经不堪一击……我越来越羞愧，因为我一直认为，只要应对得当，波特马克河以北的叛军主力就不可能逃走。现在，我的信念成了消遣的话题，但葛底斯堡战役让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62]



罗伯特·E.李率军渡过波托马克河

当人们认可林肯的判断时，应该考虑到乔治·米德的辩白。乔治·米德写道："当我提议进攻罗伯特·E.李的时候，如果在对他的阵地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起进攻，我有理由相信，我们的进攻不但不会成功，而且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几位优秀将领侦察了罗伯特·E.李的撤离工事和阵地后，得出的结论……我肩负重责，一边是已知的、重要的胜利硕果，另一边是同等重要的战败惨局。"[63]

后来，林肯理性评价了葛底斯堡战役。在1863年7月21日的信中，他写道："现在，我由衷感激波托马克军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做的一切，不掺杂任何指责。我非常信任乔治·米德将军。他是一名勇敢、明智的指挥官，也是一名忠心耿耿的战士。"1863年7月1日到1863年7月4日，北方人的情绪发生了巨大变化，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感。

虽然葛底斯堡战役的确是一次伟大胜利，但是由北方联邦军采取守势取得的。战争的本质需要北方联邦军采取攻势。幸运的是，北方联邦军中出现了一位好战的将领。1863年1月20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受命“直接指挥维克斯堡的远征”。

第7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远征维克斯堡

内战期间，密西西比河一直是重要的贸易交通渠道，但由于西部铁路网的发展，其重要性逐渐下降。一开始，北方就很重视密西西比河的控制权。东部诸州的人认为，密西西比河的控制权相当于军事优势。西部诸州的人认为，对他们来说，密西西比河必不可少，是西部产品的销售和供给主线。除了五大湖支流流经的地区，“在密西西比河上自由航行”不仅对美国西南部很重要，对阿利根尼山以西的地区也很重要[64]。由于密西西比河流经林肯的家乡，因此，林肯从小就知道密西西比河的重要性。密西西比河一直伴随林肯长大成人，滋养着他的思想。在危难时刻，他绝不会忽略密西西比河的军事价值和商贸重要性。占领亨利堡和多纳尔森堡后[65]，维克斯堡北部的密西西比流域获得解放。占领新奥尔良意味着北方联邦军占领了密西西比河口。但南方邦联军依然占据着维克斯堡和哈得逊港之间两百英里的河道，该河道是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与其他邦联州之间的纽带。路易斯安那州为南方邦联提供糖，广袤的得克萨斯州为南方邦联供应大量的谷物和牛肉。此外，由于毗邻墨西哥，加上北方联邦封锁了南方各州的港口，得克萨斯州出现一条军火通道，从欧洲运来的军火在墨西哥的马塔莫拉斯港登陆，数量庞大。目前，维克斯堡比较重要。因此，南方邦联非常想守住维克斯堡。



密西西比河

对联邦政府来说，南方最重要的三个据点是里士满、维克斯堡和查

特努加。攻克维克斯堡，意味着联邦政府控制了密西西比河，将邦联一分为二。北方联邦海军和陆军曾尝试攻占维克斯堡，但都失败了[66]。

维克斯堡的大部分工事建在密西西比河高水位线以上两百英尺处的断崖上，形成了一个天然壁垒。加上南方邦联军的严密防御，从正面攻破维克斯堡是不可能的。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密西西比河东岸占据制高点，从侧面或后面进攻或围困维克斯堡。北方联邦军试了许多连接天然河道的人工装置，但每次尝试都是按照工程师的指示或军事决议进行的。两个月过去了，北方联邦军一无所获[67]。

1863年冬天，大雨连绵。密西西比河的水位迅速上涨，一些地方的堤岸已经决口。“到处都是水。士兵们几乎找不到可以搭帐篷的营地。疟疾、麻疹和天花爆发。”[68]从报纸、士兵们写给家人和朋友的信件及营地的访客口中，北方人了解到，北方联邦军屡试屡败，痛苦难耐，营地中疾病肆虐。人们记住的是夏洛战役中的尤利西斯·S.格兰特，而不是多纳尔森战役中的尤利西斯·S.格兰特；因此，人们很容易用挑剔的眼光审视他的行动，认为他酗酒的恶习又出现了。在发电报、写信时，尤利西斯·S.格兰特显得头脑清醒，果决明智，精力旺盛。但1862年4月6日到1862年4月7日的夏洛战役结束后，他虽然恪尽职守，但一直没有吸引人们眼球的行动。因为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出众，所以主要负责一个部门。近十个月里，他观察并思考了这场分裂国家的战争。他没有读军书，也没有研究典型战役，更没有细究策略、战术，但在自己的行事方式和防御阵地方面思考颇多。他写道：“分裂局势已经形成。现在，只有通过征服南方或推翻联邦政府，才能结束战争。”他认为只要时机来了，就可以大展身手。在组织和指挥维克斯堡远征时，他得到了一个机会，但由于财力不及，加上诸多不利因素，白白浪费了两个月的时间。他对人们的诽谤很敏感，深切感受到了北方肆意滋生的诽谤。林肯说：“我想除了我，尤利西斯·S.格兰特几乎没有其他朋友。”[69]

通过技术手段改善水陆交通的计划失败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意识到，军队必须适应自然地理环境和密西西比河的航道。他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写道：“按照最初的计划，我们的战术是回到孟菲斯，将其作为储备根据地……从孟菲斯沿铁路线前进。”这是威廉·T.谢尔曼的建议。威廉·T.谢尔曼是尤利西斯·S.格兰特最能干和最信赖的中尉。但尤利

西斯·S.格兰特认为，回到孟菲斯相当于撤退，不仅其他人不会同意，还会使北方人对战争前景越来越绝望。他说："除了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别无他法。" [70] 他没有召开作战会议，甚至没有与其他将领商议，就制定了计划，并希望在开始实施计划后，得到华盛顿的认可。他非常礼貌地给亨利·W.哈勒克发了多封急件，说明了自己的计划。信中，他的语气自信、笃定。我们可以想象，林肯读到他的信时应该非常满意。在获悉大捷的消息前，林肯已经授权尤利西斯·S.格兰特"全权行使指挥权"，并表明"对北方联邦军充满信心" [71] 。

第8节　维克斯堡战役

1863年3月23日，在米利肯湾，尤利西斯·S.格兰特命军队集结。1863年3月29日，道路虽然依旧“非常糟糕”，但勉强可以行军。尤利西斯·S.格兰特命约翰·A.麦克莱恩德率军前往新迦太基[72]，命威廉·T.谢尔曼和詹姆斯·B.麦克弗森率军及时跟进。由于补给、弹药运输和炮兵行进都异常困难，军队的前进速度十分缓慢。为了顺利实施计划，尤利西斯·S.格兰特需要海军的配合。戴维·D.波特慷慨地施于援手。维克斯堡下游的战事需要使用炮艇和其他舰船。军队的粮食需求量很大，但“狭长难行的道路”无法运输足够的物资。因此，炮艇和其他运输船必须从城镇上游的一个地方穿过堡垒。1863年4月16日夜晚，行动成功。1863年4月22日夜晚，六艘船拖着十二艘满载干草、谷物和补给的驳船，驶过维克斯堡，为维克斯堡以南的北方联邦军带来了大量物资[73]。

现在，尤利西斯·S.格兰特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密西西比河东岸占据制高点。约翰·A.麦克莱恩德和詹姆斯·B.麦克弗森的军队动身前往哈德泰姆士，一部分队伍乘轮船和驳船，其他人步行。军队必须继续向南前行，但大海湾的防御工事阻断了交通，炮舰的攻击也没有打破南方邦联军的封锁。尤利西斯·S.格兰特命士兵们下船。所有人步行前往密西西比河下游的一个据点。1863年4月30日，军队从密西西比河下游的据点摆渡到了密西西比河东岸的高地——布鲁斯堡。一名黑人告诉尤利西斯·S.格兰特，布鲁斯堡有一条通往吉布森堡的路。因此，尤利西斯·S.格兰特选择了布鲁斯堡作为据点。当他发现可以顺利登陆的时候，给亨利·W.哈勒克发了一封电报，说：“我感觉此次战役胜利在望。”[74]然而，尤利西斯·S.格兰特未能消除所有的自然屏障。布鲁斯堡遍布海湾、沼泽和沟壑，丛林茂密，藤蔓丛生，根本无法通行。北方联邦军的进攻变得异常艰险。但在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鼓励下，士兵们继续前进。1863年5月1日凌晨2时，在前往吉布森堡的路上，北方联邦军遇到了南方邦联军，但兵力远胜对方。起初，双方展开了小规模战斗。后来，战斗逐渐演变成一场大战。尤利西斯·S.格兰特说：“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天黑后，在这片我见过最难行的土地上……南方邦联军节节败退。”南方邦联军“全线溃退”。1863年5月2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占领了吉布森堡，南方邦联

军撤离。在吉布森堡，尤利西斯·S.格兰特给亨利·W.哈勒克写了一封长信，描述了此次胜利。他写道："士兵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好。离开米利肯湾后，我们彻夜前行，冒着大雨蹚过了泥水。虽然没有帐篷，食物也不充足，但士兵们毫无怨言，而且很少有人掉队。"[75] 如果北方联邦军能集体发一封电报，可能会说："我们的将军与我们同甘共苦，生死与共。"



詹姆斯·B.麦克弗森（1828—1864）

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麾下有四万三千人。在大海湾，北方联邦军有一个安全的储备根据地。但尤利西斯·S.格兰特并没有将其作为主要补给点，只在经过时安排了弹药运输，补给了所需的硬面包、咖啡和盐等口粮，然后断了和储备根据地的联系。他发现此地有充足的牛羊、家禽、糖蜜和饲料，可以为军队提供充足的补给。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在维克斯堡及其铁路沿线拥兵约四万人的约翰·C.彭伯顿，另一个是在杰克逊拥兵约一万五千人的约瑟夫·E.约翰斯顿。尤利西斯·S.格兰特迅速出击，派精兵强将击败了南方邦联军，扫清了通往目的地的障碍。截止1863年4月30日至5月18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渡过了密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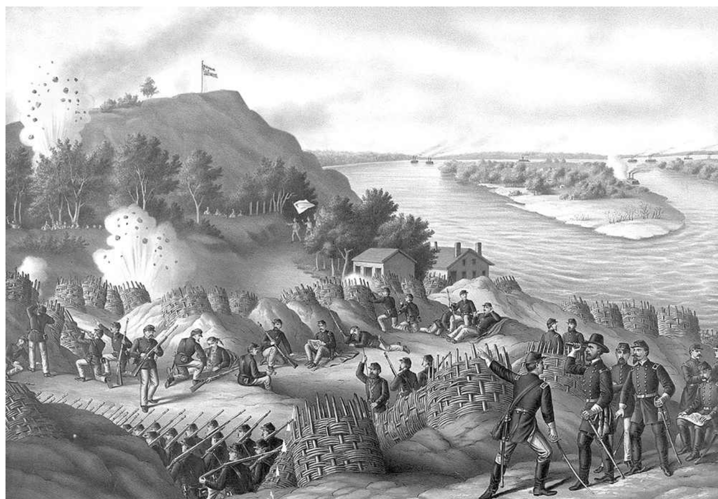
西比河，进入南方邦联军领地，穿过险象丛生的布鲁斯堡，行军一百八十英里。其间，他遭遇一系列小规模战役，打赢了五场大战 [76] ，重创南方邦联军，缴获了许多机关炮和野战炮，攻下了密西西比州的首府，并摧毁了南方邦联军军火库和军工厂。他连续十天没有与任何根据地或华盛顿联系 [77] 。现在，北方联邦军抵达维克斯堡后方。威廉·T.谢尔曼与尤利西斯·S.格兰特一起，骑马前往他们一直想去的“维克斯堡后方”的干燥高地。低头看着南方邦联的堡垒，然后看到可以随时增援的北方联邦舰队，他们意识到，作为可以与北方进行安全联系的储备根据地，维克斯堡已经唾手可得。后来，威廉·T.谢尔曼回想起当时拥有的兵力及渴望占领维克斯堡的热情，激动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尤利西斯·S.格兰特显得很平静，抽着烟，陷入了沉思。研究维克斯堡战役的专家约翰·菲斯克写道：“为了在军事历史中找到与维克斯堡战役类似的战役，我们必须回到1796年，看看拿破仑的第一次意大利战役。” [78]



尤利西斯·S.格兰特在维克斯堡战场



包围维克斯堡



围攻维克斯堡



联邦军在维克斯堡与邦联军激战

第9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

1863年5月19日和1863年5月22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试图在暴风雨中攻克南方邦联军的防御工事，但都失败了。随后，他展开了常规围攻，“地道战和反地道战都是常态。”[79] 威廉·T.谢尔曼在写给弟弟约翰·谢尔曼的信中说：“现在，我们正通过挖运河慢慢靠近南方邦联军。”尤利西斯·S.格兰特在1863年6月3日的信中说：“我们每天都会向南方邦联军的防御工事开炮，让南方邦联军不得安稳。”[80] 经历了激烈的战场厮杀后，此次围攻行动显得“缓慢、繁重而吃力”。在烈日炎炎的6月，开掘运河的劳动让将士们“疲惫而沮丧”[81] 。尤利西斯·S.格兰特也深有同感，甚至又开始酗酒。他和查尔斯·A.达纳一起去了萨塔希亚。两人乘小船沿亚祖河溯流而上。尤利西斯·S.格兰特身体不太舒服，卧床休息了。在距萨塔希亚两英里的地方，他们遇到了两艘炮艇。炮艇上的军官上船对他们说：“如果将军继续前行，会有被俘虏的风险。”查尔斯·A.达纳唤醒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但由于身体不适，尤利西斯·S.格兰特无法做决定，将决定权交给了查尔斯·A.达纳。查尔斯·A.达纳命令船返回，并写道：“1863年6月7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出来吃早餐时，精神抖擞，穿着干干净净的衬衫，全然无恙。他说：‘嗯，查尔斯·A.达纳先生，我想我们现在已经在萨塔希亚了。’我回复道：‘没有，将军，我们在海恩斯海崖。’”[82] 海恩斯海崖是他们出发的地方。

1863年6月6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查尔斯·A.达纳乘船出发。1863年6月6日凌晨1时，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总参谋长约翰·罗林斯给他写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约翰·罗林斯写道：“我非常担心军队的安全。因此，我不得不说，我一直希望您不再喝酒……今晚我找到您的地方，酒瓶空空。您和一群爱喝酒的人在一起，他们一直劝您喝酒。喝了酒以后，您无法像平常一样迅速做出决定，也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证实了我的怀疑……如果您可以很好地控制自己的食欲，那么喝酒也不在话下。1862年3月初，如果您没有以自己的荣誉向我承诺，战争期间不再饮酒，如果您在近期的战役中没有信守诺言，今天，您就不会成为一名成功的军事领袖，更不会在世界历史上名列前茅。除非恪守诺言，否则您不会成功。”[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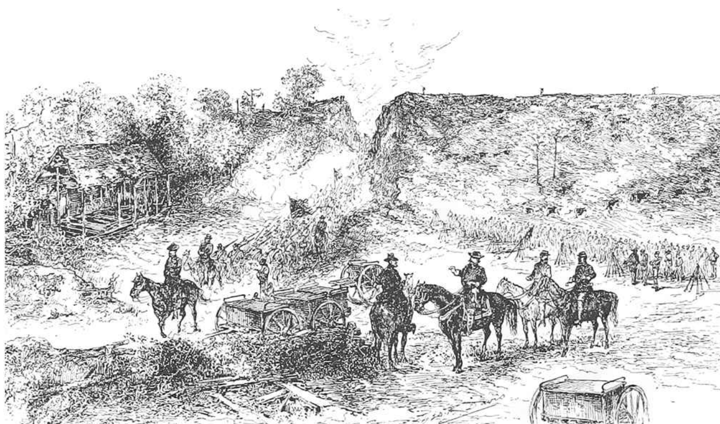
1863年6月6日，约翰·罗林斯从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帐篷前拿走了一箱酒。这箱酒是为了预祝进军维克斯堡送给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1863年6月7日早上，尤利西斯·S.格兰特搜遍了所有帐篷，打碎了找到的每一瓶酒[84]。

在罗伯特·E.李进军宾夕法尼亚州，约瑟夫·胡克指挥波托马克军时，林肯曾说："在军事行动中，总指挥至关重要！"[85] 了解了维克斯堡战役后，很多人认为，在北方联邦军的所有将军中，只有尤利西斯·S.格兰特能赢得如此漂亮的一战，同时挫败了南方邦联军的两支部队，在"维克斯堡后方"的高地驻扎自己的军队，带领军队从围攻走向胜利。尤利西斯·S.格兰特比"石墙"托马斯·J.杰克逊更伟大，即使他对托马斯·J.杰克逊说："我喜欢威士忌，但我很久没有喝过。相比南方邦联军的子弹，我更害怕威士忌。"托马斯·J.杰克逊只是将联邦的名字改成了邦联。

第10节　维克斯堡投降

林肯及其顾问对维克斯堡的行动非常担忧。他们的担心正如埃德温·斯坦顿的一位密友所说："我们如果能让尤利西斯·S.格兰特一直保持清醒，就能攻克维克斯堡。"在最后的胜利中，约翰·罗林斯功不可没。查尔斯·A.达纳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参谋詹姆斯·威尔逊非常了解尤利西斯·S.格兰特，也能体谅约翰·罗林斯，因此，一直坚定支持约翰·罗林斯。经林肯同意后，埃德温·斯坦顿派查尔斯·A.达纳去军中监视尤利西斯·S.格兰特。查尔斯·A.达纳被称为"政府的眼睛"，是一位忠诚、体贴的监督者。他不仅准确评价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还评价了海军指挥官戴维·D.波特、威廉·T.谢尔曼和詹姆斯·B.麦克弗森。他似乎获得了上述所有人的信任，但并未因此肆意妄为。他习惯用简洁的语言写信，在信中真实记录了维克斯堡战役[86]。

关于维克斯堡战役的其他内容不再详述。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维克斯堡围得严严实实，同时留出足够的兵力应对后方的威胁。但无论如何，约瑟夫·E.约翰斯顿一直无法替被困的维克斯堡驻军解围。由于疲劳、疾病和食物短缺，维克斯堡的驻军效率低下。随着增援部队的到来，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军队增至七万两千人[87]。他一步步包围了维克斯堡，准备借助暴风雨的力量，一举攻克维克斯堡。约翰·C.彭伯顿没有能力应对北方联邦军的攻击，交出了维克斯堡。1863年7月4日上午10时30分，在林肯向全国宣布葛底斯堡战役的结果时，尤利西斯·S.格兰特派人告诉他："南方邦联军投降了。"在维克斯堡战役中，北方联邦军俘虏了南方邦联军两万九千四百九十一人。与此同时，南方邦联军已经损失约一万人。此外，北方联邦军缴获大炮一百七十门，小型武器五万余件。最近，北方联邦军用欧洲的改良火枪替换了许多劣质武器。因此，尤利西斯·S.格兰特军队的损失并不大，在整场战役中共折损九千三百六十二人。



联邦军进入维克斯堡

关于北方联邦军队进入维克斯堡、南方邦联军撤离维克斯堡时发生的事，相关细节记载有所不同，但大体上是一致的。尤利西斯·S.格兰特写道："没有欢呼声，也没有议论声，民众的态度让人心痛。"一名南方邦联军的高级军官回忆说，北方联邦军中的一个小分队热烈欢呼，向"坚守维克斯堡的勇士们"[88] 致敬。

内战结束近十年后，威廉·T.谢尔曼写道："无论从大局来看，还是从细节来看，尤利西斯·S.格兰特完全掌控了维克斯堡战役。"[89]

当胜利的消息传到哈得逊港的时候，南方邦联军的指挥官将哈得逊港交给了率军围攻的纳撒尼尔·P.班克斯[90] 。1863年7月16日，在新奥尔良的大堤上，从圣路易斯驶来的"皇家"号轮船卸下了一批货物。林肯说："百川之父[91] 再次无所畏惧地向大海奔流而去。"[92]

1863年1月1日以来，北方人一直在关注维克斯堡。希望一次次破灭，又一次次燃起。1863年5月，尤利西斯·S.格兰特领导的战役让人欢欣鼓舞，但一则堡垒沦陷的虚假报道让人们倍感失望。幸运的是，自信使人们在期待中心生希望。当维克斯堡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华盛顿的那一刻，举国欢腾。人们长期以来的压抑被欢呼声取代。此外，葛底斯堡战役的胜利使北方人的热情高涨，人们将两场胜仗和1863年7月4日的国庆节联系在了一起。随着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的告捷，南北战争应该结束了[93] 。北方人备受鼓舞，因为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引领他们走出了困境。南方人因战败垂头丧气，进军宾夕法尼亚州失败了，"公

共舆论对远征结果怨声载道”。罗伯特·E.李担心公众情绪会影响到士兵们，因此，极力要求杰斐逊·戴维斯选择一位“更年轻有为的将领”，接任北弗吉尼亚军的指挥官一职，但他的请求很快被驳回了[94]。

[1] 《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373到第375页，第379页，第382页。——原注

[2]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329页，1863年7月14日。——原注

[3] 《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385页。——原注

[4]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后，詹姆斯·朗斯特里特率军与罗伯特·E.李会合。——原注

[5]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7卷，第3册，第881页。由此可见，除非北方承认南方邦联的独立，否则罗伯特·E.李不赞成和平。——原注

[6] 约瑟夫·胡克开始怀疑南方邦联军会有大举动。1863年7月9日，库尔佩珀附近爆发了布兰迪站战役。其间，北方联邦骑兵首次与詹姆斯·斯图尔特的南方骑兵较量。此次战役中的相关信件和其他情报证明了约瑟夫·胡克的怀疑。参战双方大多是骑兵，詹姆斯·斯图尔特勉强击退了阿尔弗雷德·普莱森顿率领的北方联邦骑兵。——编者注

[7] 曳船路指沿着运河或河流的路。——译者注

[8] 在葛底斯堡及撤退中，南方邦联军表现不佳。《葛底斯堡战役》，第176页，弗兰克·哈斯克尔著。《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3卷，第367页。——原注

[9] 《一名军人的心声：乔治·皮克特的私人信件》，第89页，1913年。——原注

[10] 约瑟夫·胡克想从哈珀斯费里撤兵，进攻罗伯特·E.李的交通线。但亨利·W.哈勒克反对撤兵。——编者注

[11]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344页。——原注

[12] 《乔治·米德传》，第1卷，第388页。——原注

[13] 《葛底斯堡战役》，第3页，第6页，第8页，弗兰克·哈斯凯尔著。——原注

[14]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7卷，第2册，第317页。——原注

[15] 罗伯特·E.李的骑兵主要兵力由詹姆斯·斯图尔特指挥。詹姆斯·斯图尔特没有完成刺探敌情的任务，但突袭了北方联邦军。1863年6月28日夜晚，罗伯特·E.李得知北方联邦军在波托马克河以北，乔治·米德任指挥官。1863年6月29日早晨，罗伯特·E.李下令集中兵力，依旧秘密行动，但不知道北方联邦军的具体位置。——编者注

[16] 虽然葛底斯堡战役的细节无须再提，但需要知道的是，这是敌对双方偶然相遇引发的一场大战。——编者注

[17] 南方邦联军从西面和北面集结至葛底斯堡，将北方联邦军从城中逼至葛底斯堡东南面墓地山上的一个据点。1863年7月1日，双方军队陆续涌入墓地山

上。——编者注

[18]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7卷，第3册，第446页。——原注

[19] 乔治·米德从司令部所在地托尼敦出发，于1863年7月2日凌晨1时到达葛底斯堡。《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7卷，第1册，第115页。——编者注

[20] 《卡尔·舒尔茨回忆录》，第3卷，第20页。——原注

[21] 《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102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国家》，第36页，1901年。——原注。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南方邦联军的人数很难确定。1863年7月2日，罗伯特·E.李的军队约有六万人。但官方资料显示的数字不尽相同。参见《罗伯特·E.李传》，第3卷，第81页，道格拉斯·索撒尔·费里曼著。有记载称，南方邦联军人数高达七万七千人，北方联邦军人数约十万零五千人。参见《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3卷，第440页；《葛底斯堡的相遇》（*They Met at Gettyburg*），第115页，爱德华·J.斯塔克波尔著。——编者注

[22] 《罗伯特·E.李传》，第3卷，第75页，道格拉斯·索撒尔·费里曼著。《从马纳萨斯到阿波马托克斯》，第358页，詹姆斯·朗斯特里特著。《战争年鉴》（*Annals of the War*），第421页。《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3卷，第339页。——编者注

[23] 《军事与外交研究》，第310页，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著。《讲稿》，第149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24] 北方联邦军中，古弗尼尔·K.沃伦和安德鲁·A.汉弗莱斯脱颖而出。《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7卷，第2册，第298页。——原注

[25]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7卷，第1册，第72页。——原注

[26] 《乔治·米德传》，第2卷，第103页。——原注

[27] 《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3卷，第314页。——原注

[28] 《乔治·米德传》，第2卷，第103页。——原注

[29] 《一名军人的心声：乔治·皮克特的私人信件》，第94页。——原注

[30]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7卷，第1册，第372页。——原注

[31] 《马萨诸塞州军事历史学会文献》，第8卷，第538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原注

[32] 参见托马斯·L.利弗莫尔1914年3月30日的信。——原注

[33] 《乔治·米德传》，第2卷，第108页。《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3卷，第374页。——原注

[34]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7卷，第2册，第359页。——原注

[35] 《一名邦联兵的战争回忆录》，第423页，爱德华·波特·亚历山大著。——原注

[36] 《一名军人的心声：乔治·皮克特的私人信件》，第98页。——原注

[37] 《一名军人的心声：乔治·皮克特的私人信件》，第98页。我从乔治·皮克

特1863年7月4日的信和爱德华·波特·亚历山大的回忆录中整理出了这部分内容，与詹姆斯·朗斯特里特1863年7月27日的报告稍有不符之处。爱德华·波特·亚历山大给乔治·皮克特寄过两封信。我用了更符合乔治·皮克特描述的第二封信。——原注

[38] 《一名军人的心声：乔治·皮克特的私人信件》，第99页，第100页。——原注

[39]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7卷，第1册，第373页。——原注

[40] “詹姆斯·朗斯特里特派出乔治·皮克特的军队和安布罗斯·P.希尔的八个旅，约一万四千三百名可用之兵，对阵一英里外的北方联邦军。北方联邦军的可用兵力约一万零一百人。”《马萨诸塞州军事历史学会文献》，第8卷，第536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原注

[41] 《葛底斯堡战役》，第113页，弗兰克·哈斯克尔著。——原注

[42] 《马萨诸塞州军事历史学会文献》，第8卷，第536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原注

[43] “北方联邦步兵一直保存弹药，打算近距离攻击南方邦联军。南方邦联军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毫不动摇，井然有序地前进，赢得了对手的钦佩。”《马萨诸塞州军事历史学会文献》，第8卷，第537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原注

[44] 这些引文源自乔治·皮克特部队中军官的报告。《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7卷，第2册，第385页，第999页。报告的日期分别是1863年7月9日、1863年7月12日。查尔斯·S.佩顿少校在理查德·B.加尼特的军中，威廉·R.艾利特在路易·A.阿米斯特德的军中。乔治·皮克特写了报告，但在罗伯特·E.李将军的建议下销毁了。《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7卷，第3册，第1075页。《一名军人的心声：乔治·皮克特的私人信件》，第100页，第213页。——原注

[45] 《马萨诸塞州军事历史学会文献》，第13卷，第537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原注

[46]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7卷，第2册，第366页。——原注

[47] 《葛底斯堡战役》，第136页，弗兰克·哈斯克尔著。——原注

[48] 《在南方各州的三个月》，第269页，亚瑟·L.弗里曼特尔著。——原注

[49] 《在南方各州的三个月》，第268页，亚瑟·L.弗里曼特尔著。——原注

[50] 《乔治·皮克特的属下》（Pickett's Men），第103页，沃尔特·哈里森著。——原注

[51] 《一名军人的心声：乔治·皮克特的私人信件》，第107页。——原注

[52] 一份报告记录说，乔治·皮克特军队的伤亡人数可能高达三千四百人。《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17卷，第2册，第645页。虽然准确的伤亡人数难以确定，但葛底斯堡战役中，北方联邦军伤亡人数为两万三千零四十九人，南方邦联军为两万八千零六十三人。《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440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编者注

[53] 《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100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原注

[54]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7卷，第3册，第987页，第1075页。——原注

[55] 关于乔治·皮克特的指控很多，譬如，他在战斗时躲在属下们身后或躲在一个谷仓后面。大部分历史学家不相信这些故事，认为乔治·皮克特一直站在进攻队伍的后方，指挥着行动。——编者注

[56]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4卷，第3册，第498页。——原注

[57] 《罗伯特·E.李的往事与书信》，第102页。——原注

[58] 《乔治·米德传》，第2卷，第125页。——原注

[59] 《乔治·米德传》，第2卷，第132页。——原注

[60]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370页，1863年7月14日。——原注

[61] 《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85页，1863年7月14日，约翰·海伊著。《林肯传》，第7卷，第278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62] 《乔治·米德传》，第2卷，第138页。——原注

[63]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7卷，第1册，第109页。——原注

[64] 其中不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原注

[65] 夏洛战役、占领十号岛和科林斯及撤离皮洛堡和占领孟菲斯等行动，为北方联邦军扫清了密西西比河以北的障碍。1862年初春，南方邦联军对维克斯堡的防守并不严密。——编者注

[66] 进攻维克斯堡的主要行动包括戴维·法拉格特率舰队成功穿过维克斯堡，但仅靠海军无法攻克维克斯堡。戴维·法拉格特得到了为数不多的陆军的协助。随后，北方联邦军开凿了通过斯沃皮特的格兰特运河，绕开了维克斯堡。北方联邦军还从密西西比北部出发，走陆路远征。由于在霍利斯普林斯，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供给遭到破坏，远征宣告失败。在奇克索海湾战役中，威廉·T.谢尔曼战败。其他远征包括通过普罗维登斯湖、亚祖关卡、斯蒂尔海湾和达克波特运河的行动，但都失败了。——编者注

[67] 实际上，通过戴维·法拉格特的努力，1862年5月18日，北方联邦军开始向维克斯堡进军。进攻断断续续，直到一年后才结束。——编者注

[68] 《个人回忆录》，第1卷，第458页，尤利西斯·格兰特著。——原注

[69] 《林肯的个人特质》，第253页，海伦·尼古拉著。——原注

[70] 《个人回忆录》，第1卷，第443页，尤利西斯·格兰特著。——原注

[71]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4卷，第1册，第84页。——原注

[72] 米利肯湾位于密西西比河维克斯堡以北。新迦太基位于密西西比河以西或路易斯安那州一侧，维克斯堡以南或下游附近。——编者注

[73] 将炮舰和船驶到维克斯堡下游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尤利西斯·S.格兰特渡河提供交通工具。船队顺利到达目的地，但仍有伤亡。1863年4月22日渡河时，十二艘驳船中的六艘及六艘运输船中的一艘船走失了。参见《维克斯堡》，第19页，威廉·C.埃弗哈特著。《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4卷，第1册，第30页到第31页。《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4卷，第550页到第551页。——编者注

[74]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4卷，第1册，第32页。——原注

[75]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4卷，第1册，第32页。《个人回忆录》，第484页，尤利西斯·格兰特著。——原注

[76] 五场大战指1863年5月1日的吉布森堡战役、1863年5月12日的雷蒙德战役、1863年5月14日的杰克逊战役、1863年5月16日的钱皮恩山战役和1863年5月17日的大布莱克河战役。——编者注

[77] 查尔斯·A.达纳在回忆录中写道："1863年5月10日到1863年5月20日，大军孤军奋战十日。"詹姆斯·威尔逊在《查尔斯·A.达纳》第225页写道："通信中断了整整十日。其间，大军孤立无援。"1863年5月14日和1863年5月15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经过孟菲斯时，向亨利·W.哈勒克发了两封急件。《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4卷，第1册，第36页。——原注

[78]《南北战争中的密西西比河谷》，第242页，约翰·菲斯克著。——原注

[79]《南北战争中的密西西比河谷》，第245页，约翰·菲斯克著。——原注

[80]《美国史》，第4卷，第312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81]《老旗帜之下》，第210页，詹姆斯·威尔逊著。——原注

[82]《查尔斯·A.达纳回忆录》，第83页。——原注

[83]《从查塔努加到彼得斯堡》，第179页，威廉·F.史密斯著。——原注

[84]　《老旗帜之下》，第1卷，第210页，詹姆斯·威尔逊著。——原注。很难找到关于尤利西斯·S.格兰特在维克斯堡及其他地方喝酒的细节记录。实际上，许多类似的故事都是谣言。即使尤利西斯·S.格兰特偶尔喝酒，也从来没有因喝酒影响战事。编者认为，詹姆斯·福特·罗德斯夸大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喝酒的事实。——编者注

[85]《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344页。——原注

[86]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4卷，第1册，第63页等。——原注

[87]《南北战争纪事》，第377页，威廉·罗斯科·利弗莫尔著。——原注

[88]　《个人回忆录》，第1卷，第570页，尤利西斯·S.格兰特著。《美国内战中的战役与领袖》，第3卷，第492页。——原注

[89]《威廉·T.谢尔曼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334页。——原注

[90] 哈得逊港于1863年7月9日投降。——编者注

[91] 百川之父（The Father of Waters）是密西西比河的美称。——译者注

[92]《林肯全集》，第2卷，第398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93]　参见《美国史》，第4卷，第320页注释中引用的权威文献。《解体与重建》（*De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第230页，理查德·泰勒著。《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四，第2卷，第664页。1866年，詹姆斯·M.韦恩法官的儿子亨利·C.韦恩对亨利·L.希金森少校说："维克斯堡战役和葛底斯堡战役结束后，消息灵通的人都清楚这场战争毫无意义。约瑟夫·E.约翰斯顿也深以为然，但杰斐逊·戴维斯和罗伯特·E.李并不认同。"1905年2月16日，亨利·L.希金森的书信。——原注

[94]　《杰斐逊·戴维斯回忆录》，第2卷，第393页。《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4卷，第2册，第639页。——原注

第7章　英国的态度：保持中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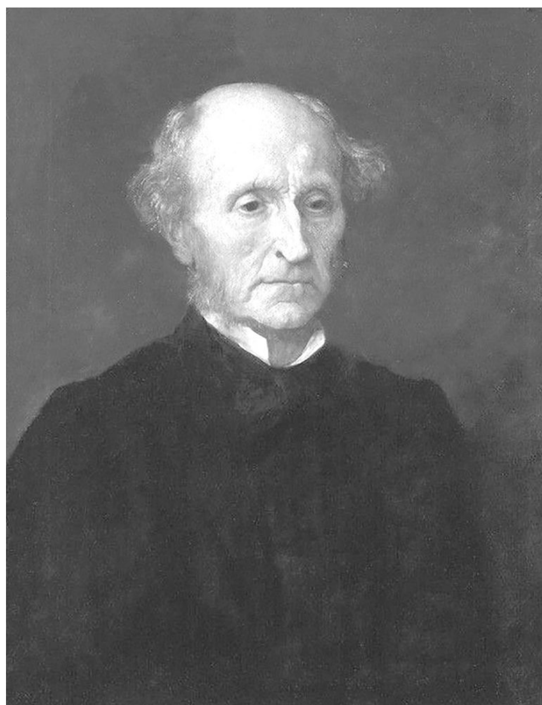
美国内战伊始，维多利亚女王提出了中立态度。1862年春天之前，英国政府一直秉承着中立态度。如果英国的统治阶层与联邦政府一直友好相处，那么英国的中立态度也许会一直延续下去。英国的大部分贵族和中产阶级都不支持美国的民主党，因为民主党制定了保护性关税。此外，英国人同情试图摆脱政治从属地位的南方。美国发动战争会威胁到英国的商业利益，但对英国的政治大有裨益。因此，一部分从事商业和制造业的英国中产阶级希望尽快结束战争，重新获得美国的棉花，继续向美国出口制成品。只要联邦政府承认南方邦联的独立性，战争就可以结束。但北方人一直执着于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战胜南方的五百五十万人。威廉·皮特曾说："三百万自由的灵魂怎么可能被征服？"他的话准确概括了美国目前的形势。

第1节　英国的民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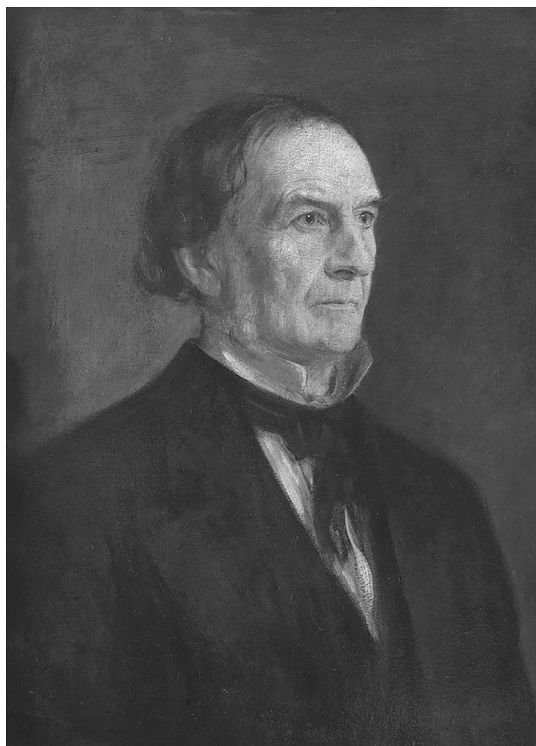
与1861年秋天一样，英国人一直保持着真诚积极的态度。但和美国国内的爱国者一样，多日来，英国人因恢复联邦进展缓慢甚为灰心丧气。美国内战对英国造成的最大影响是，英国北部的工人因棉花短缺深受其害，但他们依然支持联邦政府，也清楚战争对自己的影响。虽然有传言称，如果联邦政府承认南方邦联，战争就会在一天内结束，但英国工人心里明白，美国内战是民主对抗特权、自由对抗奴隶制。因此，他们抵制一切抗战示威活动。虽然工作没有了，积蓄也越来越少，有时甚至食不果腹，但他们仍然希望北方联邦获胜。

如果历史是一个法庭，美国起诉英国统治阶级支持南方，因为英国统治阶级支持奴隶制，所以足以证明英国以前的政府和人民在对待奴隶制问题上态度暧昧。英国人试图说服自己，承认美国内战针对的不是奴隶制，但依然掩盖不了显而易见的真相，即南方支持蓄奴，北方向往自由。由于反对奴隶制的扩张，林肯的当选引发了美国的分裂与内战。如果北方联邦获胜，奴隶制就会受到限制，甚至被废除；如果南方邦联获得独立，奴隶制就会继续扩张，非洲奴隶贸易也可能复燃。约翰·埃利奥特·凯恩斯教授和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向英国人阐述了美国内战的本质和潜在后果。虽然从逻辑方面来看，他们的观点无可厚非，但大多数英国选民并不相信。当时的许多言论非常直率。1861年，联邦政府对外公开的战争目标是恢复联邦。据说，只要联邦政府是反对奴隶制的，就能得到英国公众的同情。然而，很多人认为，林肯的补偿性解放政策徒有虚伪的外表，其真实目的是左右欧洲各国的意见。1862年1月，英国自由党政治家威廉·E.格拉德斯通表示支持北方联邦。后来，由于受到统治阶层观点的影响，1862年4月24日，他告诉曼彻斯特的民众，“悲惨的斗争”导致英国人受苦受难，但美国南方人如果“决心分裂”，就不会被打败。因此，英国人不应该疏远美国南方的六百万或一千万人。他反对同情北方的呼声，因为美国内战是奴隶制和自由之间的较量。他说：“在战争爆发的关键时刻，我们不相信北方联邦宣扬的自由制度。”在英国下议院，自由党政治家威廉·E.福斯特说：“众所周知，奴隶制是美国内战的起因，但回应我的是：‘不，不！是关税！’”他坚持说：“为什么南方邦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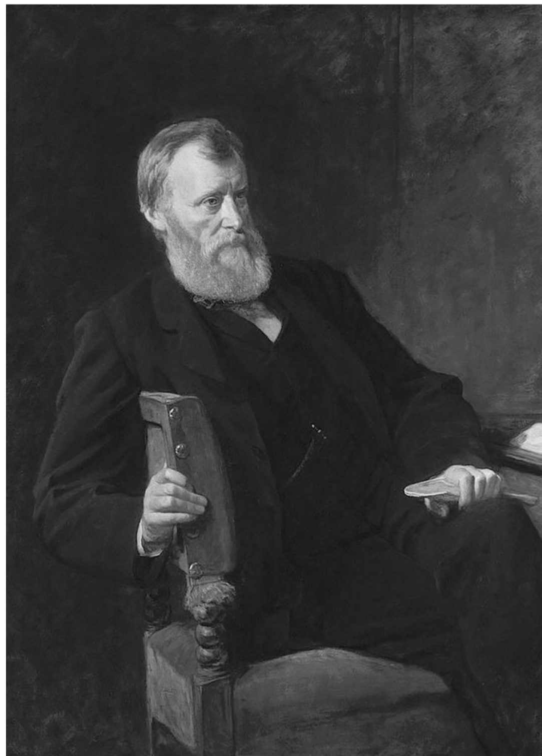
的副总统亚历山大·H.斯蒂芬斯说，南方打仗的目的是将奴隶制作为新共和国的基石？”然而，他的反驳被视为英国下议院的诡辩。



约翰·斯图亚特·米尔（1806—1873）



威廉·E.格拉德斯通（1809—1898）



威廉·E.福斯特（1818—1886）

1862年3月，英国政府犯了一个错，允许战备船“佛罗里达”号自由航行。“佛罗里达”号是在利物浦建造的，归南方邦联军所有。利物浦当局如果尽心调查，就能揭开“佛罗里达”号的真实面貌，发现其真实目的；如果与美国交好，利物浦当局就要扣留“佛罗里达”号，等法院充分调查取证后再定罪[1]。

第2节 “亚拉巴马”号

然而，英国政府犯得更严重的错误是，让“亚拉巴马”号逃走了。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要求约翰·拉塞尔伯爵在“亚拉巴马”号有意对美国不利的情况下，阻止其航行。他的信函被送到了相关部门，并及时送到了利物浦。众所周知，利物浦非常同情南方邦联诸州。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对“亚拉巴马”号的建造者起了疑心，但有意忽略了可以定罪的证据，递交了一份无关痛痒的声明，并委托伦敦海关专员，将声明交给了律师。律师判定，利物浦港口收税员的声明可以作为反对扣押“亚拉巴马”号的有力证据。在与英国财政大臣的通信中，伦敦海关专员们一致同意律师的意见，但称“利物浦的官员会密切监视‘亚拉巴马’号”。约翰·拉塞尔伯爵提供了相关信件，并根据总检察长和副检察长的示意，建议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说服美国驻利物浦领事托马斯·H.达德利，将所有证据交给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和托马斯·H.达德利坚持不懈。1862年7月9日，托马斯·H.达德利给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写了一封信。内心公正的人如果读了他的信，定会相信“亚拉巴马”号是为南方邦联设计的。后来，在反对日内瓦法庭裁决的意见中，英格兰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科伯恩写道：“在英国法庭，利物浦港口收税员的声明虽然并不成立，但盖然性证据[2]充分。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这份声明就可以转化成法律证据。”因此，从历史角度分析当时的情况，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海关律师和伦敦海关专员都清楚，“亚拉巴马”号是为南方邦联建造的。因此，他们希望“亚拉巴马”号顺利逃走，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利物浦当局并未对“亚拉巴马”号一事立案，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公务。英格兰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科伯恩以一种粉饰太平的态度，谴责了利物浦当局的作为，称利物浦官员本来应该调查莱尔德造船公司，询问“亚拉巴马”号是为谁设计的。他还说：“如果这样做了，莱尔德造船公司高尚的绅士们可能会拒绝回答，或者诚实回答。如果他们拒绝回答，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对‘亚拉巴马’号立案；如果诚实回答，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扣留‘亚拉巴马’号。”他的指责无可辩驳。托马斯·H.达德利试图通过利物浦当局获取直接证据，但利物浦当局不仅对他怀有敌意，还可能正在无声抗议。显然，利物浦当局的做法是不怀好意的，也是不合常理的。



亚历山大·科伯恩（1802—1880）



利物浦

利物浦和伦敦的海关专员奉命查明真相，但三个星期后依然毫无进

展。如果他们有意掩盖真相，就会行事缓慢。显然，他们无意寻找证据，并对相关提供证据百般挑剔。1862年7月17日，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信给托马斯·H.达德利，要求他聘请一名律师，确保将证词交给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1862年7月21日，托马斯·H.达德利及其律师将一份文件交给了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文件中，有六人为“亚拉巴马”号的性质和目的地做证，其中五人做证说，“亚拉巴马”号很可能驶向南部邦联，剩下的一个人是英格兰西北部港市伯肯黑德的水手，他发誓说：“船上的人都知道，‘亚拉巴马’号是一艘私掠船 [3] ，为南方邦联政府效力，并得到了杰斐逊·戴维斯的授权，反抗北方联邦政府。”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说：“我们不能扣留‘亚拉巴马’号”。海关律师说：“证据不足”。伦敦的海关专员说：“你们说的都对。”“亚拉巴马”号正在准备起航，“兜圈子部” [4] 进度缓慢。最后，托马斯·H.达德利提供的文件终于送到了英国财政大臣的手中。



罗伯特·P.科利尔（1817—1886）

与此同时，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聘请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御用顾问律师罗伯特·P.科利尔，将六份证词和另外两份证词交给了罗伯特·P.科利

尔。罗伯特·P.科利尔的观点非常明确，写道："我认为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完全可以扣押'亚拉巴马'号。事实上，我认为他有职责扣押……严重违反《外国征兵法》的案件很难处理，如果这一次不强制执行，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允许'亚拉巴马'号逃走，北方联邦政府是否会有足够的理由进行抗议。"利物浦当局很快知道了罗伯特·P.科利尔的观点。英格兰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科伯恩宣称："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有责任扣押'亚拉巴马'号。"但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没有采取行动，将案件交给了上级，即海关专员。海关助理律师一直称证据不足，还说："我不认同罗伯特·P.科利尔的观点。"英格兰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科伯恩写道："我认为，在诉讼阶段，伦敦海关专员有责任扣押可疑船只，拒绝明显错误的建议。但不幸的是，他们受错误建议的误导，没有扣押'亚拉巴马'号。"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给约翰·拉塞尔伯爵寄去了证词和罗伯特·P.科利尔的意见及与此案有关的其他文件。多年后，约翰·拉塞尔伯爵坦率地写道："我本来应该相信罗伯特·P.科利尔的意见，下令将'亚拉巴马'号扣留在伯肯黑德。"



"亚拉巴马"号

随后发生的一幕非常有趣，足以写进作家们的滑稽剧本，或用来描述查尔斯·狄更斯说的"兜圈子部"，但让历史学家们不知如何下笔。1862

年7月23日，从伦敦海关专员手中得到的文件被提交给了皇家检察官；1862年7月26日，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寄给约翰·拉塞尔伯爵的文件送达伦敦。其间，所有文件都上交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御用律师手中。当时，维多利亚女王的御用律师是约翰·哈丁。1862年6月下旬以来，约翰·哈丁一直身体不适，无法工作。事实上，他是一个容易情绪激动的人，身体虚弱，神志不清，已经无法承受工作重压。各方递交的文件在他家堆积了五天。“亚拉巴马”号案件的调查工作进展顺利，人人尽职尽责。利物浦港口的收税员呈请伦敦海关专员处理此事，伦敦海关专员又将此案转呈财政部大臣。最后，财政部大臣和约翰·拉塞尔伯爵将相关文件转呈给了皇家检察官。就这样，可以决定两国关系的文件被推来推去，最后交到了一位神志不清的律师手中。1862年7月28日，总检察长和副检察长拿到了这些文件，给出了一份结论性报告。1862年7月29日，他们说：“我们建议利物浦当局立即扣押‘亚拉巴马’号。”然而，1862年7月29日早晨，“亚拉巴马”号已经驶离利物浦港口，以试航为由出海了。但“亚拉巴马”号离威尔士海岸不远，离利物浦只有五十英里。对伦敦和利物浦当局来说，在“亚拉巴马”号驶出公海前，将其以美国商船身份扣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亚拉巴马”号离开利物浦时，没有携带任何枪支弹药。1862年8月中旬，两艘英国船从英格兰出发，将枪支弹药和煤炭送到了在亚速尔群岛的“亚拉巴马”号上。

在“亚拉巴马”号问题上，虽然英国政府的做法不太友好，但必须记住的是，此次事件只是英国政府的一时疏忽。英国政府与法兰西帝国皇帝不同。在美国内战期间，英国政府没有任何明显的不友好行为。1862年8月7日，在议会休会期间，维多利亚女王发表了演讲，声明英国不参与美洲大陆的冲突。

此外，虽然大部分英国人对北方联邦的态度让人很失望，作为中立国的英国也未做到尽职尽责，但采取了相应的补偿措施。英国的书刊、杂志和报纸都公开承认，英国国内的舆论导向错了。在《华盛顿条约》中，针对南方邦联巡洋舰逃脱一事，英国深表遗憾，并认为一个清楚自己实力的勇敢民族会从精神层面补偿对方。就经济方面的损失来说，相关证词已经非常充分，主张仲裁的条款也证明了证词的可靠性。评判历

史时，应该意识到，英国与美国的这笔“账”已经一笔勾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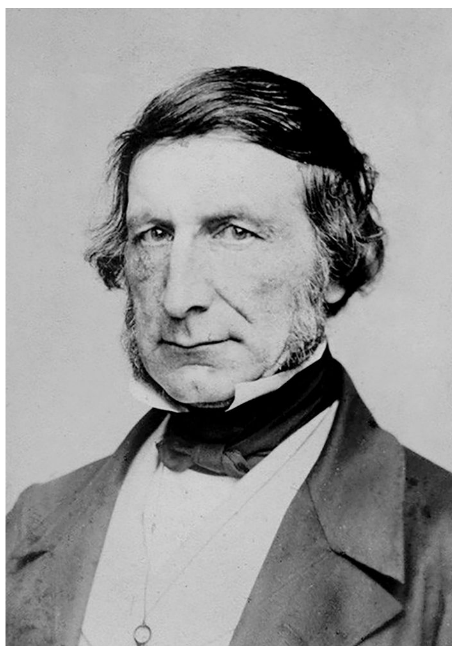
第3节　英国提议调解

在弗吉尼亚半岛，乔治·B.麦克莱伦战败。在1862年夏天的第二次布尔溪战役中，约翰·波普因指挥不当惨败，对英国统治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和约翰·拉塞尔伯爵的通信表明，他们准备向内阁提议，由英国带头，要求法兰西帝国、俄国和其他大国一起干预美国内战。1862年9月14日，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写道："北方联邦军惨遭失败。华盛顿和巴尔的摩完全有可能落入南方邦联军手中。难道英国和法兰西帝国不应该建议美国南北双方在分裂基础上达成协议吗？"约翰·拉塞尔伯爵回答道："我同意您的意见，是时候提议联邦政府调解了，使南方邦联得到认可。万一失败了，至少应该承认南方各州是独立的。"此外，他还提议召开内阁会议，认为如果要达成一项决议，首先要获得法兰西帝国的支持，"然后让英国、法兰西帝国、俄国和其他大国干预美国内战"。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回复约翰·拉塞尔伯爵的信时，正在研究安蒂特姆战役，心想如果北方联邦军避免了"惨败"，那么调解会继续进行；如果"他们能扭转局势，我们可以静观其变，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第4节　威廉·E.格拉德斯通

英国财政大臣威廉·E.格拉德斯通位列内阁第三，清楚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和约翰·拉塞尔伯爵的态度，确信他们的态度将影响英国政府的政策。1862年10月7日，在纽卡斯尔的讲话中，他预言“干预调解”可能会发生，正面陈述了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约翰·拉塞尔伯爵和大多数贵族及中产阶级的观点。他说：“毋庸置疑，杰斐逊·戴维斯和其他南方领袖建立了一支陆军，似乎正在建立一支海军。此外，他们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即创建了一个国家。在美国南方各州与北方分裂问题上，南方邦联一定会获胜。”

部门成员之间交换机密信件与向公众宣布一项尚未完全确定的政策不同。威廉·E.格拉德斯通发表讲话后不久，人们觉得他行为轻率。目前，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和约翰·拉塞尔伯爵一心想要调解，或者承认南方邦联各州独立。1862年10月13日，约翰·拉塞尔伯爵给部分官员寄了一份保密备忘录，询问“欧洲是否有义务以最友好、最温和的方式调解美国南北双方休战”。



乔治·康沃尔·路易（1806—1863）

对北方联邦来说，幸运的是，英国内阁成员的观点不一致。在英国内阁中，乔治·康沃尔·路易的地位仅次于威廉·E.格拉德斯通。他就威廉·E.格拉德斯通的讲话做了回答。1862年10月14日，向选民们发表讲话时，他说认可美国南方各州独立的时机还不成熟。随后，他将一份回复约翰·拉塞尔伯爵通函的机密备忘录交给了内阁，供内阁成员传阅。

第5节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

英国定于1862年10月23日召开内阁会议。召开会议前，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改变了主意，没有前往伦敦参会。因此，内阁会议没有如期举行，但大臣们进行了自由讨论。约翰·拉塞尔伯爵和威廉·E.格拉德斯通赞成干预美国内战，其他人的观点与乔治·康沃尔·路易一致。1862年10月23日下午，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应约与约翰·拉塞尔伯爵会面，说："我如果只听英国人民最近的说辞，就应该考虑收拾东西走人了。"会谈结束后，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记录道："约翰·拉塞尔伯爵立刻明白了其中深意，在努力为威廉·E.格拉德斯通开脱的同时，也承认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和其他内阁官员为威廉·E.格拉德斯通的行为感到惋惜。尽管如此，只要他能理解威廉·E.格拉德斯通的态度，就不能否认事实。英国人并未责备他。威廉·E.格拉德斯通否认了自己的观点，但在给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的信中，表示支持干预政策……约翰·拉塞尔伯爵说，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严格坚持中立，任美国内战自由发展。但他不知道一个月内会发生什么。我问他：'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英国的中立态度暂且不变？'他回答道：'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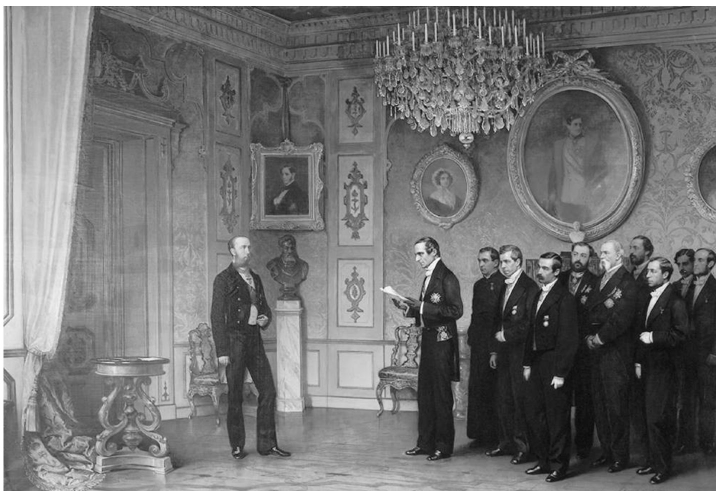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试图攻占墨西哥，将一位欧洲君主推上墨西哥的王位[5]。为了占领墨西哥，也为了获得棉花，法兰西帝国宣布支持南方邦联。1862年10月30日，法兰西政府向圣彼得堡和伦敦的法兰西大使发布了命令，让他们提议三国政府"对华盛顿和南方邦联施压，停战六个月"。

第6节　约翰·拉塞尔伯爵

约翰·拉塞尔伯爵已经酌情警告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称接下来一个月的局势非常不明朗。在1862年11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约翰·拉塞尔伯爵提出了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主张。虽然众所周知，俄国倾向支持美国北方，已经拒绝参与调解，但约翰·拉塞尔伯爵还是建议俄国接受法兰西帝国的提议。乔治·康沃尔·路易记叙道："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和约翰·拉塞尔伯爵支持法兰西帝国的提议，但并没有说太多……现在，调解提议摆在内阁面前。内阁严厉斥责了调解提议。在场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表达了反对意见，只有威廉·E.格拉德斯通支持调解提议。还有两个人没有表态。大多数内阁成员认为，停战六个月会涉及贸易封锁问题，非常不公平。因为暂停封锁明显对南方邦联有利，所以北方联邦不可能同意。片刻过后，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看到内阁一致反对调解提议，便不再多说了。我认为，威廉·E.格拉德斯通的支持态度并不真诚，不是真心实意的。"威廉·E.格拉德斯通也写了报告，说："美国的事情已经结束，但并不顺利。约翰·拉塞尔伯爵似乎打算临阵脱逃，做出了妥协，没有坚持到底……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并没有全心全意支持约翰·拉塞尔伯爵的提议。"[6]



法国远征军进入墨西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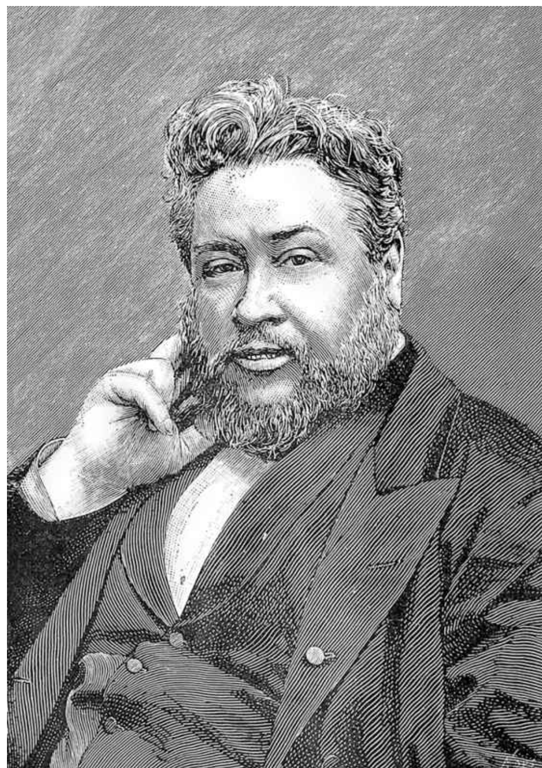
马克西米利安（1832—1867）接待墨西哥代表团，法兰西帝国企图将他推上墨西哥王位

第7节　拿破仑三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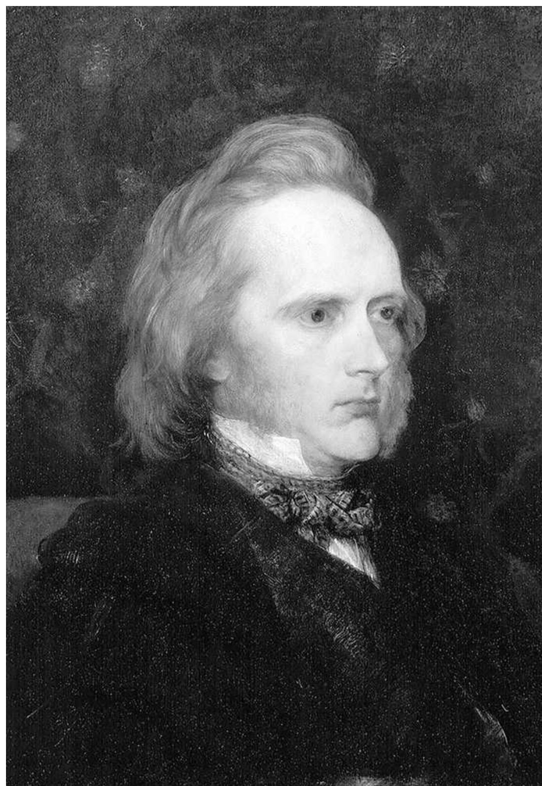
1863年1月，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提议法兰西政府单独做出调解。北方联邦军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惨败正合拿破仑三世的意。欧洲人坚信北方大业无望。随着冬天的过去，法兰西棉织品制造区弥漫着一种沮丧情绪。据报道，在法兰西，仅在一个部门，就有十万多人失业。失业人员处境凄惨，靠“乞讨”度日。1863年1月9日，拿破仑三世颁布了一项紧急命令。在命令中，他彬彬有礼，以外交口吻建议美国进行友好调解，没有再提之前的停战协议。按照惯例，1863年2月3日，他的提议通过外交渠道，由驻华盛顿的法兰西大使呈请给了威廉·H.苏厄德。1863年2月6日，威廉·H.苏厄德按照林肯的指示，礼貌、温和、体贴地写信拒绝了拿破仑三世的提议。英国一直拒绝与法兰西帝国合作，因此，拿破仑三世没有勇气继续推行干预政策。

第8节　反奴情绪

在国外，林肯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遭到冷遇和质疑。1861年，英国统治阶层断言，如果北方为解放黑人战斗，就会博得他们的同情。与此同时，《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发表可能会激起一场奴隶暴动。支持北方联邦的欧洲国家深以为然。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写道："我比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激动。"约翰·布赖特说："我为这一宣言喝彩。" [7] 他们的话表明，1862年底，英国的反奴情绪高涨。1863年1月1日，补充宣言证实了林肯的解放政策。当消息传出的时候，支持废奴的示威活动此起彼伏，比废除粮食税的示威活动多了很多。解放社的一个代表等着美国部长向林肯致以最热烈的祝贺。英国发言人克里斯托弗·纽曼·霍尔牧师称："主流报纸并没有反映民意。"一天，查尔斯·斯珀吉翁在成千上万的会众面前祈祷道："现在，上帝啊，我们转念想到海洋对岸可怕的冲突，不知道该说什么，但自由的声音说明了哪方是对的。我们向您祈祷，保佑大海对面光荣的自由宣言获得广泛支持。我们非常害怕美国同胞不够真诚，不支持《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我们不会认同奴役和鞭笞。愿上帝保佑北方，赐予北方力量，助其获胜。"在祈祷中，很多会众热情高呼"阿门" [8] ，以此回应查尔斯·斯珀吉翁的祈祷。公开集会层出不穷。阿盖尔公爵乔治·坎贝尔和托马斯·米尔纳·吉布森发表了讲话，表示英国"对美国问题的处理及其与奴隶制的关系非常有信心"。利物浦也做出了回应，如愿放走了"亚拉巴马"号。布里斯托尔是英国最后一个取缔奴隶贸易的港口。布里斯托尔当局明确表示支持林肯。1863年1月29日，自反谷物法同盟 [9] 成立以来，最能反映英国民意的示威活动在伦敦埃克塞特大厅 [10] 爆发。由于人数众多，埃克塞特大厅楼下和户外分别开设了分会场。在埃克塞特大厅里，只要提到杰斐逊·戴维斯，就会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提到林肯时，人们热情高涨，起立欢呼，挥舞着帽子和手帕。一项决议的通过展现了英国人的智慧，也体现了英国人的同理心。1863年1月29日夜晚，约克郡布拉德福德举行了一场公开会议，宣布"为奴隶制斡旋的任何行为都是可耻的"，并以三次支持林肯的欢呼结束了会议。格洛斯特郡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奴隶制会议。会上，有人发表讲话支持总统，谴责"英国人为南方邦联各州秘密提供武器的举动"。约翰·布赖特说："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对我说：'民意发生了巨大变化。'"



查尔斯·斯珀吉翁（1834—1892）



乔治·坎贝尔（1823—1900）



布里斯托尔

1863年2月举行的类似会议也通过了相关决议。利兹、巴斯、爱丁

堡、佩斯利、卡莱尔、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梅瑟蒂德菲尔和其他许多地方都举行了集会。在致辞中，格拉斯哥的群众对林肯说："我们敬重您，向您表示祝贺。"1863年3月26日，伦敦工会召集技术工人举行了会议。约翰·布赖特担任会议主席，发表了重要演讲，并向林肯传达了集会的意义和群众发言的精神。他说："如果我们的伟大尝试成功了，面对以前的欧洲可能发生的事，特权阶级会不寒而栗。但你们，工人们，你们在追求更好的时代，在踏着艰难的步伐奋力前进，走向光明。你们不应该嫉妒一个备受世界大国威胁的国家。在美国，劳动是最光荣的，是最有价值的。"他还说："美国内战介于无比崇尚劳动的一方和贬低劳动并将劳动者视为奴隶的一方"。演讲最后，他预言："公正的历史会证明，当政治家们怀有敌意或冷眼旁观时，当许多富人为富不仁时，当本应报道事实、捍卫真理的新闻违背了事实和真理时，当一个国家的命运岌岌可危、当地人民身陷囹圄时，一定要坚持自由，始终相信悲天悯人的上帝会让人类尽享自由。"

通过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视角，我们发现英国的舆论非常有趣。他在日记中写道："1863年1月17日。显然，我们只能随大流而动……1863年1月30日。英国的情况有所改善。据报道，1863年1月29日夜晚，埃克塞特大厅的示威活动是伦敦有史以来最具非凡意义的示威活动之一，体现了英国中产阶级的精神。埃克塞特大厅的示威活动虽然不能熄灭上层阶级的怒火，但至少可以起到缓和作用。"提到反奴隶制协会中一个规模庞大、广受人们爱戴的代表团时，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道："他们热情地与我握手，显示出内心涌动的情感。与贵族的冷漠不同，他们的情感体现了英国人真正的赤诚之心。"1863年2月26日，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道："我们依旧随大流而动。"

第9节　《泰晤士报》和《星期六评论》

英国的示威活动表明，支持《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示威活动是一场有组织的反奴运动。现在，支持南方邦联的英国人开始为奴隶制辩护。为了证明奴隶制的合理性，《泰晤士报》引用了《圣经》中的观点，用美国南方种植园主的口吻讲述了圣保罗和阿尼西姆的故事[11]，进一步证明奴隶制既不与福音精神相悖，也不与“锦衣玉食”相悖。《泰晤士报》称，《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激起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林肯“试图利用可怕的奴隶起义……埃及虽然灭亡了，但其精神依然存在，永远不会对人民置之不理。”《星期六评论》强调，根据《旧约》，法律承认奴隶是财产。但“美国的立法者不仅解放了邻国的奴隶，还鼓动奴隶们掐住自己主人的喉咙。他们的做法无法按照《旧约》先例进行解释……圣保罗劝导阿尼西姆，让他回去找主人腓利门。因此，如果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即使是一位信徒，也不能释放奴隶。但圣保罗没有做到的，林肯也许能做到。”后来，《星期六评论》称，英国人将反奴运动奉为“一场伪善的狂欢，一场由暴乱和屠杀激起的纷争”。《观察家》认为，《泰晤士报》和《星期六评论》代表了“英国上层阶级的观点”，清楚揭示了英美两国的资产贵族之间的共鸣。由于美国的劳动制度，南方种植园主不用再为赚钱劳心费神，可以慷慨大方地款待客人，有充足的时间奉献社会、投身政治，逐渐拥有了与英国贵族相同的生活、品味和目标。因此，英国贵族改变了对美国南方邦联的态度，希望南方邦联军获胜，捍卫奴隶制。

第10节　托马斯·卡莱尔和查尔斯·狄更斯

美国北方人拒绝了英国许多杰出文人的同情。亚瑟·格罗特热爱希腊民主，粉饰雅典的民主暴行，严厉批评美国北方人。美国北方人坚持认为，英国违背了中立态度，因为英国人的抗议缺乏礼貌雅致的语言。托马斯·卡莱尔“在英国没有赚到一分钱”，但在波士顿，他用《法国大革命》赚到了第一桶金。因此，他非常感恩波士顿，也很感激这笔应急的第一桶金。他丝毫不同情北方，并说：“我年轻的时候，没有一场战争看起来比这场战争更愚蠢。在一定程度上，我虽然是中立的，但依然支持南方。”此外，他将美国内战比喻为“一个起火的烟囱”。当有人要求他就美国内战发表意见时，他写下了《简述美国的伊利亚特》一文。部分内容如下：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

北方的彼得对南方的保罗说：“保罗，你这个不可理喻的恶棍。我发现你的仆人都是终身制的，不像我的仆人是按月或按年雇的。你会下地狱的，你……”

保罗回答：“说得好听，彼得。风险是我自己的，我愿意承担风险。你按月或按年雇佣你的仆人就好了。你会上天堂的，但别管我用什么方式。”

彼得说："不，我不会。我会先打烂你的脑袋！"

（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努力，但尚未成功。）

查尔斯·狄更斯为大西洋沿岸到密苏里河流域的每个家庭带来了泪水和笑声。在美国各自由州，受欢迎的作家寥寥无几，查尔斯·狄更斯是其中之一。在《美国纪行》一书中，查尔斯·狄更斯强烈谴责了奴隶制。既然战争已经打响，对的一方就会占上风。然而，1863年春，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告诉查尔斯·狄更斯，北方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查尔斯·狄更斯将友人的观点视为"无害的幻觉"。他无意间影响了英国上层阶级对美国北方的看法，因为他在《马丁·朱述尔维特》中描绘了一个漫画人物，真实反映了当时为了统一和自由不顾一切的人。但英国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坚信""北方会胜利"[12]。"人民的诗人"阿尔弗雷德·坦尼森虽然和普通人一样，内心充满对战争的恐惧，但深受废奴希望的鼓舞，热情高歌道："光荣，光荣，哈利路亚，他的英魂在前行。"[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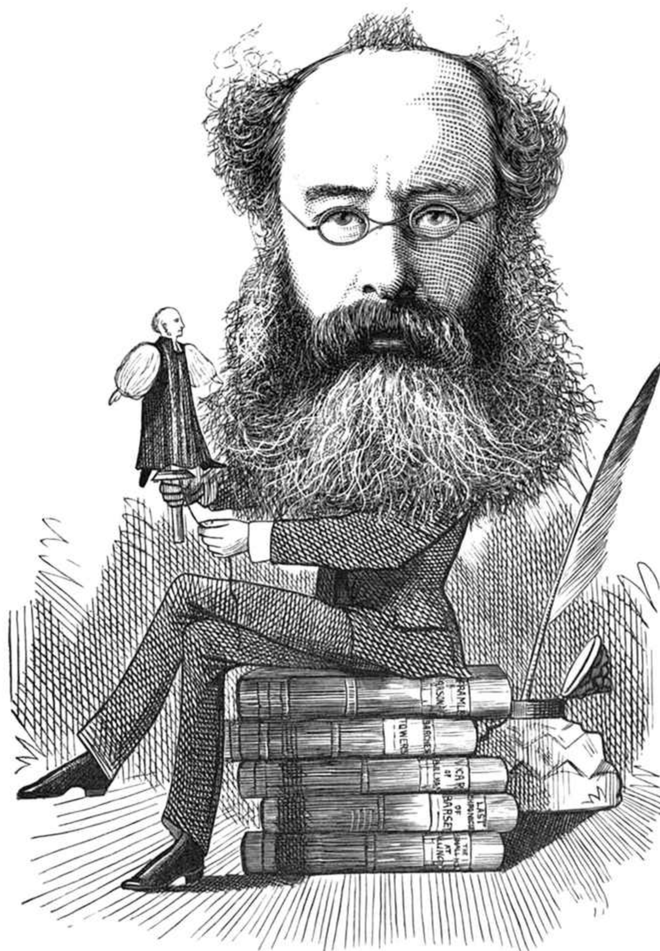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

第11节　蒸汽铁甲舰

1863年春天，很多英国人认为，北方联邦的大业已经彻底无望。维多利亚女王和本杰明·迪斯雷利都确信，北方联邦不可能恢复了。[14] 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中，约瑟夫·胡克的惨败强化了英国人的这种观点。随后，罗伯特·E.李进军宾夕法尼亚州的消息传到英国，引发了英国和法兰西帝国决定干预美国内战的谣言。各种集会激发了人们支持南方邦联的情绪。曼彻斯特、普雷斯顿、谢菲尔德等地的人们召开了会议，表示支持干预政策。其他地方的会议反对任何形式的干预政策。

1863年4月5日，约翰·拉塞尔伯爵扣押了“亚历山德拉”号。“亚历山德拉”号是伯肯黑德为美国南部邦联建造的一艘炮舰。约翰·拉塞尔伯爵的行为受到了人们的质疑。虽然英国财政法院的决定违背了英国政府的规定，但一系列法律问题使这起案件拖了很长时间。最后，南方邦联没有得到“亚历山德拉”号。

关于英国内阁和下议院在1863年春天和夏天的讨论不再赘述。但必须说明的是，在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胜利前后，英国人的态度和行为完全不同。1863年7月下旬，关于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的消息传到了欧洲。



安东尼·特罗洛普（1815—1882）



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

与此同时，在伯肯黑德，莱尔德造船公司为南方邦联军建造蒸汽铁甲舰的工作正在推进。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试图将莱尔德造船公司与南方邦联的交易告诉约翰·拉塞尔伯爵，并将托马斯·H.达德利提供的证据交给他。托马斯·H.达德利提供的证据表明了蒸汽铁甲舰的性质和目的地。根据相关通信，约翰·拉塞尔伯爵打算严肃处理蒸汽铁甲舰事件，查明蒸汽铁甲舰是在为谁建造的。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他计划拦截蒸汽铁甲舰。虽然人人都知道蒸汽铁甲舰，正如《泰晤士报》报道的："一百个人中，九十九人认为，蒸汽铁甲舰'迟早会对北方联邦军采取行动'。"南方邦联海军军官詹姆斯·D.布洛克订购了两艘蒸汽铁甲舰和"亚拉

巴马”号，但从“亚历山德拉”号被扣押一事中，他感受到了英国倾向北方的态度。在莱尔德造船公司的积极配合下，他非常妥当地处理了此事。受到下议院的影响，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开始相信一份报告中的猜测。这份报告称，蒸汽铁甲舰是为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建造的。但由于无凭无据，调查此事的官员又称，蒸汽铁甲舰是为埃及总督建造的，但很快被否认了。随后，调查官员说，蒸汽铁甲舰归一家法兰西公司所有，而且证据充足。詹姆斯·D.布洛克担心蒸汽铁甲舰会被扣押，于是，将船卖给了一家法兰西公司，并达成了一项约定。双方承诺，船驶出英国辖地后，立即转售给南方邦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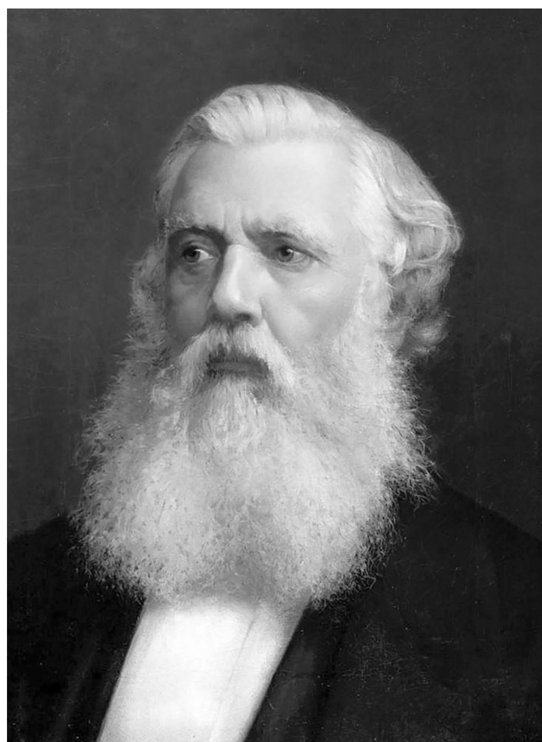
约翰·拉塞尔伯爵将相关材料交给了王室法官。经过一个月的筛选研究，法官们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蒸汽铁甲舰是为南方邦联军建造的；第二，法兰西公司关于蒸汽铁甲舰的所有权受到法律保护，因此，英国政府无权扣留蒸汽铁甲舰。尽管如此，约翰·拉塞尔伯爵依旧不相信，继续不遗余力地寻求真相。然而，虽然心存疑虑，但他无法否认相关凭证。这些凭证明显表明，蒸汽铁甲舰属于一家巴黎公司。因此，1863年9月1日，他写信给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称英国政府无权扣留蒸汽铁甲舰，但承诺说，如果有可信的证据证明蒸汽铁甲舰存在违法行为，他一定会严密监视，随时准备拦截。当时，约翰·拉塞尔伯爵住在苏格兰的乡间宅邸，但他的信直到1863年9月4日下午4时才送到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手中。

与此同时，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从苏格兰归来，很高兴能与苏格兰的政府官员进行友好交流。但一到伦敦，他就遇到了蒸汽铁甲舰事件。托马斯·H.达德利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其中一艘蒸汽铁甲舰可以随时出海。1863年9月3日，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信给约翰·拉塞尔伯爵，向他递交了相关证词的副本，称没有证据表明蒸汽铁甲舰为南方邦联效力。1863年9月4日，托马斯·H.达德利称，一艘蒸汽铁甲舰即将出发。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向英国外交部“最后一次严正抗议，谴责对一个友好的民族采取敌对行动的做法”。1863年9月1日，他收到了约翰·拉塞尔伯爵的来信。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封信深深影响了我。我清楚地预见到，矛盾一触即发。然而，我绝不能激化矛盾，必须打起精神维护国家荣誉，妥善解决问题。联邦政府的前途一片茫然……我一直在想目

前的危机……最后，我觉得必须给约翰·拉塞尔伯爵写一封信。在出现不可避免的结果前，我应该为联邦政府多争取一点时间。”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于1863年9月5日的信很有名。他写道：“约翰·拉塞尔伯爵阁下，一艘蒸汽铁甲舰即将从英国出发，去执行反对美国的任务。我很荣幸第一时间与您通信。我对英国政府得出的结论感到非常遗憾，因为这一结论无疑为叛乱分子打开了大门，允许他们随意攻击纽约、波士顿和波特兰，打破我们的封锁线。我认为，无须再向您说明，这是一场战争。”

然而，实际上，约翰·拉塞尔伯爵一直恪尽职守。1863年9月1日，英国外交部副部长奥斯汀·H.莱亚德写信给财政部说：“约翰·拉塞尔伯爵命我传达指示，希望你们向财政部专员禀明蒸汽铁甲舰的重重疑点。约翰·拉塞尔伯爵认为，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蒸汽铁甲舰是为南方邦联而建，应该扣留所有蒸汽铁甲舰，进一步查明真相。”约翰·拉塞尔伯爵逐渐意识到，在“亚拉巴马”号逃走事件中，自己似乎被骗了。1863年9月3日，他下令扣留蒸汽铁甲舰。当时，他正在苏格兰的梅克卢尔。在给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的信中，他写道：“亲爱的帕默斯顿勋爵，在伯肯黑德订购蒸汽铁甲舰的人行为可疑，我认为有必要扣留他们。我征求了副检察长的意见，他同意扣留可疑人员。虽然不符合严格的法律规范，但我们可以以此检验法律。即使必须支付赔偿金，也可以打消国内和美国普遍存在的担忧，即如果对南方邦联的可疑行为视若无睹，就不应该继续保持貌似中立的敌对状态。如果您不赞成，请于1863年9月8日或1863年9月9日召开一次内阁会议。”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赞同约翰·拉塞尔伯爵的观点，没有召集内阁会议。但约翰·拉塞尔伯爵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给奥斯汀·H.莱亚德发了一封电报，下令“一旦确定蒸汽铁甲舰试图出海”，就立即制止其行为，“等待扣留命令”。1863年9月4日，约翰·拉塞尔伯爵给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写信说：“英国政府正在认真考虑此事”。但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寄出了自己的信后，才收到约翰·拉塞尔伯爵的信。他说：“在我看来，没有必要告诉约翰·拉塞尔伯爵，南北冲突实际上是一场战争。”1863年9月5日，约翰·拉塞尔伯爵下令，无论试航“还是其他任何借口”，蒸汽铁甲舰都“不能离开利物浦，直到有充足证据证明其目的地”。与此同时，他给驻华盛顿的外交大使寄了一封密函，要求外交大使告诉威廉·H.苏厄德，英国政府已经阻止

蒸汽铁甲舰出港。但直到1863年9月8日，他才告知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自己的安排。此事原因不明。



奥斯汀·H.莱亚德（1817—1894）

与此同时，英国外交部做了系统而细致的调查后，明确指出，蒸汽铁甲舰并不属于法兰西人，而是为南方邦联军建造的。1863年10月8日，约翰·拉塞尔伯爵下令扣押较先进的一艘蒸汽铁甲舰。1863年10月9日，“宽箭”号 [15] 被扣押。莱尔德造船公司对扣押一事十分恼火，操作员对此也十分不满。为了防止蒸汽铁甲舰逃走，英国政府派了一支强大的海军看守舰船。法院一直未对此事发表意见。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舰船所有者，都不想冒被审判的风险。最后，为了解决争端，英国海军购买了蒸汽铁甲舰。

联邦海军副部长古斯塔夫斯·福克斯写道：“拦截蒸汽铁甲舰事关美国的生死。” [16] 有效的封锁是北方强有力的武器。如果蒸汽铁甲舰逃走了，势必会打破查尔斯顿和威尔明顿的封锁。到时，后果将不堪设想，即使是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的胜利，也无法扭转局面。詹姆斯

·D.布洛克认为，“蒸汽铁甲舰”可能会“将美国所有港口前线的封锁舰扫荡出去”“溯波托马克河而上”“让华盛顿失去防守”，在朴次茅斯[17]和费城强行征收特别税。因为詹姆斯·D.布洛克的所作所为及伯肯黑德一家造船公司的同情和贪婪，所以一场大战一触即发。但约翰·拉塞尔伯爵通过一系列谨慎果断的行动，将北方联邦从灾难中拯救了出来，使美国和英国避免了一场大战。扣押蒸汽铁甲舰给南方邦联造成了沉重打击[18]。

第12节　英国和法兰西帝国

1863年1月，南方邦联国务卿朱达·P.本杰明在写给约翰·斯莱德尔的信中抱怨说："约翰·拉塞尔伯爵对詹姆斯·M.梅森非常粗鲁。"1863年3月，他对英国的愤慨与日俱增。1863年6月，他常常辱骂英国政府。1863年8月4日，他写信给詹姆斯·M.梅森说，经过辩论，杰斐逊·戴维斯确信英国不会承认南方邦联，因此，詹姆斯·M.梅森可以考虑结束使命，离开伦敦了。1863年9月14日，詹姆斯·M.梅森收到了朱达·P.本杰明的信。与约翰·斯莱德尔商议后，他告诉约翰·拉塞尔伯爵，根据命令，他的任务结束了。1863年12月，杰斐逊·戴维斯在向国会发表的讲话中，吐露了自己对"英国政府的不满"，尤其是英国政府维护联邦政府的封锁，并扣押了蒸汽铁甲舰。

虽然英国对美国内战的态度与美国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对英国的态度不同，但应该记住的是，"在欧洲，我们唯一的支持者"是俄国。与法兰西政府的行为相比，英国政府似乎还算友好。事实上，如果法兰西帝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想认可南方邦联，那么英国是它们不可逾越的障碍。关于英国商人和造船商向南方邦联出售武器、弹药和舰船的行为，英国内阁表示遗憾。英国商人和造船商的行为阻碍了英国政府与美国的关系。与此同时，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正在怂恿南方邦联，承诺为南方邦联建造两艘铁甲舰和四艘帆船护卫舰，并间接为南方邦联军提供武器和装备。但法兰西建造的舰船从未挂着南方邦联的旗帜出海。此外，1863年11月，拿破仑三世改变了对美国内战的态度。1862年2月，约翰·拉塞尔伯爵第一次会见了詹姆斯·M.梅森。此后，他一直拒绝见詹姆斯·M.梅森。帕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坦普尔只在外国干涉危机过后，与詹姆斯·M.梅森见过一面。然而，约翰·斯莱德尔曾三次拜见拿破仑三世，并会见了法兰西外交大臣和其他皇室大臣，甚至可以随时见到法兰西皇室成员。此外，拿破仑三世征服了墨西哥，并扶持一位欧洲君主坐上了墨西哥的王位。

[1]　关于"佛罗里达"号的问题，一直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建造"佛罗里达"号的人在为南方邦联工作，但不确定的是，"佛罗里达"号是否是在英国政府某位高官的授意下建造的。也许是由于英国人行动迟缓，或为了避免麻烦，将"佛罗里达"号送给了南方邦联。此外，从长远来看，"佛罗里达"号几乎没有赢得战争的

希望，或帮助南方邦联军打破封锁线。它虽然对南方邦联的对外关系很重要，但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编者注

[2] 盖然性指有可能但不是必然的性质。在司法领域，如果相关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有待证实的事实，但依然可以证明事件的真实性，那么这些证据就具有高度的盖然性。——译者注

[3] 私掠船指可以攻击敌军舰船的战时武装民船。——译者注

[4] 《小杜丽》中，查尔斯·狄更斯用“兜圈子部”指代办事拖拉、互相推诿的官僚机构。——编者注

[5] 拿破仑三世企图将欧洲哈布斯堡王朝的马克西米利安推上墨西哥的王位，但最终以失败告终，马克西米利安被处决。——编者注

[6] 《唐宁街的危机》，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著。《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论文集》，第47卷，第419页，第420页。《克拉伦登传》，第2卷，268页，马克斯韦尔著。《威廉·E.格拉德斯通传》，第2卷，第85页，约翰·莫利著。——原注

[7] 《大西洋两岸的历史团结》，第112页，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著，1913年。《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传》，第297页。——原注

[8] 基督教等祈祷或圣歌的结束语，可表示同意、赞成。——译者注

[9] 反谷物法同盟成立于1838年，是英国曼彻斯特的一个政治、商业同盟，目标是废除不受欢迎的《谷物法》。——译者注

[10] 埃克塞特大厅位于英国伦敦的斯特兰德大街北侧。反奴隶制协会的会议在埃克塞特大厅举行。由于政治会议的重要性，“埃克塞特大厅”一词成为反奴隶制游说团体的代名词。——译者注

[11] 阿尼西姆是从富有的基督徒腓利门家里逃跑的奴隶，在罗马被捕。由于受到圣保罗的感化，他在狱中皈依基督，悔过自新。——译者注

[12] 《安东尼·特罗洛普自传》，第149页。《北美洲》，第2卷，第16章。——原注

[13] 歌词出自美国的一首行军歌曲——《约翰·布朗之歌》。这首歌是为纪念被杀害的著名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而作，在美国内战期间非常受欢迎。——译者注

[14] 《评巴克尔＜本杰明·迪斯雷利＞》（4），《国家》，1916年7月27日。——原注

[15] “宽箭”号是英国军械署和政府财产的一个标志，也是罪犯制服上的一个标记。——编者注

[16] 《约翰·默里·福布斯传》，第2卷，第22页。——原注

[17] 朴次茅斯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原注

[18] 在记叙蒸汽铁甲舰的事件时，我主要借鉴了布鲁克斯·亚当斯的一篇文章。《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论文集》，第45卷，第243页。——原注

第8章　胜利的曙光：奇克莫加战役和查塔努加战役

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结束后，北方的优势愈加明显，不但拥有与南方邦联军一样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且军队装备精良，供给充足，将领们能力相当。如果北方继续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乘胜追击，征服负隅顽抗的南方邦联军，一定可以取得胜利。但由于志愿兵的服务期限已到，兵源紧缺，联邦政府只能采取严格的征兵措施。但强制征兵与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除非政府深得民心，否则无法顺利实施。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胜利后不久，纽约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导致了人们对林肯的质疑。林肯很可能失去人民的支持。

第1节　纽约征兵暴乱

根据1863年3月3日颁布的《征兵法》，各地在征兵时爆发了骚乱。但骚乱很快得到平息。虽然骚乱造成了一些地区的动荡，但并不表明北方人会用暴力手段反对强制征兵。1863年7月7日，征兵工作从罗得岛州开始。1863年7月8日，马萨诸塞州开始征兵。随后，各地区的征兵工作悄然进行，一直持续到了1863年7月11日。1863年7月11日，纽约开始抽签招募新兵。虽然民众对强制征兵感到不满，也有谣言称一大批人聚集在宪兵司令办公室，可能会引发冲突，但无论如何，当天的抽签活动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扰，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1863年7月12日，报纸公布了应征者的名字，其中大部分是技术工人和体力劳动者。表明了此次征兵的真实效果，同时强调了《征兵法》规定的三年义务兵役期。随后，被抽中的或有可能被抽中的人情绪非常激动，变得越来越愤怒。人们聚集在一起，讨论民主党人的观点。民主党人认为，按照法律规定，此次征兵是违反《宪法》的。群众的不满主要是因为，法律竟然允许人们以三百美元的价格出售自己。以前，三百美元足以找一个入伍替代者。《征兵法》规定，不愿服兵役的人可以缴纳三百美元，免除自己的兵役。但现在，由于纸币持续贬值，劳动力紧缺，工资上涨，生活开销增加，三百美元已经招不到兵了。因此，人们斥责代服兵役的规定是一种卑劣手段，让富人轻而易举地逃过兵役，让穷人被迫入伍。谣言四起，社会动荡不安。最后，民众坚信此次征兵是不公正的，开始抵制征兵。

1863年7月13日清晨，纽约城中发生了骚乱，政府立即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1863年7月13日上午7时左右，宪兵司令打开了位于第三大道第四十六街拐角处的第九区司令部，准备继续征兵。写着应征者名字的纸条用橡皮筋捆住，放进了桌子上的轮盘里。其中，五分之一的人会被抽中。如果找不到替代者或无法支付三百美元，除非有身体或精神方面的疾病，或因其他特殊原因获得了法律豁免，否则被抽中的人必须在军中服役三年或直到战争结束。1863年7月13日上午10时，轮盘开始转动。每转一轮，一名蒙着眼睛的男子会从轮盘里抽出一张纸条，然后由宪兵司令宣读被抽中的人的名字。半小时过去了，已经有一百人被抽

中。突然，街上一声枪响，提前聚集起来的数千人对着司令部的门窗狂扔石块。第二大道和第六大道的铁路及城市上游，许多工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游行，说服或迫使其他人加入游行。游行队伍逐渐形成了一支小军队，向征兵司令部走去。随后，罢工工人向司令部发起了进攻，并很快占领了司令部，驱逐了宪兵司令及其副手们。他们砸了家具，将油倒在地板上，点燃了司令部。与司令部相邻的建筑物也燃起了熊熊大火。警察局长正在巡视，虽然没有穿制服，但走近司令部时依然被认了出来，遭到了工人们的袭击。幸运的是，他凭一身胆量躲过了一劫。来自退伍军人预备役[1]的宪兵司令护卫队急忙赶来。燃烧的建筑物周边的街区挤满民众。他们用石头袭击护卫队，护卫队寸步难行。士兵们向民众开枪，但作用不大，甚至被抢走了火枪，许多士兵遭到殴打。随后，一队精锐的警察也遭到了石头袭击。他们手持警棍和手枪，瞄准了示威者。但由于民众人数众多，战斗了几分钟后，他们被迫撤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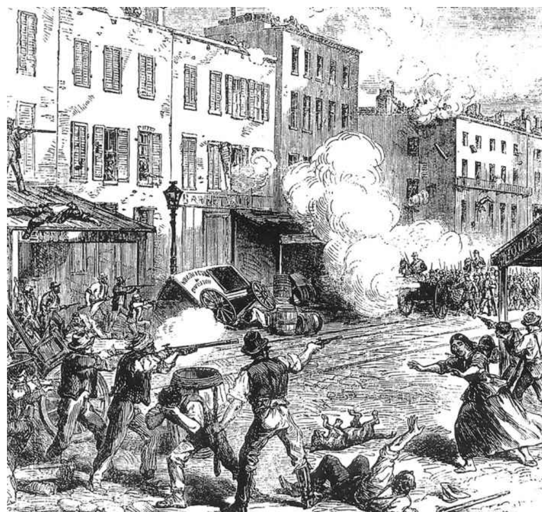
受到胜利的鼓舞，暴乱的民众在纽约城里随意游走。很多人认为征兵是为了废除奴隶制，因此，非常敌视废奴主义者和黑人。1863年7月14日，暴乱越来越严重。小偷、地痞流氓混到了愤怒的人群中，肆意抢劫。不过，政府提前采取了有效的防御措施。1863年7月15日，政府发布了暂停征兵的通知，许多民众都回了家。与此同时，派往宾夕法尼亚州抵抗罗伯特·E.李的民兵团回来了。民兵团立即采取了严厉措施，镇压了暴徒。1863年7月15日夜晚，城中秩序基本恢复。1863年7月16日，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第七兵团和其他民兵团及美国步兵和骑兵军队镇压了残余暴徒[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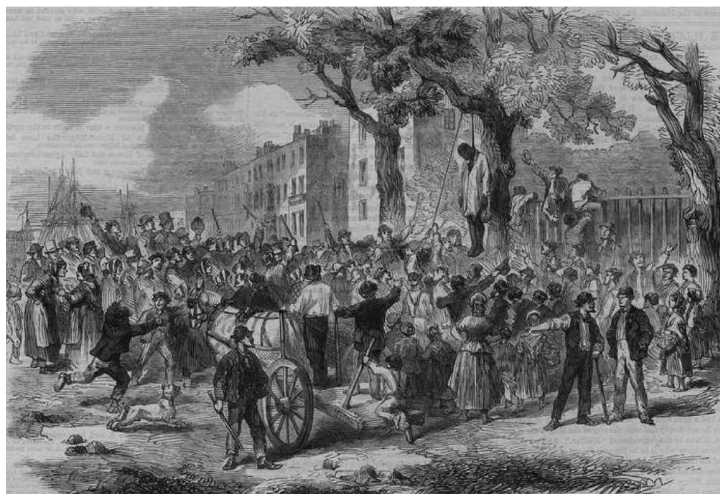
在征兵暴乱期间，纽约州州长荷瑞斯·西摩在市政厅台阶上发表著名的“我的朋友”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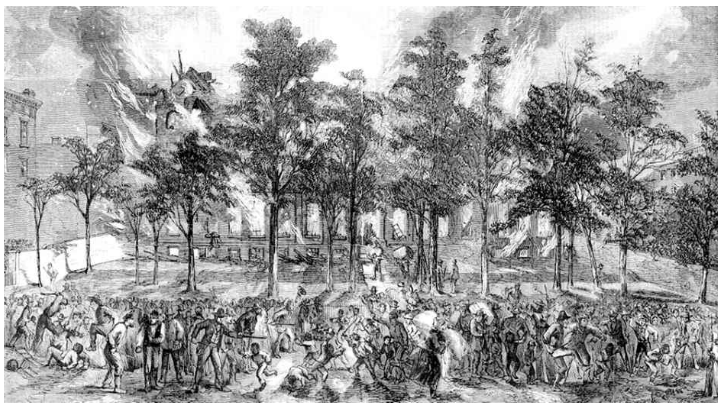
暴徒暴打一名黑人



暴徒与军队对抗



暴徒绞死一名黑人



暴徒焚毁黑人儿童的孤儿院

征兵工作并没有终止。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暴乱，纽约政府采取了严格的预防措施。一万名步兵和三个炮兵连，“包括常规军在内的精锐部队”，从波托马克军中赶往纽约。纽约州国民警卫队第一师受命执勤。纽约州州长发表了声明，告诫公民们服从联邦法律。1863年8月19日，征兵工作重新开始，进展十分顺利。随后，全国范围内的征兵工作陆续展开。因为很多人获得了法律豁免，免除了兵役，被抽中的许多人也上交了代偿金，所以此次征兵并没有起到扩充军队的作用，但说服各州、县、城镇将用来激励人们自愿入伍和完成指定配额的其他收入充盈到了国库中，促进了征兵工作[3]。

第2节　葛底斯堡战役后的乔治·米德

葛底斯堡战役结束后的十天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罗伯特·E.李率大军渡过波托马克河，来到了弗吉尼亚州。乔治·米德紧随其后。一场演习过后，双方发生了一些小冲突和摩擦，但没有引发大规模战役。林肯对乔治·米德的进攻失去了信心，说："我不相信乔治·米德会进攻罗伯特·E.李，也看不到任何进攻迹象。他浪费了一次绝佳的机会。葛底斯堡战役结束后，他做什么事都慢半拍。"[4] 1863年9月21日，林肯对吉迪恩·韦尔斯说："波托马克军无力也不愿保卫首都……哎，可悲啊，可悲！虽然军队骁勇善战，但将领们大多优柔寡断，能力有限。"[5] 1863年10月16日，林肯命乔治·米德采取行动。他在给亨利·W.哈勒克的信中写道："现在，在我们占据了绝对优势的战场上，如果乔治·米德向罗伯特·E.李发起进攻，那么波托马克军一定会全力以赴。到时，胜利的功劳都是他的，我会承担失败的责任。"[6]

乔治·米德的私人通信表明，他是一位怯懦、犹豫的将领，与"好战的将军"并不相符。他不断演习，避免与罗伯特·E.李正面作战，除非处在有利位置。担任师长和团长时，他曾批判大军将领太过小心谨慎。后来，也许是由于将领的责任和下级官员的自由之间存在差异，他也变成了一位谨小慎微的指挥官。详细研究葛底斯堡战役结束后的十天，我们发现与葛底斯堡战役前相比，乔治·米德的变化很大。指挥大军的压力削弱了他的勇气，也挫伤了他的斗志。无论如何，葛底斯堡战役结束后，乔治·米德没有做出任何结束战争的举动。

第3节　威廉·罗斯克兰斯

史东河战役结束后，威廉·罗斯克兰斯按兵不动近六个月。他命军队休整恢复，补充供给，在墨菲斯堡设防。联邦政府敦促他前进，认为他应该将南方邦联军赶出田纳西州，攻克查塔努加。乔治·B.麦克莱伦的戏码再次上演。威廉·罗斯克兰斯抱怨骑兵供给不足，粮草短缺，步枪数量与南方邦联军相差甚远。在与埃德温·斯坦顿和亨利·W.哈勒克的通信中，他显得能言善辩。1863年6月24日，威廉·罗斯克兰斯终于采取了行动，打了一场胜仗，使北方联邦军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的鼓舞下，通过计谋，他将布拉克斯顿·布拉格率领的南方邦联军赶出了田纳西州中部。随后，他率军继续前进，顺利穿过了一片崎岖难行的地区。1863年9月9日，北方联邦军抵达查塔努加。查塔努加、里士满和维克斯堡是南部邦联最重要的三个战略据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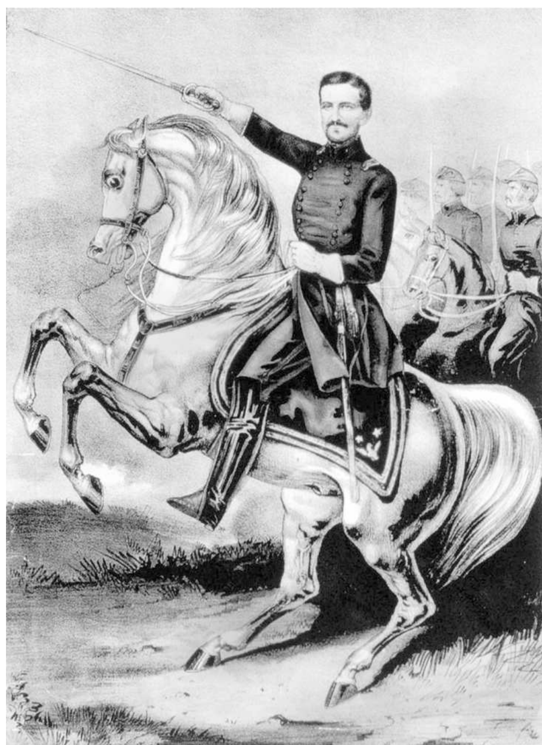
威廉·罗斯克兰斯暂时取得了战略优势，信心大增。他认为布拉克斯顿·布拉格正在向南撤退，打算进攻南方邦联军，命军队乘胜追击。追击过程中，北方联邦军需要翻过一片群山。威廉·罗斯克兰斯命各军团兵分多路。与此同时，布拉克斯顿·布拉格丝毫没有撤退的意思，反而向北方联邦军发起了进攻。很快，威廉·罗斯克兰斯陷入了险境，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这“严重影响着兵力的集结”。他竭尽全力努力了近一个星期。其间，虽然状况连连，但1863年9月18日，他终于将兵力集中到了一起。然而，由于担心布拉克斯顿·布拉格会接连粉碎自己的各分队[7]，他多日未眠，连续两晚忧心一个军团的安危，现在已经身心俱疲。布拉克斯顿·布拉格决定发动进攻。上战场前，威廉·罗斯克兰斯“像被霜打了”一样。布拉克斯顿·布拉格得到了增援，分别是维克斯堡沦陷后，约瑟夫·E.约翰斯顿的残余军队和诺克斯维尔的西蒙·巴克纳军团及北弗吉尼亚军中詹姆斯·朗斯特里特的军团。现在，南方邦联军的兵力远超对手。1863年9月19日，南方邦联军发起了进攻。

第4节　奇克莫加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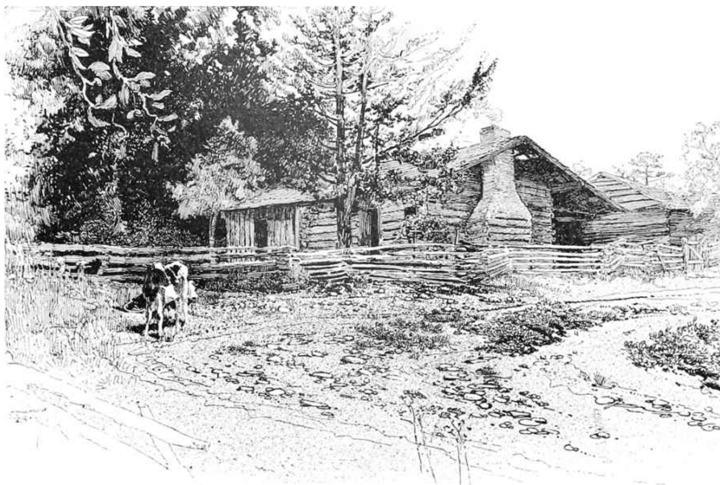
1863年9月20日，激烈残酷的奇克莫加战役爆发，即“西部大战”。如果威廉·罗斯克兰斯拥有足够的战斗勇气，那么谁胜谁负将会是个未知数。北方联邦军也许会胜利，因为他们在防守阵地和壕沟方面的优势弥补了兵力上的差距。北方联邦军的大军是身经百战、英勇无敌的坎伯兰军。从坎伯兰军的战斗史中，我们发现只要领导有方，坎伯兰军就可以创造奇迹。但在奇克莫加战役中，士兵们受到低迷士气的影响，最终血染沙场。由于主将考虑不周，下达了一项错误命令，北方联邦军的战线出现了漏洞。南方邦联军乘虚而入，打乱了两个师的阵脚，击溃了另外两个师。惊慌失措的北方联邦军迅速撤离。威廉·罗斯克兰斯与逃兵一起撤退，但担心整个大军被击溃，便骑马前往十二或十五英里外的查塔努加，试图采取行动保卫查塔努加。1863年9月20日下午5时，威廉·罗斯克兰斯写信给亨利·W.哈勒克说：“我们已经岌岌可危……南方邦联军击垮了我们，击退了我军右翼，直击我们的腹地。我们的队伍已经溃散。”乔治·托马斯指挥北方联邦军的左翼。1863年9月20日下午，他率两万五千人击退了军力是自己两倍的南方邦联军，守住了据点，获得了“查特努加之岩”的称号。后来，威廉·罗斯克兰斯下令，乔治·托马斯撤回了查塔努加，集结了剩余的军队，并加固了查塔努加的防卫。随后，布拉克斯顿·布拉格打算围攻查塔努加[8]。

奇克莫加战役爆发前，尤利西斯·S.格兰特受命从维克斯堡出发，前去增援威廉·罗斯克兰斯。但命令下达一周后，尤利西斯·S.格兰特才接到。尤利西斯·S.格兰特立即命两个师先出发，另外两个师整装待发。增援部队由威廉·T.谢尔曼指挥。华盛顿一直没有收到相关消息。威廉·罗斯克兰斯给林肯发了电报，查尔斯·A.达纳给埃德温·斯坦顿发了电报。两人都请求获得增援，试图攻克查塔努加和田纳西州的南方邦联军战线。但直到1863年9月23日夜晚，林肯和埃德温·斯坦顿才收到电报。埃德温·斯坦顿认为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于是，连夜召开了会议。约翰·海伊将威廉·罗斯克兰斯的请求送到了林肯夏天的住所——士兵之家。看过电报后，林肯立刻跨上马背，借着月光前往战争部。在战争部，他见到了埃德温·斯坦顿及其三个下属及亨利·W.哈勒克、威廉·H.苏厄德和萨蒙·P.蔡斯。

埃德温·斯坦顿提议派波托马克军的部分军队增援查塔努加。一开始，林肯和亨利·W.哈勒克并不赞同。但埃德温·斯坦顿坚持己见，并在威廉·H.苏厄德和萨蒙·P.蔡斯的支持下，否定了林肯和亨利·W.哈勒克的反对意见。最后，会议界定，如果乔治·米德行动迟缓，将派约瑟夫·胡克麾下的第十一军团和第十二军团增援威廉·罗斯克兰斯。与乔治·米德商议后，来自弗吉尼亚州库尔佩珀法院的一万六千名士兵乘火车来到华盛顿，然后转乘巴尔的摩到俄亥俄州列车，途径贝莱尔、哥伦布、印第安纳波利斯、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到达田纳西河。六天内，大部分增援军队完成了转移任务，实现了一项创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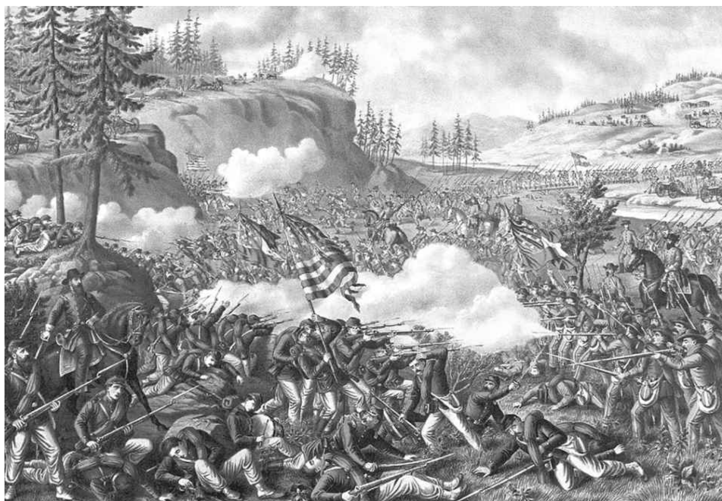
骑在马上的威廉·罗斯克兰斯



乔治·托马斯的指挥部



乔治·托马斯的露营地



奇克莫加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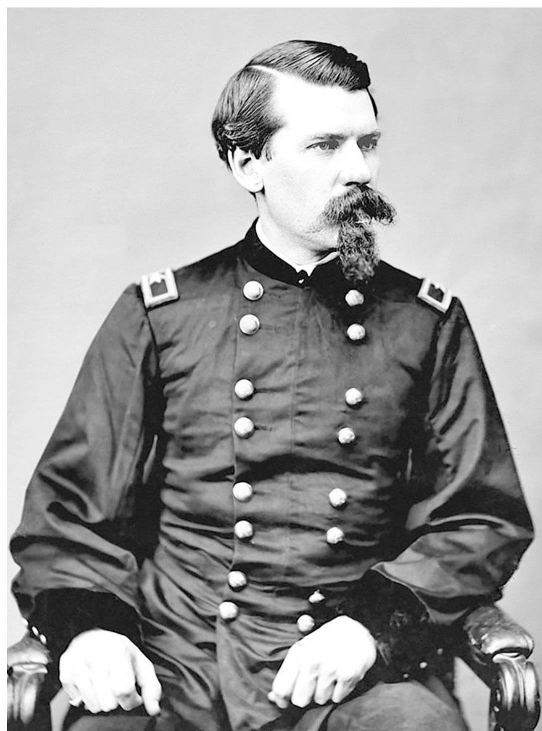
范佩尔特中尉在一门大炮旁边

第5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指挥作战

然而，虽然援兵已经到达，但需要一位主将坐镇。奇克莫加战役失败后，威廉·罗斯克兰斯情绪低落，在军中的威望也大不如前，变得优柔寡断，明显无法应对当下的困局。北方联邦军的致命弱点是缺乏补给，无法长期固守查塔努加。南方邦联军占领了田纳西河一带及田纳西河南岸宽阔平坦的大道。北方联邦军虽然占领了田纳西河北岸，但必须从斯蒂文森和布里奇波特经蜿蜒崎岖的山路用马车运输补给。斯蒂文森和布里奇波特与纳什维尔之间有铁路线，可以运送补给。但由于道路崎岖，加上秋雨绵绵，运输补给变得异常困难。士兵们饥肠辘辘。查尔斯·A.达纳写道："运输补给的路况十分糟糕，马车需要八天才能从斯蒂文森到达查塔努加……我们的粮草已经用尽，不得不扔掉部分贵重货物……如果没有新的补给线路，军队恐怕撑不过一周……更糟糕的是，军队的主将显得十分无能……他的无能似乎传染了其他人，没有人提出任何应对之策。"

第6节　乔治·托马斯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

1863年9月21日，参考了威廉·罗斯克兰斯的信件和查尔斯·A.达纳的详尽报告后，联邦政府决定任命尤利西斯·S.格兰特为主将，指挥西部所有军事行动，除了纳撒尼尔·P.班克斯指挥的军队[9]。尤利西斯·S.格兰特立即解除了威廉·罗斯克兰斯的职务，任命乔治·托马斯指挥坎伯兰军。他从路易斯维尔给乔治·托马斯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乔治·托马斯不惜任何代价守住查塔努加。乔治·托马斯迅速回复道：“就算饿死，我们也会守住查塔努加。”詹姆斯·威尔逊和查尔斯·A.达纳骑行五十五英里，午夜时分抵达了查塔努加。他们的经历说明，查塔努加的驻军处境危急。在贺拉斯·波特上尉的指挥部，詹姆斯·威尔逊和查尔斯·A.达纳享用了晚餐，即一方块油炸压缩饼干及一小块咸猪肉和一杯不加奶、不加糖的军用咖啡。事实上，这是军队能提供的最丰盛的晚餐。两匹马分别吃了两根谷穗，没有干草[10]。



贺拉斯·波特（1837—1921）

威廉·罗斯克兰斯虽然想到了一条更好的补给运输线，但缺乏付诸实践的勇气和决心。很快，人们发现，尤利西斯·S.格兰特任命乔治·托马斯是明智的选择。1863年10月23日，在查塔努加，查尔斯·A.达纳写道："指挥部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切显得秩序井然，之前的混乱已经消失殆尽。"陆军工兵指挥官威廉·史密斯制定了一项计划，打算从布里奇波特开辟一条短途补给线。他将计划提交给了乔治·托马斯。乔治·托马斯同意了他的计划，并下令执行。

与此同时，尤利西斯·S.格兰特亲自前往查塔努加。他从路易斯维尔乘火车，赶到布里奇波特，从布里奇波特骑行五十五英里，通过了北方联邦军补给线的主干道。几周前，在去新奥尔良的路上，他从马上跌落，受了重伤，现在仍然拄着拐杖。途中，他遇到了一场暴风雨，只能艰难地骑马走在泥泞崎岖的路上。由于暴雨和山体滑坡，路面的泥水已经没过膝盖，不便骑马。但尤利西斯·S.格兰特继续前行，并叙述道："路上到处都是破车的碎片及数不清的骡子和马的尸体。"1863年10月23日夜晚，他抵达查塔努加，"浑身沾满泥点，但没有受伤"。"他清澈的眼神和英武的面孔"表明，他的精神状态极佳。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精神感染了其他将领，也鼓舞了士兵们，对接下来的战事十分有利。北方联邦军的惊人变化表明，像恺撒、拿破仑、罗伯特·E.李一样的勇者正在执掌军权。

第7节　查塔努加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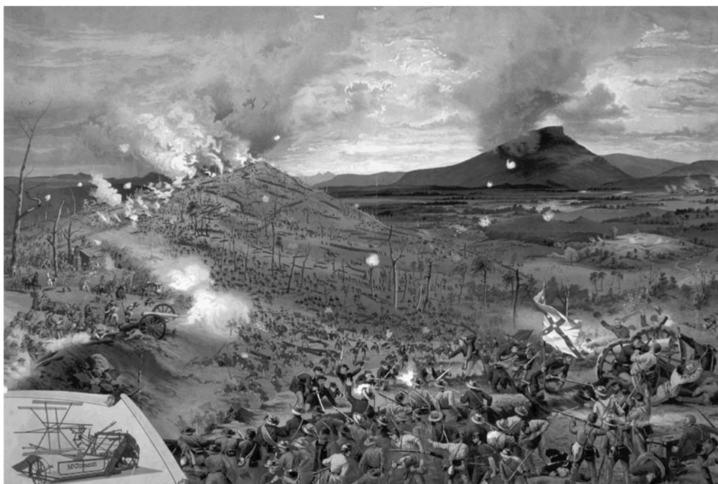
1863年10月24日早晨，尤利西斯·S.格兰特与乔治·托马斯和威廉·史密斯一起，进行了一次侦察。侦察结束后，尤利西斯·S.格兰特同意了威廉·史密斯制订的补给计划，敦促军队立即执行。事实证明，威廉·史密斯的计划“成功”保障了军中补给。北方联邦军很快掌握了新供给线。布拉克斯顿·布拉格懊悔不已，试图夜袭北方联邦军的补给线，但失败了。

1863年11月15日，威廉·T.谢尔曼骑马抵达查塔努加。田纳西州军紧随其后。尤利西斯·S.格兰特制定了进攻计划，打算尽快付诸实施。乔治·托马斯、威廉·T.谢尔曼、威廉·史密斯和约瑟夫·胡克都是得力干将。1863年11月23日到11月25日，北方联邦军的军事行动被称为查塔努加战役。其间，最精彩、最激动人心的一场战役是传教士岭战役[11]。1863年11月25日下午时分，镇守腹地的乔治·托马斯率军奉命前进，攻占了南方邦联军的第一排散兵壕，停下来等待进一步的命令。他的军队遭到了南方邦联军猛烈的炮火，丝毫没有后退。随后，乔治·托马斯率领的两万名北方联邦军并未接到命令。事实上，即使有命令，乔治·托马斯也会率军冲上传教士岭，攻克南方邦联军据点，看着南方邦联军落荒而逃。传教士岭战役中，菲利普·谢里登表现出色。

1863年11月25日下午4时30分，查尔斯·A.达纳发电报给埃德温·斯坦顿说：“荣耀归于上帝。这一天无疑是属于我们的。将士们欣喜若狂。胜利后，尤利西斯·S.格兰特骑马走在军队中间，战士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1863年11月26日，查尔斯·A.达纳发电报说：“布拉克斯顿·布拉格全线撤退，烧毁了补给站和桥梁。”



尤利西斯·S.格兰特遥望传教士岭战场



联邦军进攻传教士岭



乔治·托马斯率联邦军攻打邦联军



大战后的传教士岭

查塔努加战役的结果表明，南方邦联军的气数已尽。1863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北方人得知了传教士岭战役。内战爆发以来，这一天可能是北方人第一次真正过感恩节。1863年11月23日至1863年11月25日的查塔努加战役中，北方联邦军参战五万六千人，损伤五千八百二十四人；南方邦联军参战四万六千人，损伤六千六百六十七人，失踪四千一百四十六人[12]。

第8节　征兵

1863年的秋季选举对林肯十分有利。1863年10月17日，各州的投票活动进行四天后，林肯发布了一项公告，呼吁三十万志愿军“参军三年，或按战争所需参军，但不超过三年”。如果志愿军人数不足，就只能征兵。国会按照惯例时间召开了会议，采取了有效措施，为1864年的战斗扩充了军队。根据1864年2月24日通过的《征兵法案》，林肯有权“在发生紧急状况时，呼吁志愿军参军。”如果没有招募到足够数量的志愿军，林肯可以下令征兵 [13] 。

国会增加关税，全面实施国内税收法案，发放贷款，以此为总统提供资金 [14] 。人民越来越反感服兵役。生产劳动和商业活动的利润不断增加，因此，政府很难招到足够的志愿兵。总的来说，国会、林肯和战争部已经做得非常好，正如民主国家预想的一样。在民主国家，每个人都有权发表意见和投票。在即将举行的1863年秋季的总统选举中，这一点不容忽视。然而，征兵结果远未达到预期人数。尽管如此，征兵活动仍在继续，“但没有掀起任何波澜，人们已经将征兵视为一种必要的军事行为”。政府、各州、各县和其他政治部门都慷慨地提供了奖金，譬如，纽约县志愿兵委员会的广告语是：“招募志愿兵三万人。赏金如下：县级赏金三百美元，州级赏金七十五美元，新兵国家级赏金三百零二美元，退伍军人额外发放一百美元。”新兵赏金共计六百七十七美元，老兵赏金共计七百七十七美元，服役期不超过三年。事实上，志愿兵的现役时间只有一年多。此外，每名士兵每月有十六美元的衣食补助。虽然一些地方的赏金更高，但纽约县的赏金依然高于全国平均赏金金额。

赏金制度的缺陷是：催生了代征兵者。代征兵者的业务是招募新兵，目的是赚取佣金，不考虑志愿兵的身体状况和道德品质。此外，赏金制度还助长了骗取赏金的犯罪行为。小偷、扒手和流浪汉都应征入伍，领取了现金支付的赏金后，趁机逃走，然后隐姓埋名，再去另一个区或州应征入伍，继续领取赏金后逃走，屡试不爽，直到被抓或征兵活动结束。宪兵总司令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现在，奥尔巴尼监狱中的一名男子被判监禁四年。他承认曾三次‘骗取赏金’。据说，一支由六百二十五名新兵组成的特遣队前去增援波托马克军驻新罕布什尔的一个军团。

其中，一百三十七人在途中逃走，八十二人进入南方邦联军哨兵线，三十六人掉队及其他情况，最后只剩下三百七十人。”

由于北方幅员辽阔，每个城镇和市级行政区都急于完成自己的配额任务，加上行政制度不健全，因此，很难发现或抓捕赏金骗子。在东部的大城市，代征兵者和赏金骗子非常猖獗，一些罪犯、地痞流氓和流浪者趁机混进了军营。本来应该被监禁的人，现在却上了前线。然而，1864年招募的新兵中，很多士兵都是真正的爱国者。在乡下的村庄和小城市，一些能干的商人自愿参加了征兵活动，对应征者的品格提出了要求。大部分新兵都是强健的加拿大人或欧洲移民，因高额的赏金自愿参军，但在身体、道德和智力方面，都逊色于1861年和1862年入伍的士兵。此外，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都是雇佣兵。新招募的士兵虽然不够理想，但淘汰了党派将领和依靠势力当上低级指挥官的人。空出的职位很快被经过历练的优秀军官取代。1864年4月5日，威廉·T.谢尔曼写信给约翰·谢尔曼说：“我相信，截止1864年5月1日，我会在田纳西州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后来，威廉·T.谢尔曼指挥的战役充分印证了他的期望。

最重要的是，北方培养了四位伟大的将军，即尤利西斯·S.格兰特、威廉·T.谢尔曼、乔治·托马斯和菲利普·谢里登 [15] 。在培养将领方面，北方占据了优势。在接下来的激烈战役中，我们将看到尤利西斯·S.格兰特对抗罗伯特·E.李，威廉·T.谢尔曼对抗接替布拉克斯顿·布拉格的约瑟夫·E.约翰斯顿。在南方邦联军中，除了罗伯特·E.李和约瑟夫·E.约翰斯顿，没有人能像乔治·托马斯一样，统领一支独立的军队，也没人能与菲利普·谢里登一决高下。面对菲利普·谢里登的英勇，罗伯特·E.李十分怀念“石墙”托马斯·J.杰克逊 [16] 。

[1] 退伍军人预备役是美国内战期间，北方联邦军建立的一个军事预备役组织。该组织允许部分伤残或体弱多病的士兵或退役士兵执行较轻松的任务。——译者注

[2] 《美国史》，第4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约翰·默里·福布斯的书信回忆录》，第2卷，萨拉F.休斯著。——原注

[3] 《美国史》，第4卷，第330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4]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383页。《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7卷，第1册，第105页。《乔治·米德

传》，第223页，艾萨克·彭尼帕克著。——原注

[5]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1卷，第439页。《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9卷，第2册，第207页。——原注

[6] 《美国革命史》，第318页，威廉·布拉德福德著。《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9卷，第2册，第332页。——原注

[7] 很多人认为布拉克斯顿·布拉格有能力粉碎北方联邦军。——原注

[8] 奇克莫加战役发生在查塔努加以南。五万八千名北方联邦军对阵六万六千名南方邦联军。北方联邦军伤亡一万六千一百七十人，南方邦联军伤亡一万八千四百五十四人。《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105页，第106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编者注

[9] 1863年10月16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被任命为西部北方联邦军的指挥官。1863年10月23日，他率军到达查塔努加。——编者注

[10] 《查尔斯·A.达纳传》，第279页，詹姆斯·威尔逊著。《老旗帜之下》，第1卷，第270页。——原注

[11] 1863年11月23日，乔治·托马斯率军占领了传教士岭前的奥查德诺布，为北方联邦军取得了一个重要据点。1863年11月24日，约瑟夫·胡克进攻卢考特山，将南方邦联军赶下了卢考特山。——编者注

[12] 《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107页到第108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原注

[13] 几次征兵情况为：1864年2月1日，征兵二十万；1864年3月14日，征兵二十万；1864年7月18日，征兵五十万；1864年12月19日，征兵三十万。实招人数参见《美国史》，第4卷，第429页，注释一，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三，第4卷，第929页；《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50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原注

[14] 《美国史》，第4卷，第428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15] 虽然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应该记住的是，1863年底前，菲利普·谢里登并不是一位名将。——编者注

[16] 《美国史》，第4卷，第430页等，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三，第5卷，第673页到第675页。——原注

第9章　北方联邦军的反攻：尤利西斯·S.格兰特担任总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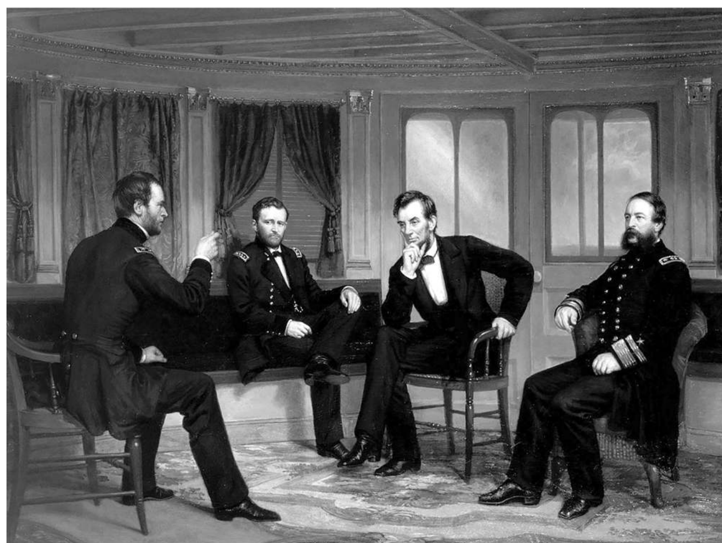
第1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

约翰·洛斯罗普·莫特利写道：“从军事角度来看，谢天谢地，我们等了很久的人似乎真的出现了。”林肯、国会和北方人也认为真正的“大将”出现了。根据1864年2月29日通过的一项法案，国会恢复了中将级别，授权林肯任命负责指挥国家军队的将军 [1] 。众所周知，尤利西斯·S.格兰特是联邦政府十分看重并希望委任军务的将领，也完全符合林肯的期望。一开始，如果有一位能力出众的将军指挥北方联邦军的军事行动，林肯一定会很欣慰。托马斯·A.斯科特年事已高，乔治·B.麦克莱伦能力不足，亨利·W.哈勒克被约翰·波普打败后“胆量”全无。正如林肯说的那样：“亨利·W.哈勒克更像一名优秀的文职人员” [2] 。很快，林肯向参议院递交了申请，提议任命尤利西斯·S.格兰特为北方联邦军的中将。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任命立即得到了批准。

尤利西斯·S.格兰特来到华盛顿后，在白宫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林肯。两人约好1864年3月9日会面。当着内阁、亨利·W.哈勒克上将和另外三个人的面，林肯递给尤利西斯·S.格兰特一份中将委任状，说：“你拥有了崇高的荣誉，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在上帝的庇护下，国家信任你，也会竭尽全力支持你。”尤利西斯·S.格兰特回答道：“我觉得所有重责都落在了我肩上。我知道，如果我能顺利完成任务，那么一定是优秀的军队的功劳。为了我们共同的国家，将士们奋战沙场。最重要的是，必须感谢上帝的恩惠，是上帝指引着我们和人民。” [3]

1864年3月12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正式担任北方联邦军总指挥 [4] 。去华盛顿前，他原本打算继续留在西部，但此刻，他发现自己属于波托马克军。到了前线后，尤利西斯·S.格兰特与乔治·米德开了一次会。会上，两人交换了一些观点。随后，尤利西斯·S.格兰特决定让乔治·米德继续留任，并动身前往纳什维尔，与威廉·T.谢尔曼讨论了田纳西州和佐治

亚州的行动计划。当时，威廉·T.谢尔曼接替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成为西部北方联邦军的指挥官。1864年3月23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返回华盛顿。毫无疑问，他现在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将领。民主党和共和党及各派都争相赞扬他。尤利西斯·S.格兰特担任总指挥前，遇到过很多质疑和诋毁，度过了一段痛苦的时光。但维克斯堡战役和查塔努加战役的胜利不仅粉碎了所有诋毁，还给负责指挥战役的将军带来了荣耀。1864年冬季和早春，尤利西斯·S.格兰特受到了很多赞扬。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样，在有生之年获得这么多赞扬。几乎没有人私下抱怨他，也极少有人妒忌他的成功。尤利西斯·S.格兰特为人谦逊，真诚大方，博得了众人的尊敬。同时，他的丰功伟绩赢得了人们对他的钦佩，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称赞。然而，林肯遭到了民主党人的辱骂及一些激进共和党人的尖锐批评和他人的诅咒。林肯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形成了鲜明对比。



林肯（右二）与尤利西斯·S.格兰特（左二）、威廉·T.谢尔曼（左一）、戴维·D.波特



威拉德酒店

和林肯一样，尤利西斯·S.格兰特性格纯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希望融入人民大众。但他常常表现得过于不修边幅，将时间花在一些不受欢迎的事情上。此外，作为一个统领五十万大军的指挥官，他经常不顾形象、毫无遮掩。1864年5月开战前不久，在华盛顿的威拉德酒店，理查德·H.达纳见到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描述道："一个弯腰驼背的矮个子男人，穿着一身脏兮兮的少将制服，外表毫不起眼，相貌平平，显得无精打采。"理查德·H.达纳很吃惊地说："当时，在威拉德楼下入口处，我看到他聊着天，抽着烟。作为军队的总指挥，国家的命运似乎要依靠他。"他还说："但他脸上的神情镇定自若，眼神清澈笃定，非常自然，丝毫不显得做作。"理查德·H.达纳深知尤利西斯·S.格兰特手握重权，掌握着国家命脉，于是说："面对战争和重重危机，我们将权力交到了一个人手中。" [5]

威廉·T.谢尔曼写道："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结束后，大战真正开始。"与前几年一样，1864年和1865年发生的一系列战役为后来的战役打下了基础。然而，直到此时，林肯和将领们才吸取了战争教训，开始真正讲究战略战术。

在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作战计划中，最突出的成就是：第一，率十二万两千人消灭或俘虏了罗伯特·E.李的军队；第二，威廉·T.谢尔曼率九万九千人击败了约瑟夫·E.约翰斯顿。此外，尤利西斯·S.格兰特还率军攻下了里士满和亚特兰大。1864年冬季和早春的大部分时间，尤利西斯·S.格兰特一直做着系统有效的准备工作。北方人对尤利西斯·S.格兰特十分有信心，期望大战能在1864年仲夏时结束。

第2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进军威尔德内斯高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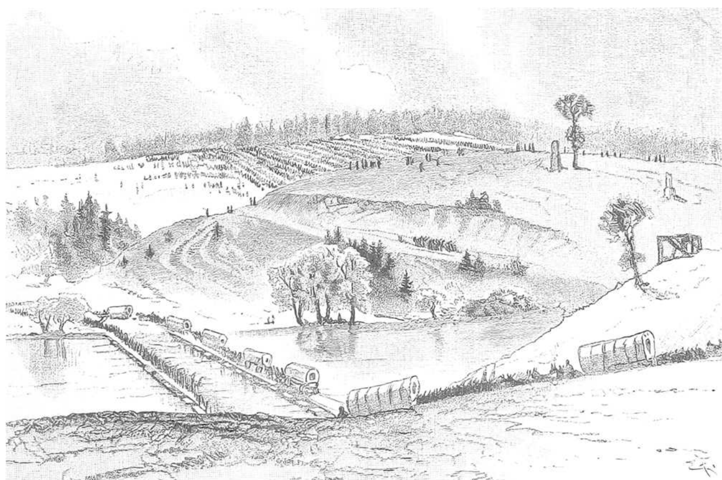
1864年5月3日夜晚，波托马克军开始前进，顺利渡过了拉皮丹河。1864年5月4日，波托马克军在威尔德内斯高原[6]安营扎寨。1863年，约瑟夫·胡克在威尔德内斯高原陷入绝境。在威尔德内斯高原的丛林中，尤利西斯·S.格兰特无意与南方邦联军对阵。但罗伯特·E.李密切监视着他，看着他顺利渡过了河，想等北方联邦军在密林中休息时，发起进攻，因为南方邦联军对威尔德内斯高原了如指掌。罗伯特·E.李立即命军队集合，极速前进，拦截北方联邦军。1864年5月5日，两军齐聚威尔德内斯高原，一场激烈的战斗一触即发。南方邦联军的人数虽然只有北方联邦军的一半，但更了解战场。此外，北方联邦炮兵基本用不上。因此，这是一场公平的较量，双方都没有优势[7]。

尤利西斯·S.格兰特意识到，军队只有杀出一条路，才能穿过威尔德内斯高原。1864年5月6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准备进攻，但罗伯特·E.李也决定进攻。两人都渴望拿到主动权，战斗提前一小时打响了。战况并不明朗，双方都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打了胜仗。南方邦联军的右翼被击退，形势危急，但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及时出现，化险为夷。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军队的一支得克萨斯旅担任先锋部队。与乔治·华盛顿一样，罗伯特·E.李是一名性格急躁的勇士，喜欢战场上的喧嚣和刺激。他快马加鞭，一心想速战速决，紧跟着得克萨斯旅出发了。然而，他被士兵们认了出来。军队上下大喊："回去吧，罗伯特·E.李将军！回去吧！"詹姆斯·朗斯特里特被自己人误伤，南方邦联军停止战斗。1863年，"石墙"托马斯·J.杰克逊受伤前，南方邦联军也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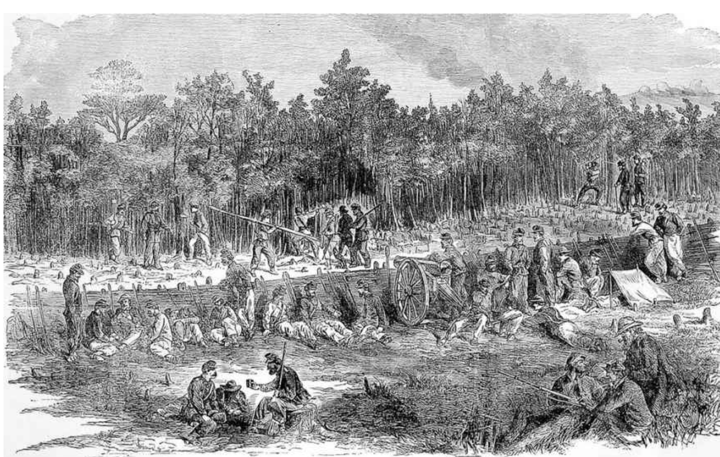
1864年5月5日到1864年5月6日的战斗被称为威尔德内斯战役。双方将军都称自己占了上风，但都对结果不满意。尤利西斯·S.格兰特计划渡过拉皮丹河，击败南方邦联军的右翼，迫使南方邦联军后退，并希望顺利穿过威尔德内斯高原，在更宽广的地界开战，重击南方邦联军。然而，看到尤利西斯·S.格兰特亲率波托马克军前来时，罗伯特·E.李并没有心生胆怯，认为尤利西斯·S.格兰特在西部的胜利主要是因为对手缺乏战术，而不是因为他领导有方。罗伯特·E.李希望能像打败乔治·B.麦克莱伦、约翰·波普、安布罗斯·伯恩赛德和约瑟夫·胡克一样，打败尤利西斯

·S.格兰特，将北方联邦军赶回拉皮丹河对岸，迫使尤利西斯·S.格兰特像北方联邦军的前任将领们一样，不再作战。北方联邦军伤亡一万七千六百六十六人。虽然没有确切的报告，但南方邦联军伤亡人数更少一些 [8] 。

1864年5月7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对乔治·米德说："约瑟夫·E.约翰斯顿的军队受到重创，一定会撤退！" [9] 这句话体现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对约瑟夫·E.约翰斯顿的尊敬。威尔德内斯战役中，他们第一次碰面，但都没有攻击对方的意图。尤利西斯·S.格兰特率先做出了部署，命左翼军继续在夜间行军，前往斯波特瑟尔韦尼亚法院。詹姆斯·威尔逊因右翼受挫感到不安，向尤利西斯·S.格兰特上报了情况并寻求安慰。尤利西斯·S.格兰特对他说："没关系，威尔逊将军。军队正在向里士满迈进！" [10] 北方联邦军出发了。士兵们知道威尔德内斯战役损伤较大，但不清楚自己是否被打败了。当他们走到岔路口时，心里最关心的问题是：命令会是再次渡河北上吗？但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向里士满进发。在北方联邦军心目中，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地位很尊贵。士兵们唱着歌，迈着轻快的步伐前进。查尔斯·A.达纳给埃德温·斯坦顿传话说："将士们的士气空前高涨。"尤利西斯·S.格兰特骑马经过。虽然天已经黑了，但他还是被士兵们认了出来。士兵们欢呼起来，挥动着帽子，拍着手，抛起手中的武器，像欢迎同伴一样欢迎尤利西斯·S.格兰特，很高兴尤利西斯·S.格兰特率领他们向里士满进发，而不是命令他们撤回已经废弃的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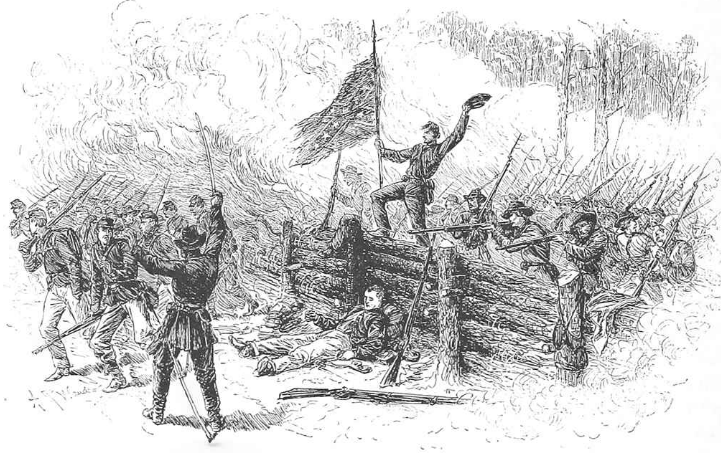
联邦军渡过拉皮丹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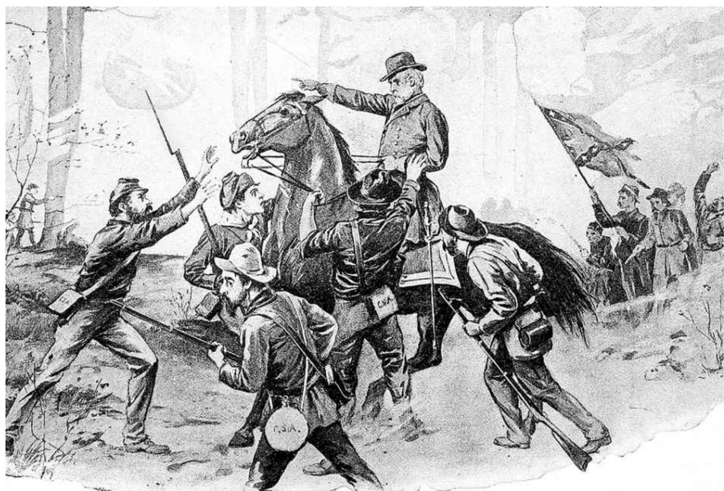
威尔德内斯战场上勇敢的联邦士兵



威尔德内斯战役



联邦军冲进邦联军阵地



罗伯特·E.李在威尔德内斯战场

南方邦联军相信，在自己的领地上，他们是战无不胜的，并认为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其他北方联邦将军一样，会弃战撤退。罗伯特·E.李一直以为，尤利西斯·S.格兰特正从弗雷德里克斯堡撤退。但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仅凭一个臆想就制定了计划。他猜测尤利西斯·S.格兰特会率军转移到斯波特瑟尔韦尼亚，于是，派出一部分兵力前往斯波特瑟尔韦尼亚。北方联邦军到达斯波特瑟尔韦尼亚前，南方邦联军抄近路占据了沿途的一个据点。1864年5月8日，双方大军再次交战。1864年5月11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写信给亨利·W.哈勒克说：“现在，我们终于结束了六

天的苦战……如果战斗会持续议个夏天，我……打算与南方邦联军决一死战。”[11] 1864年5月12日，在“血腥角”萨利安特[12] 爆发了一场激战。战斗结束后，双方归于平静，因为连日来的大雨使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无法前行。此外，北方联邦军急需修整。尤利西斯·S.格兰特希望得到支援，弥补近日来的损失。在斯波特瑟尔韦尼亚的一系列战斗中，尤利西斯·S.格兰特一直在进攻。前线上，南方邦联军的战壕里布满枪炮，战斗力倍增。据说，北方联邦军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很可能击退南方邦联军的两翼。因此，尤利西斯·S.格兰特没有在特定的、防守坚固的阵地上，命军队进攻罗伯特·E.李。弗朗西斯·A.沃克写道：“1864年夏天，北方联邦军进攻频繁，军队险些弃械投降。”[13] 但尤利西斯·S.格兰特本是一个好斗的将军，他的行动计划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断消耗南方邦联军的武装力量和物资储备”。等到军备物资消耗殆尽的时候，南方邦联军就会认输[14] 。

斯波特瑟尔韦尼亚战役爆发前，威尔德内斯战役再次上演。南方邦联军两次濒临溃败。罗伯特·E.李骑马冲锋在前，打算带头进攻，扭转败局。但士兵们拒绝前进，除非罗伯特·E.李守在后方。一次，军队溃散后，罗伯特·E.李趁机投入了战斗，并未遇险。还有一次，需要将士们齐心协力突围时，罗伯特·E.李积极参加了战斗。尤利西斯·S.格兰特指挥波托马克军前，罗伯特·E.李从未遇到过类似的事[15] 。

1864年5月19日，乔治·米德写信给妻子说：“昨日并没有发生我预期的战役。我们准备发起进攻时，发现南方邦联军阵地防御严密，甚至连尤利西斯·S.格兰特都认为进攻无异于用头撞墙。因此，他下令暂停进攻。”[16]

第3节　冷港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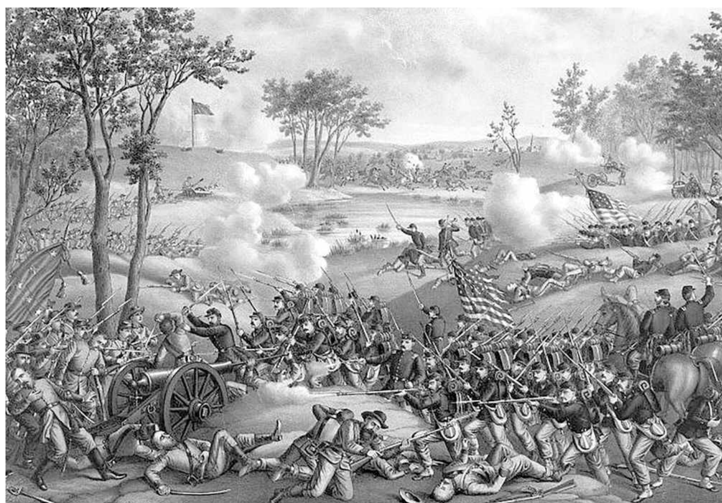
经过一个月的战斗，1864年6月2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率军深入到了弗吉尼亚州，到达乔治·B.麦克莱伦军队的侧翼在1862年5月和1862年6月攻占的一个地方。他很快攻下了盖恩斯磨坊附近的一个据点。菲茨·约翰·波特曾在盖恩斯磨坊战役中英勇作战。在此处，北方联邦军可以隐约看到里士满的建筑物。在距里士满外部防御工事约六英里处，罗伯特·E.李守着一处地理位置优越的阵地，加固了原来的防御工事。尤利西斯·S.格兰特认为侧面进攻不切实际，因此，下令正面进攻。1864年6月3日凌晨4时30分，进攻开始。此次战役被称为冷港战役[17]，是尤利西斯·S.格兰特平生最大的污点。进攻原定于1864年6月2日下午发起，但被推迟到了1864年6月3日。北方联邦军的将士们认真思考后认为，此次进攻没有胜算。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副官贺拉斯·波特记叙道：“战斗前一夜，我当值巡逻时，发现即将发起进攻的其中一个团的士兵们，正将写着自己名字和家庭住址的纸条缝在外衣背面，以便活下来的人能辨认出他们的尸体，让家人知道他们的生死。”

北方联邦军迅速发起进攻。温菲尔德·S.汉考克的第二军团的经历体现了冷港战役的过程。发起进攻约二十二分钟后，第二军团被击退了，“损失了三千名勇敢优秀的将士”[18]。北方联邦军伤亡人数共约七千人[19]。尤利西斯·S.格兰特懊悔不已，写道：“我们损失惨重，却一无所获。”[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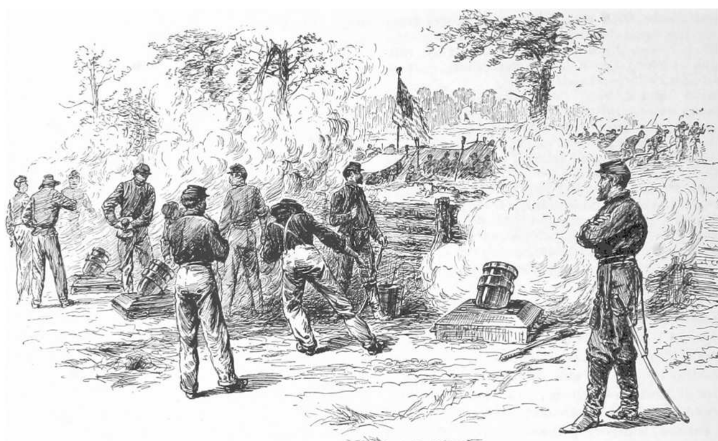
冷港战役结束后，尤利西斯·S.格兰特决定将阵地转移到詹姆斯河以南，司令部设在锡蒂波因特。1864年6月12日到1864年6月16日，北方联邦军成功转移到了新阵地。1864年6月6日，乔治·米德写道：“截至目前，我们只是迫使南方邦联军回到了里士满，依然无法一举打败、歼灭或击溃南方邦联军。”[21]

1864年5月4日到1864年6月12日，在拉皮丹河到詹姆斯河的一系列战斗中，尤利西斯·S.格兰特共折损五万四千九百二十六人，几乎是北方联邦军进军时，罗伯特·E.李军队的总人数[22]。南方邦联军的折损人数不明，但一定比北方联邦军少得多。数字并不能说明实际情况。在北方

联邦军的所有折损人数中，波托马克军占比较大。南方邦联军在地理和战略方面占据优势。交战时，北方联邦军英勇的军官一直战斗在最危险的地方，久经沙场的士兵总是冲锋在前，组成了一支敢死队。赏金骗子和雇佣兵一直躲到后方。北方联邦军士气锐减，远不及渡过拉皮丹河时情绪高涨。许多军官对尤利西斯·S.格兰特失去了信心。士兵们说："一切都是徒劳。不管谁做我们的将军，都无法击败罗伯特·E.李。"乔治·米德写道："现在，我想尤利西斯·S.格兰特已经睁开眼睛，愿意承认弗吉尼亚州不像田纳西州，罗伯特·E.李的大军也不像布拉克斯顿·布拉格的军队。"[23]



冷港战役



许多军事评论家认为，尤利西斯·S.格兰特没有抓住机会，也没有发挥好自己的优势，更没有取得与其损失相称的收获。然而，乔治·B.麦克莱伦的朋友们坚持认为，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损失相对较小，而且到达了里士满附近，因此，他指挥的战役更具价值。但他们忽略了重要一点，即不断进攻罗伯特·E.李的军队是胜利的必然结果。他们认为，夺取南方邦联的首都相当于征服南方，从而忽视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罗伯特·E.李作为首要目标，将里士满作为次要目标的重要性。尤利西斯·S.格兰特比乔治·B.麦克莱伦更高明，因为他找准了作战目标。虽然惨遭失败，损失严重，但他从未绝望，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初衷。对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批评是不合理的，除非证明如果没有遭到大规模杀戮，北弗吉尼亚军可以一直坚持战斗。如果我们拿尤利西斯·S.格兰特目前的行动与约翰·波普、安布罗斯·伯恩赛德和约瑟夫·胡克的行动比较，那么尤利西斯·S.格兰特肯定更胜一筹。乔治·米德的名字与葛底斯堡的伟大胜利联系在一起，因此，人们一般比较偏爱他，高度评价了他的功绩。但葛底斯堡战役后，他似乎再也没有独立指挥过战斗。罗伯特·E.李的军队投降前，如果用最终结果对比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损失和波托马克军其他指挥官的损失，那么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损失是最少的，因此，他的成就是伟大的。南方的军事文献直接或含蓄地赞扬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作战计划。然而，不能忘记的是，在某种程度上，乔治·B.麦克莱伦和乔治·米德削弱了北弗吉尼亚军的抵抗力。



冷港战役中联邦军的骸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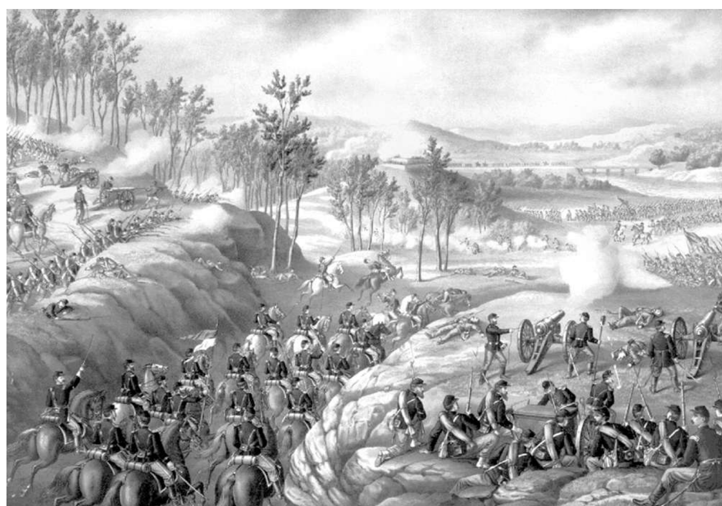
约翰·斯科菲尔德（1831—1906）

第4节　查塔努加-亚特兰大战役

威廉·T.谢尔曼的司令部设在查塔努加。1864年5月6日，他开始率军前进。坎伯兰州军、田纳西州军和俄亥俄州军分别由乔治·托马斯、詹姆斯·B.麦克弗森和约翰·斯科菲尔德指挥，共计九万九千人。约瑟夫·E.约翰斯顿率五万三千人固守在佐治亚州的道尔顿 [24] 。从查塔努加到亚特兰大的战役打响了。这场战役以勇猛的进攻和顽强的防守著称。威廉·T.谢尔曼虽然拥有更多兵力，但任务艰巨。他奉命进军南方邦联军领土，但拉长了自己军队的补给线。因此，他必须派兵保护补给线。这样一来，他的主力军就会减少。然而，他的任务是消灭对手或迫使南方邦联军投降。如果要完成任务，他必须有一支比南方邦联军强两倍的军队。与威廉·T.谢尔曼不同，约瑟夫·E.约翰斯顿没有得力的副官，也没有赢得副官们的信任，更没有与北方联邦指挥官相匹敌的人选。此外，查塔努加战役胜利后，北方联邦军热情高涨。综合考虑所有因素，双方势均力敌。后来，由于对手能力不足，威廉·T.谢尔曼的任务变得容易了一些。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约瑟夫·E.约翰斯顿会被一个能力平平的北方联邦将领一路击退南下。了解查塔努加-亚特兰大战役过程的人也许能意识到，双方阵营中都有一位擅长指挥军队和提供补给方面的将才。两人都接受过专业训练，拥有三年的实践经验，彼此之间的战斗令人敬佩，就像荷马时代的英雄决一死战一样。双方都将杀死另一方视为最高荣誉，但最终活下来的人也许会对着对方尸体哀叹，就像马克·安东尼对着布鲁图斯 [25] 的尸体哀叹一样。然而，1891年，当查塔努加-亚特兰大战役的胜利者逝世的时候，宅心仁厚的约瑟夫·E.约翰斯顿虽然年迈体虚，但仍然从华盛顿赶到纽约护柩，在葬礼上诚心哀悼 [26] 。

经过一系列侧面进攻和战斗，威廉·T.谢尔曼将约瑟夫·E.约翰斯顿击退到了卡斯维尔 [27] 。起初，南方邦联军决定在卡斯维尔作战，但两位军团指挥官反对该计划。约瑟夫·E.约翰斯顿虽然具有兵力上的优势，但得不到其他指挥官的一致同意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冒险一战是不明智的。因此，他率军撤回埃托瓦河以南。毫无疑问，他选择在相对开阔的地方奋力一搏是明智的，因为在撤退时，他集结了散落军队，还得到了一部分增援。与此同时，威廉·T.谢尔曼虽然也有增援部队，但由于需

要派兵保护后方唯一的补给线，军队人数依然较少。事实上，目前，两支军队实力相当。威廉·T.谢尔曼一直渴望开战，约瑟夫·E.约翰斯顿一直避而不战。南方邦联军似战非战的挑衅增加了北方联邦军的信心。抱着必胜的信念，忍耐着行军途中的艰辛，他们一路前进。其间，两军得知了弗吉尼亚州的作战情况。威廉·T.谢尔曼得知北方联邦军在威尔德内斯高原和斯波特瑟尔韦尼亚获胜，约瑟夫·E.约翰斯顿得知“罗伯特·E.李打败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



查塔努加-亚特兰大战役中的雷萨卡之战

1864年5月23日，在金斯敦，威廉·T.谢尔曼写道：“现在，我距亚特兰大五十英里。铁路供给线增加了一百英里，每一英里都有可能受到南方邦联军骑兵的攻击。”他的信说明进军南方邦联军领土时，北方联邦军耗费了很大精力。将士们不仅需要行军和作战能力，还需要承受失去舒适的军队生活的心情。威廉·T.谢尔曼下令遗弃大部分行李和帐篷，旅团司令部只有一顶帐篷盖，但肉、面包、咖啡、糖等食物依然比较充足。北方联邦军的所有供给都是查塔努加到亚特兰大的铁路运来的。然而，南方邦联军撤退时拆毁了铁路轨道，烧毁了信号架。幸运的是，负责维修铁路的北方联邦工兵团技术精湛，精力充沛，魔法般地修复了信号架，令南方邦联军震惊不已。南方邦联军原本认为铁路线遭到破坏后，会拖延北方联邦军的行军速度，却惊讶地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通过铁路运输，北方联邦军得到了充足的供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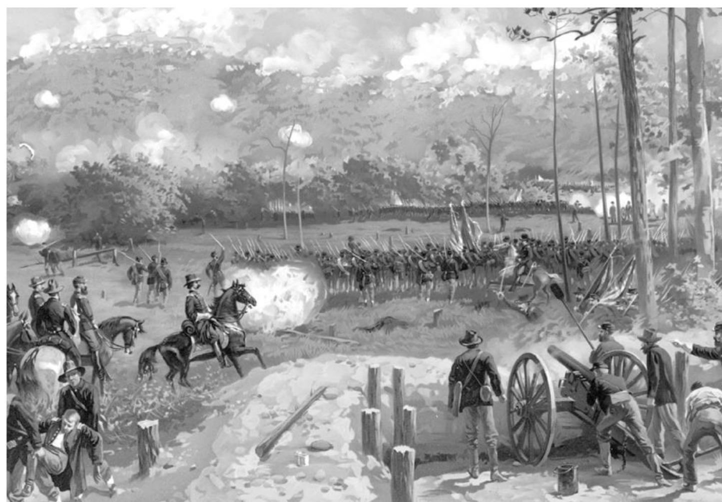
第5节　威廉·T.谢尔曼和乔治·托马斯

在金斯顿，威廉·T.谢尔曼来到二十年前担任炮兵中尉时，骑上马背的地方。想到约瑟夫·E.约翰斯顿防守森严的阿拉图纳阵地，他打算绕道而行。1864年5月25日，威廉·T.谢尔曼率军离开铁路线，绕到南方邦联军右侧，打响了激烈的新希望教堂战役，并顺利完成了任务。返回时，他攻占了可以看见科尼索山的阿拉图纳与大棚屋之间的铁路。随后，威廉·T.谢尔曼一反常用策略，开始正面进攻约瑟夫·E.约翰斯顿的阵地。[28] 他决定正面进攻的原因尚不清楚，但此次行动无疑是整场战役的一个污点。在坎伯兰州军中，一直有一个传统，即决策易变，执行冲动。如果威廉·T.谢尔曼确实存在冲动而为，也并不妨碍他做好充分的进攻准备。1864年6月24日，他下达了进攻命令。但事实上，1864年6月27日，北方联邦军的进攻才真正开始。经验丰富的士兵们勇敢发起了进攻，然而，南方邦联军战壕里一支步枪的威力抵得上他们的五支。北方联邦军很清楚，想要攻克南方邦联军防御工事一定会牺牲很多人。因此，征得了各级指挥官的同意后，北方联邦军放弃了进攻。威廉·T.谢尔曼损失近三千人，约瑟夫·E.约翰斯顿损失八百人[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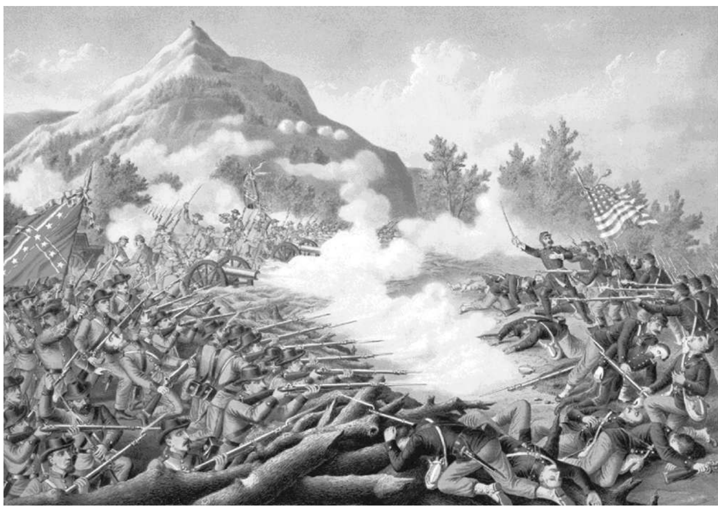
通过科尼索山战役，我们看到了威廉·T.谢尔曼和乔治·托马斯在性格和作战方式方面的差异。威廉·T.谢尔曼认为，乔治·托马斯过于保守，战斗中需要北方联邦军进攻时，他总是一味防守。然而，大部分坎伯兰州军的军官们认为，威廉·T.谢尔曼性格急躁，沉不住气，让军队在科尼索山战役中身处险境，如果没有乔治·托马斯的谨小慎微，北方联邦军一定会再遭惨败。没有参加科尼索山战役的人几乎不会贸然发表观点。但在一定程度上，科尼索山战役是一次成功的进攻。因此，很多人认为，威廉·T.谢尔曼和乔治·托马斯虽然禀性迥异，但能相互取长补短，即使时有分歧，也能在关键时刻团结一致，取得胜利[30]。

第6节　林肯和萨蒙·P.蔡斯

战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政治运动方兴未艾，北方必须提名并选举一位新总统。1863年，面对林肯是否应该连任的问题，国会已经无法置之不理。在一定程度上，林肯要为1862年的战事负责，也要为弗雷德里克斯堡和钱斯勒斯维尔的战败负责。因此，许多人质疑他是否具备担当大任的能力和决策力。但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的胜利离不开他。此后，林肯的政治地位逐渐得到巩固。然而，群众的不满表明，北方必须寻找一位新领袖。人们将目光落在了萨蒙·P.蔡斯身上。萨蒙·P.蔡斯对总统之位渴望已久。从理论上讲，萨蒙·P.蔡斯似乎是一位令人敬畏的总统候选人。他是激进共和党人的代表，被视为与林肯旗鼓相当的政治家。林肯反奴隶制的进展太慢，令共和党人非常不满。现在，他复兴联邦的政策也遭到了共和党人的反对。萨蒙·P.蔡斯在财政部的工作表现非常出色，性格和能力也完全适合担任总统。



科尼索山战役（一）



科尼索山战役（二）

林肯知道萨蒙·P.蔡斯觊觎总统之位，虽然有时会对此感到忧虑，但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胜利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1863年10月，林肯对私人秘书说：“我决定尽可能避免接触此类事情。萨蒙·P.蔡斯是一位优秀的财政部长，我会让他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如果他当了总统，我希望他不是最糟糕的那一位。”[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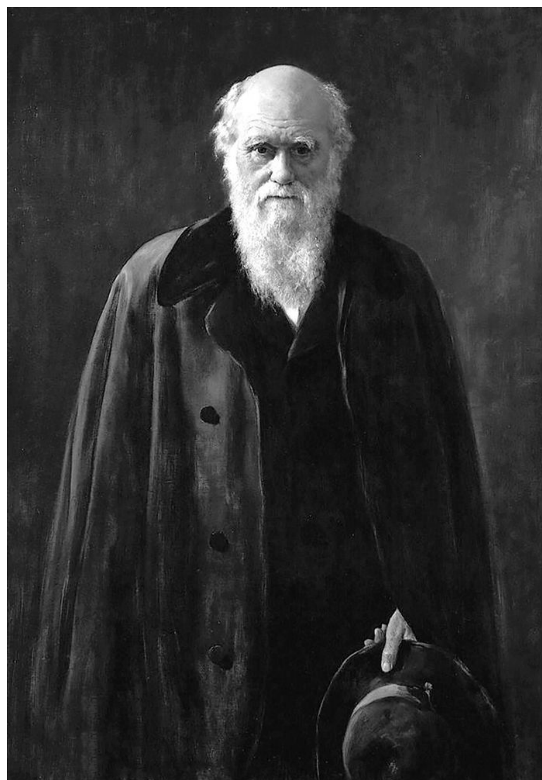
国民大会召开前，北方联邦政府和共和党多次声明，支持重新提名林肯为总统候选人[32]。虽然林肯的对手煽动一些政府官员和政客们极力反对他，但毫无疑问，北方人民支持林肯。林肯得到了平民、商人及许多优秀知识分子的支持。观察民心时，最令人愉快的莫过于发现农民、小商贩、销售员、文员、机械师及代表国家最高理想的知识分子观点一致。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在《北美评论》中写道：“历史会将林肯列入最睿智的政治家和最成功的统治者的行列。如果我们真心欣赏他，就必须想到，一旦一个无能或昏庸的人当选总统，美国必然陷入混乱。”阿萨·格雷给查尔斯·达尔文的信中写道：“林肯朴实、坦率、不求名利，可以代表美国。”[33]

第7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进军里士满

查塔努加战役结束后，尤利西斯·S.格兰特如果没有断然拒绝他的潜在支持者们使用他的名号，可能会成为一位令人生畏的总统候选人。在争取尤利西斯·S.格兰特支持的过程中，林肯非常精明。他说："如果尤利西斯·S.格兰特能攻克里士满，就让他提名。"[34]



阿萨·格雷（1810—1888）



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

1864年5月3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渡过拉皮丹河。1864年6月7日，联邦大会召开，全民振奋。萨蒙·P.蔡斯写道："在上帝庇护下，我们将希望寄托在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及其士兵身上。"[35] 北方人也将希望寄托在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身上。激烈的弗吉尼亚战役仍在继续。吉迪恩·韦尔斯在日记中如实记录了民意。他写道："1864年5月17日，军事行动中的一个痛苦悬念……深深的焦虑让人难以忍受，几乎无法让人思考。"1864年6月2日："我们对尤利西斯·S.格兰特充满信心，但看着勇敢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下，我们又倍感失望。"1864年6月7日："我军伤亡惨重。勇士们有的战死，有的重残，但尤利西斯·S.格兰特依然固执己见。"[36] 在威尔德内斯战役期间，林肯非常焦虑和悲伤。[37] 1864年5月7日，吉迪恩·韦尔斯写道："大约下午1时，林肯总统来到我的房间，说他昨晚一夜未眠。"[38] 随着战事的推进，林肯逐渐变得乐观。1864年6月15日，他意识到了冷港战役的影响，并得知尤利西斯·S.格兰特打算渡河前往詹姆斯河南岸。随后，他立即发电报给尤利西斯·S.格兰特说："我看到你们即将胜利。上帝保佑你们。"[39]

第8节　林肯再次得到总统提名

威廉·T.谢尔曼的成就并不明显，未能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罗伯特·E.李的较量中吸引过来。虽然西部各州的人民组成了威廉·T.谢尔曼的军队，但西部人并未过多关注威廉·T.谢尔曼的战事。1864年6月7日，吉迪恩·韦尔斯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的大会十分有趣。"林肯再次得到总统提名。除了密苏里州将票投给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其他州都将票投给了林肯。林肯解释道："大会认为，过河时最好不要换马。" [40]

[1]　华盛顿政府曾控制着中将头衔的授予。温菲尔德·斯科特拥有中将头衔。1864年3月1日，林肯签署了新法案，恢复了中将级别。《个人回忆录》，第357页，尤利西斯·S.格兰特著。——编者注

[2]　《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187页，约翰·海伊著。——原注。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尤利西斯·S.格兰特虽然不是一位优秀的战场指挥官，但是一位优秀的参谋长，为北方联邦军取得胜利付出了很多。——编者注

[3]　《林肯传》，第8卷，第341页，第342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4] 1864年3月12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被正式任命为北方联邦军指挥官。亨利·W.哈勒克的总司令一职被解除，任战争部埃德温·斯坦顿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参谋长。《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3卷，第669页。——编者注

[5]　《理查德·H.达纳传》，第2卷，第271页，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著。——原注

[6] 威尔德内斯高原遍布连绵起伏的山丘与沼泽洼地，灌木丛生，寸步难行。南北或东西相距约十到十二英里，几条主干道穿过高原，密实、阴暗、单调的森林里鲜有日光射入。一旦离开主干道，军队很难穿过这一地区，行进途中几乎无法保持队形，或按指定方向前进。《马萨诸塞州军事历史学会文献》，第4卷，第187页，哈泽德·史蒂文斯著。——原注

[7] 威尔德内斯战役中，北方联邦军参战十万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南方邦联军参战六万一千零二十五人，因此，北方联邦军并不是南方邦联军的两倍。《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110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编者注

[8]　托马斯·L.利弗莫尔的《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中的一些零星报告表明，南方邦联军的伤亡人数为七千七百五十人。道格拉斯·索撒尔·费里曼在《罗伯特·E.李传》第3卷第297页提到，南方邦联军伤亡约七千六百人。——编者注

[9]　《马萨诸塞州军事历史学会文献》，第4卷，第171页，西奥多·莱曼。——原注

[10] 《老旗帜之下》，第1卷，第389页，詹姆斯·威尔逊著。——原注

[11]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6卷，第1册，第13页。——原注

[12] 南方邦联军在斯波特瑟尔韦尼亚占领的U形凸角地带一直被称为“血腥角”。然而，历史学家们指出，在一处“马蹄铁形”的凸角以西的一小部分区域，才是真正的“血腥角”。——编者注

[13] 《温菲尔德·S.汉考克传》，第193页，弗朗西斯·A.沃克著。——原注

[14]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6卷，第1册，第13页。——原注。詹姆斯·福特·罗德斯关于尤利西斯·S.格兰特名言的脚注有误。参见《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6卷，第2册，第627页。——编者注

[15] 1864年5月15日，乔治·米德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觉得我军比南方邦联军更具优势，但南方邦联军仍与我们对峙。因为南方邦联军占据了有利地势，一直在修建防御工事，所以我们很难打败他们。我军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乔治·米德传》，第2卷，第195页。——原注。在斯波特瑟尔韦尼亚的战斗中，士兵们喊道：“将军请到后方去！到后方去！”《罗伯特·E.李传》，第3卷，第318页到第319页，道格拉斯·索撒尔·费里曼著。——编者注

[16] 《乔治·米德传》，第2卷，第197页。——原注。斯波特瑟尔韦尼亚战役从1864年5月8日一直持续到1864年5月20日，主要行动集中在1864年5月8日、1864年5月10日、1864年5月12日、1864年5月18日和1864年5月19日。历史学家们指出，十一万北方联邦军损失一万七千五百五十五人，南方邦联军总计人数五万零五百人，折损人数未知。但在《罗伯特·E.李传》第3卷第332页中，道格拉斯·索撒尔·费里曼估计南方邦联军的折损人数为一万五千多人。虽然战斗激烈，但尤利西斯·S.格兰特依然在左翼军的帮助下，继续前进，兵临里士满。1864年5月，菲利普·谢里登率骑兵进攻里士满，但在里士满以北的耶鲁泰文，遭到詹姆斯·斯图尔特的阻挠。1864年5月16日，在詹姆斯河，皮埃尔·博勒加德将本杰明·巴特勒率领的军队阻截在了百慕大亨德勒德。在谢南多厄河，南方邦联军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生的帮助下，打败了纽马基特的一支北方联邦军。——编者注

[17] 1864年6月3日的冷港战役常被称为第二次冷港战役。——编者注

[18]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6卷，第1册，第367页。——原注

[19] 1864年冷港战役中，北方联邦军的伤亡人数和战役时长存在争议。1864年6月1日到1864年6月3日的战斗中，北方联邦军阵亡十万七千九百零七人，受伤一万两千人。1864年6月3日的进攻中，北方联邦军伤亡人数七千人。参见《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114页到第115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1864年6月3日，北方联邦军阵亡一千人，受伤四千五百一十七人。参见《1864年到1865年弗吉尼亚州的战役》，第191页，安德鲁·A.汉弗莱斯著。南方邦联军在1864年6月3日的战役中折损一千二百人至一千五百人。参见《罗伯特·E.李传》，第3卷，第391页，道格拉斯·索撒尔·费里曼著。——编者注

[20] 《个人回忆录》，第2卷，第276页，尤利西斯·S.格兰特著。——原注

[21] 《乔治·米德传》，第2卷，第201页。——原注

[22] 威尔德内斯战役开始时，罗伯特·E.李的大军有六万一千人。《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2卷，第111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编者注

[23] 《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2卷，第201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原注

[24] 自1864年4月30日起，威廉·谢尔曼大军的可用兵力有十一万零一百二十三人。参见《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8卷，第1册，第117页。1864年5月初，由于援兵已到，加上一些骑兵，南方邦联兵人数超过六万。参见《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119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

——编者注

[25] 公元前44年，在布鲁图斯的策划下，一群元老刺杀了恺撒。马克·安东尼立即宣称，布鲁图斯等人叛国。于是，布鲁图斯逃亡东方，在雅典组建了罗马军团。公元前42年，他率军打回罗马，战败后自杀。——译者注

[26] 1891年2月14日，威廉·T.谢尔曼逝世。约瑟夫·E.约翰斯顿因在威廉·T.谢尔曼的葬礼上感染风寒，五个星期后病逝。——原注

[27] 1864年5月19日，约瑟夫·E.约翰斯顿将卡斯维尔作为据点。——编者注

[28] 1864年6月27日，威廉·T.谢尔曼发起进攻，损失惨重。——编者注

[29] 1864年6月27日的进攻中，北方联邦军损失两千零五十一人，南方邦联军损失四百四十二人。《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120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编者注

[30]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8卷，第1册，第4页。《美国史》，第4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31] 《林肯传》，第8卷，第316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108页，约翰·海伊著。——原注

[32] 事实上，联邦党为了将共和党人和“主战民主党人”联合起来，提名了林肯。譬如，民主党人安德鲁·约翰逊被提名为副总统。但在国民大会中，共和党人占了上风。——编者注

[33] 《美国史》，第4卷，第461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34] 《林肯传》，第9卷，第59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35] 《萨蒙·P.蔡斯传》，第684页，罗伯特·沃登著。——原注

[36]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2卷，第33页，第44页，第46页。——原注

[37] 《在白宫的六个月》，第30页，弗朗西斯·斯卡彭特著。——原注

[38]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2卷，第25页。——原注

[39] 《林肯全集》，第2卷，第533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40] 《讲稿》，第190页，注释一，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一部分激进的共和党人虽然支持林肯，但在1864年5月31日的克利夫兰集会上，提名约翰·C.弗里蒙特为总统。然而，约翰·C.弗里蒙特后来退出。1864年6月7日，在巴尔的摩举行的联邦党会议上，林肯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编者注

第10章　失望背后的胜利曙光：莫比尔湾战役

波托马克军留在了詹姆斯河。尤利西斯·S.格兰特原本希望消灭里士满以北的罗伯特·E.李的大军，或给罗伯特·E.李致命一击，但失败了。现在，他决定将军队转移到詹姆斯河南岸，将南方邦联军围困在里士满。1864年6月12日，北方联邦军开始行动。1864年6月16日，北方联邦军顺利转移[1]。此次行军中，北方联邦军行动神速，工兵架桥技术熟练，渡河秩序井然有序。波托马克军就像一台精良的机器，即使出现故障，也能有效运作。罗伯特·E.李预料到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行动，但没有采取任何阻止措施[2]。然而，尤利西斯·S.格兰特打算攻占彼得斯堡，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毫无疑问，很快，北方联邦军就能攻克里士满。如果一切安排妥当，计划执行顺利，北方联邦军可能已经占领里士满，抵达阿波马托克斯河。

好机会稍纵即逝[3]。当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乔治·米德到达战场时，看到南方邦联的防御工事守卫森严。1864年6月17日到1864年6月19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下令连续进攻，但依然没有攻克彼得斯堡，损兵近一万人。在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查尔斯·A.达纳的通信中，记录了彼得斯堡战役的结果。查尔斯·A.达纳写道："尤利西斯·S.格兰特已经下令放弃进攻。他现在要考虑大局。"尤利西斯·S.格兰特写道："我命大军休整数日。将士们急需休息。"[4]

波托马克军已经疲惫不堪。将士们连续战斗了四十五天，一直处在劣势，没有获得任何胜利。此外，频繁的夜间行军令士兵们筋疲力尽，心情沮丧。许多英勇善战的将领倒下了，数以千计的勇士们也倒下了。与冷港战役后相比，军中的士气明显低落了很多。虽然尤利西斯·S.格兰特陆续得到了支援，但大部分援兵是雇佣兵，其中有许多患病、不守纪律或懦弱的人，根本无法保障战事顺利进行。新招募的援兵至少需要数月的严格训练，才能成为合格的士兵。北方联邦军亟须改编重组。与此同时，在彼得斯堡围攻的掩护下，1864年6月18日，北方联邦军开始改编。改编工作在不作战的时间内进行。1865年春，北方联邦军改编结束。

第1节　林肯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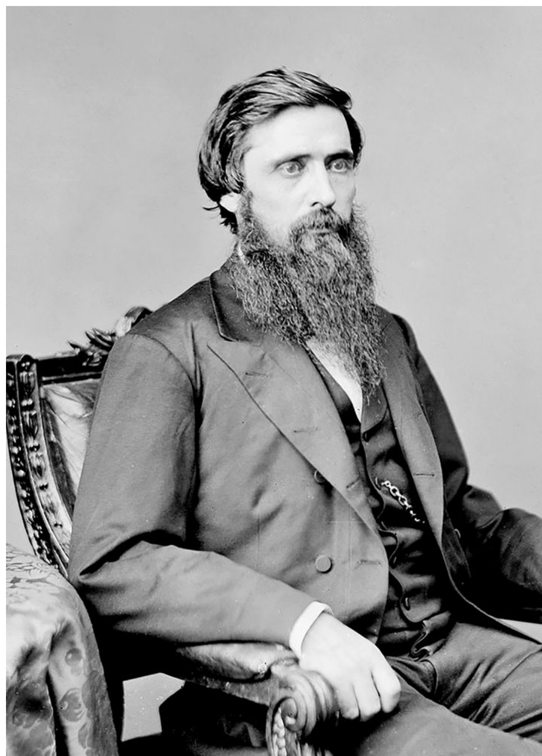
1864年6月20日到1864年6月23日，林肯视察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指挥的北方联邦军。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作战行动失败了，代价惨重[5]。此时，北方联邦军士气低落。很多人认为林肯会与尤利西斯·S.格兰特进行私下会谈，恳请尤利西斯·S.格兰特珍爱士兵们的生命，提醒他国家的艰难处境。然而，林肯从未提出类似的恳请或提醒，也不可能有类似的想法。1864年6月15日，他发给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电报证明了这一点[6]。此后，除了进攻彼得斯堡行动，林肯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虽然攻克彼得斯堡至关重要，但林肯并没有谴责任何人。谈到预期的战斗结果时，林肯提到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善良仁慈。关于对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失望，林肯说："我不能装腔作势地提出建议，但我真心希望战士们能少流一些血，尽快完成任务。"[7]

贺拉斯·波特对林肯的此次视察做了有趣的描述："波托马克军士气低落，很快影响了全国人民的情绪。但此时，有人一心想着视察。林肯骑着马，头戴一顶高高的礼帽，身着一件双排扣大衣和一条黑色长裤，与尤利西斯·S.格兰特并肩而行。在一群穿着军装、戴着肩章的军官中，出现了一位骑着马的平民，显得很突兀。林肯虽然精于马术，但看起来有些笨拙。他风尘仆仆，就像一个穿着节日盛装的乡野村夫骑马进城一样。"但林肯的和蔼可亲消除了士兵们对他奇怪形象的印象。队伍中传出"亚伯大叔[8]和我们在一起"的欢呼，随后，士兵们发自内心的欢呼声和呐喊声响起。林肯视察了一支黑人军队。在进攻彼得斯堡时，黑人士兵们表现英勇，荣获胸章。他们围着解放了自己的白人总统，亲吻他的双手，触摸他的衣服[9]，欢呼雀跃，喜笑颜开，唱着赞歌，高呼："上帝保佑林肯！""耶和华知道亚伯拉罕！""好日子来了，神啊！"林肯大脑一片空白，眼里充满泪水，泣不成声。即使在最感人的时刻，林肯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幽默感。1864年6月20日夜晚，林肯和一群副官坐在将军帐篷里。他滔滔不绝地讲着，认真分析当前的形势。副官们的赞赏和笑颜使林肯深受鼓舞。



林肯视察军队，与军官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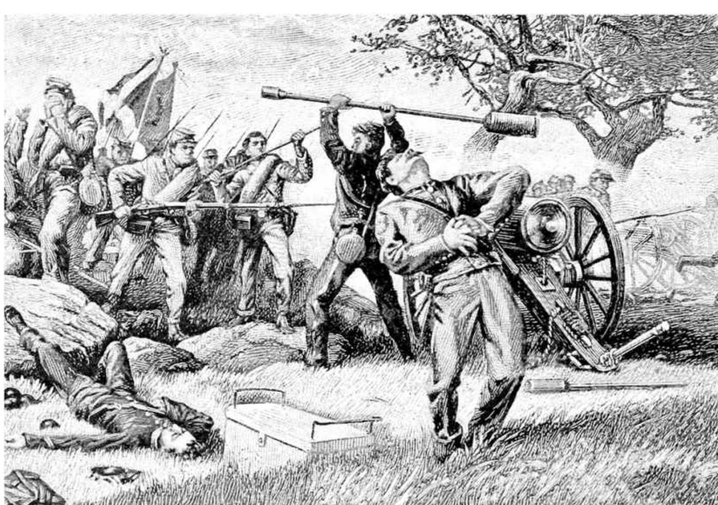
据我所知，很少或根本没有证据表明，当尤利西斯·S.格兰特渡过拉皮丹河时，由于希望落空，他变得灰心丧气。尤利西斯·S.格兰特拥有刚毅的性格、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决心，从来不承认失败。此外，他坚定的眼神足以说明一切。尽管如此，失望带来的痛苦让他重新拿起了酒杯。约翰·罗林斯见过尤利西斯·S.格兰特后，告诉詹姆斯·威尔逊，必须全力以赴“阻止尤利西斯·S.格兰特堕落” [10] 。围攻彼得斯堡的沉闷时光里，作为一名忠诚的导师和坚定的爱国者，尤利西斯·S.格兰特为国家做出了他人无法做到的贡献。约翰·罗林斯在写给妻子的信件中，表达了他对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担忧及他对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积极影响。约翰·罗林斯说，尤利西斯·S.格兰特两次 [11] “偏离了正轨” [12] 。然而，最后一次偏离“正轨”后，尤利西斯·S.格兰特打起精神，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重新对彼得斯堡发起围攻，攻克了彼得斯堡，迫使南方邦联军撤离，最终挫败了罗伯特·E.李的大军，征服了南方邦联。



约翰·罗林斯（1831—1869）

第2节　华盛顿岌岌可危

然而，目前，罗伯特·E.李正在奋力作战。打败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几次战役让他倍受鼓舞，认为南方邦联军虽然兵力减弱，但足以对抗受到重创的波托马克军。他派出朱巴尔·厄尔利和几个兵团，将北方联邦军赶出了谢南多厄河谷。朱巴尔·厄尔利找到了一条从谢南多厄河谷通往马里兰州和华盛顿后方的捷径。1864年7月9日，他率军到达弗雷德里克市，击败了当地的北方联邦军[13]。1864年7月10日，他站在两万多名老兵面前，得意地看着缴获的战利品。随后，他迅速向华盛顿进发。华盛顿及其防御工事中的军队都被派去增援尤利西斯·S.格兰特了。现在，驻守华盛顿的只有无效兵、州民兵和哥伦比亚特区的志愿兵，共计两万零四百人，大都没有作战经验，无法保卫首都。1864年7月11日上午，朱巴尔·厄尔利率步兵和炮兵来到华盛顿北边的第七大道。他的面前是华盛顿的防御工事，远处是国会大厦的圆顶。南方邦联军切断了华盛顿与北方城市间的通信，民众变得躁动而惊慌。林肯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1864年7月10日夜晚，他依旧骑马去了自己的夏天住所——士兵之家。士兵之家是南方邦联军行军必经之地。在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的一再坚持下，林肯回到了华盛顿城内。此外，林肯不知道的是，一旦华盛顿沦陷，海军副部长古斯塔夫斯·福克斯就会将他送出城。朱巴尔·厄尔利如果抓住时机，利用华盛顿人民的惊慌，就能在1864年7月11日攻进华盛顿，缴获国库中的钱财及大批衣物、武器和弹药，破坏联邦政府的财产。他即使无法占领华盛顿，也能在北方联邦军赶来救援前，安然无恙地逃离，给联邦政府造成致命一击。



朱巴尔·厄尔利进军华盛顿，图中发生在纽马基特的战斗

波托马克军队第六军团和新奥尔良第十九军团的老兵保卫了华盛顿。然而，尤利西斯·S.格兰特不相信华盛顿陷入了危险，而里士满安然无事 [14] ，更不相信保卫华盛顿的行动如此迟缓。当时，北方联邦军的指挥官显得不知所措。相关信件表明，尤利西斯·S.格兰特虽然非常勤勉，但一直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他已经不是在多纳尔森堡战役、维克斯堡战役和查塔努加战役中当机立断、目标明确的指挥官了，而是在夏洛战役中玩忽职守、萎靡不振的将军。当朱巴尔·厄尔利率军沿着谢南多厄河谷行军时，他不相信北方联邦军已经离开彼得斯堡。直到1864年7月5日，他才认清了事实。同时，他并没有掌握全局。吉迪恩·韦尔斯写道："他几乎没有什么应对之策。"[15]

然而，朱巴尔·厄尔利迟迟未动，错失了良机。尤利西斯·S.格兰特及时采取行动，挽救了华盛顿。朱巴尔·厄尔利猜测北方联邦军已经抵达华盛顿，因为南方邦联军一直没有攻克斯蒂文斯堡。斯蒂文斯堡是从第七大道进入华盛顿的关卡。朱巴尔·厄尔利本来可以轻易攻克斯蒂文斯堡。1864年7月11日正午，由霍雷肖·G.赖特指挥的锡蒂波因特第六军团的两个师抵达华盛顿码头。1864年7月11日下午4时左右，北方联邦军到达斯蒂文斯堡附近。华盛顿化险为夷。1864年7月12日，华盛顿附近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小规模战斗。林肯站在堡垒上看着战事，显然忘记了神枪手百步穿杨的子弹，直到他身边的一名军官中弹倒下。霍雷肖·G.赖特坚决要求林肯退到安全的地方。1864年7月12日夜晚，南方邦联军撤退。

古斯塔夫斯·福克斯写道："南方邦联军落荒而逃，得到的战利品是开战以来最多的。南方邦联军的此次进攻意在打垮尤利西斯·S.格兰特。但尤利西斯·S.格兰特沉着冷静，没有被打垮。虽然华盛顿遭袭令人羞愧，但并未影响前线的战事。战争结果是肯定的。"[16]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尤利西斯·S.格兰特充满信心。进攻彼得斯堡的战役伤亡惨重，北方人民非常不满。南方邦联军进攻马里兰州，华盛顿四面楚歌，人民的不满日益加重。按照惯例，一定会有人提议罢免尤利西斯·S.格兰特，但我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此外，我认为林肯从未想过罢免尤利西斯·S.格兰特。事实上，没有人可以接替尤利西斯·S.格兰特。尤利西斯·S.格兰特不需要为自己的过失找借口，因为就目前的军事能力来说，他是所有将领中最适合指挥北方联邦军的人。显而易见，林肯对他充满信心。1864年7月到1864年8月，尤利西斯·S.格兰特战败时，有人向林肯施压，要求让乔治·B.麦克莱伦重掌军队指挥权，认为林肯会欣然罢免尤利西斯·S.格兰特，任命乔治·B.麦克莱伦，或更换主将会对北方联邦大业有好处的想法，都是无稽之谈 [17] 。



霍雷肖·G.赖特（1820—1899）

1864年7月18日，根据1864年7月4日通过的《国会法案》[18]，林肯发布公告，招募五十万名志愿兵。在很大程度上，征兵公告的通过受到威尔德内斯战役、斯波特瑟尔韦尼亚战役和冷港战役的损失的影响。此外，林肯下令，征兵工作从1864年9月5日开始，以便填补空缺的兵力。

第3节　对尤利西斯·S.格兰特感到失望

1864年7月，北方人民忧心忡忡。每个人都在问：“尤利西斯·S.格兰特开战时的满怀希望已经奄奄一息，谁将重新点燃希望之光？”了解局势的人显得格外沮丧。

1864年7月2日通过的国会决议具有《旧约》中的希伯来人或英国内战中的清教徒的典型特征。该决议要求林肯“指定一天忏悔和祈祷”，并要求人们“在日常礼拜的场所集合”，以便“承认并忏悔自己的各种罪恶，祈求万能之主的怜悯与宽恕，祈求上帝迅速平定眼下的乱局”，并“祈求上帝不要摧毁美国民族”。林肯对决议中“表达的忏悔和虔诚之情……产生了共鸣”，规定1864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四“为举国忏悔和祈祷的日子”。

托马斯·A.斯科特随时准备为联邦政府效力。现在，他亲自来到华盛顿，交出了宾夕法尼亚铁路。他从费城发电报给埃德温·斯坦顿说：“公众冷漠得可怕。”[19] 人们非常怀疑联邦政府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和经费征服南方。黄金价格的波动可以衡量国家的财务状况。1864年1月2日，纽约的黄金价格是一百五十二美元每盎司，1864年4月，黄金价格达到一百七十五美元每盎司。财政部长萨蒙·P.蔡斯试图通过出售约一千一百万美元黄金的方式，压低黄金价格，但只能解燃眉之急。黄金价格很快回升。1864年6月17日，黄金价格上升到一百九十七美元每盎司。林肯批准了一项国会法案，旨在防止投机活动的发生。结果，该法案的效果与人类阻止洪水泛滥的效果类似。控制黄金价格的法案颁布后，投机活动愈演愈烈。由于战场上的失利，萨蒙·P.蔡斯辞去了财政部长一职。1864年6月的最后一天，黄金价格攀升至二百五十美元每盎司。1864年7月2日，控制黄金价格的法案被废除。1864年7月11日，朱巴尔·厄尔利兵临华盛顿，城内的通信被切断。与此同时，黄金价格达到了二百八十五美元每盎司，创下了战时以来的最高价。1864年7月12日，斯蒂文斯堡附近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关于华盛顿沦陷的谣言在费城兴起，黄金价格为二百八十二美元每盎司，流通中的纸币价值不到四十美分。政府以纸币形式出售债券，联邦各州用黄金支付了15%的贷款。此时，黄金价格为二百五十美元每盎司。在1864年7月和1864年8月的大部分时间里，黄

金价格为二百五十美元每盎司或更高。尽管如此，财政部依然可以筹到钱。持续发行法定纸币导致了通货膨胀。商人的生意虽然不平稳，但依然有利可图。我们现在的财富大都源于1863年和1864年的商业活动。交易很容易达成，大多数人使用的是现金，从事贸易或制造业的人越来越富有。资产的价值主要依赖一个稳定的政府，因此，联邦政府只有拥有大量储备资金，才能在危机时刻维系政府。目前，德意志人大量购买美国债券，增加了北方人的信心。

第4节　招兵

然而，兵力问题越来越突出。美国虽然移民人数众多，但劳动力稀缺。移民的生活费用很高，但收入非常可观。1861年和1862年，自愿入伍的人越来越少，因此，北方联邦军的补充兵力大多是雇佣军。大多数雇佣军是欧洲移民或加拿大壮汉，为了钱自愿参军。然而，联邦政府依然很难招募到足够的强健兵力。北方联邦军现有兵力包括退伍军人、威廉·T.谢尔曼的军队和其他军官率领的军队及出身上层阶级的西部各州民兵。西部各州民兵本来都是家兵，现在积极投身保卫华盛顿的战事中。目前，北方联邦军的伤亡人数几乎让所有家庭悲伤不已，加剧了人们的失落感和沮丧感 [20] 。

第5节　约瑟夫·E.约翰斯顿和约翰·B.胡德

威廉·T.谢尔曼的行动未能驱散北方人的消沉情绪。他的军事行动虽然都成功了，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此外，他的行动虽然有助于打败约瑟夫·E.约翰斯顿，攻克亚特兰大，但目前为止，亚特兰大依然没有被攻克。1864年7月17日，威廉·T.谢尔曼率军渡过查特胡奇河，直逼亚特兰大 [21] 。与此同时，杰斐逊·戴维斯下令罢免了约瑟夫·E.约翰斯顿 [22] 。罢免令中写道："北方联邦军已经抵达亚特兰大附近，你却未能阻止……无法相信你能打败或击退北方联邦军。" [23] 实际上，杰斐逊·戴维斯的罢免令帮了威廉·T.谢尔曼，正中威廉·T.谢尔曼及其将士们的下怀。约瑟夫·E.约翰斯顿的撤退计划非常高明。南方邦联军的新任指挥官是约翰·B.胡德。在西点军校时，詹姆斯·B.麦克弗森、约翰·斯科菲尔德和奥利弗·霍华德已经与约翰·B.胡德相识，他们与威廉·T.谢尔曼都非常了解约翰·B.胡德。"换人意味着要开战了。" [24] 罢免约瑟夫·E.约翰斯顿的必然结果是，南方邦联军必须进攻。约翰·B.胡德毫不迟疑，顺应杰斐逊·戴维斯的意愿，发起了三次进攻 [25] ，并发动了一场战役。在三次进攻中，南方邦联军都被击退，伤亡惨重。约翰·B.胡德发起的第二次进攻在亚特兰大，战场距亚特兰大城二点五英里。南方邦联军进攻猛烈，作战灵活，突袭了北方联邦军的后方，引起了北方联邦军的恐慌。但田纳西州军越过南方邦联军的防护墙，从后面突袭了过来。不幸的是，田纳西州军的指挥官詹姆斯·B.麦克弗森阵亡。詹姆斯·B.麦克弗森刚刚与威廉·T.谢尔曼分开，前去查看后方开火的原因，进而做出应战部署。他下了几道命令后，独自骑马进入一片树林，但遇到了一支南方邦联游击队。南方邦联兵要求他投降，他打算策马逃走，却见南方邦联军子弹齐发，最终坠马牺牲。威廉·T.谢尔曼发电报说："詹姆斯·B.麦克弗森的突然离开对我打击很大。" [26] 詹姆斯·B.麦克弗森的牺牲，加上南方邦联军声称自己获胜，无疑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人们的质疑，即1864年7月到底发生了什么。无论如何，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在亚特兰大战役前，威廉·T.谢尔曼已经失败。实际上，约翰·B.胡德的军队遭到了重创。第三次进攻结束后的一个多月里，他一直没有再次发动进攻。



约翰·B.胡德（1831—1879）

第6节　渴望和平

在一些渴望和平的地方，人们显得非常冷漠和沮丧。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写道：“商人们渴望和平”。1864年7月，贺拉斯·格里利认为应该进行和平谈判。在林肯的委托下，他为和平谈判四处奔走。林肯愿意在“恢复联邦和废除奴隶制”的基础上，实现和平。两名希望停战的使者自发前往里士满，面见了杰斐逊·戴维斯。然而，他们的努力毫无结果[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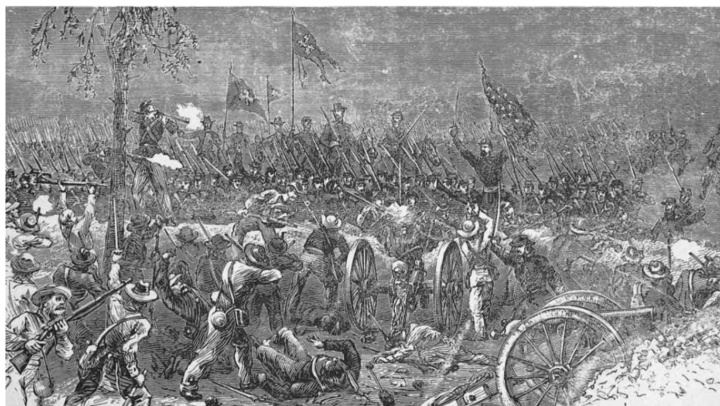
虽然战况令人窒息，但北方的不幸仍然没有结束。北方联邦军本来打算炸毁南方邦联军的一部分防御工事，进而攻克彼得斯堡，但因一名无能的军团指挥官和一名不称职的师长的失误[28]，军队在爆炸[29]成功后错失了时机，死伤惨重[30]。这次失误无可争辩，大大加重了波托马克军和北方人民的沮丧感。1864年8月1日，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在写给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的信中写道：“近来，我的心情非常低落。战争带来的期待与焦虑压抑着我。我无法思考。”[31]

第7节　对林肯的不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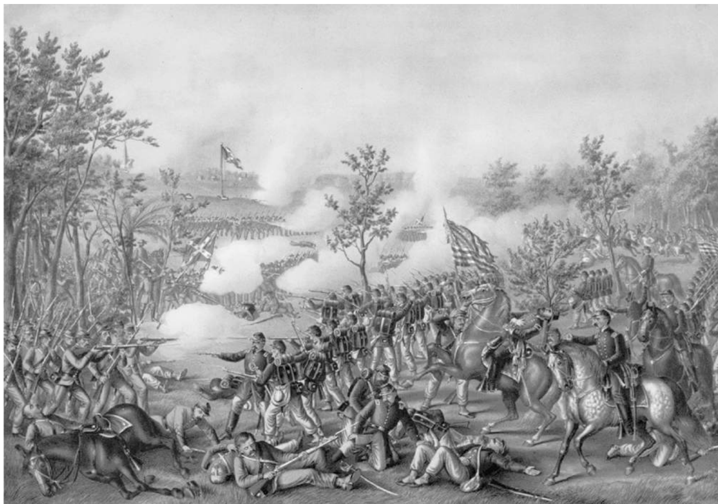
人们对林肯的不满越来越明显，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沮丧。1864年8月9日，贺拉斯·格里利在写给林肯的信中说：“我恳求您即刻和平解决争端。如果不能达成和平协议，同意停战一年也可以。”在信中，贺拉斯·格里利表达了很多人的想法。1864年8月18日，他写道：“林肯已经失败了，不能连任总统。我们必须重新起草一份总统候选人名单，避免联邦政府被彻底推翻。”纽约、波士顿和西部各州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坚持认为，林肯应该退出，让位给其他候选人。他们的观点感染了共和党全国执行委员会。1864年8月22日，共和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亨利·雷蒙德写信给林肯说：“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只有政府采取最坚决果断的行动，才能使国家避免落入南方邦联军手中……人民情绪激动是因为战场上的失利。”此外，只要林肯以废除奴隶制为前提发动战争，就不会得到和平。共和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非常恐慌，前往华盛顿恳求林肯。1864年8月25日，在写给约翰·海伊的一封私人信件中，约翰·尼古拉记录了此行的情况：“纽约的政界人士蜂拥至华盛顿，似乎要淹没一切。亨利·雷蒙德和全国委员会成员今天都在这里。亨利·雷蒙德认为，里士满的委员会是我们唯一的救命稻草。然而，林肯认为里士满的委员会会坏事。此事正在商议中，软弱的傻瓜们……正在争取一位新的候选人，从而取代林肯。到处都充斥着黑暗、怀疑和沮丧。”[32] 林肯认为自己“非常有可能”落选，但并不打算退出，并声明会在坚持“重建联邦和废除奴隶制”的基础上，调整政策，争取和平。他确信奴隶制不会永远存在，逐渐解放奴隶势在必行[33] 。



约瑟夫·胡克在皮奇特里溪附近视察



皮奇特里溪之战



詹姆斯·B.麦克弗森在亚特兰大之战中阵亡



以斯拉教堂之战

约翰·海伊来到西部后，发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事。在伊利诺伊州，他给约翰·尼古拉写了一份私人信件，详细描述了伊利诺伊州的民心。他写道："全国上下，我指的是农村地区，人们都非常支持联邦，希望北方联邦军获胜。但在城市中，一些'铜头蛇' [34] 欢欣鼓舞。我们的人民不是咆哮沮丧，就是默默懊悔。" [35]

约翰·尼古拉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写道："在南方邦联军虚无缥缈的影子中，我们的士兵看到了巨人，准备不战而降。" [36] 民主党人并没有

提名总统候选人，因此，竞选并不激烈。约翰·海伊写道："我们饶有兴趣地等待着，希望芝加哥孵化出一条和平的大蛇。"[37] 他指的是即将召开的民主党大会。1864年8月29日，民主党大会提名乔治·B.麦克莱伦为总统候选人，并通过了一项致力于和平事业的决议。乔治·B.麦克莱伦的提名激起了民主党人的热情，但令共和党人忐忑不安。林肯用一个比喻句表达了对胜利的渴望。他给尤利西斯·S.格兰特发电报说："继续让斗牛犬抓住它，撕咬它，让它窒息。"[38] 最终，他的愿望实现了。北方联邦海军和陆军的两名指挥官比任何演说家都出色。

第8节　莫比尔湾战役

1864年8月5日，戴维·法拉格特打响了莫比尔湾战役。他打算进入莫比尔湾，但必须穿过一条据称埋着鱼雷的海峡，绕开火力充沛的摩根堡，然后与铁甲舰“田纳西”号交战。舰队前行时，一艘铁甲舰下的水雷爆炸了。舰艇“瞬间消失在了海浪里。海浪卷走了英勇的指挥官和几乎所有船员。” [39] 戴维·法拉格特称其为“灭顶之灾” [40] 。往前是水雷，往后是撤退。戴维·法拉格特祈祷道：“赐予我们生命和理智的上帝啊，请告诉我我怎么办。我应该继续前行吗？”他说：“似乎有个声音在命令我‘前进！’” [41] 他命舰队继续前进，避开了水雷，绕过了摩根堡。“田纳西”号袭击了他的舰队。在一场“生死搏斗”后，“田纳西”号拔下军旗，投降了。戴维·法拉格特将莫比尔湾战役称为“我生命中赢的最辛苦的一场战役”。阿尔弗雷德·T.马汉写道：“这场无与伦比的胜仗让戴维·法拉格特成了莫比尔湾的英雄。”1864年8月8日到1864年8月23日，盖恩斯堡和摩根堡相继投降。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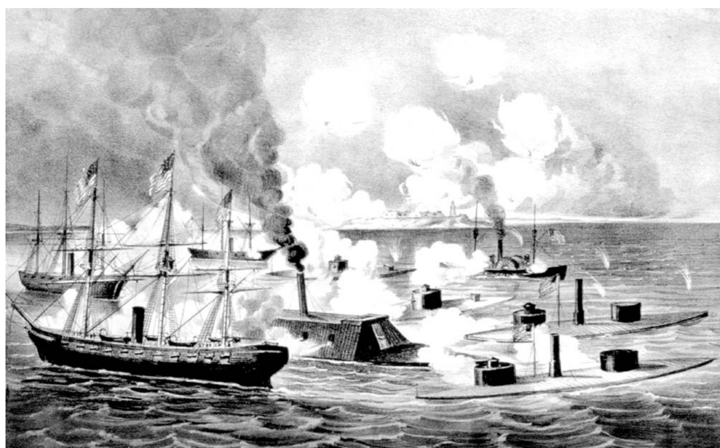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在墨西哥湾，南方邦联最重要的港口依然是莫比尔湾，但北方联邦军打破了其封锁。南方邦联通往外界的另一扇门关闭了。北方联邦海军不断封锁和占领南方邦联的各个港口。南方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第9节　攻占亚特兰大

北方人意志消沉，并没有意识到莫比尔湾战役的重要性。1864年9月3日，威廉·T.谢尔曼攻占亚特兰大的消息传来[43]，戴维·法拉格特的胜利显得更加鼓舞人心。离开查塔努加后，占领亚特兰大是威廉·T.谢尔曼最辉煌的一刻，因为“全师返回的胜利是双倍的胜利。”进入亚特兰大的军队人数与离开查塔努加时的军队人数基本相同。



莫比尔湾战役



莫比尔湾战役中联邦铁甲舰与邦联单桅帆船交战

1864年9月3日，林肯发布公告，要求下周日人们齐聚教堂时，“虔

诚感谢至高无上的上帝”，感谢上帝让北方联邦舰队获胜，让佐治亚州的北方联邦军取得辉煌成就。林肯向戴维·法拉格特和威廉·T.谢尔曼表达了感谢，命海军工厂和军火库鸣炮庆祝。在林肯指定的星期天，人们齐聚教堂，感谢上帝，相互鼓励。

模仿警句简练的笔调，人们将民主党纲领中的和平条款简化成了：通过四年内战，恢复联邦的大业失败。此刻，人们很高兴戴维·法拉格特和威廉·T.谢尔曼摧毁了民主党纲领的基础[44]。1864年9月9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一封信被公之于众。他在信中说：“现在，叛军几乎无人可用……为了补充军力，他们连摇篮和坟墓都不放过。除了在一系列小规模冲突和战斗中失去的军力，他们每天至少会因逃亡或其他原因损失一个团。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叛军的末日就不远了。”



威廉·T.谢尔曼指挥联邦军围攻亚特兰大

1864年9月上旬，佛蒙特州和缅因州的选举表明，人民对联邦政府的不满已经消散。1864年11月的选举结果对林肯十分有利。

第10节　菲利普·谢里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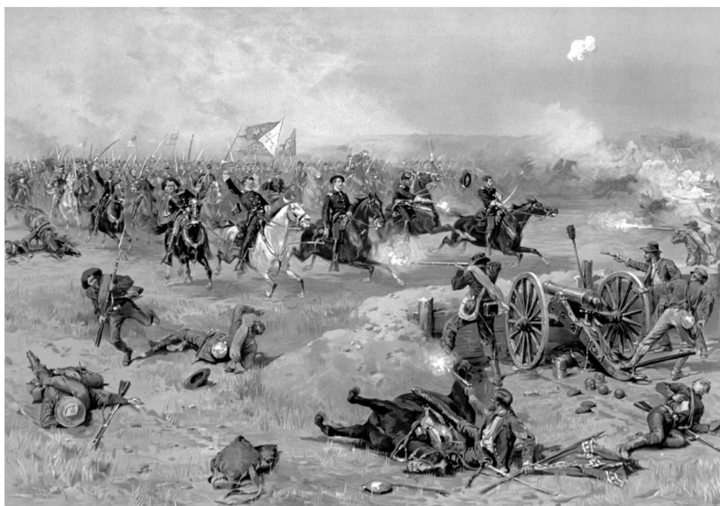


菲利普·谢里登（1831—1888）

1864年9月15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前去看望谢南多厄河谷的菲利普·谢里登，并命令他“进攻”。不到一个星期，菲利普·谢里登两次大胜朱巴尔·厄尔利[45]。他的胜利让人们想起了1862年的“石墙”托马斯·J.杰克逊。但现在，欢呼雀跃的是北方人，因为他们的指挥官勇猛谨慎，在谢南多厄河谷取得了胜利。谢南多厄河谷的胜利是北方人渴望已久却又意想不到的。曾经，谢南多厄河谷令北方人感到绝望，为南方邦联军打开了入侵门户。菲利普·谢里登在信中讲述了南方邦联军的失败，写道：“人们握手欢呼，彼此说着‘获胜了！我们胜利了！’”然而，胜利的一方无意停战。

1864年10月11日，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举行了选举。俄亥俄州以五万四千七百五十一的多数票支持联邦政府。印第安纳州选举奥利弗·P.莫顿为州长，票数比奥利弗·P.莫顿的民主党对手多两万零八百八十三票。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都争取到了国会的席位。选举表明，林肯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局势已经发生变化。现在，菲利普·谢里登的胜利加速了局势的变化。1864年10月19日，他再次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激发了人民支持林肯的热情。托马斯·布坎南·里德写了《菲利普·谢里登之行》一诗。詹姆斯·E.默多克在许多集会场合朗诵了这首诗，不仅为林肯赢得了选票，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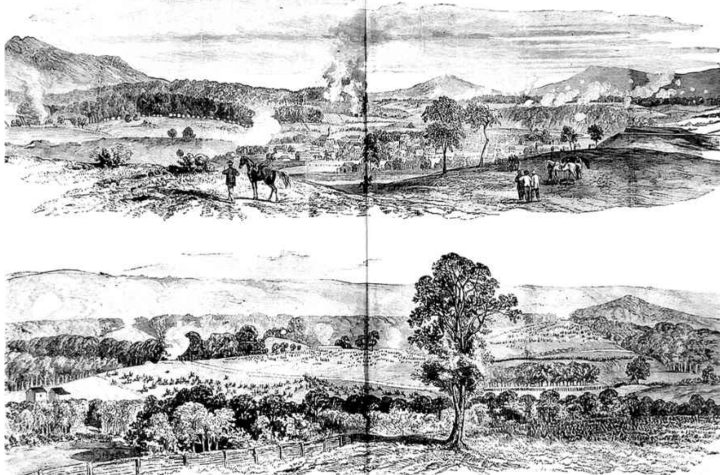
[46] 。林肯给菲利普·谢里登发电报说："我很高兴代表全国人民向您和您勇敢的军队表示感谢，也以个人名义对你们在谢南多厄河谷作战表达钦佩和感激，尤其是1864年10月19日的战役。"[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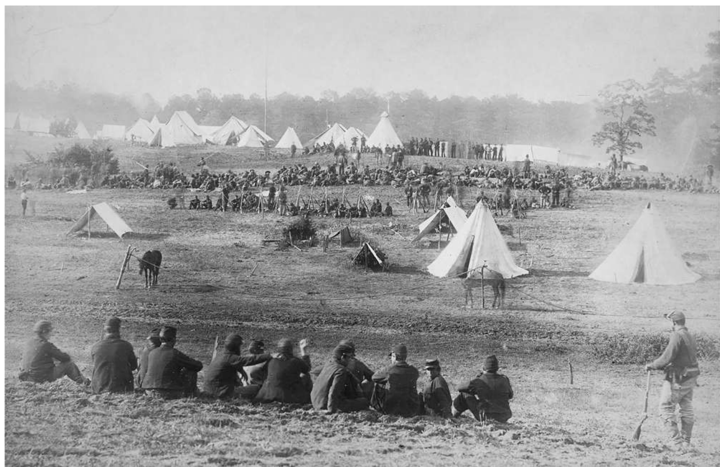
温彻斯特战役，菲利普·谢里登率联邦骑兵冲锋



温彻斯特战役中联邦军展开进攻



费希尔山战役



费希尔山战役中被俘的邦联军

第11节　林肯再次当选总统

1864年11月8日，总统选举开始。林肯获得了二百一十二张选票，乔治·B.麦克莱伦只获得了来自新泽西州、特拉华州和肯塔基州的二十一张选票。在纽约州，两人票数接近。在两次普选中，林肯获得了四十九万四千五百六十七票的多数票。此外，支持林肯的党派占据了众议院三分之二的席位。拉多夫·沃尔多·爱默生写信告诉朋友："我给你带来了选举的好消息。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获得这么多选票。我想，历史上可能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48] 尤利西斯·S.格兰特"深感此次选举意义重大。选举活动进行得平静而有序。"约翰·海伊说："整个选举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流血事件或骚乱。因此，我们的自由制度是有价值的，我们有能力维持自由制度，绝不会让国家沦落到无政府状态或专制状态。" [49]

林肯第一次当选总统时，北方人民明确表示反对奴隶制。北方人如果一直坚持自己的崇高理想，此刻就不能回头，必须笃定地前进。虽然赋税繁重，战事连连，百姓深受战乱之苦，但1864年的大选那天，北方人民决定坚持自己的理想。

[1] 1864年6月12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率十一万五千人从冷港出发，前往詹姆斯河。1864年6月14日到1864年6月15日，北方联邦军通过桥梁和轮船渡河。罗伯特·E.李非常震惊。《个人回忆录》，第2卷，第288页到第290页，尤利西斯·S.格兰特著。——编者注

[2] 《罗伯特·E.李致杰斐逊·戴维斯的密函（1862—1865）》，1915年，第227页。——原注

[3] 1864年6月15日，由于指挥混乱，北方联邦军未能向彼得斯堡发动进攻。占据兵力优势的皮埃尔·博勒加德防御森严。许多权威文献都认为，北方联邦军应该立即攻克彼得斯堡。尤利西斯·S.格兰特也深以为然。《个人回忆录》，第2卷，第293页到第294页，尤利西斯·S.格兰特著。——编者注

[4]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0卷，第1册，第14页，第25页。——原注

[5] 一些人因损失惨重责备尤利西斯·S.格兰特，但显而易见，与之前的战役相比，尤利西斯·S.格兰特一直紧逼并用策略击败了南方邦联军。北弗吉尼亚军是尤利塞斯·S.格兰特大军的坚实后盾，直到战争结束都一直如此。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目标是打败并击垮罗伯特·E.李的军队。——编者注

[6] 参见第九章。——原注

[7] 《与尤利西斯·S.格兰特共进退》，贺拉斯·波特著。——原注

[8] “亚伯大叔”是战士们对林肯的一种称呼。——译者注

[9] 黑人认为林肯的美德藏在衣服里。——原注

[10] 《老旗帜之下》，第1卷，第137页，詹姆斯·威尔逊著。——原注

[11] 指1864年6月29日和1864年7月末的某一天。——原注

[12] 《约翰·罗林斯传》，詹姆斯·威尔逊著；《从查塔努加到彼得斯堡》，威廉·F.史密斯著。——原注

[13] 在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市以南发生的莫诺卡西河战役中，朱巴尔·厄尔利打败了卢·华莱士。但在一定程度上，卢·华莱士拖延了南方邦联军，为华盛顿的守军提供了更多准备时间。——编者注

[14] 尤利西斯·S.格兰特离里士满只有几英里，只要打败罗伯特·E.李的军队，里士满就会沦陷。——编者注

[15]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2卷，第68页。——原注

[16] 《约翰·默里·福布斯的书信回忆录》，第2卷，第99页，萨拉·F.休斯著。——原注

[17]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7卷。《美国史》，第4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的日记》，第2卷。《乔治·米德传》，第2卷。《自传简述》，朱巴尔·厄尔利著。——原注

[18] 《国会法案》废除了三百美元的豁免条款。豁免条款是引起纽约征兵暴动的主要因素。《国会法案》规定，只要一个人应征入伍，就必须服役或有人代替。——原注

[19]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7卷，第2册，第255页。——原注

[20]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7卷。《美国史》，第4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21] 1864年7月7日，威廉·T.谢尔曼率军渡过查特胡奇河，而非1864年7月17日。——编者注

[22] 1864年7月17日，杰斐逊·戴维斯下令罢免约瑟夫·E.约翰斯顿。——编者注

[23] 《约瑟夫·E.约翰斯顿记事》，第349页。——原注

[24] 《威廉·T.谢尔曼将军回忆录》，第2卷，第72页。——原注

[25] 南方邦联军在亚特兰大附近的三次进攻分别是：1864年7月20日在皮奇特里溪、1864年7月22日在亚特兰大和1864年7月28日在以斯拉教堂。——编者注

[26]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8卷，第5册，第240页。——原注

[27] 《美国史》，第4卷，第513页到第516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28] 此处的军团指挥官是安布罗斯·伯恩赛德，师长是詹姆斯·H.莱德利。——编者注

[29] 指1864年7月30日的“火山口”事件。——编者注

[30] 两万北方联邦军折损三千七百九十三人。参见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116页。南方邦联军折损一千五百人，包括爆炸时死

亡或被俘的二百七十八人。参见《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0卷，第1册，第788页。——编者注

[31] 《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的书信》，第1卷，第339页。——原注

[32] 《林肯的个人特质》，第306页，海伦·尼古拉著。——原注

[33] 《美国史》，第4卷，第513页到第522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34] “铜头蛇”是民主党人的俗称。《美国史》，第4卷，第224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35] 《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219页，1864年8月25日，约翰·海伊著。——原注

[36] 《林肯的个人特质》，第306页，海伦·尼古拉著。——原注

[37] 《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219页，约翰·海伊著。——原注

[38] 《林肯全集》，第2卷，第563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39] 沉没的铁甲舰是“特库姆塞”号。摩根堡在莫比尔湾港口以东，盖恩斯堡在莫比尔湾港口以西。——编者注

[40] 《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1卷，第415页，第417页。——原注

[41] 《戴维·法拉格特传》，第277页，阿尔弗雷德·T.马汉著。——原注

[42] 《北方联邦海军和南方邦联海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21卷，第397页等。《戴维·法拉格特传》，第277页，第10章，阿尔弗雷德·T.马汉著。——原注

[43] 1864年9月1日，约翰·胡德撤出亚特兰大。——编者注

[44] 《美国史》，第4卷，第527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45] 两场战役分别发生于1864年9月10日和1864年9月22日，地点在温彻斯特和费希尔山。——编者注

[46] 1864年10月19日，在谢南多厄河谷米德尔顿附近的锡达克里克，朱巴尔·厄尔利袭击了菲利普·谢里登的军队。菲利普·谢里登迅速集结军队，打败了朱巴尔·厄尔利。——编者注

[47] 《林肯全集》，第2卷，第589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48] 《拉多夫·沃尔多·爱默生回忆录》，第609页，詹姆斯·艾略特·卡伯特著。——原注

[49] 《书信与日记》，第1卷，第249页，约翰·海伊著。——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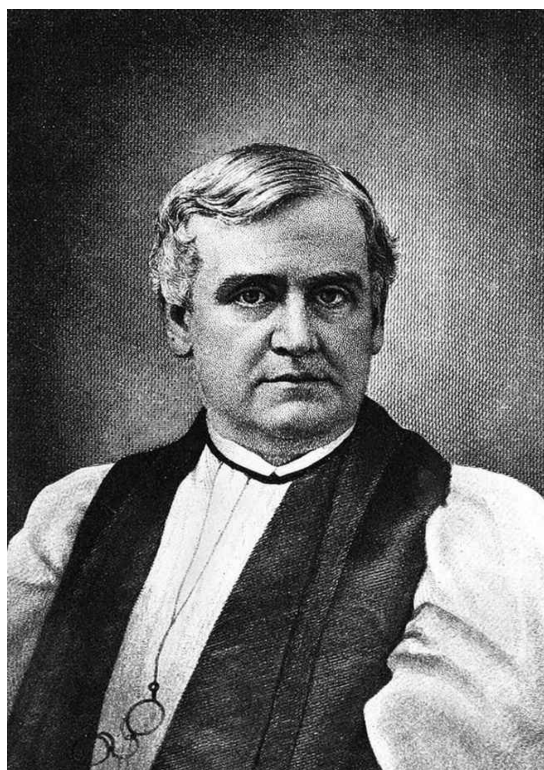
第11章　战场后方的北方人民

第1节　北方的生活

战争期间，北方人的生活与大多数欧洲文明社会相似：商业活动照常进行，各类院校学生满员，信徒按时参加礼拜，人们积极参加娱乐活动，机械工程和艺术不断发展。很多人为提高生活质量或获取知识而努力，名利的追逐并没有局限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然而，战争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并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尤其是战争爆发后的十八个月里。当时，爱国的志愿兵受到了同胞们的热情支持，备受鼓舞。1861年5月，菲利普斯·布鲁克斯感叹道："这场战争怎么样？难道不伟大吗？"直到1862年夏天，人们才注意到了北方联邦军的优秀品质。1862年7月2日，阿萨·格雷写道："我们的大部分士兵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完全有能力在军中度过一年。"1862年8月15日，阿加西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说："率先入伍的是我们最优秀的年轻人。如果人们对优秀的北方联邦军有意见，那么可能是军队带走了当地最优秀的人……乡村地区所有强壮的年轻人都参军了。"[1]

第2节　物资匮乏

战争初期，人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直到1862年秋天。1861年6月29日，在费城，菲利普斯·布鲁克斯写道："费城人越来越穷了"。1862年8月5日，《纽约论坛报》写道："我们的工业已经陷入瘫痪，贸易停滞，财政状况堪忧，铁路运输混乱不堪。"但各类商铺仍在运营，咖啡和糖的价格大幅上涨。因此，一些人将咖啡和烘烤过的蒲公英根茎泡在一起喝，一些人用干玉米或黑麦当早餐，还有一些人用红糖代替了白糖。餐桌上的奢侈品逐渐消失，但几乎没有人因吃得不够丰盛感到羞耻。穿便服成了一种时尚和美德。大部分北方人过着清贫的日子。剧院很少开放，歌剧只能偶尔演出。娱乐活动逐渐平民化，如一场受欢迎的演讲或音乐会，用战役名猜词的教堂联谊活动等。有时，青年男女会聚在一起给伤员包扎伤口，或到附近营地参观志愿兵阅兵典礼。通过娱乐活动，人们暂时忘记了战争带来的痛苦。然而，个人的忧伤加剧了整个国家的焦虑。哈里特·比彻·斯托写道："在许多房间里，生命之光已经熄灭。"



菲利普斯·布鲁克斯（1835—1893）



哈里特·比彻·斯托（1811—1896）

第3节　邮资货币

国家财政状况堪忧，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1862年1月，政府以高价出售黄金，黄金逐渐从流通中消失。此外，因为黄金并没有大量流通，各州的纸币和国家的法定货币储备充足，所以对大众来说，时世并不艰难。然而，随着黄金价格的上涨，银价也随之上涨。银币成为一种投机商品。投资者高价买入银币，将大部分银币运往加拿大。1862年7月1日，银币似乎也从流通中消失了。银币的突然消失催生了一些补救办法。与市政府或国家政府不同，个人采取行动的速度更快，促进了社会的资金流通。个人提供的资金都是面额为五美分到五十美分的小额纸币及用来支付给酒店、餐馆、商业公司和国家经销商的抵金券。不久，商人们发行了一种高额铜钱和镍币，取代了金属代币和小额银币。1862年7月14日，财政部长萨蒙·P.蔡斯在写给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的信中说："除非立即叫停纸币和金属代币的发行，让政府的小额银币继续流通或有其他替代品，否则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和困局。"他提出使面值一美元的银币贬值，或使邮票和其他税票成为合法货币。根据1862年7月17日通过的法案，国会禁止私人公司或个人发行纸币，宣布向公众发放邮票和其他税票，并规定在一定限制条件下，邮票和税票可以用来支付国家税捐，也可以兑现。与私人抵金券相比，公众更偏爱邮票。于是，很多人蜂拥到邮局领取邮票。但邮票很容易丢失，而且背面的黏性较强，质地易损，又小又轻，成了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流通媒介。一方面，由于通用的三美分邮票 [2] 进入了实用的十进位面额体系，在小额交易过程中，找零成了一件麻烦事。当找零的数额较大的时候，两美分、三美分、五美分和十美分的邮票显得不太实用。因此，在出售各种票据的地方，根据不同的情况，小额邮票一般装在标有十美分、二十五美分和五十美分的信封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些麻烦。谨慎的人常常会打开信封，查看信封里的邮票数额是否与封面上写的数额一致。因此，时间一长，邮票会变得残缺不全，无法继续充当邮资。事实证明，邮票是纸币的不良替代品。然而，面对邮票和纸币引发的问题，财政部和市政府几乎同时提供了救济金。

萨蒙·P.蔡斯提议用邮票和其他税票充当流通货币。根据他的提议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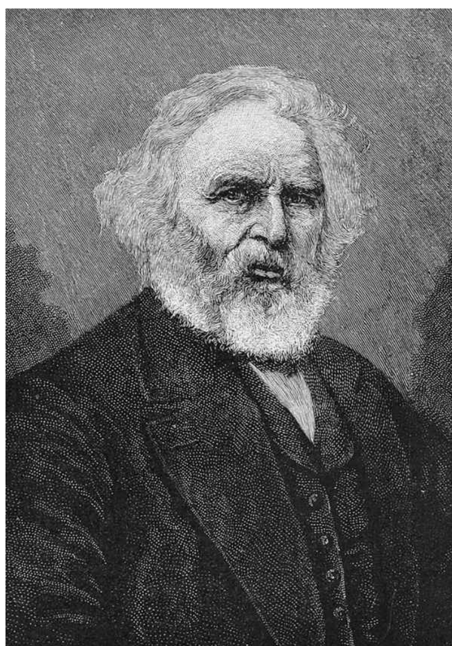
法规条款，政府没有预料到需要提供救济金。根据1862年7月17日通过的法案，萨蒙·P.蔡斯与邮政部长安排了供应邮票的相关事宜。萨蒙·P.蔡斯“很快发现，用作邮资的邮票并不适合流通”，但依然随意阐释法律，并发行了邮资货币。邮资货币票面较小，二十五美分和五十美分面额的票面是一美元钞票的四分之一，五美分和十美分的票面更小。五美分的票面和五美分邮票相同，都印有托马斯·杰斐逊的头像。在二十五美分的票面上，托马斯·杰斐逊的头像被放大了五倍。十美分和五十美分的货币上也有类似的设计。十美分邮票上的图像是乔治·华盛顿的头像。五美分和二十五美分的邮票都是棕色的，十美分和五十美分的邮票都是绿色的。崭新的邮票看起来并不丑。对用惯了纸币、弄脏或弄破过邮票和税票的人来说，邮资货币似乎是一种解脱方式。1862年8月21日，邮资货币开始发行。在纽约和其他城市的助理财务主管办公室，人们焦急地排着队，等着领取新货币。

第4节 辅币

根据1863年3月3日通过的法案，国会决定发行辅币，从而代替邮资货币，并将两种货币的流通数量限制为五千万。虽然新货币的形状大小基本不变，背面的颜色起初是棕色、绿色、紫色和红色，后来，三美分、五美分、十美分、十五美分、二十五美分和五十美分的货币背面都用了绿色。但发行新币时，萨蒙·P.蔡斯没有继续使用邮资货币的拓本。除了海关税，辅币可以用来上缴国家五美元以下的所有税款，也可以兑现，逐渐取代了邮资货币。在流通中，辅币和邮资货币被称为“临时辅币”。一开始，临时辅币就像人们的救命稻草一样，但在流通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破旧、肮脏，甚至引发了清洁和健康问题。人们开始反感临时辅币。临时辅币可以通过邮寄方式流通，也可以用来支付采矿和制造企业中劳动者工资的零头，因此，装进信封的薪金成了分配临时辅币的最好方式。但1876年，当临时辅币逐渐被银币取代，最终从流通中消失时，大多数人显得很高兴。

第5节　北方人的沮丧和绝望

1862年7月到1863年7月，北方人承受了战败带来的巨大痛苦。乔治·B.麦克莱伦在弗吉尼亚半岛的战役中失利，约翰·波普在第二次布尔溪战役中战败，安布罗斯·伯恩赛德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惨遭失败，约瑟夫·胡克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中挫败。一系列不幸事件让北方人倍感失望。虽然安蒂特姆和史东河的局部胜利稍微缓解了人们的沮丧，但累积下来，军队遭遇的惨败足以在精神上击垮任何民族，除非该民族坚强不屈，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1862年9月14日，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在日志中写道："查尔斯·萨姆纳来吃饭的时候，愁眉不展，垂头丧气，不时地叹息道：'可怜的国家啊！可怜啊，真是可怜！'"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北方联邦军不幸战败后，菲利普斯·布鲁克斯在街角握着朋友的手说："难道不是很可怕吗？"然后继续沮丧地前行。被恐惧打败的人愿意付出一切获得和平。当时，联谊会停止了。听闻战败的消息时，人们取消了一切节日娱乐活动，不再在安静的夜晚打牌，也没有心思寻欢作乐，时刻关注着南方战场上的同胞们。他们静静地坐着，想着刚刚结束的败仗。"打开晨报时，有思想的美国人都不愿看到自己热爱和拥护的国家已经彻底失败。"[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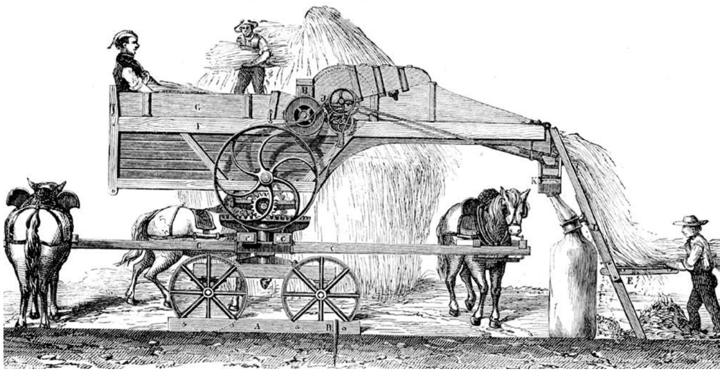
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1807—1882）

第6节　商业活动

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1862年秋天，商业活动开始复苏。从1862年秋天开始，一直到战争结束，北方的贸易活动十分活跃，工厂从未停止运转，人们很容易找到工作，失业人数极少。铁路股票大幅上涨。在纽约市场上，主要商品的价格以纸币计算稳步上涨。生铁通常被视为工业活动的晴雨表。1862年到1864年，生铁产量有规律地增加，价格上涨幅度很大。费城一号无烟煤铸造生铁在1862年、1863年和1864年的平均价格分别为每吨23.87美元、35.25美元和59.25美元。1862年到1864年是一段赚钱和积累财富的时期。1863年5月7日，奥古斯特·贝尔蒙特描述道："人们渴望金钱和财富。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所有阶层的人都将钱投入到了政府发行的证券中。北方呈现出一片团结、繁荣的景象。"哈里特·比彻·斯托说："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哈特福德看起来更昌盛、繁荣、安逸。股票价格再创新高，各行各业生意兴隆，一切都显得非常祥和。"1863年11月，威廉·T.谢尔曼说："所有阶级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尤其是劳动阶级。"

农业是美国发展繁荣的基础。北方稳定增长的农业是美国内战的特征之一。虽然参军人数很多，但农作物的收成依然很好。战争期间，小麦和印度玉米的产量很高，但1863年的印度玉米歉收。爱默生·菲特写道："农业的丰收得益于三点：第一，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广泛使用；第二，女性开始从事农业活动；第三，新人口不断涌入。"[4] 割草机、收割机、脱粒机和马耙的广泛使用将农场工人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六倍。

女性对农业生产的贡献很大。在艾奥瓦州，一位传教士写道："我在路上遇到了很多赶着牲畜的女性，在田间看到许多耕耘劳作的妇女，人数比男性多。她们似乎借最喜欢的歌对丈夫说：'拿起你的枪，出发吧！露丝我会赶牛，约翰，我还会耕地。'"[5]



脱粒机

很多人搬到了西部，因为西部的土地更廉价，容易获得 [6] 。《宅地法》促进了西部农业的发展，扩大了农作物种植面积。对军队和维持粮食生产的人来说，粮食非常重要。当时，各州的粮食都有剩余。1860年到1862年，英国歉收，粮食紧缺。因此，各州剩余的粮食都运到了英国，促进了欧美之间的交流 [7] 。

第7节　肆意逮捕

讲述北方在内战时期的故事时，违反《宪法》的行为不容忽视。北方各州的法庭都是开放的，日常的司法工作没有受到战乱的丝毫影响，逮捕违法人员的工作照常进行。大部分逮捕令是威廉·H.苏厄德下达的，其他逮捕令是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下达的。有时，官方文书只是一纸简单的电报，根本不是《宪法》规定的逮捕令 [8] 。被捕的人既没有接到任何指控，也没有经过地方法官的审查，直接被关押在了拉斐特堡或沃伦堡的监狱。参议院给出的逮捕理由是，以叛国罪逮捕违法人员有助于震慑南方邦联军。此外，为了联邦的安全，监押违法人员非常有必要。然而，肆意逮捕遭到了一些官员的质疑。参议员莱曼·特朗布尔要求威廉·H.苏厄德提供逮捕信息，指出了相关逮捕程序的不公正和不合理。他问道："如果某位内阁部长一时兴起或心血来潮抓人，我们该怎么办？"参议员约翰·P.黑尔问道："难道逮捕行动没有违反《宪法》中规定的原则吗？"没有人反驳他们提出的事实。

然而，联邦政府依然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只有参议院和国会中的少数人持有异议。但少数人提出的异议很有说服力，无可辩驳。反对的矛头指向了威廉·H.苏厄德。一些人认为，威廉·H.苏厄德仅凭怀疑缅因州、佛蒙特州、康涅狄格州和纽约州北部的士兵们叛敌，就逮捕了他们，丝毫没有理会各州的民意，他的做法与其说是对《宪法》治国的渴望，不如说是专制君主的喜怒无常。很快，逮捕政策的危害性显露了出来，为民主党反对派提供了可乘之机，很可能增强民主党反对派的实力，为海外评论者提供贬低联邦政府的机会。此外，令人担忧的是，人民可能会丧失一些自由，美国会走上从民主到专制的老路。幸运的是，预想的间接后果并没有出现。

实际上，除非林肯否认，否则内阁大臣的行为就是林肯的行为。因此，林肯必须对肆意逮捕负责。然而，肆意逮捕不可能是林肯的意愿，因为他虽然存在不按《宪法》行事的行为，但在行事过程中十分尊重《宪法》。他赞成严格遵守国家基本法的规定和精神行事。每当他行使或允许他人行使专断权时，都会懊悔不已。毫无疑问，林肯不喜欢"美利坚合众国恺撒"的称号，或"比中国皇帝更专制的独裁者"的称号。听见参

议员詹姆斯·格兰姆斯将面见总统称为“靠近白宫最高统治者的脚凳”后，林肯非常不快。1862年2月14日，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下令假释政治犯，因为政治犯不足以震慑南方邦联军，并规定只有得到军方命令，才能实施逮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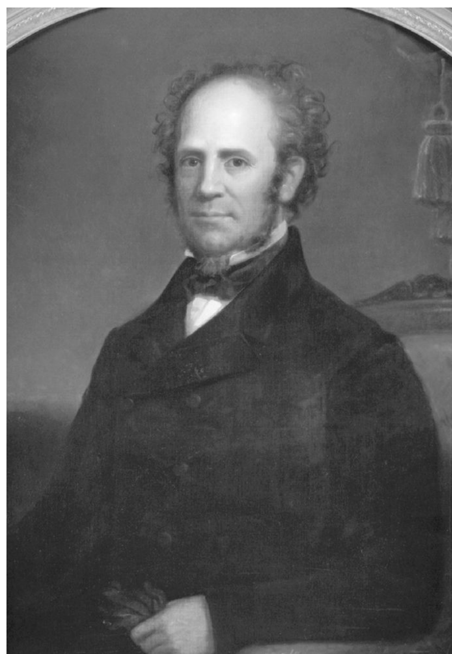
约翰·P.黑尔（1806—1873）

第8节 “铜头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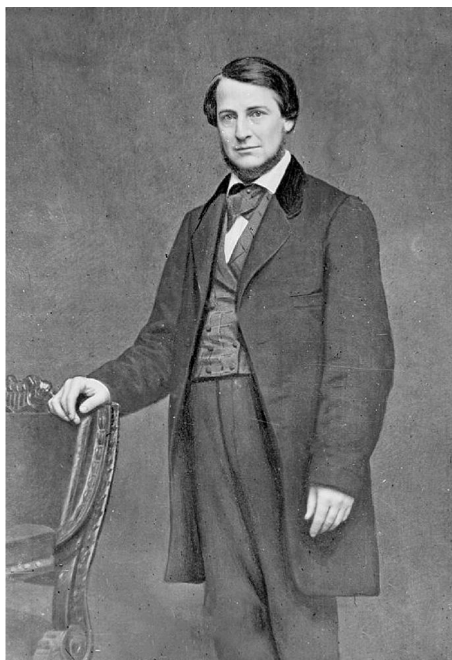
1862年秋天，出现了“铜头蛇”一词。很快，“铜头蛇”一词得到广泛使用。作为一个不雅的绰号，北方人用“铜头蛇”称呼坚决拥护民主组织、极力反对林肯和国会采取的所有战争措施、认为北方不可能征服南方、一心倡导和平的人。1863年，投票给民主党的人并不都是“铜头蛇”。但对真心希望南方获胜、组织并加入秘密组织金环骑士团 [9] 的人来说，“铜头蛇”一词比一个片面性词语更贴切。无论如何，1863年1月中旬过后，在西部诸州，“民主党人”和“铜头蛇”几乎是同义词。曾含有谴责之意的绰号成了一个表示骄傲的词。与支持和平的人不同，在选举时，“主战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一致投票支持联邦。大多数州开始使用“铜头蛇”一词。可以肯定的是，忠于并热爱民主党的人找到了代言人，即纽约的霍雷肖·西摩和俄亥俄州的克莱门特·L.法兰迪加姆。霍雷肖·西摩和克莱门特·L.法兰迪加姆都具有领导才能。东部民主党人倾向支持霍雷肖·西摩，西部民主党人更青睐克莱门特·L.法兰迪加姆的激进观点 [10] 。

第9节　霍雷肖·西摩和克莱门特·L.法兰迪加姆

任何立宪政府统治下的言论和新闻都是自由的。内战时期，政府即使陷入困境，也必须允许民众发表反对意见。为民主党人制定正确的政策并不困难。当时，正如大家承认的那样，联邦政府岌岌可危。在国会中，民主党人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与共和党合作，筹集人力、财力支持战争。无论是否反对，民主党人都应该用建议批评的口吻，而不是党派间的反对口吻，为完善必要的议案努力。在1863年3月4日结束的国会会议上，民主党人没有做到这一点，但也没有阻碍正常的议事，否则后果可能会很麻烦。因此，想要赢过萨迪厄斯·史蒂文斯代表的众议院中多数人组成的领导阶层，阻碍议事并不是明智的选择。但如果民主党人竭力阻挠，加上议事涉及的种种问题，就会使国家陷入恐慌状态。因此，国会必须承认民主党人是爱国的。在英国，正是由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爱国精神，才保住了英联邦。



霍雷肖·西摩（1810—1886）



克莱门特·L.法兰迪加姆（1820—1871）

第10节　民主党人

在众议院或参议院，任何公开行动都会遭到严厉批评。譬如，民主党的领导人在立法厅内外发表了演讲。著名的民主党刊物试图引导民意，从而影响政府的政策。但民主党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除非南部邦联得到北方联邦政府承认，否则和平不可能实现。当时，北方联邦和南方邦联之间达成了一条分界线。民主党人认为，只要停战，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就能恢复联邦。他们的这种观点毫无根据。随后，民主党人开始反对林肯的解放政策，将解放政策视为阻碍南北和解的绊脚石。但显然，爱国胜过爱党的人意识到，南方各州不会同意任何条件，即使是对美国最有利的条件。迫于事态的发展，林肯颁布了反奴隶制法令。多年来，民主党人一直是奴隶制的拥护者，认为奴隶制是社会必要的罪恶，因此，不可能真心实意地支持解放政策。但民主党人如果能理智一些，看到奴隶制道德层面的错误，那么一定会坚定地认为：《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是军令，一经颁布，必须执行。他们如果不再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不再妨碍林肯和国会行使其特权，就可以作为合理的反对派继续行使权力，也不会使“铜头蛇民主党”带着谴责含义。实际上，民主党人似乎受到了历史的垂青。他们提出了以经济和诚信原则分配公共资金的议案，为社会做出了一定贡献。此外，他们支持萨蒙·P.蔡斯和埃德温·斯坦顿的相关政策，对行政当局暂停人身保护令特权、肆意逮捕和剥夺言论与写作自由提出批评，对立法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民主党人如果只提出反对意见，其论点可能更具说服力，会引起受到民主党排挤或为侵犯他人自由行为感到困扰的人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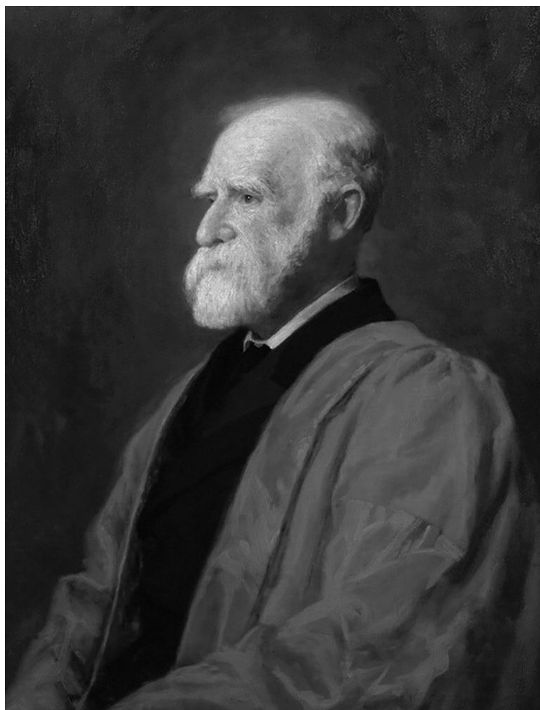
第11节　林肯对肆意逮捕的态度

考虑到我们的做法、法院的裁定、政治家和法学家的意见及英国两个世纪以来的先例，可以肯定的是，暂停人身保护令是《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行政当局无权暂停人身保护令。林肯擅用手中的权力，暂停了没有任何敌对行为的州的人身保护令。他滥用权力，使其成为支持肆意逮捕政策必需的权力。随后，威廉·H.苏厄德开始效仿林肯，而后是埃德温·斯坦顿。因此，提出辩护十分必要。先例被搁置一旁，因为此时的美国面临着联邦《宪法》通过以来最大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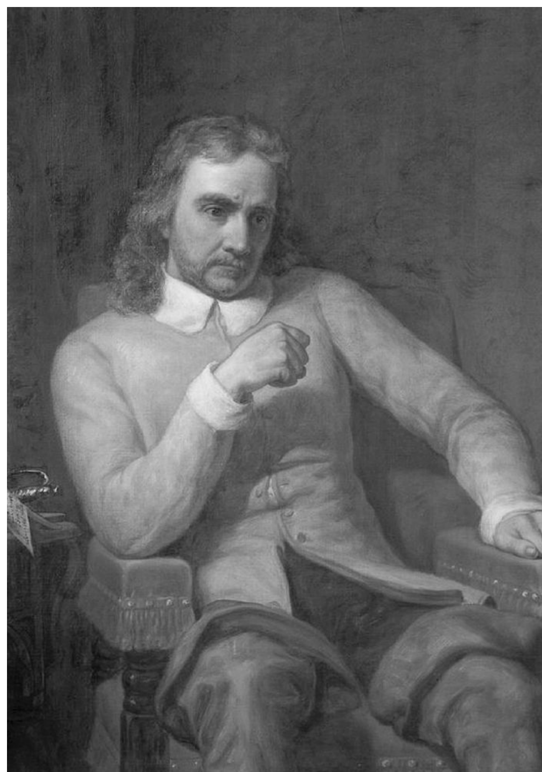
根据1863年3月3日通过的法案，威廉·H.苏厄德和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必须向国家法院的法官提供“重犯或政治犯”的名单。但我没有找到类似的名单。事实上，独裁政府的发展速度非常快。1863年9月，萨蒙·P.蔡斯惊讶地发现，除了自己，林肯和内阁所有成员都不熟悉1863年3月3日通过的法案条款。

经过认真思考，我毫不犹豫地谴责在没有参战的州进行肆意逮捕和干涉新闻自由 [11] 的做法，更何况这些州的法院一直开着。做出判断前，我研究了克莱门特·法兰迪加姆在众议院发表的演讲，民主党刊物上的相关评论及“铜头蛇”在公共场所的谈话。在公共场所，民主党人似乎忘记了谨慎和克制。此外，我还注意到，人们的批评越来越尖锐，爱国人士一直在向当局申诉对“宣泄叛国情绪”的不满。然而，我坚信所有法外程序都是不合理、不必要、不正确的。因此，使逮捕的罪犯应该依法受到起诉，或他们的行为如果不构成犯罪，就应该无罪释放。詹姆斯·布莱斯写道：“从奥利弗·克伦威尔以来，林肯行使的权力比任何一位英国独裁者都多。但应该补充的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独裁程度远超林肯，严重违反了英国《宪法》。”我从读过的英国历史资料和做过的英美比较研究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此外，林肯本性善良仁慈，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威廉·H.苏厄德和埃德温·斯坦顿粗暴的行事风格，对后人影响深远。历史和传言都证明，林肯尊重《宪法》和法律，品格高尚，功绩卓著。因此，从内战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认为，威廉·H.苏厄德和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下令实施的种种暴行并不是林肯授权的。我没有发现林肯亲自下达的逮捕令，但他默许了所有逮捕行为 [12] 。面对与路易十四的

逮捕密令一样专断的命令，林肯对肆意逮捕行为负有责任[13]。



詹姆斯·布莱斯（1838—1922）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

战争部和北方联邦军的技术专家没有为步兵配备后膛装弹步枪，遭到了公众的批评。公众的批评是合理的。战争部一直拖延着，错过了时机。1859年12月1日，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在报告中说明了后膛装弹步枪的实验结果。他说："新武器近乎完美……一个会用后膛装弹步枪的士兵相当于两个或三个使用前膛装弹步枪的士兵。相关政策要求我们采取措施，将新武器逐步运用到战场上。"但1864年10月22日，军械负责人向埃德温·斯坦顿报告说："除了极个别人，军中的后膛装弹步枪仅限骑兵使用。"1864年12月5日，他重申道："作战经验表明，对步兵和骑兵来说，后膛装弹步枪远胜滑膛枪。我们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将国家兵工厂和私人工厂生产的滑膛枪换成后膛装弹步枪。"1862年，本来应该有人意识到武器问题，向林肯、战争部和国会强调其重要性。1848年革命和1864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中，普鲁士人早已使用后膛装弹步枪。在罗伯特·E.李投降前一年，北方联邦军中的步兵早就应该用后膛装弹步枪作战。少数几个拥有连发式后膛装弹枪的北方联邦兵团作战迅猛。持后膛装弹枪的军队和持前膛装弹枪的军队进行了一场与克尼格

雷茨战役 [14] 类似的激战，这戏剧性的一幕本来预计会在1864年的弗吉尼亚州战场或佐治亚州山区上演。在战术方面，北方联邦军不及普鲁士人，但美国人的创新才能并没有错。联邦政府已经拥有优良的武器。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联邦政府的技术部门与宾夕法尼亚铁路或部分大型制造公司的技术部门能力相当，北方联邦军一定会拥有更先进的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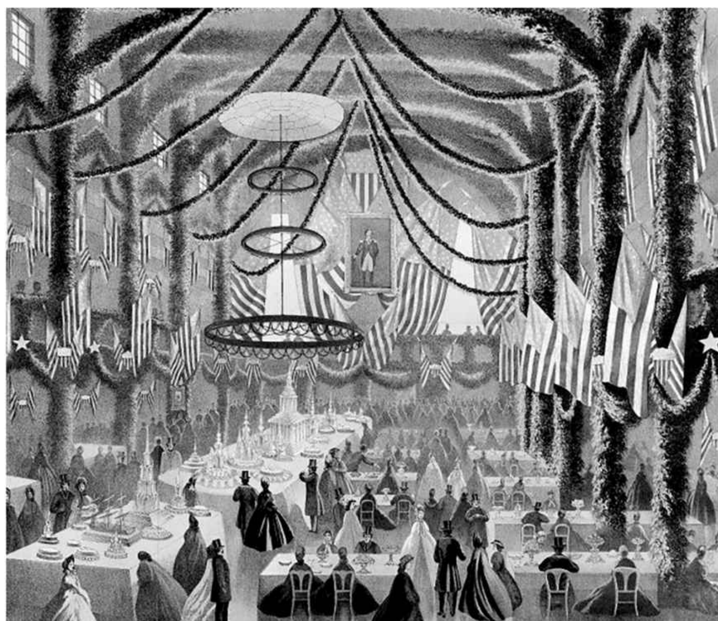
1864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



克尼格雷茨战役

第12节　卫生义卖会

内战给人道主义精神注入了强大动力。美国人基本上都是宗教信徒，基督教义早已深入人心。平民不仅通过个人力量，还通过积极组织相关机构的方式，尽力满足北方联邦军的需求，安抚受伤的士兵们。女性很适合做援助工作。她们有精力，有奉献精神，听从指挥，配得上林肯在一次卫生义卖会[15]上的称赞。林肯说："我们参与的这场战争非同寻常，影响着各个阶层，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士兵。人会为了生命倾其所有。虽然很多人贡献了财物，但士兵们以身涉险，甚至以身殉国。因此，士兵的功绩是最大的。这场战争呈现出与以往所有战争都不同的特征，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为士兵及其家人举行义卖会。参与义卖会的大多数人是女性。我一般不说赞扬的话，也从未研究过赞美女性的技巧，但自世界开始赞美女性起，演说家和诗人们一直讴歌女性。即使将所有赞美之词都用在美国女性身上，也无法完全表述她们对战争做出的贡献。因此，我只能说：上帝保佑美国女性！"



卫生义卖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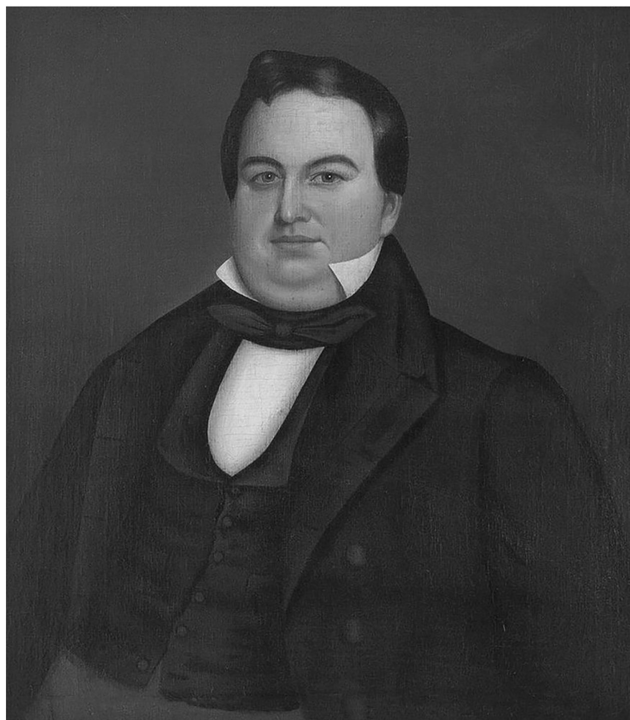
第13节　与南方通商

虽然最高法院认为，“从战争本质来看，交战双方应该停止通商”，但南北方之间的贸易规模依然很大。南方通过棉花换取金钱或急需品，华盛顿政府也曾鼓励南北贸易。通商的意图是好的。如果从国会法案、总统公告、财政部长的指令及战争部长与海军部长的命令角度撰写南北通商的历史，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在北方占领的南方邦联地区，财政部长萨蒙·P.蔡斯派专员去管理当地财产。财产应该属于忠于国家的人，为了国家利益拍卖。财政部派去的专员和其他官员向“忠诚人士”发放了许可证，允许他们与北方通商，但超出国民军战线以外的所有商业活动均被严禁。财政专员还受命与各军指挥官商议，在一定程度上，指挥官与授予许可证的“忠诚人士”对军事机关负责，但由财政部长直接管理。财政部长对“总统许可的商业往来”进行监督。其他形式的南北贸易皆属于违法行为，一经发现，没收全部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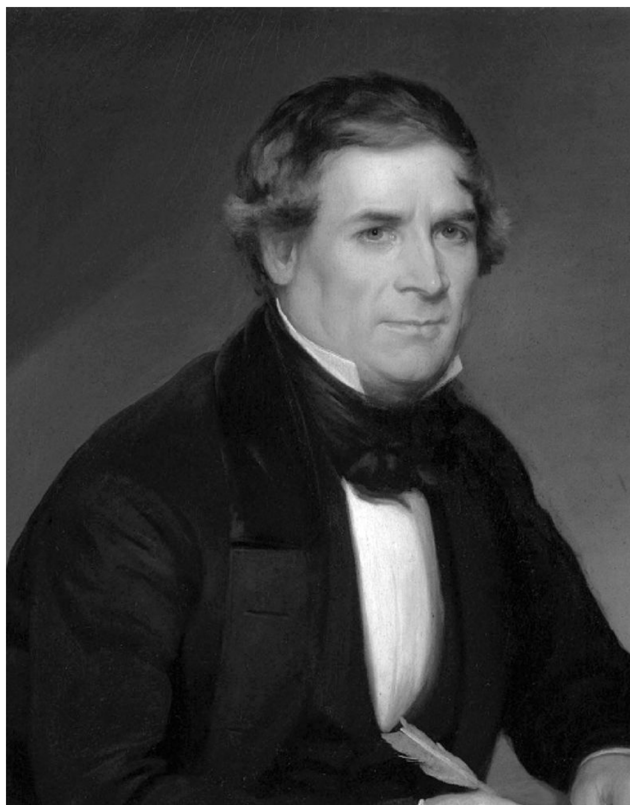
然而，1864年，由于贸易局势紧张，道德规范松弛，南北方的商业往来受到影响。1864年初，波士顿的棉花价格为每磅八十一美分，后来一直稳步上涨。1864年8月底，如果用国家流通纸币购买棉花，每磅棉花的价格为一点九美元。在南方邦联，用黄金购买棉花的价格是每磅十二至二十美分。两地的棉花价格差异悬殊，中间利润十分诱人。因此，很多人经不住诱惑，违反政府规定进行交易。相关数据表明，北方通过合法贸易获得的棉花比英国从美国走私商人那儿获得的棉花多。研究南北贸易的学者对此并不惊讶。美国的大部分棉花出自南方邦联管控的区域，南方军民用棉花换取急需物资。棉花贸易使南方受益颇多。新英格兰和中部各州得到棉花后，会立即投入生产。如果完全依赖进口商品，即使缩短工时，也不会给工人造成困扰。北方对劳动力的需求迅速增加。人们在其他行业也很容易找到工作。在洛厄尔，1862年的纺织业罢工事件影响深远。当时，储蓄银行的存款大幅增加。印度棉可以用来生产一些生活必需品，其他棉纺织品可以用羊毛代替。然而，通过棉花贸易，南方得到了盐、奎宁、弹药武器和其他军需品[16]。

第14节　财务状况堪忧

1864年夏天，联邦政府的财政负担沉重。尤利西斯·S.格兰特在弗吉尼亚州战败，人们担心林肯能否再次当选总统。局势动荡不安，很多人忧心忡忡，担心事态恶化。1864年3月14日，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布拉夫写信给埃德温·斯坦顿说：“我们的财务状况堪忧。应征入伍的士兵人均花销为三百多美元。我们已经负债累累，既无法偿还债务，也没有缩减用度。这样下去，我们很快会破产。”与此同时，有人问萨蒙·P.蔡斯：“我们现在负债多少？”萨蒙·P.蔡斯回答：“约二十五亿美元。”又问：“国家还能承受多少？”他回答：“如果我们无法平息叛乱，当负债达到三十亿美元时，政府就会破产。”威廉·P.费森登挑起财政部的重担[17]后不久，给友人詹姆斯·格兰姆斯写信说：“我发现局势极其糟糕。除了像我一样不顾一切的人，其他人都会被吓倒。因此，我只能扛下重担。”瑟洛·威德在一位英国朋友面前坦率地说道：“我们面临重重危机，首当其冲的是总统大选……士兵们衣衫褴褛，筋疲力尽，身心受创。到处都是躲躲闪闪、士气低落的士兵。”英国友人回复他说：“我亲爱的老朋友，你必须在末日到来前恪尽职守。你的政府也许会渡过难关，但在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它不会长久……如果能见到林肯，我真的想去美国。但林肯会不会很快流亡到拉斐特堡或这儿呢？”弗朗西斯·利伯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美国正在经历大规模内战，其间又逢总统选举。如果最终能安然渡过难关，无论有多少伤疤，我都会在战争史上写下这最不可思议的奇迹。”1863年，持续了四天的纽约征兵骚乱依然历历在目。此刻，人们担心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征兵会遭到大力抵制。各州政府请求联邦政府出兵维持秩序。但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军队由于战败，急需援兵。既要顾及军情紧急，又要满足各州长的请求，联邦政府左右为难。



约翰·布拉夫（1811—1865）



瑟洛·威德（1797—1882）

第15节　北方的州长们

林肯和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必须重新审视联邦制。在作战方面，联邦制存在很多缺陷。大多数州长联系紧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联邦制的缺陷。除了极少数州长，北方的各州长和林肯属于同一党派。许多州长精明能干，了解自己州的需求和能力。有人从官方记录中收集了几位名声显赫的州长，如印第安纳州州长奥利弗·P.莫顿、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翰·安德鲁、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安德鲁·柯廷及俄亥俄州的两位州长戴维·托德和约翰·布拉夫 [18] 。与其他北方州长处事时，他们显得耐心谨慎，捍卫了自己的威严。此外，他们都忠诚爱国，希望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协助联邦政府，并以自己的州为傲，竭力维护其利益。他们一直与战争部保持通信，密切关注征兵配额，总是能超额完成配额，并建议将超额征召的军队用于下一次征兵。各州的算术专家都非常精于计算，渴望将每个可以入伍的人计算在内。一次，正如林肯说的那样，“所有州完成配额的总量大大超过了要求人数”。但令人苦恼的是，在战争中，林肯获胜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得到各州长积极主动的支持。他告诉罗得岛州立法委员会：“征兵的目标是士兵，不是调整多余人数。”这句话回答了埃德温·斯坦顿和宪兵总司令提出的士兵再利用请求。尽管如此，林肯并不想在争辩中占上风，而是想说服委员会与政府官员，让官员们意识到，自己必须得有兵。然而，如果不是形势所迫，林肯依然打算通过公平方式征兵。各州长提出了建议。大多数人认为，必须换一种方式解决征兵问题。马里兰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接连面临南方邦联军入侵的危险。来自加拿大和其他英属殖民地的袭击事件使纽约州、佛蒙特州和缅因州陷入了恐慌。面对重重困局，战争部要求为各州提供救助和保护。埃德温·斯坦顿耐心回复了州长们的请求和不满，一反易怒易燥的常态。他的耐心体现了他意志坚定的一面。在过去的战争岁月里，埃德温·斯坦顿有序管理着军需部门，妥善安排了军队和物资运输，磨炼了自己的意志。继林肯之后，与其他人相比，埃德温·斯坦顿为北方各州长铺平了道路，让各州协助战争部处理各种细节事务，以此大力支持联邦政府。

第16节　埃德温·斯坦顿和林肯

据说，埃德温·斯坦顿是一个严苛的人。他经常站在高高的桌子旁，显得忙碌而疲惫，时而抱怨，时而发火，时而咒骂。除了高层官员，每个下属都很怕接近他，靠近他时都会忐忑不安。失职者见他时总是畏畏缩缩。但官方记录中的埃德温·斯坦顿不仅耐心、睿智、谦逊，还身担重任，处事果断，深谙时局，灵活变通。了解相关情况的人如果读了埃德温·斯坦顿在1864年夏天的通信，都会赞叹他的执行力。他对一些人非常耐心体贴，但如果相信自己是对的，就会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行事英明，尤其是内战期间，他和林肯都没有被1864年5月到1864年9月的失望和沮丧打败 [19] 。

从林肯身上，我们能明显感觉到战争的重担。约翰·海伊写道："他的笑声逐年减少，总是忧心忡忡，眼睛黯然无光。面对周围事物，他越来越沉默，似乎老得很快。"制作于1860年和1865年春的两尊面部雕塑充分体现了林肯的变化。约翰·海伊还写道："1860年制作的雕塑中，林肯看起来强壮健康，精力充沛，斗志昂扬。但1865年春制作的雕塑中，他看起来忧伤、平静，似乎睡着了。奥古斯都·圣戈登 [20] 第一次看见1865年春制作的雕塑时，坚持认为是一尊死人面部雕塑。雕塑的脸部线条显得生硬，仿佛活人的脸和雕塑一样，都是青铜色的。林肯消瘦的脸颊让鼻子看起来很长，嘴巴像古老的雕像一样死板，脸上的悲伤忧虑一览无余，似乎在诉说着无以言表的哀愁。整尊雕塑看上去毫无活力。"

北方人认为，萨姆特堡受到攻击后，内战已然不可避免。但1864年夏天，人们意识到，联邦政府体制中，国家与各州的权力处在分离状态，唯一的联系是华盛顿。各州选举频繁，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显而易见，我们并未做好打仗的准备。 [21] 和平才是联邦精神所在。

[1] 《美国史》，第5卷，第189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南北战争时期北方社会和工业》，第5页，爱默生·菲特著。——原注

[2] 即邮票中最常用的面值，也是供应量最大的邮票。——原注

[3] 《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的书信》。——原注

[4] 《南北战争时期北方社会和工业》，第6页，爱默生·菲特著。——原注

[5] 《南北战争时期北方社会和工业》，第8页，爱默生·菲特著。——原注

[6] 西进运动贯穿了整个内战。其间，最重要的一点是，骑兵和马车队都需要大量马匹。波托马克军曾经每天的马匹需求是五百匹。在中西部平原地区，饲养马匹的生意越来越兴旺。虽然战事仍频，但马匹生意一直在扩大。——编者注

[7] 《南北战争时期北方社会和工业》，第17页等，爱默生·菲特著。——原注

[8] 战争期间，北方很多地区的人身保护令都暂停了。——编者注

[9] 金环骑士团是19世纪中期美国的一个秘密组织。美国内战期间，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艾奥瓦州等北方州同情南方邦联，被指控属于金环骑士团。——译者注

[10] 很难将民主党人的不同意见分门别类。主战的民主党人为了国家、为了打胜仗极力支持联邦政府，支持斯蒂芬·道格拉斯的人保留原则上反对政府的权力，“主和的民主党人”渴望为和平付出更大努力，甚至赞同认可南方邦联。真正的“铜头蛇”致力于南方邦联的胜利。西部的许多民主党人并不支持克莱门特·L.法兰迪加姆的观点。——编者注

[11] 《美国史》，第4卷，第253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12] 譬如，关于查尔斯·P.斯通将军的案件，林肯声明：“是我授权将其逮捕并监禁的。”1861年10月21日的布尔溪战役后，查尔斯·P.斯通未经正式指控就被监禁了。在布尔溪战役中，林肯的朋友爱德华·贝克牺牲。据说，查尔斯·P.斯通与叛军厮混，在布尔溪战役中协助南方邦联军打败了北方联邦军，但相关指控都没有充足的证据。历史学家们认为，监禁查尔斯·P.斯通是不公正的。——编者注

[13] 《美国史》，第4卷，第245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14] 1866年7月3日，克尼格雷茨战役爆发，是普奥战争中的重要战役之一，也是普奥战争的转折点。——译者注

[15] 《美国史》，第5卷，第257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卫生义卖会是民间组织的义卖或展会，旨在以美国卫生委员会和其他慈善救济机构的名义募集资金。内战期间，卫生义卖会是为联邦大业筹款的常用途径之一。——译者注

[16] 无法确定北方与南方之间的非法贸易程度，但通过调查个案，发现南北方之间的贸易很普遍。财政部和军事当局对此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河流域是棉花交易的主要地区。——编者注

[17] 1864年7月5日，威廉·P.费森登接替萨蒙·P.蔡斯，担任财政部长。——原注

[18] 此处应该加上伊利诺伊州州长理查德·耶茨。——编者注

[19] 毫无疑问，埃德温·斯坦顿是林肯政府中最受争议的人物。有人怀疑他实际上居心叵测，反对林肯，反对战争。他因战时的许多军事和政治事件遭到责备。据说，他甚至密谋刺杀林肯。然而，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他为内战胜利和林肯政府付出颇多。——编者注

[20] 奥古斯都·圣戈登（Augustus Saint-Gaudens，1848—1907），美国雕塑家，完美阐释了“美国文艺复兴”思想。——译者注

[21] 应该尊重詹姆斯·福特·罗德斯的观点。联邦政府虽然作战方式独特，但最后还是成功了。——编者注

第12章　南方邦联的处境：物资极度短缺

由于受到封锁线的影响，美国与外界的来往并不频繁。南方邦联的情况比较特殊。北方联邦海军实力强大[1]，封锁线很难突破。萨姆特堡遭到攻击一个星期后，林肯宣布封锁海岸线。起初，封锁并不彻底，但封锁效率逐渐提高，甚至成为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林肯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很清楚，只有南方邦联军战败或投降，和平才能实现。为此，北方联邦海军严密封锁了南部港口，协助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威廉·T.谢尔曼的行动。然而，如果罗伯特·E.李和约瑟夫·E.约翰斯顿的军队没有被打败，一直驻扎在黑人劳作的肥沃土地上，得到充盈的棉花供给和有限的羊毛供应，那么封锁可能会持续到世界末日。内战期间，北方联邦陆军与海军的关系与1914年的英国陆军和海军的关系相似。1914年，英国舰队封锁了德意志帝国的港口，德意志舰队被迫停泊在安全港内。《伦敦时报》评论道："海军是我们的盾，陆军是我们的矛。"[2]

第1节　南方的不安

封锁切断了南方获取奢侈品和生活必需品的途径，南方人感到非常不安。盐、咖啡、茶、肥皂、蜡烛、火柴、胶水等商品极度稀缺，价格大幅上涨。封锁教会了南方人节俭。查尔斯顿的年轻贵族女性开始穿家纺衣裙，里士满的绅士穿着过时的衣服。扫帚、椅子、篮子、刷子、提桶、浴盆、酒桶、石笔和针织品都很稀缺。人们开始通过原始工艺制作墨水。《查尔斯顿信使》的新闻专栏报道称，北卡罗来纳州卡斯韦尔县的一名男子正在生产墨水，可以按购买者的瓶子大小提供等量的墨水。里士满的一位药剂师声明，买药者必须自带药瓶，否则不予开药。但许多常见的药物依然很难买到。里士满的医药供应商呼吁弗吉尼亚州的女性种植罂粟，从罂粟中提取麻醉剂，供军中伤员使用。人们建议用其他药品代替奎宁等药物。卫生局长以官方名义发放了一种由干山茱萸、杨树皮和柳树皮及威士忌合成的复合酊剂，“作为补药和退烧药替代了奎宁”。与北方的贸易中，奎宁和吗啡是最紧缺的商品。为了获得奎宁、吗啡和其他药物，南方人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手段。在辛辛那提，致力于南方邦联大业的人们开始从事走私活动。1862年10月，威廉·T.谢尔曼掌管孟菲斯时，一支浩浩荡荡的送葬队通过了北方联邦防线，送葬队最前面是一辆精心装扮的灵车。实际上，灵车上的棺材里装着大批稀缺药物。一个人从新奥尔良买了一个装满奎宁的洋娃娃，藏在自己的皮箱里。筛查时，他泪流满面地说洋娃娃是送给一个可怜的残疾女孩的。他的把戏成功了，洋娃娃里的珍贵药品并未被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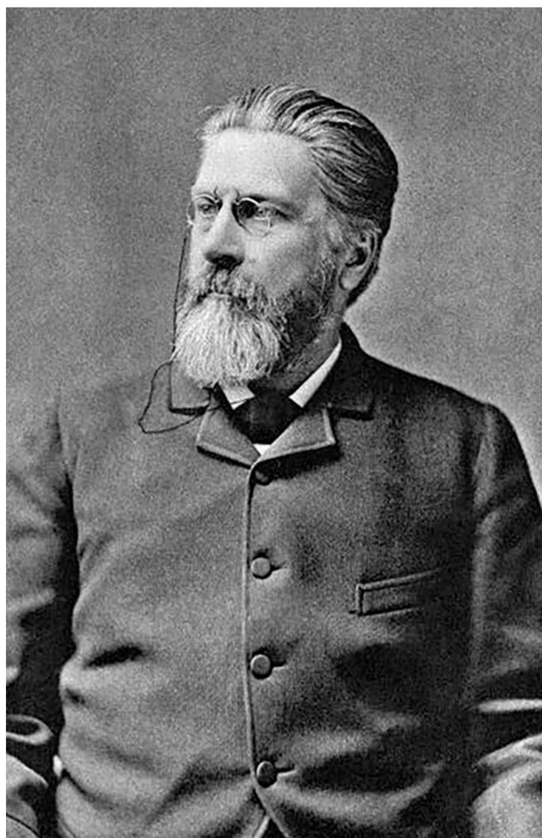
第2节　茶叶和咖啡匮乏

南方人最稀缺的商品是茶叶和咖啡。1862年4月，《查尔斯顿信使》报道：“除了最富有的人，茶叶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奢望。”1864年2月4日，约翰·B.琼斯在日记中写道：“我已经一年多没有喝过咖啡或茶了。”富人们为了将仅有的茶留给病患，也不再喝茶。医院暂时还能提供咖啡。但1863年12月2日，卫生局长下令停止为病人提供咖啡，还说：“由于咖啡供应非常有限，咖啡只能当作兴奋剂药用。”人们找到了咖啡的各种替代品，如干黑麦、小麦、玉米、甘薯、栗子、花生、菊苣和棉花种子等，但很多人认为，“咖啡就是咖啡，无可替代”。此外，人们用葡萄干、黑莓和鼠尾草叶煮水喝，或用黄樟根和花煮水喝。一些人努力让自己相信，替代品和中国茶叶一样好。1863年4月6日到1863年6月17日，在南方旅行期间，亚瑟·弗里曼特尔从没喝过茶，只在杰斐逊·戴维斯的家中喝到了“上品”的茶。

1862年，人们逐渐注意到了盐的稀缺，非常担心盐的供给。对军队来说，盐的供给至关重要，因为咸肉是军队的主要口粮。密西西比州州长写信给杰斐逊·戴维斯说：“盐的匮乏令人担忧。”亚拉巴马州州长在给邦联战争部长詹姆斯·A.塞登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国家的盐荒已经非常严重。”“熏制咸肉的厨房中，被油脂浸透的地面都被挖下来煮了。”人们没有放过任何含盐的东西，甚至用海水弥补盐的匮乏。弗吉尼亚州西南部的盐水泉是盐最重要的供应源。弗吉尼亚州当局开始生产盐，并制定了向公众分发盐的规定。其他州随之效仿，逐渐缓解了盐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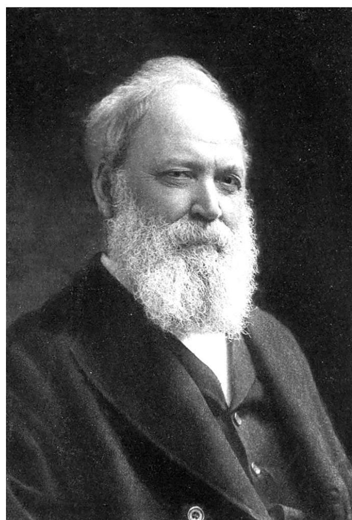
纸张的稀缺也成了问题。报纸的尺寸逐渐缩小，常用的印刷纸是牛皮纸或墙纸及非常粗糙的珍贵白纸，而且一般情况下多用半张纸印刷。劣质的纸张使报纸成为南方邦联财富日渐减少的标识。《里士满检查者》报道说：“期刊的社评大多写在牛皮纸、废纸、旧信件和拒稿文章的背面及未付票据、从年轻人的字帖和商人的分类账本中撕下来的大页纸上。”亚拉巴马州的一个编辑将社评写在一块墙板上，社评过期后擦了再写另一篇。另一位编辑以同样的方式，用上学时的小黑板发表社评。《查尔斯顿信使》上的一则广告写道：“如果买不到四十或五十张印刷纸，1863年米勒年历的订单就完不成了。”麦奎尔夫人没有空本子记日

记，只能在包装纸上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普特南夫人说，家人和朋友的信都写在包装纸上，战争爆发前，人们几乎从来不用包装纸写信。回信经常写在来信的背面。杰贝兹·L.柯里说：“在亚拉巴马州，我的农产品税收收据是用棕色纸写的，看起来又脏又旧。”群众的慷慨“成为新闻界、公众及政府的福音”。政府劝说人们将不需要的旧衣物送到造纸厂。此外，很多金属制品供不应求，尤其是铁制品。查尔斯顿兵工厂听说许多爱国公民愿意将家里的铅窗捐给政府，以备战需。炮兵团将领提出用铁替换铅窗。《查尔斯顿信使》的编辑将住所的铅水管“捐给伟大的、危在旦夕的国家”。类似的捐赠很多，甚至连教堂的铃铛都被拿来制造大炮了。



杰贝兹·L.柯里（1825—1903）

第3节　面包和肉匮乏



巴兹尔·兰诺·吉尔德斯利夫（1831—1924）

面对面包和肉的匮乏，很多人怨声载道。巴兹尔·兰诺·吉尔德斯利夫教授写道：“饥饿是南方邦联的生活主旋律。”弗吉尼亚州的情况确实如此，因为弗吉尼亚州一边要为罗伯特·E.李的军队提供粮草，一边还要遭受北方联邦军的侵扰。但整体上来看，其余各邦联州食物充足。虽然1862年的大旱导致许多州歉收，但如果铁路运行状态良好，顺利完成分配任务，那么邦联各地都能得到足够的食物。1862年，得克萨斯州丰收，为毗邻的邦联地区提供了谷物和牛羊肉。但1863年，由于尤利西斯·S.格兰特攻占了维克斯堡，控制了密西西比河，南方各州之间的商业往来就此中断。当弗吉尼亚人因物资匮乏忍饥挨饿时，1863年1月，威廉·T.谢尔曼报告说密西西比州物资充裕。他写道：“在密西西比州，家畜静静地进食，谷物遍布四处。”众所周知，1863年5月，尤利西斯·S.格兰特切断了与补给点的联系，由国家供给军队物资。1864年秋天，在佐治亚州，威廉·T.谢尔曼的军队纵酒欢歌。与此同时，罗伯特·E.李的军队在弗吉尼亚州忍饥挨饿。南方邦联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交通问题。

第4节　交通困难

1861年，南方的铁路状况越来越糟糕。铁路“磨损”严重，很多设施需要检修和更换。但由于战争，改善铁路交通是不可能的。在和平时期，南方的铁路设备都是从北方购买的。虽然货车车厢是在南方建造的，但“螺栓、杆、车轮、车轴、短钉、长钉、螺丝钉、锡、焊料、燃料和油漆”等都出自北方工厂。同样，大多数客车车厢和车头也来自北方。南方如果想自己生产客车车厢和车头，需要花很多钱获得特许权。特许权不仅是南方爱国情怀的体现，还给当地带来了很多便利。铁路衰败的同时，贸易却越来越活跃，原因之一是军队和各城市之间的食物运输。1862年，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印度玉米丰收，但路易斯安那州东部歉收。为了平衡各地区的粮食供应，火车是最重要的运输工具。铁路将大量食物和其他货物运送到各地。但1862年及随后的几年里，铁路根本无法满足邦联政府和公众的需求。1863年4月，南方邦联铁路线共计六千三百英里，不包括北方联邦军占领的铁路。邦联政府认为，如果能充分利用所有铁路线[3]，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交通问题，为人民大众服务。但铁路状况越来越差，加上缺乏设备，运行的火车很少。与同时期的北方铁路运营状况相比，南方火车的负载很轻。于是，各城市需要食物，但铁路无法运送，人们怨声载道。1864年1月，据说，在佐治亚州西南部，印度玉米的售价是每蒲式耳一美元或两美元，但在弗吉尼亚州，每蒲式耳印度玉米的价格是十二美元或十五美元。1864年底，里士满的一位当权者认为，只要分配合理，每个人都能有足够的食物。北方联邦军行军时，占领了南方邦联的一些铁路，扰乱了南方的运输计划。在1863年和1864年的铁路指南上，一些铁路线的下方写着“北方联邦军暂时占领了该部分铁路”或“整条铁路已被北方联邦军占领”等字样。1864年，类似的现象明显比1863年多。

政府事务频繁干扰着铁路系统的正常运输，人民和军队深受其害。譬如，邮件寄送不及时，收到的报纸都是很久以前的，游客在途中遇险遇难，但铁路指南并未提到这些事。1863年，旅客如果参考了铁路指南，也许会计划以每小时十四到十八英里的速度[4]旅行。1864年，铁路运行速度比1863年更慢一些。但铁路指南的参考信息并不准确。如果

旅客乘坐的火车以每小时五到八英里的速度前进，那么说明他很幸运。火车总是晚点，错过转车。道路老化、设备短缺等不稳定因素导致事故多发，很多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1862年11月，约瑟夫·E.约翰斯顿从里士满出发，前往查塔努加接管分给他的新部门，但因“几次铁路事故”延迟了。1863年6月，亚瑟·弗里曼特尔记录了他在查尔斯顿和里士满的经历。在佛罗伦萨，由于一列火车出现故障，亚瑟·弗里曼特尔不得不耐心等待。当火车终于可以出发的时候，他拼命“挤进了拥挤不堪的车厢”。乘船转到威尔明顿后，他在“水泄不通”的火车上度过了燥热压抑的一天，写道：“在威尔明顿转车时，为了一个座位，我与别人打了一架。最后我赢了，因为我对处理这类事很有经验。”他尽可能让旅程变得快一点，但从查尔斯顿到里士满还是用了四十一小时，而现在只需要十小时[5]。一位英国人提到了一个流传很广的笑话：“从威尔明顿到里士满的旅程几乎与北方联邦军交战一样危险。”根据客流量和时间预计，官方每天会发出一两列客运列车。但有时，政府会强制暂停所有客运服务，运输军需物资和士兵。1864年4月，因军情需要，邦联政府暂停了从奥古斯塔到里士满的铁路运输。一位牧师本来打算前往奥古斯塔，在长老会周年纪念日的开幕式上布道，但现在，他无法守约。1864年5月，南方邦联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从佐治亚州前往里士满，对旅程做了有趣的描述：“他坐在一节客运车厢里，车厢挂在一列装满咸肉的火车上。火车从夏洛特出发，打算北上。”在一个漆黑的雨夜，他确定自己乘坐的火车后面有一辆火车正在驶来，可能会在五分钟后追尾，唯一的补救措施是在客运车厢的后置平台上放一盏灯。只见火车慢慢爬上斜坡，又猛冲下山坡。爬上一个陡坡时，车厢与车头脱节，滑下了山坡。车厢速度越来越快，滑行两英里后到达了山脚。随后，车厢开始爬上另一个斜坡，最后及时停了下来，避免了与后面的火车相撞。过了一会儿，车头回来了。亚历山大·斯蒂芬斯继续坐火车前行。随后，他停在了丹维尔，因为前方发生了严重事故。得知北方联邦军切断了丹维尔和里士满之间的铁路交通后，他觉得自己不可能到达里士满了，决定返回佐治亚州。亚历山大·斯蒂芬斯的行程一再延误，原因不明。其间，他乘坐的火车载着许多“威尔德内斯战役中的北方战俘和南方伤员”。他坐在一节单独的客运车厢里，其他货运车厢里都是“北方战俘”。能与南方邦联军一起遣返已经是对战俘的优待了。南方邦联军曾发誓说：“每一个北方联邦军都该杀。”但现在，他们比保卫家园的伤员更受优待。1864年9月，托马斯·

达布尼在梅肯写道：“在佐治亚州中部，铁路由政府掌控。个人出行均被拒绝，除非乘坐货运列车。”佐治亚州州长约瑟夫·E.布朗的妻子享受特别待遇，坐在一节“密闭”的专属车厢里。托马斯·达布尼希望将家人、仆人及家具从梅肯运到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他花费几千美元租了两节货运车厢，与家人乘货运列车出发。列车在晚上停车，有时会停一整天。两个星期后，托马斯·达布尼一家才到达杰克逊。现在，从梅肯到杰克逊只需要不到二十个小时。

第5节　铁资源匮乏

由于交通运输不便，邦联政府和人民饱受痛苦。政府官员和铁路公司负责人都提出了各种补救措施，但其中大多数措施涉及发展制造业或扩展商业，无法执行。改善交通运输面临的最主要困难是缺铁。如果铁供应充足，就能改善铁路状况。一些人建议政府征用一条不盈利的铁路线，将其交给另一家公司，从而扩展其他盈利的铁路线。铁的确非常稀缺。事实上，邦联政府采纳了征用铁路线的权宜之计。军官们经常征用车厢和车头，下令将一条铁路上运行的火车转到另一条铁路线上，而且常常有借无还。此外，邦联政府拨款完善了一些铁路线。

研究南方邦联的处境时，现代文明对铁的依赖不容忽视。令人惊讶的是，南方的许多州蕴藏着丰富的铁矿石和炼焦煤，但一直无人开采。由于缺铁，南方各地区苦不堪言。里士满召开铁路会议前，有人在一篇文章中建议说，政府应该呼吁人们将农场、家里的所有生铁和熟铁贡献出来，并建立相关体制，在全国范围内收集“破旧的犁头、锄头、铁锹、斧头、破损的炉灶、家用和厨房用具”等，并承诺给予人民一定补偿。在里士满，街道铁路上的铁轨被用来生产炮艇的装甲。亚拉巴马州的一些地区蕴藏着大量铁矿石，当地人却没有足够的铁“制造或修补农具”。《查尔斯顿信使》愤怒地指出：“邦联政府连一把剑也做不了。”占领维克斯堡后，一名邦联官员在维克斯堡法院的铁楼梯上注意到，楼梯上刻着辛辛那提制造商的名字。他感叹道：“我们连楼梯都做不了，还想着击垮联邦，真是痴人说梦。”他的言论虽然冒犯了南方邦联，却是对片面发展观的中肯评价。战争促使南方邦联生产铁，但在相同的刺激下，南方的冶铁工业相对落后。与欧洲相比，北方的冶铁工业虽然原料利用率较低，技术不够先进，但能满足当下的紧急需求，奠定了当代先进生产系统的基础。南方的熔铁炉体积小，构造陈旧过时，使用的燃料是木炭，从未尝试用焦炭或原煤作为燃料。在弗吉尼亚最古老的铁矿区，由于多年的乱砍滥伐，木材“极为稀缺”，矿石也几乎被采空了。许多地方的矿石“供应不稳定”，需要用马车从数英里外运输矿石。“有的矿石是从十英里外运来的。”有时，虽然矿石充足，但燃料太少，有时情况又恰好相反。即使矿石和燃料都充足，每天的生产量也不会超过十吨，根本无法

养活工人。工人们只能就近获取面包和肉，因为从远处运送食物是不可能的。亚拉巴马州的情况稍微好一些。亚拉巴马州有一个新矿区，矿石丰富，食物充足。政府“改良”的大型熔炉的平均日产量为十三吨，可以连续生产一个月。此外，佐治亚州和田纳西州也冶铁。然而，北方联邦军逐渐占领了南方的很多地区，阻碍了冶铁工业的生产。截至1864年10月1日，北方联邦军烧毁或毁坏了很多熔炉，包括弗吉尼亚的十个熔炉，佐治亚州的所有熔炉，亚拉巴马州的四个熔炉，田纳西州仅存的三个熔炉。然而，1864年11月20日的一份报告显示，弗吉尼亚州的十八个熔炉虽然运转不规律，但一直在生产。为了回报邦联政府授予的特权和给予的援助，生产者将一半铁以略高于成本价的价格、另一半铁以优惠价卖给了政府。在硝石矿业局 [6] 收到的报告中，冶铁产量少得惊人。虽然数字无法准确记录产量，但与北方相比，南方的冶铁产量显得微不足道。

第6节　战时军需品

虽然南方的生产条件简陋，但战时军需品并不紧缺[7]。南方人通过自己生产和走私获得了足够的小型武器与大炮。小型武器主要来自国外，战场、围攻和海岸附近的大炮主要由兵工厂和作坊生产。南方邦联军的步枪和北方联邦军的一样好用。里士满为骑兵配备了后膛装弹的卡宾枪。在内战的最后两年，北方联邦炮兵可能优于南方邦联炮兵。1861年和1862年，南方邦联军从北方联邦军手中缴获了很多武器。但1863年，情况发生了逆转，南方邦联军在葛底斯堡、维克斯堡和哈德逊港失去了七万五千件小型武器和大量大炮。

第7节　偷过封锁线

英国和法兰西帝国都想要棉花和烟草。南方市场上，棉花和烟草很多，但缺少武器、军火和铁。英国可以为南方提供大量武器、军火和铁。因此，双方试图进行贸易，但被封锁阻碍了。于是，偷过封锁线成了南方进行进出口贸易的主要途径。只要成功越过封锁线，就能获得高额利润。1861年，走私贸易开始兴盛。南方沿海轮船不再进行正常贸易，只做走私贸易。一些小型船虽然速度慢，但能轻易避开封锁，到达封锁线附近的中立港口。装满武器、军火和其他商品的船从英国出发，前往西印度群岛的某个港口，但其真正目的地是南方邦联。走私船的航行成功了，返回时满载南方的棉花和烟草。英国和南方邦联的商人们已经习惯战争状态。因此，看到英国紧缺棉花，棉花价格高昂，而南方邦联的棉花供过于求，价格低廉及英国可以为南方提供战时必需品和其他物资，商人们发现了一个难得的赚钱机会。与此同时，北方的封锁变得越来越严密。一开始，避开封锁线并没什么特定的方法，后来，商人们逐渐掌握了规律。武器、弹药、毛毯、军服、鞋子、茶叶、肥皂、信纸信封、棉织物、亚麻、羊毛、丝绸、药品、酒类等商品先从英国运到百慕大、拿索或哈瓦那，然后转运到走私船上。随后，走私船前往威尔明顿、查尔斯顿、萨凡纳、莫比尔或加尔维斯顿，将货物投放到市场上。走私利润十分丰厚。返回时，走私船装上棉花、烟草或松脂，带回拿索、百慕大或哈瓦那，然后转运到英国。偷过封锁线的船是专门为走私贸易设计的。1863年到1864年，最典型的一款走私船是又矮、又长、又窄的侧轮式轮船，速度快，吃水浅，承载量为四百至六百吨，船体颜色是暗灰色或铅色，便于隐蔽，除非在短距离内，否则很难发现。为了避免产生烟，走私船上烧的一般是宾夕法尼亚州产的无烟煤，或威尔士州产的半烟煤。拿索是最重要的中立港口，查尔斯顿和威尔明顿是走私贸易中最重要的邦联港口。偷过封锁线的船离开拿索一小时后，可以在夜间靠近查尔斯顿或威尔明顿。越过封锁线一般在没有月亮的夜间进行。靠近封锁舰队时，走私船会熄灭船上所有的灯，将发动机舱天窗和罗盘箱用油布遮起来，在一片漆黑中前行，没有一丝声音。发出必要指令和报告周边情况时，船员必须压低音量。船上的蒸汽在水下释放。很多走私船能轻易越过封锁线，但有时候也会遭到追捕。一些船能侥幸逃

脱，但如果舰船追得太紧，就不得不靠岸被捕。这是一场偷渡者和封锁者之间的激烈较量，只有勇敢者才能参与。

关于偷过封锁线，有很多充满冒险色彩的有趣故事。为了降低风险，走私船一般都是特制的，在超载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摸索着绕过封锁舰队，在黑夜中抵达港口。一旦被追捕，走私船只能通过各种手段躲开追兵。勇敢无畏的走私商人喜欢大雾、黑暗和神秘，他们的故事非常浪漫，不像封锁者的故事那么可怕。偷过封锁线的人不定期出航，大胆一搏。封锁者必须不间断巡视，时刻保持警惕，密切关注海上的动静，因为紧急状况一般在几分钟内发生，而且不易察觉。沿海大部分地区有很多水湾。封锁船只需要经住大风的考验，就可以在靠近敌对海岸的地方停泊。由于没有先例可循，加上逃避封锁的走私船拥有蒸汽动力，封锁变得异常困难。英国渴望获得棉花，友好的中立港口离南方很近，因此，走私商人常常冒险闯过封锁线。捕获的船只数量和躲过封锁线的难度是衡量北方联邦海军能力的尺度。一个个港口陆续被封锁，只剩下查尔斯顿和威尔明顿。因为威尔明顿处在开普菲尔河入口处的岛屿上，所在海岸地形特殊，所以是最难封锁的港口。1863年和1864年，威尔明顿与拿索和百慕大的贸易量很大。1863年6月16日，亚瑟·弗里曼特尔经过威尔明顿，看到“八艘铅色的大型轮船，外形雅观，贸易往来十分频繁”。1865年1月，北方联邦军攻占了费希尔堡，制止了往返于费希尔港的走私贸易。费希尔港的走私贸易停止前的六个月里，走私船被捕的可能性很大。查尔斯顿一直开放，直到威廉·T.谢尔曼北进逼退南方邦联军 [8] 。但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建造最精良的轮船才有可能闯过封锁线，而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封锁期间，北方联邦海军需要极大的耐心，不能奢望成就丰功伟绩。执行封锁任务时，不需要做好随时开战的准备，只需要严格遵守纪律，有耐心。但封锁对联邦政府至关重要，对内战结果起着重要作用。



费希尔堡的走私贸易

第8节　黑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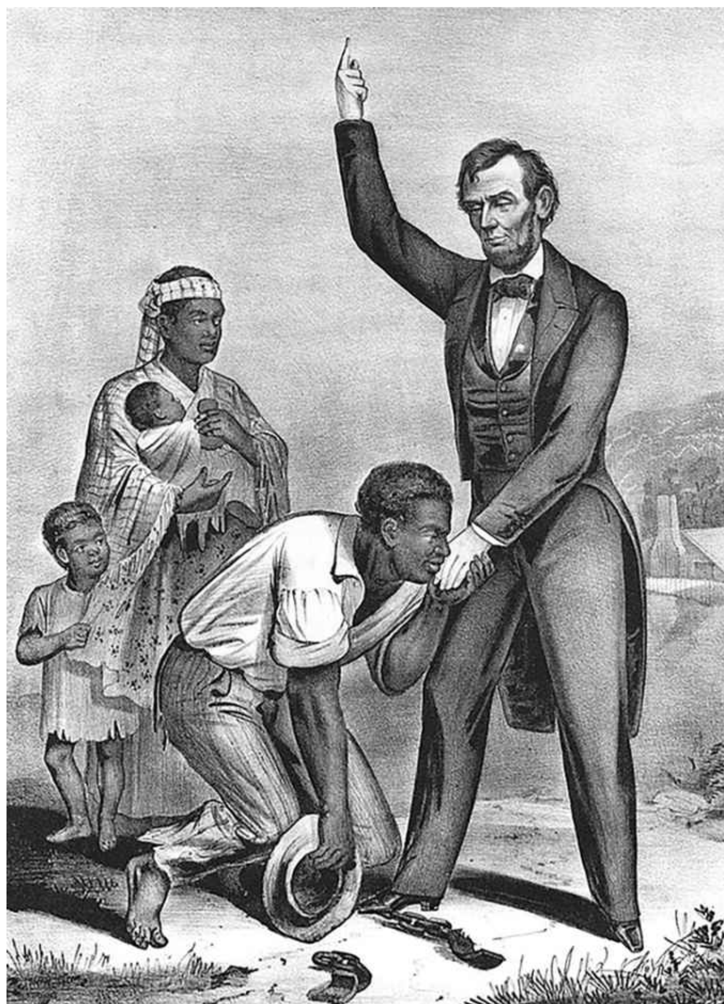
黑奴是棉花种植的主要劳动力。在风谲云诡的历史中，关于黑奴的奇事很多。譬如，在美洲，三百五十万黑奴默默劳作着，后来，战争将他们带到了南方，但1862年9月开始，北方联邦军为了他们的自由浴血沙场。事实证明了人们重复多次的一个观点，即黑人无意反抗。亨利·格雷迪说：“一千把火炬就能让南方邦联军溃散，但可悲的是，南方从未出现一把火炬。”黑奴没有反抗，对主人忠心耿耿，通过辛勤劳作为南方邦联军提供食物，协助南方邦联军继续为奴隶制而战。没有黑奴，就没有棉花，南方就只能从欧洲和北方获得棉花。一位南方邦联陆军参谋官说：“黑奴是我们的强大力量，因为八百万黑奴生产的战斗物资相当于北方两千万人生产的战斗物资。”拥有或监管二十名奴隶的人可以不用服兵役，以“维护当地治安”。但相关研究表明，这一规定并非一种限制，而是有意引导。实际上，除了少数人，身体健全的黑人一直留在人口稀疏的南方种植园，种植园附近的白人也都是老人、病患、女人和孩子。南方的这一现象非比寻常，不仅体现了南方黑人的美德，还突出了驯服黑奴的文明社会的特点。

黑奴逐渐理解了林肯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意识到北方获胜对自己的意义。随着北方联邦军进入南方，许多明白自由价值的黑人常跟在军队后面，给指挥官带来了诸多不便。黑奴对北方联邦军很友好，为逃出邦联监狱的俘兵提供吃的，将他们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指引他们前往北方联邦军营。此外，一些黑奴会将女主人的贵重物品藏起来，以免被北方联邦军中的流民或掉队者偷走。他们的藏匿技巧很高明。因此，并不是所有黑奴都忠心不二。许多南方邦联军官的贴身仆人对他们很忠诚，将他们从生死线或牢里解救出来。但在一些重要的战役中，其他黑人常给北方联邦将军当向导。

第9节　南方征兵

南方征兵比北方早。南方邦联军节节败退，重要据点多纳尔森堡失守。因此，1862年4月16日，邦联政府通过了征兵法案。征兵法案规定：所有十八岁至三十五岁的白人男子必须参军。1862年9月27日通过的法案将征兵范围扩大到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所有白人男子。起初，只有四十岁或四十岁以下的白人男子入伍。但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后，杰斐逊·戴维斯下令，所有四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的白人男子必须入伍。1864年2月17日，南方邦联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所有十七岁至五十岁的白人男子必须参军 [9] 。尤利西斯·S.格兰特说："他们连老人和小孩都不放过。"

人们逐渐厌倦了战争，逃亡在所难免。许多人不喜欢强制服兵役，只要有机会就会逃走。乡愁和难以下咽的饭菜成为士兵们逃离的原因。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的失败使逃兵数量激增。詹姆斯·A.塞登 [10] 的一位朋友写道："亲爱的詹姆斯·A.塞登，毫无疑问，我们的大势已去。"截止1863年7月24日，逃跑的士兵已达数百人，甚至有整个团离开的。逃兵几乎都带着枪。请假离开军队时，他们"会拍拍自己的枪并挑衅地说：'我要休假。'"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逃兵据点，大胆的逃兵们联合起来，一起在农场里劳作，用移动的脱粒机打粮食，在安静的院子里聚会喝酒，起誓要向抓捕他们的人复仇。1863年9月7日，南方战争部副部长约翰·A.坎贝尔法官总结了呈给邦联战争部的相关证据，写道："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和亚拉巴马州山区的形势威胁到了南方邦联的存亡，与北方联邦军一样致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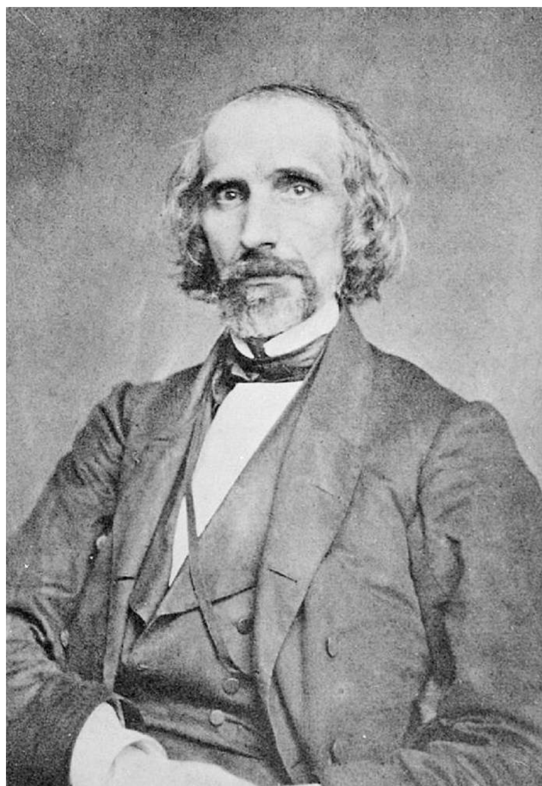
关于《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漫画：奴隶自由

1864年的官方文件中，极少提到逃兵的相关信息。1864年4月28日，詹姆斯·A.塞登做报告时，语气中透露出几分满足。罗伯特·E.李和约瑟夫·E.约翰斯顿的军队纪律严明，士兵们英勇抗敌，表明通过公众情绪的影响和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严厉措施，逃跑行为已经大大减少。然而，1864年秋天的军事行动给南方邦联带来了灾难。与此同时，林肯的连任表明，北方联邦军会继续勇往直前。有人强烈建议停止强制征兵，重新招募志愿兵。当时，南方邦联逃兵的实际人数已有十万人。逃兵人数并不能成为谴责征兵政策的理由，但暗示南方已经失败。

第10节　法定货币的狂欢

就严格界定的金融运作而言，邦联政府发行了纸币，债券收益以纸币形式支付，为政府提供资金。债券持有人通过购买债券获得了收益。由于封锁严密，棉花出口税和进口税的收益微不足道。国内税收也没有筹集到大笔资金。邦联政府试图维持铸币支付的做法是徒劳的。一些人估计，1861年到1865年，邦联政府的铸币收入约为两千七百万美元。截至1863年底，邦联财政部发行的流通中的纸币有七亿美元。1864年，流通中的纸币额增加到十亿美元。虽然纸币发行额很大，但具体数额一直没有公开，可能邦联财政部也不知道具体数额。不过，发行的纸币额并没有达到通货膨胀的程度。邦联各州还发行了州纸币，银行扩大了州纸币的流通范围。里士满、查尔斯顿和其他城市发行了市政国库券，铁路、收费公路、保险公司、工厂和储蓄银行也发行了大量纸币。市政和公司的纸币大部分以低于一美元的面额发行，解决了因小额银币消失引起的找零问题。在北卡罗来纳州，三英寸的钉子按每个五美分的价格流通。有时，邮票也会成为辅币。烟草商、杂货商、酒馆老板和牛奶经销商也推出了纸币。1862年，南方邦联政府开始发行一美元和两美元的钞票及一美元以下的小额钞票。这简直是法定货币的狂欢。

1864年，很多南方人认为必须采取措施减少货币。1864年2月17日，法国大革命的金融历史在美国重演。邦联政府规定：必须用纸币兑换4%的债券。如果不兑换，所有面额低于一百美元的纸币应换成新币，比例为三美元的旧币换成两美元的新币。如果两种兑换方式都不用，那么旧币征收淘汰。该规定表明，南方邦联国会和总统承认破产。除非独立，否则邦联政府的财政状况毫无转机。



詹姆斯·A.塞登（1815—1880）

在交易中，南方人很乐意接受北方纸币，承认北方拥有丰富的资源。在里士满，有人用北方纸币报价，经纪人的办公室里也能看到北方纸币。南方邦联货币贬值的另一个表现是，以物易物现象的出现。厂商和店主在报纸上打广告说，愿意用自己的产品换取农副产品。1864年3月29日，詹姆斯·A.塞登给罗伯特·E.李写信说：“为了获得补给，我们绝不能采取发行多余货币的措施，因为这一措施代价太高、麻烦太多……我打算大范围启用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

第11节　南方物价飞涨

与通货膨胀相伴而生的是飞涨的物价。当时和后来的一些作品中，都谈到了物价问题，指出生活质量的提高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戴维斯夫人的家庭生活和个人日记生动记录了很多事实。1862年7月，黄金价格是一点五美元每盎司，里士满的牛肉和羊肉的价格是每磅三十七点五美分，土豆价格是每蒲式耳六美元，茶叶每磅五美元，靴子每双二十五美元。1864年初，一美元黄金兑换二十二美元的邦联货币。根据戴维斯夫人的记录，当时，一只火鸡的价格是六十美元，面粉每桶三百美元。1864年7月，鞋子每双一百五十美元。

黄金的价格稳步上升，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也随之上涨。在南方邦联最后的日子里，商品价格飞涨。两位英国人的经历表明，不是商品贵，而是钱不值钱了。1863年6月，亚瑟·弗里曼特尔在查尔斯顿写道："查尔斯顿酒店收费合理，每天八美元，相当于一美元黄金多一点。"1864年1月，一位住在里士满最好的酒店里的英国人说："这是我住过最便宜的酒店。"确实，他每天的住宿费用是二十美元，相当于英国的三先令。

第12节　强制征税势在必行

南方邦联政府最担心的是军队补给问题。1863年，由于财政体系瘫痪，邦联政府采取了以农产品抵十分之一税的措施，通过强制征收农产品代替税收。人们逐渐认识到，仅凭购买粮食供养军队是不可能的。强制征收农产品的法案开创了“私有财产公用”的体制，影响深远。在一定限度内，军官可以为了储备物资或“作战”征用邦联任何地方的财产。

南方人对强制征收农产品的法案提出了强烈抗议。抗议活动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邦联战争部意识到了强制征收农产品的危害，试图纠正错误，但一切补救措施都是徒劳。强制征收农产品的法案不但很难执行，而且极不公平，遭人厌恶。但局面已经不可逆转，邦联政府必须继续执行相关政策。

有人提议用高税收、贷款和以市场价购买农产品等方式代替强制征收农产品的政策，但不切实际。1863年，税收所得货币一直在贬值。1864年，市场上的货币数量虽然很少，但价值比1863年还低。邦联政府尝试发行了各种债券及市场可以容纳的贷款。与国库券数量相称的债券数量比人们预期的少，原因不是财政管理不善，而是南方没有足够的可用资金作为永久性投资。众所周知，南方将剩余资本用在了土地和黑人上。1863年1月1日，现代商业运作机制被原始商业取代。实际上，南方没有铸币，即没有现代财政体系的基础。现代财政体系由可兑现的货币和债券构成。战争爆发时，南方邦联不仅没有存款，还欠了北方和欧洲的很多债。由于封锁，邦联港口也关闭了，邦联政府失去了从国外借钱的机会。从走私船的货物明细中可以看到，南方通过走私贸易获得的商品并不多。走私贸易和与北方的交易为南方邦联带来了军备物资，也将南方的棉花带了出去，但依然不能为政府提供足够的钱或引进铸币。因此，采用什一税和强制征收农产品势在必行。

在这种情况下，什一税是最合适的征税方法。虽然什一税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引发了人们的怨言，但大部分证据表明，什一税制度运作良好。与其他治国政策一样，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由于人们并不清楚战争规模及其持续时间，政府迟迟没有采用什一税。早在1862年，邦联政

府就应该采取强制征收农产品的措施，以便减轻后来的征税负担。1863年，事态持续恶化，强制征收农产品势在必行。强制征收农产品的法案没有问题，但实施过程出了问题。人们的怨气说明，由于疏忽、缺乏统一性和执行方式过于严苛，一项合理的法案变得令人憎恶。在南方人口稀少的地区，强制征收农产品的法案遇到了很多障碍。和平时期的农业社会使用的方法已经不再有用。训练有素的官员需要制定一套管理体系，应对战争带来的诸多难题。设计一套管理体系需要独创性，但南方的独创性远不及北方。

然而，南方虽然没有铸币，没有存款，也没有畅通无阻的贸易，但有土地和劳动力。通过一种不太完美的方式，邦联政府为军队和民众分配了食物，坚持作战四年。

第13节　南方女性

里士满离战场很近。战斗结束后，大批伤员被送到里士满。伤员们需要精心照顾。1862年，里士满的公立和私立医院共有三十五家，教堂也成为伤员们的临时疗养地。南方女性的奉献热情高涨，很多贵族女性来到医院照顾遍体鳞伤的伤员。由于没有麻醉剂和吗啡，伤员们疼痛难忍，医生也无力缓解他们的痛苦。当时的情景可以用一句诗描述："当痛苦和烦恼攀上眉梢，你就是救死扶伤的天使！"[11]

虽然这句诗由来已久，但热爱自己事业的人总能从中找到新的灵感。南方邦联的很多文学作品充满对女性的感激之情，尤其是里士满的文学作品。

第14节　焦虑与物资匮乏

战争让北方女性痛苦不堪，也让南方女性苦不堪言。在北方，许多家庭可能没有参军的近亲。但在南方，没有上战场的男性寥寥无几，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在为家人祈祷。此外，焦虑一直萦绕在南方人的心头。与北方相比，南方受战争影响的人更多。里士满收到战报的速度相对较快。经常响起警报表明危险正在靠近里士满，人们非常不安。由于经常看不到报纸，收不到邮件，一些偏远地区的人表示，自己宁愿整天活在警报声中，也不愿因得不到消息一直焦虑。

物资的匮乏加重了南方人精神上的痛苦。南方邦联女性先是缺奢侈品，后是缺生活必需品，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日常生活中，她们面对的贫困和我们熟悉的一样。战前和战后，南方人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战前，很多人家里的粮食储备充足，浪费现象司空见惯，食物压得桌子吱吱响。曾经的南方人生活奢侈，待人慷慨，仆人众多。贵妇们从不考虑食物从何而来，也从未屈尊干过任何体力活。现在，由于北方联邦军逼近，贵妇们离开豪宅，前往里士满避难。在里士满，她们排队站在最便宜的商店前，等着用微薄的工资买面粉或培根。她们的工资是“干针线活”、誊抄文件或在政府部门任文职赚来的。文职工作一般不会给女性，除非很有能力。财政部的一个职位能引来一百名女性申请者，其中很多人出自书香世家，以前的家境很不错。过惯了奢华生活的贵妇也开始干一些仆人的活。南方女性非常厌恶仆人的活，但依然得笑着忍耐。此外，她们还要面对缺乏干净食物的处境，心里盼着南方能够独立，奴隶制得以维持。很多南方女性认为，北方在改革社会结构，但她们和母亲一直生活在这一社会结构下，此外，迫使她们遭受苦难的战争逐渐逼近南方，南方正在捍卫自己应有的权利。看到乡村荒废，城镇遭到肆意破坏，品行不端的北方联邦军四处劫掠，女性们怒不可遏，口出恶语发泄心中的愤怒。佐治亚州一位年轻的女士在日记中写道：“即使将所有语言中表达仇恨的话语合成一个表达憎恶的词语，也无法诉说我对北方联邦兵的憎恨。”

第15节　充满宗教色彩的南方

和北方一样，南方邦联士兵和人民也有着深厚的宗教情感。一名传教士谈到了南方邦联军中盛行的“虔诚行为”。在1864年4月28日的报告中，詹姆斯·A.塞登证实了“宗教的巨大影响和人们的虔诚之心”。乔治·盖瑞·埃格尔斯顿记叙道：“在战争的最后一年，罗伯特·E.李的军中进行了一场复兴布道会。每个帐篷都举行了祷告会，士兵们手中拿着《圣经》，整个军队为宗教而狂。”令人欣慰的是，圣公会的史册中记录的一件事减轻了战争带给人们的痛苦。南方的主教和神职人员请求北方的同事送来两三千本祈祷书及南方邦联军使用的教堂手册。联邦政府允许北方神职人员通过北方联邦军的防线，为南方送去祈祷书和教堂手册。

第16节　南北对比

总之，南北双方的一些观念差异不言而喻。南方邦联国会多次拒绝将财政部发行的纸币定为法定货币，对《宪法》中的相关条款 [12] 进行了详细阐释。在多次讨论中，虽然将纸币定为法定货币的立法受到了罗伯特·E.李等人的支持，但关于《宪法》的争论阻碍了该立法的通过。

邦联《宪法》规定：“除非在反叛或入侵的情况下，公共安全受到威胁，否则人身保护令特权不得中止。”南方邦联政府非常关注个人自由，但南方人更倾向行使强权。一开始，林肯就有权通过行政法令暂停人身保护令。杰斐逊·戴维斯从未声称拥有类似的权力。南方人普遍认为，只有国会拥有暂停人身保护令的权力，除了明确的法规限制，南方邦联公民可享有人身保护令特权。在1864年2月15日通过的法案中，南方邦联国会大胆主张自己的权力，即“暂停人身保护令的权力……完全属于国会，只有国会有权判断是否有必要暂停人身保护令”。在四年内战中，南方邦联暂停人身保护令的时间总计为一年五个月零两天，不到战争持续时间的一半。在北方，只要行政部门或其授权的人认为有必要，人身保护令可以随时随地暂停。反对征兵的人、政治犯和涉嫌“参与不忠行动”的人无权享有人身保护特权。北方行政部门下令暂停人身保护令的时长为一年十个月二十一天，其余时间由国会批准暂停。

总体上，关于行使强权的争议焦点是：北方联邦和南方邦联是否平等。在北方，“不忠的”秘密组织逐渐扩大，威胁到了联邦政府。公众对联邦政府的批评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犀利。此外，一个有组织的政党成为反对派的领导者，袭击了克莱门特·法兰迪加姆。南方邦联政府中没有与克莱门特·法兰迪加姆职位相当的人，当下的时局也与上述情形呼应。内战的战场在南方 [13] ，因为短时间内，南方邦联军从未北进越过梅森-迪克逊线 [14] 和俄亥俄河。1862年10月，约翰·A.坎贝尔法官写道：“民政管理非常松懈，邦联政府耗费了很多精力，但里士满仍然是一个被重重包围的城市。我们与外国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受到北方联邦军攻击的地方遭受了一支强大军队的袭击。”只要有北方联邦军的地方，一旦南方邦联军中出现不忠之举，就会使北方联邦军获益，继而大胆发动战争。与前线不同的是，不忠之举会在呐喊、危机和秘密的午夜誓言中消

散。实际上，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地方并不重要，也从未受到北方联邦军的入侵或威胁。南方的法院一直是开放的。由于社会动荡，贸易中断，各州通过了留置法，法院审判的商业案件越来越少，主要处理刑事案件和附议国会法案，或帮想逃避兵役的人签发人身保护令。

第17节　北方：独裁

北方的媒体基本上是自由的，但一些期刊也会遭到压制。南方的媒体完全自由，没有受到过任何压制。因为南方报纸极少进行新闻采访，大部分新闻都参考了北方报纸，所以并不会让南方邦联将领感到不快。北方报纸经常会估计军队兵力，猜测军队动向，让联邦将领很恼火。有时，根据罗伯特·E.李或詹姆斯·A.塞登的要求，里士满的期刊会删除可能对北方联邦军有利的新闻，但政府并不强制期刊删除信息。南方人和北方人都可以参加公开集会，但北方人可以随意发表自由言论。

南方人认为，北方联邦政府已经沦为一个军事独裁体。与此同时，北方人认为，南方邦联政府的政权是镇压一切反对声音的暴政。两种观点的依据显而易见。理论上，南方比北方更自由，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无论是北方联邦还是南方邦联，真正需要人身保护令特权的人很少。但南方所有健康的年轻人和中年人都被强制要求服兵役。邦联政府按照规定的垄断价格强行征用了有钱人的财产。联邦政府也许是一个独裁者，因为国会和人民将一部分权力交给了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第18节　南方：社会化国家

南方邦联是一个社会化国家，邦联政府需要处理的事务很多。譬如，邦联政府直接征收农产品税，并规定商品价格，管理铁路运营，经营制造业，进行对外贸易等。邦联政府做的一切需要征得民众的一致同意，但人们希望政府做得更多。从当时的报纸、公开和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到，南方人经常要求扩大邦联政府、各州政府和各市政府的职责范围。一些人人为，扩大政府的职责范围似乎不可能。于是，州主权被提了出来。

南方一直存在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军事部门以外的政务能否得到妥善处理？邦联政府的下级部门没有妥善处理相应的事务，财政部长也没有表现出应对困难的能力。此外，邮局经营不善，但没有人探究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情形复杂还是邮政大臣没有能力。国会和海军部及时抓住了机会。国务卿犹大·本杰明不仅负责国外事务，还是杰斐逊·戴维斯的好友和秘密顾问，但他涉嫌贪污，被指控从事棉花投机买卖，在英国的账户上有一大笔钱。一些谣言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犹大·本杰明到达英国后，有一段时间几乎身无分文。因此，他即使有非法所得，也已经花完了。实际上，内战期间，犹大·本杰明的生活条件很不错。

第19节　杰斐逊·戴维斯与林肯

杰斐逊·戴维斯将注意力都放在了战争部。据说，战争部长詹姆斯·A.塞登只是他的首席文员。除了杰斐逊·戴维斯和詹姆斯·A.塞登之间不重要的、存在争议的信件，研究杰斐逊·戴维斯、詹姆斯·A.塞登和约翰·A.坎贝尔法官的文件时，会清楚看到他们的行政能力。事实上，任何政府都会对他们的能力感到自豪。如果单独考虑一些事实，我们可能会问北方联邦军征服南方邦联军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没有联邦领导人出众的政治能力和北方人对林肯的坚定支持，北方一定不可能征服南方。

与杰斐逊·戴维斯相比，林肯的能力更强，但杰斐逊·戴维斯是一个可敬的对手。杰斐逊·戴维斯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国外对此议论纷纷。人们甚至猜测如果他去世了，南方邦联政府该如何维持下去。1864年12月，由于杰斐逊·戴维斯患有脑部疾病，人们都以为他命不久矣。杰斐逊·戴维斯身体消瘦，面容憔悴，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很多，忧心邦联的命运使他不堪重负。但他的家庭生活甜蜜幸福，聪颖贤惠的妻子深爱着他。喜欢对比的人会发现，战争期间，林肯和杰斐逊·戴维斯都失去了一个的儿子。威廉·华莱士·林肯1862年病逝，年仅十二岁。约瑟夫·埃文·戴维斯还是个调皮的小男孩时，从门廊上跌落下来，不治身亡。

然而，杰斐逊·戴维斯如果赢了，一定会残酷对待被征服者。1864年10月，他问道："有没有人想过，我们撤退就能战胜北方联邦军吗？你们不知道驯服猎犬的唯一方式是鞭打吗？"林肯第二次就职演说的精神标准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北方胜利的原因可以用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的话概括："当一个国王处事轻率、残忍时，温顺的赌徒是最后的赢家。"

[1]　内战伊始，南方邦联根本没有海军，后来发展起来的海军都是临时召集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薄弱的海军工业潜力基础上，南方邦联海军的发展状况良好。——编者注

[2]　《观察者》，1914年9月12日，第366页。——原注。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北方联邦海军的封锁比詹姆斯·福特·罗德斯提到的更重要。南方没有大型铸铁厂，重工业更是寥寥无几。在没有进口的情况下，南方必须自给自足，被迫大力发展工业，但明显不能满足战时需要。——编者注

[3]　在南方腹地，许多铁路都是在南北方向的线路上运行，而不是在物资匮乏

的东西线上。很快，由于军事行动，为数不多的几条东西线路中断。因此，轨道和设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编者注

[4] 包括停站时间。——原注

[5] 此处提到的从查尔斯顿到里士满用十小时指詹姆斯·福特·罗德斯写此书时的交通状况。——编者注

[6] 硝石矿业局是南方邦联的一个平民政府机构，旨在为邦联各州提供铜、铁等金属材料。——译者注

[7] 实际上，南方邦联的战时军需品虽然不像其他物资那样短缺，但很多地方极缺小型武器、弹药、子弹头和雷管，尤其是弗吉尼亚州。——编者注

[8] 查尔斯顿确实一直开放，直到驻军撤离。但1863年后，查尔斯顿并不像威尔明顿那么好接近。查尔斯顿的北方联邦舰队很集中，北方联邦军占领了海岸线。因此，从查尔斯顿偷渡封锁线很难。此外，查尔斯顿港的地形复杂，不具备优势。——编者注

[9] 十七岁到十八岁和四十岁到五十岁的士兵是州防的后备力量，不应该上前线。——原注

[10] 詹姆斯·A.塞登（James A. Seddon，1815—1880），南方邦联战争部长。——原注

[11] 引自英国小说家和诗人沃尔特·司各特描写女性的诗。——译者注

[12] 南方邦联和北方联邦关于法定货币的条款相似。——原注

[13] 南方邦联的每个州几乎都有支持北方的区域。譬如，在田纳西州东部，支持联邦的人烧桥掠夺，给南方邦联军带来了很大麻烦，尤其是阻挠了铁路的正常运输。——编者注

[14] 梅森-迪克逊线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分界线，也是内战爆发前美国的南北分界线。——译者注

第13章　战争尾声：威廉·T.谢尔曼的战略布局

第1节　威廉·T.谢尔曼和乔治·托马斯

1864年9月，威廉·T.谢尔曼在亚特兰大安营扎寨。当时，他四十四岁，正值盛年，身强体健。三年丰富的作战经验夯实了他的军事理论知识。同时，他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友谊深厚，共同致力于联邦大业。此刻，威廉·T.谢尔曼“大脑高速运转”，谋划着一次非比寻常的行动，率军朝海边进发。他提议让乔治·托马斯迎战约翰·B.胡德，自己前往佐治亚州。但林肯非常担心留在后方的约翰·B.胡德，认为“一次失误对北方联邦军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与此同时，约翰·B.胡德渡过田纳西河，进入了田纳西州[1]。尤利西斯·S.格兰特怀疑威廉·T.谢尔曼的计划是否明智，问威廉·T.谢尔曼，在开始南下前，是否能先打败约翰·B.胡德的军队。但威廉·T.谢尔曼预料到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疑虑，已经发急件给他，以此打消他的疑虑。尤利西斯·S.格兰特回复道“按你的计划进行吧！”

威廉·T.谢尔曼率军朝海边进发，从萨凡纳北上。与此同时，乔治·托马斯在田纳西州采取了行动。查塔努加-亚特兰大战役后，这一系列作战行动可能是北方联邦军唯一一次大胆有效的战略部署，也是查塔努加-亚特兰大战役的后续。如果一百个人计划进军，那么只有真正的将军才会预见对手可能采取的行动，想好防范计策，预估分裂南方邦联会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后果。威廉·T.谢尔曼小心谨慎，充分考虑了此次冒险计划中的困难。当其他人都反对他的时候，他像维克斯堡战役中的尤利西斯·S.格兰特一样，表现出英勇无畏、不屈不挠的品质。约翰·B.胡德渡过田纳西河后，只有勇敢坚定的将军才会毅然进军佐治亚州[2]，尤其尤利西斯·S.格兰特还质疑他的行动是否明智。威廉·T.谢尔曼是指挥官，了解自己的将士，也清楚当下的形势，明白除非乔治·托马斯打败约翰·B.胡德，否则北方联邦军胜利无望。他很清楚计划中存在的风险，但也非常了解乔治·托马斯。威廉·T.谢尔曼和乔治·托马斯是西点军校的同学，友谊深厚。虽然两人性情不和，意见总是相左，但在内战中越来越亲密。

威廉·T.谢尔曼对乔治·托马斯充满信心，为他配备了足以应付所有突发状况的兵力，希望他守住田纳西州。乔治·托马斯发电报说："我如果有约翰·斯科菲尔德的协助，一定会更有信心。"[3] 威廉·T.谢尔曼将约翰·斯科菲尔德的军队从自己军中分离了出来，命其北上支援乔治·托马斯。1864年11月10日，威廉·T.谢尔曼启程向海边进发[4]。乔治·托马斯写信告诉他："我不担心皮埃尔·博勒加德[5]或约翰·B.胡德对我们不利。如果他们想追上你，我会尽快追上他们；如果他们不追你，我会彻底整顿我的军队。我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兵力打败他们，除非他们迅速撤离。"[6]

第2节　威廉·T.谢尔曼向海边进军

与此同时，北方联邦指挥官们并不确定约翰·B.胡德是否会追上威廉·T.谢尔曼，或北上前往纳什维尔。实际上，前往海边的军队并不需要太多人。约翰·斯科菲尔德如果能得到一万援军，就可以免去一些后顾之忧。此外，开战时如果出现问题，威廉·T.谢尔曼一定有足够的兵力打败约翰·B.胡德，并击退前来支援的散兵。威廉·T.谢尔曼的最终目标是“增援弗吉尼亚的北方联邦军”，因此，在尤利西斯·S.格兰特到来前，他本来有足够的兵力对抗罗伯特·E.李。他以为田纳西州的北方联邦军比约翰·B.胡德的军队人数“多” [7] 。根据1864年11月1日到1864年11月12日发生的一切，毫无疑问，威廉·T.谢尔曼和乔治·托马斯的军队人数相当。

威廉·T.谢尔曼谨慎考虑了自己的决定。出发前的六天里，他已经做好准备。如果要配合乔治·托马斯追上约翰·B.胡德，就必须兵分两路，一路直逼南方邦联军，另一路负责切断南方邦联军的退路。威廉·T.谢尔曼认为，“首要目标应该是消灭约翰·B.胡德的军队” [8]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开始相信，向海边进军是最有利的计划，于是下定决心执行自己的计划。1864年11月12日，威廉·T.谢尔曼在卡特斯维尔停留时，收到了乔治·托马斯的最后一封信。他回复乔治·托马斯说：“好的。” [9] 南方邦联军烧毁了一座桥，切断了乔治·托马斯与华盛顿之间的所有通信。乔治·托马斯像“朱利安进入马西安森林或黑森林的深处”一样，前途未卜。与此同时，威廉·T.谢尔曼也失去了联系 [10] 。1864年11月12日到1864年12月14日，华盛顿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威廉·T.谢尔曼的消息。威廉·T.谢尔曼写信给尤利西斯·S.格兰特说：“我不会派信使回去，但会通过里士满的报纸让你了解情况。” [11] 接下来的三十二天里，林肯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只能通过南方期刊得知威廉·T.谢尔曼的消息。

威廉·T.谢尔曼对当时的局势印象深刻，说：“敌对双方的行军方向正好相反，而且都胸有成竹，认为自己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2] 他的话常常前后不一。此次行军从侧面反映出，威廉·T.谢尔曼不太关注他人。他主意多，说话快，想到什么说什么，不管考虑得周不周全。几乎和所有实干家一样，他今天的想法可能会取代昨天的想法，明天的新想法又会取代今天的想法，但并不妨碍他做出正确决定，也不会影响他执

行计划的坚定立场。尤利西斯·S.格兰特沉默寡言，不是一个健谈的人，不会因为威廉·T.谢尔曼书信中的前后不一致谴责他。他很少表现出焦虑，也不会想没有发生的事。威廉·T.谢尔曼的一句话形象描述了他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不同性情："尤利西斯·S.格兰特并不在乎视线以外的南方邦联军，但我会为此坐立不安。"

北方联邦军在亚特兰大集结时，毁了城里能用的火车站、机械厂和其他建筑物。北方联邦军的右翼和左翼派出部分军队提前出发了。1864年11月16日，威廉·T.谢尔曼率第十四军团从亚特兰大出发。他拥有六万两千名"身体强健、经验丰富的士兵。军队装备精良，供给充裕，生活、劳作、打仗所需的物资应有尽有。" [13] 一支乐队正在演奏《约翰·布朗之歌》，士兵们合唱道："光荣，光荣，哈利路亚，他的英魂在前行。"一股激荡人心的力量油然而生，士兵们想起了1859年12月以来发生的所有事。1859年12月2日，人们心中的圣人约翰·布朗英勇就义 [14] 。北方联邦军继续向海洋进发。天气晴朗，空气宜人，战士们兴奋不已。许多普通士兵向威廉·T.谢尔曼喊话："比利大叔 [15] ，我想尤利西斯·S.格兰特正在里士满等我们。"威廉·T.谢尔曼叙述说："将士们'不顾一切'，我感到责任重大。" [16] 此次行军并非战斗，就像查塔努加-亚特兰大的战役一样，作战计划一步步展开。到达萨凡纳后，威廉·T.谢尔曼写道："前行途中，我们一直没有遇到那头'狮子'。" [17] 将士们将此次行军视为一次"野餐""一场盛大的节日聚会" [18] 。压力都在负责指挥的将军身上。在南方邦联军的领地，威廉·T.谢尔曼必须竭尽所能，保证军队的供给。军队出发时，威廉·T.谢尔曼命人准备了约二十天的面包和四十天的糖、咖啡和盐及三天的草料、充足的弹药。所有物资由两千五百辆马车拉运，一辆马车配有六匹骡子。此外还有成群结队的家畜，可以为军队提供一个多月的鲜肉。救护车有六百辆，大炮只带了六十五门。由于要过很多河，配合运送军队的火车也随时待命。北方联邦军的右翼由第十五和第十七军团组成，左翼由第十四和第二十军团组成。每个军团分到了三百辆货运列车，分头行进，通过列车行进了五英里多。与军队先锋和后卫部队随行的大炮、列车走正路，战士们走旁边的小路。黎明时分，北方联邦军开始日常行军，正午过后扎营，每天一般行军十到十五英里。七天内，左翼军穿过佐治亚州的中心地带，到达佐治亚州的州府米利奇维尔。南方邦联军非常恐慌，担心梅肯或奥古斯塔会遭遇袭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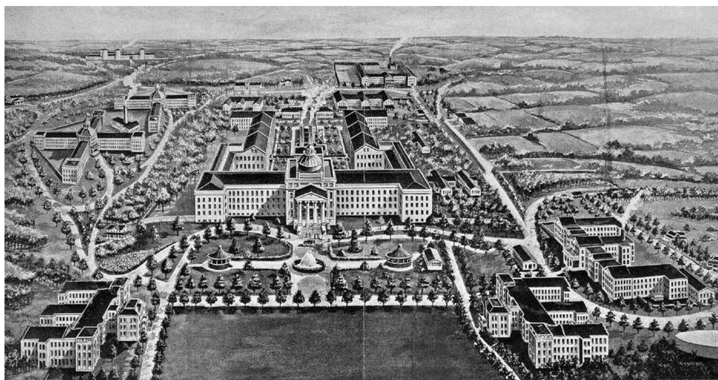
因此分散了兵力。当南方邦联军意识到萨凡纳才是北方联邦军的目的地时，已经无法集结军队进行防御了 [19] 。1864年12月10日，北方联邦军逼近萨凡纳，结束了三百英里的行军，开始围攻南方邦联军。



被毁坏的民居



被毁坏的工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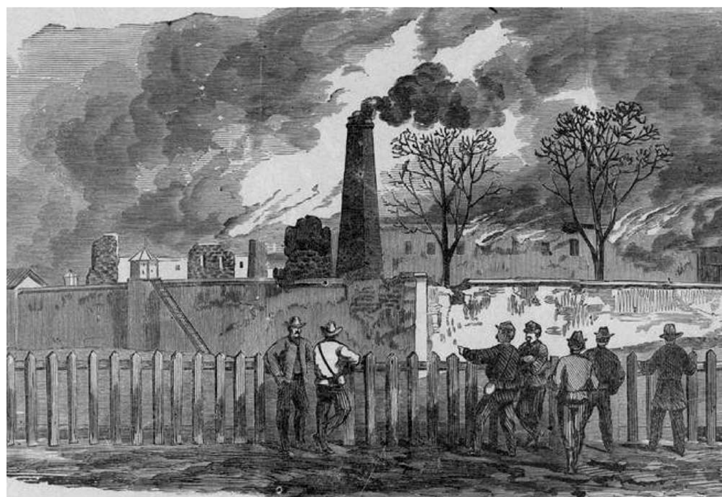
米利奇维尔

第3节　就地觅食

1864年11月9日，北方联邦军中一份特殊的战场命令称："行军途中，军队可以就地寻找食物。"[20] 佐治亚州人烟稀少，从当地权贵手中征用物资的计划显然不切实际。因此，就地觅食成了为军队提供补给的唯一可行方式。做出寻找食物的相应部署后，战士们立即行动。每个旅派出约五十人徒步搜寻食物。回来时，士兵们骑着马，赶着牛和骡子，拉着装满新鲜羊肉、熏肉、火鸡、鸡、鸭、玉米面、糖蜜罐和番薯的货运马车与家用马车。佐治亚州的农作物刚刚丰收，人们本来打算留着食物过冬。因为佐治亚州从未遇到过北方联邦军入侵，所以粮食和草料都很丰裕。虽然威廉·T.谢尔曼和其他将领竭力维持军队秩序，但士兵们搜寻食物时常常不受约束。威廉·T.谢尔曼写道："一名士兵从我面前经过，枪上挂着一根火腿，腋下夹着一罐高粱饴，手里拿着一大块蜂蜜。他正吃着蜂蜜时看到了我，低声对同伴说：'就地寻找食物'。"[21] 威廉·T.谢尔曼责备了这名士兵。看到其他士兵违反纪律时，他也会进行责备，并指明"必须选出合格的士兵寻找食物"。威廉·T.谢尔曼以军队为傲，战士们也对他充满信心，他很欣喜。抵达萨凡纳后，他并没有严厉责备士兵们，只写道："寻找食物时，他们的行为略显散漫。他们本不应该这样的。"[22] 北方联邦军中一片欢声笑语，欢乐的聚会正在进行，尤其是一些将领在米利奇维尔众议院的集会。联邦将领们组建了佐治亚州的立法机构，并选举了一位发言人，经过正式讨论后举行了公平投票，废除了"脱离联邦法令"。

第4节　破坏

行军过程中，北方联邦军对沿途的破坏也是行军的一部分，尤其因为罗伯特·E.李军队的大部分补给源自佐治亚州。在奥古斯塔的一次演讲中，杰斐逊·戴维斯说：“佐治亚州的粮食产量不仅可以满足本州人民和军队的需要，还可以补给弗吉尼亚军。”威廉·T.谢尔曼注意到，切断海湾各州 [23] 和里士满之间的铁路交通至关重要。因此，他命人烧毁了很多桥梁和栈桥，炸毁了石砌涵洞桥。在破坏铁轨方面，北方联邦军的工程兵和佐治亚州的精工巧匠展开了一场较量。北方联邦军的总工程师设计了一种通过燃烧轨枕加热轨道的机器，使轨道扭曲变形。密歇根州和密苏里州的工程师用同样的机器破坏了轨道。但北方联邦军中有很多破坏欲很强的步兵，他们也参与了铁路破坏。士兵们将烧到赤热的铁轨抬到附近的大树旁，绕着树干将其扭曲或翘得面目全非。被破坏了的轨道除了当旧铁，别无他用，甚至连工厂也不愿用。北方联邦军破坏了约二百六十五英里铁路，直戳杰斐逊·戴维斯的心脏。威廉·T.谢尔曼说，杰斐逊·戴维斯的政府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因为南方很少有可以生产替换轨道的工厂，很多港口也被封锁了，无法进口轨道。佐治亚州沿线的车站和机械厂都被烧毁了，数千包棉花及大批轧棉机和打包机付之一炬。在米利奇维尔，威廉·T.谢尔曼报告说：“我烧毁了佐治亚州的铁路和兵工厂，但保留了州政府和州长的住所。” [24] 北方联邦军到来前，囚犯们烧毁了监狱。威廉·T.谢尔曼向一个黑人询问北方联邦右翼军的动向。黑人描述说：“先来了一些骑兵，烧了车站；又来了一些步兵，拆毁了轨道。我离开前，他们将楼点着了。” [25] 总的来说，威廉·T.谢尔曼不愿破坏私人财产，但到达海边后，他写的所有信件几乎都表现出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在萨凡纳，他写道：“亚特兰大到萨凡纳周边三十英里的地区，我们得到了谷物和饲料，还有甘薯、牛、猪、羊和家禽，并带走了一万多匹马和骡子及无数奴隶。据我估计，我军对佐治亚州及其军事资源造成的损失有一亿美元，其中至少有两千万美元为我们所用，其余的都是浪费和破坏所致。虽然战争很艰难，但直接或间接引发了灾难的人清楚意识到，战争是多么残忍。” [26] 也许正如威廉·T.谢尔曼后来说的：“战场就是炼狱。”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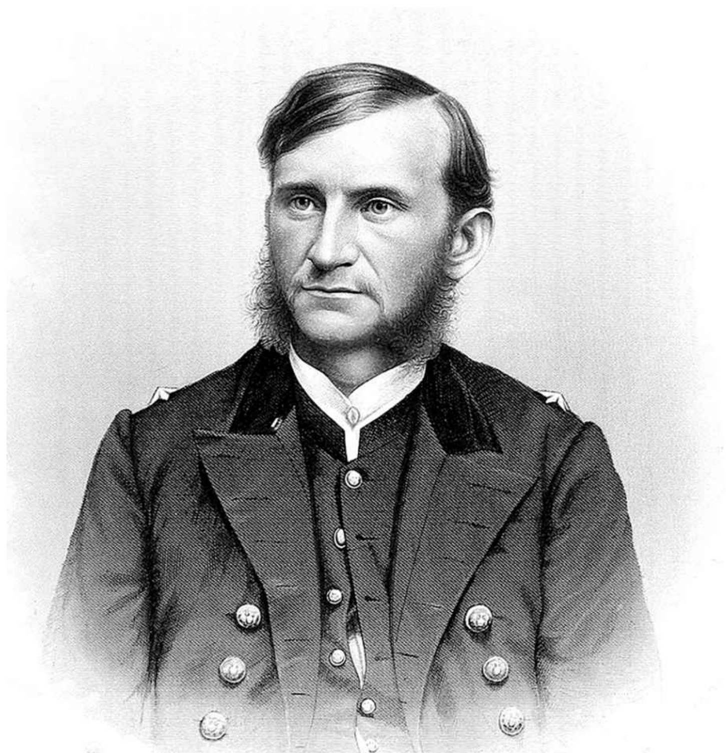


囚犯烧毁监狱

威廉·T.谢尔曼下达的各种命令表明，士兵们不仅在寻找食物时不受约束，烧毁建筑物时更是随心所欲。有人对西部的北方联邦军的一项严厉指控是掠夺。威廉·T.谢尔曼并没有否认事实，雅各布·D.考克斯也承认了士兵们的不法行为。战争结束后，威廉·T.谢尔曼听说很多女士的珠宝被抢了，但认为罪魁祸首是被称为“无赖”的抢劫者。雅各布·D.考克斯称抢劫者为“惯犯”，将大部分不法行为都归在这些人身上。士兵们掠夺他人财物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想留下一些纪念重大事件发生地的东西。此外，虽然北方联邦军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作战队伍，但因为疏于严明军纪，所以很多士兵认为，在敌方领地掠夺他人财物是合理的。然而，联邦将领们都拥有崇高的品质，非常想让士兵们遵纪守法，违反纪律的士兵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不应忽视的一点是，北方联邦军受到指控的掠夺行为中，许多实际上是南方邦联军所为。概括描述联邦将领时，值得一提的是，北方联邦骑兵指挥官休·J.基尔帕特里克因不道德行为和贪婪臭名昭著，常以军情紧急为由，无视威廉·T.谢尔曼的命令。当时，他的越轨行为使军队士气低落，自此背上了坏名声。然而，威廉·T.谢尔曼曾写道：“我从未听闻有人四处杀戮或奸淫。”[28]

第5节　黑人

威廉·T.谢尔曼的行动重创了南方奴隶制。北方联邦军所到之地，受到了黑人的热烈欢迎。在卡温顿附近，一位白发苍苍的黑人对威廉·T.谢尔曼说："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一直在寻找上帝的天使。"他认为北方联邦军的胜利会给黑人带来自由。一位黑人奴隶的代言人对威廉·T.谢尔曼的副官说："希望上帝保佑你们胜利。我和所有黑人都觉得你们是为我们而来。"在米利奇维尔，黑人们欣喜若狂，高呼："上帝保佑！感谢万能的主，北方联邦军来啦！好日子来了！"[29] 北方联邦左翼军的指挥官说："行进途中，每一英里都有很多黑人加入我们。"黑人们想要立刻得到解放的愿望很强烈。如果不是威廉·T.谢尔曼反对黑人跟随军队，那么加入北方联邦军的黑人可能会更多。威廉·T.谢尔曼允许身强力壮的年轻黑人参军，但引发了大麻烦，因为军队需要养活的人数增加了。令人担忧的是，与南方邦联军大规模交战时，黑人会妨碍军队的行动。但林肯宣布解放黑人奴隶的消息传播甚广。



休·J.基尔帕特里克（1836—1881）

北方联邦军的军事行动对南方人影响很大。杰斐逊·戴维斯写道：“威廉·T.谢尔曼的行动对我们的人民产生了消极影响。”[30] 起初，南方人普遍认为，北方联邦军的此次行动相当于自投罗网，很可能被击退或被彻底消灭。南方人低估了北方联邦军的兵力，高估了南方邦联的防御措施。此外，南方当时的军事部署毫无杀伤力。行军途中，北方联邦军几乎没有遇到阻力，威廉·T.谢尔曼称其为“现代阿提拉[31] ”的胜利之行。显然，许多南方人已经厌倦了战争。

第6节　攻占萨凡纳

威廉·T.谢尔曼与华盛顿失去联系的三十二天里，北方人只能从里士满的报纸和其他南方期刊上得到他的消息。北方的日报节选印刷了南方的报纸期刊。林肯非常担忧威廉·T.谢尔曼的安全。根据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回忆，当时，北方人很挂念军中的丈夫、儿子或兄弟。1864年12月14日夜晚，华盛顿第一次收到了威廉·T.谢尔曼的消息。1864年12月18日，威廉·T.谢尔曼来信说自己已经开始与舰队联系。1864年12月20日夜晚，南方邦联军撤离萨凡纳。威廉·T.谢尔曼占领了萨凡纳，并给林肯发了急件。圣诞节晚上，林肯收到了他的信。威廉·T.谢尔曼在信中说："我渴望将萨凡纳作为圣诞礼物奉上。萨凡纳城中有一百五十支重型枪、大量弹药及约两万五千包棉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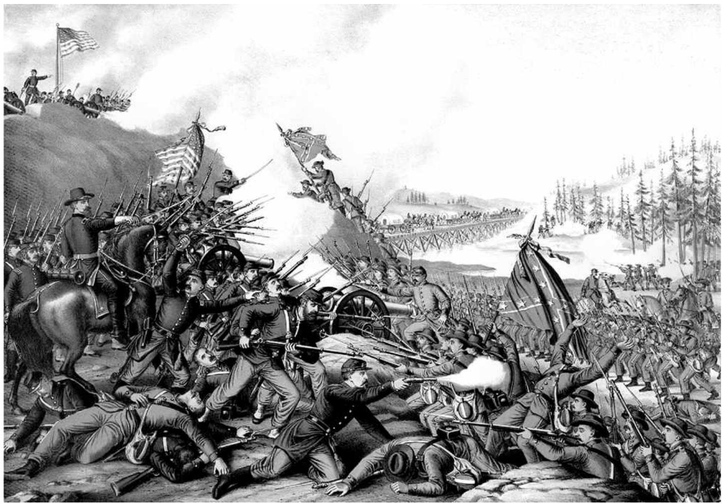
各种迹象表明，约翰·B.胡德打算进攻田纳西州。威廉·T.谢尔曼派雅各布·D.考克斯北上，并对他说："如果有硬仗要打，你就打吧。" [32] 事实确实如此。北方联邦军分散了兵力。约翰·B.胡德认为"打乱威廉·T.谢尔曼进军佐治亚州计划" [33] 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1864年11月21日，他发动了进攻，开始向纳什维尔挺进 [34] 。约翰·B.胡德的兵力比约翰·斯科菲尔德的多，而且他精力旺盛，机智敏捷，完全发挥了自己的优势。约翰·斯科菲尔德竭力拖住南方邦联军，以便协助乔治·托马斯集结军队。他意识到自己的兵力不及对手，明智选择了撤退 [35] ，安全撤到了富兰克林。在富兰克林，冲动的约翰·B.胡德逼迫约翰·斯科菲尔德背水一战。南方邦联军展开了猛烈的正面攻击，但被击退，伤亡惨重 [36] 。雅各布·D.考克斯与约翰·斯科菲尔德平分了"辉煌胜利的荣耀。" [37] 乔治·托马斯命北方联邦军前往纳什维尔。

约翰·B.胡德追击约翰·斯科菲尔德来到纳什维尔，停在纳什维尔城前。此时，他的军队只有两万六千人。南方邦联军的末日即将来临 [38] 。1864年12月11日，约翰·B.胡德在报告中解释了继续北上的原因，即"迫使北方联邦军主动进攻。" [39] 在纳什维尔，乔治·托马斯的军队有四万九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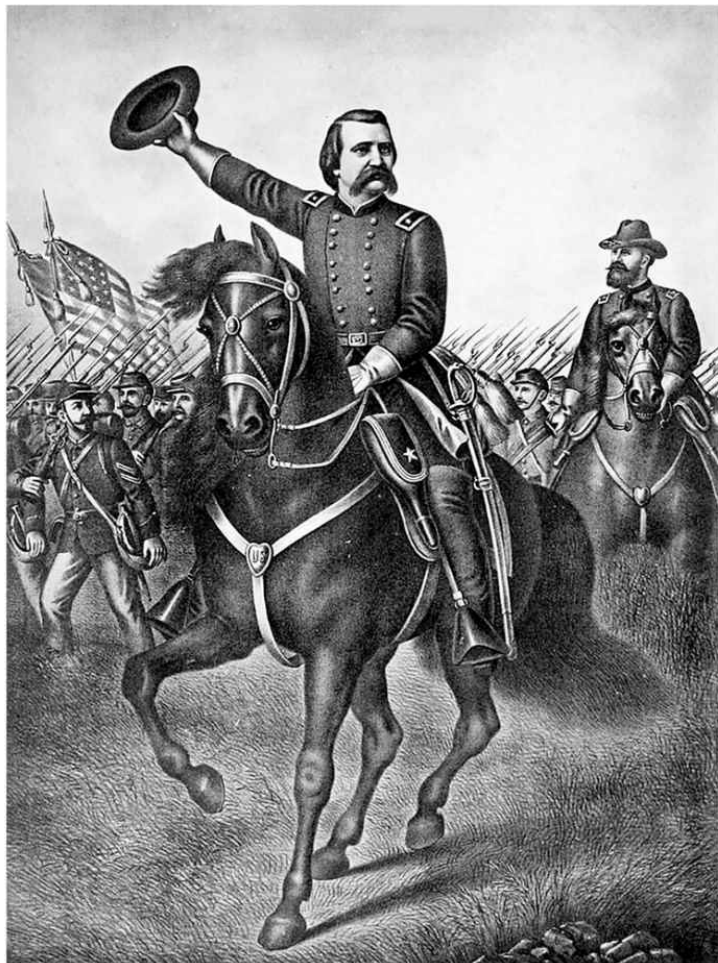
第7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乔治·托马斯

乔治·托马斯清楚当前的局势，知道自己应该进攻约翰·B.胡德。他坚信约翰·B.胡德不会前往俄亥俄河，或向南撤退，于是准备进攻，打算一举击溃南方邦联军。与此同时，尤利西斯·S.格兰特越来越不耐烦，似乎不赞成乔治·托马斯的行动。两人互不理解，对军事行动的看法截然不同。尤利西斯·S.格兰特很喜欢威廉·T.谢尔曼和菲利普·谢里登，总是忽略他们的缺点，但1864年12月，他对乔治·托马斯一直很挑剔。如果要确保威廉·T.谢尔曼的作战计划成功，打败约翰·B.胡德是必要的。因此，尤利西斯·S.格兰特对乔治·托马斯的延误十分恼火[40]。1864年12月6日，他下令“即刻进攻约翰·B.胡德”。但乔治·托马斯依然按兵不动。尤利西斯·S.格兰特打算撤去乔治·托马斯的职务，由约翰·斯科菲尔德接替，但他暂时没有发出撤职令。1864年12月11日，他发电报给乔治·托马斯说：“不要再拖延了。”与此同时，一场雨夹雪将纳什维尔周围的山丘变成了冰坡。军队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只能等冰雪融化。乔治·托马斯将情况上报给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尤利西斯·S.格兰特以为乔治·托马斯又在找拖延借口，一气之下，派约翰·A.洛根前往纳什维尔接替乔治·托马斯[41]。随后，他越来越焦虑，决定亲自前往纳什维尔。但在途中，他得到了乔治·托马斯发动进攻的消息。

尤利西斯·S.格兰特对乔治·托马斯存在偏见，只看到了乔治·托马斯性格的一面。虽然乔治·托马斯有意放慢脚步，但富兰克林战役后，他已经完全掌控了局势，非常适合对付冲动的约翰·B.胡德。威廉·T.谢尔曼将重任交给乔治·托马斯时，就发现了这一点。此外，乔治·托马斯深受士兵的信赖和爱戴。不管怎样，都没有理由让约翰·斯科菲尔德或约翰·A.洛根取代乔治·托马斯。结果表明，乔治·托马斯完全担得起肩上的重任。



富兰克林战役



约翰·A.洛根（1826—1886）

第8节　纳什维尔战役

1864年12月15日，乔治·托马斯袭击了约翰·B.胡德的军队，并发起第二次进攻，重创南方邦联军[42]。1864年春天，尤利西斯·S.格兰特接管了联邦所有军队。他的主要计划是消灭或俘虏罗伯特·E.李的军队，打败西南部的南方邦联军。1864年底，他的一半计划已经完成。约翰·B.胡德的军队溃败。1864年5月，约瑟夫·E.约翰斯顿率五万三千名精兵强将阻止威廉·T.谢尔曼的行军。可以确定的是，约瑟夫·E.约翰斯顿的军队并没有全军覆没，但大多数士兵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休假的休假，能继续战斗的已无一人。虽然两支小分队的遭遇会让人们想起约瑟夫·E.约翰斯顿军队的悲惨命运，但战争史册上再无此军。约瑟夫·E.约翰斯顿率领九千名装备不全、垂头丧气的士兵来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其他一千六百九十二名士兵去了莫比尔。

杰斐逊·戴维斯解除了约瑟夫·E.约翰斯顿的职务，将军队交给了约翰·B.胡德接管，不知不觉加快了西南地区的南方邦联军的灭亡。在亚特兰大附近，威廉·T.谢尔曼试图消灭约翰·B.胡德的军队。在富兰克林，约翰·斯科菲尔德重创了约翰·B.胡德的军队。在纳什维尔，乔治·托马斯完全击溃了约翰·B.胡德的军队。联邦将领们有谋有略，战士们英勇忠诚、精力充沛。当然，如果没有乔治·托马斯在纳什维尔的胜利，威廉·T.谢尔曼进军佐治亚州可能会让北方人倍感失望，但两人的行动共同构成了击溃南方邦联军的作战计划。俘获罗伯特·E.李的军队也是一项伟大成就。当人们为威廉·T.谢尔曼和乔治·托马斯的胜利欢欣鼓舞时，林肯、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威廉·T.谢尔曼正在制订结束内战的计划。

第9节　《第十三条修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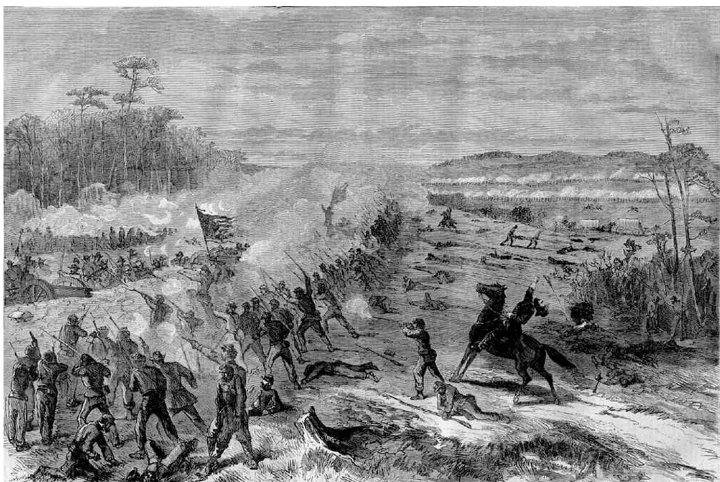
林肯非常希望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彻底废除美国的奴隶制。上一届会议中，参议院通过了废除奴隶制的修正案，但众议院未能获得规定的三分之二投票。现在，众议院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动，但林肯指出，大选表明人民是支持废除奴隶制的，1865年3月4日组建的众议院一定会通过废除奴隶制的修正案，然后各州会对修正案进行投票，“难道我们不应该提前同意吗？”他建议众议院重新考虑并通过废除奴隶制的修正案 [43] 。1865年1月31日，林肯的愿望实现了。众议院宣布，按照《宪法》规定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废除奴隶制的修正案通过。人们热情高涨。“为了纪念这一伟大而神圣的事件”，众议院休会 [44] 。现在，废除奴隶制的修正案被称为《第十三条修正案》，并得到了四分之三州的认可 [45] 。对比1861年3月通过的编号为十三的修正案和1865年颁布的《第十三条修正案》，会发现美国四年间的巨大变化。1861年的修正案写道：“不得对《宪法》做出任何修正。《宪法》授权或赋予国会权力。在任何州范围内，国会有权根据该州法律废除或干涉其扣留他人进行劳动或服务的内部制度。”1865年通过的修正案是当代《宪法》的一部分，其中写道：“美国境内或受其管辖的任何地方都不应存在奴隶制和强制劳役制度。”

第10节　南方邦联的困境

南方已经无力回天。威廉·T.谢尔曼率大军穿过了佐治亚州。在纳什维尔，约翰·B.胡德溃不成军，南方邦联军中处处弥漫着消沉情绪。罗伯特·E.李注意到，军中的“逃兵越来越多”，主要是因为“粮食不足，军饷空空”[46]。虽然南方邦联纸币已经失去价值，但罗伯特·E.李连纸币也没有。购买一美元黄金需要六十美元的邦联纸币，牛肉售价为每磅六美元，面粉每桶一千美元。天气寒冷，军队几乎没有取暖的柴火。约翰·B.琼斯记录当时的温度为0℃，一根柴的价格是五美元[47]。在困境中，1865年1月16日，费希尔堡沦陷的消息传来[48]，意味着南方邦联的最后一个开放港口——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也被封锁了。南方商人的走私贸易就此告终。与欧洲的贸易为南方提供了生活和作战物资，但现在，海外贸易彻底中断了。南方邦联的存亡取决于罗伯特·E.李的军队，但雪上加霜的是，罗伯特·E.李的军队没有食物果腹。虽然威廉·T.谢尔曼的行军切断了佐治亚州对南方邦联军的补给，但南方邦联军可以从弗吉尼亚州西南部和卡罗来纳州获得补给。然而，从里士满到丹维尔的铁路线已经无法使用，车头、车厢和机件年久失修，很难保证运行安全。罗伯特·E.李上报说，军队所到之处，所有食物被“一扫而光”。南方邦联军的总军需官写道：“几个月来，北弗吉尼亚州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49]。军队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缺钱。在北卡罗来纳州，商人们担心南方邦联军不付钱，拒绝出售任何商品。在波托马克河沿岸的一些弗吉尼亚州县区，人们以前认为，热爱邦联就应该用邦联的纸币，拒绝使用联邦纸币。但现在，人们卖掉了牛和猪，只为换取联邦纸币、棉花或黄金。在弗吉尼亚州，通常要用黄金或美元才能获得马。一个国家的纸币价值标志着社会稳定与否。人们虽然有邦联货币，但逐渐意识到邦联政府的金融体系已经崩溃，联邦货币似乎更受欢迎。因此，南方人对邦联大业失去了信心。北方联邦军控制区域内的交通网是罗伯特·E.李军队的重要补给线，关系着棉花交易，之前由南方邦联政府机构管理。



纳什维尔战役



纳什维尔战役中西尔维斯特·希尔上校被邦联军炮火击毙

南方人的心中充满沮丧和不满。杰斐逊·戴维斯对国会感到不满，国会也对他不满，很多人对杰斐逊·戴维斯和国会都不满。弗吉尼亚州大会投票决定，任命罗伯特·E.李为邦联所有军队的指挥官，以此“提高效率”，“鼓舞”战士和人民。大会委员谦恭自信地向杰斐逊·戴维斯表达了弗吉尼亚州的观点。杰斐逊·戴维斯表示赞同，回复道完全同意弗吉尼亚州大会的意见。不久，杰斐逊·戴维斯任命罗伯特·E.李位为大将军[50]。重要的是，无论人们在其他方面是否意见相左，都一致认为罗伯特·E.李是救世主。当时的局势体现了罗伯特·E.李的个人影响力。大雨破坏了里

士满到丹维尔的部分铁路，也破坏了罗伯特·E.李军队的主要补给线。因此，罗伯特·E.李的军队已经几天没有得到粮食了。根据邦联战争部的建议，罗伯特·E.李以个人名义请求农民、磨坊主和其他公民，希望他们为南方邦联军提供食物。虽然罗伯特·E.李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但人们心甘情愿上交了很多物资，试图帮南方邦联军渡过难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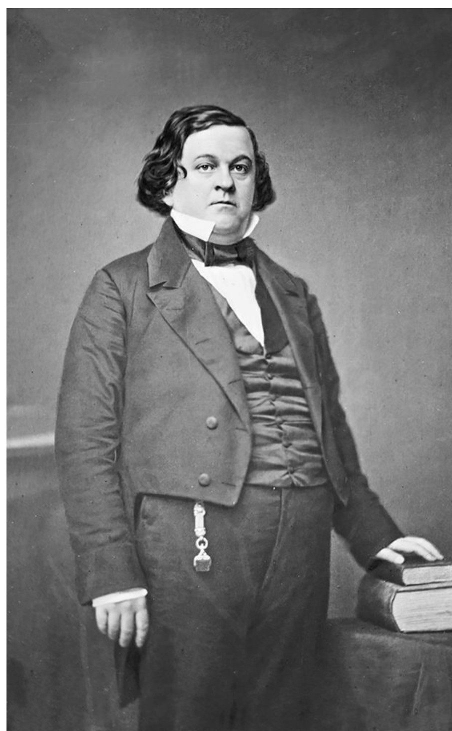
威廉·T谢尔曼向海岸进军，一路烧毁房屋，拆毁铁路

第11节　罗伯特·E.李和杰斐逊·戴维斯

在南方人心目中，罗伯特·E.李的地位远高于杰斐逊·戴维斯。但在困难时期，杰斐逊·戴维斯是仅次于罗伯特·E.李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杰斐逊·戴维斯根据自己的职务行使权力，但罗伯特·E.李大权在握，使人很难了解民意。人们渴望和平。如果北方允许南方邦联独立，那么每个南方人都愿意与北方和平相处。杰斐逊·戴维斯赞同这种观点，但“没有意识到南方已经人心涣散”[51]。他满怀希望，战胜疾病和衰弱站了起来。但显然，他已经手脚不便，才竭智疲。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各种建议层出不穷，但毫无疑问，南方人还没有认清现实，即北方已经凭借优势资源和有效的管理打败了南方。然而，说不清楚有多少南方人看清了历史的必然趋势，即除非废除奴隶制，重建联邦，否则没有和平可言。也不知道有多少南方人愿意接受废除奴隶制的条件。当然，南方也许还有转机。从军事角度看，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解放所有捍卫南方邦联的奴隶。

第12节　汉普顿锚地会议

1864年，南方邦联提出允许奴隶入伍。1865年1月11日，允许奴隶入伍的政策得到罗伯特·E.李的认可。罗伯特·E.李建议立即解放所有入伍的奴隶，同时提出了“一个容易被接受的、渐进式的解放计划”[52]。但邦联国会并没有立即采纳他的建议。即使罗伯特·E.李的建议有益，也为时已晚，已经无济于事了。关于奴隶入伍的建议遭到了邦联国会的强烈反对。内战伊始，豪厄尔·科布拥有一千名黑人奴隶，强烈反对奴隶入伍。他写道：“你们让黑人入伍的一刻，就是结束革命的一刻。如果奴隶都能当好士兵，那么只能说明奴隶制是错误的。”[53] 事实上，也许有人问过：“如果我们自愿解放奴隶，那么为什么还要分裂，还要开战呢？”然而，如果在1865年1月问南方人：“你为何而战？”所有南方人几乎都会回答：“为了我们的独立，为了反抗北方联邦的压迫。”[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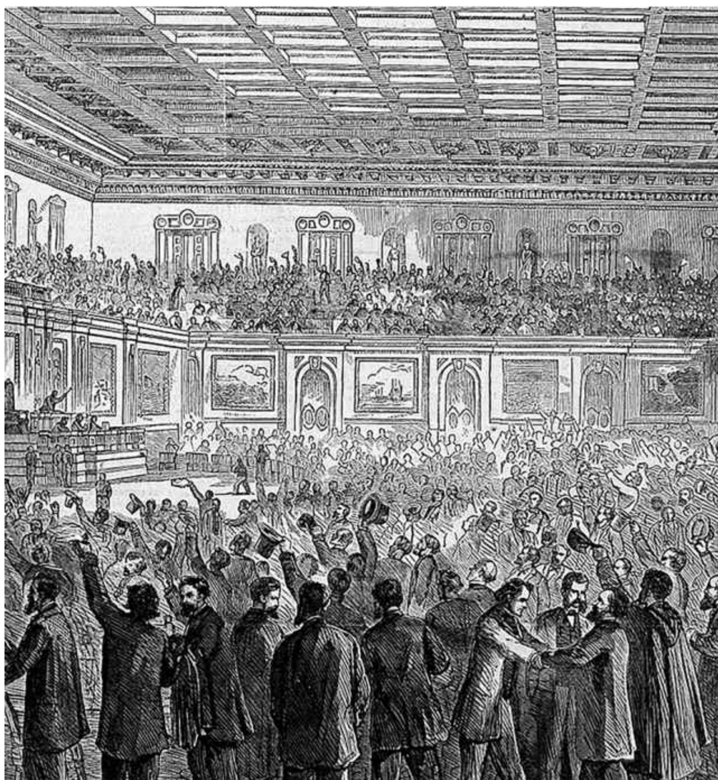


豪厄尔·科布（1815—1868）

在蒙哥马利·布莱尔的斡旋下，南北双方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一方

是林肯和威廉·H.苏厄德，另一方是邦联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约翰·A.坎贝尔法官和参议员戴维·亨特。这次会议被称为汉普顿锚地会议。1865年2月3日，在门罗堡附近停泊的一艘美国轮船上，汉普顿锚地会议召开。双方先进行了礼貌的问候，随后，林肯和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开始谈论辉格党。亚历山大·斯蒂芬斯问道："总统先生，难道没有办法结束目前的困局吗？"林肯回答道："我知道的办法只有一个，即让抵制联邦法律的人停止抵制……对我来说，恢复联邦是必需的。"约翰·A.坎贝尔法官问道：如果邦联各州同意恢复联邦，那么你如何恢复呢？林肯回答道："解散南方邦联的军队，让国家机构恢复正常。"谈到奴隶制时，林肯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改变或调整《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规定的条款。"威廉·H.苏厄德告诉南方代表，联邦国会刚刚通过了废除奴隶制的《第十三条修正案》。

亚历山大·斯蒂芬斯问道："如果南方邦联各州停止反抗，是否能列席国会？"林肯回答道："我认为可以，但我不能对这一问题做出任何承诺。"当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强调应该签订协议时，林肯说自己不能"与武装对抗政府的政党"签订协议。戴维·亨特说："这种事经常发生。譬如，英国内战期间，查理一世与英国议会签订了协议。"林肯回答道："我对历史知道的不多。关于历史方面的问题，我委托威廉·H.苏厄德回答您。但在我的印象里，查理一世最终失去了理智。"经过进一步讨论，林肯突然说道："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如果我在佐治亚州，一定会告诉你如果我是你，会做什么。我会回到南方，让各州长召集立法机关，召回参战的所有军队，然后选举参议员和国会议员，期待议会认可并执行《第十三条修正案》……无论战争爆发前的南方人怎么想，但现在，他们一定相信奴隶制气数已尽。在任何情况下，奴隶制都无法长期存在。我认为，你们的人民要走的正确道路是认可《第十三条修正案》，尽可能避免直接解放奴隶带来的消极影响。如果我是您，我就会这样做。"



通过《第十三条修正案》

戴维·亨特总结此次对话时说：“除了无条件臣服于仁慈的征服者，我们别无他法。”威廉·H.苏厄德礼貌地否认了戴维·亨特的观点。林肯说：“我全权负责《充公法令》和其他刑事法，很乐意做出清晰的解释，南方人可以完全相信我的保证。我应该享有行使行政权力的最大自由。”他接着说：“我愿意通过减税补偿南方人失去奴隶的损失。北方人和南方人一样，都应该对奴隶制负责。如果战争结束，各州自愿废除奴隶制，那么我会支持联邦政府向奴隶主支付一定的补偿金。在北方，我的这种想法很普遍，一些人甚至赞成为此拨款四亿美元……但在废除奴隶制问题上，我并不能保证什么，也不能做出任何规定。我只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及我认为的别人对奴隶制问题的看法。”在提交给众议院的报告中，林肯说：“汉普顿锚地会议无果而终。”[55]

如果罗伯特·E.李和杰斐逊·戴维斯共同掌权，一定可以更好地领导邦联国会和南方诸州。罗伯特·E.李心思缜密，尊重上级，但讨厌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因此，他不会劝杰斐逊·戴维斯进行和平谈判。如果关于

私人谈话的记录可以相信，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罗伯特·E.李已经对胜利失去希望。但杰斐逊·戴维斯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了所有下属，强烈反对在重建联邦的过程中，为南方争取更多有利条件。

第13节　宽宏大量的林肯

如果杰斐逊·戴维斯、罗伯特·E.李和南方邦联国会能够下定决心求和，那么在华盛顿时，林肯一定会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南方代表。

汉普顿锚地会议结束两天后，即1865年2月5日夜晚，林肯召集内阁，就一则即将发布的公告征求内阁成员的意见。公告建议国会授权总统，向武装反抗联邦的十一个南部邦联奴隶州和五个联邦奴隶州支付四亿美元补偿金，条件是所有反抗联邦政府的奴隶州必须在1865年4月1日前停止反抗。内阁一致反对林肯的提议。林肯深深叹了口气说：“如果你们都反对我，我就不发公告了。”对摇摇欲坠的南方邦联来说，林肯的提议体现了他的宽宏大量。1865年4月9日，罗伯特·E.李向尤利西斯·S.格兰特投降。如果南方邦联接受了林肯的提议，内战结束后，一定会立即出现一个兄弟联盟；如果南方邦联拒绝了，林肯和国会就会在史册上留下高尚的一笔。然而，林肯的提议过于明智和慷慨，无法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在所有当权者中，只有林肯的道德达到了崇高境界，因此，他只能形单影只，被迫妥协。然而，当人们回想1865年至1877年发生的事时，也许希望林肯当时的提议能通过。

1865年4月，林肯按照之前提出的补偿性解放精神，发表了第二次就职演说。他的演说掷地有声，是最伟大的总统的就职演说，也是最值得铭记的政府文件之一。

[1]　在佐治亚州的帕尔梅托，约翰·B.胡德与杰斐逊·戴维斯商议后，率军南下。1864年10月1日，他渡过了查特胡奇河，试图引诱威廉.T.谢尔曼离开亚特兰大。他率军突袭了北方联邦军从查塔努加到亚特兰大的铁路补给线。威廉·T.谢尔曼一路追赶南方邦联军，随后停了下来，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佐治亚州的行军计划上。此时，约翰·B.胡德的军队出现在了田纳西河畔的迪凯特。1864年11月2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批准了威廉·T.谢尔曼继续进军佐治亚州的计划。——编者注

[2] 威廉·T.谢尔曼做好决定时，约翰·B.胡德仍在田纳西河边，并未过河。——编者注

[3]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4卷，第3册，第582页。——原注

[4] 实际上，威廉·T.谢尔曼向海边进军并非始于亚特兰大，而是始于北佐治亚。在北佐治亚，他追击约翰·B.胡德，北方联邦军在追击途中集结。《威廉·T.谢尔曼将军回忆录》，第2卷，第169页。——编者注

[5] 皮埃尔·博勒加德曾负责掌管邦联战争部，是约翰·B.胡德的上级。——原

注

[6]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4卷，第3册，第756页。——原注

[7]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4卷，第3册，第659页，第660页。——原注

[8]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4卷，第3册，第659页。——原注

[9]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4卷，第3册，第657页。——原注

[10] 《约翰·吉本传》，第22章。——原注

[11]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4卷，第3册，第661页。——原注

[12] 《威廉·T.谢尔曼将军回忆录》，第2卷，第170页。——原注

[13] 《威廉·T.谢尔曼将军回忆录》，第2卷，第172页。——原注

[14] 北方联邦军并不认为内战是解放奴隶的改革运动，许多人厌恶这种观点。战士们的言语中没有表现出任何针对奴隶制的情绪，只表现出了对守卫联邦的热情。——编者注

[15] 比利大叔是威廉·T.谢尔曼的昵称。——译者注

[16] 《威廉·T.谢尔曼将军回忆录》，第2卷，第179页。——原注

[17]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4卷，第793页，——原注

[18] 《向海边进军》，第42页，雅各布·D.考克斯著。——原注

[19] 南方邦联军未能及时集结兵力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兵源。此外，北方联邦军的主力军人数很多，还有一些小分队。除非约翰·B.胡德留在佐治亚州，否则根本没有足够兵力对抗威廉·T.谢尔曼。——编者注

[20]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34卷，第3册，第713页。——原注

[21] 《威廉·T.谢尔曼将军回忆录》，第2卷，第181页。——原注

[22]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4卷，第14页。——原注

[23] 指美国濒临墨西哥湾的五个州，即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译者注

[24]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4卷，第789页。——原注

[25] 《威廉·T.谢尔曼将军回忆录》，第2卷，第191页。——原注

[26] 这些估计有夸大的成分。1860年，佐治亚州的地产和个人财产的评估总价为六亿一千八百二十三万两千三百八十七美元。《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4卷，第13页。——原注

[27] 这句话出自1880年8月12日的哥伦布《俄亥俄州日报》。该报报道了威廉·T.谢尔曼在1880年8月11日的演讲，引用了威廉·T.谢尔曼说的话："很多战士将战争视为无上的荣耀，但战场就是炼狱。"后来，他写过一句描述战争的话："战争

是残酷的，无法修饰。”认为“战场就是炼狱”是对他所写内容的曲解。参见《威廉·T.谢尔曼：好战的预言家》（Fighting Prophet），第635页到第636页，劳埃德·L.路易著。——编者注

[28] 《威廉·T.谢尔曼将军回忆录》，第2卷，第183页。——原注

[29] 《伟大行军记事》，第56页，第60页，乔治·W.尼古拉著。——原注

[30]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5卷，第2册，第778页。——原注

[31] 阿拉提（Attila，406—453），古代亚欧大陆匈人的领袖，曾使匈人帝国的版图达到盛极一时的地步。——译者注

[32] 《向海边进军》，第21页，雅各布·D.考克斯著。《军事回忆录》，第2卷，第326页，雅各布·D.考克斯著。——原注

[33]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5卷，第1册，第1215页。——原注

[34] 此次战役发生在佛罗伦萨和迪凯特附近。——编者注

[35] 约翰·B.胡德本来有两次机会困住约翰·斯科菲尔德的军队，但因指挥失误失败。内森·B.福里斯特差点成功攻占达克河上的哥伦比亚桥。1864年11月29日夜晚，在斯普林斯山以北几英里处，约翰·斯科菲尔德从约翰·B.胡德大军的不远处经过。约翰·B.胡德本来可以阻断主干道，围攻北方联邦军。虽然约翰·斯科菲尔德带兵有方，但确实是由于约翰·B.胡德的失误，北方联邦军才撤到了富兰克林，最后撤到纳什维尔。——编者注

[36] 1864年11月30日的富兰克林战役是内战中最残酷的战役之一。当时，北方联邦军参战两万七千九百三十九人，伤亡两千三百二十六人，阵亡一百八十九人。南方邦联军参战两万九千八百九十七人，伤亡六千两百五十二人，阵亡一千七百五十人。《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131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编者注

[37]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5卷，第1册，第343页。——原注

[38] 《乔治·托马斯传》，第316页，万·霍姆著。——原注

[39]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5卷，第1册，第658页。——原注

[40] 尤利西斯·S.格兰特说，所有人都担心“约翰·B.胡德会战胜北方联邦军”。《个人回忆录》，第2卷，第380页，尤利西斯·S.格兰特著。——编者注

[41] 乔治·托马斯率领的是坎伯兰州军和俄亥俄州军。——原注

[42] 1864年12月15日到1864年12月16日，在纳什维尔战役中，约翰·B.胡德的军队几乎全军覆灭，标志着西部地区的南方邦联军气数已尽。北方联邦军参战四万九千七百七十三人，伤亡三千零六十一人；南方邦联军参战两万三千二百零七人。参见《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132页到第133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南方邦联军估计伤亡一千五百人，但大军溃败，失踪人数不计其数。参见《田纳西军》，第417页，斯坦利·霍恩著。——编者注

[43] 《林肯全集》，第2卷，第613页，约翰·尼古拉、约翰·海伊著。——原注

[44] 《美国国会议事录》，第531页。——原注

[45] 1865年12月18日，《第十三条修正案》正式颁布。——编者注

[46]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6卷，第2

册，第1143页。——原注

[47] 《一名邦联战士的日记》，第383页，第384页，第386页，第400页，约翰·B.琼斯著。——原注

[48] 1865年1月15日，威尔明顿附近的费希尔堡沦陷。——编者注

[49]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6卷，第2册，第1035页，第1211页。——原注

[50]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6卷，第2册，第1084页，第1091页。——原注。南方邦联国会设了大将军一职。1865年2月6日，杰斐逊·戴维斯任命罗伯特·E.李为大将军。——编者注

[51] 《杰斐逊·戴维斯传》，第697页，弗兰克·H.阿尔弗林德著。——原注

[52]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四，第3卷，第1013页。——原注

[53]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四，第3卷，第1009页。——原注

[54] 1865年3月4日，南方邦联国会批准黑人奴隶入伍，但只有里士满的少数人入伍。——编者注

[55] 《美国史》，第5卷，第68页到第71页，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第14章　南方投降及林肯遇刺

第1节　威廉·T.谢尔曼行军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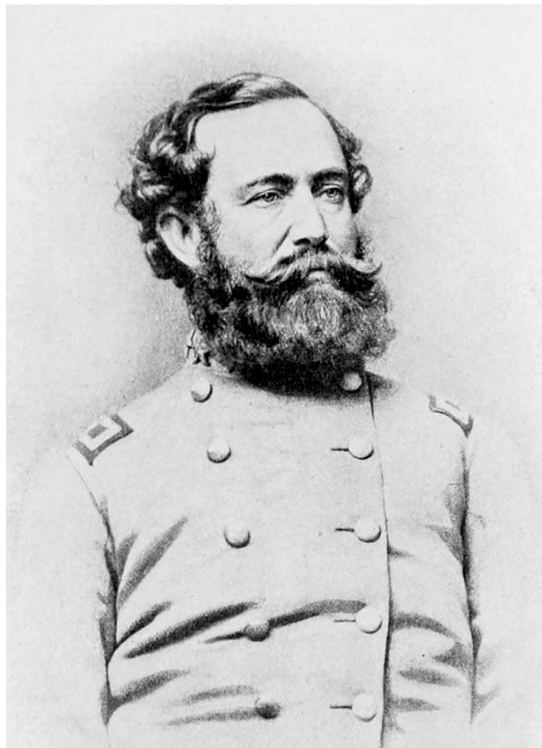
威廉·T.谢尔曼拥有六万兵力。从亚特兰大出发，抵达萨凡纳后，他的军队人数与出发前大致相同。1865年2月1日，威廉·T.谢尔曼率军离开萨凡纳，开始执行之前制订的作战计划。1865年3月23日，他到达北卡罗来纳州的戈尔兹伯勒，五十天内行军四百二十五英里。威廉·T.谢尔曼进军佐治亚州是明智的，但率军北上是与大自然展开的一场漫长斗争。行军刚开始，威廉·T.谢尔曼军队的第一师就遇到了暴雨。萨凡纳河水迅速上涨，堤坝决口，河水淹没了道路，淹死了很多士兵。等洪水消退后，北方联邦军成功克服了萨凡纳附近的重重困难，但又走进了康贝河和埃迪斯托河的沼泽地。随后，军队挣扎着通过了皮迪河和开普菲尔河流域的平坦泥潭，渡过了五条运河。冬季连绵不断的降雨让运河变成了湖泊。有时，军队在及腰深的冰水中行进。威廉·T.谢尔曼讲述道："一天，士兵们正在渡一条河流。河流两岸数英里内都是沼泽。在水中走了约一个小时，我们还看不到对岸。"一个士兵向伙伴大声抱怨道："哎，汤米，如果不是想着我们在纵向过河，我早晕了！"[1] 没有被水淹没的地方是厚厚的淤泥。连续不断的暴雨使路面泥泞不堪，将湿软的道路变成了深深的泥潭。雅各布·D.考克斯写道："又是一片混乱。"[2] 但勇敢坚韧的北方联邦军已经在泥泞的道路上行进了数百英里。士兵们在路上铺了干草军队也很难通过此地。此外，在约瑟夫·惠勒骑兵的带领下，许多黑人"伐树、烧桥，为威廉·T.谢尔曼的军队设置了重重障碍。"[3] 想要占领通过沼泽的长堤，就必须打败南方邦联军。因此，几乎每天都有小规模冲突发生。但北方联邦军依然以日均十英里的速度行进。在彼得堡，罗伯特·E.李写道："威廉·T.谢尔曼似乎能掌控一切。"[4] 约瑟夫·E.约翰斯顿说："自恺撒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优秀的军队。"[5]

第2节　南卡罗来纳州

威廉·T.谢尔曼军队的两千五百辆马车装满充足的弹药和大量补给。最初，军队的粮食供给刚够度日，士兵们只能就地寻找食物。从亚特兰大到海边的行军中，就地觅食非常实用。北方联邦军从南卡罗来纳州出发，直接穿过南卡罗来纳州的中心地带，所到之处都是熊熊燃烧的房屋和棉花。北方联邦军拆毁了沿途的铁路，点燃了枕木，弄弯了铁轨，破坏了所有列车的水箱、发动机和机械装置。南方邦联军放火焚烧了棉花，防止棉花落入北方联邦军手中。北方联邦军途经无法占领的地区时，烧毁了南方邦联军留下的一切。四年战乱让北方联邦军的将领们对南卡罗来纳州深恶痛绝。威廉·T.谢尔曼写道："将士们非常厌恶南卡罗来纳州，想要在此报仇雪恨。我很担心南卡罗来纳州的命运，但又觉得是咎由自取。"[6] 威廉·T.谢尔曼的想法尚且如此，普通士兵自然觉得烧杀抢掠南方人民是理所应当的，但许多非法行为都是掉队的士兵干的。从军事角度来看，威廉·T.谢尔曼的命令虽然是合理的，但给士兵们的肆意破坏提供了借口。也许是迫于形势和肩负的重担，面对士兵们的不法行为，威廉·T.谢尔曼只能置若罔闻。然而，有证据表明，许多联邦将领都曾竭力阻止士兵的掠夺行为，惩戒抢劫者。必须声明的是，由于休·J.基尔帕特里克不听指挥，助长了士兵们的破坏和掠夺行为。



约瑟夫·惠勒（1836—1906）



韦德·汉普顿（1818—1902）

此次行军中最著名的事件是，南卡罗来纳州首府哥伦比亚的大火造成的局部破坏。但这起事件不能归咎于威廉·T.谢尔曼、韦德·汉普顿或其他任何将领 [7] 。

威廉·T.谢尔曼占领了哥伦比亚，迫使南方邦联军在1865年2月18日放弃了查尔斯顿。南方邦联试图召集一支能够抵抗北方联邦军的军队，但从北方联邦军的行军态势来看，任何努力都是徒劳。杰斐逊·戴维斯听说必须放弃查尔斯顿时，写道："我曾希望听到一些好消息。现在，我失望至极。" [8]

查尔斯顿的很多财产遭到破坏。南方邦联军通过各种方式实施了破坏计划。北方联邦军队进入查尔斯顿时，发现城内的公共建筑、商店、仓库、铁路桥、私人住宅和棉花正燃着大火。为了报复导致了南北分裂的查尔斯顿，北方联邦军洗劫了该城。当时，大多数北方人对查尔斯顿的苦难并没有任何感触，只觉得是查尔斯顿咎由自取。查尔斯顿原本是一个优雅的富庶之地，但现在，城内的居民饱受战乱之苦，衣衫褴褛，

食不果腹，不禁唤起了我们的同情。

想要了解北方联邦军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行军，必须牢记的是，内战期间，北方联邦军对南卡罗来纳州的仇视起了主导作用。因此，在佐治亚州，北方联邦军并没有做出类似的事，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行为也并不出格，但给了掉队的士兵抢劫施暴的好借口。1865年3月7日，蒙哥马利·布莱尔在报告中说："今天，我在沿途看到的所有房屋都遭到了洗劫。屋里的箱子被砸开了，珠宝、银子等都被抢走了。"[9] 战后，雅各布·D.考克斯提供的相关证据表明，一些暴徒甚至强迫别人说出藏匿贵重物品的地方。"掉队者、逃兵、盗匪、无赖、流浪汉、黑人和白人都对当地居民实施了暴行。"据报告，"当地发生了三起强奸案和一起谋杀案"[10] 。一些人的不法行为受到了惩戒。奥利弗·霍华德下令将一名抢走居民手表的士兵剃光头，然后开除军籍。针对一起强奸案，指挥第二十三军团的雅各布·D.考克斯按照军事法庭的规定，判处施暴者死刑。雅各布·D.考克斯回忆说，犯了强奸罪的罪犯是为了骗取赏金入伍的。一名北方联邦兵谋杀了一个北卡罗来纳州居民，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死刑，两天后"击毙"[11] 。威廉·T.谢尔曼下令，任何盗窃行为都必须受罚。然而，参考相关证据时，人们注意到，北方联邦军罪行累累，但对他们的处罚寥寥无几。现在，虽然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暴力行径，但对妇女的暴行很少见。威廉·T.谢尔曼宣誓作证说，整个行军过程中，他只听说了两起强奸案。



占领哥伦比亚

除了当代的相关记载，联邦官员一直尽量忽视北方联邦军的破坏行为，许多北方作家也一直在掩盖事实真相。因此，即使列举出每一项证据，北方联邦军也不会因真相受到惩罚。南方记录的大部分证据都不具体。此外，由于所有证据都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我更倾向从北方的记载中研究北方联邦军的破坏行为，做出客观的推论。如果列出所有证据，那么对威廉·T.谢尔曼军队的不利证据会多一些[12]。总体来看，与内战爆发前的所有欧洲军队相比，威廉·T.谢尔曼军队的行为更人道。但在战争中，遭到入侵的敌方领地总会受到破坏。

第3节　威廉·T.谢尔曼的军队

1865年3月11日，威廉·T.谢尔曼率军抵达北卡罗来纳州的费耶特维尔，随后乘一艘蒸汽拖船从威尔明顿[13]出发，奉命前往开普菲尔河与约翰·斯科菲尔德谈话[14]，然后与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埃德温·斯坦顿谈话。1865年2月22日前，通过里士满的报纸，尤利西斯·S.格兰特了解了威廉·T.谢尔曼军队的进展。与此同时，南方邦联政府下令，里士满的报纸不得发布与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军事行动有关的任何新闻。因此，后来，尤利西斯·S.格兰特能得到的仅是一些不重要的消息。威廉·T.谢尔曼在写给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信中说："虽然天气恶劣，道路泥泞，军队可能无法前进，但将士们不但身强体健，状态良好，而且斗志昂扬。"[15]

1865年3月21日，约翰·斯科菲尔德抵达北卡罗来纳州的戈尔兹伯勒。1865年3月23日，威廉·T.谢尔曼与约翰·斯科菲尔德会合[16]，并写道："如果要评价进军佐治亚州和从萨凡纳行军北上的重要性，我认为前者排第一，后者最多排第十。"[17]用拿破仑在奥地利战役期间的话说，威廉·T.谢尔曼"仅凭行军打败了南方邦联军。"[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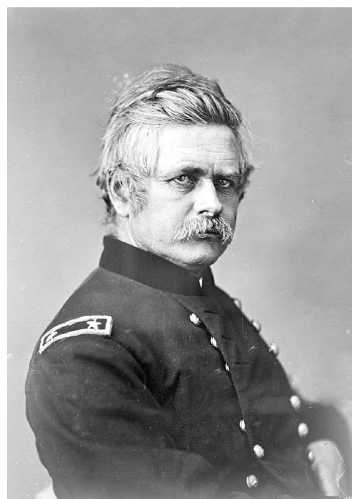
第4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威廉·T.谢尔曼

威廉·T.谢尔曼亲自前往锡蒂波因特，打算与尤利西斯·S.格兰特进行协商。在锡蒂波因特，他见到了林肯。三人进行了两次会谈，一次是1865年3月27日下午，另一次是1865年3月28日。他们讨论了之前的行动和即将到来的胜利及即将结束的战争。林肯和威廉·T.谢尔曼说得比较多，尤利西斯·S.格兰特边听边思考。根据威廉·T.谢尔曼后来的回忆，他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都同意“再次血战沙场，打最后一仗”。林肯认为战士们流的血已经够多，问“能否避免开战”。威廉·T.谢尔曼回答道：“我们无法控制事态发展，一切取决于杰斐逊·戴维斯和罗伯特·E.李的想法，不知他们是否认为应该决一死战” [19] 。

事实上，人们希望林肯、威廉·T.谢尔曼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能尽快结束战争，然后很欣然地回顾过去一年的军事行动，展望未来。但他们更看中眼前所得，只顾沾沾自喜。1864年5月，尤利西斯·S.格兰特与罗伯特·E.李展开对峙，威廉·T.谢尔曼对抗约瑟夫·E.约翰斯顿 [20] 。尤利西斯·S.格兰特率军从拉皮丹河出发，一路打到了詹姆斯河和阿波马托克斯河。威廉·T.谢尔曼从道尔顿出发，一路战斗到了亚特兰大，然后继续向佐治亚州进军，但在途中遇到了最强的对手——大自然。威廉·T.谢尔曼完成了行军任务。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戈尔兹伯勒，他率八万人准备向约瑟夫·E.约翰斯顿发起进攻。与此同时，约瑟夫·E.约翰斯顿率领三万三千人，驻扎在威廉·T.谢尔曼军队和北卡罗来纳州首府罗利之间 [21] 。在其他作战区，大批装备精良的北方联邦兵整装待发，在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指挥下，决心一举歼灭南方邦联军。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罗伯特·E.李和约瑟夫·E.约翰斯顿主动投降，那么其余负隅顽抗的南方邦联军会随之瓦解。

在决战中，敌对双方的将军才能相当，但北方联邦军拥有物资优势。不过，历史证明，只要领导有方，充分挖掘士兵们的作战潜力，使士兵们相信自己在为反对镇压人民的力量而战，军队的战斗力就会很高。了解南方邦联军的人都知道，北方联邦军只有派出最优秀的将领，才能确保决战胜利。显然，命运之神更青睐北方。在战争的最后两年，虽然双方都有作战良将，但北方拥有一位伟大的统治者。虽然在出生、

教养、学习和经验等方面，杰斐逊·戴维斯明显优于林肯，但在赢得民心方面，他远不及林肯。林肯遭遇过很多挫折，经历了一段阴暗的岁月，但他的谦逊令人惊叹。他会虚心听取他人的建议、警告甚至责备，其他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很少像他一样谦逊。担任总统期间，他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克服了重重困难，逐渐变得强大、令人钦佩。


爱德华·奥德（1818—1883）

战争后期，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状态越来越好。通过多纳尔森堡战役、维克斯堡战役和查塔努加战役的磨炼，他变得越来越精明果敢。通过军事报告和私人信件，我们了解了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作战计划和过程。他深入研究了战场，与驻扎在各地的军队保持密切联系，亲自率军完成了很多重要的作战任务。他虽然自信满满，但不乏小心谨慎，也没有低估南方邦联军的实力，更没有因取得的胜利得意忘形，忘记真正的目标。与此同时，他没有畏首畏尾，止步不前。他非常信赖威廉·T.谢尔曼和菲利普·谢里登，就像信赖自己一样。威廉·T.谢尔曼和菲利普·谢里登意见一致，完全支持尤利西斯·S.格兰特。他们能迅速领会尤利西斯·S.格兰特命令中的意思和精神，并积极执行命令，其他将领做不到这一点。威廉·T.谢尔曼的行军和作战已经结束，但菲利普·谢里登依然是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得力干将，就像早期战役中的“石墙”托马斯·J.杰克逊对罗伯特·E.李一样。在尤利西斯·S.格兰特直接领导的军队中，除了菲利普·谢里登，还有乔治·米德、古夫尼尔·沃伦、安德鲁·A.汉弗莱斯、爱德华·奥德、霍雷肖·G.赖特和约翰·G.帕克等优秀的军团指挥官。阿波马托克斯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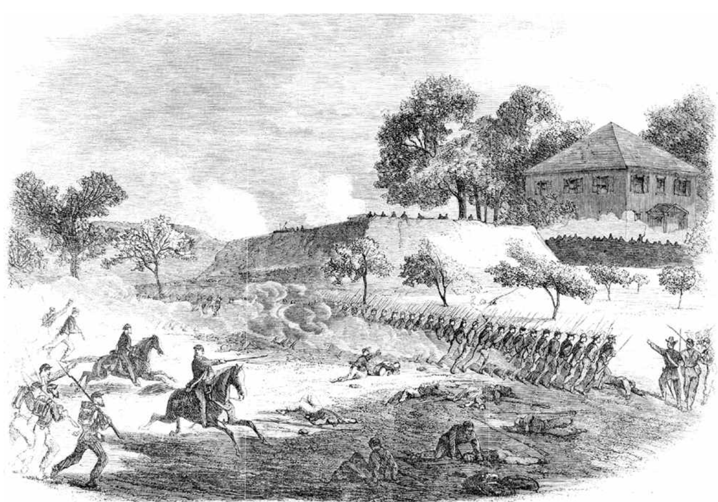
役打响时，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可用兵力有十一万六千人，但罗伯特·E.李只有五万两千人[22]。

第5节　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罗伯特·E.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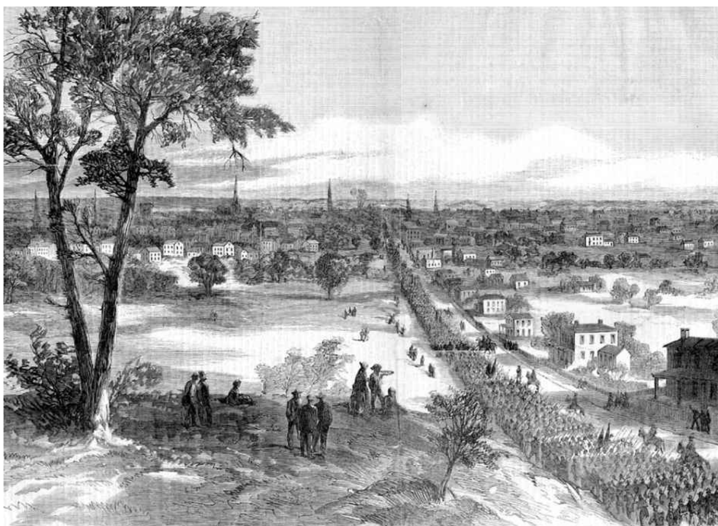
1864年夏天以来，尤利西斯·S.格兰特一直在围攻里士满和彼得斯堡[23]。围攻进展缓慢，用时较长。1865年2月中下旬，罗伯特·E.李开始考虑放弃里士满和彼得斯堡。在私人谈话中，罗伯特·E.李可能绝望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在一些信件中，他依然相信还有胜利的希望。此外，他明确表示，只要有能力抵抗，一定会抵抗到底，除非邦联政府命令他投降。1865年3月25日，罗伯特·E.李奋力突围，虽然失败了，但表明他的军队依旧战斗力十足[24]。北方联邦军没有完全包围里士满和彼得斯堡，在西侧和西南侧留下了缺口。里士满和彼得斯堡的补给线运营正常，其中包括里士满和丹维尔之间的铁路线、彼得斯堡的交通线、邵斯赛德的铁路线和林奇堡的铁路线。尤利西斯·S.格兰特“几天来忧心忡忡”，担心罗伯特·E.李会放弃里士满和彼得斯堡，然后与约瑟夫·E.约翰斯顿会合，或从林奇堡撤退，进入弗吉尼亚山区的据点后突袭田纳西州的东部。如果罗伯特·E.李和约瑟夫·E.约翰斯顿团结起来，北方联邦军在1864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会耗在一场漫长、乏味且代价高昂的战役上”[25]。罗伯特·E.李考虑到了上述两种可能，更倾向与约瑟夫·E.约翰斯顿联手。但杰斐逊·戴维斯后来回忆说，罗伯特·E.李“从未打算投降”，而是仿效华盛顿的计划，打算万不得已时撤退到弗吉尼亚山区，继续战斗二十年[26]。综合考虑，双方的较量势均力敌，各有用兵之道。



彼得斯堡战役



联邦军进攻彼得斯堡右边的堡垒



联邦军进入彼得斯堡



围攻彼得斯堡的联邦士兵



联邦士兵修筑的围攻工事

第6节　撤离里士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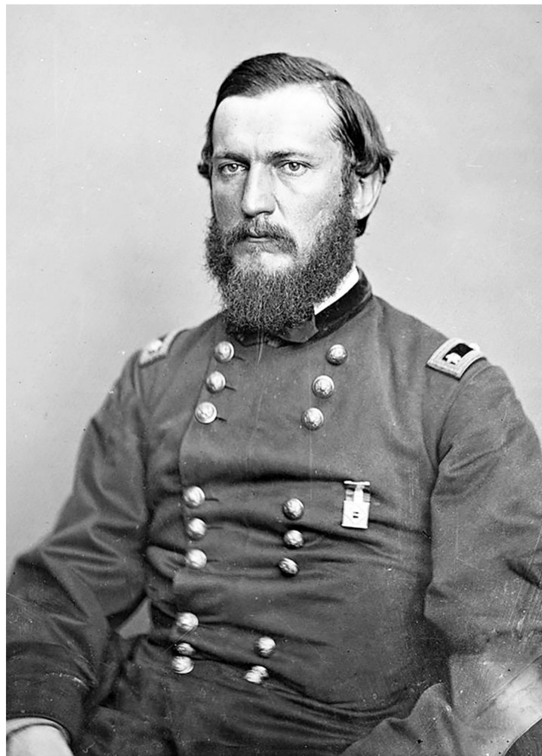
1865年3月29日，尤利西斯·S.格兰特军队的左翼军开始行动。1865年3月29日夜晚，北方联邦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河和丁威迪法院之间设了一条严密的防线。在战地司令部，尤利西斯·S.格兰特写信给菲利普·谢里登说："如果结束战争后不用回去，我现在就想结束战争。"大雨下了一天两夜，阻断了北方联邦军的行动。1865年3月31日，北方联邦军继续前行。与此同时，罗伯特·E.李袭击了北方联邦军的第五军团和骑兵，取得了暂时性胜利。尤利西斯·S.格兰特写道："在撤退中，菲利普·谢里登展现出了杰出的指挥才能。"1865年4月1日，菲利普·谢里登指挥五岔口战役，重创了南方邦联军。尤利西斯·S.格兰特描述五岔口战役时说："菲利普·谢里登胸有成竹。"1865年4月1日晚上9时，尤利西斯·S.格兰特收到了五岔口战役的捷报，随即下令进攻南方邦联军防线。1865年4月2日凌晨，北方联邦军的进攻开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27]。1865年4月2日夜晚，罗伯特·E.李命军队撤出里士满和彼得斯堡，在阿梅利亚法院集结，然后前往丹维尔与约瑟夫·E.约翰斯顿会合。1865年4月3日早晨，北方联邦军开始追击南方邦联军。

1865年4月1日前，杰斐逊·戴维斯认为没有必要立即放弃里士满。1865年4月2日早晨，他在圣保罗教堂聆听圣公会的祷告文。这是牧师最后一次为南方邦联总统朗诵祈祷文。在圣保罗教堂，战争部的一名信使禀报说军情紧急。杰斐逊·戴维斯静静离开了座位，威严地走出教堂，接过了罗伯特·E.李发来的电报。在电报中，罗伯特·E.李说军队受到重创，建议放弃里士满。消息迅速传播开来，里士满陷入一片混乱和骚动中，大部分官员准备逃走。1865年4月2日晚上11时，除了詹姆斯·A.塞登，杰斐逊·戴维斯、内阁所有成员及一些工作人员和其他官员乘里士满到丹维尔的一列火车，1865年4月3日下午安全抵达了丹维尔。根据罗伯特·E.李的命令，负责指挥里士满守军的理查德·S.尤厄尔下令焚烧城内的所有烟草，破坏所有无法搬走的店铺。随后，熊熊大火在里士满上空燃起。可以肯定的是，1865年4月3日凌晨，一群黑人和白人组成的乌合之众点燃了城内的建筑物，"开始洗劫里士满"。理查德·S.尤厄尔在报告中说，天亮后，暴乱被平息了。约翰·B.琼斯写道，1865年4月3日早上7时，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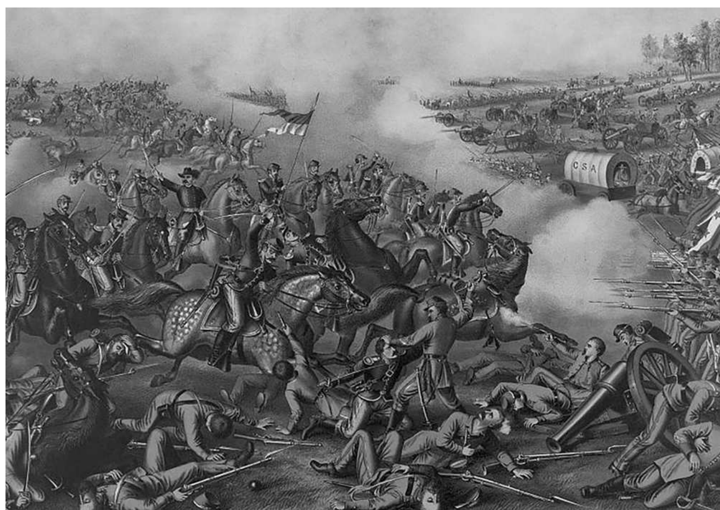
兵们前往各家卖酒的店铺，奉命将酒洒在街上。排水沟里全是酒，市民们争先用罐子和桶装酒。与此同时，南方邦联军已经全部撤出里士满。

北方联邦军谨慎穿过了南方邦联军的第一道防御工事，但没有遭到任何阻拦，于是迅速穿过了后面的防线。北方联邦军在里士满的最高点升起了一面国旗，乐队奏起了《集合到国旗下面来》。在街头胜利游行时，北方联邦军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但很快，他们发现城内大火蔓延，抢劫和骚乱四处可见。1865年4月3日8时15分，在里士满的市政厅，北方联邦军指挥官戈弗雷·韦策尔接受了里士满的投降。1865年4月3日下午2时，北方联邦军平息了城内的骚乱，扑灭了大火，但城中大部分建筑物已经面目全非。

里士满的居民热烈欢迎北方联邦军的到来。1865年4月4日，林肯从锡蒂波因特出发，前往里士满。他的此次出行简单低调，但意义重大[28]。行程和护送人员已经安排妥当，但由于两次意外，林肯乘一艘十二桨的驳船，通过水路抵达了里士满。在戴维·D.波特与其他三名军官的陪同和十名带枪海员的保护下，林肯在里士满的街道上行走了约一英里半。黑人们兴高采烈地欢迎林肯。虽然城中到处都是喝醉的居民，但林肯既没有遇到骚扰也没有遭到人们的侮辱。杰斐逊·戴维斯曾经居住的地方现在成了戈弗雷·韦策尔的司令部。根据一些个人回忆录记载，林肯环视了司令部，坐在杰斐逊·戴维斯曾坐过的椅子上，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1865年4月5日，林肯返回了锡蒂波因特。随后，约翰·B.琼斯汇报说里士满城中秩序井然。查尔斯·A.达纳从里士满发来电报说：“1865年4月4日，共和党人上了联邦报纸……里士满的剧院今晚开演。”[29]



戈弗雷·韦策尔（1835—1884）



五岔口战役



菲利普·谢里登一马当先，冲破敌阵

第7节　罗伯特·E.李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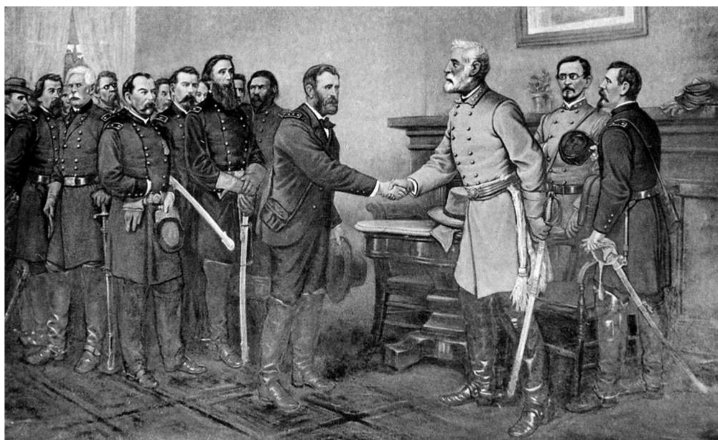
1865年4月2日夜晚和1865年4月3日凌晨，北弗吉尼亚军撤离里士满和彼得斯堡。尤利西斯·S.格兰特没有在里士满逗留，打算乘胜追击。追了八十英里后，他率军包围了南方邦联军，迫使南方邦联军投降 [30] 。罗伯特·E.李知道抵抗毫无意义，说道："此时我束手无策，只能去见尤利西斯·S.格兰特。我宁愿死一千次。"他下令军队升起白旗，写信请求对方停战，并希望与尤利西斯·S.格兰特见一面。在阿波马托克斯郡的小村庄麦克莱恩，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罗伯特·E.李会面。罗伯特·E.李穿着一身崭新的灰色军装，"纽扣一直系到了喉咙处"，佩戴着一把宝剑，剑柄上"镶着宝石"。尤利西斯·S.格兰特穿着"一件深蓝色法兰绒衬衫，前面的扣子没有系，也没有佩剑。" [31] 尤利西斯·S.格兰特写道："我穿了一套佩着中将肩章的列兵制服，与身高六英尺、体型健硕、穿着讲究的罗伯特·E.李形成了鲜明对比。" [32] 尤利西斯·S.格兰特虽然胜利了，但与罗伯特·E.李面对面接触时，"感觉一点儿也没有体会到打败强大对手的喜悦感。"尤利西斯·S.格兰特心胸宽广，罗伯特·E.李英勇无畏。于是，双方签订了停战协议。停战条款并不苛刻 [33] 。

两万八千二百三十一人南方邦联军投降 [34] ，"过去几天的主要食物是干玉米"，急需粮食。尤利西斯·S.格兰特为降军提供了军粮。北方联邦军听到南方邦联军投降的消息后，开始鸣枪庆贺。尤利西斯·S.格兰特下令禁止此类做法，说道："战争已经结束，南方邦联军已经成为我们的同胞，庆祝胜利的最好方式是不要在战场上鸣枪。" [35]

罗伯特·E.李悲伤地骑马回到了营地，热泪盈眶地对士兵们说："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我已经尽我所能为你们做了一切。我有一肚子话要说，但不知从何说起。" [36] 1865年4月4日，罗伯特·E.李向北弗吉尼亚军发表了告别演讲，然后骑马前往里士满。南方邦联军解散了，士兵们纷纷回家 [37] 。

1865年4月9日晚上9时，华盛顿收到了罗伯特·E.李投降的消息。随后，北方其他城市也得知了南方投降的消息。北方人虽然因占领里士满高兴，但也意识到战争尚未结束。现在，人人都说"叛军的将领已经投

降”，意味着奴隶制已经灭亡，国家开始复苏了。北方联邦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欧洲。1865年4月10日，英曼航海公司 [38] 专门派出一艘轮船，将消息带到了大西洋的另一边。1865年4月9日夜晚和1865年4月10日，北方人一直在欢庆，好像自己从未如此高兴过，好像此后再也不会欢呼雀跃一样。各种贸易暂停，法院休庭。炮声隆隆，钟声咚咚，彩旗飘扬，各种颜色的房屋和店铺看上去喜气洋洋。各个城镇的街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人们高兴地握手、拥抱、欢呼，完全沉浸在喜悦的海洋中。酒吧和酒铺提供了大量的酒水饮料，街上到处是游行队伍、怪诞表演和一些愚蠢行为。年长庄重的绅士们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身份，玩起了学生时代的恶作剧。但无论人们的行为有多么愚蠢，酒喝得多么过头，耳畔回响的都是欢乐的爱国和宗教音符。街头、商铺和证券交易所里的人们传唱着《万福之源歌》。一位作家记录说，在华盛顿威拉德酒店的酒吧里，当南方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一位年长的绅士跳上了吧台，带着众人激动地唱起了颂歌。华尔街上聚集了两万人，人们脱帽唱着《万福之源歌》。1865年4月11日，人们齐聚在纽约的三一教堂，参加了一次特别的礼拜。合唱团吟唱了《赞美颂》。在牧师的要求下，会众们站了起来，跟着大风琴和合唱团唱起了圣歌《荣归主颂》。歌曲开头是“愿荣耀归于上帝，和平和善良归于凡人”。对北方人来说，这句歌词意义特殊。与此同时，大部分北方人对南方人都很宽容。《约翰·布朗之歌》《我的国家属于你》《集合到国旗下面来》和《星条旗之歌》表达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用文字表达了北方人的心中所想：“亲爱的查尔斯，这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好消息。我欣喜若狂、百感交集，想笑又想哭，最后归于平静，心怀感恩。有一个所有人都热爱的国家是多么美好！”[39]



尤利西斯·S.格兰特与罗伯特·E.李会面



签署停战协议



罗伯特·E.李率部队放下武器

罗伯特·E.李投降后，约瑟夫·E.约翰斯顿也向威廉·T.谢尔曼投降了[40]。至此，美国内战结束。

第8节　林肯遇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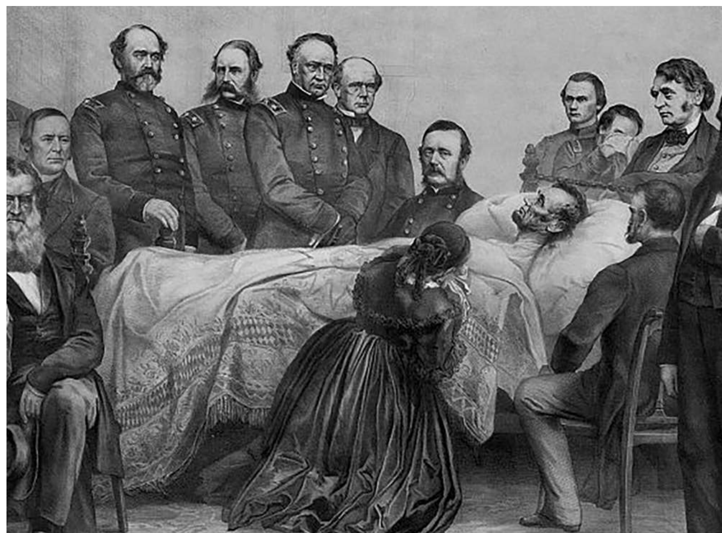
罗伯特·E.李和约瑟夫·E.约翰斯顿投降期间，美国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不幸——林肯遇刺身亡[41]。沃尔特·惠特曼[42]写道：



约瑟夫·E.约翰斯顿向威廉·T.谢尔曼投降



林肯遇刺



林肯身亡

啊，船长！我的船长！可怕的航程已完成；

船历尽风险，企求的目标已达成。

……

啊，船长！我的船长！起来吧，听听钟声；

起来吧，旌旗为您高悬，号角为您长鸣；

……

我的船长不作声，嘴唇惨白，一动不动。

北方人虽然为林肯的遇刺愤愤不平 [43] ，但同时因尤利西斯·S.格兰特在阿波马托克斯的壮举备受鼓舞。没有一位南方人因政治罪被判绞刑 [44] ，南方的土地也没有被没收。乔治·梅瑞狄斯 [45] 写道："自从美国人以最高尚的方式结束内战以来，我将他们视为我们文明的希望。" [46]

林肯是内战时期最伟大的人。没有他，北方可能会放弃与南方的较量。他热爱国家，克己奉公，是一位可敬的领袖。其他掌权者都冷酷打压了阻挡自己的人，但林肯说："我不喜欢打压任何人。每个人都应该得到机会。"

林肯不像特奥多尔·莫姆森笔下的恺撒，他不是一位"完人"，"但所作所为都是史无前例的"。恺撒为世界创造了恺撒主义，即君主专制。但人们更愿意接受专制还是自由呢？效仿恺撒和给每个人一个机会，哪个更能有效约束他人呢？恺撒和林肯的智慧没有可比性。我们会说强大的恺撒，但不会说强大的林肯。没有人说正直的恺撒，但正直的老亚伯会永传于世。

[1] 《与尤利西斯·S.格兰特共进退》，贺拉斯·波特著。《世纪杂志》，第739页，1897年9月。——原注

[2] 《向海边进军》，第172页，雅各布·D.考克斯著。——原注

[3]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7卷，第1册，第19页。——原注

[4]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7卷，第1册，第1044页。——原注

[5] 《向海边进军》，第168页，雅各布·D.考克斯著。《军事回忆录》，第2卷，第531页。——原注

[6]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4卷，第741页。——原注

[7] 《美国史》，第5卷，第90页等，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史论》，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哥伦比亚大火的真相。1865年2月17日，威廉·T.谢尔曼攻占哥伦比亚城。1865年2月17日夜晚，城中大火弥漫。大量研究的说法不同，主要的观点是，威廉·T.谢尔曼下令烧城，或南方邦联军的韦德·汉普顿离开哥伦比亚时，下令点燃棉花包。大胆的联邦士兵、黑人、犯人首先点了火。南方邦联军焚毁了棉花，火焰肆意蔓延。詹姆斯·福特·罗德斯在论

文《谁烧了哥伦比亚》中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将责任归咎于罪犯、暴民、出逃的联邦犯人、掉队的士兵和喝醉的“无赖”、黑人及一心想报复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兵。第310页。——编者注

[8]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7卷，第2册，第1201页。——原注

[9]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7卷，第2册，第714页。——原注

[10]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7卷，第3册，第79页。——原注

[11] 《战时的俄亥俄州》，第1卷，怀特洛·里德著。——原注

[12] 《战时的俄亥俄州》，第1卷，怀特洛·里德著。——原注

[13] 1865年2月22日，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归北方联邦军所有。——编者注

[14] 约翰·斯科菲尔德乘船和火车，从田纳西州的乔治·托马斯军中前往华盛顿，然后从华盛顿坐船抵达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附近。——原注

[15]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7卷，第2册，第794页。——原注

[16] 1865年3月19日至1865年3月21日，北方联邦军在卡罗来纳州的行军过程中，发生了唯一一次大战即本顿维尔战役。当时，约瑟夫·E.约翰斯顿率残余部队试图进攻威廉·T.谢尔曼的一些小分队，但均以失败告终。——编者注

[17] 《威廉·T.谢尔曼将军回忆录》，第2卷，第221页。——原注

[18] 《拿破仑传》，第2卷，第235页，威廉·M.斯隆著。《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7卷。《美国史》，第5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威廉·T.谢尔曼将军回忆录》，威廉·E.谢尔曼著。《军事回忆录》，雅各布·D.考克斯著。——原注

[19] 《威廉·T.谢尔曼将军回忆录》，第2卷，第326页。《与尤利西斯·S.格兰特共进退》，第739页，贺拉斯·波特著。——原注

[20] 罗伯特·E..李任命约瑟夫·E.约翰斯顿为指挥官。——原注

[21]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7卷，第3册，第731页。截止1865年3月31日，约瑟夫·E.约翰斯顿军队的可用兵力为一万六千零一十四人，总兵力为两万两千两百七十八人。可用骑兵兵力为六千五百八十七人，骑兵总人数为七千零四十二人。因此，约瑟夫·E.约翰斯顿的总兵力约为两万九千人，可用兵力约为两万两千六百人。——编者注

[22] 《马萨诸塞州军事历史学会文献》，第6卷，第451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原注。一般认为，阿波马托克斯战役发生在1865年3月29日至1865年4月9日。其间，尤利西斯·S.格兰特军队参战十一万两千八百九十二人，南方邦联军参战人数仅有四万九千四百九十六人。参见《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135页到第136页，托马斯·L.利弗莫尔著。——编者注

[23] 1864年6月30日的火山口战役后，彼得斯堡的围攻战线拉长。北方联邦军发起了几次小规模进攻，目的是切断南方邦联军的通信和供给，给罗伯特·E.李和彼得斯堡施压。1864年6月22日到1864年6月23日，北方联邦军未能占领威尔顿铁路。1864年8月18日到1864年8月21日，北方联邦军占领威尔顿铁路。1864年9月29日到1864年9月30日，皮布尔斯农场战役爆发，北方联邦军被迫西退。1864年10月27日的伯吉斯米尔战役中，北方联邦军向邵斯赛德铁路进军，但被击退。

1865年2月5日到1865年2月7日，北方联邦军切断了博伊顿栈道，将战线扩展到了彼得斯堡西南部的哈彻尔溪。——编者注

[24] 1865年3月25日，南方邦联军的进攻点在围攻线东侧的斯特德曼堡。——编者注

[25]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6卷，第1册，第47页，第50页，第52页。——原注

[26] 《南方邦联政府的兴衰史》，第2卷，第656页，杰斐逊·戴维斯著。——原注

[27]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6卷，第1册，第53页、第54页；第3册，第394页。——原注

[28] 1865年4月4日，林肯抵达里士满。——编者注

[29] 《北方联邦陆军和南方邦联陆军的官方记录》丛书一，第46页，第3册，第575页。——原注

[30] 1906年1月8日，托马斯·L.利弗莫尔写道："在1865年3月29日到1865年4月9日的阿波马托克斯战役期间，尤利西斯·S.格兰特军队率大约十一万六千人，将约五万两千名南方邦联兵赶出了战壕。随后，他率七万两千人追击剩余的三万七千名南方邦联兵，追了八十英里。途中俘获、打散的南方邦联军约有九千人，投降的有两万八千二百三十一人。"《马萨诸塞州军事历史学会文献》，第6卷，第451页。——原注。罗伯特·E.李撤退时，命军队在彼得斯堡以西四十英里处的梅利亚法院集结，但没有将军队补给送到梅利亚法院。南方邦联军拖了一天后，继续撤退。尤利西斯·S.格兰特试图阻断南方邦联军的后路。在梅利亚西南部的杰特斯维尔，菲利普·谢里登成功阻截了罗伯特·E.李。罗伯特·E.李向西前往法姆维尔。1865年4月6日，在法姆维尔以东十英里处的塞勒溪，理查德·S.尤厄尔和罗伯特·安德森的军队被菲利普·谢里登打败，大部分士兵投降。北弗吉尼亚军的残余部队继续撤退，1865年4月8日抵达阿波马托克斯郡，北方联邦军紧随其后。1865年4月9日早晨，阿波马托克斯郡附近爆发了一场战斗。——编者注

[31] 《与尤利西斯·S.格兰特共进退》，第883页，贺拉斯·波特著。——原注

[32] 《个人回忆录》，第2卷，第490页，尤利西斯·S.格兰特著。尤利西斯·S.格兰特身高五英尺八英寸，肩膀略垮，年近四十三岁。罗伯特·E.李当时五十八岁。——原注

[33] 条款中包含允许南方邦联军保留私人马匹、假释邦联士兵等内容。尤利西斯·S.格兰特还为罗伯特·E.李的军队提供了粮食。——编者注

[34] 关于投降人数的争议颇多。托马斯·L.利弗莫尔将《南北战争中的人数与损失》第137页记录的数据改为两万六千七百六十五人。尤利西斯·S.格兰特在《回忆录》第2卷第500页提到投降人数为两万八千三百五十六人。——编者注

[35] 《与尤利西斯·S.格兰特共进退》，第886页，第887页，贺拉斯·波特著。——原注

[36] 《罗伯特·E.李将军传》，第463页，约翰·E.库克著。——原注

[37] 《美国史》，第5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38] 英曼航海公司是19世纪北大西洋英国三大航海客运公司之一，另外两家公司是白星航海公司和库纳德航海公司。——译者注

[39] 《致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的信》，第1卷，第344页，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著。——原注

[40]　1865年4月18日，在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站北附近，约瑟夫·E.约翰斯顿和威廉·T.谢尔曼签署了和平备忘录。但由于华盛顿当局对条款存在争议，直到1865年4月26日，约瑟夫·E.约翰斯顿才宣布投降。1865年4月4日，其他南方邦联军在莫比尔投降，1865年5月26日，跨密西西比河军投降。1865年5月10日，杰斐逊·戴维斯在佐治亚州的欧文维尔被俘。——编者注

[41]　　1865年4月14日，林肯在福特剧院遭到刺杀，1865年4月15日早晨离世。——编者注

[42]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美国著名诗人、人文主义者。——译者注

[43]　北方人对林肯的遇刺不仅是愤愤不平，甚至一直怀恨南方，将林肯的死归咎于南方。——编者注

[44]　　“人们力证道，草很快会盖住战场上的血，但永远盖不住绞刑台上的血。”《伊丽莎白时代》，第4卷，第368页，詹姆斯·弗鲁德著。——原注

[45] 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诗人。——译者注

[46] 《讲稿》，第193页，注释一，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美国史》，第5卷，詹姆斯·福特·罗德斯著。——原注

专有名词英汉对照

James Ford Rhodes	詹姆斯·福特·罗德斯
Ohio	俄亥俄州
Richard Hildreth	理查德·希尔德雷斯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史》
Thucydides	修昔底德
Tacitus	塔西佗
Herodotus	希罗多德
Edward Gibbon	爱德华·吉本
Thomas Carlyle	托马斯·卡莱尔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州
Cambridge	坎布里奇
Harvard	哈佛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美国历史协会
Confederacy	南方邦联
the Pulitzer Prize for history	普利策历史奖
William Roscoe Livermore	威廉·罗斯科·利弗莫尔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美国历史评论》
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Lincoln	林肯
Everette Beach Long	埃弗里特·比奇·朗
Oak Park Illinois	伊利诺伊州奥克帕克
Diary of Gideon Welles	《吉迪恩·威尔斯的日记》
Life of John Rawlins	《约翰·罗林斯传》
Letters and Diaries	《书信和日记》
Miss Helen Nicolay	海伦·尼古拉女士
Personal Traits of Lincoln	《林肯的个人特质》
Life and Letters of General Meade	《乔治·米德将军传》
Story of the Civil War	《内战故事》

John Bigelow Jr.	小约翰·比奇洛
The Campaign of Chancellorsville	《钱斯勒斯维尔战役》
Life of John Hay	《约翰·海伊传》
The Reminiscences of Carl Schurz	《卡尔·舒尔茨回忆录》
Daniel P. Rhodes	丹尼尔·P.罗德斯
Miss Wyman	怀曼女士
Boston Athenaeum	波士顿图书馆
Charles K. Bolton	查尔斯·博尔顿
Miss Wildman	怀尔德曼女士
Miss Cattanach	卡塔那奇女士
San Marino	圣马力诺
Huntington Library	亨廷顿图书馆
Dr. Allan Nevins	艾伦·内文斯博士
Ralph G. Newman	拉尔夫·G.纽曼
Franklin J. Meine	富兰克林·J.迈因
Newberry Library	纽贝里图书馆
Chicago Public Library	芝加哥公共图书馆
Bruce Catton	布鲁斯·卡顿
Republican party	共和党
Missouri river	密苏里河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州
Charleston	查尔斯顿
Thomas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
Missouri Compromise	《密苏里妥协法案》
Henry Clay	亨利·克莱
Crittenden Compromise	《克里滕登妥协法案》
Kentucky	肯塔基州
John J. Crittenden	约翰·J.克里滕登
William H. Seward	威廉·H.苏厄德
Daniel Webster	丹尼尔·韦伯斯特
Cuba	古巴
Maryland	马里兰州
North Carolina	北卡罗来纳州

Tennessee	田纳西州
Arkansas	阿肯色州
Fort Sumter	塞萨姆特堡
Robert Anderson	罗伯特·安德森
Fort Moultrie	莫尔特里堡
Secretary of State	国务卿
John A. Campbell	约翰·A.坎贝尔
Winfield Scott	温菲尔德·斯科特
Pierre Beauregard	皮埃尔·博勒加德
Fort Johnson	约翰逊堡
Baltic	“波罗的海”号
Powhatan	“波瓦坦”号
Cummings Point	卡明斯角
Sullivan Island	沙利文岛
Henry Adams	亨利·亚当斯
James Russell Lowell	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
George Ticknor	乔治·蒂克纳
Sixth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州第六兵团
Baltimore	巴尔的摩
Wilmington	威尔明顿
Harrisburg	哈里斯堡
Harper's Ferry	哈珀斯费里
Gosport	戈斯波特
Richmond	里士满
Eighth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州第八兵团
Seventh New York	纽约州第七兵团
Annapolis	达安纳波利斯
Lord Richard Lyons	理查德·莱昂勋爵
Capitol	国会大厦
Galusha A. Grow	加卢沙·A.格罗
Fort Monroe	门罗堡
Chesapeake bay	切萨皮克湾
Potomac	波托马克河

Rhode Island	罗得岛州
Perryville	佩里维尔
Roger A. Pryor	罗杰·A.普赖尔
Alexander H. Stephens	亚历山大·H.史蒂芬斯
Francis P. Blair Jr.	小弗朗西斯·P.布莱尔
St. Louis	圣路易斯
William Pitt	威廉·皮特
The Times	《泰晤士报》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河
Cairo	开罗
Springfield	斯普林菲尔德
Jacob D. Cox	雅各布·D.考克斯
James A. Garfield	詹姆斯·A.加菲尔德
John T. Morse	约翰·T.莫尔斯
Alleghanies	阿勒格尼山脉
George B. McClellan	乔治·B.麦克莱伦
Iowa	艾奥瓦州
Indiana	印第安纳州
Oliver P. Morton	奥利弗·P.莫顿
Enfield rifles	恩菲尔德式步枪
West Point	西点军校
Bull Run	布尔溪
Bismarck	俾斯麦
Helmuth von Moltke	赫尔穆特·冯·毛奇
Pericles	伯里克利
John Bell	约翰·贝尔
Edward Everett	爱德华·埃弗雷特
New York Tribune	《纽约论坛报》
William P. Fessenden	威廉·P.费森登
Crimea	克里米亚半岛
Irvin McDowell	欧文·麦克道尔
Shenandoah valley	谢南多厄河谷

Joseph E. Johnston	约瑟夫·E.约翰斯顿
Robert Patterson	罗伯特·帕特森
Centerville	森特维尔
William T. Sherman	威廉·T.谢尔曼
Henry House	亨利豪斯
Barnard E. Bee	巴纳德·E.毕
Manassas	马纳萨斯
Agincourt	阿金库尔战役
Henry V	亨利五世
Warrenton turnpike	沃伦顿关卡
Fairfax Court-House	费尔法克斯郡法院
John C. Ropes	约翰·C.罗普斯
Charles Francis Adams	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
writ of habeas corpus	人身保护令
Joseph Story	约瑟夫·斯托里
Roger Taney	罗杰·塔尼
Benjamin Butler	本杰明·巴特勒
Confiscation Act	《充公法令》
John C. Fremont	约翰·C.弗里蒙特
Rocky mountains	落基山脉
Charles Sumner	查尔斯·萨姆纳
William Herndon	威廉·赫恩登
James Grimes	詹姆斯·格兰姆斯
Orville H. Browning	奥维尔·H.布朗宁
Montgomery C. Meigs	蒙哥马利·C.梅格斯
Lorenzo Thomas	洛伦佐·托马斯
Aaron Burr	阿伦·伯尔
Memphis	孟菲斯
Elihu B. Washburne	伊莱休·B.沃什伯恩
Salmon P. Chase	萨蒙·P.蔡斯
Henry Ward Beecher	亨利·沃德·比彻
Cincinnati Gazette	《辛辛那提公报》
Richard Smith	理查德·史密斯

Ball's Bluff	李斯堡战役
Lyman Trumbull	莱曼·特朗布尔
Zachariah Chandler	撒迦利亚·钱德勒
Benjamin Wade	本杰明·韦德
Jacobin Club	雅各宾派
Norfolk	诺福克
Ulysses S. Grant	尤利西斯·S.格兰特
letters of marque	捕拿特许证
John Lothrop Motley	约翰·洛斯罗普·莫特利
Viscount Palmerston	帕默斯顿勋爵
Henry John Temple	亨利·约翰·坦普尔
Morrill tariff	莫勒尔关税
Voltaire	伏尔泰
Edward Dicey	爱德华·戴西
James Russell Lowell	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
Oliver Wendell Holmes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Arthur Grote	亚瑟·格罗特
Napoléon III	拿破仑三世
John Bright	约翰·布莱特
James M. Mason	詹姆斯·M.梅森
John Slidell	约翰·斯莱德尔
Havana	哈瓦那
Trent	“特伦特”号
St. Thomas	圣托马斯
Southampton	南安普敦
Charles Wilkes	查尔斯·威尔克斯
USS San Jacinto	“圣哈辛托”号
John B. Floyd	约翰·B.弗洛伊德
Montgomery Blair	蒙哥马利·布莱尔
Benedict Arnold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
Charles Mackay	查尔斯·麦凯
Life of John T. Delane	《约翰·T.德莱恩传》
Stephen Lushington	史蒂芬·勒欣顿法官

Sir George Grey	乔治·格雷爵士
Duke of Somerset	萨默塞特公爵
Edward Seymour	爱德华·西摩
William Scott	威廉·斯科特
Yorkshire	约克郡
Baron Houghton	霍顿爵士
Richard Monckton Milnes	理查德·蒙克顿·米尔恩斯
Richard H. Dana	理查德·H.达纳
Charles Eliot Norton	查尔斯·艾略特·诺顿
John Bright	约翰·布赖特
Richard Cobden	理查德·科布登
Attorney-General	司法部长
Provincetown	普罗温斯敦
Halifax	哈利法克斯
Thomas A. Scott	托马斯·A.斯科特
Edwin Stanton	埃德温·斯坦顿
Fort Henry	亨利堡
Fort Donelson	多纳尔森堡
Andrew H. Foote	安德鲁·H.富特
Henry W. Halleck	亨利·W.哈勒克
Albert Sidney Johnston	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
John A. McClernand	约翰·A.麦克莱恩德
Lew Wallace	卢·华莱士
Charles F. Smith	查尔斯·F.史密斯
Simon B. Buckner	西蒙·B.巴克纳
Vicksburg	维克斯堡
Chattanooga	查塔努加市
Rappahannock river	拉帕汉诺克河
Corinth	科林斯
Savannah	萨凡纳
Pittsburg Landing	匹兹堡栈桥
Crump's Landing	克伦普栈桥
George P. Buell	乔治·P.比尔

Shiloh	夏洛
Austerlitz	奥斯特利茨
William Nelson	威廉·纳尔逊
Braxton Bragg	布拉克斯顿·布拉格
John Sherman	约翰·谢尔曼
Alexander K. McClure	亚历山大·K.麦克卢尔
Hatteras Inlet	哈特勒斯湾
Port Royal	皇家港
Roanoke Island	洛亚诺克岛
La Gloire	“光荣”号
Warrior	“勇士”号
Merrimac	“梅里马克”号
John Ericsson	约翰·埃里克森
Monitor	“监视”号
Hampton Roads	汉普顿水道
Newport News	纽波特纽斯港
Minnesota	“明尼苏达”号
Sewell's Point	苏埃尔岬角
John L. Worden	约翰·L.沃登
Dahlgren guns	达尔格伦大炮
David	大卫
Goliath	哥利亚
Roger Jones	罗杰·琼斯
George G. Eggleston	乔治·G.埃格尔斯顿
David Farragut	戴维·法拉格特
St. Philip	圣菲利普堡
Jackson	杰克逊堡
David D. Porter	戴维·D.波特
Ship Island	船岛
Hartford	“哈特福德”号
Chalmette batteries	沙尔梅特炮台
Alfred T. Mahan	阿尔弗雷德·T.马汉
Fort Pillow	皮洛堡

Port Hudson	哈德逊港
Shenandoah mountains	谢南多厄河谷
Chickahominy	奇克哈默尼河
Williamsburg	威廉斯堡
William B. Franklin	威廉·B.富兰克林
Fredericksburg	弗雷德里克斯堡
Lynchburg	林奇堡
Raleigh	罗利
St. Paul's Church	圣保罗教堂
rite of confirmation	坚信礼
Richard S. Ewell	理查德·S.尤厄尔
Nathaniel P. Banks	纳撒尼尔·P.班克斯
Napoleon's Maxims of War	《拿破仑战争箴言集》
Front Royal	弗兰特罗亚尔
Strasburg	斯特拉斯堡
Winchester	温彻斯特
Edwin V. Sumner	埃德温·V.萨姆纳
James Longstreet	詹姆斯·朗斯特里特
Daniel H. Hill	丹尼尔·H.希尔
Ambrose P. Hill	安布罗斯·P.希尔
Fitz John Porter	菲茨·约翰·波特
Gaines's Mill	盖恩斯磨坊
John G. Barnard	约翰·G.巴纳德
John F. Reynolds	约翰·F.雷诺兹
Allan Pinderton	艾伦·平克顿
Savage's Station	萨维奇车站
Frederick the Great	腓特烈二世
Glendale	格兰岱尔
Frayser's Farm	费拉泽农场
Malvern Hill	莫尔文高地
Seven Days' Battles	七日之战
Harrison's Landing	哈里森栈桥
John Falstaff	约翰·福斯塔夫

United States Treasury	美国财政部
Committee on Finance	财政委员会
House Committee of Ways and Means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
Thaddeus Stevens	撒迪厄斯·史蒂文斯
Hayti	海地
South Americ	南美
Liberia	利比里亚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Horace Greeley	贺拉斯·格里利
Prayer of Twenty Millions	《两千万人的祈祷》
George William Curtis	乔治·威廉·柯蒂斯
Cleveland	克利夫兰
Ambrose Burnside	安布罗斯·伯恩赛德
Petersburg	彼得斯堡
Aquia Creek	阿奎亚溪
Second Battle of Bull Run	第二次布尔溪战役
William J. Worth	威廉·J.沃思
Monterey	蒙特雷
Frederick City	弗雷德里克市
Susquehanna river	萨斯奎汉纳河
Kirby Smith	柯比·史密斯
Lexington	列克星敦
Louisville	路易斯维尔
Cincinnati	辛辛那提
Covington	卡温顿
Harpers Ferry	哈普斯渡口
Hagerstown	黑格斯敦
Andrew G. Curtin	安德鲁·G.柯廷
Battle of South Mountain	南山战役
Antietam	安蒂特姆
Sharpsburg	夏普斯堡
Artemus Ward	阿蒂默思·沃德

Wisconsin	威斯康星州
Kansas	堪萨斯州
Oregon	俄勒冈州
David Tod	戴维·托德
William Rosecrans	威廉·罗斯克兰斯
Warrenton	沃伦顿
Francis W. Palfrey	弗朗西斯·W.帕尔弗里
Andrew A. Humphrey	安德鲁·A.汉弗莱斯
Darius N. Couch	达利斯·N.库奇
Ormsby M. Mitchel	奥姆斯比·M.米切尔
Dartmouth	达特茅斯学院
Hackett	哈克特
Edwin Booth	埃德温·布斯
Murfreesborough	默夫里斯伯勒
Philip Sheridan	菲利普·谢里登
Francis Lieber	弗朗西斯·利伯
Auguste Mercier	奥古斯特·梅西埃
Henry J. Raymond	亨利·J.雷蒙德
National Banks	国家银行
Cooper Institute	库珀学院
Duchess of Argyll	阿盖尔公爵夫人
John Barleycorn	大麦约翰
John Sedgwick	约翰·塞奇威克
Committee on the Conduct of the War	作战部
George H. Covode	乔治·H.科沃德
Rapidan	拉皮丹河
Chancellorsville	钱斯勒斯维尔
Daniel Sickles	丹尼尔·西克尔斯
Oliver Howard	奥利弗·霍华德
Dr. Hunter McGuire	亨特·麦圭尔博士
Fitzhugh Lee	菲茨休·李
God of Battles	战神

Chicago Tribune	《芝加哥论坛报》
Old Abe	老亚伯
Martinsburg	马丁斯堡
Chambersburg	钱伯斯堡
Carlisle	卡莱尔
Columbia bridge	哥伦比亚桥
tow-path	曳船路
Cumberland Valley	坎伯兰山谷
George Pickett	乔治·皮克特
Corn Exchange	谷物交易所
Hannibal Barca	汉尼拔·巴卡
Battle of Gettysburg	葛底斯堡战役
Winfield S. Hancock	温菲尔德·S.汉考克
Seminary Ridge	神学院山脊
Cemetery Ridge	墓地山脊
John Gibbon	约翰·吉本
Henry J. Hunt	亨利·J.亨特
Richard B. Garnett	理查德·B.加尼特
Major Charles S. Peyton	查尔斯·S.佩顿少校
James L. Kemper	詹姆斯·L.坎伯
William R. Aylett	威廉·R.艾利特
Milliken's Bend	米利肯湾
New Carthage	新迦太基
James B. McPherson	詹姆斯·B.麦克弗森
Hard Times	哈德泰姆士
Grand Gulf	大海湾
Bruinsburg	布鲁斯堡
Port Gibson	吉布森堡
John C. Pemberton	约翰·C.彭伯顿
John Fiske	约翰·菲斯克
Satartia	萨塔希亚
Yazoo river	亚祖河
Haynes's Bluff	海恩斯海崖

Father of Waters	百川之父
John Elliott Cairnes	约翰·埃利奥特·凯恩斯
John Stuart Mill	约翰·斯图亚特·米尔
William E. Gladstone	威廉·E.格拉德斯通
Manchester	曼彻斯特
William E. Forster	威廉·E.福斯特
Liverpool	利物浦
Thomas H. Dudley	托马斯·H.达德利
Geneva Tribunal	日内瓦法庭
Alexander Cockburn	亚历山大·科伯恩
Messrs. Laird	莱尔德造船公司
Birkenhead	伯肯黑德
Circumlocution Office	兜圈子部
Robert P. Collier	罗伯特·P.科利尔
Foreign Enlistment Act	《外国征兵法》
John Harding	约翰·哈丁
Welsh	威尔士
Azores	亚速尔群岛
Treaty of Washington	《华盛顿条约》
Newcastle	纽卡斯尔
George Cornwall Lewis	乔治·康沃尔·路易
S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
Emancipation Society	解放社
Christopher Newman Hall	克里斯托弗·纽曼·霍尔
Charles Spurgeon	查尔斯·斯珀吉翁
Duke of Argyll	阿盖尔公爵
George Campbell	乔治·坎贝尔
Thomas Milner Gibson	托马斯·米尔纳·吉布森
Bristol	布里斯托尔
Anti-Corn Law League	反谷物法同盟
Exeter Hall	埃克塞特大厅
Bradford	布拉德福德
Gloucestershire	格洛斯特郡

Leeds	利兹
Bath	巴斯
Edinburgh	爱丁堡
Paisley	佩斯利
Birmingham	伯明翰
Merthyr Tydvil	梅瑟蒂德菲尔
Glasgow	格拉斯哥
Trades-Unions	伦敦工会
Anti-Slavery Society	反奴隶制协会
Paul and Onesimus	保罗和阿尼西姆
Old Testament	《旧约》
Spectator	《观察家》
Thomas Carlyle	托马斯·卡莱尔
Ilias Americana in Nuce	《简述美国的伊利亚特》
American Notes	《美国纪行》
Martin Chuzzlewit	《马丁·朱述尔维特》
Anthony Trollope	安东尼·特罗洛普
Alfred Tennyson	阿尔弗雷德·坦尼森
Benjamin Disraeli	本杰明·迪斯雷利
Preston	普雷斯顿
Sheffield	谢菲尔德
James D. Bulloch	詹姆斯·D.布洛克
Austen H. Layard	奥斯汀·H.莱亚德
Meikleour	梅克卢尔
Broad Arrow	“宽箭”号
Portsmouth	朴次茅斯
Judah P. Benjamin	朱达·P.本杰明
Crimean War	克里米亚战争
Veteran Reserve Corps	退伍军人预备役
New York State National Guard	纽约州国民警卫队
Knoxville	诺克斯维尔
Rock of Chickamauga	查特努加之岩
Bellaire	贝莱尔

Columbus	哥伦布
Indianapolis	印第安纳波利斯
Stevenson	斯蒂文森
Bridgeport	布里奇波特
battle of Missionary Ridge	传教士岭战役
New Hampshire	新罕布什尔
Willard's Hotel	威拉德酒店
Wilderness	威尔德内斯高原
Spottssylvania Court House	斯波特瑟尔韦尼亚法院
Salient	萨利安特
battle of Cold Harbor	冷港战役
City Point	锡蒂波因特
John Schofield	约翰·斯科菲尔德
Dalton	道尔顿
Mark Antony	马克·安东尼
Brutus	布鲁图斯
Cassville	卡斯维尔
Etowah river	埃托瓦河
Kingston	金斯敦
Allatoona	阿拉图纳
battle of New Hope Church	新希望教堂战役
Kenesaw Mountain	科尼索山
Big Shanty	大棚屋
North American Review	《北美评论》
Asa Gray	阿萨·格雷
Charles Darwin	查尔斯·达尔文
Appomattox river	阿波马托克斯河
Fort Stevens	斯蒂文斯堡
Horatio G. Wright	霍雷肖·G.赖特
Chattahoochee river	查特胡奇河
John B. Hood	约翰·B.胡德
Republican 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共和党全国执行委员会

National Committee	全国委员会
battle of Mobile Bay	莫比尔湾战役
Fort Morgan	摩根堡
Gulf of Mexico	墨西哥湾
Vermont	佛蒙特州
Maine	缅因州
Thomas Buchanan Read	托马斯·布坎南·里德
Sheridan's Ride	《菲利普·谢里登之行》
James E. Murdoch	詹姆斯·E.默多克
New Jersey	新泽西州
Ralph Waldo Emerson	拉多夫·沃尔多·爱默生
Phillips Brooks	菲利普斯·布鲁克斯
Agassiz	阿加西
Harriet Beecher Stowe	哈里特·比彻·斯托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
August Belmont	奥古斯特·贝尔蒙特
Homestead Act	《宅地法》
Fort Lafayette	拉斐特堡
John P. Hale	约翰·P.黑尔
Connecticut	康涅狄格州
Knights of the Golden Circle	金环骑士团
Horatio Seymour	霍雷肖·西摩
Clement Vallandigham	克莱门特·法兰迪加姆
James Bryce	詹姆斯·布莱斯
Oliver Cromwell	奥利弗·克伦威尔
Schleswig-Holstein war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
Königgratz	克尼格雷茨战役
Sanitary fairs	卫生义卖会
National Army	国民军
John Brough	约翰·布拉夫
Thurlow Weed	瑟洛·威德
Francis Lieber	弗朗西斯·利伯
Augustus Saint-Gaudens	奥古斯都·圣戈登

Charleston Courier	《查尔斯顿信使》
Caswell County	卡斯韦尔县
Richmond Examiner	《里士满检查者》
Miller's Almanac	米勒年历
Mrs. MacGuire	麦奎尔夫人
Mrs. Putnam	普特南夫人
Jabez L. Curry	杰贝兹·L.柯里
Basil Lanneau Gildersleeve	巴兹尔·兰诺·吉尔德斯利夫
Florence	佛罗伦萨
Weldon	威尔顿
Augusta	奥古斯塔
Presbyterian Anniversary	长老会周年纪念日
Charlotte	夏洛特
Danville	丹维尔
Thomas Dabney	托马斯·达布尼
Macon	梅肯
Joseph E. Brown	约瑟夫·E.布朗
Nitre and Mining Bureau	硝石矿业局
Bermuda	百慕大
Nassau	拿索
Galveston	加尔维斯顿
Cape Fear river	开普菲尔河
Fort Fisher	费希尔堡
Henry Grady	亨利·格雷迪
James A. Seddon	詹姆斯·A.塞登
George Gary Eggleston	乔治·盖瑞·埃格尔斯顿
Episcopal Church	圣公会
Mason and Dixon's line	梅森-迪克逊线
Cartersville	卡特斯维尔
Julian	朱利安
Uncle Billy	比利大叔
Milledgeville	米利奇维尔
Gulf States	海湾各州

Michigan	密歇根州
Hugh J. Kilpatrick	休·J.基尔帕特里克
Attila	阿提拉
John A. Logan	约翰·A.洛根
Howell Cobb	豪厄尔·科布
Hampton Roads Conference	汉普顿锚地会议
Charles I	查理一世
Goldsborough	戈尔兹伯勒
Combahee	康贝河
Edisto	埃迪斯托河
Pedee	皮迪河
Joseph Wheeler	约瑟夫·惠勒
Wade Hampton	韦德·汉普顿
Fayetteville	费耶特维尔
Edward Ord	爱德华·奥德
John G. Parke	约翰·G.帕克
Southside	邵斯赛德
Dinwiddie Court-House	丁威迪法院
battle of Five Forks	五岔口战役
Amelia Court-House	阿梅利亚法院
Rally Round the Flag	《集合到国旗下面来》
Godfrey Weitzel	戈弗雷·韦策尔
McLean	麦克莱恩
Inman line	英曼航海公司
Stock Exchange	证券交易所
Wall Street	华尔街
Trinity Church	三一教堂
Te Deum	《赞美颂》
Gloria in Excelsis	《荣归主颂》
My Country 'tis of Thee	《我的国家属于你》
Star-spangled Banner	《星条旗之歌》